中国历史百科全书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HISTORY





第三卷

军　　事

主编　徐　寒

吉林大学出版社

目　录

一、兵役制度 …………………………（1）
【部族兵制】 ……………………（1）
【全面征兵制】 …………………（4）
【部分征兵制】 …………………（7）
【职业兵制】 ……………………（10）
【世兵制】 ………………………（12）
【募兵制】 ………………………（14）
【古代军训】 ……………………（18）
二、兵器装备 ………………………（21）
【十八般兵器】 …………………（21）
【棍】 ……………………………（21）
【戈】 ……………………………（22）
【矛】 ……………………………（23）
【戟】 ……………………………（24）
【枪】 ……………………………（25）
【镋钯】 …………………………（26）
【斧】 ……………………………（27）
【剑】 ……………………………（27）
【刀】 ……………………………（29）
【弓箭】 …………………………（31）
【弩箭】 …………………………（32）
【投枪】 …………………………（36）
【砲】 ……………………………（36）
【弹弓】 …………………………（37）
【火枪】 …………………………（38）
【火炮】 …………………………（38）
【枪炮】 …………………………（40）
【火箭】 …………………………（43）
【头部防护具】 …………………（44）
【身体防护具】 …………………（45）
【手持防护装备】 ………………（46）
【兵车】 …………………………（47）
【攻城器械】 ……………………（49）
【守城器械】 ……………………（50）
【障碍器材】 ……………………（51）
三、军事编制 ………………………（52）
【四大兵种】 ……………………（52）
【车兵】 …………………………（52）
【步兵】 …………………………（53）
【骑兵】 …………………………（54）
【水军】 …………………………（56）
【什伍之制】 ……………………（59）
四、统兵制度 ………………………（66）
【文武分途】 ……………………（66）
【军官制度】 ……………………（71）
【庙算】 …………………………（79）
【以文驭武】 ……………………（83）
五、兵礼军法 ………………………（90）
【交战规则】 ……………………（90）
【军营礼仪】 ……………………（93）
【军功制】 ………………………（95）
【军法】 …………………………（98）
六、战术战略 ………………………（102）
【步兵阵法】 ……………………（102）
【骑兵战术】 ……………………（108）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110）
七、兵书通览 ………………………（114）
【《孙子兵法》】 ………………（114）
【《吴子》】 ……………………（117）
【《司马法》】 …………………（119）
【《孙膑兵法》】 ………………（123）
【《尉缭子》】 …………………（126）
【《六韬》】 ……………………（129）
【《阴符经》】 …………………（133）

【《黄石公三略》】 ……… (135)
【《将苑》】 ……………… (136)
【《李卫公问对》】 ……… (138)
【《素书》】 ……………… (141)
【《百战奇法》】 ………… (142)
【《阵纪》】 ……………… (145)
【《兵法百战经》】 ……… (148)
【《三十六计》】 ………… (150)
【《兵经百篇》】 ………… (152)
【《曾胡治兵语录》】 …… (155)
【《乾坤大略》】 ………… (157)
【《兵谋与兵法》】 ……… (160)
【《练兵实纪》】 ………… (161)
【《兵机要诀》】 ………… (164)
【《防守集成》】 ………… (166)
【《火龙经》】 …………… (167)
【《海防图论》】 ………… (169)
【《海国图志》】 ………… (169)
【《百将传》】 …………… (174)
【《太白阴经》】 ………… (176)
【《武经总要》】 ………… (178)
【《武备志》】 …………… (182)
【《兵学新书》】 ………… (187)
【《治平胜算全书》】 …… (190)
【《知古录》】 …………… (193)
【《武经七书》】 ………… (194)
八、著名战役 ……………… (197)
【涿鹿之战】 …………… (197)
【鸣条之战】 …………… (200)
【牧野之战】 …………… (203)
【长勺之战】 …………… (204)
【韩原之战】 …………… (208)
【泓水之战】 …………… (209)
【城濮之战】 …………… (212)
【鄢之战】 ……………… (222)
【邲之战】 ……………… (223)
【鞍之战】 ……………… (223)
【鄢陵大战】 …………… (225)
【马陵之战】 …………… (225)
【桂陵之战】 …………… (225)
【即墨之战】 …………… (229)
【华阳之战】 …………… (232)
【长平之战】 …………… (232)
【巨鹿之战】 …………… (233)
【井陉口之战】 ………… (234)
【陈仓之战】 …………… (235)
【垓下之战】 …………… (237)
【马邑之战】 …………… (238)
【昆阳之战】 …………… (238)
【官渡之战】 …………… (239)
【赤壁之战】 …………… (246)
【街亭之战】 …………… (256)
【彝陵之战】 …………… (257)
【南中之战】 …………… (260)
【苦县之役】 …………… (263)
【关洛大战】 …………… (263)
【前秦灭凉、代之战】 …… (264)
【柴壁大战】 …………… (264)
【清口之战】 …………… (265)
【淝水之战】 …………… (265)
【常山之战】 …………… (268)
【邙山之战】 …………… (269)
【高梁河之战】 ………… (269)
【澶渊之战】 …………… (272)
【富平之战】 …………… (275)
【和尚原之战】 ………… (278)
【仙人关之战】 ………… (281)
【黄天荡之战】 ………… (282)
【郾城之战】 …………… (283)
【顺昌之战】 …………… (283)
【柘皋之战】 …………… (284)
【定川之战】 …………… (285)
【三川口之战】 ………… (285)
【好水川之战】 ………… (285)

【麟府之战】 …………………… (286)
【夏辽之战】 …………………… (286)
【永乐城之战】 ………………… (287)
【采石之战】 …………………… (287)
【十三翼之战】 ………………… (290)
【三峰山之战】 ………………… (294)
【钓鱼城之战】 ………………… (297)
【襄樊之战】 …………………… (300)
【北京保卫战】 ………………… (303)
【宁远之战】 …………………… (307)
【赤嵌城之战】 ………………… (311)
【雅克萨之战】 ………………… (313)
【乌兰布通之战】 ……………… (317)
【大小金川之战】 ……………… (320)
【虎门之战】 …………………… (323)
【三元里之战】 ………………… (327)
【浙东之战】 …………………… (330)
【吴淞之战】 …………………… (333)
【湖口之战】 …………………… (336)
【三河之战】 …………………… (339)
【大沽口之战】 ………………… (342)
【谢庄之战】 …………………… (345)
【高楼寨之战】 ………………… (348)
【金积堡之战】 ………………… (350)
【新疆之战】 …………………… (353)
【镇南关之战】 ………………… (356)
【甲午之战】 …………………… (359)
【天津卫之战】 ………………… (363)
【江孜之战】 …………………… (366)
【黄花岗起义】 ………………… (369)
【武昌首义】 …………………… (372)
九、军事人物 …………………… (376)
【孙武】 ………………………… (376)
【吴起】 ………………………… (390)
【田单】 ………………………… (395)
【白起】 ………………………… (396)
【王翦】 ………………………… (396)
【蒙恬】 ………………………… (397)
【项羽】 ………………………… (397)
【韩信】 ………………………… (399)
【周亚夫】 ……………………… (435)
【卫青】 ………………………… (435)
【霍去病】 ……………………… (436)
【马援】 ………………………… (437)
【窦宪】 ………………………… (438)
【李固】 ………………………… (438)
【窦武】 ………………………… (439)
【荀彧】 ………………………… (439)
【郭嘉】 ………………………… (440)
【司马懿】 ……………………… (440)
【邓艾】 ………………………… (441)
【钟会】 ………………………… (441)
【诸葛亮】 ……………………… (441)
【关羽】 ………………………… (442)
【张飞】 ………………………… (443)
【马超】 ………………………… (443)
【姜维】 ………………………… (444)
【孟获】 ………………………… (444)
【孙坚】 ………………………… (444)
【孙策】 ………………………… (445)
【孙权】 ………………………… (445)
【周瑜】 ………………………… (446)
【张昭】 ………………………… (447)
【吕蒙】 ………………………… (447)
【陆逊】 ………………………… (447)
【祖逖】 ………………………… (448)
【谢安】 ………………………… (449)
【谢玄】 ………………………… (450)
【苻坚】 ………………………… (450)
【王猛】 ………………………… (451)
【苏威】 ………………………… (451)
【韩擒虎】 ……………………… (452)
【杨玄感】 ……………………… (452)
【宇文化及】 …………………… (453)

【王世充】…………………… (453)
【窦建德】…………………… (454)
【刘黑闼】…………………… (455)
【翟让】…………………… (456)
【李密】…………………… (456)
【杜伏威】…………………… (458)
【李世民】…………………… (458)
【李靖】…………………… (462)
【李勣】…………………… (470)
【侯君集】…………………… (471)
【褚遂良】…………………… (471)
【徐敬业】…………………… (472)
【安禄山】…………………… (472)
【史思明】…………………… (473)
【李光弼】…………………… (473)
【王仙芝】…………………… (474)
【黄巢】…………………… (475)
【尚让】…………………… (476)
【刘知远】…………………… (477)
【郭子仪】…………………… (477)
【石守信】…………………… (491)
【潘美】…………………… (492)
【杨业】…………………… (492)
【戚继光】…………………… (501)
【宗泽】…………………… (506)
【李纲】…………………… (506)
【岳飞】…………………… (508)
【韩世忠】…………………… (533)
【张俊】…………………… (533)
【文天祥】…………………… (534)
【成吉思汗】…………………… (535)
【窝阔台】…………………… (538)
【术赤】…………………… (539)
【察合台】…………………… (540)
【拖雷】…………………… (540)
【蒙哥】…………………… (541)
【拔都】…………………… (542)
【元世祖忽必烈】…………………… (544)
【木华黎】…………………… (546)
【耶律楚材】…………………… (547)
【伯颜】…………………… (547)
【伯颜】…………………… (548)
【脱脱】…………………… (548)
【韩林儿】…………………… (549)
【刘福通】…………………… (549)
【徐寿辉】…………………… (550)
【陈友谅】…………………… (551)
【张士诚】…………………… (551)
【李自成】…………………… (552)
【张献忠】…………………… (555)
【朱元璋】…………………… (557)
【徐达】…………………… (559)
【李善长】…………………… (574)
【刘基】…………………… (574)
【汤和】…………………… (575)
【常遇春】…………………… (575)
【熊廷弼】…………………… (576)
【杨涟】…………………… (577)
【袁崇焕】…………………… (577)
【郑成功】…………………… (578)
【多铎】…………………… (590)
【多尔衮】…………………… (590)
【吴三桂】…………………… (591)

一、兵役制度

【部族兵制】

大约在公元前1027年（武王伐纣年份有多种说法，这里根据近代史学界较为常见的说法）的某日清晨，一支庞杂的军队正在当时称为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的一片平原上排列阵势。一辆战车载着一位左手握着一柄黄金装饰的青铜大斧、右手掌着白色的用牦牛尾装饰的战旗的君王来到阵前。这就是周国的国王姬发，历史上被称之为周武王，正在向他组织的反抗商朝统治的大军发布战前动员令。

这篇动员令以《牧誓》之名载入史册。内容大概如下："从西方远道而来的人们！我的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的人们！举起你们的戈，排齐你们的盾，听我誓师！古人有言：'牝鸡无晨（母鸡不在早晨鸣叫），牝鸡之晨，惟家之索（破败的意思）。'现在商朝国王受辛，一味听从妇人（指王后妲己）之言，搅乱祭祀祖先的规矩，不亲敬同胞兄弟；招徕各地的逃亡罪犯，还推崇他们、信任他们，把他们提拔为卿大夫，使这批罪人祸害百姓，在商国作乱多端。现在我姬发就是恭敬地奉行上天对于受辛的惩罚。今天开始进攻后，每前进六七步就要整顿一下阵势，请诸位注意了！每击打四五下、六七下就要整顿一下队列，请诸位牢记了！摆出我们的威势来！在这商朝行都的郊外，要像虎豹熊罴那样勇猛！不要杀死放下武器的投降者，把他们带回西方去服役。诸位奋勇前进！有谁不努力作战的，我就当场斩了他！"

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将他人怕老婆之类的家务事作为首要的战争理由是非常可笑的。但是如果考虑到当时参战的各部族都是严格的父系氏族部落，或许就能够理解周武王为什么把政治因素作为发动战争的第二层次的理由了。这场战役中周武王所指挥的显然是一支各部族的联军，由庸（今湖北竹山）、蜀（今川西陕南）、羌（今甘肃一带）、髳（今山西平陆）、微（今陕西眉县）、卢（今湖北襄樊）、彭（今房县）、濮（今川东鄂西一带），以及周族（以今陕西西安一带为中心）本身这9个部族组成。单是周族的兵力据说就有战车300



西周利簋

辆，虎贲勇士3000名，甲士45000人。而对方商朝的军队据说更有70万人之多。但商军人心离散，“前徒倒戈”，导致大败。商王受辛（史称纣王）逃回行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在满堆着金银财宝的鹿台纵火自焚而死。

武王伐纣后建立的周朝，采用了“封邦建国”的政策，将周族及其联盟部落的分支派往各战略要地殖民，成立城邦国家；同时又将各地表示服从周朝的地方部落封为方国。据说总数大约有800个大小国家。各国的军队由统治部族的全体男子（号为国人）组成部族军队。军队中的“甲士”是战车兵或徒步作战的“虎贲”，由“士”阶层以上的人来担任，是贵族兵。其余的平民担任步兵“徒”。而生活在这些城邦国家里的其他部族人（号为庶人）至多只是作为战地服务人员“徒役”，一般并不参战。城邦国家附近的土著部族（号为野人）则并没有任何参战的权利和义务。所以当时是以部族兵制为主。

据《周礼》等古籍记载，当时国人满20岁开始服役，参加军训和提供军事劳役；30岁正式轮流入伍参战；50岁后只参战，不再参加一般的劳役和训练；60岁后退役。平时征召十分之一的国人入伍，要自备口粮衣物。

东周春秋时期社会发生巨大变革，部族城邦国家逐渐向国土国家形式发展，作战方式也大为变化，徒兵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部族兵制逐渐向征兵制演变。庶人成为战斗兵，野人也逐渐被统一于国家户籍之内，开始承担兵役义务。

在西周以后的各少数民族皇朝统治期间，仍然实行这种部族兵为主的兵制。统治民族（一般为游牧民族）全族皆兵，作为朝廷的禁卫军；归降的非汉族部族也都征为部族兵，是朝廷的主力军；被俘收编的汉族士兵也组编为职业兵；而对普通汉族人则往往只征发劳役，不征兵役。

由匈奴、羯、羌、氐、鲜卑等部族建立的十六国以及北朝的少数民族皇朝，一般实行“胡汉分治”，以“国人”组成军队。国人一般都从16岁就开始服役，一直到60岁才下战场。451年北魏太武帝围攻南朝在江北的据点盱眙，写信给刘宋盱眙守将臧质说：“我派出的士兵，都不是我的国人。城东北是丁零族和胡族，城南是三秦地区的氐族和羌族。你杀死丁零族，正好是帮我减少在常山、赵郡造反的贼寇；杀死胡人，正好帮我减少并州的贼寇；杀死氐、羌族，正好减少关中贼寇。所以你尽情杀丁零人、胡人，对我没什么坏处。”东魏权臣、鲜卑化的汉族将领高欢在平定中原后，对鲜卑族人宣传说：“汉民是你们的奴隶，男人为你们种地，女人为你们织布，给你们粮食布帛，使你们得到温饱，你们为什么要欺凌他们呢?”而对汉族人则宣传说：“鲜卑是你们的客人，拿了你们一斛粟、一匹帛，就为你们打盗贼，让你们得安宁，你们为什么要仇恨他们呢?”

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实行“北南分治”，北面官府管理各少数民族，南面官府管理汉族。凡15到50岁的契丹族男子都列入兵籍，每名“正军”必须自备3匹马，打草谷、守营铺的家丁2人，全副铁甲、马具，4张弓，400枝箭，长、短枪，斧子、小旗、干粮袋、200尺拴马绳索等等用品。契丹士兵组成由皇朝主力军“御帐亲军”（由投降及被

俘汉族军队组成的一些职业军团也被包含在内)，以及由皇帝、皇后指挥的“斡鲁朵军”（宫卫骑军)。先后被契丹征服的奚、渤海、室韦等部族组成“众部族军”、“乣军”。而15~50岁的汉族男子被征发为“五京乡丁”，主要承担地方警戒，提供劳役，据说总数达到117万多人。

党项羌族建立的西夏实行的也是部族兵制。根据游牧特点，每一家为“一帐”，男子15岁以上服役，“二丁取一”为正军，每两名正军出一名杂役，合称“一抄”，居住一个帐篷。每名正军配有马、骆驼各一匹，还要自备一匹骆驼，以及弓箭、帐篷。至60岁才退役。在下达征兵令时也是按照部落下达，部落首领带兵出征，号为“一溜”。被认为勇悍的汉族人也被征发为“撞令郎”，作为先锋出战。其余的汉族人只在后方耕种，提供劳役。

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情况略有不同。女真族人男子17岁开始服役，武器、马匹、粮草都要自备。编制为由围猎组织发展而来的“猛安”（原为千夫长)、“谋克”(原为百夫长）军队，以后将大量被征服的部落人民也纳入到这一编制中来，包括了契丹、羌、奚、渤海等部族，也有汉族降军，因此是一种职业兵化的部族兵制。但在外表上都按照女真风俗剃光前额头发，后部头发梳为长辫，以利骑射。1149年后为适应南侵需要，正式规定被征服的原宋朝统治地区的汉族人都必须服兵役，号为“签军”，因此又转变为全面征兵制。

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在统一全中国过程中逐步由完全的部族兵制向世兵制转化。蒙古族兴起时，全族15~70岁的男子全体为兵，按照部落编制出战。以后又将被征服的一些游牧民族士兵和蒙古士兵混编为“探马赤军”。消灭金朝后，在原金朝统治地区“括签”征发汉族人民为兵，组成“汉军”，平均每7户出一兵。消灭南宋后，将南宋的降俘将士组编为“新附军”。元朝在统一全国后，将这些军队士兵都列为“军户”户籍，世袭为兵。除蒙古族外的其他军户，每户可有4顷“赡军地”免税，但士兵应征时必须自备军马、武器、粮食。如果是贫困军户，签括附近三五户居民为“贴军户”，为“正军”（或称“军头”）准备行装。士兵战死，一年后征发该军户次丁服役；病死的，百日后即征次丁；逃亡的立即补征；无子绝户，即括签其他民户承役。

满族（即女真族改称）在关外建国之前就已创设了著名的“八旗兵”制度。据说八旗起源于满族围猎时的“牛录”（大箭）组织形式，原来是围猎后即告结束，1583年统一了女真各部的努尔哈赤将这种制度固定化，明确每300人为一牛录，以后又在1601年将牛录组编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四旗，1615年再新编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总合“八旗”（或许是因为围猎以旗帜为标识而得名，绿色因在树林中不显著而不用)。由此满族全体男子都被编为士兵，同时又将协助满族的蒙古族男子也按八旗编为军队。在入关前，又逐步将降附的汉族军队编为“汉军八旗”(全都按照满族风俗剃发梳辫)。凡编入八旗的人户，男子16岁成丁服役，但在出征时一般“三丁抽一”，留下的为“余丁”，负责供养出征士兵的装备、粮秣。出征“披甲人”所得战利品（包

括财产、奴隶）都应分配给余丁。入关后八旗兵拱卫北京一带以及在各战略要地设防，由朝廷圈占土地分配给八旗士兵。八旗都是世袭为兵，有固定粮饷。一直是清朝廷倚重的武装力量。

【全面征兵制】

公元前260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秦、赵两国为了争夺上党地区发生大战。赵军统帅廉颇在初战失利后，死守营垒，坚壁不出。后来赵王阵前换将，撤换廉颇，让善于夸夸其谈的赵括来统兵。秦国知道这个消息后，也秘密任命白起为统帅，引诱赵军出击，以奇兵截断赵军后路，将赵军与国内的联系隔断。为了防止赵军突围，秦昭王亲自赶到靠近战场的河内郡，把当地15岁以上的男子统统征发为兵，赶到前线，将赵军团团包围。40万赵军被围46天，反复突围都被秦军堵截。赵括在突围中被秦军射死。赵军最后被迫投降。白起下令屠杀了这几十万战俘，只让240个年纪小的士兵回到赵国。赵国前后损失将士达45万之多，而全力动员的秦军也死亡过半。虽然打到赵国首都邯郸城下，但也是强弩之末，最终被楚、魏等国联军打败。五年后燕国认为赵国青壮年都已丧身长平，少儿尚未长大，兵源不足，就派遣大军进攻赵国，却被重新起用的赵国老将廉颇领兵击败。



白起画像

从这几场大战可以看到，当时各国都已实行了全民皆兵的征兵制度，任何男子都必须为朝廷上战场拼命，必要时连少年都要从军。这种全面征兵制与近代的义务兵役制相似，以法律规定全体男子都负担兵役义务，平时轮流为朝廷当兵，战时则全部出战。《战国策》里记载说客苏秦列举的各国兵力：齐国地方2000里，“带甲数十万”，临淄城有7万户人家，必要时可以征发20万人当兵，也就是说每户可以出兵3人；赵国地方2000里，也是“带甲数十万”，必要时可以组建百万大军；魏国有武士20万，起辅助作用的苍头20万，断徒10万；韩国地方900里，也有“带甲数十万”；燕国地方3000里，“带甲数十万”；楚国地方5000里，“带甲百万”；秦国自昭王时代就有“锐士、虎贲百万”。一般估计战国时期总人口在2000万左右，而这七国的总兵数将近500万，居然要占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即使其中有夸张的成分，仍可见当时兵力动员强度之大，真的可说是“扫地为兵”。如该书提到的楚国东部地区守将昭常所说，在该地区“悉五尺之六十”，就可以征发30万人的军队。而当时一般以身高6尺为少年，7尺为成年，可见是将男子全部征发为士兵。有时甚至妇女也

要为战争提供劳役，在守城战时，妇女也要参战。如《墨子》里讲述守城时城墙上每50步配备10名男子（6人持弩、4人持格斗兵器），壮年女子20名、老小10名，每人持矛。

这是和当时的国家制度以及战争形态相吻合的兵役制度。战国时期各国都普遍实行了郡县制度，朝廷可以直接控制人户。而这时的战争也具有“总体战”的性质，各国不断以战争争夺土地、人口资源，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时间也越来越长。当时在铁制工具和牛耕技术促进下正在发展的小农经济勉强能够支撑这种强度的征兵。战国各国普遍实行军功爵位以及赏赐制度，平民可以凭借军功而跻身于上层社会，是当时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基本途径；同时因为军功也会得到经济上的好处，可以得到国家分配的土地以及奴隶等等的各类战利品。因此尽管动员强度如此之大（即使打一个更大的折扣，战国时的兵数占到当时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仍然是以后历朝从未达到过的动员强度），当时的这种兵役制度也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并没有严重影响各国农业的发展。

战国时期建立的这种全面兵役制度以秦国最为典型。根据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竹简材料来看，凡在秦国统治地区，身高达到6尺5寸以上的男子（17岁左右）都必须向官府进行兵役登记，称“傅籍”。之所以按身高登记，或许是因为在秦国扩张过程中新占领地区一时还来不及建立完整的户籍，当时刑事责任、结婚等民事行为能力的确定等都是以身高来确定的，秦国本土也是到秦始皇十六年（公元前231年）才“初令男子书年”。凡是登记者都必须如实报告身体状况，伪报的都要处以赀罚盾或甲的处罚。到达60岁的男子才可以提出免役申请。每个登记在册的男子每年必须为政府服劳役一个月，从事筑城、修路、架桥之类的公共工程，或从事运输物资，称为“徭役”。每位男子还必须服“戍役”（兵役），但一般情况下每次征发每户仅出一名。兵役期限不详，从睡虎地秦墓的墓主喜的年表来看，他当了四年戍卒后才复员，或许是完全根据战争需要而定。

根据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材料，“傅籍”在每年的8月进行。而征发令下达时间并不固定。征发徭役令下达后未立即出发的，要处以“赀二甲”；到达指定地点“失期”3～5日的，“谇”；6～10日，赀一盾；超过10日的，赀一甲。而戍卒征发令下达后不去报到为“逋事”，未到达指定地点是“不会”，要笞打50下。秦末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时，说是戍卒“失期，法皆斩”，或许是动员群众的口号。在睡虎地出土的一份木牍，是两个在淮阳服役的士兵惊夫、黑的家信，信中请求家里“急急急”给他们捎去购买越冬衣物的钱。看来服役士兵除了武器、盔甲和伙食外，穿衣问题还要自己设法解决。

秦统一全国后并不因大规模战争的结束而实行军队复员，反而北击匈奴、南戍五岭，据说总计征发了230万人的兵役，还不包括提供劳动力的徭役征发数。而当时的总人口大约是在2000万人左右。正常的兵役制度还不足以完成建立帝国统治所需要的人力，于是又有大量征发特定对象的“谪发”，公元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郡”，也就

是征发曾有逃亡前科的人，以及被世俗所轻视的赘婿（倒插门女婿）、商人作为征服五岭以南地区的兵力。以后还曾特意征发“治狱吏不直者”（违法裁判的法官）去参加筑长城或去攻打南越。据说按照当时制度，征发兵役先征发村落中“闾右”（有钱财者），然后再征发“闾左”。陈胜、吴广等戍卒据说就是被征发的“闾左”，最后不惜铤而走险，发动起义，并得到各地的响应，最终推翻了秦朝。

公元前206年，当刘邦率领军队占领秦都咸阳后，萧何进宫首先保护好秦朝的户籍档案，并带着这批档案撤退到汉中地区，成为以后征发各地兵役、组织军队的依据。西汉成立后，全面继承秦朝的兵制，所有的男子在年满20岁时（后来曾一度放宽到23岁）都要“傅籍”，至56岁除籍。可以免征兵役（当时叫“复”）的条件有“罢癃”，即身高未超过6尺2寸的；在县、乡二级担任“三老”（乡官）职务的；曾在汉高祖刘邦平城被围（公元前200年）的军队里服役过的；被评为“孝悌力田”的；能够通一经的读书人，或者是在朝廷所设的“五经博士”处跟随博士读书的博士弟子；家有90岁以上高龄老人的子孙；已经为国家提供了车马的人。另外，刘邦家乡丰沛地区的民户，皇家的亲属（宗室），功臣之家，曾跟随刘邦进入汉中根据地的二千石以上官员之家，爵位在五大夫以上的家庭，为国家放牧马匹的“牧户”，刚被迁徙到边境居住的民户以及刚流亡回乡的民户，都被“复其家”，免服兵役。对于父母去世而正在服丧的人则予以缓征。

汉代已有明确的服役期限。公元前183年首次明确戍卒的服役期为一年。以后的制度明确规定，和平时期每个男子在适役期间内应服两次为期一年的兵役。一次为“正卒”，到指定的军队驻扎地点服役，充当各地“材官”、“楼船”、“骑士”等兵种的士兵。另一次或者调到驻扎在京城的中央禁卫军“南北军”充当“卫士”，或者是派往边境地区充当“戍卒”。这种服役实际上是按照日数来计算的，根据在居延等地出土的汉代竹简，在服役时有“日迹簿”记录士兵的表现，有功或超额完成任务，可以“赐劳”，比如射击优秀的，可以“赐劳”15日；完成定额的可以“劳二日皆当三日”等等，制度相当严密。

除了兵役外，所有的男子仍然要承担每年为朝廷无偿劳动30日的“更役”，也称“更卒”。这种劳役可以出钱代役，但兵役不得出钱代役，即使是丞相之子仍然要去边疆服役。

和秦朝一样，汉代也有“谪发”。最著名的是所谓的“七科谪”，即集中征发被社会习俗视为贱民的犯罪官吏、逃亡者、男到女家的赘婿、商人、原来具有市籍（商人户籍）者、有市籍者的子女、孙子女。汉武帝时还曾征发死罪的罪犯、京城的亡命之徒去打朝鲜，征发各地的“恶少”去打大宛。

东汉虽然理论上仍然实行全面的征兵制，但实际上汉光武帝刘秀大规模裁军，主要依靠集中于中央的职业兵来维护统治，并不经常性的征兵。征兵制度在东汉时逐步松弛并趋于瓦解。职业兵在边疆和内地都成为主要的武装，在黄巾大起义后，割据一地的军阀大多也是职业兵。

战国秦汉建立的这种全面征兵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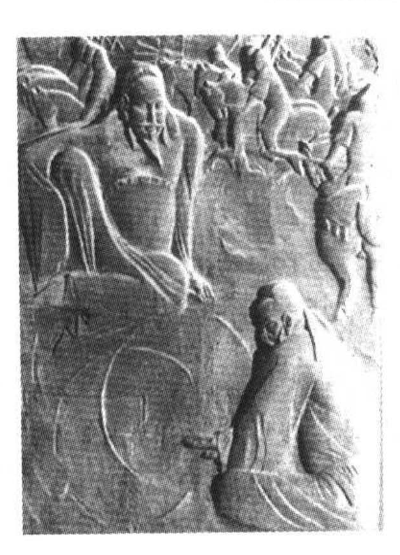
在以后各代不再是兵役制度的主体。全面征兵制需要臣民对于统治者有相当的认同感，对于所进行的战争有一定的“同仇敌忾”的意志，需要有自耕农经济基础的支撑，也需要有严密并被有效执行的法律，尤其需要有可提供士兵因服役而提高社会地位的阶梯。唐代诗人李贺的诗：“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当战功是平民步入社会上层、甚至可能为“万户侯”的主要机遇时，全面征兵制才有存在的可能性。

以上这些条件在以后的朝代都相当欠缺。统治者如同走马灯一般的转换，他们都为了自己一姓一氏的荣耀以严刑驱使人民投入厮杀。贫困的农民根本无力准备各种作战物资，而家中一旦失去劳动力也就是失去了最重要的谋生手段。被驱赶到战场的士兵也很少有可能因此发迹而步入上层社会，因为读书做官提供的是更保险的上升途径，而且在以后大多数的朝代，武将的地位总是被排在文臣之后。当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服从并遵守法令时，不仅说明这种法令本身就是蛮横的，而且也很难顺利得到贯彻实施。

后世仍然时常有强行全面征发兵役的事例，但征来的士兵丝毫没有战斗力，不仅常常打败仗，甚至还极有可能触发社会动乱。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十六国大乱时后赵石虎为讨伐前燕慕容皝，在所占领的各州“五丁取三、四丁取二”，组建50万人的军队，并规定每5名被征发的士兵要准备一辆车、两头牛、15斛米、10匹绢，“不办者以斩论”。结果穷兵黩武，内乱频发，导致后赵皇朝覆灭。前燕的慕容俊更走极端，为进攻东晋，在境内“校阅见丁”，每户只准留一丁，余下全部征发，打算凑一支150万人的大军。大臣刘贵上书极谏，“百姓凋敝，召兵非法，恐人不堪命，有土崩之祸”，才下令缓征。前秦的符坚为攻打东晋，在所占领地区按照“十丁一兵”比例大规模征发兵役，结果虽然拼凑起了号称百万的大军，却毫无战斗力，在淝水战役中被仅8万人的东晋军队打败，并导致前秦皇朝的垮台。南朝刘宋在450年大举北伐，将江淮地区六州居民“三五兵丁”（三丁征二、五丁征三），限令10天内报到，引起社会骚动，出兵后很快被北魏打败。唐末军阀刘仁恭割据幽州，为与朱温争夺中原，将所统治地区所有的男丁脸上刺字“定霸都”并征发为兵，读书人则在手臂上刺“一心事主”，统统驱赶上战场，混战几年后造成幽州地区十室九空，刘氏父子也自相残杀，结束其野蛮统治。女真族建立的金朝也曾恢复全面征兵制度，一有战事就“签民为军”。1159年完颜亮准备进攻南宋，下令将境内20岁－50岁的男子全部征发为兵，激起人民反抗。两年后完颜亮在攻宋战争中失败，因兵变被杀。这些事例给以后的统治者留下了深刻教训，因此在统治较为稳定时期都尽量不采用全面征兵制。

【部分征兵制】

《木兰诗》是广为流传的一首古诗，诗中写道木兰代父从军，“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这里的“军帖”大概就相当于今天的征兵通知书了。从“点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浮雕

兵”一词来说，木兰一家所遇到的征发，并不是上文所提到的那种“扫地为兵”的全面征兵制。这是一种以某种标准定期拣点、挑选某些人户来承担兵役的制度。可以称之为“部分兵役制”。

最典型的部分征兵制是西魏一北周开创、隋唐延续的“府兵制”。十六国以来中原地区少数民族政权一直实行部族兵制，并没有建立经常性的征发汉族民众为兵的制度。北魏分裂后，占据关中地区的西魏政权势力比较弱，为了在与东魏的战争中取得上风，西魏政权联合汉族世族豪强势力，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542年开始征发汉族人民当兵。550年正式建立“府兵制”。凡户等（按资产评定的户口等级）在6等以上的中上户，有三个儿子以上的家庭选择“魁健有力”者为府兵。应征府兵者可以免除本人的其他赋役负担，脱离一般的户籍，编为府兵的独立户籍。府兵平时驻扎在家乡，半个月演习操练，半个月警戒巡逻。战时征调参战，没有服役期限。府兵平时的生活用品以及作战的马匹是要自行解决的，因此才要按照人户的户等征发。《木兰诗》所说的“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就是在出征前自行准备马匹及马具的写照。

西魏－北周的府兵户籍单列，在被挑中后就要一直服役，与三国两晋南朝的世兵制相近。隋朝取代北周后，于590年进行了另一次改革，取消了军户的特别户籍，实行兵农合一。从所有21～60岁的男子中拣点府兵，被拣点后府兵按期轮换服役，由当地的军府统帅。可以说真正是实现了部分征兵制度。

府兵制被唐朝继承后，更发展为一套完整的、有效的制度。男子20岁“成丁”，每三年按照“十丁抽二”（唐太宗以后改为“十二丁征一”）的比例从全体成丁中拣点府兵，按照户等拣点有较多财产的、兄弟较多的、身材魁梧的为府兵。一旦点中即终身承担兵役。府兵平时仍在家乡耕种，只是每年冬季农闲时集中到当地的“折冲府”进行操练和演习。府兵在20～60岁的服役期内还要轮番到京师担任宿卫，或者到边境地区军镇值勤，这叫做“番上”。番上值勤的期限为两个月。规定按照值勤地点的距离而确定轮换期限，值勤地点距离500里外的，平均每5个月一次；1000里的，平均每7个月一次；2000里的10个月一次；2000里以上的平均12个月一次。如果是出征的，按照出征日期可以免除“番上”，但一般不得过“三番”。

被征为府兵的家庭可以获得免除其他的徭役义务。按照北朝以来的均田制，任何年满18岁的男子都可以获得政府分配的100亩土地，其中80亩是年老后要退还给政府的“口分田”，20亩是可以

传给后代的“永业田”。无论这个制度的实际操作情况如何，每个农民是否会分配到足额的土地，它至少表明朝廷主要的政策是扶植自耕农，而府兵制这种部分征兵制度也就是建立在这种自耕农经济基础上。每个府兵要自行装备好1张弓、30枝箭以及箭袋、横刀、磨刀石、解绳结的骨锥、大毡帽、毡褥、装行李的藤箱。去“番上”时的路费也是要自己掏的。如果番上值勤地点在500里内的，一年内就要值勤两次，加上路程，府兵大概要有将近半年的时间脱离农耕。上番在1000里外的，允许以“纳资”的方式来顶替值勤。因此只有家境富裕、有其他劳动力保证耕作的自耕农家庭才可能承担得了这项负担。府兵因参战没有按时更番还乡的，所分配的口分田可以由亲属耕种六年。府兵回乡，优先授予口分田。府兵战死，已分配的口分田由子孙继承，并免出租调。府兵因战功获得勋位，还可以按照勋位受田。

府兵制度是一种很精致的兵役动员制度，这和当时初唐社会风气普遍尚武、国家占有大量可供分配的土地资源、而社会经济正处在迅猛的恢复发展期等等历史背景有关。唐中期开始的“均田制”已运转不灵，农民分配到的土地越来越少，而因为频繁的对外用兵使府兵的“番上”不断增加，农民不堪重负，纷纷逃亡，府兵缺额日增。朝廷采用的对策是不断扩大拣点府兵的范围，强行征发。府兵制度成为人民痛恨的沉重负担，大诗人杜甫在《兵车行》中描写了其悲惨场面：

>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诗中“点行频”一句说明了拣点府兵以及府兵的番上频率大大增加，15～40岁的男子都在服现役，造成山东200州农村萧条，只有妇女下田耕作。而且府兵战斗力大降，如同被驱赶的“犬与鸡”那样上战场，一批批人无谓的牺牲在边疆。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皇朝更是无节制地征发府兵来补充军队，甚至连妇女也要征发提供战地后勤服务。如杜甫的另一首名诗《石壕吏》中老妇所言：“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诗人储光羲的诗中也说“妇人役州县，丁男事征讨。”实际上兵制已转变为全面的强行征兵，也不复有完整的制度可言。

部分兵役制度在明中期后曾一度恢复。1494年因为世兵制无法提供足够的警戒地方的兵力，朝廷制定“佥民壮

法”，规定以“里”（每110户编为一里）征发民兵性质的民壮，有七八百里的大州县每里佥2人，500里左右的州县每里佥3人，300里左右的州县每里佥5人。民壮平时由地方军事部门定期训练，不完全脱离生产；如有战事，由朝廷补给，调动出境作战。1543年又在每个州县原有的1500名左右民壮基础上，再规定大的州县增加1000名，中等州县增加六七百名，小的州县增加500名。但是民壮仅能应付地方治安，一旦要调动出境作战即逃亡殆尽。后来只得采用另行招募的办法解决兵源，部分征发兵役制度至此打上句号。而清朝入关后即对民壮进行大幅度裁减，仅允许每个州县保留五六十个民壮，担任一般的护卫警戒，与衙役合流，不再有军人的性质。

【职业兵制】

征兵制优点是兵农合一，可以节省一大笔养兵的财政费用，也不容易形成骄兵悍将势力威胁到朝廷的统治。但是缺点是士兵不专业，训练程度差，战斗力不强。因此即使是实行征兵制的朝代，实际上也都同时建立职业军队，作为一种军事突击力量。而在很多朝代，都是以职业兵制为主的。

职业兵制是规定士兵长期服现役，直到年老才退役的制度。这种制度有的是从百姓中强行征召士兵后不再允许其退出现役，强迫士兵服役到老；有的是从应征士兵中挑选出部分人长期服现役；有的是规定士兵子孙后代永远当兵（详见世兵制一节）；也有的是采用公开招募的办法，预先说明士兵的待遇，允许百姓来自愿选择受雇，充当士兵这一职业（详见募兵制一节）。

在战国时期各国已经开始建立起职业兵制度。比如《荀子》的“议兵”篇假借孙卿子的话评论各国军队说：齐国有“技击”的职业兵，规定在战场上能够斩得敌人首级一个的，就赏赐黄金，这种军队就如同是商人做买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用来对付小国敌军、小型战争还能够侥幸，如果遇到强国大战，士兵就会顿作鸟兽散，这是一种“亡国之兵”；魏国有“武卒”的职业兵，按照身高标准，并要求能够着全副盔甲，“操十二石之弩”，背负50支箭和3天的口粮，持戈带剑，一天中急行军100里，如果符合这一标准，士兵家庭可以免除其他徭役，由国家授予土地房宅，这种兵长期服现役，到老才退役，军队难以更新，而且国家赋税收入因此而减少，是“危国之兵”；秦国采用的是征兵制，用刑罚逼迫老百姓服役，使老百姓只能依靠从军作战才能获得社会地位和物质奖赏，这样组成的军队为“锐士”。孙卿子的总结是“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但是这些士兵又都不是春秋齐桓公、晋文公时期符合兵礼的、有“节制”军队的对手，而即使“桓文之节制”，也不能够抵挡商汤王、周武王时期君臣一心、君民合力的“仁义”之师。从这一段评论来看，提倡德礼的儒家对于职业兵制评价很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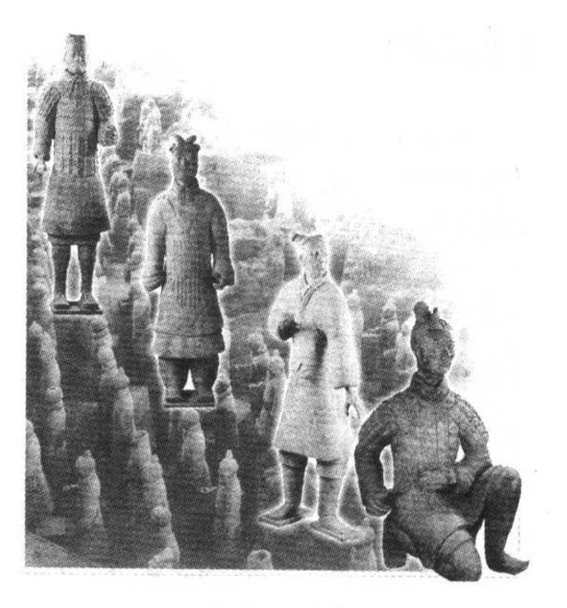
秦国征服六国的军队中，可能也有一定比例的职业兵部队。到了汉代，直属朝廷的中央禁军“南北军”中职业兵制比重逐渐加大。汉武帝在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6郡（在今甘

肃、陕西一带）选拔善于骑射的“良家子弟”，组成“期门”（约定时间在宫殿门下会合侍从皇帝的意思）卫士，大约有近千名。以后仍然从以上6郡中选拔“羽林”骑士，分为左、右骑，作为皇帝的侍从卫士，有时也作为精锐部队派往前线作战。又附设“羽林孤儿”，收留作战身亡将士的遗孤，长大后仍然服役。“期门”和“羽林”属于南军，都长期服役，是一种职业兵，但其身份很高，退出现役的可以被皇帝派到朝廷部门担任官职。

汉代同为直属朝廷的“北军”也有相当多的职业兵部队。汉武帝时期扩充“北军”、增设“八校尉”作为常备军编制，士兵都是职业兵，主要从朝廷所在的“三辅”（陕西关中地区）征召，长期服现役。八校尉是指：中垒校尉（负责北军的日常管理），屯骑校尉（负责轮训骑兵），步兵校尉（管训守卫皇室园林上林苑的部队），越骑校尉（也是一支管训骑兵的部队），长水校尉（管训长安附近地区由匈奴战俘组成的部队），胡骑校尉（管训泾阳一带匈奴战俘部队），射身校尉（轮训弓弩手的部队），虎贲校尉（轮训车兵部队）。这些部队都作为精锐，防卫京师，有时出征。以后又增设城门校尉，负责守卫长安的12座城门，士兵从外地各郡征调，也是长期服现役。这种军队出征边疆后也会长期服现役，如汉代古诗《十五从军征》称“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就是指这种职业兵。

汉代另一种形式的职业兵是“屯田兵”。汉代要防守绵延数千里的北方边防线，单靠戍卒轮替补充边防军队，代价很大。汉文帝时谋臣晁错建议“移民实边”，开始组织向边疆地区移民。以后汉武帝进一步推行屯田，将征召来的士兵迁到边疆，就地居住，亦耕亦战。这些士兵成为特殊的职业兵。他们从国家得到了一块荒地，得到一定的补贴，但平时要依靠自己的耕作过活，轮流值勤。这种兵制后来成为汉朝的传统政策，一直沿用到东汉。

后世的职业兵制度大多和汉代相近，士兵往往并没有选择这项职业的自由。除了下节要介绍的“世兵制”和“募兵制”以外，很多朝代是强行征召一批百姓充当终身士兵，由此建立起职业军队的。如东汉末年军阀袁谭在所占领地区招兵，“放兵捕索，如猎鸟兽”，即抓来的兵须终身服役。唐代中期发生“安史之乱”后，在平定叛乱的过程中，各地军阀依靠强行征发组建的军队也都是终身服役，后来成为割据一方的职业化藩镇军队。唐末五代时期军阀混战，基本上也是以强行征召百姓、强迫长期服役的办法来组建军阀赖以为生的职业军队。



秦兵马俑阵势

为了防止士兵逃跑，朱温（后梁太祖）下令在士兵脸上刺上军号（用针刺字后再涂上墨汁），在道路关口设立岗哨盘查，发现刺字的逃兵就予以处死。逃兵即使逃回家乡也没人敢收留。这种办法迅速被各个大小军阀采用，或者刺臂，或者刺额、刺脸，以至于招兵就称之为“招刺”。

职业兵的另一种主要来源是战俘。中国古代从来没有战时双方扣押战俘到战后交换，或者要求用钱财赎换战俘这样的交战规则，战胜的一方不是将战俘全部杀光泄愤，就是将健康的战俘全部补到自己军队当兵。最著名的事例是东汉末年曹操将十多万被迫投降的黄巾农民军改编为自己的“青州军”。又如辽朝初期将前来投降的杜重威、李守贞等部二十多万汉族军队改编为“控鹤军”、“义勇军”、“护圣军”、“虎翼军”等职业部队。以后清朝也将明朝的俘虏兵改编为绿营兵。

【世兵制】

东汉开始征兵制逐渐废弛，朝廷也没有改良的打算。史学家应劭曾说征兵制废弛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一方有难，三面救之”，急如星火地临时



汉习射画像砖（拓片）

征召百姓入伍，匆忙征集作战物资，“黔首嚣然”，将毫无训练的农民驱上战场，好比是“鸠鹊捕鹰鹞，豚羊弋豺虎”，经常打败仗。另一方面，土地兼并疯狂进行，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流离失所，被迫依附于世家大族，失去人身的自由，也丧失国家户籍，朝廷更难征兵。朝廷依靠的是职业化的北军等中央军队，在边境地区则依靠屯田兵以及匈奴等少数民族职业军队维持。

184年爆发了黄巾大起义，各地军阀乘机作乱，地方的世家大族也将依附的农民编成私人军队（号为“部曲”）加入混战，全国陷入空前的混战局面。经过十多年混战，“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军阀曹操在尸山血海的混战中崭露头角，逐步统一北方。为了保证他所赖以起家的职业军队的实力，曹操设定了世兵制度，将他军队中的士兵一律划为“士籍”（或称“士家”），户口单列，世袭为兵。士兵家属集中迁居到许昌一带居住，作为人质，如果士兵有逃亡叛降行为，就连带处罚其家属。士家的女子不得外嫁，只能在士家之间通婚。

曹魏的世兵制有配套的专门法规“士亡法”，即士兵逃亡要拷问其妻子，妻子即使不知情也要连坐处死。当时曾有一位妇女白氏由双方父母包办嫁给一士兵，才过门几天，连丈夫的面都没见过，结果就因为丈夫逃亡而被判死刑。门下省“贼曹”的官员卢毓引经据典加以反驳说：“妇女要在丈夫家祖宗牌位前拜过天地祖宗、与丈夫一起喝过同牢合卺之酒才算是成婚，白氏没有经过这些程序，所以还不是正式的士兵妻子，罪何所加？刑之为可，杀之为重。”曹操批准了卢毓的意见，才使白氏免遭处

死。另有一次军队中的吹鼓手宋金等人在合肥逃亡，官府抓了宋金留在许昌的妻子、母亲、两个弟弟，全部都判死刑。当时担任丞相府“理曹掾”的高柔向曹操建议：“士兵逃亡后也有后悔归队的，要是全部杀死他们的亲属，就会动摇军心，也不利于士兵悔罪。”曹操接受意见，将法令修改为逃亡士兵家属没为官奴婢，宋金的家属才得免一死。不久又有一个叫窦礼的士兵出营后失踪，军营以逃亡上报，将他的妻子及子女没为官奴婢。高柔当时已是负责司法的廷尉，仔细询问窦礼的妻子，得知窦礼是个极为爱护家庭的人，于是高柔要手下从仇人陷害的角度进行侦查，果然发现窦礼的被害尸体。窦礼的妻子、子女因此得以恢复为平民。

曹操设定的世兵制对于蜀汉、东吴也有影响。蜀汉以征兵制为主，但征发的少数民族士兵以及随刘备入蜀的老兵都划为士籍，世代为兵。东吴王朝的起家兵力大多为一些世家大族的私人“部曲”，以后将俘获收编的地方豪强私兵以及山越（当时在江南山区的越族）族士兵都编入士籍，户籍随带兵将领而转移，实际上具有浓厚的私兵性质。

三国时期的这种世兵制被两晋和南朝继承。不过东晋在江南建立统治时，士籍户口大为减少，军队兵员不足，为此统治者采用的对策之一是大量征发奴隶、逃亡者并将他们转为士籍，如 321 年将在扬州的因战乱沦为他人奴隶者都解放，充为士籍；以后又将江东地区被解放的奴隶集中到建康，转为士籍；在检查户口时将隐漏不报户口者发为士籍。二是将大量罪犯“补兵”，比如规定凡抢劫犯的伯叔、兄弟等亲属都要补兵。此外还规定有十多种罪名可以将罪犯“补士”。这样一来，士兵的地位急剧降低，成为法律上和习俗上的贱民阶层，战斗力更差。南朝沿袭这些制度，甚至常常以解除士籍作为刺激世兵奋勇作战的手段。实际上世兵制已不再是朝廷的军事支柱，当时人称世兵“或年已八十而犹伏隶，或年仅七岁而已从役”，老的老、小的小，根本无法作战，主要都是依靠招募的军队作战。以后的唐宋时期不再采用这种兵制。

元朝在部族兵基础上重建了世兵制。以后的明朝就沿袭了元朝的这一做法。明太祖朱元璋在统一全国后，将当时拥有的百万大军统一编制，在各地布防，还将所有的军人户籍单列为“军籍”，由军队的卫、所机构管理，世代为兵，并实行“以军隶卫，以屯养军”，分配给军户一些土地，轮流耕种、出操或征战。在一些新设定的驻军地区，从百姓中“垛集”征发军户。和元代制度相仿，每三户抽一户为“正军”，另两户为“贴户”。军户如果因战死、逃亡、绝嗣等原因而不再有丁可充当士兵，就要到该军户的原籍“勾军”，即将该军户的近亲属或者是原垛集的“贴户”勾为军户，填补空缺。军户不得脱籍，只有官至正二品的尚书才可以脱离军籍。军户之间的诉讼案件也由军队系统审理，罪犯除死罪以外都处身体刑后到其他地方“充军”，继续为军户。后来法律规定民户触犯的很多罪名也要“充军”，如《问刑条例》规定有 133 项平民犯罪的罪名要处以充军。

明代的世兵制显然要比前代完善，充分考虑到在保证兵源的同时使军队自给自足，并且注意不使军户脱离农业生

产，因此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是这一制度下军户更像是朝廷或军官的佃农，而不像是职业军人，训练程度以及作战能力都会受到影响，当受到持续的战争压力、士兵大量损耗的情况下也难以及时补充，每次“清军”（全面清查军户户口）以及“勾补”，都造成社会动荡。尤其是在当时重文轻武的社会环境下，科举入仕成为各个阶层最为羡慕的坦途，而军户却被明确排斥在科举仕途之外，使得军户子弟无法改变其社会地位，再加上动辄以“拿来做军”作为处罚罪人手段，更降低了军户的社会地位。这使得军户的士气极其低下，对于正常的训练、操典和征战，都没有多少积极性可言。因此在明朝建立百年后，世兵制已无法为朝廷提供有效的武装力量，只得转变为以募兵制加以补充，不但将边防军逐步改造为募兵，以后京军也募兵化了。世兵制逐渐消亡。

【募兵制】

雇佣兵是最典型的职业兵。不过要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背景下才会出现雇佣兵制度。中国古代比较具有雇佣性质的募兵在东汉末年已经相当常见。比如曹操起兵时就是毁家散财，招募了5000人马，后来觉得兵少，又与夏侯惇到扬州募兵4000人。刘备起兵，也是得到商人朋友的资助，招募起一支小部队。即使后来三国两晋时期建立起世兵制，仍然有招募士兵的情况。比如西晋时为镇压凉州树机能叛乱时，将军马隆招募弓弩兵，条件是下腰能张开30钧的弩、或能够拉开4钧的弓并能中靶者，当天就招募到3500人。尤其是东晋退居江南时，往往采用招募的办法来组编军队。比如祖逖要求发起北伐，东晋朝廷只想偏安，为了敷衍，就拨给他1000人的口粮、3000匹布，让他到江北自行招募军队。祖逖带着自己的部曲私兵过江，船到中流，他发誓不扫清中原誓不过江。后来靠他的忠勇感动并招募成一支军队，曾一度收复黄河以南地区。以后东晋为防卫长江防线，也在扬州设立军府，招募在江淮之间的各种流民武装，整编为正规职业军，号为“北府兵”（因在建康以北而得名），是东晋皇朝的主力部队，以在淝水大战中打败前秦大军而闻名。

招募士兵实现经常化、制度化，是在唐朝。虽然唐朝建立了严密的府兵制度，但在发动对外战争时，府兵制不足以提供优秀的兵员。为此唐太宗在征高丽时决定实行募兵，自称：“我募兵，募十得百，募百得千。”果然顺利招募到10万人马，名将薛仁贵就是这次应募的士兵。以后唐朝依靠募兵组建起中央禁军的主力部队。中央禁军“北衙”是职业兵。唐皇朝进占关中后，将部分一直跟随作战的三万“义兵”改编为“元从禁军”。以后又规定其子孙世袭为兵，称“父子兵”。唐太宗又抽调其中善于骑射的士兵组成“飞骑”部队，作为皇帝的贴身随从军队，平时分左、右两营。这支部队从“百骑”，发展到“千骑”、“万骑”，实力不断增加，大量从功臣子弟、“良家子弟”中征召士兵，改称左、右“龙武军”。原来由府兵轮值的左、右“羽林军”、左、右“神策军”也被规定长期服役，成为职业兵，总称为“北衙六军”，在安史之乱后历经重建，成为主要的朝廷军队。

由于唐中叶后长期进行对外战争，在边疆地区也逐渐建立起职业军队。原来是由府兵轮流到边疆服役，当战事发生，府兵即留在边疆作战，727年起开始规定边防府兵如服役3年，赐物20段（当时以绢帛为货币），以后就明确各边镇可以直接招募士兵。自愿长期服役的府兵可以免除其他的赋役，家属可以随军，在军队驻地附近授予均田耕种。职业化的边防军人号为“长征健儿”。边镇往往招募当地游牧少数民族士兵，如安禄山、史思明等都是被招募的少数民族士兵，后来他们也就是依靠这种职业军队起兵发动叛乱的。

主要依靠募兵制来组建军队的是宋朝，而且宋朝的募兵制是以雇佣兵制为主的，服役期间的士兵有明确的薪饷。根据王曾瑜先生《宋朝兵制研究》一书，北宋时禁军士兵俸钱分为五等，上禁兵（仅中央的四军）每月1贯（1000文）；中禁兵两等，分别为每月为700文、500文；下禁兵两等，分别为每月500文、300文。月粮3—2石，每年发给服装衣料6匹、绵12两，随衣钱3000文。厢军士兵俸钱分三等，每月300—500文，口粮2石，并根据所在地区发放衣装钱物。此外还有薪水钱之类的补贴，以及一些特别的赏赐，比如朝廷三年一次的“郊祀”（祭祀上天）、每年的几大节日都有“特支”赏赐。南宋有《请受格》的专门法律，按照士兵等级细致规定待遇，一般而言，作战士兵每月的俸钱3贯，口粮1石，冬季衣料4匹。

当然这份兵俸也不是随便就可以挣的。招募士兵有严格的条件，有朝廷定下的各军身材体格标准，招兵时还会派出“兵样”（标准身材的士兵模特），或用表示各军标准身高的标尺“木梃”米衡量应募者。中央的上四军要求最高，身高要求在5尺8寸（1.80米）至5尺7寸（1.78米）；一般禁军的士兵要求5尺5寸左右（1.71米）；大部分厢军只要求超过5尺2寸（1.61米）就可以了。据说宋太祖时招募士兵还要求身材“琵琶腿、车轴身，取多力”。后来招募时都要当场测试“阅驰跃、试瞻视”，即测试应募者跑跳动作以及视力。测试通过后就在士兵脸上刺上“指挥”（宋代军队基层编制）两个字，在具体分配后再刺上部队名称，并给予衣服和一定的现钱，号为“招刺利物”。这就算是入伍了。



西晋持盾、持刀俑

雇佣兵制既然是采用契约关系来组织军队，自然应该是“好钱买好货”，强调的是精兵主义。这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是如此，比如中世纪欧洲，瑞士雇佣兵曾在很多国家军队服役，作为该国的精锐部队，甚至很多国家（包括法国这

样的大国）的王室卫队都是由瑞士雇佣兵组成。可是两宋朝廷的募兵制却意不在此。宋太祖指出募兵、养兵是惟一“可以利百代者”：在饥荒发生时，“有叛民而无叛兵”；丰年作乱，“有叛兵而无叛民”。苏东坡说得更简洁：饥荒时将难民收募为兵，就可以防止难民造反。凶悍之人无时不有，在灾荒来临时就会倡首作乱，将这些人招募为兵，他们的凶悍之气有发挥余地，又能安稳饭碗，于是就不会提倡造反了。尽管实际上招募饥民为兵并不能防止农民起义的发生（两宋农民起义发生的频率并不低于任何朝代），可是两宋历朝皇帝都信奉这一既定国策，一有灾荒就开始招募，于是军队员额不是根据国防需要而是按照政治需求而日益膨胀。一直维持着历史上最为庞大的职业兵员，北宋初年禁军就达到了66万多人，北宋中期后长期保持在100万人以上，造成所谓的“冗兵”现象，朝廷财政的百分之七八十只好都用于养兵。

宋代的募兵制并不完全等同于雇佣兵制的另一个方面是，承担地方治安以及政府杂役的厢军士兵，有很大部分由罪犯组成。宋初为了表示“轻刑”，将很多应判徒刑、流刑的罪名改责“脊杖”，又规定某些罪犯在脊杖后还要刺配为厢军服役，后来类似这种对罪犯要刺配为兵的法律规定越来越多，罪犯也就成为厢军士兵的重要来源。

另外，阵亡士兵的子孙超过20岁的可以入伍领俸，或者在15岁以上的可以先领本俸，到20岁正式领俸。理论上士兵在60岁才退役，可是实际上这样的年纪已经失去了战斗力，于是军队中就有一批“老军”，提供一些军营勤务。

既然是企图将凶悍者收入军营，防止为患社会，因此对于应募的士兵并没有严格的品行上的要求，再加上罪犯也补入军中，对于士兵的操行显然不会有什么好处。中国古代将脸上刺字视为是一种莫大的侮辱，因为《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连这最简单的孝行都做不到，自愿或被朝廷在脸上刺字、毁伤父母给予的身体，显然是无赖之徒。因此宋代社会对于士兵的评价极低，民间因此形成所谓“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俗谚。

募兵制在宋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没有被统治者采用。但到了明中叶后，原来的世兵制度已无法提供维持朝廷统治所需要的武力，无论是朝廷直属的军队还是在外地镇守的军队都逐渐依靠招募来补充兵员。1559年戚继光在浙江招募4000名义乌矿工及农民组成军队，认真训练后投入实战，所向连捷，号为“戚家军”。以后这一做法在东南推广，能与倭寇一战的基本都是招募成军的部队。1567年戚继光调到北方，负责北京以北地区的边防，他要求招募并训练10万精兵。主政的张居正以在北京等地恢复全面征兵制为名，规定每户有三名男子的出一名参加训练，轮换征发，但却允许民间缴纳代役钱，由官府另行招募。实际上是以此为借口筹措一笔招募经费而已。这次招募30000多人，加上戚继光从浙江调来的老兵，与原有军队混编，重新训练，使北方边境转危为安。以后招募制推广到全国边境所有的军镇，都由当地统帅就地招募，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原来指挥、调动系统的新军。加上原有的世兵，军队数量竟然达到了150万

人以上。但是招募都由各地自行组织，并没有全国统一的制度。

清朝入关后，陆续收编投诚的、俘虏的明朝军队，并将其按照明末的基本制度一律改编为清朝的建制军队，总称为“绿营兵”（因打绿色旗号而得名）。在统一全国后，绿营兵被分散到各地驻防。规定绿营士兵终身服役，超过50岁后退出现役，不再可以领取粮饷，只有子弟仍然在营服役的可以支取每月3斗米的养老饷。绿营兵的招募制度比起前朝更为严密，只准招募部队驻地有户籍者，不得招募外来人员以及无户籍、无担保的闲散人员，即使是战时补充仍然要从原籍招募。这是为了让士兵顾虑到家属的安危，不敢轻易作乱犯上。而且绿营兵编制极其死板，固定编制后，缺一补一，不得超过。防止了绿营兵员像宋、明两代那样无限扩张，全国绿营兵员一直控制在五六十万左右。招募主要针对原绿营士兵的子弟，按照一定比例在绿营子弟中确定“余丁”，给每个月5钱银子的饷银。“余丁”年满16岁后就可以填补营中的缺额，不过仍然要通过考试。

绿营士兵的服役报酬有俸银、薪银、蔬菜灶炭银、心红纸张钱等。并按照士兵级别、兵种不同而有差别。一般来说马兵每月2两，步兵每月1两半，守兵每月1两。口粮一般每月3斗米。马兵要养马，另外给豆9斗、草30束（每束7斤）。如果调动出征，另外给一笔“俸赏行装”，马兵有10两，步兵有6两。而且在出征期间，每月另给“盐菜口粮”，兵丁每人每月9钱。阵亡的抚恤银按级别为40两到20两不等。

清末发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后，绿营兵、八旗兵都无法将其迅速镇压，太平天国农民军席卷了半个中国。清朝廷无奈之下，只好允许地方政府另行招募编练新军，这就是所谓的“勇营”。最为著名的就是胡林翼组建的“楚勇”，曾国藩组建的“湘勇”，李鸿章组建的“淮军”等。这实际上是重蹈了明末各军镇自行招兵的覆辙。各地招募成军的制度五花八门，但是后来最成功的湘军、淮军的制度都渊源于明代的戚家军，招募条件相当严格，士兵必须身家清白，有亲属连保，忠厚淳朴，孔武有力。测试后才可入伍，训练后才可参战。招募由带队军官主持，所招募的即为其所部，决不转换。军官死亡或转任，所招募的士兵即解散退役。这样就带有了私家军队的性质。和绿营往往长期积欠饷银不同，勇营总是尽量按期发足，按照士兵级别，每月饷银一般在4两5钱到3两之间。阵亡的抚恤银按级别为30两到10两不等。勇营的雇佣兵色彩较浓，士兵自愿应募，战斗力也较强。各勇营实行精兵主义，而且受到筹饷的制约，员额尽力压缩。湘军最庞大时也只有十万多人，攻克南京后立即全部解散退役。淮军后来成为清朝廷一支最重要的战略部队，但其规模最大时也不过六万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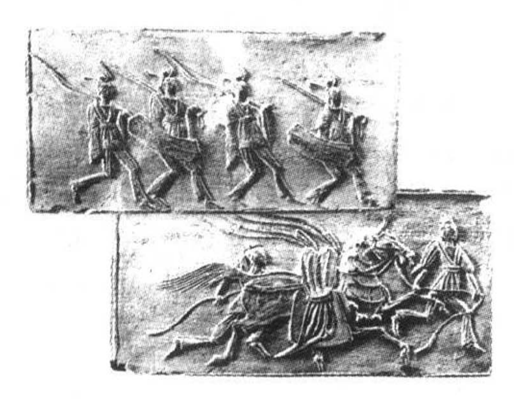
清朝的募兵制后来直接影响了中华民国时期的兵制，民国时期的军队都是招募成军，即使国民革命军北伐，仍然是募兵制。士兵月饷7块2角银圆，号为“吃七块二”。这种兵制难以保证有足够的预备役军人，适应当时频度高但规模小、程度弱的军阀混战。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由于军队大幅度减员难以补充，国民政府才开始宣布实行义务兵役制。由于很久以来中国汉族

普通百姓并不服兵役，结果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动荡。

【古代军训】

无论是经过哪一种途径征募来的士兵，都必须要经过训练才能完成普通老百姓到职业杀人机器的转变。

西周时士以上的贵族必须掌握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前四艺都和军事训练有关。



南朝武士画像砖

“礼”主要是“五礼”，其中就有“兵礼”，是战场纪律和交战规则。

“乐”既包括“师出以律”（战时为调整士兵步伐的军乐），也包括“武舞”，是手持干（盾牌）戚（战斧）的舞蹈，实际上是练习步战格斗。

“射”就是射箭，这是最主要的军事训练项目。除了平时勤学苦练外，朝廷以及各诸侯国还要经常性的组织比赛。据说这种比赛每年举行几次，最重要的是“大射”，是在宫殿前举行的全国性比赛。在诸侯朝见周王，以及周王设宴招待诸侯时，也要举行“宾射”、“燕射”来助兴。平民“国人”也要进行射箭比赛，称之为“乡射”，每年在春、秋两季各举行一次。

“御”是驾驭战车，当时战车要靠四匹马拉动，而马的挽具还不很合理，驭手全凭马缰控制马匹，使四匹马步调一致要有相当的技巧。尤其是战车很高（车轮直径一般在1.4米），车厢又短，转弯时很容易翻车。这些都必须要经过长期的练习。另外还要练习从飞驰的战车上迅速地跳下跳上，以适应车上、车下作战。

西周时朝廷每年还要进行军事演习性质的大规模围猎活动，据说每年的仲春季节注重于战斗队形的演练，以及步兵的队列训练，包括“坐作、进退、疾徐、疏数”；每年的仲夏季节演练野战宿营、夜间的警戒；每年的仲冬季节大规模围猎“大阅”，完全按照作战的要求集结军队，按时出动，以旗号金鼓指挥，实施冲锋、包围、追击等活动，并按战斗队形围猎。

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训练普及到全体平民士兵，而训练的主要内容也是射箭。春秋时吴王阖庐在与越国的战争中受伤身死，太子夫差继承王位后，“以伯嚭为太宰，习战射”，二年后伐越，大获全胜。《韩非子》称，战国初年李悝为魏文侯的“上地之守”，为了当地百姓“善射”，下令凡是疑难诉讼案件无法解决的，就由双方当事人比赛射箭，“中之者胜，不中者负”。于是百姓“皆疾习射，日夜不休”。后来与秦国作战，因士兵善射而获胜。更著名的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为了便于骑马和射箭，连服装也都要改革。后来赵国名将李牧，长期守卫赵国北部边境，为战胜前来袭扰的匈奴，每天杀几头牛犒劳士兵，督促士兵练习射箭骑马，使匈奴不敢来犯。

除了要求练习掌握射箭技能外，当时的军事训练内容还包括严格的队列操练，以养成士兵对于军队纪律的习惯性的机械式的服从本能，以及在近战格斗能够保持队列，赴汤蹈火，不敢犹豫。如孙武向吴国国君演示兵法，让宫女们进行队列训练，将不听指挥的宫女斩首示众，于是号令一下，队列整齐划一。士兵还要练习跑步、投石。秦国大将王翦率领60万大军进攻楚国，反客为主，坚垒深沟，不与楚军交战，每日巡行营垒，慰问将士，和士兵一起吃饭。一段时间后，王翦听说士兵都自觉以“投石超距”为游戏。于是王翦认为“士卒可用矣”，一举出击，打败楚军，降服楚国。

西汉时军队仍然着重于射箭训练。从居延发现的汉代竹简中可以发现，当时规定每年要对边防军队的下级军官“候长”等进行射箭考核，12箭中至少要有6箭中靶才算合格，中6箭以上者，可以“赐劳”15日（算作完成15个标准的训练日），可缩短服役期或给予其他的奖赏。此外还着重骑兵的骑术训练。西汉时在步兵中又推广“蹴鞠”作为军事训练辅助项目。蹴鞠是古代的足球，具体的规则现在已经难以考证，据说在战国时齐国、楚国已很流行。西汉军队推广这项运动，卫青、霍去病等将领领兵出塞，即使在荒漠地区扎营，也仍然要开辟球场。这是为了锻炼士兵的体力和身体灵活性，当时都将这项运动视为“兵技巧”。此外还开展角抵（摔跤）、徒手搏斗等训练。

据《旧唐书》记载，唐代府兵的日常训练主要有“习射”和“唱大角歌”。前者就是指练习射箭，后者是指每年冬天由本地折冲都尉指挥，以大角为号进行队列演练。职业兵射箭技艺要求比较高，比如对于羽林飞骑士兵，要求能够开“伏远弩”，射远300步远，4发2中；“臂张弩”射远230步，4发2中；“角弓弩”射远200步，4发3中；“单弓弩”射远160步，4发2中。

宋代建立起的雇佣职业军队，在禁军编制中专门设置“教头”的职务，专职训练士兵的战斗技能，但是士兵最基本的训练还是射箭。宋朝人华岳说，36种兵器首推弓箭，而18般武艺射箭为第一。按照宋代的制度，一般的弓箭手用的弓为1石2斗的拉力（约120斤左右），在有效射程60步（约90米）距离上，发射12支箭能中6支才算是合格。对于军队训练水平的考核也主要看士兵开弓的力度和射靶成绩。《武经总要》认为军队教习射箭，首先是要求能射准，其次才是能射远。禁军士兵平时训练80%的内容是练习弓弩，其次才是枪、牌格斗。

两宋的军队训练水平总的来说比较低。明代建国后建立的世兵制军队，由于军户的大部分时间需要种田养家，训练程度也不是很高。明中期组建起雇佣性质的职业军队后，一些将领开展精兵训练，收到很好的效果。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戚继光组建的“戚家军”。后来戚继光将他的训练方法编成书籍《练兵实纪》，对于以后的军队训练发生重大影响。《练兵实纪》主张军队采用精兵主义，要求士兵在军事训练中“练胆气”、“练耳目”、“练手足”、“练营阵”。针对当时火器已成为军队的主要武器，而火器发射速度慢需要格斗兵器保护的特点，大力训练士兵发射火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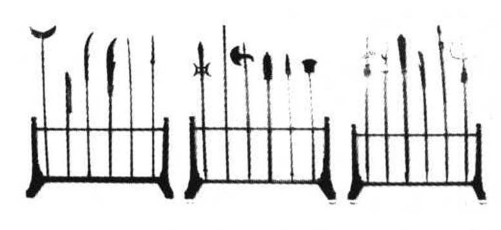
速度与精度，强调士兵对于格斗兵器的掌握，还要求士兵练足力，能够一口气跑一里路而不气喘。规定将士兵训练成绩列为九个等级，严格按等进行赏罚。而且强调训练要实用，如对于弓箭手的要求是射程不必太远（平时练习 80 步的靶子），着重练习射箭的准确性和贯穿力。这一套军队训练方法后来被清朝军队继承，尤其是晚清的湘、淮军，训练方法及制度都是从《练兵实纪》发展出来的。

二、兵器装备

【十八般兵器】

在古代，战斗的主要形式之一是士兵之间的格斗。“兵”这个字的原意就是这种格斗的器械，比如据中国第一本字书《说文解字》的解释，兵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械也”。根据儒家经典《周礼》一书的说法，西周时期中国军队的制式兵器统称为“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后世没有这种统称，到了元代民间开始流行“十八般兵器”的说法，主要的一种说法称这18种兵器是：刀、枪、剑、戟、棍、棒、槊、镋、斧、钺、铲、钯、鞭、锏、锤、叉、戈、矛。

古代把各类武器按照有效距离的长短而笼统分为“长兵”和“短兵”，包括了格斗武器和射远武器。我们为了叙述的方便，本节主要介绍格斗类兵器，姑且按照格斗时的使用方法，分抡击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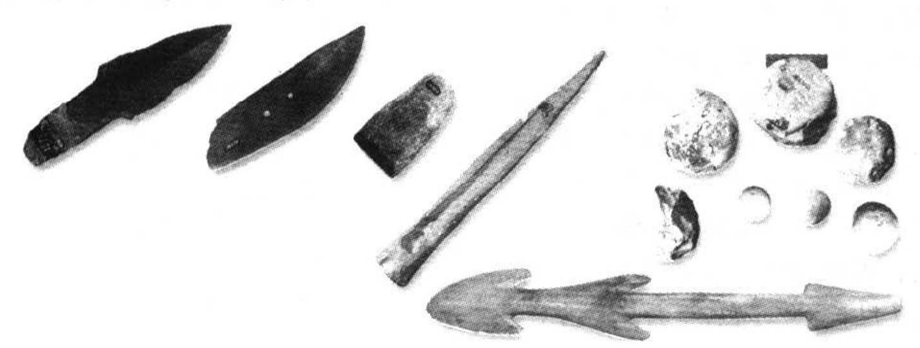


古代的十八般兵器

啄击类、刺击类、砍击类这样几大类来介绍。

【棍】

棍棒也许是人类最早用来攻击动物或同类的武器，因此这一印象长久地留在了人类的记忆里。在多种人类文化中，由棍棒转化而来的“权杖”一直是权力的象征。欧洲的国王在王座上行使权力时，手里总是持着权杖。在太平洋各土著民族社会中，部落头领标志自己身份的也是一根“大头棒”。中国古代社会也是如此。表示父亲的“父”字，原型



新石器时代武器

就是“[illegible]”，是一只右手举一根权杖的象形，表示父亲的权力。《说文解字》解释：“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同一本书中表示长官的“尹”字，原型也作“[illegible]”，解释是“治也。从又丿，握事者也。”直观的来看，握的也是一根棍棒。代表王权的“君”字，就是“父”和“尹”的扩大，但是加上了有权发布命令的“口”。“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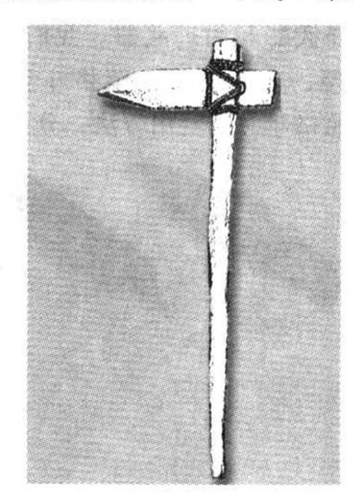
棍棒本身以后也依旧是一种主要的武器，在春秋战国时期称为“殳”，或者称“杵”、“杖”、“棒”、“梃”，是当时的“制式装备”。一般的殳只是一根硬木棍，是最下等的士兵的武器，比如“徒役”就是手持殳的一排徒步的步兵。而在湖北出土的7根春秋时期的曾侯用的殳，顶端有三棱状的铜头。在秦始皇陵出土的30根殳，可能是作为仪仗队的兵器，头部包有10厘米长的圆筒铜皮。

秦以后各代棍棒一般不再是正规军的制式武器，而农民在忍无可忍时举行起义，还会“揭竿而起”、“斩木为兵”，用棍棒武装自己。在正规军中，经过改良的棍棒武器只用于一些特殊的场合。有的前端加上了一些铁刺，号为“狼牙棒”（这曾经是蒙古重骑兵和长矛一样熟练使用的制式武器）；有的顶部是个铁皮或硬木制作的球，称为“骨朵”或“蒜头”；有的用铁链将两段或三段棍棒连接起来，号为“铁连枷棒”；在棍棒上加上刀刃，称为“大棒”。明代名将戚继光在镇守北方边界时，为了对付蒙古骑兵，再次将大木棍作为制式武器，规格为7尺长、2寸粗，3斤8两重，并在大棍上加上一片长5寸的刀片，叫“加刀棍”。

金属制成的棍棒状武器一般称“锤”、“椎”。《史记》一书记载，公元前257年，魏国的信陵君“窃符救赵”，随行的勇士朱亥袖里藏一根40斤重的铁椎，见大将晋鄙怀疑兵符的真实性，抽出铁椎一下子就打碎了晋鄙的脑袋。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出巡，张良派出的刺客用一个120斤重的铁椎打碎了秦始皇的副车。《说唐》里有尉迟恭和秦琼“三鞭换两锏”的故事，鞭和锏就是铜或铁制的棍棒，圆形竹节状的称为鞭，四方形的称为锏。不过实际上这两位大将并不用鞭、锏，倒是南宋的岳云“每战，以手握两铁椎，重八十斤，先诸军登城”。但后来的说书人把“椎”改成了“锤”，画像也画成了两个大圆球。北宋初年勇将王继勋，打仗时常用铁鞭、铁槊、铁檛，军中称为“王三铁”。

【戈】

在汉字里，凡是表示战争或武装之类意思的字绝大多数都属于“戈”部首，而且后世往往以“干戈”来统指所



石戈复原图



青玉刻铭戈

有的兵器，或者以“兵戈”来指战争。可见戈至少在文字产生时就已经是一种标准武器，而且从古代文献和考古材料来看，戈也确实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军队的制式装备。

戈的基本结构是在木柄上横绑一片刃具。在作战时需要挥动木棒，以这片刃具啄击或勾击对方。所以后来把它归类为“啄兵器”或“勾兵器”。刃具最早采用的是石、骨、蚌壳之类的材料，以后改成青铜。发展的形式是将刃具与木棒结合的部位加长，沿木棒延伸的部分称为“胡”，刃具称为“援”，刃具后部称为“内”。在胡与内上打有“穿”，以便用绳索捆绑在木柄“柲”上。而且胡与内也都可以磨削刃口，增加杀伤力。越是到后来，戈的胡越长，穿的数目越多，而援也做成弧形。按照《考工记》的记载，戈的标准规格是：宽2寸，内长4寸，胡长6寸，援长8寸，重1斤14两（约448克），柄长6尺6寸（周代8寸为1尺，每尺合今19.91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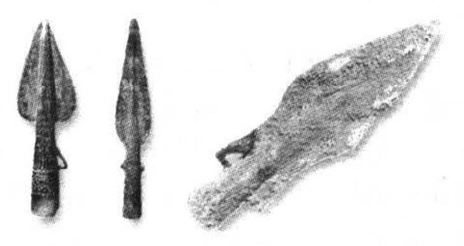
戈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兵器，至今为止还没有在任何其他的古代文明遗迹中发现过类似的兵器。有人认为这是远古的猎人受到鸟喙或兽角的启发，也有的人认为是从农民的镰刀发展而来。不过无论如何戈的有效杀伤范围实在是有限，因此戈本身在秦汉以后的军队武库中就再也不见了踪影，只有它和矛的结合兵器“戟”保留了下来。

【矛】

用来刺杀野兽或敌人的锐器，也是远古时代人们最早的工具兼武器。开始时是用兽角或尖形的石器安装在木杆上，到了青铜时代，开始出现了尖锋两刃、后部开有安装木柄的“銎”的金属矛头。从考古资料中可以知道，商代时长矛就已被作为主要的兵器，并发展出很多的种类。战国以后采用铁制矛头，杀伤力更大。

《周礼》“五兵”中的“酋矛”和“夷矛”，据《考工记》一书的记载，前者是步卒使用的，柄长2丈（约398厘米）；后者是战车上的甲士使用的，柄长2丈4尺（约478厘米）。这样长的矛恐怕很难近战，只能向前直刺，属于冲击型的武器。后来的长矛达到这个长度的就算出奇了，比如《三国志·蜀·张飞传》记载张飞用的长矛“长丈八”，按照当时的东汉1尺合今23.04厘米计算，张飞的长矛长度是414.72厘米，还短于周代车用长矛。

汉唐时期一般的长矛标准长度是8尺，略长于普通成年男子的身高（当时一般以7尺为男子标准身高）。有的更短，供骑兵单手使用，叫做“手矛”。长度达到“丈八”的一般称“槊”，或叫“铍”、“矟”。比如曹操征讨江南时，



商铜矛

在军中“横槊赋诗”，手持的就是这种长矛。

随着魏晋南北朝时马镫的普及，重甲骑兵可以稳坐在马背上，手持这种4米左右长度的长矛发起冲击，敌人很难阻挡。不过和后来欧洲中世纪时期的骑士一样，在马上熟练使用槊是一门很难掌握的技艺，要经过长时间的训练，也要有相当的天赋。根据《旧唐书》等史料的记载，唐初名将尉迟敬德（即尉迟恭）、程知节（即程咬金）等都是以这种技艺闻名。比如《程知节传》称：“程知节，本名咬金，济州东阿人也。少骁勇，善用马槊。”尤其是尉迟敬德更是号为天下第一的马槊高手。《尉迟敬德传》称“敬德善解避槊，每单骑入贼阵，贼槊攒刺，终不能伤，又能夺取贼槊，还以刺之”。能够躲避敌人的槊，而且还能够马上夺槊。齐王李元吉也善于马槊，要亲自和尉迟敬德比试马槊。尉迟敬德建议让齐王的槊保留长矛矛头，自己使用的则去掉矛头。比试几个回合，齐王都无法刺中尉迟敬德。秦王李世民赞叹不已，问尉迟敬德：“是夺槊难还是避槊难?”尉迟敬德回答说是夺槊难。李世民就要他去夺齐王的槊。双方再次比试，才一会儿，尉迟敬德就三次夺得齐王的槊。齐王李元吉视此为奇耻大辱，埋伏下日后相害的伏笔。

唐宋时期长矛还成为“禁兵器”，只能由国家掌握，一般的百姓不得私藏长矛，尤其是矟。按照唐代法典《唐律疏议》的规定，家中私藏矛、矟，要判处一年半徒刑；私自制造的，加重一等处罚（判处两年徒刑）。

【戟】

矛可以直刺，戈能够横击，两者结合的兵器必然是优势互补，这就是传奇式的兵器“戟”。最早的戟出土于河北藁城商代遗址，是简单地在长矛的矛头下绑上戈。而到西周时戟已是大为普及，最常见的是用青铜铸成的矛戈一体化的、呈现十字形状的戟。按照《考工记》的记载，戟的标准尺寸是宽1寸半，内为宽度的3倍，胡为宽度的4倍，援为宽度的5倍。刺长6寸，重1斤4两，柄长1丈6尺。铸造戈、戟的合金比例是“四分其金（铜）而锡居一”。

到了春秋时期，将戈绑在矛柄上的戟又再次流行，还出现在矛头下安两三个戈的两联装、三联装的戟。但到战国时期，随着钢铁铸造技术的进步，各国军队又开始大量装备矛戈一体化的戟。这时的戟的形制也逐渐脱离了原来戈矛的式样，内被取消，形成“卜”字形的戟体。

戟是战国秦汉时期军队的标准武器，史书里往往将“持戟”作为军队的代称。如《史记》记载平原君游说楚王，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此霸王之资也”。狭义的“持戟”是指宫廷或将幕府的卫士。著名刺客聂政刺杀韩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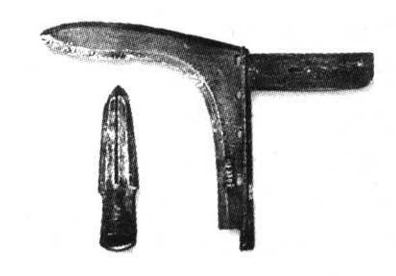
戟

相国侠累，侠累身边“持兵戟”的卫士众多，聂政直入案前，杀死侠累。韩信自称原来在项羽手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持戟”。

戟的杀伤力大，适合于单人作战，是秦汉时期将领们常用的武器。《史记》记载项羽亲自出战时“披甲持戟”。《汉书》记载西汉时“七国之乱”，灌夫的父亲被叛乱的吴王军队杀死，灌夫“披甲持戟”冲进吴军大营，一直杀到中军帐下后复出，以此“名冠三军”。《三国志》里有很多有关戟的传奇故事。比如董卓生性多疑，脾气暴躁，吕布为他部将时，偶尔为了一点小事惹了他生气，就将“手戟”（单手用的戟）扔将过去。曹操的大将张辽在逍遥津战役中“披甲持戟”，亲自冲锋陷阵，孙权只得退到小高地上“以长戟自卫”。

历史上使用戟最出名的将领是曹操的部将典韦。典韦原来是个刺客，曾独自以匕首为人刺杀仇人，然后逃回所乘车辆，取出“刀、戟”和追兵“转战数里”而逃走。投奔曹操后有一次和吕布军队作战，他带了几十个人，穿上两重铠甲，不用盾牌，“但持长矛撩戟”。在对方逼近到五步左右时，“手持十余戟，大呼起，所抵无不应手倒者”。平时他喜欢使用“大双戟与长刀”，军中号为“帐下壮士有典君，提一双戟八十斤”（“双戟”应该是指一矛两戈的两联装戟）。后来在张绣反戈时，他为掩护曹操，坚守中军帐，“以长戟左右击之，一叉入，辄十余矛摧”，最后力竭被杀。

或许可能戟的制造成本比较高，或者是戟的横击作用不再受重视，南北朝时的军队一般已不再装备戟，只有在特殊场合下，才会使用这一武器。比如南


秦铜戟、铜戈

陈将领章昭达率军进攻江陵，为破坏敌军运输军粮的索桥，“命军士为长戟，施于楼船之上，仰割其索”，终于断绝敌军粮道，得以攻破江陵城。有些将领还习惯用戟，如《旧唐书》记载唐代名将薛仁贵跟随唐太宗征高丽，安地城战役中他身穿白衣，手握长戟，腰挂劲弓，“大呼先入，所向无敌”。

历代的宫廷卫士也使用戟，戟从作战武器逐渐变成一种仪仗用具，有“陛戟”、“棨戟”等等名目。北朝隋唐时期的军队已不装备戟，但三品以上官员的家门口，可以“列戟”12 枝，显示府邸的威严气势。比如《旧唐书》记载唐初大臣张俭，兄弟三人几乎同时官至三品以上，三家宅院门前都树棨戟，人号“三戟张家”。开元时大臣崔琳与兄弟崔珪、崔瑶在东都洛阳私邸门口列戟，号“三戟崔家”。韦斌、韦陟、韦由、韦绍四兄弟先后官登三品，四家同时列戟，“衣冠之盛，罕有其比”。

【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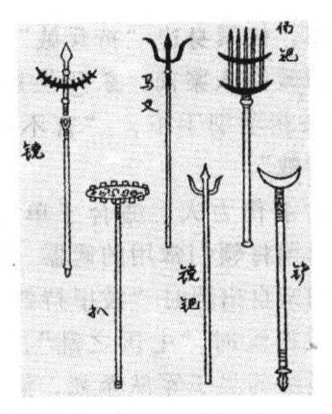
枪的原意就是指尖头木棒，应该也是一种极其古老的兵器。后世的枪和长矛相似，只是枪头比矛头要短小，枪杆一般仅等身长，比较轻便，利于格斗。战国时期步兵已开始使用枪，魏晋以后枪成为制式武器，既有步兵使用的枪，

也有骑兵使用的枪。比如唐初名将秦琼跟随李世民出征作战时，如果发现“敌中有骁将锐卒，炫耀人马，出入来去者”，他就“跃马负枪而进，必刺之万众之中”。唐中叶名将哥舒翰也善于使枪。有一次与吐蕃的战役中，他一个人手持半截枪阻挡三队敌军，由此成名。他平时在追击战时往往把枪架到逃敌肩上，大喝一声，乘敌人回头时，“从而刺其喉”，然后顺势往上一挑，“皆剔高三五尺而堕，无不死者”。五代后梁名将王彦章，“常持铁枪冲坚陷阵”，号为“王铁枪”。据《宋史》记载，南宋著名爱国将领岳飞也是使一杆“丈八铁枪”。

宋代枪已完全取代原来长矛的地位，成为最重要的兵器。宋代的军事著作《武经总要》称“阵所适用者，莫枪若也”，种类也发展到有十多种，有步兵专用于野战的素木枪、鸦项枪、四棱枪头的锥枪、枪头下有防夺短刃的太宁笔枪，专用于攻城的短刃枪、短锥枪、抓枪、蒺藜枪、拐枪，专用于守城的拐突枪、抓枪、拐刃枪、钩枪，有骑兵专用的单钩、双钩枪等等。总的特点是在刺杀为主的枪头侧面加上各种刃具以防对方抓夺，并且也起到一定的杀伤作用。明代军队制式枪有长枪、铁钩枪、龙刀枪，比较简单，而清代军队装备的枪和宋代一样也有十多种之多，主要特点是结合戟的形式，突出枪的侧击作用。

【镋钯】

明代的枪虽简单，但是却发展出一批多用途的刺杀类兵器，一般总称为镋钯类。其主要用途除了刺击外，还可以架开对方的兵器，是攻守兼备的兵器。



镋钯是在对付倭寇侵扰时出现的。倭寇善于近战肉搏，为了挡开倭寇的快刀，明官军设计了这种带有分叉的兵器。标准的镋钯总长7尺6寸（236.4厘米），重5斤（约3公斤），中锋与枪头相当，两侧的“横股”是四棱刃。略小型化的是镋和马叉，后者是骑兵用的。还有一种叫“𠐉耙”，是五股直叉的步战兵器。

小说《西游记》里沙僧和猪八戒用的兵器也确实曾经是明代军队的制式武器，即“铲”和“扒”。前者是一种便于格斗的双头武器，一头是月牙状的刃具，一头是枪头；后者是在横木上安铁齿，是战船上用的兵器，用来勾抓敌船，跳帮作战。这倒是很切合猪八戒在天上掌管水军的“天蓬元帅”的身份。

将这类分叉型武器发展到极致的是“狼筅”。这是一种用毛竹制成的兵器，长度在1丈5尺（466.5厘米）以上，分叉最多的有9到11层。每层的竹枝都用火熨烫整形，有直有勾，灌以桐油使之坚韧，还要涂上毒药增加杀伤力。中间的竹尖安上铁枪头，作战时用来在对方阵势中推出缺口，使长枪、镋、大刀可以发挥作用。最早是在正统年间（1444～1449）由叶宗留领导的浙江矿工起义军设计发明的，是用来对付明朝

官军的，后来戚继光到浙江抗击倭寇，就采用这种兵器来对付倭寇的快刀和长枪，训练一些体格魁梧的士兵为狼筅兵，获得很大成功。

清朝入关后仍然将这些分叉型的武器列为绿营兵的制式装备，不过加以一些改进，简化了种类。狼筅则不再装备。

【斧】

横向砍或劈的兵器也源于工具。人类最早的工具之一是石斧，利用加工后的石片的刃口砍树、打猎。青铜时代的人们开始制造铜斧，用于战争。中国古代把大的铜斧称为“钺”，小的称为“斧”、“斤”、“戚”。从出土的商周时期的铜钺来看，当时的钺制作得相当精美，河北藁城出土的商朝青铜钺还有铁陨石的刃口。所以看来当时的青铜钺不大可能是实用的兵器。在历史文献里，钺都是作为王权的象征物出现的，是一种对罪犯施行砍头死刑的刑具。比如《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牧野战役中，“王左杖黄钺”发布誓师令。《国语・吴语》记载吴王率军准备与晋军决战，“王亲秉黄钺”。以后大将接受国王命令出征时往往由国王授予黄钺，表示在战区该大将有权代表国王诛杀罪犯。



西周铜管銎斧

汉代以后，开始出现战斧。三国的蜀汉，诸葛亮曾下令工部制造刀、斧供应军队。唐代军队装备有两种制式战斧：“长柯斧”与“凤头斧”。《旧唐书・李嗣业传》载安史之乱时，李嗣业率军在香积寺战役中就大量使用长柯斧，获得胜利。从《宋史》的记载来看，当时战斧主要用于对付敌军铁甲。如北宋初年大将曹利用平定岭南叛乱，见叛军以坚盾铁甲护身，就命令士兵“持巨斧长刀破盾”；南宋时韩世忠在大仪战役中，出动“背嵬军”，“各持长斧，上揕人胸，下斫马足”；刘锜在顺昌战役中用“大斧”对付金军的重甲骑兵“铁浮图”，都大获全胜。宋代军队还装备攻城和守城战斗中专用的战斧。开挖地道用的有“蛾眉䦆”、“凤头斧”，守城时用来砍敌方攀登士兵的有“剉子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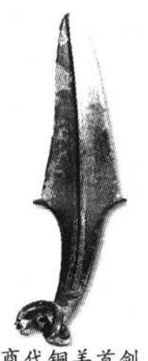
蒙古骑兵也将战斧作为重要武器，有圆刃的锚斧，还有和唐宋凤头斧相似的镰斧；明清军队也装备有各种战斧。

【剑】

剑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兵器之一，在各种历史记载中有很多剑的传说，使剑不再是简单的一种兵器，而是一种充满着传奇色彩的精神象征。

与大多数兵器由工具转化而来的情况不同，剑是在青铜时代才产生的专门兵器，而铜是非常名贵的，一般人很难拥有，因此剑从一开始时就具有贵族身份，以后也主要是贵族的武器。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剑是在西周早期墓葬中出土的，到了西周中期，剑的基本形制已经定型：握把部分称“柄”，柄与剑身的结合部有“格”分开，而格下的柄部称

为“茎”，柄的最后部位为“首”，有环或突出的边防止脱手。剑身有凸起的脊，两侧的刃也称“锷”，剑尖为“末”，或称“锋”。



商代铜羊首剑

按照《周礼》的说法，剑也有上、中、下三等之分，剑身越是修长就越高贵。然而从实战的角度来看，剑过长不仅使用难度增加，而且也容易折断。从制造的角度来看，剑身越是修长也就越难制造，难于批量生产，价格也就更为昂贵。因此修长的剑主要是来显示身份的，并非实战的武器。战国秦汉时期凡是士以上阶层的人都必定佩带长剑。《战国策·齐策》记载孟尝君豢养门客故事，冯谖“贫乏不能自存”前来投奔，仍然带着长剑，一有觉得招待不周，就弹着长剑发牢骚，要吃鱼，要坐车，还要孟尝君养他的老母亲。《史记·淮阴侯列传》写韩信穷困潦倒，以至于“寄食漂母”，但出门仍然必定要佩带长剑。

事实上在史籍中几乎找不到在战争中使用剑为主战武器的记载，多的倒是出剑暗杀（以至于《韩非子》把“私剑”与国法对称）、“伏剑”自裁。仅《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记载公元前521年新里战役是用剑的。当时宋国贵族叛乱，吴国出兵帮助叛军，晋国、齐国、卫国出兵帮助宋国国君。齐、宋联军打败吴军，但叛军打败了宋军，宋国国君已打算出逃。齐国将领乌枝鸣负责守卫新里，见叛军气势很高，说：“对方人多，要决一死战不如用剑。”于是带头拔剑冲击，击退了叛军。

从现在出土的大量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剑来看，当时的铸造技术令人叹为观止。剑身一般是复合金属的，中脊部分含锡量低以增加韧性，而两侧刃部的锡含量较高以提高硬度。特别是剑的表面都经过化学处理。著名的越王勾践的剑，剑身布满暗纹，有一层锡、铜、铁以及微量镍的合金镀层。秦始皇陵出土的剑至今闪着寒光，表面有一层极薄的含铬镀层，锋利得可以用来当作裁纸刀。

如此精美的剑价格当然也是极高的，故称“宝剑”。《左传·桓公十年》记载，虞国的贵族虞叔有宝玉，被国君虞公强求而被迫交出。后来虞公又要他的宝剑，虞叔说：“是无厌也。无厌，将及我。”于是在公元前702年，发动叛乱驱逐虞公。可见宝剑比宝玉更为珍贵。春秋战国到秦汉时的宝剑有贵至“百金”的（秦以20两黄金为一金，汉以16两黄金为一金。百金相当于当时10



①西周铜马首剑　②③西周铜剑
④西周铜剑鞘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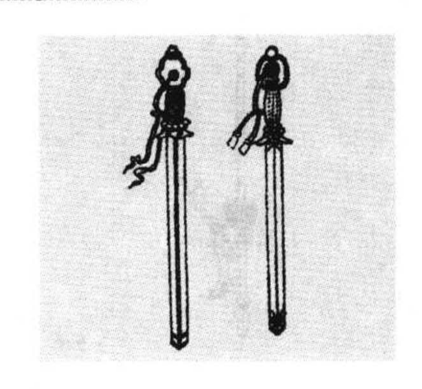
户中产家庭的财产总和），如《史记》记载伍子胥的宝剑值“百金”，他用以答谢救他命的渔夫。西汉初年著名说客陆贾生前将财产平分给五个儿子，约定以后轮流到五家生活，如死在哪一家，哪个儿子就承担送终的责任，并可以得到他价值“百金”的宝剑。

既然宝剑这么贵，所以也就有专门鉴定宝剑的“相剑者”。《韩非子》里有这么个故事：有个叫曾从子的，是“善相剑者”。知道卫国国君怨恨吴王，他就向卫君献计，说是可以乘为吴王相剑时刺杀吴王。卫君回答说：“你是为了利益才如此的，吴国强而富，卫国弱而贫。我恐怕你到吴国就会向吴王献此计来杀我。”赶紧把他驱逐出境。

当时人的评论是好剑出自南方，《周礼》一书称：“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春秋时著名的干将、莫邪、湛卢、鱼肠等宝剑是吴国工匠铸造的，太阿、龙泉等是楚国工匠制造的。《左传》记载莒国（今山东莒县）国君“虐而好剑”，喜欢亲自铸剑，并拿百姓来试剑，最后被百姓驱逐。

这些著名的宝剑可能也有用钢铁制造的。湖南战国楚墓出土的铁剑已有1.4米长的，显示出技术的成熟。西汉时已普遍使用钢剑，剑身也越来越修长，更注重其装饰意义。《晋书·舆服志》称“自天子以至百官无不佩剑”。

历经魏晋南北朝，剑的形制也有所变化。唐代的剑身比较宽，适合于劈砍，剑格和剑首一般做成云彩状。剑的主要用途仍然是仪式性的，并不作为战斗武器。宋代的剑虽然装饰纹样仍然是唐代的基本风格，可是剑身“厚脊短身”，



唐宋时期的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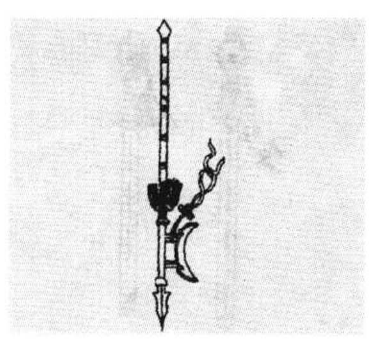
似乎更实用。元代蒙古骑兵也用短剑，装饰很少，更为实用。

虽然明清小说中剑开始进一步被神化，但是当时的军队武库却已彻底地排斥了剑的存在。无论官兵，都不再佩剑。

【刀】

远古时代作为工具的刀是从石器刮削器发展而来的，中国境内目前出土的年代最久远的是在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红铜刀，距今已有四千多年。河南殷墟出土的商代青铜刀大多是弯背小型，不大可能是用做武器。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刀具是社会各阶层普遍使用的工具，以至于齐国等国家流通的青铜铸币都是刀状的“刀币”。不过当时的刀具主要用途是割削，因为青铜比重大而强度不够，青铜刀具还不能适用于劈砍，在文献记载中也找不到当时的军队使用刀为武器的记载。

随着炼铁技术的发展，钢铁刀具的制造技术逐渐成熟，汉代开始用各种长短的刀装备军队。另外由于汉代骑兵大盛，刀背厚实不会在劈砍时折断，因此刀成为骑兵的利器。如《汉书·匈奴传》说匈奴军队“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梃”，汉朝军队也广泛装备刀。《汉



戟刀

书》记载袁盎被即将反叛的吴王拘押，有个曾得到他恩惠的士兵为报答他，灌醉了卫兵，“引刀决帐”，带他脱离险境。汉代将军也往往佩刀代剑，飞将军李广随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因所属部队迷途而失误战机，被告发受审。李广不愿受此侮辱，“引刀自刭”。苏武出使匈奴，匈奴首领强迫他投降，他“引佩刀自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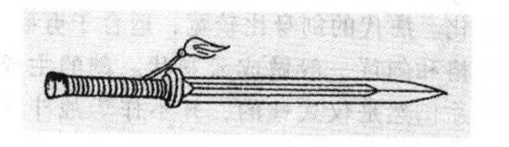
汉代刀的流行式样是在刀柄有一个环，号为“环首刀”。在洛阳发现的西汉墓葬群，23 座墓有陪葬的环首刀。东汉时出产一种刀面上有错金马纹的环首钢刀，号为“金马书刀”。这种刀由“三十炼（炼是指加热后折叠锤打）”、“五十炼”而成，最好的是“百炼”（也称“百辟”）。东汉末年曹操命令有关部门为他制造宝刀，花了三年时间才制成五把，他自己保留两把，另外三把分别分给了三个儿子。曹植为此写了《宝刀赋》，称赞这把刀能够“陆断犀革，水断龙角”。除了这种贵族豪富的宝刀外，当时的朝廷也批量生产一般士兵用刀。如刘备曾命令蒲元一次造刀 5000 把。东吴、曹魏政权也往往一次制造成万把军刀。

刀是一种单手使用的“短兵”，步兵作战要全凭短刀就很困难。《汉书》记载李陵率步兵远征匈奴，箭矢用尽，仅凭“尺刀”无法打退匈奴进攻，最终失败。东汉末年开始将刀装在木柄上，便于双手把握，成为一种“长兵”，号为“长刀”。上文提到曹操的猛将典韦就好用这种长刀。十六国战乱时，割据陇西的军阀陈安本人就是著名猛将，当时人歌谣称他“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到了唐代长刀成为标准装备，又创一种双刃长刀，称为“陌刀”，是步兵武器。还设置专门的“陌刀将”。而唐代短刀并不完全是步兵武器，“仪刀”是禁卫皇宫的卫士的佩刀；“鄣刀”是官吏的佩刀。只有“横刀”才是装备步兵的武器。

刀在以后继续发展。宋代军队装备的长刀居然有七种之多，其中的屈刀、掩月刀、凤嘴刀都是传统的大刀片；而眉尖刀、笔刀则刀身修长；掉刀是唐陌刀的发展形式，是两刃尖刀，可刺可砍；戟刀则是将凹刃刀安装在长枪上，被后世小说家称之为“方天画戟”。而宋代军队装备的短刀只有“手刀”一种，柄后仅有很小的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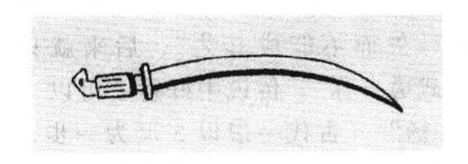
明清两代军队的长刀有所简化。明代《武备志》一书仅记载了两种长刀：钩镰刀和偃月刀，特点是刀背上都有钩刃，也许是想增加杀伤力。清代仅绿营兵仍装备长刀，有挑刀、宽刃刀、片刀、虎牙刀四种，形制相当简单。

短刀的形制在宋代以后发生很大的变化。元代蒙古骑兵开始用“环刀”，后来接受阿拉伯军队的影响，开始使用



蒙古剑

"回回刀"，即阿拉伯弯刀，曲背弧刃尖头，与中原地区传统短刀式样不同。而从北宋开始，日本向中国朝贡的主要贡品之一就是刀具，民间也已开始从日本进口刀具。明代日本仍然朝贡刀具。日本刀制作精良，对中国刀具生产也发生影响。明代军队装备的短刀基本都是日本刀式样，刀身修长，略有弯曲。其中的"长刀"刃长5尺（155.5厘米），刀柄长1尺5寸（46.6厘米），适合于双手把握劈砍，是步战利器。"腰刀"



蒙古环刀

刃长3尺2寸（99.5厘米），刀弧较深，当时是藤牌兵的进攻武器。还有"短刀"是佩带用的。清朝入关后军队的佩刀延续明军刀特点而又有发展，最常见的佩刀与明长刀相似，但略短（刃长2尺2寸），适合单手劈砍。其他的名目有云梯刀、长刃大刀、背刀、窝刀等等，都大同小异。而八旗前锋营用的顺刀和传统的剑相仿。绿营步兵则往往使用短柄刀，刀刃与传统的长刀相似，柄后也有小环，是回归传统的军刀。

【弓箭】

弓箭是远古人类的伟大发明，中国境内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石箭镞是在山西峙峪文化遗址发现的，距今已有两万八千多年。由于在这个遗址发现了至少120匹野马和88匹野驴的遗骸，所以考古学家们把这里的古人类称之为"猎马人"，可见原始弓箭足以使古人猎杀飞奔的野马、野驴。弓箭使我们的祖先掌握了一种不仰仗大自然的工具，大大增强了人类的自信，这在"后羿射日"的著名神话里得到了鲜明的反映。

弓箭以后一直是中国军队的主要射远武器。据儒家经典《周礼》的说法，西周时期的弓箭已经有了很多种类。"王弓"和"弧弓"是用来作战的，可以射穿皮甲；"夹弓"、"庾弓"是用来打猎的；"唐弓"、"大弓"是用来学射的。箭也分成六种："枉矢"、"絜矢"是可以带火种的火箭，用来守城和车战；"杀矢"、"鍭矢"是用来打猎的；"矰矢"、"茀矢"可以"弋射"（在箭后拖一根细绳），用来射鸟的；"恒矢"、"痺矢"是多用途的箭。而当时的弓是一种复合弓。据《考工记》，当时制造弓的工艺很复杂，材料要用干、角、筋、胶、丝、漆"六材"。弓身基本材料为干，也有七种可供选择，最好的是用柘木，其次可以用檍、桑，最差的是竹片。制作时，冬天采干，春天浸角，夏天治筋，秋天用胶将这三种材料合成弓身（弓身中部为干，两头用牛角加强，外附以牛筋），然后再上漆。最好的弓这个过程要多次反复，"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规；诸侯，合七而成规；大夫，合五而成规；士，合三而成规"。据说当时的弓分成三种尺寸，上制为6尺6寸，中制为6尺3寸，下制为6尺。

从商周遗址出土的大量的箭镞实物来看，也确实证明上述记载不虚。出土的箭镞形制多样，绝大多数都是青铜铸造，刃口锋利。而从史籍记载的古代战争情况来看，弓箭的杀伤力是第一位的。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攻进王宫后，亲自

射了已自杀身亡的纣王三箭，然后用大钺砍下纣王脑袋，悬在大白旗上示众。在《左传》所记载的春秋时期的战争中，有大量伤亡情况是箭矢造成的。

历史上的名将大多是以骑射而出名的。西汉时号为“飞将军”的李广，《汉书》记载他身材高大，手臂又长，以“善射”闻名天下。平时与人喝酒，“画地为军阵，射阔狭以饮。专以射为戏”。作战时“见敌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在被罢官后有一次夜间醉酒，见林中大石以为是老虎，一箭射去，箭头居然射进了大石。远征匈奴建立战功的霍去病也是以善于骑射而从军。据《三国志》，东汉末年著名猛将吕布也是“便弓马，膂力过人，号为飞将”。如著名的“辕门射戟”的故事：吕布为帮助刘备免于袁术的兼并，叫手下在辕门外举戟，他一箭射中戟的“小支”（即横出的原来的戈刃），由此要两家讲和。东晋名将刘牢之，家传善射。历史上著名的英武之君唐太宗，也是以善射闻名，据说有一次在打猎时，遇到一群野猪的袭击，唐太宗迅速“引弓四发”，接连射死四头野猪。

弓要依靠臂力拉开，古代弓制成后用重物悬吊使弓张开，以此测量弓的强度，因此有几斤弓、几石弓的说法。南梁名将羊侃，《梁书》上说他“臂力绝人，所用弓至十二石，马上用六石弓”。一石为120斤，按照梁代衡制标准，羊侃拉开步战用弓的力量达320多公斤。而一般“弓贯六钧”（30斤为一钧）就号为良弓了，这种弓射出的箭矢射程可以达到300米以上。南宋名将岳飞和韩世忠，都以能拉开300斤的硬弓而著称。根据《天工开物》一书的记载，明代军队装备的弓分三种规格，弓身的基本材料恰恰是《考工记》认为最次的竹片，其他的用料仍然是角和胶。120斤的弓装备“上力”，“中力”的士兵配备的是不满百斤的弓，“下力”士兵的弓仅有60斤左右。

强弓射出的箭矢射程远，贯穿力强，但是需要射手经过长久的锻炼，而且大力拉开弓的同时还要瞄准，对于射手的要求相当高，并不是人人都能成为合格的射手，比如唐初名将侯君集，从小“玩弓矢而不能成其艺”，后来就只好“以武勇自称”。传说中好射手可以“百步穿杨”（古代一般以5尺为一步，百步约合130米左右），但即使是李广那样可以将箭射入石头的射手，在作战时却还是尽量在几十步距离内发射，以求射击精度。

弓箭在古代战场上一直起着主角作用，尤其是北方狩猎以及游牧民族（如匈奴、鲜卑等民族），民众自小就练习骑射，进入青壮年后就是熟练的士兵，因此在对汉民族的作战中有相当的胜算。尤其是蒙古骑兵精于骑射，每人都装备称之为“马克打”或“卡蛮”的复合弓，这种弓西方人称“基斯泰”弓，尺寸不大，适合于在马上发射，据西方史料记载，其拉力一般为166磅（75.6公斤），射程可达200米。满族八旗军队也以善于骑射为看家本领，直到鸦片战争前夕朝廷还孜孜不倦地要求八旗子弟练习骑射。

【弩箭】

弩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弓，它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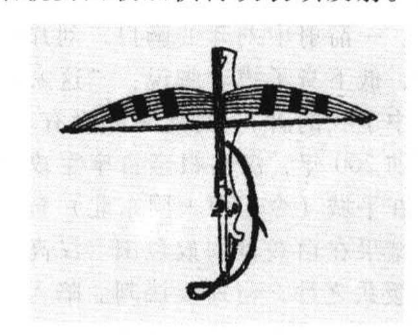
是将弓箭的张弓动作和瞄准发射动作分离。在弓的中央装一个“臂”，臂上开放置箭矢的槽；把弦拉到弩臂后部的“弩机”，用“牙”挂住，瞄准后扣动“悬刀”（相当于现在步枪的扳机），箭矢就发射出去了。由于弩在拉弦的时候不必顾及瞄准，还可以用腰腹力量拉弦，因此弩的弓身可以很硬，保证具有足够的射程和贯穿力。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优点，掌握射弩的技巧要比弓容易得多，普通人稍加训练就可以上阵发挥足够的战斗力。

根据现有资料，中国是弩的故乡。传说弩是由楚国人琴氏发明的，而儒家经典《周礼》一书则称西周军队已装备了四种弩：夹弩、庾弩是用于攻城以及守城战斗的，唐弩、大弩则利于车战和野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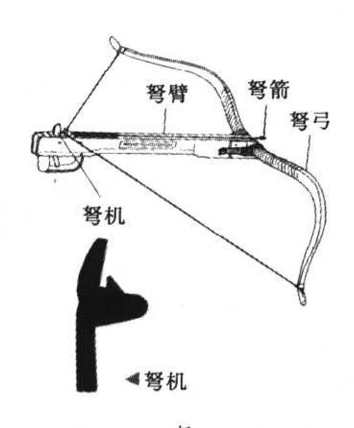
战国时期的军队已大规模地使用弩作为主要武器。最著名的战例就是公元前341年孙膑设计在马陵伏击庞涓率领的魏军，“齐军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夜间出击，万弩俱发，庞涓智穷兵败，自杀身亡。一支军队能够装备万件弩，可见弩已成当时军队的主要射远兵器。据说魏国挑选“武卒”，要求能够穿上盔甲，“操十二石之弩”，并且带上50枝箭和三天的口粮，扛着戈、佩上剑，全副武装，一天内能急行军100里。《史记》记载，公元前310年，秦国的将领樗里疾率领百乘战车进入西周，西周设置军队仪仗迎接。与秦国争雄的楚国为此责备西周君，西周的大臣游腾解释说这是为了防备秦军突袭，所以排列阵势，“长戟在前，强弩在后”。而说客苏代游说燕昭王时也说，军队出战时“强弩在前，锬戈在后”。看来当时弩已是军队作战战术的重要因素，取代了原来弓的地位。显然无须经过长时间训练的弩更适合当时全面征兵制下服役的普通农民士兵使用。

张弩的拉力普遍远远高于一般的弓。战国时期威力最大的弩是韩国制造并装备的。《史记》记载，苏秦游说韩王，说是天下的“强弓劲弩皆从韩出”，并提到韩国有“谿子”、“少府”、“時力”、“距来”等劲弩，“皆射六百步之外”。而且韩国士兵射技高强，可以接连发射100箭，射穿敌人的胸口。由此韩国军队天下闻名。

战国晚期还出现了巨型的弩。《战国策》提到当时有“千钧之弩”，即使这是夸张之语，打掉一点折扣的话，那么至少当时已经有了张弓拉力在1000公斤以上的弩。《墨子·备高临》讲到，守城可用“连弩之车”，并说它有“两轴三轮”，有着一个可以转移发射阵地的车架。并又说它是以辘轳张弓，箭矢长“十尺”。箭矢上还连系绳索，如同弋射，可以用辘轳把箭矢回收回来。《六韬·军用》也记有“绞车连弩”，应是同性质的武器。所谓“连弩”，看来就是指这种弩的箭矢上系有绳索，可以回收。这很可能是因为这种超大型的箭矢制造成本很高，不可轻易浪费，射空的话就要回收以供再次装填发射。《史



蹶张弩



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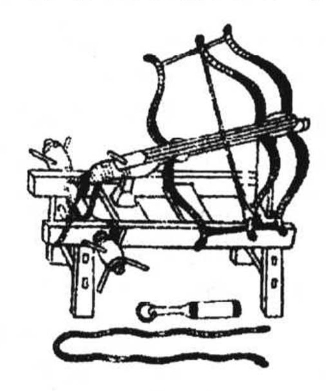
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受方士蛊惑，误以为数次派人入海求仙不遇，都是因为海里的大鲛鱼阻挡，于是亲自带了军队至莱州的芝罘海边，用这种“连弩”射击海中巨鱼，射中一条大鱼。这倒是很像今天的捕鲸船装备的捕鲸炮。

秦汉时期弩仍然是军队的标准作战武器。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派遣“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甚至建造坟墓时，还要在墓道内安装“机弩”，“有所穿近者辄射之”。西安出土的兵马俑有一些蹲着的士兵塑像，就是准备发射弩箭的士兵。楚汉战争期间，刘邦与项羽长期在成皋（今河南汜水西北）、广武（今河南荥阳北）一带对峙，公元前203年，项羽在阵前单挑刘邦决斗，可是刘邦却历数项羽十项大罪，说是不屑于和这样的罪人决斗。项羽大怒，要埋伏的弩手射击，一箭射中刘邦的胸口，刘邦强忍疼痛，低下身子摸着脚说：“这家伙竟然射中了我的脚。”为此军心没有动摇。公元前200年，汉高祖亲自率军攻击匈奴，在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贸然出击，结果在白登被匈奴包围。汉高祖只得施缓兵之计，与匈奴谈判。陷入包围的第七天，天降大雾，派出去的谈判代表往来于双方阵地之间，居然没有被匈奴发现。陈平建议赶紧突围，士兵们持“强弩”，张弩装上箭矢，同时手里准备好第二枝箭，随时准备连射，以密集队形开道，才侥幸回到平城，脱离险境。

张弩时是用脚踏弩身，以全身力量往后拉，所以也叫“蹶张”。操作的士兵也叫“材官”，西汉初年的丞相申屠嘉就是“材官蹶张”出身。汉代军队有“材官”，以及“强弩都尉”、“强弩将军”的编制。

汉朝与匈奴的长期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汉军的弩与匈奴的弓对决。公元前89年，李陵率5000步兵出征，与匈奴单于带领的主力遭遇。李陵下令以大车结为军营，出战时“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当匈奴军逼近时，“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获得首战胜利。匈奴调集援军，连续进攻，李陵以“连弩”（应该是远射程的强弩）射单于，使单于差点中箭。最后匈奴将汉军围困于山谷，万箭齐发，一天之内发射了50万枝箭。而汉军矢尽粮绝，无法有效还击。李陵感叹说，如果再有几十枝箭也就能够突围了。结果全军覆没，李陵被俘。

三国时蜀汉的诸葛亮发明了称为“元戎”的连发弩。据说是在弩臂上安



三弓床弩

装箭盒，可以安放10枝箭，每次射击只需张弦，不用安箭。231年诸葛亮第五次出击祁山，就是集中这种连发弩，射死了曹魏的大将张郃。不过总的来说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在步兵作战中使用弩的记载不多。相反，在阵地战中使用巨型强弩的记载却越来越多。东汉已经有“车张”之弩，陈球在坚守零陵的战役中，使用可以发射的“矛矢（安有尾羽的长矛）”，可以“远射千余步”。南朝也有“神弩”（或称“万钧神弩”），用来打击敌方的船舰。1960年在南京出土的一件南朝铜弩机，构造和汉代弩机差不多，有将近40厘米长、30厘米高。以此推算，这个大弩机的弩臂要有两米多长。而北朝在边境地区的每座据点设置“强弩十三床”，每一床强弩配给牛六头，可见也是一种巨型弩。

唐宋时期仍然延续这一趋势，巨弩被广泛用于阵地作战。这种巨弩要用绞车张开，称“绞车弩”或“车弩”，同时射出7枝箭矢，中间是长3尺5寸、粗5寸的巨型箭矢，两旁各三枝略小的箭矢。据说可以摧毁城垒和舰船。宋代进一步发展，巨弩通称“床弩”或“床子弩”，往往联装两张弓或三张弓，利用多弓的合力发射箭矢。北宋的《武经总要》记载了多种多弓床弩，其中最为强劲的三弓床弩又称“八牛弩”，需要七十多人绞轴张弦。发射的箭矢称“一枪三剑箭”，射程有两三百步。床弩还可发射“踏橛箭”，可以把箭矢成排成行地钉在城墙上，让攻城兵士可以攀援。据《宋史》记载，北宋初年魏丕曾将床弩的射程提高到了“千步”。1004年宋辽澶渊之战，宋军在城头安设床子弩，守弩兵士惊慌失措，辽军还没有大举攻城，就匆忙发射，恰巧命中辽军阵内的主将萧挞览。辽军军心动摇，无心恋战，于是和宋朝议和。

宋代步兵使用的弩称踏张弩，有黑漆、黄桦、白桦等等多种名号，但结构几乎完全相同。1068年李宏改造踏张弩，将弩的尺寸略微加大，发射仅几寸长的“木羽箭”（由于弩的箭矢会与滑轨摩擦，轻而长的箭杆阻力大，而且会在飞行中抖动，增加阻力，因此弩的箭矢一般都比较短），射程达340步左右（约500米），可以将一半的箭杆射入榆木，由此得名“神臂弓”，广泛用于实战。南宋时韩世忠创一种“克敌弓”，也能在百步内射穿重甲。

由于弩算是当时重武器，因此唐宋的法律严禁私人拥有弩。法律规定有一张弩的要判两年半徒刑，有弩五张就是死罪。私造的更要加罪一等。

和汉族军队依靠弩为主要射远兵器的情况不同，惯于骑射的蒙古军队并不装备弩，但入主中原后蒙古军队也开始制造装备各种弩，据说元军的“神风弩”射程有800步。但是总的来说，弩不是主要装备。明初军队还装备两种弩，号“神臂弩”、“克敌弩”，但据《天工开物》，其射程最远不过50步，但在射



神臂床子弩

程内的穿透力强于弓，主要用于守城，野战时仅用弓。巨型弩也已大大简化。由于火器的登场，明朝军队以后不再装备弩，弩往往只是民间的打猎工具。清朝军队则一直没有弩的装备。

【投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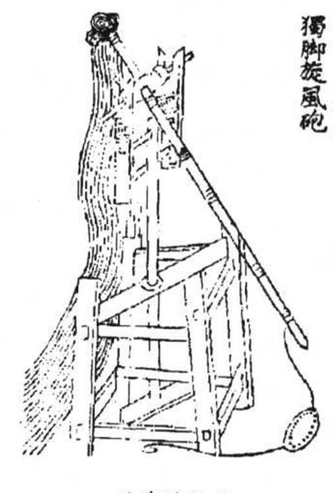
投掷尖头木棍可能很早就是打猎的方式，以后投枪也成为武器。西周的贵族在饮酒时有“投壶礼”，大家用小型标枪投入壶口助兴，或许就是由作战时投枪发展而来。不过在宋代以前中国军队并没有投枪的装备。宋代是一个大力发展射远武器的时期，军队将投枪作为制式兵器，称“梭枪”。蒙古军队装备的长投枪长一丈，两头都有刃，也可以用于肉搏；短投枪是三尾标枪，长四五尺。明代步兵用的投枪叫标枪，水师战船用的叫“镖”，有犁头镖和小镖。主要的特点是枪头较重，枪杆长七尺左右，用较软的木杆或细竹制作，可以投二三十步远。清朝的水师装备了儿种镖，有手镖、犁头镖、铁斗镖等名目，尺寸较小。

【砲】

砲的字义原来就是“抛”，是用抛掷石块打击敌方，所以部首是石。和古罗马军队普遍装备以筋腱扭力发射的抛石机的情况不同，中国军队较晚装备这种重型武器。史籍记载中首次明确提到在战争中使用抛石机，是公元200年官渡战役中曹操的军队以“霹雳车”发射大石块，摧毁袁绍军队的“橹楼”（阵地战中用以向敌方阵营发射矢石的塔楼）。据说这种抛石机抛射的石块发出呼啸声，因此称霹雳车。

在南北朝时期的史书记载中，使用抛石机战例的记载很多。当时将抛石机称为“拍车”，可见是一种装在车上的抛石机。573年，南陈将领黄法抃率领陈军进攻北齐据点历阳（今安徽和县），这支军队装备有很多的拍车，到了历阳城下，“竖拍”，猛烈发射石块，破坏了历阳城楼，得以攻下这座重要据点。南北朝对峙，很多战事是在江河地区展开的，主要的作战装备为“拍舰”，把抛石机装在船上攻击对方船舰。567年，南陈大将吴明彻进攻叛变的湘州刺史华皎和后梁的联军，双方在洞庭湖决战，南陈军先派小战船逼近，等对方的石块消耗殆尽，乘机出动大船巨拍，将对方的主力拍舰全部击沉。

抛石机在唐代仍然是为完成特殊任务才装备的武器。639年侯君集率军远征高昌，为此征募了山东地方的“善为攻城器械者”。先后以巨型“抛车”攻击柳谷城，“抛车石击其城中，其所当者无不糜碎”，以至守军无法上城墙守卫，很快攻下该城。再攻击高昌都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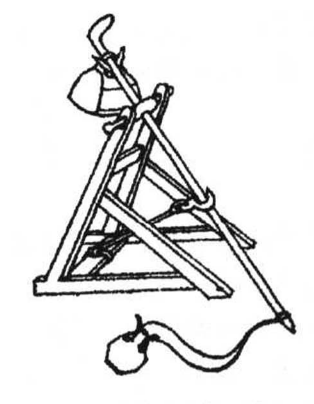


独脚旋风砲

仍然以抛车为主要武器，迫使高昌国王投降。“安史之乱”时，李光弼坚守太原，在城中设置“大礮”发射巨石，打击叛军集群，一发石块打死二三十个，叛军为之胆寒，不敢迫近作战。

中国古代的抛石机主要依靠人力拉动一根巨型长木杆，木杆下方有轴，利用杠杆原理和离心力将放置在木杆梢头皮袋里的石块甩出去。宋代军队普遍装备抛石机，并且定名为“砲”。《武经总要》称：“凡砲，军中之利器也，攻守师行皆用之。”当时军队装备的砲有十多种，小的“手砲”，发石半斤，两人操作，是近距离作战兵器。中型的单捎、双捎、旋风、虎蹲等砲，使用 40～100 人拉砲绳，可以将最大 25 斤的石块发射到 50～80 步（约 78～125 米）的距离。巨型大砲要几百人拉砲绳，发射的石块可达上百斤。不过这种巨型大砲是固定式的，一般只用于攻城或守城，战役结束就拆除，并不是常备武器。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抛石机是 1273 年元军围攻襄阳城时使用的“襄阳砲”。这是一种新式的抛石机，是在抛石长杆原来靠人力拉动的部位安装一个巨大的平衡重锤，安上石块或铁块，利用重力使长杆竖起甩出砲石，基本原理与打水的桔槔相同。这种抛石机使用人力不多，但抛射距离远、抛射重量大，而且发射速度快。当时襄阳攻守战已经进行了四年，元军久攻不克，回回人亦思马因献计，制造了这种大砲来攻城。据说它发射的石块重达 150 斤，飞越城墙后，“入地七尺”。宋军的防守工事纷纷被打破。宋军苦等援军不至，守将吕文焕最后被迫投降。



“回回砲”（即襄阳砲）

利用重力发射的“襄阳砲”以后成为元军攻城夺寨的重要装备，并且传播到了欧洲。据欧洲史料记载，巨型的“襄阳砲”使用的平衡重锤可达 10 吨重，能够将 200～300 磅（约 90～140 公斤）的石块抛射 100 米远。而在中国，这种抛石机却逐渐消失。元末战争中使用的大砲，大多还是中国传统式样的人力抛石机。据《明史·兵志》记载，明初朝廷兵仗局还有制造“襄阳砲”的任务，不过是排列在“火器”的标题下，可能并不是抛石机。随着在战场上火器运用的普及，明朝军队不再装备各种抛石机。

【弹弓】

古代小说里常有用弹弓做武器的故事，比如《儒林外史》里的萧云仙，凭着一把弹弓，打败了造反的“苗子”。但是在正史里，几乎没有这样的记载。在史书里弹弓都是用来打鸟的工具，或者是不良少年的作恶用具。比如《左传》记载晋灵公“不君”，喜欢在高台上用弹弓弹射行人，看人们抱头躲避的模样取乐。《晋书》记载后赵石虎“善弹”，也是喜欢弹人取乐。《梁书》载叛将侯景喜爱的消遣是“弹射乌鸟”。隋

末大将宇文化吉也是善用弹弓，不过并没有他以弹弓作战的记载。

【火枪】

从唐代药学家孙思邈《丹经》一书所记载的最早的火药配方来看，最初由炼丹道士发明的火药只是一种燃烧火药。据《九国志》记载，906年淮南军阀秦裴进攻洪州时，曾经“以机发火”，一般认为这是火药用于战争的首次记录。

“以机发火”很可能是将火药投掷到对方阵地引燃大火。到了宋元明清时代，“火箭”成为标准的武器装备。用弓、弩发射带有火药药包的箭矢，药包是用纸扎成的，里面裹上火药，外面浇有松脂，点燃后发射到对方阵营。引燃的烈火无法用水扑灭。直到清朝时这种火箭仍然是水师的标准装备。

以火药筒喷火的“火枪”，在宋明时是很常用的近战作战武器，金朝人称之为“飞火枪”，明清时称之为“梨花枪”。即在长枪枪头附近绑上裹有火药的药筒，交战时点燃药筒，火药燃烧喷发出火焰以及药筒内装有的铁渣、毒药。有的有几个药筒，轮流燃放，将敌方喷倒后再以长枪刺杀。这种武器刚开始投入战场时取得很大的成效，比如南宋时割据山东淮西一带的军阀李全，作战主要依靠这种喷火枪，号称“二十年梨花枪，天下无敌手”。明代还将这种喷火武器扩大为“木火兽”：在木制手推车搭上轻木架，画上可怕的怪兽模样，捆绑上一些喷筒、火铳，作战时由士兵推向敌阵，猛烈燃放喷射，用来打乱敌方阵脚。河北真定制造“平安火伞”，铁枪上环以响铃，绑上三个火药筒，作战时对付敌方的骑兵，以喷射的火舌惊吓敌马。

投掷火药包也是一种引燃类的武器，尤其是用于守城战。火药包或者用纸张糊成，或者用粗竹筒制成，或者用陶瓷罐；可以手投，也可以用抛石机发射。宋以后各代普遍使用这类武器，名目极多。有的是装上毒药，喷发毒火毒烟的，如宋代的“毒药烟球”，明代的“神火混元球”、“烂骨火油神炮”、“火妖”等等。也有的是装上大量的铁蒺藜、碎瓷渣，用以伤人或做障碍物，如宋代的“西瓜炮”、“霹雳火球”等等。

【火炮】

对于火药组成成分比例的进一步研究，就制成了可以引爆的火药。这个过程大约在南宋时已经完成。南宋将这种爆炸武器称为“火炮”。1127年，赵士珸坚守洛州（今河北邯郸附近）抗拒金兵，使用“火炮”炸毁了金军围困城市的壕堑、鹿角，并活捉了金军将领，迫使金军解围。1161年宋金采石矶之战，南宋军队使用的“霹雳炮”，对于打退金军进攻发挥了很大作用。1272年，张顺率领3000敢死队员援救已被围困五年的襄阳，乘汉水暑汛大水，驾百余条特制的三身连体船（中间船身装载援救物资，两侧为掩护）闯进元军的封锁线。“各船置火枪、火炮、炽炭、巨斧、劲弩”，半夜出击，将沿途几百条锁江铁链一一破坏，转战120里，冲到襄阳城下。张顺自己“身中四枪六箭”，壮烈捐躯。1277年元军进攻广西静江，宋军首领投降，可是部将娄钤辖以250人坚守月城不投降。元军围困了十多天后，



山海关明代铁炮

娄钤辖向元军索取吃食，在吃了元军给的几头牛后，“鸣角伐鼓”，元军还以为宋军将要出城决战，不料一声巨响，娄钤辖及其部下“拥一火炮燃之”，全部自杀。

金朝也很快掌握了这一技术，军队装备有号称“震天雷”的炸弹。“震天雷”外壳是用生铁浇铸的，是世界上第一种金属外壳的炸弹。有的是瓦罐形的，有的是葫芦形的，有的是圆柱形的，有的是合碗形（两个半球合成）的。使用时点燃引信，然后用抛石机抛射到敌阵爆炸。或者是用在守城战，点燃引信后往城下抛掷，或用绳索吊到敌军头上爆炸。蒙古军队在1231年攻下河中府（今山西永济）时，金军守将板讹可带了部分军队从水路冲出重围，元军夹岸追击，“矢石如雨”，又以战船横截，幸好船上士兵有人带了“震天雷”，炸翻追兵，凿沉拦截的船只，保住性命。第二年当元军南北两路首次围攻开封时，才真正领教到了“震天雷”的厉害。据《金史》记载，当元军开始爬城时，金军大量扔下“震天雷”，“其声如雷，闻百里外”，一个“震天雷”爆炸的有效杀伤面积有半亩以上，铁片横飞，击穿铁甲。元军改用地道战术，金军将“震天雷”吊到地道口爆炸，把元兵炸得尸骨横飞。而且喷火的“飞火枪”也使元军大吃苦头，不得不暂时撤围。

史料中似乎没有蒙古军队普遍使用这类爆炸类火器的明确记载，只是在日本方面一些反映元军进攻日本战况的图画里，可以看到有元军使用合碗式震天雷的场面。

后来的明代军队大规模装备了各种炸弹，仅《武备志》一书记载的就有二三十种，而且其中有十多种是地雷。这种爆炸类武器有铁壳的，有石壳的，以及木、纸、瓷等等多种弹体的，是相当标准化的系列武器。如铁弹体的“击贼神机石榴炮”，是生铁浇铸成石榴模样的弹体，装填火药和毒药，中间安置一个内有火种的易碎酒杯。临战时点燃，盖上铁盖，扔向敌军，酒杯破裂，火种引爆火药。“威远石炮”是一种地雷，

在石块挖眼，内置火药，装填小石子和石弹，另有小孔安引火线。放置城下或道口，当敌军来临时点炮。而“慢炮”是定时炸弹，引信可以阴燃三四个小时再引爆。对付行军大队的“炸炮”，是在被敌军踩到“钢轮发火”的机关后，逐次点燃用导火索串联起来的几十个生铁炸弹。更厉害的是“万弹地雷炮”，是用一个大坛装满火药和鹅卵石，以“钢机”引爆。还有用于水战的“水底龙王炮”、“混江龙”等等，是以猪、牛膀胱之类的隔水膜包裹铁制炸弹及其引火线，以木板等为漂浮具，放漂炸船。

由于缺乏工厂化的标准生产，当时的这些爆炸类武器在火药的配方、尤其是引爆机制上存在诸多问题，使用的可靠性并不高，因此注重实用的清朝统治者对于装备这类火器相当谨慎。除了手掷的火罐、手炮外，其他林林总总的爆炸类火器都未列入编制武器。

【枪炮】

世界上最早的管形发射火器，是南宋的“突火枪”。据《宋史·兵志》记载，1259 年寿春府（今安徽寿县）军队开始自行制造装备“突火枪”，以粗大的竹筒，“内安子窠”，点燃引信后喷出火焰，“子窠发出”，据说射程有 150 多步（约 230 米）。现代武器专家认为这种枪由于竹筒容易爆裂，所发射的“子窠”应该是一种石子、铁粒之类的霰弹。

从目前所能看到的实物来说，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管形发射火器是元朝军队制造于 1332 年的铜火铳。看来蒙古军队在灭亡宋朝的战争中发展了这类发射类火器，同时也在东征西讨的扩张中把这种革命性的火器传遍了欧亚大陆。到 14 世纪末，发射弹丸的各类枪炮已大量装备于亚洲以及欧洲的军队中。



清双筒火枪

《明史·兵志》称蒙古军在 1233 年围攻金朝最后据点蔡州时使用了从西域传入的以火药发射弹丸的“礮”，以后“造法不传，后亦罕用”，直到 1407 年明朝大军征服安南时，“得神机枪砲法”，为此特设“神机营”，才开始大量制造铜、铁火枪炮装备军队。但是从同书其他篇章来看，元末战争期间各方都已经广泛使用这类武器。如 1363 年陈友谅围攻南昌，攻守双方都使用“飞砲”，朱元璋的大将孙德胜被“砲石伤肩”。同年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决战，朱元璋的坐舰被“飞礮”击碎。1367 年徐达等率军围攻平江（今苏州），起三座高台，台上设置“飞礮”轰击城内，击毙了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而平江城守军也在一位名叫熊天瑞的工程师的指导下，以“飞礮”还击。元末割据四川地区的明升，也使用“飞礮”作战。割据福建的陈友定最后无法继续顽抗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军器局失火，“城中礮声震地”，以至军心动摇。

明朝建立后，火砲就已是明军标准

武器。现存有明初洪武年间制造的铁火炮五件以及铜铸的“大碗口筒”（该件铭文有“进字四十二号”字样）。实战如1389年沐英平定广西土司思伦发，作战时“火砲、劲弩为三行”。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后的第三年，燕军与明朝廷军队在淮水沿线对峙，朝廷军决计在半夜撤退，以三声“砲响”为撤退信号。不料燕军半夜前来偷袭，在兵营外连发三砲，朝廷军队以为是撤退信号，纷纷后撤，被燕军击溃。就是在1407年明朝大军征服安南的战役中，统帅张辅也是使用火砲、劲弩打乱以大象为突击手段的安南军队阵营的。因此《明史·兵志》的说法应理解为是从安南引进了更有效的火器。当时从安南俘虏了一批火器工匠，尤其其中的黎澄是首屈一指的火器专家，明朝廷将这批工匠带到内地制造经过改良的火器来装备军队。

明朝时并没有为这类武器统一名称，无论口径大小，礮、砲、炮、筒、铳混称。“大者发用车，次及小者用架、用桩、用托。大利于守，小利于战。随宜而用，为行军要器”。以后逐步将口径大的称“砲”，其中威力大的号称“将军”；口径小的称“铳”。

最先装备火炮的部队是北方的边防军，1412年开始在边防要塞山头上设置固定的“神机火砲”，每个山顶设置五个砲架，不过到了1430年后，明朝廷惟恐火器技术流失，开始限制北方边防军队发展和配备火器。火器的制造集中到北京，设置兵仗、军器二局，分造火器。制造的火砲有五等被冠以“将军”称号，号为“夺门将军”的大小两种，此外还有神机砲、襄阳砲、盏口砲、碗口砲、旋风砲、流星砲、虎尾砲、石榴砲、龙虎砲、毒火飞砲、信砲、神砲、砲里砲、十眼铜砲、三出连珠砲、百出先锋砲、铁捧雷飞砲、火兽布地雷砲等等名目。铳有碗口铜铁铳、手把铜铁铳、神铳、斩马铳、一窝蜂神机箭铳、木厢铜铳、筋缴桦皮铁铳、无敌手铳、乌嘴铳、七眼铜铳、千里铳等等名目。

传统的发射火器毫无瞄准设施，因此往往致力于加大口径来提高作战威力，结果造成射击精度很低，只能大致地朝目标方向开火。而同一时期西欧的火器技术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迅速发展，到1500年前后，西欧的军队已普遍装备了火绳枪，它将点火的火绳盘在火枪的一侧，使用扳机使火绳下降点燃火药池，引燃枪膛内的火药，发射出弹丸。士兵不必用眼睛注视点火就可以发射子弹，这样就解决了小口径的手持发射火器点火和瞄准的矛盾。在火炮方面，这一时期的西欧火炮已经普遍安装炮耳，火器的固定与改变发射角度以求不同射程的矛盾得到解决。而且炮身的浇铸技术也已成熟，在炮膛部位加厚炮身，可以增加膛压，从而加大射程。16世纪初新航路开辟后，这些新式武器开始传入东亚。

1522年，明朝军队在广东屯门俘获了两条葡萄牙船只，白沙巡检何儒研究



十眼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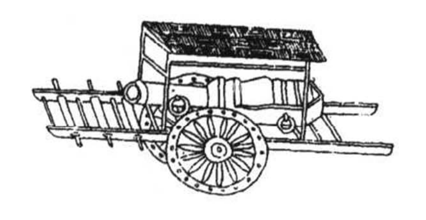
了葡萄牙船上的火炮，并且开始仿制。1529年右都御史汪鋐正式建议朝廷仿制“佛郎机砲”（佛郎机是阿拉伯人对于西欧国家的统称）。这是一种装在船甲板上的青铜火炮，“长五六尺，大者重千余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长颈”。有五5个安装火药的“子铳”，每次射击后抽出空“子铳”，放入已装填好的“子铳”可以再次发射，射程有“百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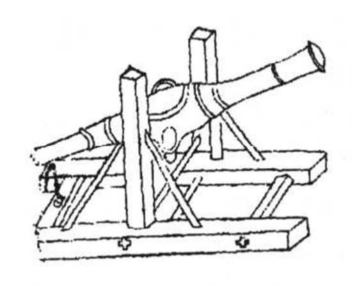
明铁佛郎机

丈”，威力强大，“所击辄糜碎”。明朝仿制的有连珠佛郎机砲、大中小佛郎机铜铳、佛郎机铁铳等等。以后荷兰船只出没东亚，带来了西欧陆战用的大炮，“长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明朝于1622年开始仿制，称为“红夷大炮”，封以“大将军”。当时仿制西欧火炮的规模很大，据《明会典》记载，曾一次规定朝廷的“兵仗局”在三年内制造4300副中样铜佛郎机，50副小佛郎机，10门大将军、79门二将军、20门三将军，669个“神炮”，1558副“神铳”。同时还向被葡萄牙侵占的澳门卜加劳炮厂定购这类大炮。

加紧仿制和进口西欧火器，说明当



车载无敌大将军



大佛郎机

时明代军队对于火器的依赖程度。1626年后金进攻宁远城，明朝守将袁崇焕以“红夷大炮”还击，后金首领努尔哈赤伤重身亡。明末时徐光启建议请来华的一些西欧传教士帮助铸造大炮，结合两种西欧大炮，制造“神飞炮”，比红夷大炮略轻，又采用佛郎机的子炮装填法，防止炸膛事故。这类火炮被广泛使用于各地镇压农民暴动，但很多都被农民军缴获，成为后来李自成农民军攻城略地的利器。

明朝自制的各类火铳均无法瞄准射击，装填速度慢。在掌握“佛郎机砲”技术后出现了一批“大追风枪”、“剑枪”、“万胜佛郎机”、“百出先锋”等仿型单兵火器。1543年，三个葡萄牙人在日本种子岛传授西欧火绳枪制作技巧，日本武士开始装备火绳枪。1558年中国军队缴获了倭寇的火绳枪，因为它可以精确瞄准射击，十发九中，可射落鸟雀，所以中国军队称其为“鸟枪”。首先开始仿制的是日本火绳枪，称为“鸟嘴铳”，1598年又仿制西欧商人的“鲁密铳”。这以后单兵发射火器才开始装备军队。1635年毕懋康发明以燧石发火的“自来火铳”，但似乎并未能够批量生产供应军队。

清朝入关后，火炮技术没有很大发展，制造生产的多种名目的火炮基本停留在原来的“红夷大炮”水平上。在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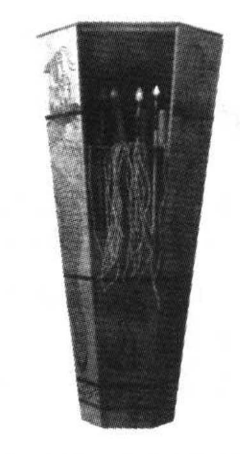
枪方面，也与明末情况不同，并不积极进行火枪技术的引进与改进。军队装备的火绳枪称之为“兵丁鸟枪”，枪管长6尺1寸，装药3钱，发射1钱重的子弹。木质枪身按照不同军队涂有不同的颜色，装备有架枪的木叉。这种鸟枪的放大型号为“抬枪”，长1丈，重30多斤，由多人杠抬发射而得名，也是清代军队的标准武器。同时清朝统治者严禁民间传播、研究火器技术，私铸“红衣（即夷）”炮者一律处斩，妻子家产入官，邻居、房东等人也要处死，私自持有鸟枪也要处杖一百。

【火箭】

利用火药燃烧向后喷射气体的反作用力来推动箭矢，这是明代开创的火器种类，也是今天一切火箭的先驱。

明军使用的单发火箭按照箭镞的不同而分为飞刀箭、飞枪箭、飞剑箭等。这些火箭一般长6尺，箭镞长3寸，是一种大型箭矢，绑有8寸长、1寸2分粗的药筒。据说射程可达300步（约466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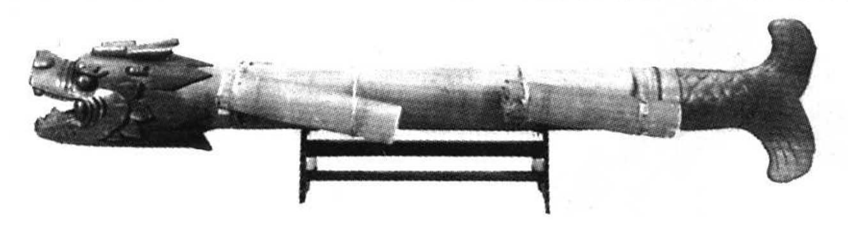
还有一种爆炸型的火箭，“飞空击贼震天雷”。外形是一个装有翅膀的直径3寸5分（约11厘米）的圆球，里面有药筒、爆炸药和有毒的棱角，可以飞越障碍在敌军上方爆炸。



“一窝蜂”火箭（模型）

明军装备的多发火箭有五虎出穴（5支）、火弩流星箭（10支）、火龙箭（20支）、长蛇破敌箭（30支）、一窝蜂（32支）、群豹横奔箭（40支）、飞镰箭（49支）、百虎齐奔箭（100支）等等名目。基本结构是用竹筒或纸筒安装绑有药筒的箭矢，引信点燃后同时发射，据说射程有三四百步之远。

明军对付水上目标的有世界上最早的多级火箭“火龙出水”和“飞空沙筒”。前者是绘成龙形的大竹筒，插有四根火箭筒为助推器，飞行一段后引信燃烧点燃大竹筒后面的药筒，继续推动飞行。据说射程有二三里，撞上敌方目标船只后会引起大火。后者也用竹筒制成，有几级药筒，在插入敌军船只的篷帆后引燃，并喷发细沙、烟雾，使敌军难以灭火。当喷射火药用完后，引燃最后一节倒装的火药筒，推动火箭返回己



“火龙出水”火箭（模型）

方阵地。

【头部防护具】

古代一般将防护头部的装备称胄，以后称盔、兜鍪等。原始的护头具可能是兽皮制的，而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青铜头盔是在殷墟出土的，距今已有约三千多年。头盔和护身甲一般连称，只要上阵就是随身披挂，只有打了败仗，为了赶紧逃跑，才会“丢盔卸甲”。公元前638年，鲁国干涉邾国内政，邾国起兵攻打鲁国，鲁僖公看不起邾国，没有作好准备就列阵迎战。臧文仲劝告说：“没有准备的军队人再多也打不了胜仗，《诗经》上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以先王如此的道德风尚，依然如此谨慎，何况是我国这样的小国。君不要以为邾国小就看不起，蜜蜂这么小，蜂刺也足以伤人，毕竟邾国也是一个国家！”鲁僖公不听。结果鲁军在会战中大败，鲁僖公狼狈逃窜。邾军缴获了鲁僖公的“胄”，挂在自己的城门上表功。

从出土文物来看，直到春秋时期，青铜头盔的形制变化不大，基本都是略有拉长的半球形（因当时男子头顶后上方有突出的发髻），中脊突出，饰有花纹，中央处有一个安放帽缨的装置。这种头盔可以有效遮蔽脑部及耳朵，现在还没有发现护脸鼻、颈项部位的附件。不过从文献材料来看，当时的胄是包括护脸鼻、颈项的。比如公元前479年，楚国发生内乱，楚国的贵族叶公子高（就是那个以“好龙”出名的叶公）起兵平叛，打败叛军后，他按照当时习惯“免胄”准备进入都城的北门，有个人对他说：“你为什么不戴胄？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万一有个盗贼射箭伤你，那不就要断绝了人民的希望了吗？赶紧戴好胄吧！”叶公听从劝告戴好胄，可是没走几步，又有一个人上来劝谏：“君为何要戴胄入城？国人望君如望丰年，每日盼望，得见君面，才可以放心。知道君还健在，就会蜂拥跟随。你现在自己掩面以绝民望，这也太过分了吧！”说得叶公只好赶紧又把胄取下。



西周铜胄

青铜头盔价格昂贵，不可能是全体士兵的护头具。在战国以后铁制头盔出现后，似乎仍然没有普及。出土的秦兵马俑依旧大多未戴头盔，以后历代军队也只有军官或一些特殊使命的部队才佩戴金属头盔。北齐兰陵王高长恭，是一员猛将，但面容姣好，为在作战时威吓对方，他经常在头盔下再戴上一个相貌凶猛的面具。564年北齐与北周在芒山一带会战，高长恭率500骑兵直冲周军阵营，直到被围困的洛阳城下。城上北齐守军不认得他，高长恭脱下头盔和面具，守军才知援军杀到，里应外合，打败北周军队。武士为歌颂大捷，创作了《兰陵王入阵曲》长久流传，为历史名曲。这种带有面具的头盔在后世依然使用，比如据史书记载，北宋名将狄青

"临敌被发、带铜面具"，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明代的头盔有的有一圈护颊颈的延伸下沿，有的是以锁子甲缀在头盔的下沿。

从史书记载以及流传至今的一些绘画来看，宋元明清时期普通士兵的护头具比较简单，一般就是有沿的布帽或毡帽，中央也有帽缨，往往以帽缨的不同颜色来表示所属部队的番号。

【身体防护具】

防护身体的装备总称甲，或者也称介、函。传说是夏朝的第六代国王予（或写作杼）发明了甲，装备军队与东夷作战。早期的甲都是用兽皮制作的，为了剪裁和缝制的方便，将牛皮之类的兽皮剪裁成一片片的长方块，再用皮条连缀起来，做成可以套住身体的护身甲。皮甲还要涂上起保护和装饰作用的漆。未经鞣制的生兽皮干燥后相当坚硬，能够挡住一般力量的箭矢和刀剑棍棒的打击。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金属武器的普及，士兵普遍穿甲作战，因此"带甲"成为士兵的代名词。春秋时拉战车的马匹也都要披甲。公元前589年，鲁国、卫国、晋国的三国联军进攻齐国，齐顷公骄傲轻敌，摆开阵势后说："等我把这批敌军收拾了再吃早饭不迟。"马匹没有披甲就发起冲锋，结果全军覆没，齐顷公自己单车狼狈逃窜。可见当时一般情况下战马都应该披甲作战。

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了铜制或铁制的护臂、护胫、胸甲作为皮甲的补充。再进一步的发展，就是用铁片代替原来的皮甲片，用金属线缀连成铁甲，这种铁甲在古代称为"铠"。由于铁铠呈黑色，西汉时也叫"玄甲"。以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流行铁铠。铁铠连有袖筒的，技术难度最大，号为"筒袖铠"，据说是诸葛亮发明的，25石的劲弩也射不穿。比较常见的是"两当铠"，是用背带将前后身两片铁铠连接挂在肩膀上，恰似现在的背心。当时称背心叫"裲裆"，故此得名。还有一种挂在胸前和背后的用大片铁片打制的圆形护甲，号为"护心镜"，因为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称为"明光铠"。唐代是铁铠甲最发达的时代，除了以上三种外另有光要、细鳞、山文、乌锤等等名目。并出现了"锁子甲"，这是用铁链编制成的铁甲，便于穿着，又比一般的铠甲轻便。宋代仍然发展金属甲，有铜、铁锁子甲、光明细钢甲、山字铁甲等名目。

金属甲最大缺点是重量太重，无法灵活作战。宋代的铁甲重量有50斤，明代铁甲加上头盔总重量达57斤，再加上其他武器装备，一个穿着铁甲的士兵负重88斤半。作为步兵来说这就大大限制了作战以及机动的能力。另一个不可忽略的缺点是价格昂贵，根本不可能让所有的士兵全部装备铁甲。如唐代普通士兵的护身甲有白布甲、皂绢甲、布背甲、皮甲、木甲等。唐末河东节度使徐商还曾试制"纸甲"。

自从约4世纪出现马镫后，骑兵的



西周铜胸甲


宋朝全副盔甲

作战能力大大加强。金属甲的重量可以由战马承担，对于士兵作战妨碍不大。因此上述的铁甲主要是用来装备骑兵的。西晋十六国混战时开始出现“铁骑”部队，即装备铁甲的骑兵。唐、宋两代都有“铁骑”部队。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骑兵往往以铁甲装备作为突击力量的主力部队，用来集中冲击对方阵地，或者在退却时起到屏障作用。比如突厥、西夏等少数民族王朝军队的主力都是“铁骑”。最为著名的就是金朝号为“铁浮图”的重骑兵，穿着两层铁铠，箭矢无法穿透；另外又有负责两翼包抄的铁骑兵，号为“拐子马”。这两支铁骑兵“专以攻坚，战酣然后用之”，号为无敌，后来在1140年的顺昌战役中被击败。横行天下的蒙古骑兵约有40%是披挂锁子甲的重骑兵，是近战肉搏的主力。据说当时蒙古骑兵还贴身穿着丝绸内衣，当箭矢射入后，可以连内衣一起拔出箭镞。

自明代开始普遍使用火器作战后，皮甲的防护作用降低。战马容易被火器惊吓，骑兵装备铁甲便意义不大，因此甲的发展逐渐停顿。明代注重护身具的轻便性，开始使用棉花为制甲材料，以几层棉絮棉布来阻滞箭石的侵入，以柔阻刚，颇有几分现代防弹衣的思路。这种棉甲初成品俗称“胖袄”，再用金属铆钉加固，有的在关键部位缀上铁片，就是所谓“青布铁甲”，按照规定每付重量为24～35斤。清代沿袭了这一趋势，至清中期后实战中已几乎不再使用护身甲。

【手持防护装备】

作战时士兵手持的防护装备古代统称干，以后称盾、牌（或写作排）。干很早就和戈连称作为武器的代名词，《诗经·公刘》描绘周族首领公刘带领部众迁居周原的情形：“弓矢斯张，干戈戚扬。”

早期的盾或许就是一块木板，到西周时，盾都蒙上兽皮，最好的是蒙犀牛皮的“犀盾”，被认为是最牢固的盾。当时步兵使用的“步盾”是长方形的，尺寸比较大，可以遮蔽半个身体；车兵使用的是“孑盾”，尺寸较小，只能遮蔽身体的一小部分。到战国时开始出现用金属片包裹的盾，可以抵挡长矛的冲击。《韩非子》中“自相矛盾”的寓言，说明盾可以用来防御长矛。另外战国时骑兵成为重要兵种，骑兵使用的盾更小


人面铜盾饰

型化，为了手持方便，一般做成凸圆形，盾牌后有两条系带，可以绑在手臂上使用，号为“旁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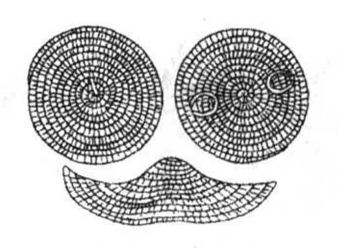
《史记》记载公元前206年刘邦与项羽“鸿门宴”，范增授意项庄借酒舞剑，打算借机刺杀刘邦。危急时刻刘邦的勇将樊哙手持“铁盾”冲进营帐，营门口持戟卫士上前阻止，被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被撞倒在地。樊哙入内谴责项羽不义，刘邦才得以逃遁。铁器相当沉重，不大可能用作单手持用的防护具，这种“铁盾”或许就是包有铁皮的木盾。

古代的盾牌大多经过油漆，一般正面都要画上各种凶猛狰狞的图案，常用的如虎面、龙面等等，以壮声势。472年，北方的游牧少数民族柔然侵扰北魏边境，北魏献文帝率军出征，任城王拓拔云为中军大都督，建议说：“柔然部落的马匹没有见到过‘武头盾’，如果先头部队作战时以这种盾牌前列，肯定可以打胜仗。”拓拔云亲自带了先头部队前进，“相率而歌，方驾而前”，柔然的战马受惊，结果溃不成军，部落首领也被擒获。

盾牌在唐以后各代没有很大的发展，只是注重按照盾牌的使用方法进行分类。宋代步兵、骑兵都配备旁牌，又制作专



商兽面铜盾饰



藤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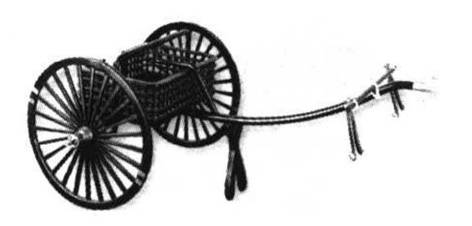
用于守城、可以遮蔽士兵身体大半的“立牌”。立牌有竹制的和木制的，比较宽大，有支架，可以抵挡一般的箭石打击。

明代军队步兵使用的木制盾牌有“手牌”、“燕尾牌”、“挨牌”等名目，手牌是长梯形的小盾牌，燕尾牌是下部有三角缺口的盾牌，挨牌是有凸弧面的长盾牌。另外还有“藤牌”，即用藤条编成的凸圆形盾牌。另外明代军队还装备了一批大型盾牌，用以掩护火器发射，称“火牌”。如神行破敌猛火刀牌，用生牛皮蒙面，后部有喷射火器，作战时持牌发火，据说可喷两三丈远。虎头火牌结构基本相同，在牌面上开有射击孔，可以发射火枪或火箭。最大的无敌神牌可以遮蔽25名操作的士兵，有几排发射孔。

清代军队只装备步兵盾牌，不再使用大型盾牌。由于火器的发展，盾牌的防护作用迅速降低。清中叶后军队已不再使用盾牌。

【兵车】

马车在古代世界是一种令人生畏的作战器械，两匹或四匹高头大马拉着载有不停发射箭矢士兵的战车迎面疾驶而来，对于手持一般竹木武器、徒步的敌军士兵具有强大的冲击力。距今3000年



春秋兵车（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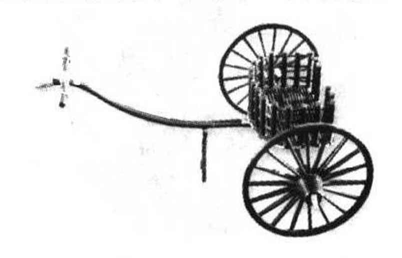
前左右的一些文明古国如赫梯、埃及、亚述等，都以兵车横行天下。中国古代也是如此，军队的“军”字部首从“车”，就说明了在专业军队概念形成时兵车的重要地位。

传说夏朝时奚仲发明了车，并被任命为“车正”。从出土材料来看，商朝已有正规的兵车。西周建立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军事上依靠的就是兵车。这种车的形制是两轮，用四匹马拉动，敞开的车厢是一个扁长的矩形，可以并排容纳三名甲士：中间是驭手，左边是弓箭手，右边是持长戈的武士。车厢底部中央有向前伸出的车辀（也称辕），是一根往上弯曲的直木，顶端有衡木，衡木上有套住马脖子的轭木以及供缰绳穿过的铜环“轙”。车辆前进的动力则依靠系在马胸部的皮条“靷”来拉动。当时贵族围猎活动就相当于军事演习，都驾驶兵车，晚上休息时，将兵车围成营盘作为掩体。出入口把两辆兵车的车辕朝上竖立作为标记，因此号为“辕门”，后来成为军队司令部所在地的通称。

西周以及春秋时期每一辆兵车为一个作战单位“乘”，当时国家的强弱就按照拥有多少“乘”兵车来决定，小国为“百乘”，大国为“千乘”。兵车平时保存在专门设置的“库”中，战时配备给将士。公元前 713 年，郑国准备讨伐许国举行阅兵，公孙子都和颍考叔为争夺兵车发生争吵，颍考叔凭着自己力气大，夹着车轴就走，子都拔戟去追，不料颍考叔健步如飞，拉着车跑远了。子都虽然被他人劝阻，但心头一股怨气无由发泄。第二年郑国围攻许国国都，颍考叔第一个登上城墙，正招呼士兵跟上，子都从后面一箭射倒了他，颍考叔掉到城下摔死。这是争车的恶果。

春秋时期兵车技术还在扩散中。公元前 584 年，晋国为了牵制南方大国楚国的军事力量，派了巫臣为首的使团到吴国，传授兵车的制造以及使用的技术战术，并派了一些官兵充当顾问。吴国以这一在南方地区的新装备接连进攻楚国附近的附庸小国，搞得楚国军队在南北两线疲于奔命，而吴国也就此加入了中原的强国俱乐部。

除了作战的兵车外，春秋时期的军队还装备着相当多的辅助性车辆，比如每一乘战车单位还包括了辎重和修理、运输的广车、钝车，以及人力拉的辇车。作战的指挥车是战车改成的。还有一种是瞭望车“巢车”，是在八轮大车上树立两根木柱，用轱辘把一个开有窗口的小板屋升到顶端，士兵可以隐藏在板屋内瞭望敌情。公元前 575 年楚晋在鄢陵会战，楚共王亲自爬到巢车上观察，大臣伯州犁跟在他后面。共王见敌方的阵营里有骑兵来回奔跑，问是为什么，伯州犁回答说：“是在召集军官开会。”“都已经聚集到中军了。”回答说：“那



商代兵车（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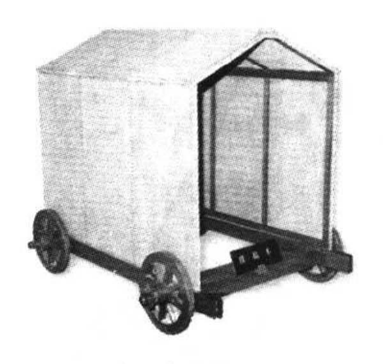
就是在讨论战术了。”“把帐篷的帐门打开了。”回答说：“是在祖先牌位前卜卦。”“把帐篷撤了。”回答说：“那就是快要发布命令了。”“很嘈杂，而且尘土飞扬。”回答说：“那是要把井塞了、灶填了，准备将营地作为战场。”“兵车都已套好了马，士兵在准备登车。”回答说：“那是要排列阵势了。”“可是上了车又下来了。”回答说：“那是在为战胜而祈祷。”楚共王了解了敌情后才下车布置作战。这场战役打了两天，战况相当激烈，楚共王自己也被晋军的魏锜射瞎了一只眼睛，好在楚军的神箭手养由基一箭射死了魏锜，才得以安全撤离。

到了战国，主要作战方式逐渐改为能够适应各类地形的步兵方阵，金属武器和弓箭的密集使用抵消了战车的冲击力。战车就此逐渐退出战场。秦汉以后军队仅装备一般的运输车辆，不再使用战车。明代曾一度将火器配备在车辆上，号为“火车”，先后试用了正厢车、扁厢车、双轮战车、单轮战车、雷火车、全胜车、鹰扬车、屏风车、冲虏藏轮车、火柜攻敌车等等名目，但没有收到预想效果，没有普遍装备军队。

【攻城器械】

至少从周朝开始，每个诸侯国和贵族采邑的头等大事就是要筑城。这样也就开始发展出一套守城和攻城的器械，以后历代很少有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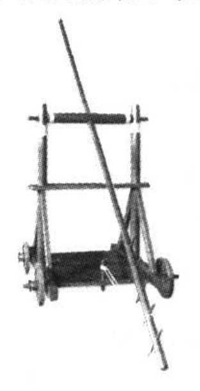
长期沿用的主要攻城器械有跨越护城河的“壕桥”，能够居高临下向城内射箭投石的“橹楼”，供士兵爬城的“云梯”，破坏城墙的活动掩体“轒辒（fēn wēn）”，与城墙等高、可供士兵直接跳上城头的“临冲”等等。



轒辒车（模型）

轒辒实际上是一个安装了车轮的木屋，屋顶上蒙上生牛皮，作战时还要涂上湿泥浆以防火，俗称“木牛车”。屋顶下躲藏一些士兵，将其推到城墙下，士兵可以在屋顶的掩护下挖城（明以前的城墙都是夯土筑成），或者开挖地道，或者破坏城门。到了南北朝时，又将屋顶改成一个大的等腰三角形，号称“尖头木驴”，可以掩护6~10人在城下进行破城作业。到了宋代，这种器械进一步大型化，包括了前导用来挡箭石的“屏风牌”，破城作业车“头车”，以及掩护换班、运土、输送器材的“绪棚”，后面另有用来拖动头车和绪棚的绞车“找车”。

直接破坏城墙的还有“饿鹘车”或者“搭车”。这是安装了长柄耙爪的车



饿鹘车（模型）



云梯（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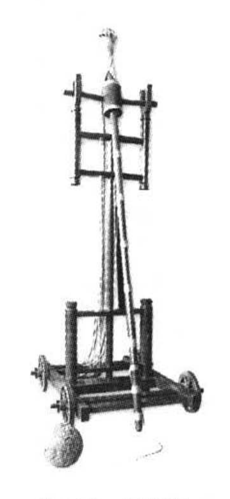
辆，攻城时在压制了城上的发射武器后，可以将这种车推到城下，耙拉城垛，将城墙扒出缺口后士兵可以直接登城。

城门总是城墙最薄弱环节，攻击城门的器械有“火车”。实际上只是一个装上了大火盆的手推车。火盆里盛满燃烧的油脂，如果守方浇水灭火，油会浮在水上燃烧，更容易烧毁城门。另一种是“钩撞车”，和“尖头木驴”相仿，里面悬挂一根粗重的撞木，用来撞击城门。

“临冲”是一种大型楼车，也叫“吕公车”。它比城墙略高，分成好几层，有供射箭、投枪、石的层面，以及可以搭在城墙上的跳板，后面有楼梯。作战时推到城墙下，在压制住对方的发射武器后，士兵可以直接登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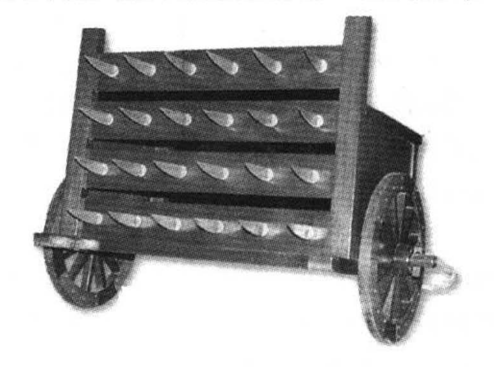
【守城器械】

守城器械大多是利用守方居高临下的优势，往下抛掷的“炮石”、“擂木”之类。长方柱形的砖石投掷物是“砖雷”，擂木周身钉有逆须钉的是“木雷”。大型化的擂木称“夜叉雷”或“留客住”，长一丈多，直径一尺左右，周身钉满逆须钉，两端有轮，突然扔到城下攻方士兵人丛中，再用绞车拉动碾压，还可以回收。还有一种是将布满狼牙钉的方铁框扔到城下，杀伤敌军后再用绳索吊起回收，叫“狼牙拍”。明代守城的器械还有放置在城垛间的“奈何木”，上面插有尖竹签，挂着缀有炮石和铁蒺藜的绳索，攻方士兵爬到城头无法攀援，无可奈何。还有如同船锚一般的“飞钩”或“铁鸱脚”，用绳索系着扔下城杀伤敌兵。



抛石机（模型）

守城防御器械另有推云梯的“叉竿”、“抵篙”。当城垛被攻方破坏后，就要用预先准备好的“木女头”先抵挡一阵。这是一种开有射孔、下有车轮的厚挡板。城门被破坏时有“塞门刀车”



塞门刀车（模型）

临时抵挡，这种车的前挡板上布满尖刀，阻挡敌军涌入。

守方一般还会在城墙上预先准备好吊车、绞车，以用来吊放士兵下城反击或者破坏攻方的攻城器械。

【障碍器材】

为了阻碍敌方军队的行动，古代发展出了一些障碍器材。秦汉时已普遍使用了“渠答”，后世称为“铁菱”、“铁蒺藜”。这是些有四个头的铁尖刺，扔在地上总有一个刺朝上。中间有一个孔，可以用绳穿在一起方便携带。有大小两种型号。作战时散布在敌方的必经之路，尤其是狭路、河沟、城壕之类地点。

还有一种普遍使用的障碍物是“拒马”。是用木架架起一排削尖的圆木，主要用以堵塞城门道口，唐朝时往往用铁枪代替尖头圆木，号为“拒马枪”，有时也在野战中使用。最著名的是金朝的“铁浮图”重骑兵，作战时骑兵横队每前进一步，后面就排上拒马，使之有进无退。

在军队营垒、城镇之类的据点周围，战时都会布置鹿角木（尖头粗树枝）。晋、唐时期为阻止骑兵还有专门的钉板，可以迅速布防。

三、军事编制

【四大兵种】

古代军队不像现代军队那样有完整的军兵种划分。随着作战武器以及作战方式、作战地域的变化，才逐渐分离出一些专业化的部队，具有一定的兵种性质。一般有车、步、骑、舟四大兵种。两汉以后车兵消亡，主要是步、骑、水军三大兵种。不过中国古代军队主要不是按照兵种来编制和指挥的，而且也从来没有形成陆、海并列的两大军种体制。

【车兵】

从理论上而言，最早的军队应当都是步兵。不过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早期军队的主力是战车兵。商周时主要由贵族组成的战车兵，是当时最重要的兵种，在漫长的五个多世纪中，战车驰骋在中原大地上，而步兵配属于战车，在战车冲破敌人队形时进行格斗厮杀。由平民或者奴隶充当的“徒役”则在车后护卫战车，提供后勤，实际上只不过是战车兵的侍从。军队的编制以战车为核心，一国的军事实力以多少“乘”为标志。当时的一辆战车乘员三人，左侧的“车左”持弓箭射击，是主要的攻击力量，为一车之长，号为甲首；右侧的“车右”持戈矛，以勾刺杀敌，又称“骖乘”；中间的甲士为驭手，驾驶战车。



车兵

春秋时期步兵逐渐成为独立的兵种，与车兵并列。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仍有战车兵，与步兵混编，依旧是作战兵种。西汉也仍然有“车士”的编制，以及在直属朝廷的北军中有专门的“虎贲校尉”，有“车骑将军”名号。

后世车兵没落，东汉后车兵不再是独立的兵种，直到约1500年以后，随着火器的发展，明代军队又出现“车兵”兵种。嘉靖（1522～1565）后直属朝廷的“三大营”全都有车兵编制。戚继光在组建边防军时，也专门组织了用于战斗的车兵。这时候的车兵使用的是一种两轮车，两侧装有护板，号为正厢车（仅一侧有护板的称“偏箱车”，没有护

板的为“轻车”），平时用两头骡子拉动，战时靠车兵人力推进至发射阵地。车上装有火炮（大将军一座或佛郎机两座）。每辆战车，车兵定额24人，有佛郎机手、鸟铳手、火箭手、藤牌手等。作战时以战车为依托施放火器，扎营时将战车围绕营盘一圈，首尾相连，护卫营盘。因此这种车兵实际上具有一定的炮兵性质。

清朝入关后不再采用这种战车作战方式，车兵被废除。

【步兵】

公元前541年，晋国统帅荀吴率领晋军与北方少数民族狄人作战，作战地点在太原北面的山区一个叫“大卤”的地方，地势险要，战车难以行使。部将魏舒提出建议：“敌人都是步兵，在这山区里我们的战车无法发挥作用，步兵困在战车旁边也没有用。不如自我以下所有甲士全都下车徒步作战。”荀吴同意这个计划，委派魏舒为前敌指挥。魏舒下令拆毁战车，将所有的甲士和原来跟随战车的“徒兵”混编列阵。自认为出身高贵的战车兵不愿下车和徒兵混在一起，魏舒就把荀吴的一个亲信当场斩首示众，这才逼迫甲士下车排阵。魏舒用一支小部队在前面诱敌，将主力排列在阵势后部的两侧。狄人没见过华夏族军队徒步作战，大声嘲笑，也不列阵就一拥而上，想不到正中了魏舒的诱敌之计，晋军从两侧合击，狄人大败。

这虽是首次在战场上临时组编步兵，但步兵作为华夏族军队一个独立的兵种却由此发端。春秋时期步兵迅速兴起，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平民（国人以及庶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战国时期步兵已经是军队作战的主力。从秦始皇兵马俑坑中出土的步兵俑来看，有的步兵是穿甲的，有的是不穿甲的，前者大多手持各类格斗兵器，后者大多手持弓弩做发射姿势。说明当时步兵也已有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之分。不过这两种步兵是混编的，并非是独立的两个兵种，只是在某些战斗需要的情况下会集中起某一类步兵，如孙膑集中万名弩手伏击庞涓。

以后历代步兵一直占了军队的绝大部分编制。建制步兵种类繁多，但一般依然保持着秦代这两大类区分，也仍旧实行混编。如汉代步兵总称“材官”，其中的弩手称“蹶张”，勇健善斗的有“奔命”、“勇敢”等名号。西汉时设置的北军“八校尉”中有“步兵校尉”，但实际上八校尉大多数都是步兵编制，这支部队守卫上林苑，是一支长于格斗的步兵。另有“射声校尉”，是专门的弓弩部队。唐代的步兵也有以格斗见长的“奇兵”（机动队）和“跳荡兵”（突击队）以及发射武器为主的“弓弩兵”。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步兵往往主要是依靠发射类武器进行战斗的，尤其是宋代军队中发射武器的步兵要比格斗步兵多得多，平均每100名马军（并非完全是骑兵）士兵中，枪手和旗手加起来只有13人，余下的全都是弓箭手；每100名步军士兵中，刀手8人，枪手16人，弓箭手有76人。

元代开始军队装备火器，自然也就有专门的操作火器的步兵。如明代步兵编制中都有“铳手”，负责发射火炮、火枪。戚继光组建军队，无论骑兵、步兵，都有专门的鸟铳手、快枪手、火箭手、藤牌手，以及挑选“有杀气者”为

近战时的刀棍手，混编为战斗基本单位。清代绿营兵主体是步兵，其中混编有鸟铳手、抬枪手、炮手。

【骑兵】

马匹是被人类很早就驯服了的动物，不过早期的骑兵既没有马鞍，也没有马镫，全靠自己的双腿紧紧夹住马腹催马奔驰，在马上也无法使用身体力量来进行劈砍、刺杀等格斗动作，主要是依靠射箭来杀伤敌人。只有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游牧民族才善于这种高难度的骑射，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军队要到较晚的时期才开始组建骑兵。

战国时期一般讲到国家军事实力时往往“车骑”并提，足可见当时的骑兵已和车兵并列为重要的技术兵种。《战国策》提到苏秦游说秦王，说秦国有“战车万乘，奋击百万”，“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范雎也说“秦卒之勇，车骑之多”，所向无敌。与“车骑”对称的“奋击”、“秦卒”应该就是步兵，看来这就是当时军队的三大兵种了。《史记》记载苏秦的话，说是燕国有“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赵国“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魏国“武士二十万，奋击二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南方的楚国则步兵比重大，“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总的来说各国的骑兵只占全部军力的5%都不到。

当时华夏族的服装都是宽袖长袍，骑在马上要做射箭动作很困难。公元前307年，北方的赵国在长期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中痛感骑兵的重要性，国王赵武灵王毅然推行“胡服骑射”，将骑兵的服装改为与游牧民族相同的窄袖短衣，终于建立起可以与游牧民族作战的骑兵。后来任用李牧为统帅，训练士兵骑射，并精选战车1300乘，骑兵1.3万人，“百金之士”5万，弓箭手10万，组成主力部队与匈奴作战，接连打败或降伏匈奴的附属国如东胡、林胡等，使得匈奴在以后的十几年里不敢接近赵国的边境。赵国这支特编的部队步骑比例还是没超过10: 1。

战国时期的骑兵仍然还没有马镫，难以进行马上格斗，在野战中一般不在正面进行突击，主要用于包抄、迂回、追击。如李牧以骑兵两翼包抄战术击败匈奴大军。秦赵长平之战，白起以1.5万骑兵截断赵军与营垒之间的联系。骑兵的编制还不大，并不独立执行战役任务。

秦汉时期骑兵已有很多的独立建制部队，比如楚汉相争时，两军有很多称



骑兵

为“骑将”的军官。公元前202年楚汉垓下决战，项羽最后失败，带领800名骑兵突围。刘邦命令骑将灌婴率5000骑兵猛追，一直追过淮河。项羽只剩下28个骑兵，被数千名汉军骑兵包围。项羽知道无法逃脱，对手下的骑兵说：“我起兵八年来，打了七十多仗，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所以称霸天下。今天被围困在此，是天要亡我，不是我不会打仗。反正今天我带你们决一死战，一定要打赢它几个回合，突围、斩将、刈旗，让你们知道是天要亡我，不是我不会打仗。”他把剩余的骑兵分为四队，说“我为诸位取对方一员将军”，要骑兵四面突击，约好在一个山头会合，他自己大吼一声，乘乱一直冲到汉军人丛中，果然将汉军的一个军官砍于马下。与骑兵会合后，汉军又包围上来，项羽又与骑兵一起突击，杀死汉军的一个都尉和上百骑兵。突出重围到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边再次会合时，28骑只丧失2骑。骑兵们都衷心敬佩项羽。项羽认为是天要亡他，而且丧失了过去带过江的8000子弟兵，无面目复见江东父老，于是把战马送给梢公，要骑兵全都下马步战，与汉军追兵短兵相接，最后项羽受伤自刎而亡。

西汉为与匈奴作战，逐步组建起大规模的骑兵部队，征兵时专门有“骑士”的兵役，朝廷任命专门的“车骑将军”，以后又设立“骠骑将军”、“骁骑将军”等名号，朝廷直属的北军中也有“屯骑校尉”和“越骑校尉”、“胡骑校尉”。汉武帝时期发动多次进攻匈奴的战争，出动的骑兵动辄数以十万计，可见当时军队中骑兵的比重加大，在边境地区已经超过了步兵。

东汉保留了西汉时的制度，但军队中骑兵的比重明显下降。几次边境战争中，由内附的南匈奴或羌族部落骑兵起到重要作用，汉族骑兵出动数量不多。如73年窦固等出击西域，89年窦宪等出击北匈奴，汉族骑兵都不到“万骑”规模。在中原地区的战争中往往“步骑”并提，在作战时仍然采用混编，骑兵起辅助作用。

东汉末年的战乱中，曹操集团的军事实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有一支较精锐的骑兵。比如在200年官渡之战中，曹操亲自率5000骑兵突袭袁绍军后勤基地乌巢，获得决定性胜利。又如211年曹军进攻关中，以步兵诱敌，而以“虎骑”为主力夹击，大败马超、韩遂。这种“虎骑”很可能就是人马都披甲的重装骑兵，说明汉族军队骑兵开始有重装与轻装区别，而且这种重装骑兵已具有野战强攻突击能力。

十六国混战时期（304～439）是重装骑兵全面登上军事舞台的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大批内迁，畜牧业的发展有可能使骑兵用马大量增加；马镫等更为完善的乘马具的发明，大大增加了骑兵在马上的格斗能力；手工业的发展也能够为骑兵提供更完善的防护甲。因此重装骑兵已具有强大的突击能力，成为战场上令人生畏的决定性力量。军队中骑兵的比重也大大增加，如312年汉族军阀王濬组织五万军队进攻盘踞襄国的军阀石勒，石勒先败后胜，在最后的追击战中缴获“铠马”5000匹。可见在王濬军队中重装骑兵至少要占到十分之一以上。328年石勒进攻洛阳，出动的军队中“步卒六万，骑二万七千”，骑兵达到全军近三分之一。383年前秦苻坚以百万

大军进攻东晋，据说步兵有60万，骑兵有27万。可见步骑之比为2：1似乎是当时的惯例。而后来北魏军队动辄出动数以十万计的骑兵大兵团作战，甚至在450年大举进攻南朝刘宋时，出动的骑兵居然达到了60万，营寨绵延3000里。

北朝极端重视骑兵的传统也影响到隋唐。唐太宗是一位轻骑兵（指人披甲、马不披甲的骑兵，人披的甲是俩裆铠为主，主要遮蔽胸部，或者也叫胸甲骑兵）奔袭战术的积极实践者，他在建立唐朝过程中东征西讨，很多战役都是他亲自率轻骑兵奔袭、突击而获胜。唐代也是古代汉族皇朝军队骑兵的鼎盛时期。按照《通典》所载唐初大将李靖的说法，唐代军队的标准编成是骑兵要占到战斗部队的30%，而盛唐时期全部57万常备军中有16万是骑兵，差不多也占到30%。

唐代中叶起中原汉族皇朝逐渐丧失对于主要马匹产区的控制，军队编成中的骑兵比重也随之逐渐降低。到北宋建立时，军队编成中尽管有相当比重的"马军"，但却大部分是没有马匹的步兵。北宋皇朝千方百计促进马匹的养育，而在农业地区难以放牧大批马群，马匹生产长期萎缩，"马军"也就只能名不副实。这种局面到南宋时更为严重，骑兵补充马匹只能依靠广西等地出产的矮种马，骑兵的比重不到5%。而与两宋对峙的辽、西夏、金、元等游牧少数民族皇朝却以骑兵为主力军，屡屡打败宋军。南宋能够与之一战的部队往往装备有较多骑兵，比如著名的岳家军，以俘获的马匹编练8000骑兵，号"背嵬军"，又编练"游奕马军"，1140年颖昌大战，这两支骑兵与金骑兵进行大规模骑兵会战，获得胜利。

明代在初期为与蒙古作战，极力加强骑兵实力，尤其是在明永乐年间（1403～1425），永乐帝亲自多次远征漠北，每次都出动大量骑兵。1409年邱福率10万骑兵奔袭鞑靼本雅失里，结果是全军覆没，邱福阵亡，明朝廷立即动员组建30万骑兵，也只用了半年多时间。可见当时有强大的骑兵后备力量。但1449年"土木之变"后，朝廷直接掌握的京军几乎被全部消灭，尤其是骑兵损失后再也没有能够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而战马的供应更加困难，从此明军逐步倒退到两宋时期的那种状况，骑兵在军队编成中所占比例不到十分之一。

清代八旗兵的主体是骑兵，而绿营兵则基本是以步兵为主。入关前八旗兵的骑、步比为1：1，入关后仍然基本保持这一比例。而从制度上来看，朝廷规定绿营兵部队一般原则是"马三步七"，但实际上各地均不相同。比如江西、安徽驻军都是"马一步九"；陕西、甘肃驻军则为"马六步四"。由于清代"马兵"是指级别最高、薪俸最多的士兵，因此"马兵"并不一定是备有马匹的骑兵，连水师的士兵也有相当比例的"马兵"。

【水军】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49年夏天，楚国出动了一支"舟师"讨伐长江下游的吴国，没有获得什么战果，当年退回本国。这次讨伐战役特意被称之为"舟师之役"，可见在这之前即使是在长江流域的诸侯国军队中还没有普遍组建这种"舟师"。这是史籍上首次有关独

立建制的水上军队的记载。而过了一年，吴国的反击，也没有组建这种舟师，仍然是从陆路围攻楚国的巢，结果吴国国王诸樊卤莽冒进，在巢的城门口中箭身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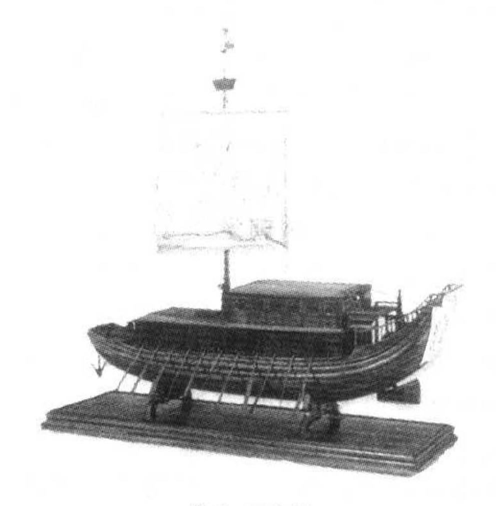
楚国看来是最早组建“舟师”的国家，而且经常以舟师发动战争的也是楚国。如公元前523年，楚国组建“舟师”进攻濮；公元前517年，又与越国约定夹击吴国，也是出动舟师侵略吴国的边境地区。公元前515年吴国进攻楚的潜，楚军以舟师包抄吴军后路，使得吴军难以退兵。吴军发生内乱，阖闾派刺客刺杀吴王僚，自己称王。楚军听说吴军内乱就解围而走，吴军得以撤退。公元前508年，楚国再次进攻吴国，双方在豫章一带对峙。这次是吴国组建了一支舟师，但却只用做疑兵之计，主力暗中突击巢，拔掉了这个眼中钉。两年后吴军联合唐国、蔡国一起进攻楚国，吴军到淮汭抛弃船只，从陆路翻越大别山击败楚军，乘胜攻入楚国的都城郢。后来楚国靠秦国援军才打退了吴军。

吴国的组建舟师似乎比楚国要晚，但战斗力很强。公元前504年，吴国再次进攻楚国，吴军舟师一举打败了楚军的舟师。楚国为此担忧要亡国，一度迁都。公元前485年，吴国派出以徐承率领的一支舟师，从海路远袭齐国。这支军队顺利登陆，但在登陆后的战斗中失利。徐承又将这支军队带到海上，仍旧从海路回到吴国。一般认为，为这次远程渡海作战而编成的“舟师”，标志着中国海军编制的正式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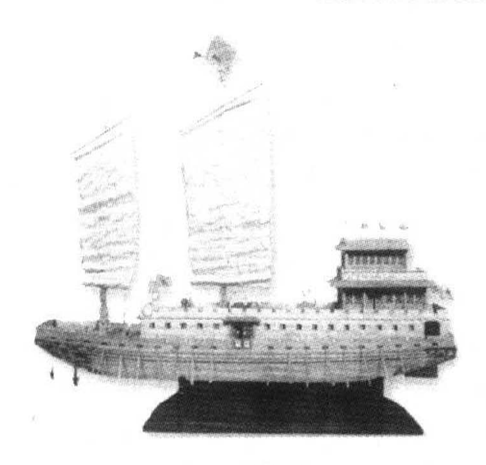
战国时期各大国先后根据需要组建舟师。如秦国为攻略巴蜀，组建了大规模的舟师。公元前280年攻略楚国的黔中时，出动的舟师有船只上万艘。舟师的士兵也经过专门的训练，称“习流”或“楼船士”。秦统一六国后，继续组编并出动大规模的舟师向南方扩张势力。如公元前214年，屠睢率以舟师为主的50万大军进攻南方的“百越”。

汉代军队确立步、车、骑、舟四大兵种的常备军。大型舰只为“楼船”，舰上有楼，可以供士兵居高临下发射箭矢。配备楼船的“楼船军”往往用于渡海作战。较为轻巧的“弋船”，适合在急流险滩航行，一般配备在南方水网地带部署的舟师中，进行内河作战。

东汉后期舟师一般改称“水军”。如208年曹操准备一举攻略江南，在邺都开挖玄武池训练水军。刘备退到江夏，仅存关羽指挥的“水军万人”。赤壁之战，曹操精心操练的水军几乎全部被歼灭，但第二年即重新“作轻舟，治水军”。到曹魏代汉时，已建有一支完整的水军，有能力以水军发动东征，进攻东吴。三国中东吴的水军最为强大，建有濡须口（今安徽巢县南）、西陵（今湖北宜昌）两大水军基地，防备来自



蒙冲（模型）



斗舰（模型）

西、北两方面的威胁。同时还建造大型海船，渡海远征，如230年卫温率载有万人以上的舰队登陆台湾。东吴水军还曾远征辽东、海南岛等地。后来西晋准备灭吴时，大将王濬编练水军，建造大型楼船，得以突破吴军封锁线。

东晋南朝在江南建国，水军是重要的武装力量。这一时期水军普遍装备"拍舰"，使用大型抛石机进行水面战斗。与之对峙的十六国及以后的北朝都是长于骑兵而水军较弱，但是北方统一后，隋朝大大加强了水军建设。杨素提出进攻江南的方略，并在永安（今四川奉节东）主持建造一批大型战舰："五牙"，有楼五层，并仿照南朝拍舰，在舰只的前后左右设置六架抛石机，全舰可容纳800名士兵；"黄龙"，可容纳100名士兵；以下还有"平乘"、"舴艋"等。588年隋朝发动全面攻势：杨素率水军主力从永安出发顺流而下，燕荣率领另一支水军自东莱沿海南下包抄，步骑兵主力则逼近长江北岸，准备在南陈水军被消灭后分两路渡江。杨素所率的水军主力出三峡，以数千艘"黄龙"乘夜攻破南陈水军，以百余艘"青龙"舰组成的狼尾滩封锁线。"水军东下，舟舻被江，旌甲曜日"，杨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伟，被南陈人称为"江神"。在荆州的水战中，隋军的四艘五牙战舰击毁十多艘陈军战舰，南陈水军主力被歼灭。隋水军主力顺利到达汉口，与步骑军主力会师，保证了步骑军一举渡江成功，隋朝另一路包抄的水军也顺利攻下江南的重镇江阴、吴郡以及会稽等地。隋朝只用一年时间就获得南北统一战争的全面胜利，说明其水军具有对于南朝水军的压倒性优势。

唐朝初年在统一全国战争中组建水军，以后又为征讨高丽组建起庞大的海军。如660年苏定方率领这支海军降伏百济（朝鲜半岛西南部）。第二年当地叛唐，刘仁轨坚守府城，唐朝又派出孙仁师"率兵浮海以为之援"。刘仁轨率领援军在白江口与前来干涉的日本海军连续作战，四战皆捷，焚毁400余艘敌船，"烟焰涨天，海水皆赤"，得以平定百济。但是以后唐朝的军事重心移往北方边境，水军建设逐渐萎缩，并不再建立常备的水军编制。

北宋时期在朝廷直属的军队中设有"虎翼水军"，各地部署的水军很少。南宋则倚靠水军守边，在江淮之间组建大批水军部队，有"凌波军"、"楼船军"等名号。"其战舰则有海鳅、水哨马、双车、得胜、十棹、大飞、旗捷、防沙、平底、水飞马之名"。以后又在沿海地区部署水军，驻防各战略要地的水军编制约有3.3万人，另外还有直属于御前的虎翼水军等为机动部队。

蒙古军队以骑兵为主力，但在攻略南方的过程中充分注意到水军的重要性，1260年忽必烈即位当年就组建了第一支水军，任命张荣实为第一位"水军万

户”。1268年阿术率领蒙军围攻襄樊，南宋降将刘整建议：“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蒙军迅速造船5000艘，同时训练水军7万。1269年宋援军赶到，蒙军将新练水军投入战斗，击败宋军，“大破之，杀溺生擒五千余人，获战船百余艘”。从此水上战争形势逆转，宋军多次从水上来援都被打败。元军将领阿里海牙以水军焚毁宋军连接襄阳和樊城的浮桥，断绝两城联系，各个击破。1273年先下樊城，后下襄阳。这次战役的胜利说明元军的水军实力已超过宋军，以后在元军南下过程中，接连打败宋水军。1275年宋将张世杰率水军在镇江焦山一带长江与元军决战，结果大败。元军同时还组建海军，在渡江进攻的同时，董文炳率领的水军也已从海道逼近南宋都城临安。以后元朝又招降南宋泉州一带的海军将领蒲寿庚，从而在海军方面也超过南宋残军。1279年张弘范指挥元军舰队在崖山海面与宋军决战。宋军将上千艘舰只抛锚固定在海面上，在船只上建立楼橹，如一座水上城市。张弘范指挥元军两路包抄，迫近宋军舰只进行接舷近战，“弓弩火石交作，顷刻并破七舟”，宋军溃败。南宋朝廷至此彻底灭亡。元朝统一全国后，继续以水军为主力向外扩张，但1281年进攻日本和1282年进攻占城时，水军损失极其惨重。以后停止使用水军为主力对外进行大规模扩张，各地编练的水军改为驻防为主。

明太祖朱元璋有鉴于元朝对海外用兵导致的严重后果，在他给子孙后代留下的政治遗嘱中特意划出了日本、占城等15个“不征之国”，规定不得对这些海外国家用兵。另外对付退到海岛顽抗的原来割据江浙一带的张士诚、方国珍余部，也采用加强海岸警备力量的对策。明初在沿海设置了75个“海防卫”（军队编制单位），在各卫配备50艘舰只，平均分配，受陆地指挥官的节制。这样一来，明朝廷在战略上就将海上水军限制在单纯防守的限度之内。仅在南京的上下游，设置了独立编制的两支内河水军。以后，明代统治者基本上都遵循这一方针。虽然15世纪初有郑和七下西洋这样的航海壮举，证明了中国水军具有威慑广大海域的实力，但由于这一壮举没有转化为经济收益，结果巨大的耗费反而使统治者进一步压缩水军编制。到了16世纪，曾经强大无比的中国水军居然无法对付以小股偷袭的日本海盗的侵扰。

清朝入关前已在辽东部署水师，统一全国后根据战事需要曾组建相当规模的水师，如讨伐吴三桂时，组建水师有鸟船100艘，沙船438艘，总兵力3万人。进攻台湾时调集各地水师船只500艘，施琅攻克澎湖，用战船300艘，水师2万人。以后陆续设置了奉天、旅顺、天津、浙江、福建、广东等水师，但基本上仍然沿袭明代的战略，水军编制很小，以“营”为单位配置各地，而所起作用仅是“捕盗”。但即使如此，沿海商民仍困于海盗之苦。太平天国战争后，经曾国藩建议才改组水师为外海、内洋、里河三大类，并将后两类水师逐渐组建为新式海军，分为南洋、福建、北洋三大水师。

【什伍之制】

“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是人们熟

悉的谚语，军队是由士兵组成的战斗集体，要组编为一个单位，才容易指挥调动，并可以计算兵力。军队的编制就是军队组编士兵的方式。现代军队编制一般都是统一的，在平时和战时的编制基本相同，要调动的话也是成建制的调动。但中国古代军队往往有两种编制，一种是平时组织训练的编制，另一种是战斗部队的编制。当要组建参战部队时需要打破原来的编制，将士兵重新组织到新的战斗编制中去。中国古代军队编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基本的固定编制规模逐渐缩小，越到后来，千人以上的部队就越是习惯于采用临时组编的办法来编成。

5 进位以及 10 进位制是人类普遍采用的记数方法，因此也很早就用来计算并编制士兵。中国古代军队的基本编制单位就是一五一十点数的“什伍”之制。另外古代展开军队作战时往往会排列左、右两路或左、中、右三路的阵势，由此影响到军队有时要采用 2 进位或 3 进位（包括其倍数）的编制。

出土的商代墓葬遗址中，殉葬人大多是 10 人一排，墓外的殉葬坑一般也是 10 人一组，陪葬的铜兵器往往也是 10 件为一捆，或许当时已经有了“什”的士兵编制。有人认为甲骨文中的“行”字也就是 10 个“什”，由“百夫长”指挥；10“行”编为“大行”，由“千夫长”指挥；作战时习惯按照左、中、右各一个“大行”来排列阵势，投入战斗的三个大行就称之为“师”，是商代最基本战略单位。据说商王亲自率领的“王师”就是由三个“师”组成。不过根据安阳一个商朝墓葬出土的战车来看，却是 5 辆一组，前三后二，每辆有三套作战武器，说明每辆有三名士兵；另外前面又有三个殉葬坑，每坑殉葬五人，看来应该是为前面三辆战车提供勤务的徒役。另一处车马坑则是集中埋葬了 25 辆战车。据此推测，再结合一些史料的记载，商代的战车编制是实行 5 进位制的。5 辆一队，5 队、25 辆战车组成的战斗单位由“马亚”指挥；而出动 100 辆战车时的指挥官叫“多马亚”；一次出动的战车如果超过了二三百辆，就要由商王亲自指挥了。

一般认为商代开创的这种什伍之制后来被周朝继承。周武王伐纣发布《牧誓》就提到“百夫长”、“千夫长”，而周代的军队也是以战车为核心，一辆战车及其配属的步兵合称“乘”，是最小的编制单位。乘战车的甲士是三名，至于配属的步兵究竟有多少，众说纷纭。按照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司马法》一书的说法，每乘是甲士 10 名（三名上车作战，七名在车下作战），徒役 20 名。但也有人认为 20 个徒役中只有五名承担养马、炊饮，另外 15 名也参加战斗。比较一致的说法是每五乘编为一队，由仆射指挥；每两队（10 乘）由“官”指挥；每 10 队（50 乘）编为“卒”，由“卒长”指挥；每二卒（100 乘）编为“师”，由“师氏”指挥。周代仍然以“师”为基本单位，但师的数量逐渐增加，据说西周有 14 个师。

春秋时期军队中步兵比重逐渐增大，根据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一书的研究，认为这一时期每乘步兵从 25 名逐渐增加到 50 名、75 名，而楚国军队每乘步兵为 100 名。西周时作战在排列阵势时一般将参战部队分为左、中、右三个集群，号为“三军”，并按照集群的

战术重要性又称为上、中、下军，而以总指挥所在的中军地位为最高。春秋时期各国之间战争频繁，这种战术单位逐渐固定，成为“师”以上的又一编制单位。各个诸侯国编成的军数目不同，有的有三军，有的有四军，有的有六军。军所隶属的战车以及士兵数量并不完全一致，一般来说在200乘上下。步兵逐渐在独立作战中也形成了新的编制，据《国语》记载吴国步兵的编制为10进位制的：10人为队，10队为行，10行为旌，10旌为军。

战国时期步兵成为主力，各国编制不尽相同。据《周礼》（一般认为该书成书于战国时期，反映的是儒家理想中的国家制度，其中有一些是成书时的制度）的说法，步兵每五名编为“伍”，由伍长指挥；五个“伍”（25人）编为“两”，由“两司马”指挥；四个“两”编为“卒”（100人），由“卒长”指挥；五个“卒”编为“旅”（500人），由“旅帅”指挥；五个“旅”编为“师”（2500人），由“师帅”指挥；五个师编为“军”（12500人），由“军将”指挥。而《尉缭子》的说法，可能是魏国的步兵编制：5人为伍，10人为什，50人为属，100人为闾。《商君书》提到的可能是秦国的步兵编制，则5人为伍，50人设“屯长”，500人设“五百主”，1000人设“二五百主”。骑兵的编制应当与此相近。

总的来看，早期步兵都以五人为战斗单位。据《司马法》一书，五人分别使用弓、殳、矛、戈、戟，成纵队战斗队形时，短兵器在前、长兵器在后。五个伍排列成一个方阵“两”，两司马为甲士，居中担任指挥。看来这种步兵战术与基本编制配合得很好。

秦国实行全民皆兵，索性将成年男子一律称之为“士伍”，平时按照居住地点就近编伍，由各郡的郡尉、各县的县尉负责训练，警备治安。大规模征发参战时，就由郡尉、县尉率领上前线。参战时由朝廷任命的统帅进行战时编制，委派若干“将军”分领几个作战集群，集群下将各地征发的士兵按其地域集中编制为某一战斗部队，号为“部”，由朝廷委派的“校尉”指挥；部下分为若干个（一般也应是5进位制）“曲”，约1000人，由“军侯”指挥；曲以下按平时基本编制，整编为伍（有伍长）、什（有什长）、队（50人或100人，有队率）、屯（500人，有屯长）。另外每一级军官都可支配约占编制10%的另编人员为随从亲兵，担任警卫、通讯等特别战地勤务。

汉代军队编制沿袭秦代，按照战时编制的常备军逐渐固定，以部为基本单位。部由校尉指挥，因此部有时也称“校”。校尉出缺由军司马代领。东汉时直属朝廷的北军“五校尉”部队称之为“五营”，每营应该相当于过去的部，但编制定额仅千人左右。校尉的级别相当于郡尉（比二千石），军侯相当于县尉（比六百石），屯长、队率相当于县吏（比二百石、百石）。以下的什长、伍长不算官。部以下的编制不固定，根据任务各有几个“曲”；而部以上的编制也不固定，由朝廷根据战略方向、战役任务委派的将军指挥根据该任务而组编的几个部，构成一支某个战役或战略方向的兵力，有时就称军。将军的指挥部由于要在野地宿营搭建帐篷而称之为“幕府”，朝廷往往给予相当大的人事权力，

允许临时任命幕府官员，因此将军出征也就叫做“开府”。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军队的基本编制情况相当混乱，史籍的记载也不明确。总的趋势是部、曲的地位日益下降，成为将领的随从亲兵，其中大多数都是将领的奴仆，没有人身自由，最后部、曲联称，成为法律限定的一种贱民。而将军越封越滥，所领的“军”的员额不断缩小。西晋时每一军编制仅1500人左右，而东晋时将军甚至成为文官的称号。南朝刘宋时将军队大致编制为军、幢、队三级，队以下仍为传统的什伍之制。队约有200人上下，设“队主”；若干队合为幢，设“幢主”；一般三幢合为军，一军约3000人。军以上无固定编制，由朝廷临时任命“都督”或“统军”。

关于北朝时期军队编制情况，史籍记载不是很明确。据说北魏时期也是以队、幢、军三级为基本编制。但据说军仅千人左右，则或许是100人左右为队，以上三队一幢、三幢一军。指挥官分别为军主、幢主、队主。军以上编制不固定，根据战时需要组编，由“统军”、“别将”、“都督”等指挥。

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对传统军队编制的改革力度较大。据说当时在皇帝之下设六个柱国大将军，每个柱国大将军管辖两个大将军（共12名），每个大将军管辖两个“开府”（共24名开府），每个开府管辖两个“仪同”（意思为仪仗可以与开府相同，总共48名）。这些听上去级别很高的军官实际指挥的士兵并不多，每个开府所指挥的是“军”（也叫“团”），但是实际上只有2000人左右；每个仪同指挥约1000人左右。千人以下的编制情况不明，但想来应该还是传统的什伍之制。

隋唐继承了府兵制度，尤其是唐府兵制的编制非常规整。各地遍设折冲府，为组织、训练的编制单位，管辖兵员800～1200人，设折冲都尉，副手为两位果毅都尉；府下辖4－6个团，每团兵员200人，设校尉为主官；团下辖二旅，每旅兵员100人，设旅帅为主官；旅下辖二队，每队兵员50人，设队正为主官；队下辖五火，每火兵员10人，设火长。战国以来传统的“伍”被取消。全国的折冲府数目庞大，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就达到了643个，分别由朝廷的12卫大将军统帅。以上这种府兵的编制只是组织、训练编制，至于府兵上番组成的战斗部队的编制究竟如何，是否仍然和平时的编制相同，盛唐时期各边境军区军队的基层编制如何，尚存有疑问。但很明显的是，到唐中期后，府兵的这套编制已实际被废除。

五代时期战乱频仍，无所谓平时战时，军队的编制就是战斗编制。到后周时组建基本战斗部队编制：100人为一个“都”，都有“都头”；五个都组编为一个“营”（500人），营有“指挥”；五个营即组编为一个“军”（2500人），军有“都指挥使”或“都虞侯”，或直接称“军主”；10个军编为一“厢”（2.5万人上下，从战斗中的左、右两翼发展而来），厢有“都指挥使”，或直接称“厢主”；左、右两厢编成一个战略方向的总兵力，一般大约为5万人上下，由皇帝派出的节度使统帅。这或许就是从唐代军队的战时编制发展而来的。

后周的制度被宋朝全盘沿用。宋军以标准为500人的营（一般直接称“指

挥"）为基本单位，统计兵力都计算有多少指挥，调动组编也以指挥为单位，一般并不拆散。营下的为100人的都，有都头；都以下的编制应该是什伍之制，有军头、"十将"（管辖10人）等士官的名目。理论上五营编一军，但实际上往往不足额（也有相反的情况）。而军以上的厢由于兵员过多，因此朝廷往往采用抽军办法，使厢并不足额，甚至进一步撤消厢的番号。北宋中期后厢几乎已全部架空，朝廷直接指挥并调动军，厢都指挥使成为武官的虚衔。

宋军是职业军队，理论上不应再有平时、战时编制的区别，但是实际上这套编制在战时运转并不理想，到北宋中期又发生转变。范仲淹在主持陕西防务时，为适应作战需要而重新整编军队：以五人为"伍"，五伍（25人）为"队"，五队（125人）为"阵"，20队（2500人）为"将"。"将"作为独立战术单位，直接指挥下属。后来他的部下蔡挺在宋神宗改革时又将这一编制改动后向全军推广：10人为"火"，五火为队（50人），10队为营（即指挥，500人），若干个营组编为"将"（根据战役需要3000~10000人不等）。指挥以下完整编制调动，将的编制也尽量保持稳定，指挥官有"将"和"副将"，下属尽量不打乱。1081年全国建立起92将，号为"将兵法"。

南宋皇朝在颠沛流离中仓促建军，重新将"军"作为独立战术单位，把原来的"将"组编为若干个军，设"统制"或"统领"为军指挥官；又按照战略防御方向将"军"组编为若干个"大军"，设"都统制"或"护军"为统帅。如韩世忠为"前护军"，以楚州（今江苏淮安）为中心组织防御，下辖11个统制、13个统领，有63将编制，约8万兵马。刘光世为"左护军"，下辖10军，防御淮北方向，约有5万多兵马。张俊为"中护军"，有11军、99将编制，以建康（今南京）为中心展开，兵力约为8万人。岳飞为"后护军"以鄂州（今武昌）为中心组织防御，辖12军，有84将编制，10万多兵马。吴玠为"右护军"，在今陕南一带展开，约7万人，编制较为混乱。不过至1139年与北方金朝和议成功后，南宋朝廷就裁撤了"大军"的编制，由朝廷直接控制各军。军以下仍然保留将、营、队、火的基本编制。

先后与宋皇朝对峙的辽、西夏、金、元少数民族皇朝军队的编制情况史载不明。最著名的是金朝的"猛安谋克"制度。猛安原意是"千夫长"，谋克原意为"百夫长"，在谋克之下有什长、伍长，可见原来女真族军队也是采用10进位制的编制方法。以后将被征服的各部落武装也按此制编制成军，若干个猛安编为"司"，设立都统司指挥。随着金朝的迅速扩张，难以严格贯彻原有编制，在巩固了对于中原地区的统治后，1175年金朝曾经重新编制猛安、谋克，按照女真人全民皆兵的传统，每谋克300户，7~10个谋克编为一个猛安。1183年编成220个猛安，1878个谋克，61万多户，平均每谋克有327户，大约每个猛安下有8个半谋克。但是女真社会急剧变化，原来天经地义的服役从征逐渐不再能吸引青年人，猛安、谋克的职位世袭，官愈多而兵日少，金末每个谋克平均只有25人，除去旗手、鼓手等，战斗兵仅18人，而每个猛安平均也仅辖4个

谋克而已。

蒙古兴起后建立的军队也是按10进位制编制的，10人为队，有队长或称“牌子头”；10队组成一个“百户”，10个百户组成一个千户，10个千户组成一个万户，万户为蒙古军最高编制单位。百户、千户、万户既是编制单位，也是长官的名号。不过实际上编制往往并不足，比如有7000人以上的为“上万户”，5000人以上为“中万户”，不满3000人为“下万户”。同样，千户、百户也是按照这个比例分出上、中、下。入主中原后元朝军队大体上保持这一基本编制。

朱元璋在占有江南地区后开始整编军队，规定每10个士兵组成一个“小旗”，5个小旗组成一个“总旗”，两个总旗组成一个百户，10个百户组成千户，5个千户设一指挥。建立明朝后根据刘基的“军卫法”建议，各省设都指挥使统辖驻军，以下分设卫、所。每卫编制5600人，设置指挥；卫下辖5个千户所，每所1112人，设千户；千户下辖10个百户所，每所112人，设百户；百户下辖2总旗；总旗下辖5小旗。和以前的朝代一样，明代这套卫所制的军队编制也没有贯彻始终，到了明中期后，明军的编制又随着募兵制的盛行而发生变化。而且这种新的编制因为募兵常常是由各地将领在本镇（相当于军区）组织的，全国并不统一。朝廷直接指挥的“三大营”开始采用“营”为基本编制，回到过去宋代的编制。营设参将，以下仍然沿用小旗、总旗、百户的基本编制。在福建、浙江编制的抗击倭寇的军队，则以5进位制，5人为伍，5伍为甲，5甲为队，若干个队组成营，若干个营组成镇。戚继光的“戚家军”则又不同，5人为伍，2伍为队，4队为宗，5宗为哨，4哨为营。戚继光在蓟镇组编的军队，又采用3进位制的编制：12人组成“队”（分为杀手队和鸟铳队，前者以近距格斗为主，2名圆牌手、2名狼筅手、2名长枪手兼弓箭手、2名钯手兼火箭手、2名大棒手兼弓箭手、1名火兵和1名队长混编；后者10名鸟铳手和1名火兵、1名队长），3队组成1旗（设1名旗总，共37人），3旗组成1局（设1名百总，共112人），3局组成1司（设1名把总，共449人），2司组成1部（设1名千总，共899人），3部组成1营（设将官，共2699人）。

满族军事实力在关外逐渐壮大的同时，开始建立八旗制度。其兵民合一、平战一体的基本编制是10人为1队，若干队组成“塔坦”（村落，设章京），4个塔坦组成1个“牛录”（以300人为标准，设佐领），5个牛录组成1个“甲喇”（设参领），5个甲喇组成1个“固山”（即“旗”，设固山额真，即旗主）。牛录为基本战术单位，固山为战略单位。这套编制后来推广于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但实际往往并不足额。比如蒙古、汉军八旗不到300人就可以编为牛录。入关后八旗兵长期维持这一编制体系。

作为清朝入关后主要军事力量的绿营兵，是由入关时逐步收编投降的明军组成的，而明末军队已不复有全国统一的编制，绿营兵的编制开始就很混乱，以后又因为满清统治者视绿营兵为治安军，并不以提高战斗力为编制原则，因此绿营这种混乱的编制长期保留下来。绿营兵编制总的来说是以“营”为基本单位，根据驻防地点的重要性，各设有

参将（正三品）、游击（从三品）、都司（正四品）、守备（正五品）等军官；而各营又按照长官的等级以及驻防重要性规定有不同的兵员编制数目，在200～1200名之间。营以下也没有统一的编制，而是分“汛”驻防。各汛分设“千总”（从六品）和“把总”（正七品），其所辖兵员定额也各不一致。按照全国有60万绿营兵计算，除去1653个千总、3414个把总，每汛不过百人而已。汛下又有“塘”、“卡”、“哨”等编制，最小的不满10人。营以上的编制也是毫无统一性，一个战略要地的各营隶属于“镇”（设有总兵，正二品），该镇总兵直属的若干个营组成“协”，由副将（正三品）指挥。各省设提督（从一品）统领本省的绿营兵驻军（有的省不设提督，由巡抚统领），若干个省组成大军区性质的总督辖区，由总督指挥。这些提督、巡抚、总督也拥有直接隶属的若干个营组成的“标”，而且以上所讲的绿营兵编制还是平时驻防编制，如果要征调出征，又不是成建制的调动，而是要从各省各镇各营各汛抽调官兵，来重新组编成战斗部队。这种战斗部队的编制居然没有一个固定的成法，一般的原则是以原来从属于某一镇的官兵重新组编为一个营，从一个省调出的部队再组编为一支军队。

由于清朝的这套编制实在是难以应付大规模的战争，与其从各省缓慢抽调官兵组编战斗部队，还不如在当地征募士兵组建新部队方便，因此从清中期镇压白莲教起义起越来越经常采用临时征“勇”代兵。勇和兵不一样，是打仗的“临时工”，为战事而征募，战后即遣散。到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曾国藩等人建立的湘军、淮军等都是全新的编制，基本制度沿袭的是戚继光在《练兵实纪》中所创设的编制再加以变通。采用10进位的基本编制，每10名战斗兵加1名什长、1名伙勇，组成“队”；8队组成1“哨”，有哨官、哨长；4哨（前、后、左、右）组成1营，还有营官亲自指挥的亲兵6队。全营总兵员数500人（正勇336名，伙勇42名，什长32名，护勇20名，亲兵60名，亲兵什长6名，哨官、哨长各4名）。另有180名长夫提供后勤运输。营为基本的战术以及经制管理单位。后期又组编若干个营（四五个）为“军，设立“分统”指挥，但只是军事指挥关系。若干个军上再设立“统领”，为战役方向单位。

四、统兵制度

【文武分途】

“商鞅变法”是大家都熟悉的故事，但人们往往并不清楚商鞅是以怎样的身份、怎样的官职来主持变法和政务的。据《史记》的记载，公元前356年的第一次变法时，商鞅是以“左庶长”的身份主持变法的，这是当时秦国的第十级爵位称号。四年后他因主持变法有功被提升为“大良造”（第十六级爵位），并领军围攻魏国的安邑（今山西夏县）。公元前350年他再次主持变法，《史记》没有说明当时他的爵位或职务。公元前340年商鞅又被任命为“将”，领军进攻魏国。他设下圈套，骗过去的老朋友、魏国的将军公子卬到阵前来与他叙旧，活捉了公子卬，然后乘机大举进攻，打了个大胜仗，于是被封为最高爵位“列侯”，封商於地方15“邑”。不过对于这块封地他并没有直接的统治权，仍然在朝廷执政。到公元前338年他被仇敌诬告“谋反”，仓皇出逃到自己的封地，发兵抵抗，很快就被朝廷军队粉碎，落得个车裂的下场。

商鞅主持变法以及领兵的爵位、职务变化，表明当时正处在从贵族掌政向职业官僚制度转化的过程中，职业军官或者按照中国传统称之为“武官”、“武将”的系统也正在形成之中。

中国直到春秋时期还处在部族国家阶段，各级贵族掌握着政治权力。周天子以下的公、侯、伯、子、男各级贵族分封于各地组建国家，号为“诸侯”。周天子的朝廷有公、卿、大夫等贵族主持朝政，各个诸侯国的国君也依靠卿、大夫等贵族执掌政务，分工有管军事的司马，管司法的司寇等，但这些贵族各自有封地、采邑，全都世袭职位，号为“世卿世禄”。卿有上、中、下之分，大夫也有上、下之等，一般并没有明确的文、武官职分类。平时在朝处理政务，有些被天子或国君指定为执政，统揽全局；在战争时期一般卿受命为“帅”或“将”（都是指挥的意思）领军出战。据《公羊传》解释，如果领兵的贵族地位高、而且军队规模大，就称之为“帅”；如果领兵贵族地位高而军队规模不大，就称之为“将”。由于上卿经常领兵，因此也尊称为“将军”。临战时，将、帅会分派大夫为“尉”、“御”、“右”等战术指挥职务。

战国时期原来的旧氏族贵族逐渐退出政治舞台，以原来的“士”为主体壮大起来的新贵族全面执掌各国政务。比如秦国实行二十等军功爵位制，建立起新贵族等级制度。这些新贵族并没有世袭地位，他们的贵族地位来源于他们对于国王的效忠与文治武功，他们的封地只是他们俸禄的补充，他们的爵位称号

也与过去的不同。开始的时候他们也和过去的贵族一样，在朝执政，出朝领兵。

随着各国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加强，新贵族向职业官僚转化。同时由于战争日益频繁，作战的规模和地域也不断扩大，作战时间不断延长，作战形式日益复杂，而士兵成分也多样化，需要有专职的军官担任指挥，原来只是临时战地指挥员的“尉”逐渐成为专职的军官。到战国末年，各国都建立职业军官体系：“尉”为武官的统称，指挥一“部”军队的为“部尉”或“校尉”，另外县有“县尉”，郡有“郡尉”，为当地的司令官；以上有“都尉”，可以指挥某一战区或战役方向；朝廷设立“国尉”（或尊称“太尉”），相当于军队的总司令，与丞相平级。秦国后来还设立卫戍京城的“中尉”，警卫宫廷的“卫尉”等专职武官官职。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大战，秦军先是连续攻取赵军两个阵地，杀死赵军四个尉官，以后又攻破赵军西边的营垒，打败赵军两个尉指挥的军队并俘获这两个尉。

虽然职业军官系统已经形成，但当时仍然保留以爵位表示级别的惯例。“将”主要是指战地指挥官，比如秦国名将白起，在公元前294年为左庶长，“将而击韩之新城”。获胜后爵位升至“左更”（第十二级爵位），第二年又为“将”，指挥秦军与韩、魏两国联军在伊阙大战，斩首24万，还俘虏了联军统帅公孙喜，攻取五座城池，于是被任命为“国尉”。下一年爵位升至“大良造”，再次指挥进攻魏国，攻取大小61座城池。以后连年进攻魏、赵、楚国，迫使楚国迁都。秦国将楚国原都城郢改为南郡，封白起为列侯，号“武安君”。长平大战，白起又被秘密任命为“上将军”指挥最后决战。后来白起因与当时的丞相应侯范雎有矛盾，被免去官职与爵位，降为“士伍”（平民），最终被迫自杀。又如赵国名将赵奢因在公元前269年的“阏与之役”中战胜秦军，被封为列侯，号“马服君”；另一个功臣许历为国尉，两人得以与廉颇、蔺相如同位。秦军军官出征时往往是以爵位来表示级别，如公元前260年，“左庶长”王龁进攻韩国上党，第二年秦国又使“五大夫”王陵攻赵国邯郸。

战国末年各国逐渐直接以武官的官职来表示级别，“将军”除了表示是战地指挥官的意思以外，也可以直接来表示级别。职业军官制度已经完全形成。秦国自秦庄襄王即位（公元前249年）后派出作战的指挥官都称将军，不再用爵位表示级别。公元前247年魏国召回避祸侨居赵国的信陵君魏无忌，以“上将军”名义指挥五国联军，大败秦将军蒙骜指挥的秦军。秦王政发动全面征服六国的统一战争时，也不再将有战功的将军封侯或赐予封地。公元前226年秦国打算灭楚国，因以数千人猛追燕太子丹而出名的勇将李信，宣称只要20万人就足以灭楚，秦王很高兴，结果第二年秦军在平舆打了个大败仗，两个堡垒被攻破，七个都尉被杀，秦王只得亲自到老将军王翦隐居的地方去请他出任灭楚统帅。王翦要求配备60万大军，又向秦王请求“美田宅园池”，说：“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只好及時以请园池为子孙产业耳。”到了前线还五次派使者回都向秦王请求肥田美宅，做出一副只知道捞取实惠，没有野心的样子，以安秦王之心。

秦始皇征服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朝代。在秦朝政府机构中，文、武两个职业官僚系统已经完全形成。朝廷武官系统有与丞相、御史大夫并列为“三公”的太尉，有警卫宫廷门户的郎中令，有指挥宫廷卫兵的卫尉，有卫戍京城地区的中尉，有监督武官的护军都尉。有些带“尉”的官职则是文官，比如廷尉掌司法审判，主爵中尉掌爵位封赏。在出征作战时则会任命大将军、上将军、将军、裨将军等表示级别的不同名号的指挥官。地方也采用文武分别的制度，郡尉、县尉分掌地方军队的指挥并负责地方的防卫与治安。在各地交通要道还设置关卡，派出“关都尉”进行守卫警戒。

汉代基本沿袭秦制，仍然以“尉”作为武官统称，而明确文武官员以其每年的俸禄数量来表示级别。太尉（以后改称大司马）作为最高武官，列“三公”，年俸号为“万石”（实际4200斛）。三公以下的“九卿”，年俸号“中二千石”（实际2160斛），武官列为九卿的有光禄勋（郎中令改称）、卫尉。执金吾（中尉改称）虽然不列为九卿，但也是“中二千石”。这些朝廷最高级武官的主要副手称“丞”，一般有二人，级别为“千石”（实际960斛）。此外武帝时又设置城门、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八校尉”，级别略低，号“二千石”（实际1440斛）。地方郡尉级别相比“二千石”的郡守略低，为“比二千石”（实际1200斛）；县尉级别也低于县令（六百石），为“比六百石”（实际600斛）。还有很多“尉”并不是真正的武官，除了从秦朝沿袭来的廷尉、主爵都尉等以外，汉武帝还设置“奉车都尉”掌管皇帝的车，“驸马都尉”掌管皇帝的马，“水衡都尉”掌管皇帝的园林，级别都为“比二千石”。有的从武官变为文官，比如汉武帝设置“司隶校尉”，原来是武官，负责侦缉、镇压京师地区重大政治犯罪，后来被禁止带兵，改为监督京师附近地区的监察官。

西汉时的“将军”称号仍然具有战地或某一方面军司令官的性质，还不算是武官的正式官称，因此级别并不固定。比如与匈奴作战时卫青作为全军统帅，号“大将军”；有的以战略方向为号，比如“贰师（西域有贰师城）将军”、“度辽将军”；有以所指挥部队为号的，比如“材官将军”、“楼船将军”、“骁骑将军”等等。将军作为司令官有组织指挥所的权力，可以自行组织“幕府”（因为设置在军营帐篷中而得名），任命“司马”、“长史”等参谋人员。以后将军长期设置，成为一种正式官职。东汉正式明确“大将军”为朝廷最高级官员，后来一般只用来封赏执掌朝政的外戚（皇后的亲属）。以下有骠骑、车骑、卫将军、伏波、抚军、中军、四征、四镇、龙骧、典军、上军、辅国等等一系列将军称号，如果加上“开府仪同三司”（开府是可以建立正式衙门机构的意思）的名号，也与三公平级。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将军名号最滥的时期。曹魏在大将军下设“中领军将军”来统帅中央军集群，又将护军都尉改为护军将军，来主持武官的选拔委派。以后这两种级别最高的将军也逐渐增设。其他有左、右卫将军，骁骑将军，游击将军等。实行九品官制后，凡大将军或开府将军都列一品，骠骑、车骑、领军、

护军等将军为二品，左、右卫以及前、后、左、右将军为三品，校尉为四品。在将军府担任参谋工作的长史、司马、主簿、参军等武官为五、六品。基本军官则仍然是以“尉”为名，最低的塞尉为九品。到了后来将军越封越多，晋代将军仅名号就有40种，而将军名号与所承担的指挥职务完全无关，甚至习惯上前、后、左、右将军是授予文官的称号，比如东晋时王羲之就是“右军将军”。而南梁的将军名号居然多达240种，在区分品级外又分成44班。北魏有60多号将军，都是用来“褒赏勋庸”，并没有军事指挥职权。

这一时期实际担任战区或方面军指挥职务的官职改称“都督”。起先这是一个全军总指挥职务，如公元216年曹操曾命令夏侯惇以大将军身份“督二十六军”，222年曹真以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以后越设越滥，一个州、一个郡大小的军区也设都督。晋代以“都督诸军”、“都督中外”为全军指挥，“监诸军”为临时指挥，以下战区都督有“使持节”、“持节”、“假节”三个等级，“使持节”有权杀地方长官以下之人，“持节”有权杀无官位人，“假节”只能处死违反军令者。这种制度被以后南北朝各代继承，除了指挥朝廷直属军队的一些将军职称外，只有加了都督衔的将军才是真正的武官。北周又另设“行军总管”作为方面军指挥。

隋唐时期朝廷府兵12个卫各设正三品的大将军，以下各卫设将军，从三品；长史，从六品上；录事参军事，正八品上；以下另有参军、司阶、校尉、旅帅、队正、副队等大小军官。地方各府（隋朝称“骠骑”、“鹰扬”等府，唐朝称折冲府）设折冲都尉，按照军府上、中、下等，由正四品上至正五品下；副手为果毅都尉，从五品下至从六品下；下设别将，正六品下至从七品下；长史，正七品下至从八品下；兵曹参军，从八品下至从九品下。下属有校尉、旅帅、队正等低级军官。这些是平时的武官，战时以亲王担任总指挥的称元帅，在战区内统管文武官员的，称总管。边境军区设置“节度使”，因为“受命之日，赐之旌节（代表皇帝的信物）”，得以有军事指挥的专断权力，下有大使、副使、判官等属官，指挥驻军。节度使原来是由文臣担任的，在唐玄宗统治的后期逐步改为由武将专任。安史之乱后内地也普遍设置节度使，成为一种高级武官的职称，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正式级别。其级别要看节度使所挂的其他官职，比如早期节度使往往挂有尚书衔，那就是级别最高的官员了。后期的节度使有的挂中央军12卫大将军衔，有的挂太尉或“中书门下同平章事”的宰相头衔，级别相当混乱。

出于唐末五代军阀割据、武夫专政的历史教训，宋朝统治者有意实行“以文压武”的政策，总的来说武官的实际级别大大降低。另外又实行“官”、“职”分离的制度，使得武官的级别与所任军职并没有必然联系。最高级别的武官仍然是“太尉”，但只有从二品，而且只是个荣誉称号，无论文武都可以封授。同时保留了前朝的种种将军、校尉名号，但只是作为武官的“赠典”，只有荣誉称号的意义，甚至有的号为“大将”，实际上只是个没有品级的官。武官的级别以“某某使”（北宋后期改为某某大夫）来表示品级，如传统的称

号：节度使（从二品）、承宣使（正四品）、观察使（正五品），以及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等（均从五品），或者是宋代新创的内客省使（正五品）、四方馆使（正六品）等等，低级军官为“某某副使”。到北宋末将高级武官改为带有“武”字系列的“某某大夫”，低级军官改为“某某郎”。但都是虚衔，仅仅表示俸禄数额。真正的最高军职为朝廷“三衙”长官，即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的“都指挥使”，往往只挂有个四、五品的官衔。而且明确文官可以管辖武官，而武官绝不得管辖文官。在品级比自己高的文官面前，武官只好俯首听命。

辽、西夏、金、元几个少数民族皇朝统治时期，一般都在沿用中原皇朝种种武官名号的同时，保持着本部族的特色。比如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沿用了唐宋以来的都点检、都指挥使种种将军名号，明确殿前都点检为正三品，都指挥使为从三品，以下的左、右卫将军等等各有品级。在各要害地设置统管军民的总管，正三品；或设军镇，设节度使，从三品。而部族军队则仍然以猛安、谋克来指挥。元代最高军事统帅机构枢密院大多由武官来担任枢密使、副使，可以称之为最高级别武官，为从一品。指挥朝廷各卫的都指挥使，以及各地的蒙古军“万户”、都指挥使都为正三品，“千户”为正五品，“百户”为正七品，同时也沿袭前代将军、校尉之类的名号，作为武散官给武官加衔。

明朝以武立国，接受宋代教训，没有采用以文抑武的政策，相反大幅度提高武官级别，而且明太祖朱元璋还明确规定文臣不得封公侯，最高只能封伯爵。设置最高军事机构为中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五都督府，每府左、右都督，都是正一品；副手都督同知，从一品，都督佥事，正二品。朝廷各卫的指挥使都是正三品，各省的军事长官都指挥使为正二品，要高于本省的行政长官布政使（从二品）。地方各卫的指挥使也是三品官，千户所的千户为正五品，百户所的百户为正六品，都远高于知县（正七品）。小说《金瓶梅》中恶霸西门庆后来弄到一个“千户”的军衔，县官见了他也要敬礼。这样明代成为历史上武官级别最高的朝代之一。不过和历代一样，这套武官系列到了明中期后就运转不灵了，朝廷陆续在各地设置“总兵”作为某一部队的总指挥，以下也不再按照原来的序列任命军官，而是另行委派参将、游击、守备等中级军官作为基层部队的指挥官。另行委派千总、把总之类名目的军官来组织指挥小部队。而在这些武官之上具有战区指挥权的却往往是朝廷派出的文官担任的“提督”、“总督”、“经略”。

清朝入关后，八旗兵军官序列相当高，各旗都统为从一品，各地驻防八旗的将军也是从一品（原为正一品，乾隆时期改为从一品）。具有指挥某城八旗全权的副都统，为正二品。以下有总管（正三品）、副总管（正五品）、城守尉（正三品）、防守尉（正四品）、参领和协领（从三品）。绿营兵军官序列则沿袭明末惯例，以提督（从一品）为最高级别军官，以下为总兵（正二品）、副将（正三品），以及参将（正三品）、游击（从三品）、都司（正四品）、守备（正五品）等级别军官，基层军官“千总”（从六品）、“把总”（正七品），级

别也很高。总的来说武官的级别与明代相当，但是比较注意协调与文官序列的地方行政官员的级别关系，一般尽量做到平级。也和明代一样，清朝统治者一般尽量避免委派武官为一个大的战区的指挥官，而是习惯于从朝廷派出文官来指挥战区或军区。清初已形成惯例，几个省组成的大军区由挂朝廷右都御史衔的总督（从一品）来指挥，省军区则由挂朝廷兵部右侍郎衔的巡抚（正二品）来指挥。理论上而言，总督与提督平级，巡抚与总兵平级，但实际上这些武官见了总督、巡抚都要下跪行参见礼。即使在地方也是如此，把总见平级的知县，也不可平礼。

【军官制度】

军队需要有能力的军官来担任指挥。在职业军官系统形成之初，有很多人是在学习了“兵法”，掌握有军事指挥专门技能后被国王聘用的。比如春秋末年时，齐国人孙武研究战略战术，著书13篇（即流传至今的《孙子兵法》），广为流传。吴王阖闾读到后，赞叹不已，公元前512年将孙武请到吴国来，拜为将军，统率吴军与强大的楚国作战，连战连捷。

大约就在同一时期，齐国受到晋国和燕国的进攻，打了大败仗，齐国执政大夫晏婴向齐景公推荐了以研究军事出名的穰苴。齐景公亲自召见穰苴，听他谈论军事，大为折服，立刻聘用穰苴为将军，领军反击晋、燕联军。穰苴说自己出身卑贱，一下子担任将军（相当于上卿），位居大夫之上，人微言轻，“士卒未附，百姓不信”，请求齐景公派一个得到宠幸、有声望的大夫为监军。齐景公就派了自己宠幸的大臣庄贾为监军。穰苴先到军营门口，立起测量日影的“表”，摆好计时的滴漏，等待庄贾。不料庄贾自认为监军就是统帅，不慌不忙地接受亲友的送别，到了约定的正午时分仍然没有赶到军营。穰苴就撤去了表、放掉了滴漏的水，自己进入军营，接管指挥权，发布命令。傍晚时庄贾才赶到，穰苴说：“作为将领接受命令之日就要忘了家庭，在军队接受军纪约束就应忘记双亲，听到战鼓隆隆就应该忘记自己。现在敌军入侵，国内骚动，百姓之命都悬于君，怎么还要在乎送别！”于是按照军法将庄贾斩首示众。全军将士都为之震惊。齐景公派遣使者拿了代表国君的“节”来赦免庄贾，使者马车一直奔驰进入军营。穰苴说：“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又按照“军营中不可驾车奔驰，违者斩”的军法条例准备斩使者，只是国君使者不可杀，就杀了马车夫和两匹马来示众。第二天出发，穰苴与士兵吃同样的伙食，问寒问暖，士兵都争着参战。晋燕军队听说了不敢与齐军会战，主动撤退。齐军收复失地，胜利凯旋。齐景公拜穰苴为大司马。以后战国时齐威王将齐国历代司马的事迹编写成书，穰苴的事迹也附在其中，书名就称之为《司马穰苴兵法》。

战国时期这种情况更为普遍，与当时说客以口舌取官乃至任为丞相的情况相同，很多游士靠谈论兵法而出任将军统帅。最著名的莫过于孙膑、庞涓的故事。两人同学兵法，后来庞涓得以成为魏国将领，因妒忌孙膑才能，设计陷害，“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使孙膑无法出头露面。后来孙膑逃亡到齐国，齐国

大将田忌很器重孙膑，但孙膑作为刑徒已无法率军，于是坐在密闭的车辆里为田忌当军师，指导齐军接连打败庞涓指挥的魏军，最终在公元前340年，在马陵道设伏，全歼魏军，庞涓兵败自杀。另一位名将吴起也是游学出身，在鲁国求学，为能够在鲁国与齐国的战争中充当将军，不惜杀死自己妻子（齐国人）来取得信任。后来又到魏国，被任命为将军，打败秦国军队。为魏国效劳后，这位名将又被楚国聘请，为楚国主持改革。秦国的几位名将如白起、尉缭、王翦等也都是以“好兵”而得为将军。

秦末混战时期，这一风气犹存。比如陈胜、吴广起义后，有个叫周文的“自言习兵”，曾是楚国春申君的门客，陈胜就任命他为将军，率领大军进攻咸阳。后来周文军被秦将章邯打败，周文被杀。楚怀王因为宋义谈论兵事，料事如神，就拜宋义为上将军，位置高于项羽，率军北上。结果项羽发动兵变，杀了宋义，自立为“假上将”（代理上将军），篡夺指挥权，楚怀王只好承认既成事实。韩信自学兵法，先是投奔项羽，不料项羽只是让他当个卫士，他大失所望，又去投靠刘邦。刘邦也不重视他，韩信又打算离开，只是因为萧何在和他的交谈后很欣赏他的才能，在他开小差后，赶紧追赶，在历史上留下“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样的佳话。萧何追回韩信后，又以自己的脑袋担保韩信，才使得刘邦回心转意，拜韩信为大将，把主力军队交给他指挥。

后世的帝王对于这样招聘“自由职业者”来担当军国重任实在是不放心，以后各个朝代就再没有将游士立即拜为大将的事例。历代军官的主要来源有这样几个方面：从士兵中提拔的“行伍出身”，由军官子弟世袭的“世职出身”，以及在隋唐以后出现的和文官相仿的“科举出身”，另外也有不少武官是由文官或幕僚转任的。

行伍出身

战国末期的思想家韩非在他的名作《五蠹》一文中已经明确指出“猛将必发于卒伍”，可见早在战国时代，已经习惯于从士兵中提拔军官，行伍出身已经被各国军队广泛认可。替汉朝打天下的很多开国功臣比如周勃、灌婴、樊哙之类，都是行伍出身。西汉初期号为“飞将军”的名将李广，就是从一名弓箭手逐步升为将军的。他的堂兄弟李蔡和他一起入伍，一起升为将军，最后还从武官转为文官，位至丞相。

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的连年混战中成名的一些名将，大多是行伍出身。比如也号为“飞将”的名将吕布，以“骁武”投军，以后以“便弓马，膂力过人”著称，最后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曹操手下著名的勇将典韦，投军之初，是张邈手下的旗手。当时军队的战旗号“牙门旗”，一般要几个人才能掌握挥动，而典韦用一只手就能举起，由此出名。投入曹军后，先是以作战中多能斩敌首级，计功升为“司马”（小军官）。公元194年曹操与吕布在濮阳激战，典韦自愿率领敢死队冒死突击，为曹操军队打开撤退的通道。因为这项战功，典韦被任命为都尉，指挥曹操的卫队，后来在张绣兵变中战死。曹操手下大将张辽，也是行伍出身，因“武力过人”应募当兵，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先后四易其主，吕布被杀后转入曹操帐下，被曹操重用。在207年出征乌桓的战役

中，他主动请战，曹操把自己的指挥旗给他，他率军奋勇冲锋，一举战胜。209年，曹操军队刚遭受赤壁战役的沉重打击，孙权亲自率军进攻合肥，张辽以寡敌众，在逍遥津战役中带了800名敢死队突击孙权中军阵地，迫使孙权放弃进占合肥的战略意图。曹操另一个大将乐进，“容貌短小”，原来只是曹操军营中的小卒，因为招募军队有功才升为“假司马”，后来每次攻城作战，乐进都有“先登”战功。在关键性的官渡之战中，乐进杀死袁绍的大将淳于琼，升为大将。一起升大将的于禁，原来是黄巾军士兵，几经辗转，投到曹操帐下，从司马、校尉、都尉，靠战功逐步升迁。蜀汉阵营的名将赵云，原来只是个骑兵，投到刘备手下时，开始只是刘备随从骑兵的队长，当阳战役中刘备军队全线崩溃，赵云胸怀刘阿斗，保护刘备的甘夫人，安全突围，才得到“牙门将军”的称号。刘备入蜀，赵云留在荆州军，后来才随诸葛亮增援入蜀，以战功升为大将。蜀汉的另一名将魏延，也是行伍出身，“以部曲随先主入蜀”，靠战功一直升为大将军。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名将也有不少是行伍出身。如东晋名将刘牢之，以“骁猛”应募，为小军官，作战率所部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在决定南北对峙局面的淝水大战中战功卓著，成为大将。北朝以部族军队为主，大多数将领是从部族头领转化而来，但也有一些是从士兵升迁而成的。比如北魏名将杨大眼，原来是个流浪儿，北魏孝文帝部署南征，要招募一批士兵，杨大眼前去应征，官员起先看不中，杨大眼就当场表演他的绝技：将一根三丈长的绳子绑在自己发髻上，撒开腿飞奔，那根绳子居然飞荡在后面成一直线，骑马的人也追不上他。由此立即被收录为“军主”，成为一名小军官。以后屡立战功，“勇冠六军”。但有一次因为友军阵地崩溃，导致全军败退，被撤职，“徙营州为兵”。后来再次起用，长期镇守与南朝相对峙的边界，威镇江淮，以至于民间以“杨大眼来了”吓唬啼哭不止的小孩。当时人都认为可比关羽、张飞。

隋唐之际乱世英雄起四方，而唐皇朝的一些开国功臣仍然是行伍出身的职业军官，比如最著名的勇将尉迟敬德和秦琼，都是从士兵升为大将的。尉迟敬德在隋朝末年从军，在隋朝官军镇压各地暴动民众的战争中积累战功，“以武勇称”。隋朝垮台后投入唐朝阵营，以战功成为开国大将。秦琼也是在隋朝末年从军，开始只是隋朝将领来护兒的一个亲兵，以后跟随隋朝名将张须陀镇压卢明月起义军，他和另一个勇士罗士信火烧敌军营地，接应大军，使隋军一举大胜。不过他在隋军最高也只得了个尉官。后来投入李密起义军，成为重要将领。转到唐皇朝阵营后，又为唐朝立下汗马功劳，先后作战两百多次，自称受伤流血好几斛，最终才得以成为大将。

两宋时期朝廷推行崇文抑武的既定国策，而号为名将的大多是行伍出身。北宋中期最著名的将领狄青，就是行伍出身的大将。年轻时以“善骑射”应募当兵，因为脸上有青色的被刺的军号，以后被称为“狄青”。他在北宋与西夏的战争中以战功崭露头角，四年作战大小25仗，每次作战奋勇向前，八次负伤，升为指挥，因为得到主持西北战区的文官上司韩琦、范仲淹的赏识，才得

以升迁为朝廷重臣。宋仁宗曾建议他将脸上当兵时的刺青除去，狄青回答说："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第，臣所以有今日。因此臣愿留这块刺青，以劝军中。"南宋初期"三大将"：韩世忠、岳飞、张俊都是行伍出身。韩世忠，"早年鸷勇绝人"，能够驯服烈马，但"嗜酒尚气，不可绳检"。18岁应募投军，以能够"挽强驰射"而出名。在与西夏的战争中屡有战功，但只升到"勇副尉"。北宋末年，随军转战南北，靠战功升为将领。南宋初期镇守长江下游地区，成为大将。岳飞，"少负气节"，"家贫力学"，少年时就能拉300斤弓、8石弩，而且能左右射。1122年应募投军，以战功升为小军官。南宋建立后，他上书请求立即开始北伐，以"越职"而被罢官。这也就埋下了日后不得信任的伏笔。在以后平定江淮地区的战争中再立战功，得以成为方面军大将，长期镇守长江中游地区。张俊，少年时"好骑射，负才气"，在乡间为盗，16岁时投军为弓箭手。在北宋末年与西夏的战争中以战功升为将领。因为劝赵构自立为皇帝（即南宋高宗）而得到信任，南宋朝廷初建，张俊就被任命为御营前军统制，地位在武将中为第一。后来极力支持秦桧与金朝议和，设计收其他两大将的兵权，并参与陷害反对议和的岳飞，不料自己的兵权也被撤消，被迫退休。

明清时期行伍出身的军官仍然占了绝大多数。明初的开国功臣常遇春，少年时就混在一伙强盗里，后来转投朱元璋部下当兵。在朱元璋渡江攻取集庆（今南京）为根据地的战役中，他带头冲锋陷阵，立下大功，由此得到朱元璋赏识，不久就被任命为"统军大元帅"。在建立明朝统治的混战中战功卓著，成为全军副统帅，地位仅次于朱元璋的老战友徐达，封为开平王。他的小舅子蓝玉，也从士兵升到大将。明成祖朱棣时期的一些名将也大多行伍出身。比如号为功臣第一的邱福就是行伍出身，以资格升到千户后，即跟随朱棣起兵，在"靖难之役"中立下战功，被任命为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封淇国公，但是后来在出征本雅失里时，在胪朐河战役中兵败被杀。另一个功臣薛禄，朱棣起兵时他还只是士兵，连名字也没有，因排行第六，被军中呼为"薛六"，后来因战功升为大将，才以音定名。他在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号为宿将，粗通文墨而已。为满清入关当先锋的一些明朝叛将孔有德、耿仲明等，原来都是行伍出身的低级军官，因为明辽东主将毛文龙被冤杀，发动兵变，被明官军攻击后归降满清，反倒成了满清的开国功臣，后来得以封王。清朝平定三藩时绿营兵已起到主要作用，而绿营的一些名将也是行伍出身的。比如赵良栋，是在清兵入关后的第二年才应募当兵的，到三藩之乱时已升为总兵。他以自己训练的5000精兵平定了宁夏的叛军，又从四川转战到云南，首先攻入昆明城，被提升为云贵总督、挂兵部尚书衔，这已是武官的最高台阶了。但后来因与其他将领争功，被迫退休。据张仲礼《中国绅士》一书的统计，直到18世纪末，清朝军队中仍有76%的军官是行伍出身。

世职出身

俗称"将门虎子"，这在中国古代倒也确实曾经成为一项制度，很多朝代都是明确规定军官子孙可以世袭军职。即使没有明文规定，武将的子弟往往也

总是被朝廷任命为武将。

先秦时贵族爵位世袭，内文外武，世卿世禄。虽然秦汉时代已建立起职业官僚制度，但是爵位制度也同时存在，继承爵位者往往也就会被皇帝委派一定的官职。尤其是有爵位的武将，其子孙袭爵后往往就会获得武官的职位。比如西汉周勃封为绛侯，他的儿子周亚夫在袭爵后先是被任命为河内郡太守，但当匈奴入侵后，立即就拜为将军，在细柳驻军布防。他得到文帝的欣赏，在匈奴退去后，被任命为中尉，警戒长安地区。文帝死前告诫太子，说："如果发生危急情况，周亚夫是真可以带兵的将军。"太子即位后（汉景帝）立即任命周亚夫为车骑将军。三年后发生诸侯吴王、楚王叛乱，周亚夫被提拔为太尉，全面指挥平叛，以守待攻，只用了三个月就平定了叛乱。

历史上一些名将之子习惯上也总是被任命为军官。如西汉飞将军李广有两个儿子早死，第三个儿子李敢被任命为校尉，跟随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击匈奴左贤王，在战斗中夺得左贤王旗鼓，又斩首多，赐爵关内侯。被任命为郎中令后，因为怨恨大将军卫青害死自己的父亲，有一次打伤了卫青，卫青没有立即报复，而卫青的外甥霍去病在一次宫廷围猎时，射冷箭杀死李敢。汉武帝包庇霍去病，宣布李敢是"鹿触杀之"。李广的长子长孙就是李陵，也因"善骑射"，被汉武帝认为大有李广遗风，特命他带800名骑兵深入大漠侦察地形，胜利归来后被任命为骑都尉，指挥5000勇士，在酒泉、张掖一带布防。以后李陵就以这5000步兵转战大漠，被匈奴大军围歼。唐朝开国功臣程知节的三个儿子有两个都被授予军职，他的小儿子程处弼任左金吾大将军，程处弼的儿子程伯献，后来也官至右金吾大将军。另一位开国功臣段志玄，唐太宗在他临死前表示要授他儿子五品官，而段志玄请求给他弟弟段志感授官，唐太宗于是授段志感左卫郎将。他的儿子段瓒，袭爵褒国公，官至左屯卫大将军。唐玄宗时的名将高仙芝，是高丽人，他父亲高舍鸡从军后，屡建战功，曾任四镇十将、诸卫将军。高仙芝"美姿容，善骑射，勇决骁果"，少年时随父亲至安西，以父亲的功劳起家就是游击将军，到20岁拜将军，和他父亲同班秩。

少数民族皇朝统治时期，部族军队的军官都是世袭的，而且一般都带有较多的贵族政治色彩，有爵位者就有职权，继承爵位往往也就继承了官职。比如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将原来女真族游猎作战的猛安、谋克固定为军职，有战功者往往也授世袭猛安、谋克。金世宗统治时期，朝廷已相当汉化，有部门提出各地猛安、谋克依仗世袭身份，常常侵扰平民，建议改为和一般文武官员性质相同的"流官"，每30个月转官。朝廷讨论时，宗宪（宗翰，即兀术之弟）认为："昔太祖皇帝抚定天下，誓封功臣世袭猛安、谋克，现在若改为迁调，就违背太祖的誓约。不如对猛安、谋克进行考核，有不称职的，选择其弟侄中贤者代之。"被金世宗接受。这项制度一直维持到金朝灭亡，蒙古族建立的元朝也将百户、千户、万户之类的军职作为世袭职位。

在汉族皇朝中，明确规定军职世袭的只有明朝。朱元璋或许是为了与世兵制配套，规定军官都授予世职，军官死

亡或年满60岁，由嫡长子承袭职位，如果自己没有儿子的，允许兄弟继承。在承袭职位前要经过骑射测试，第一次没有及格的，只能算是代理职务，领取一半的俸禄。第二年再试，仍然没有及格的，就要充军。但是后来制度废弛，有一战事就有大批冒功被授予军职，而世袭者中冒名顶替的也不计其数，导致军官数量猛增。到明朝建国后100年左右的时候，军职增长了四倍，再到50年后的嘉靖年间，又增长好几倍。当时有个叫霍韬的官员建议，严格实施制度，即使有战功的也要区分大小，"或许世袭，或许终身，或许继，或不许继，各具册籍，昭示明白，以为激劝"。当时一次性的大检查，淘汰了几千名军官，但是不久就恢复了老样子。不过明代确实也有不少名将是世职出身的，比如以抗倭出名的名将戚继光就是世职出身，他家世职为登州卫指挥佥事，父亲死后，他承袭职位，因为才能卓著，又被提拔为代理都指挥佥事，主持山东防备倭寇的防务。后来改派挂浙江都指挥司官衔，而实际职务为参将，几经反复，主持台州、金华、严州防务。他在实战中痛感原来的卫所军队已失去战斗力，因此重新招募4000士兵，在义乌组编新军，严格训练，屡战屡胜，号为"戚家军"。

清朝入关后，吸取明朝教训，严格控制世袭军职，即使是八旗军职也只有在临阵战死的情况下才可以由其子孙承袭，如果子孙尚未成年，可以先发放一半的俸禄。而绿营兵军官战死，子孙仅得"难荫"（有一子可入国子监为监生）而已。1784年乾隆皇帝发布诏书称："旗员及绿营人员，效命疆场，同一抒忠死事，何忍稍存歧视。"规定以后绿营军官战死的，也一律授予子孙世职。和明朝不一样的是，清朝世职是一个做官的出身，承袭世职只是挂一个官衔，实职仍然要从基层小军官做起。

科举出身

隋朝开始"开科取士"，但只是选拔文官的途径之一。唐朝科举制度开始时"六科"也都是以文取士。到了武则天当政，在长安二年（702年），首次举行"武举"考试，考试内容为射箭技巧，以及马术、负重等等。以后武举考试兴废不常，很少有军官是以此出身的。在新、旧《唐书》的列传中，提到武举出身的只有一个人，而这个人正是唐朝中兴名将郭子仪。郭子仪出身寒素之家，年轻时"以武举异等"得以起家为军官，先是补左卫长史，后来逐步升迁为边防军将领。安史之乱爆发后，率军平叛，成为当时唐皇朝最得力的大将。

宋朝建立后，进一步规范了武科举的制度，考试内容除了武艺和体力外，还要考"策"（就时政提出建议）或考察对兵法书籍的熟悉程度。王安石变法时，正式在朝廷设置"武学"，每三年举行一次全国性的考试，录取名额以百人为限。各地最高级官员可保送一名免试入学，其余的都必须参加考试：骑、射外考兵法和对策。按照考试成绩，优等的直接送枢密院试用为低级武官；其余的按成绩进入武学上舍或外舍学习。武学讲授"诸家兵法"以及"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学制三年。毕业考试及格后授予初级武官官职。以后还曾在各州设置武学。

武科举考试以后单独进行，1078年《大小使臣试弓马艺业出官法》规定：第一等，步射1石弓，10发3中；马上

能射7斗弓，并掌握5种马上格斗武艺；《孙吴兵法》10道题答出7道的，“时务边防策”5题“文理优长”，法律题10道答出7道，就可以出任低级武官。第二等步射8斗弓，10发2中，马上能射6斗弓，有3项马上武艺，答出一半兵法题目和法律题目，可以见习低级武官。第三等，步射6斗弓，10发1中，只有两项马上武艺，兵法、法律只能答3题的，记录在案。每三年考试1次，任命武官不过30人，后来逐步增额，以至于3人取1，每次都有百人入流，比文科举得官还容易。1110年规定限额，每次考试只能取10人，其余的人武学。南宋进一步改革，1135年开始由皇帝亲自“廷试”，合格的都赐予武进士，授予武官衔“保义郎”、“承节郎”等名目。但实授的职务往往并非军官。1166年武举进士也比照文科，有第一、二、三名的排名。以后又规定参加廷试的都必须由各地方长官先行选拔，作为“武举人”保送朝廷。这样一来，武科举体系与文科举体系基本相同。1177年明确武科状元之称，状元愿意从军，授予正将之职，第二、三名副将，第四、五名准备将。

两宋正式建立武科举系列，但是在当时重文抑武的风气下，很多人只是为谋一当官出身而已，考取后并不愿从军，因此两宋时期由武科举出身的名将极少。较为著名一点的有北宋末年的何灌，他在武选登第后即为军官，在与辽朝边境地区任巡检，以善射闻名，号为“何巡检神箭”，后来在“靖康之变”时受命防守汴京，战死疆场。另一个是同时期的徐徽言，在1108年应“求材武士”诏，“武举绝伦及第”。以后即担任武职，长期在河西地区为军官。1127年金朝攻破开封，而徐徽言率领本部军队坚守晋宁近两年，最后这座孤城被攻破时，徐徽言将防御器械全部烧毁，力战被俘，宁死不屈，被杀害。两宋时即使是武状元，也并不一定担任军职，比如1235年武状元朱熠，起家是“阁门舍人，差知沅州”，担任了地方行政官，后来以担任监察御史敢于弹劾权臣而闻名。1260年升为“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算是主管军事的副宰相级别，但仍然不算武官，不久也遭御史弹劾而罢官。

武科举制度后来也被金朝继承。主要考试内容为骑射，要求挽一石力弓，射150步至210步远的靶，并且要求策马飞驰，在150步内接连用枪刺落四块靶子。此外也有书面考试，考兵法书。武举入仕，都授予巡尉之类的军职。到金朝末年，世袭军官大多腐朽不堪一战时，武科举出身的军官在军队中曾起过很大作用。比如金末将领古里甲石伦，武举登第后以勇武异常，提升很快，并建议组编“义军”，“三十人为一谋克，五谋克为一千户，四千户为一万户，四万户为一副统，两副统为一都统，外设一总领提控”，以抵御蒙古军队。他长期在西北地区主持防务，最后兵败自杀。另一个金末武举出身的将领纥石烈鹤寿，原来是世袭猛安，但却只是一名亲兵，中武举后才得以担任军官。当南宋与蒙古约定夹击金朝时，他负责防守金朝南部边境，在与南宋军队的战斗中多次获胜，最后战死。

元朝科举制度兴废不常，也没有武科举制度。明朝建立后，设置武学、武科举，在京师以及卫所设置武学，训导军官子弟。凡10岁以上可承袭军职的子弟应入学学习，教材为《武经七书》。

地方青年可以通过考试获得武学学生资格，号为武生，与文科举生员（俗称秀才）相同。武科举制度与文科举相仿，武生通过乡试（省级考试）的武举人，可以到京师参加会试。会试内容曾规定，“先策略，后弓马”，策不中就不可试弓马。但以后改为三场考试，第一场试“马上箭”，射35步远的靶子；第二场试“步下箭”，80步的靶子；第三场才是笔试。每三年会试，录取进士定额为100人。

由于明朝武科举制度比较长久，武科举出身的军官相当多，比如明中期抗倭名将之一的俞大猷，就是武科举出身。他“少好读书”，学《易》又学剑。考中秀才后因家境穷困，在父亲死后，承袭了父亲“百户”世职。不过他并不甘心，1535年考中武进士，被授予“千户”军职，守御金门。他上书对海防提出建议，却被上级训斥：“小校安得上书?”被责打一顿后罢官。1542年蒙古俺答人侵山西，诏天下举武勇士。俞大猷向巡按御史自荐，得以上京，被送到宣大总督翟鹏处，他和翟鹏论兵，翟鹏几次被他说得下不了台，于是说：“我不应当把你看作武夫。”可是仍然没有用他。好在兵部尚书毛伯温欣赏他，在他回到家乡后任命他为汀漳守备，这位命运多蹇的武进士才真正成为一名带兵军官。以后他长期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靠战功由都指挥佥事、参将，逐步升迁为备倭都指挥、总兵官。但仍然多次被降级、查办，甚至被判死刑、戴罪军前效力以赎死罪。与之齐名的另一名抗倭名将刘显，原来是私塾教师，后来冒籍四川，得为武生。从军以军功升为军官，调到东南沿海抗倭，为参将，也屡立战功。

明朝武科起先没有殿试，因此没有武状元之称。比如嘉靖年间有个名叫尹凤的，武科举乡试、会试都是第一名，但不称状元。他本身世袭府军后卫指挥同知，考中武举第一后，提升为署都指挥佥事，派到福建参加防倭作战，以功升到福建参将。明末崇祯帝锐意求治，想要提拔武科，正好1631年武会试因为考官不公，引起武举人聚众闹事，崇祯帝派人复查，发现武举中能够挥舞百斤大刀的只有两个人，而其中居然有一个人没能中进士。崇祯帝下令将考官全都抓起来治罪，将有关的兵部22名官员贬官，另外派人重新主持考试，录取100名，仿照文科举形式，也分为三甲。崇祯帝亲自调阅前30名考卷，钦定一甲三名，头甲头名为状元。这位明朝第一个状元名叫来聘，正是能够挥舞百斤大刀的武举之一。他当即被授予副总兵之职。这个武状元果然也能够为皇帝尽忠，三年后就在攻打孔有德叛军盘踞的登州时，身先士卒，战死在城头。当然绝不是所有的武科举出身的军官都会这样对大明朝忠心耿耿的，明末引满清入关的吴三桂，也是一个武举出身的军官。

清朝入关当年就举行武科举考试，用以笼络汉族好勇斗狠之徒，以后一直与文科举考试同期，每三年举行。凡通过基层考试即获得武生资格（俗称武秀才），可以参加武乡试，另外绿营兵丁也可以报名参加乡试。通过乡试的武举人，以及绿营的千总、把总，通晓文义的可以直接参加会试。满族因有世职，开始时不得参加武科举考试，雍正年间开始允许满族人参加，以后时停时行，没有定制。会试及格后进入无淘汰的殿

试，排出三甲名次，一甲三人，和文科举一样有状元、榜眼、探花之名。武乡、会试都分内、外三场。首场马射（35步远靶子，10发3中），二场步射（80步靶子，10发2中）、技勇（拉硬弓、舞大刀、掇重石），三场是内场，考策、论（首题用《论语》、《孟子》，次题用《孙子》、《吴子》、《司马法》）。清初明确，一甲进士授副将、参将、游击、都司，二、三甲进士授守备、署守备。以后武状元授一等侍卫，榜眼、探花授二等侍卫，二、三甲进士授三等及蓝翎侍卫，获得这些官衔后，再到兵部选实职官。

清朝每次乡试录取武举人名额，全国总计将近1000名，武会试名额300～100人不等，因此通过这一途径成为军官的人不少。据张仲礼《中国绅士》一书的统计，18世纪末清朝军队中有将近13%的军官是武科举出身。如鸦片战争中著名的“定海三总兵”之中，葛云飞是1823年的武进士，王锡朋是武举人出身。

和文状元很少成为宰相或著名权臣的情况相仿，武状元成为全军统帅或一代名将的情况也很少见。清代武状元中经历比较具有戏剧性的是马全。他是山西阳曲人，原来的名字是马璟，乾隆十七年（1752年）考中一甲三名武进士（探花），以二等侍卫出为福建抚标右营游击。可这位武探花当官不久就因为和同僚争吵而被夺职，他就改名马全，寄籍在北京的大兴县。1760年再次参加武会试，居然又一次名列前茅。乾隆皇帝亲自主持殿试，见了马全很眼熟，说：“你不就是马璟吗?”马全赶紧叩头请罪，想不到乾隆皇帝爱才，居然钦点马全为武状元，授头等侍卫。两年后乾隆皇帝下江南，命令他代理江西南昌镇总兵，负责护驾警卫。马全这次尽心尽力，很讨乾隆皇帝喜欢，南巡结束就提升他为江苏苏松镇总兵，以后提升为江南提督，成为绿营最高级军官。1773年，乾隆皇帝发动征讨金川战役，又想起马全，特意将他调来为领队大臣，不料在木果木大营遭到夜袭时，马全殿后掩护，于夜战中战死。乾隆皇帝知道后很是惋惜，说：“提督马全乃国家出力有用之人，今力战死事，实堪轸惜!”

【庙算】

战争的最高指挥权毫无疑义一直是属于国王的。传说中国第一位世袭国王——开创夏朝的启，在刚当上国王后，就发兵征讨表示不服的有扈氏部落，在一个叫甘的地方举行会战时，启发布“甘誓”，宣称自己是代表上天实行讨伐。从此以后，历代国王、皇帝都沿袭夏启的口吻，把自己宣布为是惟一的手握战争权力的上天代表。

大约从商朝开始，战争的策划都习惯在国王祭祀祖先的祖庙大殿中进行，称之为“庙算”。《孙子兵法》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而况于无算乎!”也就是说在进行战争前先要在祖庙进行战争的推演，推演的结果是获胜的，实际获胜的可能性大，相反推演结果是失败的，实际获胜的可能性就小。庙算当然应该是国王主持的，但国王一个人是无法推演战争过程的，所以总得找些人来帮忙。这种参与战争策划和指挥的大臣，在春秋时是各国执


出土的战国“杜虎符”

政的卿大夫，到战国时就逐渐是一些受到国王信任的职业官僚，包括了最高文官的相国和统称为“尉”的武官。

庙算后征发、组编、调动军队的权力也是属于国王的。大约从春秋末期开始，就出现了国王发兵专用的“虎符”。这是一种铸成卧虎形状青铜器具，可以分为左、右两片，左面的一片在任命军队指挥官时当场拆开交付执掌，右面一片保存在国王的宫中。当要发兵时，国王就派出使者执虎符的右片到军营传达命令，指挥官必须严格核对虎符确实为原件无误，然后执行调动出征的命令。这种虎符有的流传至今，比如秦国的“新郪虎符”，上面的铭文是：“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郪。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可见调动50人以上的军事命令都必须由国王发布。除了虎符外，还有代表皇帝的“节”（8尺长的竹竿，竿头装饰有牦牛尾巴）、由皇帝发布的书面军事征调命令“檄”（刻在1尺2寸长的木简上，紧急情况下插上羽毛，号“羽檄”）等调兵方式。

历史上有很多关于调兵虎符的传奇故事，最著名的就是战国时“窃符救赵”的故事：长平大战后，秦军连续三年进攻赵国，并威胁各国不得援救赵国，魏国国王已派出晋鄙率领的10万援军，受到秦国威胁后赶紧命令晋鄙停驻观望。魏国公子、信陵君魏无忌的姐姐嫁给了赵国公子——平原君赵胜，为此屡次建议魏王出兵援救，魏王都不同意。公元前257年魏无忌通过魏王的宠姬从魏王寝宫偷得虎符，带了勇士朱亥等一批门客，到魏军军营，杀死怀疑他使命的晋鄙，夺过指挥权，迅速进军，在邯郸城下大败秦军。另一个历史上有名的故事是西汉初年吕太后去世后，她的弟侄掌握政权，太尉周勃、丞相陈平准备发动政变消灭吕氏，可即使是最高武官周勃没有虎符也没有办法进入北军营垒、指挥调动北军，后来为皇帝保管符节的纪通投靠周勃，周勃才得以代表皇帝的“节”为掩护，假称有皇帝命令进入北军营垒，夺取北军的指挥权。

这个办法一直沿用到后代。唐朝为了避祖先李虎之名，将虎符改为“鱼符”，改为以左半片留在朝廷，右半片交各地府兵指挥官执掌，而且由于朝廷机构的扩大，根据不同情况，左片有的是三片，有的是五片。不过到了749年府兵制已瓦解，明确规定停止使用鱼符征调府兵。宋代只有在宋仁宗时曾一度规定使用“银牌”（上下两片，有密押图案）调兵。按照正常制度主要依靠书面命令，并且配合使用虎豹形铜符、鱼形木契作为调兵信物。《武经总要》明确规定发兵之类的机密事情必须有书面文件，在未核对文件和铜符、木契就发兵的，都要处死。在著名的南宋高宗以12道“金牌”强迫命令岳飞回师的故事，实际上“金牌”本身并不是调兵信物，只是要求日行500里传递中文件的标志。少数民族皇朝如辽朝沿用鱼符制度，金朝则有鹿符（中央调兵令牌）、虎符（地方军区调兵令牌）。元朝虽然有铜虎符，号为“虎头牌”，但主要已

成为军官的地位的象征，并非令牌。明清军事调动主要依靠书面文件，以印信文件为主，虽然有“信牌”，但只是传递公文、表示官方身份的标志，并不是调兵令牌。

春秋时期，国君一般都亲自率军出征作战，有不少国君负伤、阵亡或被俘的记载。比如据《左传》记载的就有公元前766年秦襄公在进攻犬戎之战中阵亡，公元前707年东周与郑国繻葛之战中，周桓王中箭负伤，公元前660年卫懿公在与狄军作战中被杀，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中晋惠公因战车陷入泥潭被俘，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以后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国君亲自出战的情况到了战国时期就很少见，一般都是委派将军到前线指挥，并授予将军实现庙算所决定的战略目标的全部临战指挥权，仅在和、战等重大问题上才需要向国君请示。据《六韬》一书的说法，当时任命将军的仪式非常隆重，君王要在太庙亲自向将军授予代表国王权威的斧钺，并要说将军持斧钺自天到地都可制裁之类的套语，而将军要向君王表示“军不可从中御”。战争结束后，将军率军回朝，交出指挥权。《孙子兵法》将此归结为：“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孙膑兵法》更是将军队“不胜”的五个原因之首列为国王“御将”。

将军拥有指挥全权的情况在秦汉时期还有遗风，最著名的例子是汉文帝“细柳劳军”的故事：公元前158年匈奴入侵，汉军集结应战。周亚夫率军屯兵细柳，汉文帝前往慰问，不料军营的门都尉不开营门，说：“将军有命令：军营中只服从将军命令，不接天子诏令。”汉文帝只得派使者手持代表皇帝的“节”进军营找周亚夫，周亚夫传令打开营门，自己身披盔甲、手持兵器迎候，只向汉文帝行军礼，并要求车驾不得在军营中急驶。汉文帝非但没有因此怪罪周亚夫，还称赞周亚夫是“真将军”，其他四座任由车驾长驱直入的军营只是儿戏。不过从当时随行的大臣都大惊失色的情况来看，“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已经不再是被普遍接受的观点。

随着后世太多的将军发动军事政变篡夺政权的状况出现，制度上不再允许“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相反强调的是在出兵后，皇帝仍然要通过种种办法加以“遥制”，战略的指挥权和战场指挥权都力图要保留在皇帝手里。朝堂不仅要庙算，还需要进一步遥控指挥。朝廷里开始出现皇帝周围的一些亲信组成的实施这种遥控指挥的小班子。西汉末期是以大将军府来实施指挥的，到东汉时期是以皇帝周围原来的秘书班子“尚书台”来实施，凡是受到皇帝信任的大臣就挂上“录尚书事”的头衔，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变化，尚书台扩大为尚书省，尚书省下的兵部正式掌握承受皇帝命令、发布调兵指令、武官任免、军队编制等权力，而与尚书省并列的武官机构12卫大将军府，则有组织训练、出任战地指挥等权力。不过因为尚书省是处在宰相领导之下，如果兵部权力过大也就是加强了宰相的权力，所以唐末五代时期又出现了枢密院机构，由皇帝的亲信组成——开始时是由皇帝所亲信的太监组成，以后才改为文官担任——专门处理军国重事，

帮助皇帝实施军事指挥，成为军事统御机构。枢密院的长官为枢密使，副手为枢密副使。

北宋正式建立与行政机构平级的军事统御机构——枢密院，与管理行政的中书省对等号为“二府”。枢密院长官开始称枢密使、枢密副使，与宰相并称“宰执”，以后为了防止权臣，改由其他官员来负责枢密院事务，号为“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枢密院的职责是辅佐皇帝实现对军事指挥的控制，制定战略方针，调度军队，选任指挥官，向前线指挥官发布实施战役的指令。尚书省的兵部仍然保存，但只负责执掌武官的人事、军队编制等具体事务，没有调兵、指挥权力。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一般都是由文臣来担任，间或有武官担任的情况发生，但不是经常性的。比如狄青出任枢密使，遭到文臣的一致反对，即使是同情他的文官也建议朝廷为了狄青能够“全节”还是撤了他为好，最后以狄青罢官了结。武官的最高机构“三衙”（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仅负责军队日常训练，以及京师地区的日常警卫。

宋朝这套制度防止了权臣专政和军阀擅权，保证了皇帝独揽军事大权，但是却大大降低了军事机器运转效率。尤其是当时受人力、马力接力传递文件的通讯条件的限制，指挥命令只能以日行400～500里的速度从朝廷传递到前线，一个来回就要十天半月，根本就无法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做出反应，而宋代的皇帝们却都热衷于从皇宫深处“遥制”远方军队。宋太宗以后不少皇帝都喜欢在军队出征前给将帅授“锦囊妙计”，强调作战方略，特别是喜欢制作“阵图”，要将帅们按图部署军队投入战斗。如宋太宗发给前线将帅的阵图号为“御制平戎万全阵图”，宋朝廷内府还藏有不少类似的阵图。以后的宋真宗、神宗等都是喜欢临战发图进行指挥的皇帝。在作战过程中皇帝也力图控制战场指挥，完全无视通信条件的限制，经常滥发“金字牌”的“御前急件”。比如据史料记载，南宋初年军情紧急，仅1134～1135年的五个月内，朝廷就发出“金字牌”文件1023封，平均每天6封半。当时战场分布在四川到山东的广大地区，文件来回一次要四十多天。真不知当时的前线将领见到这些过时指令作何感想。

少数民族皇朝统治时期也基本沿用宋朝的这套朝廷军事统御体制。辽、西夏、金、元也都建立枢密院，帮助皇帝进行军事指挥，但和宋朝不一样的是，这几个少数民族皇朝常常在大战区设置“行枢密院”作为中央派出机构进行指挥。朝廷对于战区指挥官一般都授予指挥全权，并不进行经常性干预。另外，这几个朝代的枢密使几乎是没有汉族官员来担任的。

明朝建立之初基本沿袭宋元制度，朝廷号称三大府：管行政的中书省，管军事的大都督府，管监察的御史台。1380年废除中书省，朝廷六部直属皇帝；大都督府一拆为五，改为五军都督府；御史台改为都察院。开始时军事统御体系回到唐朝体制：兵部掌调兵权、武官人事等；五军都督府管日常编制与训练，前、后、左、右、中都督府各领若干个地方都指挥使司的事务，分别与兵部平移公文。但是这种体制大大加强了皇帝的日常工作量：六个部、五个府

都直接向皇帝汇报，听取指示，更不要说朝廷还有大量的机构都要皇帝下指示。因此明成祖起就找一些文臣，给他们加上某某殿阁大学士头衔，以便于他们出入宫廷，在皇宫内替皇帝阅读文件，草拟“圣旨”。这些人因在宫殿“大内”办公，因此称之为“内阁学士”。以后内阁学士往往又兼任某部尚书，组成的工作班子就简称内阁。大学士、尤其是资格最老的大学士号为“首辅”，逐渐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凡军国大事内阁都要替皇帝处理，军事决策、调兵权力实际上也由内阁掌控，在草拟指令后经皇帝批准下达兵部。从大学士名称来看自然应该是由文官担任的职务，明朝从没有一个武官入阁。和宋朝一样，文官实际上往往不懂军事，对于遥远的作战地区情况也很少有切身的体会，所以为皇帝草拟的一般总是被皇帝批准的军事指令大多是外行意见。

清朝入关以前以及入关后初期，最高决策机构是王大臣议政会议，由满族八旗旗主聚会讨论决定重大军政措施。内阁虽然保留，但只能就一般的行政问题草拟指令。以后君主集权进一步加强，王大臣会议逐渐不再是决策机构。康熙皇帝在 1677 年设置南书房，由翰林院中得到皇帝信任的一些翰林组成，帮助起草军政指令。雍正皇帝又在 1730 年设置军机房，指定一些受到信任的大臣到房，为他起草对当时正在进行中的西北方面战事下达的指令。以后常设，名称也改为办理军机处。这个军机处从此成为清朝的军事决策机构。进入军机处的大臣是受皇帝信任的一些部门的长官，号为军机大臣，并没有正式的品级规定，也没有人数限制，多的时候有七八名，少的时候只有三四名。他们的助手号为军机章京，同样也由各部中级官员兼任，人数也不固定。军机处办事突出机密性，军机大臣必须亲自阅读起草、抄写文件，不准找秘书誊抄。甚至有明确规定为军机处扫地端水的侍从都不许识字，年满 18 岁就不得在军机处服务。军机处下达的军事指令称为“廷寄”，直接交由驿站以规定的速度（日行 300 里到加急的日行 600 里）传递。兵部仍然保留，但只负责绿营兵军官的选拔、委任，以及绿营兵的装备、编制等日常事务。八旗兵事务由各旗直接向皇帝汇报，领受指令。

和宋、明等朝代发生的情况相仿，清中叶确立起来的这套军事统御体系的效率也是极其低下的。全国军队都要等待朝廷命令才可以调动，指挥官也要等待朝廷命令才可以动身，将领的战场指挥权也受到朝廷的掣肘，作战计划、作战经过都必须随时报告。往往前线已经打了败仗而作战计划却刚刚被皇帝批准。这种情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因为清朝所面对的军事敌手相对弱小、军事威胁相对统治中心距离较远，并没有对其军事作战能力发生致命的损害，但当利用海洋迅速调动兵力的英国侵略者打上门来时，这套体制就完全不能应付，而到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更是难以再维持下去。

【以文驭武】

自从春秋时期开始任命将军领兵出战，对于担任将军的战地指挥官的种种监督、防范制度也就开始形成。上文提到的春秋时期齐国穰苴要求齐景公派

"监军"，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战国时期对于战地指挥官的监督制度具体情况不清楚，现有史料中也没有明确的朝廷派出"监军"之类的监察官到战区执行监察的记载。秦国在各郡都派出"监御史"，御史是皇帝周围的文官侍从，是受到皇帝信任的人，由朝廷派到各郡进行监视，这或许就是从监察战区指挥官的职务发展过来的。

西汉武帝开始委派"监军御史"到各战区监察指挥官，但并没有授予御史太大的职权。比如汉武帝时有个叫胡建的，在北军中担任"军正丞"（负责军法的军官），他家境贫困，没有车马，经常和士兵一起步行，和士兵关系很好。北军有个监军御史，是个贪官，将北军的军营营墙开了门洞作市场，从军营外运了百货进来高价卖给士兵。胡建并没有权力去审判监军御史，他就和亲近的士兵约好，在某天校阅军队时，他召集这些士兵登上指挥台，将监军御史当场抓起来砍头。北军的各位尉官都不知所措，胡建却不慌不忙取出早准备好的给皇帝的上书，其中说："臣闻军法：立武以威众，诛恶以禁邪。而监御史公然打破军营做买卖，败坏军营勇猛气氛，尤其失理不公。如果按照普通法律来审判，御史是没有死罪；但是按照军法：'壁垒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谓奸人，奸人者杀。'因此我自己做主，将御史处斩，冒死报告。"汉武帝反而觉得胡建敢做敢为，下命令说胡建按军法从事做得对。

东汉时期由朝廷派出监军已是制度，并且提高了监军的职权，一般由朝廷大臣担任"监军使者"。这些使者保留本身的官职级别，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代理总指挥，从而开创了后世文臣领军、以文驭武的先例。公元48年，湖南一带的少数民族起兵反抗汉朝统治，汉将刘尚兵败战死，当时伏波将军马援已经62岁了，仍然向东汉光武帝请战，说自己还能披甲上马。光武帝亲自看他上马后，才同意他带4万多援军出征，并委派已在前线的使者、朝廷大臣宋均为监军。第二年这支大军到达前线，在初战获胜后就陷入游击战的泥潭，不断遭遇袭击，但却找不到敌军主力。暑热季节来临后，传染病在军营中爆发，马援自己也病死在军营中。光武帝很着急，又派了虎贲中郎将梁松赶到前线接管指挥权。梁松和马援关系一直不好，到了前线就诬告马援，光武帝一怒之下，剥夺马援的"新息侯"爵位。而梁松自己也没有打赢这一仗的能力，士兵已病死了一多半。宋均见可能要全军覆没，就和诸将商议是不是和对方停战和谈，将军们都不敢发表意见。宋均说："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国家，专之可也。"于是毅然伪造诏书，派人去和对方谈判，代表皇帝保证不再追究造反罪责。当地少数民族除去了几个好战分子后，纷纷解甲归田。宋均率领军队回朝，还没进洛阳就先自劾"矫制"罪。光武帝却下令嘉奖，派人迎接，赐给金帛，要他先回家探亲。以后视宋均为心腹之臣，有疑难问题经常请宋均出主意。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监军使者往往受其指使，陷害正直的将领。162年"武陵夷"起兵反抗汉朝，打到江陵一带，东汉地方长官纷纷逃跑。东汉桓帝拜"少学《春秋》、《司马兵法》"的冯绲为车骑将军，领兵10万进行讨伐，并授予冯绲全权："进赴之宜，权时之策，

将军一之，出郊之事，不复内御。”可是冯绲知道自己和太监关系不好，惟恐被太监陷害，就请求桓帝派中常侍（太监头目）为监军。当时还没有太监监军的先例，因此有大臣为此弹劾冯绲“失大臣之节”。桓帝也没有同意冯绲的请求。后来冯绲平定荆州回师后，监军使者张敞按照宦官布置，弹劾冯绲带了两个穿军装的丫鬟出征，还在江陵为自己“刻石纪功”。文官们则为冯绲辩护，认为这两件事“罪无正法”，不应追究。正好长沙又发生少数民族起义，于是桓帝以“盗贼复发”为理由，罢了冯绲的官。

黄巾大起义爆发后，各地战事频发，太常卿刘焉建议将各州刺史职权提升为掌一地军政全权的“州牧”（原来刺史只是监察官，没有行政权力），得到汉灵帝批准。刘焉领益州牧，并且被任命监军使者，以此掌握军事指挥权。这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成为惯例，刺史不是兼任都督，就是兼任监军，具有军事指挥权。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惯例是：如果朝廷官员是以“持节”或“假节”为监军的，就是战区的最高统帅，具有实际指挥权；如果仅仅是监军头衔，则只有监督权和指挥否决权，在未接到明确指令前不得接管指挥权；而监军御史只有报告权，没有干预指挥权力。如255年魏国大臣文钦、毋丘俭起兵讨伐司马师，司马师以王基为“行监军，假节，统许昌军”，实际就是统帅。又如263年曹魏分两路进攻蜀汉，而以卫瓘为监军。钟会一路由汉中进攻剑阁，邓艾一路经阴平小路奇袭成都平原，监军卫瓘并没有协调指挥权。以后邓艾奇袭成功，蜀汉朝廷投降，而钟会诬告邓艾要谋反，执掌曹魏政权的司马昭即命令卫瓘逮捕邓艾。卫瓘到达军营出示司马昭的亲笔命令，邓艾的部下都放下武器，邓艾被关入囚车。以后钟会自己和姜维连手打算起兵，被乱兵杀死。邓艾的部下又追上囚车，迎接邓艾回成都。监军卫瓘怕再起兵变，接管指挥权，派遣将军田续等在路上截击，将邓艾杀死。即使没有这样的特别变故，监军对于军事指挥仍具有否决权。如582年隋文帝派出大军进攻南陈，以长孙览为东南道行军元帅，统八个总管出寿阳，水陆俱进，一直打到长江边上，南陈惊恐万分。正好这时陈宣帝死了，长孙览打算乘机过江灭陈，但监军高颖以“礼不伐丧”为理由加以阻止，仍然维持原来只示威、不作战的战略计划，退兵而还。

唐朝初年仍然派遣文臣监军，但唐玄宗是依靠宦官帮助发动政变才得以为皇帝，上台后便提高宦官地位，开始任命宦官为将军，派遣宦官领兵出征。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对于军事将领和文臣都不相信，派遣宦官边令诚为监军，监督封常清、高仙芝率领的平叛军队。当这支军队打了败仗后，边令诚报告说两个将军无故弃守，唐玄宗立即派人将他们处死。尽管宦官监军一开始就暴露出如此严重的弊病，但从此监军却大多改由宦官担任。宦官既无军事常识，又因为身处深宫，对于社会缺乏正常的判断能力，只会给皇帝打小报告，更有很多宦官腐败弄权，搅乱军政。刚开始宦官监军时，高适就上书说：在哥舒翰军队为监军的太监李大宜，“与将士约为香火，使倡妇弹箜篌琵琶以相娱乐，樗蒱（xūpǔ 赌博）饮酒，不恤军务”；而

南阳军队有三个持节都督，好几个监军“更相用事”，这样下去，“战而能必胜哉?”不过对于唐朝皇帝来说，却只有宦官才值得信任。758 年由九个节度使率领的唐朝官军集结于邺城，围攻安庆绪叛军，唐肃宗居然不任命总指挥，却只派了亲信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作为总监军。结果 60 万大军各自为战，居然被 6 万多叛军击溃，使得叛军再次气焰高涨。

委派宦官监军以后成为唐皇朝的既定国策，每一支军队都有朝廷派来的宦官监军。这种监察根本没能防止唐末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甚至有的监军是导致军阀叛乱的起因。比如同华节度使周智光，本人是靠宦官鱼朝恩提拔的，766 年陕州节度使的监军张志斌经过他的驻地回长安，认为周智光招待不周，就责骂周智光。周智光大怒，说：“天下的将军哪个想造反，都是因为你们这批鼠辈作福作威。我本来不造反，今天就因为你才造反!”把张志斌处斩后，分割其肉强迫随行的小太监吃下去。773 年晋州人郇谟冒死上书，只有 30 个字，其中主要是“监”字，请求罢诸道监军使。唐代宗虽然接受上书，但一项都不改。

795 年，河东节度使李自良病死，按照当时惯例节度使不是长子继承，就是军中推举，朝廷只能追认。监军王定远和太原府尹李说定计，秘不发丧，先将士兵拥戴的将领打发去休假，然后迅速请求朝廷任命李说为代理节度使，并且立即给军官们加官晋级，得以顺利实现交接。可是以后王定远认为李说是自己立的，任意干涉，军政皆自专决，并请求皇帝给他“赐印”（从此成为惯例，监军都有印，得以干涉军政事务）。王定远有了官印，开始自说自话的委任军官，李说大为不满。王定远委派了虞侯田宏为列将，取代彭令茵，彭令茵不服，说：“田宏没有功劳，怎敢取代我!”王定远居然把彭令茵找来斩首，还把他的尸体埋在马粪里。军士为此闹事，李说向唐德宗报告，而唐德宗因为王定远过去有“扈从之功”，也不治罪。王定远知道李说弹劾他，到了李说府上举刀就刺，李说赶紧逃走。王定远召集将吏，拿出箱子里的 20 多卷“官告”（委任状），自称有皇帝圣旨撤李说的职，其他将领都加官。诸将正要谢恩下跪，大将马良辅出来揭穿，说那都是旧官告，不是皇帝圣旨。王定远只好自己逃走。这样作恶的监军，唐德宗也只不过下诏“长流崖州”。

通过总结唐末的历史教训，后梁恢复以朝臣为监军的传统，但是朱温习惯以自己身边的“近臣”来任每一支军队的监军，“进止可否，悉取监军处分”，监军具有指挥权。而后唐改过来再以宦官为监军，“皆恃恩暴横，节将不能制”。

注意到唐以来的教训，后周和后来的北宋，包括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皇朝，都采用了以监军和领兵将领共同负责的“双首长”制。无论兵员多少，只要是一支独立作战部队，往往都会同时任命指挥官和监军，文武官员都可以任监军。因此监军逐渐成为军官的一种称号，失去了原来的监察意义。

在历经唐末以来的军阀混战后，北宋皇朝的第一要务是防止军阀割据，因此把军权集中到中央，尽量避免某一方面的大兵团有长期的统帅，而采用临时

委派朝臣号为“率（帅）臣”来统领。这种率臣的名目有“都监”、“监押”、“安抚使”、“经略使”、“都部署”、“总管”、“都钤辖”等等，统军的多少、时间的长短、本身的品级等全无定制。如北宋初年名将曹彬，在后周世宗时以贵戚身份为“河中都监”，当时才20多岁，以后逐步升迁成为名将。宋初是文武兼用，越到后来越是倾向于“以文驭武”，用文臣来担任率臣。文臣一般是以安抚经略使、都部署名义指挥某一战略方向的军队，并且兼任战区所在州的行政长官，掌军政全权。比如西夏起兵反对宋皇朝，宋朝廷先后在陕西设立四路安抚使：韩琦“管勾秦凤路部署事”兼知秦州，范仲淹“管勾环庆路部署事”兼知庆州，王沿“管勾泾原路部署事”兼知渭州，庞籍“管勾鄜延路部署事”兼知延州。四人互不统辖，又都是文人带兵，造成与西夏的战事打成绵延几十年的持久战、消耗战。奇怪的是，后来统一陕西作战指挥的却是宦官童贯。他因为和宋徽宗是老相识，徽宗登基后，居然任命他为陕西五路军马的都监，以后又任命为五路的经略安抚制置使。以后童贯回朝，兼任了陕西、河东、河北宣抚使，领枢密院事，执掌全国兵权。

南宋起初战事频繁，朝廷完全倚仗几个方面的大将，给他们挂上“都统制”的称号，有相当的自主权。但在南宋统治稳定、尤其是和金朝议和后，再一次收去武将兵权。先是在几个大战区设置文官“总领”，以控制军队的经费来源，以后又正式明确文官安抚使为“路”的军政长官，号为“帅”，在一个路内的战区及军队，都由安抚使指挥。在包括几个路的大战区则设置“制置使”，都统制受其指挥，同时又滥授都统制，从原先的10个扩充到几十个，分散兵权。军队统辖关系极其复杂，各路不同，各自为战，在蒙古军南下时，几乎没有统一的抗敌战略，甚至在一个战区内也是各打各的仗，导致兵败灭亡。



杯酒释兵权

元朝以蒙古人任将领，虽然也沿用宋朝制置使、总领等官职，但都是武将出任，没有进一步的监视措施。

明朝建立后提高了武将级别，同时也恢复文臣监军的传统。每支军队调动出战，都由朝廷都察院之类的监察机构来派出监军。视军队规模，有的是以监察御史监军，也有的是以按察使（省级监察长官）、副使、佥事官职出任监军。这种监军只有监察权，可以随时向朝廷报告军情，也可以弹劾将领，但不得直接干涉作战指挥。一般也不会像前朝那样转化为武官，只有在明末有几个事例。比如1635年，农民起义军进入河南，河南驻军将领畏缩不敢出击，监军御史张任学激励将领出战，并上疏弹劾诸将，请求皇帝批准自己担任武官官职，“亲执干戈，为国平贼”。崇祯帝很高兴，

要吏部会同兵部及都察院讨论。这些机构汇报说此事无先例，拟仍以监军御史兼总兵事。崇祯帝不同意，直接任命署都督佥事，为河南总兵官。后来张任学在作战中战死。

随着皇朝专制集权的加强，明中期后逐渐恢复过去宋朝“以文驭武”的政策，不再任命武将为跨省的军区、战区的总指挥，代之以朝廷临时委派的文臣，以“总督”、“总理”、“总制”某地军务的名义担任总指挥；而各省的军务也不再由都指挥使来管，另设“巡抚”某省兼“提督”某地军务名义的朝官来指挥省以下的军事活动。明中期以后陆续设了15个总督和总理，29个巡抚，辖区遍及全国。这些朝臣大多是挂都察院都御史、佥都御史的官衔，仍然保留监察官的身份。

文臣监军、朝臣领兵仍然不足以使皇帝放心，因此明永乐朝以后，又重新开始委派太监监军。太监监军和文臣监军并列，可以直接向皇帝打小报告。文臣监军不能监察自己的朝臣上级，而太监监军正可以监视这些朝臣。当时大臣上谏指责说：“今九边镇守、监枪诸内臣，恃势专恣，侵克百端。有警则拥精卒自卫，克敌则纵部下攘功。”直到末代崇祯皇帝，仍然重用太监，各支军队都派太监监军，在边镇的称为“监视”。1635年因朝臣的激烈反对，说这批监军“多侵克军资，临敌辄拥精兵先遁”，撤回全部监军，只留下崇祯帝最相信的太监、号为“知兵”的高起潜监辽东各军。但第二年就全部恢复太监监军，还特命高起潜为“总监”。

清朝入关，吸取明朝教训，不再有太监监军，也不再有文臣监军。在大规模战争停止后，不再由亲王、贵族出京领兵，也逐渐停止委任汉族武将为某一战区的统帅，而全面采用明中后期文臣为战区、军区总指挥的制度。明确总督为跨两三省的大军区总指挥，指挥区内的绿营兵，但仍然挂都察院右都御史（从一品）的官衔；巡抚为各省的绿营兵总指挥，挂兵部右侍郎（正二品）的官衔。总督和巡抚各自都有直接指挥的绿营兵部队（督标与抚标），和绿营兵的武将提督、总兵、副将所属的各镇、各协绿营兵部队互为牵制。另外各要害省又有驻防的八旗军队，不受总督、巡抚节制。这种盘根错节的军事体制，比之前代更有效地防止了武将割据局面。而且总督、巡抚理论上也是临时职务，虽然总督、巡抚辖区内的军政事务都要受其节制，但开始时并没有正式的衙门，也没有设置衙门的预算。其属下配备的从属官员只有副官性质的文、武巡捕，没有其他正式职官编制。总督、巡抚要自行组织起军事指挥部性质的“幕府”，聘请编外人员帮助处理军政事务。这也具有防止总督、巡抚专权的意义。

晚清出现的另一种“文人带兵”的情况，就是曾国藩创立的湘军体制，即直接以文人为带兵军官。根据罗尔纲《湘军兵志》一书的统计，见于史籍的湘军各级将领182人中，文人出身的居然有104人，达到58%。尤其是统领以上的高级将领，大多数是文人书生，武官出身的只是在基层营官一级占有多数。这实在可以说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说明当时清朝的统治确实是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而曾国藩又成功地将清朝的统治危机演绎为中国传统名教的危机，从而得以顺利动员如此之多的文

人书生投身过去无论如何不愿涉足的军旅。后来李鸿章仿照湘军体制组建淮军就没有如此突出的文人带兵现象，王尔敏《淮军志》统计432名淮军将领中只有5%是文人出身，淮军幕府则大多由文人组成，依然是传统的“以文驭武”的体制。这些幕府人员后来官至总督、巡抚的有10人，而武将中只有4人达到这个地位。

五、兵礼军法

【交战规则】

公元前638年，宋国纠集了卫国、许国、滕国一起进攻郑国。宋国是商朝灭亡后的商族人国家，西周之初受到周族诸侯国家的严密监视。春秋时期宋国开始摆脱被周族诸侯国家监视的状况，而宋国的国君宋襄公更进一步，想步第一个称霸诸侯的齐国国君齐桓公的后尘，来当中原诸侯各国的霸主。当时郑国已沦为楚国的附庸国，因此宋襄公打算通过这次征讨来树立他在各诸侯国的称霸地位。宋国的司马子鱼劝说他："上天在很久以前就抛弃了我们商族，您想要振兴宋国，恐怕是违背天意的。"宋襄公不听。楚国为解救郑国，直接出兵进攻宋国。宋襄公亲自率领宋军在泓水（今河南柘城西北）迎击楚军。宋军先排列好了阵势，而楚军还在渡河，司马子鱼建议乘着敌军在渡河的机会发起冲锋，宋襄公不同意。楚军上了岸，正在排列阵势的时候，司马子鱼又建议赶紧冲锋，宋襄公又断然拒绝。等到楚军排好阵势后，宋襄公才下令冲锋，可是由于宋军实力弱于楚军，结果打了个大败仗，宋襄公自己大腿受了伤，卫队也全部被消灭。

宋襄公带着残兵败将回到国内，宋国人都一致谴责他。宋襄公为自己辩护说："君子打仗时对于已经负伤的对手就不再伤害，不捉已经有白发的俘虏。古代军队作战时从不乘人之危发起进攻。我们商族是亡国的后代，不能向尚未排列阵形的敌人发起冲锋。"司马子鱼说："您不懂打仗。敌人比我们强大，队形混乱不成阵势，这是上天给我们的好机会，乘机冲锋，有什么不可以的？即使是这样还难说一定获胜。而且对方都是我们的死敌，就是老头，抓到就是俘虏，哪里还要管他有没有白头发？我们训练军队就是为了杀敌，为什么不可以多次杀伤敌人？如果不想重复伤害，那就不如别去伤害；要爱护敌人的老年人，还不如索性就不打仗。"宋襄公由于泓水战役中的负伤，在第二年死去。

宋襄公因为这次战役的指挥而遭到后世的一致嘲笑，记载这个故事的《左传》一书显然就是站在他的对立面——司马子鱼的立场上的，而后来毛泽东在他的军事名著《论持久战》中更是将宋襄公的举动称之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从历史的角度看，宋襄公很可能是在遵循西周时期诸侯贵族之间的交战规则，只不过到了春秋时期这种规则已经过时，不再被人们遵守，而宋襄公企图以严格遵守交战规则来表示自己是"周礼"的真正捍卫者，进而为自己中原称霸找到理由，结果却落得个受人耻笑的

下场。

从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记述以及议论中，可以发现在西周以及春秋早期，确实存在一些基本的交战规则。比如儒家的《礼记·月令》一书认为在春天不可发动战争，只有到了立秋这一天，国王带大臣到西郊“迎秋”后，才可以开始发动战争。《春秋公羊传》称西周的“兵礼”是“不斩祀，不杀厉，不获二毛”，不破坏别国的祭祀设施，不俘虏有白发的人；“不加丧、不因凶”，对于正在为国君服丧，以及有灾荒的国家不得发动战争。宋襄公所说的双方应都排列阵势后再进行交锋，不要对伤员再加伤害，这也应该是西周“兵礼”的内容。兵家著作《司马法》也说西周作战要“成列而鼓”，“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战场追击不要超过100步，战役追击不要超过三天的行军）。

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这些交战规则已被抛弃，人们已经认为“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孙子兵法》“兵不厌诈”、“勿击堂堂之阵”、“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等的理论已被人们普遍接受。在后世流传下来的交战规则中主要只有“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和修筑纪念武功的“京观”。

春秋时期诸侯派出的外交使节是不可侵犯的。公元前596年楚国派出申屈出使齐国，楚庄王特意嘱咐不要从宋国经过。宋国执政华元听说了，觉得这是对宋国的莫大侮辱，就设伏击杀死楚国使者。楚庄王为此“投袂而起”，出动大军包围宋国国都整整九个月。宋国派出使者到晋国告急，晋国上一年刚被楚军打败，不敢冒与楚国全面冲突的危险，只是派解扬为使者劝宋国坚守，不要投降。解扬经过郑国，被郑国抓起来交给楚国。楚庄王亲自接见解扬，企图买通他，要他向宋军喊话，说晋军不再提供救援，断绝宋军的希望，解扬不同意。经楚庄王几次威逼利诱，解扬才答应下来。可是当解扬来到瞭望城中的楼车上，就大声疾呼，说晋国援军不日就到，请宋国无论如何要坚持下去。楚庄王大怒，解扬说：“我答应你的条件只是为了实现使命，现在使命实现了，请立刻处死我。”楚庄王无话可说，反而释放他回晋国。长期围困而无战果，楚庄王打算退兵，可申屈的父亲拦在车前，说：“我儿子不惜生命以完成国王的使命，难道国王要食言了吗？”楚庄王无言以对。申屈父亲建议在宋国建造住房，耕种土地，表示要长期占领宋国，宋国就会表示屈服。宋国见楚军不肯撤退，就派华元为使者来谈判。华元半夜里潜入楚军大营，劫持了楚军统帅子反，说：“我的国君要我为使者来谈判，现在城内确实已是‘易子而食，析骸以爨’，但是如果订立城下之盟则情愿举国牺牲。贵军退到三十里外，我国惟命是听。”子反就在睡床上说保证做到。第二天报告了楚庄王，楚军真的退到30里外，并和宋国停战，双方保证不再互相欺瞒，华元作为这项和约的人质到楚国居住。

后世将这一交战规则称之为“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历史上最著名的战时两国使节以礼相见的故事是“彭城相会”。450年南朝刘宋与北魏发生战争，刘宋发起北伐，先胜后败，战略据点彭城被包围。江夏王刘义恭率领军队死守彭城（今徐州），北魏太武帝想一举打过长江，派出李孝伯为使节进彭城劝降。刘义恭派了张畅为代表与李孝伯谈判。

两人都是当时的“名士”，互相代表各自的君主赠送礼品，尽管处在极其残酷的战争环境，但他们在谈判中却仍然是文质彬彬、礼貌周全。这次谈判本身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可双方的礼节及言辞，一直被后世誉为战场佳话。

另一项不那么文明的交战惯例是，战胜的一方将战败一方阵亡者的尸体堆积在大路两侧，覆土夯实，形成一个个大金字塔形的土堆，号为“京观”或“武军”，用以夸耀武功。这也是很早以前就形成的惯例。公元前597年楚军在邲（今河南武陟东南）战胜晋军，这是一个空前的大胜仗，大臣潘党建议将晋军阵亡者的尸体堆筑为“京观”，说：“我听说打败敌军后，要留下纪念物给子孙，使他们不忘武功。”而楚庄王却说：“武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要‘止戈’，力求不再使用兵器。国家用武是为了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做到了这七件才可以使子孙不要忘记武功。现在我使两国子弟暴尸野外，是残暴；出动军队威吓诸侯，未能戢兵；暴而不戢，也不能保大；晋国仍然存在，也不算有功；这场战争违背民众意愿，不能说安民；自己无德还和诸侯征战，何以和众；让别国混乱以为自己的荣耀，也不丰财。七项武德我一项都没有，怎么能够让子孙纪念？而且古代圣王是讨伐不敬者，将罪大恶极者筑为京观，是用这种最重的惩罚来警告坏蛋。这场战役中的阵亡者都是为了自己的国君尽忠，怎么能够将他们筑为京观?”下令将晋军阵亡者妥善埋葬。

从以上这段《左传》的记载来看，当时习惯都将战败一方阵亡者筑为京观，而楚庄王另行解释了筑京观的意义，《左传》的作者显然是赞同楚庄王的说法，因此有意略去所有的有关京观的记载，并以楚庄王的这段话来批判将普通阵亡者尸体修筑京观的行为。司马迁写《史记》也继承这一传统，认为战争中的阵亡者都是各为其主，并没有罪过，不应该被修筑为京观。秦军在长平大战中战胜赵军，秦军统帅白起无法处理多达数十万的战俘，索性将战俘全部屠杀，并将赵军士兵尸体堆积为京观。司马迁特意用“阬”来表示这件事，“阬”字的原意是高大的门楼，而“观”与“阙”相通，也有门楼的意思。而“阬”与“坑”又可借用，也往往写作“坑”。在《史记》中这样的记载很多，比如秦始皇在秦军攻下他少年时曾居住过的邯郸后，就下令将曾经欺侮过他的人全部“坑杀”，又“坑”460多个对他有怨言的儒生。而项羽也曾“坑杀”襄城守军，“坑杀”新安的20多万秦军战俘。

后世的史籍一直都保留这个传统，比如《汉书》记载王莽篡汉时将反对他的刘信、翟义、赵明、霍鸿等人及其亲属全部“坑杀”，但该书所载的王莽关于诛杀这些人的诏书中，明明白白地写着是要将这些人的尸体堆土，筑为“方六丈，高六尺”的京观，上面再树六尺高的旗杆，写上“反虏逆贼鲸鲵”。可见“坑”或京观、武军实际是一回事，都是指将尸体堆积封土，只是史学家认为是合乎楚庄王所言的惩治罪大恶极者标准的，或者至少是将阵亡的敌军尸体堆积封土的就称为“京观”；而认为根本是滥杀无辜，或者是屠杀战俘后将尸体堆积封土的就称之为“坑”。

见于史籍的这种“京观”记载很多。比如418年夏国进攻关中地区，将

东晋军队阵亡士兵的首级堆积为京观，号“骷髅台”。隋炀帝征高丽失败，高丽国将隋军阵亡者尸体筑为京观，631年唐太宗派遣使者与高丽交涉，拆毁京观，收拾隋军骸骨，祭而葬之。784年军阀李希烈叛军进攻蕲春，被李皋打败，“斩首万级，封尸为京观”。936年辽国帮助军阀石敬塘消灭后晋政权，将后晋皇室成员以及晋军将士尸体都埋在汾河岸边，“以为京观”。986年辽军在莫州打败宋军，将宋军尸体筑京观。1410年明朝大将张辅进攻安南，击败安南军队，杀死两千多名战俘“筑京观”。

有关“坑”的记载就更是史不绝书，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比如《后汉书·袁绍传》记载200年曹操与袁绍军在官渡决战，曹操险胜，将一支被迫投降的袁军部队“尽坑之”。而《三国志·魏本纪》就不提这事。258年司马昭攻破诸葛诞盘踞的寿春城，俘获东吴援军，有人建议说这批吴军士兵不会真心归降，应“坑”之。司马昭没有同意，只是将这批俘虏迁离边境地区。可见当时仍然习惯对于用不着的俘虏都“坑”杀。《晋书·载记》所记载的十六国大乱时期，有关“坑”的记载不胜枚举，如310年石勒攻晋冠军将军梁巨于武德，“坑降卒万余”。317年前赵刘聪镇压平阳贵族，“坑士众万五千余人，平阳街巷为之空”。320年石虎击败前赵刘曜，“坑士卒一万六千”。321年石勒“坑”晋军曹嶷部的降卒3万人。349年石虎死后，几个儿子争夺帝位，小儿子石冲战败，“坑其士卒三万余人”。还有大量将战败方战俘“尽坑之”的记载。这些“坑”并非活埋，该书记载401年后秦等长期围攻后凉吕隆占据的姑臧城（今甘肃武威），城内缺粮，但吕隆不准百姓出城，将企图逃出城的百姓“尽坑之，于是积尸盈于衢路”。可见该书的“坑”记载实际就是将受害者尸体堆积封土的“京观”。唐太宗征高丽时，“收靺鞨三千三百，尽坑之”。北宋田况镇压保州反叛士兵，先是招降，然后“坑其构逆者四百二十九人”，得到朝廷赞赏。但是《宋史·田况传》的评论认为，田况就是因为坑杀降卒，导致“无后”。《明史》记载明初功臣常遇春坑杀敌军俘虏，徐达阻止不及，朱元璋知道后，认为常遇春杀心过重，任命徐达为全军统帅。

【军营礼仪】

西周时期的“军礼”包括交战的规则，也包括军营礼仪。这些礼仪在当时也是维持军事纪律、保证军事行动效率的重要制度。

祭祀礼

祭祀神灵、祈求神灵保佑战斗胜利，是古代军队最重要的礼仪，统治者总是企图通过这种庄重的礼仪来坚定将士的必胜信念。

儒家经典称西周时凡出动军队都要举行大规模的祭祀仪式，屠宰牛羊献祭祖先、社稷（土地与谷物神）。全体出征将士列队，屠宰后的牛羊还要载车在队列左右转一圈，号为“殉阵”，并宣布“不用命者斩之”。统帅亲手在作战使用的旗号、战鼓、金铎、兵器等淋上一点牲血，号为“衅”，表示祭祀神灵。旗号、战鼓等都要带上战场，奇怪的是淋过牲血的战车却要放回库中保存。祭祀结束后，将屠宰的牛羊煮熟了，即

"胙肉"，分给将士们享用。

从《左传》的记载来看，春秋时期仍然保留这样的传统，而且往往是将敌军的俘虏当场杀了作为祭祀品，并将其鲜血淋在战鼓上，号为"衅鼓"。比如公元前627年崤山战役中秦军全军覆没，孟明视等三个将军被俘，后来晋国因国君夫人的请求释放了这三个将军，但又反悔，派兵追击未及。孟明视在船上高喊："承蒙晋君恩惠，不以我们衅鼓，让我们回国接受本国死刑。如果万一不死的话，三年后再来拜访。"公元前537年，吴国与楚国发生战争，吴王派了自己的弟弟蹶由去犒军，半路上被楚军俘虏，楚王要将蹶由"衅鼓"，还调侃地派人问他："你来的时候是不是卜到了个吉卦?"蹶由回答说："我是得了吉卦。我国国君得知大王可能要攻打我国，问卦说：'要派人去犒军，并侦查情况，可以早做准备。'结果得了吉兆。现在大王要拿我衅鼓，我国就知道要提防了，这不是大吉吗?"楚王听了不是滋味，就没有杀蹶由。

汉代每年立秋在祭祀上天的仪式"郊礼"结束后，皇帝坐红鬃白马拉的车，在东门外的大路上亲自射杀一只麋鹿，谒者用车将麋鹿送到太庙祭祀。皇帝以束帛赐武官，武官主持大规模会操，练习"孙吴兵法六十四阵"，皇帝率百官到场观看。当委派大将出征时，由符节郎代表皇帝向大将授予"节"、"钺"。西晋改为皇帝亲自到场，由尚书授予大将节、钺。出征时仍然要举行上述的出征礼。

北朝对这些礼仪略有修改，北齐在出征礼上增加了祭祀的神灵，包括后土、神州、岳镇、海渎、源川之类的行军将要经过的方位和山川神。并且专门举行单独的祭祀军旗的礼仪，要卜得吉日，以太牢（全牛、羊、猪）祭祀军旗。到了战场后要举行祭祀当地土地神的礼仪，准备黑色的牲，排列队伍，在辰位上设置祭坛，堆起柴堆，宰牲献祭，乐队奏《大护》曲。礼毕，撤牲后将柴堆点燃。战前一日，举行祈祷祖先、土地仪式。如果得胜，就以太牢祭祀报答，胙肉赏用命战士，并在社坛处死不用命者。

北齐的礼仪后来被唐宋等朝代沿袭。军队的前导大旗被称为"牙旗"，师出必祭，祭祀的礼仪也被定名为"祃"，有专门的"祃仪"。军营驻扎地必须建立祭坛，绕以青绳，张有幕帐，置军牙及军旗的牌位。祭祀要用全套祭品，牲用太牢。如果没有牛可以羊猪代。统帅以全副军服献祭，将校陪位。宰牲的血仍然要"衅鼓"。

明朝专门在京师以及各地卫所建立"旗纛庙"，进行日常祭祀。每年仲秋，皇帝祭祀山川之日，同时去祭京师的"旗纛庙"。祭祀的神灵也进一步扩大到"旗头大将"、"六纛大将"、"五方旗神"、"主宰战船正神"、"金鼓角铳砲之神"、"弓弩飞枪飞石之神"、"阵前阵后神祇五昌等众"，共七座牌位，祭以太牢。各地卫所在公署后立庙，以指挥使为主祭官。出征前也仍然举行祃仪。明朝还恢复了遣将礼，皇帝服武弁服，御奉天殿，大将军入就丹墀，四拜，由西陛入殿，再拜跪。承制官宣制，以节、钺授大将军。大将军出至午门外勒所部将士，建旗帜，鸣金鼓，正行列，擎节钺。奏乐前导，百官依次送出。

相见礼

中国古代主要的礼节是跪拜礼。直

到唐代，中国人还是习惯“席地而坐”。古人的“坐”，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的跪，两膝着地，然后将臀部坐于后脚跟之上，脚掌向后向外。西周时的礼仪规定，当要表示尊敬时，就伸直上半身，也就是所谓“引身而起”；进一步的就是上半身向前倾斜、两手伏地，这就是“拜”。正式场合的“正拜”有稽首、顿首、空首。稽首是拜者屈膝跪地，左手按右手，支撑在地上，然后将头叩首到地，稽留一会，手在膝前，头在手后。这是最重的礼节，一般用于臣子拜见君王或是子孙祭祀先祖的礼仪。顿首和稽首的基本动作相同，只是拜时叩头动作较为迅速，额头触地即起。一般用于下对上的敬礼。空首的基本动作是双膝着地，两手在胸前拱合，俯头到手，头与心平而不到地，又叫“拜手”。贵族出行驾车，见地位比自己高的人要让道下车，而对方应将手放在车前横木上，称为“式”。

这种礼节以后成为习惯，即使在宋以后人们已广泛使用椅子、凳子“垂足坐”，仍然保留了跪拜礼。而同辈者、地位相同的人之间可以行拱手礼。注视对方、将双手在胸前合拢抱拳，一般称“作揖”，同时发“诺”声的为“唱诺”。

根据儒家经典里的记载，西周时在军营里不行这些普通的礼，比如凡已披挂甲胄的将士不行跪拜礼，对于地位比自己高的人也仅行拱手礼而已，号为“介者不拜”；而受致敬者也仅需作揖还礼。兵车出行，即使有人向驾车者致敬，也无须行“式”还礼，号为“兵车不式”。军营中授受有锋刃的武器时要以木柄一头来递交。出军营的时候，武器的锋刃要向前，而进入军营时锋刃要向后。到了汉代以后这些军营礼节仍然存在，比如著名的汉文帝“细柳劳军”故事中，周亚夫就以“甲胄之士”为理由不行跪拜礼，不过没有披甲的将士仍然要行跪拜礼。

唐以后的军营相见礼结合了跪拜礼和作揖。比如戚继光规定军营中下级将士参见主将都必须“两跪一揖”，非直接下属参见则“一跪两揖”。道路遇见直接上级必须下马让道，行拱手礼路迎。如果是非直接上级军官，仍要下马让道立正候过。把总参见千总“两揖一跪”，以下各级均如此。上级下达军令下级必须跪接。并宣称“军中立草为标”，任何人都必须向上级行礼。清朝的军营相见礼以单腿着地的“打千”为主，见上级必须“打千”，如果是向直接上级报告，仍然要行跪拜。

【军功制】

激励士兵冒生命危险参加战斗的因素，主要有实际利益（提升社会等级、获得物质利益等）以及精神刺激（得到社会的高度评价、荣誉感）等。法家著作《商君书》将此发挥得淋漓尽致。它鼓吹“壹教”，要求国家将所有的利益授予与舆论评价都集中到战争上：“富贵之门，必出于兵”；“死者不悔，生者务劝”；起居、饮食等日常生活的歌谣都要和战争有关；实现“民闻战而相贺”，甚至要做到“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

春秋战国时代原来束缚社会成员的身份等级限制被打破，奴隶、平民都可以通过战场上的战功来提升自己的社会

地位。这对于参战的平民士兵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激励机制。比如公元前493年，晋国权臣赵鞅率领自己的私家军队在朝歌和齐军作战，在战前动员中，赵鞅宣布如果打了胜仗，上大夫可以获得一个县的赋税收入，下大夫可以获得一个郡（当时郡指边境地区的据点，小于县）的赋税收入，士可以获得土地，平民以及工商业者可以做官，奴隶可以获得自由。结果大获全胜。

将这一政策发挥到极致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这次变法把秦国的20等爵位改造为彻底的军功爵位制，无论什么身份的人，只要有战功，在战场上斩得一个对方甲士的首级，就可以提升一级爵位。而国家规定的社会地位以及经济利益全都按照爵位来授予。爵位由低到高分为20等：与过去“士”相当的爵位分为4等，分别为“公士”、“上造”、“簪袅（zān niǎo）”、“不更”；与过去“大夫”相当的爵位分为5等，分别是“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与过去“卿”相当的爵位分为9等，分别是“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或称“大良造”）、“驷车庶长”、“大庶长”；与过去诸侯相当的爵位分为2等，分别是“关内侯”、“彻侯”。每晋升一级爵位，就由国家赐予耕地100亩、宅地9亩，并由国家分配给一名“庶子”，平时为主人耕种土地，战时随主人出征提供勤务。五大夫以上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税邑”（划定某些地方人户上缴的赋税归其享用），彻侯和关内侯还可以得到封地，获得封地的赋税收入（但一般不得直接在封地进行统治）。每一爵位都可以享受相应的社会特权，比如“不更”可以免除一般百姓必须承担的劳役，“公乘”具有出行时乘坐政府车辆的特权等等。平时衣、食、住、行，生、婚、丧、祭等各方面享用标准都按照爵位严格划分。有爵位者还可以出任一定级别的官职，比如第五级“大夫”以上就可以担任各级军官。有爵位者在犯罪的情况下，往往可以用“贬爵”来代替刑罚。而爵位也可以用来为自己的亲属免除官府奴隶的身份，用一级爵位可以赎取一个沦为奴隶的亲属的自由。

秦国的《军爵律》对于战功的计算与赏赐做了详尽的规定。比如规定士兵在战场上斩得敌军普通士兵的首级，就可以免除全家的徭役和赋税。100人以下的作战编制单位如果能够斩敌33个首级，就计为“满功”，带队军官可以晋爵一级。大兵团在攻城战役中斩首8000级以上、在野战中斩首2000级以上，也计为“满功”，各级军官都晋爵一级，其中战功卓著者可以晋爵三级。

从战国后期秦军几乎所向无敌的情况来看，这套激励机制还是相当有效的。到了秦末战争期间，各方基本都采用这套制度。刘邦的汉军在战争期间大量授予军功爵位，但是对这些有爵位者的社会评价和实际待遇已大大打了折扣，以至于刘邦在战争结束后特意要发布文告，要求各地政府尊重有爵位的退伍官兵。而他的儿子汉文帝刘恒接受文臣贾谊建议，允许百姓出粮买爵位来增加政府收入。后来的很多皇帝更进一步，经常为了某项政治目的而宣布“赐天下民爵一级”，甚至赐民爵二级、三级，人人有爵位也就等于是人人无爵位，爵位不再有什么激励的因素。

以后各代不再有类似的普遍性的爵位制度。汉武帝为了推进对匈奴的战争，另行设计一套17级“武功爵”，名义上是奖赏作战勇敢的将士，但实际上却和原来的爵位一样可以卖钱。现在只知道从低到高有“造士”、“闲舆士”、“良士”、“元戎士”、“官首”、“秉铎”、“千夫”、“乐卿”、“执戎”、“左庶长”、“军卫”等名目。

秦汉以后由于社会所看重的是职官，再赏赐爵位没有激励意义。于是北朝的北周设置“勋官”制度，对于有战功的将士赏给一个名义上的官位。这一制度被隋唐五代以及两宋沿袭，北周有“上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上仪同三司”、“仪同三司”等11级。隋文帝改为“上柱国”、“柱国”、“上大将军”、“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上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大都督”、“帅都督”、“都督”11级，官阶等级从正二品至七品，得勋者不可直接正式担任官职，但可以享受相应的官职的特权（比实际官员略减几等）。不过名称与实际官职相同的很多，容易混淆，于是隋炀帝再改为14级专门的勋官官称：左光禄大夫、右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正议大夫、朝请大夫、朝散大夫、建节奋武尉、宣惠尉、绥德尉、怀仁尉、守义尉、奉诚尉、立信尉，正二品至从九品。唐朝确立上柱国、柱国、上大将军（后改上护军）、大将军（护军）、上轻车都尉、轻车都尉、上骑都尉、骑都尉、骁骑尉、飞骑尉、云骑尉、武骑尉12等，正二品至从七品。这被五代以及宋朝沿袭，不过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元朝入主中原也有同样制度，勋官10阶：上柱国、柱国、上护军、护军、上轻车都尉、轻车都尉、上骑都尉、骑都尉、骁骑尉、飞骑尉，正一品至从五品。明朝恢复唐宋制度，名称略有不同，仍为12级：左柱国、右柱国、柱国、上护军、护军、上轻车都尉、轻车都尉、上骑都尉、骑都尉、骁骑尉、飞骑尉、云骑尉、武骑尉，正一品至从六品。

以勋官作为奖赏军功的手段到了以后很少有激励效果，因为勋官并没有什么实际待遇。每当战情吃紧，朝廷往往不得不给有战功者直接封官职。唐朝安史之乱爆发后，勋官之外还滥发职事官的“告身”，吏部、兵部特设91名“写急书告身官”，日夜不停地书写“告身”，每年发出去的告身有10万件，即使这样也没有能够有效地提高官军士气。南宋初期，朝廷也只能给将士滥发官照作为奖赏，发出去的官照成千上万，以至于当时军队中有的队号为“武功队”，全队士兵至少都是“武功郎”（正七品武官）、“武功大夫”（从七品武官）的级别。清朝入关，不再有勋官制度，改为直接奖赏“功牌”，和今天的奖状相似，仍然仿照官阶，从五品以下各分等级。有了几品的功牌，平时就可以摆几品官的谱，坐八人抬的官轿，出行时可以按照品级鸣锣开道，只是都必须自费，国家只给一张纸允许你摆谱而已。还有一个奖赏的办法就是直接授给官职，比如“军前效力补总兵”。每一次战役后，领军将领都可以“保举”部下为官。最先的比例是不得超过全体将士的5%，后来逐步提高，到太平天国战争时，有的时候会达到15%，甚至30%。曾国藩曾企图将湘军的保举比例限定在14%以下，但是往往被突破，而实际上朝廷没

有这么多的武官官缺（职位），得到官职的人要自费到兵部报到候补实际官缺，当战争规模很大，赏赐的军功官职会成千上万，候补官要等很久很久也难以补上缺，最后连回家路费也没有。清末湘、淮军将士在镇压太平天国战争中得到各类武官官衔的有十几万，而朝廷武官官缺编制却是固定的13000个左右，很多退伍的将士既没有上京参加铨选的旅费，又没有文化，明知道自己不可能补上实缺，只好拿了“官照”贱卖换钱。

靠提高社会等级身份的犒赏军功的办法效力有限，还需要其他的激励手段。《木兰辞》中说花木兰屡立战功，“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12转的勋官既然意思不大，就主要靠百千强（强即“镪”，铜钱）的赏赐。看来北朝时期已开始向将士发放现金来奖励战功。后来将这办法大加发挥的是实行雇佣兵制的宋朝。宋朝有专门的法律《赏格》，明码标价。禁军将士：第一等，绢10匹、钱10贯；第二等，绢7匹、钱8贯；第三等，绢5匹、钱5贯；第四等，绢3匹、钱3贯；第五等，绢1匹、钱3贯。蕃兵、义勇、弓手：第一等，绢10匹；第二等，绢8匹；第三等，钱10贯；第四等，钱5贯；第五等，钱3贯。一般战场斩敌一首级，为第四等，以上依次类推。高级军官（副指挥使以上）受轻伤，赏5匹绢；重伤，赏7匹绢。基层军官（副都头以上）重伤5匹、轻伤3匹。“长行”士兵重伤3匹，轻伤2匹。

宋朝明码标价的办法在以后各朝代也都流行。比如清朝的绿营兵也将战功分为三等，一等赏银5两，二等赏银3两，三等赏银1两。特等的战功按照具体情况给赏，比如攻城时最先登上城头、冲进城内的，赏银250两；野战时首先冲破敌阵的，赏银50两；夺得敌方船只一艘的，赏银100两；如此等等。阵亡的普通士兵，步兵50两，马兵70两，杂丁20两；军官阵亡的，从提督的800两递减至把总的100两。作战受伤的赏银从50两到30两不等。以后的湘、淮军都按照这一制度略加修改形成一套奖赏军功的赏格。

【军法】

据《史记》记载，春秋末年的时候，吴国国王阖庐看了孙武所著的13篇兵书后非常欣赏，邀请孙武来吴国，但孙武到了吴国他又不太相信，要孙武当场训练王宫中的180名美女作为试验。孙武把这些宫女分为两队，任命两个吴王的宠姬为队长，于是发给武器，进行队列操练。他说明了纪律后，设立斧钺，“三令五申”后擂鼓指挥，可是那些宫女却哈哈大笑。孙武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再次三令五申后，重新擂鼓发令，宫女们依旧嘻嘻哈哈。孙武说：“现在纪律已经说明了，仍然不服从命令，是吏士之罪。”便将两个队长抓起来准备处刑。吴王在高台上见了，赶紧派使者来传令，说：“寡人已经知道将军能用兵了。寡人没有这两位美姬食不甘味，请停止处刑。”孙武却说：“我既然已经受命为将军，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仍然将这两个队长斩首示众。又选了两个宫女当队长，重新发令。这次宫女们都乖乖地执行命令，队形严整。于是孙武要使者去报告吴王，“现在这支部队已训练成功，大王就是命令她们去赴汤蹈火也会执行。”

这个故事很能说明中国古代军法的特点，维持战场纪律是靠大量使用死刑来实现的，所以在俗谚中“军法从事”一般就是指以砍头为代价的事。儒家经典记载夏、商、周三代历史的《尚书》中，夏朝第一个国王启在甘作战时的誓词《甘誓》、商朝第一代国王成汤的《汤誓》、西周第一代国王周武王的《牧誓》，几乎都规定战场上作战“不用命”的将士要在祭祀土地神的“社坛”被公开处死，并且还要连带处罚其家属。而据其他的史籍记载，春秋时期战场上的逃兵、作战不努力者被处死后的尸体还不得葬入家族墓地，这在当时或许是比死刑本身更重的处罚。

春秋战国时期军法资料最为详尽的是兵家著作《尉缭子》。该书公开宣传使用重刑来维持战场以及军队纪律，甚至说：“善之用兵者，能杀士卒之半；其次杀其什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其什三者，力加诸侯；杀其十一者，令行士卒。”也就是说，至少要能够杀掉士兵10%的，才能使军队纪律严明，令行禁止。首先是要立法禁止逃亡；其次是要使士兵“什伍相联”，互相保证，有罪连坐；最后要使将领能够立威，有处罚士兵的全权，每一级军官都有处死其下级的权力。《勒卒令》篇说，军阵中以金、鼓、铎、旗为指挥信号，听到擂鼓声就应前进，重重的擂鼓声就表示要发起冲锋，与敌军交战；听到鸣金声应该停止，而重重的鸣金就表示要后退；听到铎声就要注意指挥官的口头命令；看军旗的方向前进，旗左即左，旗右即右。如果不听这些信号指挥的就要处以死刑，在阵中喧哗的要处以死刑。其他篇目说作战中每伍如果仅有伤亡而无战功的，说明作战不努力，士兵要全部处死。每一编制单位指挥官伤亡而没有毙、伤、俘对方同级军官的，全部士兵处死，并连坐家属。而如果主将战死，部下带500兵以上的军官都要处死，卫队也全部处死，士兵有战功的降级，无战功的罚戍边三年。带领千人以上的军官弃城投降或临阵脱逃的，为“国贼”，本人处死，暴尸示众，其家属没入官府为奴隶，并发掘其祖坟；带领百人以上的军官有这样行为的，是“军贼”，同样要处死、抄家。

《尉缭子》的说法在春秋战国时期具有普遍性。著名的《孙子兵法》虽然没有正面接触到军法问题，但也强调“兵置于死地而后生”，表现对于士兵生命的冷酷态度。另一部《孙膑兵法》也有一篇叫《杀士》，其内容虽已亡佚，不过其标题与《尉缭子》说法相近。这些兵家著作所言军法或许应当和当时的实际情况相差不是很大。

除了广泛使用死刑外，当时军法中其他的处罚方法还有鞭打和“贯耳”（用箭矢穿刺违纪者的耳朵）。《左传》记载公元前633年，楚国准备围攻宋国，先进行了大规模的会操，统帅子文主持的会操，进行了半天，没有杀一个人。以后楚国更换统帅，由子玉再次组织会操，进行了一整天，鞭打了七个人，“贯三人耳”。楚国贵族为军队出发而为子文举办宴会庆贺，有个叫蒍贾的年轻贵族晚到，到了也不表示庆贺。子文很奇怪，就问他为什么，蒍贾说：“我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庆贺的。您将指挥权转交给子玉，要求他安定国家，他只是平定国内，将来要在国外失败。他的失败是由于您的举荐，您的举荐要败国，有

什么好庆贺的？子玉这人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超过300乘的军队他就带不回来，等他回来以后再庆贺也不迟。”果然第二年子玉违抗楚王要他撤退的命令，指挥楚军在城濮和晋文公亲自率领的晋军会战，结果打了败仗。楚王大怒，暗示子玉自杀以承担责任。子玉只好自杀。从《左传》这段记载来看，显然作者对当时残酷的军法持批评态度。

另外当时的军队已经广泛实行连坐法。如湖北云梦出土的秦国的《军爵律》规定，伍中有一个士兵逃亡的，其余四人都要受罚两年的劳役（如有战功斩敌一首可以免罪）。这种连坐法使全体士兵出于自身安全考虑而互相监视，所以被认为是维持军纪的有效手段，为当时各国军队普遍实行。

从现存的一些汉代军法来看，汉代仍然保留春秋战国以来的传统。比如“乏军兴”（提供出征军用物资有短少）是当时最重的罪名之一，要处以“腰斩”。而未得到皇帝发出的兵符就调动军队的，也是斩罪。大敌当前，指挥官没有及时出击，为“逗留不进”罪，也是死刑。著名的探险家张骞在回到国内后就曾因这个罪名而被判死刑，好在汉武帝允许他出钱财赎罪。另外一个重罪是战场投降敌人，本人要处死，家属要连坐。比如李陵投降后，其家属被全部处死。军队指挥官没有能够按照预定日期赶到战场为“失期”罪，也是处斩。飞将军李广在随大将军卫青出征匈奴时，因为向导带错路而迷失方向，“失期”被逮捕，他不愿受军法官审讯的侮辱，情愿自杀。损失将士过一定比例的指挥官为“亡士多”罪，也是死刑。虚报战功“盗增虏获”过一定比例也是死罪。

现存比较完整的早期军法原文，是保留在《通典》等书中的曹魏《军中令》的几条条文，基本与《尉缭子》所说的相近，比如也规定阵中喧哗者、不听旗鼓号令者都处斩。“伍中有不进者，伍长杀之；伍长不进，什长杀之；什长不进，都伯杀之。督战部曲将拔刃在后，察违令不进者斩之。”一支部队受敌而另一支部队不及时救援，也要斩。追击时不得单兵独骑，违者罚金四两。在战斗中收取战利品者也要斩。另外在军队中不得随便张弓弩，违者“鞭二百”。军营中不得屠宰牲畜买卖，违者没收，带队军官“杖五十”。部队出军营时应擂鼓、张旗帜，出营三里后卷起旗帜；回营时再擂鼓、张旗帜，否则旗鼓手要“髡”（剃光头发胡子）。

后世的军法都保持曹魏《军中令》的面貌。唐朝法典《唐律疏议》算是古代最为宽简的法典，但是其中有关军事的《擅兴律》仍然保留相当多的死刑。擅自发兵千人以上为绞刑（10人以上徒一年，以上递加）；“乏军兴”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都要斩；出征军人稽留三日以上就是斩罪；未能固守城池的主将，斩；作战时未派出斥候导致失败的，也是斩；临阵先退、抛弃武器、任意杀死投降者，都是斩罪；出征逃亡15日以上就是绞罪，如果是已上前线又逃亡的，就是斩罪。不过原来北朝的北齐法律将“降”作为“重罪十条”之一，《唐律疏议》对此倒没有特别的规定。

唐末以后军阀混战，后周以严行军法而逐渐组建起军纪严明的军队。当赵匡胤还是后周将领时，有一次在六合激战，他站在阵后督战，用剑在他认为作战不努力的士兵斗笠上戳上印记，战后

检查士兵斗笠，有记号的数十名士兵全部当场处斩，以此造成士兵对军法的畏惧，使他所带领的部队成为精锐部队。当了皇帝后，赵匡胤特意颁布“阶级法”，强调军官对于下级官兵的生杀大权，敢有顶撞长官、不服从命令的“上军”（军俸最高的士兵）当场处死，“下军”及厢军徒三年，偶犯的各减二等。并将这个法令作为传家宝，要以后各代皇帝代代相传下去。《武经总要》所载72条北宋军法大多是战场纪律，也保持着春秋战国以来的一贯风格。比如临战未等命令就冲入敌阵的要斩，在射程以外就发射弓弩的要斩，而在命令射击时多射或少射、抛弃箭矢的也要斩，箭矢已上弦还回头张望的也要斩。在扎营后不从正门回营的，就要处斩。部队如果在战场上丧失了本队的旗帜、鼓号的，全部处斩（而古代罗马军队在相同情况下，实行所谓“什一法”，士兵报数后，逢十抽一处斩首，撤消该部队番号，剩余士兵分散编入其他部队，这已被认为是最严酷的军法）。对于士兵扰民的处罚也很重，规定即使破敌有功，只要有“掘冢烧舍、掠取资财”，仍要处斩。与军队驻地附近妇女通奸或将妇女带入军营的，都要处斩。对于一般的违反纪律行为都要责打军棍。

元明清时期朝廷颁布的法典都有专门的“军律”或“兵律”篇目，基本仍然继承这些传统，不过有些罪名的处罚略有减轻。比如明清律中的擅调官军罪，不过处以充军。原来的“乏军兴”，改为“失误军事”，处杖一百，造成失误军机的才处死刑。“从军征讨”而逃亡的，初犯杖一百，再犯处绞。也有些更为详细，比如有“飞报军情”的规定，失误军机的要处死刑。士兵在已平定地区掳掠的“皆斩”。官员将领“激变良民”，失陷城池的，处斩。此外清朝还曾订立一些专门的军事法规，如“行军简明纪律”等。

明朝以训练精兵出名的戚继光，在其所著的军事著作里并不一味主张重刑。他认为军队中要“严赏罚”，不过对于士兵平时的一般过错，他都要求初犯、再犯予以警告，三犯之徒才予以严惩。责打军棍以五下为度，视情节增减。主要贯彻责打的严肃性，必定要召集全队，说明理由，重重责打，而不必过多责打。另外他主张“详责成”，所有违犯军法军令的行为都要连坐军官。管5人的，属下1人有犯就要连坐；管20人以上的，属下2人有犯就要连坐；管60人以上的，属下6人有犯就要连坐；管百人以上，10人有犯必要连坐；管300人以上的，20人有犯，必定连坐；至管1万人的，属下500人有犯，就要连坐。每一单位的士兵都要连保，如有逃兵，一队中“一半送监”，其余一半进行缉拿，都要革去“月粮”。一年未抓获的，全队发往边防巡哨三年。本伍的士兵捆打后仍然服役，但在抓获逃兵以前只能拿一半兵饷。对于士兵酗酒斗殴、破坏百姓田地庐舍，“贯耳游营”；奸淫妇女、偷盗财物的，就要“军法示众”。同队有士兵揭发的，全体不必连坐，如果无人揭发，就要全队连坐。这些都是他带兵训练时拟定的制度，后来大多被清末的湘、淮军继承。

六、战术战略

【步兵阵法】

冷兵器时代由于兵器的杀伤范围相当有限，因此能够将兵器杀伤力高度集中的密集战斗队形是制胜的法宝。这种战斗队形在中国古代称之为“阵”，不同的战斗队形的排列组合方法称之为“阵法”。阵法的变化很多，也有各种名称，古代谈论战法、训练军队，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阵法，是国家军事制度的重要内容。

早期战争中的战斗队形情况已不可考，现在大致可以明了的最早的阵法是西周时期以战车为主力的阵法。根据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等论著的考证，当时每辆战车配备一定数量的“徒”（步兵），“徒”分为几个小组（两），分布在战车周围，组成基本的战斗单元。步兵战斗小组在战车正前方时称为“前拒”，在战车两侧前方的称“角”，平行两侧的为“队”，在战车后方的称“墩”。当时的战车冲击力强而向两侧机动的性能很差，因此整个战斗队形由各个战斗单元组成一字排开的横阵，一般分为左、中、右三个编队，两侧编队向前突出的叫“角”，或分别叫“左拒”、“右拒”。在作战开始前，战车排列成一列横队，战车与战车之间的空隙由步兵的战斗小组填充。战车全速冲锋时，步兵在两侧和后方提供护卫；在对方战斗队形被冲散后，步兵追赶上去扩大战果；如果战车冲击受阻，步兵进到战车前组成防线帮助战车掉头撤退。在整排横阵之后有预备队“游阙”，辎



“战国水陆攻战纹鉴”上的步兵作战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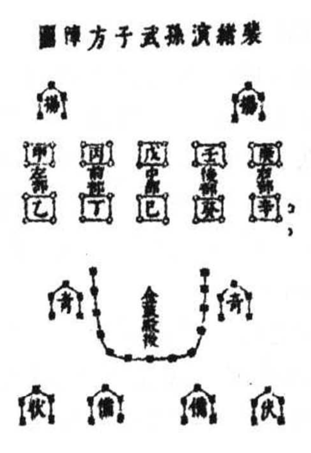
重车队及其护卫步兵。

随着战争规模以及作战地域的扩大，原来只起辅助作用的步兵在战斗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每一战车配备的步兵越来越多，步兵的战斗小组也逐步严密，步兵的各种兵器搭配组合，形成一个个的“方阵”，本身就成为一个完整的战斗单元，不再是战车的附属。这种方阵据后人考证是每五人为伍，五伍为“两”，由一名甲士“两司马”指挥。公元前541年晋军在太原附近的“大卤之战”

中，索性将全部车兵编入这种步兵的战斗队形，组编为大的步兵阵势，得以大败狄人。不过关于这次战役中晋军组编的战斗队形的具体细节，史书记载不详。据后人考证，当时是将全部士兵组编为五个独立的大战斗队形，前出的一个号为“偏”（大约有1875人），用来诱敌；“偏”后边面有“两”（大约有3650人），用来接应“偏”；两侧各部署了“左角”和“右角”，左角有大约2100人，号为“参”，右角有大约6000人，号为“专”，从两侧向内合击；主力部队“后军”，有9000人左右。战斗开始后前出的两支战斗队形互相接应将敌军引诱到主力部队面前，然后两侧的“角阵”向内合击，一举粉碎了敌军。这个阵势被后人称之为“崇卒之阵”。

战国时代步兵战阵交锋成为最主要的作战形式。根据后人考证，当时最基本的战斗队形是密集小方阵，以“伍”的纵队为基础，每10个“伍”的纵队排列为“队”（5×10）；两个队组成“伯”，可以横排（5×20），也可以重叠（10×10）；两个“伯”组成“曲”，同样可以横排一列（5×40），或重叠四队（20×10），或并列（20×10）。一般战斗中以“曲”为基本单位，用各种方法将曲再组编为大的战阵。

《孙膑兵法》专门有“十阵”篇，记载了10种阵势：方阵、圆阵、疏阵、数阵、锥行之阵、雁行之阵、钩行之阵、玄襄之阵、水阵、火阵。后两种阵势是讲水战和火战，实际上与阵法无关，即使是《孙膑兵法》一书本身也称“用八阵战者，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可见实际上步兵战阵主要是八种。以后各代都以这八种基本阵法而加以变化。所



后人设想的孙子方阵图

谓的“八卦阵”或许就由此以讹传讹。

方阵是将一个个小方阵“曲”组成的长方形的大方阵，战地指挥部“中军”在方阵之后。小方阵为了集中发挥兵器的杀伤力是相当紧凑的，而大方阵内则必须有间隔，才可以机动兵力。因此有“阵间容阵”的说法，即在小方阵之间要间隔一个小方阵的距离。《孙膑兵法》主张方阵应该是中间兵力薄弱、两翼兵力加强，以引诱敌军在中间投入主力，便于本军两翼包抄合击。

圆阵是将“曲”排成环形，中军位于环形之内。这是一种在战地进行的环形防御阵型。

疏阵是将“曲”尽量分散，可以将以上的基本阵型都列为稀疏的战斗队形，加大各行列的间隔，用以迷惑敌军。

数阵是密集的阵型，和疏阵相反，将各个小方阵的间隔缩小，用来进行近战格斗。

锥行之阵，是一个尖角向前的三角形的攻击阵型，用来冲击分割敌军阵型。后世称之为“牡阵”。

雁行之阵是向前或向后的八字形阵型，两翼的小方阵梯次排列。向前的雁行之阵是用来包抄敌军的，两翼小方阵

向前梯次展开攻击，中间的小方阵掩护中军。向后的雁行之阵则可以防守，或做撞城式的中间突破攻击。如果两翼向前成纵队、中间的方阵排列较宽，就是“箕形阵”或“牝阵”，可以用中间的一个小方阵引诱敌军进行中间突破而遭到两翼的包抄。

钩行之阵是“前列必方、左右之和必钩”的阵型，就是基本排为横型阵势，而两翼略向后弯曲，以保障翼侧安全。

玄襄之阵是一种“迷阵”、假阵，没有正式的阵型，主要是指迷惑敌军。利用地势多树旌旗，擂鼓鸣金，扬尘喧哗，使敌军判断错误。

现在还没有史料能够直接证明《孙膑兵法》所说的这八种阵法就是当时普遍采用的战阵，只能推测这应该是作战经验的总结。秦汉以后的步兵战阵的情况也相当模糊，只有唐朝杜佑《通典》一书记载的唐朝名将李靖的一些语录，使我们可以得知唐朝步兵的主要战斗队形。

李靖的阵法被后人总称为“七军六花阵”。其基本的战斗单元是“队”。和古代的方阵不同，李靖将以近战格斗为主的步兵“队”阵型改为锥形，每一队的“队头”站在全队最前列，身后是旗手“执旗”，旗手后面是两个护旗手“傔旗”，以后是五排步兵，按照 7、8、9、10、11 人排列，每排比前排多一人，使每一个前排士兵能得到在侧后方两个战友的支援。“队副”站在全队最后，“执陌刀，观士兵不人者便斩”。显然这是一个在向敌军发起进攻时的阵势。队与队组合成一个大的战阵，一般情况下为横阵，第一线排列“战队”，每三个队组成一个三角形的大队，突前的队为“战锋”；第二线步兵兵力略少于与第一线，排列“驻队”，以队为单位占据第一线大队与大队之间的间隙位置，并在两侧部署兵力相当于驻队一倍的骑兵队；第三线部署“奇兵”（预备队），以队为单位横向展开，兵力略少于第二线。

如果是在山地作战，横阵难以展开，李靖主张将进攻阵势改为“竖阵”。将弩兵、弓兵、战锋分别编队，依次一一竖向排列，后方并列驻队，一齐闻鼓声发起冲锋。显然是企图依靠弩、弓兵密集发射箭矢打开缺口，战锋队乘势向前格斗；如果进攻受阻，第二波再如法炮制。

李靖以 2 万人、其中 1．4 万人为战斗兵的部队为例，主张编成七个军：前军、后军、左军、右军、中军、左虞候军、右虞候军。中军是指挥部所在地。作战时可以将七个军成一字形排开为“横阵”，每个军按照上述基本阵法排列阵势，军与军之间有间隔，中军位于中央，并在最右方部署“奇兵”。这是一个可以机动的基本阵势。在追击战时可以改为“雁行阵”，以右虞候军突前，两边梯次排列其余六军。在驻扎以及防守时可以将中军位于中央，其余六个军环绕中军部署，这被后世称之为“六花阵”。

历代最重视阵法的莫过于宋朝。宋朝最大的军事威胁始终来自于北方的游牧民族骑兵，而宋朝因为丧失了放牧马匹的优良草场，一直组织不起像样的骑兵与之抗衡。为了在野战中取得优势，宋太祖亲自制作了“御制平戎万全阵图”，试图以绵密纵深的阵势来抵御骑兵的冲击。这个阵法是一个空前的大阵，

以11万多名步兵组成三个方二里的大方阵，每个方阵周遭每五步就排列大车一乘、步兵22人，1400多乘大车围起的阵地内还有5000名步兵为预备队。在这三个大方阵外部署骑兵，前、后两阵各5000骑兵，东、西稍阵（即两翼）各1万骑兵。总兵力达到14万多人，展开的正面宽达17里。这个阵势似乎是要等对方骑兵先进攻，再来后发制人。这张阵图算是宋朝皇帝的传家宝，代代相传，可是显而易见的是，总是力求按照这张阵图去作战的宋朝军队既没有能够“平戎”，也没有能够“万全”，北宋初期对辽、西夏的战争史几乎就是一整部败仗记录。

北宋后期的《武经总要》一书记载了当时宋朝军队使用的一些主要的阵法，号为“本朝八阵”。该书以指挥1．4万人的军队（50人为队，共200队步兵，80队骑兵）为例，图示了这八种阵法。其基本的阵势是四方形的方阵。组成“牝阵”时，左右两翼向前伸出一支小部队，比前代的倒八字的“箕阵”要保守得多。组成“牡阵”时，前军以弓、弩队为首，以下战锋队、战队依次展开，形成锥形攻击阵势，而主力仍组成四方的阵势。组成所谓“冲方阵”，实际仍然是四方形的方阵。组成“车轮阵”（也就是“圆阵”）时，与唐“六花阵”相仿，排列六边形的阵势。“罘罳（fú sī，捕兽的网）阵”是将前、后军展开为横队，主力在中央为纵队，横队搜索，主力突击。“雁行阵”是八字形的阵势。“容辎重方阵”，是防守的阵势，将辎重车辆围护在中央。总的来看都是以密集、但机动性较差的步兵方阵为主体。

南宋初年吴璘在今陕甘一带组织防御，为对付金军骑兵冲击，又设计“迭阵”。作战时以铁链连接的拒马挡在阵前，第一排为长枪兵，坐在地上，树起长枪以屏障身后的弓箭手；第二排为最强弓手，第三排为强弩手，采用跪姿发射；第四排为神臂弓手，采用立姿发射。敌军至百步内，神臂弓发射，70步距离时，强弓、强弩齐射。然后两翼骑兵转到阵前掩护第二拨步兵上前列阵。这一战术以步兵轮番上前发射箭矢来代替贴身肉搏，收到一定的效果，1141年吴璘就以迭阵在剡家湾（今甘肃天水东北）打败呼珊率领的3万金军。

明朝时火器开始大量装备军队，对于传统步兵战术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有头脑的指挥官开始探索如何更好地发挥火器的作用。其中最成功的是戚继光，他改革了传统的步兵战斗队形，并且能够因地制宜，针对不同的敌军采用不同的步兵战斗队形，使传统的步兵战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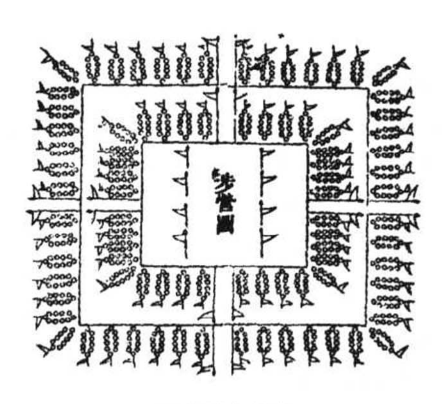
在东南沿海地区与倭寇作战时，戚继光注意到倭寇擅长短兵近战格斗以及伏击、奇袭战术，针对敌军这一特点，他设计的基本战术是以长兵顶住敌军，不让敌军的快刀发挥作用，并将行军队形和作战队形结合在一起，随时可以投入战斗。他编练的“戚家军”每伍由两个长枪兵、一个狼筅兵、一个镋钯兵、一个藤牌（或长牌）兵组成，两个伍组成的队由一名队长指挥。平时行军队形号为“鸳鸯阵”（两列纵队）：两个藤牌或长牌兵在前，队长居右侧指挥，后面依次是两个狼筅兵、四个长枪兵、两个镋钯兵。分伍为单列纵队行军，也是同样的顺序。在遭遇倭寇突袭时，两列纵队即展开排列为“三才阵”的横队：队

长居中，两边由狼筅护卫、身后两侧是镋钯兵支援，两边各有一组由藤牌或长牌并护卫的长枪兵，这样的阵势使倭寇被狼筅顶在远处无法靠近，无法使用快刀，相反会被长枪戳伤；一列纵队展开“小三才阵”：狼筅兵居中、两侧为长枪兵，藤牌兵及镋钯兵分守左右两翼。在足以展开的地形上，遇有敌情全军集结，中军居中，各营分别组成5×5（队）的方阵占据中军前后左右位置，形成十字形的阵势。前营向前方发起攻击时，左右两个营分别从两侧包抄敌军，后营分队插入前营各队之间的间隙，增加攻击密度。如果是在预设阵地与敌军作战，在前方两侧设鸟枪伏兵，三个营大致成钝三角，中军居中后方策应，引诱敌军发起攻击后，伏兵猛烈射击，全军出击，割裂敌军予以歼灭。如果战斗不利，也强调各营、各哨、各队要相互接应，逐次掩护。

戚继光调防北方后，针对蒙古骑兵突袭战术，又另行制定战术，强调发挥火器的远距离杀伤作用。他重新整编军队，将步兵战术改造为以发挥火力为作战手段，以车辆作为掩护，步兵战阵以火力车辆为核心。所谓以车“束部伍”，以车“为营壁”，以车“代甲胄”。每车装备两门佛郎机火炮，四枝鸟铳。士兵24人，分为“奇、正”两队：正队10人，六名佛郎机炮手，两名火箭手，两名弓箭手，一名舵工，一名车正；奇队四名鸟铳手，两名快枪手，两名藤牌/火箭兵，两名镋钯/火箭兵，一名火兵（炊事员），一名队长。在敌骑兵来袭时，100步内听天鹅声喇叭为号，鸟枪一齐开火，然后快枪开火，镋钯兵上前架起火箭发射，弓箭手再发射弓箭。敌军接近至30步内，听号令全队出战，排列鸳鸯阵，快枪手掉转快枪以枪当棍，鸟枪手弃枪换用长刀。当中军擂三通鼓时，不拘阵势，必须尽数“上前血战”。敌军退走，听鸣金声，撤回重整阵势，防备敌军回头突袭。这一战术将火器和冷兵器结合使用，但看来戚继光估计在冷兵器掩护下仍旧难以重新装填火器，因此才明确火器一次齐放后即改为冷兵器格斗，只有在依托车辆防守作战时，才强调轮番开火射击，并说明在敌军逼近时还是要步兵出阵格斗，暴露出当时的各类火器发射速度过慢的致命缺陷。

明末兵部尚书孙承宗督师辽西，进一步发展步兵使用火器的战术。他改编军队，五人为伍，二伍为什，二什为队，共25人，配备一辆装运火器的偏箱车，装备佛郎机火炮二门，鸟枪二枝，三眼枪六枝。各什有一伍由三名三眼枪手，一名鸟枪手，一名火箭兵组成；另一伍三人为佛郎机炮手，一名火弩手，一名长枪兵。各队环绕成基本的车营方阵，可以变化为曲阵、直阵、锐阵等阵势。作战时强调要“枪用连环、炮用叠阵”，靠发扬火力杀伤敌军。不过当时的火器并不比戚继光时有什么明显的改进，要不间断射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鸟枪、佛郎机、三眼枪、火箭轮番发射后，还是需要近战格斗。孙承宗以这种编制和战术编练了8万人的部队，使用火器的士兵要占到三分之一，在一段时间里比较有效地阻止了满清向关内的扩张。

清朝入关后组建的绿营兵部队，继承了明后期强调火器杀伤力的传统，但是不再以战车为野战掩体和编制单位，这或许是考虑到在绿营兵和八旗兵配合作战时，只要发扬了火力后，八旗骑兵



明车营方阵图

就足以对付敌军骑兵。也有可能是为了防止绿营兵获得对抗八旗骑兵的实力。绿营兵具体作战编制以及战术不详，很可能基本沿袭了明末的配备，三分之一左右的士兵是操作火器的。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与清军作战的各种军队往往是没有任何火器装备的，被清军枪炮一轰就支撑不住，因此清军能够屡屡获胜。太平军兴起后，在与绿营兵的作战中很快掌握其弱点，在百步开外遭到射击后，仍然冒死前进，以投掷火罐打乱绿营兵阵型，然后以密集的藤牌护身，贴近绿营兵以长枪猛戳，同时集中火器抵近猛烈射击。绿营兵来不及装填枪炮，又毫无决死战斗的勇气，也没有任何防护装备，在近战中死伤累累，很快就会溃败。

曾国藩等人组建起湘军后，认真总结绿营兵战术的缺陷，也仔细研究了太平军的战术。曾国藩因此仿照戚继光的战术，强调火器与冷兵器的结合使用。但是不再将火器兵与冷兵器兵混编为小队，也不采用战车，而是以哨为基本战斗单元，每哨有两队抬枪（各有抬枪3杆）、两队小枪（各有鸟枪10杆）、四队刀矛（每队10人），作战时尽量依靠发扬火力杀伤敌军，必须在百步以内才可以发出射击命令。抬枪先发射，然后鸟枪兵分三层射击：每层两人卧射、两人跪射、两人立射，射击后迅速从两侧绕到阵后装填；第二层、第三层依次射击。如果敌军已冲到阵前，则由刀矛队以一字阵（一行横队）或二字阵格斗掩护，鸟枪手装填结束后继续开火。

由于太平军没有骑兵，步兵冲锋速度较慢，因此有利于湘军的火器战术发挥作用。但是太平军人多势众，士气高昂，特别是后来也装备了大量火器，在野战中仍然经常击败湘军。因此曾国藩又确定尽量依托营垒工事发扬火力的战术。这可以说是“营阵”。湘军的“扎营之规”要求每支部队到达目的地后，必须寻找地势较高的地方扎营，中军居中，四哨分布前后左右。挖壕筑墙，遍布花篱（拒马）。墙以土筑，包砌土坯，要高八尺、厚一丈；壕要一丈五尺深，最好多道；花篱用长五尺的粗木尖头桩，三尺埋土中，最好要有五六层。限四小时完工。扎营前不得休息，也不可作战。尽量不主动出击，引诱敌军来攻，使敌军暴露在火力网下，在枪炮装填的间隙无法靠近肉搏。这称之为“结硬寨，打呆仗”。即使进攻城市，也使用这一战术，以己方营垒围困敌方阵地致胜。

在野战中，湘军注意到当时陆续从西方引进的枪炮射程远、精确度高，可以远距离杀伤敌军，因此极端重视作战地形，要求抢占便于发扬火力的地势。每次作战前主将必须亲自察看地形，绘制地图，复制后召开作战预备会议，要求各级军官都明了作战地域的地形，制定计划。作战中尽量依托有利地势发扬火力，即使战败也可以火力掩护交替撤退，不至于溃散。

湘军的战术代表了中国军队从冷兵

器格斗战术过渡到发扬枪炮火力战术的最高水平，随着西方近代枪炮的引进，湘军和继起的淮军中刀矛兵迅速减少，到太平天国、捻军等反清起义被镇压后，这两支军队的主力部队已几乎全部使用枪炮作战，其战术也逐渐过渡到近代散兵战术。

【骑兵战术】

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是骑兵战术的最早的实践者，战国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三胡”（东胡、林胡、楼烦）以大规模的骑兵和中原地区的诸侯国发生冲突，中原诸侯国也逐渐开始组建骑兵部队。最著名的事例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战国时期中原各诸侯国的骑兵主要是起作战辅助作用，《六韬》认为骑兵是“军之伺候”，用于追击、隔断作战。骑兵的编制和步兵什伍相似，作战时骑兵以什伍为单位轮番上前发射弓箭，近战格斗则各自为战。

秦汉时期的骑兵战术仍然以集团马上射箭为主。匈奴骑兵善于射箭，也能够在没有马镫的情况下进行使用长矛、刀剑的格斗，而中原地区骑兵只有项羽那样具有高超骑术的人才能够做到，一般骑兵主要依靠射箭为战斗方式。为提高射击密度，战斗队形比较严密，估计也采用和步兵一样的方阵，基本方阵“曲”为100名左右，以下有几个“屯”，可以横队或竖队迎敌。汉朝武帝开始组织骑兵大兵团深入漠北求战，应该有严密的骑兵战阵，以集体发射和冲击对付匈奴骑兵的散兵战术。绵延将近百年的汉匈大战结果是以汉朝的胜利而告一段落。

4世纪时马镫开始普遍使用，同时马的防护装备也大量普及，马刀、长矛成为骑兵的主要作战武器。这种技术进步迅速影响到骑兵战术的改革。集团横队冲锋、近战格斗成为“铁骑”（人马都披甲的重甲骑兵）取胜的法宝。游牧民族建立的十六国以及后来的北朝政权都依靠这种新的骑兵战术对汉族皇朝的步兵取得压倒性胜利。唐朝兴起时，在继承北朝重甲骑兵战术的同时，更注重以轻甲骑兵部队迂回突袭，李世民本人就擅长率领轻骑兵长途突袭。

唐皇朝建立后，将骑兵结合在步兵战阵中。从《通典》所引的李靖语录来看，唐皇朝的标准战术是将骑兵部署在第二线步兵战阵的两侧，当第一线步兵战队开始进攻时，骑兵无须上马，在战斗胶着、第二线步兵投入战斗时，或者是敌军已经动摇、阵脚不稳时，骑兵从两侧发起猛烈突击，给予对方决定性打击。骑兵战斗单元也是50人的“队”，可以排纵队或横队阵势。轻骑兵作战手段包括了射箭和马上格斗，以长矛突击为进攻的主要方式。

唐以后的中原皇朝再也没有能够建立起大规模的骑兵兵团。骑兵战术的主要发展在于和步兵的协同作战。北宋初年沿袭唐朝传统，在宋太祖制定的“御制平戎万全阵图”里，骑兵作为辅助兵力，部署在阵内的3万骑兵，仍然按照唐朝制度进行编制，但显然并不是主动出击的部署，而只是平均配置，作为中间三个大步兵方阵的屏障。

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辽、西夏、金、元都以骑兵称雄。辽朝骑兵战术是以轻骑兵为主力，轻骑兵诱敌，野战时故意三三两两的布置为散兵阵，一般并不主

动突击，等敌军突击靠近后迅速集结射箭，然后以主力排横队冲锋，每一横队500～700骑，轮番冲击，打开缺口后以纵队骑兵插入分割或追击，失利即迅速撤离战场。西夏骑兵以重骑兵著名，野战时以重骑兵“铁骑”为先锋，人马披甲，以铁索连接为30骑的横队，即使阵亡的士兵也不会从马上掉下来。对于步兵为主的宋军来说，要能够抵抗这种重骑兵突击有相当难度。一旦宋军步兵战阵被打开缺口，西夏的轻骑兵和步兵就乘势猛攻。

金朝骑兵战术更为成熟，平时作战都以轻重骑兵混编，50人为队，作战时20名重骑兵居前，以长矛棍棒为武器，30名轻骑兵居后，以弓箭为武器。一般并不轻易突击，在发现对方薄弱环节后，集中射箭，重骑兵冲锋，轻骑兵跟进。在和宋军相持不下时，则会以号为“铁浮图”的重骑兵投入战斗，这种骑兵身穿着两层铁铠，马披坚甲，箭矢无法穿透，三列横队，每列战马都用铁索相连。这种重骑兵由于盔甲太重，无法疾驶，因此以缓慢步伐前进。在遇到猛烈抵抗时，会在重骑兵后面放置拒马，迫使人马不得后退，向前一步就将拒马往前移。在这种撞城式的攻击下，一般敌军都会瓦解，金军同时也会出动“拐子马”重骑兵从两侧迂回攻击。

蒙古骑兵是各代游牧民族王朝骑兵战术的集大成者，得以席卷欧亚大陆。蒙古骑兵每人至少配备三匹马，可以进行长途奔袭。在作战时不拘一格，在遇到强劲的敌军骑兵时，善于以散兵阵诱敌，当敌军冲锋后迅速撤退，等敌军人困马疲，主力才出动交战。对于以步兵为主的敌军，采用标准的骑兵攻击战术，排五列横队，20骑一列，前两排为人马披甲、使用长矛和狼牙棒的重骑兵，后三排为使用弓箭、马刀的轻骑兵，重骑兵冲破步兵战阵后，轻骑兵射箭并砍杀敌军。同时蒙古军队也善于从敌方吸取作战武器和经验，比如在野战中使用炸弹，在攻城时使用大型抛石机等等，都是在和金、宋的战争中掌握的战术和技术。

明朝建立的军队以步兵为主体，但对于骑兵战术有相当的发展，主要是开始试图以火器装备骑兵，并探索其作战战术。明初给骑兵装备手铳，作战时可以施放手铳后再发起冲锋。明末戚继光在蓟镇编练新式骑兵，编制为五骑为伍，二伍为队，三队为宗，三宗为局，三局为司，三司为部，三部为营，五营为军。营为基本编制，3000骑左右，配备有鸟枪、快枪各300杆左右，手铳和虎蹲炮等共有200支（门）左右，和当时的步兵一样，火器兵也要接近三分之一。其设计的骑兵战术与步兵战术相仿，以队为作战单元，排列鸳鸯阵。作战时和步兵配合，在阵前放置拒马以及虎蹲炮，在敌军进到百步开外时骑兵上马，敌军进到百步内，枪铳听号令分两轮开火，然后施放火箭，放虎蹲炮，再一齐射箭。敌军进到30步内，先由步兵上前格斗，骑兵放置好火器，各持短兵（由前至后分别为镋钯、刀、棍、大棒、长刀）以鸳鸯阵排列，听号令在步兵格斗相持时出阵与敌军格斗，在第一、二次信号（擂鼓、天鹅号）要保持队形，至第三次信号，全部“拥为一列混战”。听鸣金后收队，各回本伍本队，每三队为并列纵队回本阵。这样的战法似乎全然不考虑发挥骑兵的机动性，全然是关在步

兵战阵内作战。以后孙承宗的车营方阵也依然是将骑兵平均部署在车辆战队之后，并不将骑兵当作突击力量使用。因此这种探索虽然有益，但并没有能够带来革命性的变革。

满清在关外兴起也是依靠骑兵。八旗骑兵的主要战术与金、元各朝相差不多，仍然主要依靠散兵射箭与近距离格斗，只是在和明朝的战争中掌握了火炮技术，得以在野战和攻坚战中使用，但是并没有发展明末以火器装备骑兵的趋势。在入关以后，八旗骑兵战术即停止发展，甚至有所倒退，战斗力也日益下降。传统的骑兵战术至此衰亡。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中国古代高度重视军事后勤问题，《孙子兵法》中指出："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而古代主要的军事后勤问题就是粮食问题，后世因此归结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孙子兵法》也指出战争会耗费大量的财富，"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出动2000乘战车、10万人的军队，每天所需的费用就要高达"千金"。因此《孙子兵法》提出发动战争要极其慎重，尽可能速战速决，"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只征发一次兵役，消耗的粮食不超过三年积蓄，是发动战争最理想的情况。

由于粮食是消耗性的大宗物资，通过陆路运输的耗费极大，"国之贫于师者远输"，兴兵打仗造成国家穷困的直接原因不是战争本身，而是运输费用，因此《孙子兵法》提出"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一般的军事器材可以依靠国内提供，而军粮最好是从占领地区掠取。"智将务食于敌"，在占领区获得一钟（古代粮食量器）粮食相当于本国的20钟，获得一石喂马的禾草相当于本国的20石。这一原则实际上很早就在战争中得到了体现。春秋初期，郑国与东周朝廷发生冲突，公元前722年郑庄公派出军队到东周军事示威，就"取温（今河南温县）之麦"，又取"成周（今洛阳东）之禾"。以后各国混战中有很多割取敌国农田庄稼为本军军粮的记载。

更简单的做法是掠夺战区当地居民的粮食来实现"以战养战"。这是后来很多军阀以及铤而走险的"盗贼"使用的补给方式，也是很多游牧民族开始侵入中原地区后的主要补给方式。契丹骑兵集中打仗，分散"打草食"；蒙古军队长途奔袭时，军食或者依靠移动的畜群，或者就靠在战地抢掠。这种补给方式最大问题是难以持久，不仅要激起强烈的反抗，而且即使能够镇压反抗，也会造成人民普遍逃亡，土地荒芜，再没有什么可抢的时候，军队就陷入困境。比如东汉末年的大混战中，各大军阀都是靠劫掠养兵，袁绍的军队在抢光了粮食后曾经靠摘桑葚为食，袁术的军队只好下河摸鱼虾、捞蛤蜊，而曹操甚至将死人肉夹杂在军粮里发放。因此，靠这种方式补给的军队往往都需要流动作战，除了战略考虑外，也要考虑去新的地区解决后勤供应问题。

有头脑的统治者都反对这种依靠劫掠的"以战养战"。一般采用的办法是

在新占领的地区建立起赋税制度，有节制的、分期分批地向当地居民索取粮食。这需要有较为稳固的军事占领才可以做到，而且也需要有文官的协助。这一点做得最成功的是战国时期的秦国，每占领一个地方立即就开始编制户籍，征发徭役和粮食，使秦国的战争机器可以不间断地运转。刘邦进占咸阳灭亡秦朝时，萧何进入宫殿第一件事就是保护全国户籍资料，后来又将这批资料带到汉中。楚汉大战时，萧何坐镇汉中、关中地区，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粮食和壮丁，使刘邦军队能够屡败屡战。反观项羽每到一地都是纵兵烧杀抢掠，不仅失去民心，也得不到可靠的后勤支援，打了败仗后连个喘口气的根据地也没有。蒙古刚开始进攻金朝时，完全依靠劫掠养兵，占领黄河流域后，打算将当地百姓赶走，大片土地改为牧场。耶律楚材建议实行赋税制度，所得可比放牧多得多，果然打动蒙古大汗，放手让耶律楚材建立赋税制度，使黄河流域社会经济得以从长期战争破坏中慢慢恢复，也使蒙古军在大军西征的情况下仅靠木华黎一支偏师就得以维持对南宋的压力。

还有一种办法是《孙子兵法》完全未曾想到的，就是让士兵也种地，军队自己养活自己。最早大规模推行这种办法的是汉武帝。为了维持在漫长的长城边防线的驻军，汉武帝推行“屯田”，将边防线的可耕地划为国有，发放给士兵耕种，并将罪犯之类的社会闲散人员发往边疆，充当耕种屯田的劳力。以后曹操为了解决军粮问题，也大规模地在内地推行屯田。当时中原地区饱经战乱，土地荒芜，192 年曹操推行“屯田制”，将全部荒地划为国有地，强迫一部分士兵以及招募的农民固定在政府分配的荒地上进行屯田，收成“六四开”，60% 归朝廷，40% 归“屯田客”。军屯的士兵仍为士籍，每五里设营，约 60 人为营，“且耕且守”。这是曹操最终得以战胜众多其他军阀统一北方的重要因素。以后蜀汉、东吴也都仿照这一制度，以屯田养兵。诸葛亮在“六出祁山”战役中痛感军粮运输困难，最后决心在前线屯田，不过这一地区土地瘠薄，屯田没有取得很大成效。以后北周、隋、唐的府兵制，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解决军队的供给问题，府兵各单位相当分散，得以“寓兵于农”，解决军队的供养问题。以后的明太祖朱元璋自称：“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也规定在边防地区的驻军 70% 的军户屯种，30% 守城；在内地的驻军 80% 屯种，20% 守城。将大批国有荒地划拨军户为屯田，每户军户分配 15 ~ 50 亩，并分配一定的耕牛、种子、农具，要军户耕种，除供给自己的军粮外每年还要上缴 12 石。

国家平时要为战时积蓄粮食，为出动军队提供后勤保障，这在战国时代已经形成严密制度。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律中，有专门的“仓律”，集中了很多关于国家粮食仓库保管、储运制度方面的条文。以后各代都有类似的制度。西汉“文景之治”时期，长期保持和平局面，休养生息，太仓里的粮食因保存时间太长而“红腐不可食”。隋朝统一全国后，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各地粮仓丰盈，著名的如京城的太仓、洛阳的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等，据说储藏的粮食有数百万石到上千万石不等，可以供军队使用几十年。后来在隋末战争中凡是占领这

些粮仓的武装力量都维持了较长的时间。元末战乱，朱元璋听从朱升的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在江南地区建立起牢固的战略根据地，终于得以歼灭群雄。

正如《孙子兵法》早就指出的，战时运输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当战区是非农业地区或者难以实行“以战养战”时，就必须要依靠后方长途运输粮食。汉武帝时连年出动大军进攻匈奴、西南夷，军粮全凭内地长途运输，“千里负担馈饷，率十余钟致一石”，结果造成严重财政危机，据说“海内耗半”。隋文帝为征高丽，下令全国向辽西运粮，有的地方百姓将三石米装上车，结果一路上的口粮就用掉了车上的粮食，到了目的地连一斗都没剩下。宋朝长期在北方边界维持数十万大军，当地农民由于长期战争大多逃亡，没人种地来养活士兵，而宋朝的禁军又都是吃现成饭的，造成极其严重的后勤负担，所有的军用物资都必须从后方运输，而朝廷如果征发如此规模的劳役就有可能引发百姓的反抗。宋朝政府的对策也是前无古人的，这就是要求商人承担军事运输任务，将物资运到前线后，由军事部门接收后估价，发给“交引”，商人凭“交引”可以到指定地点提取朝廷专卖的商品：食盐、香料、茶叶等等。这称之为“入中法”。后来的明朝也曾经实行过同样的政策，改称“开中法”，商人运输粮食到“九边”，可以获得优先提取两淮官盐的特权。可是后来明朝盐政大坏，商人持有“盐引”却难以提到官盐，不得不重新向食盐生产商再付现金买盐，从此也就不再愿意承担运输任务。“九边”的供应日益艰难，严重影响到战斗力的维持。后来李自成起义军横扫边镇，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有力的抵抗。

历代负责军队供应的朝廷部门都属于文官系统，军事部门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后勤部门，这或许就是文官得以压武官一头的经济背景。秦国专门设立“治粟内史”，负责征收粮食实物税以及税收的分配。西汉时改为大司农，桑弘羊担任这个职务时，大力推行盐铁官营等财政措施，得以全力供应对匈奴的战争需要。隋唐以朝廷户部管理财政，供应军需也属于户部的职责。宋代更进一步，设置“三司使”负责财政，地位与宰相相等，号为“计相”。以后的朝代仍然以户部主管财政，并负责军队的供应。

出征的军队有自己的后勤部门，负责接收后方运输来的物资及其分配。在各个朝代，领兵将军组织的“幕府”里，都设置了专门的官员来主管此事。在很多情况下，当朝廷无法维持正常的军队供应时，只得给前线军队一些自筹军费的自主权。比如明朝中期沿海地区苦于倭寇骚扰，沿海设置海防府，部署很多军队，朝廷无法供给，到了后来不得不允许民间商人可以经营海外贸易，各地海防府可以向商人征税来养兵。这种税收主要用来支付兵饷，所以就叫做“饷税”。有领取出海许可证的“引税”，商船进港的“船钞”，货物进口税性质的“货饷”，以及进口白银的“加增饷”。这笔饷税就成为海防军费的主要来源。

给军队自筹军费政策最著名的事例是清末的“厘金”。1853年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威胁到清朝廷生命线——大运河。清朝在扬州设立江北大营，为了筹措军费，清朝左副都御史雷以諴建议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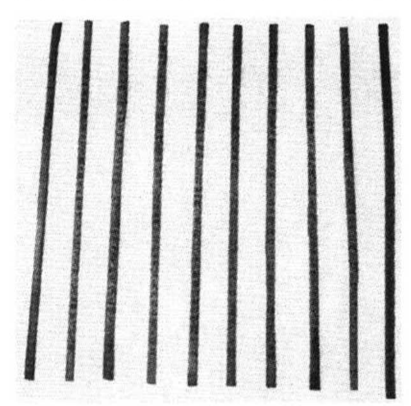
往来大运河的商人货物按价值征1%的"厘金捐"。这个政策很快被"就地筹饷"的湘军以及后来的淮军争取到手，凡这两支军队所到之处，都由幕府下的"粮台"筹划设置厘金局，在各交通要道口设卡，向过往的商人收厘金税。这是湘、淮军最重要的军费来源，曾国藩甚至称之为"养命之源"。厘金收入由湘、淮军将领控制，分配给士兵为兵饷，造成士兵和将领之间的私人关系。而军队自设厘金，又使军队得以脱离中央控制，成为地方割据的起因之一。

七、兵书通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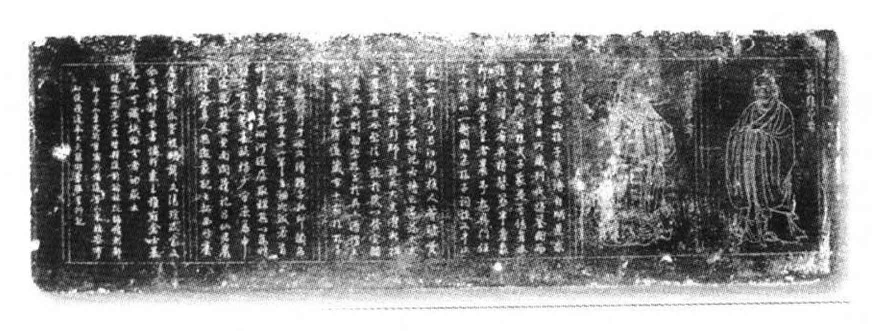
【《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孙武撰。孙武字长卿，春秋末年齐国人，生卒年月未见史载，约与孔丘同时期。他是陈国公子完的后裔，陈完因内乱逃奔齐国，并改姓陈为田。田完的五世孙、孙武的祖父田书因“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乐安（今山东惠民）”（《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后来，因齐国政局动荡不安，孙武由齐国到了吴国。经伍子胥引荐，以自著兵法十三篇晋见吴王阖庐，得到吴王的重用，任为将军，帮助吴王经国治军，“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史记·孙吴列传》）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简称《孙子》，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兵书，也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兵书，宋代朝廷颁定的“武经七书”之一。它系由孙武草创，后经其门弟子整理而成，约成书于春秋战国之交，原书十三篇。《孙子兵法》在战国末期和汉初已很流行，当时流行的就是“十三篇”文本，“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史记·孙吴列传》）到汉成帝时，任宏论次兵书，定著《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根据山东银雀山西汉墓发掘出的竹简《孙子兵法》和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西汉墓发掘出的木简《孙子兵法》佚文，以及流传至今的《史记·孙吴列传》，均有“十三篇”的记载，说明“十三篇”是《孙子兵法》的本文。“十三篇”之外的六十九篇和图九卷可能是后人附益的内容。东汉末年，曹操删去了附益的部分，专为“十三篇”作注，恢复了“十三篇”的本来面目，使“十三篇”得以完整地流传至今。其他六十九篇和图九卷先后佚失。但从银雀山汉墓竹简和上孙家寨汉墓木简的《孙子》佚文以及散见在史书、类书中的《孙子》佚文看，《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也确实存世过，任宏、班固的著录是有根据的。


《孙子兵法》竹简

今存《孙子兵法》约五千九百字，共十三篇：第一《计篇》，主要论述研究和谋划战争的重要性，通过战略运筹



"孙子"石碑

和主观指导能力的分析，以求得对战争胜负的预见，提出了"五事""七计"、"兵者，诡道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等军事原则；第二《作战篇》，主要讨论物力、财力、人力与战争的关系，提出了"兵贵胜，不贵久"的速胜思想和"因粮于敌"的原则；第三《谋攻篇》，主要论述"上兵伐谋"的"全胜"思想，揭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著名军事规律；第四《形篇》，主要论述战争必须具备客观物质力量即军事实力，中心讲"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第五《势篇》，主要论述在军事实力的基础上，如何正确实行作战指挥问题，通过灵活地变换战术和正确地使用兵力，造成锐不可当的有利态势；第六《虚实篇》，主要论述作战指挥中要"避实击虚"、"攻其必救"、"因敌而制胜"，中心讲用"示形"欺骗敌人，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第七《军争篇》，主要论述争取战场主动权的问题，提出了"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军事原则；第八《九变篇》，主要论述根据各种战场情况灵活运用军事原则的问题，提出了"必杂于利害"、"君命有所不受"的思想；第九《行军篇》，主要论述行军、宿营和作战的组织指挥及利用地形地物、侦察判断敌情的问题；第十《地形篇》，主要论述地形的种类与作战的关系及在不同地形条件下的行动原则，还提出了"视卒如爱子"的观点；第十一《九地篇》，主要论述九种不同作战地区及其用兵原则，提出了"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的突然袭击的作战思想；第十二《火攻篇》，主要论述火攻的种类、条件和实施方法。第十三《用间篇》，从战略的高度论述了使用间谍的重要性及其各种间谍的使用方法，提出先知敌情"不可取于鬼神"，"必取于人"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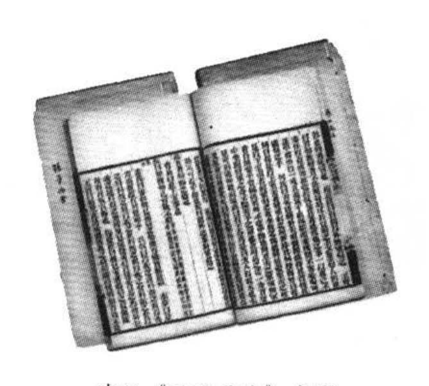
《孙子兵法》词约意丰，内容博大精深，揭示了战争的一些一般规律。在军事哲理方面，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它十分强调政治、经济在战争中的作用；贯穿于全书始终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思想，至今仍是科



不同版本的《孙子兵法》

学真理；它重视人事，反对天命，不信鬼神；它含有弱生于强、强生于弱的矛盾转化思想、“在利思害，在害思利”的辩证分析的思想、“兵无常势”的发展变化思想等。在战略战术方面，它重视战略谋划，反对轻易用兵，主张“慎战”、“全胜”，“不战而屈人之兵”；它把战略的内容归纳为“道、天、地、将、法”五个要素，并指出将帅只有深刻了解、确实掌握这五个战略要素，才能够打胜仗；它强调战术的灵活性，提出“兵无常势”，“践墨随敌以决战事”，“因敌而制胜”，要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作战对象等而采取不同的打法；要“致人而不致于人”等。在军队建设方面，非常重视和强调将帅的地位和作用，把具有“智、信、仁、勇、严”五个条件的将，看作是决定战争胜败的五个战略要素之一；主张文武兼施，刑赏并重，以法制原则治理军队等。当然，《孙子兵法》也存有糟粕，如在认识论、方法论方面，夹有某些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成分；在历史观方面过分夸大将帅的作用，提倡愚兵政策等，都是应该进行批判的。

《孙子兵法》在唐朝时传到日本，十八世纪传到了欧洲，相继出现了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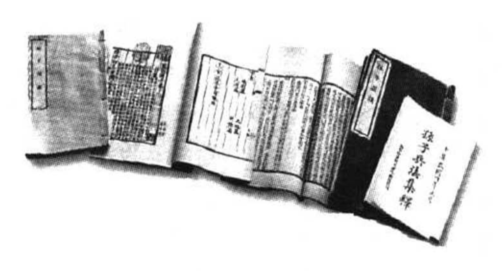
清版《孙子兵法》书影

英、德、俄等译本，目前世界各国大都有自己的译本。《孙子兵法》被推崇为“兵学圣典”、“东方兵学的鼻祖”、“武经的冠冕”，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孙子兵法》饮誉千年，传抄翻刻者历代不断，自曹操开注《孙子》先河之后，更是注家蜂起，产生了众多的版本，有抄本、印本、纸本、竹简本、白文本、注解本、单行本、丛书本、汉文本、少数民族文本（如满文本、西夏文本）等。据现存有关书目粗略统计，中国历代注解批校《孙子》者有二百一十家，各种版本近四百种。

现存最早的版本是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孙子兵法》，汉初抄本，惜为残简，经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整理，文物出版社 1975 年出版校注、注释本，1976 年出版释文本，战士出版社 1976 年翻印文物出版社 1976 年本。

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的《武经七书》本和南宋宁宗年间的《十一家注孙子》本。宋刊《武经七书》现藏日本静嘉堂。此本为白文本，版心有刻工姓名，书前钤宋“礼部图书”九叠篆朱文大长印，卷首钤“汪士钟印”，“郁松年印”，“泰峰”三印。国内通行的是 1935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采用中华学艺社借照静嘉堂藏本胶片影印出版的《续古逸丛书》本。宋刊《十一家注孙子》存世有三部，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足本和一部残本。足本书尾有承德堂牌记，钤“钟溪鉴赏”、“岳飞之章”、“戎马书生”、“周暹”、“高山流水”五印。残本仅存卷下一册，钤“槜李”、“项子京家珍藏”、“稽瑞楼”、“文瑞文勤两世手泽同和敬守”、“常熟翁同龢藏本”、



《孙子兵法》

“翁斌孙印”六印。上海图书馆藏本，卷首和卷尾钤“袁氏珍藏图书”、“袁堎”、“长安子孙”、“季振宜印”、“沧苇”、“昆山徐氏家藏”、“天禄继鉴”、“乾隆御览之宝”八印。其中上卷、中卷和《孙子本传》共缺25页，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据此本影印和排印，并用北京图书馆藏本补全。

现存最早的《孙子》单注本是影宋本《魏武帝注孙子》，在清孙星衍《平津馆丛书》卷一《孙吴司马法》之内。此本书中避讳至“慎”字，原本当是南宋孝宗刊本。原本今不得见，摹本出自顾广圻（字千里）之手，酷像原本。此本当是宋元丰年间编辑《武经七书》时所收录的曹注《孙子》。

现存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本是西夏文本。今存仅有102页。台湾《书目季刊》第15卷第2期载有此本影印件。

宋以后，《孙子》的版本很多，但大体上都是从《武经七书》本、《十一家注孙子》本和《魏武帝注孙子》这三种版本演化而来，其中尤以《武经七书》本为最多。

现代人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研究《孙子》的首推郭化若将军，其代表作是《孙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校勘用功最勤的是杨炳安《孙子会笺》（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以注解信达、准确见长的有军事科学院战理部《孙子兵法新注》（中华书局1977年版）。解说通俗而又深刻者有吴如嵩《孙子兵法浅说》（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

【《吴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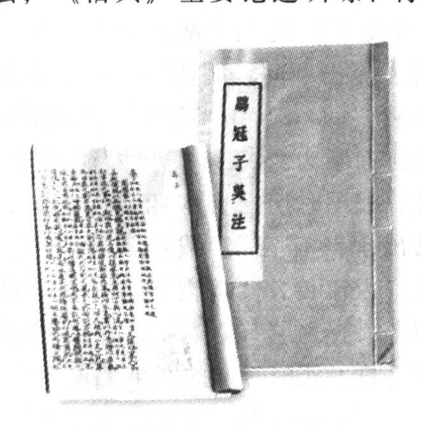
《吴子》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宋代颁定的“武经”之一。吴起撰。吴起，战国时卫国（今山东曹县北）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381年。吴起重名轻利，敢于改革，善于用兵，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和兵法家。他初拜曾参为师，勤于学业，后因母死不归，被曾参所逐，遂弃儒学武，研读兵法，被任为鲁将，大破齐国。继任魏将，“击秦，拔五城”（《史记·孙吴列传》），屡立战功，被魏文侯任为西河守，以拒秦、韩。文侯死，遭陷害，逃奔楚国，初为宛（今河南南阳）守，不久被任为令尹（楚国最高的官职，掌军政大权），辅佐楚悼王进行变法。“明法审令”、“要在强兵”，促进了楚国的富强，曾“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史记·孙吴列传》）楚悼王死，吴起遂被旧贵族杀害。

《吴子》成书于战国时期，宋以前没有人提出疑问，明清以后，学者以书中所载“四兽”和“笳笛”非战国时所有为由而断为西汉或六朝时人伪托之作。据考，战国时期已有“四兽”之说，军中已出现“笳笛”；战国末期《吴子》就已广为流传，“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篇》）。书中反映了战国时期的军事特点。所以，《吴子》不是伪书，当是经后人整理的吴起军事思想的纪录，约成书于战国中

期以前。

《吴子》，《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吴起》四十八篇，《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作《吴起兵法》一卷，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为三卷，并称唐陆希声类次为之，凡说国、料敌、治兵、论将、变化、励士六篇。《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经籍考》均作三卷。今存本有的并为一卷、二卷，也有的分为三卷、六卷，但除“变化”作“应变”外，篇目与《读书志》著录的完全相同。可见自《隋书·经籍志》以下各书著录的一卷本和三卷本《吴子》即今存《吴子》。然只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四十八篇的一部分。

今本《吴子》约五千字，共六篇：《图国》主要围绕“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战略主张，论述经国治军“必须先教百姓、亲万民”，修德行仁，明耻教战，任贤使能，“简募良材，以备不虞”，并对战争的起因和种类进行了初步探讨；《料敌》主要从战略的高度分析敌方的优劣短长，论述了侦察敌情的要领及对不同情况下的不同敌手的作战方法；《治兵》主要论述训练、行军、宿营及保养军马的原则和方法，提出了“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等著名观点；《论将》主要论述将帅在治国统军中的重要性和应具备的条件，以及观察分析敌情优劣的要领。《应变》主要讲随机应变的战术思想，论述了遭遇强敌、敌众我寡、敌拒险坚守等情况下的应急方法和谷战、水战、车战、攻城战等作战要领；《励士》主要论述奖有功激无功，鼓舞部队士气。



《歇冠子吴注》书影

《吴子》是“武经七书”之一，向与《孙子》（孙武兵法）并称，军事思想颇为丰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1）“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战略思想，他强调首先搞好国内政治，“教百姓，亲万民”，修德行仁，达到国家和军队内部的协调统一，才可对外用兵；同时又强调必须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要“简募良材，以备不虞”，“先戒为宝”。（2）随机应变的战术思想。《吴子》十分重视战争中各种事物的差别和变化，强调要侦察了解敌方军队素质、将帅特点、所占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掌握战场的变化，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法。并总结出了在何种情况下“击之勿疑”、“急击勿疑”，在何种情况下“避之勿疑”等带有规律性的战术原则。（3）“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的治军思想。他认为军队能否打胜仗，不完全取决于数量上的优势，重要的是依靠军队的质量。兵“不在乎众”，“以治为胜”。要求把军队训练成“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的军队，要发挥士卒各自的特点，使其“乐战”、“善战”、“乐死”。要求将帅要有优良品德和深邃的谋略，

具备“理、备、果、戒、约”五个条件，懂得用兵“四机”。强调“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以励士兵。(4)朴素的军事哲学思想。吴子对战争的实质有了朴素的认识，他把战争发生的原因归纳为五条：“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并认为战争具有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质。他朴素地认识到战争事物具有两重性，他在对各国的政治、经济、民情和军队分析时，既看到了他们的长处、强处，又看到了他们的短处、弱处。他认识到了战争事物的发展变化，尤其是认识到事物会向其反面转化，认为打胜仗越多就会孕育着未来的灾祸，“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

《吴子》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兵法》，总结了战国初期的实战经验，反映了战国时期的战争规律和特点，具有重要的军事史料价值和军事学术价值。

《吴子》和《孙子》一样受到历代中外军事家、政治家的重视。唐初魏徵曾将其内容收入《群书治要》，供治国安邦参考。与《孙子》一起在唐代被吉备真备带到日本，自此，《吴子》在日本传播开来，据笔者所知，日本研究《吴子》的有66家之多。1772年又被法国一位神父P·阿米奥翻译成法文，传到欧洲。现在有日、英、法、俄等多种译本流传。被西方人士称为“箴言”和“无价的真理”，如美国海军上校柏特逊说：“在遥远的中国，有两位将军，他们所有关于战争的议论，都可以凝集在一本小册子里，不像克劳塞维茨那样写了九大巨册，自足地写下了数量有限的箴言。每则箴言都具体表现了他们关于



吴起像

战争行为的信条和重要教义。这两位军事主宰者——孙子和吴子，他们无价的真理，已经长存了两千年。”（《中国古代兵书杂谈》15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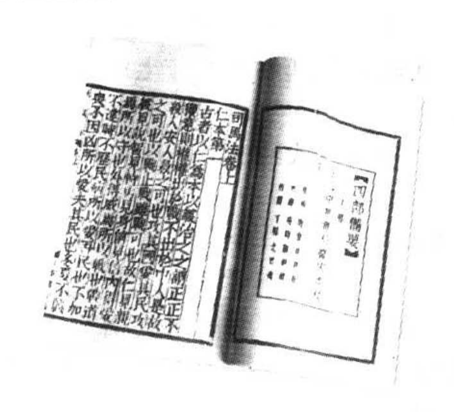
《吴子》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刻《武经七书》本。后世众多版本大都源于此本，并多以丛书本行世，除了宋刻、影宋刻、影宋抄、明刻、清刻《武经七书》本之外，比较重要的还有明吴勉学刊《二十子》本、明翁氏刊《武学经传三种》本、清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本、清乾隆《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等。重要的注释本有宋施子美《施氏七书讲义》本、明刘寅《武经直解》本、清朱墉《武经七书汇解》本等。建国后研究《吴子》的不多，比较重要的有197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注释本、1986年解放军出版社《吴子浅说》本和《武经七书注释》本等。

【《司马法》】

《司马法》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旧题司马穰苴撰。司马穰苴，其先人陈公子完奔齐，改姓田氏，因其任大司马之职故称司马穰苴。

生卒年不详。《史记》称其为齐景公时人，《竹书纪年》载为齐威王时人，而《战国策》又说是齐湣王时人。本文以《史记》为据。穰苴为春秋末期齐国人，精通兵法，齐相国晏婴以他“文能附众，武能威敌”（《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推荐他于齐景公，“景公召穰苴，与语兵事，大说之，以为将军。”（《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他严于治军，执法不避权贵。率兵攻打晋燕，将出征违纪的景公宠臣监军庄贾斩首示众，全军震恐，争相赴战，晋、燕军闻讯而逃，收复了失地，其名声大震。后受谗被景公解职，发病而死。然其用兵之法为田氏后世所承继，“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史记·司马穰苴列传》）

《司马法》自《隋书·经籍志》始著录为司马穰苴撰。然而，根据《史记》记载，“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史记·司马穰苴列传》）可知《司马法》应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齐国大夫们追论的古者《司马兵法》，二是穰苴的兵法，三是汇集者的观点。



古代兵书《司马法》

关于《司马法》的真伪。宋代之前对于其为先秦古籍没有疑问。到了辨伪蔚然成风的清代，姚际恒、龚自珍等以今本《司马法》所存篇卷无多，辞义浅近等为由，断定司马迁所言《司马兵法》已佚，今本《司马法》“为后人伪造无疑”（《古今伪书考》）。但据考证，今本《司马法》保存许多古兵法，如“古者……成列而鼓”（《仁本》），“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仁本》），“古者逐奔不远，纵绥不及，不远则难诱”（《天子之义》）等，符合司马迁所讲“追论古者《司马兵法》”。另外，《史记》、《左传·贾逵注》、《吕氏春秋·高诱注》、《汉书》、《周礼·郑玄注》等两汉著作引用的《司马法》文句，多见于今本《司马法》。至于一些古籍引用的《司马法》文句不见于今本者，属于《司马法》的佚文，这是古籍流传过程中的一种正常现象，不独《司马法》如此。所以，我们说今本《司马法》不是伪书，而是一部先秦古籍。

肯定了《司马法》是一部先秦古籍，并未解决它的具体成书年代。若据《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司马穰苴撰而断为春秋末期成书，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史记》中说得很清楚，“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代《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史记·司马穰苴列传》）因此说，它当成书于齐威王时期。周显王十一年（齐桓公十七年，公元前 358 年）齐桓公卒，齐威王立。周显王十三年（公元前 356 年）改元齐威王因齐元年。《史记·六国年表》将因齐元年误记为周安王二十四年（公元前 378 年），有人据此断定《司马法》约成书于公元前 370 年，显

然也是错误的。《史记》载，威王初即位以来，九年不亲政，致使国人不治。九年之后开始亲政，“遂起兵西击赵、卫，败魏于浊泽而围惠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这说明威王大举兴兵之前命大臣们汇集研究过穰苴兵法，否则便不可能于“用兵行威”之际，“大放穰苴之法”。齐败魏是在齐威王十六年（公元前341年）。由此推断，《司马法》当成书于威王亲政的公元前348年至公元前341年之间。

《司马法》又称《司马穰苴兵法》、《军礼司马法》、《古司马兵法》等。刘向《七略》将《司马法》入于兵书类，班固编《汉书·艺文志》时将其出“兵书类”而入“礼类”，并称《军礼司马法》，共一百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称《司马法》三卷，不分篇；《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等书目均同《隋书·经籍志》。而宋邢昺《论语疏》则称《司马法》一百五十篇，疑为一百五十五篇之误。《直斋书录解题》又著录为一卷。今传世本有的作三卷，如《宋刊武经七书》本、《四部丛刊》本等；有的作一卷，如《四库全书》本、《百子全书》本等；还有的作五卷，如《施氏七书讲义》本。但不管分为几卷，其内容都是五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世所行本，以篇页无多，并为一卷，今亦从之。”说明一卷是由三卷合并而成的。汉代本共一百五十五篇，今本仅有五篇，说明大部分都已散佚。清代人辑有《司马法逸文》一卷，其中有些内容不见于今本。

《司马法》的篇目和主要内容：《仁本第一》，主要论述战争的性质、目的、起因和对战争的态度，以及发动战争的时机，追述了古代的一些战法；《天子之义第二》，阐述君臣之礼，治国、教民和治军的不同方法，记述了古代的一些作战形式、兵器配置、战车编组、旗语徽章、赏罚制度等；《定爵第三》，主要讲战争的准备、战场指挥、布阵原则、侦察敌情、战时法规等问题；《严位第四》，主要阐述战略战术和将帅指挥，以及胜利后注意事项等；《用众第五》仍是讲战略战术及战场指挥等。

《司马法》包含有春秋以前的已经落后的军事原则，如“成列而鼓”等。但是它更为丰富的是根据春秋末期和战国初的战争实践经验而提出的进步军事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 “相为轻重”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就像《孙子》将许多军事问题概括为“奇正”一样，《司马法》将战争中的诸多因素抽象为“轻、重”这样两个对立统一的因素。它认为，“凡战，以轻行轻则危，以重行重则无功；以轻行重则败，以重行轻则战。故战，相为轻重。”（《严位第四》）这就是说他主张“以重行轻”，轻、重相辅而成。它把统帅的战术指挥称为轻，战略指挥称为重，认为“上烦轻，上暇重”，主张轻重相节，不可偏废。它认为轻、重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指出“马车坚，甲兵利，轻乃重”（《严位第四》）。它的“轻、重”说运用广泛，有时运用于指挥号令，如“奏鼓轻，舒鼓重”（《严位第四》）；有时运用于装备兵器，如“甲以重固，兵以轻胜”（《严位第四》）等。“轻、重”说的另一层含意即是“杂”，通过“杂”来扬长避短，取长补短，谋

取优势。它指出："行惟疏，战惟密，兵惟杂。"（《定爵第三》）"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重则钝，钝则不济。"（《天子之义第二》）

2. "以战止战"的战争观。《司马法》的作者通过对春秋以来频繁战争的洞察，认识到要消除这种混战的状态，非用战争不可。所以他极力支持正义战争。他所谓的正义就是指的"安人"、"爱民"，如指出："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仁本第一》）"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他所说的"爱民"虽有一定的虚伪性，但这在当时却是具有重要进步意义的。另外，他还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重要思想。

3. 以仁义为本的治军思想。《司马法》的"仁义"思想贯彻全书的始终。对民施仁，就是吊民伐罪，不误农时；对部下施仁，则是关心爱护，"见危难勿忘其众"（《定爵第三》），"胜则与众分善"，"若使不胜，取过在己"（《严位第四》），对于攻取之国，规定"无暴神祇，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仁本第一》）《司马法》把"仁"作为战争的最高目标，指出"以礼为固，以仁为胜。"（《天子之义第二》）

上述三条不能全面概括《司马法》的军事思想，除此之外，还有些具有进步意义的军事思想，如"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难进易退"（《天子之义第二》），"三军一人胜"（《严位第四》），"赏不逾时"，"罚不迁列"（《天子之义第二》），"教惟豫，战惟节"（《定爵》）等等，此不一一详细介绍。

《司马法》在历史上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汉代司马迁称其"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意，如其文也。"（《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汉武帝"置尚武之官，以《司马法》选位，秩比博士"（荀悦《申鉴·时事篇》）。唐李靖说："今世所传兵家者流，又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李卫公问对》卷上）宋代元丰年间被官定为"武经"，成为培养和选拔军事人才的军事教科书。明清以来出现了众多的注释本。《司马法》在国外流传也较广泛。早在1600年日本就出现了研究《司马法》的专著《校定训点司马法》和《司马法评判》，之后相继有三十余部专著问世。1772年它又被译成法文，被收入《中国军事艺术》，在巴黎出版发行。

《司马法》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它关于三代的军赋、军法等军制资料被许多史家和兵家所征引；它的许多关于战争的锦言妙语广为传播而成为军事名言。但需要指出的是，《司马法》由于包含着追论的古代兵法，许多原则早在春秋战国时已经成为陈旧过时的东西，在当时不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今天我们阅读《司马法》时更需要鉴别批判。

《司马法》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刻《武经七书》本。《武经七书》系统版本最多，流传最广。

除了《武经七书》系统诸多版本以外，还有《武学经传三种》本、《平津馆丛书》本、《四库全书》本、《述记》本、《四部备要》本等丛书本。另外，清代钱熙祚、张澍辑有《司马法佚文》一卷，分别收录在《指海》、《二酉堂丛书》中。另外，清黄以周辑有《军礼司马法考证》二卷附《司马法逸文》，清王仁俊也辑有《司马法逸文》一卷，收录在稿本《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和《经籍佚文》中。

【《孙膑兵法》】

孙膑撰。孙膑，战国时齐国阿、鄄之间（今山东阳谷东南）人，孙武的后世子孙。孙武死后百余年生孙膑，生卒年不可详考，约与商鞅、孟轲同时期。他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和兵法家。“尝与庞涓俱学兵法。”（《史记·孙吴列传》）孙膑聪慧好学，深得先祖孙武兵法真传。故遭到做了魏国将军的庞涓的嫉妒，被骗至魏国残遭陷害，“断其两足而黥之”（《史记·孙吴列传》），成为“刑残之人”。后逃回齐国，经田忌推荐，受到齐威王的重用，被任为军师。他帮助齐国打胜了著名的桂陵和马陵之战，“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史记·孙吴列传》）之后，不知所终。

《孙膑兵法》又称《齐孙子》。《史记》称“世传其兵法”，“孙子膑脚，而论兵法”。《汉书·艺文志》著录有“《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汉书·陈汤传》引有《孙膑兵法》的“客倍而主人半，然后敌”，说明西汉时《孙膑兵法》尚在流行。但因历史上的种种原因，东汉以后便失传了。引起以后的种种猜测。有的说孙膑即孙武，有的说《孙膑兵法》即《孙子兵法》，总之是否定两个孙子和两部兵法的同时存在，否定《汉志》著录的“《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1972 年，《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及其他先秦兵书同时从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前期墓葬中被发现，解决了历史上这一悬案。



《孙膑兵法·擒庞涓》西汉竹简

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孙膑兵法》，由于年代久远和发掘上的原因，已经残缺不全，不能见其全豹。经过专家们的精心整理，共得残简 364 枚，11000 余字，30 篇，编为上下两编，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据有的残简记载一篇字数多达 787 字（如《十阵》），有的篇目仅存一字（如《起师》只存一个“王”字）推测，原书字数当不少于 3 万，篇数也不止 30 篇。

整理后的竹简《孙膑兵法》，上编记孙膑事，或称“孙子曰”，“威王问”、“田忌问”，且文体、风格与《孙子》不相类，当属《孙膑兵法》没有异议。下编各篇没有提到孙子，整理者据内容和文体定为孙膑兵法。学术界有人提出下编似非孙膑之书。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重新编订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膑兵法》1985 年版也将下编

全部移出，不再视为孙膑的著作。上编十五篇的文字也有不少变动，并增加《五教法》一篇。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将下编各篇全部移入第二辑《佚书丛残》中，并在1985年版《银雀山汉墓竹简（壹）》编辑说明中指出："这样处理也并不排斥其中有一些仍是孙膑书的可能性。"将上下两篇对照比较，从军事思想上看，除有些篇章确不像孙膑书外，有些篇章与上编却颇为一致，只不过下编对有些问题阐述得更加详细具体，很可能是孙膑的后学对孙膑兵法的阐释之作。竹简《孙膑兵法》各篇体裁不尽相同，有记叙体、问答体，也有论文体。由此可见，《孙膑兵法》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而是由孙膑草创，经过其门弟子不断增编而成的。

为便于读者了解上下编的情况，现将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孙膑兵法》残简的篇目和主要内容概述如下：

上编：(1)《擒庞涓》，记述孙膑在"围魏救赵"之战中，用避实击虚，"攻其必救"等战法，于桂陵大破魏军，俘获庞涓的事迹；阐述孙膑战略战术思想。(2)《见威王》，记孙膑初见齐威王时，陈述自己对战争的看法。(3)《威王问》，记孙膑与齐威王、田忌关于用兵问题的问答，讨论了在敌我兵力对比不同情况下的用兵原则和方法，提出兵之急为"必攻不守"。(4)《陈忌问垒》，记田忌与孙膑的问答，主要追述马陵之战的战略战术部署。(5)《篡卒》，即《选卒》，主要讨论关系战争胜负的有关重要因素。(6)《月战》，讨论日、月、星辰与战争胜败的关系，强调"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7)《八阵》，提出了选将的条件，论述用"八阵"作战的原则和方法。(8)《地葆》，从军事上论述各种地形的优劣。(9)《势备》，用形象的比喻，说明阵、势、变、权四者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10)《兵情》，说明卒、将、主在战争中各有各的作用，缺一不能致胜。(11)《行篡》，论述怎样使士卒和民众在战争中尽力。(12)《杀士》，仅残存两简，意为信赏必罚，激励士卒拼死作战。(13)《延气》，论述激励士气、鼓舞斗志的重要性。(14)《官一》，主要论述各种军事措施及阵法的作用或适用的场合。(15)《强兵》，记述齐威王与孙膑之间关于富国强兵的问答。



孙膑像

下编：(16)《十阵》，论述十种阵法的特点、作用和布列方法。(17)《十问》，讨论敌我双方兵力对比的各种不同情况及如何实施不同的作战方法。(18)《略甲》，简文残缺严重，看不出主要内容。(19)《客主人分》，论述兵多、粮足、武器精良不足恃，只有掌握了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即"知道"，才能保证取得战争的胜利。(20)《善者》，主要说明善战者在作战时能使自己处于主动而陷敌于被动。

(21)《五名五恭》，论述用不同的战法对付不同的敌军和军队进入敌方境内时，“恭”、“暴”两种手段要交替使用。(22)《兵失》，分析作战失利的各种因素，变不利为有利。(23)《将义》，提出将帅要具备义、仁、德、信等品质。(24)《将德》，论述将帅要具有爱兵、敬兵、秉公及时赏罚等品德。(25)《将败》，列举将帅品质上导致战争失败的二十种缺点。(26)《将失》，列举分析了造成将帅作战失利的三十二种情况。(27)《雄牝城》，论述攻城的难易及其在地形上的特点。(28)《五度九夺》，论述如何避免作战时的不利条件，争取有利条件。(29)《积疏》，主要论述积疏、盈虚、众寡等矛盾的辩证关系。(30)《奇正》，阐述奇正的相互关系和变化，以及如何运用奇正的原则来致胜。

新增加的《五教法》主要论述训练问题。

《孙膑兵法》在军事理论方面有很高的成就，它继承《孙子》、《吴子》等兵家思想并有新的发展，包含有丰富的军事思想。主要是：(1)“战胜而强立”和“乐兵者亡”的战争观。孙膑认识到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战争的胜负关系国家的存亡，是不可不认真研究的。用“积仁义、式礼乐，重衣裳，以禁争夺”是不可能办到的，只有“举兵绳之”，“战胜而强立”，才能达到国家统一。但反对“乐兵”好战，提出“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2)在战略上提出“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的思想。孙膑吸收前人“弱之胜强”的理论，总结了以往小国打败大国，弱军战胜强军的历史经验，指出寡可以胜众，弱可以胜强。认为弱能变强，强能变弱，寡能变众，众能变寡，关键是要“善翦断之”，“能分人之兵，能按人之兵，则锱（铢）而有余。”反之“则数倍而不足。”(3)“批亢捣虚”，“必攻不守”的战术思想。孙膑认为，“赏、罚、权、势、谋、诈”都是战斗以前的谋划，都“可以益胜”，但不是作战时最关紧要的，最关紧要的是“必攻不守”，就是“批亢捣虚”，避实击虚，“攻其无备，出其不意”。(4)赏罚严明和“篡贤取良”的治军思想。孙膑非常重视赏罚在治军中的作用，指出：“赏者，所以喜众，令士忘死也。罚者，所以正乱，令民畏上也。”“不信于赏，百姓弗德，不敢去不善，百姓弗畏。”他非常重视将帅的选拔，提出要“选贤取良”，最高标准是要“知道”，“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即要掌握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5)在军事哲理方面，对形名问题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并把它运用到解释战争上来；提出了许多战争中的矛盾对立概念，如积疏、盈虚、众寡等等，并朴素地认识到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关系；看到了事物的两重性，“善战者，见敌之所长，则知其所短，见敌之所不足，则知其所有余。”

《孙膑兵法》的出土和整理出版，不仅解决了历史上是否有两个孙子和两部兵书存世的悬案，而且增添了新的更为可信的古代军事资料，补充了史书对马陵、桂陵之战记载之不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孙膑兵法》被发现以后，经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整理，并加注释，

由文物出版社于1975年出版线装本和平装本，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先后出版研究专著十余部，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在注释方面，以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中华书局1984年版）和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重新编订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膑兵法》（文物出版社1985年9月版）为代表。它们对1975年竹简整理本进行了订正和补充，注释最为详悉。重新编订本还对内容作了重大调整，不仅将原来的下编全部移出，而且上编内容也有不少补充，新增《五教法》一篇，全书共16篇，不再分上下编。在军事思想研究方面，以詹立波《〈孙膑兵法〉初探》（见文物出版社1975年2月版《孙膑兵法·代前言》）、霍印章《孙膑兵法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版）和陈济康、邓泽宗《略谈〈孙膑兵法〉对〈孙子兵法〉的发展》（载《争鸣》1987年3期）为代表，詹文第一次全面论述了孙膑的军事思想；霍著则首次以上编15篇立论探讨孙膑的军事思想；陈、邓文阐述了《孙膑兵法》对《孙子》的发展。

【《尉缭子》】

《尉缭子》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宋代颁定的“武经”之一。尉缭撰。尉缭其人史书记载非常简略，《汉书·艺文志》杂家类《尉缭》下著录为“六国时”人，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称“缭为商君学”。《隋书·经籍志》始著录为“梁惠王时人”，以后各家书目大多沿袭上述说法，但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未详何人书”，宋施子美《七书讲义》则说是“齐人”，明茅元仪《武备志》又说是“魏人”、“鬼谷高弟”，归有光在《诸子汇函》中还说“尉缭，司马错也”。施、茅、归距战国甚远，实属臆测。因《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一个“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有人“以为秦国尉”的尉缭。因此，《尉缭子》一书的作者，究竟是见梁惠王的尉缭，还是做秦国尉的尉缭？引起后人的争论，至今尚无定论。但从全书人称、语气和内容上考察，开头就是“梁惠王问尉缭子曰”、“尉缭子对曰”，并不断有“听臣言”、“听臣之术”、“臣闻”、“臣以为”等语，又称魏为“吾”、“我”，内容反映了梁惠王时的情况。魏国吴起被谗奔楚，魏军力削弱，兵败迁都大梁，欲于衰落中中兴，“以武事成功”，且多次提到吴起，予以赞美，两次提到“吴起与秦战”。据此，似定为梁惠王时尉缭较合情理。近有学者考证，提出与梁惠王答对的尉缭，正是由大梁入秦的那个尉缭。

《汉书·艺文志》杂家著录有“《尉缭》二十九篇”，兵形势家著录有“《尉缭》三十一篇”。《隋书·经籍志》及《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只有杂家《尉缭子》五卷，兵家不见著录。自北宋景祐年间编纂的《崇文总目》始，复见兵家《尉缭子》五卷，宋神宗时并与《孙子》等一起被颁定为“武经”，而杂家不再见著录。今传世本即“武经”本。对于杂家、兵家、今传世本《尉缭子》之间的关系后人也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杂家和兵家《尉缭》本是一部书；有的认为是内容不同的两部书；有的认为今本《尉缭子》是原兵家书，杂家书亡；有的认为是原杂



《尉缭子直解》书影

家书，兵家书亡；还有的认为是两部古代残书的合编本。从现有资料分析，《汉志》著录的杂家《尉缭》和兵家《尉缭》，由于《七略》中的两书提要被班固删掉而失传，究竟是内容基本相同或根本不同的两部书，还是同一书的重复著录，难以确断。但从以下情况看，《七略》的著录体例，多有同一个人的著作交叉著录现象，如被班固认为是重复著录而省掉的《伊尹》、《太公》等十家、二百七十一篇即是；唐魏征撰《隋书》将《尉缭子》入杂家，兵家不人，而他同一时期撰《群书治要》时辑录的《尉缭子》，与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尉缭子》残简相应的文字大多类同，与武经本（即今传世本）的相应篇目也基本相同，这说明杂家和兵家《尉缭子》很可能是同一部书，只是因为兼有兵家和杂家的思想内容而归类不同罢了。

关于《尉缭子》的成书时间，自南宋陈振孙提出《尉缭子》疑非先秦兵书后，明清以后出现伪书说。1972 年《尉缭子》残简在银雀山西汉前期墓葬中出土，内容与今传世本大致相同，不仅均不避汉初几个皇帝“邦”（高祖刘邦）、“盈”（惠帝刘盈）、“恒”（文帝刘恒）、“启”（景帝刘启）、“彻”（武帝刘彻）的名讳，而且书写字体隶书中带有明显的篆书风格，这说明抄写年代应在秦汉之际，成书年代当更早，似由战国时人整理写定，伪书之说不攻自破。

《尉缭子》自汉以后，历代均有著录，然卷、篇数不等，有五卷、六卷之分，三十一、二十九、二十四、三十二篇之别，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流传中有佚失，二是分篇不同，如武经本将《兵令》和《兵教》分别分为上、下篇。今传世本共二十四篇，其篇目和主要内容是：《天官第一》，主要论述战争中“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道理，批驳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兵谈第二》，主要论述立邑、土地、人口、粮食与固国胜敌的相互关系，说明“战胜于外，备主于内”，“兵胜于朝廷”的道理，提出了治国治兵的一些方法和对将帅的要求等；《制谈第三》，主要论述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与战争胜负的关系，提出“凡兵，制必先定”，“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等治军、治国方法；《战威第四》着重论述高昂的士气对于取得战争胜利的重大作用，激励部队士气的方法；《攻权第五》，着重论述进攻的战略战术，强调战前要有充分的思想、组织准备，要善于选择敌人的弱点发起进攻；《守权第六》，主要论述防守中的守城法则；《十二陵第七》，总结了治军的正反十二条经验；《武议第八》，内容很丰富，论述了战争的性质、目的和物质基础，将领的作用、条件和权力，刑赏的原则等；《将理第九》，着重说明执法不明会影响国计民生，造成军需亏乏，使国家危险的道理；《原官第十》，主要叙述国家分

官设职的重要性，以及君臣职能和施政办法；《治本第十一》，主要论述治国要以耕织为本，提出了“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的进步观点；《战权第十二》，主要阐述懂得战争权谋的重要性；《重刑令第十三》，主要讲惩处战败投降、逃跑将吏的刑罚措施；《伍制令第十四》，主要讲军队的连保制度及严格军纪、防止奸细的重要意义；《分塞令第十五》，主要讲军队营区的划分、建设和管理条例；《束伍令第十六》，主要讲战场上的赏罚制度和各级军吏的惩处权限；《经卒令第十七》，主要讲战斗组织、编队、佩戴标识符号及对战斗胜利的意义；《勒卒令第十八》，主要讲金、鼓、铃、旗四种指挥工具的作用和使用方法，以及军事训练和正确指挥的重要性；《将令第十九》，主要讲将军受命的郑重和将令的威严；《踵军令第二十》，主要阐述部队的战斗编成、各自的任务和行动部署，提出“欲战先安内”的观点；《兵教上第二十一》，主要叙述部队训练的方法、步骤和训练中的奖惩制度等；《兵教下第二十二》，主要阐述国君必胜之道和有关行军作战训练的问题；《兵令上第二十三》，主要讨论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及列阵交锋的内容和要求等，提出“以武为植，以文为种”的观点；《兵令下第二十四》，主要讲述战场纪律条令及严格执行条令与战争胜利的关系。

《尉缭子》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吴子》等的军事思想，具有战国时代的特点。它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战争观，反对用唯心主义的天命观指导战争，提出“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进步观点。它认为战争有正义与不义之分，反对不义之战，支持正义战争，“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主张“王者伐暴乱”的战争要以“仁义”为本。还认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故不得已而用之”，既要“慎战”，又不能“废兵”。在战略上它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这集中反映在它对军事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的论述方面。它把军事和政治形象地比喻为“植”（枝干）、“种”（根基）和“表”、“里”，指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意思是政治是根本，军事是从属于政治的，这与两千年后的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经济是治国之本，是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主张发展耕织，“明乎禁舍开塞，民流者亲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治则国富。富治者，民不发轫，车不出暴而威制天下。”

《尉缭子》注重战前思想、物质和组织的准备，主张“权敌审将而后用兵”，“凡兴师，必审内外之权，以计其去，兵有备阙，粮食有余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后兴师伐乱，必能入之。”注重奇正的灵活运用，认为“故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主张集中，认为“专一则胜，离散则败”。进攻时，主张出其不意，先发制人；防守时，主张守军和援军要“中外相应”，守与攻相结合。

《尉缭子》的治军思想很丰富，重视将帅的政治品德和个人模范作用，要求将帅秉公执法，恩威并施，吃苦在前，临战忘身，为人表率；重视部队的行政建设，制定了较完备的战斗、内务、纪律条令，是研究先秦军制史的重要资料；注重军队的训练，论述了训练的目的、

方法、步骤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提出从最基层起逐级教练，最后合练的训练方法；重视赏罚，提出“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杀［赏］一人而万人喜者杀［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的思想，在书中记述的各种条令条例中都有赏罚的具体规定和要求。

《尉缭子》问世后，受到历代统治者和兵家的重视。唐魏徵将其收进用于经邦治国的《群书治要》之中，宋代被官定为武学经书，后世兵家多有引述。很早就传到日本，日本研究、译注《尉缭子》的兵书有庆长十一年（1600年）元佶《校定训点尉缭子》、林道春《尉缭子评判》等三十余种。此外还有朝鲜刊本。《尉缭子》是一部具有重要军事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兵书。也应该看到《尉缭子》中也存有封建阶级的糟粕，如鼓吹用严刑酷法来维持纪律的执行等，是剥削阶级军队官兵对立的产物，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

《尉缭子》现存最早的版本是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竹书抄本，可惜是残简，不是完帙。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刊《武经七书》本。后世诸多丛书本大都源于此本。建国后研究《尉缭子》的主要成果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尉缭子注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尉缭子注释》、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尉缭子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竹简帛书论文集·尉缭子斠证》、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尉缭子浅说》等。

【《六韬》】

《六韬》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宋代颁定的“武经”之一，旧题周吕尚撰。吕尚，字子牙，原姓姜，周人称之为师尚父或太公望，为周初军事家、谋略家。然而，“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章学诚《文史通议·诗教上》）。就是说周初尚无出现个人著述，所以《隋书·经籍志》题“周文王师吕望撰”，显系托名。它的真正作者已不可详考。但是，根据《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于道家类，“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和其内容“规模阔大，本末兼该”（朱墉《武经七书汇解》）而又多史实记述等方面推测，它很可能出自后世史官们的手笔。

关于《六韬》的成书时间。由于原书作者姓氏失传，对于它是不是一部先秦兵书乃至具体成书时间也就引起了后人的种种猜测。自北宋何去非首先提出对《六韬》怀疑之后，南宋叶适遂判其为伪书。此后，宋明以来的学者群起而应之，南宋的黄震，明代的宋濂、胡应麟、焦竑、张萱，清代的姚际恒、姚鼐，近代的梁启超，现代的黄云眉等均断定《六韬》为伪书。究竟伪在何时，也有不同意见：一为周末说，“《六韬》言骑战，其书当出于周末。”（卫应麟《困学记闻》卷五）；二为楚汉说，“今所传《六韬》、《三略》，乃楚汉间好事者所补”（张萱《疑耀》卷二）；三为汉以后说，《六韬》为“汉以后人伪撰”（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四为魏晋说，“考《汉志》有《六弢》，初不云出太公，盖其书亡于东京之末，魏晋下谈兵之士，掇拾剩余为此，即《隋志》《六韬》也。”（胡应麟《四部正讹》）。

七十年代初分别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和河北定县汉墓南北两地出土了竹简本《六韬》和《太公》。据专家们考证，这两座汉墓的埋葬时间，前者至迟在汉文帝即位之前（公元前179年），亦可能在秦楚之际（公元前209年～前203年）；后者断为汉宣帝五风三年（公元前55年）。很显然，简书书写年代应在埋葬之先，而成书年代又必定在书写年代之前；既然埋葬年代为汉初或秦汉之际，那么上述所谓秦汉以后伪撰的说法不攻自破，《六韬》为先秦兵书便确定无疑了。具体成书于先秦的哪个时期，这是汉简所没有解决的。近年发表了一些考据文章，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春秋说，认为《六韬》“著作的时代大抵在社会变革的春秋时代”（宗彦群《从临沂一号墓出土的竹简看秦始皇“焚书”的革命措施》，《文物》1974年第3期）；一是战国说。笔者认为战国说较合情理，其理由是（1）《六韬》开始杂取儒、道、法、墨等家的思想，这种各家思想开始走向融合和统一的趋势，只能发生在战国以后，不可能在春秋之前。（2）《六韬·武韬·兵道十六》引有“黄帝曰”，黄帝的传说最早出现于《左传》、《国语》、《逸周书》，这三部古籍均为战国时作品，尽管所依据的材料可能会早一点，但黄帝的传说流行却在战国尤其是战国中期以后。（吴光《黄老之学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所以，引用黄帝之言的书只能在战国以后。（3）《六韬》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骑兵部队的编制、骑士的选拔和骑战战法，其最高战术单位是二百骑，车骑比例是一比六或一比十，主要任务是邀敌、追击、奇袭和骚挠敌人等。这些情况既不是春秋时期的情况，也不可能是汉以后的情况，因为汉时骑兵已跃居于诸兵种的首位，韩信破赵时用骑兵二千名；文帝时一次出征动用骑兵十万名，车骑比例达一比一百。所以说《六韬》反映的骑战只能是战国时的情况。（4）《六韬》中的“避正殿”、“将相分职”、“万乘之主”、“百万之众”等内容都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特点。



《六韬》书影

关于《六韬》的著录。以往一般认为《汉志》无《六韬》，《隋志》始著录；或谓《汉志·儒家类》之《周史六弢》即今本《六韬》，这是不正确的。《汉志》著录有《六韬》，但无《六韬》之名，它包含于道家类《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中，即其中的《兵八十五篇》。《汉志·兵书类·兵权谋》下的注释说“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篇；出司马法入礼也。”这就是说，太公的论兵著述已著录于《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中，兵书类省略不录。《六韬》系道家之流所为，内容亦多言道，《汉志》将其归入道家类是理所当然的。《太公兵八十五篇》何时以《六韬》之名行世？有人据《庄子》中“从说之则以《金版六弢》”断为战国时已有《六韬》之名行世，看来证据不足。

《史记》称《太公兵法》，《汉志》称《兵》，两地出土的汉简均有篇题名称，而均未见《六韬》之名。现在所能见到的较早记载《六韬》之名的文献是《后汉书》和《三国志》，其中有："《太公六韬》有天子将兵事，可以威厌四方。"（《后汉书·窦何列传》）"善诵《太公六韬》。"（《后汉书·徐璆传》及《左雄传注》）"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三国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由此推知东汉以后《六韬》之名才开始流行，到唐魏征等编《隋志》时首次在书目中著录为《太公六韬》，后世相沿至今。

关于《六韬》的篇目。《汉志》著录《兵八十五篇》，今本即宋代删定的"武经"本《六韬》共六十篇，二者相差十五篇。现在所能看到的两种汉简本和唐写本残卷中的篇题和内容，即有与今本相同的，也有不同的。不同的篇题，如汉简中的《葆启》、《治国之道第六》、《以礼义为国第十》、《国有八禁第三十》，唐写本中的《利人》、《趋舍》、《礼义》、《大失》、《动应》等。这些与今本不同的篇章内容当是六十篇之外的十五篇内容，或者为流传过程中失传，或者为宋朝廷颁定"武经"时删掉。

今本《六韬》共六卷六十篇：

《文韬》：文师第一、盈虚第二、国务第三、大礼第四、明传第五、六守第六、守土第七、守国第八、上贤第九、举贤第十、赏罚第十一。

《武韬》：发启第十二、文启第十三、文伐第十四、顺启第十五、兵道第十六、三疑第十七。

《龙韬》：王翼第十八、论将第十九、选将第二十、主将第二十一、将威第二十二、励军第二十三、阴符第二十四、阴书第二十五、军势第二十六、奇兵第二十七、五音第二十八、兵徵第二十九、农器第三十。

《虎韬》：军用第三十一、三阵第三十二、疾战第三十三、必出第三十四、军略第三十五、临境第三十六、动静第三十七、金鼓第三十八、绝道第三十九、略地第四十、火战第四十一、垒虚第四十二。

《豹韬》：林战第四十三、突战第四十四、敌强第四十五、敌武第四十六、乌云山兵第四十七、乌云泽兵第四十八、少众第四十九、分险第五十。

《犬韬》：分合第五十一、武锋第五十二、练士第五十三、教战第五十四、均兵第五十五、武车士第五十六、武骑士第五十七、战车第五十八、战骑第五十九、战步第六十。

《六韬》："规模阔大，本末兼该"（清朱墉《武经七书汇解》），内容非常丰富。《文韬》主要讨论了治国用人的政治战略；《武韬》着重论述了如何用兵的军事战略；《龙韬》阐述了军队的组织、奖惩、将帅的选拔和修养、军事秘密通讯、奇兵的运用、侦伺敌军的方法以及兵农合一的思想；《虎韬》主要讨论了各种特殊天候、地形及其他不利条件情况下的进攻和防御战术，并记述了古代武器装备的种类、形制、配置、作用和一般布阵原则；《豹韬》主要讲述森林、山地、河流、险隘地区作战和防敌突袭、夜袭以及遭遇战的战术。《犬韬》主要论述了军队的指挥调动，击敌时机，练兵方法，步、车、骑兵的组织、协同和各自的战法。

《六韬》继承了它以前的兵家的优

秀思想，又兼采诸子之长，所以思想内容很丰富。在政治战略思想方面主张"同天下"、"天下同利"，反复强调"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重民"、"利民"，认为天下是属于民众的，因此"取天下"必须得到民众的拥护，强调"国之大务"在于"爱民"，要使"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善于不争"，"削心约志"，其实质是轻徭薄赋，要求君主清静寡欲，不与民争利，"无取民者，民利之"，最后达到"取民"的目的；"上贤下不肖"，认为"上贤下不肖"是治国之要道，具体阐述了举贤的标准和方法，明确指出了不能重用的十三种奸人，即"六贼七害"；"赏罚必信"，认为"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提出了"杀贵大，赏贵小"的重要原则。

在军事方面，主张"伐乱禁暴"，"上战无与战"，强调"知己知彼"，"密察敌人之机"，"形人而我无形"，"先见弱于敌"。要求战争指导者"行无穷之变，图不测之利"，机动灵活地运用各种战略战术。它认为作战中最重要的是奇正变化，"不能分移，不可语奇"。对于攻城它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围困打援，迫敌投降。它重视地形、天候对战术的影响。总结了步、车、骑兵种各自的战法及诸兵种的协同战术。它重视部队的编制和装备，详细记述了古代司令部的人员组成和各自的职责，提出了因士兵之所长分别进行编队的原则。它认为"凡三军有大事，莫不习用器械"，详细记述了古代武器装备的形制和战斗性能。重视军中秘密通讯，记述了古代军中秘密通信的方式方法。它还重视将帅修养和选拔，认为"社稷安危，一在将军"，要求将帅不仅要谙熟战略战术、知进退攻守、出奇制胜的谋略，而且要懂得治乱兴衰之道，要能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并提出了考察将帅的八条办法，即所谓"八徵"。

在军事哲理方面，《六韬》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它一方面反对巫祝卜筮迷信活动，把它列为必须禁止的"七害"之一，另一方面又主张用天命鬼神去迷惑敌人，"依托鬼神，以惑众心"。它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初步认识到了矛盾的对立和转化，提出了"极反其常"的重要辩证法命题，是对古代辩证法思想的重要贡献。它的许多军事思想都是建立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的，如"夫存者非存，在于虑亡；乐者非乐，在于虑殃"，"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太强以折，太张必缺，攻强以强"，"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等等。

《六韬》在国外颇受重视。日本战国时代的足利学校（武将顾问资格的养成所）就曾把《六韬》与《三略》定为该校的主要教科书。据有关书目记载日本研究译解《六韬》的著作也有三十多种。西方第一次翻译的中国兵书共四种，合称《中国军事艺术》于1772年在法国巴黎出版，《六韬》就是其中一种。此外朝鲜、越南等邻国也相继出版和翻译了《六韬》。

《六韬》是宋代颁定的《武经七书》之一，是先秦兵书中集大成之作，受到历代兵家的重视，曾被译成西夏文，在少数民族中流传。它不仅文武齐备，在政治和军事理论方面往往发前人所未发，而且保存了丰富的古代军事史料，如编

制、兵器和通讯方式等。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史料价值。

《六韬》也有许多糟粕，如《兵徵》中的“望气”是一种迷信方术；《文师》中的“钓饵”之术表现了剥削阶级的偏见；“明主”、“贤将”决定社会发展，是唯心史观的反映，等等。

《六韬》的版本源流比较复杂，各本内容互有异同，从现存版本看，大致有以下四个系统：（1）竹简本，即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六韬》残简和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太公》残简，这是现存最早的版本。前者已整理出来，有文物出版社铅印本。（2）唐写本，即敦煌唐卷子本《六韬》残卷，共存二百零一行（其中一行只残存半个字），二十个篇目。原件藏法国巴黎国会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有缩微胶卷。这是现存最早的纸写本《六韬》。（3）《群书治要》本，是唐魏徵给唐太宗编的摘要本，只有文韬、武韬、龙韬、虎韬、犬韬的内容，未列子目，亦未收豹韬。以上三个系统都程度不同的保存了一些不见于今本的佚篇或佚文。（4）《武经七书》本，初刻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现存有南宋孝宗、光宗年间的刊本，藏日本静嘉堂文库，是现存最早的刊本，国内有其影印本即《续古逸丛书》本。明清以来众多的丛书本及其注释本、白文本，大都属于这个系统的版本。

【《阴符经》】

《阴符经》又称《黄帝阴符经》。旧题黄帝撰，伊尹、太公、范蠡、鬼谷子、张良、诸葛亮等注。此书出现于唐代，最早记载见于唐欧阳询的《艺文类聚·木部》；最早著录见于《新唐书·艺文志》。但它的作者及成书时代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至今尚属悬案。关于作者主要有如下几种意见：黄帝撰、战国山林之士撰（见《朱子遗书·阴符经考异·庐陵黄瑞节附录》）、晋杨羲撰（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道家类·阴符经解》）、北魏寇谦之撰（见唐杜光庭《神仙感遇传》）、唐李筌撰（见宋黄庭坚《山谷题跋·跋翟公巽所藏石刻》和宋朱熹《朱子遗书·阴符经考异》）。关于成书时代主要有商末说、周末说、战国说（见《朱子遗书·阴符经考异·庐陵黄瑞节附录》）、战国末说（见清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阴符经》）、东汉末说（见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证·阴符经》）、晋说、北魏说、唐说（后三说见上文注）等。近年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两家，一是王明的东晋说，认为成书于东晋以后，约在公元531年至580年期间（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二是李养正的战国末年说，认为此书是以黄老学说为理论基点，在政治、军事思想方面的运用和发挥，是战国时期激烈的斗争形势在哲学思想上的反映，它可能成书于战国末期（见《中国古代佚名哲学名著评述·阴符经》）。

《阴符经》，自李筌始为其作注以后，历朝为其作注的都很多，宋郑樵《通志》著录的各种本子有三十九部，明《道藏》中注本有二十四种，明代吕坤说：“自有《阴符》以来，注者不啻百家”（《注阴符经题辞》），到清便更多了。有的从道家、兵家角度注解，也有的从儒家、佛家、纵横家、医家、阴阳

家、道教等角度注解。所以，古籍书目中往往道家、兵家等类同时收录此书。

《阴符经》一卷，共分三章（一本作上、中、下三篇）：一、《神仙抱一演道章》，二、《富国安民演法章》，三、《强兵战胜演术章》。第一章主要内容是论说天道与人事、政治的关系。第二章主要内容是阐述以自然天道为法则，乃可富国安民的道理。第三章主要内容是论兵的，讲主事专一精神；守时发机；不为声色所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明了事物变化之理，掌握应变之术，天道、人事相参验，随机应变等。

《阴符经》是一部论述王政和军事的著作。本文仅对其军事思想作一简单介绍。书名"阴符"概括了全书思想内容的核心。什么叫"阴符"，李筌解释说："阴，暗也。符，合也。天机暗合于行事之机，故曰阴符"。（《阴符经疏》）意思是政治和军事斗争的策略计谋必须暗合于自然天道。它认为统治者处理政事、指挥打仗要仰观天象、掌握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要"知之修练"，修德练武，内辨忠奸，外御强敌，国家便可巩固。它认为用兵若能做到精力专一，用己之长，就能事半功倍。指出："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反昼夜，用师万倍。"这是借瞽聋之短长比喻用兵也要培养自己的长处，扬长避短，便可获十倍甚至万倍之利。它主张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天之无恩，而大恩生"，对国家实行无为而治。而用兵必须以奇取胜，"迅雷烈风，莫不蠢然"，意思是阴阳激博而生迅雷烈风，其势猛烈，万物莫不惊惧而蠢然若呆。这是用自然界的声势来比喻以奇用兵之势。它还主张要正确使用恩赏。认为"恩生于害，害生于恩"，意思是说有感恩戴德的君子，也有以怨报德的小人。因此，对于恩赏要慎重，君主赏不可妄行，恩不可妄施。

《阴符经》在哲学上的成就是较为突出的。它以自然天道观否定了天命论；在社会变化动因上，既肯定了"天道"的影响，也注意到了人的作用，提出了"天人合发"的论点；包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认为变与定、巧与拙、生与死、恩与害等，无不相反相成，相互依存而又相互转化。

历史上对《阴符经》的评价有毁有誉，但大都失之偏颇。我们既不同意把它神秘化，也不同意把它贬得一无是处。它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和军事思想史上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它对后世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如唐代李筌、明代吕坤等进步思想家就受过很大影响，李筌《太白阴经》中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军事辩证法就源于《阴符经》的天道观和朴素辩证法思想。

《阴符经》行世后为其作注和翻刻者日渐增多，出现了三百字本、四百三十七字本等内容有差异的不同版本。注本中以唐李筌、张果；南宋朱熹、俞琰等注最有影响。现存各注本大都被收进丛书，比较重要的有：道藏本、四库全书本、广汉魏丛书本、说郛本、增订汉魏丛书本、子书百家本、宛委别藏本、墨海金壶本、道书全集本、兵垣四编本等。另外也有单行本行世，如清乾隆壬辰（1772）年林笏堂刻本、清道光壬寅（1842）年静观堂刊本、清光绪丙申（1896）年大梁奇文斋重刻本等等。

【《黄石公三略》】

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宋代颁定的“武经”之一。旧题黄石公著。黄石公即圯上授张良兵书的老人，事见《史记·留侯世家》。他可能是一位反秦的隐士。据从思想体系、使用的语言、出土兵书、引文、古文献记载、著书目的等六个方面考证，《黄石公三略》既非张良所受之书，亦非黄石公所著，它当是西汉末年精通兵法、熟悉张良事迹、拥护汉室的隐士所为。（详见：《黄石公三略浅说·概论》，解放军出版社 1986 年版）《黄石公三略》原名《黄石公记》，最早见于《后汉书·臧宫传》，三国时期开始称《三略》，魏李康《运命论》有“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北齐魏收《魏书》中有刘昞注《黄石公三略》。书目著录则始于《隋书·经籍志》，之后，历代书目均有著录。

《黄石公三略》共分上、中、下三略：《上略》多引《军谶》语，主要通过对“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的分析，论述以“柔弱胜刚强”为指导、以收揽人心为中心，以“任贤擒敌”为宗旨的治国统军的战略思想及其实现的方法。《中略》多引《军势》语，主要通过“差德行，审权变”，论述君主驭将统众的谋略。《下略》主要内容是“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

《黄石公三略》是《武经七书》之一，它兼采众家之长，而又自成体系，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专门从战略上论兵的兵书，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它重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指出：“夫为国之道，恃贤与民”、“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夫统军持势者，将也；制胜破敌者，众也”、“以弱胜强者，民也”。注重收揽民心，重视民事，“兴师之国，务先隆恩。攻取之国，务先养民。”重视对战略要地的控制，提出“获固守之，获厄塞之，获难屯之。”它提倡将帅要爱护士卒，与士卒同甘共苦，将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良将之养士，不易于身，故能使三军如一心，则其胜可全”，“蓄恩不倦，以一取万。”要求将帅要有优良的品质和广博的知识。做到“能清、能静、能平、能整、能受谏、能听讼、能纳人、能采言，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难，能制军权”。主张“仁贤之智，圣明之虑，负薪之言，廊庙之语，兴衰之事，将所宜闻”。在将帅的选拔和使用方面，它反对任人唯亲，主张任人唯贤，因人而致用，“贤者所适，其前无敌”、“贤人所归，则其国强；圣人所归，则六合同”、“使智，使勇，使贪，使愚。知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愚者不顾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无使辩士谈说敌美，为其惑众，无使仁者主财，为其多施而附于下”。它在哲学方面，初步揭示了人们的认识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对战争的认识不能超越客观条件的许可，“端末未见，人莫能知。天地神明，与物推移。变动无常，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初步认识到对立的事物能够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柔能制刚，弱能制强。”认识到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向其反面转化，“造作过制，虽成必败”。它从《老子》的反战观点中引出了积极支持正义战争的主张，认为战争是不好的，但是战争不会

自行消灭，要用正义的战争消灭非正义的战争，“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在论述士与民、将与众、德与威、仁与法、柔与刚、强与弱等关系时，注意到对立事物的两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片面性。如提出贤士是国家的骨干，民众是根本，将卒并重，德威相济，仁法兼施，刚柔强弱相宜等观点。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在政治上还提出了“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的思想。诚然，《黄石公三略》中也存有一些封建阶级的糟粕，如剥削阶级的权术、消极出世思想等，在今天看来，都是很反动的。

《黄石公三略》问世之后，就受到社会的重视，广为流传。宋晁公武说：“其书论用兵机权之妙，严明之决，明妙审决，军可以死易生，国可以存易亡。”戴少望则认为“兵法传于今世者七家，惟《三略》最通于道，而适于用”，“《三略》之书，则其旨远，其理深。”（《将鉴论断》）《四库总目》说它：“务在沈机观变，先立于不败，以求敌之可胜，操术颇巧，兵家或往往用之。”唐代魏徵将其内容收入《群书治要》，供皇帝治国安邦参考。宋元丰三年（1080年），被颁定为武学的“经书”。并被与宋廷对立的西夏国译成西夏文。它在唐朝时传到日本，日本宽平（公元889～897）年间，日皇敕命藤原佐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就著录有《黄石公三略》。日本战国时代的足利学校（武将顾问资格的养成所）将此书与《六韬》定为该校的主要教科书。据不完全统计，日本研究《黄石公三略》的有近四十家之多。同时也传到了朝鲜等国。

《黄石公三略》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刻《武经七书》本。此本除原刻本尚存日本静嘉堂文库以外，后世几经影刊翻刻，形成“武经”系统本。其他丛书本也多以此系统本为底本。注释本比较重要的有宋施子美讲义本、明刘寅直解本、清朱墉汇解本等。建国后研究《黄石公三略》的主要著作有《武经七书注释·三略》（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和《黄石公三略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等。

【《将苑》】

旧题诸葛亮撰。诸葛亮（181～234年），字孔明，东汉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县）人，是三国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早年隐居邓县隆中（今湖北襄阳西），被称为“卧龙”。刘备三顾茅庐，请他出山。他向刘备提出了夺取荆（今湖南、湖北）、益（今四川），外结好孙权，内革新政治，积蓄力量，准备条件，统一全国的建议，即著名的《隆中对》。从此成为刘备的主要谋士。他辅佐刘备、刘禅创建了蜀国，自任丞相。刘禅继位后，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掌管蜀汉军政大权。当政其间，励精图治，赏罚严明，革除弊政，推行屯田，发展生产，改善和西南各民族的关系，对于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团结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他还积极推行联吴抗魏的战略方针，曾五次出兵攻魏，争夺中原。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因力不从心，于建兴十二年（234年）死于五丈原军中。他足智多谋，善于治军，相传革新连弩（革新后能同时发十箭）、创八阵图、造“木牛流马”（一种

有利于山地运输的工具），受到后人的崇敬。自陈寿编《诸葛亮集》后，明清又编辑多种，如明王士骐编《武侯全书》二十卷、杨时伟编《诸葛忠武全书》十卷、清朱璘辑《诸葛武侯集》二十卷、张澍编《诸葛亮集》等，本文所要介绍的《将苑》就收录在《诸葛亮集》之中。中国兵书史上有一种现象，就是伪托之作多托于先圣先贤。由于诸葛亮被后人当作智慧的化身，所以，正像《四库总目提要》说的“盖宋以来兵家之书，多托于亮”。各种书目著录诸葛亮撰的兵书就有二十余种，如《火龙经》、《心略地利》、《武侯奇书》等等，这些兵书究竟哪些是诸葛亮的作品，有待逐一考证。

《将苑》最早见于宋尤袤《遂初堂书目》，题作《诸葛亮将苑》，明代编的诸葛亮文集中也予以收录。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和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是后人伪托之作。从书中内容大多采自兵、史诸书和隋、唐不见著录来推断，不像诸葛亮亲著，但其中许多思想与诸葛亮的军事思想相一致。

《将苑》又称《诸葛亮将苑》、《武侯将苑》、《心书》、《武侯心书》、《新书》、《武侯新书》等。此书宋代称《将苑》，明代始改称《心书》，如焦竑《经籍志》；或《新书》，如陶宗仪《说郛》；也有称《将苑》的，如《百川书志》。《汉魏丛书》虽于书名题作《心书》，而篇章标题中间有《新书》字样。现存版本中，这几种称谓都有，核其内容，虽有所差别，但基本上是一致的，是同书异名。因为《将苑》之名出现较早，故本文以《将苑》相称。

《将苑》一卷（一作二卷，见《百川书志》）共五十篇。其篇目如下：兵机、逐恶、知人性、将才、将器、将弊、将志、将善、将刚、将骄吝、将强、出师、择材、智用、不阵、将诫、戒备、习练、军蠹、腹心、谨候、机形、重形、善将、审因、兵势、胜败、假权、哀死、三宾、后应、便利、应机、揣能、轻战、地势、情势、击势、整师、励士、自勉、战道、和人、察情、将情、威令、东夷、南蛮、西戎、北狄。

《将苑》是中国古代论述为将之道的兵书。书中博采《孙子》、《吴子》、《尉缭子》、《六韬》、《三略》、《左传》等兵书史籍中的论兵妙语，分门别类加以阐述，言简意赅，自成体系，概括了古代为将之道的各个方面。它对将帅进行了分类研究，认为从思想品德性格特长上分，将材有九：仁将、义将、礼将、智将、信将、步将、骑将、猛将、大将。按能力器度分有十夫之将、百夫之将、千夫之将、万夫之将、十万人之将、天下之将。意在选拔任用将帅要量才而选，量力而用。它总结归纳了为将八弊：“一曰贪而无厌，二曰妒贤嫉能，三曰信谗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犹豫不自决，六曰荒淫于酒色，七曰奸诈而自怯，八曰狡言而不以礼。”意在向将帅敲警钟。它认为将帅关系着国家兴亡、战争胜败、士卒的安危，因此，要求给予将帅自主权，重申“将之出，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训。同时，对将帅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条件和要求。首先强调将帅自身修养好。它要求将帅不恃强，不怙势，宠之而不喜，辱之而不惧，见利不贪，见美不淫，以身殉国，忠贞不渝；要做到刚不可折，柔不可卷，不骄不吝，能总文武之道，操刚柔之术，先仁义而

后智勇；要有五善四欲，五善是“善知敌之形势，善知进退之道，善知国之虚实，善知天时人事，善知山川险阻”。四欲是“战欲奇，谋欲密，众欲静，心欲一”。它还要求将帅力争五强，杜绝八恶。五强是：“高节可以历俗，孝悌可以扬名，信义可以交友，沈虑可以容众，力行可以建功。”八恶是“谋不能料是非，礼不能任贤良，政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济穷厄，智不能备未形，虑不能防微密，达不能举所知，败不能无怨谤”。它提出了将帅应遵守的十五条纪律，即虑、诘、勇、廉、平、忍、宽、信、敬、明、谨、仁、忠、分、谋。其次要求将帅要善于治军，精于作战。在治军方面，要求将帅要重视法制，信赏必罚，严号申令，“诫之以典型，威之以赏罚”；要加强军事训练，认为“军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要收揽和掌握有特长的人才，“必有博闻多智者为腹心，沈审谨密者为耳目，勇悍善敌者为爪牙”；要身先士卒，关心和爱护部下，养兵像养自己的子女一样，“有难则以身先之，有功则以身后之”，与士卒同生死，共患难。在作战方面，要求将帅不恃众以轻敌，不傲才以骄人，要“先计而后动，知胜而始战”；要懂得“兵机”、“兵势”，“因机而立胜”，“因天之时，就地之势，依人之利”；要熟悉战场地形地物，探明敌情，“不知战地而求胜者，未之有也”，“必先探敌情而后图之”，要懂得各种地形天候条件下的战法，如林战、丛战、谷战、水战、夜战等。

《将苑》一书，一直为后人所重视，流传比较广泛。它集中了古代将帅选拔、修养的精华，虽然不免打着封建阶级的印记，但其中许多思想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将苑》现存版本多题名为《心书》或《新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诸葛亮集》题为《将苑》。该书版本大致有三个系统，一是《诸葛亮集》系统；二是丛书本系统，较有代表性的有：广汉魏丛书本、增订汉魏丛书本、子书百家本、增订汉魏六朝别解本、唐宋丛书本、学海类编本、说郛本等。三是单行本系统，主要有：明正德十三年韩袭芳铜活字印本、明万历三十三年书林郑少斋刻本、明黄邦彦刻本、民国年间石印本、1926年成都昌福公司铅印本等。

【《李卫公问对》】

《李卫公问对》是一部问答体兵书。又称《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或《唐李问对》。唐太宗即李世民（599～4549年），唐代皇帝，李渊次子。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后世居于陕西武功。他自幼聪颖干练，博文精武，少年即通古今兵法，是古代著名的军事家。隋末劝其父起兵反隋，李渊称帝时，封为秦王，任尚书令。曾镇压窦建德、刘黑达等农民起义军，消灭薛仁杲、王世充等割据势力。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李建成，被立为太子，继帝位。公元626～649年在位，推行均田制和府兵制，常以“亡隋为戒”，较能任贤、纳谏，注意恢复发展社会经济和加强与少数民族的贸易文化交流，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击败东突厥，被铁勒、回纥等族尊为天可汗。晚年由于连年用兵，营建宫室，赋重役繁，加深了阶级矛盾。李卫

公即李靖（571～649），本名药师，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东北）人，唐初军事家。少有文武材略，精熟兵法，其舅父名将韩擒虎“每与论兵，未尝不称善，抚之曰：‘可与论孙、吴之术者，惟斯人矣。’”（《旧唐书·李靖列传》）隋末任马邑郡丞。唐高祖时，任行军总管，岭南道抚慰大使，以副帅佐李孝恭镇压辅公祐起义军。唐太宗时，历任兵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职，先后击败东突厥、吐谷浑，封卫国公，故称李卫公。据书目记载，他著有《卫公兵法》等十余部兵书，然大都佚失，“世无完书”，《通典》中保留了部分内容。

《唐李问对》，顾名思义就是唐太宗李世民与卫国公李靖论兵的言论辑录。然而自北宋陈师道在《后山谈丛》中提出“世传王氏《元经》……李卫公《问对》，皆阮逸所著”和何薳在《春渚纪闻》中提出“先君（按：指何去非）言《六韬》非太公所作，……又疑《李卫公问对》亦非是”之后，引起了学术界的一场争论，至今尚无定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吴曾《能改斋漫录》、汪宗沂《卫公兵法辑本自序》、湘浦《卫民捷录·问对题注》等径从陈、何之说，断定《李卫公问对》为阮逸伪撰。另一种意见否定阮逸所伪撰，如元马端临说：“神宗诏王震等校正之说既明见于国史，则非阮逸之假托也。”（《文献通考·经籍考》）清姚际恒说：“今世传者当是神宗时所定本，因神宗有‘武人将佐不能通晓’之诏，故特多为鄙俚之辞。若阮逸所撰，当不尔。意或逸见此书，未慊其志，又别撰之。而世已行此书，彼书不行欤？”（《古今伪书考·子类》）还有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书影

一种意见，即否定阮逸伪撰，也否定卫公所著，如明胡应麟说：“此书不特非卫公，亦非阮逸，当是唐末宋初俚儒村学缀拾贞观君臣遗事、杜佑《通典》原文，傅以闾阎耳口。”（《四部正讹》）据今人考证，宋初既流行有《兵法七书》，宋神宗元丰三年下诏校定包括《李卫公问对》在内的七部兵书，颁定为武经，作为武举试士和武学的军事教科书，说是宋仁宗天圣（1023～1031年）才中进士的阮逸伪撰，理由实不充分。说“其词旨浅陋猥俗，兵家最亡足采者。……当是唐末宋初俚儒村学缀拾贞观君臣遗事、杜佑《通典》原文，傅以闾阎耳口”，更是偏颇之言。公正的评价是：《李卫公问对》“兴废得失，事宜情实，兵家术法，灿然毕举，皆可垂范将来。”（宋戴少望《将鉴论断》）“《卫公问答》，语极审详，真大将言也。”（俞正燮《癸巳存稿》）“其书分别奇正，指画攻守，变易主客，于兵家微意时有所得。”（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综观全书，上述评论并非溢美之辞。《李卫公问对》虽未必是李靖的手定稿，它当是深通兵法韬略，熟悉唐太宗、李靖事迹的隐士根据唐、李论兵言论汇编而成，具体成书时间不可确断，然据宋初即有《兵法七书》流传推测，其下限应在五代之前。

《李卫公问对》共分上、中、下三卷，一万零三百余字。全书涉及的军事问题比较广泛，既有对历代战争经验的总结和评述，又有对古代兵法的诠释和发挥；既讲训练，又讲作战；既讨论治军，又讨论用人；既有对古代军制的追述，又有对兵学源流的考辨，但主要内容是讲训练和作战，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心围绕着"奇正"论述问题。

奇正是古代军事学术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是历代军事家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李卫公问对》对奇正论述深刻，分析透辟。它引《握奇经》："八阵，四为正，四为奇"，说明奇正原是方阵队形变换的战术。方阵中有四块"阵地"或"实地"（即战斗部队的位置），有四块"闲地"或"虚地"。在"实地"作战的部队就是"正兵"；利用"虚地"实施机动的部队就是"奇兵"。它认为奇与正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提出"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奇正，在人而已，变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它用奇正的观点来解释进退、攻守、众寡、将帅、营阵、训练等各个方面的军事问题，大大发挥了孙子的奇正学说。如它指出："凡兵，以向前为正，后却为奇"；"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大众所合为正，将所自出为奇"；"凡将，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国之辅也"等。它把奇正与虚实、示形紧密联系起来阐述，指出"奇正者，所以致敌虚实也。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但教诸将以奇正，然后虚实自知焉"，"故形之者，以奇示敌，非吾正也；胜之者，以正击敌，非吾奇也。此谓奇正相变"，"形人而我无形，此乃奇正之极致。"

《李卫公问对》非常重视阵法训练。主张从实战需要出发训练部队，达到在战斗中"斗乱而法不乱"，"形圆而势不散"，"绝而不离，却而不散"。它重视训练方法，认为"教得其道，则士乐为用；教不得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事矣"。强调根据部队的不同特点进行教练，"汉戍宜自为一法，蕃落宜自为一法，教习各异，勿使混同。"它还提出了由单兵到小分队，由小分队到大部队的训练程序，即由伍法而队法而阵法。对于方阵、圆阵作了较为明确的阐述。尤其对李靖创造的六花阵，明确指出本于诸葛亮八阵法，"外画之方，内环之圆，是成六花，俗所号尔"，"凡立队，相去各十步；驻队去前队二十步；每隔一队，立一战队。前进以五十步为节。角一声，诸队皆散立，不过十步之内。至第四角声，笼枪跪坐。于是鼓之，三呼三击，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敌之变。马军从背出，亦五十步临时节止。前正后奇，观敌如何。再鼓之，则前奇后正，复邀敌来，伺隙捣虚。此六花大率皆然也"。

《李卫公问对》对古代兵法的源流进行了总结归纳，它认为古代兵法"大体不出三门四种而已"，即："《太公谋》八十一篇，所谓阴谋，不可以言穷；《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穷；《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财穷。此三门也"，"权谋为一种，形势为一种，及阴阳、技巧二种，此四种也。"它对古代重要兵法进行了评述和发挥，其中有许多独到见解。如对《孙子》"守则不足，攻则有余"的解释不囿于曹操等旧说，

并批评他们用力量的强弱来解释是“不悟攻守之法也”。指出“谓敌未可胜，则我且自守；待敌可胜，则攻之尔。非以强弱为辞也”。对于攻守问题，它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如“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矣”，“攻者，不止攻其城击其阵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阵而已，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等等。

《李卫公问对》也包含着较为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它认为战争的胜负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不可归结为单纯的一个原因，“兵家胜败，情状万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它还认为事物都是在发展变化的，强弱、优劣、主客都处在变化之中，“‘因粮于敌’，是变客为主也；‘饱能饥之，佚能劳之’，是变主为客也。”它注重人事、反对迷信，指出“后世庸将泥于术数，是以多败”，“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但是，它又不主张废弃阴阳术数，认为这是“使贪使愚”的诡道之术。

《李卫公问对》是《武经七书》之一，在中国古代军事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它也存有一些明显的封建糟粕，如对李勣的明黜暗用的封建权术；它提出阴阳术数为诡道之术，若用来作为欺骗敌人、团结内部的一种战术，尚有可取之处，若用它来愚弄本部士卒，便是封建的愚兵政策。它的“教正不教奇”的论点，也有很大的片面性。明何良臣曾批评它说：“奇而不教，则号无以别，变何以施?”（《阵纪·奇正》）

《李卫公问对》，宋初有《兵法七书》本，后又有麻皓年注释本。宋元丰三年（1080年）宋神宗诏令校定《孙子》、《李卫公问对》等七书为《武经七书》，镂版刊行。据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载，宋代曾刊印过《李卫公问对》三卷单行本。但北宋之前的版本今不可见。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刻《武经七书》本。此后众多丛书本及清刻、清抄本，大多源于此本。现存比较重要的注释本有宋施子美讲义本、明刘寅直解本、清朱墉汇解本。建国后主要的研究成果有吴如嵩、王显臣的《李卫公问对校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和《李卫公问对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素书》】

《素书》又名《黄石公素书》。旧题黄石公撰，宋张商英注。此说源出张商英《黄石公素书·序》。张商英，字天觉，宋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年）为尚书右仆射，曾学浮屠法，喜讲禅理。劝徽宗节华侈，息土木，抑侥幸，徽宗颇惮之，遂蒙忠直之名。后被台臣上疏攻击，出知河南府。卒谥文忠。他在序言中称：“黄石公圯桥所受子房《素书》，世人多以《三略》为是，盖传之者误也。晋乱，有盗发子房冢于枕中获此书，凡一千三百六言。上有秘戒：‘不许传于不神不圣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传，亦受其殃。’呜呼！其慎重如此。黄石公得子房而传之，子房不得其传而葬之，后五百余年而盗获之，自是《素书》始传于世间。”张商英这段话说的神乎其神，然而说得愈神秘愈露出了他作伪的马脚。对此明代以来，学者多有辩驳，如明都穆说它有“三伪”：“子房以三寸舌为帝者师，而卒之谢病辟谷；托从赤松子游，君子称

其明哲保身，顾有死而葬以玉枕，其伪一也。自晋逮宋，历年久远，岂是书既传，而荐绅君子不得而见，亦未闻一言及之，其伪二也。书有秘戒，乃近世术家欲神其术之俚言，而谓圯上老人为之，其伪三也。且书中之言，往往窃吾儒之绪论，而饰以权诈。苏文忠谓圯上老人秦之隐者，而其言若是，乌足以授子房？其为张氏之伪明矣。”（《听语纪谈》）《四库总目提要》引胡应麟的话说：“其书中悲莫悲于精散，病莫病于无常，皆仙经佛典之绝浅近者。盖商英尝学浮屠法于从悦，喜讲禅理，此数语皆近其所为，前后注文与本文亦多如出一手。以是核之，其即为商英所伪撰，明矣。”笔者以为《素书》从内容到文句，引用《黄石公三略》颇多，如“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蹈……”等。实际上它是张商英取《黄石公三略》之本旨，以广其说，又撷取儒道文辞，杂采仙经佛典俚语以及有生命力的民谚汇集而成的一部著作。虽为张商英所伪托，但“其言颇切理”（《四库总目提要》），书中不乏有可资借鉴的思想内容。

《素书》一卷共六篇：原始章第一、正道章第二、求人之志章第三、本德宗道章第四、遵义章第五、安礼章第六。全书围绕“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展开论述，主张“潜居抱道，以待其时”，修德行仁，遵义尚礼。教育人们不要损节背理，要谦恭行善。在军事方面，重视设权定谋，指出：“设变从权，所以解结”，“长莫长于博谋”，“阴谋外泄者败”，“患在不预定谋”。重视民心民意，认为“民怨伤国”，“民困国残”。重视人才的选拔和正确使用。认为“安在得人，危在失士”，“得人者昌，失士者亡。国将霸者士先归，邦将亡者贤先避。”在战争中，主张根据各种人才的特点进行战斗分工，扬长避短，人尽其能。“重可使守固，不可使临阵；贪可使攻敌，不可使分阵；廉可使守主，不可使应机，五者各随其才而用之。”

《素书》自宋以来翻刻者颇多，流传很广。从现存版本看有明刻、明抄本，以及日本庆长（明万历）刻本，但更多的是丛书本，比较重要的有子汇本、二十子本、先秦诸子合编本、且且庵初笺十六子本、影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本、道藏本、四库全书本等。据不完全统计，各种丛书本有二十余种之多。

【《百战奇法》】

《百战奇法》又名《百战奇略》，最早著录见于明杨士奇撰《文渊阁书目》，其后见于明晁瑮的《宝文堂书目》，明周弘祖的《古今书刻》，明焦竑的《国史经籍志》等书目，均未著录作者。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李赞刻《武经总要》附刊本，此本《百战奇法·序》中说：“书亡作者姓氏。”说明作者已不可考。清黄虞稷等撰《补辽金元艺文志》著录有《百战奇法》，有人便以为是元代作品。但明李赞把它与宋代兵书《武经总要》合刻在一起；明茅元仪撰《武备志·战略考·序》中明确指出“宋有《百战奇法》，继有《百将传》、《续百将传》、《史略战宗》”；明崇祯年间刊行的军事丛书《韬略世法》，以《新编百战百胜合法引证》为题全文收录《百战奇法》，卷端著录为“宋谢枋得编辑，明汪淇参订”。明

邹复序中指出，《百战奇法》“未详作者姓氏，……殆宋人手笔，张预、戴溪之流亚也”；又核查书中征引近百个战例均为五代之前的，而不见宋以后战例的踪影，据此推断，它当成书于宋代。清游统道人辑的军事丛书《水陆攻守战略秘书七种》和清抄本军事丛书《帷幄全书十四种》，均收有《百战奇略》，题明刘基（字伯温）撰，将其与明刊本《百战奇法》对照，内容相同，由此可见，清刊《百战奇略》即为《百战奇法》，题名明刘基撰显系伪托之举。对此，清咸丰三年麟桂重刻《水陆攻守战略秘书七种》时，在其为《百战奇略》的题词中已经指出：“此书题刘伯温作，盖亦托名。”近年学术界开展了对《百战奇略》的考辩，一种意见认为是刘基所撰，并断定是刘基“隐居力学”八年期间，攻读《武经》时写下的笔记。（郝兆矩《刘基军事思想述评》，载《浙江学刊》1984年第2期）另一种意见否定为刘基所撰，其中有的并具体认定为清游统道人根据明刘寅《武经七书直解》的资料改编而成。称“擗统道人既不是驰骋沙场之名将，也不是运筹帷幄的军事谋略家，然而有了《武经七书直解》这部战略理论与史例引证齐全的宝藏，就轻而易举地托出《刘伯温先生百战奇略》这部伪书”。（周大海《（百战奇略）辩伪》，载《浙江学刊》1985年第5期）以上意见和考辩都局限于清代伪称刘基撰的《百战奇略》的抄本或刊本，没有与《百战奇法》联系对照起来进行考证，所以用功甚勤，然而结论却大谬。

《百战奇法》是一部有编纂特点的兵书。本书作者广收博采，将战争的诸方面概括归纳为一百个题目，即书名所讲的“百战”，每篇先阐发自己的认识，然后引一句古代兵书（主要是《孙子》）中的名言粹语概括本篇内容，最后引用战例或将帅事迹言行以证之。如《谋战》：“凡敌始有谋，我从而攻之，使彼计衰而屈服。法曰：上兵伐谋。”接着引证了春秋时，晋齐两国君臣相互伐谋的战争实例。它融兵法理论和战争战斗实例于一体，便于理解和掌握，是其一大优点。

《百战奇法》的篇目有：计战、谋战、间战、选战、步战、骑战、舟战、车战、信战、教战、众战、寡战、爱战、威战、赏战、罚战、主战、客战、强战、弱战、骄战、交战、形战、势战、昼战、夜战、备战、粮战、导战、知战、斥战、泽战、争战、地战、山战、谷战、攻战、守战、先战、后战、奇战、正战、虚战、实战、轻战、重战、利战、害战、安战、危战、死战、生战、饥战、饱战、劳战、佚战、胜战、败战、进战、退战、挑战、致战、远战、近战、水战、火战、缓战、速战、整战、乱战、分战、合战、怒战、气战、归战、逐战、不战、必战、避战、围战、声战、和战、受战、降战、天战、人战、难战、易战、饵战、离战、疑战、穷战、风战、雪战、养战、书战、变战、畏战、好战、忘战。

《百战奇法》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诸如战争性质、战略战术、军事谋略、国防战备、作战指导、后勤补给、军事地理、将帅修养等方面都有所论述。在战争观方面，它继承了古代传统的军事思想，反对黩武穷兵，认为“不可以国之大，民之众，尽锐征伐；争讨不止，终至败亡”，同时又主张“安不忘危，

治不忘乱”，认为“天下虽平，忘战必倾”。在作战指导方面，它主张灵活用兵，认为“兵家之法，要在应变，好在知兵。举动必先料敌，敌无变动则待之；乘其有变，随而应之”。主张“以计为首”，“先胜后战”。在确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要不失时机地进攻，“见可而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要硬拼，要避其锋芒，“知难而退”，伺其空隙，待机而动。全书以大量篇幅论述了不同兵力对比、不同作战对象、不同作战形势、不同天候地形条件下的不同战法。如山战要居高阜；谷战要依附山谷；水战要半渡而击；火战要掌握风候时机等。在治军方面，主张先教而后战，赏罚必信，恩威并重，将帅要关心爱护士卒，士卒要听从指挥。在后勤补给方面，特别重视粮秣的供应，对己要确保粮道畅通和粮秣供应；对敌则要设法断其粮道，迫敌屈服。在军事哲理方面，由于它汇集了历代兵法和战史的许多精华，所以通篇充满着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如它特别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反对巫祝卜筮等迷信活动。它在《人战》中指出，行军作战中出现猫头鹰落在帅旗上，或者旗杆突然折断等异常现象时，主帅要及时给予恰当的处置，稳定部队士气。只要禁止迷信的流行，消除部队的疑惑，就是战死也不会退逃。它在解释“穷寇勿迫”时，明确提出了“物极则反”的观点，指出：“凡战，如我众敌寡，彼必畏我军势，不战而遁。切勿追之，盖物极则反也。宜整兵缓追，则胜。”意思是，在战争中，我众敌寡，敌军畏惧而逃跑，这对我是有利的态势，但这时不能急追，急追会迫使敌人由逃跑转化为拼死抵抗。这样对我不利。“勿迫”不是不追，而是缓追，待机歼敌。它还用转化的观点论述了强与弱、众与寡、胜与败、安与危，以及将帅爱士卒与士卒尊将帅的辩证关系。

另外，《百战奇法》对《孙子》的许多观点的诠释和阐发有独到见解。如《孙子》的“其下攻城”，一向被指为历史的局限性。《百战奇法》的作者似乎不同意这种观点，并认为“其下攻城”是一般的战争指导原则，是与“伐谋、伐交、伐兵”相对而言的。是主张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不希望以大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它指出：“凡攻城之法，最为下策，不得已而为之。若彼城高池深，多人而少粮，外无救援，可羁縻取之，则利。”它征引前燕与东晋广固之战战例，用燕将慕容恪的话表达了这一思想：“若我强敌弱，敌人外面又没有援兵，我军有足够力量制服敌人，这时就要先牵制住敌人，慢慢围困他们，等待敌人陷入绝境。《孙子兵法》上说有十倍于敌的兵力就包围它，有五倍于敌的兵力就进攻它，即是这个道理。东晋的段龛很注意团结部属，其部属没有背叛他的迹向。现在他们凭借着坚固的城墙，上下一心防守。如果我们使用全部精锐部队进攻它，用几十天的时间虽然也能攻下来，但那样我们要死伤许多将士。所以用兵作战，最重要的是灵活机动。”最后慕容恪用围而不攻的战法，征服了广固。再如对《孙子》的“围师必阙”，它从敌我两个方面阐述了“围师必阙”的实质是一种精神战术，手法是虚留生路，目的是动摇敌人坚守意志，诱敌逃跑。围攻敌人要“围其四面，须开一角，以示生路，使敌战不坚，则城可拔，军可破”。这一战术我可用，敌

也可用，所以它又指出了对付这一战术的方法：敌人围攻我时，“当圆阵向外，受敌之围。虽有缺处，我自塞之，以坚士卒之心。四面奋击，必获其利”。

《百战奇法》汇集历代兵法精粹和战史资料，条分缕析，分类排纂，言简意赅，既可作为兵法理论来阅读，又可作为工具书供查阅战史资料来使用。明王鸣鹤将本书前五十战收入他的《登坛必究》，并评论说：“《百战奇法》五十款，款下各附合于孙子法，且更以古人之行事证之，利害得失昭然于心目之间，殊足以启发后人，而战道略备矣。”（《登坛必究》卷二十）其体例对后世影响颇大，明清的许多兵书如《白毫子兵䂮》、《兵经百篇》、《三十六计》等都采用这一体例。流传甚广，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是，书中也充满着许多封建糟粕，阅读时需要加以批判；有些篇题立论不够恰切，如“害战”听起来很费解，实际讲的是要塞地区防御作战战法；有些兵法、战例选择不够精当；前后体例不够统一，如引用战史资料，只有个别篇章注明出自《南史》、《北史》、《五代史》，大多数均未注明来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缺陷。

《百战奇法》未见有宋、元刊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本子是明弘治十七年（1504 年）李赞刻《武经总要》附刊本，之后又有明金陵书林唐富春刻《武经总要》附刊本、明嘉靖七年李诏德刻单行二卷本。明崇祯年间刻《韬略世法》收录此书时改名为《新编百战百胜合法引证》。清雍正以后，《帷幄全书》、《水陆攻守战略秘书七种》等丛书及抄本将其更名为《百战奇略》，并伪称明刘基撰，影响很大。直到近年有的出版社出版的铅印本、注释本仍沿袭这一错误说法。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百战奇法浅说》，恢复了本书的原称，纠正了刘基撰的错误说法，明确了本书为宋代作品。

【《阵纪》】

明代兵书。何良臣撰。何良臣字际明，号惟圣，浙江余姚人。生卒年不详，据本书序跋和书中内容推测，约生活于明嘉靖至万历间。他善长诗赋，热爱军事，“自结发从戎海上”（《阵纪·后序》），积累了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和军事理论知识。他曾说：“吾求人以武夫目我，而不得也。”（《阵纪·后序》）可见他对军人这个职业是很赞赏的。但由于明廷军政腐败，这位有胆有识的将才却长期没有得到重用。在“知阵无所事阵”的苦闷中，“辄寄之歌咏，以畅发其所欲吐所受禁而能为不得为之情”。（《阵纪·后序》）所以他的诗词具有浓郁的军人风格，张应登说：“诵其诗，纪律严明，有正正堂堂之势，登坛对垒，旗鼓相当者不数也。”（《阵纪·跋》）由于他有军事才能，自“握管从戎，辄投辄效”（《阵纪·序》），逐渐受到重用，被召为幕僚，参与训兵，运筹诸边要务。后因立战功，升为偏裨将，最高官至蓟镇游击将军。其著作除《阵纪》外，还有《军权》、《利器图考》、《制胜便宜》。

《阵纪》是何良臣潜心研究兵法和自身实践经验的总结。其具体成书年代不详，但据书中引有戚继光的鸳鸯阵和对戚继光浙闽用兵方略的评论来推测，其成书的上限应在《纪效新书》的成书

时间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之后，其下限应在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以前，因为书后有黄道月明万历己丑（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仲春序和张应登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五月跋。

《阵纪》共四卷、六十六篇，其篇目如下：

卷一：《募选》二篇；《束伍》四篇；《教练》三篇；《致用》二篇；《赏罚》四篇；《节制》三篇。

卷二：《奇正虚实》四篇；《众寡》三篇；《率然》二篇；《技用》十五篇。

卷三：《阵宜》三篇；《战令》五篇；《战机》三篇。

卷四：《摧陷》一篇；《因势》二篇；《车战》一篇；《骑战》一篇；《步战》一篇；《水战》三篇；《火战》一篇；《夜战》一篇；《山林泽谷之战》一篇；《风雨雪雾之战》一篇。

《阵纪》是讲选练和作战的兵书，内容较为充实，有将士的选拔管理和教练，也有战场指挥和奇正虚实的运用；有兵器的形制性能和配置，也有阵法的种类和变换；有旗鼓烽燧指挥、通讯、报警系统，又有赏罚条格和战场纪律规定；既讲一般情况下的作战问题，又讲特殊天候、地形条件下的战略战术；既言练艺，又言练胆；既有对古代兵法的继承和阐发，如他指出："孙子谓：'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要知善用正者，亦如天地之无穷，江河之不竭耳。又曰：'善用奇者无不奇，善用正者无不正。'正此谓也。……有等庸将派定伍队，正者只做正兵，奇者只做奇兵，皆非也。"（《奇正》）又有对前世兵家观点的匡正，如他批评大军事家李靖的"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似亦误矣。奇而不教，则号无以别，变何以施？孙子谓，奇正相生，循环无端。安有不教而能相生无端者耶?"（《奇正》）；既有对明廷腐败军政的揭露和抨击，又有变革图强的见解，如他批评明廷，"今也，将吏惫于监司中制之烦，士卒疲于科克工役之苦，偏裨困于谋求奔走之劳。""将乏良能，兵无练锐。"（《率然》）又进言"臣于是而知斯时也，非商鞅之变法，不可以言守国，非尉子之连刑，不可以言治旅。"（《率然》）既有对前世军事制度的追述，又有对明代军事制度的记录，如他在讲到军队编制时，除追述周制外，详细记载了明代军队各级的编制人数："五人为伍，五伍为队，五队一百二十五人为哨，五哨六百二十五人为总，五总三千一百二十五人为营，五营一万五千六百二十五人为镇。大约用一万八千人成一镇也，以二千三百七十五人为奇零之用，余皆仿此。"（《束伍》）总之，它既有军事理论价值，又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阵纪》的军事思想主要反映在治军、作战指导和军事哲理三个方面。

在治军方面，重视军队的选练，"众非精选，无以得用"。（《募选》）在具体选募中，主张"募贵多，选贵少"（《募选》）。他认为，"多则可致贤愚，少则乃有精锐"。（《募选》）以人的精神品质为首要选募条件，"首取精神胆气，次取膂力便捷"。反对选"城市游滑之人"，主张用"乡野老实之人"。强调因人而选，因长授职，如年高衰惫，"而有武技兼人，手足利捷，曾经战斗，惯识夷情者，又当别选为司教、司战。乖觉晓事，诚慎细密，备谙山川、进退险易者，宜充哨探巡察。胆力倍人，精神

出众，而智识过一队者，立为伍队之长”（《募选》）等。他还参照《六韬》用人思想，根据每个士卒的不同特长组织各类型的专门部队，如异术队、敢死队等。主张明耻教战，“教之以礼，励之以义”，要求全军懂得所谓荣辱廉耻，以战死为光荣，以退逃求生为可耻；将士之间要情同父子，义若兄弟，亲密无间，生死与共。当然这在封建阶级的军队里只能是一种愿望和空想，不可能真正实现。重视赏罚在治军中的作用，认为诛贵大，赏贵小，“能行诛于贵里，下赏于微贱，则威自伸，而明不翳。故杀及权幸，赏及牛童者，谓不论贵贱，不预恩仇，示至公也”。（《赏罚》）强调赏真罚实，防止私下捣鬼，要求将帅亲自调查，以“耳目见闻”为实。

在战略战术方面，战略上主张“以威德服人，智谋屈敌”，认为“能以威德服人，智谋屈敌，不假杀戮，广致投降，兼得敌之良将者，为不世功。兵不赤刃，军不称劳，而得敌之土地数千里，人民数十万者，为不世功”。（《赏罚》）而“奋力抵敌，或因救护而致重伤，或带重伤而复得敌级，并获敌中利用器具之类者，为下功”。（《赏罚》）这无疑是继承了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对奇正的阐述详备而且有新见解。他历数诸家对奇正的认识以后，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奇兵变化无常，正兵也可变化无常；奇兵和正兵相互依存，又可相互变化，奇兵可作正兵用，正兵亦可作奇兵用，要视战场情况而定；他用形象的比喻说明了正、奇、伏三者的辩证关系，“正兵如人之身，奇兵如人之手，伏兵如人之足。有身而后有手足也，三者不可缺其一。三者能俱用，而旗鼓秘之，是为神化。故三分其一为奇伏，然伏出于奇者也，奇又出于正者也。善用伏者，自无处不伏耳。岂独以丛林草木陵阜间可伏耶”。（《奇正》）“众寡”是兵家必谈的问题。《阵纪》对“众寡”问题的论述重“众寡”的运用，认为“识众寡之用者胜”。“用众，宜整、宜治、宜分”，“用寡，宜固、宜轻、宜锐。”他还认为众寡也是可以变化的，“莫以土地广大，兵马繁盛，就为众也。但分守处多，便无处不寡矣”。（《众寡》）对骑战、步战、车战、水战、火战等战术都根据明代的实战经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对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车战，他根据明代战争的特点，提出“非车无以致远，非车无以行制”，“不可以车为无益于军用也”，“欲挡胡马之冲，非车壁不可；欲挫胡马之锐，非车击不可；欲逐套卫之虏，非车攻不可；欲弥隙塞罅，而却胡马之不人，非车守不可；欲出塞开边，以建不世之业，非车行不可”。（《车战》）他总结明代海战的经验，提出：“洋海之战，所虑风涛不时，又虑迷失向往，当以斗建为正，加四时定之，知所进退矣。”（《水战》）

在军事哲理方面，他继承了古代兵家优秀的唯物主义传统。他认为敌情是在不断变化的，用兵的要诀在于因敌转化，阵法“皆参古法今而作，其用变取胜，各有神异，在学者变通之耳。能将握步根本，练之精，出之熟，变之神，自可驱步卒横行而无敌也。”他注意到事物的两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片面性，如他在讲训练时，既强调练技，又强调练胆；在讲赏罚时，指出“赏罚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轻，赏轻则人心不劝，罚轻则人心忘惧；赏重则人心侥幸，

罚重则人心无聊”。(《赏罚》)在讲兵器时，强调兵器短长要适度，“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重则易钝，钝则不济”。(《步战》)朴素地认识到事物的相互转化，指出“必死则生，幸生则死”，这句话不仅道出了“生”与“死”的辩证关系，而且似乎包含着精神力量能够转化为物质力量的思想。在他看来，将士如果抱着必死的决心去英勇作战，便能迸发出强大的力量，战胜敌人，取得胜利，获得生的希望；如果个个都有侥幸偷生的念头，那么就必然士气低落，丧失战斗力，而被敌打败。所以，他说：“夫一人必死，足敌十夫；十夫必死，足敌百夫；百夫必死，足敌千夫；千夫必死，足敌万夫；万夫必死，天下莫当。”(《摧陷》)

《阵纪》是明代一部比较优秀的兵书。对中国军事理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讲理论不流于空泛，讲制度不失之于繁杂，“凿凿足当实用，非徒拾前人咳唾，堇堇盗浮声也者”。(《阵纪·序》)它“切切以选练为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阵纪》)，比较实用。明代著述兵书称多，然多为掇拾汇集之作，这更显得《阵纪》之可贵。正像纪昀评论的那样：“明代谈兵之家，自戚继光诸书外，往往捃摭陈言，横生鄙论，如汤光烈之掘阱藏锥，彭翔之木人火马，殆如戏剧，惟良臣当嘉靖中海滨弗靖之时，身在军中，目睹形势，非凭虚理断，攘袂坐谈者可比，在明代兵家，犹为切实近理者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阵纪》)

《阵纪》现存有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刊本、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墨海金壶》本、清道光《珠丛别录》本、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惜阴轩》本、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瓶花书屋》本、清同治《半亩园》本、清咸丰《长恩书室》本、清抄本、民国年间《丛书集成初编》本等版本。

【《兵法百战经》】

《兵法百战经》，简称《百战经》，由《兵法百战经全卷》和《兵法百战经下卷》两部分组成。“全卷”以“王鸣鹤曰”开篇，其中有些思想与《登坛必究》相同；“下卷”卷首则称：“是辑酌古宜今，汇集诸家之精粹，诚兵法之大成，以为卫民之一助也。”而且没有“王鸣鹤曰”字样。卷首均著录“淮阴王鸣鹤编订，古吴何仲叔参辑”。由此推知，“全卷”应为王鸣鹤所著，“下卷”系由何仲叔所辑。王鸣鹤事略见本书中编第十三章第五节，何仲叔生平未详。

《兵法百战经全卷》有如下细目：地利总说、圮地、通形、挂形、支形、隘形、选能、两翼游兵、火攻药法、骑射、安营机要。“全卷”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论述地形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各种地形的特点及作战方法。“全卷”第一句话就是：“王鸣鹤曰：我先知胜地，则敌不能以制我；敌先居胜地，则我不能以制敌。若择地顿兵不能趋利避害，是驱百万之众而自投死所，非天之灾，将之过也。”接着列举了《孙子》中提出的圮地、死地、通形、挂形、支形等各类地形概念，以吴子问，孙武答的形式，阐述了敌我双方陷入上述地形条件时的作战方法。如在“死地”作战，若我陷死地，要深沟高

垒，示我有备，安静勿动，以隐蔽我军实力；然后杀牛燔车，犒赏士卒，填井毁灶，打消侥幸偷生的心理。这样全军死战，必锐不可挡，转败为胜。若敌居死地，则要网开一面，虚留生路，动摇其斗志，并在生路两侧埋伏精兵，在要道隘口布署精骑，乘敌逃跑进行截击，必获全胜。二是记述了选贤任能的原则和考选弓弩、鸟铳手的方法及标准。强调统军作战，务必选拔搜揽各方面的人才。主张要像春秋战国时那样，“虽鸡鸣狗盗之士，无不延见庭养，以为己用”。对于有特殊才能的以很高的礼遇对待。要求将帅不仅要有才，更要有德，“世之为将者，贵有将才，尤贵有将德。”对于鸟铳手的考选记述很细致，从铅子、火药、火绳、铅子袋到瞄准、射击都有具体规定。三是记述了明代的游兵战法和军中赏罚制度及指挥旗号。所谓游兵，就是在军队左右两翼的前锋，各设一个头队，即侦察分队，由骁将统领，负责侦察敌情，搜索伏兵，应付突然事变。头队中实行逐级论功行赏，一队之中如果赏多罚少，队长领红顶签、赏少罚多，队长则领黑顶签。主将则根据红、黑签赏罚队长。四是记述了明代火器种类及炮火药、水火药等火药配方。该书记载，当时“火器二百六十余种，皆有稗于实用”，按其用途分，有战器，有埋器，有攻器，有守器，有陆器，有水器。提出用器在于“合宜”；制器在于便利使用，如战器利于轻捷，攻器利于机巧，埋器利于爆击易碎。五是记述了骑马射箭的要领和训练、检验足力的工具及方法。有歌诀，如马箭歌诀等。有图式，如马箭式、步箭式等。六是阐述了营垒的重要性。王鸣鹤认为，“张军宿野必有营垒。营者，三军之家也。止而无营，犹人之居无屋宇、墙堑，一旦盗贼窃发，何以押御耶”。他还提出，要巩固营垒安全，形势、米粟、赏罚等固然是不可缺少的，但“上下相亲，人和为要”，“无事忧为有事之防”。七是总结了明军刘家河惨败的教训，提出加强“正兵”建设的建议。他认为刘家河之败的原因是“既不能用奇，而又自弃其正”。建议先定什伍之法，“五人为伍，以上递相连属，以至于将皆如身臂相使，首尾相应，虽极仓促，只须百人。其差次，先以强力疾足负重能走者三千人，次能射远趋二百里者三千人，次能命中者四千人，次能射远者四千人，次壮使轻勇能格斗者一万人，总二万四千人，将校并在内，为马、步、战兵之数”。

《兵法百战经下卷》的细目有：军誓、定惑、符契、乡导、金镜捷法淘金歌、年局起例、月局起例、日局起例、时局起例、太乙起例、测水平器、水军营法、兵夫列船。“下卷”内容较杂，多为用历法推算吉凶祸福，是封建糟粕。其中讲到古代的战斗动员、稳定军心的教育、水军战阵营法等尚有些参考价值。它公开声称，军中进行祭祀等迷信活动是“以权佐政”，巩固军心，鼓舞士气。它记述了当时的战船战斗队形，并认为战斗队形应随水域的不同情况而变化，“港有湾曲阔狭，当风隐风之不同，随港形深浅难拘一定之势”。

《兵法百战经》是产生在明代末期的一部兵书。它篇幅较小，约 8000 余字，但涉及到军事的许多方面，而且图文并茂，附图 20 幅，比较适宜当时粗通文墨的军人学习。它还能结合明代的军

事特点对古代军事思想进行阐发，尚有一些参考价值。不过本书编排较乱，各部分之间缺乏内在联系；有的本应标目的内容没有标出来，杂在其他类中，名不符实。该书刊本著录为“板藏南阳石室”。

【《三十六计》】

《三十六计》是一部佚名兵书。该书原是抄本，于1941年最先在邠州（今陕西邻县）一个书摊上发现。抄本前部“都系养生之谈，而末尾数十篇附抄《三十六计》”（1941年土纸翻印本前言）。同年由成都兴华印刷所用土纸翻印。然而此本流传不广，已往公私藏书目录均未见著录。1961年9月16日《光明日报》第四版发表了叔和的《关于“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文中说：“十几年前，我在成都一个冷摊上无意中发现一本土纸印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是根据一个手抄本翻印的，封面书《三十六计》，旁注小字‘秘本兵法’。”1962年无谷作了译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图书资料馆印行，才使这部濒临失传的古兵书重现于世。

“三十六计”之称来源于“三十六策”，最早见于《南齐书·王敬则传》：“东昏侯在东宫，议欲叛，使人上屋望，见征虏亭失火，谓敬则至，急装欲走。有告敬则者，敬则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汝父子唯应急走耳。’”（中华书局点校本487页）之后，《南史》、《资治通鉴》均有此记载。“三十六计”之名虽然出现很早，但是《三十六计》作为一部兵书却不会成书太早。由于缺乏可靠证据，具体成书年代不可详考。然从早期史籍均不见著录和其系统以《易》演兵的内容方面推测，估计约成书于明、清之际。

《三十六计》不分卷。全书共分六套三十六计，前冠一段总说文字，后附一段残缺的跋语。具体篇目如下：

总　说

第一套　胜战计

第一计　瞒天过海
第二计　围魏救赵
第三计　借刀杀人
第四计　以逸代劳
第五计　趁火打劫
第六计　声东击西

第二套　敌战计

第七计　无中生有
第八计　暗渡陈仓
第九计　隔岸观火
第十计　笑里藏刀
第十一计　李代桃僵
第十二计　顺手牵羊

第三套　攻战计

第十三计　打草惊蛇
第十四计　借尸还魂
第十五计　调虎离山
第十六计　欲擒故纵
第十七计　抛砖引玉
第十八计　擒贼擒王

第四套　混战计

第十九计　釜底抽薪
第二十计　混水摸鱼
第二十一计　金蝉脱壳
第二十二计　关门捉贼
第二十三计　远交近攻
第二十四计　假途伐虢

第五套　并战计

第二十五计　偷梁换柱

第二十六计　指桑骂槐
第二十七计　假痴不癫
第二十八计　上屋抽梯
第二十九计　树上开花
第三十计　反客为主

第六套　败战计

第三十一计　美人计
第三十二计　空城计
第三十三计　反间计
第三十四计　苦肉计
第三十五计　连环计
第三十六计　走为上
跋（残缺）

六套计中，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是处于优势情况下使用的计谋；混战计、并战计、败战计、是处于劣势情况下使用的计谋。每计的名称多取之于广为流传的成语典故，形象易记。每计的顺序是先出计名，次作解语，再加按语。解语前半部分多引自兵法，后半部分多引自《易经》，理性较强，比较难懂。书中自称，“解语重数不重理”，认为，“理”只能说明设谋定计的一般规律，而“数”才能解决具体实际问题。按语又是对解语的阐释，一般先理论上阐述，后举实例相参证，较易理解。如第十六计“欲擒故纵”的按语，先解释“所谓‘纵’者，非放之也，随之，而稍松之耳。‘穷寇勿追’，亦即此意。盖不追者，非不随也，不迫之而已”。然后引武侯擒孟获事参证，“武侯之七纵七擒，即纵而蹑之，故展转推进，至于不毛之地。武侯之七纵，其意在拓地，在借孟获以服诸蛮，非兵法也。若论战，则擒者不可复纵”。

《三十六计》可以说是集古代兵家“诡道”之大成，专讲军事谋略的兵书。由于它以《易经》的阴阳燮理，推演兵法的奇正、刚柔、攻守、进退、主客、虚实等的相互转化，所以，全书含有丰富的朴素军事辩证法思想。如它在“总说”中就指出：“六六三十六，数中有术，术中有数。阴阳燮理，机在其中。机不可设，设则不中。”从“数”与“术”、“阴”与“阳”的辩证关系，推演出了计谋的运用要根据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不可生搬硬套和预先凭空安排。这就为全书提供了一个思考问题的辩证方法。它在每一计的解语中都能注意到矛盾对立双方的相互转化，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转败为胜；还注意到了局部与全局的辩证关系，认为“势必有损，损阴以益阳”。意思是当战争的形势发展到必然会有所损失的时候，要用局部的损失来换取全局的胜利。全书还贯穿一条战略战术原则，即形势不利不要冒进，敌人强大时不要硬攻。形势对敌有利时，要“待天以困之，用人以诱之”；敌人“将多兵众，不可以敌”。书中还谈到了战争的一般规律和计谋的关系，认为“战争之事，其道多端。强国、练兵、选将、择敌、战前、战后，一切施为，皆兵道也。惟比比者，大都有一定之规，有阵例可循，而其中变化万端，诙诡奇谲、光怪陆离、不可捉摸者，厥为对战之策”。意思是关于战争之事，内容极其繁多，例如强国、练兵、选将等等，但战争有一定规律可循，作战的经验也可以取鉴，借以获得教训；然而战争中的对战之策，即阴谋奇计却变化多端、光怪陆离、不易掌握。所以它指出：“‘三十六计’者，对战之策也，诚大将之要略也。”将帅需潜心研究，因时、因地、因敌制变，恰当运用

“攻心夺气”等战场的一切诡诈奇变，以实现“胜之转机”的目的。

这里有两点需要指出：一是本书辑录三十六条计谋汇编成书，只是借用阴阳学说中的太阴六六之数，来安排它的所谓每套六条，一共六套，六六三十六条计谋。并非军事上的计谋只有三十六个。实际上，正如本书跋语中指出的，战争中的计谋变化万端，光怪陆离，不可胜数。本书只是对古代部分计谋的概括归纳。二是关于“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是说当处于完全劣势，面临败亡的时候，“走”是上策，而不是说“走”是三十六计中最高明的一策。这从檀公“三十六策，走为上计”以避魏的战例（事见《南史·檀道济传》）和本书的按语诠释中都能得到证明。它实际是一种“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战略。按语中说，当敌势全胜，我不能胜他时，出路只有三条，一是降，二是和，三是走。投降是彻底失败；媾和是一半失败；退却不是失败，而是转败为胜的关键。

《三十六计》总结了以往战争中施计用诈的实践经验，包含有较为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至今不无参考价值。但是，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封建糟粕，例如“借刀杀人”、“趁火打劫”、“笑里藏刀”、“混水摸鱼”、“偷梁换柱”、“美人计”、“苦肉计”等计中反映的封建割据战争中那些尔虞我诈、掠夺兼并一类落后、反动的思想内容。内容编排上也有许多牵强附会的地方。

《三十六计》现存版本有：成都兴华印刷所1941年土纸翻印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图书资料馆1962年内部印本、炮兵学院训练部1963年译注本、济南军区司令部1964年翻印政治学院印本、武汉军区司令部1973年和1978年抄本、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译注本（社会科学丛书本）。解放军出版社1981年出版了李炳彦的《三十六计新编》，删去了原书的“按语”和“跋语”，每一计增加了“新解”，增补调整了一些古代战例，增加了一些近代或现代战例。

【《兵经百篇》】

揭暄撰。揭暄，字子宣，清初江西广昌人。据载，他“少负奇气，喜论兵，慷慨自任。独闭门户精思，得其要妙，著为《兵经》、《战书》，皆古所未有。”（《揭暄父子传》）他还深明西方算学，著有《璇玑遗述》（一名《写天新语》）等。曾起兵抗清，失败后隐居山林，郁郁而死。

《兵经百篇》又名《兵镜百篇》、《兵法百言》、《兵经百字》、《兵略》、《揭子兵书》、《兵法圆机》等。清道光六年（1826年）成书的《皇朝经世文编·兵政门》录有此书（以下简称文编本）。全书分智篇、法篇、术篇上、中、下三卷，由一百字为题组成一百篇。但文编本所收内容不全，《智篇》删去了“言”字；《智篇》之“左”字，《法篇》之“较”字，《术篇》之“蹙、唆、半、静”等字均佚。清光绪年间江都吴明经酉书从沈阳书肆中购得一书，题名为《揭子兵书》，其卷次和百字分目与文编本均相同，而且文编本所删一字和所佚六字具存，为本书的完璧本。其与文编本所不同的是，下篇“术”字为“衍”字。孰对孰误？一种意见认为“衍”对，理由是下篇28字非智、法二篇所能概括其范围，故以“衍”名篇，

取诸推阐无尽之义，文编本系由“衍”“術”（术的繁体字）形似而致误；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术”对，其理由是“术”字在《说文》里训为道，古代兵家莫不以智、法为用，以道为体，下篇28字始于“天”而终于“藏”，“天”为道之本原，而“藏”为道之归宿，以“术”名篇是正确的。

《兵经百篇》将军事上各方面的问题概括归纳为一百个字，每字之下有一段论述，又大体按权谋、形势、阴阳的分类标准，按内容属性分为智、法、术三篇（有的版本“篇”作“部”）。智篇主要讲计谋方略，共收28字，即：先、机、势、识、测、争、读、言、造、巧、谋、计、生、变、累、转、活、疑、误、左、拙、预、叠、周、谨、知、间、秘。法篇主要讲练兵用兵之法，共收44字，即：兴、任、将、辑、材、能、锋、结、驭、练、励、勒、恤、较、锐、粮、行、移、住、趋、地、利、阵、肃、野、张、敛、顺、发、拒、撼、战、搏、分、更、延、速、牵、勾、委、镇、胜、全、隐。术篇主要讲天文、术数、侦察通信等用兵的辅助条件，共收二十八字，即：天、数、辟（一作闭）、妄、女、文、借、传、对、蹙、眼（一作目）、嘹、揑（一作持）、混、回、半、一、影、空、无、阴、静、闲、忘、威、繇、自、如（一作藏）。

《兵经百篇》是一部理论性较强的兵书。它继承了古代优秀军事思想，并结合自己的研读心得和清代的军事实践，用当时较为通俗的语言进行了阐发，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战争观方面，对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进行了具体发挥，认为“兵以安民非害民，兵以除暴非为暴”。（《法篇·全》）所以，主张“于无争止争，以不战弭战，当未然而寝消之”，（《智篇·先》）“无功之功乃为至功”。（《智篇·争》）即使战争真得打起来，也要“定不攻自拔之计以全城；致妄杀之戒以全民；奋不杀之武以全军；毋邀功，毋欣利，毋逞欲，毋籍威，城陷不惊，郊市若故”。（《法篇·全》）在治军方面，提出以将制将、不要听信谗言，“毋听谗，谗非忌即间也。故大将在外，有不俟奏请，赠赏诛讨，相机以为进止。将制其将，不以上制将”。（《法篇·任》）重视军队内外、上下之间的团结，认为团结是治国行军的重要思想基础，指出：“辑睦者，治安之大较。睦于国，兵鲜作；睦于境，燧无警。不得已而治军，则尤贵睦。君臣睦而后任专；将相睦而后功就；将士睦而后功赏相推，危难相援。是辑睦者，治国行军不易之善道也。”（《法篇·辑》）提倡广开言路，倾听各类人员的意见，“献谋献策，则罔择人，偶然之见，一得一长，虽一卒徒，必亟上推，言有进而无退，虽不善而不诛，则英雄悉致”。（《法篇·材》）他还提出了“胜天下者用天下”的观点，认为不管是本国，还是与国、邻国、敌国，凡是可用之材，可用之力，都要充分利用。重视关心爱护士兵，除了重申以往兵家所谓与士卒同生死共患难之外，对爱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不使陷于敌，不使陷于法”（《法篇·恤》）。特别强调粮饷在战争中的作用，认为“食者，民之天，兵之命，乌可缓也”（《法篇·粮》）。并根据新的战争经验对孙子的“因粮于敌”和檀道济的“筹粮沙”之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种办法只

能救一时，不能完全依靠，“因粮于敌，与无而示有，虚而示盈，运断围久，索百物为饲者，间可救一时，非可常恃”。（《法篇·粮》）对粮饷必须做到取之不尽，运输畅通，严密守护，节约使用，“故必谋之不竭，运之常继，护之维周，用之恒节”。（《法篇·粮》）

《兵经百篇》在军事哲学方面具有明显的进步倾向。首先，它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解释古代的天文术数，认为“星浮四游，原无实应。”（《术篇·天》）风雨云雾是一种自然现象。这些自然现象的产生与社会活动没有必然联系，但人们可以利用这些现象为社会活动服务。所以，它反对观天意，而主张观天象而用兵，并总结了恶劣气候往往是进攻一方喜欢利用的时机，提出：“疾风飒飒，谨防风角。众星皆动，当有雨湿。云雾四合，恐有伏袭。疾风大雨，隆雷交作，急备强弩，谨防敌突。善因者无机而不乘，善防者无变而不应。天未尝不在人，惟智者能因之取胜耳。”（《术篇·天》）它对术数完全持否定态度。所谓术数是指以种种方术，通过观察自然界的现象来推测人、军队和国家的气数和命运。它认为战争胜负与术数无关，是人决定“气数”，而非“气数”决定人。指出：“兵贵用谋，何可言数。而数亦本无，风扬雨濡，在天只任自然；冰坚潮停，亦是气候偶合”，“事所未意，而机或符，皆以人造数，而非有数造人，数系人为，天着何处。”（《术篇·数》）所以，它极力反对以占卜的所谓凭据、禁忌来决定军事行动，“兵家不可妄有所忌，忌则有利不乘；不可妄有所凭，凭则军气不激”。（《术篇·辟》）主张以人事和时务来制定战争决策，“以人事准进退，以时务决军机，人定有不胜天？志一有动气哉”。（《术篇·辟》）但是，它又主张假借鬼神而用兵，“兵法以能妄而有功”，鬼神、梦占、谣谶等都可以用来鼓舞军心，沮丧敌人士气。其次，它明确提出了军事事物具有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指出：“义必有两，每相对而出，有正即有奇，可取亦可舍。”（《术篇·对》）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它对军事上的许多问题都能从正反两方面来论述，如在讲到以计破敌时，强调我用计，敌亦用计，我变敌亦变，只有考虑到这一点，才能高敌一筹，战而胜之，指出：“我以此制人，人亦可以此制我，而设一防。我以此防人之制，人亦可以此防我之制，而增设一破人之防。我破彼防，彼破我防，又应增一破彼之破。递法以生，踵事而起。”（《智篇·累》）第三，认识到事物之间的相互变化，主张以变制变，活用兵法。认为“动而能静，静而能动，乃得兵法之善”。（《术篇·静》）阴阳、主客、强弱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指出用兵要善于随机应变，因敌之巧拙，因己艺之长短，因将之智愚，因地之险易而灵活用兵。

《兵经百篇》思想内容比较丰富，而且不杂抄硬拼，语言也较简练，是清代的一部重要兵书，具有一定军事学术价值，在清代后期有较大影响。

《兵经百篇》初以抄本传世，后被贺长龄、魏源收入《皇朝经世文编》，李鸿章收入《兵法七种》刊行。光绪年间浙江学堂教员侯荣逐字释义，并引战例相参证，于光绪三十四年由齐国璜整理出版。民国年间又有多种铅印本行世。

【《曾胡治兵语录》】

蔡锷编辑。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1895年以优异成绩入学为秀才。1898年考入湖南时务学堂，从梁启超学习。1899年东渡日本，进入以梁启超为校长的东京大同高等学校。1900年辍学返国，参加唐才常等组织的自立军起兵反清。起义失败后重新东渡日本，进入由大同高等学校改组的东亚商业学校。此时他痛心祖国风雨飘摇，决心学习陆军。1901年以自费进入成城学校习陆军。1903年考入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深造。1904年冬从士官学校毕业返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训练新军。1911年被李经羲任命为云南新军第19镇37协统领。武昌起义爆发，与云南讲武堂总办李根源在昆明响应，组织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为军都督。1913年被袁世凯调至北京，暗加监视。1915年潜出北京，12月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起兵讨袁，与袁世凯军激战于四川泸州（今泸县）、纳溪。袁世凯死后，任四川督军兼省长。1916年因病赴日治疗，不治逝世。后人辑有《蔡松坡先生遗集》、《蔡锷集》等。

《曾胡治兵语录》中的曾、胡，指曾国藩和胡林翼。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湖南湘乡人。清道光进士。湘军首领。1853年为对抗太平天国革命，以吏部侍郎身份在湖南办团练，后扩编为湘军。率兵阻击太平军，并出省作战，夺取武昌和田家镇。1855年败于太平军，退守南昌。1860年任两江总督，次年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主张“借洋兵助剿”，伙同英法侵略军夹攻太平军，1864年攻陷天京。1865年调任钦差大臣，对捻军作战，战败去职。与李鸿章、左宗棠创办江南制造局、福建马尾船政局等军事工业。胡林翼（1812～1861），事略见本书中编第五章第五节。曾、胡是近代史上的反动人物，是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他们同属“儒将”，注意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军事思想，善于总结和理性思考，在治军和作战中提出了一些值得借鉴的军事思想。《曾胡治兵语录》就是他们有关军事言论的选录。

《曾胡治兵语录》编辑于1911年。这年春天，经同盟会员李根源、罗佩金向云贵总督李经羲推荐，蔡锷赴云南担任新军训练工作。他初到时未受到重用，便住在教练处，整天手不释卷，辑录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兵言论，附以按语，编成《曾胡治兵语录》。六月，李经羲任命蔡锷为云南新军第19镇37协统领。镇统钟麟同委托蔡锷编“精神讲话”教材，遂将《曾胡治兵语录》以代“精神讲话”，印发新军官兵。

《曾胡治兵语录》书前有自序和梁启超1917年作的序，全书共十二章：第一章《将材》；第二章《用人》；第三章《尚志》；第四章《诚实》；第五章《勇毅》；第六章《严明》；第七章《公明》；第八章《仁爱》；第九章《勤劳》；第十章《和辑》；第十一章《兵机》；第十二章《战守》。前十章主要讲治军，后两章讲作战。每章先选曾、胡有关言论若干条，然后加上按语，或对本章概括归纳，或对曾、胡言论加以评述，或借题发挥，阐述自己的军事思想，提出对时局和作战问题的看法。如第十二章《战

守》之按语："右揭战守之法，意括而言赅，曰攻战，曰守战，曰遭遇战，曰局地战，以及边防之策，攻城之术，无不独具卓识，得其要诀。虽以近世战术之日新月异，而大旨亦不外是。其论夜间宿营，虽仅一宿，亦须深沟高垒，为坚不可拔之计，则防御之紧严，立意之稳健，尤为近世兵家所不及道者也。(按咸同时，战争两方，多为不规则之混战，来去飙倏，不可端倪，故扎营务求坚固以防侵袭。）曾胡论兵，极重主客之见，只知守则为主之利，不知守反为客之害，盖因其时所对之敌，并非节制之师，精练之卒，且其人数常备于我，其兵器未如今之发达，又无骑炮两兵之编制，耳目不灵，攻击力复甚薄弱，故每拘泥于地形地物，攻击精神，未由奋兴，故战术偏重于攻势防御，盖亦因时制宜之法。近自普法日俄两大战役以后，环球之耳目一新，攻击之利，昭然若揭，各国兵学家，举凡战略战术，皆极端的主张攻击，苟非兵力较弱，或地势敌情，有特别之关系，无复有以防守为计者矣。然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事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矣。兵略之取攻势，固也，必须兵力雄厚，士马精练，军资（军需器械）完善，交通便利，四者均有可恃，乃足以操胜算。四者之中，偶缺其一，贸然以取攻势，是曾公所谓徒先发而不能制人者也。普法战役，法人国境之师，动员颇为迅速，而以兵力未能悉集，军资亦虞缺乏，遂致着着落后，陷于防守之地位。日俄之役，俄军以交通线仅恃一单轨铁道，运输不继，遂屡为优势之日军所制，虽迭经试取攻势，终归无效。以吾国军队现势论，其数则有二十余镇之多，然续备后备之制，尚未实行，每镇临战，至多不过得战兵五千，须有兵力三镇以上，方足与他一镇之兵相抗衡，且一有伤亡，无从补充，是兵力一层，决难如邻邦之雄厚也。今日吾国军队，能否说到精练二字，此稍知军事者，自能辨之。他日与强邻一相角逐，能否效一割之用，似又难作侥幸万一之想。至于军资交通两端，更瞠乎人后。如此，而曰吾将取战略战术上最有利益之攻势，乌可得耶？鄙意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帮以兵戎相见，与其为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用波亚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而歼灭之。昔俄人之蹴拿破仑于境外，使之一蹶不振，可借鉴也。"上述深刻入理的分析，严密的论证，与其说是一篇序言，不如说是一篇精彩的军事论文。

1924 年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期间，增补第十三章《治心》，并作序言，名曰《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印发黄埔军校"人各一编"。然蒋补《治心》一章，实为儒家修身养性之道，且冗杂离治兵甚远，大不如蔡锷所选精练。

曾、胡军事思想是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既有反动成分，亦有虚伪之言。但他们同是书生从戎，"儒将"治军，熟悉历史和兵法理论，注意吸收古代优秀军事思想并运用于实践，所以其中不乏有借鉴价值的观点。在治兵方面，主张恩威相济，"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既强调仁爱士卒和民众，"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扰民而坏

品行”，“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又强调令行禁止，赏罚严明，用兵“先明赏罚”，“号令未出，不准勇者独进；号令既出，不准怯者独止”。重视将帅的选拔和修养，认为，“兵易募而将难求；求勇敢之将易，而求廉正之将难”，“求将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气，有智略”。尤其重视智略，认为“兵事不外奇正二字，而将才不外智勇二字”，“智多勇少，实力难言；勇多智少，大事难成”。重视人的作用，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反对对人求全责备，主张用人所长，“用人不拘定一格，而熏陶裁成之术，尤在用人者运之以精心，使人人各得显其所长，去其所短而已”。对将帅主张以诚相待，“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强调练兵要严格，以“养其精神，炼其体魄，娴其技术”。认为“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必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为典法”，“久逸则终无用处”。在战略战术方面，其主要思想是“慎”和“稳”。主张宁可几个月不开一仗，也不可打无计划安排无准备的仗。强调行军以“稳”字为先。反对轻易踏险，轻用奇谋。强调“以静待动，先谋后战，稳扎稳打”。认为“交战宜持重，进兵宜迅速，稳扎猛打，合力合枝，足以括用兵之要”。主张后发制人，反对不能制人的“先发”，但是不是一概反对先发制人，主张把两者结合起来，“先发”、“后发”要看具体情况如何来定，认为“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随物变化，诚为用兵之至要”。

曾、胡是近代史上的反动人物，其言论中存有糟粕是必然之事；蔡锷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称太平天国为“粤寇”，对曾、胡大加赞美，这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既应该批判，又应该曲谅。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蔡锷在本书序言中，将曾、胡誉之为“中兴名臣中铮皎者”，“懿行嘉言，皆足为我师资”。要人们“细加演绎，身体力行”，然而窥其本意，并非完全出于为曾、胡立言的动机，主要是有感于民族危机的严重，希望借此能对新军的训练有所“挽回补救”。

《曾胡治兵语录》问世后流传甚广。1917年于上海公开印行，梁启超亲为作序。1919年李根源于广州重印。1924年蒋介石增补后再版。1943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编辑《中国军事思想丛书》，将《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收入出版。现在流行的主要版本有1917年铅印本、1922年铅印本、1937年冯治安铅印本、1941年中兴书店《古代兵经》本等数十个版本。

【《乾坤大略》】

明末清初人王余佑撰。王余佑，字介祺，自号五公山人，卒后其学生私谥文节先生，《自序》称己为献县（今河北献县）人，一说为直隶新城（今河北新城县）人（《中国人名大辞典》）。早年受业于孙奇逢（明万历进士），学习兵法，并随其征战。明朝灭亡，又从奇逢讲性命之学，隐居五公山聚众授徒，五公山人即由此而来。他虽隐居山野，“然性不平，好武健，雅不欲以腐木烂草掷此生平，虽巢栖薇茹，时一室叫跳，辄觉须眉如刀槊。故独慕陈同甫之好谈霸王大略。”“复熟览天下之大势，推求

古今帝王得失成败之机，……然后标为十目，各成一卷，摭以古事，定以今评。”（《乾坤大略总序》）撰成《乾坤大略》。此外还著有《八阵图》、《万胜车图说》、《兵民经略图》等。

《乾坤大略·跋》指出：“此非谈兵也，谈略也。兵则千百端而不尽，略则三数端而已明矣。”“至于选将、练兵、安营、布阵、器械、旗鼓、间谍、向导、地利、赏罚、号令种种诸法，如人之耳目口体一物不可少者，则各有专书，不在此列矣。”意思是本书不含军事上的具体问题，而只讲扭转乾坤的用兵方略，即“乾坤大略”。因本书按类汇辑历代战争战例，以为用兵的借鉴，所以，山西育才馆民国9年（1920年）铅印本又题《兵鉴》。

《乾坤大略》十卷，补遗一卷。卷目如下

卷一：兵起先知所向；

卷二：兵进必有奇道；

卷三：初起之兵遇敌以决战为上；

卷四：决战之道在于出奇设伏；

卷五：乘胜略地莫过于招降；

卷六：攻取必于要害；

卷七：据守必审形胜；

卷八：立国在有规模；

卷九：兵聚必资屯田；

卷十：克敌在勿欲速；

补遗：佐胜之著，编中未录者，偶记于此。

《乾坤大略》是一部辑评历代用兵得失的兵书。“十卷挨次而进，各有深意”。观其内容，各卷之间互相联贯，自成体系。其体例与他书有所不同，全书之前有“总序”，每卷之前都有“自序”。去掉这些序文，便成为一部纯粹的军事类书。每卷围绕某个主题，辑录了较为丰富的历史上的军战史资料，如卷一《兵起先知所向》就辑录了纪信假扮刘邦诈降诳楚，大胜项羽等二十余条历代用兵故事。“自序”着重是对某个军事问题的评述，集中反映了作者的军事思想。下面按照原书的顺序对其军事思想作一简述。

兵起之先，强调要审敌强弱，选准正确的进攻方向，确定正确的战略部署。他认为，战争往往在瞬间决定胜败；优柔寡断，进攻方向不明，注定要失败。明确进攻方向以后，一要“进取”、“疾速”，“兵贵进取，贵疾速。进取则势张，疾速则机得。”（卷一自序）二要避实击虚，“敌弱或可直冲其腹；敌强断宜旁剪其支”，“乘势而趋利。”（卷一自序）这样，就能使敌惊骇万状，而我则军威大振。

兵进之时，强调奇正之变，主张以奇道取胜。他认为，作战“不得奇道以佐之则不能取胜”，“一阵有一阵之奇道，一国有一国之奇道，天下有天下之奇道。即有时正可为奇，奇亦可为正”，“夫兵进而不识奇道者，愚主也，黠将也。”（卷二自序）

重视初战，主张要尽全力争取初战胜利。他认为，初起之兵“不得已而与敌遇，非战无以却之。盖兵即深入，则敌必并力倾国以图蹂荡我，恐我声势之成，此而不猛战疾斗，一为所乘，鱼散鸟惊，无可救矣。诚能出其不意，一战以挫其锐，则敌众丧胆，我军气倍，志定威立，而后可攻取以图敌”。（卷三自序）

作战之时，强调出奇设伏。他指出，战争的情况很复杂，古有百战之说（如

《孙子》的“百战不殆”，宋代的《百战奇法》等），其实远不止百战。但无论何种战争，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善于出奇设伏。所谓善于出奇设伏，就是能“用众以覆众，因弱而为强”。（卷四自序）

乘胜略地，主张用招降之法。一场战争取得胜利，便成“破竹之势”，乘胜略地，扩张战果，无需继续用兵，“不烦兵也”（卷五自序），而以安抚招降为上。但招降之法，必须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对敌造成强大威势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因为，“胜则人慑吾威，而庇吾势，利害迫于前，祸福怵其心，故说易行而从者顺；若在我无可恃之形，而徒以虚言嬲众，是犹梦者之堕井，无怪乎疾呼而人不闻也”。（卷五自序）

进攻战，强调要首先攻取要害之地，扫清进退障碍。他认为，“要害之地，我不得此，则进退不能如意，而形相制，势相禁”。（卷六自序）敌若凭险反击，“霍然如探喉骨而拔胸块也”（卷六自序），必置我于死地。他并总结历史教训说，“古恒有军既全胜，而一城扼险，制吾首尾，几覆大业者”。（卷六自序）进一步强调攻取要害之地的重要性。

防御战，强调要固守住对战争胜负有决定意义的战略目标。他指出：“能取非难，取而能守之为难；汛守非难，守而能得其要之为难。昔项羽委敖仓而不守，弃关中而不居，而卒使汉资之以收天下，此最彰明较著者也。他如陈豨之不知据邯郸而阻漳水，董卓之不知依旧京而守洛阳，自古及今坐此患者，不可胜数，而独南宋君臣守江失策尤为可笑。”（卷七自序）

在国防后备建设方面，一是强调立国要有正确的方略和宏大的规模，改革旧制，创立新法，“朝廷之上置中书以总机务，疆场之外，建专阃以总征伐；经理度支，抚驭军民，适宽严之宜，得缓急之序；崇大体，立宏纲，破因循之旧格，布简快之新条，使人人辑志，处处向风”。（卷八自序）二是主张屯田，减轻民众负担，解决军队粮饷。他认为“百万之众，无食不可一日支”。（卷九自序）如李密以霸王之才徒以用粟不节，卒致米尽人散；而刘邦却以能食敖仓之粟，得以亡楚兴汉。“屯田一著，所谓以人力而补天工也”。（卷九自序）

本书在最后一卷，论述了用兵全胜之术，主张在有充分准备的前提下，待机而动；反对死打硬拼，鲁莽从事。他以与虎搏斗作比喻，指出，斗虎“当设网罗，掘陷井，围绕其出路旁，睨而伺之，久将自困，若奋不顾身，径进而与之斗，鲜不伤人矣”。（卷十自序）斗敌与斗虎理同，“故欲克敌者，强其势，厚其力，谨其制，利其器，然后堂堂阵，正正旗，声罪致讨，而施戎索，乃全胜之术也”。（卷十自序）

《乾坤大略》初以抄本行世。辰州秦聚奎在为本书写的序中说：他在任职肃水时看到的抄本，往往事不归类，踌驳颇多。他于清咸丰四年（1854 年）任职饶川时，王余佑之裔孙王懋亭茂才来饶，携其先人藏书数种，内有此书原本，因重校一遍，始知篇中错杂重复之处，为后人所窜入，而原书本来是融会贯通的。当时筹防吃紧，到处戒严，韬钤攻守之术，尤为救时良剂。于是，他据原本重录一份，与旧本相校，将后人窜人的十三条，删其重复，另记于后，以资参览。这就是所谓的秦校本。本书被收

入《畿辅丛书》、《丛书集成初编》。宝兴堂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翻刻、山西育才馆于民国9年（1920年）翻印。这些不同的版本，或以秦校本为底本，将窜入的十三条附于书后，如山西育才馆铅印本；或以旧抄本为底本，但在后人窜入的内容后面一一注明“秦校原本无此条”，如《畿辅丛书》本即如此。

【《兵谋与兵法》】

《兵谋》一卷，清初魏禧撰。魏禧事略见本书中编第十三章第八节。

《兵谋》是一部辑录《左传》用兵谋略的兵书。魏禧认为：“凡兵有可见，有不可见，可见曰法，不可见曰谋。法而弗谋，犹搏虎以挺刃而不设阱也；谋而弗法，犹察脉观色而亡方剂也。”所以，他很重视用兵之谋和用兵之法，便把《左传》中的有关“谋”和“法”的史实进行剖析梳理，综合归纳，编成《兵谋》和《兵法》二书。

《兵谋》概括出了《左传》中的三十二条用兵谋略：（1）和，上下礼让，同心和睦；（2）息，息民养战；（3）量，度量敌我；（4）忍，忍辱含垢，以图大谋；（5）弱，示弱骄敌；（6）弱而示之强，以震慑敌人；（7）致，调动敌人，迫于就范；（8）畏，敬畏，优而不恃，胜而不骄；（9）防，防敌谋我；（10）需，迟缓以老其师；（11）疾，急速乘敌之隙；（12）久，持久固守要冲；（13）激，抑制自己冲动，激怒敌人，使其暴躁，失去常态；（14）断，果断不疑；（15）听，倾听部众贤能的意见；（16）诡，诡诈，知人之诡，我以诡人；（17）信，信用礼节；（18）谍，间谍；（19）间，离间，间而挠之，间而离之；（20）内，内奸；（21）衅，间隙，乘敌之隙；（22）逼，以势逼敌投降，不战而胜；（23）与，与国，国家之间结盟共同抗敌；（24）胁，胁从，逼迫敌人听从我调动；（25）假，假借占卜、神鬼、物象等蒙骗敌人；（26）名，师出有名，执义循礼；（27）辞，辞令，以辞令赢得战争胜利；（28）备，戒备，未战备战，未败备败，有备无患；（29）法，赏罚之法制；（30）同，与士卒同甘共苦；（31）本，以民为本，修其本以胜敌；（32）保，保障胜而不败，保卫胜利果实。

每条谋略之后辑录《左传》中有关战例若干条，每条战例都一一注明了《左传》上的年份，便于查找。如“弱”条下辑录了“文公退三舍以骄子玉（夹注：僖廿八。即《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等十余条战例故事。从全书看，里面也夹有辑录者的观点，如“听”条下指出：“或听于众，或听于贤，或听于能，或听于尊；不听则败，听于私则败。”等等。

本书既是读《左传》的札记，又是讲谋略的兵书，对研究《左传》中的谋略思想有一定参考价值。《昭代丛书丁集新编补）收录有此书，书后有吴江沈茂德《兵谋跋》。

《兵法》一卷，魏禧撰。《兵法》是一部辑录《左传》用兵之法的兵书，其体例同《兵谋》，每法之后辑录《左传》中的有关战例故事，并注明《左传》中的年份。本书将《左传》中的用兵之法归纳概括为二十二条，即：（1）先，先声夺人，先发制敌；（2）潜，隐蔽袭

敌；（3）覆，埋伏乘敌；（4）诱，示弱诱敌；（5）乘，乘敌不意，攻其无备，如乘于未阵，乘于半济等；（6）衷，分割包围；（7）误，多方误敌；（8）瑕，罅隙，攻敌薄弱之处；（9）援，声援，兵必置援以备不虞，且张其声；（10）分，兵必分道，以攻则奇，以守则固，以罢人则逸，以息民则不劳，以备不虞则不败；（11）尝，尝试，试探；（12）险，战必知地之险阻；（13）整，军容严整；（14）暇，示闲暇造成敌人判断失误；（15）众，示众慑敌；（16）简，简选精锐；（17）一，统一进退号令；（18）劝，激励士气，劝道有四，曰恩，曰威，曰忿，曰身；（19）死，拼死作战；（20）物，以物助战，兵之变无所不有，故物无所不备；（21）变，权变，因敌制变；（22）将，统率将领的方法。

该书把《左传》中的用兵之法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类，为研究《左传》的军事思想提供了一些方便。此书收录在《昭代丛书丁集新编补》中，书后有吴江沈茂德《兵法跋》。

【《练兵实纪》】

明戚继光撰。明隆庆二年（1568年）五月明廷命戚继光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总兵官以下悉受其节制。他到任以后，上疏痛陈边备废弛、边军“七害”，“士卒不练之失六，虽练无益之弊四”（《明史·列传·戚继光》，中华书局点校本5613页），并针对蓟州一带地形的三个特点，提出车、步、骑战，“三者迭用”的用兵方略。他整敕军纪，革除弊政，改进兵器，修建敌台，建立车营和辎重营，使蓟门军节制精明，器械犀利，遂为诸边之冠。蓟镇“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率以罪去。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明史·列传·戚继光》，中华书局点校本5616页）《练兵实纪》就是他在蓟门练兵守边的经验总结和真实纪录。

《练兵实纪》，清代常州麟玉山房刊本刻成《练兵纪实》。《明史·戚继光传》记作《练兵事实》，显系笔误。中华书局点校本据《明史·艺文志》、《千倾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校为《练兵纪实》欠妥，因上述书目作《练兵实纪》，应校为《练兵实纪》为是。

《练兵实纪》是戚继光练兵中编写的各种教材和条规的汇编。《练兵实纪公移》说：“譬如遴选营阵行伍号令旌旗之色，金鼓之音，车营、车步骑合营、野营、行营、野战、战胜、教养、晓喻之类，一切未备者，本府逐渐拟定。教练已经二年，各路与入卫将士，虽以台工未及详举，而标兵六营，耳提面命，颇皆堪阅。今将先后给与将士教习过条约，通集成帙，计八卷，一卷大约数十条，又附以练将一卷，乃听将官自习，不系士伍程督，计共九卷。”这就是《练兵实纪》正文九卷的成书情况，但只言“教练已经二年”，未说明具体成书年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据《登坛口授》载：“时帷庚午夏六月，诸边新台，肇建过半，乃奉制府会同抚院奏，奉暂停以举练事。”庚午年即明隆庆四年（1570年），断为写成于明隆庆五年（1571年）。据今人考证，戚继光练兵始于隆庆二年（1568年），其成书时间当在隆庆四年末或隆庆五年初。《杂集》六卷写成于隆庆年间至万历初年，收入

《练兵实纪》当在万历年间。

《练兵实纪》九卷九篇共二百六十四条，具体篇目是：练伍法第一、练胆气第二、练耳目第三、练手足第四、练营阵第五（场操）、练营阵第六（行营）、练营阵第七（野营）、练营阵第八（战约）、练将第九。后附杂集六卷六篇：储练通论（上下篇）、将官到任宝鉴、登坛口授（李超、胡守仁辑）、军器解、车步骑营阵解。书前还冠有"凡例"即"分给教习次第"共十五条，记述了将、卒各自应学习的内容、标准，教材发放办法，督促学习的措施等。

《练兵实纪》内容广泛，涉及兵员选拔、部伍编制、旗帜金鼓、武器装备、将帅修养、军礼军法、车步骑兵的编成保结及其协同训练等建军、训练和作战的各个方面。正文一至四卷侧重单兵训练；五至八卷和"杂集"的《军器解》、《车步骑营阵解》讲营阵训练；正文第九卷和"杂集"中的《储练通论（上下篇）》、《将官到任宝鉴》和《登坛口授》等篇记述了将帅的选拔培养、应具备的条件等。

《练兵实纪》成书于《纪效新书》之后，它既注意吸收南方练兵的经验，又结合北方练兵的实际，其练兵思想在《纪效新书》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主张根据实际情况改革训练。针对北方地形和敌情，提出改革编制，增设车营和辎重营，并提出车、步、骑三兵种协同作战的思想，记述了协同作战的方法。改革兵器，扬长避短。指出敌人力壮，专用刀，善骑马，我方的刀必须长于敌才能占便宜，就是砍不着敌身上，必先砍着他的马头。所以规定，我方各项器械必须各长彼一倍，敌善用弓矢，我则用远射火器火箭、鸟铳、喷筒制敌。提出要灵活布阵，"各随地制宜，如地不容若干车为一城，大大小小，多多寡寡，长长短短，曲直偏弯，只以地为准，并不相拘。"（《练营阵第五》）

在训练方法上，提出要分层次训练，"练将册给将；练卒册给卒"（《凡例》），并对将帅和士卒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对士卒不要求原文背诵，只记大意即可；将帅则须条条款款诵熟；将帅必须背诵练卒条款，而士卒不必背诵练将条款。还制定了鼓励背诵的措施，"若将条约随俗改为唱曲习学以代戏乐者，有赏。"（《练胆气第二》）对于触犯军法者，若能背诵五条，免打一棍。

在训练内容上，特别重视学习兵法理论。认为："兵之有法，如医之有方，必须读习而后得。但敏智之人，自然因而推之，师其意不泥其迹，乃能百战百胜，成为名将。盖未有不习一法，不识一字，不经一事，而辄能开阖变化运用无穷者。"（《练将第九》）它还规定了学习内容和次第，指出要先读先讲《孝经》、《论语》、《孟子》白文，《武经七书》白文。次第记诵，不专句读文辞，但求理解精义；次读《百将传》，熟知诸将人品、心术、功业，以为借鉴；再读《春秋左传》、《资治通鉴》，以丰富历史知识；最后讲授《大学》、《中庸》大意，以修身养性。它还重视练心，要求使将士把实心拿出，"爱军是爱军的心，操练是操练的心，上阵是上阵的心，必思胜彼之法"。（《登坛口授》）这样上下同心，就能达到万人联异为同，聚少成多，合寡为众。主张以练胆为先，对于"艺高人胆大"这句谚语有新的认识，认为"必须原是有胆之人，习得好

艺，故胆益大。无胆之人，平日习得武艺十分精熟，临时手软身颤，举艺不起，任是如何教习，亦不得胆之大也”。（《储练通论》）

重视后勤训练和物质保障。戚继光针对以往官军因无辎重常常失掉战机的实际情况，提出“师行粮从，军事所先”（《车步骑解》），新创辎重营三座，每座大车八十辆，每辆骡八匹，并规定了辎重营的编制、训练方法，绘制了辎重营阵图。认为“辎重无失，便为奇功”。（《练营阵第五》）

重视政治训练。他认为“将有本，心术是也”。（《练将第九》）所谓“心术”，就是政治素质，即“光明正大，以实心行实事，纯忠纯孝，思思念念，在于忠君、敬友、爱军、恶敌、强兵、任难”（《练将第九》），具体提出要有志向，懂得生死的意义，明辨利害得失，做好人，守节操，宽度量，禁声色，尚谦德，惜官箴，牢记货利、刚愎、骄傲、逢迎、委靡之害等。宣传为民杀敌而死，虽死犹生的道理，指出：“况使死得当，立庙祭祀，血食百世，是死后还活，地方士女，口碑一日相传，是一日活在世间；若生前无闻于世，就活在世间，已是死了。”（《练将第九》）还反复强调拼死作战则生，侥幸偷生则死的道理。它强调军队要尊重人民，将帅要尊重士兵，注重维护人民和士兵群众的利益，反对扰民和向士兵乱派公差杂役，规定：“行营排阵间，将领敢于行伍中抽一人一骑者，军法从事”，“军士擅发冢墓，焚庐舍，杀老幼及妇女，践禾稼，伐树木，奸犯人妇，及将妇女入营者，军法从事”。（《练营阵第七》）认为将与卒虽位有贵贱，但身无贵贱。反对下级对上级“惟惟奉命，甚至增美其说”。（《登坛口授》）

强调练兵之要，先在练将。书中对将帅的品德、战术和技术修养有具体的规定和要求。它认为将帅是一军之长、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全军的情绪，所以要求先要训练好将帅。它主张兴办武庠，即军事学校，对各级军事统帅进行系统地正规训练。在学习文化的基础上，“授以《武经总要》，孙吴兵法，‘六壬’、‘百将’等书，俾各习读讲解其义。仍于骑射之外，如矛、盾、弋、铤、钩、弩、炮石、火攻、车战之法，各随所长，分门析类，各令精通，俟其稍熟，间一试之，或令之赴边，使习知山川之势，北敌之情。或暂随在营，使熟识旌麾金鼓之节，且教而且用之。用之不效，而复教之。如此，数年之后，必有真材”。（《储练通论》）它还对将帅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如要求“将官先以舍生为本”，“刚不可吐，柔不可茹”，习武艺学兵法，“必自身率始”（《练将第九》），“不拘三军各色武艺，长短器具，必一一习之。既不能皆精，必精其一二技，而余技亦必习知其概”（《储练通论》）等等。

关于书中的迷信问题。《将官到任宝鉴》等篇中确实有利用时日吉凶预测人事和因果报应等封建迷信内容，这是需要批判的。但是，书中又明确规定：“禁妖妄，讹言诳惑。妄说阴阳、卜筮、道释、鬼神、灾祥、祸福摇动众心者，重治。”（《练胆气第二》）并声明：“夫天时不足忌，在尽吾人事，自能感召天禄，所谓人定亦能胜天，阴阳时日，何为者哉！”（《将官到任宝鉴》）这说明作者并不相信迷信，他收录这些内容，目

的是让将帅掌握，作为一种心理战术，以达到“定众志而作气”的目的。

《练兵实纪》是明代以讲军事训练为主的著名兵书。它条理清晰，语言通俗，易懂易记；反映了明代后期火器大量使用后，军队编成的变化和训练作战的特点，“今以此书，考其守边事绩，无不相符，非泛摭韬略常谈者比”。（《四库总目提要》）因此，它具有较高的军事学术价值和军事史料价值，受到后世兵家的重视。

《练兵实纪》现存版本主要有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刑玠刻本、明天启二年（1622年）刻本、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许乃钊刻本、清咸丰甲寅（1854年）光霁堂刻本、清光绪乙未（1895年）上海醉经楼石印本、四库全书本、学津讨源本、墨海金壶本、守山阁本、瓶花书屋本、京都琉璃厂刻活字本、抄本、多种铅印本等。抄本十卷，与刻本内容不同，子目为：骑兵、步兵、车兵、辎兵、合营、行营、下营、禁令、兵法、练艺、练器、训谕、条教、图解。

【《兵机要诀》】

明徐光启撰。是一部新发现的失传兵书。此书撰于明万历年间，曾刊印过：后失传。康熙二年徐光启之孙徐尔默撰《文定公集引》，称徐氏所撰《选练百字括》已刻已毁，《选练条格》未刻而佚。徐光启十二世孙徐宗泽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搜集到一些新的徐光启文献，拟出版徐光启新集。从上智编译馆第三卷三、四合期（1948年3、4月间）所刊拟议出版的徐光启新集目录中发现，内有《兵法选练百字诀》、《火攻要略》、《制药》、《练艺条格》、《束伍条格》和《形名条格》六篇（均为《兵机要诀》的子目），可惜新集未能刊刻，所搜集的文献也随之散佚。六十年代初王重民先生编辑徐光启集时因没有找到上述文献，仅列其目待访。1982年解放军原装甲兵政委莫文骅将军为支持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的工作，将珍藏多年的一批重要古代兵书送到了军事科学院，供研究参考。其中就包括了失传已久的重要兵书《兵机要诀》，为嘉庆九年甲乙（1804年）抄本。《军事卷通讯》特发了一则消息。上海的专家学者闻讯赶到北京，在莫将军热情支持下，很快将此书整理影印，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徐光启著译集》中出版。

徐光启（1562～1633），是明代著名的科学家、军事家。字子先，上海县徐家汇（今属上海市辖区）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崇祯五年（1632年）升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并参机要，崇祯六年（1633年）兼任文渊阁大学士。从万历末年到天启初年，为了对付后金崛起，明廷特命徐光启“总理练军事务”，训练新兵保卫京师。在这期间他结合军事实践，深入研究军事理论，撰有军事著作多种，并汇编《大明一统九边险要韬略世法》等军事丛书，还将其从万历末至天启初年有关军事的奏疏等辑为《徐氏庖言》（国内已佚，原书藏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据书目著录，未刊而佚的军事著作还有《兵事厄言》、《兵事疏》、《军事或问》等。

《兵机要诀》，在《徐氏宗谱·翰墨考》中误作《兵机要略》。新发现的抄本题“云间徐光启子先父著，虞山单侃

景略父评”，单佩眉批十余条。全书共计六篇，其篇目和主要内容如下：

《总诀第一》，卷端题《兵法选练百字诀》，即徐尔默《文定公集引》所说的《选练百字括》，亦即《徐氏宗谱·翰墨考》所载的《百字诀》。名为“百字”，实为一百零五字，如果将“臂力”、“营阵”各算一字，也有一百零三字。共分学兵之要三、养兵之要三、教兵之要三、学艺之要三、选士之要四、勇之凡四、选胆之略三、练胆之略三、选智之略三、选力之法三、选捷之法三、技之凡五、远技之法三、长短技之法三、相士之法三、身材八字、战之品三、守之品三、和之品三、练士之法八、阵之法五、列阵之法四、进退之法二、兵阵之形十、兵法要八等二十五组，每组多为三字成诀，亦有二字、四字、五字、八字、十字成诀者。每字都有独立的含意，有的并进行简略诠解，如“学兵之要”的“想”解为“沉思曲想”，“讲”解为“学问遍知”，“养”解为“治心治气”。有的未有诠解，但是言简意赅，如将“兵法之要”概括为“攻、守、形、势、奇、正、虚、实”八个字。

《条格第二》，卷端题《兵法条格》，其中包括《练艺条格》、《束伍条格》和《形名条格》三篇，是徐光启结合练兵实践，对《选练百字诀》的具体化和条格化。《练艺条格》强调了练艺的重要性，规定了士兵需练习的各种技艺及具体要求。指出：“练远器先铳炮次弓矢”，“练长器先长枪次狼筅”，“练短器一刀二棍三镰四钯，俱长九尺以上。”《束伍条格》细分为伍艺、伍号、伍约、伍书，制定了军队的组织、管理和纪律规则，规定同伍五人和四伍长互相保结，严禁脱逃。《形名条格》规定军队的指挥号令、标识，包括服章、旗帜和金鼓。强调“齐众若一”，“众人共一耳，共一目，共一心”。

书后附有《火攻要略》和《制火药法》。《火攻要略》分别介绍了新式火器以及使用这些新式火器的胜敌之道。《制火药法》介绍了练硝、练硫和制炭的新方法，其关键是硝取其清、硫求其净、炭择其轻。还介绍了火铳（粗药）、鸟铳（细药）和火门药方等。

《兵机要诀》较集中地反映了徐光启在练兵方面的军事思想。他主张养兵要少而精，“少（所以饱）、饱（所以好）、好（所以少）”，这是他设计的养兵良性循环系统，阐明了少、饱、好的辩证关系。主张练兵从单兵练起，“凡练士，先练一人始，一人有五体即伍法也。护首手必应，举手足必随，即常山蛇势也。攻守、形势、奇正、虚实备在一身，因而五人为伍，五伍为队，五队为哨，五哨为部，五部为营，布阵变化出没总是此理，一人之技精，兵法尽在其中矣”。重视练艺。他针对项羽的“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指兵法）”，批评说：“此不知剑法，亦不知兵法也。”明确指出：“练土之法首技艺。”练艺注重实用，反对于实战无用的花架子，指出：“目今教练诸艺，不及尽学全套，只须除去花法，专练实用。”甚至平时军营活动也强调从军事需要出发，禁止刺绣、结网帽、赌博等，而用射箭、打统各色武艺，投石、超距、跖墙、打球之戏用以决赌者不禁。重视练胆，其要领是怒（杀敌者怒）、耻（明耻教战）、习（艺高胆大）。主张长短兵器都要掌握，认为长短兵器各有所

用，“兵法不论短长，用得着时，便为救命立功无上之宝”。尤其是重视先进军事技术的运用。明代后期，火器有了较大发展，出现了一些较为先进的新式火器，徐光启不仅亲手辑录新式火器和火药的资料，而且反复强调：“方今制敌利器，火器第一”，“非火器莫能御敌也。”他还重视训练中的奖惩升降，明确规定：“以胜负为赏罚，积赏罚为升降。”

《兵机要诀》是一部失而复得的明代重要兵书，它不仅具有重要的军事学术和军事史料价值，而且它保留的当时制火器火药新法具有科技史料价值。

《兵机要诀》嘉庆原抄本由莫将军收藏，上海古籍出版社《徐光启著译集》据此本影印。另外，明崇祯九年（1636年）山西绛州韩霖编的《守圉全书》内辑有《选练条格》，分选士、练艺、束伍、形名及营阵五篇，其中《选士》与《选练百字诀》有很大部分相同，而《练艺》、《束伍》、《形名》与《兵法条格》有关各篇内容基本类似，由此可见，两书系出同源。《守圉全书》原刊本现藏上海图书馆，为国内孤本。

【《防守集成》】

《防守集成》，顾名思义，是关于防守城池的集大成之作。实际上它是乡兵团练防守县城土堡的兵书，与《金汤借箸十二筹》、《救命书》等属于同一类。原书题朱璐编次。朱璐，字玉泉，清末旌德（今安徽省旌德县）人。他成年后喜欢搜罗阅读各家兵书，钩玄撮要，潜心探索，认为有价值的内容就抄录下来，分类收藏。他是一位有正义感的青年，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和清朝的腐败深恶痛绝，在本书序言中气愤地说：“将不知兵，兵不用命，文吏以徇私取巧为能，武弁以退却偷生幸免，而肉食者，复未能远谋，一旦有警，则万姓流离，四方震动，良可慨也。”清咸丰初年，他到福建做官，原想大干一番事业，可到任一看，那里“豪猾当权，贤能敛迹；兵无实用，饷尽虚縻；官弁伤亡，形同刈草；贼氛猖獗，势等摧枯；有城莫守，有隘难防；进退张皇，上下粉饰”。（《自序》）他为了尽职报效朝廷，便想以著书来挽救败局。于咸丰四年（1854年）将平时积累的关于防守方面的军事资料，重加删订，分类纂辑成《防守集成》，刻印三百部，“权为救时之助，以尽涓（捐）报之心”（《自序》）。

《防守集成》共十六卷，十六篇，附图200余幅，约10万字。对于每篇的排列顺序，编者动了一番脑筋，都有一定的依据，具有一定的逻辑性。编者认为，本书以讲地方官弁防守土地为主，故以“城制”为卷首；有城不可无卫，故以“保卫”为卷二；既有城卫，不可不附民，故以“保甲”为卷三；既有民不可不教，故以“乡团”为卷四；有城有民不可不足食，故以“积贮”为卷五；内事既备，外患不可不知，故以“烽堠”为卷六；既知敌至，又必先据地利，故以“设险”为卷七；险阻既固，又必预为困寇之术，故以“清野”为卷八；野既清，而城中需用之物不可不备，故以“需备”为卷九；各物具备，更需器械以资捍御，故以“守器”为卷十；器械足资，则号令不可不明，故以“约束”为卷十一；令行必有禁止，故以“严禁”为卷十二；禁令严

明，尤宜倍加谨慎，故以“慎防”为卷十三；布置周密，敌至临时措之方可裕如，故以“措应”为卷十四；各项具备，最终目的是为守城，故以“城守”为卷十五；又恐怕当今不知武略的人，或以为本书为纸上谈兵，空言无据，故以“引证”为卷十六。一至十五卷的体例相同，先有一段理论阐述，出自编者之手，是全书价值较高的内容。接着是罗列辑录的有关资料。一至十四卷均附载有图说，主要有城制图、防御工事图、阵图、防守器械图、武器装备图、旗帜图等。第十六卷“引证”系辑录的从先秦至明代关于防守城池的战例一百余条。全书除卷前一段序文外，主要是辑录的资料，但也有编者补写的内容，“编中有武备诸书所未及载者，乃不揣鄙陋，以补其缺。”由于本书所辑资料均未注明出处，编者补的内容也未注明，所以究竟那是编者补充的内容，难以分辨。

本书与同类书比较，在编纂方面有些特点，一是比较全面地辑录了有关民防团练的内容，又删去了繁衍的部分，比较简练；二是注意揭露时弊，促进变革。编者在卷十五“城守”篇揭露当时官场，“文吏游谈而养尊，武臣恬嬉而宝身。闲雅雍容之习成，而慷慨果锐之气丧，一闻寇警，如浇冰水”。并声言“因录《城守》以救弊”。他还提出改革城制，学习西域城制，按营阵之法建城，大城包小城。这样一城破，其他城犹存。三是为便于粗通文字的军人学习，全书作了断句。四是所绘阵图，以兵器、旗帜代替抽象的符号，比较形象易懂。

《防守集成》成书于封建社会的末期，它所防御的对象，除了外国侵略者及所谓土匪外，主要是防农民起义，所以在政治上有它反动的一面。但是从军事的角度看，它所提出的一些防御思想，还是有借鉴价值的。对于守与攻的关系，它提出“盖欲善守，必明善攻。预知患端，方能捍患”，（卷二《堡卫》）“欲战必先守，欲守必先清野，欲清野必先坚壁。”（卷四《乡团》）要以战为守，积极防御，“所谓守者，非徒闭门不出，可幸保全也。必按境内山川形胜，何处可扼要，令重兵屯守；何处可分据，令偏师犄角；何处可伏兵挫其先锋；何处可游兵，绝其粮道；何处可设机，以陷敌于死地。能以战兼机术为守，则守固。断不可遽闭城隅，自投绝路。故善守者，必先自立于不败之地”。（卷七《设险》）它还总结了一些守城的规律，如“三道”（正道、奇道、伏道），“五败”（壮夫寡；小弱众；城大而人少；粮少而人众；蓄货积于外；豪强不用命），“三可力守”（外有援兵；人士劲勇，刍粟丰备；城池完固，民人富实），“三可决战”（外无援兵；人劲马壮，兵甲坚利，储蓄不备；城池不完，士民穷匮）等。对于各种防御工事的修筑标准，它提出要以是否有利于杀敌为准，“敌台、弩台，俱以杀敌为义，不能杀敌，无贵为台矣”。（卷二《堡卫》）

该书有清咸丰四年刊本传世。

【《火龙经》】

《火龙经》又名《火龙经全集》、《火攻备要》，是明代关于火药、火器技术的兵书。旧题汉诸葛武侯著，显然是伪托。因为那时只有草木火攻，火药和火器尚未发明。

本书是杂抄《火龙神器阵法》、《登

坛必究》、《武备志》、《兵法百战经》等兵书中的有关内容汇集而成的。卷前序言即是《火龙神器阵法》的《授书序》。本书中的“火攻总说”，称“东宁伯曰”，实际是《登坛必究》中的“辑火器略说”，原文是“王鸣鹤曰”。既伪托诸葛亮著，又收录焦玉的序，其做法甚为笨拙。

继本书之后，又有人编辑《火龙经二集》、《火龙经三集》，“二集”卷前有毛希秉崇祯五年（1632年）序，“三集”卷前有诸葛光荣崇祯甲申（1644年）序，据此推知，《火龙经》约成书于崇祯五年之前，《武备志》刻成之后，即明天启至崇祯年间。

本书共分三卷，上卷除“火攻总说”和“选用火兵诸法要诀”外，主要辑录火药配方，共26种，即神火药、毒火药、烈火药、飞火药、法火药、烟火药、逆风火药、飞空火药、日起火药、夜起火药、喷火药、爆火药、炮火药、水火药、火弹药、五里雾、迢魂雾、烟球毒药、神火、神烟、结烟、青烟、红烟、紫烟、白烟、黑烟。中卷和下卷为“火器图说”，将火器区分为炮类、铳类、箭类、器械类、喷筒类（以上为中卷）、牌类、球类、杂品类、禽兽类、水具类、地伏类，后附“万弩齐发说”、“轮流发弩式”（以上为下卷）。共辑录各类火器62种，附图62幅。这些药方和火器在《火龙神器阵法》、《登坛必究》、《武备志》等兵书中大都有记载，但此书所记火药、火器较之上述诸书为略，如火药配方大都不记每料的数量。

《火龙经二集》共三卷，卷上收录了《武备志·军资乘》中的“用火器法”，共七篇，其中四篇原出自《火龙神器阵法》，即火攻风侯、火攻地利、火攻器宜、火攻兵戒。另三篇是教演火攻、制火器具、火器试验。“火攻风侯”还从其他书中辑录了一些占风云的内容，有古代预测风雨的经验之谈，也有阴阳诡诞之说。卷中和卷下为火器图说，其类目有炮类、车炮类、铳类、箭类、器械类、喷筒类（以上为卷中）、牌类、球类、砖弹鹞炬葫芦类、杂器类、兽类、车类、水具类、地伏类。从《武备志》等书中辑录了《火龙经》没有辑录的40种火器，附图40幅，“补初集之遗者”。（毛希秉序）卷前毛希秉作序时间为明崇祯五年，说明本书成书于崇祯初年。而书名页题刘伯温增辑、卷端题明伯温刘基补著，显然又是伪托。似由毛希秉汇辑成书。

《火龙经三集》二卷，书名页题诸葛光荣辑，卷端则题明茅元仪汇集，琅琊诸葛光荣校。从编纂质量上看，比较低劣，不像出自茅元仪那样的大手笔，况且茅元仪也不会把王鸣鹤的东西改为自己的，所以本书辑者应是诸葛光荣。本书主要从《登坛必究》、《武编》等兵书中辑录了有关火器的论述及制造方法，卷上有“辑火攻说”、“火攻略论”；下卷有“辑西洋神器说”、“西洋神器诸法”。“辑火攻说”本为王鸣鹤所作，本书改为“茅元仪曰”。“西洋神器诸法”中杂有弓说、披背筋法、漆弓法、裹弓法、儆弓法、焙弓法、焙弓火侯、箭说、造伏弩法等有关冷兵器的内容。

《火龙经》及其《火龙经二集》、《火龙经三集》虽然是伪托之作，又是辑录成书，但它们把散见诸书的有关古代火药、火器的资料汇辑起来，分类编成火器专书，促进了古代军事技术的传

播；清代广为刊行，在军事科技史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海防图论》】

《海防图论》又称《海防图说》、《海防论》等，是明代关于海防的兵书，旧题胡宗宪撰，实际是由胡宗宪汇编而成。这在胡宗宪的序言中说得很清楚："凡耳目所历，哨探所传，无微不核，无细不综，因汇次为《海防图论》，凡若干篇。"经核对，自"广东要害论"至"山东预备论"辑录自郑若曾的《万里海防图论》（见《郑开阳杂著》）这是本书的主要内容，所以，有的版本又著录为郑若曾撰。《辽东军饷论》由明万世德补辑，《日本考略》由明殷都补辑，但其资料都源自郑若曾的《万里海防图论》。胡宗宪在给《筹海图编》所作的序中说："余既刊其（注：指郑若曾）《万里海防》行世。"据此推测，《海防图论》当即是《万里海防图论》。题郑若曾撰是正确的。

《海防图论》主要篇目有：海防图、广东要害论、琼管论（原作琼馆守御论）、广福通番当禁论、福洋要害论、福洋五寨会哨论、福宁州论（原作福宁州守御论）、广福浙兵船当会哨论、浙江四参六总分哨论（原作浙洋守御论）、舟山论、浙直福兵船当会哨论、苏州水陆守御论（原作苏松水陆守御论）、江北设险方略论、江淮要害论、山东预备论、辽东军饷论（《万里海防图论》，亦有是篇，文字有所不同）、日本考略。本书铅印本后附《阵纪》八篇：战令、战机、摧陷、水战、火战、夜战、山林泽谷之战、风雨雪雾之战。以《武经七书》的言论为根据，阐述战场律令、战机选择和各种天候地形条件下的作战特点。

《海防图论》以地形和倭情为依据，论述了沿海各地的战略形势和在抗倭中的战略地位，提出了加强防御的措施。其总的防御思想是御之于远洋，歼敌于近岸，各省联合防御，协同会剿，内外夹持，水陆兼备。具体措施主要有加强鱼船管理，除掉内奸，使倭寇失去耳目和向导；占领海上要害岛屿，封锁倭寇必经之路；分哨和会哨紧密结合，尤其要加强防御接合部的会哨，堵塞一切空隙；在沿岸港口设水陆把总和游兵把总，既能水上击敌，又能在陆上堵截歼敌；组织团练乡兵，使处处有御倭之兵。每篇之后有辑录者的评论，如"苏州水陆守御论"后，针对原文提出的"调募客兵不如调土著之兵，可调习而有常；官造战船不如雇民间造私船，皮坚久而省费"的主张，评论说，"苏松海防所依赖者，无过兵船。第招募客兵亦未为不可，至于战船民造，实为坚久，是当永为例云"。

《海防图论》是明代的重要海防文献，所提出的御倭方略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据胡宗宪《筹海图编·序》可知，此书在嘉靖年间刊印过，称《万里海防》，此刊本今不可见。万历年间刻本改称《海防图说》。以后被《兵垣四编》、《长恩书室丛书》、《后知不足斋丛书》等丛书收录，均题《海防图论》。

【《海国图志》】

清魏源撰。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道光进士。官至高邮知州，和龚

自珍同属主张“通经致用”的今文学派。鸦片战争时，在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参予浙东抗英战役。他是清代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一生著述甚丰，鸦片战争前主要有《书古微》、《诗古微》、《默觚》、《老子本义》等，鸦片战争后主要有《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海国图志》、《元史新编》等。此外，还协助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成《皇朝经世文编》。

《海国图志》是在《四州志》的基础上几经增补编辑而成的。《四州志》是根据英人慕瑞（Murray）著的《地理大全》编译的，文字经过林则徐修饰，主要概述世界各国史地政治情况，全书约八、九万字。林则徐被革职后，将此书和有关外国资料交给魏源，嘱其编撰《海国图志》。魏源遂以《四州志》为基础，广泛搜集中外有关著述，增补整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二月撰成《海国图志》五十卷，共计五十七万字，较《四州志》内容增加了五倍多，另有地图二十三幅，洋炮图式八页。五十卷本刊行后，国内争相传诵。魏源复加增补，扩为六十卷，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重刊于扬州。这次刊行增入西南洋、希腊等四国，五印度沿革总考，欧洲总沿革，北洋普鲁社国、琏国（即丹麦）以及外大西洋



《海国图志》

墨利亚（美利加）洲，及南洋西洋各国教门表，中国西洋历法异同表，中国西洋纪年通表等。西洋技艺部分，五十卷本只有附录一卷，六十卷本增为八卷，其内容原来只介绍洋炮，六十卷本增加火轮船、地雷、水雷、望远镜等器艺的制造和使用方法。此后，继续加以补充，并且亲到澳门、香港等地游览采访，终于竭十年之力，编成《海国图志》一百卷，于咸丰二年（1852年）刊于高邮。百卷本全书约八十八万字，各种地图七十五幅，西洋船炮器艺等图式七十五页，还增补了地球天文合论、国地总论等九卷，各卷并增添了很多新见资料。地志部分扩充到六十六卷，西洋技艺增为十二卷。百卷本卷目如下：

卷一：筹海篇：议守上、下。

卷二：筹海篇：议战、议款。

卷三：海国沿革各图、地球正背面图、亚细亚洲各图。

卷四：利未亚洲各图、欧罗巴洲各图、亚墨利加洲各图。

卷五：东南洋海岸诸国、越南。

卷六：越南分国沿革。

卷七：暹罗。

卷八：暹罗本国沿革。

卷九：暹罗属国今为英夷新嘉坡沿革。

卷十：缅甸。

卷十一：东南洋海岛诸国、吕宋、吕宋所属岛。

卷十二：荷兰属岛、大岛、英荷布路三夷分属地间等岛。

卷十三：英荷二夷所属葛留巴岛。

卷十四：附葛留巴所属岛。

卷十五：英荷二夷所属亚齐及三佛齐岛。

卷十六：英夷所属新阿兰岛。

卷十七：日本岛。

卷十八：东南洋诸岛形势。

卷十九至卷二十：西南洋各国、五印度总述上下。

卷二十一：中东印度分述。

卷二十二：北南印度分述。

卷二十三：西印度巴社国。

卷二十四：西印度阿丹国。

卷二十五：各国回教总考。

卷二十六：西印度如德亚国。

卷二十七：天主教考。

卷二十八：南土鲁机回国。

卷二十九：五印度沿革总考、附恒河考。

卷三十：中印度沿革、东印度沿革、南印度沿革、西印度沿革、北沿度沿革。

卷三十一：北印度西北邻部附录。

卷三十二：北印度以外疆域考。

卷三十三：利未亚洲总说、东利未加阨日多国、未利未加阿迈司尼国。

卷三十四：东利未加分隶他国兼摄者八国、北利未加分隶他国兼摄者四国、南利未加分隶西洋各国兼摄者五国土酋自主者四国。

卷三十五：西利未加二十四国。

卷三十六：中利未加二十五国。

卷三十七：欧罗巴洲总沿革。

卷三十八：布路亚国。

卷三十九：大吕宋国。

卷四十：荷兰及弥尔尼壬国。

卷四十一至卷四十二：佛兰西上下。

卷四十三：意大里国。

卷四十四至四十五：耶马尼国上下、附分国二十五部。

卷四十六：欧塞特里阿国、附寒牙里九部、波兰国。

卷四十七：瑞士国。

卷四十八：北土鲁机国。

卷四十九：希腊国。

卷五十：英吉利兰墩国都五十三部、附英吉利斯葛兰岛三十部、英吉利爱伦岛三十部。

卷五十一至卷五十三：英吉利国广述上、中、下。

卷五十四：俄罗斯国东五部、俄罗斯国西八部。

卷五十五：大俄罗斯十八部、小俄罗斯三部、南俄罗斯五部、加匽俄罗斯四部、俄罗斯南新藩五部、俄罗斯东新藩四部、西悉毕厘阿二部、东悉毕厘阿二部。

卷五十六：俄罗斯沿革。

卷五十七：普鲁社国。

卷五十八：琏国、大尼国、瑞丁国、那威国。

卷五十九至卷六十一：外大西洋亚墨利加洲、弥利坚国总记上、中、下。

卷六十二：弥利坚东路二十部。

卷六十三：弥利坚西路十一部。

卷六十四：北墨利加洲墨西科国、附西南四国西方三国及西北诸蛮。

卷六十五：北墨利加洲内英俄各国属地。

卷六十六：德沙国、危地马拉国。

卷六十七：南墨利加洲智国、金加西腊国。

卷六十八：巴拉大河国、伯西尔国。

卷六十九：智利国、各国兼摄地在南墨利加洲内者。

卷七十：南墨利加诸岛、西海诸岛、南极未开新地附录。

卷七十一：南西洋各国教门表。

卷七十二：中西历法同异表。

卷七十三：中西纪年通表。

卷七十四至卷七十六：国地总论上、中、下。

卷七十七至卷八十：筹海总论一、二、三、四。

卷八十一至卷八十三：夷情备采一、二、三。

卷八十四：仿造战船议。

卷八十五：火轮船图记。

卷八十六：铸炮铁模图记。

卷八十七：仿铸洋炮议、炸弹飞炮说、炮车炮图说。

卷八十八至卷八十九：西洋用炮测量记上、下。

卷九十：西洋炮台记。

卷九十一：西洋自来火铳法。

卷九十二至九十三：攻船水雷图记上、下。

卷九十四：西洋技艺杂述。

卷九十五：西洋远镜作法。

卷九十六至卷一百：地球天文合论一、二、三、四、五。

魏源编《海国图志》参考和征引的文献资料数量多、范围广，涉及中外古今各类著作。除《四州志》以外，还有历代史志如《汉书》、《隋书》、《元史》、《明史》等；明以来岛志书如《海岛逸志》、《岛夷志略》等；外国人著作如英国人马礼逊《外国史略》、葡萄牙人马吉斯《地理备考》、美国人高理文《美理哥国志略》等；并且还亲自询问英夷俘虏，将了解来的情况，写成文章辑入本书，如《英吉利小记》。百卷本先后共征引历代史志 14 种，中外古今各家著述 70 多种，此外还有各种奏折 30 多种。

《海国图志》既是一部记述世界各国地理、历史和经济、政治、军事、科学技术、宗教、文化等情况的外国史地著作，又是一部军事地理著作，是一部海防大全。它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是一部“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海国图志》卷首）的愤时之作，介绍史地知识、科学技术只是手段，御侮图强才是目的。其最大特点是具有强烈的反侵略思想，从选材到内容安排，都紧紧围绕这一思想展开。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贯穿全书的最主要思想。魏源从介绍夷情入手，用“师夷”作手段，以“制夷”为目的。他提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海国图志》卷一）“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海国图志》卷首）魏源通过鸦片战争，比较了敌我双方的优劣，认识到要抵制西方侵略（制夷），必须向西方学习（师夷），提出了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他认为，对于以“洋艘洋炮”为“长技”的侵略者，既不要惧怕，也不要轻敌，主张对英国侵略者要“力持鸦片之禁，关其口，夺其气”，把外流的白银，用来“购洋炮洋艘，练水战火战之用，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道光洋艘征抚记》下）。

依靠人民群众，反对外国侵略，是《海国图志》的又一重要思想。魏源通过沿海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事实，看到了人民的伟大力量，提出了利用民众的力量打击侵略者的主张。他认为，“调客兵不如练士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挑选土著之利有三：一曰服水土；二

曰熟道路；三曰顾身家”。并指出：“广东岸上力作之人与水中渔贩之人，其技勇皆欧罗巴人所不及，若挑练此等人为兵卒可谓一等勇壮之兵。”（《海国图志》卷一）他还主张裁减水师，以本地人充任，“取诸沿海渔户枭徒者十之八，取诸水师旧营者十之二，尽裁并水师之虚粮冗粮，以为募养精兵之费”。（《海国图志》卷二）魏源把抵抗侵略的人民群众称为“义民”、“义兵”，予以歌颂赞美；而对那些仇视、害怕和污蔑人民为汉奸的投降派的无耻澜言予以坚决驳斥：“若谓闽粤民兵虽可用，而多通外夷”，那么“何以广东之斩夷酋、捐战船者皆义民？两禽夷舶于台湾、火攻夷船于南澳者亦义民?”（《海国图志》卷二）并举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具体事例说：“三元里之战，以区区义兵，围夷酋，斩夷帅，歼夷兵，以款后开网纵之而逸，孰谓我兵陆战之不如夷者?”（《海国图志》卷一）

《海国图志》还提出了“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海国图志》卷一）的海防思想。魏源之所以提出与明代郑若曾等人完全相反的海防思想，是因为，清朝所面临的敌手和明代倭寇有很大不同，他们船坚炮利，具有海上作战的优势，清军必须扬长避短，方能制服敌人。所以，魏源提出要采取类似游击战的战术，具体战法是：选择有利地形，扼守内河，坚壁清野，选练精兵，备好火攻，埋伏奇兵，诱敌深入，然后依靠“兵炮地雷，水陆埋伏”，狠狠打击侵略者。他认为采取这种战术，就会：“如设阱以待虎，设罾以待鱼”（《海国图志》卷一），必制敌于死地。

《海国图志》的内容和思想都很丰富，研究成果也很多，这里仅挂一漏万地介绍了它军事方面的主要思想。该书出版后，对洋务派、改良维新派，以及国内当时及其后史学界对世界史地和西北地理、元史等史学研究，对中国海防研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对改良维新派的启迪。它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它在国外也引起了重大反响。英国人威妥玛曾将其日本部分译成英文，刊于《中国丛报》第19册，向西方介绍；德国传教士郭士立也对该书作了选译，供西方研究者参考。它在国外的影响，最大的是日本，他们几经辗转翻刻，传播甚为广泛。中外学者对该书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如清张之洞说：“《海国图志》是为中国知西政之始。”（《张文襄公全集》卷二〇三）日本盐谷世弘称赞《海国图志》是“名为地志，其实武备大典”。（《翻刻海国图志序》，《宕阴存稿》卷四）

当然，《海国图志》也有其局限性。在编撰方面，除《筹海篇》和各部分的叙文和按语，以及《元代北方疆域考》等文字为他精心撰述外，大多是辑录他人著作汇编而成。而且汇编时其中原有的欠缺与错误，也没有作较多的纠正。在思想方面，他主张利用民力反对外国侵略，却又想借此转移斗争目标，企图使“沿海销无数之械斗。中原收无数之枭匪”，并称之为“以毒攻毒”（《海国图志》卷一）。他主张“师夷”，但只限于学习造船制炮和养兵练兵之法；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虽沾沾称许，但却没有改革封建统治制度的意向。尽管如此，《海国图志》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著作。

《海国图志》出版后，进行了多次翻刻，有道光甲辰年（1844年）古微堂聚珍版五十卷本、道光己酉年（1849年）古微堂重刊六十卷本、咸丰二年（1852年）高邮刊百卷本（以下均为百卷本）、同治六年（1867年）陈善圻重刊于郴州本、光绪二年（1879年）魏光焘平庆泾固道署重刊本、光绪六年（1880年）邵阳急当务斋新镌本等十余种版本。

【《百将传》】

《百将传》，宋刻残本称《张氏集注百将传》，元、明刻本又称《十七史百将传》、《正百将传》。张预撰。张预，字公立，北宋东光（今河北省东光县）人，生平不详，只知他注过《孙子》（见《十一家注孙子》），非常推崇孙武。他用数年的工夫，按照《孙子》的思想，选编了《百将传》。他在该书“进表”中说：“观历代史书，上下千余载间将兵者，所以成，所以败，莫不与武之书相符契”，“因择古之所谓良将者，得百人，以其传集成一书，分为十卷，以太公为首，而其次皆以年代，题曰：《百将传》。”（明刻本《十七史百将传序》）本书名将事迹虽采集自五代之前的史书，但并非原封不动地照录原书传记，而是按照一定的选材标准和编纂体例进行重新编辑。其选材标准和体例是：“凡史辞泛漫而不切于兵者，一删去之；或非兵略可以资人之智虑者，间亦存焉。虽期便于观阅，然亦全其始末。传取数事，先以《孙子兵法》题其后，次以行事合之参校其得失。”（明刻本《十七史百将传序》）张预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学者观此不独简而易习，明而易晓，抑亦知孙子之书不为空言，而古之贤将所以成立功名者，岂无法哉”。（明刻本《十七史百将传序》）

《百将传》，张预“进表”和现存元、明刻本均著录为十卷，但现存宋刻残本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却著录为一百卷，可能是以人分卷的缘故。全书辑录自周初太公迄五代刘词（明万历本《正百将传评林》“词”作“嗣”，《四库总目提要》称“终于五代刘那”）共一百人，每卷十人。具体卷目如下：

卷一：周齐太公、吴孙武、越范蠡、齐孙膑、齐田穰苴、魏吴起、秦白起、秦王翦、燕乐毅、赵李牧。

卷二：赵赵奢、赵廉颇、齐田单、汉张良、汉韩信、汉周亚夫、汉李广、汉卫青、汉霍去病、汉赵充国。

卷三：汉陈汤、汉冯奉世、汉邓禹、汉寇恂、汉冯异、汉岑彭、汉贾复、汉吴汉、汉耿弇、汉耿恭。

卷四：汉王霸、汉臧宫、汉祭遵、汉马援、汉班超、汉虞诩、汉皇甫规、汉张奂、汉段纪明、汉皇甫嵩。

卷五：汉朱儁、魏张辽、魏张郃、魏徐晃、魏李典、魏邓艾、魏司马懿、蜀诸葛亮、蜀关羽、蜀张飞。

卷六：吴周瑜、吴吕蒙、吴陆逊、吴陆抗、晋羊祜、晋杜预、晋王浚、晋马隆、晋周访、晋陶侃。

卷七：晋谢玄、燕慕容恪、秦王猛、宋檀道济、宋王镇恶、梁韦睿、梁王僧辨、陈吴明彻、魏崔浩、魏于谨。

卷八：齐斛律光、周宇文宪、周韦孝宽、隋杨素、隋长孙晟、隋韩擒（韩擒虎）、隋贺若弼、隋史万岁、唐李孝恭、唐尉迟恭。

卷九：唐李靖、唐李勣、唐苏定方、唐薛仁贵、唐裴行俭、唐唐休璟、唐张仁愿、唐王晙、唐郭元振，唐李嗣业。

卷十：唐李光弼、唐郭子仪、唐李抱真、唐李晟、唐李愬、唐马燧、唐浑瑊唐王忠嗣、梁刘鄩（五代）、周刘词（五代）。

《百将传》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辑评名将传略的兵书。它记述人物，着重在用兵的谋略和战法方面。如孙膑“围魏救赵”，减灶诱敌；田单诳称神师下凡，夜摆“火牛阵”；张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韩信背水而战，半渡而击；耿弇逼巨里而致费邑，攻西安而拔临淄；耿恭以毒药傅矢而谓汉家箭神；段纪明欲击鲜卑而诈为召还；檀道济“夜唱筹粮沙”，等等。每将传记最后都有一段评语，先以“孙子曰”引一句《孙子》中的话，再讲人物的一件用兵事例，以说明《孙子兵法》的实用性和名将用兵之法的继承性。评语长短根据人物事迹而定，长至百余字，短则十余字，如司马懿的评语一百七十字，而王猛的评语只有十八个字。这些评语既诠释了《孙子》的军事论点，又评论了名将的用兵得失，也反映了编辑者的军事思想。

《百将传》是一部可读性较强的兵书。它将深奥的军事理论寓于生动活泼的战争故事之中，加上画龙点睛似的评语，读者既可学到名将们的用兵艺术，又可加深对古代兵法理论的理解。因此，它的读者面较为广泛，受到后世兵家将帅的重视。明庆远府儒学训导高谅陈演在为本书写的后序中说：“此乃军旅之龟鉴，而中兴之急务也。”，“此足为治乱持危之筌蹄，而为将者不可不知。”（明刻本《十七史百将传后序》）为适应将帅学习的需要，之后又产生了续、评、增补《百将传》的兵书。

首先续编《百将传》的是何乔新。何乔新，字廷秀，明景泰（1450～1456）进士，历任刑部侍部、刑部尚书等职，为人刚正，长于著述，著有《元史臆见》等多种著作。他在出镇北陲，提督雁门等关兼巡抚山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时，“自念累世儒家于行师御众、营垒战阵之法，素未之讲，大惧无以应变于仓瘁。乃取公立所编（注：指张预编《百将传》），正其讹，补其缺，治戎之暇，辄取而阅之，以考古人用兵胜负之迹，庶几缓急不至于偾事”。（《百将传续编序》）但又感到张预《百将传》有欠缺，意欲续编。便于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考五代及宋元史，又得王彦章以下四十人，芟其浮辞，摭其实事，以续公立所编，本传有缺者，杂取它书以补之。于是上下数千年元戎大帅用兵之迹，可以一览而得矣”。（《百将传续编序》）他采用张预《百将传》的体例，每将传之后也有一段以“孙子曰”开头的评语，将续收的40名将帅传记编成四卷本的《百将传续编》。其卷目如下：

卷之一：梁王彦章、唐周德威、郭崇韬、宋曹彬、曹翰、王全斌、潘美、曹玮、李继隆、尹继伦。

卷之二：狄青、种世衡、郭逵、王韶、种师道、宗泽、岳飞、韩世忠、张俊、刘锜。

卷之三：吴玠、吴璘、李显忠、杨存中、王德、王彦、刘子羽、魏胜、李宝、赵方。

卷之四：孟宗政、孟珙、杜杲、余玠、赵范、赵葵、曹友闻、史天泽、伯

颜、张弘范。

明万历年间出现赵光裕评本，全称是《新刊官校批评正百将传十卷》，著录为东光张预公立集，东浙赵光裕克荣评。此本在原本上增加了眉批。之后，又出现《正续百将传评林》，一称《正续百将传节评》，题宋东光张预集录，明六安张澡节评。所谓节是指对于“传中无关于大体者节而删之”（《锲“百将传节评”引》），所谓评是指张澡的评语，附在原评语之后，并另起一段，均以“平曰”开头。张澡，字子新，号阳泉，明代六安人。袭职六安卫指挥，积功至参将，先后驻浙江十年，御倭有战功，授征蛮将军印。曾镇粤西，寻以南京都督致仕。他“文武并用，翩翩有古儒将风”。（《锲“百将传节评”引》）所以，他节评的《百将传》，“节则简，简则不滥；评则核，核则不晦；俾后学一展卷间道善败如别苍索，不至于按图索骥焉。其功倍于作者多矣，讵徒述焉已哉”。（《锲“百将传节评”引》）明天启三年（1623 年）陈元素编出《名将传》，所收名将逾百人。它虽然源于张预《百将传》，但从内容到书名都有了很大变化，当是另一部独立的兵书，将另文介绍。

【《太白阴经》】

《太白阴经》又称《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唐李筌撰。李筌，号少室山达观子，《唐书》无传，里籍不详。大约生活在唐肃宗、代宗年间。唐乾元二年（759 年）《进太白阴经表》称“正议大夫持节幽州军州事幽州刺史并本州防御使上柱国臣李筌上表”，唐永泰四年（即大历三年，768 年）《序》署名“河东节度使都虞侯臣李筌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集仙传》称其仕至荆南节度副使、仙州刺史，著《太白阴经》。又《神仙感遇传》曰：筌有将略，作《太白阴符》（注：符当经之误）十卷，入山访道，不知所终。”据《新唐书·艺文志》和《宋史·艺文志》等书目记载，李筌还著有《孙子注二卷》、《青囊括一卷》、《阃外春秋十卷》、《通幽鬼诀二卷》、《军旅指归三卷》、《彭门玉帐歌三卷》等兵书。

《太白阴经》本来是一部“记行师用兵之事”的兵书，但因李筌以阴阳数术之说，以为“太白主兵，为大将军；阴主杀伐”（《进太白阴经表》），故取名为《太白阴经》，给这部兵书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后人又编造出所谓“李筌常游名山探奇术，于嵩山虎口岩石壁中得《黄帝阴符经》，遇骊山老姥，指明秘要，洞究深微，撰为兵书，名曰《太白阴经》”（《进太白阴经表》注）的神话。加之书的后半部分辑录了大量医卜星相、奇门遁甲之类的内容，使这部兵书进一步神秘化。揭去它身上的迷彩，就会发现它是一部较全面反映唐以前军事知识的综合性兵书。

《太白阴经》始藏诸名山石室，后献给唐朝廷，“进入内府，不传于世，瑞南宋公先世有传而得之，以辅明廓清海宇，是书之功也。以后子孙，慎勿妄传”。（史氏珍藏尾跋，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因此，此书明以前只有抄本传世。由于传抄者随意删削合并，遂出现六卷本、八卷本和十卷本等不同卷数的本子。考《进太白阴经表》、《新唐书·艺文

志》和《宋史·艺文志》均称为十卷，说明此书全帙应为十卷。

《太白阴经》是李筌花十年心血写成的兵书，搜罗广泛，内容丰富。他在《进太白阴经表》中说："人谋、筹策，攻城、器械，屯田、战马，营垒、阵图，括囊无遗，秋毫必录。其阴阳天道，风云向背，虽远人事，亦存而不忘。小及锥刀，大至城堡，智周乎万物，而道济乎三军，辕门有之，虽桴鼓之吏，厮养之卒，亦可为万人之将。言无文饰，理探玄微，十载修成。"全书十卷共一百篇，具体篇目如下：

卷一　人谋上：天无阴阳、地无险阻、人无勇怯、主有道德、国有富强、贤有遇时、将有智谋、术有阴谋、数有探心、政有诛强。

卷二　人谋下：善师、贵和、庙胜、沉谋、子卒、选士、励士、刑赏、地势、兵形、作战、攻守、行人、鉴才。

卷三　杂议：授钺、部署、将军、阵将、队将、马将、鉴人、相马、誓众军令、关塞四夷。

卷四　战具：攻城具、守城具、水攻具、火攻具、济水具、水战具、器械、军装。

卷五　预备：筑城、凿濠、弩台、烽火台、马铺土河、游奕地听、报平安、严警鼓角、定铺、夜号更刻、乡导、井泉、迷途、搜山烧草、前茅后殿、衅鼓、屯田、人粮马料、军资、宴设音乐。

卷六　阵图：风后握奇垒图、风后握奇外垒、太白营图、偃月营图、阴阳队图、教旗图、草教图、教弩图、合而为一阵图、离而为八阵图。

卷七　捷书、药方：祃牙文（一）、祃牙文（二）、祭蚩尤文、祭山大川文、祭风伯雨师文、祭毗沙门天王文、露布、治人药方、治马药方。

卷八　杂占：占日、占月、占五星、占流星、占客星、占妖星、占云气、分野占、风角、五音占风、鸟情占。

卷九　遁甲。

卷十　杂式：元女式、察情胜败、主客向背、推神煞门户、龟卜、山冈营垒、山形冈陇。

《太白阴经》是在比较充分地研究前人军事论著的基础上写成的。其写作方法一般采用先以"经曰"引出一段前人的论兵言论，接着征引古代战例，将帅事迹，或古代兵法，加以阐述，最后亮出自己的结论。他继承了前代的优秀军事思想成果，介绍了古代许多军事知识，诸如军仪典礼、攻防战具、侦察通讯、行营警备、粮草行装、战场建设、战阵队形，以及古代军中祭祀占卜活动等都有较详细介绍。其中比较有价值的是前五卷，后五卷多为非科学的内容。

前五卷中最有价值的是重视人事的唯物主义思想。李筌认为阴阳不能决定胜败、存亡、祸福、善恶，"凡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索之不得、指虚无之状，不可以决胜负，不可以制死生"。(《天无阴阳》) 阴阳对人是无情谊的，只有依靠人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任贤使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功赏劳，不禳祀而得福"。(《天无阴阳》) 李筌又认为地利虽是用兵的辅助条件，但就像天时不能依靠一样，地利也不能依靠。地无险阻，全在将帅会不会利用。指出："天时不能祐无道之主，地利不能济乱亡之国。地之险易，因人而险，因人而易。"(《地无险阻》) 李筌还认为人的勇怯不

是天生的，也与生长的地方无关，而全在于培养锻炼和使用是否得当，“勇怯在谋，强弱在势。谋能势成，则怯者勇；谋夺势失，则勇者怯”，“勇怯在乎法，成败在乎智。怯人使之以刑则勇；勇人使之以赏则死。”（《人无勇怯》）刑赏能使怯者变勇，使勇者变得不怕死。总之，胜败存亡决定于人谋。人谋的最高标准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他认为“善师者不阵，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善师》）主张以仁义道德为本，“有道之主能以德服人，有仁之主能以义和人”（《贵和》）。崇尚智谋，认为自古以来没有不用智谋而成王业的。所谓不战而胜，就是用阴谋颠覆敌国。重视选贤任能，不仅要求把国内的各种专门人才收揽起来，而且敌国的人才也要求注意收买。主张赏罚公正，要求“赏无私功、罚无私罪”。（《刑赏篇》），重赏有功以励全军，重罚有罪以儆部众。要求将帅关心爱护士卒，与其共安危，同患难，以取得士卒的拥护，听从命令、拼死作战。在军事上重视庙算，乘敌之隙，攻其无备，扬己所长、避己所短，见利而进、无利而止等。他还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实行军屯垦田，以使国家富强，军队强大。

《太白阴经》是唐代重要兵书，它辑录保存了古代许多军事资料，尤其是在唐朝佛教盛行的情况下，他扛起了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大旗，是难能可贵的。它还保存了唐代有关山川道里，关塞四夷等资料，具有一定的军事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太白阴经》问世之后，受到后人的重视。有的在书中大量引用此书的内容，如唐杜佑《通典》就引用颇多；有的给予较高的评价，如清代学者钱曾说：“此书详整有法，篇次精允，军家之要典也。”（《读书敏求记》）当然，它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如它一方面重人事、舍鬼神，强调“敌情不可求之于星辰，不可求之于神鬼，不可求之于卜筮”；（《行人篇》）一方面又辑录了大量阴阳占卜之类的内容，这些内容虽然是古代军中客观存在的东西，但毕竟是非科学的，在一些篇章中，如《鉴人篇》等杂有许多唯心主义的糟粕。我们阅读该书时应该注意鉴别和批判。

《太白阴经》始以抄本流传，现存最早的抄本是明汲古阁抄本，清代又有多种抄本，如清初抄本、清内府抄本、平津馆影宋抄本等。清嘉庆以后，被《墨海金壶》、《守山阁丛书》、《半亩园丛书》等多种丛书收录，刊印行世。以上均为十卷本。另外还有《四库全书》八卷本存世。

【《武经总要》】

宋代官修兵书，曾公亮、丁度等奉敕撰。《仁宗皇帝御制序》中说：“深帷帅领之重，恐鲜古今之学，命天章阁待制曾公亮等同加编定……《武经总要》”，“尚书工部侍郎参知政事丁度总领书局。”这说明曾公亮是编纂官，而丁度是组织编纂者。曾公亮（999～1078），字明仲，北宋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宋仁宗天圣年间中进士，知会稽县，后知郑州、知开封府。仁宗嘉祐六年（1061 年）为宰相，以熟悉法令典故著称。晚年推荐王安石于神宗，共同辅政。熙宁二年（1069 年）以年老自请罢相。加太保，卒谥宣靖。丁度

(990～1053)，字公雅，北宋祥符（今河南开封）人，文字训古学家。仁宗时，累官至端明殿学士。后拜参知政事，罢为观文殿学士，再迁尚书左承。卒谥文简。著述有《迩英圣览》、《龟鉴精义》、《礼部韵略》、《编年总录》、《贡举条式》等。另外，关于阴阳星占等内容是为古代军中专门学问，系由司天监杨帷德等参考旧说编纂而成。

据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康定（1040年）中，朝廷恐群帅昧古今之学，命公亮等采古兵法，及本朝计谋方略，凡五年奏御。这就是说，《武经总要》共用五年编成，成书于1044年。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四、《宋史·仁宗纪》和《玉海》卷一四一记载，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乙卯诏修兵书，并命丁度提举。但未言及完成时间。

《武经总要》分前后两集，各二十卷，共四十卷。其中前集的第十六卷、十八卷，后集的第十九卷各分上、下两卷。明弘正年间刻本移原第十六卷下的《北蕃地理》为第二十二卷，又把原第十八卷下作为第十九卷，改原第十九、二十两卷为二十、二十一卷，这样前集就多出两卷。后集亦如此例。所以有些版本和书目上著录为前集二十二卷，后集二十一卷，合计共四十三卷。然绍定四年（1231年）赵休国跋称全书四十四卷，不知是计算有误，还是合并、缺佚？另外明正统间李进序刻本、明嘉靖刻本附刻《行军须知二卷》，明弘治间李赞刻本、明金陵唐富春刻本附刻《百战奇法》二卷、《行军须知》二卷。

《武经总要》的篇目如下：

前集：卷一：选将、将职、军制、料兵、选锋、选能；卷二：讲武、教例、教旗、旗例、习勒进止常法教平原兵、教步兵、教骑兵（鼓角金钲教场图等）、教法（教条十六事、三令五申）、草教法（并图）、日阅法（并图）、骑兵习五变图、步兵习四变图、教弩法（并图）、教弓法；卷三：叙战、抽队、军争、以寡击众、捉生；卷四：用车、用骑、奇兵、料敌将、察敌形；卷五：军行次第（并图）、行为方阵法（并图）、禁喧、度险、出隘、赍粮、斥候听望、探旗、探马、递铺、烽火、行烽、军祭、军誓；卷六：下营法、营法、诸家营说、下营择地法、绿营杂制、警备、备夜战法、立号、定铺、持更、巡探、漏刻、防毒、寻水泉、养病、征马；卷七：大宋平戎万全阵法（并图）、大宋八阵法（并图）、大宋常阵制；卷八：八阵法、握奇图、金鼓旌旗数、李靖阵法、裴子法、常山蛇阵、八阵图；卷九：九地、六形、杂叙战地、土俗；卷十：攻城法（并器具图）；卷十一：水攻（并图）、水战（济水附，并图）、火攻；卷十二：守城（并器具图）；卷十三：器图；卷十四：赏格、罚条；卷十五：行军约束、符契、传信牌、字验、间谍、向导；卷十六上：河北路；卷十六下：北蕃地理、戎狄旧地、中京四面诸州；卷十七：河东路；卷十八上：陕西路；卷十八下：西蕃地理；卷十九：益利路；梓夔路；卷二十：荆湖北路、荆湖南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

后集：一至十五卷为故事：故事一：上兵伐谋、不战屈人之师、用间、用谋、觇国、用敌人以为谋主、纵生口；故事二：明赏罚、军政不一必败、军无政令必败、将帅和必有功、将帅不和必败、

法贵不犯、兵道尚严、临敌不顾亲、仁爱、士卒同甘苦、亲受矢石、抚士、得士心、得士死力、贵先见、知己知彼、料敌主将、料敌制胜、料敌形胜；故事三：方略、权奇、临时制宜、诡道、奇计；故事四：将贵轻财、将贪必败、临敌易将、将骄必败、矜伐致败、不矜伐、将帅自表异致败、将帅自表异以夺敌心、均服、隐语、先锋后殿、击其后、退师；故事五：出奇、伏兵、多方以误之、声言欲退诱敌破之、声言怠敌取之、称降及和因懈败之、卑辞怠敌取之、甘言怠敌以击之、捣虚、击东南备西北、声言击东其实击西、示形在彼而攻于此；故事六：张大声势、先声后实、疑兵、察虚声、避实击虚、以寡击众、攻其必救、夜击、潜兵袭营、横击、掩袭、伪退掩袭；故事七：持重、轻敌必败、戒轻举、坚壁挫锐、避锐、以逸待劳、矫情安众、军中虚伪、克敌安众心、辨诈伪；故事八：御士推诚、与敌推诚、以恩信结敌人、知人、善用人、解仇用人、使过、示信、示义、以义感人、激怒士心；故事九：绝艺、挑战、势宜决战、临危决战、戮力必胜、骁勇敢前、陷阵摧坚、表里夹攻、乘胜破敌、乘机破敌、乘风雨破敌、散众；故事十：兵贵有继（兵无继必败附）、兵多宜分军相继、救兵、力少分兵必败、分兵势破之、上速、示缓（攻敌有缓急附）、示弱、示强、示闲暇、设诈误敌（此条正文缺）、素教、素备、先设备取胜（戒不备附）；故事十一：新集可击（击未集附）、半济可击、饥渴可击、心怖可击、奔走可击、气衰可击、粮尽可击（粮道不继必遁附）、不得地利可击、天时不顺可击、不暇可击、不戒可击、将离部伍可击、挠敌可击、阵久力疲必败、攻不整、敌无固志可击、击不备、出不意大阵动可败、击未成列；故事十二：饵兵勿食（防毒附）、围敌勿周、穷寇勿迫、高陵勿向、佯北勿从、察敌进止、察敌逃遁、归师勿遏、死地勿攻、立奇功、军师伐国若中路遇大城须下而过、舍小图大、师不袭远、军胜重掠伏袭必败、击归堕、地有所不争；故事十三：察敌降（料降诈降附）、招降、谕以祸福、纵舍、占候、至诚获神助、推人事破灾异、假托安众、下营择地、据险、先据要地、据水草、绝水泉、据仓廪、断敌粮道、伏归路败之；故事十四：水战、济水、断船路、引水灌城、拥水误敌、火攻、用车、用骑、游骑；故事十五：修城栅、攻城、守城、屯田、让功、辞赏。十六至二十卷为占候：占候一：天占、地占、五行占、太阳占、太阴占；占候二：日辰占、五星占、二十八宿次舍、星变、风角；占候三：云气、气象杂占、军行灾异杂占、太乙；占候四：太乙定主客胜负阳局立成、太乙定主客胜负阴局立成；占候五：六壬、遁甲。

《武经总要》是北宋封建王朝用国家力量来编辑的一部大型综合性兵书，也是我国第一部官修兵书。它对于军事组织、军事制度、用兵选将、步骑训练、行军宿营、古今阵法、战略战术、武器装备的制造和使用、军事地理、历代用兵实例、阴阳星占等各个方面都有所论述。其中营阵和武器装备两部分，还附有大量的插图。“前集备一朝之制度、后集具历代之得失”（《四库总目·兵家类》），较完整地保存了北宋前期的军事制度；“采春秋以来，列国行师制敌之谋，出奇决胜之策，并著予篇，随其效

应依仿兵法以分其类目”。极便查找。所以，它不仅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前集价值更大一些。后集的内容，一部分是辑录前代用兵的故事，一部分是论述“兵阴阳”。但是它对于兵阴阳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认为阴阳为军事天文，是用兵的辅助条件，“仰观天文著在图籍，昭昭可验者也”。反对舍人事任鬼神。它说：对于阴阳“使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任鬼神。凡誓军旅履行阵，制胜决于人事；参以天变，则衄者鲜”。尽管它这样认识，但是所辑录的阴阳占卜资料却多属诡诞迷信之谈。

《武经总要》的编纂反映了宋朝至仁宗时军事思想的变化。众所周知，宋初为防止武臣夺权，以“安内”为首，实行以文制武，“将从中御”的治军原则，致使宋军屡遭失败。在血的教训面前，宋朝廷开始否定宋太祖以来的军事思想，认识到“国事在戎，设营卫以整其旅”。（宋仁宗《武经总要序》）在朝廷敕命编纂的这部兵书中，总结了包括宋代在内的历代战争经验，重新肯定了“兵贵知变”这一兵家的优秀传统思想；重视将帅的作用和选拔，指出“君不择将，以其国与敌也”；重视军队的训练，认为“盖士有未战而震慑者，马有未驰而疲汗者，非人怯马弱，不习之过也”；重视赏罚，“申赏罚以一其心”，具体规定了“赏格”、“罚条”，等等。

《武经总要》记载了丰富的古代科学资料，尤其是首次比较全面具体的记载了古代各种武器装备的制造技术。所记载的北宋时期武备上使用的各种长短兵器、远射兵器和防御武器的说明及附图，生动地勾画出了自南北朝、隋、唐、五代传袭而来迄宋更有发展的武器形象的轮廓。它所涉及的科学内容，用现代科学术语表达，包括化学、力学、声学、磁学、热学等，有些方面代表了我国宋代的科学技术水平，有些记载则是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发现。如我国古代四大发明，本书就详细记载了其中的两种。一种是指南鱼。磁性指南在我国发源甚古，汉代王充《论衡》中已出现指南杓。西晋崔豹的《古今注》中也提到过指南鱼，但如何制做，未有详载。《武经总要》第一次详细记载了制做方法：“鱼法以薄铁叶剪裁，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为鱼形，置炭火中烧之，候通赤，以铁钤钤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位，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以密器收之，用时置水碗于无风处，平放鱼在水面令浮，其首常南向午也。”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记载的用地球磁场进行人工磁化的方法。尤其可贵的是，那时我国先人已意识到地球有磁倾角存在，所以，懂得“没尾数分则止”，不让铁片与地面平行放置。另一种是火药配方。火药虽然在唐代已经发明，但最早明确记载火药配方的是《武经总要》。在前集卷十一和卷十二中，记述了三个火药的配方：毒药烟球法，用13种药料，捣合为球；蒺藜火球法，含有10种药料；火炮火药，含有14种药料。另外还记载了现代意义上的火箭，即前集卷十二记载的“放火药箭者，则加桦皮羽，以火药五两贯镞后，燔而发之”。《武经总要》在科学技术史，尤其是军事技术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我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也有着重要作用。

《武经总要》于庆历四年（1044

年）经宋仁宗核定后首次刊行。南宋绍定四年（1231年）又曾重刻。但两宋刊本今均不得见。现存较早的版本是明弘治、正德间（1488年~1521年）据宋绍定本重刻本。此本遇宋帝、本朝字样提行，庙讳痕迹仍有保留，可以看作是覆宋本。1959年中华书局曾将此本前集影印出版。明弘治十七年李赞刻本、明嘉靖刻本、明金陵书林唐富春刻本、明刻本、明万历三十六年庄重抄本等明刻明抄本都是善本。现存版本中惟以《四库全书》本和以此本为底本影印的《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最劣，此本的重要问题是内有缺页，妄事连缀；擅改原著中的“北虏”、“匈奴”等文字；抄写错误；插图失真。

【《武备志》】

《武备志》是中国古代部头最大的一部综合性兵书。全书二百四十卷，约二百万字，附图七百三十余幅，被称为“军事学的百科全书”（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第九章）。这部兵学巨著是由茅元仪历时十五年撰成。

茅元仪（1594~1640），字止生，号石民，又号东海波臣、梦阁主人、半石址山公等，明归安（今浙江吴兴）人，明末杰出的军事家和文学家。他出身世代书香门第，自幼好学不厌，博览群书，尤“喜读兵农之道”（《石民四十集》卷69）。年方十岁，他的家乡吴兴遇大灾荒，太守集议赈荒，官吏及富户无人敢应诺，独有未成年的茅元仪请求倾尽家藏粮食数万石，以救济灾民。他熟悉古今用兵方略，对九边阨塞要害，口陈手画，了如指掌。面对后金政权崛起，狼烟频频，明廷政治腐败，国运衰落，激起了发奋学习，探讨“治国平天下”方略，著书立说，以振兴明朝武备的雄心壮志。他寓居南京，潜心研究历代兵法韬略和当代国防形势，倾注十五年的心血，撰成了《武备志》这部古代兵学巨著，于天启辛酉（1621年）刻印成书。自此，这位年轻学子声誉鹊起，以“知兵”之名被任为赞画，随大学士孙承宗督师辽东，抵御后金。他曾出塞视察红螺山，七天不见烟火，随从都面无人色，而他仍从容不迫。并到江南募集舟师战舰，为孙承宗筹划了辽东水军的部署。不久，孙承宗遭排挤去职，茅元仪亦被削籍，告病南归。崇祯帝继位后，茅元仪赴京向新帝进呈《武备志》，“且上言东西夷情，闽粤疆事及兵食富强大计，先帝命待诏翰林”。（《列朝诗集小传·茅待诏元仪传》）然而却被权臣王在晋等所中伤，以“傲上”的罪名被放逐定兴（今属河北）江村。崇祯二年（1628年）冬，后金骑兵进逼京师，孙承宗于危难之际再度受命督师。茅元仪和二十四骑护卫孙承宗，从东便门突围至通州，击退后金军，解除了京师之危。茅元仪被任为副总兵，督理觉华岛（今辽宁兴城菊花岛）水师。先被权臣所忌被解职，后受辽东兵哗之累，充军福建。辽东军情紧急，请求募死士勤王，遭到权臣阻挠，悲愤纵酒而亡。茅元仪文武双全。明清之际学者称赞他“年少西吴出，名成北阙闻，下帷称学者，上马即将军”（方以智：《流寓草》卷七《酬茅将军》）。他一生著述宏富，据《方以智茅元仪著述知见录》（任道斌编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统计，其著作有《武备志》、《督师纪略》等

60余种，数百万言。但由于屡遭禁毁，多散佚。

《武备志》是一部大型综合性辑评体兵书。它体系宏大，条理清晰，体例统一。全书分类排纂史料，每类之前有序言，考镜源流，概括内容，说明编纂指导思想和资料依据；大类之下有小类，小类之下根据需要设细目，如《军资乘》下又分为8类64个细目；文中有夹注，解释难懂的字词典故，如在《孙子·行军篇》“仗而立者”下注“依兵仗而立”；文旁有批点，用“○”表微妙处，用“ᐅ”表示紧关处，用竖空心线“▭”表示一篇纲领，用竖黑线“▬”表示分段条目，用“⁀⁀⁀”表示隐微处；文上有眉批，或赞扬，或批判，不拘一格，如在《孙子·九地篇》“善用兵者，譬如率然，……击其中则首尾俱至”上批道：“千古阵法，概此一语。李药师稍窥其端，其余名将犹堕云雾中。”《武备志》完备的体例，不仅表明了著者对各个问题的看法，而且为读者把握全书的重点提供了线索。

《武备志》共由兵诀评、阵练制、军资乘、占度载五大部分组成。

《兵诀评》，18卷，选录《孙子》、《吴子》、《司马法》、《三略》、《六韬》、《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全文和《太白阴经》、《虎钤经》的部分内容，进行评点。他非常推崇《孙子》，“自古谈兵者，必首推孙武子”。他还有一段名言：“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谓五家为孙子注疏可也。”（《兵诀评》）后人在引用这段话时往往掐头去尾，只取中间一句，来证明《孙子》是古代“空前绝后”之作，实际上是不符合茅元仪本意的。茅氏是将《孙子》与先秦其他五家兵书相对比得出的结论。尽管如此，茅氏评说仍有偏颇之处。不可否认，《孙子》的成就最高，但其他五家也各具特点，都在不同的方面对《孙子》有所发展。

《战略考》，三十三卷，按照时间顺序，从战略的高度选录了春秋、战国、西汉、东汉、三国、晋、宋、齐、梁、陈、隋、唐、五代、北宋、南宋、元等十六个朝代有参考价值的战争战例。茅元仪认为，“良工不能离规矩，哲士不能离往法。古今之事，异形而同情，情同则法可通；古今之人，异情而同事，事同则意可祖”。（《战略考·序》）所以作《战略考》“以为今之资”。古代战争战例资料非常浩瀚，他并非有记必录，而是有严格的标准：一、不是讲战略的不录，“非略弗录”；二、不是奇略不录，“略非奇不录”；三、要能启人心智，“每举一事而足益人意志”；四、要能“言之竟日而弗倦，试之万遍而不穷”。《战略考》共选录六百余个战争战例，大都在历史上以奇谋伟略取胜著称，如马陵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虎牢之战等等。

《阵练制》，41卷，由“阵”和“练”两大部分组成，前者强调要详细，后者强调要通俗实用，“阵取其制，制则宁详；练取其实，实则宁俚。”（《阵练制·序》）“阵”下又分94个细目，附三百一十九幅阵图，详细记载了从先秦至明代各种阵法阵图，堪称古代阵法阵图大全。茅元仪认为，古代阵法失传，后人便胡编乱造。本来古人量地制阵，出现方、圆、曲、直、锐之形，可后来有人便“易以旌旗之名，诡以神将之

临，重以五行之目，饰以五方之色，淆以吉凶之门”（《阵·序》），把本来很形象实用的阵法搞得扑朔迷离。其原因是秦以来谶讳盛行，阵法也被蒙上了神秘色彩。其中“有最卑浅而无当者”。对这些诡诞不经之作，如果废掉，有人反而会以此惑世，“故谱而存之，鲜有删铲，阵所掊击，以广学者之目。”（《阵·序》）“练”又分选士、编伍、悬令、教旗、教艺五部分，详记士卒选练之法。有士卒的选拔淘汰，车、步、骑、水兵的编伍，赏罚律例，教兵方法，兵器训练等，多采自唐宋以来的兵书《太白阴经》、《虎钤经》、《行军需知》、《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

《军资乘》，五十五卷，由营、战、攻、守、水、火、饷、马八部分组成。类下又有子目，子目下又分细目，内容非常广泛。现将子目抄录于下：营：营制（下设十八个细目，记李靖等立营方法）、营算、营地、营规、夜营、暗营；战：军行、渡险、赍粮、寻水、候探、烽火、乡导、审时、布战、料敌、应战、设险、人伐、受降、符契、旌旗、器械（下设三十三个细目，记弓矢刀剑等兵器）、祭祃；攻：措置条件、器具图说；守：城制、约束、需备、措应、器式、堡约；水：水利、水平、战船、济水、禁涉、海候；火：制火器法（下设三十七个细目，记各种火药制造方法）、用火器法（下设五个细目，记各种条件下火器使用方法）、火器图说（下设四个细目，记各种火器图式）；饷：屯田今制、屯田水利、河漕、海运、车运、骑运、人运、米盐、宴犒、矿砂、医药；马：相形、相毛、齿诀、刍水、医药、禁忌、简别、结束、驰骤、征调、厩牧、贡市、虏产。从以上子目可以看出，这部分所记军用物资完备而详细，从攻守器械、火器火药、车马战船到粮饷米盐无不具载，堪称古代军用物资大全。尤其是在军事技术方面收录资料更丰富，共收录各类武器装备六百余种，其中仅火器即达 180 多种。是收录军事技术成果最多的一部兵书。不仅如此，它还首次辑录了火龙出水（一种龙头多发火箭）等他书罕载的珍贵资料。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海候”部分占风、云、雾、电、海潮等内容与《占度载》的占验内容不同，它是当时气象经验的总结，没有把自然现象与人事相附会，有一定实用价值，如“占雾门”用雾相预测天气：“晓雾即收，晴天可求。雾收不起，细雨不止。三日雾蒙，必起狂风。白虹下降，恶雾必散。”还记载了浙东等沿海地区的潮候。

《占度载》，九十三卷，由占、度两部分组成。“占”即占天，记天文气象。子目有：占天、占日、占月、占星、占云、占风雨、占风、占蒙雾、占红霓、占霞、占雨雹、占雷电、占霜露、占冰雪、占五行、太乙、奇门、六壬、杂占、选择、厌禳。这部分内容反映了古代人们对天文气象的朴素认识，如“天色惨黄为风”等。但是转而把自然现象与人事相附会，便成为谎诞迷信之说，如“天色惨白，风声凄切，大兵起”等。

“度”即度地，记兵要地志。子目有：方舆（下分一统图等十六个细目，详讲内地）、镇戍（下分蓟镇等九个子目，详讲边疆）、海防（下分二十七个细目，有“日本入犯图”、广东、福建、浙江、南直隶、山东、辽阳等沿海地区总图、兵险考等，详讲沿海）、江防

（下分江防考等五个细目，详讲江河）、四夷（下分四夷总图等十九个细目，详讲周边属国）、航海（讲航海所到诸国，即所谓声教）。茅元仪认为曾公亮《武经总要》“独载边塞道里之远近，而于方舆之概，户口兵马之数，缺如也”，“近王将军之谈地理也，详与沿革，旁及山川，则太矣，而于关要者仍有缺，非所以言武备也。故我志武备而终之于度”。（《占度载·度·序》）这部分详细记载了明代的山川形势、关隘要塞，道里远近，州府及卫所设置、兵马驻防、督抚监司、镇守将领、钱粮兵额等内容，尤其是收录了郑和航海图，即《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蕃图》，以及航海用《过洋牵星图》，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武备志》在内容和编纂方法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1）广收博采，内容丰富。茅元仪的祖父茅坤是著名藏书家，又“究极兵家之学，其书多秘诸枕中”（顾起元《武备志序》），为茅元仪采辑兵学资料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然而他不满足于此，又四方搜讨传借，私访秘图写本。“其所采之书二千余种，而秘图写本不与焉；破先人之藏书垂万卷，而四方之搜讨传借不与焉”。（宋献《武备志序》）全书囊括了当时兵学的各个方面。（2）选材精当。强调资料要可靠，不凭道听途说；讲实用的问题，不采稗官野史，如他在《占度载·度·序》中说：“其声声之不通于中华者，不敢据稗而信也；贡献不通于大国者，不敢信耳而传也。”紧紧围绕武备选材，如在《战略考》和《占度载·度》序言中规定：“非略弗录”；“于武备稍远者，听之舆图方史可矣”；名胜古迹主要供游览、吊古之用，与行军作战关系不大，“故不敢详”等。注意选录最新资料，全书对明代军事记载最详，不仅选录了先于编者的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的治军、练兵、作战等方面的言行，也选录了与他同时代人的军事资料，如王鸣鹤的“号令说”等。（3）编排合理，有一定的逻辑秩序。全书五大部分，从理论到实践井然有序，又不可分割，郎文唤在序言中以医药作比喻，生动地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首兵诀者，如医之探腑脏，论脉理也。次战略者，如医之举旧案，宗往法也。次阵练者，如医之辨药性，讲泡制也。次军资者，如医之分寒温，定丸散也。终占候者，如医之考壮弱，断死生也。”每部分的子目顺序也是按照它们的内在联系排列的，如茅元仪在交待《军资乘》子目的排列顺序时说：“三军既聚，必先安其身，身安而后气可养，身安而后患可防，故首以营。营具而可以战矣，故次之战。地有异形，时有异势，不可徒恃其野战，故次之以攻。可以攻人，人亦可攻我，故次之以守。五兵之用有时穷，则必济之水火，水火之资生者大，故其为杀也亦暴，智伯曰，吾知水之可以亡人国也，故次之水。水待于地，火时于天，地有定而天常移，是以火之效居多，故次之火。明乎六者而思过半矣，然民以食为天，故次之饷。士以马为命，故次之马。于兹八者，核其详，辨其制，是为军资乘。”（4）评论精炼概括，既讲历史沿革，又讲当代研究的最新成果和自己的看法，具有批判精神。如在评论兵器时说：“诸艺宗于棍，棍宗于少林，少林之说莫详于近世新都程宗猷之阐宗。”（《阵练制·练·教艺·棍·序》）又指

出，弩之法不传，程宗猷革新古弩机，创造出腰开弩，力可达三十六钧（合当时1080斤），而力举三百斤者便可使用。他在“挑壕而营”的上方批评说：“今御虏者，全用挑壕法，所谓自置其身于死地也。”（卷七十眉批）（5）辑录了许多他书罕载的珍贵资料。如一些杂家阵法阵图，连研究阵法的专著《续武经总要》都未记载。尤其珍贵的是收录了“郑和航海图”、“航海天文图”，及明代一些少见的舰船兵器及火器等。（6）图文并茂。全书附图738幅，除《兵诀评》和《战略考》外，都有大量附图，生动形象，便于理解说明文字，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窥见明代兵器、车船等的形制，山川河流的概貌。（7）采用了目录学中的参照法，对交叉重复的内容进行了说明，便于互相参照。如《军资乘·战·器·弩·序》指出：“其详则见于练制中。”《占度载·度·序》指出：“若漕河，见于饷，不复再。”这样读者便可到《阵练制》中去查找弩的资料；到《军资乘·饷》中去查找漕河方面的资料。

《武备志》汇辑了历代的兵学成果，包含的军事思想非常丰富，反映了各个不同时代的特点，但不能视其为辑录者的思想，所以本文不再一一概括介绍，仅据序言和评点对茅元仪的军事思想作一简单介绍：呼吁加强武备，富国强兵。他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此三代之所以为有道之长也。自武备弛，而文事遂不可保”。（《自序》）他痛斥当世士大夫不习兵事，遇有战事惊慌失措，束手无策，误国误民。提出“惟富国者能强兵”，“足饷尤先务”（《军资乘·饷·序》）。主张开矿、屯田、发展经济。重视军队的训练，认为，“兵之有练，圣人之六艺也。阵而不练，则土偶之须眉耳”。（《阵练制·序》）战时号令不齐，“不归于战而归于练”。（《阵练制·练·悬令》）在国家防御方面，主张边、海、江防要并重。针对西北边疆的特殊情况提出“人自为守”的战略方针，指出：“西北诸边，与虏相犬牙，非随地为堡，则子女、牛羊、储粮、蓄刍皆虏资也。虏资粮于我，故我必清野，始可与虏战。有堡始可以清野。虏人自为战，故我必人自为守，始可与虏敌。有堡始可以人自为守”，（《军资乘·守·堡约·序》）对海防提出“其要在拒之于海”。（《占度载·度·海防·序》）又认为江防的战略地位也非常重要，指出：“迫海而亘中区，外溃则为门户，内讧则为腹心，故江之要与边、海均。”（《占度载·度·江防·序》）对于攻与守、盛与衰、强与弱的认识，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例如，他认为我“可攻人，人亦可攻我”（《军资乘·序》），“善守者，使不得攻”。（《军资乘·守·序》）能从攻与守这两方面认识问题。他还认识到物极必反的道理，指出：“夫极盛者，必极衰，天道然也”，“然衰极则盛，理之常也。”并用这一道理论证贡市潜伏危机的道理，劝说明廷振兴武备，指出：“贡市者，体极尊，名极美，而财日浚，备日弛，丁我之盛，其衰伏焉。有所衰，必有所盛，可不畏哉”，“我不振则彼强，故张皇六师，非黩武也。”（《占度载·度·四夷·北虏考·序》）

由于茅元仪长期与清政权处于敌对阵营，加上他为抗击后金政权、保卫明廷的著书目的，书中有许多对女真族和后金的不敬之语，所以，这部很有价值

的兵书在清代遭到禁毁，清乾隆年间被列入《违碍书目》和《清代禁毁书目·禁书总目》。致使这部兵书的版本发生了较为复杂的流变。明天启元年（1621年）刻印本，由于保持了本书原貌，“多悖碍字句”（姚觐元：《清代禁毁书目·禁书总目·补遗一》），在清禁书严律下，流传不广。现在只有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等几个大的图书馆藏有此本，而且有的本子被清代人挖掉了一些“违碍字词”。明天启年间刻的版块，后被汪允文收藏。汪允文，钱塘（今杭州）人，室号莲溪草堂。清初，他对收藏的明刻板块进行挖改修补后，进行了重印，因书名页下印有“莲溪草堂藏板”，故称为莲溪草堂本。此本撤掉了卷首李维桢、顾起元、张师绎、郎文唤、宋献、傅汝舟等六人序，挖掉了茅元仪自序中的“东胡”。清廷取得政权之初，尚无暇顾及禁书，出现了一种刻印较好的据明本覆刻本，由于未著明刻者姓氏和刻书年代，往往使人误以为明刻本。实际上若细心观察亦不难鉴别，因为，它为避清讳对原序言进行了篡改，如茅元仪自序中的“东胡”改刻为“兵戈”；郎文唤序中的“东夷小丑”改刻为“域中小丑”；张师绎序中的“建夷匪茹”改刻为“边陲告警”等等。并抽掉了李维桢序。正文中凡对清“违碍之语”均缺字，并刻成了墨围，还抽去了第二百二十八卷《四夷》中《女直考》的内容。日本宽文4年，即清康熙三年（1664年），日本须原屋茂兵卫据明刻本覆刻。此本增刻有日文假名训点，序和正文未作任何删改，从内容上保留了明本原貌。清至道光时已开书禁，此书得以公开印行。这时的公开印本是木活字本。书前增收了“明史节录”和“茅待诏小传”。此本系据清初刻本排印，卷首删去了李维桢等六人序，“自序”中的“东胡”改排为“干戈”，书中对清“违碍之语”加墨围代替，《女直考》亦被删掉。清末，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湖南以日本刻本为底本覆刻，另外，还有抄本行世。现存各种版本以明天启元年刻本为最善。

《武备志》是中国古代部头最大、类似军事百科性的兵书。它以丰富的内容、比较科学的编纂方法、珍贵的史料，赢得了后人的赞誉，受到社会的重视。在遭到禁毁的情况下，几经翻刻，广为流传，说明它影响深远。在国外，日本不仅于宽文年间据明刻本翻刻，而且于1974年以和文出版发行。它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和军事学术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对于研究军事史、经济史、交通史、海外关系史、科技史、历史地理等均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当然，本书也不是十全十美，无懈可击，在对有的兵书评论时，未有深究，承袭了以往错误的说法，如他评论《三略》说：“本太公所作，黄石公尝推演之授子房。”又如因袭《续武经总要》、《武编》等明代兵书对宋代兵书《虎钤经》的记载，将其作者许洞记为元代人等。

【《兵学新书》】

徐建寅撰。徐建寅（1845～1901），一名寅，字仲虎，江苏无锡人。清末科学家徐寿之子。他“素有大志，抱负雄才远略。在昔壮年时，苦志力学，久而弥笃，博闻强记，无书不读，凡学必精。”（张罗澄《兵学新书序》）初在江

南制造局与李善兰、华蘅芳等翻译西方自然科学书籍，后供职天津机器局，继任山东机器局总办、福州船政局提调。1886年在金陵机器局督炼钢铁和制造后膛枪。戊戌政变后调湖北，总办全省营务，督办保安火药局。1901年因试制无烟火药失事，被炸死。

徐建寅于清光绪四年（1878年）曾任驻德使馆参赞，并赴英、法各国考察，“历观轮船军械各厂，探讨政治风俗，访其议院及其军操各程式”。（张罗澄《兵学新书序》）通过考察，使他认识到，世界上几个军事强国，“蔑弃礼让，竞尚暴戾，挟势不论理，观兵不耀德，角力争雄，恃强凌弱，皆以战胜攻取为其立国要图。我中国若不君臣上下、通国人民合志同心，讲求兵学，亲之信之，尊之重之，则无以洽民心，强兵力，保国本，尊君权”。（《兵学新书凡例》）面对祖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局面，他发愤研究军事，探讨各国新法之精理，汇辑泰西诸书之精华，撰成《兵学新书》。

《兵学新书》又称《兵法新书》，十六卷，附图370余幅。卷一记哨队官长操兵之法及一旗之制；卷二、卷三记旗哨官长操兵之法；卷四记营旗官操兵之法，并及一营步兵之制；卷五记统领分统布阵之法，示以进攻布置之程式，以及一军之制，并总论用兵要诀；卷六为马兵列阵运用及马兵一旗一合营之制；卷七记炮兵操练、运用及炮兵一旗之制等；卷八为步、马、炮合用之法，以及考徵古来战事之要和调度方略之用；卷九为挑民兵、集民饷之制；卷十为粮饷、衣食之制，军市、转运之法；卷十一论枪炮军械，皆取新法适用之件，其旧法粗笨及过于纤巧不适实用者，皆置不录；卷十二论挖筑沟墙，以明数十人至数万人防守攻取之法；卷十三论行军旷野，预备宿食之法；卷十四论造望台、筑道路；卷十五论行军、铁路造筑之法；卷十六论以铁路运兵之章程及仓猝毁坏铁路不资敌用等。其具体卷目如下：

卷一　一旗初操（步兵）：一旗之制、练力、持枪、走阵、打靶、队长、行路。

卷二　一旗阵式：阵式、紧队、散队、放枪、估距、刃刺、旗哨官长。

卷三　一旗运用：运用、总纲、住守、进攻、退回、拒马兵、树林、要隘、村镇、堡墙、诱敌、劫袭、应急、巡护总论、行路巡护、住营巡护。

卷四　一营阵式：营制、走阵、运用、进攻、住守、退回。

卷五　一军阵式：军制、小军运用、总论、综要、号令。

卷六　马兵：一旗之制、列阵运用、追敌、巡探。

卷七　炮兵：一旗之制、备放、进退、连炮箱车、走阵、雁行、鱼贯、雁行改鱼贯、鱼贯改雁行、阅操官行过、运用。

卷八　综要：步马炮合用、考徵、方略、伤亡。

卷九　教训：挑兵、召募、编营、集饷、教训、弁兵学、将官学、办事官、中军官、弁兵学（奥国）、将官学、升迁、办事官、罪罚。

卷十　粮饷：俸饷、饷簿、衣食、军市、游息、转运。

卷十一　军械：总论、洋枪、毛瑟、漫利夏、马枪、炮论、快炮。

卷十二　沟墙：总论、急筑、暂筑、

土器、用法、全军、大军、镇堡、卡墙、矮墙、卡门、药弹房。

卷十三　宿食：住宿、遮风、卡棚、草荐、坑厕、暂屋、马棚、久屋、印度兵屋、饮食、提水洁净、滤水、起水、炊煮。

卷十四　台路：望台、简便测量、筑路。

卷十五　铁路：铁路军工、铺轨、铺轨人器、叉交路、停车场、号令、各数。

卷十六　运兵毁路：运兵、修整、拆毁、街轨、桥梁、沟轨、土路汽车。

《兵学新书》，“采集各国军政，实事求是，择精语详，自募选训练，以及布阵运用，下至军士起居饮食之微，凡军所需与一切有关于军者，无不绘图系说”。（张罗澄《兵学新书序》）尤其是记述了当时先进的军事技术及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如铁路电报等在军事上的应用。但是，“不载吉凶占验诸异说，可谓集近时兵学之大成，得古今教民之深意矣”。（张罗澄《兵学新书序》）全书内容比较丰富，也反映了编纂者的军事思想。

对于当时何为国家的急务，著者认为，“救世之策，莫若兵学为先”（《兵学新书凡例》）。他提出，维新之政端在富强，富强之基始于学问。设学堂以培才，讲工商以致富，这是正常的道路。但是，惟中国积弱之名已布四邻，觊觎之心日亟，如果是等待人才学成以后再致富，致富以后才自强，那就好像是从容拯溺，揖让拒寇。即使能致富，也必然是慢藏海盗，益启戎心，势弱气消，阽危立待。他并打比喻说：“若不先讲兵学，力图强兵，则设学堂以培才，考工商以致富，不啻勤于稼穑留为四邻之储积；力于南亩以待盗贼之收获，洵足惧也。”（《兵学新书序》）他得出的结论是，欲图存须自强，欲自强须备战，备战必练兵，练兵以御外侮。而要练兵御侮，还必须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调整好国家与军队、君主与民众的关系。所以，他又进一步指出：“兵以卫国，国以庇民，民以尊君，君以治兵。国能自立，民以得安，民皆当兵，国以自立。兵与民，民与君，君与国，国与民，互相连合而不离，君臣上下，通国民人，心志相孚，声息相通，一德一心，虽欲不强不可得矣。欲得君臣庶民声自相通，心志相孚，非详订议章，设立议堂，讲求兵学，选练民兵，难臻御侮之功，而期自立之效也。”（《兵学新书凡例》）

在训练方面，一是主张训练方法要随着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的改变而改变。指出，“今之陆战与昔异，故操练亦因之而异”，（卷四《综要》）“改易古法，每战必胜”，（卷八《考徵》）“布奥之役，用后膛枪，故步兵阵式，已有更改，及布法之役，布之亲兵全军。在圣泼里伐，仍泥旧法，大受法兵快枪之害。昔时步兵不顾敌枪炮之击，而猛进以枪刃冲刺，为长技，泥此而遇新式快枪之击，为害甚大”。（卷八《考徵》）二是重视诸兵种协同训练。提出“步马炮三兵合用，须求各尽其长，要在善择妥便地势，以得展布所长”（卷八《步马炮合用》）的协同原则，并认为，“战阵始终专以步兵为主，马炮二兵，仅以为辅助”。（卷八《步马炮合用》）三是主张实地训练和练为实战。指出，练习要隘防御和进攻作战，“必至实有要隘之处，先操驻守，后操进攻，交互练习”。（卷三

《要隘》）而训练又必须把重点放在临战运用上，“行走阵式既熟，当习临战之运用。古来名将，近时兵书，皆言临战不可徒拘教场、初操行走阵式之板法，必以多营合操临战之运用，则一旦疆场有事，方能制胜克敌”。（卷三《运用》）四是重视训练中的群众纪律。指出，“村镇不便借以操练，恐扰及居民也。仅可率领哨官及哨队长，常往各村镇，观看形势，指示以将来临战遇此应如何运用，并使知攻守俱以边际为最要，不带兵丁，免惊民人”。（卷三《村镇》）五是反对依靠洋人训练军队，主张起用中国有志之士当教官。他认为，召募外洋将弁作教官，“语言不通，情意未达，学其外貌，遗其精义，知其一而漏其万，及至有事于彼之时，外洋将弁例皆告退。平时徒费巨款，仅得粗浅皮毛，战时全不得用。”所以，“非集中国有志之士自行讲求兵学之精义，必不能训练兵士，使成劲旅”。（《兵学新书后序》）

在兵役制度方面，提出了抽丁之制。即每二百壮丁抽一人为兵，其他壮丁每人日出一文钱供养这一兵。三年期满复员回家，仍操旧业。一有战事，可按籍召回军队。全国按二十二行省计，可得兵四十余万人。他认为，这样做，既可节省国家养兵之费，民众负担又不会过重，“国家防御有资，民间治生不害，烦苛免而民乐从，国用充而精锐成”。（卷九《筹兵》）他还提出了兵制与学堂相辅而行，文武合一的主张。认为，“欲通国士民，学问精妙，要在通国士民，人皆当兵，方能无人不力学。盖兵制与学堂相辅而行，武备即学问，学问即武备，两相附丽不能分，亦不可分。分之国贫且弱，合之国富且强，必学问深而武备始精。学问既深，将弁兵丁，无一不各尽其职。于是通其学问，以及士农商工，政治风教，自能渐渍相化，莫不精诚核实，而通国臣民，自皆奋勉鼓励矣。数十年来，西德、东倭，勃然以兴，皆由此道也。士民入营三年，无日不致力于学问，三年期满，学邃品端，在营即为精兵，回家即为君子”。（卷九《教训》）

《兵学新书》以新的内容和新的思想为古老的中国兵学注入了新的血液。它刊印于戊戌维新之时，对于当时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尤其是军事改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当然，它还不可避免地打着封建思想的印记，如多次申明“尊君权”、“尊我君”等。

《兵学新书》流传不广，仅见有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刊本。

【《治平胜算全书》】

《治平胜算全书》，清代军事类书，题年羹尧辑，书前有年羹尧自序。年羹尧，字亮工，号双峰，汉军镶黄旗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 年）进士，改庶吉士，任四川、广东乡试考官，后迁内阁学士。他因深通兵法，熟谙地理险要，擢升巡抚，历任四川巡抚、四川总督、平西将军、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是清代著名的军事将领。他多次上疏言兵，提出了“以番攻番”，“宜步不宜骑”的御边之策，并亲自驰骋在西北西南疆场十余年，戡乱西藏，平定青海，为捍卫和巩固多民族的国家统一作出了贡献。雍正三年（1725 年）因所写贺表有误，触怒雍正，削去总督之职，调任杭州将军。又因他抗旨不遵，职务尽削。继则

罗列九十二条罪状，被雍正赐死。

年羹尧《自序》称："爰不揣鄙陋，采辑古来帝师王佐营阵，以及先民制器尚象阵式，汇为一册，二十卷。久欲谋之梨枣，以公同志，无奈南辕北辙，东讨西驰，刻无停晷，未能竣事。今谪官武林，闭门谢客，旅舍无聊，检点旧箧，复观此书，因叹数十年之精力，至今日乃淹没于残笥破簏之中，亟为装订成帙。"如果这篇《自序》可靠的话，说明本书由年羹尧亲手采集军事资料汇编而成。由于他身任军职，南征北战，无暇刻印。直到他被贬官杭州时，才装订成帙。自序时间题为雍正二年春三月，似有误，因他"谪官武林"是雍正三年春天，所以自序时间应为雍正三年。他在《自序》中还说："窃欲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以俟将来君子。"说明他自己未有刊印。而他于雍正三年十二月被赐死身亡，后人也未为之刊印，因此只有抄本传世。

《治平胜算全书》二十卷，一种抄本作十二卷，系以类目分卷；还有一种抄本分为二十八卷。全书约十五万字，附图四百五十余幅。为便于了解它的收录内容和编排体例，特将其详细卷目抄录于后：

卷一　战地：杂叙战地、叙战、九地、六形、土俗、城制图、弩台图。

卷二　仪制：仪注、庙誓、军誓、军祭、定惑、行赏、临行变阵图、大将军行营旗鼓说、军约、结状式。

卷三　仪制：排列图、乡导、间谍、阵号、符契、字验、传信牌、干酪、备干粮、斥堠听望、探旗、探马、递铺、烽火、行烽说。

卷四　古阵：古阵叙法、大阵、东西拐子马阵、先锋阵说、策先锋阵、分马后队、八阵法、黄帝所传风后握奇阵图、续握奇图说、握奇阵记、李靖阵法、万全阵法、大宋平戎万全阵图、宋八阵法、诸葛八阵记、诸葛瞿塘方阵辩、伏羲六十四卦内外图、黄帝纵布握奇图、孙武八阵图、阵法正宗十八势。

卷五　阵法：阵法总说、裴子法、裴子又法、方阵图说、圆阵图说、牝阵图说、牡阵图说、冲方阵图说、车轮阵图说、罘置阵、雁行阵、方大阵、圆大阵、牝大阵、冲方大阵、车轮大阵、罘置大阵、雁行大阵。

卷六　阵法：八阵图、推演八阵法、八阵图说、天覆阵、地载阵、风扬阵、云垂阵、龙飞阵、虎翼阵、阵法十四势、鱼复江八阵、骑兵二十四阵、骑滚兵阵、骑兵归营、常山蛇阵、骑兵战方阵、炮方阵。

卷七　下营：诸军营法、下营法、绿营杂制法、偃月营法、裴绪营法、警备法、备夜战、立号法、定铺法、持更法、迫探法、漏刻法、防毒法、寻水泉法、养病法、征马法。

卷八　下营：营法（并图三）、行别方阵、右方营法、行军辎重、立成方阵。

卷九　守城：守城法、守城论、守城说、守城问答、原信、暗门、插板、钓桥、垂钟板、蓖篱笆、皮竹笆、木马子、狗脚木、竹立牌、布幔、皮帘、土色毡帘、撞车、绞车、铁撞车、刀车、木女头、木櫑、砖櫑、夜叉櫑、车轮櫑、狼牙拍、飞钩、水袋、水囊、麻搭、唧筒、风扇车。

卷十　守城：穿环、陷马坑、机桥、鹿角木、挡蹄、地涩、铁蒺藜、铁菱

角、拒马木枪、拐枪、抓枪、拐刃枪、钩竿、锉手斧、叉竿、布城说、布城图式、拒马式、蒺藜式、软壁式、木城式、刚柔牌式、鬼箭式、张弩式、连弩式、飞炬、燕尾炬、鞭箭、火药鞭箭、铁火床、游火箱、行炉、引火球、蒺藜球、铁火鹞、竹火鹞、猛火油柜图说、火楼、揚丝杈、横筒、通锥、钓锥、碗、勺、沙罗、霹雳火球、火锋、烙锥、烙铁、地听。

卷十一　攻城：攻城法、攻城略、地道、木排搭绪棚、绪棚盖笆、绪棚两边垂笆、雁翅笆拐、木挂搭绪、排搭绪棚、屏风牌、屏风笆、编皮笆、上头车梯、炮楼、壕桥式、行炮车、折叠桥、云梯、火车、飞梯、竹飞梯、蹑头飞梯、辒辒车、木牛车、尖头木庐、木幔、望楼图说。

卷十二　攻城：火镰、火叉、铁锚、火钩、短刃枪、短锥枪、蒺藜枪、拐枪、抓枪、烈钻、欢耳枪、镬锥、蛾眉斧、风头斧、注盘、木盘、皮幔图说、皮透槽、行天桥、绳梯、樯梯、把车、扬尘车、填濠车、濠皮车、巢车、搭天车、枪车、饿鹘车、钩撞车、地戟、风轮船、下城缒车、虎皮车、运干粮车、巷战车、象战车。

卷十三　旗号：带甲神旗、中军坐纛旗、清道旗、金鼓旗、门旗、大五方旗、五方神旗、五方高照旗、五色展光旗、展光杂色旗、五行旗、角旗、主将号旗、豹尾旗、主将认旗、主将腰旗、中军腰旗、千把总腰旗、塘报旗。

卷十四　旗号：二十八宿旗、号带旗、六丁六甲旗。

卷十五　火攻：火攻说、火器说、原火器、神铳议、大神铳滚车、灭虏炮车、轻车、战车、佛郎机图说、小佛郎机说、虎蹲炮式、无敌神飞炮、天坠炮、万弹地雷炮、地雷式、地雷问答、石炸炮、石炸解、炸炮说、自犯炮、地雷炸营、西瓜炮图说、木炮式、子母炮总形、子母铳说、赛贡铳图说。

卷十六　火攻：锡铅铳说、无敌竹将军图说、木发贡说、飞天烟喷筒说、满天烟喷筒式、喷筒式、火妖、火砖包式、火桶、火罐、火枪、飞枪刀式、飞剑、神机箭、火箭问答、火龙箭式、雀杏、火禽、火兽、火牛、火兵、火盗、火船、烟球、行烟说、毒药火球、窝蜂图说、小窝蜂式、蜂窠式。

卷十七　水战：水战、水攻、水济、水平、照板、度竿、蒲筏、飞缸、浮囊、皮船、木罂、械筏、战船说、浮艇图说、蒙冲图说、走舸图说、斗舰图说、海鹘图说、火龙船图说、子母船图说、破船筏图说。

卷十八　原铳：火攻要言、原铳、说铳、铳法或问、炼大小铳火药、大铳药方、小铳药方、火箭方、火弹方、鸟铳药方、火门药方、见血封喉方、器解（即制炮法）、试旧炮法、捻药线法、火药法、炼硝法。

卷十九　原铳：粪炮灌法、制火药法、论铅子、火药问答、噜密铳全形散形、西洋铳全形散形、掣电铳全形散形、轩辕铳全形散形、九头鸟、火弹铳、火溜箭全形散形、鸟嘴铳全形散形、连子铳式、钻筒图、钻架图式、滚槽弹模、钻火箭图式、定火箭图、定自然打成线眼图、定火箭匣式、分形、定自然眼图、定自然眼座式。

卷二十　持铳：持铳图、倒铳药图、装铳药图、实药装弹图、着门装药图、

着火绳图、噜密人打放图、立放图、十数步打放图、五六步打贼图、西洋人打放图、改西洋铳图、五人更番打放图、放掣电铳图、装轩辕铳图、着轩辕铳图、放九头鸟铳图、迭放火箭图、单梢炮图说、双梢炮图说、五梢炮图说、七梢炮图说、旋风炮式、虎蹲炮图说、拄腹炮、独脚旋风炮、旋风车炮式、车行炮式、车炮式、总梢炮式、合炮式、火炮式、炮车式、炮说、铳歌、炮歌。

从以上卷目可以看出，本书所辑内容比较丰富，主要包括军事地理、条令条例、阵法阵图、城邑攻守、旗帜号令、火攻水战、兵工制造及火器使用等。资料来源主要是《武经总要》、《武备志》等大型综合性兵书，也有其他兵书如《兵法百战经》、《救命书》等的内容。综观全书，采辑资料比较重视实用，少有空谈虚论。所辑阵法阵图较他书更重实战应用，如辑录了“阵法正宗十八势”、“阵法十四势”等内容，对阵法的变换运用讲的甚细。卷一所辑对《孙子》“九地”、“六形”的解释，通俗而深刻，比《兵法百战经》所载内容为多。书中一些思想与年羹尧奏疏中的思想相吻合，如“以蛮夷攻蛮夷”，“以边塞之民，召募为用，开辟广土，以食厚赏”（卷一）等。在辑录的内容中也有些真知灼见，如卷九提出的积极防御思想：守城“当出奇用诈，以战代守，以击解围”等。但是由于本书辑录资料以实用为主，所以整部书理论价值不高。在编排上也较散乱，比如关于火铳的制造与使用本应归人火攻一类，反而放在了水战之后，单独列为两类，违背了分类的逻辑性原则。

另外，题名年羹尧撰的《经帮寇轨》（见《清隐山房丛书》），又称《年大将军兵法》（见《八旗丛书》），与本书是同类书，但它录自《登坛必究》，内容只是本书中的一部分。需要提及的是，它将“攻城法”一篇（见《治平胜算全书》卷下）移至其卷端，作为序言，并题年羹尧自序。

【《知古录》】

清代军事类书。分类辑录古代兵家将帅言论和事迹，取宋范仲淹“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之意，取名为《知古录》，意在“以古人之性情正众人之心术，以古人之事功广众人之见闻”，（盛福跋）倡导学习历史和军事理论。

《知古录》系恒称据其读史笔记整理而成。恒称，字寿之，清绥芬人，旗校出身，“身隶旗籍，职厕兵官”。（自序），从军燕齐徐泗间（今河北、山东、江苏一带）。曾统领本旗兵守卫京师，“治军严整，不惮劳瘁”。（伊兴额序）他博览群书，注重研读古代兵法，“遇古人一言一事之足为师法者，往往情不自禁辄手录之，积日既久，裒集斯多”。（自序）但他又感到“故纸成堆，终归无用”。（自序）于是，于咸丰五年（1855年）利用军务闲暇，整理旧日札记，重新加以校阅，从中选出对军事有所裨益的三百余条，分门别类，汇为一书。作者除编有本书外，还辑有《韬钤拾慧录》，系摘抄《百战奇法》、《金汤借箸十二筹》、《练兵实纪》、《虎钤经》等兵书中的片断章节。

《知古录》共三卷，二十八类，约二万字，大致有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兵法通论，选录古代兵家将帅的三十七

条兵法言论，以资借鉴；二是内篇性情，选录一百三十二条有关将帅修养方面的事例，“以正心术”；三是外篇事功，选录一百二十二条有关将帅治军用兵的事迹，“以广见闻”；四是巾帼，选录七条有关古代妇女用兵御敌的故事，“以愧须眉”；五是鉴戒，选录十三条古代将帅的恶德败绩，“以作鉴戒”。具体卷目如下：

第一卷：兵法通论（三十七则）。

第二卷：内篇性情：仁（八则）、贤（二十六则）、能（二十二则）、勇（十一则）、智谋（二十五则）、忠诚（十五则）、恩信（六则）、公正（七则）、谦退（四则）、廉洁（八则）。

第三卷：外篇事功：整暇（十一则）、镇定（八则）、持重（三则）、备御（十一则）、军律（二十七则）、用间（五则）、料敌（十二则）、抚众（十一则）、安民（八则）、受降（三则）、城守（六则）、边防（十一则）、水军（六则）。

附录：巾帼（七则）、鉴戒（十三则）。

恒称以军人的眼光选录历代军事史料，比较重视实用。与同类书相比，其突出特点是比较简练，很少有繁冗的文字。有人称其“条目赅括，拣练精详，在韬钤诸书中，洵属言简意深”，（盛福跋）“《知古录》较之《兵法类案》颇易观览”。（毓孚序）本书的另一特点是注意到了妇女在战争中的作用，辑录了妇女御敌的故事，尽管他的目的是“以愧须眉”，但在男尊女卑思想极其严重的封建社会，能做到这一点也是难能可贵的。本书的再一个特点是重视反面教材的作用，特意辑录了古代将帅中骄横无礼、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等所谓恶德的反面事例，使人们以此为戒。

本书因系由读书笔记整理而成，所以资料来源只限于编者读过的书，采集面较窄；史料虽辑自正史，但编者在摘录时也有剪裁失当之处。作为军事类书，类目过少，内容也过于单薄。

《知古录》书成于咸丰五年，“未尝轻以示人”（自序），直到咸丰十年（1860年），他随军驻防彭城（今江苏徐州）时，才在伊兴额的提议下，由盛介臣、续小泉等捐资刊印。清同治二年癸亥（1863年）避热窝重刊。

【《武经七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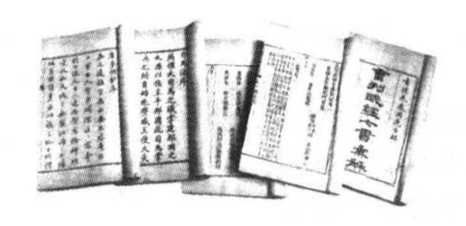
《武经七书》又称《武学七书》，简称《七书》。它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理论丛书，收录从先秦到唐宋间七部重要兵书，即《孙子》、《吴子》、《司马法》、《李卫公问对》、《尉缭子》、《三略》、《六韬》。这七部兵书已分别介绍，这里只介绍作为丛书的《武经七书》的整体情况。

《武经七书》这部兵书丛书是封建社会根据兴武备、建武学、选武举的需要逐渐形成的。早在南北朝时《孙子》就被称为“兵经”（梁刘勰《文心雕龙·程器》），宋初也曾出现过“七书”之称（“七书”指哪七部书不详，见《太平御览》），但《武经七书》作为一个整体正式颁定并被固定下来是在宋元丰年间。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四月乙未（初二，公历24日），宋神宗下诏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并雕版刊

行，号称“七书”，《武经七书》即源于此。自此，《武经七书》被定为官书，颁之武学，并列学官，设置武经博士。《武经七书》是自宋代以来封建社会武举试士的基本教材。能否谙熟《武经七书》，成为统治者选拔军事人才的一条重要标准。

《武经七书》中七书的次序，是北宋国子司业朱服组织校定“七书”时确定的。他校定的顺序是：《孙子》、《吴子》、《司马法》、《李卫公问对》、《尉缭子》、《三略》、《六韬》。现存最早的朱服校定的《影宋抄本武经七书》就是按这个顺序排列的。到了南宋，这个顺序开始被打乱。宋孝宗时刊本“七书”的顺序变成了《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尉缭子》、《三略》、《李卫公问对》（见清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六）。现存最早的宋刊本《武经七书》，即藏在日本静嘉堂文库的南宋孝宗、光宗年间的刊本，又把《六韬》提到了《孙子》之前，其排列顺序是：《六韬》、《孙子》、《吴子》、《司马法》、《李卫公问对》、《尉缭子》、《黄石公三略》。到了明代，刘寅著《武经直解》时，又恢复了朱服校定的次序，仍以“孙、吴”居首，《六韬》居尾。后来，虽又出现许多不同的排列次序，但是《孙子》、《吴子》居《武经七书》之首基本上再没有改变，只是后边的几部书互相移位罢了。

关于《武经七书》的注释。“七书”颁定之前，各书已都有注释，注释最早、注家最多的首推《孙子》。但“七书”颁行时，只有《孙子》录有曹操注，其他六种书都未用注。而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宋刊本连曹注也去掉了，只剩下



《武经七书》

了“七书”的原文。把《武经七书》作为一个整体统一注释，始于宋代的施子美《七书讲义》。此书既有自己的见解，又广引史传作论证，内容丰富，说服力较强。继施子美之后，注解《武经七书》最突出的是明代刘寅。他所著《武经七书直解》，通俗易懂，言简意赅，字解与意解相结合，间以史实相参证，是《武经七书》注解中的佳本。明清学者游士，为应武闱答策之需，注解《武经七书》蔚然成风，出现许多“开宗”、“辑注”、“汇解”、“全解”之类的注释书，如明黄献臣的《武经开宗》、李清《武经七书集注》、陈元素《武经七书评注》、清朱墉《武经七书汇解》等。但这些注释书都在刘寅“直解”以下，往往辑录诸家旧说，以汇辑前人注解为主，间有自己的评注，少有创见。

《武经七书》是中国古代兵书的精华、第一部兵书丛书，是宋代官方校刊颁定的军事教科书。它的颁定，确立了兵书在封建社会的正统地位，促进了古代军事学术的发展，不但在中国兵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世界军事学术史上也素负盛名。

《武经七书》的版本流传经受了坎坷的经历。从史书和书目记载看，《武经七书》是有北宋刊本的。元丰三年就雕版印行过。清代《皕宋楼藏书志》还载有北宋刊本，可惜今不可见。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

年间的刊本，原书藏在日本静嘉堂文库，国内通行的是这个版本的影印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抄本是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的影宋抄本《武经七书》二十五卷（缩微胶卷，原书藏台湾省），著录为宋朱服等校定，张蓉镜等跋。此外还有宋刻元明递修本、明初刻本、明嘉靖三十一年陕蕃刻本、明国子监刻本等。注释本《武经七书直解》曾在明代盛行一时，现在尚能见到的有明成化二十二年赵英刊本、明万历九年莫与斋刊本、明崇祯十年翁洪业刊本、明刊本等。然而到清乾隆修《四库全书》时，竟未收录全书，只收《三略直解》一种。其他六种及至民国才得以从丁氏八千卷楼旧藏中发现出来，影印、排印行世。明清以来各种注释本相继刻印，流传至今的也较多，如明万历乙未年筹胜堂刻周国雍注本、明天启四年李逢申刻李清集注本、明天启元年茅震东刻王守仁评注本、明万历三十二年陈汝忠弘锡堂刻何守法音注本、明末东壁斋刻李贽参同本、明万历十六年刻赵光裕标题正义本、明末金陵唐锦池刻标题正义本、明末金阊十乘楼刻陈玖学注释本、明王立贤刻黄榜重编考注本、明末刻谢弘仪辑注本、明崇祯九年经世堂刻沈应明辑注本、明崇祯十年吴氏富酉堂刻黄华旸类注本、明龚绍山刻陈元素辑注本、明崇祯刻孙履恒裒谷子商骘本、明崇祯刻沈际飞合笺本、明崇祯九年刻黄献臣开宗本、明崇祯五聚堂刻开宗本、清康熙沈定远订正开宗本、清康熙四十八年宝旭斋刻鲁经会解本、清刊（清康熙三十九年刊、四十四年三畏堂光启堂合刊、康熙年间怀山园刊、光绪二年古经阁刊、辉发索绰氏岭南校刊）朱墉汇解本、日本宽文辛丑年（清顺治十八年）日本嵩山堂刻张居正辑注本、清康熙赐书堂刻丁洪章全解本等。

八、著名战役

【涿鹿之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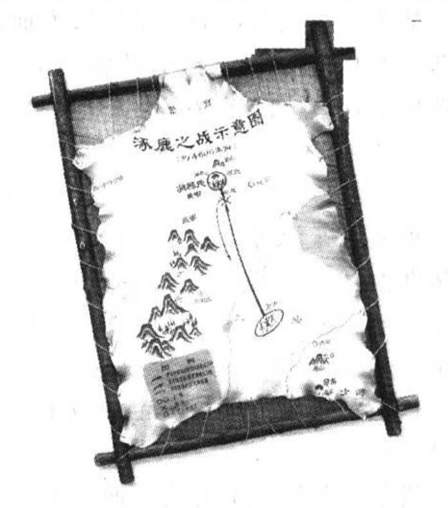
我们中国人总是自豪地称自己为“炎黄子孙”，炎黄指的就是炎帝和黄帝，他们是传说中中华民族的两位始祖。关于他们的故事非常多，尤其是黄帝的传说。在黄帝时代，曾经发生过一件重大的事情，那就是他和蚩尤之间的一场惊天动地的战争。

传说称，黄帝是居于中央的上帝，其余东西南北四方，还各有一个上帝主管着。东方的上帝叫太昊伏羲，辅佐他的是木神句芒，手里拿着一个圆规，掌管春天；南方的上帝叫炎帝，辅佐他的是火神祝融，手里拿着一支秤杆，掌管夏天；西方的上帝叫少昊，辅佐他的是金神蓐收，手里拿着一把曲尺，掌管秋天；北方的上帝叫颛顼，辅佐他的是水神玄冥，手里拿着一个秤锤，掌管冬天。黄帝长有四张脸，四张脸分别正对着东西南北四方，他住在天庭的中央，在土神后土的辅佐下，掌管着整个世界，不论什么地方发生了事情，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蚩尤，据说是炎帝的后代，原系南方一个巨人部族的首领，他们共有兄弟八十一个，一个个都长得身高数丈，铜头铁臂，勇猛无比。他们额上都生有两只坚利的角，耳朵两旁的毛发直竖起来，好像剑戈一样，四只眼睛，六双手，两双牛一样的脚。

蚩尤弟兄们不但形状奇特，吃的东西也和别人不同，他们拿沙子、铁块、石头做家常便饭。他们善于制造各种兵器：锋利的矛、尖锐的戈、巨大的斧、坚固的盾、轻捷的弓箭……这些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除此之外，他们还具有超凡的神力。正因为蚩尤觉得自己本领大，能耐强，渐渐地就不能安分守己了，勃发了要把那尊贵的上帝宝座夺过来，让自己坐一坐的念头。

在去夺黄帝的宝座之前，他想，不如先把老祖宗炎帝的宝座夺过来，壮壮声威再说。于是，他发动了那些早已在摩拳擦掌等候着的弟兄们，带上一群魑魅魍魉，想给这个老头子以出其不意的



涿鹿之战示意图

袭击。太阳神炎帝虽然有火神祝融这样一员大将，本人也有广大的神通和本领，但是一则确实没有准备，蚩尤来得十分凶猛，二则仁爱的炎帝害怕战争会使老百姓受到祸殃。于是，南方天帝的宝座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给蚩尤夺去了。

蚩尤夺过炎帝的宝座，加上他本来就是炎帝的后代，便“名正言顺”地自称起炎帝来了。这个冒牌的炎帝野心很大，他并不把这小小一方天帝的位置放在眼里，他的最终目的乃是要夺取作为中央上帝的黄帝的宝座。

南方的苗民是黄帝传下来的后代，是一个勇敢的民族，蚩尤为了扩充军队，进行他的冒险事业，就看中了这个民族。他利用种种办法鼓动苗民跟从他去与黄帝作对，终于这个英勇善战的民族受到蚩尤的鼓动，便跟着他干了起来。

蚩尤看见时机成熟，便带领着他的军队浩浩荡荡地从南方奔杀到北方来。

黄帝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勃然大怒。但他仍想先用仁慈来感化蚩尤。可是顽强固执、风头正劲的蚩尤哪里听得进去，最终他们只能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了。

战争是激烈无比的，蚩尤这方面的军队，有他七八十个铜头铁臂的弟兄，有苗民，有魑魅魍魉……等等妖魔鬼怪；黄帝方面的军队，除了四方鬼神之外，还有人熊、狗熊、老虎、狐狸、豺狼……种种凶猛的野兽，想来也还有一些来帮助他打仗的下方民族。正所谓棋逢对手，各不相让。——由于蚩尤是冒了炎帝的名号来打仗的，所以这场战争，有人竟把它当作黄帝与炎帝的战争，其实是弄错了。

战争一开始，蚩尤这方面的军队果然表现强悍，黄帝方面虽然有一大群野兽冲锋陷阵，又有四方鬼神和下方一些勇敢民族来助阵，但他究竟也还不是蚩尤的对手，连接吃了好几个败仗，情形相当狼狈。

有一次，正当双方军队在原野上战斗正酣的时候，蚩尤不知弄了一种什么魔法，竟造起漫天遍野的大雾，把黄帝和他的军队团团围在核心，也辨不出东西南北方向。在这一片白茫茫的大雾中，一个个铜头铁臂、额上生角的勇士们显得更加可怕。他们在雾中或隐或现，时出时没，逢人就砍，见人便杀，只杀得黄帝的军队马嘶人叫，虎窜狼奔。

“冲出去呀！冲出去呀！”黄帝手挥宝剑，站在战车上大声叫着。

“冲出去啊！冲出去啊！”四方的鬼神也应和着黄帝的喊声，齐声呐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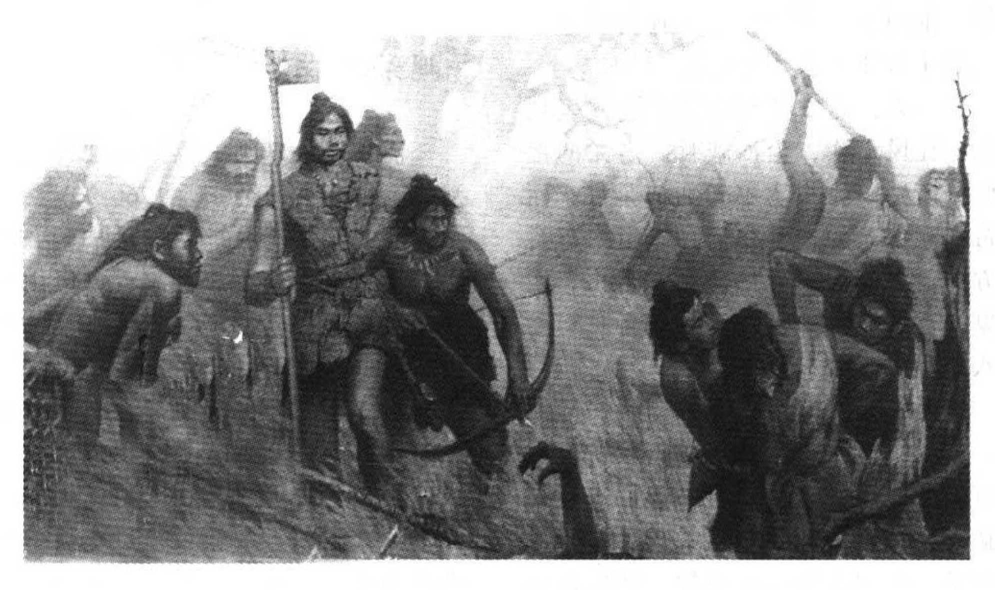
老虎在吼，熊在咆哮，面对这片威胁生命的大雾，谁都希望早点儿冲出它的包围。可是冲杀了老半天，转来转去，还是在这一片白茫茫的大雾中。四方鬼神没了办法，黄帝也束手无策。这雾，仿佛并不是雾，倒像一幅巨大的白布幔子，将天与地整个儿都包罗在它的手中。

正当黄帝愁眉不展的时候，他的一个名叫“风后”的臣子，一个非常聪明的小老头儿，却倚在战车上微微合着双眼，仿佛在打瞌睡。

黄帝见了发怒说：“你不替大伙儿想想办法，还有闲心打瞌睡啊？”

“我打什么瞌睡，我正在想办法呢！”风后霍地睁开眼睛，分辩道。

事实上这个小老头儿也的确是在想办法，他想：那北斗星的斗柄为什么能依着时序的不同而变换它所指的方向呢？假如能发明出一种东西，不管你怎么转，它总能指着一定的方向，一方能定出来，



黄帝、炎帝与蚩尤展开涿鹿之战

其余三方不也就能定出，那问题岂不就解决了吗？

他说干就干，马上动手，在战场上运用鬼斧神工的本领，很快替黄帝做了一辆“指南车”。这个指南车的前面，有一个铁制的小仙人，伸出手臂正指着南方。就靠着这辆车子的引导，黄帝统领着他的军队，冲出了大雾的重围。

但是黄帝对蚩尤，还是愁得没有办法，眼看着他这边军队的士气一天比一天低落，使他不能不暗暗忧虑。于是他干脆把军队暂时交给麾下的大将指挥，自己却跑到泰山上去躺卧起来，筹划对付蚩尤的计谋。

这时，有一个自称“玄女”的鸟身人头的妇人前来见他，说她是天上得道的女仙，特地来教他取胜的兵法。

黄帝对这从天而降的意外的有力支援，当然求之不得，赶紧先向玄女致谢，然后虚心学习种种神奇奥妙的兵法。黄帝得了玄女的传授，按此行军布阵，变化莫测，不可捉摸；同时又得到了昆吾山上火一样的红铜打造宝剑。这种宝剑制成后，变得水晶般的透明，青光四溢，寒气逼人，拿它来切玉就像切泥土一样。

黄帝一下子得了兵法，又得到了武器，顿时军威又大大振奋起来。黄帝想，蚩尤是从南方而来，对北方的天候地形不熟悉，所以决定如兵法中所说的那样，实施后退作战的方针，将蚩尤引诱到一个陌生的地域，以增加其生活和行动的困难，然后再在他战斗力衰退之际，捕捉机会将其一举歼灭。

根据这一构想，黄帝带领他的军队步步后退，开始主动向北撤去。蚩尤高兴极了，以为不久就能坐上中央大帝的宝座，就命令自己的部队快马加鞭，跟踪追击。

经过长途奔袭，蚩尤已经深入北方。在生疏的环境中，他们的行动日感困难，精神上所受的威胁也越来越大，不少苗民当了逃兵，更令他们惊恐的是，喷烟吐雾的法力在干旱的北方施展不出来。

当蚩尤率领军队来到涿鹿（今河北

涿州）的时候，部队早已被拖得疲惫不堪，战斗力和斗志大为减退。

这一天，北方特有的沙暴气候表现出来：狂风大作，尘沙蔽日。蚩尤的部众们无所适从，根本不知如何是好；而黄帝则乘蚩尤的迷乱彷徨，以指南车辨别方向，率众向蚩尤部队大举冲击，四方鬼神也各显神通，将敌兵敌将打得七零八落。

蚩尤像一根擎天柱，站在人们的面前，黄帝叫应龙去与他决斗。应龙虽然没有蚩尤那样巨人般的身体，但也长得勇猛无比。他最大的特点就是灵活得像只燕子，打起仗来动作敏捷，能搅得敌人眼花缭乱。蚩尤和应龙一交手，就打得天昏地暗。论力量，应龙也许不是蚩尤的对手，可他打得巧，连老天爷也飞沙走石地来助其声威。蚩尤直觉得两眼睁不开，急忙抽身而逃，应龙紧追不舍。他们跑到一个叫凶黎的山谷里，应龙箭步赶上前去，一刀将蚩尤刺死了。

巨人就这样倒下了。大概黄帝也认为蚩尤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便厚葬了他。传说蚩尤那沾满鲜血的兵器落在地下，便化成了一片枫林，每到秋天，漫山遍野像血一样的红，人们说蚩尤就是死在秋天；又说当月明风静的时候，他的坟墓上常常有红霭冉冉升起，想来这就是那个巨人的瑞气。

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是中国史书上见于记载的一场最早的大规模战争。如果不是黄帝战略思想的指导正确，天下则很有可能永为蚩尤所占领，那神州大地此后的历史又会是怎么样的呢？谁也无法想像。由此可见，涿鹿之战实为我中华民族发轫初期决定日后面貌的一件军事大事啊！

【鸣条之战】

商汤征伐夏桀的鸣条之战，发生在夏桀王十三年（公元前1766年）。

夏朝从传说中的大禹的儿子启开始，中经太康失国，少康中兴，风风雨雨四百多年。自孔甲以后，国运日薄西山，再传三世，到了桀即位，已是气息奄奄。

桀即位以后，把国都迁到了太康住过的斟寻（今河南登封西北）。这个桀天赋很高，就是不务正业。他很聪明，无论什么东西，很快就能学会，但他只把聪明用在吃喝玩乐上；他很勇武，力气大得能把铜钩扳直，把鹿角折断，但他却把劲头使在游猎征战上。桀的生活荒淫奢侈，他日夜与妃子妹喜及宫女、宠幸们饮酒作乐。妹喜爱听撕裂绢帛的声音，桀就亲手撕给她听，逗她高兴。他用人驾车外出游玩，把老虎放到人多的集市中去，以观看人们惊恐躲避的惨状取乐。

有个大臣实在为夏朝的命运担心，就进宫边哭边劝道："大王，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就要灭亡了！"

夏桀笑道："我拥有天下，就好比天上有太阳一样。如果太阳能从天上消失，或许我才会亡国。"

老百姓怨声载道，指着天上的烈日骂道："你这个太阳怎么还不快点灭亡！你要是灭亡了，我们就是跟着一起死也情愿啊！"

夏政每况愈下，而此时由殷（今河南安阳西）迁至亳（今山东曹县）的商族，在其首领汤的率领下逐渐强大起来。

汤做商族首领时，商人只有七十平方里那样大的一小块地盘，但商汤能够

励精图治，奋发图强。他在自己日常使用的一个铜盘上，刻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几句话，表示要天天进取，不断进取。他很关心民众的疾苦，说：“人见水才能照出自己的影子，一个国家只有观察民众的情况，才能知道治理的好坏。”以民众生活作为施政得失的标准，无疑会使国家昌盛、发达起来，所以商族在商汤时代，力量迅速得到了增强。

汤很重视人才，对有才德的人，不论其出身贵贱，皆可以被重用。伊尹和仲虺就是他的左右手，一个出身低微，一个出身贵族，都被汤任命为相国。仲虺的祖先世代在夏朝做官，很有地位，因见夏桀残暴无道而投奔了汤，汤早就知道他的才能，遂任命其为左相。伊尹为有莘国的奴隶，是作为有莘国国君女儿的嫁妆，陪嫁到商汤来的。伊尹在向汤夫妇进献饭菜食物时，与商汤有了接触，便趁机向他讲述如何治国安邦、统一天下的道理。汤觉得伊尹很有本事，居然把他从奴隶中提拔出来，作自己的助手，任命其为右相，地位更在仲虺之上。汤重才的名声传扬开去，不少有才能的人纷纷前来投奔，商汤如虎添翼。

汤还十分重视拉拢其他诸侯国。据说，有一次，汤看见一个人四面张着罗网，跪在地上祈祷：“天上的和地上的所有猎物，都快快收进我的罗网吧!”他便走到那个人的面前说：“你这不是和夏桀一样，要把世上万物都一网打尽吗?”汤替他收掉了三张网，只留下一面，并教那人重新祈祷说：“想往左的，就往左；想往右的，就往右；不听命令的，才进我的罗网。”周围各小国诸侯一听，心想：商汤对鸟兽都这么好，更何况我们这些小国呢！很快就有四十个小国归顺了商。所以后人评价说，商汤网开三面，并不是为了网鸟，而是为了笼络诸侯啊！

夏桀看见商在汤的治理下很快强大起来，就任命汤为方伯，即东方诸侯长，还授予他掌有讨伐诸侯的权力，可代自己执行“王命”。夏桀的本意是想笼络汤，却没想到正好使汤有了扩大势力、剪除异己的方便条件。

商汤为推翻夏朝，进行了甚为深远的谋划和长期的准备。他深知夏桀虽然暴虐无道，为民所弃，但夏朝毕竟已有四百余年的历史，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声威犹在，非自己所可以比拟的。况且夏桀与各诸侯国间有着上下名份之分，以下犯上，是不易获得人心的。于是，他便利用中原百姓崇拜天帝的宗教思想，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广布仁德，以争取人民的拥护。在征伐葛国时，商汤就是这样做的。

在商的西边紧紧相邻的是葛国（今河南宁陵北），它横亘在商通向夏的要道上。葛国的国君对汤怀有敌意，不服从商而忠于夏桀。葛伯的作风也与桀相同，荒淫昏庸，不理国政。葛国在他的统治下，各方面都搞得十分糟糕。葛伯由于无心治理国家，连天地鬼神也不愿意祭祀了。当时的人们都很迷信，认为天地鬼神都是主宰人命运的，必须经常用牛羊和稻谷去祭祀他们。葛伯不祭神灵，这在当时人们心目中是犯了不可饶恕的弥天大罪。商汤看准了这个弱点，就派兵把葛国灭了。

商汤灭掉葛国后，为了做出宽厚仁慈的样子，他一面严格管束自己的军队，不许掠夺财物，一面向各国派使臣进行

解释，说他灭掉葛国是合乎道义的。为了安抚和收买葛国的民心，他又从商国运来大批粮食救济葛国平民，并组织他们开荒种地，让他们只向商国交纳收成的十分之一。这一系列的富民政策，不仅使商国取得了实际利益，而且对周围的邻国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归顺汤国的诸侯日益增多。

商汤在征伐葛国的同时，为不让夏桀对自己起疑心，遂推荐伊尹去夏桀处供职。伊尹带着贵重的礼品去拜见夏桀，并告诉他说，商汤绝没有谋反之心。夏桀看见那么多礼物高兴极了，连声称赞商汤的忠心，并把伊尹留在朝内。伊尹则利用这个机会，仔细观察夏政，调查中原地形，并在夏臣中宣传商汤的好处，对他们进行策反。有了伊尹，商汤对夏桀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

汤灭葛以后，便开始了大规模的兼并扩张战争。战争得到了各地人民的支持，他们都希望早日摆脱夏桀的残暴统治，盼望着商汤的军队早点儿到来。汤军向北攻打时，南边的人有意见；向东攻打时，西边的人又有意见，他们都说，为什么不先到我们这里来？经过十几年的兼并扩张，夏桀的党羽一个个被铲除，最后只剩下了韦、顾和昆吾三个死心塌地跟着桀的诸侯国。当时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商汤武王挥动战旗，手执战斧勇猛威武，

军威雄壮如火烈烈，天下无敌谁敢阻截。

一个昏君三个顽劣，无根无叶，即将消灭。

统一九州，建立王业，打败豕韦，

再伐顾国，铲除昆吾，消灭夏桀。

韦、顾、昆吾是灭夏总决战前的最后三个未被征服的国家。但韦国和顾国都在汤伐桀的进军路上。汤伐桀，先灭掉了这两国，就直逼夏的都城斟寻。而昆吾的军队一直是编入夏军序列的，所以史书上说，夏桀与昆吾是同一天灭亡的。

在讨伐夏桀之前，汤还做了一些试探性的工作。伊尹给汤献上一计，让他停止向夏进贡，看看桀会有些什么反应。这一年他们果然没有像往年一样，向夏送去大量的贡品，桀知道后大怒，以为汤要造反，马上计划派出大军前来镇压，而这正好给早就准备灭夏的汤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公元前1766年，商汤终于兴兵伐夏了。交战前，在举行的动员大会上，汤对将士们说：

“你们诸位不要喧哗，都来听我讲话，此次我伐桀并非犯上作乱，皆因为夏桀罪孽深重，上天命令我来消灭他。”

“今天你们却说：‘我们的君王不怜惜我们，迫使我们放下农事来征讨夏国。’但夏桀确实有罪，我惧怕上天，所以不敢不去讨伐。”

“你们要问我：‘夏国的罪到底怎样？’我告诉你们吧，夏桀耗尽了民力，使国家四分五裂，老百姓怨声载道，所以一定要消灭他！”

“希望你们用心协助我，执行上天的命令，我将要重赏你们，决不食言。如果不服从命令，我就要把你们罚为奴隶或处死，决不宽恕！”

商汤在这篇名为《汤誓》的演说中，俨然以救世主自居，有意夸大自己

受人民拥护的程度，煽动应当以商代夏的心理，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为了迎击商军的进攻，桀连夜调集军队，防守在斟寻城的东面。夏桀刚刚布好防线，商汤的大军就开到了。两军立即交锋，在城外厮杀起来。

一场搏斗之后，夏桀的军队败退下来，他带着残兵败将北渡黄河，逃到了夏的故都平阳。而商汤则采取大迂回作战、切断对方退路的战术，沿黄河南岸西进，并利用大河作掩护，使夏桀不能觉察，等到了潼关附近，突然渡河向北，攻击平阳侧翼。夏桀仓促应战，双方战于鸣条之野（今山西运城东北）。夏朝的军队一触即溃，夏桀一逃再逃，逃到了南巢（今安徽巢湖以西）终被商军俘虏，夏朝就这样从此灭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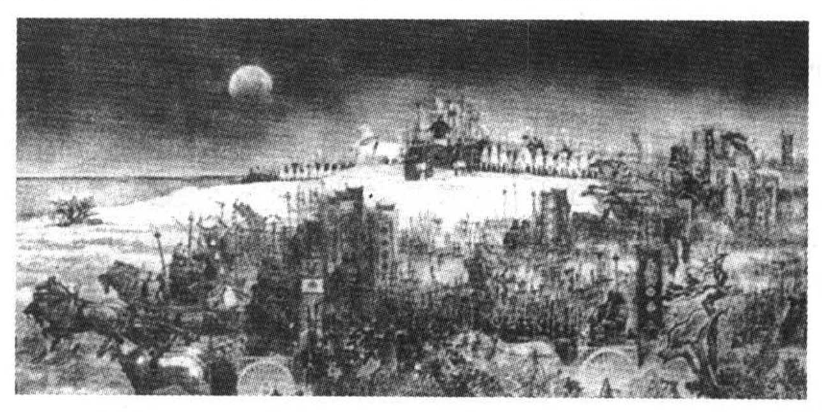
综观商汤灭夏，举凡近代所谓的心理战、宣传战、间谍战、宗教思想战，以及大规模战略迂回与切断敌后方退路等，均有实际运用，可谓中国早期战争史上卓越不凡的战例。

【牧野之战】

约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四年），武王已继位四年，他认为时机业已成熟，决定灭亡商朝。在军事行动之前，武王也有舆论攻势，即向天下人宣布了纣王的六项罪恶：1. 酗酒淫佚；2. 听信妇人；3. 遗弃亲旧；4. 任用邪佞；5. 荒废祭祀；6. 相信天命。

本年初，武王亲率带甲之士4.5万人，还有敢死队3000人，并与早已跟周人结成联盟的其他封国的军队相配合，东渡孟津，开始了讨伐纣王的战争。武王所到之处，各地纷纷归附。到2月5日，武王的联军就在殷都的郊外牧野与纣王的军队摆开了决战之势。纣王也集合起了十几万人与武王相抗衡，可是，因为民心的归向，纣王的军队毫无战心，反而倒戈帮助武王。所以，没费太大的力气，武王就攻进了都城朝歌。纣王眼看大势已去，就登上花费巨资为自己建造的鹿台自焚身亡了。殷商王朝也就这样灭亡在了纣王的手中。

正史上记载武王不费吹灰之力而灭掉商朝，但也有记载说，在武王与纣王的决战中，双方大动干戈，结果是“血流漂杵”，战死者的鲜血之多，把掉在地上的武器都浮了起来。这充分说明牧野一战的酷烈程度。



牧野之战，武王伐殷的决定性战役

【长勺之战】

发生在公元前684年。交战的双方是齐国（在今山东东北部，占有山东半岛大部分）和鲁国（在今山东西南部，与齐国相邻）。战争的结局是鲁胜齐败。这是我国春秋时期弱者战胜强者的一个著名战例。让我们首先从齐鲁关系的恶化谈起。

齐鲁交恶

齐国是春秋时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由于齐国疆域广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又东临大海，有渔盐之利，所以，它的社会经济相当发达。早在春秋初期，齐国就已经开始使用铁制农具，砍伐森林，开垦荒地，扩大了耕地面积。齐国还先后吞并了邻近的一些小国，国力日益强大。鲁国则是比较弱小的诸侯国。无论是疆域还是国力，都无法跟齐国相比。

公元前690年，齐国吞并了跟鲁国有亲戚关系的纪国（在今山东寿县西南）；公元前687年，齐、鲁两国又共同进攻郕国（在今山东汶上县北），但是郕国的土地却被齐国独占。这样，齐、鲁两国之间的关系便紧张起来。

公元前686年，齐国国君齐襄公到姑棼（在今山东博兴县附近）去打猎，碰到了一头凶猛的野猪。齐襄公向它连射几箭，被激怒的野猪竟直立起来，大声嚎叫。齐襄公吓得浑身发抖，从车上掉下来，跌伤了脚，连鞋子也丢了。

原来，齐襄公有个叔伯弟弟，名叫公孙无知，早就想伺机夺取君位。这时，公孙无知听说齐襄公受伤，便派人杀死了齐襄公，夺取了君位。但是，公孙无知即位不久，又被一帮大臣杀掉，国君的位置又空了下来。

齐襄公的两个兄弟——公子纠和公子小白，这时都在邻国避难。公子纠和鲁国国君鲁庄公（前693—前662年在位）是舅甥关系，他和他的师傅管仲都住在鲁国。公子小白和他的师傅鲍叔牙住在莒国（今山东莒县）。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听到公孙无知被杀的消息以后，都想赶快回到齐国去做国君。

鲁庄公为了让公子纠尽快得到国君的位置，特意派了一支兵马和十辆战车，护送公子纠回国；同时派管仲带领一支人马赶到从莒国到齐国的路上，准备半路上拦截公子小白。当管仲带领人马赶到即墨（今山东即墨县）时，公子小白在莒国军队的护送下，刚刚过去不久。管仲得知这一情况后，一口气追了三十里，果然追上了小白。于是，管仲张弓搭箭，嗖地一声向小白射去。那支箭正好射中小白的铜带钩上。聪明的小白将计就计，乘机咬破嘴唇，大叫一声，口吐鲜血，倒在车上，假装已死。管仲见了，信以为真，赶快派人去报告公子纠。公子纠听到这个消息，也认为小白已经死了，就放宽了心，不慌不忙地向齐国进发。等公子纠到了齐国国境时，才知道公子小白早就到达齐国的都城临淄，并做了齐国国君。公子小白就是齐桓公（前685—前643年在位）。这样，公子纠和管仲见国君的位置已经被小白抢先夺去，只好仍旧回到鲁国安身。

这件事使齐、鲁两国的关系更加紧张。因为鲁国积极支持公子纠，想叫他做齐国国君，所以刚刚即位的齐桓公对鲁国非常恼火；鲁庄公也因为公子纠没有当上齐国的国君，对齐国更加仇视。

公元前685年秋，两国军队便在齐国境内的乾时（在今山东临淄西）大动干戈。结果，鲁国战败，鲁庄公把自己乘坐的车子也丢掉了，后来另换了一辆车，才逃脱了性命。

不久，齐将鲍叔牙又领兵打上门来。他要鲁国杀死公子纠，交出管仲。否则，齐国军队就要继续围攻鲁国。鲁庄公没有办法，只得逼死公子纠，囚禁了管仲。这时，鲁国的谋士施伯说："管仲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齐国要是重用了他，将对鲁国不利；不如杀掉管仲，把尸首交给齐国。"但是，鲁庄公没有采纳施伯的意见，把公子纠的头颅和管仲送交了齐军。

管仲等人被押出鲁国国境以后，鲍叔牙亲自迎上前去，替管仲松了绑。他和管仲本来是好朋友，也深知管仲的才干。回到齐国以后，鲍叔牙就在齐桓公面前竭力保荐管仲。齐桓公虽然被管仲射过一箭，但他不仅不念旧恶，反而接见了管仲，向他征求治理国家的意见。管仲的见解很合齐桓公的心意，因此，齐桓公便重用了管仲。

曹刿会见鲁庄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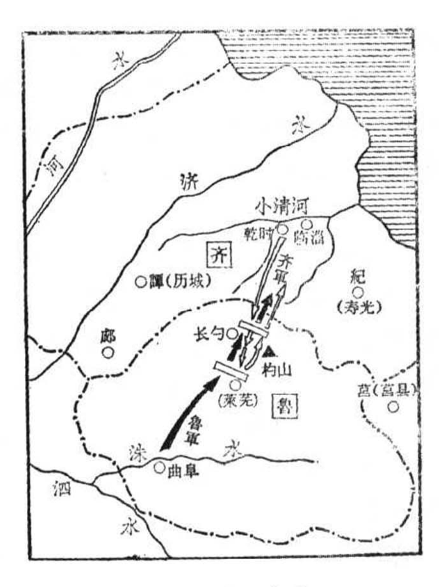
经过乾时一仗，齐桓公的君位开始巩固了。管仲建议齐桓公对内要革新政治，整顿军事；对外要联络其他诸侯，同他们结好。等到自己的力量进一步强大起来以后，再乘各诸侯内部发生变乱的机会，想法扩张势力。但是，齐桓公急于向外扩张，没有采纳管仲的正确意见。公元前684年春，他又发动了对鲁国的战争。

这时，鲁国吸取了乾时之战失败的教训，加紧训练军队，赶造各种兵器，并疏通了曲阜以北的洙水，加强了对国都的守备，以防备齐国的再次进攻。同时，在政治上，鲁庄公也做了一些取信于民的工作。所以，面对齐国的进攻，鲁庄公决定动员全国的力量同齐国决一胜负。

鲁国有一个名叫曹刿的人，听到齐国要进攻鲁国的消息以后，非常着急。他虽然不是什么肩负军国重任的大官，但是他认为，对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事，每个人都有责任来关心、过问。于是他决定去见鲁庄公，跟他讨论有关这次战争的问题。

曹刿的乡亲们知道后，纷纷阻拦他。他们说："战争是国家大事，让那些成天吃鱼吃肉、酒醉饭饱的大官们去谋划吧，你何必多管闲事呢?"曹刿说："不。那些身居高官的人往往目光短浅，不会深谋远虑。"说罢，就一直向王宫走去。

曹刿见了鲁庄公，开口就问："齐军快打来了，听说你已经做出应战的决策，但不知你凭什么同齐军作战?"鲁庄公正需要有人帮他出主意，见曹刿这样关心国家大事，就高兴地回答说："我对待别人还算是宽厚的，对衣食等生活用品，我从来不肯一个人享用，总要分一些给别人。"曹刿认为单凭这一点还远远不够，还不能作为战胜齐军的保证，就对鲁庄公说："你只不过给人家一些小恩小惠，何况这些小恩小惠又只落到少数人身上，多数人并没有得到。这样，老百姓是不会和你一起去跟齐军死战的。"鲁庄公接着说："我不仅待人好，就是对待天地神明我也是很虔诚的。我在祭祀天地的时候，使用的牛、羊、猪和宝玉、丝绸等祭品，总是有多少就说多少，从来不敢夸大。我这样诚实，



长勺之战示意图

天地神明一定会帮助我打败齐国。”曹刿还是不以为然，说：“你不虚报祭品的多少，这只能算是有点信用，还说不上是很有信用。单凭这些，老天爷不会给你降福，老百姓也不会信服你。”鲁庄公沉默了一会儿，又继续摆他能够战胜齐国的理由。他说：“咱们鲁国每年发生千百起诉讼案件，我虽然不敢说件件了如指掌，判决公平，但是，我总算尽了最大的努力，总算是慎重处理了呀！我想，老百姓会相信我、支持我的。”曹刿听到这里，果然连连点头。他用赞同的口气说：“诉讼案件，无论大小，都关系到人们的生命财产；案件处理得公平与否，会直接影响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你能够这样重视诉讼案件，并尽可能地公平处理，就是为老百姓办了一些好事。因此，我认为你可以跟齐国决一胜负了。”

从上面这些对话可以看出，曹刿跟鲁庄公一样，尽管迷信天地鬼神，对法律的阶级性也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但是，他懂得既要进行战争，就要依靠人民，争取人民的支持。看到了人民的力量，这还是正确的。

接着，曹刿又自告奋勇，请求跟随鲁庄公一起出战。鲁庄公见曹刿很有智谋，便答应了他的请求，让他跟自己乘一辆战车，率领着鲁国军队，去抗击齐军的进攻。

鲁国战胜齐国

当时，齐军仗着兵强马壮，步步深入鲁国。鲁国兵少国弱，处于劣势。为了保存实力，待机反攻，鲁军不得不暂时避开齐军的锋芒，采取守势。后来，鲁军退到一个有利于反攻的地方——长勺（在今山东莱芜北），战局才开始扭转。

齐军攻到长勺后，稍稍稳住阵脚，便先发制人，向鲁军发动猛烈进攻，鼓声震天动地。鲁庄公见鲁军阵地受到威胁，心急火燎，要立刻下令击鼓反击。曹刿连忙阻拦说：“等一等，不要击鼓反击。眼下敌人士气正旺，如果我军出击，正合敌人心意，不如先不跟他们交锋，消磨消磨他们的锐气。”说话间，齐军随着咚咚的鼓声冲杀过来，眼看就要攻入鲁军阵地，鲁军突然万箭齐发，齐军无法前进。齐军求胜心切，一连擂了三次鼓，冲了三次锋，始终没能同鲁军正式交锋。鲁军的阵地象扎了根一样，怎么也攻不动。这时，齐军接连发动了几次攻势，都没有奏效，人人泄气，个个疲劳。

曹刿看准了这个时机，便对鲁庄公说：“齐军已经泄气了，你赶快下令擂鼓，发起反击。”鲁军阵地战鼓一响，士兵们士气高昂，争先恐后地冲向齐军，锐不可挡。不大一会儿，齐军的阵地就被冲垮了。

鲁庄公一见齐军败退，就要下令追击，曹刿又制止说：“别忙，等我看看敌人是真败还是假败。”说着，他就跳下战车，查看了齐军战车留下的车辙，接着又登上战车前的扶手，观察了齐军的旌旗，然后对鲁庄公说：“请下令追击吧。”追击令一下，鲁军军心大振，杀声震天，很快追上了齐军。经过一场厮杀，终于把齐军赶出国境。

鲁国虽然打胜了这一仗，但是，鲁庄公对曹刿的军事指挥却很不理解。战争结束以后，鲁庄公向曹刿提出了一连串问题。比如，为什么要在齐军三次击鼓冲锋之后，鲁军才发动反击？为什么齐军已经溃退，还不让鲁军立即追击？曹刿为什么要查看齐军的车辙和旌旗？

对这些问题，曹刿一一作了回答。他说：“打仗凭的是一股勇气。当士兵听到第一次冲锋的鼓声时，士气正旺；如果第一次冲锋没有成功，再次击鼓冲锋时，士气已经衰退；到第三次击鼓冲锋时，士气已消失殆尽，不会有什么作为了。在齐军三鼓过后、勇气衰竭的时候，我们才擂响战鼓，激发士兵斗志，所以能一鼓作气，战胜齐军。”关于不匆忙追击齐军的问题，曹刿解释说：“齐国是大国，我们不能低估它的实力。齐军开始溃退时，我怕他们是假败。因此，我劝你不要立刻下令追击，以免遭到齐军的伏击，吃亏上当。后来，我见齐军车辙混乱，旌旗也东倒西歪，这说明他们军容不整，十分狼狈，肯定是真的溃败了。所以，我才请你下令追击。”鲁庄公听了这番话，心里明白多了。

在长勺之战中，实力较弱的鲁国，为什么能战胜实力强大的齐国呢？

首先，鲁庄公为了抵抗齐军，战前曾被迫实行了一些取信于民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其次，鲁军根据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采取了先让一步，后发制人的军事原则。战争开始后，鲁军为了保存自己，积蓄力量，主动后撤到预先选择好的有利地点——长勺，并沉着应战，以逸待劳。当强弱形势发生变化时，鲁军适时抓住有利战机，一鼓作气地进行反击，终于打败了齐军，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至于齐国方面，情况却完全相反。在乾时之战以后，管仲曾建议齐桓公改革政治，联络诸侯，以壮大自己的力量。但是，齐桓公自恃国力强大，急于向外扩张，贸然进攻鲁国。这就首先犯了冒险轻敌的错误。当齐军进入鲁境以后，情况不甚明了就迫不及待地接连出击，过早地削弱了自己，影响了战斗士气，使齐军从优势变成了劣势，为鲁军提供了反击的机会。在败退时，齐军又表现得惊慌失措，以致陷于完全失败的境地。

齐鲁长勺之战虽然是一次规模不大的战争，但是，它生动地表明，小与大、弱与强，是相对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劣势和优势也是可以转化的。小国弱国只要依靠人民，充分准备，并采取正确的方针，是可以打败大国强国的。



齐国刀币

【韩原之战】

晋惠公之立，得力于秦，但他却恩将仇报。秦穆公夫人秦穆姬是晋惠公同父异母之姐，晋惠公自秦返晋时，秦穆姬将太子申生之妃贾君嘱托给他，又让他把流亡在外的晋公子都接回晋国。可是，晋惠公返国之后却与贾君同居，又不接纳群公子，秦穆姬很恼怒。晋惠公曾答应给秦的财物、土地和五座城邑，后来也食言不给。晋有饥荒，秦运去粟米；秦有饥荒，晋却拒秦人于境外。晋惠公的多恶使一向讲信义的秦穆公忍无可忍，决心惩诫他。公元前645年（周襄王七年）秋，秦穆公率军伐晋。出发前，卜徒父占筮，得大吉大利之兆。秦、晋双方交战，晋军三次败北，退到韩地（今山西河津县东南）。晋惠公询问庆郑，如何对付秦军。庆郑认为这是惠公自己酿成的恶果，无法可想。晋惠公认为庆郑放肆无礼，在占卜选择车右武士时，尽管庆郑吉利，也不任用，而让家仆徒充任，又让步扬驾御战车。晋惠公用郑国进献的小驷马驾车，这种马外强中干，进退旋转都不尽人意，庆郑劝他换掉，晋惠公不听劝告。此年九月，韩简侦察敌情后说，秦军人数虽比晋少，但勇于战斗的武士却超过晋一倍。晋惠公派韩简到秦军约战，韩简预料晋军必败，故不愿从命。由此可见晋惠公深背民心。在秦国，由于秦穆公爱戴百姓、信守仁义，故深得民心。百姓闻知秦国将与晋国作战，纷纷踊跃报名参战。公元前645年9月14日，两军在韩原（今山西河津、稷山间），展开了决战。战争中，秦军一度处于劣势，秦穆公也被



春秋时期战车复原图

围困于晋军之中。这时，曾受恩于穆公的300名岐下野人（他们曾宰食了秦穆公丢失的良马，但秦穆公没有处治他们，而是将他们赦免了）冲锋陷阵，以自己的生命救出了秦穆公。后来，秦军就发起了反击。在秦军的顽强打击下，晋军节节败退。晋惠公的小驷马陷在烂泥中盘旋不出，向庆郑求救，庆郑深恨惠公不听劝告，违背卜兆，认为这是他咎由自取，根本不愿救他，惠公遂被秦军俘虏。

晋惠公被俘，举国哗然。公元前645年10月，晋大夫瑕吕饴甥代表晋与秦穆公会见，并在王城（今陕西大荔县东）盟誓。秦穆公询问晋人意见是否一致。瑕吕饴甥说，晋国的小人以失去国君为耻辱，并且哀悼战死的亲属，所以立圉为国君，准备报仇。晋国君子爱护国君，而又知道他的罪过，所以等待秦国的决定，准备报答秦国的恩惠。因此，晋国内部的意见并不一致。秦穆公又询问晋人估计晋惠公将被如何处置，瑕吕饴甥说，晋国的小人忧愁，认为他不会被赦免。晋国的君子宽慰，认为他一定回来。小人说：我们愧对秦国，秦国岂能让国君回来？君子说：我们已经知罪，

秦国一定会以德报怨，让他回来。秦穆公说，晋国君子所言正是自己的愿望。王城之盟以后，秦改变了晋惠公的待遇，让他住进宾馆，还送七副牛、羊、猪等食用物品。公元前645年11月，晋惠公返回晋国。

经过韩原之战，秦国的国威得到空前彰扬，秦国的国力得到大大加强，秦穆公的地位日益巩固和提高，一个称霸中原的秦国从此迅速崛起。

【泓水之战】

泓水之战发生在公元前638年，交战的双方是宋国（今河南商丘一带）和楚国（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一带）。战争的发动者是宋国的国君宋襄公。

宋襄公在历史上以标榜“仁义”著称。他以“仁义”起家，也以“仁义”覆败。泓水之战就是他以“仁义”指挥战争遭到彻底失败的一次战例。因此，在介绍这次战争以前，有必要先谈谈宋襄公和他的所谓“仁义”。

讲“仁义”的宋襄公

宋襄公的名字叫兹甫，是宋国国君桓公的嫡子，很早就被立为太子。公元前651年，宋桓公病得快死了。兹甫一再请求垂危的父亲把君位让给庶兄目夷。他说：“目夷年长，而且仁义，请您改立他为太子吧。”目夷听到了，当然不敢担当，也向宋桓公说：“兹甫连君位都要让出来，这是最大的仁义了。我哪里及得上他。况且，他本来就是太子，君位理应由他来继承。”第二年春天，宋桓公死了。兹甫又推让一番，然后当上了国君。他，就是宋襄公（前650—前637年在位）。

在剥削阶级的社会里，统治者见荣誉就上，见好处就抢，大家争权夺利，你欺我诈；尤其是为了争夺最高的权位，往往演出流血的惨剧。宋襄公居然一再推让君位，这在当时看来，是件“仁义”的事。因此，大家称他是个讲“仁义”的国君。宋襄公名利双收，尝到了讲“仁义”的甜头。

宋襄公认为目夷不肯接受君位，也很有“仁义”，就任用目夷做他的助手，帮助他治理国家。

宋襄公即位后的第八年（前643年），齐国国君齐桓公病死，他的五个儿子争夺君位，齐国发生内乱。太子昭逃到宋国，请求宋襄公作主。宋襄公觉得支持太子昭复国，是件“仁义”的事。他立刻会合了几国诸侯，共同出兵护送太子昭回齐国，帮他平定了内乱，立他为国君。太子昭就是齐孝公。

齐国是东方的大国。齐桓公的时候，他曾多次召集诸侯，主持盟会。黄河流域的许多诸侯都奉他为头儿。他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那时候，齐国的威望高到极点。霸主的地位也特别惹人眼红。现在，宋襄公平定了齐国的内乱，代它立了国君。这样，在无形中，宋国的地位就在齐国之上了。宋襄公自然“当仁不让”，准备出场当霸主了。

但是，霸主的头衔是不能自封的，须要取得一些诸侯的拥护才行。于是，宋襄公仿效齐桓公的做法，准备召集一些诸侯举行会议，借以抬高自己的声望。他恐怕大国诸侯不听他的号令，就约请几个小国诸侯来开会。但是，就连那些小国诸侯也没有按时到齐。滕国（今山东滕县西南）诸侯迟到了，鄫国（今山东峄县东）诸侯干脆不到。会还没有开

完，曹国（今山东定陶西北）诸侯又偷跑回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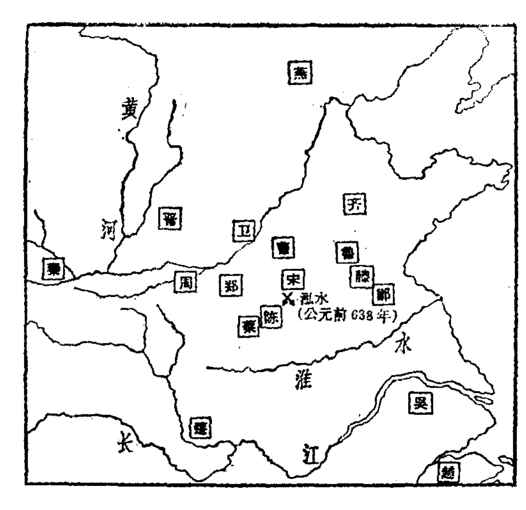
这下子，宋襄公被激怒了。看来，“仁义”是不适用于对待小国诸侯的，还得诉诸武力。他把滕侯关押起来，把鄫侯杀了祭睢水神，又出兵压服了曹国。

接着，宋襄公准备同大国打交道，以便确定他的霸主地位。

宋楚争霸

当时的大诸侯国，有齐、秦（今甘肃天水一带）、晋（今山西太原一带）、楚等。齐国自从发生内乱以后，国力已经衰弱下去。秦和晋，一个在西边，一个在西北，离中原还远，它们暂时并不妨碍宋襄公去称霸。只有楚国，才是宋襄公称霸的唯一对手。

楚国占有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的广大地区，疆域很辽阔。黄河流域的各诸侯国一向瞧不起它，称它为“蛮子国”。这个“蛮子国”不断向北方扩张势力，同那里的各国经常发生冲突。那时候，楚成王在位（前671—前626年），国力很强大。鲁、陈（今河南开封一带）、蔡（今河南上蔡一带）、郑（今河南新郑一带）等中小诸侯国，都被迫同楚国订立了盟约，接受它的节制。



春秋形势图

对于这样一个强敌，宋襄公打算采取联络它的办法。他的如意算盘是：只要把楚国拉过来，那么，那些同楚国订立盟约的诸侯国自然也会随着一起过来了，他的霸主地位也就可以确定了。

他把这步高着告诉了目夷。目夷却另有看法：第一，宋国称霸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如果急于去称霸，恐怕会惹出祸事来；第二，楚成王野心很大，能力也很强，恐怕宋襄公斗不过他。宋襄公却认为目夷的顾虑太多，仍旧坚持自己的意见。拉拢楚国的方针就这样草草地决定了。

公元前639年春天，宋襄公约请楚成王、齐孝公在鹿上（今安徽阜南南）开了个小会。会上，宋襄公要求楚成王约请他的盟国出席下一次诸侯大会。高傲的楚成王居然答应了。

那年秋天，宋襄公带了目夷和其他一些文官兴高彩烈地到盂（今河南睢县）地去大会诸侯。楚成王也带了一帮人如期到达。此外，郑、蔡等五国诸侯也都出席了会议。

宋襄公满以为这次会议既然是由他召开的，当然得由他来担任盟主。因此，他就大模大样地登上了盟主的座位。哪里料到，他还没有坐稳，楚成王一声号令，楚兵一拥而上，就把这位“盟主”从宝座上揪了下来。顷刻间，“盟主”变成囚犯。会场上秩序大乱。在混乱之中，目夷逃回本国，准备应付事变。

楚成王押着宋襄公，带领楚军一直打到宋国的都城商丘（今河南商丘）。幸亏目夷早作准备，楚军一时攻不破城。

楚军这次攻打宋国，本来是临时采

取的措施。楚成王只是看到有机可乘，才用军事行动试探一下。现在，强攻的一手一时不易奏效，他就试用讹诈的一手。他向宋军说："你们再不投降，我就要杀掉你们的国君了。"宋军回答说："我们已另立国君。随你怎么办，我们决不投降。"

楚成王觉得在宋襄公身上已经榨不出什么油水，与其把他杀了，还不如卖个人情把他放了。这样，宋襄公才获得了自由。楚成王带着军队凯旋而回。

宋襄公泓水大败

碰了钉子的宋襄公怀着满腹委屈被目夷等一帮大臣迎回宋国。他越想越生气，楚成王如此不讲信义，这个仇非报不可。

但是，对标榜"仁义"的宋襄公说来，要报仇，总得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才行。凑巧，公元前638年，郑国的国君去朝见楚成王。这给宋襄公带来了兴师问罪的"理由"。在宋襄公看来，郑国国君祖祖辈辈都受到周王的信任，而那个没出息的后代竟然不去朝见周王，却拜倒在"蛮子"的脚下，这简直是忘恩负义，有失体统。单凭这一点，他就有责任去惩罚郑国。何况，宋襄公十分清楚，郑国的兵力不强，打起仗来，宋国赢得胜利是十拿九稳的。郑是楚的盟国，把郑国打败了，好歹可以出一出这口窝囊气。

提不同意见的，还是那个目夷。他认为攻打郑国可能引起楚国出兵干涉，会闯出乱子，劝宋襄公忍耐一下。但是，宋襄公仍旧不听。那年夏天，他就出兵去攻打郑国。

郑国打不赢宋国，果然向楚国求援。楚成王立刻发兵，矛头直接指向宋国。宋襄公得到消息，急忙带领军队往回赶。宋军赶到泓水（故道在今河南柘城西北）北岸，楚军也已到达泓水南岸了。

两军隔河相对，大战一触即发。

目夷对宋襄公说："算了吧！楚强我弱，乘现在还没有打起来，同楚军讲和吧。"宋襄公不答应。

宋军列好了阵。楚军正在乱哄哄地渡河。

目夷对宋襄公说："敌军多，我军少。乘他们刚渡河的时机，给他们来个迎头痛击，或许能够打败他们。"宋襄公还是不同意。他说："不行，讲仁义的人不能乘别人困难的时候去攻打人家。"

过了一会儿，楚军全部渡过了河，但是还没有摆开阵势。

目夷又建议道："乘他们还没有站稳脚跟，我们即刻发动进攻，还可以打赢。"宋襄公仍旧不同意。他说："不行，讲仁义的人不能攻击不成阵势的队伍。"

不一会儿，楚军摆好了阵势，千军万马冲杀过来了。到了这个时候，宋襄公才下令还击。但是，已经迟了。宋军抵挡不住，一个个地倒了下去。宋襄公的卫队全部被楚军歼灭，宋襄公的大腿上也挨了一箭，受了重伤。在目夷等人的拼死保护下，宋襄公狼狈地逃了回去。

泓水之战以宋襄公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宋襄公争霸的"理想"由此破灭。

回到宋国，大臣们都埋怨宋襄公丧失战机。宋襄公却理由十足地争辩说："讲仁义的人不去伤害已经受伤的人，这叫作'君子不重伤'；也不去捉拿头发已经花白的老人，这叫作'不擒二毛'。我怎能忍心向没有摆好阵势的敌

军发动进攻呢?”

宋襄公的伤势很重。泓水之战以后不到几个月，他就死去了。

宋襄公一向标榜所谓“仁义”，在战争中也想亮出这面旗子，哗众取宠。其实，在阶级社会里，哪里有什么抽象的“仁义”?它只不过是统治者手里的一块欺骗人民、笼络人心的招牌罢了。愚蠢的宋襄公尝到过“仁义”的甜头，自以为得计。于是，他就不分场合、不分条件地到处搬用“仁义”，甚至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也来这一手。结果，骗人害己，最后连自己的性命也给送掉了。泓水大败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所谓“仁义”的虚伪性的绝大讽刺。

毛泽东同志曾经这样写道:“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

【城濮之战】

争夺霸主的斗争

两千多年以前，我国历史上有一个春秋时期。在这个时期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比较快。在农业生产方面，已经开始使用铁制的工具，开始用牛来耕田。过去的许多荒地被开垦出来，耕地面积增加了很多。这样，农业生产量就提高了。那时候，手工业和商业也进一步发展起来，人口也增加了。

自从西周(约从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771年)以来，在我国的疆域内，分布着许多诸侯国和部族。进入春秋时期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各诸侯国和各部族之间的力量，由于情况不同，条件不同，发生了新的不平衡。有的最初较强，但后来变弱了；有的最初较弱，但后来又变强了。尤其是有些被称为“蛮”、“夷”、“戎”、“狄”的部族或国家，在黄河流域各国先进的经济、文化的影响下，发展得特别快。它们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很快赶上了，甚至超过了原先较为先进的诸侯国家。

在各诸侯国强盛起来的同时，周朝王室却大大衰微了。周天子已经没有一点威望，再也不能控制诸侯了。

各诸侯国之间互相混战、吞并，打破了过去的诸侯并列、王室独尊的局面。周初的一千八百国，到春秋时期，只剩下一百多国。比较大的诸侯国，只有秦、晋、齐、楚、鲁、卫、燕、曹、宋、陈、蔡、郑、吴、越等十四个。其中，最强大的是秦、晋、齐、楚。由于小国剩下不多，加上社会经济的发展又把黄河和长江流域广大地区的各国、各族联系起来，因此各大国之间的矛盾更直接，更尖锐，它们之间的战争也就更加频繁。正当那些较大的诸侯国相互混战的时候，散居在现在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省境内的被指为“狄”、“戎”、“夷”的各部族，也常常同王室和诸侯国发生战争，使他们感到很大的威胁。

在这种形势下，一些较大的诸侯国，就借口维护周朝王室共主的地位，提出“尊王攘夷”(尊奉周天子，抵抗落后部族)的口号，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达到掠夺和吞并弱小国家的目的。在吞并的过程里，最强的国家就成为霸国，这个国家的国君就成为霸主。那些被胁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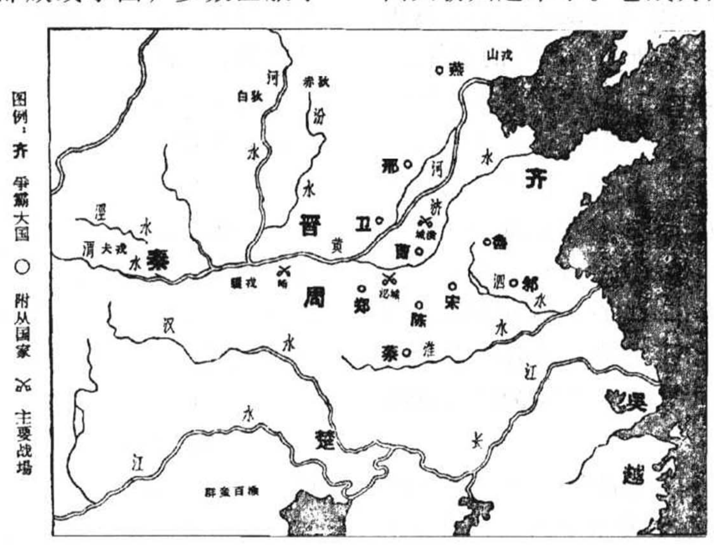
被征伐的诸侯国，要以过去侍奉王室的规矩，来侍奉霸国、霸主。向霸主缴纳贡赋；对霸主朝聘；霸主如果要召集会议，或征调兵力，也只有立刻服从。因为作霸国、霸主能够得到这许多好处，所以大国诸侯都想创立霸业，自己做霸主。这样，各大国间争霸的斗争就剧烈起来了。

最先创立霸业、登上霸主宝座的，是齐国的齐桓公。他任用大政治家管仲，改革内政。国力强盛以后，他就以“尊王攘夷”相号召，联合其他国家，打败了在今河北北部一带的戎族；制止了北狄的侵扰，挽救了邢（在今河北邢台西南）、卫两国。他又联合鲁、宋、郑、陈、卫、曹、许等国的军队伐楚，责问楚国为什么不向周天子进贡包茅（澄清酒滓所用的草），使楚国暂时不敢北进。齐桓公还曾经几次大会诸侯，周天子也派人参加会盟，对他加以慰劳。在那一段时期里，齐国的威望高到极点。

还在齐桓公做霸主以前，一向被指为南蛮的楚国就开始强盛起来了。楚国西、南两面的部族或小国，多数臣服于楚。东面的群舒和淮夷等族，也受到楚的约束。北面的周的同姓国或周的与国（友好国家），有的被楚降服，有的被楚消灭。楚国还打败了随国，灭掉了申国、息国、邓国，降服了蔡国，并且连年出兵攻打郑国，插手郑国事务。当齐桓公在黄河流域称霸的时候，楚国正是楚成王熊恽在位。楚成王又先后灭掉了弦、黄两国，打败了徐国。楚国的力量更加强大起来了。

齐桓公死了以后，齐国国内发生了争夺君位的斗争，统治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齐国的霸业也就逐渐衰落下去了。那时候，楚国又把锋芒指向黄河流域。宋国的宋襄公想继承齐桓公的霸业，公元前638年，他在泓水（在今河南柘城北）北岸同楚国打了一仗，结果大败，连自己也受了伤。这样一来，原先同齐国结盟的鲁、宋、郑、陈、蔡、许、曹、卫等，都陆续成为楚的盟国。楚国控制了黄河流域的许多中、小国家，代替齐国成为霸主。

正在那个时候，在今山西一带的晋国又勃兴起来了。它成为楚国北方的劲



敌，限制着楚国霸业的发展。

晋国本来是护卫平王东迁的强国之一，只是由于国内长期内乱，顾不到向外发展势力。公元前676年到公元前651年，晋献公做着国君。他先后灭掉了霍、耿、魏、虞、虢等西周封国，又战胜骊戎、北狄等族，统一了今山西南部，把晋国的势力发展到黄河南岸和西岸。同时，晋献公又大力整顿内政，除掉了同他对立的一些贵族，任用的卿大夫大多是异姓人。这样，国君的权力加强了，晋国成为一个政权比较集中的强国。

晋献公在位的时候，曾经把自己的儿子重耳（后来的晋文公）、夷吾（后来的晋惠公）放逐出国。他死了以后，国内大乱。被放逐出国的公子夷吾，拿晋国的一些土地贿赂秦国。他在秦穆公的帮助下回到晋国，做了国君，这就是晋惠公。后来，晋惠公不实行自己的诺言，不拿土地给秦国。于是，秦穆公起兵攻晋，打败了晋国，俘虏了晋惠公。在惠公被俘期间，晋国的大臣们进行了一些改革，把一部分土地给人民耕种，同时叫人民按规定当兵或出兵器。这就为后来晋国的强盛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公元前636年，公子重耳回国做了国君，就是晋文公。晋文公在外流亡了十九年，曾经周游列国，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政治经验。他回国即位以后，长期随从他在外流亡的功臣赵衰、狐堰等人都得到重用，君臣一心，整顿国政，训练军队，奖励农业生产，减轻一些对人民的剥削。这样一来，晋国的国力就更加强大了。

晋文公即位以后的第二年（公元前635年），周朝王室发生了内乱，周襄王的弟弟叔带借狄人的兵马进攻王都洛邑。周襄王打了败仗，逃到郑国，派遣使者向秦、晋等国求救。晋国君臣为了提高自己在诸侯中间的威信，早就想把周王这面破旗抓到手里，以便“挟天子以令诸侯”。因此，在听见襄王逃难的消息以后，晋文公马上带领军队前去救援。晋军击溃了狄人，杀了叔带。晋文公亲自护送周襄王回到洛邑。为了答谢晋文公，周襄王赏了他四座城池和一些土地。晋文公在诸侯中间的威信提高了。

一方面，晋国创立霸业的条件在逐渐成熟；另一方面，河南一带地区已经成为楚国的势力范围。这就是当时晋、楚两国的基本的政治形势。很明显，在这种形势下，晋国要“取威定霸”，就不能不同楚国交锋对垒了。

伐卫破曹

在泓水之战里，宋国虽然被楚国打败了，但是并不甘心。只是由于当时楚国的力量强大，宋国不敢公开同它对抗，因而才表面上对楚国表示臣服。

泓水之战以后没有多久，晋文公平定了周王室的内乱，晋国的声威一天天高涨起来。宋国看到晋国强盛，就又离开楚国，归附了晋国。

宋国背楚投晋，这对楚国说来，当然是一个打击。因此，在公元前634年的冬天，楚国就派子玉和子西两个将领率领军队，前去伐宋。结果没有打下来。楚国当然不肯就此了事。第二年冬天，楚国又联合陈、蔡、郑、许四国的军队，进攻宋国。

宋国国君派大司马（主管军政的官）公孙固到晋国报告楚军入侵的消息，要求晋国出兵援助。晋国的一些大臣，认为晋国建立霸业的条件已经成熟，

极力主张出兵。晋国的将领先轸对晋文公说："报答宋国赠马的恩惠，解救宋国被围的患难，在诸侯中树立威信，奠定晋国的霸业，就在这次战争了！"晋文公的舅父狐偃，同意先轸的意见，并且提出了转移楚国兵力，解救宋国被围的具体办法。他对晋文公说："楚国刚刚得到曹国的归附，新近又同卫国结为儿女亲家。我们如果出兵去打曹、卫两国，楚军一定会前去援救。这样，宋国之围就可以解除了。"晋文公认为先轸和狐偃的意见有道理，就答应了宋国使者公孙固的请求，并且积极准备出兵。

首先，晋文公在一个名叫被庐的地方，检阅军队。晋国原来只有上、下二军，这次阅军的时候，扩充为上、中、下三军。接着，晋文公同大臣们商议中军元帅的人选。赵衰向晋文公推荐大夫郤縠。晋文公采纳了赵衰的意见，任命郤縠为中军主将。任命郤縠的族人郤溱为中军副将。同时，晋文公又任命狐毛、狐偃、栾枝、先轸等人，为上、下两军的正、副将领。军队扩充了，人选确定了，晋国的军事力量加强了。

公元前 632 年春天，晋国出兵讨伐曹国。曹国在卫国的东面。晋国从西面攻曹，要经过卫国。因此，晋文公先派人去向卫国借路。卫国不答应。这样，晋军就决定绕道渡河南下，攻打曹、卫两国。正月，晋军占领了卫国的五鹿（今河北濮阳南）。二月，晋中军主将郤縠病死。下军副将先轸因为攻下五鹿立了头功，被升为中军主将。晋文公另派胥臣为下军副将。不久，晋军又占领了敛盂（卫国地名，今河北濮阳东南），在那里驻扎下来。

在晋国这次伐卫攻曹的前两年（公元前 634 年），鲁国曾经请楚国军队去攻打齐国，夺取了齐国的穀地（今山东东阿）。楚国派大夫申叔带兵驻守在那里，以威胁齐国。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当晋军在卫地敛盂驻扎下来的时候，齐孝公就跑到那里去同晋文公结盟，打算得到晋国的帮助。晋、齐结盟，更加提高了晋国的声威。卫成公听到这个消息，就恐慌起来了。他也连忙请求同齐、晋结盟，但是受到晋文公的拒绝。后来，卫成公又去亲近楚国，打算从楚国得到救兵，同晋军拼个你死我活。但是卫人不愿意同晋国打仗，他们把卫成公赶走了。

那时候，鲁、卫都是楚的同盟国。为了讨好楚国，鲁国在卫人赶走卫成公以后，就派大夫公子买带兵到卫国去驻防。同时，楚国也调动部分兵力，前去救卫，结果失败了。鲁国看到晋国这样强大，连楚国都敌不过它，就害怕起来，杀了公子买来讨好晋国。

晋军攻下卫国不久，又包围了曹国的国都。曹人猛烈抵抗，晋军死伤很多。曹人把晋兵的尸体陈列在城上，打击晋军的士气。这件事，使晋公文很伤脑筋。就在这紧急关头，一些士兵向晋文公献计说："我们把军队驻扎到曹人的墓地上去（暗示要掘曹人祖先的坟墓），曹人一定很恐惧。我们就乘他们慌乱的时候去攻城。"晋文公采纳了这个建议，叫兵士们立刻驻扎到墓地上去，并且扬言要挖掘曹人的坟墓。这一计策果然有效。城上的曹人看见这种情景，又纷乱，又害怕。为了使晋军不挖掘坟墓，他们赶快把晋军的尸体用棺木装好，送出城去。晋军抓住这个机会，加紧进攻。三月初八那天，晋军攻入曹国国都，活捉了曹共公。

晋军进入曹国都城以后，晋文公列举罪状，当众责骂曹共公，说他不该不信任曹国的贤臣僖负羁，不该滥封官爵，像曹这样的小国，竟让三百名品德不好的人做大官，乘坐高车大马。晋文公过去在国外流亡的时候，曾经到过曹国。曹共公对他很不礼貌，只有僖负羁曾经暗地里送饭菜招待过他。为了报答僖负羁的恩惠，并且表示自己对贤人的尊敬，晋文公命令晋军不要进入僖负羁的住宅，保护他的家族的安全。不过，晋文公手下的人并不都理解他的这些做法。部将魏犨和颠颉两人听到这个命令，就气愤地说："我们跟从主公到处流亡，吃尽千辛万苦，主公从来没有考虑到我们的功劳，却偏偏要去报答僖负羁送饭这点小恩小惠。这有什么可以报答的呢！"他们两人就放火烧了僖负羁的住宅。僖负羁也被烧死了。为了严肃军纪，晋文公杀了颠颉。至于魏犨，由于晋文公喜爱他作战英勇，只革掉了他的官职，没有处死刑。晋文公在曹国的这些措施，得到了曹人的支持，提高了晋国的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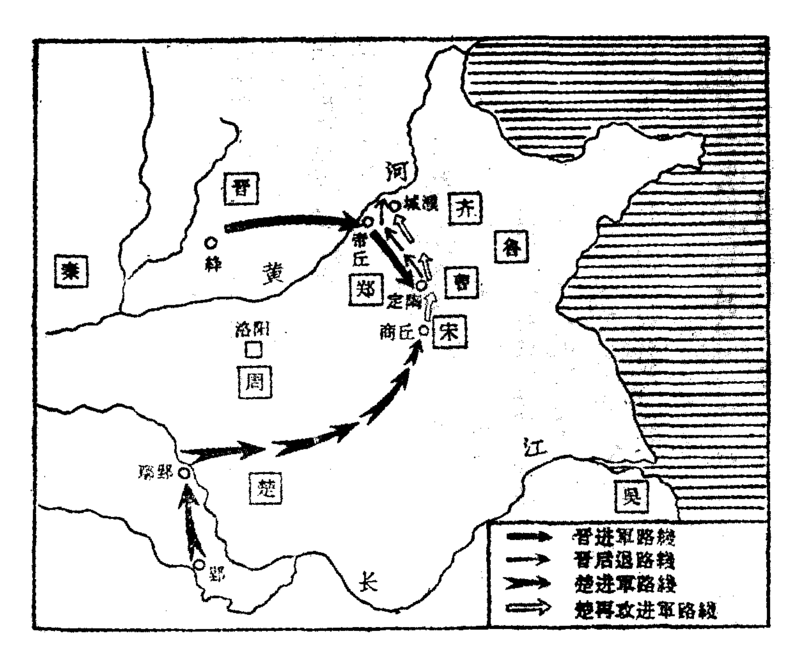
退避三舍

晋军伐卫攻曹，原是想以此来解宋国之围，没料到攻下曹、卫两国以后，楚国还是围住宋都不放。宋成公第二次派人向晋文公求救。晋文公感到很为难。他对大臣们说："宋国来求救，要是不去援救，宋国就会同我们断绝关系。同楚国商量，叫楚军自动从宋国撤退，楚国又不答应。我想同楚国打一仗，但是齐、秦又不肯同我们合作。这怎么办呢？"还是先轸有办法。他对晋文公说："叫宋国不必向我们讨救，而用财货去贿赂齐、秦两国，请齐、秦出面调解，要楚国退兵。我们把曹国国君扣留起来，并且把曹、卫的土地分一些给宋国。楚国同曹、卫很要好。这样一来，它一定不会接受齐、秦的调解，同宋国讲和。齐、秦接受了宋国的贿赂，却起不到调解的作用，就会对楚国不满。这样，它们怎能不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呢！"晋文公十分赞许这个计谋，立刻扣留曹共公，把曹、卫的一部分土地分给了宋国。

晋国同齐、秦建立联盟，这对楚国说来，自然是很不利的。楚成王也看清在这种极为不利的形势下，同晋国交战是讨不到什么便宜的，于是就下令叫申叔撤离穀地，叫子玉撤离宋国。他说："我们不能同晋国军队打仗。晋侯出奔在外十九年，后来终于回国即位。他什么危险、困难都经历过，经验很丰富，要战胜他是很困难的。"

但是，正在前线指挥楚军攻宋的子玉并不服从楚成王的命令，他坚持要同晋国一战。他派大夫伯棼去见楚成王，要求楚成王增加军队，并且下达出战的命令。子玉为什么坚持要同晋国交战呢？其中有这样一个原因：

楚国围宋的前夕，楚成王叫已经卸职的令尹子文在一个名叫睽的地方训练军队。从天明到中午，子文没有惩罚一个人。接着，现任令尹子玉又在一个名叫睽蒍的地方训练军队。到天黑收操的时候，他鞭打了七个人，用小箭穿了三个人的耳朵。国内年老有资望的人，都认为子玉有才能。子玉做楚国的令尹，是因为他伐陈有功，由子文推荐的。因此，这些老年人又都去向子文祝贺，贺他推荐了有才能的人。但是年幼的蒍贾，却很晚才去。去了，也不向子文祝贺。子文问他为什么不贺。他说："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可贺的。你推荐子玉代自己



城濮之战形势图

做令尹，据你说是为了安定国家。但是子玉没有大才能，如果再叫他对外作战，一定要失败。试问，这有多少好处呢？你推荐一个使国家打败仗的人，又有什么可贺的呢？子玉这个人倔强而没有礼貌，不能治理百姓，如果叫他带领超过三百乘车的兵士去作战，怕就不能胜利回国了。如果他果真打了胜仗，那么等他打了胜仗回国，再祝贺也不算迟。”子玉听了蒍贾对自己的这番评论，很不满意。他认为这次对晋国的战争正是表现自己，提高自己威信的好机会。因此，他坚决主战。他要伯棼向楚成王转达他的话说：“我不敢说一定有把握打胜仗，只想用事实来杜塞那些说我不会用兵的人的毁谤。”

子玉不服从命令，楚成王很不高兴。但是，楚成王也不甘心让晋国独个儿称霸，阻碍自己的北进。所以，当时他没有坚决制止子玉，并且还给了子玉一些人，作为补充力量，希望侥幸得胜。

宋国军民凭城坚守，楚军攻了好久攻不进去。子玉只好派大夫宛春去同晋军谈判，退兵的条件是：晋国恢复卫成公的君位；恢复曹国的领土。

接受不接受楚国提出的谈判条件呢？晋军将领们的意见有些分歧。

狐偃认为楚国的条件太苛刻，主张不接受。他对晋文公说：“子玉多么没有礼貌，多么不讲道理呀！您是君，只得到解除宋国包围一桩好处。子玉是臣，倒要得到恢复卫侯和封曹两桩好处。就同楚国打一仗吧，别失掉这个机会。”

中军主将先轸的意见，比狐偃高明。他对晋文公说：“您还是答应了楚国提出的条件吧！安定别人的国家，才可以称为有礼。楚国子玉通过使者宛春说的一番话，可以使卫、曹、宋三国安定下来。我们只要说一句拒绝的话，就可能断送这三个国家。那样，就是我们不讲礼。没有礼，怎样去同敌人作战呢？再说，不答应楚国的条件，就等于抛弃宋

国。我们攻曹伐卫，原是为了救宋国。现在又抛弃它，各国诸侯要说些什么呢？楚国的条件可以使卫、曹、宋三国得到好处。要是我们拒绝了，这三国就会怨恨我们，同我们为敌。树敌多了，又怎么能够取胜呢？我以为，不如将计就计，私下答应曹、卫恢复自己的国家，使它们脱离楚国。同时，我们把楚国使者宛春扣留起来，以激怒楚国。子玉恼怒，一定来进攻。我们就全力应战。至于要不要恢复曹、卫的问题，等战争结束以后再作考虑。”

先轸这个计策，能够离间楚国和曹、卫两国的同盟关系，使楚国陷于孤立地位；同时，又能使晋国争取到同盟国，改变当时晋国在政治上、外交上的被动地位。晋文公采纳了先轸的建议，立刻把宛春拘留在卫国，并且暗地里答应恢复曹、卫两国。曹、卫两国果真同楚国断绝了关系。

子玉果然被激怒了。他很快带领军队赶到晋军驻地附近。晋文公见楚军逼近，立刻命令晋军撤退。这就引起了一些军官的不满。他们对晋文公说：“一国的国君，倒要躲避敌国的臣子，这是一种耻辱。而且，楚军连年转战在外，士气已经衰落，我们为什么要撤退呢？”

的确，在这种情况下，晋文公为什么还要命令晋军撤退呢？这就要从他流亡在楚国时的一段故事讲起。原来，晋文公和他的随从人员流亡到楚国的时候，楚成王把他们当作贵宾，摆设盛宴招待。在一次宴会上，楚成王曾经问晋文公：“公子如果回国做了国君，准备怎样报答我呢？”晋文公回答说：“美女、宝玉和丝绸，您有的是。漂亮的雀翎，名贵的象牙和皮革，又是楚国的特产，流散到晋国去的，只是您享用以后剩下的东西罢了。我用什么东西来报答您呢？”楚成王说：“话虽然这样说，你还是得考虑一下怎样报答我呀！”晋文公经过一番思索，最后对楚成王说：“要是托您的福，我能够回到晋国，将来晋同楚万一发生战争，双方军队碰上了，我一定命令晋军‘退避三舍’；如果您还不谅解的话，那么，我们就只好同你们较量较量了。”现在，晋、楚两国的军队果真碰上了。晋文公命令晋军撤退，就是为了表示实行自己对楚成王许下的诺言。

当然，晋文公命令晋军撤退，并不单纯是为了实行诺言。因为，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取信于民，可以激励晋军士气，可以使自己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另一方面，又可以避开楚军的锋锐，挫伤楚军的士气，选择有利时机同楚军决战。但是，晋国的一些将领并不明白晋文公撤军的意图，他们认为这是对敌人示弱的表现，是晋国的耻辱。为了取得认识上和步调上的一致，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先轸说服了狐偃，狐偃又向将官们解释道：“大凡用兵的道理，理直，士气就旺盛；理曲，士气就衰落。士气的旺盛和衰落，并不取决于出战时间的长短。我们国君过去如果没有楚国的帮助，就不会有今天。现在我们撤退九十里，就是为了报答楚国的恩惠。如果我们负恩失信，激起楚人的仇恨，那就是我们理曲，楚国理直。况且，楚军士气一向是饱满的，不能说现在已经低落。假如我们退兵以后，楚国也退兵，就避免了两国间的战争。那不是很好吗？要是我们退兵，他们还要继续追上来，那就是他们理曲了。”狐偃的分析很透彻，

一些将官们听了都表示信服。晋军就按照晋文公的命令，向后撤退九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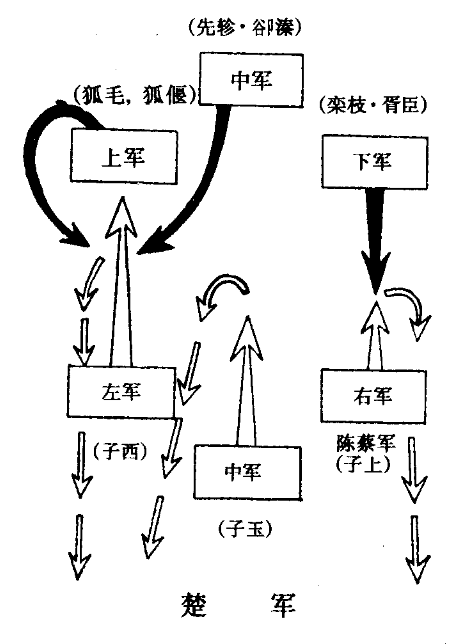
城濮交兵

晋军撤退了九十里，在卫国的城濮（约当今山东鄄城西南临濮集）驻扎下来。四月初三那一天，宋成公、秦穆公的儿子小子慭和齐国大夫国归父、崔夭，也率兵前来城濮同晋文公会合。

楚军官兵见晋军后退，想就此罢手，不再追击。但是，子玉不同意。他认为晋军的后退是由于害怕楚军。因此，他命令楚军背靠着一个名叫酅的险要丘陵地带，扎下营寨，准备同晋军决战。

多少年来，楚国很少打过败仗，现在又占领了险要的丘陵地区，晋文公不禁担心起来。他听到一群晋军士兵唱起这样一首歌："田里好庄稼，密密又层层。旧的且丢开，新的要经营。"晋文公又误认士兵唱的歌是讽刺他忘了楚国过去对他的恩惠，因此更加怀疑起来。狐偃看见这种情形，就给他打气说："战吧！战胜了，我们可以得到各国诸侯的拥戴。即使失败了，我们晋国内有太行山，外有黄河，形势险要，可以固守，也不会有什么害处的。"其他一些将领，也同意狐偃的主张。晋文公见大家同心协力，斗志昂扬，战胜楚国的信心也就加强了。

晋、楚两国的战争不可避免了。子玉派大夫斗勃到晋营挑战说："我们请求同您的战士作戏，您可以靠在车前扶手的横木上观看，得臣（子玉的名）也将奉陪参观。"晋文公也不示弱，他叫栾枝答复说："贵国请战的事，我国的国君已经知道了。楚君的恩惠不敢忘记，所以我们才退到这儿。既然得不到贵国的谅解，只好烦你转告你们的主将，准



城濮之战示意图

备好战车，谨慎地执行你们国君交付的任务。明天清早，我们在战场上见面吧。"

晋军有战车七百辆，士兵五万二千五百人，装备都已经齐全。战斗开始以前，晋文公登上古代有莘氏的废墟，检阅全军。他说："上下一致，纪律严明，可以同楚军一战了。"接着，他吩咐战士们砍伐树木，作为补充武器。第二天，也就是四月初四日，晋军在城濮摆开阵势，等候对敌。

楚国的军队，分为左、中、右三军。左军由子西率领。右军是陈、蔡的军队组成的，由子上率领。中军是主力，子玉亲自指挥。子玉过低地估计了晋国的力量，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在决战以前，他还夸口说："今天晋国一定要完蛋了！"

会战开始，晋文公命令下军副将胥

臣率领一支部队，首先向楚的右军进攻。胥臣把驾车的战马都蒙上虎皮，向前冲去。陈、蔡联军的战马惊惧起来，伏倒在地。士兵也惊慌失措，纷纷弃阵逃跑。楚国的右军崩溃了。接着，晋上军主将狐毛假充中军，竖起两面大军旗（当时主帅统率的中军才有两面大旗），装作要退兵的样子。同时，下军主将栾枝也叫人用战车拉着树枝，扬起尘土，假装败逃。楚军看到这种情景，误认为晋国的主帅败退了，就驱马追击。晋将见楚军中计，先轸、郤溱就指挥中军（就是晋文公统率的亲兵），拦腰冲杀过去。狐毛、狐偃也指挥上军，夹攻子西。楚国的左军也崩溃了。只有子玉及时收兵，才没有全军覆灭。

就这样，城濮之战以楚国的失败和晋国的胜利而结束了。

在这次战役里，晋军俘获了楚国的战车一百乘，步兵一千人。战斗结束以后，晋军在城濮休整了三天，吃的是楚军积聚的粮食。四月初八日，晋军高唱凯歌，班师回国。

楚成王本来就不大同意子玉同晋国作战，这回听说楚军战败，更是生气。他派使者对子玉说："申、息两地的子弟跟从你出征，现在都战死了。你活着回来还有什么面目见他们的父老?"意思是要子玉自杀。使者没有到达以前，子玉也曾经想自杀，结果被子西和子玉的儿子大心劝止。所以子西和大心听了使者的那番话以后，便急忙替子玉辩解说："子玉本来也想自杀，是我们阻止了他，要他回国接受国法的制裁。"使者把子西和大心的话转告楚成王。楚成王感到说得有理，于是又差遣使者向子玉传达免死的命令。但是，在使者还没有赶到以前，子玉已经在连谷（楚地名）自杀了。

子玉虽然骄傲自大，缺少计谋，但仍旧不失为楚国的一员猛将。因此，晋文公听到子玉自杀的消息，高兴地说："以后就没有人同我作对了。"

晋国在城濮大战中的胜利，大大提高了它的声威。从前同楚国关系密切的一些诸侯国，许多都来向晋国讨好。城濮战役前三月，郑国国君还到楚国拉关系，现在听说楚国打败了，非常恐惧，赶紧去同晋国订立盟约。其他一些诸侯国，也陆续来归附晋国。这样，就改变了战前晋、楚两国力量的对比，实际上确定了晋国的霸主地位。

晋胜楚败的原因

晋、楚城濮之战，是春秋前期最大的一次战争，也是我国古代战争史上有名的战例之一。

城濮之战以前，楚国不但纵横于汉水、长江一带，而且它的势力差不多已经达到了黄河流域。它拥有的土地、军队和附属国，从数量上说，都超过了晋国。这次战争一开始，晋军退却九十里，口头上说是为了实行晋文公的诺言，实际上也正反映了当时楚军居于优势地位。从表面看来，这次战争的结局应该是楚国胜利，晋国失败。当时，子玉和其他一些将领们正是这样估计的。

然而，事实同这种估计相反。城濮大战的结果是原来居于劣势地位的晋国胜利了。晋国为什么能够打败楚国呢?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以晋文公为首的晋国统治集团，有发愤图强、创立霸业的决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在政治、军事方面作了许多准备。在政治上，晋文公能

够注意收揽人心，争取与国。例如，对内，他不是专以严刑峻法来维护统治，而是较多地注意了对人民的“教化”，这自然就相应地得到人民的好感。对外，他不仅把周天子这张王牌抓到手里，用“尊王攘夷”的口号对各国诸侯作一般的号召，而且还善于利用楚国同齐、秦以及其他一些诸侯的利害矛盾，争取齐、秦等国的合作，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城濮战争开始的时候，晋文公以实行诺言、报答楚成王的恩惠作借口，命令晋军退却九十里。这一行动本身，也使晋军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在军事上，他早在回国即位的那年（公元前636年），就着手训练军队。在以后的两三年里，晋国君臣又采取种种措施，来提高晋军的士气和作战能力，就是在伐卫攻曹和城濮大战的过程里，也没有忽略这方面的训练。晋军将领不但勇敢，而且有智谋，有策略。晋军“退避三舍”，从军事方面说，是劣势的晋军为了保存力量、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重要步骤。这样，晋国就避开了在不利条件下同楚国决战，达到了积极防御、激励士气的目的。决战的时候，晋军避开了敌人强大的中军，选择了力量比较薄弱的两翼冲击，使自己在局部上占据了优势。一战而胜，再及其余，终于打了胜仗，从局部的优势转变为全局的优势。另外，晋军以竖大旗和拖树枝扬灰尘的方法，假装失败逃走，造成敌人的错觉，然后出其不意地攻击敌人。这也是晋军变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以致最后取得胜利的一个原因。

在楚国方面，楚国统治集团内部，对晋、楚斗争形势的估计和主张不尽一致。楚成王一方面认为晋国太强大，要打败它很困难；另一方面又不甘心晋国阻碍自己霸业的发展，想同它较量一番。所以，当子玉坚持要同晋国打仗的时候，他又怀着侥幸求胜的心理，不坚决加以制止。子玉倒是坚决主战的，但是他又过低地估计了晋国的力量，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骄傲轻敌，对这次战争没有足够的准备。楚国君臣这种战略思想上的矛盾和错误，是楚军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大战以前，楚国虽然纠合了陈、蔡等几个小国的军队，但是这些军队都是临时拼凑而成，组织涣散，战斗力不强。子玉没有加以整顿。在决战的时候，他又放松了对左右两翼的加强，所以战争一开始，两翼就立刻崩溃了。楚军的战术也不像晋军那样机动灵活。晋军已经集中兵力向自己的左右两翼进攻了，强大的中军仍旧按兵不动，坐等晋军把自己的左右两翼各个击破。这样，自己的优势就逐渐变为劣势，终于全面失败。

城濮之战以前，楚国威风一时。齐桓公虽然曾经联合鲁、宋等国向它问罪，但是并没有摧毁它的势力。城濮一战，晋军才给了楚军有力的打击，稳定了当时的政治局势。晋国的霸主地位也从此确定了。

晋、楚城濮之战，同春秋时期各国间的其他争霸战争一样，是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战争双方的目的都是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和勒索贡赋。不管谁胜谁败，给人民带来的都是灾难。因此，交战双方，很难说谁是侵略者，谁是被侵略者；谁是正义的，谁是非正义的。不过，在城濮之战的前夕，北方的狄族和戎族仍旧严重地威胁着黄河流域各国，号称“南蛮”的楚国的势力也正在向北

方扩张。这对黄河流域各国说来，对它们的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发展，是不利的。经过城濮战争，晋国不但迫使楚国的势力退回南方，而且解除了狄族和戎族的威胁，使黄河流域各国比较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得以继续发展。就这方面来说，晋国取得战争的胜利，对当时黄河流域各国的历史发展，还是起了一些积极作用的。

【崤之战】

公元前 627 年（周襄王二十五年）4 月，晋国与姜戎合攻秦师，战于崤（今河南洛宁县西北），秦师大败。公元前 624 年（周襄王二十八年），秦军渡河攻晋，取晋城邑，至崤山而还。

公元前 636（周襄王十六年），秦穆公派兵帮助晋公子重耳归国为君，穆公的本意是想扩大秦国的势力和影响。但是，晋文公迅速站稳脚跟，成就霸业，反使秦穆公的努力相形失色，成为晋文公图霸事业的配角。在晋文公时代，秦、晋的关系大体处于友好状态。

晋文公在位九年，于公元前 628 年冬去世，晋人为文公服丧。在此同时，



郁函地区重要关口——函谷关

秦穆公不听蹇叔之言，派百里奚之子孟明视、蹇叔之子西乞术、白乙丙带兵袭郑。蹇叔哭着为儿子送行，说道晋国人必定在崤伏击秦军，我等着去收你的尸骨吧。事情进程果如蹇叔所料，秦军偷袭郑国不成，班师西归。晋国众大夫讨论是否袭秦军，先轸认为，秦国不听蹇叔之言，由于贪婪而劳动百姓，此乃天赐良机，一定要截击秦军。栾枝则说，晋尚未报答恩施却以武力先攻，将愧对先君。先轸反驳说，秦不为新逝的晋君丧事悲伤，反而攻打晋的同姓国，就是无礼。为子孙后代打算，也不能放走秦军。新继位的晋襄公于是决定发布命令，与姜戎联合发兵攻击秦师于崤，大败秦军，秦军三大将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皆被俘。晋襄公母文嬴是秦国人，崤之战后，她请求襄公将孟明视等三位主将释放回国。

公元前 625 年（周襄王二十七年），秦穆公再派孟明视率师攻晋，以报崤之役的惨败。晋襄公亲自率军迎战，而以先且居为主将，两军激战于彭衙（今陕西澄县西北），秦军又败。主将孟明视战败仍受秦穆公信任，让他主持秦国军政。次年，秦军第三次伐晋，由秦穆公亲自率领，孟明视为主帅，渡河以后焚烧渡船，以示必死之决心。秦军取晋王官（今山西闻喜西），晋军坚守不敢出来迎战。秦军又渡茅津（今山西平陆茅津渡）至崤，埋葬崤之役秦军尸骨而还。

晋文公去世以后，晋国势已过鼎盛时期，而秦穆公励精图治，渐有压倒晋国之势。但晋国依然有着相当实力，始终都是春秋时期的一流大国。而秦自秦穆公去世后，国势长期不振，对晋战争

胜少败多。因此秦国在春秋数百年间，有时颇为强大，但其基本势力始终局限于函谷以西。

【邲之战】

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十七年、晋景公三年），晋、楚之军在邲地交战，晋军大败。因为郑国的背叛，楚庄王亲自带兵伐郑。晋国得知这个消息后，由荀林父为主帅，率领晋国的三军赶来救援郑国。可是，当晋国到达黄河北岸时，又传来了郑国已经降服楚国的消息。此时，晋军内部发生意见分歧。以上军主帅士会为首的部分将领主张退兵。他们认为，楚军师出有名，在先后平定陈国的动乱和郑国的背叛等问题上，既符合道义，也没有扰民；而在楚国内部，由孙叔敖主政，一切都很有条理。此时与楚军对垒，显然是不明智的。至于郑国归附楚国，等楚军退走之后，再找郑国算账不晚。可是，以中军副帅先縠为首的一些将领，认为出兵到了这种程度再撤走，有损于作为霸主的晋国的颜面。所以，先縠不由分说，先带着自己本部人马渡过了黄河。主帅怕先縠一人过河有闪失，只好也随着渡河。

此时的楚庄王，得知晋军已经渡河，本想退兵。可是，庄王的宠臣伍参坚决主张进兵，因为他看出了晋军之中没有君主的权衡，将领意见和行动都不一致，有可乘之机。于是，楚庄王决定伺机与晋军一战。交战之前，楚庄王派使者到晋军探虚实，说明楚军只是想平服郑国，并无与晋军决战之意。士会在公开场合的答复比较委婉，而先縠则又在私下里给了楚国使者以强硬的回答。面对晋军内部的分歧，楚庄王决定跟晋国人决战。但为了扩大晋军内部的不和，庄王一面表示要跟晋人讲和，一面又派出小股部队跟晋军挑战。而在晋军内部，又有两个公报私仇的将领，说是要去跟楚国人讲和，其实是想挑起两军的战斗。楚军无奈，下令全面向晋军近逼进攻。晋军主帅荀林父不知所措，命令晋军撤退过河。晋军士兵抢着船只渡河，结果，已经上了船的士兵用刀猛砍想扒上船的士兵的手，以至于船舱里都是砍下来的手指。晋军于是大败，只有士会率领的上军，由于准备充分，未受损伤。

这是晋、楚两军继城濮之战后的又一次大决战。楚国的胜利，奠定了楚庄王在中原地区的霸业。而晋国的失败说明，如果晋国还想保持霸主地位，就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君主来坐镇。

【鞍之战】

公元前589年（周定王十八年）春，卫穆公派孙良夫、石稷、宁相、向禽将等率军入侵齐国。此年四月，卫军和齐军在新筑（今河北魏县南）相遇。石稷想退归，孙良夫认为，军队出征，遇上敌人就回去，如何向国君复命？如果不能打仗，就应当不出兵。现在既然和敌人相遇，那就不如一战。新筑之战中，卫军大败。石稷对孙良夫说，卫国军队战败，您如果不顽强坚持，以顶住敌军，就会全军覆没。假若丧失了军队，还有什么回报君命？他见大家都不回答，便又说，您是卫国之卿，假若损失了您，那就是卫国的羞耻。您带着大家撤退，我在这里殿后。石稷还通告军中，卫国援军的战车已经大批来到，以此鼓舞士

气。石稷率领军队力战，齐军攻势被阻止，退守在居（今河南封丘县境）。在新筑大夫仲叔于奚的救援下，孙良夫也得免于难，撤军回卫国。

新筑之战败后，卫军主将孙良夫没有返卫，径直去晋请求发兵，这时鲁国臧孙许也到晋国请求援助。两人都找到晋国执政大臣郤克，请他帮助。晋景公答应给郤克700辆战车前往救援鲁、卫两国。郤克认为这是城濮之战中晋国的兵车数量，当时有先君的明察和先大夫的敏捷，所以得胜，而我和先大夫相比，还不足以做他们的仆人，因此，请允许派800辆战车。晋景公答应。晋军由郤克率领中军，士燮辅佐上军，书率领下军，韩厥做司马，出发援救鲁、卫。鲁国的臧孙许为向导开路，季文子率领鲁军和晋军会合。这时候，齐军伐鲁、胜卫，正凯旋而归。晋师追踪而至，在莘（今山东莘县北）地追赶齐军。

公元前589年（周定王十八年）六月十六日，援救鲁卫、追赶齐军的晋国军队到达靡笄山（今山东济南千佛山）下。齐顷公派使者向郤克请战说，您带领国君部队光临敝邑，敝国士兵人数很少，请在明天早晨相见。郤克回答说，晋和鲁、卫是兄弟国家，他们告诉我们，大国不分早晚都在敝邑土地上发泄气愤，寡君不忍，所以派下臣前来向大国请求，同时又不让我军长久留在贵国。因此，我们只能前进而不能后退，您的命令我们会照办的。齐顷公则高傲地表示，无论晋是否同意，都必有一战。齐国高固单车挑战，进入晋国军队，拿石头投人，把晋军士兵抓住，然后坐上战车回到齐军，在齐军营地耀武扬威、鼓舞士气。

六月十七日，晋、齐两军在鞍（今山东济南市西）摆开阵势，鞍之战爆发，夏为齐顷公驾车，逢丑父为车右。晋国解张为郤克驾车，郑丘缓为车左。齐顷公轻蔑地说，我姑且消灭这些敌人再吃早饭！齐顷公战车马不披甲，驰向晋军，齐军遂冲杀过去。晋军主将郤克为箭所伤，血流到鞋上，但他却使军中鼓声不断。驾车手解张一边激励郤克，一边左手握缰策马、右手握槌击鼓。战马飞奔向前，全军将士也随着冲锋陷阵。齐军大败，晋军乘胜追击。晋军司马韩厥站在战车中央驾车，与车左、车右一起追赶齐顷公。顷公御者邴夏欲射杀韩厥，顷公以之为君子而不许，于是只杀死了车左和车右。韩厥躬身稳车，顷公乘机逃逸，并与车右逢丑父互换了位置。后齐顷公之战马被绊，车右逢丑父受伤，再度被韩厥追上。逢丑父命齐顷公取水，公得坐上郑周父驾御的副车逃归，而逢丑父则被韩厥误认为齐君而俘。

追赶齐军的晋国军队，从丘舆（今山东益都县西南一直）进入齐国，攻打丘舆附近的马陉。齐顷公派执政大臣国佐把齐灭纪所得到的室、玉磬和齐国所侵占鲁、卫两国的土地送给战胜诸国，以求媾和。晋人还要求把国母肖同叔子作为人质并使齐国境内田陇全部东向，这样才能媾和。国佐以为这一要求迥出常理，据理力争，并说："如果你不同意的话，我们就将收集残余力量决一死战。"在鲁、卫两国劝谏下，晋人答应了齐的请求。公元前587年（周定王十八年）七月，晋军和齐国国佐在爰娄（今山东临淄西）结盟，齐把汶阳（今山东宁阳县北）之田归还给鲁国。鲁成公为表示感谢，特意赶到上（今山东阳谷县境）会见晋军，把车轮和三命的车

服赐给晋军的三位高级将领——克、士燮、栾书，晋军的司马、司空、舆帅、候正、亚族等一般将领都赐给以一命的车服。

【鄢陵大战】

公元前575年（周简王十一年）春，郑国叛晋附楚。夏，晋厉公怒，栾书认为不可使晋国失去在诸侯的霸主地位，必须攻打郑国，于是发兵，厉公亲身率军。郑闻晋军前来讨伐，便派人求救于楚。楚共王率军救郑。五月，晋军渡过黄河，晋、楚两军遇于鄢陵（今河南鄢陵县北）。楚军在早晨逼近晋军，摆开阵势，晋国军吏有些担心。这时，从楚奔晋的苗贲皇也把楚军情况报告给晋厉公，让晋厉公命令晋军把精兵分开去攻击楚的左、右军。然后三军联合进攻楚中军王卒。晋楚两军交战时，晋国吕锜取中楚共王眼睛。楚军被困在险阻之地，公子筏也被晋俘获。战斗自晨至暮，楚将子反命令军吏观察伤情，修理武器，准备再战。楚共王找子反议事，子反醉而不能见，楚共王乘黑夜逃走。楚军退到瑕地时，子反自杀，楚军败归。作战之日，齐国国佐和无咎才到军中，卫献公才从卫国出发，鲁成公才离开坏隤（今山东曲阜境），他们对鄢陵之战都持观望态度。鄢陵之捷，使晋厉公扬威于诸侯，欲霸天下。

【马陵之战】

公元前342年（齐威王十五年、魏惠王二十八年），齐、魏两国在马陵会战，魏国大败。

两年前，韩国和赵国抵制了魏惠王称王天下的“逢泽之会”。魏惠王怀恨在心，并在这一年兴兵攻打这两个国家。魏国的首要目标是韩国，并在梁、赫（均在河南临汝）大败韩军。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国大将军田忌主张马上出兵。军师孙膑则认为，韩国是该救，但要选中时机。现在韩、魏之争还未见分晓，齐国马上出兵，等于是代替韩国跟魏国交战。齐军一旦受损，韩国日后其势大于齐国，这显然对齐国不利。所以，应该在韩、魏两国都精疲力尽之时出击，齐国既有把握获胜，韩、魏两国也会两败俱伤。

于是，齐国先做出发兵之势，这使得韩国觉得有了依靠，就全力攻魏，结果五战五败。眼看韩国就要支持不住之时，齐国的大军才开始出动。此时的魏国，大败韩国之后，颇想一鼓作气，再击败齐国，就派出太子申和庞涓率3万大军迎击。齐军按照孙膑的计谋，采取所谓“减灶诱敌”之法，在不断后撤的同时，每天减少驻扎地的军灶数目，在3天内从10万灶减少到2万灶。庞涓误认为齐军在大量逃亡，从而放心大胆地以少数主力部队突前追击。结果，齐国在马陵（今山东范县）以重兵设下埋伏，全歼魏国主力。太子申被俘，庞涓自杀而亡。齐国通过桂陵和马陵两次战役的胜利，事实上已取代魏国，成为中原地区的第一强国。

【桂陵之战】

孙武死后一百多年，孙家又出了一位大军事家——孙膑。孙膑所处的时代，已经是战国中期了。

孙膑自幼酷爱祖传的兵法十三篇，和他一道学习的还有魏国人庞涓。两人情同手足，但性格上却迥然不同：孙膑比较内向，忠厚朴实，好学上进；而庞涓则比较外露，华而不实，好高骛远。学习三年之后，两人在思想上开始发生分歧。孙膑总感到自己学的不多，要继续攻读；而庞涓则自以为能，急于去求取功名。

庞涓本是魏国人。晋在战国初期分成了魏、韩、赵三家诸侯，而魏国首先通过变法，迅速成为一个强国。特别是魏惠王在公元前369年即位以来，器重各种人才，四处张榜，访求将相。庞涓辞别了孙膑，来到魏国都城大梁，并最终取得魏惠王的信任，当上了魏国的将军。他练兵有方，指挥果敢，首次对卫、宋等小国用兵，就大获全胜。齐军入侵魏国边境，也被庞涓赶了出去。一时间，小国胆寒，大国心惊，庞涓的名声迅速传播开去。

这时庞涓想到了孙膑。他想孙膑是齐国人，学识比自己高明，如果将来回到齐国去任将，恐怕会对自己不利。于是，庞涓派人把孙膑请到了魏国，推荐给魏惠王。后来，他又怕孙膑胜过自己，



孙膑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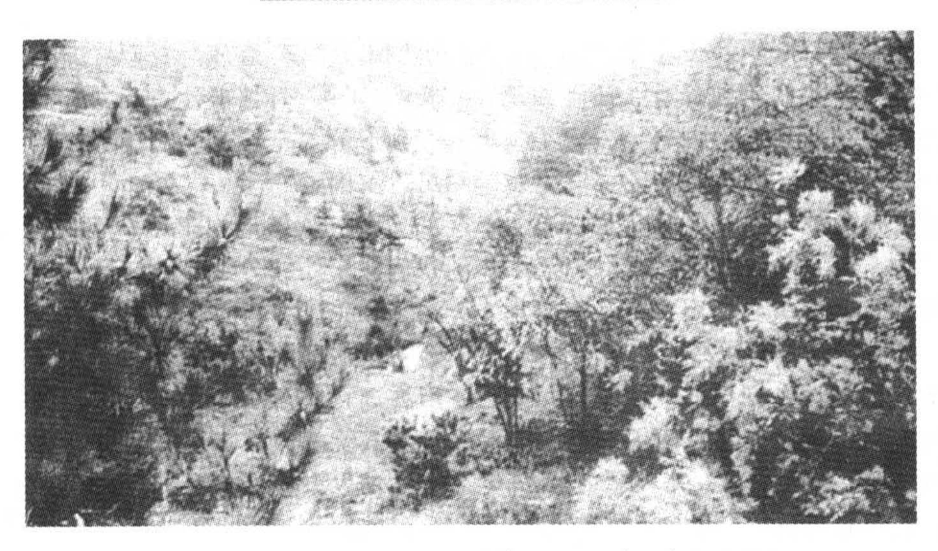
就用阴谋剜去了孙膑的两个膝盖骨。一天，有个齐国使者来魏国，了解到孙膑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就设法将孙膑秘藏于车中，带到了齐国。庞涓闻知孙膑失踪，连忙派人四处搜寻，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庞涓害怕魏王追究，便叫左右申报孙膑已落水而死，骗过了魏王。

孙膑来到齐国都城临淄，立即受到了齐国大将军田忌的热烈欢迎。田忌见孙膑面色苍白，双膝脓肿，十分心疼，未及晋见（田）齐桓公，就把孙膑接到自己府上，请名医诊治，送美食调养。孙膑很快恢复了健康。

田忌对孙膑非常敬重，国事、家事都喜欢同他商量。孙膑对田忌感激不尽，也时时进言献策，为之分忧。

孙膑的智谋第一次显露，是他出主意帮助田忌赛马。原来齐桓公午喜欢赛马，时常和贵族们赛马赌输赢，每次下的赌注都很大。田忌养了不少好马，可是每次三场赛马都输。有一次，孙膑跟田忌去观看赛马，回来后对田忌说："下次赛马，尽管下大注，我有法使你赢。"田忌大喜，在智能方面，他相信孙膑简直胜过相信自己。所以在下一次赛马时，田忌每场下注一千两，三场就是三千两。等到临场比赛时，孙膑对田忌说："请用您的下等马去同国君的上等马比赛，先输一场。再用您的上等马去同他的中等马比赛，用您的中等马同他的下等马比赛，赢回两场。三场两胜，这就是我们的对策。"

比赛结果真如孙膑安排的那样，田忌一负两胜，得黄金一千两。齐桓公惊得目瞪口呆，半天回不过神来。这时，田忌笑着对齐桓公解释说："臣今日获胜，并不是因为马力加增，完全是依靠



马陵道，史载齐国军师孙膑设计在此歼灭了庞涓率领的魏军

了孙膑的妙计。”于是，他把孙膑的对策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桓公。齐桓公明白了底细，赞叹道：“就这么件小事，也足见孙先生的智慧非凡。”便马上召见孙膑，与之谈论兵法，大为叹服，遂拜孙膑为军师。齐军在孙膑的调教下，改变了防御体系，完全放开了手脚，在四邻的不断袭扰中，打出了威风。南边的楚国不敢再骚扰齐国边境，西边的赵国不敢再到黄河来捕鱼，其余周边国家也不敢再对齐国用强了。

孙膑从魏国秘密来到齐国这件事，庞涓连一点音信也不知道。孙膑失踪的时间愈久，他就愈加放心，管你孙膑是死是活，都碍不着我庞涓的手脚了！庞涓的心思已经完全转到如何大显身手、建立赫赫武功的问题上。作为魏国将军的庞涓，并不满足于对各小国作战的胜利，而是早就琢磨着如何对邻近的大国下手，拿谁来开刀。

那时，魏国西边筑长城与秦国相隔，南边与韩国、楚国接壤，东边以淮水、颍水为界与齐国相邻，北边以漳河为界与赵国相交。在这些邻国中，秦、齐、楚较强，而韩、赵较弱。因此，魏国对韩、赵两国的主意已经打得很久了。尤其是赵国，竟敢疏远魏国，投靠齐国，与齐结成联盟，这对魏国的威胁确实不小。

庞涓决定先从赵国开刀。在他看来，赵国实力单薄，可以马到成功；而瓦解了齐、赵联盟，齐国也会势孤力单。于是，他面奏魏惠王，陈说利害，决心伐赵。惠王当然同意，并正式下令，命庞涓统率八万全副铠甲的精锐部队出征赵国。

公元前354年，庞涓亲率大军，直取赵国都城邯郸。魏军装备精良，十分勇悍，庞涓指挥自如，势如破竹，第二年就兵临城下，将邯郸围了个水泄不通。

邯郸危在旦夕。国君赵成侯一面命令守臣凑集军民之力，拼命固守，一面火速派人向齐国求救，表示愿把中山（今河北定州一带）这块地方让给齐国，作为出兵援救的报酬，并向齐国指出，如果赵国不保，战火势必向齐国蔓延。

继桓公之后担任齐国国君的威王因齐（公元前357年继位）也看清了这种

形势。魏国攻打赵国，无非是杀鸡给猴看，与其今后自己单独伐魏，还不如现在以援救赵国为名，两国合力，狠狠地揍它一顿。再说，援救赵国，实际上就是一种进攻性的自卫。何况赵国还是自己的盟国，赵国受到威胁，出兵救援，正是坚持正义。决心已定，齐威王立即想到了孙膑。孙膑精通兵法，多谋善断，又熟悉魏国国情，且痛恨庞涓，这正是他报仇雪恨、建立战功的极好机会，于是准备任命孙膑为主将，率兵救赵。

孙膑却辞谢说："我是受过刑的人，做主将万万不可。"齐威王不解其意。孙膑解释说："做主将，就要打出我的旗号，庞涓得知，必然会引起高度警惕。再说，做主将，就应该带头冲锋陷阵，我双腿已残，不能身先士卒，势必影响士气。对敌人，应尽量表现自己的无能；对部下，要尽量发挥自己的威力。这才是用兵之道。"于是齐威王改任田忌为主将，孙膑作军师，立即起兵，援救赵国。

田忌打出"田"字旗号，率领齐军浩浩荡荡向西开进。孙膑坐在有篷帐的车子里，随军进发，暗中策划，而不让敌人发觉。

田忌准备率兵直奔赵国都城，与赵夹击魏军，以解邯郸之围。孙膑却连连摇头，认为不可。他对田忌说："魏军攻打邯郸甚急，邯郸已朝不保夕，不等我们部队赶到，就会失守。当前已不需要解邯郸之围，而是要解救赵国之危。"

田忌为之一震，说："军师言之有理。既然如此，你看怎么办呢？"

孙膑说："要解开一团乱丝乱麻，不能抓在手里强拉硬扯；要劝开两个打架的人，不能插身进去拳打脚踢。救兵解围也是这个道理。我们应避开敌人充实的地方，而打击他虚弱的部位，敌人看到形势与己不利，有了顾忌，自然就可以解围了。"

田忌急切地问道："照军师所言，我们向何处进军呢？"

孙膑详细指点说："现在，魏国把最精锐的部队用来对外，而把老弱残兵留在国内防卫，弱敌就在这里。我看，您与其统率大军去攻其精锐，还不如直扑魏都大梁，占领其要道，控制其交通，攻击他们防务空虚的地方。魏军主力知道后，必然放弃对赵国的进攻，而回师自救。这样，我们就可以一举两得：一则解除赵国之危，二则使魏军奔波疲惫，我们即可从中获利，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田忌伸出拇指，高兴地说："真是一条绝妙好计！"遂立即率兵直奔魏国。齐军攻入魏境时，果然不出孙膑所料，邯郸已于公元前353年十月被庞涓占领了。庞涓乘胜又攻打归附赵国的卫国，以扫清侧翼，一心要把赵国置于死地。

田忌探知卫国被围，魏军就在近处，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便急忙找孙膑商量。孙膑说："请您率兵向南佯攻襄陵（今河南睢县西）。襄陵城小而管辖地盘大，人多兵马壮，是魏国的军事要地，很难攻下。我们这是有意让敌人迷惑不解。攻打襄陵，南有宋国，北有卫国，路上还有魏国的市丘城，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粮草断绝了通道。魏军看到我们战法笨拙，必然会麻痹轻敌。"田忌心领神会，立即拔营启程，向南直扑襄陵。

且说庞涓闻知齐国出兵，先是一惊，生怕国内空虚，经不起齐军的进攻，正准备调整部队，回师对付齐军。忽又闻

报齐军正扑向襄陵，不禁大笑道：“简直是糊涂将军！襄陵极难攻下，待我攻下卫国，再去回救也不迟。”于是，便命令魏军继续攻卫。

齐军来到襄陵，孙膑又改变了策略。当田忌正要派兵攻城的时候，孙膑问道：“率兵前来的都大夫中，谁最不会打仗？”

田忌说：“率领齐城（即山东临淄）、高唐（今山东高唐）部队的两位都大夫。”

孙膑说：“那就派这两个都大夫兵分两路，强攻襄陵。”从齐城、高唐两地来的部队，在不会打仗的两个都大夫率领下，分兵强攻襄陵，结果被守军打得大败。

庞涓获悉，高兴得手舞足蹈，更加不把齐军放在眼里。就在齐军攻打襄陵、庞涓尚未回兵的关头，孙膑从容地对田忌说：“到时候了！请您集中各路部队，迅速向大梁挺进。”

齐军放弃了对襄陵的攻打，集中兵力，绕道直插魏都大梁。魏惠王闻讯，大为震惊，立即命令庞涓火速撤兵回援。庞涓这才着急起来，部队来不及休整，立即传令返回本土作战。他十分后悔没有及时阻击齐军，竟让齐军哄瞒过去，深入到国都去了。接到魏王的命令，他急如星火，指挥部队昼夜兼程，人不歇脚，马不停蹄，恨不得马上赶回魏国。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孙膑已在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南）布下阵势，以逸待劳，正等待着他庞涓落网呢！

桂陵是魏国的交通要道，也是魏军主力回援的必经之地。这里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孙膑、田忌就在这里摆好了战场，设下了圈套。

庞涓一路上气急败坏，心急如焚。他轻视齐军，只顾前进，武器、粮草都顾不上多带。魏军连续行军，得不到休息，士兵精疲力竭，活像打了败仗的逃兵。庞涓自以为齐军战将无能，后援不继，自己一旦回师，即可全歼。哪知一到桂陵，只见齐军漫山遍野，阵容整齐，斗志高昂，刀枪林立。庞涓看到这般阵势，慌了手脚，但事情既已至此，也不得不硬着头皮，指挥进击。魏军早已疲惫不堪，哪里经得起齐军精锐轮番冲杀，再加上马无草，人无粮，刀枪弓箭都得不到补充，不两天便被齐军打得七零八落。不可一世的庞涓急忙收拾残部，星夜逃回大梁去了。

事后庞涓打听到，齐军的决策者不是别人，正是失踪不见、与自己势不两立的孙膑。一想到孙膑，他就感到后怕，顿足捶胸叹道：“这瘸子果然叛魏返齐，我上了他围魏救赵的当了。”

【即墨之战】

公元前314年，燕国起了内乱。齐国趁火打劫，借着平定燕国内乱的名义，由大将匡章率兵把燕国灭了。但燕国人发起了一个复国运动，找到了以前的太子，立他为国君，这就是燕昭王。各地投降了齐国的将士也纷纷起来反抗，把齐国人轰了出去，归顺了燕昭王。燕昭王回到都城，修缮宗庙，整顿朝政，搜罗人才，操练兵马，立志要向齐国报仇。

公元前284年，燕昭王任命乐毅为上将军，统率燕军，加上秦、赵、韩、魏的友军，大举伐齐。

上将军乐毅身先士卒，带兵跑在了秦、赵、韩、魏各国兵马头里，到最接

近敌人的地方去指挥作战。四国将士见此，群情振奋，个个拼了命地往前打，在济西一战中打败了齐军的主力。

四国将士打了几回胜仗，各自占领了齐国的几座城，就心满意足地驻扎下来，不再接着往下打了。乐毅自己则率燕军乘胜前进，攻陷齐国都城临淄。接着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连下七十余城。除了莒邑（今山东莒县）、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两地没有被攻下之外，其他地方都被乐毅攻没为燕国的地盘了。

乐毅知道，单靠武力，征服不了齐国的民心；民心不服，就算把齐国全拿下来，也守不住。好在齐国只剩下两座城，也不能再成什么大事了，不如以恩德去打动齐国人。于是他做了几件讨好齐国人的事情，如废除当时齐王所定的苛刻法令，减轻人民捐税负担，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优待地方名流等等。乐毅围困莒邑和即墨将近三年，可还是没有打下来，他就下令退兵，把大军驻扎在离城十多里远的地方，并下了一道命令，说："凡是城里老百姓出来，可以让他们随便来往，不准留难他们。瞧见挨饿的，给他们吃；受冻的，给他们穿。"

公元前 279 年，燕昭王死了，太子即位，就是燕惠王。这时传来谣言，说乐毅想在齐国称王。燕惠王赶忙派骑劫为大将，将乐毅调了回来。

骑劫当了大将，接收了乐毅的军队。他有他自己的一套办法，把乐毅的命令全改了。燕军都有点不服气，可是大伙儿敢怒不敢言。骑劫下令围攻即墨。守城的将军田单，早已将决战的步骤部署好了。

田单是齐国田氏远房的贵族，曾在临淄作过小吏，平庸无闻。齐国都城临淄被攻陷时，田单也携家带口乘车逃到安平（今山东淄博东北）。一路上见到逃难的车辆十分拥挤，常常相互撞翻，他估计燕军还要来追，就把自己车轴两端露在车厢外面的部分锯掉，用铁皮包起来。果然燕军追来，齐人又争相逃命，许多车辆为夺路而撞断车轴，无法行走，惟有田单的车顺利地逃到了即墨。

即墨大夫率众与燕军战死。即墨人得知田单改造车轴、安全撤退的事，认为他足智多谋，加上又是田氏的后代，定能熟悉兵法，于是大伙儿共同推举田单为将，坚守即墨。田单做了即墨的首领后，与部下同甘共苦，不分日夜地亲自巡城，受到全城百姓的信任和拥戴。

田单一方面加强城防的守备，一方面派人到燕国去侦察敌方的情况。他听说燕昭王死了，儿子惠王登位，惠王原来就与乐毅有矛盾，互相很不信任。于是，他便使用反间计，派间谍去燕国造谣说："齐王已经死了，齐国的城池未被燕国大军攻下的，只不过两座而已。乐毅现在以伐齐为名，其实是想联合齐国的残兵败将在那里称王，只是齐国人民不肯归顺他，所以他并不急于攻下即墨，为的是等待时机成熟。现在齐国人担心的是燕国改派别的大将来，那即墨城马上可就要完蛋了。"燕惠王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信以为真，果然另派骑劫去代替乐毅。乐毅被革职以后，惧怕遭燕惠王杀害，回家乡赵国去了。骑劫本是个无能之辈，他一上任，顿时使燕军的军心动摇了。

田单利用反间计去掉了乐毅之后，进一步做鼓舞士气的工作。他用迷信的形式，在军队里挑选了一个机灵的士兵，

让他假装“神师”。以后每逢下令，田单总是非常恭敬地将这位“神师”请出来，说是出于天神的教导。齐军士兵听说有天兵天神下凡助阵，都非常高兴；相反燕军听到这个消息，真以为齐军有天兵天神帮助，却非常害怕。

田单又叫几个心腹扮作老百姓到城外去议论。有人说：“以前乐毅将军太好了，抓了俘虏还好好款待他们，城里人当然不怕了。要是燕国人把俘虏的鼻子都削去，齐国人哪里还敢打仗？”又有人说：“我们祖宗的坟都在城外，要是燕人刨起坟来，那可怎么办呢？”

骑劫听到这些话，果然真的把齐国俘虏的鼻子都削了去，又把即墨人城外的祖坟掘坏，并引火焚毁。城上齐国守军见城外火光冲天，腥臭之气熏天，个个咬牙切齿，痛心疾首，愤恨燕军的暴行。

即墨的士兵和群众纷纷向田单请求，一定要与燕国人拼个你死我活。田单挑选了五千名壮丁、一千头牛，先训练起来，叫老头儿和妇女们在城头上值班。他又搜集了好些金子，打发几个人装作即墨的富豪，偷偷地给骑劫送去，说：“城里的粮食已经完了，不出三天就得投降。贵国大军进城的时候，请求将军保全我们一家老小。”骑劫见财喜出望外，连声允诺，一心只等齐军投降，而放松了戒备。

田单认为，反击燕军的条件已经成熟。但是，即墨兵力有限，出击围城的大批燕军，必须设计一个好的作战方案。于是，田单把那一千头牛打扮起来。牛身上披着一件大褂子，上面画着大红大绿、稀奇古怪的花样；牛犄角上捆着两把锋利的尖刀；牛尾巴上系着一捆浸透了油的麻和苇子。那五千名壮士则组成一支“敢死队”，他们都打上五彩的花脸，拿着大刀阔斧，跟在牛队后面。

到了半夜，燕军皆已昏然入睡，田单命令拆开几十处城墙，将牛队赶到城外，牛尾巴点上火。牛尾巴一烧着，这一千头牛可就犯了牛性子，一直向燕国的兵营狂冲过去。五千名“敢死队”紧跟着冲杀上去。城里的老百姓狠命地敲着铜盆、铜壶，随着跟到城外来呐喊。霎时间震天动地的喊杀声夹着鼓声、铜器声，惊醒了燕国人的睡梦。士兵们手忙脚乱，慌里慌张地找不着家伙。只见一大群凶猛的怪兽，头着利刃，后面裹挟着一团烈火，风驰电掣般地冲来。别说是一千对牛犄角上的刀扎伤了多少人，那五千名“敢死队”砍死了多少人，就是燕国军队自己连闯带踩地一乱，也就够受的了。大将骑劫乘着车，打算杀出一条血路，正巧碰上了田单。这个自以为比乐毅高明得多的大将，交战未及数合，便被田单给杀了。

田单整顿好队伍，立即展开反攻。整个齐国轰动起来，各地燕军听说田单反击大败燕军，主将阵亡，纷纷退却。那些已投降燕国的将士一听到田单打了大胜仗，都准备迎接田单。田单的军队打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就起来响应，田单的兵力越来越强大。不到几个月工夫，被燕、秦、赵、韩、魏占领的几十座城，一座一座地全被收复回来。由于田单恢复了父母之邦，为国家立了大功，将士和百姓们都要拥立他为齐王。田单说：“太子法章就住在莒邑，我们早有联络，我哪儿能自立为王呢？”田单把太子法章接来临淄，择了个好日子，祭祀太庙，太子正式做了齐国国君，他就

是齐襄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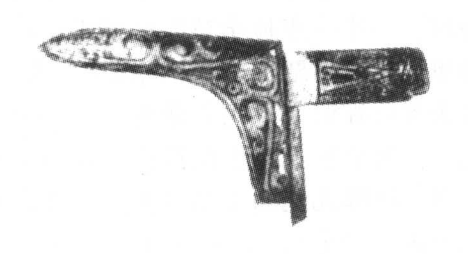
齐襄王对田单说："齐国已经亡国了，全靠叔父力挽狂澜于既倒，重新建立起来，这个功劳实在太大了，叫我怎么来报答您呢？我封叔父为安平君，请叔父万万不要推辞。"田单谢了恩，请齐襄王继续发愤图强，以防备燕国再来报复。但是齐国经过几年的战争，到底力量有所削弱，再也没有力量与诸侯一争天下了。

田单以火牛阵出奇制胜的即墨之战，是战国时期的著名战役之一。由于做到了知己知彼，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田单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和弱点，养精蓄锐，团结人民，壮大自己的力量，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创造了以弱敌强、运用军事谋略的典型战例，而流传千古。田单不愧为一名优秀的军事家。

【华阳之战】

公元前273年（秦昭王三十四年），赵国和魏国进攻韩国的华阳（今河南新郑），秦国乘机获取实利。

在秦国不断东进的同时，山东六国的内耗也在加码。秦国攻破楚国郢之后，把首攻目标定在三晋，而三晋之间的火并也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这一年，赵、魏联合进攻韩国的华阳，韩国向秦国告急，秦国不救，坐视三晋的搏杀。眼看



云纹铜戈

危急万分，韩国的相国只好央求大臣陈筮，请他带病去见秦国丞相魏冉。魏冉问陈筮，是不是事情太紧急了，才派你来？陈筮则说，感到紧急的不应该是韩国，而是秦国。为什么呢？陈筮解释说，韩国实在没有办法之时，就会与赵、魏联合，共同对付秦国。秦国这才出兵救韩。秦国的大将白起在华阳城下打败魏军，斩首15万，并乘胜夺取了卷（今河南原阳）等地；接着，又击败赵将贾偃，把2万赵军淹死在黄河之中。秦国的大军又往前进，围攻魏国都城大梁，以期消灭魏国，以斩断山东六国搞合纵战略的腰部。幸好有燕国和赵国及时赶来救援，魏国又割让土地给秦国，秦国才退兵而去。

【长平之战】

公元前260年（秦昭王四十七年、赵孝成王六年），魏国在长平战败，40多万士兵被秦军活埋。

因为赵国接收秦国的上党郡而引发的秦、赵长平之战，到这一年已经进入第三年。秦国不断在长平周围诱扰赵国主帅廉颇，廉颇却不为所动，坚守不出，等待秦军的疲惫。而在赵国内部，由于把几乎全部兵力都压在了长平，赵王很希望能与秦国一决胜负，因而不断指责廉颇。秦国丞相范雎得知这一消息后，就使用了秦国惯用的反间计。他派人到赵国，用金钱打通关节，向赵王吹风说，秦国最怕的是赵奢的儿子赵括，而廉颇最好对付不过，不久就要投降了。赵王信以为真，就用赵括接替了廉颇。

赵括少年时就学习兵法，说起兵法来头头是道，连他的父亲，智勇双全的



长平大战

赵奢也说不过他。但他只会纸上谈兵，实战经验全无。到任之后，赵括一改廉颇的战略，冒然出击，主动与秦军交手。而秦国的主师白起，久经沙场，立刻就引诱赵括上了钩。白起佯装败走，赵括便率领大军追击。当追到秦国的壁垒跟前时，白起的伏兵杀出，把赵军冲断为两截。赵军进退两难，只好就地筑起壁垒，等待援军。秦昭王闻讯，亲自征发援军，并阻断了赵军的粮道。赵军断粮46天，赵括本人也在拼死突围中战死，赵军40多万人就都投降了秦军。白起怕留下后患，除了让其中的240个年少者回到赵国外，将余下的赵军全部坑杀。长平之战，赵军先后损失士卒45万，致使国力大衰，只有坐待灭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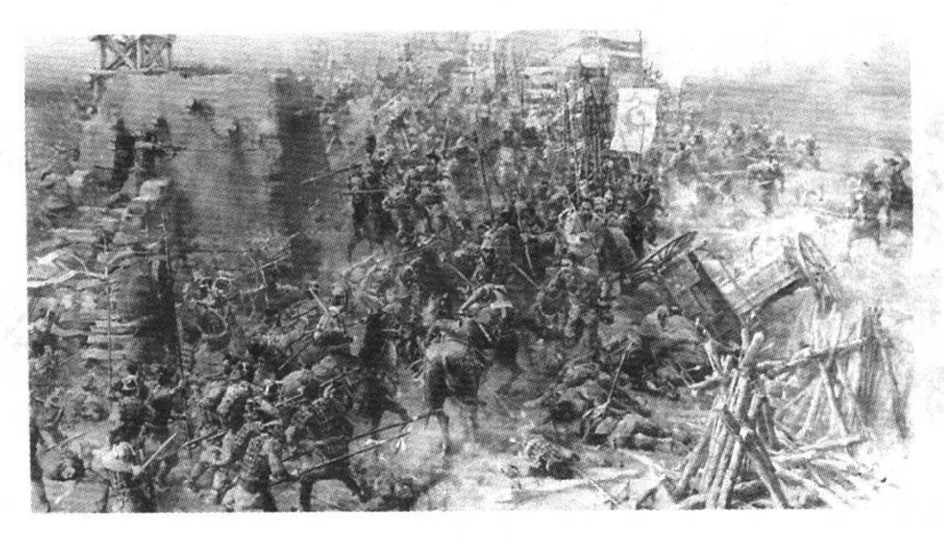
【巨鹿之战】

公元前207年（秦二世二年），项羽在巨鹿之战中大破秦军主力。

前208年，秦将章邯击溃项梁率领的楚军主力，以为楚地之兵不足为忧，就转而攻打赵地。秦军攻破邯郸，把赵王歇围困在巨鹿（今河北平乡）。楚怀王任命项梁的副手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率各路兵马救援赵王。宋义率军到达安阳（今山东曹县）时，驻扎46日不进兵。项羽主张渡过黄河，与赵军内外夹击，攻破秦军。宋义则想让秦、赵先斗，楚军坐守渔翁之利，并宣布不服从命令者斩首。此时已至十一月，天寒大雨，士卒冻饥难忍。项羽一怒之下，矫称楚王之命，杀死宋义。楚王随即以项羽为上将军，率军北进。

十二月时，项羽先派出英布和蒲将军率两万人先渡河，截断秦军粮道。然后，项羽亲率全军，渡过黄河。过河之后，项羽下令把所有渡船凿沉，把炊具和帐蓬等也都烧掉，士兵每人只能携带三天的干粮，表示要与秦军决一死战。结果，与秦军交战之时，楚军喊声震天，无不以一当十。双方大战九场，楚军大破秦军。秦将王离被擒，苏角被杀，涉间自杀，主帅章邯败逃。

当楚军与秦军决战的时候，赵军以及救赵的齐、燕之军，都被双方拼杀的场面所震惊，竟不敢参战，只能作壁上观。待项羽终于率军击破秦军之后，各路诸侯到项羽营中祝贺。他们进入辕门之时，没有人胆敢抬头看一眼站在门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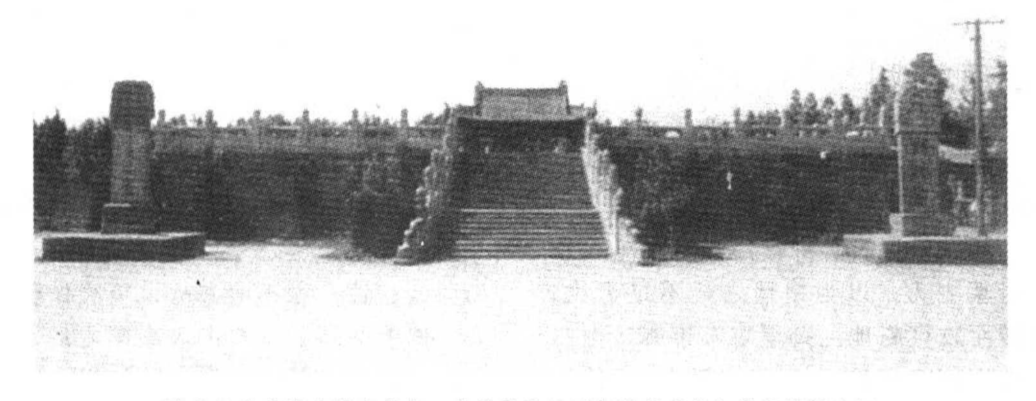
巨鹿之战

的项羽。自此以后，项羽的勇猛传遍天下，无人不服，最终作了诸侯的上将军。

【井陉口之战】

公元前204年（汉王三年），韩信以背水阵大破赵军，显示出过人的军事才能。

韩信与张耳率军翻过太行山，东攻赵国。赵王歇与赵军统帅陈余在井陉山口（今河北井陉）筑垒，据险与汉军决战。赵将李左车建议从小路截断汉军粮道，陈余不听。韩信在离井陉口三十里处扎营，夜里派出两千人，从小道出发隐蔽起来。另派出万人先行，到井陉口附近的绵蔓河东岸背靠河水摆开阵势。天明之后，韩信亲自率军攻击井陉山口，壁垒里的赵军出来应战。双方激战良久，韩信佯败，退入背水而建的阵势之中。赵军见汉军背水为阵，没有退路，就全军出击。结果，隐蔽在那里的两千汉军突然杀出，夺取赵军的壁垒。韩信指挥的背水而战的军士拼死而战，经久不败。赵军一时难以得胜，打算退回壁垒，择日再战。不想壁垒已被汉军占领，大惊之余，纷纷逃散。汉军乘势反击，大破赵军。陈余被杀，赵王及李左车被擒。韩信的背水而战，与项羽的破釜沉舟相



陕西汉中市城南的拜将台，传说是汉王刘邦拜韩信为大将时所设之坛

比，显然又多了几份智慧在其中。

【陈仓之战】

公元前206年二月，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并开始分封诸王。要想巩固自己的霸业，就必须铲除颇有实力的劲敌刘邦。若是遵照原约，应该让刘邦做关中王，可是，这里地势险要，土地肥沃，若封其在这里为王，岂不使刘邦如虎添翼，以后就更加难以对付了；如果不这么办，项羽又不愿承担毁约的罪名，何况鸿门宴上又表示了和解的意愿，这可把他难住了。还是范增给他出了个主意，可以借口汉中也属于关中，封刘邦为汉王，这样也就算是依照原约了。于是项羽就让刘邦到偏僻的南郑（今陕西南郑）去建都，只管辖四十一个县。又把按约应该分给刘邦的关中地区，划分为雍、塞、翟三个部分，封章邯为雍王，掌管咸阳以西地区；封司马欣为塞王，掌管咸阳以东到大河（黄河）一带；封董翳为翟王，掌管陕北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这三人都是秦朝的降将，他们对项羽的不杀之恩已经感激不尽了，如今又对他们裂地分王，就更是死心塌地愿意为项羽效劳了。项羽也深知此点，让他们三人分别镇守关中，为的就是要防止刘邦东进。

项羽在六国残余势力割据局面的基础上，把参加起义的六国贵族和灭秦有功的将领，总共分封了十八个王。分封完毕，各路诸侯都分别带着兵马到自己的封国去了。项羽也带着大队人马，回彭城去建都了。

汉王刘邦因为项羽背约称霸，把他赶出了关中，眼看到嘴的肥肉又被别人夺了去，这口气实在咽不下去。他想立刻攻打项羽，可又感到自己的兵马太少，不能跟项羽较量，整日里愁眉不展。张良和萧何看出了刘邦的心思，便劝他“以屈求伸”，先把拳头收回来，然后再打出去，这样才会更有力量。刘邦想，也只能如此了，遂带领他的队伍向他建都的南郑出发。他们翻过终年云封的秦岭，面对的是高山陡坡上的栈道。这栈道是用一根一根的木桩打到悬崖上面，再利用木桩铺上木板筑成的。人马走在上面摇摇晃晃，往下一看，深不见底，一不小心，就会跌得粉身碎骨。

在鸿门宴上帮助刘邦脱险的张良，送了刘邦一程，就要和刘邦分手了。他是韩王成的臣下，要跟随韩王回到韩国去。临别时，他对刘邦说：“往前走还有很长的栈道，请大王走一段烧一段，一方面可以防止追兵袭击，另一方面表示您无意再回来，好让霸王放心。然后暗地里积蓄力量，待到时机成熟，从另一条道路打过来，可以出奇制胜，消灭项羽。”刘邦接受了张良的建议，可是他手下的士兵们并不知道这是一计，以为是断绝了归路，一个个很是惊慌，再加上道路艰险，行军困难，不少人半路就开了小差。

汉王好不容易到了南郑，拜萧何为丞相，任曹参、樊哙、周勃等人为将军，决定休兵养士，招纳人才，准备将来好与楚霸王项羽争个高低。但是，他的士兵不愿意在这里久住，整天唱着思乡的歌，想回到东方老家去。不仅兵士有人脱队逃走，就是有的将官也离去了，愁得刘邦吃不好、睡不安。

一天，忽然又有人来报告，说萧丞相也逃走了。汉王一听急坏了，不料过

了一两天，萧何又突然回来了。刘邦见到萧何，喜怒交加，责骂道："别的将士逃亡，情犹可原；我对你倍加重用，你怎么也要逃走呢?"萧何见刘邦满面怒容，连忙解释说："为臣哪儿会逃走啊，我是追韩信去了，因为时间紧迫，没有来得及向大王报告。"

刘邦一听更生气了，骂道："我的十几员大将都逃跑了，你一个也没有去追，现在却说是去追一个无名小校韩信，该不是在骗我吧?"

萧何诚恳地对汉王说："诸将易得，举世无双的韩信却难求啊！大王若只想长久地在这里称王，韩信确实没有多大的用处，大王如不想长期在汉中苟且偷安，还要争霸天下，那韩信可就是非常用得着的人才了。这要看大王您的志向了。"

刘邦当然不愿偏安在这汉中之地。在萧何的举荐下，汉王终于拜韩信为大将，并举行了隆重的拜将仪式。

汉王举行拜将仪式以后，对韩信说："丞相多次推荐将军，称赞将军的雄才大略。我想统一国家，平定天下，将军有什么好计策，请多指教。"

韩信谢过汉王，向汉王详细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韩信说，能够和汉王争夺天下的只有霸王项羽。以前他曾在霸王手下做过事，知道霸王勇猛，但是他刚愎自用，不会用人。表面上很仁慈，实际上很吝啬，别人有了功劳不愿封赏，把着权力不放。更严重的是，怨恨他的人多，亲近他的人少。他烧杀掳掠，早已失掉了民心。韩信建议汉王要反其道而行之，大胆任用英勇善战的将士，不仅对有功劳的人厚加封赏，更要注意笼络民心，取得老百姓的支持。只要这样，就一定能够打败霸王。

汉王听罢大喜，只后悔没早用韩信。他下定决心东征，就由韩信指挥将士，操练兵马。没有多久，韩信就把汉军整顿得军容整齐，壁垒一新。

这时，那些对封地不满的王侯贵族，也纷纷起来争夺地盘。就在项羽主持分封以后的五月间，没有得到封王的齐国田荣，就率兵赶走了新封为临淄王的田都，接着又杀死胶东王田市，自立为齐王，并和没有得到封地的彭越结合起来，攻杀济北王田安，据有三齐之地。同年八月，韩广不肯移到辽东去，被新封的燕王臧荼所杀。十月，陈余在田荣的鼓动和支持下赶走了常山王张耳，迎回了赵王歇，自己被立为代王。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东方战乱不停。项羽被东方的战乱所牵制，无暇西顾，正好给刘邦的发展造成了一个好机会。

韩信向刘邦建议说："项羽虽被东方牵制，但关中有雍王章邯、翟王董翳和塞王司马欣把守着，我们可采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方法，乘其不备，向关中地区突破，然后再直接攻打项羽。"刘邦欣然接受了韩信的建议。

刘邦重修栈道的消息早有探子报告了章邯。章邯心里盘算，被刘邦烧毁的栈道有三百多里，而且地势险要，在短期内是没有办法修复的。可他哪里知道，汉军修复栈道不过是用来麻痹他的烟幕而已。

公元前 206 年八月，刘邦、韩信率兵日夜兼程，直取陈仓（今陕西宝鸡东）。章邯听到消息，大吃一惊，心想，栈道烧了还没修复，难道汉军是从天上飞过来的吗？他顾不得多想，便匆匆忙忙地带领队伍前去抵挡，他哪里知道，

刘邦的军队是从多年来断行的故道到达陈仓的。

两军相遇，立即交锋。汉军久思东归，如同下山猛虎，而陈仓的守兵却毫无准备，章邯的雍军节节败退。

刘邦当初入关后，曾约法三章，关中的老百姓仍记忆犹新，如今见汉军又回来，便夹道欢迎。汉军势如破竹，很顺利地打败了雍王章邯，占领了关中大块土地，章邯败退到了建都的废丘（今陕西兴平东南）。韩信首先拿下了咸阳，卡住了章邯东逃的去路，然后又回兵攻打废丘。他查看了地形，见废丘面临渭水，防守严密，决定智取，不予强攻，便派樊哙诸将限期完成截断渭水下流的任务。水不下泄，顿时水势猛涨，如万马奔腾，涌向废丘。城中军民大乱，正在策划加固城防的章邯吃了一惊，以为是汉兵攻破城池，连忙外出查看，只见大街小巷全都是水了，只好急忙带着家小和将士们从北门水浅处逃出城去。韩信一面整队入城，安抚百姓，一面又派樊哙领兵追击章邯。章邯失去了都城，前无去路，后有追兵，人困马乏，无力再战，就拔剑自刎了。不久，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也都投降刘邦。不到三个月的工夫，关中地区就全归汉王所有了。

刘邦取得关中之后，继续迷惑项羽说："义帝（楚怀王）曾说'先入关者王之'，现在我平定三秦，只不过是实现义帝的诺言，决没有东下出关的意思。"项羽信以为真，决定暂时放下刘邦，先去平定东方。刘邦、韩信趁此时机在关中休整部队，养精蓄锐。汉王还下令，除执行原来的"约法三章"以外，开放从前秦国的园林，让农民耕种。这样一来，刘邦很快便在关中站稳了脚跟。

第二年四月，刘邦、韩信集五十六万大军，浩浩荡荡，东出函谷关，直捣项羽的老巢——彭城。

【垓下之战】

公元前 202 年（汉高祖五年），项羽被汉军在垓下彻底击垮，退至乌江岸边自杀，五年之久的楚、汉之争自此结束。

项羽与刘邦订立"鸿沟"之盟时，已现出弱势。项羽东归，刘邦乘势追击。几经战斗，在这一年的十二月（秦历三月），刘邦的汉军及韩信等的诸侯之军把项羽的主力围困在垓下（今安徽灵璧）。汉军唱起楚地之歌，瓦解楚军斗志。项羽听到四面楚歌，以为楚地都被汉军占领，便在夜里率残部八百余人向南突围而逃。刘邦令骑将灌婴率五千骑兵，务必追杀项羽。项羽渡过淮河时，仅有百余人跟随。又迷途，陷于沼泽之中，终于被汉军追至。项羽退至乌江边，自称无颜面见江东父老，遂拒绝渡过，自刎而亡，时年三十一岁。司马迁以他的大手笔，尽力渲染项羽面临最终败亡之时的英雄气概和悲剧色彩，比如"霸王别姬"、最后只身与汉军的拼杀等等，以便让项羽顺利叹息道："此天亡我，



四面楚歌

非战之罪也!”其实，项羽式的个人英雄主义，从来就不是得天下者的素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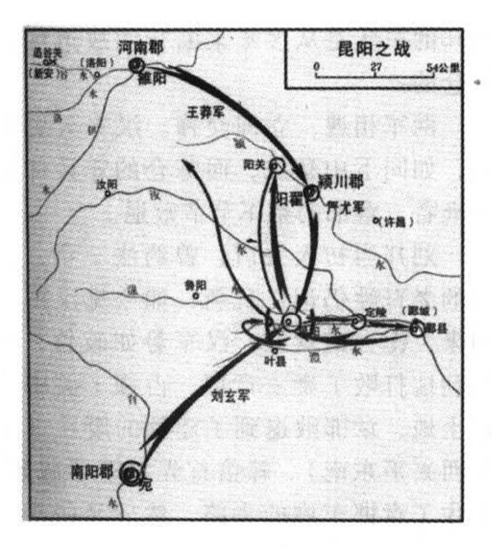
【马邑之战】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元光二年），武帝采纳大臣王恢的建议，在马邑伏击匈奴，未成。

到汉武帝时，汉朝对匈奴的政策发生了改变。武帝很想彻底击败匈奴，一则从根本上解除北部边疆的紧张，二则顺势拓展实际控制的疆土。此前，他派出的外交使者张骞，就是打算联合西方的大月氏夹击匈奴。但是，张骞一去没有消息，武帝急于建功，就在这一年用王恢之计，私下派出马邑（今山西朔州）人聂翁壹为间谍，假装逃亡到匈奴，作为向导，引诱匈奴单于进攻北部边塞。同时，任命韩安国为护军将军，李广、公孙贺、王恢、李息等为将军，率领车骑、材官30余万隐蔽在马邑两旁的山谷中，伺机伏击。单于率领10万骑兵偷袭马邑，行至距马邑百余里的地方，发现山野中到处是牲畜，却没有放牧之人，就感到有些蹊跷。于是就抓获了一个雁门尉史审问，得知了汉朝的谋划，便引兵而退。汉兵追之不及，也罢兵而去。王恢被武帝下狱治罪，自杀而亡。从此以后，匈奴就拒绝了与汉朝和亲。虽然老百姓之间的边关交易还在继续，但双方军队的厮杀已势不可免。

【昆阳之战】

公元23年（更始元年），绿林起义军已发展到10多万人，起义军攻南阳、占昆阳（今河南舞阳），节节胜利。王



昆阳之战

莽对此惊恐万分，他派大司马王寻、大司空王邑率领各州郡精兵42万，号称百万，向宛城进发，妄图一举歼灭起义军。5月到达颍川，与严尤、陈茂的军队会合，然后直逼昆阳，把昆阳城包围起来。城内起义军仅八九千人，力量单薄，但他们毫不畏缩。首领王凤、王常一率众坚守阵地，一面派刘秀、宗佻、李轶等13轻骑乘夜出城到定陵、郾城等搬请救兵。6月，刘秀等人集中万余起义军增援昆阳。援军在距莽军四五里的地方列成阵势，准备交战。刘秀仔细观察敌军阵势后，决定先发制人。他亲自率领步、骑1000人作为前锋，向敌军猛烈冲杀过去，击溃莽军调来迎战的1000余人。首战告捷，将士们大受鼓舞，准备乘胜前进。此时宛城已被义军攻破，但刘秀还没有得到消息。为了鼓舞士气，瓦解莽军，刘秀就制造了攻克宛城的捷报，射入城中，又故意将一些战报丢失，让莽军捡拾。攻克宛城的消息一经传开，城内起义军士气更加高涨，守城更加坚定，而莽军苦战一月，毫无进展，又听说宛城已经失守，士气更加低落。刘秀抓住



昆阳城遗址

战机，进行决战。他挑选3000勇士组成敢死队，迂回到城西，出其不意地渡过昆水，向莽军中坚发起猛烈攻击。王邑、王寻见起义军不多，亲率万余莽军迎战，并命令其余各军不许擅自行动。莽军接战不利，大军又不敢擅来相救，王邑、王寻军阵大乱，王寻被杀。守城义军也乘势杀出，内外合击，喊杀声震天动地。莽军全线崩溃，奔走践踏，伏尸百余里。这时又逢狂风暴雨大作，屋瓦皆飞，雨下如注，逃窜的莽军赴水溺死者又有万余人。起义军尽获其辎重，不可胜数。莽军四散逃走，只有王邑带领的长安兵几千人逃回洛阳。

昆阳之战从根本上摧毁了王莽的主力，取得了西汉末年农民起义的决定性胜利。

【官渡之战】

战前的基本形势

公元二世纪末，我国历史上爆发了一次以黄巾军为主力的农民大起义。那次农民大起义给了地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使东汉王朝的政权接近垮台。但是，起义军本身也在全国地主阶级武装力量的联合攻击下，最后失败了。在镇压各地农民起义的过程里，各地方的官僚和豪族纷纷乘机扩大自己的武装，成为许多大大小小的军阀。他们各据一方，互相混战，使黄河流域地区受到空前的大破坏，生产被摧毁，人民被大量屠杀，形成了“出门无所见，白骨蔽（遮盖）平原”的惨象。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之战就是北方两个最强大的军阀袁绍和曹操之间进行的一次最大的战争。

袁绍是汝南郡（今河南东部、安徽西北部一带）汝阳县（今河南商水）人。袁家是东汉后期的大贵族，从袁绍的高祖父袁安以下，一连四代有五个人做过三公，社会地位很高。三公有权任用自己的属官，和荐举别人作官。通过这种关系，袁家拉拢了一批官僚，政治势力很大。公元190年二月，大军阀董卓挟持了东汉的末代皇帝汉献帝，把他从洛阳向西迁到长安。关东被许多大大小小的军阀占据了。袁绍乘机取得冀州（今河北中部、南部，山东西端，河南北端一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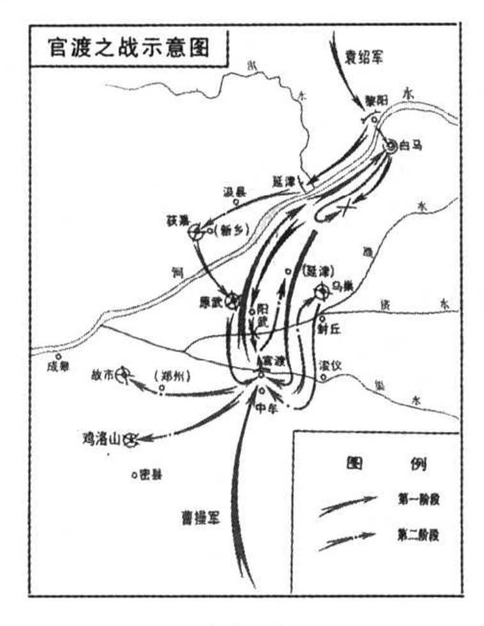
冀州在当时是一个战争较少、人口众多、粮食丰足的地区，比起州郡残破的中原地区要好得多。但是，袁绍是大官僚地主的代表，他的一切政治措施，都从豪族地主的利益出发，穷凶极恶地压榨剥削农民。他手下的官员如审配、逢纪等都是贪污不法、搜刮百姓的豪强地主。在袁绍的包庇纵容下，他们无法无天，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因此，袁绍尽管拥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有利的客观形势，但是在他的统治下，政治非常腐败，经济情况越来越坏。

正当袁绍在河北扩大地盘的时候，

曹操也积极在黄河以南发展自己的势力。曹操出身于宦官家庭，社会地位比不上“四世三公”家族出身的袁绍。汉灵帝末年，黄巾大起义，曹操参加过镇压颍川郡（今河南许昌、禹县一带）黄巾军的活动。

公元 189 年，汉灵帝死，儿子刘辩继位。大军阀董卓想乘机夺取帝位，带兵赶到洛阳，废了刘辩，立刘协为皇帝。刘协就是汉献帝。在董卓作乱的时候，曹操参加了以袁绍为盟主的讨伐董卓的大军。董卓从洛阳退走长安、袁绍占据河北。曹操也想占一块地盘，作为根据地。

那时候，长期潜伏在河北的黑山军和山东地区的黄巾军，又重新活跃起来，攻郡县，杀官吏，声势很大。曹操又配合袁绍镇压濮阳一带的黑山农民军。公元 192 年，青州（今山东北部和胶州半岛一带）黄巾军攻入兖州（今山东西部一带）。曹操又进兵兖州，打败他们，



官渡之战

并且选拔其中精壮的士兵加以改编，号称青州兵。从此，曹操的武装就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开始同袁绍分离。

公元 196 年，汉献帝从长安逃回洛阳。当时，曹操刚好打败豫州（今河南东部、安徽北部一带）黄巾军，取得汝南、颍川两郡。他亲自带兵到洛阳，把汉献帝迎接到颍川郡的许县（今河南许昌东），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从此，曹操在政治上便处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地位，利用傀儡皇帝的名义向各地方军阀发号施令。

同时，曹操在经济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发展生产。他所控制的中原地区，本来是繁荣的经济文化中心。但是，经过董卓之乱和其他军阀的长期混战，那里人口大减，土地荒芜，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的破坏。为了稳定社会秩序，蓄积力量，战胜其他军阀，曹操采纳部下的建议，实行屯田。公元 196 年，他在许县一带召募流亡的农民，开垦无主的荒地，恢复农业生产。他设置专门管理屯田的官吏，把农民象军队一样地组织起来，几十人为一屯进行耕种。农民用自己的牛耕种的，收获物同官家对半平分；用官牛的，六成交给政府，自己得到四成。这种剥削虽然也相当重，但是比较一般豪强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压榨，还是要轻一点的。屯田的效果很好，当年就在许县取得了一百万石谷物的大丰收。不久，曹操又把屯田政策推广到他所控制的其他州郡，特别是那些土壤肥沃、形势重要的地区。除了“民屯”之外，后来又实行“军屯”，让士兵们利用空闲时间开垦荒地。为了确保农业丰收，曹操还注意恢复和兴办水利事业。当时凡实行屯田的地区，农业生产都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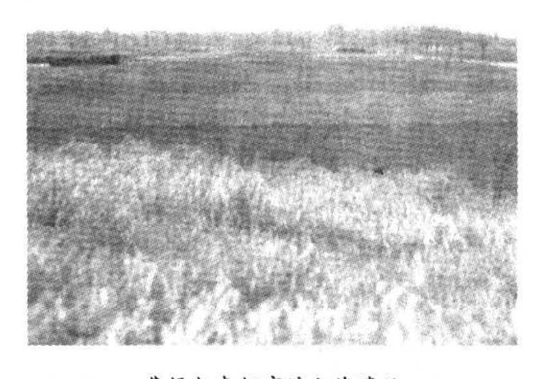
渐恢复起来，多少改变了往日荒凉的景象，军粮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社会秩序也比较安定了。在以后的几年里，曹操又先后消灭了中原一带的割据势力，成为北方惟一可以同袁绍对抗的势力。

袁绍计划进攻许都

公元196年，曹操把汉献帝迎接到许县建都以后，袁绍曾经借口许县卑湿，洛阳残破，要曹操把皇帝迁移到鄄城（今山东濮县东），以便于自己就近控制。但是，这一建议被曹操拒绝了。

袁绍自从占据冀州以后，就同北方的另一个大军阀公孙瓒连年发生战争，陆续占领了为公孙瓒所割据的青州和并州（今山西大部和内蒙古南部一带）。直到公元199年，袁绍才最后打败了公孙瓒。于是，他就把矛头转向同他隔河相对的曹操。他打算用数量和装备上占绝对优势的兵力，一举攻下许都，消灭曹操。他手下的谋士沮授、田丰等都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曹操在政治上处于“奉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地位，而且法令统一，士兵精练。而自己方面因为连年用兵，百姓疲劳，府库空虚。在这种情况下，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是不利的。他们主张，应当首先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经济，充实军事力量，然后再去攻打曹操。但是，这个意见没有被野心勃勃、骄傲自大的袁绍所接受。他终于在郭图、审配等人的迎合、怂恿下，点选大军十万人向许都进攻。

在兴兵以前，袁绍原命沮授统率三军。郭图等人为了争功邀宠，对袁绍说，沮授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如果再任令发展下去，将来就不好控制了。袁绍对于沮授不赞成他这次用兵，本来已经不满，又听了郭图的谗言，就决定把沮



曹操与袁绍官渡之战遗址

授原来统率的军队分别命令沮授、郭图、淳于琼三个人各自带领一军。这样，就削弱了沮授总领三军的大权。

袁绍在进攻之前，曾经派人去劝说荆州牧刘表从南面进攻曹操。刘表只是在口头上答应了袁绍，实际上并没有出兵助战。袁绍的第一着棋落空了。他又派使者到穰城（今河南邓县）去见张绣，动员张绣从侧面袭击曹操。但是，张绣不仅没有帮他的忙，反而接受谋士贾诩的劝告，率领所部官兵归降了曹操。这样，就相对地减少了袁绍的优势。袁绍不得不推迟大举进攻的时间。

曹操听到袁绍要来进攻，就同他的高级谋士郭嘉，荀彧等人分析了当时的客观形势。特别是郭嘉，很有智谋，他把曹操和袁绍双方的情况作了对比，指出曹操必胜，袁绍必败。他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袁绍出兵，对汉朝说来，是一种叛逆举动，不得人心；而曹操却是以皇帝的命令为号召，能够得到别人的支持。第二，袁绍猜忌心很重，对有才能的人不信任；而曹操却敢于大胆用人，一些有远见、有才能的人都愿意为曹操所用。第三，袁绍计谋虽多，但是很不果断；而曹操在确定了策略以后，就决心实行，并且能够随机应变。第四，袁绍的部下争权夺势，勾心

斗角，袁绍也是非不分，赏罚不明；而曹操却能明断是非，不受迷惑，赏罚分明。第五，袁绍喜欢虚张声势，不懂得兵法；而曹操很会用兵。

根据以上的分析，曹操决定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公元 199 年八月，曹操把部队推进到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并且先后作了以下的战略部署：

（一）派臧霸带领精兵进入青州，用来牵制袁军，同时巩固自己的右侧。

（二）派于禁带领步骑兵两千人屯守延津（今河南延津北），同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北）太守刘延共同防止袁绍的正面进攻。

（三）在官渡布置防线，作为阻挡袁军的主要阵地。

公元 200 年春，正当曹操布置对袁绍作战的时候，另一个军阀刘备占据了徐州、下邳（今江苏宿县西北）等地。附近郡、县大多归附刘备。刘备的军队发展到几万人。他同袁绍有联系，打算合力对付曹操。面临这个意外的情况，为了避免处于两线作战的不利地位，曹操决定亲自领兵去攻打刘备。结果，曹军很快地把刘备打垮，接着，又攻下下邳，擒获了刘备的大将关羽，收为己用。刘备兵败，被迫退到青州去投奔袁绍的儿子袁谭，后来又转到邺城（今河南安阳北，是袁绍的根据地）去投靠袁绍。这样，曹操就取得了局部优势。曹操打败刘备以后，就亲自领兵出屯官渡，准备迎击袁绍。

白马、延津之战

当曹操出兵进攻刘备的消息传到河北的时候，袁绍的谋士田丰认为，这正是进攻许都的好机会，便建议袁绍发兵去袭击曹操的背后。但是，见事迟慢的袁绍竟以儿子有病来推辞，没有接受田丰的建议，以致失去了有利的战机。田丰气得连连说："可惜呀可惜，大事完了！"直到曹操击破刘备回军官渡以后，袁绍才召集众将讨论怎样进攻许都。田丰认为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进攻是不利的，就一再劝阻袁绍说："曹操既然已经打败了刘备，许都就不再是空虚的了；况且曹操善于用兵，机智灵活，他的军队虽然少，但是不可轻视。为今之计，不如作持久的打算。"袁绍不但拒绝田丰的忠告，而且认为他故意扰乱军心，下令把他关进了监狱。接着，袁绍就向各州郡发表了讨伐曹操的文告，准备大举进攻。

同年二月，袁绍把大军十万人集结在河北前线的黎阳，准备渡河南进，直捣许都。他首先派大将颜良进攻白马。四月，曹操从官渡率兵北上，解救白马。他采纳了随军谋士荀攸的建议，引兵先到延津，装作要渡河去袭击袁绍后方的模样，准备等袁绍西来应战的时机，再以轻装部队回袭白马。袁绍不知是计，果然派出一部分军队往延津去迎战。曹操立刻率领骑兵，轻装急进，赶到白马。曹军来到离白马十多里的地方，颜良才发觉，慌忙应战。刘备的大将关羽也在曹操军中效力。他突入袁军阵中，在千军万马之中，斩了颜良。袁军顿时溃败。战斗结束以后，曹操把白马城里的居民全部迁出，随着军队沿河向官渡撤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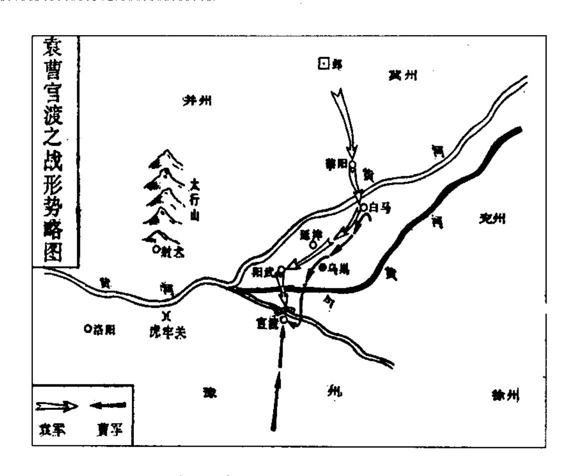
袁绍听说曹操从白马退去，亲自率领大军渡河南进，恨不得一口就把曹操吞掉。沮授劝阻说："战争胜负的变化，不能不仔细考虑。现在最好还是驻军在延津，分出一部分兵力去进攻官渡。如果能攻下，再来迎接留驻延津的大军，

也不算晚；如果大军贸然南进，万一失利，就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是，骄傲自大的袁绍又一次拒绝了沮授的意见，决定命令主力部队渡河向南追击。在大军将要渡河的时候，沮授叹息说：“黄河呀黄河！我们还能再渡河回去吗?”袁绍见他斗志不坚，就再把他的部队抽掉一部分划归郭图指挥。

当袁绍的军队赶到延津以南的时候，曹操命令军队在延津南面山坡下扎好营。了望哨发现袁军，立刻向曹操报告说：“袁绍追兵约有五六百骑。”过了一会，又报告说：“袁军骑兵比以前又增加了一些，步兵多得数不过来。”曹操一面命令不用再来报告，一面让所有骑兵都卸下马鞍放马，把辎重车辆都杂乱地停在路上。曹操的部下都认为敌军众多，恐难抵挡，主张退守营垒。只有荀攸领会曹操的用意，对他们说：“这样正是为了引诱敌人上钩，怎么能够后退呢?”不一会，刘备和袁将文丑一同率领五六千人马先后来到。曹军将领们感到情况紧急，催请曹操下令，上马应战。曹操还是非常沉着，对他们说：“还不到时候。”又过了片刻，袁军后继队伍大部分赶到，看见曹军的军用物资堆得满地都是，就争先恐后地去抢夺，乱成一片。于是，曹操立刻指挥全军，一齐上马冲杀。文丑在混乱中被杀。曹操的军队俘虏了文丑的全部人马，退回官渡。袁绍一连损失两员大将和许多人马，士气受到了重大的挫折。曹操方面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被动地位，奠定了全局胜利的初步基础。

决战的前夕

经过白马、延津两仗以后，袁、曹双方进入了一个暂时相持的阶段。袁绍



袁曹官渡之战形势略图

虽然连败两仗，但是仍旧保持着优势力量：从军队数量说，袁绍的军队将近十万人，曹操最多不过三四万人。从后方的经济力量说，曹操占领的兖、豫二州，是汉末以来破坏得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远不如袁绍占领的河北地区那样富庶。曹操虽然在进入许都的那一年，就开始屯田积谷，但是毕竟只有四、五年的光景，还不能根本改变占领区的残破面貌。军用粮饷，也远远不及袁绍充足。

曹操是一个有才干的政治家、军事家。他虽然在物质条件方面还比不上袁绍，但是他很懂得从政治上争取人心。他一方面严令各地方官加紧催收租税，以便供应前线；另一方面，也采取了一些笼络人心的政治措施。例如：他采纳了朗陵（今河南确山西南）令赵俨的建议，把阳安郡（治所在朗陵）界内所征收的绵绢，发还给百姓，减轻一些人民的负担。又如：他下令部队行军时不许马踏麦田，违者处死。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人民的支持，为自己在军事上战胜敌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袁绍没有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仍旧仗着他在军队数量、装备和物资储备上的优势，盲目冒进。七月，袁绍把大

军集结到官渡北面的阳武，准备继续发动进攻。沮授再一次向他分析战争形势说："我方军队虽然人数多，却比不上曹军勇敢善战；曹军的弱点是军粮少，物资储备没有我方充足。"根据这个客观情况，他建议袁绍，用持久战来消耗曹军的力量，以便最后战胜曹操。袁绍仍旧不听从沮授的意见。他命令主力部队进到官渡前线，安营下寨，军营东西长达几十里。曹操也针锋相对，摆好阵势，同袁军对峙。

公元200年九月，曹操向袁军发动了一次进攻，没有获胜。他就改变方针，深沟高垒，固守阵地，以等待有利时机。袁绍见曹军坚守不出，命令士兵在曹营外面堆起土山，砌起高高的壁楼，在那里用箭射击曹军。箭密得像下雨一般。曹营士兵来往行动都得用盾牌遮住身体。曹操命工匠连夜赶造了一种炮车，发射石块，把袁军的壁楼击破。炮车发射石块的时候，声响如雷，因此，当时人们都管这种车叫"霹雳车"。袁军这一着没有成功，又暗凿地道，直通曹营，打算由地道里打过去。曹操针对这种地道战术，命人在营墙内挖掘长沟，进行防御。双方就这样在官渡相持了三个多月。

当时，曹操方面军队数量既少，军粮也不充足。在这种不利的处境下，曹操统治区内的很多军民都对战争前途有怀疑，有些郡县叛变了。曹操也很忧虑，他曾经写信同留守许都的荀彧商量，打算退守许都。荀彧给曹操写回信，向他分析战争的前途。信里说明，当前是战败袁绍、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关头；曹军粮食虽然不足，但是还不至于毫无办法，只要坚持下去，战局一定会很快发生变化。他劝曹操要努力争取最后胜利，千万不要退兵，失却机会。曹操认为荀彧的见解很正确，就坚定了同袁绍周旋到底的决心。他一面命令部队继续固守官渡，一面密切注视敌人动态，以便寻找有利时机，进行最后的决战。

曹操夜袭乌巢，袁绍败归河北

在两军相持阶段，军粮的补给是关系战争胜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曹操看到袁军粮草虽然比较充足，但是因为军队多，消耗也大，如果军粮发生问题，就会不战自败。曹操一方面严令后方催办粮草，接济军需；一方面，决定派人去烧毁袁军的粮草。恰巧袁绍派韩猛监押粮车几千辆，前来官渡途中。韩猛是袁绍手下的一员战将，但是他有勇无谋，而且轻敌少备。荀攸了解到这个情况，就向曹操建议派兵去劫夺袁绍的粮车。曹操派部将徐晃和史涣带兵前往，打跑了韩猛，烧掉了他押送的全部粮车和军用物资。到了十月，袁绍又派人从河北运来一万多车军粮，囤积在大营以北四十里的故市、乌巢（都在今河南延津县境），还特派大将淳于琼带领一万人驻扎在那里保护。由于上次粮车被烧，一度造成袁军给养的困难，因此沮授特别提醒袁绍，要他另派一员战将率领一部分部队驻防在淳于琼的外侧，以防曹军抄袭。袁绍没有采纳。

袁绍的另一个谋士许攸，认为曹操兵少，而且主力部队都集中在官渡，后方必定空虚。因此，他建议袁绍派出一支轻骑部队，去偷袭许都。但是，盲目自大而又顾虑多端的袁绍，并不重视许攸的意见，反而骄傲地说："不必，我一定可以在这里擒住曹操！"许攸感到袁绍这样骄傲轻敌，最后一定要失败。因此，他的思想发生动摇。正在这个当

儿，许攸的家族有人犯了法，被留守邺城的审配拘捕起来。许攸在气愤之下，竟然背弃袁绍，去投奔曹操。

曹操听说许攸前来投靠，高兴得连鞋子都没有来得及穿，就光着脚跑出去迎接，并且拍手说："子远（许攸的字）远道而来，我的大事一定可以成功了。"许攸见了曹操，开口就问道："袁绍军势很盛，您打算怎样对付他？目前还有多少存粮？"曹操说："可以支持一年。"许攸知道这是假话，就说："没有这么多吧！"曹操又回答说："可以支持半年。"许攸直截了当地说："您不想打败袁绍吗？为什么不说实话呢！"曹操才对许攸说："其实军粮只够维持一个月了。你看这该怎么办呢？"许攸这才把袁绍在乌巢堆积军粮的情况完全告诉了他，并劝他率轻骑前往偷袭，把袁绍的粮食和辎重全部烧掉。

许攸的情报，真使曹操喜出望外。当天夜里，曹操留下曹洪、荀攸防守官渡大营，亲自率领步骑兵五千人，打着袁军旗号，每人手里拿着一把干柴，口里衔着枚，把所有的马嘴都束起来，从小路奔向乌巢。在行军途中，曹军忽然遇到一队袁军，盘问他们是何处兵马，曹操让士兵回答说："袁将军恐怕曹操包抄我军粮屯，特地派我们前去增援。"曹操的部队骗过了敌人的耳目，顺利地通过了袁军的防线，直奔乌巢，把袁绍的粮屯团团围住，然后放起火来。在黑夜中，只见粮屯周围，浓烟四起，火光冲天。袁军从梦中惊醒，慌作一团，不知如何是好。天亮以后，袁军守将淳于琼发现曹操兵马并不多，就把军队调出营门，攻击曹军。结果，被曹军打得大败，淳于琼只得退守营屯。

袁绍听说曹操进攻乌巢粮屯，仍旧没有引起严重的注意，反而认为这是攻下官渡、歼灭曹军主力的最好机会。他对袁谭说："只要我们攻下曹操的大营，即使他打败了淳于琼，也没有退路了。"于是，他命令大将张郃、高览率兵加紧攻打曹操的官渡大营。张郃看到曹操亲领精兵围攻乌巢，恐怕淳于琼支持不住。他认为乌巢如果有失，大事也就完了。因此，他一再请求袁绍先派兵去救淳于琼。但是，袁绍在郭图的迎合下，仍旧坚持以主力进攻曹操的官渡大营，只派少数骑兵去救乌巢。由于曹操在官渡的营垒很是坚固，战士死守，袁军久攻不下，主力部队反而被吸引住了。这就给曹操拿下乌巢创造了有利条件。当袁绍的增援骑兵临近乌巢的时候，曹操的部下慌忙向他报告说："敌人援军就要到了，我们快分一部分军队去抵挡吧！"当时，正是能否攻下乌巢，决定胜负大局的紧要关头。因此，曹操严厉命令部下说："等敌人到了我们背后，再来报告！"在曹操坚决果断的指挥下，不但击溃了袁军的增援部队，而且攻下了袁军营屯，杀死了淳于琼。袁军的一万多车粮谷也被烧得一干二净。

淳于琼战败被杀的消息传到官渡前线，张郃看到大势已去，失去了斗志。他同高览把全部攻城器械烧掉，一道到曹营去投降了。袁军粮屯被烧，军心已经动摇。这回又传来了主将投降的消息，更加慌乱，袁军一下子全都溃散了。曹操乘势领兵出击，袁军大败。袁绍和袁谭只率领着八百名亲兵逃回黄河以北。曹操缴获了袁军丢下的全部军用物资和珍宝财物，并坑杀了投降过来的许多袁军士兵。在这一次战争里，袁绍的主力

差不多全部被歼灭了。

袁绍经不起这样的惨败。他又气又急，得了重病。公元 202 年五月，袁绍病死了。他的几个儿子争权夺位，最后竟至互相攻杀起来，结果都被曹操各个击破。公元 206 年，曹操彻底消灭了袁氏的残余力量，全部控制了过去为袁绍所占据的地盘。

曹操战胜的原因和这次战争的历史意义

官渡之战是东汉末年许多次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战争。在这次战争中，曹操以少数兵力战败了袁绍的十万大军，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有名战例。

袁绍集团当时占领北方大部地区，人口众多，粮食充足。在地理形势和物资储备上，袁绍都占着优势。然而由于袁绍纵容豪族，任意兼并土地，使河北地区的社会经济不但得不到发展，反而受到更加严重的摧残和破坏。袁绍由强转弱以至最后失败的根本原因，正在这里。

作为交战另一方面的曹操，虽然也属于地主阶级，但是比袁绍在农民战争中接受的教训要多一些。对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厉行法治，打击豪强，推行屯田政策，奖励农业生产。这些政令实施的结果，使原来中原地区的残破情况，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得到一定程度的好转。这是曹操能够转弱为强最后战胜袁绍的重要原因。

就战略形势来说，在战争初期，袁、曹双方力量的对比差别是很大的。袁绍在人力、物力上，拥有压倒的优势，在战略上处于主动进攻的地位；曹操兵力弱，装备差，在战略上处于被动防御的地位。但是，曹操能够运用对方的矛盾和弱点，选择适当时机去打击他的敌人。在白马、延津两仗中，曹操局部地削弱了袁军的优势。随后，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决战，曹操固守官渡阵地，使袁军始终不能前进一步。最后，许攸来降，告知袁军屯粮情况。曹操紧紧抓住时机，亲领精兵偷袭乌巢，焚烧了袁军的全部军粮。这就使得战局急转直下，大获全胜。

官渡之战，曹操打垮了袁绍，从而奠定了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曹操又进一步地改善了屯田办法。由于人民的辛勤劳动，河北地区的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为曹氏父子建立魏国创造了条件。由此可见，官渡之战是使中国北部由分裂走向统一的一次关键性的战争。这次战争对后来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这次战争，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的中国历史上的著名的战争；在战略上是符合由于“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原则的重要战例之一。这次战争展示了若干带有原则性的军事策略，如速决战、主动性、灵活性等等，给我们遗留下某些战争的经验和教训，它在我国军事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赤壁之战】

官渡战后的政治形势

东汉末年，我国历史上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黄巾起义。黄巾

起义最后被镇压下去了，但是，东汉政权也在这次起义里走向瓦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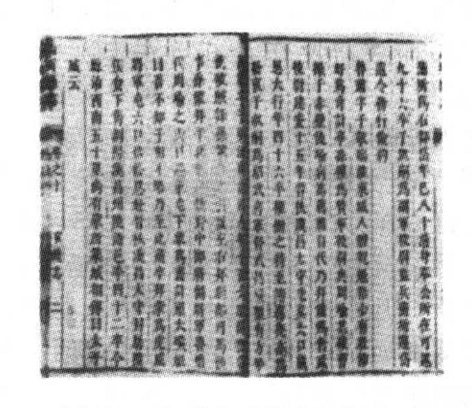
在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里，东汉各州郡的大官僚壮大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为了扩张势力，军阀之间互相混战。在黄河流域，袁绍和曹操两大军阀的势力最强盛。袁绍占据今山东、河北一带。曹操的根据地在河南。他把东汉的末代皇帝汉献帝带在身边，借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在政治上占了优势。

公元200年十月，曹操同袁绍在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发生大战，把袁绍打得大败。曹操乘胜向袁绍占据的地区进军，公元202年（建安七年），袁绍病死了，他的几个儿子和他的政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分裂。曹操利用这个机会，分别击破他们。经过六七年的战争，曹操肃清了袁氏的残余势力，占有了袁绍原来统治的冀、青、幽、并四州，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曹操又亲自率领大军，出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在白狼山（今辽宁凌源东）一带打败了乌桓，解除了东北边境上的威胁。

在统一北方的战争过程里，曹操在政治上、经济上实行了一些改革，如兴办屯田，整修水利，打击豪强分子，减轻百姓租税，选用有才能的地方官吏，等等。这样，北方残破不堪的社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曹操的势力，也随着不断壮大，他的雄心也一天天大起来了。他打算一鼓作气，把盘踞在南方的刘表和孙权两大势力，挨个儿消灭掉，以达到统一全国的目的。曹操和部下研究了向南扩张的战略计划，决定首先攻打刘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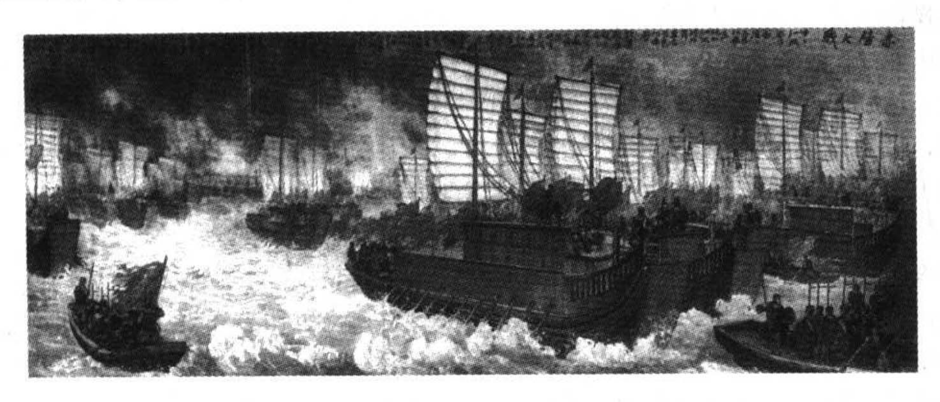
刘表当时是荆州牧（一州的长官），统治着荆州。他驻在州治襄阳（今湖北襄阳）。刘表是汉朝皇帝的同宗。这个人在汉末虽然有些名望，但是缺乏政治才干，而且没有什么作为。他的集团内部又充满着矛盾。刘表统治荆州，采取“保境安民”的政策，对外很少用兵。在当时来说，荆州这块土地还比较安定，黄河流域一带的小军阀和士大夫，有很多人到那里去避难。其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刘表的宗弟刘备。

刘备，字玄德，涿郡（治所在今河北涿县）人，是西汉皇族的后代。早年曾参加过镇压黄巾起义的战争。后来他依附过很多军阀，但是始终没有得到固定的地盘。官渡战争以后，刘备受到曹操的袭击，不得已逃到荆州去投奔刘表。刘表表面上对他很好，内心里却很不放心他。起初，刘表让刘备驻屯在新野（今河南新野县）。不久，刘表又让他移驻樊城（今湖北襄阳县北），想利用他来防守荆州的北面门户，作为抗拒曹操的前哨。刘备的力量虽然不大，但是野心不小。他在荆州积极整训军队，网罗人才，不断扩展力量，准备等待机会，独创局面。当时，流亡到荆州去的和荆



《蕲圻县志》中有关赤壁之战的记载

州本地的士大夫归附他的很多。著名的大政治家诸葛亮，就是在那时候被刘备再三邀请出山的。诸葛亮在他那篇有名的政治论文《隆中对》里，替刘备规划了争取天下的总策略：东面联络孙权，西面占据荆州和益州（今四川、陕西南部一带），南面拉拢夷、越等少数民族的统治阶级，北面抗拒曹操。依照这个方案，夺取荆州早已列入刘备的“兴复汉室”的计划中了。只是由于当时刘备的力量还很薄弱，所以没有立刻袭取荆州。



国画《赤壁大战》

曹操准备消灭的另一个有实力的军阀是雄据在江东的孙权。

孙权，字仲谋，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他祖先好几代都做吴郡的地方官。他继承了父亲和哥哥的基业，占有吴郡（治所在今江苏吴县）、会稽（治所在今浙江绍兴）等属于扬州（今江苏、浙江、江西、安徽一带）的六个郡。这一地区，土地肥沃，自然条件比较好。在孙氏地主政权的统治下，这里虽然也发生过一些镇压人民反抗暴政的战争，但是由于地处长江以南，距离中原战场远，受到战火的破坏比较小，社会秩序还是比较安定的。东汉末年，黄河流域长期混战的时候，北方的农民不断流亡到这里来。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这是孙氏政权在经济方面的有利条件。在军事力量方面，孙权手下有周瑜、程普、黄盖等战将和精兵几万名。同时，在地理上，据有长江天险，可以作为屏障。因此，孙权的统治基础是相当巩固的。

曹军南下，占领荆州

公元208年（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率领大军南下，攻打刘表。

在出发以前，曹操向他的高级谋士荀彧（域）征询作战计划。荀彧建议他派大军直出宛城（今河南南阳市）、叶县（今河南叶县南），同时另派一支轻骑兵由小道急行军，乘敌人没有防备，一下子拿下襄阳，消灭刘表。曹操采纳了他的作战方案，军事进展得很顺利。

事有凑巧，正当曹操的大军走在半路的时候，荆州牧刘表病死了。刘表的第二个儿子刘琮继承了他的职位。同年九月，曹军到达新野。刘琮被曹军的浩大声势吓坏了。他背着刘备，暗地里派人向曹操接洽投降。当时，刘备正驻守在樊城，对于刘琮投降的事，一点也不知道。等他发现情况起了变化，已经来不及组织力量，抵抗曹军。他只得率领

部队匆匆忙忙地向江陵（今湖北江陵）方面撤退。

在刘备撤退到襄阳的时候，诸葛亮劝刘备乘机袭击刘琮，占有襄阳。刘备没有采纳。为了收买荆州人心，刘备特意到刘表坟前哭祭了一番，然后快马加鞭地走了。荆州的官员和百姓有很多人跟随刘备一起向南逃跑。一路上，刘备又收容了不少刘表的部队和当地百姓，合计起来不下十多万人，光是运载行李和辎重的车辆就有好几千辆。由于军民混在一起撤退，行动缓慢，每天只能走上十多里路。刘备的部下建议他抛弃随从百姓，迅速轻装赶路，以便抢先占有江陵。刘备还假惺惺地回答说："要成就大事，必须以人为本，现在百姓愿意跟随我，我又怎能忍心丢开他们不管呢！"但是，当时的情况实在太紧急了。刘备决定派遣关羽带领水军一万人，先由水路乘船退往江陵，等候在那里会师。

江陵是荆州的军事要地，又有刘表贮存的大量军用物资。这些，曹操都是知道的。他恐怕刘备走在自己前头，抢先占有江陵，就亲自率领五千名精锐骑兵，一天一夜走三百里路，追赶刘备。当刘备率领军民退到当阳（今湖北当阳东）东北的长坂的时候，曹操的骑兵从背后赶到了。刘军匆忙应战，被曹军打得大败。形势已经严重到这样的地步，刘备不得不放弃原来退往江陵的计划，也不再顾及随从的军民了。他抛弃所有的辎重，同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几十个人，改向侧面的汉水撤退。

为了阻挡曹军的跟踪追击，刘备命令张飞率领二十名骑兵留在最后，作为掩护。张飞保护刘备、诸葛亮等一行人过了长坂桥，就立刻叫人把桥梁拆毁。他睁大眼睛，横着长矛，立马河边，对追来的曹兵，大声喝道："我就是张飞。来吧！让我们拼个死活！"曹兵早就听说张飞十分勇猛，一时又弄不清情况，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敢冒冒失失地向前，这样，刘备等一行人才得安全逃脱了。当刘备和部下退到汉津口的时候，正好同关羽率领的水军会合。他们共同渡过汉水。江夏太守刘琦（刘表长子）也领兵前来接应。于是，大家合兵一处，一同到了夏口（今湖北汉口）。

当阳长坂一仗，刘备损失了许多人马和军用物资。曹操顺利地占领了江陵，基本上控制了荆州。他获得了刘表贮存的大量军用物资，还收降了荆州的大批军队。在这种情况下，曹操越发骄傲起来了。在他看来，不仅乘胜追歼刘备，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就是沿江东下，消灭孙权，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蒋干过江，游说周瑜

曹操打败刘备，占领江陵以后，就打算顺流东下，乘势攻打孙权。他的部下贾诩（许）向他建议说："您在消灭了袁绍父子以后，紧接着又降服了汉南地方，您的威名已经远播国内，军事力量也比以前强大多了。如果能够利用荆州的丰富资源，休整部队，安抚百姓，使内部稳定下来，到那时候，江东就可以不战而服了。"从当时的情况来说，贾诩的建议是有道理的。但是，曹操由于轻易地取得了荆州，在军事上又获得一连串的胜利，因此，更加滋长了骄傲轻敌思想。他主观地认为，凭着自己当时的政治优势和军事力量，是有可能迫使孙权归降的。他手下有个谋士蒋干同孙权帐下的主将周瑜是老朋友。曹操就秘密派遣蒋干过江去劝说周瑜归降。

周瑜，字公瑾，庐江舒（今安徽庐江）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东汉末年，凉州（今甘肃一带）军阀董卓兴兵作乱，在黄河流域一带，骚扰得很厉害。各地军阀联合讨伐董卓。孙权的父亲孙坚也以长沙太守的名义起兵参加。在出发以前，他把家眷安置在舒。因此，周瑜和孙坚的大儿子孙策从小就在一起，交情很深。孙策的母亲也把周瑜当儿子一样看待。周瑜二十四岁的时候，在孙策部下担任建威中郎将，领兵二千人，并且曾经跟随孙策攻皖（今安徽潜山县）。后来，两人都娶了乔公的女儿，孙策娶了大乔，周瑜娶了小乔，两个人又成了亲戚。公元200年（建安五年），孙策死，孙权继承他的事业，执掌江东政权。孙权任用周瑜和长史（相当于秘书长的职务）张昭共同掌管军国大事。此后，周瑜就成为江东武将的首领了。曹军南下，周瑜正确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坚决主张抵抗。这次蒋干来访，他早已猜中了他的来意。为了先发制人，周瑜一见到蒋干，就对他说：“子翼（蒋干字）不辞辛苦，远涉江湖到我这里来，莫不是替曹操来做说客吗?”蒋干被这一问，只好连忙推说是前来拜访老朋友的。周瑜特意陪同蒋干参观了江东的营垒、仓库、军资、器仗，表示自己的实力非常雄厚，暗示他打消劝降的幻想。蒋干在周瑜那里住了三天，也没有敢提起劝降的事。蒋干回到江北，向曹操复命说：“象周瑜这样有才气的人，不是用言辞能够说动的。”曹操的如意算盘因此落了空。《三国演义》和京剧中的“蒋干盗书”，就是根据这一史实铺演出来的。

孙、刘决策，联合抗曹

早在刘表病死的时候，孙权手下的政治家鲁肃就对孙权说：“荆州紧挨着我们的边境，形势险要，土地肥沃，百姓富足。如果占有了它，就可以创立帝王的事业。现在，刘表刚死，两个儿子不和，部下也各有打算。刘备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同曹操有仇。如果刘备同刘表的部下能够齐心协力，我们就应该联络他们，结成同盟。如果他们不能团结，我们就应该另外想办法去对付他们。”鲁肃要求孙权派他用吊丧的名义，去慰问荆州的当权将领，并且说服刘备，要他好好团结刘表部下，同孙权联合起来，对付曹操。鲁肃还说：“事情不能拖延。如果不赶快进行，恐怕曹操就要走在前头了。”

孙权同意了鲁肃的主张，立刻派他出发。鲁肃日夜赶路，不敢耽搁。等他到了湖北江陵境界，刘琮已经投降，刘备正在往南逃走。鲁肃赶了上去，在当阳长坂碰上了刘备。鲁肃就把孙权的意思面告刘备，并且同他谈论天下大事，建议刘备同孙权联合。鲁肃的意见同诸葛亮的主张，正相符合，刘备很是高兴。鲁肃又见到诸葛亮，说：“我是子瑜的好友。”由于他们都主张孙、刘联合，共同抗曹，因此，谈得十分投机，两人从此成了好朋友。刘备还采纳鲁肃的建议，把自己的军队进驻长江南岸的樊口（今湖北鄂城县西北）。

当刘备到达夏口的时候，听说曹操大军即将从江陵顺江东下。他决定派诸葛亮和鲁肃一同前往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面见孙权，陈说利害，以便共同商定联合抗曹的大计。

诸葛亮见到孙权，首先分析了当前

的形势。他说："全国大乱，将军在江东起兵，刘豫州在汉南收集人马，一同跟曹操争夺天下。现在，曹操已消除了他的劲敌，平定了北方，又南下攻破荆州，势力强大，威风得很。刘豫州英雄没有用武之地，逃到这里。希望您能根据自己的力量作出决定！如果您认为可以利用江东的人力、物力，同曹操对抗，不如趁早同他断绝关系。如果您认为自己的力量敌不过曹操，那么为什么不早点解散军队，收起武器，向曹操称臣投降呢？现在，您表面上装作服从，内心里却拿不定主意。事情已经到了紧急关头，您还不能当机立断。恐怕没有多久，亡国大祸就要临头了。"

诸葛亮的这一番话，正好揭出孙权当时的内心矛盾。孙权沉思了一会儿，用愤激的语句反问诸葛亮道："如果照你这样说，那末刘豫州已经被曹操打得大败，为什么还不投降曹操呢？"

诸葛亮听孙权这样一说，不禁暗自高兴，就抓住他的话锋回答说："田横不过是齐国的一个壮士，尚且能够不受屈辱。何况刘豫州乃是帝王的后代，当世的英雄。人心都归附他，就像江河的水流归大海一样。他已经决定同曹操斗争到底了。就是不能取胜，也决不向敌人投降。"诸葛亮的这一段话，等于把孙权将了一军。孙权激动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怒容满面地说："我不能拿整个江东地方和十万甲兵，让别人来支配。我的主意已经决定了！现在，没有刘豫州是难以抵抗曹操的。"孙权虽然这样说了，但是他对刘备的力量有怀疑，对曹操所宣传的声势有顾虑。所以，紧接着，他又向诸葛亮问道："不过，刘豫州刚被曹军打败，又怎能有力量来抗抵这场灾难呢？"

诸葛亮为了解除孙权的顾虑，坚定他的抗曹决心，进一步向他分析了双方力量的实际情况，指出孙、刘联合作战，是可以打败曹操的。他说："刘豫州虽然刚在长坂战败，但是逃散的战士，现在已经陆续回来，加上关羽从汉水而下的水军，合起来还有精兵一万人。刘琦统率的江夏军队也不下一万人。曹操的兵马，从北方远道而来，已经非常疲劳。听说他们为了追赶豫州，骑兵一天一夜要赶三百多里路。现在他们的力量好比射到尽头的一支箭，就连最薄的一层绸纱也穿不透了。兵法上认为：这样冒险作战，一定要损伤主将。况且北方将士，最怕水上作战；曹操收编的荆州部队，都是被迫参加的，并不是真心归服。因此，他们不会替曹操卖命。"

最后，诸葛亮对孙权说："您如果真能调派几员猛将，率领几万名精兵，同刘豫州同心协力，联合作战，那就一定能够打败曹操了。曹操失败以后，一定退回北方。这样，荆州和江东的局势就可以稳定下来，三分天下的形势也就出现了。是成功，还是失败，就取决于今天的决策了。"孙权听了诸葛亮的话，很是高兴，立刻召集部下举行会议，以便决定和战大计。

正当孙权召集群臣举行会议的时候，凑巧曹操给孙权送来了一封信。信中威胁孙权说："我奉了天子的命令进行征伐，大军南向，刘琮已经束手投降了。现在我带领大军八十万人，打算在江东地方同将军比个高低。"孙权把这封信传给大臣们看，许多人都十分害怕。以长史张昭为首的一群投降派，只看到曹操信中吹嘘的兵力，而没有具体分析双

方的实际情况。他们议论道："曹操就像虎狼一样，动不动就假借朝廷名义，征讨四方。今天我们要抵抗他，在道理上说，就如同臣子反抗皇帝一样。况且我们可以依靠来抵抗曹操的，主要是长江天险。目前，曹操已经占领荆州，取得刘表手下成千只战船和大批水军。他指挥全部水陆大军，沿江东下。实际上，长江天险，他已占有了一半。而且在军队数量上，我方更是无法同曹操相比。当前最好的办法，莫如迎接曹操，向他投降。"

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只有鲁肃坐在一旁一声不响。孙权起身到厕所去，鲁肃跟着追了出去。孙权知道鲁肃有话要说，就在屋檐下等着他。孙权握着鲁肃的手，问道："你有什么话要讲吗?"鲁肃爽直地说："我认为张昭等人的意见，是要断送您的事业。您不能同他们商量大事。说到迎降曹操，我鲁肃倒可以做得，但是您却无论如何做不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投降曹操，总还能保持个一官半职；至于您，请想想看，将会落得一个怎样的结果呢？希望您慎重考虑，早一点决定大计，千万不要听信他们的话!"孙权听了鲁肃的话，叹息地说："张昭等人的主张，很使我失望。你的分析很正确，同我的看法完全一致。"

但是，象这样关系重大的事情，孙权还不能一下子就决定下来。于是，鲁肃劝他把正在鄱阳（今江西鄱阳）的周瑜召回来，共同确定抗曹大计。

周瑜一到，就对孙权说："曹操虽然在名义上是汉朝的丞相，其实是汉朝的国贼。将军（称孙权）拿江东作根据地，民富兵强，本来可以为国家除掉坏人（指曹操）。现在，曹操自己前来送死，为什么反而要向他投降呢?"接着，他向孙权具体地分析了当时敌我双方形势和战胜曹操的充分可能性。周瑜指出，曹操这次用兵，有四大不利：第一、北方并没有完全统一，马超、韩遂还在函谷关以西活动，威胁着曹操的后方；第二、曹军多数是北方人，不善于水战。现在，他们却离开陆地，跑到船上来，妄想同我们的水上健儿比个高低；第三、目前正是天寒地冻的时候，战马缺乏草料；第四、把北方的兵士赶到江湖地带作战，他们不服水土，一定要害病。因此，周瑜最后说道："以上这些，都对曹操的军事行动不利，但是曹操偏偏要干冒险的事。您要想活捉曹操，今天正是大好机会。"周瑜要求孙权拨给他几万名精兵，进驻夏口，保证能够打败曹操。

孙权听了周瑜的分析，抗曹的信心加强了。他对周瑜说："你的主张同我的想法完全一样，我同曹操是势不两立了!"为了向群臣表示决心，他当场拔出身上的佩刀，狠狠地把面前的桌子砍掉了一个角，并且严厉地说："从今天起，文武官员有再敢说应当迎接曹操的，就同这张桌子一样!"

联刘抗曹的大计，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当晚，周瑜又去见孙权，对他说："曹操在信上夸口说有水陆大军八十万人。实际上，他原有十五六万人，而且早已疲劳不堪。新收编的刘表的部队，最多不过七八万人罢了。何况他们对曹操都还怀有戒心，军心不稳。您想想看，曹操带着这样疲劳多病的军队，指挥着心怀二意的降兵，人数虽多，又有什么

可怕！”

孙权抵抗曹操的决心更加坚定了。他选拔了精兵三万人，交给周瑜，任命周瑜、程普为左右都督（正副司令），鲁肃为赞军校尉（参谋长）。让他们带领部队，会同刘备的人马，一同西上，合力抗击曹操。

大战的前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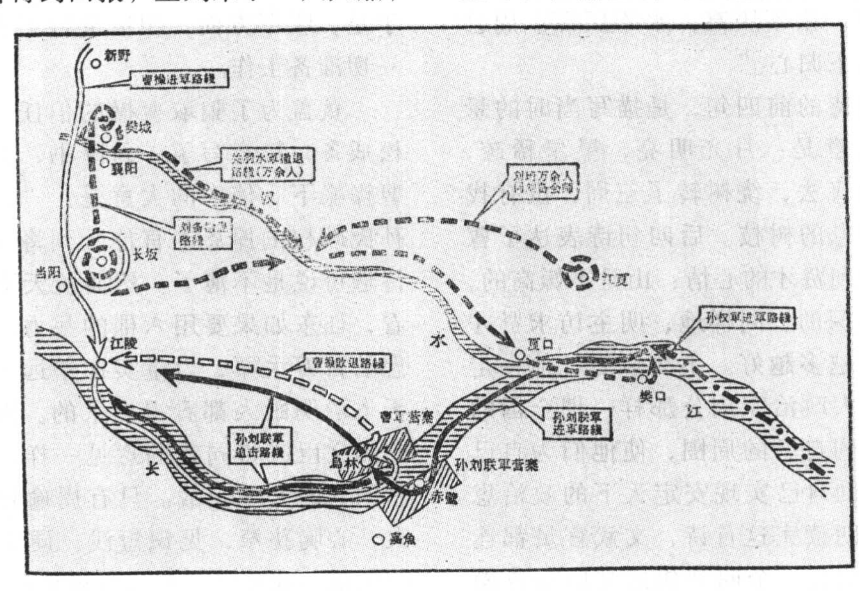
当时，刘备正率领本部人马在樊口驻扎，诸葛亮出使柴桑还没有回来。刘备听说曹操的大军就要打来了，非常害怕。他每天都派出官员在江边上巡逻探望，等候着孙权兵马的到来。

有一天，一个担任巡逻的官员看到周瑜率领的大队战船，从东面开来。他赶忙去向刘备报告。刘备派人带了羊、酒等礼物，去慰劳周瑜的部队。周瑜对刘备的使者说：“我因为军务在身，不能抽身去拜望刘将军。假如刘将军能够屈尊到我这里走一趟，那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刘备得到回报，立刻乘了一只大船，来看周瑜。一见面，刘备开口就说：“现在贵军决定同我们共同抵抗曹操，实在太好了。但不知贵方可以调动多少人马？”周瑜答道：“三万人。”刘备忍不住说：“可惜少了一些。”周瑜充满信心地说：“这么多人已经很够用了，请将军放心。您看着吧，我一定能够打败曹操！”

孙、刘联军继续向西进发，在赤壁（今湖北蒲圻西北，在长江南岸）同曹操的先头部队相遇。那时候，曹军士兵由于不习惯水上生活，很多人都得了疫病，士气很低。两军刚一接触，曹操方面就吃了一个小败仗。曹操被迫退回长江北岸，屯军乌林（今湖北嘉鱼西北），同孙、刘联军隔江对峙。

为了克服北军不习惯船上生活的弱点，曹操命令工匠，把几艘或十几艘战船编为一组，用铁链、铁钉连锁在一起；又在上面铺好木板，以减少风浪的颠簸。这样，不但人可以在船上来往行走，甚至可以在船上骑马。这就是所说的“连



赤壁之战示意图

环船”。曹操认为这个办法很好，更加得意了。

《三国演义》里，对曹操在大战前夕的得意心情，创造了一段“横槊赋诗”的故事。故事的情节是这样的：在向江南发动进攻的前一个夜晚，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曹操，认为攻下江南，统一天下的日子就在眼前，非常高兴。他决定在水寨主帅的大船上，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预祝即将到来的胜利。宴席摆设在大船的中央，文武官员们都分班坐在两边。侍从们个个穿着色彩鲜艳的锦衣绸衫，拿着明晃晃的武器，站在两旁护卫。夜幕渐渐降临，月亮慢慢从东山升起。皎洁的月光，照射在长江水面上，发出万道银光。曹操站在船头上，手里拿着长矛，向四野一望，只见江山景色好像图画一样的秀丽动人，心里真有说不出来的喜悦。他觉得这锦绣江山，广阔国土，不久就要完全属于自己所有了。不禁乘着酒兴，吟起诗来：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首诗的前四句，是描写当时的景物的，大意是：月光明亮，星星稀疏，乌鸦向南飞去，绕树转了三周，没有找到可以棲息的树枝。后四句诗表达了曹操希望得到贤才的心情：山是不嫌高的，水是不嫌深的。同样地，明主访求贤才也应当是越多越好。不久以后，他一定会象古代大政治家周公那样，把全国的贤才聚集到自己的周围，使他们为自己服务，帮助自己实现安定天下的政治思想。曹操朗读完这首诗，文武官员都连声称赞。只有一个叫刘馥的文臣对曹操说，这首诗有几句不够吉利，预示着我们南征不会成功。曹操听罢大怒，乘着酒气，一矛把刘馥刺死了。这个故事是文艺创作，不是真有其事。但是，当时曹操对战争实际存在的困难没有正视，盲目乐观和骄傲自满的情绪，确实已经发展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小说中的描写，倒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实情况。

黄盖献计，火烧战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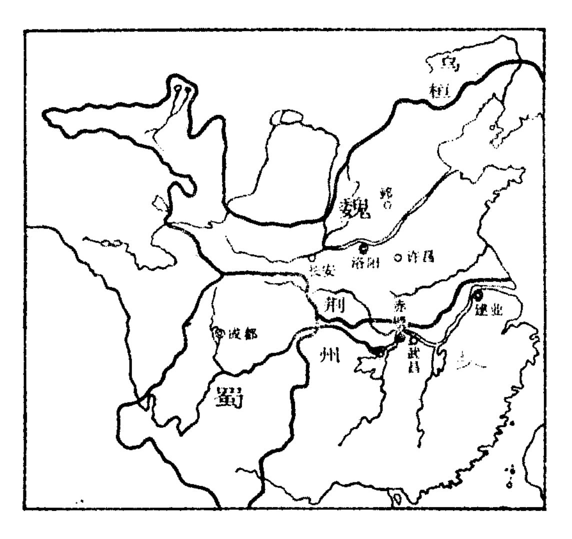
周瑜的部将黄盖，字公覆，是孙氏政权的三朝元老，很有军事经验。这次，他也跟随周瑜参加了抗曹的战争，来到赤壁。他看到长江里的曹军战船，船头连着船尾，锁在一起，就向周瑜献计说：“现在曹军船只连在一起，我们可以用火攻战术来击破它。”周瑜认为黄盖的计策很好，决定照计实行。

不过，当时正在寒冬季节，经常刮西北风。在江上放火，容易烧着联军自己的船只。黄盖的火攻计划实行起来是有困难的。经过周瑜、诸葛亮等人的研究，估计在冬至前后可能有东南风出现。于是，联军方面，积极进行了火攻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黄盖为了骗取曹操的信任，使他放松戒备，特意写了一封降书，派人送到曹操帐下。信中的大意是：“我黄盖受孙氏政权的厚恩，官位升到将帅。这种待遇可说是不薄了。然而从天下大势来看，江东如果要用六郡的兵力，来抗拒您的百万大军，力量实在差远了，这是天下的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的。因此，江东的文臣武将同我的意见一样，都不愿意同您的大军交战。只有周瑜和鲁肃两人，心胸狭窄，见识短浅，硬要作无谓的抵抗。我不忍江东地方被他两人断送，所以情愿向您归顺。周瑜统领的军队有

限，是不难打败的。等到双方交锋的时候，我愿意利用自己担任先锋的有利条件，寻找机会，为您效劳。”曹操看了这封信，起初还有些怀疑。但是，他想到自己在政治上、军事上的“绝对优势”，足以使江东文武百官丧失斗志。因此，他认为孙氏政权内部发生分化，也是有可能的。他召见送信的人，对他说：“黄盖如果真心归降，我一定要重用他。”曹操的骄傲轻敌思想一直在滋长着。对于黄盖的归降，他实际上已经是信而不疑了。

公元 208 年十一月的一个夜晚，黄盖带领十只冲锋战船，向曹操的水寨急速驶去。船上装满了浇了油的枯柴干草，还有大批硫磺、烟硝等引火的东西，外边围着布幔。另外，还有一些轻快的小船，系在船梢。冲锋船行驶到江心，黄盖命令各船都张起帆来。船前进得更加快了。黄盖手中高举火炬，命令官兵齐声喊道：“黄盖来降！”曹营中的官兵，听说黄盖来投降了，都走出营门，伸着脖子观望。说话之间，黄盖的船只已经驶近曹操的水寨了，只离开二里多路。于是，黄盖拔刀大喊：“放火！”号令一下，十只战船就一齐放起火来。当时正刮着猛烈的东南风，十艘战船像十条火龙，直向曹操的水寨冲去。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只见烟火冲天，江面上一片通红。曹操的水寨立刻陷入火海当中。曹操的水军在战船上你挤我撞，争着逃命。“连环船”一时间又分散不开，士兵被烧死、淹死的真是数也数不清。火势越来越猛，一会工夫，曹军岸上的营寨也被延烧着了。周瑜在南岸望见北岸火起，知道黄盖已经得手，立刻指挥快速战船，擂动战鼓，全力猛冲上去。这一仗，把曹军杀得人仰马翻。曹操的大部人马和所有战船，顷刻间都灰飞烟灭了。



三国鼎立的形势图

在烟火弥漫里，曹操带领着残兵败将，向华容（今湖北潜江西南）小遣撤退。不料，又遇上狂风暴雨，道路泥泞，简直没法通过。曹操命令所有老弱残兵，找来树枝杂草，铺在烂泥路上，骑兵才勉强地走过去。那些老弱残兵被人马碰倒，受到践踏，又死伤了不少。刘备、周瑜的军队水陆并进，把曹操一直赶到江陵县境。打了这一仗以后，曹操元气大伤，兵员损失了一大半。他只好留下一部分军队防守江陵和襄阳，自己率领残部退到谯郡（郡治在今安徽亳县）去了。

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辉煌战例

赤壁之战以后，全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曹操经过这次挫败，退回到北方，势力局限在北部中国，再也没有力量南下扩张势力。公元 220 年（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死，他的儿子曹丕在同年废掉汉献帝，自己做了皇帝（文帝），国号魏，建都洛阳。孙权经过这次战争，巩固了在江东的统治，接着

又以建业（今南京市）为中心，向南扩张地盘，发展成为后来的吴国。联军的另一方刘备，战后乘机南下，攻占荆州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等四郡；不久，又向孙权借得南郡，从此才有了一块据根地。公元214年（建安十九年），刘备从刘璋手里夺得益州，逐渐发展成为后来的蜀国。赤壁之战对于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

在这次战争里，曹操的军队号称八十万人（实际上只有二十多万人），处于优势地位；孙、刘联军共五万人，处于劣势地位。但是，战争的结果，却是联军胜利，曹军失败。这是什么道理呢？让我们从交战双方的政治、经济措施和战略、战术的运用等方面来加以考察吧。

官渡之战以后，曹操虽然在人力和物力上，都获得了很大的扩展，但是，当时黄河流域一带，经济还没有全面恢复。军民在长期战争以后，渴望得到喘息的机会。荆州人民在刘表“保境安民”的政策下，生活一向比较安定。曹操的军事行动，也不能不引起他们的反感。因此，曹操这次用兵，时机是不够成熟的。由于一连串的胜利冲昏了曹操的头脑，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过低地估计了敌人。他主观地认为孙权害怕自己的声威，将会献地投降；刘备势穷力尽，可以一战而败。因此，曹操的战略措施不是孤立敌人，各个击破；而是妄想军事、政治双管齐下，一下子就把问题解决。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象曹操的设想那样，孙权和刘备不但没有屈服，反而结成了牢固的联合阵线，来对付曹操。这不能不说是曹操战略上的错误。

同时，由于骄傲轻敌，曹操集中军队从长江一路向江东进发。在长江水面上，善于陆战的北方军队也不能发挥他们的特长。再加上疲劳、疾病、新旧部队的矛盾等等因素，这就使曹操在军事上的优势逐渐向劣势转化。

至于孙、刘联军方面，在客观上，战胜的条件似乎不多。但是，由于主要领导人周瑜、诸葛亮、鲁肃等没有被曹操所宣传的八十万大军所吓倒，而是能够正确地从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气候等方面具体地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因而得出正确的判断。

在作战指导上，他们比较谨慎，同曹操的骄傲自满，麻痹大意，有所不同。最后，联军针对敌方连锁战船的弱点，使用黄盖提出的“火攻”战术，一下子把曹操打得大败。赤壁之战在我国军事史上创造了一个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辉煌战例。这次战争有力地说明了主观指导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街亭之战】

228年（蜀建兴六年）本年初，蜀丞相诸葛亮兵出祁山（今甘肃西河县北祁山堡），首次发动攻魏战争。

227年，诸葛亮上后主刘禅《出师表》，主张应“北定中原”，而后遂率军北屯汉中，作北伐的准备。228年，诸葛亮从汉中出师，扬言从斜谷道取郿（今陕西眉县东北），但他实际上是兵分二路：一路以赵云、邓芝为疑军，进据箕谷（今陕西太白县境内）为疑兵，将魏军部分主力吸引到郿县一线；另一路则由诸葛亮亲率主力向西北攻打祁山，军纪严明，行动迅速，兵锋所至，魏军大惊。原魏控制之下的天水（今甘肃甘



诸葛亮像

谷县东）、南安（今甘肃陇西县西南）、安定（今甘肃镇原县东南）三郡望风叛魏归蜀，天水将领姜维向诸葛亮投降。魏国朝野一片恐慌，魏明帝曹睿准备亲征，大将张郃率军西上。

在蜀魏之战的关键街亭一役中，诸葛亮误用马谡为先锋，马谡不遵照诸葛亮的吩咐，又不听副将王平的劝阻，一意孤行，舍城而据山，最后被张郃切断水道，大败而溃。唯王平鸣鼓自守，徐徐收兵。街亭失守，诸葛亮进无所凭，眼见取胜无望，便带兵撤回汉中，自请降爵三等，以右将军代理丞相事，奖励王平并挥泪斩马谡。

一出祁山以后，诸葛亮连年用兵，北伐攻魏，但战绩平平，威胁终比不上一出祁山。

【彝陵之战】

赤壁之战后，曹操退回北方，暂无力对吴、蜀用兵。刘备则乘胜占领四川和陕、甘的一部分，还控制了荆州。在赤壁之战中出了大力的孙权，自然也不甘愿只保住长江中下游地区，正努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吴、蜀便产生了矛盾，而矛盾的焦点，则在于争夺荆州。孙权派大将吕蒙和年轻的将领陆逊与关羽抗衡，并寻机拿下荆州。

陆逊，字伯言，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出身于江南士族之家。聪明好学，喜读兵书，在军事方面很有见解，深得孙权的赏识。后来娶了孙策的女儿为妻子，年仅二十岁便开始步入政治、军事舞台，显露出自己的才华。

关羽并没有把年轻的陆逊放在心上，他只是对吕蒙存有戒意，于是吕蒙假装称病要求调回建业（今南京），以此来麻痹关羽，使他松懈防备。陆逊写了一封信致关羽，言语十分谦逊、恭敬，自称是无能的书生。关羽信以为真，抽调了大部分守军去攻打曹操占据的樊城。正当他与曹魏军队激战时，吕蒙、陆逊却趁机一举占领了荆州的府都江陵。关羽回师南下，又被吕蒙、陆逊俘获后杀死，荆州全部落入孙权之手。

刘备听到荆州失陷、关羽被害的消息，悲愤交集，于蜀汉章武元年（221年），发兵东下，部将赵云等力劝刘备以大局为重，不要先攻打吴国，可刘备不听。张飞为关羽报仇心切，要求士兵过于苛刻，结果也被叛将杀死。刘备更加震怒，决心调动大部兵力约几十万人与孙权决战。

孙权因刘备不肯罢兵，自知交战难以避免，但为了能够一心一意地对蜀作战，使魏国不至于掣其后肘，便派遣了使者向魏国称臣，在送给魏文帝曹丕的表文中，孙权把自己说得很无能，极力恭维魏文帝，并送还了以前被关羽俘虏的魏国将军于禁。这时，魏国的大臣们都向曹丕表示祝贺，只有侍中刘晔说：

"孙权无缘无故来向我们投降，必定国内有紧急事情。前些时候他偷袭荆州杀了关羽，刘备一定会大举兴师讨伐。孙权外面有强大的敌人进攻，内部人心惶惶，又怕我们魏国乘机去攻打他，所以才来向我们投降。这样一来，一则可以防止我们出兵，二则可以借魏国中立的名义，来壮他们的士气，迷惑敌人。我们应该乘此机会，也大举出兵，直接渡江袭击东吴。这样，刘备从外面攻，我们从里面打，不出几天就可以灭亡吴国了。"

曹丕左思右想，斟酌再三，对众人说："孙权向我称臣，我还要讨伐他，岂不使天下想归附我的人都怀疑我的为人。不如暂且接受孙权称臣，而去袭击蜀国的后方。"于是曹丕在让孙权兼荆州牧的同时，耍了个花招，将荆州原来所辖的江北诸郡划归郢城。孙权虽然对此十分不满，但在这时却不敢流露出来。

孙权联魏成功后，便开始全力对付刘备。这时，吴国名将吕蒙已死，孙权任命陆逊为大都督，率五万军队，全力抵御蜀军。两军比较，蜀军占显著优势。从军队数量上讲，刘备几十万人，吴军不过五万；从地势上看，蜀据长江上游，且控制三峡，进可攻，退可守，处于有利地形；从心理上看，蜀军认为胜利在握，吴军则信心不足。陆逊分析了形势后认为，如果死拼，吴军必定要吃亏，而这次战争关系到吴国的存亡问题，所以陆逊决定智取。这位有着卓越指挥才能的军事家，在大敌面前不慌不忙，采取了诱敌深入、等待战机、后发制人、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



江陵古城遗址

章武二年（222年）初，刘备率领军队经过秭归，封锁了长江，派兵进攻彝陵（今湖北宜昌东）。接着又越过彝陵直达猇亭（今湖北枝城北），深入吴地达五六百里，沿江设置了数十个屯营，步步进逼陆逊统领的吴军。但陆逊一直避免同蜀军鏖战。即使他们天天在阵前辱骂、挑战，陆逊仍置若罔闻。

刘备见陆逊拒不出战，又分兵一部围攻驻守夷道（今湖北枝城）的孙桓。吴军诸将纷纷要求援救孙桓，以解夷道之围。陆逊拒绝了分兵救援的主张，认为只要待机集中主力，取得同蜀军决战的胜利，夷道之围就会不救自解。

许多将领都认为陆逊怯敌怕战，有一些跟随孙策起兵的江东老将本来就对陆逊不大服气，见陆逊又如此用兵，都纷纷质问他。陆逊拔剑对众人说："刘备天下闻名，连曹操都有些怕他。如今他已在我们的疆界之内，决不可小觑。诸位身蒙国恩，理应戮力同心，击灭刘备，怎么能如此乱来呢？我虽然是个书生，但受命于主公。主公之所以委屈诸位由我节制，大概因为我多少还有些长处，起码能够忍辱负重。请各位不要多言，否则以军法从事！"诸将只好听令，坚守不战。

这天，蜀军先锋吴班又率数千蜀兵到阵前叫骂，有的解开衣服卸下盔甲，有的赤身裸体地睡着或躺着。吴将徐盛、

丁奉看在眼里，气在心头，他们禀报陆逊："蜀兵太嚣张了，我们应该出战打掉他们的锐气。"陆逊摇摇头，笑着说："大家不要意气用事，刘备这样做乃是诱敌之计。后面那个山谷中杀气腾腾，定有伏兵。刘备率军沿江东下，士气正盛，而且乘高据险，很难立刻将其攻破。纵然能攻破其一部，也无济于事；万一失利，反倒影响大局。我们姑且养精蓄锐，从多方面考虑破敌的策略，等待敌情的变化。如果这里是平原旷野地带，恐怕我们根本站不住脚，好在刘备是沿着山地进军，兵力施展不开，而且他们必然会疲惫于山林之间，从而给我们以可乘之机。吴班率少量蜀军兀然在平地立营，其中必然有诈。"诸将不理解陆逊的作战意图，认为陆逊的确是惧怕蜀军，无不心怀忿忿。

刘备见立营平原之计未能奏效，便下令将预先埋伏在山谷中的八千伏兵撤出。吴军将士见蜀军阵容严整，兵多将广，都吓得直吐舌头，他们这才知道陆逊的顾虑所在。这时，孙权也派人询问陆逊为何按兵不动。陆逊上书回报主公："彝陵这个要害地方，是我们东吴的重要关口。虽然很容易被攻取，但也容易失守，一旦失去，不仅是损失一个郡的问题，就连荆州也难以保住。今天我们争夺这个地方，要一举成功，一劳永逸，以后不再失去。开始时，我顾虑刘备水陆大军同时前来，那么我们势必要分兵抵抗。现在他放弃水路，单用陆路，又在七百里内处处结营，兵力分散，看来刘备的布置不会再有什么变化了。请您放心好了，不用再为攻打刘备的事而挂念了。"于是，吴军仍然坚守不战，使得蜀军欲进不得，双方就这样相持于高山大川之间。

远在魏国的曹丕也派人到荆州打探刘备进兵的情况。当听说刘备在秭归至猇亭之间以木栅联营七百余里时，曹丕说："刘备实在不懂得用兵。七百里长的营地，怎能抗拒敌人的进攻呢？刘备用木栅连营，更是犯了兵家大忌。孙权的好运气就要到了。"

这年闰六月，陆逊突然决定向蜀军发起全面进攻。将领们都说："要攻刘备，应当在他们初来的时候。如今他已经深入我们国境五六百里，相持了七八个月，所有重要险阻的地方，都有重兵坚守，现在我们去攻他，一定不会有好结果。"陆逊说："刘备是个狡猾的敌人，加上他经历过的事很多，经验极为丰富。当他大军初来的时候，考虑问题必然专心精细，那时是不能轻易去攻击他的。现在时间久了，他找不到我们的空隙，士兵已很疲惫，士气低落，又想不出打败我们的计策，因此正是我们用计打败他们的好时机了。"

陆逊先派鲜于丹带领五千人马，攻打蜀将傅彤驻守的江南第四营，结果吴军被蜀军围而攻之，伤亡过半，鲜于丹拼死逃回营中，首战告负。将领们又埋怨说："这样只是白白牺牲兵士罢了。"陆逊此刻却早已胸有成竹，他对大家说："这是我试探敌人虚实的做法，现在我已经有了破敌之计！"

第二天午后，东南风大作，陆逊命令韩当、周泰各领一军分别攻打江北、江南大营，每人手拿一把茅草，里面装着硫磺、焰硝等易燃之物，一接近蜀军兵营，就顺风举火。只听一声令下，蜀营顿时变成了一片火海。陆逊率领全部军队发起进攻。虎威将军朱然首先击破

蜀军前锋，并切断了蜀军后退之路；振威将军潘璋击溃蜀将冯习部；偏将军韩当与朱然一起大破蜀军于涿乡（今湖北枝城西北马鞍山下）；绥南将军诸葛瑾、建忠郎将骆统、兴业都尉周胤也自潺陵（今湖北公安西）进击猇亭，与陆逊合攻蜀军主力。蜀军四十余座营地相继被拔，蜀将冯习、张南等被斩，杜路、刘宁等被迫降吴。

刘备逃上马鞍山，把军队沿山环列，进行困守。陆逊命令所有将士从四面猛攻。刘备的部队全部溃散，被杀死的人数以万计。刘备连夜逃走，依靠沿途的驿站，将辎重、器械焚烧，堵塞山路隘口，才阻止了东吴的追兵，逃进白帝城。其他所有船只、器械、水步兵的军用物资，全部为东吴军队缴获。被杀死的蜀军尸体，塞满了整个长江水面。

彝陵之战后，孙权本想继续围攻白帝城，逼迫刘备投降，进而深入巴蜀，但因顾忌曹丕掩袭其后方，不敢向西太远，遂下令撤军。这时，曹丕已平定了塞外的乌桓、鲜卑之乱，果然派大军南下袭吴。孙权决心抗拒，并立即建国号为吴。孙权为拒此大敌，转而谋求与蜀汉和解，派郑泉出使白帝城。蜀汉也派宗玮回访东吴。吴、蜀从此又相通好，三国局面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南中之战】

刘备入川以后，当时的一些汉族豪强勾结少数民族上层贵族，妄图维持割据局面，而挑起了民族矛盾。公元 223 年，益州郡（今云南晋宁东北）的雍闿杀了蜀汉太守正昂；牂柯郡（今贵州黄平西南）的朱褒、越嶲郡（今四川西昌东南）的高定也起兵叛乱。这一切都直接干扰了诸葛亮的战略计划，阻碍着兴师北伐曹魏的行动。

因此，对于蜀国来说，“西和诸戎，南抚夷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如果单纯采取武力征服的办法，对“居依山，或聚或散”的少数民族武装的弹压，就会长期纠缠下去，这样不但误了大计，而且树敌更多。所以，诸葛亮采取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作战方针，孤立、打击极少数叛乱的主要祸首，而对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则实行耐心的安抚工作。

在诸葛亮的“心战”中，七擒七纵孟获最为著名。

公元 225 年二月的一天，蜀国将要出兵平定南中了。只见阅兵场上，战旗高高飘扬，战鼓咚咚作响。一批批身强体壮的士兵，排列得整整齐齐，刀枪铠甲，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雄姿英发的战将，跃马横枪，威风凛凛地守候在点将台旁。三通鼓响之后，诸葛亮端立在点将台中央。他极目四望，扫视着整个校场的盛况，然后高声向全体将士们宣布：“为了稳定我们的大后方，平定南中诸郡的叛乱，今天我们就要出征了。现在我命令马忠为东路统帅，领一支部队攻打益州郡东面的牂柯郡；命令李恢为中路统帅，佯攻叛乱分子的老巢益州郡，以牵制益州的叛乱分子，使它不敢抽出力量去援助越嶲郡。西路大军由我亲自率领，攻打越嶲郡。然后三军会合，攻打叛军的最后据点——益州郡。”

三军将领接受命令以后，高举战旗，擂起军鼓，雄赳赳、气昂昂地分别朝指定的方向出发了。诸葛亮的南征，就这样开始了。

马忠一路，没有费多大力气就攻下了牂柯郡；李恢一路，虽然进展不大，却断绝了益州郡与越巂郡的联系，使叛军陷于孤立；诸葛亮的西路大军由僰道（今四川宜宾西南）经水路进入卑水（今四川昭觉）以后，就停止了前进，以诱惑敌高定决战。等到高定把分散在各地的军队聚拢到一起之后，诸葛亮便采取突然行动，歼灭了这股叛军，杀死高定，占领了越巂郡，雍闿等人也被高定的部下杀死了。

自牂柯、越巂二郡平定之后，诸葛亮的南征，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这时，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由于受雍闿等人的蛊惑，影响远未肃清，隔阂还没有消除。夷人孟获收集高定与雍闿的余部，继续在益州郡骚动。参加的人又大多是受骗的少数民族。为了安定益州郡，诸葛亮率军穿过人烟稀少的山岭，渡过波涛汹涌的泸水（金沙江），经过艰苦的行军，终于逼近益州郡，马忠、李恢两军也到达会师。于是，他们与孟获展开了一场赛意志、比智慧的斗争。

孟获这个人身高体健，性格倔强，而且勇敢善战。他本来不是夷族的贵族，只是听了雍闿等人的挑拨、煽动，才参加了骚乱。雍闿、高定死后，他被夷人推为首领。他的部将，大都是骁勇强悍、能泅善攀的能手。他们世世代代聚居在南中四郡的山里，过着落后的甚至是原始的部落生活。这里峰峦起伏，怪石嶙峋，洞穴深邃，绵亘的大森林里，虎豹成群，蛇蝎毒草处处皆是。穿山过峡而来的泸水，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呼啸奔腾，惊险异常。一到夏天，暑热难熬，瘴气蒸人，瘟疫流行，即使长期定居于此的人，也难免遭到毒蛇猛兽的袭击和



诸葛亮与孟获（浮雕）

疾病的折磨。诸葛亮的南征就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下进行的。加上语言不通，地理不熟，这需要多么大的毅力才能克服这些困难呀！

这天，孟获率领由夷人组成的部队来同诸葛亮会战。诸葛亮命令自己的部队，不许杀害孟获，只能活捉。

不懂兵法的孟获，骑着高头大马来到蜀军阵前观望，狂妄地对他的部下说："人人都说诸葛亮会用兵布阵，非常厉害，我看他的阵法并不高明。早知这样，我早该造反了。今天我一定要活捉诸葛亮，还要打到成都去。"于是，他驱兵前进，向蜀军冲杀而来。

蜀军将士遵照诸葛亮的嘱咐，并不与他硬拼，小战几个回合后就渐渐退去，慢慢地把孟获引到一个狭窄的山谷里，然后四面包围，许多蛮夷士兵都被俘虏了。孟获一见中计，赶忙翻身下马，钻进荆棘丛中，想趁机逃脱。其实，蜀国的将士早就注意他了。结果，孟获被蜀兵生擒活捉。

蜀国的将士们见到孟获被擒，个个欢呼雀跃，拍手称快，他们希望早点处决孟获，早日结束这场艰苦的战斗，并儆戒夷人的反叛者。谁知诸葛亮不仅不杀孟获，反而亲自替他松绑，带他观看蜀军的兵营。诸葛亮问孟获："你觉得蜀国的军队训练得怎么样？战斗力强不强？"

被俘的孟获很不服气，怒气冲冲地回答："这样的军队不算什么，我是因为不了解你们的实力，才吃了败仗。如果有机会再打一仗，我一定会胜利的。"

听了孟获这些傲慢无礼的话，诸葛亮毫不在意地笑了笑，说："那么，我现在就放你回去好好准备，再打一仗，要是你再次被俘虏又怎么办呢？"

孟获连声说："真要是那样，我就心甘情愿地臣服！"

诸葛亮果真将孟获放了回去。孟获回去后好好准备了一番，不料第二次战斗的结果，孟获又被俘了。诸葛亮还是和第一次一样，一不杀，二不骂，只是问他为什么又打败了。孟获低头不语，只是不断地唉声叹气。

诸葛亮见他这副神情，知道孟获还不服气，又同第一次一样把他放了，并约他下次再战。就这样一捉一放，接连搞了六次。

孟获心想，如此比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这诸葛亮神机妙算，用兵如神，真要是再被他擒住，这张老脸还往哪儿搁啊！正当孟获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位蛮将向他献计说："从这儿往东南方向几百里处有一小国，名叫乌戈国。国王兀突骨，身高两丈，不食五谷，专门吃生蛇和恶兽。他手下的士兵，都穿着藤甲。这种藤本来就坚韧无比，他们制作藤甲时将其浸在油里，半年之后才取出晒干，然后再浸再晒，几十遍之后，用其编制成铠甲。这藤甲穿在身上渡江不沉，经水不湿，刀箭穿不透。如果大王把藤甲兵请过来，打败诸葛亮就如同利刀破竹一样容易。"孟获一听大喜，立即前往乌戈国求来三万藤甲兵。

第二天，两军交战，魏延带着蜀兵迎战藤甲兵。哪知蜀兵射出的箭都被对方身上的藤甲挡落在地，刀砍枪刺也丝毫无损。蛮兵却如同虎狼一般用利刀钢叉猛攻猛杀，蜀兵抵挡不住，被打得落花流水。再看藤甲兵，见蜀兵败阵也不追赶，纷纷回到河边，把藤甲扔到水里，然后人往上一躺就渡过河去了。

魏延回到帐中将情况禀报诸葛亮，诸葛亮对众人说："藤甲这东西利于水则必不利于火，虽然它刀箭不入，但是油浸的东西，遇火必着。我们可以用火攻来破它。"说完便详细地给众将分派了任务。

以后的几场交战中，都是蜀军败退，一连输了十七阵，丢掉了七个栅寨。然而，蛮兵离地势狭窄险要的盘蛇谷也越来越近。这天，魏延又诈败，将藤甲兵引进了盘蛇谷。只听巨响连连，蜀兵从两侧山上扔下的滚木礌石将谷口堵住，然后火把更如雨点般落向谷中，原先埋在谷中的火药也被点着了。一时间满谷火光乱舞，藤甲一碰到火花没有不起火的。不到半个时辰，三万藤甲兵就被烧死殆尽。孟获乱中慌不择路，又被马岱生擒活捉。

诸葛亮命人替孟获松绑，并再给他赐酒肉压惊，等孟获酒足饭饱后又派人传话给孟获，让他再招人马来决胜负。孟获流着眼泪说："七擒七纵，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我虽然是个粗人，但还懂得一点礼义，难道真的一点也不知羞耻吗？"说完，便与被俘虏的其他蛮人一起跪下谢罪，保证今后再也不造反了。诸葛亮把孟获请至上座，设宴庆贺，并封他永远为王，而且将蜀军所占之地全部退还给他。孟获及其手下都感激不尽。

南中叛乱平定后，有人建议诸葛亮

留下汉人掌管那个地区，诸葛亮本着相信少数民族的精神，拒绝了这种建议，他说："如果留下外人，就必须留下兵马，留下兵马，就要运粮；况且他们刚刚战败，父兄战死，留下外人，必成为祸患；再者，留下外人，会造成感情上的裂痕。倒不如粗制法度，让他们自觉遵守就可以了。"从此，少数民族杂居的南方成了蜀汉巩固的后方。

"七擒七纵"是诸葛亮采取军事与政治相结合方针的一次胜利，就连后世的统治者也都称赞不已。

【苦县之役】

311年（永嘉五年），石勒在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郸城东）围射官军，杀太尉王衍等人，死10余万人。

此前，刘渊称帝后就曾命其子刘聪进攻洛阳，洛阳危急。310年秋刘曜、王弥、石勒的军队再次攻洛阳，洛阳再次危急。怀帝及司马越发檄文征调四方兵师来增援。然而，因为各路方镇对司马越十分失望，加之石勒在对各方镇的作战中十分勇猛，屡有胜绩，使当时的各方镇自顾不暇。所以，没有一支援军来洛阳，于是，司马越准备放弃洛阳，以讨伐石勒为名，率4万人及大批的朝臣（如朝中有声望的王衍等）东驻于项，以避难自保。

311年初，东海王司马越忧愤而死于项。太尉王衍等不作战备，反护司马越的灵柩还葬东海国，队伍行到苦县宁平城，被石勒骑兵追及。石勒以骑兵围而射杀，箭矢如雨，晋军将士自相践踏，10余万人无一幸免。

留守洛阳的何伦等人得知司马越去世，带着司马越的妻子裴氏、儿子司马毗以及宗室48王东去奔丧，中途尽被石勒杀死。司马越也被石勒剖棺灭尸。

苦县之役，晋军主力尽被歼灭，洛阳守备空虚，危在旦夕。

【关洛大战】

328年（前赵光初十一年后赵太和元年）底，前赵与后赵在洛阳附近发生大战，前赵兵溃，刘曜被杀。

325年，刘曜曾派刘岳进军孟津，镇东将军呼延谟攻占后赵的孟津、石梁等两个军事据点。后石虎出战，斩杀呼延谟，败刘岳，刘曜亲率兵士增援，再次兵溃。刘曜返长安后，忧愤患病，卧床不起了。

328年夏天，石勒遣石虎率兵4万攻前赵的河东地区，占50余县，并进攻蒲阪（今山西永济西）。身体刚刚恢复的刘曜亲率水陆精兵营救蒲阪。在高侯（今山西闻喜北）大破石虎军，石虎丢盔弃甲，逃奔朝歌（今河南淇县）。刘曜乘胜进击，南攻后赵石生占据的洛阳金墉城，并挖开千金土堨灌金墉城，一时后赵军队守地告急。

石勒闻讯，率师出襄国，增援洛阳。正当石勒等6万后赵大军渡洛水，兵锋直指洛阳时，刘曜却在金墉城下饮酒作乐，石勒不久率兵4万进入洛阳城，在洛阳西阳门（洛阳城西面南头门）两军交战中，刘曜兵败，身负重伤被石勒所擒。此役，后赵大胜前赵，斩首5万余，尽灭其主力。

刘曜被解至襄国后，受逼写信给太子刘熙劝其投降，刘曜却言太子应自维社稷，遂被石勒杀。329年，石勒出兵

拔上邽，杀刘熙及王侯将相以下3000余人，又徙台省文武、关东流民、秦雍大族约9000余人于襄国。前赵自刘渊立国至此灭亡，前后共26年。

【前秦灭凉、代之战】

376年（前秦建元十二年），前秦攻灭张凉与鲜卑拓跋氏的代国，统一北方。

370年，前秦灭掉了北方最具实力的强敌前燕。之后，苻坚就在谋取北方的凉、代，并觊觎东晋的疆土。

373年冬，前秦派王统、朱彤率军2万出汉川，毛当、徐成率军3万出剑门，进攻东晋。年底，分克汉中、成都，占得东晋梁、益两州。邛、筰、夜郎等都归附前秦。

前秦与张凉早有臣属关系，366年，前凉国君张天锡派人通知前秦，断绝双方外交关系，随之羌人敛歧背叛前秦，此事令苻坚十分恼火。为了不引起更为强烈的连锁反应，苻坚派兵攻打李俨，李俨向张天锡求救，但不久，张凉竟听任王猛生擒了李俨，此事暴露出张天锡惧怕前秦、目光短浅的弱点。此后，前秦恩威兼施，在威逼利绣之下，张天锡



“大秦龙兴化牟古圣”瓦当

再次向苻坚称臣。半年后，张天锡又一次背弃前秦，并派人去同桓联系，以依晋敌秦。

张天锡的一切努力在张凉国力颓衰的情况下都难奏效。376年夏，苻坚派遣毛盛、姚表等人率13万大军两伐前凉，一路势如破竹，进而围攻姑臧，张天锡出降，前凉亡。凉州郡县全都成了前秦版图中的组成部分。随后秦以梁熙为凉州刺史，梁熙治理得法，凉州渐渐安定。

灭梁之后，苻坚乘军队士气高涨之时，于376年冬，遣苻洛率军10万，俱难、邓羌等率兵20万分兵击代，代国军队不堪一击，什翼犍出逃，不久，又回到云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代国又发生内乱，前秦趁机击云中，杀代国国君什翼犍之子寔君，代亡。前秦将代地的属民分为两部分，河东归刘库仁，河西属刘卫辰。

至此，前秦基本统一了北方，与南方的东晋政权以淮水为界南北对峙了。

【柴壁大战】

402年（后秦弘始四年，北魏天兴五年），魏秦在柴壁大战，魏重创后秦主力。

时北方诸国之中，数北魏与后秦为强。402年春，后秦国主姚兴派主力伐魏，以义阳公姚平、尚书右仆射狄伯支等率军4万为先锋，姚兴自领军队为后继。北魏也遣毗陵王拓跋顺等率6万军队为先锋，拓跋珓领大军继后。

402年两军会于晋南汾河岸边。时姚平据有柴壁（今山西霍州市附近），姚兴自率众近5万与姚平隔汾水相望，

姚平在汾水之东，姚兴在汾水之西。拓跋珪听从部下的意见，一方面增设重围，围困姚平；另一方面，隔断姚平与姚兴的联系，使姚平供给不足。402年秋，姚平无奈，弃城而逃，被北魏兵击垮，而西岸的姚兴无法救援。柴壁一役，后秦损失狄伯支、唐小方等40多位大将及主力近4万人。从此，北魏力量大增，而后秦实力受创，再也无力与魏一争高下，魏奠定其人主中原的基础。

【清口之战】

458年（宋大明二年魏太安四年），北魏镇西将军封敕文率军攻打宋军，宋清口戍主傅乾爱败魏兵，双方遂爆发战争。

458年秋宋积射将军殷孝祖在清水之东筑二城，封敕文来击，不久败退。孝武帝见战端已启，就派虎贲主庞孟虬前去援救。青、冀二州刺史颜师伯派中兵参军荀思达协助孟虬，打败魏军。孝武帝又派司空参军卜天生等北上，屡破魏军。拓跋濬也派征西将军皮豹子南下增援封敕文。宋魏双方屡在青州、高平发生战斗，互有胜负。

459年，拓跋濬兵伐柔然初还，兵马力疲，无法再战；刘宋内有不平，为防宗室刘诞叛乱，刘骏也匆匆收兵。清口之战结束。

【淝水之战】

前秦皇帝苻坚雄心勃勃，总想灭亡东晋，统一天下。他在几次跟东晋的小接触中，打败了晋军，于是就骄傲起来，自以为天下无敌，不听别人的忠告，终于向东晋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

出兵之前，苻坚召开军事会议，宣布了要进攻东晋的决定。当时一些善于逢迎谄媚的大臣赶紧奉承说："陛下出兵去打东晋，一定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胜利是可以预料的。"可是尚书左仆射权翼却表示反对，他严肃地指出："东晋虽说偏安江南，力量薄弱，可他们内外齐心，君臣和睦，还有谢安、桓冲这些有名的将领，都是智勇双全之人。依我看，目前去攻打东晋，恐怕时机还不成熟。"太子左卫率石越也附和说："权翼说得对，东晋还有宽阔浩瀚的长江作为天然屏障，我们切不可小看他们。"苻坚一听，不由得火冒三丈，他怒气冲冲地说："长江有什么了不起！我的军队这么多，只要我一声令下，每个人把马鞭子扔进长江，就能把江水截断。那时候他们还拿什么做屏障？"

苻坚不听权翼、石越等人的劝告，一意要进攻东晋。他下令强迫征发各族人民补充兵力，征集大量的军用物资，在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年）八月，亲自统率全国八十多万军队，号称百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向东南地区进发了。苻坚让他的弟弟阳平公苻融带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又命羌族的将领姚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州诸军事。九月，苻坚亲自从长安出发，领兵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前后千里相连，旗鼓相望。苻坚到达河南项城时，后续部队还在陕西咸阳一带，从水路走的部队也是连绵万里，运船万艘。其声势之大，为历史上所罕见。

面对前秦苻坚的大举进攻，东晋群臣都很紧张，当时能用来御敌的军队不到十万人，主要就是谢玄所统领的北府

兵，双方兵力相差太大。但这时东晋由文武全才的谢安担任宰相，掌握军政大权，还有桓冲与他通力合作，一起出谋急，无心对弈，谢安却反而聚精会神，步步紧逼，使谢玄难以取胜。谢安的镇定自若，增强了谢玄抗敌取胜的信心。



淝水之战（油画）

划策。在强敌压境、生死存亡的关头，原先勾心斗角的东晋统治集团，在谢安的领导下空前地团结起来。他们决心抵抗前秦的进攻，并紧张地进行了军事部署。谢安自任征讨大都督，命令他的弟弟谢石负责指挥全军；侄子谢玄担任前锋，带领八万兵马阻击秦军；又派胡彬率领水军五千，赶去增援淝水河边的寿阳城（今安徽寿县）；同时他又把淮北人口南迁到淮南，实行坚壁清野，不让敌人在当地取得补给。

谢安是经验丰富的良相，他知道在大敌逼近的这个关键时刻，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会直接影响到人心士气，所以故意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外出游玩，谈笑风生，努力消除人们的紧张情绪。谢安对谢玄的北府兵寄予厚望，谢玄向他请示退兵之策，谢安只说："我已经安排好了。"语气非常冷静，有信心，他又特地请谢玄下棋。平素谢安棋技不如谢玄，常为下手；现在谢玄因局势危

前秦苻融率领的前锋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日夜行军，到达了淮河北岸的颍口（今安徽颍上正阳镇），苻坚亲自率领的主力军，随后也赶到了项城（今河南沈丘西南）。他求胜心切，不等其他各路人马到齐，就命令苻融进攻寿阳。寿阳是个军事重镇，它的得失对于整个战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时奉命增援寿阳的晋将胡彬还在半路上，寿阳的防守能力很弱，因此苻融很快便攻下了寿阳城，守将徐元喜等被俘。胡彬接到寿阳失守的消息，只好退守硖石山（今安徽寿县西北）。

苻融攻下寿阳以后，一面继续攻打硖石山，一面派部将梁成带领五万人马，占领军事要地洛涧。梁成在那里扎下了许多水寨，把谢玄带领的八万晋军，阻挡在洛涧东边。谢石、谢玄率领北府兵西进至距洛涧二十五里处驻扎，不敢贸然向前。

这时退守硖石山的胡彬被前秦军队

围困，粮草将尽，遣人求援，但送信的人中途却被秦军捉获。苻融大喜，认为晋军兵力寡少，粮食不足，可以轻易将其击败，他赶忙把情况报告给在项城的苻坚。苻坚闻讯，更是喜出望外，急于取胜的心理使他把大军停在项城，自己带轻骑八千，匆忙秘密赶到寿阳。

到了寿阳，苻坚派尚书朱序到晋军大营去劝降。这朱序本是东晋的将领，四年以前，他在襄阳与前秦军队作战，兵败被俘，留在了前秦。现在他见秦晋交兵，认为自己为东晋出力赎罪的机会到了。所以他到晋营不但没有劝降，反而向谢石提出了破秦的建议。他说："秦兵百万，势不可挡。现在应趁他们各路兵马还未到齐，先打败他们的前锋，挫伤他们的锐气。你们什么时候进攻，我可作个内应，协助你们。"谢石等人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改变原先采取的"欲不战以老秦师"的消极防御方针，先发制人，首先袭击洛涧的秦军，让朱序在晋军进攻秦军主力时再配合行动。

谢玄派战斗力较强的北府兵将领刘牢之，带领一支人马，在夜晚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洛涧，向秦军阵地发起突然袭击。正在睡梦中的秦将梁成，听到喊杀声，吓出了一身冷汗，慌慌张张地从床上爬起来，上马迎战，结果被刘牢之一刀砍翻，送了性命。秦军失去主将，无心再战，晋军乘胜追击。谢石带领晋军主力渡过了洛涧，在离寿阳城只有四里地的八公山下，扎下营寨。这一战，刘牢之等先后斩杀和俘虏前秦军队一万五千余人，尽收其器械军资。北府兵以五千之众，击歼数倍于己的敌人，初战获胜，大大提高了东晋军的士气。这是淝水大战的前哨战。

在寿阳城里的苻坚，接二连三地接到洛涧方面失利的消息，再也沉不住气了。他忐忑不安地和苻融一起登上寿阳城楼，瞭望晋军动静，只见晋军阵势森严，旌旗如林，八公山上密密麻麻，不知道有多少晋军在东奔西突地苦练杀敌本领。看到这种情景，他心里着实吃惊不小，对苻融说："你看，这里满山遍野全是晋兵，怎么能说他们不行呢!"他连忙下令，要各处秦军严加防守，没有他的命令，不许出击。其实，八公山上并没有多少晋军。苻坚他们是因为在洛涧吃了败仗，挫伤了锐气，心慌气馁，眼花缭乱，才把八公山上被风吹得左右摇摆的草木，看成是晋兵在练武了。这就是"草木皆兵"的来由。

由于前秦军队屯扎淝水为阵，东晋军队难以渡河作战，尽快击败敌人前锋的计划无法实施。如果久拖不战，待秦军主力聚齐，对东晋极为不利。在这关键时刻，谢玄筹划一计，他派人前往前秦军营，对苻融说："你们远道而来，临水为阵，这不是要速战速决，而是作持久战的准备。如果你们把阵地向后稍稍移动一下，使我军得以渡水，让双方将士在此决一胜负，岂不是一件挺痛快的事嘛!"当下苻坚聚部下共议，诸将都主张不让东晋军队渡水，主张前秦军队仍应阻遏淝水，东晋兵少，前秦军多，这是万全之策。苻坚在寿阳城看到东晋军容威严，虽然也有点胆怯，但仍恃自己兵力众多，急于决战，谢玄的建议正符合他急于求胜的心理，于是他不顾众议，答应了谢玄的要求，而且自作聪明，想着让自己的军队稍作后退，待东晋军半渡淝水的时候，立即派骑兵向对方猛扑，逼水冲杀，以此取得胜利。苻坚的

决定得到了苻融的支持。

到了约定的日子，苻坚传下号令，叫秦军拔营后退，让晋军渡河。但就在这时，苻坚根本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发生了。原来前秦士卒大多是被强迫抓来的汉族和其他许多少数民族百姓，他们厌恶这场互相残杀的战争，更不愿为压迫、剥削自己的前秦政权卖命，因此他们毫无斗志；前秦的一些将领，包括部分暂降苻坚的少数民族首领，或者是被前秦所灭的亡国之君，他们各怀鬼胎，都想伺机夺权，因而惟恐前秦不乱。所以前秦军队貌似强大，实际上很脆弱，经不起一点风浪。将士们一听到向后撤退的命令，军心马上动摇，队伍一下子失去了控制，像决了堤坝的洪水，掉转头来拼命地向后奔跑。

这时谢玄和谢琰、桓伊等率北府精兵八千人，疾速涉渡淝水，向着前秦部队大力奋击。苻融见此情景，大吃一惊，竭力指挥，想让部队稳住阵脚，组织反攻，但前秦士卒早已不听指挥。乱军之中，苻融因从骑倒下而被晋军所杀。这时，朱序又在前秦阵地后面高喊："秦军大败了！秦军大败了！"前秦士兵看到主帅被杀，又听到朱序的喊声，更加失去了节制，惊恐万状，如鸟兽散。谢玄等率大军全力歼敌，一路追杀，直追至寿阳城西面三十里的青冈，才收众回兵。前秦军队阵上被杀的、人马自相践踏而死伤的，满山遍野；幸存者拼命逃跑，在途中听到风声鹤唳，也以为是晋兵追至，受惊再加上饥饿、伤病，又去了十之七八。苻坚也在混乱中中箭受伤，他一口气逃到淮北，清点了一下残兵败将，原来的几十万人马只剩下不足十万了。

谢石、谢玄连夜派人回建康报捷。当报捷的军士赶回建康的时候，谢安正在跟客人下棋。接到捷报，他起先还装得若无其事，把信扔在床上，继续下棋。客人问他有什么事。他轻描淡写地说："小儿辈打败了敌人而已。"送走客人以后，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由于过分激动，过门坎时，竟连木屐上的齿也碰断了。

淝水大战以后，东晋的安全得到了保障。前秦吃了败仗，力量大大减弱，鲜卑人、羌人、匈奴人和汉人纷纷反秦自立，组织了许多政权。苻坚战败回国不久，也被他的部将、羌族人姚苌捉住杀死了。

【常山之战】

756 年（天宝十五年）2 月，河北节度使李光弼败史思明于常山，解饶阳之围。

史思明既攻陷常山，又率兵攻击反



李光弼

抗叛军的诸郡，广平、钜鹿等郡又复陷于叛军之手，只有饶阳太守卢全诚据城坚守。史思明围城29日不下。2月，玄宗加李光弼为魏郡太守、河北采访使。李光弼遂统领蕃、汉步骑万余人，太原弩手3000人出井陉，收复常山。史思明闻常山被攻破，立刻解饶阳之围，率军来援。李光弼布兵列阵，屡败叛军，史思明只好退回九门。此时，常山郡9个县中，7县附唐军，只有九门、藁城为叛军所占领。

【邙山之战】

761年（上元二年）2月，李光弼被迫与史思明交战，大败于邙山。

李光弼败史思明于河阳后，有人言，洛中叛军将士多为燕人，久戍思归，攻之必破。陕州观军容使鱼朝恩说肃宗令李光弼进取东京。光弼奏称：“贼锋尚锐，未可轻进。”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因李光弼治军严厉，由畏而恶之，遂附会鱼朝恩，亦言东都可以收复，于是中使相继于道，督促光弼出兵。李光弼不得已，被迫出兵，遂使郑陈节度使李抱玉守河阳，与怀恩率兵会鱼朝恩及神策军节度使卫伯玉攻洛阳。光弼命于邙山依险布阵，仆固怀恩却阵于平原，史思明乘官军阵脚未稳，进兵击之，官军大败，死数千人，军资器械尽弃。李光弼、仆固怀恩走保闻喜，鱼朝恩、卫伯玉败还陕郡，李抱玉也弃河阳而逃走，河阳、怀州皆陷叛军之手。朝廷闻知战事，速增兵屯于陕郡，以防叛军西侵，邙山败后，李光弼上表请求自贬，肃宗遂下制以李光弼为开府仪同三司、侍中，领河中节度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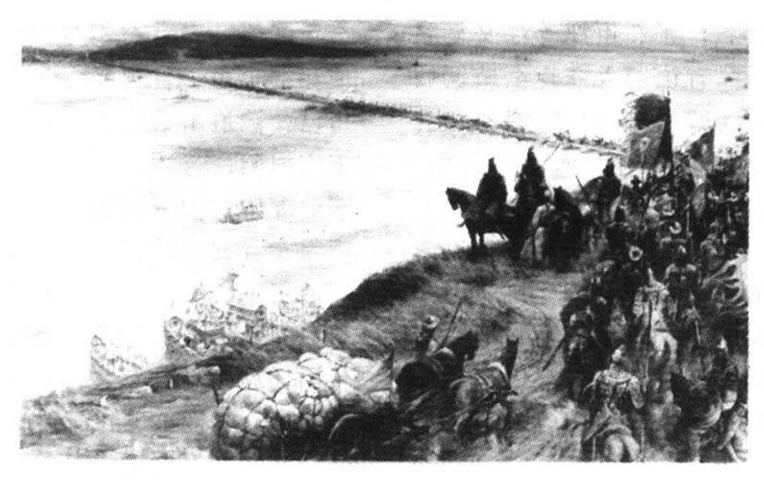


《玄宗幸蜀图》（部分）

【高梁河之战】

赵匡胤建宋后，即着手进行统一战争。他花了十三年时间，南征北伐，先后灭掉了荆南、武平、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政权，但在攻打北汉都城太原时吃了败仗。不久，宋太祖含恨死去。他的弟弟赵匡义（光义）继承皇位，即为宋太宗。太宗继续推进统一战争进程，削平了割据南方的吴越政权和陈洪进势力，接着挥戈北上，把太祖的未竟事业——消灭北汉，收取幽云十六州提上了日程。

扫平割据势力，把后晋石敬瑭割让给辽国的幽云地区置于宋朝的统治之下，是赵匡胤兄弟的共同心愿。宋太祖曾专门设置了一个封桩库，把每年财政节余封存在库中，准备蓄满五百万缗，向契丹人赎回幽云地区。如果契丹不答应，就用这些钱召募勇士，用战争手段解决幽云问题。太宗继位后，也把攻取北汉、



北宋大军过浮桥，征南唐

收回幽云地区作为自己奋斗的一个目标。他刚一即位，就对齐王廷美说："太原我必取之。"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二月初，宋太宗下诏亲征，率领数十万大军直逼北汉。宋军兵分四路，由中央禁军围城打援，很快使北汉都城太原陷入孤立境地。北汉皇帝刘继元见大势已去，只好献城投降。五代十国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就这样灭亡了。

五月下旬，灭北汉的善后事宜一处理完毕，宋太宗就决定挟破北汉之余威，直接向幽州进军。

此时宋军已经连续对北汉作战几个月，将士们都已疲惫不堪。北汉灭亡后，宋军人人松了一口气，等着论功行赏、休整些时日呢。没想到征尘未洗，又要起兵东进，绝大多数将领不愿意立即向辽进军，但却无人敢直言谏阻。以殿前都虞候崔翰为首的少数将领赞成东进，他们认为应该乘灭北汉的破竹之势直取幽云，不能错失良机，因此极力怂恿宋太宗出兵伐辽，这更加坚定了宋太宗的决心。

于是，宋太宗不顾全军普遍流露出的厌战情绪，于五月二十日下令调发京东、河北诸州军集中到镇州（今河北正定），并冒着六月酷暑天气，亲自率军北征。宋太宗的战略意图是，以幽州为主要作战目标，迅速自太原转移兵力东进，越过山峦重迭、沟壑纵横的太行山区，乘辽无备，实施突然袭击，一举夺占幽州，然后乘胜收复全部幽云地区。

六月十三日，宋太宗率军从镇州出发。宋军刚北进，随从六军有的就不按时到达，露出了军心涣散的苗头。宋太宗想整顿军纪，这时有一个禁军将领说，敌未殄灭时不应诛谴将士，以免动摇军心。宋太宗听从了他的意见，没有对这种纪律松弛、行动不一致的现象加以制止。这样一来，军纪就更加松懈了。

十九日，宋军进入辽境，迅速占领了金台（今河北易县东南）。此后宋军以每天百里的速度开进，其间只遇到小股辽兵的抵抗。辽岐沟关（今河北涿县西南）和涿州（今河北涿县）的守将又先后开城投降，宋太宗率军直进，没费吹灰之力就于六月二十三日黎明抵达幽州城南。

辽军南院大王耶律斜轸（一作色

珍）看到宋军兵锋甚锐，不敢正面交锋，便率军驻屯得胜口（今北京昌平北）诱敌。宋太宗一路节节胜利，也未免有些轻敌情绪，即命令宋军进击，辽军抵挡不住，伤亡千余人。但耶律斜轸趁此机会率领一部人马悄悄绕到宋军后阵，使宋军腹背受敌。宋军不得已后撤，停止了进攻。耶律斜轸乘势进驻清沙河北（今北京清河镇附近），待机而动。

宋军未能全力夺取得胜口这一要点，反而使幽州与得胜口、清沙河结成犄角之势，大大提高了辽军坚守幽州的决心。宋太宗认为耶律斜轸一军只能凭险据守，不会再对宋军构成什么威胁，就留下少部分兵力牵制其军，而把主力集结在幽州城下，二十五日对幽州展开围攻。

宋军兵分四部，从四个方向同时向幽州城发动攻击。宋太宗亲临阵地，监督指挥宋军攻城。城内辽军在守将耶律学古、韩德让的指挥下奋勇抵抗，使宋军付出重大伤亡，攻而不克。

六月三十日，宋太宗率军合围幽州的消息传到辽都城上京。辽景宗耶律贤闻报后心慌不已，打算放弃幽州，退守松亭关（今河北喜峰口）、虎北口（今河北古北口）。这一主张提出后，立即遭到许多大臣的反对。北院大王耶律休哥站出来坚决劝阻，并请求率兵十万前去解幽州之围。辽景宗见群情激昂，就接受了耶律休哥的建议，命他与南京（即幽州）宰相耶律沙统军越过燕山增援幽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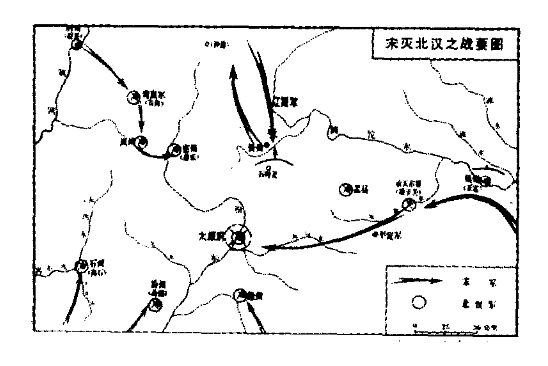
由于城内辽军的顽强抵抗，自六月二十五日到七月初五，宋军连攻十一天未能把幽州城攻陷。昼夜连续作战使宋军将士疲惫不堪，许多人都丧失了继续战斗的勇气和信心，不愿再往城下冲了。宋太宗本想速战速决，却不料低估了守城辽军的力量，出现这种情况，不免心急如焚，于是强令宋军继续攻城，宋军的斗志更加涣散。

七月初六，正当宋太宗督军攻城时，耶律沙率援军到达幽州外城。宋军探卒飞马把这一情况报知宋太宗，太宗听后说："我军先去迎击敌援，杀败了他们，再来攻城就无后顾之忧了。"随即率大军向外城掩杀过去。

宋军与耶律沙援军在高梁河畔（今北京外城）遭遇，即展开激烈的厮杀。双方金鼓齐鸣，旌旗飞舞，直杀得天昏地暗，鬼哭神号。宋军人数毕竟占优，战至黄昏，辽兵伤亡惨重，渐渐不支，耶律沙率军向后撤退。宋太宗眼看胜利在望，立即挥动令旗，命令宋军前进追击。

在此紧急关头，忽听南面炮响，大队辽军喊杀而至。耶律沙定睛一看，知道是耶律休哥率领援军赶到，不由得喜出望外。原来耶律休哥受命之后，率军自虎北口而入，绕道西山，日夜兼程而进，从近道席卷北上，出人意料地抄了宋军的后路。

宋军发现腹背受敌，阵势一阵大乱。宋太宗大惊之下，急命宋军加紧前突，



宋灭北汉之战要图

想尽快杀败耶律沙，免受辽军两面夹击之苦。正在此时，北面喊杀声大震，又有一队辽军加入战斗，原来是集结在清沙河北的耶律斜轸军得到战报后，突破宋军封锁而来。耶律斜轸率军与耶律沙会合一处，配合耶律休哥军形成左右两翼，奋力击杀宋军。

两支生力军的参战，使战场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宋军由攻击转为防守，辽军则两翼配合，开始进行猛烈的反击。宋军将士由于长期连续作战，本已十分疲惫，斗志涣散，这时又被辽军左右夹击，顿时弄得晕头转向，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耶律休哥见宋军阵势大乱，带领一队骑兵杀入宋军阵中，左冲右突，直杀得宋军丢盔弃甲，四处奔逃。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幽州城内的守将耶律学古闻听援兵杀到，就打开城门，命令士兵燃起火把，列队鸣鼓助战。城内居民也乘势呐喊助威，呼声震天。战斗中的宋军将士看到远处火光闪烁，鼓声、喊杀声大作，慌乱中以为又到了一支辽军援兵，士气顷刻便被瓦解，再也无心恋战。许多士兵不听将领指挥，自顾自四散逃命而去。紧跟着宋军将士争相奔逃，宋军顿时全线崩溃。宋太宗在乱军中想稳住局面，制止颓势，周围却找不到一个部将，太宗势孤力单，也无从指挥。这时辽军从后面掩杀过来，宋太宗忽觉腿上疼痛，用手一摸，发现已中了两箭，鲜血直流。他骑不上马，仓皇中找了一辆驴车坐上，在随从的护卫下加鞭疾走，向南逃命去了。

宋太宗一直逃到金台驿，遇着殿前都虞候崔翰带领一部人马赶到，即命崔翰前去整饬败军，部队这才稳定住。崔翰护卫着宋太宗率领前卫部队南撤，十一日退至定州（今河北定县）。宋太宗令崔翰及定武节度使孟玄喆等留屯定州，彰德节度使李汉琼屯守镇州，河阳节度使崔彦进屯守关南（北宋时称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以南地区为关南），并授予他们便宜行事的权力，防备辽军袭击。

耶律休哥在激战中身上三处负伤，不能骑马，就乘一辆轻车率军沿路追击宋军，一直追到涿州，见无法追上，只好下令回师。沿途宋军遗弃的大量兵器、粮草，悉为辽军所获。

宋太宗在顺利灭亡北汉的情况下，收复失地心切，不顾师疲兵散，不了解辽军虚实而贸然用兵，远程急进，单向突破，围城之后又缺乏打援部署，求胜心切，欲速而不达，终使收复幽云十六州的梦想变成了泡影。

高梁河战役后，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再次对幽云地区用兵，结果遭到同样的失败，从而彻底断绝了宋朝收复幽云十六州的希望。

【澶渊之战】

宋太宗两度进军幽州失败后，完全丧失了继续对辽用兵的勇气。他曾对大臣发表议论道："国家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是边事，可以预先防备。只是奸邪难以觉察，若为内患，深为可怕。帝王当用心于此。"太宗按"内外相制"的原则，在京城周围屯驻数十万甲兵，以防"内患"；而在边境对辽则实行消极防御。这便是"守内虚外"政策。

太宗死后，继位的宋真宗继续推行"守内虚外"的政策，对辽完全采取守

势。辽统治者看到宋朝在边境上的力量日渐削弱，遂加强了对宋的军事攻势。

宋咸平二年（999年）至咸平六年（1003年）间，辽对宋发动了三次较大规模的试探性进攻。宋军将领在战斗中表现出的无能，使辽认为宋软弱可欺。于是，辽统治者决定对宋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入侵行动。

辽统和二十二年（宋景德元年，1004年）闰九月，辽朝萧太后、辽圣宗亲率二十万大军南下，越过许多州县，直向黄河挺进，大有兵临开封之势。

告急文书雪片似的飞向京城，宋朝举国上下为之震骇。宋真宗慌忙召集群臣，商量对策。

参知政事王钦若和佥署枢密院事陈尧叟都主张迁都逃跑。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陈尧叟是四川人，主张直去成都。真宗左右为难，就召见新任宰相寇准，征求他的意见。

寇准是坚决的主战派。他看了看两边的王钦若和陈尧叟，心中便有了数，严厉地说："谁主张迁都逃跑？应该先斩了这些人，然后北伐。"他分析道，真宗御驾亲征是上策；若出奇兵骚扰辽军，宋军坚守，使辽军长期不得进展而疲劳涣散，也是获胜之策。但如果弃都南下，跑到江南、川蜀去，必会使人心溃散，敌人长驱直入，宋朝的江山恐怕就难保了。

宋真宗虽惧怕同辽作战，但听到寇准言明利害关系，也不得不思考再三，最终接受了寇准的建议，放弃了弃都南下的主张。

十一月，宋真宗终于鼓起勇气，决定率军亲征，向河北进发，由寇准随同指挥。

适值初冬，天气严寒，朔风凛冽。有部下给真宗拿出锦帽貂裘，真宗以与将士同受苦寒为由加以拒绝。宋军将士闻知后都非常感动，顿时勇气倍增，士气大涨。

但在宋军大队人马到达韦城（今河南滑县东南）时，又有人趁寇准不在，向真宗建议暂时退兵，往幸金陵。真宗本来就不很坚决，经这么一劝，又看到强敌就在附近，不禁又想退却了。寇准得知这个情况后，激动地对宋真宗说："主张南逃的人如此懦弱无知，陛下怎能受他们左右呢？如今敌兵迫近，人心惶惶。陛下只能进一尺，不能退一寸了。河北的军队日夜盼望圣驾到来，士气会因此百倍增长；如果回辇数步，则令万众失望，军心势必瓦解。敌人乘势进攻，到那时恐怕想要到金陵都不可得而至了。"

寇准苦口婆心，还是未能使宋真宗去掉畏敌情绪。真宗沉吟片刻，答道："卿所言亦是，容朕细思！"寇准看到真宗推委搪塞，只得怏怏而出。

寇准出了行宫正好碰到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就对他问道："太尉受国厚恩，今天何以报国？"高琼毫不含糊地回答："我本一介武夫，情愿以一死报国。"

寇准上前拉住高琼的手，又带他一同返身入见宋真宗。寇准重申只能进不可退的主张，厉声说道："陛下若不信我的话，请问问高琼便是了。"

高琼随即下跪，说："宰相说得对。随军将士的家眷都在汴京，必不肯弃京南行，愿陛下速幸澶州（今河南濮阳），有臣等拼死力战，辽军并不难破。"

在寇准、高琼和将士的敦促下，宋真宗才下令离开韦城，向澶州进发。

澶州跨河分为南、北二城。十一月二十四日，辽兵抵达澶州北城，对澶州形成三面围攻。辽军先锋统军萧挞览带领数骑视察地形，不料中了宋军的伏弩，伤重死去。辽军先锋一死，士气顿受大挫。萧太后只得下令稍向后退，解除了对澶州的包围。

二十六日，宋真宗率军到达澶州南城。此时辽将萧挞览阵亡、辽军后撤的消息还没有传过来，在要不要请真宗过河的问题上，群臣又发生争执。许多人认为辽军势盛，宋真宗不能过河；寇准与高琼等人则坚持要求宋真宗过河，以安定人心，鼓舞前线将士的士气。

高琼恳切地对真宗说："陛下若不过河，河北百姓人心益危，哪儿还有取胜之机呢?"

站在一旁的金署枢密院事冯拯闻听后，斥责高琼说话不顾分寸，想给高琼浇浇冷水，同时讨宋真宗的欢心。高琼转身愤慨地对冯拯说："你以文赋升到两府高位，今天到了这种情势还指责我高琼无礼。那你为何不赋诗一首来退敌呢?"一席话把冯拯说得面红耳赤，哑口无言。

高琼不等宋真宗表态，就指挥卫士推动真宗的辇车，继续前行。不多时，车驾到了河岸边，对面便是连接澶州南、北两城的浮桥。宋真宗又犹豫起来，叫把车子停下。高琼见此情景，急忙过来用木条抽打车夫的背，说："还不快快走！今天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可犹豫的!"硬让把真宗的辇车推上了浮桥。宋真宗无可奈何，只好下令起驾过河。

宋真宗虽然勉强过得河来，但他的到来却给了守城将士们一个莫大的鼓舞。他们一见皇帝亲临督战，顿时士气高涨，欢声雷动。"万岁"呼声响彻数十里。不少人喜极而泣，纷纷决心为守城誓死力战。

士气低落的辽兵，听到宋真宗亲临前线的消息后，军心更加动摇。在这种情况下，萧太后明白，要想在澶州城下打败宋军是不可能的了。她又顾虑辽军此次南下乃孤军深入，沿途许多州县由宋军把守，后路随时有被切断的危险，因此不愿在澶州与宋军相持太久，遂决定同宋朝议和。她以左飞龙使韩杞为代表与宋谈判，并非常策略地提出要宋朝"归还"关南之地，作为议和的条件。

宋真宗听说辽朝提出议和，正中下怀。他本来就没有与辽作战的信心，在离开汴京前就派了殿直曹利用为阁门祇侯，假崇仪副使北上同辽朝进行调解斡旋。但听说辽提出"归地"，宋真宗不禁面露难色，说："这是祖宗留下来的基业，我怎么能够丢掉呢？如果每年给些金帛，解决解决困难，好在我们家大业大，倒也无妨。"

正在双方使臣往来、讨价还价之际，天上忽然发生日食，宋真宗大为惊恐。司天官员连忙向他解释说，日食并非凶兆，主两国和解，他这才惧色稍释。

萧太后、辽圣宗对于得不到关南之地，作出一副十分为难的样子，称"若不遂所图，则本国负愧多矣"，但"南北通和，实为美事"，为了两国的共同利益，宋朝必须立誓，不在缘边开移河道，广浚壕堑，对辽采取军事行动，在辽退兵之时，不得袭其归师，并需岁赂金帛以助军旅。

曹利用从辽营归来，告知宋真宗辽朝议和的条件改为索要金帛财货。宋真

宗听了如释重负，说："汉代曾有赠玉帛与匈奴修好的先例。朕亦应效法前人，为社稷着想，输些财货在所不惜。"

宋真宗又召寇准商议，寇准上奏说："陛下若要为长久考虑，就要借此机会使辽向大宋称臣，及献还幽、燕等地。这样才能确保百年无事。否则数年后，他心必生，辽人又要来扰境了。"宋真宗听后颇为不快，说："如卿所言，那这仗非打不可了？但你能料定谁胜谁负么？就算我们胜了，也须伤亡若干兵民，朕实在于心不忍。况且数十年后，自然会有能御辽的人。眼下答应与辽讲和，总能使边境如故，不妨就此了事了吧。"不等寇准答话，便又吩咐曹利用说："如若迫不得已，就是每年百万财货，也可以答应。"

寇准见宋真宗执意议和，也没有了办法，但他又不甘心让辽朝得到太多的利益，就私下里对曹利用说："虽有敕旨，但你答应的数目若超过三十万，回来我定要你的脑袋！"曹利用吓得直伸舌头，连连称是。

曹利用到了辽营，又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定下来宋朝每年给辽朝银绢三十万。

曹利用回澶州向真宗复命，真宗正在用餐，急于知道谈判的结果，就叫太监出来向曹利用问明情况。曹利用认为这是机密大事，不便明说。真宗再次派人问他："你先说个大概数目。"曹利用伸出三个指头，做了个手势。

太监回禀宋真宗，真宗以为曹利用答应的数目是三百万，不禁有些心痛。但是转念一想，三百万能换来边境无事，也就宽下心来。

宋真宗吃完饭，便召见曹利用详细汇报情况。当他最终弄明白赔款数目是三十万时，喜不自禁，认为讨了个大便宜，直夸曹利用能干，会办事。

是年十二月，宋、辽双方正式达成和议：宋、辽结为兄弟之国，辽圣宗称宋真宗为兄；宋朝每年向辽交纳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称作"岁币"。因澶州郡名澶渊，所以历史上把澶州城下达成的这个休战协议，叫作"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订立后，辽军得以从险境中脱身，而且还得到了战场上本来得不到的东西。宋朝却在军事上占有优势的情况下，由于宋真宗的坚持，委身求和，不败而败。宋朝统治者推行"守内虚外"的政策，最终推出了"澶渊之盟"这么个结果。

【富平之战】

陕西是宋朝的战略要地。

建炎三年（1129 年）五月的一天，曾在平定"苗刘之变"（是年三月，武将苗傅、刘正彦等在临安发动兵变，逼宋高宗传位于年仅三岁的幼子旉，改建炎三年为明受元年，请隆裕太后孟氏听政，文臣吕颐浩、张浚及武将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起兵，杀苗、刘等人，复高宗帝位一事，史称"苗刘之变"或"明受之变"）中立功的张浚向宋高宗建议说："汉中前控六路之师，后据西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守可屏障川蜀，攻可取河南、河东，实乃天下形势之地。号令中原，必基于此。"他自告奋勇，表示愿去承担固守陕西的军事重任。宋高宗出于维持统治的需要，便任命张浚为川陕、京西、两湖宣抚处置使，并且亲作诏赐之，授给

他“便宜黜陟”的大权，可以不经朝廷同意，而自行选用或罢免行政官员和军事将领。

十月张浚到达兴元（今陕西汉中东）后，即着手调整部署，加强防务。他把宣抚使司组织成一个很庞大的班子，并将熙州（今甘肃临洮）、秦州（今甘肃天水）等诸路大臣，均改为武将，一心想对金人采取主动攻势。

第二年（1130年）夏天，兀术自黄天荡渡江北退后，仍停留在两淮地区，并扬言秋后再次大举伐宋。从温州刚回到越州不久的宋高宗对此深感忧虑，于是就派人要张浚在陕西发动攻势，出袭金军后方，牵制金朝兵力，以缓解东南危局。

张浚早就想出师关中，转守为攻了。在接到宋高宗的命令后，他立即调集熙河经略使刘锡、秦凤经略使孙偓、泾原经略使刘锜、权永兴军经略使吴玠、环庆经略使赵哲等五路兵马，打算分道由同州（今陕西大荔）、鄜（今陕西富县）、延（今陕西延安）出击，“以捣其虚”，收复关陇。

张浚的攻击计划一出台，宣抚使司中就有人曲意迎合说：“只要五路兵马全部到来，金兵就能一扫而光了。”宣抚司干办公事郭奕听后，应声问道：“这‘一扫’，不知是怎么个扫法？是用笤帚扫，还是扫帚扫？”话一出口，满座为之惊愕。都统制、威武大将军曲端接着站出来发表看法：“平原旷野作战，有利于金人骑兵驰突，我们难与之争锋。不如精练士卒，按兵据险，待金人粮尽兵疲，而后伺隙出击。”八字军名将王彦也分析说：“陕西各路兵将，上下情况未通，如若出师不利，则五路俱失。不如分路守险，以固根本，敌人来犯则互相应援，纵不能得胜，也不致大败。”谋臣参军事刘子羽这时也乘机力争，认为不宜对金用兵。张浚听后，不耐烦地回答说：“这些难道我不知道吗？但考虑到现在东南局势危急，不得不如此呀！”

张浚力排众议，把陕西诸路的人力物力都集中在耀州的富平县：步兵四十万，骑兵七万，金银布帛和粮草，堆积如山。诸路乡民运送粮草辎重的，络绎于道，源源不断。张浚命人把这些物资堆积在军营附近，用马车栏栅围起，构筑成一座座便于守卫的堡寨。随后张浚任命刘锡为统帅，负责前线指挥，自己也亲往邠州（今陕西彬县）督战。张浚到富平前线视察时，看到宋军兵马强壮，军需富实，不无得意地说：“看来这场仗打起来以后，就可以一直打到幽云去了。”

这时，金军右副元帅完颜宗辅已从蒲坂（今山西永济西）渡过黄河，兀术奉命由洛阳西进，经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潼关与宗辅军会师于下邦（今陕西渭南北），而负责关陇军务的娄室军，却还停留在陕北绥德。宋军将领中有人主张乘此机会向金军发动进攻，张浚却认为此战有十足把握取胜，不同意实施袭击，乃决定致书金军，约期会战。张浚派人几次投书，不料都没有回音，宋军将士便认定金军胆怯畏战，更不把金军放在眼中。有人甚至建议送些妇女妆饰给宗辅、兀术，以羞辱他们没有男子气。

金军帐中，宗辅一面故意避战拖延时间，一面急遣娄室军向富平方向运动。娄室得报后星夜进军，不久抵达富平附

近，与宗辅、兀术军会合。

娄室到达后，带着数十骑登山察看宋营阵势。他看到宋军人数虽多，但壁垒不固，防御不严，认为宋营易于攻破。不过，娄室仍建议宗辅继续避战示怯，以助长宋军骄傲轻敌情绪；同时加紧制订作战方案，准备打宋军一个措手不及。

金军避战多日，前线总指挥刘锡已耐不住性子，就召集众将商议进兵事宜。吴阶首先提出自己的见解："平原作战，地势于我不利。我军宜占据高地，使敌骑冲突，我们居高临下，足以抵御。"郭浩接着发言说："金兵势盛，未可争锋。我们当分地守御，待其疲敝后再作攻击。"将领们大都不同意他们二人的主张，当即有人驳斥说："我军数倍于敌，且阵前阻有苇泽，敌人有骑不得施，哪里用得着移营他处呢?"刘锡倾向于多数人的意见，决定立即着手准备向金军发动攻击。

正当宋军准备进击而尚未部署停当的时候，金军却于九月二十四日先行发起了攻击。宗辅派娄室率右翼军，兀术率左翼军，分路向宋营挺进。娄室选拔了三千名精骑，每人携带一个土袋和一捆柴草，由骁将折合率领着来到苇泽地边。折合命令金兵把土袋和柴草投到苇塘中，然后骑上马踏平。不大工夫，宋军赖以阻止金军骑兵的天然屏障就成了金兵的一条通途。

娄室大军藉淖而进，径直冲向宋营周围的乡民堡寨。乡民们看到金兵气势汹汹而来，惊恐万分，纷纷丢下粮食物资逃向宋营。许多人边跑边喊："金兵打过来了!"顿时引起了宋军的一片混乱。

刘锡等人做梦也没有想到，金军会率先发动攻击。仓猝间各自召集士卒，慌忙进行抵御。刘锜首先带领人马冲进敌阵，与娄室军战在了一处。紧接着，其他各路人马也先后加入战成一团。

这真是一场激烈的大鏖战。只听双方战鼓不停地敲，两边的喊杀声也一阵比一阵高，但见宋、金将士驭马驰突，血刃肉搏，人都成了血人，马也成了血马。刘锜率部奋勇力战，斩杀金军兵将无数，自己的人马也折损了不少，但毕竟挡住了娄室右翼军的攻势。双方从早上一直激战到午后，胜负未分。

战场另一边的形势却大不一样。兀术率左翼军突入宋营后，即陷入了宋军的重重包围中。主帅刘锡手挥令旗，调动宋军四面合击，把兀术军压迫得苦不堪言。兀术派大将韩常率一支精骑突围，韩常等人连冲数次，都被密如飞蝗的利箭挡了回来。兀术眼见金军伤亡人数越来越多，宋军的包围圈越收越小，心想如此打下去，有被全歼的危险，于是再次对韩常下令说："此次若再突不出去，就不要活着回来见我!"韩常振作精神，再度领兵杀向宋阵。

突然，一支流矢飞射过来，正中韩常左眼。韩常又惊又痛又怒，抓住箭杆，用力一拔，竟活生生地把眼珠带了出来，鲜血登时喷涌而出，染红了半边面颊。韩常忍着疼痛甩掉箭杆，从地上抓起一把沙土，堵在伤眼上，大吼一声，跃马继续奋勇前冲。许多宋兵都被眼前这个金军骁将的勇敢举动震呆了，还没等回过神来，就已被韩常等人冲到近前，枪挑斧劈，结果了性命。韩常像一头暴怒的狮子，策马在宋军阵中左冲右突，舍命拼杀。宋兵慑于他的勇猛，都不敢上到近前。韩常乘势率军杀开一条血路，

兀术领着大军紧随其后，终于冲出了重围。

这时，娄室见刘锜斗志顽强，料难取胜，便率军转攻环庆军。途中恰遇兀术率部突围而来，于是金军左、右两翼合为一路，集中力量向环庆赵哲部杀去。

赵哲素来畏金人如虎，是个贪生怕死之辈。在得知金军将要来进攻自己的阵地后，他更是怕得要命。赵哲一面命令将士做好战斗准备，一面暗自盘算着如何逃走。不多时，娄室、兀术率军杀到，即刻与赵哲军战在一处。赵哲部众平时纪律涣散，疏于操练，战斗力远不及其他各路宋军，此时在斗志旺盛的金军强大攻势下，渐渐抵挡不住，开始向后退却。赵哲见势不妙，心想还是保命要紧，便勒转马头，加鞭疾走，撇下部队溜之大吉了。

正在激战的赵哲部将校望见远处尘起，才发现他们的主帅已策马先逃了，于是再也无心恋战，跟着掉转马头逃命而去。宋军士卒见长官临阵脱逃，军心顿时瓦解，许多人连兵器都扔下不要了，抱头四处逃窜。金军乘势发动全线冲锋，将士们争相上前立功，像赶鸭子似的追着宋军掩杀过来。

一发牵而动全身。赵哲部的溃败引起了其他各路宋军的恐慌，他们闻听金兵杀声大至，也纷纷在败退而来的宋兵卷拥下，如潮水般向后退去。刘锡、吴阶、刘锜等将领在人潮中奋力制止宋军后退，却无人再肯听命，全军已完全陷入混乱失控的状态中。娄室、兀术率金军一路追击，斩杀宋兵无数，宋军丢弃的大批粮草、盔甲兵器和堆积如山的金银布帛，也都成了金人的战利品。

宋军败逃数百里，直到邻州才被刘锡等人收拢。在邻州督战的张浚没想到宋军会败到如此地步，在查明情况后，便立即大会诸将，宣布把临阵脱逃的赵哲等人斩首示众，并贬责了前线统帅刘锡。随后张浚命令各路宋军回到本路屯驻，自己也从邠州撤往秦州。

金军乘富平大捷之势又连续攻下邠州、泾州（今甘肃泾川北）、渭州（今甘肃陇西东南），再败宋军于瓦亭（今宁夏固原南），翻越六盘山，攻取德顺军（今宁夏隆德），对秦州形成包围之势。张浚不得已放弃秦州，退往兴州（今陕西略阳）。不久，又退到阆州（今四川阆中），至此再也不提收复关陇的计划了。

富平之战是宋军首次以大兵团主动出击的大会战。从战略意义上讲，这次会战打乱了金军的战略部署，的确达到了牵制金朝兵力、缓解东南危局的目标，但南宋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关陕之地从此沦陷，终南宋之世，再也不可能收回了。

【和尚原之战】

富平之战虽以宋军惨败而告终，却给了南宋朝廷以稍得喘息的机会。同时，南侵的失利也使金朝统治者认识到，全线用兵得不偿失，也不可能达到并吞整个中国的目的。于是金朝调整战略方针，在东南取守势，而在西北取攻势，把主要军事力量集中在陕西一线，准备自秦陇攻入四川，控制长江上游，扼住临安南宋朝廷的咽喉而制其于死命。

于是，宋金战争的焦点，便转到了川陕边界的一角。

自建炎四年秋到绍兴四年秋（1130

~1134年）的整整四年中，围绕蜀口的争夺，宋、金间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战役。

绍兴元年（1131年）五月，战役首先在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打响。

和尚原为蜀口的前哨据点，是入川的必经通道。当时有人曾对和尚原的战略地位作过这样的评价："和尚原最为要冲，自原以南，则入川路散；失此原，是无蜀也。"和尚原的战略地位如此重要，不可避免地成为兵家必争之地。金人为了打开入川的门户，便把进攻的矛头首先直指和尚原。

这时，陕西六路都已被金军攻破，只有阶、成、岷、凤、洮五郡和凤翔境内的和尚原、陇州境内的方山原两个军事据点，还保持在宋军手里。在这些据点中，和尚原处于抗敌最前冲。

此时把守和尚原的，正是忠州防御使、秦凤经略使吴玠。

吴玠自富平战败后，收编散兵，从大散关来到和尚原。他对战场态势作了分析之后，认识到和尚原的战略地位和价值，便决心在此死守，阻止金军入川。

吴玠组织军队囤粮积粟，修缮兵器，在原下列栅固垒，为死守和尚原做准备。有些部下看到自己势孤力单，认为死守和尚原，挡不住人多势众的金军，便劝吴玠退守汉中，扼蜀口，以安人心。吴玠慨然道："我保和尚原，敌人就决不敢越我而进，坚壁临之，他们就怕我们偷袭其后，保此地就是保蜀呀！"将士们经他一番劝导，军心渐渐安定下来。

昔日吴玠在凤翔时，注意体察民情，了解民间疾苦，为凤翔人民做了不少实事，因此在凤翔口碑颇佳。如今吴玠退守和尚原，凤翔百姓得知后，感念他往日的恩惠，相与在夜里向原上运送刍粟。吴玠得到百姓的支持，心里非常感激，就回送金银和布帛作为报偿。百姓们看到吴玠如此公道，奔走相告，于是往原上运送粮食的人越来越多。金军发现这个情况后，就在渭水伏兵，杀了不少运粮的平民。并下令保伍连坐，不准百姓送粮给宋军。但人们仍是冒禁如故。凤翔百姓的支持，使吴玠守军的后勤给养日渐充实。

绍兴元年五月，吴玠接到前线侦骑来报，金将没立从凤翔，乌鲁、折合从阶、成两路进兵来犯，准备在和尚原会师。吴玠随即搜集兵甲，预备出师。

不久前哨又有飞骑来报，乌鲁、折合已率军到达北山。吴玠闻讯后不慌不忙，分军为前后两队，径逼北山，迎击金军。

金军沿山列阵，乌鲁、折合见宋军逼近，便麾众出战。吴玠一马当先，遇到一金将，几回合后，手起刀落，把敌将砍落马下。宋军士气顿时为之大振。吴玠号令前队冲杀，与金兵鏖战在一处。时至中午，吴玠便令前队回军休息，把后队抽出，与敌再斗。金兵此时已经打得疲惫不堪，怎能禁得住一支生力军？宋军后队士气高昂，杀得金军抵挡不住，渐渐后退。吴玠见时机已到，便又把前队投入战斗，督兵进逼，全线压上。乌鲁、折合看到难以抵挡宋军攻势，就仓忙回马奔驰。主将一逃，金军顿时乱作一团，争相跟着逃命。吴玠率军追杀数里，杀死杀伤金兵大半。

此时吴玠得到没立开始攻箭筈关的消息，就派遣将领杨政率部前往迎击。没立在箭筈关同样遭到了失败。金军会师和尚原的计划成为泡影。

这一仗的胜利，大大提高了宋军的士气，使富平一战以来宋军低迷惧战的情绪一扫而光。但同时也惹得女真统治者大为恼怒，一场更大的进攻在等待着吴玠和他的将士们。

没立和乌鲁、折合领着残兵败将回营后，急忙把战况报知元帅兀术。兀术听后大怒，叫嚷着一定要攻下和尚原，捉取吴玠。于是兀术决定亲自出马，绍兴元年十月，他会集诸将及兵卒十余万，在渭水上筑起浮梁，陆续渡兵，进抵宝鸡。从宝鸡县起，结连珠营，垒石为城，夹涧与吴玠军相拒。

这时已被任命为明州观察使、陕西诸路都统制的吴玠，得知兀术率大队人马来犯，深怕引起部下的恐慌，动摇军心，就决定召集将士，用忠义来勉励他们。

吴玠把金兵再次进攻的消息告诉大家，然后拉住已擢任秦凤路兵马都钤辖的弟弟吴璘的手，对他说："今天是我兄弟报国的日子，万一兵败，宁可我兄弟先死，决不使将士先亡。"吴璘奋然应诺。吴玠抬起左臂，捋起袖子，用力把手臂咬破，凛然对将士道："苍天有眼，看我誓死守卫和尚原。"在场的将士无不被感动得热泪横流，心里已决心誓死守原，见主将发誓，也都齐声道："主将兄弟报国，我等亦愿报主将。"

吴玠见将士群情激奋，心中不由大喜，急忙吩咐吴璘挑选强弓劲弩，配发给每一位将士；然后把宋军分成数队，由吴璘等将领带队，分守各个阵地。

和尚原下，兀术也在加紧调兵遣将。围绕制订攻原战法的问题，金军将领产生了意见分歧。一些有见地的将领向兀术提出，和尚原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如要强攻，损失必定惨重，不如正面佯攻，同时，另派奇兵从侧翼偷袭。另一部分将领则认为，我军势众，不必采取偷袭战术，应分兵攻原，各个击破，攻取和尚原当不成问题。兀术此次挟十余万人马来攻和尚原，有势在必得之意，觉得金、宋两军众寡悬殊，怎用得上偷袭战术？他没有采纳正面佯攻、侧面进击的建议，而令大军围住和尚原，从四面八方向宋军发起了猛烈攻击。

吴玠闻报兀术率军攻原，就对众将士说："报国的时刻到了，生死成败在此一战！"他命令各队官兵备好箭矢，搭箭上弓，排成数行，轮番上前迭射。将士们称此为"驻队矢"，决心用强弓劲弩来给金兵以颜色看看。

金兵潮水般自原下攻来。吴玠一声令下，利箭率先出手。紧接着一排排利箭如雨注般射向金兵，中箭倒下者不计其数。

宋军一队射击完毕，后面备好了箭的一队紧接上去，下来的士卒又迅速引箭上弦，准备下一轮射击。如此分番迭射连发不绝。宋军斗志高昂，居高临下，射出的箭力道极强，有的竟射穿了金军的盾牌。密密的箭阵有效地压制住了金军的攻势。

兀术见金军伤亡惨重，下令暂缓攻击，向后撤退稍作休整。

紧张局势暂时得到缓解，守原将士都松了一口气。吴玠对大家说："我们的弓箭虽挡住了敌人的进攻，但毕竟是权宜之计。金人再来攻，我们的箭射完了又当如何？若想取胜金人，须易守为攻，把战场的主动权抓在我们手中。"众将纷纷问吴玠有何良策，吴玠不慌不忙地说："敌人远道袭来，粮草最为重

要，我们只须出奇兵断其粮道，金人方寸必定大乱。”众将都赞成吴玠的这一主张。

于是吴玠分遣诸将，从间道绕出，切断了金军粮道。吴玠料想金军粮道被切，后勤保障跟不上，十余万人马必定困顿不堪而不得不撤军。这样一来，和尚原的危局就扭转过来了。但吴玠又岂能满足于金军撤兵？富平兵败这口恶气他早就想出了，他现在需要的是一次更大的胜利。他要给金人以痛击，杀一杀兀术的气焰；他要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以断绝金军对四川的觊觎之心。

吴玠料到金军撤退必定经过神坌沟，此处地势险要，正适合预设伏兵。一个歼敌神坌沟的计划在吴玠心中暗暗生成。

吴玠派吴璘带领三千弓弩手，埋伏在神坌沟两侧的高地上，静待金军到来。随着夜幕的降临，吴玠领着一队人马，乘着夜色向金军营帐杀去。金军粮道被断，已再无斗志，此时正准备撤军，怎能挡得住宋军的一阵冲杀？不多时，就接连被宋军攻破了十余座营帐。兀术在中军帐闻知宋军来袭，亦无心恋战，命令大军且战且退。

兀术仓皇败走，奔着神坌沟而来。金军进入沟内，忽听一声炮响，霎时箭如飞蝗，许多金兵中箭而亡。惨呼声从沟底传出，响彻夜空。许多金军官兵见势不妙，纷纷扔掉火把，四散逃命，金军顿时乱作一团，相互践踏，死伤者又有无数。兀术身上也中了两箭，此时已无力控制局面，只得抱头前窜，边跑边听到两边传来“兀术休走”的呼叫声，兀术心中愈加发慌。此时天色未亮，辨不清方向，兀术恐怕被宋军认出，仓猝间把须髯割去，骑马飞逃而出。留在沟内的金军，则大部分被歼灭，尸体堆积谷底，绵延二十余里。

和尚原之战后，兀术带着箭伤，领着残兵败将回归燕山。这一战对于金军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兀术之众，自此不振”。

此后围绕争夺蜀口，金军虽在饶风关（今陕西石泉西）打败过吴玠，占领了宋军自动放弃的和尚原，却在仙人关（今甘肃徽县南）遭到吴玠更为沉重的打击，始终未能越过蜀口一步。当地人民积极支援宋军，吴玠乘胜又收复了凤州、陇州、秦州。南宋的川陕防务日趋巩固，金军不得不暂时放弃进入四川的企图，对南宋的重点进攻遭到了彻底失败。

兀术入侵江南失利后，金对宋战争策略的变化；张浚组织富平会战失利后，关中之地的丧失；以及金军争夺蜀口的失败，这一系列事件使得宋、金双方出现了一条沿秦岭至淮河的比较稳定的战线。此后宋金战争尽管持续进行了多年，但始终没有能改变这一格局。宋金战争自此出现了相持的局面。

【仙人关之战】

1134年（绍兴四年）3月，吴玠率兵于仙人关大败金兵。

1133年，和尚原失守，吴玠料金兵必乘势南下，而该地离蜀较远，万一粮道不继，难以持久。遂在仙人关右侧修筑山寨，称为“杀金坪”。派兵驻守严阵以待。2月，完颜宗弼、撒离合又协同齐国的刘夔率10万骑兵从宝鸡入侵仙人关，设寨40余座，与南宋对垒。吴玠军万人在杀金坪抵御。吴玠领兵由七方



陕西宝鸡西南大散关，宋将吴玠曾在此取得南宋抗金的首次大捷

关急援，转战七昼夜，与吴玠合兵。3月，金兵进攻关隘，身披重铠，用铁钩相连，鱼贯而上。宋军用神臂硬弓，奋力劲射，又发飞炮捍卫。吴玠督军死战，矢下如雨。金兵死尸层层堆积。撤离合火攻，又被宋统领姚仲设法扑灭。吴玠派统制杨政、统领田晟率军出击，战场上火炬照亮了群山，战鼓声震天动地。金军攻下“杀金坪”第一隘，宋军死守第二隘。吴玠乘金军兵锋受挫，又派统领王喜、王武率勇敢战士，分紫白两色旗帜夜袭金营，并在其退路设伏，宋军全力奋战，金军不支，连夜撤走，退守凤翔。此后，金军不敢窥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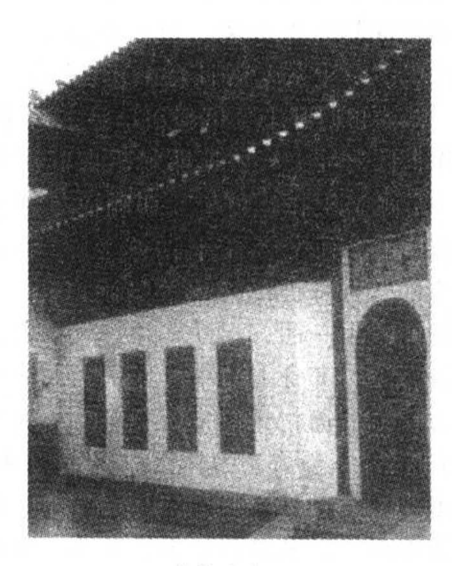
【黄天荡之战】

1130年（建炎四年）3月，浙西制置使韩世忠率军阻击金军于黄天荡，大胜。

2月，金军大肆掳掠后北撤。3月15日，金军撤至镇江。浙西制置使韩世忠率水军8000、战舰100余艘，进屯焦山、金山脚下，切断金军退路。韩世忠妻梁红玉亲自击鼓助阵。宋军士气大振。韩世忠发挥宋军舟师善于水战的优势，大败金兵。金兵不能渡江，便向韩世忠行贿，表示愿尽归所掠，赠予名马，韩世忠严词拒绝。金军沿长江南岸西下，世忠率舟师沿北岸堵截，将金军逼入死水港黄天荡（今江苏南京市东北），金军被堵截在黄天荡48天不得出，后来利



韩世忠像（左一）



妙高台遗址

用老鹳河故道造成一条连接江口的大渠，才得以逃往建康。韩世忠以8000人的队伍，打得号称10万的金军狼狈而逃，扭转了南宋一味逃窜的颓势，有很大的意义。

【郾城之战】

1140年（绍兴十年）7月，岳飞军大破金兵于郾城，取得郾城大捷。

1140年5月，金兵元帅完颜宗弼（兀术）背信弃义撕毁和约，分兵四路，大举进攻南宋。南宋朝廷命令岳飞率兵数万北上抗击金兵。在这之前，南宋军队已经进入河南中部，通过几战，先后占领了中原战略重地郾城、颖昌府（今河南许昌）、郑州等。与此同时，岳飞还命令梁兴等人北上强渡黄河，联合河北河东义军，通过游击的方式扰乱金军后方。

7月初，岳飞率部攻克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同时命令部队集结，准备伺机进攻开封，完颜宗弼乘岳飞兵力分散之机，亲率15000重甲精骑，奔袭郾城，企图一举摧毁岳家军的指挥中心。

7月8日，双方在郾城北对峙。

金军以“铁浮屠”居中，以号称“拐子军”的两翼骑兵居左右，列阵进攻。岳飞指挥儿子岳云等率骑兵应付，令将士手持刀斧，杀向敌阵，上砍敌人，下砍马足，以步刺骑。使金军的重甲骑兵和左右翼骑兵拐子军难以发挥所长。激战数日，金军死伤甚重，被迫撤退。杨再兴单骑闯入敌军，打算活捉宗弼，受伤数十处，杀死敌军数百人，又杀出敌阵。两军鏖战到天色将黑，金军败退。

14日，宗弼又率3万人马转攻颖昌，宋将王贵、岳云等守城与金军决战。宋军先以精骑从正面发起猛攻，随即以步兵与金军左右翼骑兵展开搏斗，大败金军。自晨至午，杀金统军使、上将军夏金吾（兀术之婿）以下将士5000余人，俘2000余人，获战马3000余匹。金兵再次大败，宗弼逃窜开封，不敢再战，感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顺昌之战】

1140年（绍兴十年）6月，刘锜率兵于顺昌大败金兵。

5月，金军背盟，分四路南下攻宋。完颜宗弼（兀术）率主力10余万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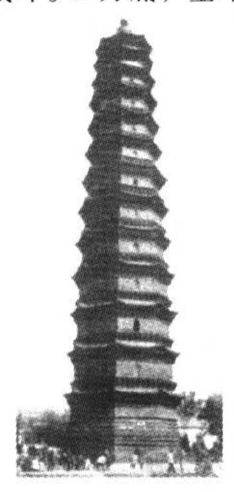


郾城大捷（壁画）



南宋刘松年《中兴四将图》(部分)岳飞像(右)

东京。南宋河南、陕西各地守臣多系议和之前的伪齐旧官，故闻知金军进犯，纷纷献城迎降。时新任东京副留守刘锜，率王彦旧部八字军自水路赴任，北上行至顺昌，闻金军毁约破东京，进入陈州，遂在知府陈规支持下，决心坚守顺昌，阻挡金军南下。刘锜下令把船只凿沉，八字军士气高昂，妇女们也磨刀擦枪准备战斗。5 月底，金军 3 万包围



六和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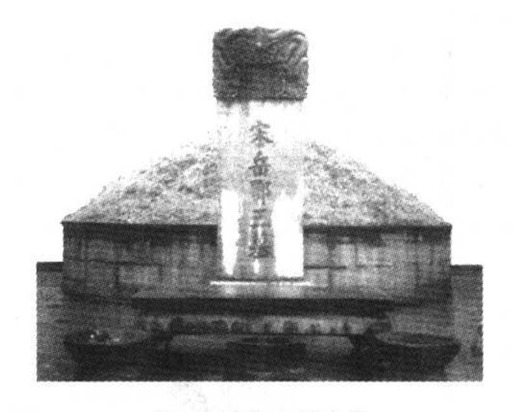
顺昌。刘锜令大开城门，金军疑惧，不敢轻进。宋军先用强弓硬弩射敌。接着步兵冲击，杀败金兵，金军退兵 20 里，夜间，浓云密布，闪电四起，刘锜命勇将阎充率 500 壮士夜袭金营，金兵败退 15 里。

6 月，宗弼率主力 10 余万进抵顺昌，向顺昌城东西两门发起猛攻，自率号称“铁浮屠”的 4000 重甲精骑兵往来为援，宋军以逸待劳，部队轮番休息，与金军相持到中午。金军昼夜兼程赶来，本已疲惫，加上天气炎热，人马又饥又渴，宋军早已在颍河上流和城外草丛撒下毒药，金人马食用水草后中毒。刘锜趁机发兵出击，直捣金中军，大败金军。

【柘皋之战】

1141 年（绍兴十一年）2 月，宋金柘皋交战，杨沂中、刘锜、王德等大败金军。

上月，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乘宋廷准备求和，两淮防御空虚之机，



杭州西湖边上岳飞墓

出兵攻占寿春（今安徽寿县）。2 月初，又占庐州（今安徽合肥）。赵构命诸将合兵淮西。淮西宣抚使张俊率军自采石渡江北上，进屯和州（今安徽和县）；韩世忠军自楚州，岳飞军自鄂州增援。

金军在刘锜、张俊、杨沂中 3 支宋军全力攻击下，撤至巢县（今安徽巢湖

市）西北柘皋镇，拆毁石梁河桥，将数万骑兵分为左右翼，夹道列阵、企图利用平川旷野的有利地形，发挥骑兵优势，与宋军决战。

刘锜、杨沂中及张俊军一部相继到柘皋，刘锜乘金军轻敌不备，率将士渡河向金军发起猛攻。张俊部将王贵率军直冲金军右翼，杨沂中率军从石梁河上游渡河，以一万人手持大斧奋勇截击金军两翼精骑。金军全线溃退，死伤万余人。战后，金军撤出庐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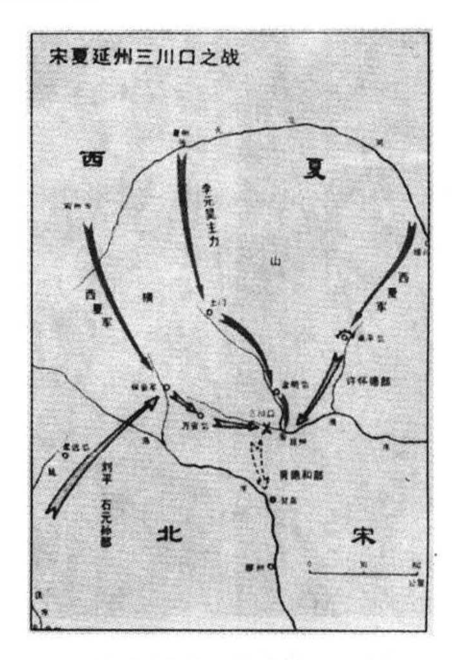
【定川之战】

1042 年（天授礼法延祚五年）夏景宗元昊采纳中书令张元的建议，在天都山集结左右厢兵 10 万，分东西两路夹攻镇戍军。宋朝知渭州王沿派泾源路副总管葛怀敏率兵应战，因葛怀敏轻敌深入，被夏兵包围在定川寨（今甘肃平凉北），夏兵切断宋兵的水源。黑夜，夏兵从四面放火攻城，宋军难以抵抗，葛怀敏领部众突围，经过长城壕时，被夏兵包围，葛怀敏和战将 14 人战死，近万名士兵和 400 多匹战马被夏兵俘获。

定川战役后，元昊率兵乘胜南下，直至渭州，攻破栏马和平泉两城，烧杀掠抢而去。

【三川口之战】

三川口之战是西夏建国初期，与宋朝进行的一次战役。夏景宗元昊称帝后，宋仁宗削去赐予元昊的官爵，并召募人捕杀元昊。1040 年，夏攻破宋朝金明寨，又以几万军队攻打延州，知州范雍急调驻庆州的鄜延、环庆副总管刘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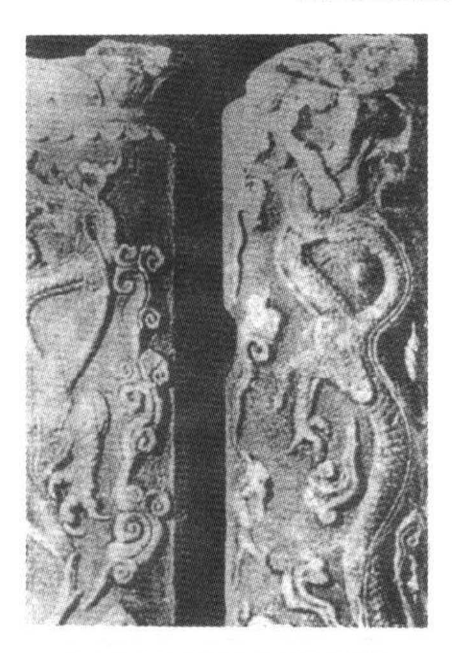


宋夏延州三川口之战示意图

副都督石元孙督精兵昼夜兼程赴援，到了三川口（今陕西志丹县南），宋军仓促应战，都监黄德和见西夏兵多势众，在阵后领兵逃走，宋军溃乱。刘平、石元孙领残兵退到西南山，设寨抵御。元昊派兵到寨前叫战，而元昊自己亲自领部分兵从后山攻入山寨，刘平、石元孙被擒，元昊大胜而归。

【好水川之战】

好水川之战是西夏建国之初同北宋进行的又一场战役。1041 年（天授礼法延祚四年）2 月，夏景宗元昊见延州不可取，即派兵攻打宋的渭州（今甘肃平凉）。进攻之前，元昊先派人到泾原请和，宋将韩琦告诫部下说："无故请和，必定有诈。"韩琦亲自巡边到高平（今甘肃平凉县北）。韩琦命任福率万人与夏作战。当夏兵在张家堡与宋军相遇时，元昊假装西逃，任福不知是计，遂率骑



宁夏银川西夏王陵区的雕龙栏柱

奋力而追，追至六盘山下的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北）时，人困马乏，只得安营扎寨。而元昊领10万精兵埋伏在好水川口，命人将100余只鸽子分装在一些泥盒子中，放在道路旁边。次日清早，任福等领兵沿好水川继续向西进军，快到羊牧隆城（今宁夏西吉县南）时，发现道路旁边的泥盒中有动静，急忙将盒子打开，不料从盒子中飞出10余只鸽子，盘旋在宋军的上空。西夏军看见鸽子飞旋的位置，从四面将宋军包围。夏景宗元昊站在山顶上，指挥作战。宋军不知所措。宋军的桑怿、刘肃、任怀亮等将领战死。任福身负10余箭。部下劝任福撤退，而任福说："我身为宋朝大将，军败，当以死报国。"率领士兵继续战斗，直至战死。只有1000余人突围出去。这次战役，宋军伤亡惨重，数十名大将阵亡，万余士兵死伤，宋仁宗十分震惊，并下令对韩琦、范仲淹贬官降职。

【麟府之战】

1041年（天授礼法延祚四年）7月，西夏军队又击攻北宋东路。原先归附宋朝的党项族乜罗部叛宋投夏，给夏军作向导，从宋军防守薄弱的后河川径渡屈野河（今陕西神木县窟野河），攻打麟州。麟州守将王凯率军与西夏军激战10余天，不能取胜。知并州高继宣领兵援救，被夏兵打败。后招募黥配厢军2000人，组成清远军与夏作战，清远军奋力死战，夏兵后退。元昊故意散布夏军死伤3万余人，失辎重数千，麻痹宋朝边吏。8月，元昊领兵再次越过屈野河，攻破宁远砦（今陕西府谷县西北），接着又破丰州城。9月回兵再攻麟、府二州，被宋巡检使张岊击败。10月，夏兵进屯琉璃堡。宋仁宗用张亢为并州和代州钤辖，与张张合兵防守麟、府二州。张亢领轻骑夜袭琉璃堡，夏兵死亡300余人，失牛、羊、马、驼万余，弃堡而



西夏陵墓的石刻

去。11月，元昊命令夏兵占据麟州与府州之间的建宁砦。张亢命张岊兵埋伏在山后，夏军误入宋军埋伏，惨败，全部退兵。

【夏辽之战】

1042年（天授礼法延祚五年）3

月，元昊请辽出兵攻宋，辽出兵到幽州却不前进，元昊甚为不满。翌年8月，西夏出兵帮助辽朝镇压了夹山部呆儿部族起义，而辽将所有掳获物据为已有，更激起了元昊对辽的怨恨。11月，元昊煽动辽统治下的山南党项各部及呆儿族叛辽附夏。1044年4月，辽朝山西五部节度使屈烈等率部投夏，辽责令归还，夏不答应。5月，辽派兵讨伐叛辽的党项族，元昊出兵救援，杀了辽招讨使萧普达等。辽兴宗大怒，从各地抽调10万大军，准备讨伐西夏。10月，辽分兵三路，对夏发起大规模进攻，在贺兰山北打败夏兵。元昊以缓兵之计，派人向辽谢罪，请辽退兵。北院枢密使萧惠说："夏人忘恩背盟，今天子亲临，大军并集，如若不将西夏一举征服，将来后悔莫及。"兴宗采纳了萧惠的意见，下令辽军向河曲（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境）进军。元昊退兵百里。每退30里，都将方圆几十里的田园烧尽。辽军所到之处，人马无所食，元昊发起反攻，将辽军大败于河曲，并俘虏萧胡睹等大臣数十人。这时，元昊又派人向辽请和，辽兴宗无力再战，遂与夏讲和。

【永乐城之战】

1082年（大安八年），宋神宗派遣给事中徐禧到鄜延与种谔协商，欲在夏、银、宥三州之间修筑永乐城。种谔说："其地依山无水源，不可修城。"神宗坚执不听，徐禧等役使兵丁用了14天即修成了永乐城，赐名"银川砦"。9月，梁令统军叶悖麻、咩讹埋六监军司30万大军进攻永乐城。徐禧等领兵回援，与夏兵战于永乐城下。叶悖麻先纵铁鹞骑军渡河，宋将领曲珍发现后，对徐禧说："这是西夏的锐兵，当它渡到一半的时候，去袭击它，可以战胜；如果让它到了平地，则无法阻挡了。"徐禧不听曲珍之言。西夏骑兵渡河以后，奋勇冲杀，势不可挡，大败宋军于永乐城下，围困永乐城，断绝水源。不几日，宋军士兵大半渴死。半夜夏兵猛攻，永乐城破，士卒、役夫死者20万，只有曲珍、李浦等坠城逃跑。此役宋朝共死亡兵将60余万人，损失钱、银、粟、绢数万。宋神宗得知永乐城的败讯后，临朝痛哭，只得与夏议和。

【采石之战】

"绍兴和议"的签订，使南宋获得了金朝对其偏安一隅的承认。在这以后的二十年时间里，金朝统治者集中力量巩固其在北方的统治，加之宫廷内部也不断发生相互残杀的争斗，无暇再发动对南宋的进攻。以宋高宗为首的南宋投降派以为，从此便可以安安稳稳地做太平梦了。

可是，好梦不长。绍兴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就把宋高宗一伙的和平幻梦给彻底搅破了。

完颜亮是金朝第四个皇帝。他在发动宫廷政变，弑杀金熙宗完颜亶，登上皇帝宝座后，实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杀掉大批奴隶主旧贵族，确立了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完颜亮野心勃勃，好大喜功，羡慕江南繁华，梦想一举灭宋，使"天下一家"，自己成为正统。

为了消灭南宋，完颜亮一面下令大规模调拨军队，制造战船，一面不断指责南宋招纳叛亡，盗买马匹，对和议履

行不诚，制造举兵的舆论。

就在完颜亮准备大举南进的时候，宋高宗与一帮佞臣还仍在过着“西湖歌舞几时休”的醉生梦死生活。对于完颜亮南侵的意图，南宋一些有识之士早就有所觉察。许多大臣上书高宗，力陈防备，但高宗均无动于衷，不少大臣反而因此获罪遭贬。

是年六月，完颜亮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此时他终于按捺不住野心，于八月间就迫不及待调动六十万大军，号称百万，分兵四路南下，大举侵宋。东路出寿春（今安徽凤台）渡淮河攻淮南，中路由蔡州（今河南汝南）出发攻襄阳及荆南，西路由凤翔出发向蜀口进军，取大散关。最后一路由海道直取临安（今浙江杭州）。完颜亮亲率东路大军，狂妄叫嚣：最多不过一百天，灭掉南宋，统一全国。

金兵南侵已迫在眉睫，宋高宗君臣才从和平幻梦中清醒过来，仓猝组织防务。此时当年名将岳飞、韩世忠等早已不在人世，刘锜、吴璘等也都老了，而且身患重病。宋高宗为了偏安而自毁长城，造成现在的局面，只能自吞苦果。不得已宋高宗起用尚在病中的老将刘锜，任命他为淮南、江南、浙西制置使，节制诸路军事，率军迎敌。

十月初，金兵逼近淮河北岸，形成两军隔河相峙的态势。担任淮西防务的都统制王权，是个贪财爱色、贪生怕死之辈。刘锜命他领兵迎战，他却赖在建康不走，刘锜再三督促，他才哭哭啼啼地和妻妾告别，临行前把家私细软装入官船，准备随时逃走。刘锜几次命他进驻寿春（在下蔡地入于金后，南宋以安丰为寿春府治，今安徽寿县西南），他都推委搪塞，后来实在没有法子，王权才勉强去了离前线较远的庐州（今安徽合肥）。

十月初九，完颜亮率军抢渡淮河，王权根本无心抵抗，先后放弃了庐州、和州（今安徽和县），渡江逃到采石（今安徽当涂西北）。金军如入无人之境，很快便占领了滁州，把战线又拉到了长江北岸。刚刚赶到淮阴的刘锜，得知淮西已失守，又接到退守江南的命令，只好引兵退回京口（今江苏镇江），布置防务。眼睁睁地看着淮南全部落在完颜亮手中。

金军兵临长江，临安南宋朝廷一片惊慌。大小官员纷纷送家属出临安，随时准备逃跑。宋高宗此时早已没了主心骨，又想遣散朝官，走三十年前浮海避敌的老路。只是由于新任宰相陈康伯的坚决劝阻，他才打消了逃跑的念头，勉强下诏表示要率军亲征，并派知枢密院事叶义问督视江淮军马，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虞允文参谋军事，到江、淮督战。

就在叶义司等人十月下旬离开临安的时候，金朝内部又发生政变。东京留守完颜雍在部分女真贵族的拥立下登上帝位，宣布废黜完颜亮。消息传来，完颜亮见归路已绝，便决定孤注一掷，自杨林渡（今安徽和县东）渡江，欲取代南宋，在江南扎下脚跟。

但是，他却低估了南宋方面的力量。

十一月初，南宋任命芜湖守将、宁国军节度使、御前诸军都统制李显忠接替王权的职务，并派虞允文督促李显忠前往接任，同时犒师采石。

虞允文来到采石，此时王权已离去，新任统帅李显忠还未到任。他到江边巡视，沿途见到因王权逃跑而从淮西败退

下来的宋军将士，三三两两，无精打采地坐在路边，丝毫没有斗志。隔岸望去，北岸金兵营帐密布，大战一触即发。虞允文看到形势异常危险，便把将士召集起来，激发他们的抗敌热情。

虞允文向将士们指出："敌人万一得以渡过长江，我们就是后退也没有生路了。现在我们前有天堑，占有地利，还不如死中求生！况且朝廷养了你们三十年，难道还不能一战报国吗?"将士们听后都说："谁不愿意杀敌立功？只是没有主将。"虞允文见群情已起，于是就宣布："朝廷已将王权撤职，另派李显忠前来负责军务。"李显忠是深孚众望的勇将，将士们听说他来当主帅，立刻精神大振。虞允文趁热打铁，接着又对将士说："现在军情紧急，在李将军到任之前，我愿意负责军务，和大家一道杀敌报国。国家是不会亏负我们的！"在虞允文的感召下，众将士决心为国守土死战。

虞允文清点宋军部队，却只有一万八千余人，战马数百匹而已，与金军相差悬殊。

大敌当前，除了挺身而上，没有退路。虞允文迅速召集将领，研究制订作战方案。最后决定采用水、陆相互配合，以水战为主的战法。步兵和骑兵埋伏在江岸高地后面，待命行动。水军船舰分成五队：选择精兵藏于海鳅船（一种以车轮激水的快速战船）内，停泊在大江中流，作为主攻部队；用两队海船组成东、西两翼配合主力；另外两队隐藏在港汊间，用作袭击敌船和后援之用。

宋军部署刚刚完毕，金军船队已在鼓噪渡江了。完颜亮在北岸高台上居中而坐，身着黄金甲，手挥小红旗，指挥几百艘战船从杨林河口出发，直驶长江南岸。船借风势，不一会儿，驶在前面的七十多只战船已抵达南岸。金兵弃船登岸，直向宋军冲来。

此时虞允文穿梭于宋军各部之间组织迎敌，见部分金兵登陆，便拍着勇将时俊的背说："你以有胆略闻名四方，此时还立在阵后做什么?"时俊见虞允文亲临阵地，勇气倍增，回顾虞允文，好让他看自己前去杀敌，大喝一声，挥舞双刀冲向敌阵。士兵们一见将领向前，也随之冲了上去，登陆的金兵很快就被全歼。

这时候，江南风力渐弱，宋军水师开始了猛烈反击。在海鳅船上踏车的都是初临战阵的当地民兵，但他们毫无惧色，驾船直冲入金军船队。海鳅船船体大，速度快，金军战船船体小，与海鳅船相撞，大部分被撞沉，船上的金兵多半淹死在江中。

完颜亮不甘心失败，他把剩余的船只重新集结起来，准备再次发动进攻。时近黄昏，一队从他处撤退下来的宋军路过采石，虞允文便动员他们打旗擂鼓，从山后绕到江边。完颜亮以为宋军援兵来到，不敢再战，急忙命令金军船队向后撤退，舍舟登岸。宋军强弩手乘胜追射，把金军杀得大败。完颜亮率领残兵败将，退至和州。

宋军以少胜多，取得了巨大胜利。虞允文一面向朝廷报捷，一面犒赏将士。但他并未被暂时的胜利冲昏头脑，清醒地认识到，敌军人多势众，并不会因此沉重一击而善罢甘休。他向将士们指出："敌军今天败了，明天将卷土重来。"随后召集众将领连夜重新进行战斗部署：把大部分战船开到杨林河口，封锁金军

出入的水道，另派一队海船停泊在上流。

第二天天一放亮，大批金兵果然乘船又来进攻。虞允文指挥宋军对金兵形成夹攻之势，用一种叫做“神臂弩”的劲弩射击敌船。一时间飞箭如蝗，许多金兵应弦而倒。宋军船上的霹雳炮也开始发挥威力，轰击敌船。宋军经昨日一战，士气大涨，作战十分勇猛。金军经受不住宋军的夹击，开始撤退。停泊在杨林河口上流的宋军，此时乘势放火，把金军百余艘战船全部烧毁。经过这一仗，金军在淮西的主力，基本被歼灭了。

金军惨败采石矶，完颜亮仍不甘心。他见军事进攻不成，便企图使用反间计，离散宋军军心。完颜亮写了一封信，派人送至宋营，谕示王权事宜，似乎早与王权有约。虞允文识破完颜亮的计策，写了一封回信，表示要同金军再战，决一雌雄。完颜亮见信大怒，却又无计可施，只好下令移师瓜洲渡口，企图从此渡江，夺取京口。

京口此时由老将刘锜把守。刘锜久卧病榻，实际上已不能处理军务。虞允文料想金兵定会由此乘虚而入，便自告奋勇，请求已到任的李显忠拨给他一部分军队，支援刘锜。李显忠钦佩虞允文的勇气和胆识，立即调拨了一万余人马。虞允文率军星夜开向京口。

虞允文到京口后，首先去拜望刘锜，征求他对防务的意见，刘锜闻听虞允文采石大败金兵，感慨地说：“想不到朝廷养兵三十年，竟首先让你这样一个书生建了大功，真让我们武将感到羞愧。”虞允文安慰了他一番，便会同其他将领，在江面上作了严密的防御部署。

金军将官在北岸看到南宋已早有准备，知道渡江难以成功。有一个将领指出，瓜洲江面比采石宽阔，请求完颜亮不要忙着进攻，待退回扬州再做打算。气急败坏的完颜亮非但不听，反而打了他五十军棍，接着下令：军士逃亡者，杀其领队；部将逃亡者，杀其主将，强令金军渡江。这样一来，使得军中人人自危，军心骚动。一些金军将领开始秘密商议，准备起事，杀死完颜亮。

十一月二十七日，金将浙西路都统耶律元宜率众把完颜亮乱箭射死于营帐中。这个曾不可一世的君主，终于梦断瓜洲渡口，统一大帝国的迷梦彻底破灭了。

此时进攻南宋的其他三路金军，在南宋军民的奋力抵抗下也遭到了失败。耶律元宜见大势已去，便领军从瓜洲向北撤退三十里，用都督府的名义，派人持信到京口议和。

金朝对南宋的威胁暂时解除了。

【十三翼之战】

提起成吉思汗这位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人们自然会把他和诸如“一代天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亚欧大陆征服者”等字眼联系在一起。的确，成吉思汗一生金戈铁马，横扫欧亚，所向披靡，先后征服四十余个部落和国家，奠定了历史上疆域最大的王朝——元朝的基础。其辉煌的武功，不仅在蒙古史上是仅有的，即使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可是有谁知道，成吉思汗平生亲自指挥的第一仗，却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呢？

12 世纪的蒙古高原上，生活着蒙古部、塔塔儿部、克烈部、乃蛮部、篾儿乞部、汪古部等数以百计的大小部落。

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之间时而结成联盟，时而又互相攻伐、互相残杀，结下了难解之怨。

公元1162年（金大定二年、南宋绍兴三十二年），蒙古乞颜部酋长也速该的妻子诃额仑生了一个男孩。这个婴儿出生的当天，也速该率同族人袭击塔塔儿部获得胜利，并且抓到两个酋长，其中有一个名叫铁木真。在蒙古语中，铁木真是“精钢”的意思，也速该认为这个名字不错，就给刚出生的儿子取名，也叫铁木真。

谁也没有料到，这个被叫作铁木真的婴儿长大以后，会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成为威震全球的草原英雄成吉思汗。

铁木真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是在争战与苦难中度过的。九岁那年，他的父亲也速该被仇敌塔塔儿人毒死，所属人众离散，乞颜部的势力渐渐衰落下去。铁木真随寡母生活，屡遭艰险。又过了几年，原来的乞颜属部泰赤乌部的奴隶主，担心铁木真长大以后会来寻仇，就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把铁木真抓来，给他戴上木枷示众。有一天，铁木真乘泰赤乌部人举行宴会的机会，用枷锁打倒了看守人，在奴隶锁儿罕失刺父子的帮助下，才逃回到家中。

铁木真逃离虎口后，就把全家迁到了不儿罕山（今蒙古国大肯特山）去居住，并按婚约与蒙古翁吉刺部的特薛禅之女孛儿帖结了婚，以便取得翁吉刺部的支持。可是，婚后不久，又遇到世敌篾儿乞人的袭击。铁木真等人虽然逃脱，但他的新婚妻子孛儿帖却成了篾儿乞人的俘虏。

挫折和灾难磨炼了铁木真的意志，



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国画）

也燃起了他复仇的怒火。他决心恢复父亲的事业，振兴孛儿只斤氏族。但挫折使铁木真懂得，单凭自己聚集力量是不足以战胜敌人的，只有利用蒙古各部之间的矛盾，取得一些部落奴隶主的支持，才能壮大自己的力量，打败那些敌人。

克烈部是乞颜部南边的近邻，地广人众，势力很强。其首领汪罕曾与也速该结为“安答”（义兄弟）。札答刺部原是蒙古部的一个部落，紧靠孛儿只斤氏族牧地。首领札木合颇具才识，与铁木真在少年时代就曾结过“安答”。汪罕和札木合都曾作过篾儿乞部的俘虏，久存复仇之心。因此，铁木真决计同克烈部和札答刺部结成联盟，共同对付篾儿乞部。

为了联络克烈部，铁木真忍痛把妻子的嫁妆黑貂裘献给了汪罕，并认他做义父。汪罕十分高兴，满口答应帮助铁木真，出兵进攻篾儿乞部。

铁木真取得克烈部的支持后，又去向札木合求援。札木合得知汪罕愿意派重兵相助，遂再次与铁木真结成“安答”，欣然允诺出兵。

于是，汪罕与札木合各出兵两万人，加上铁木真自己的部队，三方结成联军，由札木合任总指挥，向篾儿乞部发动了进攻。作战中，札木合指挥联军迂回到敌人侧后，从其背部突然发起攻击，一

举击败了篾儿乞人，夺回了铁木真的妻子孛儿帖。

这是铁木真一生中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札木合在此战中杰出的军事指挥艺术，使铁木真深感佩服。于是，铁木真积极向札木合靠拢，在战后把金带、马匹等战利品送给札木合，并与他合营于豁儿纳主不儿（今内蒙呼伦贝尔附近）。

铁木真与札木合相处了一年多的时间，白天常在密林浓荫下举行宴会，夜里常在一个帐幕中同枕而眠，情同手足一般。

札木合的部众里，有许多人是也速该的旧部和亲族，他们看到故主的儿子有着超众的射骑之术，有着宽阔的胸襟和过人的胆略，越来越认定铁木真将是能为他们夺得富饶牧地和财产的首领，时间一长，便纷纷向他靠拢。其中有一个叫木华黎的聪明人，甚至编造出铁木真将做可汗的“天意”之说，更使得人心日益归附于铁木真。人们在背后悄悄议论：“札木合当败，铁木真当兴。”这些话不时传到札木合耳中，他对此也渐渐不能容忍了。

终于有一天，铁木真与札木合并肩走在车前，札木合忽然说道：“铁木真安答，我们靠山下马住下来吧，好让牧马者寻草喂马；我们依水下马住下来吧，好让牧羊人找水饮羊。”铁木真不明白这话的含意，一时愣住了。他赶忙回到营帐向母亲请教，诃额仑沉默不语。这时一旁的孛儿帖听出了札木合的弦外之音，便说：“人家都说札木合胸襟狭窄，如今想必是容不得我们了。或许什么时候会加害于我们，咱们还是赶快动身，与他分手为好。”铁木真认为妻子的话有道理，便乘迁徙别处游牧的时机，借故与札木合分道扬镳了。

铁木真临行前，札木合部队里一些也速该的老部下，以及札木合的一些部众，都络绎不绝地来归附铁木真。铁木真带着他们沿斡难（鄂嫩）河北岸西行，回到不儿罕山附近游牧，从此成为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

经过对篾儿乞部的战争，铁木真在各部落中的声望已大大提高。武装独立后不久，蒙古部中旧时的属民、那可儿（伙伴）、奴隶也纷纷来投靠铁木真。铁木真麾下便聚集了许多能征善战之士，其中有后来统称为“四杰”的木华黎、博尔忽等人，以及被称为“四狗”的哲别、速不台等人。这些人如众星拱月一般，凝聚在铁木真周围，使铁木真的力量大为加强。

公元1189年（金大定二十九年，南宋淳熙十六年），有个名叫豁儿赤的奴隶主看到铁木真已是众望所归，便提议推举铁木真为国主，得到了蒙古部许多奴隶主的一致赞同。在他们的拥戴下，二十七岁的铁木真登上了可汗的宝座。

铁木真为汗后，即着手实现他的宏图大志，决心统一蒙古高原。他冷静地分析了蒙古高原各部的情况，决定首先从整顿本部军队入手，加强武装力量。他组建了专门警卫汗的侍卫军，又建立了保护、训练战马，负责军队给养的专门机构，还对各队、各种组织机构分别指定了长官，分工负责各项事务。在整顿军队的同时，铁木真展开外交攻势，派遣使者向各部落首领报告自己被推戴为汗的消息，以获取他们的支持。

就在铁木真雄心勃勃，欲有一番作为的时候，有一天忽得急报：札木合率军前来宣战。铁木真不禁大吃一惊。

原来，自铁木真从札木合那里收走也速该的旧部众以及一部分札木合的部下后，札木合一直对此耿耿于怀。铁木真被推举为汗后，他意识到新近崛起的铁木真将是他逐鹿高原的劲敌，因而对铁木真就更加愤恨。在他的眼里，已经容不下昔日的好友铁木真了。正巧此时，札木合的弟弟塔合察儿抢夺铁木真部下的马群，结果送了性命。于是，札木合打着为弟弟报仇的旗号，联合泰赤乌部等十二个部落共三万多人，向不儿罕山杀来，准备一举击垮铁木真。

铁木真被迫应战。他迅速召集部众，把所有的亲族故旧、侍从仆役，统行征发。就连铁木真的母亲诃额仑也向他请缨，坚决要求领兵杀敌。铁木真拗不过母亲的固执，遂答应了她。这样，加上归附助战的尼鲁温氏族，铁木真共得一万多人，号称三万骑。针对札木合进军的形势，铁木真把部队分成十三翼（翼，也称“圈子”，“十三翼”即十三个圈子或十三团），分兵迎战札木合。诃额仑老当益壮，着戎服，跨骏马，统领亲族、属民及诗人作为第一翼；铁木真统帅诸子、那可儿和他的侍卫军作为第二翼，是作战的主力。其余各翼，分别由乞颜部贵族首领们统领。

铁木真率十三翼人马来到不儿罕山下答阑版朱思（今蒙古国温都尔罕西北）的旷野上，遥见札木合军已逾岭驰来，如电掣雷击一般，瞬息即至。铁木真整饬各翼军队扎住阵脚，严防冲突。说时迟，那时快，这边铁木真部众刚刚做好战斗准备，那边札木合已经率部杀到。就在答阑版朱思平川上，两支骑兵大军的鏖战开始了。

札木合下令敲响牛皮鼓，十三部人马顿时如汹涌的激流向铁木真的军队呼啸而来。三万多人的喊杀声汇聚在一起，像晴天一阵霹雳，震得苍穹摇摇欲坠；三万多匹马四蹄如飞，踏起一团团黄沙，把答阑版朱思的天空染成了黄色。强大的攻势足以使铁木真部队的士兵们感到窒息。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铁木真并没有被敌人的这种阵势吓倒。他镇定地传令各翼领军，吹起牛角号，迎击进攻的敌人。勇将木华黎大喊一声，一马当先狂呼着冲向敌阵。紧接着，铁木真的十三翼骑兵，也都如饿鹰扑食般勇敢地跟了上去。

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铁木真年轻的将士们，刀剑砍卷刃了，衣衫被鲜血染红了，仍然在奋力与敌人拼杀。战斗中，木华黎左臂中箭，几乎成了一个血人。铁木真手下的其他几员猛将，也都受了伤。

札木合站在高坡上观战。他看到铁木真的阵形渐渐乱了起来，有些抵挡不住了，就命人连连击鼓，示意自己的部队加强攻势。

铁木真意识到，这样打下去伤亡只会越来越重，自己的力量将会受到更大的损失。他看看难以取胜，为了保存实力，便果断地下令撤退，率人马驰入斡难河上游的哲列涅山谷中。札木合不肯就此罢休，带着部众追赶过来。铁木真命大将博尔忽堵住谷口，凭险据守。札木合率军一连攻了三天都没有攻下，只好撤军而去。

为了发泄恼怒和仇恨，札木合下令把俘获的铁木真部属，用皮绳扎住舌头串在一起，带到一个看台前。札木合坐在看台上喝酒。他每喝一口酒，就要斩

掉一个人头。接着又命人架起一口大锅，把战俘放入锅中活活地煮死，要不就将人系在马尾上拖死。最后，札木合把婴儿的脑袋也扔进了锅里，一共煮了七十锅，然后一个个挂在高杆上。而且扬言，要是把铁木真抓来，也在这里斩头，祭他的军旗。

札木合的种种残暴行径引起了部下强烈的不满。许多部族纷纷离开札木合，投奔铁木真去了。

铁木真见此情形，就在札答剌部牧地附近的树林里大摆筵席，欢迎各部来投的人。这样一来，投奔铁木真的人越来越多，铁木真的势力反而得到了迅速加强。

铁木真在平生指挥的第一次战斗中，虽因力量不足、缺乏经验而失利，但他在战后采取的热情招待来投者、分化瓦解敌人的政策却大获成功，初步显示出他的深远战略眼光和政治雄才大略。同时，这次经历也使铁木真认识到，人心的向背，既是战争胜负的关键，也是事业成功与否的根本保证。因此，在以后的征战中，铁木真很注重团结内部，争取民心。这一“人和”思想，后来成为成吉思汗治军方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峰山之战】

成吉思汗临终前，回顾总结几次伐金的经验教训，为儿子们拟定了联宋灭金、远程迂回袭击的战略。他对儿子们说：“金朝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黄河，难以遽破。若借道于宋，宋、金有世仇，必定能答应我们。然后下兵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直捣大梁（今河南开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而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敝，就是赶到了，也无法战斗，这样一定能打败他们。”侍立在一旁的小儿子拖雷把父亲的这些话暗暗记在心里。五年之后，在三峰山一战中，他把成吉思汗的战略设想变成了现实。

金正大八年（1231年）五月，蒙古汗窝阔台在官山九十九泉（今内蒙古卓资北）召集诸将会议，商讨作战方略，决议兵分三路向金朝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斡陈那颜率左路军，向山东济南进行钳制性攻击；窝阔台自统中路军，从黄河北的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到济源（今河南济源）一线进军，直达汴京（今河南开封）；拖雷统领右路军，自凤翔南下，准备绕道南宋境内，直捣汴京背后。三路大军约期在汴京会师。

已于上年年底带兵进入陕西的拖雷，牢记父亲的临终遗言，在率军南下之际，就派速不罕为使者，前往南宋境内的沔州（今陕西略阳），与统制张宣谈判借道与索粮事宜。张宣认为蒙古军的要求无理，就下令把速不罕杀了。拖雷得知后大怒，道：“他们以前派人来通好，怎么能自食其言、背叛盟约呢?”于是决定动用武力，强行向南宋借道。

八月，拖雷率骑兵三万余人穿过大散关，进入宋境。九月，攻破凤州（今陕西凤县北）；接着，又屠洋州（今陕西洋县）、围兴元（今陕西汉中）。然后分兵西进，入沔州，沿嘉陵江而南，至西水（今四川阆中西）而还。两路人马势如破竹，连克南宋沿途许多州县，于十一月会合后，向饶风关进军。四川安抚制置使桂如渊面对蒙古军的长驱直入之势，被迫采取合作态度，派宋军作先导引拖雷军过关。此后，蒙古军经金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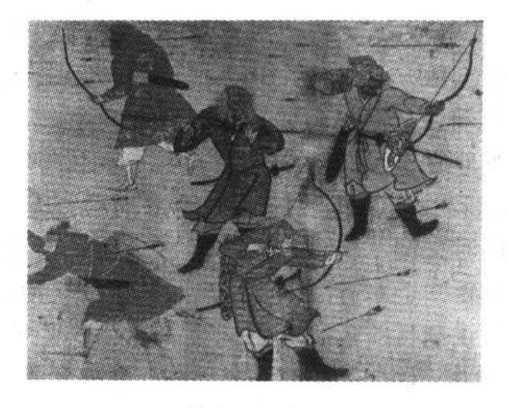
（今陕西安康）东进，取竹山（今湖北竹山南）、房州（今湖北房县），又在武当山区大败宋军。十二月，拖雷指挥蒙古军在光化军（今湖北光化西北）乘骑浮渡汉水北上，离开了南宋国境，抵达金朝境内的邓州地区。至此，蒙古军完成了借道宋境，对金实施战略大迂回的预定计划。

就在蒙古军经金州东进的途中，金廷便得到战报，意识到蒙古军将会出兵唐、邓。金哀宗急调驻守潼关和河南的完颜合达、移剌蒲阿两军约二十万人，驰守邓州，迎击拖雷军。

合达、蒲阿奉命率军开进邓州地区后，得到蒙古军北渡汉水的战报，遂召集众将商议对策。诸将领都主张乘蒙古军半渡时前去攻击，但蒲阿不同意。他的计划是，放蒙古军渡河，然后在禹山（今河南邓州西南）依据有利地势实施堵截。于是合达、蒲阿把金军调往禹山，依势列阵，步兵在山前迎战，骑兵屯驻于山后，等待蒙古军的到来。

拖雷率军渡过汉水后，在禹山与金军遭遇。拖雷见金军阵形严密，便命令部队撤退。合达以为是计，按兵不追。拖雷又把部众分为三队，然后分头而进，牵引金军来回驰突，战斗一直持续到黄昏。

第二天黎明，金军突然发现几万蒙古骑兵一夜之间没了踪影。合达、蒲阿正在疑惑时，有哨兵来报，捉住两名误闯金营的蒙古骑兵。合达立即命令把两名俘虏押来，询问蒙古军的去向。蒙古兵告诉合达说，拖雷已连夜渡江南归了。这时，又有十余名蒙古兵敝衣羸马前来投降，他们向合达、蒲阿哭诉沿途行军如何艰苦，说因不堪忍受才来投诚。合



蒙古军攻击图

达与蒲阿这才确信蒙古军已渡江南撤，不由得大喜，赐给他们美酒衣食，并给他们换上肥马，留在阵后骑兵营中。可是没想到，十几名蒙古兵竟乘金军不备，骑着马一溜烟地跑了。金军发现后才知道上了当，原来这些蒙古兵是用诈降来探察金军虚实的。

合达、蒲阿获悉拖雷军并未南渡，就派侦骑四处探察，可是一连四天都没有找到蒙古军的影子。合达、蒲阿有些沉不住气了，打算撤离禹山，班师回邓州城固守。

就在金军将往邓州城开拔时，忽有侦骑来报告说，在光化对岸的枣林中发现有蒙古兵活动。合达、蒲阿得报后马上率军前去迎击。金军进入枣林后，发现蒙古军已撤离完毕。合达、蒲阿悔恨又晚了一步，正待撤军，忽听到后阵大乱，有人高喊："蒙古兵来了。"合达、蒲阿刚要下令出击，后阵却又传来消息，百余名蒙古骑兵已截走了辎重，往东而去。合达、蒲阿急得直跺脚，忙下令大军追击，可哪儿还追得上。

合达、蒲阿毫无办法，只好率领金军退入邓州城，部分金军屯驻城东、城西，另派一部在城下列阵扎营，准备对付蒙古军前来攻城。

蒙古军神出鬼没，四天中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原来拖雷在禹山一战中看到金军兵强马壮，又凭险据守，料难取胜，于是就在当晚与部下商议，决定采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同敌周旋，同时又派军士诈降探察金军虚实。当拖雷得知金军有二十万之众、粮草充足后，认识到目前还不具备同金军正面作战的实力，就令军队在邓州周围作迂回运动，白天在山林隐蔽处休息，夜晚则率军转移行进。经过几天的休整，又夺得金军的辎重，使蒙古军得到了充足补给。拖雷由此决定甩开金军，绕过邓州挥师北向，直趋金朝都城汴京。他把部队分成数队，在邓州地区分头行进，“散漫而北”。

蒙古军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邓州后，便合成一队，浩浩荡荡向汴京进发，一路连克泌阳、南阳、方城、襄城、郏城，直抵汴京南边诸县。拖雷料想邓州金军得知蒙古军北上，必定率师追击，就下令把沿途所克州县的积聚物资全部焚毁，让金军在追击途中得不到补给。接着，拖雷派三千骑兵驻留等待金军，尾随其后实施袭扰，又以三千骑兵为本军殿后。

合达、蒲阿在邓州摆开阵势，却等不到蒙古军前来。当后方传来泌阳被蒙古军攻克的消息后，二人才知又一次上了拖雷的当。恼恨之余，合达、蒲阿猛然醒悟，蒙古军要去攻打汴京了！于是急急忙忙率军离开邓州，向北追去。

担负袭扰任务的三千蒙古骑兵等到金军赶来后，便悄悄跟在后面，一路上频繁地对金军发动袭击。金军停下来迎击，他们就不战退去；等金军一宿营，他们又来袭扰。到了晚上，他们四处击鼓呐喊，扰得金军不能休息。金军被迫且行且战，一路上又得不到补给，进到钧州（今河南禹县）时，早已疲敝不堪。

这时已是次年（1232 年）正月，金军行至钧州南十五里的黄榆店时，天色渐暗，朔风哀鸣，吹下了满天大雪。不多时，白雾蔽空，大雪盈尺，合达、蒲阿只好下令盘营休息。

大雪一连下了三天，却苦了金军将士。金军南来时，衣着单薄，外披甲胄，经过这场雪，许多人冻得面无人色。军士们披着甲胄僵立雪中，枪槊结冻如椽一般。加之得不到充足的给养，饥寒交迫，其中有不少人几天粒米未进，饥馁难耐，只好抓雪来充饥。

金军盘营三日，合达、蒲阿恐误军机，下令拔营继续行进。不久大军来到钧州西南郊的三峰山。这时大雪又下了起来，金军人马疲惫冻馁，再也没有力气前进了。合达、蒲阿正要强令部队前行，忽得哨兵来报，金军已被蒙古军四面围住。合达、蒲阿不禁大惊失色。

原来拖雷到达钧州时，部分中路军接到战报后，也渡黄河南下赶来增援。两军会合一处，决计在三峰山伏击金军。

蒙古军把金军包围后，拖雷派人在阵前架起柴薪，上炙牛羊肉，然后把蒙古军分成两队，轮番向金军发动进攻。退下来的将士饱食牛羊肉后，再接着上前作战。久未进食的金兵闻到飘来的肉香，心中更加发慌，哪儿还有什么战斗力？一个个带着强烈的食欲作了蒙古军的刀下鬼。

蒙古军围攻数日，把金军打得狼狈不堪，但毕竟金军人多，拖雷见不能速胜，故意放开通往钧州的道路让金军逃

走。金军果然中计，在合达、蒲阿的带领下往道上一拥而去。拖雷指挥蒙古军夹道奋击，金军大溃，声如山崩。除合达、蒲阿带领数百骑逃走外，其余十几万人马被蒙古军尽数歼灭。

随后，拖雷又率军攻下钧州，俘杀合达，并向金军宣告："你们所恃赖的就是黄河与合达。如今合达已被我们杀了，黄河也为我们所攻破，你们不投降还等什么！"金军无力抵抗，蒙古军很快攻占了河南大部分地区。

三月，窝阔台与拖雷在钧州会师后，命大将速不台进围汴京，自己与拖雷携手北返。

三峰山一战，金朝精锐部队丧失殆尽，是蒙古灭金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战役。

此役蒙古军获胜后，金哀宗于十二月逃离汴京，奔归德（今河南商丘南）。第二年（1233 年），金哀宗又出走蔡州（今河南汝南）。窝阔台派出使者与南宋定约，联兵合围蔡州。公元 1234 年（宋理宗端平元年，金天兴三年，蒙古窝阔台汗六年）正月初九，金哀宗传位于完颜承麟，次日即位，是为末帝。典礼甫毕，宋军突破南门，宋、蒙大军入城，蔡州陷落，金哀宗自杀，末帝死于乱军之中，金朝灭亡。成吉思汗借道于宋、联宋灭金的遗言，终于得以全部实现。

【钓鱼城之战】

四川是南宋支持战争的财力、物力供应基地，战略地位相当重要，蒙古军一旦夺占四川，即可出三峡，顺流东下，直逼江东，径取临安，因此蒙古统治者对这块风水宝地早已虎视眈眈。

南宋宝祐五年（1257 年）秋，雄心勃勃的蒙古第四任大汗蒙哥，急于想建立超过父祖的功业，实现四海一统的梦想，不顾诸王大臣们的谏阻，决心对南宋发起全面进攻。他吸取窝阔台汗全线进攻，兵力分散，难以突破长江防御的教训，决定把战略突破口放在四川。计划兵分三路，西路主力攻四川，南北两路分取潭州（今湖南长沙）、鄂州（今湖北武昌旧城）。企图先占四川，再取荆湖，三路大军会师后，顺江东下，夺取临安。

在战争准备大体就绪之后，蒙哥即于宝祐六年（1258 年）二月颁诏天下，征诸道兵，屯聚于六盘山。以灭亡南宋政权为目标的步调统一的大进军，就此拉开了战幕。

七月，蒙哥亲率西路主力四万人，号称十万，从六盘山出发，入陇州（今陕西陇县），经宝鸡，人大散关，然后分道沿嘉陵江、渠江、涪江南下，于是年底进抵合州（今重庆合川），把攻击矛头直指南宋的四川军政大本营——重庆。这时，四川数十座山城，或降或陷，或围或困，能够担负起屏障重庆、支撑四川战局重任的，只有重庆北面七十公里的合州州治钓鱼城（今重庆合川东）了。

钓鱼城位于嘉陵江、渠江、涪江交汇之冲，下可控扼三江展开的扇形地区，背依华蓥山脉，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既可阻止南下的蒙古铁骑长驱直人，以蔽重庆，又可连接诸江，组成一道封锁开达、夔峡之路的防线。

此时，担负钓鱼城防御任务的守将名叫王坚。王坚原是南宋名将孟珙的部下，孟珙任四川宣抚使时，他随孟珙一

起来到四川。入蜀后，王坚参加了四川制置使余玠指挥的北伐汉中之役，因战功卓著被任命为兴元都统兼知合州。

王坚知合州以后，进一步加强钓鱼城的防御。他发动军民修固城墙，开池凿井，并在钓鱼山的南、北两面各筑了一道“一字城”，延伸至江边，以拦截来敌于城墙和江流之外；与此同时，王坚率领城中军民，春季出屯耕耘，秋季收粮运薪，收获储备了大量粮草物资。经过一番努力，钓鱼城城坚、粮丰、水足，布置得当，具备了长期坚守、独立作战的良好条件。

开庆元年（1259年）正月，蒙哥汗驻跸青居山（今四川南充南），欢度新年，并召开前线军事会议，商讨下一步的进军方案。

大臣术速忽里进言说：“重庆以钓鱼城为藩屏，此处地势险要，宋人依险为固，若死守抗击我师，则不易攻破。不如用降人为向导，绕道东下，出荆楚，与鄂州渡江诸军会合，如此则东南之事一举可定。”

诸将恃强好胜，邀功心切，加之一路东伐势如破竹，未遇大碍，都没有把小小的钓鱼城放在眼中，认为“攻城则功在顷刻”，因此纷纷指责术速忽里见解迂腐，要求蒙哥出兵攻打钓鱼城。

蒙哥思量再三，也认为拿下钓鱼城，则攻取重庆易如反掌。如此全取川蜀，再挥师东进就无后顾之忧了。

主意拿定后，深谙“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蒙哥并未急于出兵，而是派了一个叫晋国宝的南宋降官前去劝降守将王坚。

晋国宝到了钓鱼城，劝降未成，反而被王坚骂了个狗血喷头。在返回途中又被王坚派人捉了回去，押赴阅武场处决了。钓鱼城军民看到这个变节汉奸的可耻下场，人心为之大快，抗蒙情绪日益高涨。

晋国宝被杀事件大大激怒了蒙哥。他明白该是用武力说话的时候了，于是合诸道兵进围合州，直抵钓鱼城下。

蒙哥首先作了切断钓鱼城与外界的联系，堵绝荆蜀通道的部署。一方面，他派亲王末哥（蒙哥异母弟）率军攻打渠州礼义山城（今四川渠县东北），曳剌秃鲁雄率军攻打巴州平梁山城（今四川巴中西），以切断钓鱼城与渠江流域诸城的联系，陷钓鱼城于孤悬之中。另一方面，蒙哥又命令纽璘率一部兵力向重庆下游江面进攻，在涪州的蔺市（今重庆涪陵西）造浮梁，以阻长江下游宋军增援，造成“蜀道梗绝”的态势。

蒙哥在部署停当后，便于这年二月带着精心准备的攻城器具，率军从钓鱼城东北的鸡爪滩渡过渠江，在城东南的石子山扎下营寨，准备攻城。

二月七日，蒙哥督师钓鱼城下，指挥蒙古军从东面向东新门与护国门之间的一字城发起了猛烈攻击。城上的宋军早有准备，箭矢、石块雨点般倾泻下来，蒙古军屡次发起冲锋，都未能奏效，伤亡者极多，蒙哥只得下令停止进攻。九日，蒙古军转攻镇西门，再次受挫。

两战的失利，给蒙哥当头泼了盆冷水，使他清醒了许多。他开始意识到，钓鱼城将是块难啃的骨头，一味靠单向强攻、死打硬拼是很难成功的，于是他开始考虑变换战术。

对付一座孤城，蒙哥自然想到了一个“困”字，到手的肥肉，又何必急于吞下呢？

于是，蒙哥命令部队原地休整，一连一个月没有发动攻势。其间城中宋兵每日站在城头上大声诟骂，蒙哥丝毫不予理会。

一个月后，蒙哥推想城内粮草大概已所剩无几，认为是重新发动攻击的时候了，就选拔勇敢的士卒组成敢死队，准备再次攻城。蒙哥吸取了前两次失利的教训，决定采取“环攻”战术，同时从东、北、西三面向钓鱼城发动强攻。

三月，蒙古军兵分三路，分头攻打东新门、奇胜门和镇西门。蒙哥命令各路人马在阵前架起石炮，以配合攻城。在飞石的掩护下，敢死队队员们肩扛云梯，手执刀盾，喊杀着向城下冲去。许多人在冲锋途中就被城上射来的箭矢、飞石击中倒下，也有不少人被射程不够的己方石炮所误伤。不多时，钓鱼城下的江岸上已遍布蒙古兵的尸体。

但蒙古军的攻势并未因此而有所减弱。他们踩着同伴的尸体，继续奋勇前冲。一顿饭工夫，已有成群的蒙古兵冒死冲到城墙下，用盾牌护住身体，开始向城墙上架设云梯。当蒙古兵不顾一切地把云梯支好后，却发现了一件悲惨的事情。原来钓鱼城依山而建，城邑高厚，云梯搭上去，距城头还差一大截子，蒙古兵登时傻了眼，泄了气。

城上宋军则在王坚等人的指挥下，乘机用钩枪钩翻云梯，又不断发射利箭、檑石，对城下蒙古兵予以痛击。只听惨叫声从城墙下不断传出，撕心裂肺，此起彼伏。几个时辰过后，城墙下已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

三路蒙古军攻了大半天，不是因伤亡惨重而苦战不前，就是因后军不继而被迫退回。蒙哥发动的第二次攻势又以惨败而告结束。

进入四月后，蒙哥又卷土重来，采用“夜袭”的战法，乘着夜色曾一度攻入外城。形势危急时刻，王坚、张珏及时率援军赶到，开城出击，经过奋战，终于把蒙古军赶出了外城。

此后，风云骤变，连续下了二十天的大雷雨，恶劣的气候条件使得蒙古军攻势顿减。钓鱼城中的宋军则在王坚的指挥下，夜晚不断出城“斫营”，袭扰敌人，使得蒙古军士气大为低落。

钓鱼城经过数月的坚守，给了南宋军民以很大的鼓舞。宋理宗赵昀以王坚忠节，守城拒敌，万折不回，可为列城之倡，特命优加旌赏。为了确保长江上游地区的安全，他让四川制置副使兼湖北安抚使吕文德率军逆江而上，增援四川战区。吕文德进抵涪州，经力战冲垮江上浮梁，突破蒙古军的封锁，于六月初到达重庆。然后又率战舰千余只，逆嘉陵江而上，增援钓鱼城。蒙古大将史天泽军分两翼，顺流纵击，在槽山（在今重庆合川境内）大败吕文德军。吕文德人援钓鱼城不成，只得领兵退守重庆。

这时，蒙古军围攻钓鱼城已有五个月，仍不能攻下，而巴蜀炎热的夏天已经来临。这一年的夏天奇热无比，又逢天旱，田里的禾苗全都枯死了。蒙古军长期征战，加上水土不服，疫病开始在军中蔓延，病死了不少人，其部队的战斗力大为减弱。

这时内心最焦急的恐怕就是蒙哥了。这位雄心勃勃的蒙古大汗，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快拿下钓鱼城，以扭转不利的局势。因此他派前锋大将汪德臣去城下对王坚进行招降。汪德臣多次前往，均被王坚严词拒绝，不由得恼羞成怒，

发誓说："我大军旌旗所向，无不披靡，独此旅拒。捐躯图报，正其时也。"于是他挑选锐卒乘夜进攻外城马军寨。王坚率兵进行反击，两军一直相持到天亮。

第二天，汪德臣又来阵前劝降，大声喊话说："王坚，我来是给你们指条活路的，赶快投降吧！"话音刚落，城上忽然飞来一块巨石，不偏不倚，正把汪德臣打下马来。汪德臣受重伤被抬下，送往重庆北碚的缙云山寺温泉养伤，不久便一命呜呼了。

汪德臣的死讯传来，蒙哥扼腕叹息不止，直呼失去了左右手，蒙古军的锐气也因此大受挫折。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钓龟城内粮草仍旧丰足，城内军民士气高涨，斗志旺盛。为了显示城内的储备和必守的信念，王坚命宋军发炮，向城外抛掷了三十斤重的鲜鱼两尾和数以百计的蒸面饼，并在城上喊话说："尔等北兵可烹鲜鱼、吃面饼，我们再守上十年，你们也攻不下来。"

蒙哥气得吹须瞪眼，但却无力强攻取胜。他又不甘心弃城撤军，只好加强对钓鱼城的封锁和监视，以待有利时机。为了观察钓鱼城内的情况，蒙哥命人在西门外建筑瞭望台，并亲自到城下督视。当蒙古兵爬上瞭望台向城内窥探时，城上宋军瞅准时机，发射飞石，把探望的蒙古兵打下来摔死。

蒙古军在此期间，伤亡甚众。蒙哥也不幸在一次督战中被飞石打中，身负重伤，蒙古军被迫从钓鱼城下撤退。不久，蒙哥在撤退到金剑山温塘峡（今重庆北温泉）时因伤势过重而死去（关于蒙哥的死因有多种说法，一说因病，一说中箭，还有的说中飞石受伤而死；死的地点也有所不同，一说在钓鱼城下，一说在壁山西温泉，也有说在北碚北温泉。——编者注）。进攻四川的蒙古军随即在史天泽等大臣的率领下，运着蒙哥的灵柩奉丧北归。

九月，南宋朝廷宣布合州围解，擢升王坚为宁远军节度使。十月，宋理宗又诏谕四川守臣"恤军劳民，庶底兴复"。至此，钓鱼城之战宣告结束。

钓鱼城之战在中国战争史上，创造了以山城设防击败蒙古军铁骑的奇迹。此役的胜利，使蒙古军会师鄂州、顺江东下灭亡南宋的战略计划彻底宣告破产，从而使南宋王朝暂时免遭灭国之祸，又延续了二十年。正如明人邹智所说："向使无钓鱼城，则无蜀久矣。无蜀，则无江南久矣。宋之宗社，岂待崖山而后亡哉！"

【襄樊之战】

南宋末年，权臣贾似道独擅朝纲，对蒙古推行妥协投降政策。蒙古军围攻鄂州的时候，他瞒着朝廷私下与忽必烈签订了和约，以换取蒙古军北撤；而且隐瞒真相，谎报战功，靠着欺骗过日子。贾似道毕竟做贼心虚，惟恐阴谋败露，因此极力打击作战有功将领，以致将士离心，武备松弛，国力日益衰弱。

忽必烈回到北方后，打败了和他争夺汗位的阿里不哥（拖雷幼子），登基称汗，把都城迁至燕京（今北京）。这时他想起了与南宋订立的和议，遂派信使郝经到临安，敦促南宋履行和约条款。贾似道为了不使私订和约的事情败露，就把郝经扣留，长期软禁在真州（今江苏仪征），这给了蒙古以再次大规模南

侵的口实。

此后，忽必烈平定山东李璮叛乱，稳定了在中国北方的统治。接着又着手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并扩充军队，制造兵器，增修战船，积极为攻取南宋创造条件。

这时，南宋潼川安抚副使刘整因受上司整治，向朝廷申诉无门，愤然以泸州十五郡降附蒙古。刘整的叛降，使忽必烈完全了解了南宋的国情虚实，因此下定消灭南宋的决心。

忽必烈总结以往攻宋的战略得失，认识到要打开攻宋战争的新战局，必须选准用兵突破口，从战略上改变过去的做法。为此，忽必烈多次召开军事会议，让众将领充分发表意见，献计献策。刘整向忽必烈提出："攻宋方略，宜先从襄阳入手，攻蜀不如攻襄，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得。如果攻下襄阳，浮汉入江，则南宋可平。"忽必烈采纳了刘整的建议，制定出以主力进攻襄樊，扼制长江中游，实施中间突破，然后顺江东下、直取临安的战略方针。

忽必烈选择襄樊这块战略要地作为进攻南宋的突破口，正击中了南宋的要害。

襄樊地处南阳盆地南端，西邻关陕，东达江淮，南通荆湖、巴蜀，北距三都，为鄂、豫、陕交通要冲。樊城居汉水北，襄阳在汉水南，两城隔水相对，互为犄角，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是扼守长江的屏障。忽必烈出兵前，按刘整的建议，用玉带贿赂依附贾似道的鄂州帅吕文德，以置榷场互市为名，秘密在樊城外的鹿门山修筑堡垒，建立了进图襄樊的第一个据点。

蒙古至元四年（宋咸淳三年，1267年）冬，忽必烈以南宋扣留郝经为借口，命阿术为主帅，刘整为副帅，备师进攻襄樊，同时出兵川蜀、淮西，配合中路进攻。南宋派吕文德的弟弟吕文焕知襄阳府兼京西安抚副使，以重兵防守，两军在襄阳城下对峙。忽必烈向阿术下达围城阻援、先困后攻的作战指导方针。

阿术军在忽必烈的授意下，开始在襄阳外围构筑长围，用垒寨连接起来，以阻止城内宋军出击；又派重兵于鹿门山和襄阳西边的万山，以断宋军粮道；接着在万山、白河口（襄阳南）汉水中立栅，切断宋军沿汉水增援的道路，又在德安（今湖北安陆）、京山（今湖北京山东）等地集结兵力，牵制和分散宋军增援部队，保障对襄阳的长期围困。

蒙古军虽把襄阳围得如铁桶一般，阿术仍然清醒地看到，宋军在战略上处于劣势，但在战术上却具有一定的优势，尤其长于扼守险隘要津和水战，而蒙军的弱点也恰恰在于水军力量不足。于是，他建议忽必烈增强围城水军的力量。忽必烈吸取蒙哥汗兵败钓鱼城的教训，采纳了阿术的建议，增调战船五千艘，水兵七万人，投入襄樊战场。蒙古军所筑垒寨得水军之助，如虎添翼，使襄阳守军陷入了孤城困守的境地。以后的战斗



襄樊城遗址

过程表明，蒙古军增强水军力量并投入战斗，是一个关系战役全局的战略性变化。

蒙古至元六年（1269年）三月，蒙古军又包围樊城，宋京湖都统制张世杰率兵救援，结果在赤滩浦被阿术军打败。七月，宋沿江制置副使夏贵乘汉水暴涨之几率舟师援襄，在虎尾洲遭到蒙古水军重创。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以舟师支援，在灌子滩又为阿术军所败。

宋军几次入援失败，使得襄、樊两城的守军处境更加困难。蒙古派刘整在襄樊前线就地建造战舰，操练水军；又用张弘范议，加强襄樊外围城栅，襄樊与外地的水陆交通全部断绝。襄阳守将吕文焕只能以小渔船渡汉水窥伺军情。他的哥哥吕文德没想到自己当初因贪小利，给朝廷和自己的亲属带来这么大的灾祸，悔恨不已，背发毒疽而死。

吕文德死后，南宋另派在两淮抗击蒙古军有功的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继续督师进援襄樊。但贾似道怕李庭芝打了胜仗，再立战功于己不利，命自己的女婿、亲信范文虎从中进行牵制，不听李庭芝的约束。范文虎以贾似道为靠山，相互勾结，整日在营中与妓妾嬉戏饮乐，根本不以襄阳告急为意。他推托未得朝廷命令，拒不出兵。

吕文焕得不到救援，只好率襄阳守军万余人出击突围，进攻襄阳西面的万山堡，结果被蒙古军击败，被迫又退入城中。在看不到南宋援兵的艰苦情况下，襄、樊两城军民利用江面上的一座浮桥相互支援，共同坚守。他们拆房屋作柴烧，缝钞币当衣裳，丝毫没有动摇守城的决心。

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称帝，改国号为“大元”。在南宋朝野的一片呼吁下，范文虎不得已总统殿前司两淮诸军援襄。阿术率万户阿剌罕等与范文虎军在湍滩交战，大败宋军。六月，范文虎又率舟师十万、战舰一千余艘，进至鹿门。这时汉水暴涨，阿术率诸将迎击，分水军为四翼，先以轻舟投入战斗，再以大船进击，追宋军到水浅处，俘获南宋战舰百余艘，宋军再次大败，范文虎乘着夜色逃走。

范文虎两次援襄失败后，李庭芝不得已决定组织一支敢死队，进行一次冒死冲击元军防线、入援襄樊的尝试。

襄阳西北的均州（今湖北均县）、房州（今湖北房县）山区人民，屡遭元军掳掠，保卫乡土、援救襄阳的要求十分强烈。李庭芝就在这两处招募民兵三千人，并制造轻船，以民兵勇将张顺、张贵为都统，在均州上游水峪加紧训练，进行入援准备。

至元九年（1272年）五月，三千人敢死队在张顺、张贵的率领下，趁汉水上涨之机，乘船百艘，满载布帛、食盐等物资溯流入援襄樊。敢死队沿途斩断元军布设的铁索、木桩，转战一百二十里，冲破重重封锁。张顺在途中身中四枪六箭，不幸战死。最后这支援军终于在张贵的带领下到达襄阳城下。

城中断绝外援已久，军民们听说援军到了，民心士气为之大振。为了长久解决襄樊的物资困难，张贵建议联络新郢（今湖北钟祥西南）的交通。他派了两名擅长潜水的勇士，带着蜡书，冒着生命危险突破封锁，到新郢与范文虎联系，范文虎答应约期派兵夹击元军。九月，张贵率民军按期举炮发舟出战，但不幸的是有个败类离军叛逃，泄露了张

贵的突围计划。元军加强防备，张贵率军奋力死战，终于到达与范文虎约定会师的地点。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怯懦的范文虎竟然违约退兵，使元军抢先占据了龙尾洲，以逸待劳。张贵孤军奋战，所率勇士全部战死，张贵最后也因伤重被俘壮烈牺牲。此后，襄樊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又完全断绝了。

元军包围襄樊前后达五年之久，却久攻不下，不得不调整战略部署，改变战法。元将阿里海牙在分析了攻守形势后上奏忽必烈："襄阳之有樊城，犹齿有唇。宜先攻樊城，断其声援。樊城下，则襄阳可不攻而得。"忽必烈采纳了他的意见，命阿术指挥元军，刘整、阿里海牙指挥汉军，加紧进攻樊城。

元将张弘范向阿术献计说："若从陆路攻樊，襄阳出舟师救援，恐难以得手。只有先截断江上浮桥，阻其援兵，再水陆夹击，才能破樊城，那时襄阳就不攻自下了。"阿术认为有理，遂按此计行动，于至元十年（1273 年）正月，派水军焚毁了襄阳通往樊城的浮桥，切断了两城的联系。

接着，阿术集中水陆兵力，又调来产自西域的巨炮"回回炮"，向樊城发起总攻。樊城守军得不到襄阳的支援，于正月十一日城池失陷。樊城守将牛富率兵与元军展开巷战，最后身负重伤，投入火中自焚而死。另一位宋将范天顺见大势已去，表示"生为宋臣，死为宋鬼"，在所守之地也自杀身亡。

樊城失陷后，吕文焕不断设法向临安告急。贾似道蒙蔽宋度宗说，襄阳之围一定能解，背后却命令不向襄阳派一兵一卒。二月，元军从樊城移师直攻襄阳，以"回回炮"攻城。吕文焕见待援无望，又害怕"回回炮"的威力，只好献城投降。历时六年的襄樊攻防战，终于以元军全取襄樊而告结束。

元军攻占襄樊，使蒙、宋三十余年来对峙的僵局被打破，从而带来了宋、元战局的根本性变化。元对宋在战略上已处于绝对优势，攻灭南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北京保卫战】

元朝被推翻后，一部分残余势力逃往漠北，历史上称作"北元"。后来经历了几十年的演变和分裂，北元瓦解，分成鞑靼和瓦剌等部。到了 15 世纪中叶，瓦剌部在其首领脱欢、也先的统领下逐渐强盛起来，并统一了蒙古各部，控制地域西起中亚，东接朝鲜，北连西伯利亚，南逼大明疆土，成为明王朝北方的劲敌。

这时候，明朝统治集团内部宦官王振专权，政治黑暗，贪污成风，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农民大量流亡。政治的腐败与经济的萧条，导致了明朝军事力量的不断削弱，北部防线逐渐南移。也先看到明朝边境防御日渐空虚，就不断派兵南下袭扰，并乘势步步进逼，把自己的疆域逐步向南扩展。

明正统十四年（1449 年）二月，瓦剌派使者向明朝贡马，谎报朝贡人数，企图多领赏品，王振由此下令削减马价，双方引起纠纷。也先早就想发兵南下，于是便抓住这次机会，以明廷侮辱贡使、削减马价为借口，纠集大军进犯大同，并分兵向辽东、宣府、甘肃等地发起了大规模进攻。边报传至朝廷，王振不顾众臣的劝阻，竭力怂恿年轻的明英宗御

驾亲征，打算借皇帝亲征之名，吓退瓦剌军队，也趁机抬高自己的声望。明英宗是个没有主见的人，在王振的挟持下决定出征。



北京保卫战（油画）

八月十四日，明军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遭到瓦剌军的堵截包围。翌日，瓦剌军佯退，王振下令移营就水，阵势大乱。瓦剌骑兵乘机进攻，明军仓猝应战，将士伤亡过半。英宗被俘，王振也死于乱军之中。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土木之变”。

土木堡惨败、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群臣相对而泣，上下一片惊慌。十七日，皇太后孙氏和皇后钱氏接到英宗派人送来的密信，信中要求多送金帛赎回自己。皇太后急忙命人搜索宫中珍宝，装了八车送往瓦剌，结果毫无回音。皇太后没有办法，只好命郕王朱祁钰（英宗弟）代理朝政，召集众臣商议战守对策。

朝议中，翰林侍讲徐珵说：“我观验星象，看出天命已去，只有南迁才可以解救国难。”徐珵话一出口，立即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兵部侍郎于谦站出来，义正辞严地斥责道：“倡议南迁的人，该斩首！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宋朝南渡的教训难道大家忘了么？现在应立刻调集勤王之兵，誓死守卫京师。”于谦的意见得到了皇太后、郕王以及多数朝臣的支持。于是，朝廷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负责部署保卫北京的事宜。

这时，北京城内疲兵羸马不足十万，政局动荡，人心惶惶，社会秩序混乱不堪。于谦受命于危难之秋，针对这种形势，决定先从稳定政局入手。

一天，郕王临朝理事，众臣哭诉王振的罪行，纷纷提出族诛王振以安人心的要求，朱祁钰迟疑不敢答复。王振的党羽马顺上前喝斥，激起众怒，被群臣一拥而上当场打死。同时被打死的还有宦官毛贵、王长。又有人乘势捉住王振的侄子锦衣卫指挥王山，一时群情激愤，朝班大乱。郕王吓得六神无主，正要退避。于谦挺身而出，上前拉住郕王，劝他当众宣布马顺等人当死，百官无罪，这才将混乱的局面安定下来。接着郕王下令处斩王山，诛王振党羽及全族。朝中的宦党势力受到打击，人心渐渐趋于稳定。

内患既除，但国不可一日无君。郕王监国摄政，遇大事总不敢决断，这对明王朝的战守非常不利。于谦等文武大臣多次劝谏，说服了皇太后和郕王，拥

立郕王即位称帝，统一朝政号令，从而扭转了动乱的局面。同时，这也从政治上打击了也先，使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诡计不能得逞。

稳定了政局，于谦又从各地选拔出有才干的将领，组成抗战的指挥集团，开始着手调兵筹饷，整军备战。于谦等人首先调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直隶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紧急集中北京，又派人到京畿、山东、河南等地招募兵士，速成训练，以备调遣；将通州（今北京通县）可供京师一年之用的数百万石粮米运入北京，加强了后勤实力。接着于谦组织军民加固城墙，并疏散城外周围居民，加大防御纵深；又命工部赶造兵器战车，同时将南京库存的军用物资赶运来京；还派人到土木堡收集明军丢弃的盔甲兵器，以充实战备。经过这些措施实施，短时间内就组织起二十二万兵强马壮的守卫大军，明军的守城实力迅速得到了加强。

十月，也先率瓦剌军分三路大举攻明。东路两万人马取古北口（今北京密云东北），作为牵制力量；中路五万人马，从宣府方向进攻居庸关；西路由也先自率十万主力，挟持明英宗，经大同进攻紫荆关（今河北易县紫荆岭），企图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分进合击，一举夺占北京。也先由熟知紫荆关设防部署的被俘太监喜宁引导，率军偷越山岭，内外夹击，攻克了紫荆关。此后，又挥师南下，经易州（今河北易县）北上直逼北京。

于谦得到瓦剌入侵的战报后，立即奏请景帝朱祁钰，急调各地宗室的部队进京勤王，以配合北京守军夹击瓦剌军。接着于谦召集抗战指挥集团，商讨作战方略。

针对敌人的来势，兵马司提出，拆毁城门外民房，实行坚壁清野，以利于战守。都督王通发表意见说：发动军民在城外挖深壕，前筑工事据守。总兵石亨则主张军队全部撤入城内，尽闭九座城门，坚壁死守。众将领虽然意见不尽一致，但都认为瓦剌军来势凶猛，应先避敌锋芒，以守为主。于谦不同意这些意见，认为不应该消极防御，他向众将领陈述了自己的主张：“瓦剌现在气势嚣张，据守不战则表示我们害怕他们，这就会更加助长敌人的气焰。我们不能示弱，让他们轻视我们。我认为应该列阵于城外，用冲锋来迎战他们。”众人听后，也觉得拒敌于城外更为主动，都同意了于谦的主张。最后，于谦同众将领协商制定了依城为营、以战为守、分调援军、相互配合的作战部署。

于谦随即将调集的二十二万军队依城列阵于九门之外，都督陶瑾、刘聚等将领分别统兵列阵于安定门、西直门等城门下，于谦则同石亨指挥诸军，并亲率副总兵范广、武兴列阵在德胜门外，



土木堡城门



于谦

挡住瓦剌军的来路。同时派都督王通、副都御史杨善率一部分兵力防守城内。

布置完毕，于谦下令闭门誓师，宣布任何人即使战败也不得退入城内。并规定，将领临阵不顾军队先退的，斩首；军士不听将领指挥先退的，后队斩前队。于谦躬擐甲胄，身先士卒，眼噙泪花，号召守城三军："要用我们的头颅与热血，来雪皇帝被俘的奇耻大恨!"

十月十一日，瓦剌军主力逼近北京。也先命军队列阵于西直门，而把英宗放置在德胜门外，想要迫使明廷献城投降。于谦不为所动，决定先发制敌，打一打也先的气焰，于是命令都督高礼、毛福寿率军出击，在彰义门（今广安门西十余里）北，打败了瓦剌军先锋，斩杀数百人，夺回被俘者千余人。这天晚上，于谦又派薛斌率军潜入瓦剌军营，偷袭成功。瓦剌军受此两挫，士气大为折损。

也先原以为明军不堪一击，没想到北京守军阵严气盛，战斗力这么强，开始感到有点惊恐。也先料想如果继续打下去，恐怕于己不利，便采纳了降阉喜宁的计策，遣使入城，邀明廷派大臣"迎驾"议和，妄图诱于谦、石亨等人前来，将其扣留，使明军失去指挥，不战自溃。于谦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阴谋，但为了揭穿也先的诡计，掌握主动，遂派赵荣、王复前往谈判，同时，于谦下令守城将士不得谈论议和之事。

也先见于谦、石亨等重要将领未到，就借口来使官小，不与谈判，要明廷派于谦、石亨、王直等人前来。这时朝中主和派又乘机大倡和议之策，景帝一时难以决断，就派人征求于谦的意见。于谦坚定地回答："现在我只知道有战事，其他事一概不愿听到。"并劝景帝说："当前应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于谦的一番话，坚定了景帝抗战的决心，粉碎了也先的阴谋。

十三日，也先撕下了议和的伪装，集中主力向德胜门发动进攻。于谦令石亨在城外民房设置伏兵，派小队精骑主动迎击，交战后佯装败退，诱敌进入设伏地域。也先果然中计，率万名骑兵紧追不舍。范广出其不意，指挥"神机营"突然发射神铳、火箭，打得瓦剌军晕头转向。石亨乘几率伏兵投入战斗，前后夹攻，瓦剌军死伤无数。号称铁颈元帅的也先弟弟勃罗和平章卯那孩也中炮身亡。也先这时才发现明军主力就在德胜门，于是急忙撤军，集中力量转攻西直门。

都督孙镗率西直门部队迎击瓦剌军，杀败了瓦剌军先锋。但也先不断增兵，孙镗力战不支，想退入城中。负责监军西门的给事中程信严令不许开城门，让城上守军发射火器轰击瓦剌军，配合孙镗守军战斗。这时高礼、毛福寿和石亨率援兵从彰义门、德胜门赶到，会合孙镗三面围攻瓦剌军。瓦剌军抵挡不住，在也先的率领下仓皇向西南方向退去。

十四日，也先整顿兵马，再次进攻彰义门，于谦派武兴、王敬率军迎战。明军前队以神铳轰击，后队列弓弩继进，将瓦剌军击退。这时，景帝所派的监军太监率数百骑企图抢前争功，冲乱了明军的阵势，副总兵武兴中箭牺牲。瓦剌军乘势反击，追至土城（在德胜门外）。在此危急时刻，土城居民纷纷爬上屋顶，大声呼喊，向瓦剌军投掷砖石，配合明军打击瓦剌军。佥都御史王竑和都督毛福寿又率援军赶到，再次打退了瓦剌军的进攻。

此时，进攻居庸关的五万瓦剌军也遭到守关明军的顽强抵抗，被迫撤退。也先见北京城防守严密，屡战不利，手中的英宗又失去了要挟作用，在得到中路军兵败居庸关的消息后，又获悉各地勤王军即将到达，他害怕后路被切断，于十五日夜间偷偷拔营撤走。于谦发现也先撤军，立即派石亨等集中火炮轰击，并急令明军乘胜追击，又在固安（今河北固安）、霸州（今河北霸县）歼灭瓦剌军万余人，擒获其将领四十八个，夺回被掳人口、牲畜数以万计。至此，北京保卫战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瓦剌败退后，于谦继续加强北方边镇的防务。也先几次出兵南犯，都被击退。在武战不胜、求和不成的情况下，瓦剌被迫于景泰元年（1450 年）八月无条件释放英宗回朝，恢复了对明朝的臣属关系。其后，瓦剌内部矛盾不断加剧，势力渐渐衰败下去，明朝北方边境的威胁才得以解除。

【宁远之战】

“我从二十五岁带兵作战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何单单一个宁远城却攻不下来呢?”后金杰出的军事首领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失利以后，这样向他的部将问道。

宁远一役，后金损兵折将，是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以来，最为惨重的一次失败。已近风烛残年的努尔哈赤，经受不住宁远城下的惨败所带来的精神打击，背生毒疽，不久便愤然辞世。而明军凭借主帅的正确谋略，镇定指挥，同仇敌忾，以少胜多，取得了自萨尔浒（今辽宁新宾西）战役惨败以来的第一次胜利。宁远之战连同这位主帅的名字一起载入史册，名垂后世。这位主帅便是袁崇焕，我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将领之一。

袁崇焕，字元素，祖籍广东东莞，生于广西藤县。他为人慷慨，心雄胆壮，富有谋略。自少时起，他就立志于边塞，以安边治国为己任，希望建立不朽勋业。为此他熟读兵书，平时与人交谈，也离不开用兵打仗。他在任邵武（今福建邵武）县令期间，每天都找了解“辽事”的老兵讨论边塞军事，侃侃而谈，“绝不阅卷”。由此他掌握了相当丰富的边塞知识和用兵谋略，故常以“边才”自许。

就在袁崇焕忧心欲报国的同时，努尔哈赤率领的铁骑已把明朝边防冲得七零八落。自“七大恨”誓师起兵以来，后金军已先后攻占抚顺、开原、铁岭、辽阳、沈阳等地，萨尔浒之战令明军元气大伤。天启二年（1622 年）正月，明军辽西战事失利，努尔哈赤又得广宁（今辽宁北镇），直接对关内地区构成了严重威胁。

广宁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明廷上

下一片慌乱。正值此时，袁崇焕入京朝觐，当他得知辽西战役失利后，立即上书朝廷，表示愿赴关外为国效力。此时正是用人之际，熹宗即刻任命袁崇焕为兵部职方司主事。二月十六日，袁崇焕辞朝出关，详细考察了山海关形势。回京后，他向朝廷发出豪言壮语："给我兵马钱粮，我一人足以守关！"袁崇焕的一番话，给惶惶不安的明王朝注入了一支镇定剂。二十八日，熹宗批准提升袁崇焕为宁前兵备佥事山海监军。三月初，袁崇焕肩负重任，出关赴职。

袁崇焕认为对后金应主守而后战，主张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坚守关外，在举足轻重的宁远（今辽宁兴城）要塞，建立坚固的防线，防止后金军队南下。但他的意见得不到辽东经略王在晋的支持，袁崇焕纵有满腹奇略，却一时也不能付诸实施。

八月间，王在晋被免去了辽东经略的职务。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以天下为己任，勇赴国难，自请出任经略。袁崇焕再度提出守关外以捍关门的方略，得到了孙承宗的全力支持。孙承宗是个颇具战略眼光的人，他也发现了宁远依山傍海，有着重要的战略价值，因此，便和袁崇焕等诸将领一道，倾注全力经营宁远。三年间的苦心经营，一条以宁远为重点的宁锦防线终于建立起来。袁崇焕的战略构想变成了现实。

孙承宗、袁崇焕挡住了后金南下的铁蹄，却没有能够挡住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从背后射来的暗箭。孙承宗在朝廷中功高权重，魏忠贤想把他拉拢到自己一边。但孙承宗不肯与阉党同流合污，遭到魏忠贤的嫉恨，他唆使其党羽上书熹宗，参劾孙承宗。在魏忠贤的打击下，孙承宗被迫去职。天启五年（1625年），辽东经略的职务落到了阉党高第的手中。

高第是个怯弱无能的人，主张退守关内，故而一上任就下令拆撤宁锦防线。眼看自己数年心血毁于一旦，袁崇焕怎能不痛心疾首？当高第命令袁崇焕撤出宁远卫与前屯卫（在宁远西南，今绥中西南）两城时，袁崇焕拒不从命，他大义凛然地说："我是宁前道，当官在此，要死就死在这里，绝不离开宁远半步！"袁崇焕眼睁睁地看着高第撤防、驱赶军民进关，心中悲愤难当，上书朝廷要求辞职，但熹宗不准奏，于十二月还提升他为按察使，继续执行原定职责。此时，他驻守的宁远城在关外辽西一线仅是孤城一座了！

努尔哈赤听到明朝辽东前线换帅，又自动撤了锦州、右屯一带防务的消息，不由得大喜过望。自他天启二年初占得广宁直到现在，时隔三年多没有发动大规模伐明的战争，除了出于其自身因素考虑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明廷派重臣出关，致力于防务，努尔哈赤未测虚实，不敢贸然用兵。此时出现这样的形势，对努尔哈赤来说无异于天赐良机，眼看自己的宏图大业就要实现，努尔哈赤怎不心花怒放？于是他决定，攻克宁远，挺进山海关，以图霸业！

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努尔哈赤亲率诸贝勒统领八旗大军，向明朝发动了新的大规模进攻。后金兵将如入无人之境，未遇任何抵抗，一往无复顾忌，直取宁远。二十三日，抵达宁远城郊。

努尔哈赤到底是一个谋略很深的人，他以攻心为上，想收到不战而得之效，

遂先派被俘汉人进城给袁崇焕传信："我以二十万大军攻此城，定能攻破。你们若肯投降，马上封以高爵！"袁崇焕反唇相讥："汗为何向宁锦加兵？这都是你抛弃的地方，我既已恢复，就有责任死守，岂有投降之理？你说出兵二十万，是虚夸之数。我已知道你的兵力只有十三万，我又怎能对此数嫌少呢！"

袁崇焕对后金的进攻早就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他已决定与宁远卫共存亡，并精心进行了军事部署。

当后金兵渡辽河的消息传来后，袁崇焕命令中左所、右屯等处兵马及宁远城外的驻军，连同西洋大炮，一并撤入宁远城防守，集中兵力，严阵以待后金兵马到来。接着袁崇焕又实行坚壁清野。传令住在城外的百姓携带守城工具迁入城里，所剩屋舍与积蓄全部付之一炬，使后金兵到此一无所获。同时在防务上实行严密分工，集中指挥。袁崇焕令同知程维模督察奸细，防止后金派人混进城中刺探军情；通判金启倧编排民夫，供给饮食；卫官裴国珍负责采办物料；总兵满桂提督全城的防务，自己则总督全局。

袁崇焕深知，以宁远城一万余人的兵力，抵抗十数倍于己的敌人，关键是要激发起全城军民同仇敌忾的抗战热情，树立起敢战敢胜的无畏勇气。他召集大将满桂、参将祖大寿、守备何可纲等，把全城官兵集中在一起，慷慨激昂地进行了战前动员。讲到激愤时，袁崇焕突然拔出佩刀，手起刀落，左臂赫然出现一道血口，鲜血顿时喷涌而出。他用右手食指蘸着鲜血，在众目睽睽下血书急就而成。袁崇焕托起血书，面对全体将士，双膝下拜，郑重委托他们一定要不惜一切牺牲，坚守住宁远这座孤城。



袁崇焕

全城军民都为袁崇焕的壮举所深深打动，纷纷表示愿与宁远城共存亡。他们迅速行动起来，不能登城打仗的，就参加后勤供应，连那些文弱书生也投笔从戎，负责把守城内各巷口。为了防止军心民心动摇，袁崇焕与军民约定，战斗中有乱行动者即杀，城上的人有擅自下城者即杀。他通令守前屯的赵率教、守山海关的杨麒，凡从宁远脱逃经其处者，逮住即杀，如若放跑一人，惟赵、杨是问。经过一番严密的组织动员，宁远全体军民把共同的命运都维系在宁远一战的得失成败上了。

袁崇焕抱定如此誓死守城的决心，努尔哈赤的诱降之计又怎能得逞？回答他的是从宁远城上发出的隆隆炮声。后金军队猝不及防，被炸死伤数十人，不敢久留，忙把营帐迁至城西侧。

努尔哈赤见攻心失败，遂调整兵马，二十四日下令发起对宁远城的总攻。他选择了明军防守力量薄弱的西南角作为攻击点，企图由此突破，并可以阻击从

山海关调来的援兵。努尔哈赤横刀跃马，亲自指挥攻城。

城内，袁崇焕正与几个幕僚闲谈，得到后金攻城的警报后，他面无忧色，镇定如常，立即乘轿至敌楼，令城上的兵民偃旗息鼓，不要发出声响。待后金兵近城，进入射程之内，袁崇焕一声令下："开炮！"忽听一声巨响，架在城上的西洋大炮开始发挥威力，震得城墙都发颤。袁崇焕笑着说："敌人攻城，正好让他们尝尝西洋大炮的滋味！"他推开窗子，俯视城外，后金人马蔽野，骑兵、步兵、楯车、钩梯一拥而至。

后金采取楯车与步骑相结合的"结阵"法攻城，却抵挡不住威力强大的西洋大炮。只要一被击中，楯车便炸得粉碎，后金士兵更是血肉横飞。但后金毕竟人多，他们不顾死伤累累，踏着同伴的尸体拼命向城下推进，一些楯车已直抵城墙脚下，猛烈地撞击着城墙。冲到城下的后金士兵，在楯车的遮护下也开始凿城，不多时，宁远城下已有三四处高约二丈余的墙被凿出了一个个大窟窿。情况万分危急！

袁崇焕眼见城墙要被凿破，也豁了出去，他身先士卒，挑石土堵塞缺口，不意受伤，众将士见主帅受伤就要把他拉下。袁崇焕厉声喝道："偷息以生，复何乐也！"说着，从自己身上撕下战袍，包扎伤处，继续奋不顾身地挑土搬石。袁崇焕的大无畏气概，深深感染和鼓舞着将士们，他们个个争先，很快又将缺口堵住。此时通判金启倧急中生智，猛然想起用火对付敌军的办法。袁崇焕迅速采纳了他的建议，把一捆捆柴草浇上油并掺入火药，用铁索系到城下，城上明兵急速投下点燃的火箭、硝磺等易燃物，引燃柴草。楯车、盾牌都是木制的，遇火即燃，顿时城下一片火海，潜伏在楯车下的士兵大多被活活烧死。

激战一直持续到晚上，后金兵冒死不退。城上举火，又将火球、火把掷下，城上城下，火光冲天，把半个天空照得如同白昼。后金兵马伤亡惨重，尸体堆积成山。至二更时，努尔哈赤只得下令停止攻城。

次日，后金又发动新的攻势，喊杀声、炮声与北风的怒吼声交织在一起，战斗进行得像昨日一般残酷异常。明军在袁崇焕的带领下，箭如雨，矢如蝗，西洋大炮轰鸣声不绝，抵抗得仍很顽强。久攻不下，伤亡惨重，后金兵斗志渐消，再也没有一个敢靠近城下。努尔哈赤在乱军中奋力指挥，不料被西洋大炮轰下马来，后金兵一见主帅受伤，登时队伍大乱。努尔哈赤不能继续组织攻城，只得下令退兵。袁崇焕乘势领兵杀出城去，一直追赶了三十里，大胜而归。努尔哈赤收拾残兵败将，退到距沈阳四十里的叆鸡堡，才停了下来。

宁远之战，以明军大胜而告终。此后，明与后金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宁远战役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明王朝的灭亡。

袁崇焕战后的一番总结，回答了困惑努尔哈赤的问题。他认为取胜后金的原因在于将士用命，百姓支援，上下同心，众志成城。此外，他还认识到旷野厮杀、拼击不是明兵所长，只有依赖坚固的城池和大炮，使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制服后金。这一重要战略思想的提出，恰是从军事上对宁远之战的经验总结。它成为明军此后相当长时期内对后金作战的指导方针。

【赤嵌城之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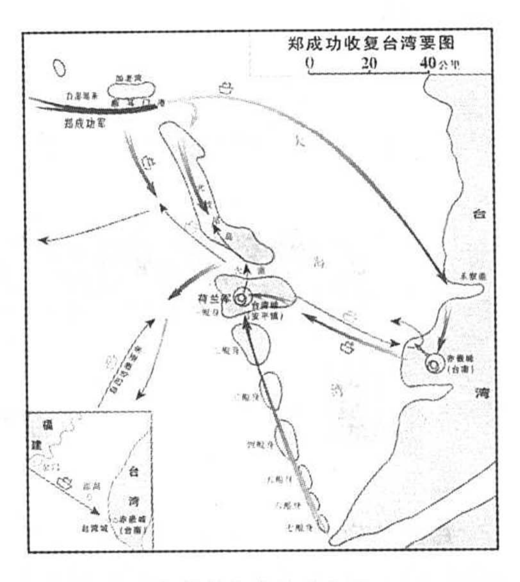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在隋朝以前称夷洲；到了隋朝，称流求；明朝又把流求改称为北港（鸡笼）；明朝末年，才改称台湾，自此以后，一直沿用到现在。

公元17世纪初，统治中国的明王朝日趋衰败，当时倭寇和西方殖民主义者，乘机在我国东南沿海进行各种骚扰和侵略活动。1603年，荷兰殖民者侵占了我国的澎湖地区。后来，被我军民赶走。但荷兰殖民者侵略中国的野心不死，于1624年又霸占了台湾西南海岸的安平湾一带，并在鲲身（今安平）岛上建造了“热兰遮”城（亦称台湾城）。随后，又在赤嵌（今台南西）建筑了“普罗文查”城（即赤嵌城），并把这两座城作为荷兰控制台湾的重要据点。为了争夺我国的台湾，荷兰和西班牙这两个殖民强盗，进行了长达十五年的战争，结果荷兰战胜西班牙。1642年，荷兰殖民者独占了我国的宝岛台湾。

荷兰殖民主义者侵占我国台湾后，对台湾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他们强迫台湾群众交纳繁重的苛捐杂税，并立下各种征收名目，大肆勒索与盘剥。规定对七岁以上的中国人，每月都要征收人头税，对打猎的群众要缴纳猎税，对下海、河捕鱼的渔民要强征鱼税等等。此外，殖民当局还破坏在台湾居住的汉族同高山族及其他民族的团结与友好关系。在经济上，殖民主义者竭力掠夺台湾的各种资源，并垄断了台湾的对外贸易。更令人发指的是，荷兰殖民者甚至强行将台湾人贩卖到爪哇等地去当奴隶。不甘屈服的台湾人民，对荷兰的殖民统治和残酷剥削进行了强烈的反抗和英勇的斗争，并渴望得到大陆人民的支持和帮助。最后，他们把驱逐侵略者的希望寄托在坚持抗清斗争的郑成功身上。

郑成功，是福建南安人，原名福松，又名森，字明俨，号大木。后来受隆武帝赐姓朱，改名成功，所以被称为“国姓爷”。在清兵南下进攻福建时，他自封招讨大元帅，以广东的南澳为基地，进行反清斗争。后来，郑成功率部北伐，进攻南京失利，退到福建、广东沿海一带活动。为了开辟新的抗清根据地，长期与清王朝统治者对抗，同时激于对荷兰殖民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的义愤，郑成功决定挥师东向，收复台湾。

正在这个时候，一个从台湾逃回厦门的翻译，名叫何延斌，这个人有一定的爱国心。他专门拜见郑成功，再三劝说郑成功率兵赶走荷兰殖民军，夺回被占领土。他对国姓爷说：“台湾土地肥沃，交通发达，所处地位十分重要。如



郑成功收复台湾要图

果得到这块土地，可以丰衣足食，训练出强大的军队。如今台湾汉族和高山族人民遭受荷兰人的欺负和压迫，进行了多次武装起义。现在凭你的实力和威望，一定能够把荷兰侵略者赶走。”接着，何延斌又向郑成功讲了荷兰人在台湾的兵力部署和设防情况，并献给他一张台湾海图。郑成功接过海图十分激动，觉得出兵的条件已经具备，遂决定尽快收复台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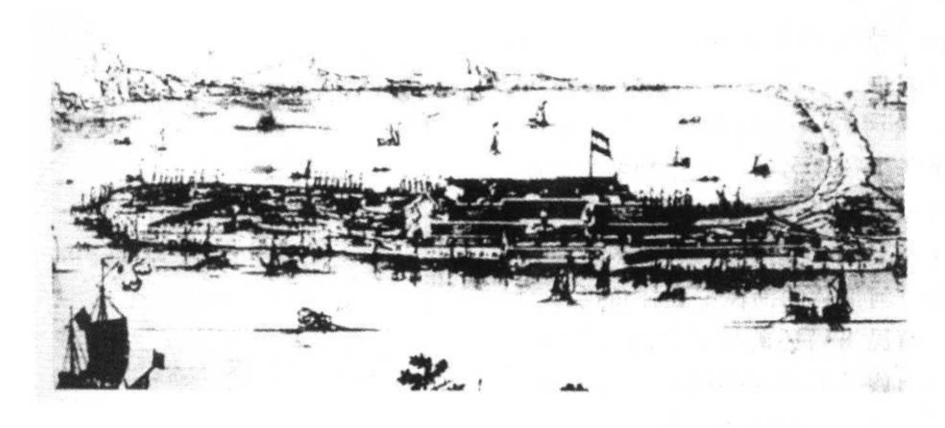
为了收复台湾，郑成功加强了对士兵的军事训练，特别是海上作战的训练。同时，又准备了大批的船只和各种武器、粮食。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郑成功定于南明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1661 年）四月出兵台湾。为了配合作战，他命令儿子郑经带领一部分军队坚守金门和厦门。郑成功率领二万五千大军，乘坐战舰三百五十多艘，以何延斌为向导，趁着海水涨潮时，从金门出发，经过澎湖，向鹿耳门（在赤嵌城附近）驶去，并顺利地在禾寮港（今台湾台南境内）登陆。

运来粮食，有的提水端茶迎接大军的到来，有的主动向大军报告敌情，也有的拿起武器，保护粮仓，救护伤员，积极配合郑成功的军队打击荷兰侵略者。他们不再到荷兰人开办的学校去，并且焚毁荷兰的书籍，重新恢复被荷兰人强令改变的风俗习惯，打死了一些往日横行霸道欺侮他们的荷兰人。

郑成功在台湾人民的积极援助下，一面派部队去切断敌人的陆上交通，一面乘胜进攻赤嵌城。

在奇袭赤嵌城的时候，郑成功的部下抓到一男一女两个年轻的荷兰人，他们衣着华丽，好像是新婚夫妇。郑成功让何延斌审问他们，开始他们什么也不说。郑成功就命令先将他们看管起来，好好照料他们的食宿，以后再慢慢盘问。

赤嵌城城墙上有四座炮楼，七百多名守兵。守将苗难实叮见郑成功的部队声势浩大，连战连胜，吓得不敢出城作战，只命令炮兵不断轰击中国军队的驻地。郑成功担心房屋和仓库里的粮食被敌人的炮火焚毁，便命令一部分人马去



赤嵌楼

郑成功的军队一上岸，台湾各族群众纷纷前来欢迎和支援，有的推着小车

保护和抢救，并且迅速把抢救和征集来的粮食分发给各镇士兵。战士们顺利登

陆，连打了几个胜仗，现在又分到了充足的粮食，士气更加旺盛。

郑成功恩威并施，一面命令士兵们把柴草堆在赤嵌城周围，准备在敌人拒不投降时放火烧城，一面派人前去招降。他在给敌人送去的劝降信中说：荷兰在台湾的兵力寥寥无几，欲同中华大军对抗，真是愚蠢之极。若在我军开炮之前，把城堡献出，可保你们的生命安全，如有什么要求，也可以答应，决不食言。即使在我军开炮以后，你们挂起白旗来求和，我军也将立即停止炮击。如你们携带家眷来投降，真心愿意放下武器，我军可马上把大炮撤回船上，你们的财产将受到保护，并准许你们携带私人财物离开台湾。

苗难实叮派人去请示荷兰驻台长官揆一。揆一此时还幻想能来救兵，拒绝投降。他答复说，为了荷兰及东印度公司的利益，即使危及生命也要继续守卫台湾。

就在这时，郑成功的士兵所抓获的那两个荷兰人，因为看到郑成功待他们很有礼貌，所以解除了顾虑，说话了。原来他们是苗难实叮的弟弟和弟媳，新近结婚，来台湾探望哥嫂。那天他俩出城游玩，想不到郑成功的军队从天而降，他们便成了俘虏。郑成功让何延斌对他们讲明“国姓爷”收复台湾是天经地义的事，请他们回去劝说苗难实叮。苗难实叮因为已被四下包围，孤立无援，城里又缺水少粮，无法再顽抗下去，他更害怕郑成功放火烧城，于是便挂起白旗投降了。赤嵌城宣告收复。

另一支被围困在台湾城（王城）的荷兰军队，在粮食和水源切断以后，饿死了不少人。同时，又不断遭到郑成功军队的打击，伤亡很大，士气一蹶不振，内部混乱不堪。在此督战的揆一，眼看粮食、弹药和水源都难以为继，顽固死守下去已无路可走，便使了个计策，向前来劝降的人说，愿意以几万两饷银和土产作为条件，并送劳师银十万两，要求郑成功放弃台湾，收兵返回大陆。对此，郑成功坚决地予以拒绝，并义正词严地重申：“台湾是中国的土地，长期以来被你们霸占，今天我来收回，这是理所当然的。”

揆一见阴谋破灭，又妄图调兵前来解围，驻爪哇的荷兰军舰队司令卡宇率战舰十艘、士兵七百名赶来增援，但在郑成功军队的严厉打击下死伤惨重，狼狈而逃。这时，台湾城内的荷兰守军，目睹援军溃败，士气更加低落。在郑成功的强大攻势下，他们只好乖乖地举起了白旗，缴械投降。清康熙元年（1662年）二月一日，荷兰驻台长官揆一垂头丧气来到郑成功的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了字，荷兰殖民军从台湾全部撤走。

在伟大的民族英雄郑成功的坚持斗争下，我国终于收复了被荷兰殖民者占据达三十八年之久的领土台湾，台湾人民重新回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怀抱。

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后，制律法，行屯田，兴学校，并将其改名为安平镇，赤嵌城改名为承天府，设县二，一曰天兴，一曰万年。

【雅克萨之战】

公元17世纪，满族崛起于东北，建立清王朝，并入关夺取了对全国的统治权。这时候，世界上早期殖民主义势力正方兴未艾，大肆从事对外扩张，许多

国家和民族遭到前所未有的劫掠、奴役和蹂躏。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接踵来到中国的东南沿海，沙皇俄国也窜至中国的北部和东北边疆。清王朝，从它建立全国政权的时候起，就遇到了复杂而棘手的同西方国家的矛盾，面临着中国历代王朝从未经历过的险恶的国际形势。

从明崇祯九年（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 年）起，俄国侵略军开始入侵中国东北边疆，先后占据了黑龙江上游的尼布楚城（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和雅克萨城（今黑龙江漠河东南）。俄军在尼布楚与雅克萨建筑寨堡，设置工事，勒索贡税，绑架人质，建立殖民农庄，奴役和镇压当地的中国各族居民，并不断向黑龙江下游进行骚扰、扩张。

黑龙江流域是满族的故乡，是清朝的发祥地，王朝统治者自然不能容忍俄军在这里为所欲为，驱逐入侵军、收复失地成了朝廷十分强烈的愿望。康熙皇帝曾说："朕十三岁亲政之后（康熙帝亲政在康熙六年，1667 年），即留意于此（指俄国侵占黑龙江流域），细访其土地形胜、道路远近及人物性情。"可见清王朝的统治者早已看出来自沙俄的侵略势力不可低估，一直密切注视着北方边防，抵抗侵略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但是，在入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正集中全力，争夺对全国政权的控制，不可能用很多力量去顾及黑龙江的防务。直到清康熙二十年（1681 年）平定三藩叛乱之后，才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东北，开始作武装驱逐侵略者的各项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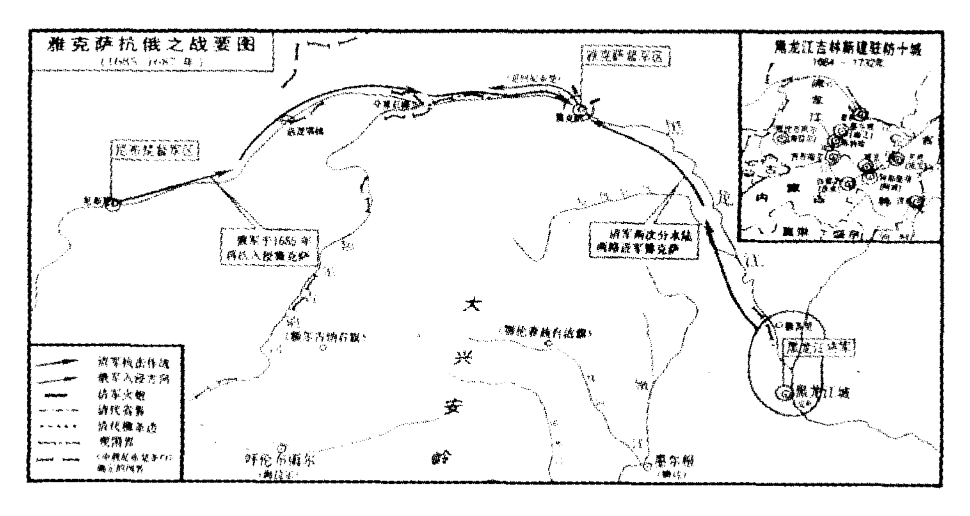


雅克萨之战（油画）

清廷奉行的方针是军事斗争、外交谈判和充实边防三者并举。他们在和俄国长期交涉的过程中逐渐懂得：没有强大的武装，不建立巩固的边防，不经过激烈的斗争，是不可能劝说俄军放弃侵略、撤出中国领土的。同时，清朝统治集团也懂得：中、俄两国都是封建大国，不可能用军事力量彼此压服，只有通过谈判，商定两国都可以接受的边界线，才能保障边境的安宁，才能保持长期的和平。所以军事斗争的结果还是要举行谈判，用兵的目的是为了自卫，为求得比较公正的解决。

康熙皇帝总结了中国军民三十多年来同俄国侵略者进行斗争的经验，制订了周密的计划，进行了细致的准备工作。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即平定三藩之乱后的第二年，康熙帝在四月到盛京（沈阳）谒陵后，由抚顺、兴京（今辽宁新宾西）、哈达城（今辽宁西丰东），

出柳条边，五月到船厂（今吉林市），航行于松花江上，亲自视察边防情况。同年九月，康熙派副都统郎淡、公彭春率领数百人，以捕鹿为名，到雅克萨附近侦察地理形势和水陆交通。郎淡等回到北京后报告说，“攻取罗刹（清朝对俄国人的称呼）甚易，发兵三千足矣”，并建议立即采取行动。康熙没有同意这种单纯从军事上考虑的意见，认为必须作更为充分的准备，先在黑龙江（今黑龙江黑河东南）和呼玛尔（今黑龙江呼玛河口）两地建城驻兵，贮存粮食，修造船只，筹划屯田，开辟驿路，以求战而能胜、胜而能守。



雅克萨之战要图

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夏天，第一批乌喇宁古塔官兵一千人在副都统萨布素率领下到达瑷珲（今黑龙江黑河南）。次年秋，又有乌喇宁古塔官兵及增派的达斡尔官兵一千人，携带家属到黑龙江屯田驻守。这两批军队共有两千人，是守卫边境、对俄作战的主要力量。清军到达瑷珲后，即在黑龙江东岸古城的废墟上建立城堡，城名黑龙江，设将军驻守，萨布素担任第一任黑龙江将军。

清军进驻黑龙江后，在当地人民的配合下，拔除了俄军在黑龙江中下游的许多侵略据点，收复了大片中国领土。但清朝统治集团并不是单纯采取军事手段，每次战斗都先礼后兵，派人进行政治劝说，表明只要俄军停止侵略，就愿意同俄国保持和平。而俄国方面则野心不死，准备顽抗到底。俄国政府将黑龙江地区殖民占领的军事机构作了全盘调整，任命熟悉情况并以精悍骁勇著称的弗拉索夫和托尔布津分别担任尼布楚和雅克萨的督军，增调援兵，贮存粮食物资，构筑工事，加固城防，准备赖在这里，长期盘踞下去。清廷除了用武力驱逐侵略者以外，已没有其他选择了。

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六月，清军进抵雅克萨，先遣返俄俘费咬多里等三人入城，带去了两件公文，一件是康熙致沙皇的信，一件是清军都统彭春给雅克萨俄军的咨文，要求俄军立即撤离中国领土，对侵略者发出最后警告。

六月二十三日，清军统帅部移至雅克萨城下与俄方对话，但俄军头子托尔布津却出言不逊，并故意挑衅。

二十四日，清军列阵，包围雅克萨。

二十五日，有一队俄军从黑龙江上顺流而下，企图冲进雅克萨，被清军拦截，在江面上展开激战，毙伤俄军四十多人。接着，清军又架起大炮，向雅克萨猛烈轰击，城内到处起火，俄军伤亡惨重，心胆俱裂，走投无路。清军多次把劝降信射入城内，投降条件十分宽大，俄军只要撤出雅克萨，保证不再重来，就可以保全性命，并允许俄军带走自己的武器和财物。至此，托尔布津无可奈何，只好竖起了降旗。清军准许七百多名俄国人撤出雅克萨，并把他们送到额尔古讷河口。另有巴什里等四十五名俄军不愿回国，要求留在中国，随清军回到瑷珲。雅克萨据点内还有一百六十多名被俄军扣押为人质的中国索伦族、巴尔虎族人民，全部获得释放。第一次雅克萨战斗以俄军的战败、投降和撤出雅克萨而告终。

托尔布津率领俄军从雅克萨退到尼布楚，但侵略的野心不死，仍想卷土重来。这时，由俄国政府委派的一名普鲁士军官拜顿率领六百名援军抵达尼布楚。同时，他们打听到，清军战胜后已全部撤回了瑷珲，并没有在雅克萨留兵驻守。因此，托尔布津和拜顿立即率领俄军八百多人又重新占领了雅克萨，并全力构筑城堡工事，妄图负隅顽抗。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七月，清廷不得不再次出兵，萨布素率清军二千余名进抵雅克萨。先释放了俄俘鄂克索木果，令他带信入城，再一次警告俄军："你们又偷偷返回，重建城堡，据守其中。还欺凌我方渔民猎户……今我大军已兵临城下，绝对不会轻易舍弃。尔等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你们将被逐出，无力卷土重来，结局便是如此。"但俄军自以为兵多粮足，负隅顽抗，频繁出城攻击。而清军士气高昂，又有当地各族群众帮助，屡次挫败出城掠战的俄军。在战斗开始以后的几天内，就打死了一百多个侵略军官兵，俄军头子托尔布津也中炮毙命。

经过长时间的战斗和包围，俄军大多战死、病死，八百多名俄军最后只剩下六十六人，粮食弹药亦消耗殆尽，尼布楚方面也无力派援军来，困守雅克萨的侵略军只能坐以待毙。

十一月，正当雅克萨围城旦夕可下的时候，一批俄国信使从莫斯科星夜奔驰，来到北京，路上历时几达一年之久。原来，俄国政府已知道雅克萨战争的消息，康熙的几封信也先后被人带到莫斯科。俄国政府清楚：中国进行自卫反击的态度非常坚决，因此十分焦急。可是，当时俄国正由彼得一世的姐姐索非亚公主执政，贵族们争权夺利，统治很不稳定，又在西方连年作战，兵疲财尽，不可能再派大批军队到中国，困守在雅克萨的俄军眼看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沙俄政府为了缓和远东方面的紧张局势，决定接受清廷的建议，举行边界谈判，并派出了以戈洛文为首的谈判使团。

清朝统治者表现了极大的和平诚意，以礼接待俄国信使。在雅克萨唾手可得的情况下，同意了俄国的请求，停止战斗，解除包围，并实现单方面撤军。第二次雅克萨战斗由于中国方面倡议和平谈判并停火撤军而宣告结束。此后，中俄关系的历史进入了谈判阶段。

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1689年9月7日），中俄双方经过长达三年的艰难曲折的谈判，正式签订了尼布楚条

约。

《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国和俄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正式文本是拉丁文本，由双方代表签字盖章。条约共六条，实质性部分包括：中俄东段边界的划分，越界侵略和逃入的处理，中俄往来贸易的规定等。

中俄东段边界的划分是条约中最重要的部分。条约明确规定，以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和额尔古讷河为两国的分界线。又规定，外兴安岭和乌第河之间的地区暂行存放，留待后议。清政府在领土方面作了重大让步，将尼布楚及其以西直至贝加尔湖原属中国的领土让给了俄国，以换取俄军撤出雅克萨。所以条约又规定了俄国在雅克萨和额尔古讷河南岸的据点全部拆毁、迁移。

《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一个平等的条约。双方代表都在各自政府事先指示的范围之内进行谈判交涉，没有也不可能用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最后达成的协议并没有越出中俄国政府愿意接受的范围。条约明确划分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是中国的领土。

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一段时间内，中俄的东段边界稳定了下来，边境相对比较平静，两国人民之间的和平交往和贸易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乌兰布通之战】

清朝入关后，建立起全国的中央统治政权，为了集中力量先稳固其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地位，对分布在中国西部、北部广阔边疆地域的漠西蒙古采取了安



康熙首征噶尔丹出师图

抚羁縻的政策。漠西蒙古又称厄鲁特蒙古，游牧于天山以北地区，分为和硕特、准噶尔、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四部。四部当中，尤以准噶尔部最为强盛，仗势凌压蚕食其他各部，先后迫使土尔扈特部转牧伏尔加河流域，和硕特部迁居青海，又出兵征服了杜尔伯特部。17 世纪后半叶，在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的统治下，它们发展成一支十分强大的割据势力，控制着天山南北，威胁青海、西藏和漠北蒙古，成为巩固国家统一、实现民族团结的严重阻碍。

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噶尔丹经过长期准备，率骑兵三万侵入漠北蒙古（喀尔喀）腹地。康熙皇帝闻讯大怒，遣使要噶尔丹退还其所侵占的土地与掠获的人口畜产，并退回自己的辖地。但是，噶尔丹此时已经头脑发胀，根本不把康熙帝的诏书放在眼里。为了进一步扩充实力，噶尔丹还开始与沙皇俄国进行勾结。当时清廷正在与俄国举行尼布楚条约谈判，要求收复被俄国侵占的

中国领土，噶尔丹派密使去见伊尔库茨克总督戈洛文，请求俄军与噶尔丹军队合作。噶尔丹在给戈洛文的信中说，俄国侵略军可以和他并肩作战。噶尔丹甚至丧心病狂地以出卖祖国神圣领土来博取侵略者的青睐，他在对使臣的指示中竟胡说什么“阿尔巴津（即雅克萨）建寨的地方原本是蒙古的，不是博格达汗（指清朝皇帝）的”，而统辖蒙古人和这个地区的是他——博硕克图汗，“倘若沙皇陛下有意在这里建立城堡，博硕克图汗愿意将这个地区让给陛下”。而戈洛文的复信中，则“保证以俄国军队的相应行动支持”，并派人到噶尔丹处，“继续就可能共同出兵一事进行谈判”。

清王朝的统治者对噶尔丹叛乱其实早就有所警惕。当时清廷正忙于在南方平定“三藩”、在东北抗击沙俄侵略者，尚无能力马上解决这一问题，但仍时刻密切注视着西北地区噶尔丹势力的发展。早在康熙十七年（1678 年），清廷就派人至甘肃一带探听消息，不时回报朝廷。清朝统治集团一直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少数民族之间的纠纷，力求避免使用战争手段。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清廷派大臣到准噶尔，抚慰噶尔丹并赏赐物品，要求其服从中央命令，与各部友好相处。当时的噶尔丹羽翼未丰，与沙皇俄国也还没有达成勾结，不敢显露叛乱的形迹，装出一副十分恭顺的样子。噶尔丹双膝跪地领受诏书，并矢志服从清朝中央政府的命令，一再表示“我并无自外于中华皇帝”，“向在中华皇帝道法之中，不敢妄行”。直到他依仗沙皇俄国的支持，悍然入侵漠北蒙古，康熙帝才知道噶尔丹不仅是个不听诏命的边疆逆臣，而且欲勾引外敌背叛祖国，因而决心对其进行讨伐。

发兵前，康熙帝先召见了在京的沙俄使臣，警告沙俄不得支持噶尔丹叛乱，并趁噶尔丹集中大军于漠北，后方空虚之际，资助逃亡在吐鲁番的噶尔丹的侄儿策妄阿拉布坦西归伊犁，册封其为准噶尔新汗，使噶尔丹在漠北成了如同春秋时期赴会黄池的吴王夫差式的人物。

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六月，噶尔丹引军两万余，举兵南犯，深入内蒙的乌珠穆沁。清廷理藩院尚书阿尔尼，



乌兰布通古战场遗址

正以钦差名义巡视察哈尔北部，他立即集合漠南蒙古各部迎战。两军在乌尔会河打了一仗。噶尔丹先是佯败，沿途抛弃大批牲畜帐幕。蒙古兵们贪利争夺，队伍错乱，噶尔丹趁机返身攻打回来，阿尔尼猝不及防，被他杀得大败，五百多辆大车及全部辎重被噶尔丹悉数掳去。

噶尔丹初战获胜，更加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率军直逼乌兰布通（今内蒙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南境），距北京只有七百里之遥。京师震动，人心惶惶，老百姓抢购粮食，米价一度升至三两白银一斤。而清廷也急忙调兵遣将，康熙皇帝一面命令阿尔尼严加警戒，等候大军来援；一面采取分进合击的战略，以裕亲王福全（康熙之兄）为抚远大将军，率左翼军出古北口，以恭亲王常宁（康熙之弟）为安北大将军，率右翼军出喜峰口。康熙帝亲自出塞，准备御驾亲征，后因病停驻在波罗和屯（今河北隆化），指挥各路大军进剿。

叛乱军队很快即面临清左、右翼军的夹攻，噶尔丹很是惊慌，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他身边的一位谋士献上一计，使噶尔丹大喜过望。原来乌兰布通依山傍水，谋士建议在山坳水源处建立一座“驼城”，阻挡清军的进攻，拟待后续援军到来后再发动攻势。于是噶尔丹下令将随军所带的万余峰骆驼环列起来卧倒在地，背加箱垛，蒙上湿毡，环成一圈如同栅栏，士兵们则隐藏在垛隙中打冷枪。开始清军对“驼城”束手无策，不知如何下手，后来，康熙帝从北京调来火炮，决定用火炮轰开“驼城”。

八月一日，清军开始向乌兰布通发起进攻，“隔河而阵，以火器为前列，迳攻中坚”。这次战役打得十分激烈，炮声隆隆，声震天地。据当时一个外国传教士记述：这次“大战以大炮火枪互轰开始，继而两军士卒肉搏”，双方展开了殊死的战斗。在清军的英勇进攻下，噶尔丹的“驼城”终于被攻破，由于骆驼的脚都被拴在了一起，清军专门派出一个小分队，搬开死去的骆驼，打开缺口，大军乘势进击，大败叛军。噶尔丹军力不支，趁夜黑向北逃遁。清军的伤亡也很惨重，康熙帝的舅舅佟国纲中枪身亡。狡诈的噶尔丹兵败后，施用缓兵之计，曾派人向裕亲王福全谢罪，发誓不再侵犯东土，永为清朝边疆守臣。福全奏报康熙帝，康熙未予理睬，命令继续追击。但作为清军前线统帅的福全，在惧战、妥协的思想指导下，未能乘胜追剿，致使噶尔丹逃走。噶尔丹军北渡西辽河后，疾奔大兴安岭，过大漠西遁而去。

噶尔丹自乌兰布通败归科布多（今蒙古国科布多省），元气大伤，西攻其侄策妄阿拉布坦未胜，北联沙俄亦遭拒绝，只好遣使南至归化，再次向清廷入贡请降。康熙帝召噶尔丹来京，噶尔丹不敢前往，亦不再与清廷联系，而以科布多为根据地，招集流亡，休养生息。康熙帝知道噶尔丹并非真心归降，为了进一步平定噶尔丹叛乱，巩固中国北部边防，他一面组织在木兰行围习武，秣马厉兵，教营伍，练攻战，激励将士，赏罚分明，以提高士气和战斗力；一面对散漫无纪的漠南、漠北蒙古各部进行整顿。

乌兰布通一战之后，康熙帝亲自与内外蒙古各部首领于多伦诺尔（今内蒙正蓝旗东北）会盟，联合各部力量，以进一步统一漠北地区。多伦诺尔地势平

旷，饶有水草，向来是“内外札萨克来朝者，道里适中”之所。康熙三十年（1691年）四月，康熙皇帝自北京出发，亲率上三旗官兵，出古北口，溯滦河而上；下五旗官兵出独石口，会师于多伦诺尔。参加会盟的清军，布营设哨，军容威武，气势雄壮。内外蒙古各部首领早已在会阅之地百里以外，听候传谕。康熙帝首先调解了各部之间的宿怨和纠纷。在调解了他们的纷争之后，首领们被逐次引进御帐，朝见大清皇帝，共进御宴，奏乐进茶，在隆重和睦的气氛中，举行了会盟大典。会上，康熙帝郑重宣布：保留各部首领的汗号，取消蒙古贵族原来的济农、诺颜的名号，按满洲贵族的封号，各赐以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等爵位。其军事行政体系也如满洲八旗一样，实行旗兵制，旗下设参领、佐领，从而结束了蒙古各部长期以来没有法度、不能约束、以强凌弱、自相劫夺的混乱局面，加强和巩固了中央对大漠各部的管辖。

多伦诺尔会盟对于加强中国统一，巩固北部边防，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进一步发展了清王朝中央与内外蒙古的关系。正如康熙帝所说：“昔秦兴土石之功，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即蒙古），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巩固。”

乌兰布通之战与多伦诺尔会盟以后，清军和噶尔丹又在昭莫多（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南）打了一仗，此战基本上消灭了叛军的主要力量。不久，众叛亲离的噶尔丹，因精锐丧尽，妻死子虏，走投无路，只好服毒自杀。清王朝在康熙帝三次亲征后，终于取得了平叛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和北部边防的巩固。

【大小金川之战】

大金川为今四川省大渡河上游，小金川乃大金川东部的一条支流，因沿河诸山谷的金矿而得名。金川地区为藏族聚居之地，形势险峻，交通梗阻，居民都住在石碉之中。

清雍正元年（1723年），大金川演化禅师嘉勒巴之孙莎罗奔因随岳钟琪进藏平乱有功，被授为金川安抚使。莎罗奔势力日益强盛，欲吞并小金川。他先以女儿阿扣嫁给小金川土司泽旺为妻，泽旺性懦弱，受制于妻。乾隆十一年（1746年），莎罗奔将小金川土司泽旺劫持，并夺其印信。四川总督下令申斥后，“始还泽旺于故地”。乾隆十二年（1747年），莎罗奔发动叛乱，出兵攻掠革什布扎及明正两土司。四川巡抚派兵弹压，反为所败，于是奏请朝廷进剿大金川。乾隆皇帝早就对莎罗奔感到恼火，又鉴于南明余党常在大小金川活动，更加重视这里的形势，立即将平定苗瑶有功的云贵总督张广泗凋往四川，相机剿治。

大金川本是天险，西面临河，东边则是崇山峻岭。莎罗奔居住在勒乌围（今四川金川东），命其侄儿郎卡居噶尔崖（金川东南），二城皆在大金川东岸，阻山临水，地势险要，附近筑有许多坚固的战堡。这战堡是土人用石头筑垒而成，高约三四丈，仿佛塔形，里面用人守住，四面开窗，可放矢石，极难攻取。张广泗为求必胜，向朝廷奏请精兵三万人，拟分两路进攻，后因山道艰险，进军困难，又请增兵一万人。然而直至次年春天，清军非但没有奏捷，还连损几员大将。

乾隆帝没想到大金川不过弹丸之地，兴动四万大军进攻数月竟会如此，遂派大学士讷亲为经略，与岳钟琪、傅尔丹等宿将赶赴前线。可是讷亲位高气盛，一至前线即要求从速破敌，限三日务取噶尔崖。结果由于清军准备仓促，大败而归。讷亲不敢再自专，仍依张广泗、岳钟琪之计行事，然而为时已晚。这时，岳钟琪也觉察到为清军担任向导的泽旺之弟良尔吉乃是莎罗奔的耳目，提醒张广泗留意，张广泗听信混入其帐下的南明余党王秋的话，对良尔吉坚信不疑，此后数月，清军仍未得寸进，反倒每战皆败。乾隆帝震怒，认为张广泗有挟师观望之罪，将其斩首。接着，讷亲亦因滥用职权、贻误战机之罪赐死，乾隆帝改派大学士傅恒继为经略。

傅恒至大金川，立即杀死良尔吉和王秋，断敌内应，同时增调邻省兵马进剿。至乾隆十四年（1749年）春天，傅恒始知进剿大金川的确不易，向朝廷如实报告两年来的作战情况，决心不再争夺敌战堡，只等大军齐集捣敌巢穴。这时，乾隆帝已无意再对大金川用兵，以“息武宁边”为名，下诏撤军。不料诏书未到，傅恒与岳钟琪已兵分两路大举深入，莎罗奔因连年抵御，部众亦死伤不少，力不能支，遂释归泽旺，遣使向岳钟琪乞降。岳钟琪因莎罗奔曾是其征西藏时的宿将，今见莎罗奔畏死乞降，仅带数名随从前往勒乌围受降。莎罗奔得知岳钟琪亲至，率领部众出寨恭迎，头顶佛经跪拜马前，然后随岳钟琪赴清军大营去见傅恒。傅恒命其发誓不再抗命，归还侵夺各邻近土司的辖地，献出为其出谋划策的南明余党，上缴军械，然后宣诏赦其死罪，仍为土司。

十数年之后，郎卡代替莎罗奔掌管大金川，始终以曾经重挫清军而自豪，见清廷一再以抚绥边远地区为宗旨，视为软弱可欺，又复桀骜不驯，侵扰邻境，不受四川总督的命令。乾隆帝命川督阿尔泰征调九土司之兵，围攻郎卡。九土司中，兵力较强盛者为小金川土司和绰斯甲（今四川道孚北）土司，其余皆弱小不堪。郎卡于是施展计谋，与绰斯甲土司“结姻”，又以其女嫁给小金川泽旺之子僧格桑为妻，这样便使“有夙怨，不甚联络”的大小金川，反而因“姻党联结”互相联合起来。不久，郎卡死去，小金川土司泽旺也已年老，郎卡之子索诺木与泽旺之子僧格桑各继为土司，大小金川终于结成军事同盟。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索诺木诱杀革什布扎土司，僧格桑亦屡次攻打沃日土司，阿尔泰派兵救援，僧格桑竟公然与清军开战。

乾隆帝闻报，想到以前大金川之役本以救援小金川为起因，如今小金川亦敢叛逆，决心予以严惩，立派大学士温福、侍郎桂林赴四川进剿。小金川土司僧格桑见朝廷发动大军来讨伐，向大金川土司索诺木求援。索诺木暗中发兵来助。乾隆帝为求对大、小金川各个击破，下诏给温福和桂林，命其先剿小金川，暂不声张大金川助逆为敌之罪。

温福和桂林先后到川，即分兵两路，温福率北路军自汶川（今四川汶川西南）西进，经会理（今四川理县）西越邛崃山，进攻小金川的北面，桂林率南路军自打箭炉（今四川康定）以东北进，经金汤城（康定东北），进攻小金川的南面。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春，清军

开始对小金川实施前后夹击，沿途夺回僧格桑所侵占的邻近土司的土地，进军颇为顺利。五月，南路副将薛琮恃勇冒进，率三千多人深入小金川黑龙沟，遭敌截击，桂林未及时赴援，致使该部全军覆没。乾隆帝为此撤除桂林的职务，改以阿桂为参赞大臣，代桂林职。十一月，阿桂探知僧格桑拥兵美诺（今四川小金），率军乘夜以皮船渡过小金川，连夺险要，进抵美诺。僧格桑仓皇逃往其父泽旺所居的底木达，泽旺不肯接纳，迫不得已，僧格桑又投奔大金川。清军占领底木达，将泽旺缚献京师，并命索诺木交出僧格桑。索诺木置之不理。

次年春天，乾隆帝命温福为定边将军，阿桂为副将军，分道进讨大金川。温福因索诺木扼险为守，难以进军，暂时驻营于木果木（今小金川西北耿家关以西），命提督董天弼分屯底木达，以守备通往小金川的后路。温福秉性刚愎，独断专行，仍袭用张广泗强攻战堡的故伎，致使清军兵力分散，无所进展。小金川降众见清军久屯不进，群起反叛进攻清军，迫使董天弼拔营逃遁，并与大金川兵夹攻木果木清军大营，温福仓促迎战，被敌兵杀死，小金川又落入僧格桑手中。清将明亮、海兰察等闻警赴援，仅收容溃兵万余人。正在热河避暑的乾隆帝闻报大惊，命阿桂为定西将军，丰伸额、明亮为副将，调在热河专门训练进攻碉堡作战的健锐火器营两千人前去助剿，大大增强了进攻的力量。十月，再次收复小金川。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正月，乾隆帝以土司恃险反复，重劳用兵，非大举深入不可，乃命阿桂进攻大金川。阿桂兵分三路，奋力杀入，节节进攻，击破敌垒无数，大小数百战，直到七月，才至勒乌围附近。

勒乌围前面皆山，敌兵据险扼守，第一重山名博瓦山，第二重山名那穆山，最是险峻。阿桂命三路军绕攻博瓦山后，三路军仰攻博瓦山前。猛搏三昼夜，方杀上博瓦山，占领了第一重门户。休息两日，又开始进攻那穆山。这山势尤险，防守更严，阿桂仍令前后分攻，数日无效。海兰察作战非常勇猛，攻克不下，很是气闷，他遥望那穆山上，守兵布得密密层层，只是西边最高峰上，虽有两个大战碉，碉内却空若无人。于是黄昏一过，他带领六百名死士，历尽千辛万苦，在第二天黎明之前，爬上高峰，捣入碉中。每碉不过数十名敌兵，一阵狂扫，立即歼除。其他守山的敌兵，总以为绝壁峭立，没人可上，谁料上面竟插起了大清旗号，错疑是飞将军从天而降，顿时人心大乱，又被山下的清兵，杀上山腰。第二重门户又破，勒乌围已无险可守。索诺木大为震惊，毒杀了僧格桑，将其尸体献给清军，请求停止进攻。阿桂奉乾隆帝之诏，决心不再姑息，进攻益急。

这时已是秋末冬初，天气阴寒，雨雪霏霏。任凭阿桂奋力向前，也不能直捣敌穴。过了年，又到了春季，渐渐冰雪消融，路上方可行动。阿桂等转战而前，只一二十里地面，却攻了三四个月，才到达勒乌围。攻至八月，勒乌围终于被占领，然而索诺木与莎罗奔已逃往噶尔崖。阿桂等转兵围困噶尔崖，断绝水道，以大炮昼夜轰击，仍不见效。直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二月，城中食尽，索诺木、莎罗奔等才被迫出降。阿桂献俘京师报捷，乾隆帝御驾午门受俘，

因索诺木、莎罗奔罪大恶极，被凌迟处死。乾隆帝下诏改大金川为阿尔古厅，小金川为美诺厅，直隶四川省，令明亮为四川将军负责镇守。

清廷平定大小金川之战，前后共用兵五年，费帑亦至七千余万两，阵亡将士三万余人。这个代价虽然浩大，但对于促进西南少数民族与整个中华民族的统一还是大有意义的。

【虎门之战】

17、18世纪，西方国家先后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为攫取更多的财富，英、法等国纷纷伸出魔爪大肆扩张。他们把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视为一块大肥肉，蜂拥而至，企图用工业品敲开封建王朝的大门。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当时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他们的工业品根本无法渗入中国人的生活，相反，在贸易中，中国货却畅销西方各国，这让西方资产阶级既慕又恨。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追逐高额利润，从18世纪末开始，他们丧心病狂地把鸦片输入了中国。



销烟池旧址

鸦片是用罂粟果实中乳状汁液制成的毒品，里面含有大量能麻醉人的毒素。吸食者骨瘦如柴，精神萎靡，最后凄惨死去。英、法等国贩来的鸦片，在很短时间内就毒害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据粗略统计，仅1838年，全国吸食鸦片的人就超过了二百万，而且遍及社会各阶层，上至朝中权贵，下至贩夫走卒，甚至还有缉毒缉私人员。鸦片的泛滥，严重地摧残着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加剧了清王朝的腐败，给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华民族造成了深刻的民族危机。

面对烟毒造成的民族危机、社会危机和财政危机，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林则徐力排众议，以“（对烟毒）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的疾呼震动了犹豫不决的道光帝。他临危受命，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慨然前往遭受烟害最重的广东禁烟。

在广东人民的全力支持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及水师提督关天培的大力协助下，林则徐沉重地打击了外国鸦片贩子的嚣张气焰，粉碎了他们的种种阴谋，一举收缴鸦片二百三十七万多斤。1839年（清道光十九年）6月3日至25日，这些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在虎门海滩被全部销毁。前后二十三天，前来观看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群情激愤，就连林则徐特邀来观看的外国商人和传教士，也不得不“摘帽敛手”以示钦佩。中国人民的禁烟斗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鸦片贩子哪会就此甘心，他们疯狂叫嚣着要报复。9月4日，处心积虑的英国人在九龙山口岸以索食为名靠近中国水师战船，发动突然袭击，燃起了鸦片战争的战火。

在这场战斗中，中国士兵在参将赖恩爵的指挥下对入侵之敌给予坚决回击，先后击毙十七名英军，打断敌兵船“甘米力治”号船长忌剌士的胳膊，于下午6点击退了狂妄的侵略者。此战不仅打击了英军的嚣张气焰，也沉重打击了他们的士气。后来，当时参战的英军士兵艾姆斯里回忆说：“我真希望我绝对不再参加战斗，这回，我们已经被揍得很够受了。”



林则徐雕像

11月3日，英舰“窝拉疑”号和“海阿新”号又开到虎门以外的穿鼻洋面，企图拦截遵照林则徐“永不夹带鸦片”规定、从事正当贸易的商船报关入口。关天培闻讯赶往查看。正当他准备与英舰交涉时，“窝拉疑”号船长士密悍然下令开炮。顿时，中国水师战船周围巨浪滔天，炮弹横飞。英国人望着烟火弥漫的中国战船，得意地大笑起来。

可惜他们高兴得太早了，措手不及的中国水师在关天培的带领下，迅速组织了有效的还击。硝烟中，关天培不顾头、手受伤，血流不止，持刀屹立船头，大喊：“有击中敌船者，重赏！”话音未落，只听敌船“窝拉疑”号船头一声巨响，随后腾起一团黑烟，船头之人纷纷滚落海中。“好！打得好！”关天培用刀指着敌舰高声称赞道。随后，炮手麦廷章指挥士兵又连续两炮击中该船，打穿舰身左右舱口，摧毁了后楼。

英国人万万没想到中国水师会有如此强的战斗力，偷鸡不成反倒蚀了一把米，看着“窝拉疑”号浓烟滚滚，帆斜旗落，而“海阿新”号也好不了多少，再也无心恋战，慌忙开足马力，灰溜溜地往外洋逃去。第一次穿鼻之战以装备处于劣势的中国军队取胜而告结束。

紧接着，停泊于九龙尖沙咀的英舰不甘心失败，又连续六次向官涌炮台发动进攻。林则徐早料到英军会打官涌的主意，命令尖沙咀和官涌的清军“固垒深沟”，严阵以待。英军的六次进攻无

一例外以惨败告终。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侵略者占据尖沙咀洋面作巢穴的美梦宣告破灭。他们不得不放弃原定计划，远遁外洋。

第一次穿鼻之战和官涌之战的胜利，大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斗志，也说明当时英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也并非是不可战胜的。同时，林则徐和邓廷桢、关天培等人清醒地认识到，要打败装备精良的侵略者，还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

根据当时中国水师战船的作战能力和装备状况远不如英舰的事实，林则徐制定了“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策略，并在此原则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准备。

首先充实了广东水师的力量，提高战斗力，加固了禁烟时布设的木排、铁链，保证实战时能守得住，并在可能经常发生战斗的战略要地——尖沙咀、官涌添建炮台。林则徐认为，英国侵略者赖以为恃的就是船坚炮利，因此他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购来了两百多具西洋大炮，甚至还购买了曾参加过“九龙之战”的英国旧商船“甘米力治”号，把它改造成了一艘战舰。同时他命令关天培等加紧训练水师，招募船户壮士五千余人作为预备队。此外，他还“日日使人刺探夷事，翻译夷书，又购其新闻纸”，以做到知己知彼。

事实证明，面对强敌，林则徐的应敌之策是完全正确的。英国侵略者见虎门附近的大小炮台都有重兵把守，虽有侵略之心，却无来犯之胆。他们在虎门外海面盘桓了十几天，始终无机可乘，不得不离开广东海面，向北窜入浙江境内。

一方面是侵略军增加力量，北上骚扰东南沿海；另一方面却是闽浙一带准备不足，甚至毫无防备。因此，英国侵略者得以乘虚长驱而入，袭取定海。这时，优柔寡断的道光皇帝动摇了。他相信投降派琦善和伊里布等满洲贵族的话，决意妥协。对御敌有功的林则徐不仅不提拔奖赏予以重用，反而无端斥责是他把英军逼到闽浙，最后干脆把他给撤职查办了。由此，战局急转而下。

接替林则徐主持广东大局的琦善是个满脑子“妥协议和”念头的投降派。他竟然任用被林则徐缉拿在逃的汉奸鲍鹏与英国人“周旋避战”，对侵略者的话言听计从。他不仅不巩固海防，反而“一切力反前任所为”，对林则徐在任时的战守设施大加裁撤，遣散了林则徐募集的数千壮丁水勇。有人向他报告缉拿汉奸、鸦片的情况和英国军队最新动态时，他也大加训斥，反诬说汇报者是汉奸。

正当琦善、鲍鹏等人进行投降卖国活动的时候，英国侵略者却在积极准备军事进攻。1841 年 1 月 7 日，英军在虎门外发出登陆信号。由于琦善裁撤了珠江口周围的大量军事设施，又拒不发兵增援，英军花了不到一个半小时，就轻易攻占了虎门的门户沙角、大角炮台。1 月 25 日，英国侵略军的铁蹄踏上了香港的土地。

沙角和大角炮台一失守，整个虎门防御体系立时陷入瘫痪状态。在琦善兵力不固，民情不坚，若与交锋，定无把握，决意妥协求降的指导方针下，守军根本无法进行认真的备战。当时，关天培驻守靖远炮台，李廷钰守威远炮台，马辰和多隆武守定远炮台，手下都只有几百人而已，弹药也严重不足。面对整

日游弋在虎门外海的英舰，守军们无不感到心急如焚。无奈之下，李廷钰跑到琦善面前痛陈虎门形势，谁料琦善死活不答应增兵，还大发脾气说："就是因为你们整天只知打打杀杀，惹恼了洋人，议和才屡屡受挫！"李廷钰急了，"噗通"一声跪倒在地，号啕大哭，乞求发兵增援。琦善见状，面色一变，犹豫片刻，终于开口了："添兵二百！多一个也不行！"

虎门前线的指挥者连求援增兵的请求都得不到允准，又怎么能根据敌情进行适当的战斗部署！原本坚不可摧的虎门要塞就这样在琦善的盲目指挥下形同虚设。

2月23日，英舰"复仇神"号冲进三门口，把钉在海中的木桩轻易拔去，破坏了拦海栅栏，以扫清虎门前沿阵地。25日，十八艘英舰包围横档、永安两炮台，并在虎门防线最薄弱的环节下横档强行登陆，修建了巩固的炮兵阵地。26日清晨，英军炮轰清军炮台所在的上横档。不过两个小时，上横档失守。下午4点，虎门要塞陷落。

在虎门之战中，由于胆小的琦善懦弱无能，严重影响了清军的士气，当英军利用涨潮时机由横档西边浅水道包抄进攻时，清军中许多人掉头就跑。有些炮台甚至未放一炮便落入敌手。真正同侵略者作殊死战斗的，只有关天培部。

战斗开始前，关天培自知敌强我弱，又孤立无援，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将一个装有自己几缕头发和几枚牙齿的木匣交给家人带走，说："我已决心以死报国，若是战后找不到我的尸体，就把它葬了！"

激战中，他不顾随从劝阻，亲自操炮瞄准射击。但是由于弹药制造商偷工减料，炮弹中火药分量严重不足，有的甚至全是沙土，中方的火力根本无法达到阻击敌人之目的。滚滚硝烟中，关天培圆睁虎目，满身是血，仍然沉着地瞄准射击。一些官兵在他的带动下，也奋不顾身地投入战斗。突然"轰"的一声，关天培身边的一门大炮发生膛炸，周围士兵死的死、伤的伤，幸存的也个个面无人色。关天培当即被震倒在地，一个随从见状，扑上来抱住他，大喊："事不宜迟，快走吧！"说着背起他就准备往后撤。关天培擦擦脸上的血，拔出佩刀作势要砍背他的随从，叫道："谁敢后退，我就砍了谁！"随从无法，只好松开手。关天培一挥佩刀，高喊一声："好汉子，跟我杀敌！"转身又投入了战斗。

这时，英军已攻入炮台，关天培大喝一声，带领数人冲入敌阵。只见刀光闪闪，血花飞溅，英军被砍得七零八落。然而终究寡不敌众，关天培和他的战士们在力劈数十个英军后，重重地倒在了血泊之中。一代名将就这样血染沙场，为国捐躯了。

关天培与守台将士四百余人壮烈战死，虎门之战的失败，一时震惊全国。这本是琦善投降卖国政策所导致的后果，并非英军不可战胜。然而腐败的清朝统治者却心惊胆战，丧失了抵抗侵略的信心和决心，一心只想妥协求和，丝毫不理会广大人民和爱国将士要求抵抗的呼声。此后，英军趁胜闯入珠江，27日攻下乌涌，又乘潮占领了距广州仅二十里的猎得、二沙尾。广州的门户洞开，战争的主动权完全被英国侵略者所掌握，中国进一步坠入了这场注定要失败的战

争深渊。

【三元里之战】

英军攻占虎门之后，溯流而上，沿途的防守要塞在琦善的卖国投降政策下丢失殆尽。英军遂长驱直入，于1841年（清道光二十一年）5月24日直逼广州城下。

守卫广州外围的清军不战而退，纷纷撤至城内，又使英军从容占据了广州城外的几处重要炮台。英军以其中的四方炮台为据点，公然在城外高地上架炮轰城。一时间，广州城内火光冲天，一片混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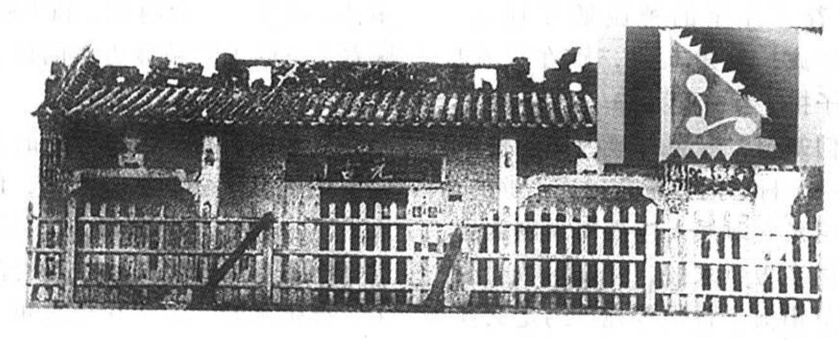
此时，接替被撤职查办的琦善前来“靖逆”的靖逆将军奕山，却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呆坐在总督府议事大厅。满屋的文武官员也都默不作声，不知如何是好。突然，站在奕山身后的一个护卫打了个响亮的喷嚏，一直提心吊胆的奕山竟吓得全身一颤，面无人色。

“诸位，事到如今，我们如何是好？”沉闷了好久，奕山开口了。众官员面面相觑，良久，终于有人嘀咕了一句：“我看还是以和为贵。”奕山闻言，精神一振，“和？”他假意皱起眉头想了想，“嗯，我礼仪之邦怎能与蛮夷一般见识！就由你去议和吧！”他指了指刚才发话的人。

26日上午，广州城头飘起了白旗。27日。奕山代表清廷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屈辱的《广州和约》，清军撤出广州城六十英里，向英方缴纳六百万元“赎城费”。广州就这样落入了敌手。

面对满城废墟和一纸滴血的和约，民族仇恨的烈火在广州人民胸中熊熊燃烧。广大群众既痛恨侵略者的无恶不作，又愤然于官府的软弱无能。他们纷纷把官府的告示撕毁，决心“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把侵略者赶出国土。一场迅猛的暴风雨在酝酿之中。

广州北郊，白云、越秀二山连峰叠翠，雄伟多姿。山脚有一片美丽富饶的土地，这便是后来名噪一时的三元里村。



三元里古庙和三星令旗

5月29日，盘踞四方炮台的英国鬼子和往常一样外出抢掠。在三元里村口，他们遇到了正在劳作的菜农韦绍光及其妻子李喜。一见美貌的妇女，英国鬼子嘻皮笑脸地围了上去，就想调戏。平日练得一身好功夫的韦绍光哪容他们如此放肆。只听他大喝一声，冲入敌群，左右开弓，拳打脚踢，当即打倒几个家伙。周围有的乡亲马上鸣锣告警。附近村民闻讯纷纷赶至，把压在心底多日的怒火全部发泄在这些鬼子的身上，当场打死

了十几个侵略者。其余英军见势不妙，鼠窜而去。

估计到吃了大亏的英国人不会善罢甘休，晚上三元里全村父老相约来到村北的三元古庙。这古庙前后两进，青砖石脚，古色古香，已有百余年历史，向来是全村人集中议事的地方。这天晚上，庙内火烛齐明，有如白昼。韦绍光站在桌上，挥动着拳头说："乡亲们，鬼子兵占我良田，抢我财物，辱我妻女，无恶不作，天理难容，我们该怎么办?""杀了他们!""赶走他们!"众乡亲挥舞着手中的铁锄、铁叉，喊声此起彼伏。

"好!"韦绍光喊道，他一把拔出庙内神像旁的神旗，把这面三角形，黑底白边，缀着三连星的神旗插在地上，"这就是令旗！旗进人进，旗在人在！我们和鬼子拼了！打死无怨……"

乡亲们知道，要想打败凶残的侵略者，单凭一个村子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于是，韦绍光立即派人连夜向周围的唐夏村、萧岗乡告急求援，又修书数封分别送往邻县南海、番禺等地，约定共同起事。唐夏村、萧岗乡及南海、番禺等地的群众早就憋足了一口气，闻讯立即举旗响应，星夜赶到三元里。这样，广州周围一百零三乡的群众，都集合到了反侵略的义旗之下。

敌人装备精良，力拼不是办法，因此各路首领一合计，决定以智取胜。这时，韦绍光发话了："村外四五里地有个叫牛栏冈的小山，上面树老林深，藏上几百人不成问题。山腰就是鬼子来犯的必经之路，再往山脚，又有大片的烂泥坑。这个地方地势险要，山路既窄又难行，正是伏击鬼子的好地方。大家说怎样?""好哇！那我们便在山上埋伏，再派些人把鬼子引过来，在牛栏冈摆桌鬼子宴!"唐夏村义勇首领颜浩长，快人快语定下了对敌策略。于是，各乡义勇依计行事，凌晨时分，一切准备就绪。

5月30日清晨，对三元里人民恨之入骨的英军侵略者，由司令官卧乌古率领，气势汹汹地向三元里扑来。离三元里还老远，鬼子兵便不时遭到鸟枪、弓箭的零星阻击。仗着武器优良，侵略者紧追不舍。

没想到中国义勇"毫不禁打，一战即溃"，英国人大为得意，追得更带劲了。这天天气异常闷热，英国兵们又不像当地百姓能在羊肠小道上行走如飞，没多久，一个个都累得直喘粗气。10点多钟，英军三三两两地追到牛栏冈附近，眼看手下的士兵精疲力尽的样子，卧乌古不得不下令就地休息。

敌人越聚越多，抄后路的义勇看到鬼子兵差不多全进了包围圈，便依计向天放了一枪。枪声划破了沉闷的空气，只见山顶三星令旗一动，霎时间杀声震天，旌旗遍野。埋伏在树林里、大石后的众义勇一齐杀出，挥舞着手中的大刀、长矛、铁锄、钉耙等，向横七竖八躺在地上休息的英国鬼子冲了过去。

鬼子兵哪里见过这种场面，慌忙拿起枪边顽抗边四下逃命。勇敢的猎手怎允许落网的猎物轻易脱逃，只见身材魁梧的颜浩长手持长矛冲在最前面，所挡者非死即伤，勇猛无比。在杂葬岭，他截住了一个全副武装的英军军官。"是鬼子兵头头毕霞!"有人认出了那个军官。"好!"颜浩长断喝一声，一抖长矛冲上前去。毕霞自恃身高马大，又是全副武装，心想对付眼前这个貌不出众的农民不成问题，便狞笑着迎了上来。好

个颜浩长，出手如电，“唰”的一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刺毕霞咽喉。毕霞做梦也没有想到，对方出手如此之快，连叫都没来得及叫便一命呜呼了。

急得众义勇抓耳挠腮。情急中，有人找来长绳，拴上乡村里常用的耙钩，看准了朝敌人扔去。钩子不偏不倚地钩住了一个鬼子兵的衣服，没等鬼子挣扎，义勇一使劲，就把鬼子拖出泥坑，旁边的人手起刀落，结果了这个鬼子。其他义勇连忙如法炮制，轻松地消灭了这股敌人。



①英国侵略者在中国大肆劫掠
②三元里民众抗英用过的部分兵器
③三元里民众在抗英斗争中缴获的战利品：服装、佩剑和印章

正在勇士们群起杀敌的时候，一场暴雨从天而降。一时间，风急雨横，雷电交加，没多久，四周顿成一片汪洋。侵略者笨重的大皮靴在泥泞的小路上举步维艰，曾令他们颇为自得的火枪又因火药尽湿成了废铁。如此，陷入重围的侵略者只剩下挨打的份儿。不少人慌不择路，失足跌下山来，命丧黄泉；有的还打算作困兽之斗，被当场击毙；也有些人眼见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得举手投降，“一时乞命之声震山谷”。

一群鬼子被赶进了牛栏冈山脚的烂泥坑里，烂泥齐腰，笨拙的敌人怎么也挣扎不出来，急得哇哇乱叫。但追赶他们的义勇赶到了泥坑边，也不敢贸然进去，眼见鬼子近在跟前，却无法歼灭，

初战得胜，各乡义勇连同陆续赶到的花县、增城等地的武装群众一鼓作气，从四面八方涌到四方炮台。几万人马把侥幸脱逃的卧乌古一伙与前来增援的义律等牢牢困在炮台里。义律站在炮台上心惊胆战地往外看，只见四周的山坡、平地上，旌旗林立，刀枪纵横，寒光夺目，他的心都凉了半截，望望旁边的卧乌古，动了动嘴唇，却未说出话来。

三元里这边群情激忿，乡民们奋不顾身地为国杀敌，而广州城里，奕山等不但不抓紧有利时机实施反攻，反而命

令清军继续撤离广州，以示“诚意”。消息传到炮台里的义律耳中，他像抓住了根救命稻草，赶忙派汉奸混出重围带信给奕山，威胁说：如果围攻炮台的老百姓不马上散去，就会被当作是中国官方的行动。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都要由中国一方承担。

这样色厉内荏的威胁居然又把胆小的奕山吓住了。他慌忙派出广州知府余保纯带上南海、番禺的知县出城为侵略军解围。

余保纯找到各路义勇首领，一扫在英国人面前的战战兢兢，趾高气扬地说：“现在朝廷已同洋人议和了，你们就不要胡闹了，快散了吧！”

众义勇哪肯就此便宜了恶贯满盈的侵略者，坚决不答应。有的人见官府不但不抗敌，反而还替敌人说话，怒不可遏，当场大骂余保纯是汉奸卖国贼。余保纯恼羞成怒，又拿义勇们没有办法，便转而威胁率众参加战斗的各乡士绅：“若是此地出了事，现在都要由你们承担！六百万元赎城费都由你们出！”

乡绅们平素就害怕官府，这一下纷纷开始动摇，陆续带走了他们的家丁。围困的群众孤掌难鸣，到了第二天下午，不得不撤围而去。这次轰轰烈烈的人民自发斗争，就这样被封建统治者强压了下去。

义律、卧乌古一伙绝处逢生，再也不敢久留，灰溜溜地拉着溃不成军的队伍，逃到泊于珠江江面的英国军舰上。四方炮台又回到了人民手中。

这一仗，英国侵略者遭受了第二次广东战争以来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损失极为惨重。按当时率水勇参战的林福祥所说：“水勇砍得逆夷头目首级一颗，杀毙夷兵十二名，乡勇杀敌二百余名，而水勇、乡勇战死者共二十余名而已。”

可笑的是惊魂未定的侵略者一边仓皇逃跑，一边还死要面子掩盖败绩。他们沿途贴出告示，说什么：“此次百姓刁抗，蒙大英官宪宽容，后毋再犯……”

群众看了这个恬不知耻的告示以后，马上针锋相对地贴出檄文，驳斥道：“尔日前虽占炮台……我义民约齐数百乡村，同时奋勇，灭尽尔等畜类。尔若有能，就不该转求广府，苦劝我义民罢战！”并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宣布：“务使鬼子无只影留存，鬼船无片帆回国。汝等无避，卜日交战！”

外强中干的英国侵略者闻风丧胆，“海上霸王”的威风扫地殆尽，再也不敢在广东地界停留，灰溜溜地退出虎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敢前来进犯。

【浙东之战】

英国侵略者在广东战争中没有占到多大便宜，反而吃了不少苦头，又急又气不甘心就此罢休，便于1841年（清道光二十一年）8月21日自广东启碇北上，妄图在闽浙一线发动新的侵略战争，以达到自己的侵略目的：“得到（中国）皇帝对……提出的一切要求，完全无条件地应允。”

8月25日黄昏，英军舰队出现在福建厦门青屿口海面，并向中国守军示威挑衅。厦门局势一触即发。闽浙总督颜伯焘派出使者据理力争，要求英军立即离开。英军首领璞鼎查竟趾高气扬地对使者说：“我要求你们马上放弃城池和周围的一切堡垒，否则别怪我们不客

气!”面对气焰嚣张的侵略者，立志坚决抵抗的颜伯焘毫不畏惧。虽然此时负责福建海面防务的水师出洋巡缉海盗未归，厦门守军力量严重不足，他怀着“澄清海宁之志”，整顿防务，招募水勇，要与侵略者放手一搏。

8月26日下午1时许，英军分两路发起进攻。颜伯焘和驻守金门的总兵江继芸指挥白头汛、屿仔尾和鼓浪屿的守军从三面抵抗。由于交战双方实力悬殊，更由于颜伯焘应战心切，和敌人硬拼打消耗战。坚持到下午6点左右，各炮台相继失守，厦门落入了侵略者的魔爪。

在厦门大肆掳掠了十余天后，英军继续北犯。9月26日到达了浙江定海附近的舟山洋面，妄图再在这儿捞点好处。可是他们哪里知道，此时的定海已不是他们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轻易占领的定海了。自1841年2月24日定海收复后，驻守定海的定海镇总兵葛云飞、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和处州镇总兵郑国鸿，齐心协力积极备战，大大加强了定海的防御工事和作战力量。他们协调部署，由王锡朋和郑国鸿分别率部防守侧翼的晓峰岭和竹山门，葛云飞则守土城作正面防御。三部严阵以待，要给入侵者以迎头痛击。

英军指挥巴加和郭富自恃船坚炮利，8月27日公然驾船闯入定海防线的咽喉竹山门窥探形势。我英勇的守土将士哪能容他如此狂妄。守卫土城的葛云飞一声令下，只听“轰”的一声炮响，入犯英舰的头桅应声倒下，吓得巴加面色煞白，慌忙下令掉头逃窜而去。

28日，英军开始进攻定海。作了充分准备的守军隐蔽在岩石洞中，任英军怎么狂轰滥炸，仍是毫发无伤。等炮击一停，英军准备登陆时，众守军迅速到位，沉重打击蜂拥而来的侵略者。英军的多次进攻都这样被击退了，就连偷偷渗到五奎山脚建立起来的炮台阵地也被葛云飞发现，几炮给轰掉了。面对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英军指挥官们一筹莫展。

30日，台风突袭定海，风雨交加昼夜不停，平地积水达四五尺，给连日激战的守军带来了极大困难。同时，英军屡获增援，轮番骚扰，而守军却因为贪生怕死的提督余步云拥兵不援，昼夜都得不到休息，弹药、粮食已告枯竭，战斗力急剧下降。这便给了英军以可乘之机。

10月1日清晨，英军利用大雾天气，在大炮掩护下，由汉奸带路，分三路对土城、晓峰岭和竹山门发起了攻击。

晓峰岭上，已率部与敌激战四天的王锡朋指挥守军奋起还击。一时间阵地上炮火盈天，硝烟弥漫，连使用的抬枪枪管都打得发烫发红了。然而由于晓峰岭守军没有大炮，也无法获得足够的炮火支援，未能压制住一拥而上的英军。眼见敌人冲上山岭，王锡朋来不及细想，抓起大刀率部与敌展开肉搏，手刃数人之后，终因力竭不敌侵略者的围攻，壮烈殉国。晓峰岭失陷!

与此同时，竹山门激战正酣。战斗从早晨一直进行到中午，郑国鸿部炮矢皆尽，再也无法阻挡满山遍野的英军。有人建议撤退。郑国鸿听了，两眼一瞪，高声道：“武臣效命疆场，是我的责任!”表明了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此时，攻占晓峰岭的英军绕道从背后向竹山门袭来，与下面的英军形成夹攻。郑国鸿部腹背受敌，几乎伤亡殆尽。绝

望之中，郑国鸿单骑冲入敌阵，左冲右突，身被数十创，最后中炮阵亡。竹山门随之宣告陷落。

守卫土城的葛云飞在激战中惊闻晓峰岭、竹山门失守和王锡朋、郑国鸿两总兵为国捐躯的噩耗，悲愤异常。他知道，局势已经无法挽回了。于是他将自己的印信交给随从军官，激愤地说："你快回大营请求援兵，趁敌人立足未稳反攻，我就算死了也要化为厉鬼相助！"

当攻占竹山门的英军合而为一向土城冲来时，葛云飞果断下令调转炮口向竹山门方向轰击。可是由于连日大雨，四千斤的大炮深深陷入淤泥之中，难以转动。形势非常危急，只听葛云飞振臂一呼："跟我杀贼去！"说完带头跃出土城杀向敌军。二百多名亲兵紧随其后，与英军展开肉搏。战斗中，葛云飞的大刀砍折了，他拔出战前打就的"昭勇"、"成忠"两把佩刀继续砍杀。杀到竹山门山麓时，他的右脸已被削掉一半，右手臂也被砍断，全身受了四十多处伤，血流如注，但他仍竭力拼杀。忽然，一颗子弹击穿了他的胸背，他"立竹山门崖石而卒，尸植不仆，手擎刀作杀状"。就这样，葛云飞和他的将士英勇牺牲，定海陷落了。

定海的失守，主要原因不在于英军无法抵挡，而是钦差大臣裕谦的战略决策失误。裕谦作为一个满蒙大臣，怀有一腔报国热情，然而却缺乏"制寇之才"。他把精兵良将布置在孤悬海外的定海岛上，希望在那里与侵略者一决雌雄。事实上，英军在海上拥有绝对优势，在孤立的小岛上与之硬拼，于已有百害而无一利。当时，林则徐和领命驻守定海的葛云飞都先后就此提出过建议，可惜裕谦杀敌心切未予采纳，终于使定海在激战六昼夜后再度落入敌手。

英军占领定海后，又继攻镇海。裕谦率领四千人防守，他亲自登城督战。后因提督余步云溃逃，总兵谢朝恩战死，镇海也失陷了。面对国土沦丧，裕谦悲愤交集，含恨投水殉难。于是，英军在舟山群岛及其属区内设立了一个以丹尼斯为首的所谓军政府，对当地人民实行殖民统治。他们以此为基地，先后袭取了宁波、余姚等城。清朝守军除少数顽强抵抗外，大多闻风即溃，不战而逃。

道光帝得到定海、镇海等地相继失守的消息，并未怎么放在心上。因为广州的奕山借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胜利来粉饰自己，谎报说广州战争大胜。昏庸糊涂的道光帝对中英战争的实情并不了解，信以为真。他认为，既然一个"靖逆将军"能打败英军，再派一个"扬威将军"去浙江也同样能打败英军。于是10月18日，他委任奕经为"扬威将军"到浙江进行反攻。

奕经虽然接受了反攻的命令，但并不坚决主战。经过他的老朋友臧纡青的再三劝告，他才逐渐定下了决心。

臧纡青还提出了一种"遇散便攻、见夷即杀"，"人自为战、战不择地"对付侵略者的战术。这实质上就是游击战术的一种表现，也是较弱的军队抗拒较强的和有组织的军队的有效方法。然而奕经只是表面上同意，实际上却没有按这条建议准备。

奕经领受了办理浙江军务之责后，于12月初到达苏州，一住就是两个月，未曾检阅一次部队。1842年1月25日，他忽然梦见英军"纷纷上船，窜出大

洋”，以为“吉兆”，决定克期进驻绍兴，准备一举收复宁波、镇海、定海三城。3月8日，他在准备不充分、时机未成熟的情况下，贸然反攻宁波，终以大败告终。

相对清军的屡战屡败甚至不战而败，东南沿海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却呈高涨之势，在敌后坚持抵抗侵略者的战斗，以浙东人民在黑水党领导下的斗争最为引人注目。

黑水党是当时浙东沿海人民的一种自卫武装组织，以宁波为中心，活动地区遍及镇海、定海一带。他们在实践中与臧纡青“遇散便攻、人自为战”的策略不谋而合，灵活机动地利用他们自己置备的八桨小艇，神出鬼没地打击英国侵略军。

一次，一艘英国运输小火轮由于退潮而搁浅。船上的英军无奈之下上了岸，抓到一个中国人当向导。他们哪知这名中国人是“志愿”让他们“抓”到的。这名中国人顺利地把这些侵略军带进了黑水党的包围圈。经过激烈搏斗，英军仅一人逃脱，其余或被消灭或被生擒。

英军占据宁波城后，为防备清军反攻，夜里总要派出不少人巡逻。这些零散的士兵正好成了黑水党人袭击的目标。他们乔装改扮，引得英军巡逻哨靠近，或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干净利落地解决战斗，或者干脆将其生擒活捉。如果不小心被发现，则专挑深僻的小巷穿行，英军往往都迷路搞不清方向。这又给了黑水党人以可乘之机。有的英军士兵刚才还在和同伙说话，一转眼便一命呜呼了。

对付在城墙上巡逻的英军，黑水党人用的方法则更显机智。他们用长藤绕个环，悄悄守在城墙下。当城墙上有英军士兵出现时，他们故意弄出响声。英军伸出头俯看，正好中计。黑水党人用藤环套住他的头轻轻一拉，立刻就把中计的英军士兵拉下了城墙。闻声而来的其他士兵出于本能也伸头察看，静候城下的黑水党人又如法炮制。如此擒得几名鬼子兵后，他们把俘虏装入麻袋扛着大笑而去，只留下城上的英军鬼哭狼嚎般的叫声。

在黑水党的这种出其不意的游击战术干扰下，英国侵略军整日人心惶惶，食不甘味，睡不安寐。每天都有人死亡或失踪，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而侵略者对此却束手无策，恐惧之下，英军官兵再也不愿在宁波一带久留，再加上种种别的原因，1842年5月7日英军仓皇撤离宁波。

尽管中国人民坚持反抗侵略，而且取得了较大成效，然而清朝统治者却看不到这点。他们把反抗的人民诬蔑为“汉奸”，称黑水党人为“别贼”，把自己失败的责任转嫁到人民头上，奕山甚至说：“患不在外而在内”，“防民甚于防寇”。奕经也认为：“……到处汉奸充斥。该处人情，败坏至此。”像这样在大敌当前之时，还处处与人民为敌的将军，怎么能不打败仗呢！浙东之战的失败，更严重的是直接导致了清廷彻底投降政策的确立，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更为深重的灾难。

【吴淞之战】

早在1841年（清道光二十一年）9月底，英国侵略者就制定了一个狂妄的计划，企图占领一片对中国来说举足轻

重的土地，借此向中国统治者施压，“以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一个令人满意的条约”。他们选中了长江下游。

众所周知，长江下游自古便是鱼米之乡，自明代开始就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如果说北京在当时是中国的大脑中枢，那么长江下游便是中国的心脏要害。只要控制这块地方，便控制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命脉，清朝统治者就必定会惊恐万分，会因此而言听计从。

正是看准了这一点，英国侵略者调动了一百多艘军舰，调集了一万多人蠢蠢欲动，准备向长江下游进发。可是，昏庸无能的清朝统治者不经周详的调查研究，就盲目地对侵略军的目的作出错误的估计。他们主观地认为，英军这次行动的目的是沿海北上，通过白河进攻北京。因此，他们所忙于部署防守的是北京，而不是长江下游。这就给了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1842 年 6 月 8 日，气势汹汹的英军到达长江口，阻挠交通，侦察吴淞口的防御布置，公开进行武装挑衅。

虽然清朝政府并不重视长江下游的防务，但驻守吴淞口的江南提督陈化成却不遗余力地积极备战，此刻，从吴淞口延伸至宝山沿线都筑有坚固的炮台，并且安置了一百六十多门大炮。黑洞洞的炮口直指长江口外鬼魅般游荡的敌舰。水师方面，守军还新制装备了一种明轮船。这种战船比当时一般的水师船快得多，火力也强大得多。这些连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军队对吴淞这个要塞的防守，是经过认真准备的。”然而，仅靠第一线的固守是远远不够的，吴淞防线的两个侧翼和后方的兵力部署却十分薄弱，而且担任指挥的都是些假抵抗派。战斗一开始便暴露出其贪生怕死的本质，直接导致了战斗的失利。

6 月 16 日拂晓，英军悍然向吴淞进犯。在提督陈化成的亲自指挥下，守军群情振奋，炮火不但猛，而且准，给进犯之敌以迎头痛击。英军没料到中国守军如此厉害，一时间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战后一个英军军官心有余悸地回忆说：“这是自与中国军队作战以来，中国人炮火最厉害的一次。我方损失惨重，旗舰‘皋华丽’号后甲板被击穿；‘布朗底’号被击中十四次；‘西索斯梯斯’号被击中十一次；好几艘战舰的船身被打穿；多人阵亡，其中中国人的第一炮就打死了我方一名中尉军官和几名水手……”

坐镇后方大营协调指挥整个战斗的两江总督牛鉴，表面上看是个很坚决的抵抗派，实际上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投降派。战斗开始前，他跑到陈化成面前，说什么敌人太强大，和他们硬拼只不过是拿鸡蛋碰石头。不如选送些东西过去犒赏一下，作缓兵之计，然后再从长计议。六十七岁的陈化成勃然变色，大声道：“英人强大，可我们也不是鸡蛋！我打了四十多年仗，从未临阵退缩过！今天更是有进无退！况且作为武将，战死沙场也是我的本分！你就不要多说啦！”一席话把牛鉴说得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再也不敢乱说什么，只得悻悻离去。

战斗刚开始，牛鉴缩在大营里坐立不安，想跑又怕承担临阵脱逃的罪名，心中暗暗叫苦。这时，前线喊声震天，不时有打中敌舰的好消息传来。他不禁大喜过望，赶忙带人赶到校场，升起帅旗，命令擂鼓助威，想借此获得亲临前

线督战的赞誉。谁知英军的瞭望哨发现了他的帅旗，指引炮火延伸到了校场。一发炮弹不偏不斜落在演武台上，击毁了演武台一角。这下把牛鉴吓得面无人色，两腿打颤，慌忙下令撤退。他怕自己身着引人注目的官服成为明显的目标，硬逼着一名士兵穿上他的衣服、坐在他的轿子里代替他，而自己则混在乱军之中狼狈逃去。如此胆小无能的总督怎么能指挥协调整个防线呢？他一跑，负责两侧和后方防守的军队便随之溃散。整个吴淞防线只剩下陈化成和他的部下以寡敌众，用落后的武器抵抗侵略者。

当时阵地上枪弹几近枯竭，但却得不到武器、人员上的任何支援。由于两翼空虚，英军顺利登陆，并从两侧包抄过来。看着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敌人，年近七旬的陈化成转身对自己的部下喊道："为国尽忠的时候到了！你们怕不怕？"已为数不多的部下望着这位斑白的须发都被鲜血染红了的老将军，齐声回答："不怕！""好！听我号令！开炮！"随着陈化成手中令旗一挥，仅余的几门大炮一齐怒吼，大地为之一震，前方的英军立刻倒下了一片。"打得好！"陈化成满脸鲜血在硝烟中赞道。

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阵地上的守军人数越来越少，能用的大炮几乎没有了。而英军越逼越近，隐隐约约都能看到他们的蓝眼睛高鼻子了！这时陈化成血流如注，身上已是七处负伤。他挣扎着站到阵地中央，发现连他在内，阵地上仅存三人。他悲叹一声，拔出佩刀，激愤地对身后的一名随从说："阵亡人亡，我无颜苟活了！我死后，你把我就地埋葬，我就是死了也要守着阵地！"说完，将佩刀用力往地上一掷，大哭数声，气绝身亡。吴淞要塞遂告失守。

吴淞战斗失利，宝山、上海等城的大小官吏闻风而逃，只留下两座无人把守的空城。英军进入上海时，只派出了两三名士兵设法爬过城墙打开城门，就进入了上海，连一个清军的影子都没有看到，顺利得令他们自己都不敢相信。

占领了上海，通往镇江的门户便敞开了。镇江位于南北走向的运河与贯通东西的长江的交汇点，自古便是交通咽喉，为兵家必争之地。然而就在侵略者一步步向镇江逼近的时候，清政府还正手忙脚乱地"设法羁縻求和"，哪有什么心思布置镇江防务！把守镇江的只有京口副都统海龄带领的千名旗兵和六百名青州兵以及几门旧炮，而敌人是拥有各种先进武器的一万二千多名英军。实力之悬殊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投降派的阻挠破坏，英军从上海到镇江一路畅通无阻，没费一枪一弹直抵镇江城下。骄横的侵略者根本没把镇江守军放在眼里，他们连一个完整的攻城计划都未制订便贸然进攻。他们想不到，等待他们的是前所未有的惨痛损失。

英军架起云梯争相攀登，都想第一个登上城头，以领取可观的奖金。谁知城墙上的守军冒着枪林弹雨，一次次把云梯推倒。云梯上的英军纷堕如落叶，摔了个七零八落，非死即伤。

怎奈守军太少，无法兼顾一拥而上的英军，陆续有不少亡命之徒爬上了城墙。惨烈的肉搏开始了。训练有素的守军个个以一当十，奋不顾身。有位勇士身负重伤，仍奋力与一个比他高出一头的英军搏斗。情急之下，他大喝一声，冲上前去牢牢抱着英国鬼子，纵身跳下

高高的城墙，与敌人同归于尽了。从未见过中国军队如此勇猛顽强，色厉内荏的英军开始退缩了。就这样，英军的数次进攻都被击退，只留下城墙角一堆堆尸体。同时，守军也有较大伤亡，守城的任务更加艰巨。

很快，英军卷土重来。这次，他们调来了军舰，准备以优势火力压制守军。海龄见状，果断下令抓住敌人立足未稳的时候，先敌开火！只见几门旧炮再显神威，敌人措手不及，刚才还在船上指手画脚的一名军官和十几个士兵立刻上了西天。但是，由于装备窳劣，弹药不足，十几分钟后，守军的火力弱了下来。得以喘息的英军凭借其强大的火力优势逐渐占据了主动。在他们集中火力轰击下，城墙塌陷了一个口子，成群的侵略军士兵从缺口处蜂拥而入，对镇江军民展开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海龄自知再也无力回天，全家自杀殉国。7 月 21 日，镇江城破！

两个月后，一群卖国官僚耆英、伊里布等在南京江面登上了臭名昭著的英舰“皋华丽”号，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暗无天日的时代。1842 年 8 月 29 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也成为中华民族永世难忘的国耻日。

【湖口之战】

19 世纪中叶，中国封建社会已走到了穷途末路。西方列强疯狂渗透瓜分，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人民反抗满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斗争风起云涌，并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发展成了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农民武装起义——太平天国运动。

1851 年 1 月 11 日（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经过精心筹划，以洪秀全为首的拜上帝会在广西桂平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号称“太平军”，建号“太平天国”。由于领导人的正确指挥，更由于各地人民的全力支持响应和广大太平军将士的浴血奋战，太平军连续突破了清军的多重围追堵截，越战越勇，越战越强，纵横驰骋数千里，从珠江流域一直打到长江流域。1853 年 3 月 19 日（咸丰三年二月十日），太平军攻克南京。十天后将其改名为天京，作为太平天国的首都，从此开始了革命的新阶段。

定都天京以后，如何争取更大的胜利，以尽快结束满清的腐朽统治，便成了太平天国领袖们面临的新课题。为此，他们制定了一个分兵出击、两路齐发的战略计划：一路尽选精锐长途奔袭清朝的中枢——北京，给予统治者最直接的打击；另一路便是挥师西征，夺取长江中上游各省，扩大自己的控制区域。这一大胆的计划，一方面反映了太平天国领袖们在取得一系列辉煌胜利后的昂扬斗志，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骄傲轻敌的思想在领袖们头脑里有所滋生，对后来的军事斗争产生了一系列不利的影响。

1853 年 5 月 19 日，西征太平军在胡以晃、赖汉英的率领下，攻克和州，浩浩荡荡地向西进发。太平军作战勇敢，纪律严明，受到沿途各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因此进展颇为顺利。然而在进军湖南时，太平军碰到了一个新的凶恶敌人，那便是由清朝反动官僚曾国藩建立的地主武装——湘军。

太平军刚进驻天京不久，清朝统治者便在天京南北建立了江南、江北大营，围困太平军。然而他们也深知，单靠已没有什么战斗力的八旗和绿营兵是不足以对付迅速发展的太平军的。因此，他们利用一些汉族地主本乡本土的封建政治、经济、宗教势力，在几个重要省份举办团练，积蓄反革命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革命斗争。湘军便是这一阴谋的产物。经过曾国藩的苦心经营，湘军具备了比较强的战斗力，成为太平军的主要作战对手。



太平军作战图

1854年（咸丰四年）4月，曾国藩为解除太平军对长沙的威胁，亲率水、陆两军扑向长沙外围要塞靖港。守卫靖港的太平军用猛烈的炮火迎接这些“不速之客”，并乘着风势火攻。湘军水师接连起火，顿时大乱，竞相逃命。水师的混乱迅速波及陆上的湘军。太平军趁势进攻，把送上门的湘军聚而歼之，大挫湘军锐气。曾国藩又羞又气，一头扎进水中，企图以“自尽”掩饰窘态，演出了一场“自尽未成”的把戏。

在城陵矶，智勇双全的“飞将军”曾天养抓住敌水师顺流而下、易进难退的弱点，率领“虎头军”，于旋湖港设下天罗地网。本来水陆联手作战的湘军水师仗着船多兵多，贸然进攻，正中太平军下怀。待敌完全进入包围圈后，四下伏兵尽出，一举歼灭助战而来的广东水师及总兵陈辉龙、湘军水师总统褚汝航等四名敌主将。

在节节胜利的同时，多线出击所造成兵力严重不足的后果日益暴露。太平军无法在新开辟的两湖地区站稳脚跟，不得不放弃原计划，步步回撤，退出了湖南、湖北。这便给了湘军以喘息之机，从而死里逃生。

这年11月，英勇善战、足智多谋的翼王石达开受命主持西征军事。他清醒地分析当时形势，认真总结湖南战场的成败得失，把西征军略加收缩，着力经营几个战略要地，加强水师建设，在短期内建成了一支具有一定作战能力的水师部队，使战局为之一变。

湖口，位于鄱阳湖出长江之口，地势险要，上通楚北，下达皖南。在石达开眼里，这儿正是聚歼湘军水师的好战场。1855年初，他亲临湖口组织部署，要在这里与湘军展开决战。根据当时实际情况，他制定了以守为攻、惊营疲敌、诱敌深入、奇袭制胜的作战方针。

在鄱阳湖与长江交汇的水面，石达开命人扎起大小两座木排，在两岸厚筑土城，安装炮位，严阵以待。急于报复的湘军缓过劲来之后，千方百计地对湖

口发起多次进攻。无奈石达开率众沉着应战，据险坚守，湘军每次进攻都无功而返。技穷的曾国藩望着江中耸立的木排只剩叹气的份儿，不得不下令水师停止进攻，另寻他计。

敌驻我扰，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支由百余条小船组成的小部队悄悄出现在江面上。这些小船或三只或五只地连在一起，船上堆满了混着火药的柴草。等小船神不知鬼不觉地滑到湘军战船中间时，只听一声炮响，四下立时火起。船上的湘军从睡梦中惊醒，已身陷火海，被烧死的、自相践踏失足落水被淹死的不计其数。从那以后，太平军不是以小船袭击，便是以强弓硬弩射去火箭惊扰。湘军昼夜担惊受怕，寝食难安，而且几乎每天都有人伤亡，士气日益低落，“锐师倏而变为钝兵”。

如此过了二十多天，曾国藩心知长期对峙于己不利。因为太平军身后有着广大江西人民的鼎力支持，无后顾之忧，而对杀人如麻的他，老百姓们除给了一个“曾剃头”的绰号外，别无他物。所以决定集中全部兵力，从水、陆两路猛扑湖口，以撕开石达开的沿江防线。西征中最精彩的一幕开启了。

1月29日，湘军集中炮火向鄱阳湖口的太平军阵地狂轰滥炸。炮火引爆了木排上太平军的弹药箱，接着又引燃了木排。太平军在水面已无险可守！面对不可一世的湘军，太平军果断后撤，避敌锋芒。曾国藩自以为得计，笑着对左右说：“破了湖口，就可以‘直捣金陵’啦！”

面临险境，石达开随机应变，决定利用木排被焚作诱兵之计，肢解湘军水师再各个击破。他命令守军趁夜将大船凿沉江心，堵塞水道，只在西岸边留下一道狭窄的隘口，象征性地设置了几处障碍。这样，湘军的重型战船便进不了鄱阳湖。

骄横的湘军哪知是计，气势汹汹地派出一百二十多艘轻便快船舢板等冲入湖内，而将“快蟹”、“长龙”等大船尽留外江。石达开闻讯大喜，立刻命令埋伏的太平军封锁隘口，将钻进内湖的敌船牢牢锁在湖内。湘军水师一下被分割成互不呼应的两部分，原有的部署立刻一片混乱。

上了钩的大鱼怎容它轻易溜掉，埋伏已久的太平军抓住有利时机，以关门打狗之势痛击失去大船掩护的内湖湘军。只一夜工夫，“入瓮”的湘军便所剩无几了。而停泊在外江的大船，由于没了轻快小艇的配合，犹如“飞鸟去翼，爬虫去足”，根本无法进行战斗。太平军一阵猛打猛攻，湘军立呈败象，一部分战船见势不妙，顾不上照应其他船只，掉头就跑，狼狈逃往九江。

2月11日，仓皇失措逃回九江的湘军惊魂未定，便发现大举反攻的太平军在夜幕掩护下，以数十只小船为先导，悄悄靠近湘军水师大营。一声令下，火箭、喷筒万支齐发，太平军以翻江倒海之势猛扑上去，喊声震天，刀光闪闪。措手不及的湘军闻风丧胆，溃不成军，连曾国藩的座船也被太平军包围了。曾国藩羞愤难当，自思如此大败，以后有何面目见人，又是一头扎进水中企图自杀。众随从慌忙把他捞起，藏到了一艘小船的甲板下，趁乱狼狈逃去。他的管驾官和监印官则被当场击毙。

经过这样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曾国藩已成为惊弓之鸟。他自己也不得不

承认，“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指太平军战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

湖口、九江大捷之后，石达开指挥西征太平军趁势全线反攻，连克武穴、兴国、汉阳等城，重新控制了武汉至九江的长江水面及附近的湘、鄂、赣广大地区，在较短时间内完全扭转了长江中游的战局。

在西征取得初步胜利之后，石达开又率军顺江而下，与守卫天京的太平军密切配合，一举粉碎了围困天京达三年之久的江南大营。同时，由陈玉成率领的太平军也一鼓作气消灭了江北大营的清军。天京的肘腋之患完全肃清，太平天国的革命斗争达到了最高潮。

综观西征，太平军之所以能在强敌环伺的不利环境中取得空前的胜利，除了战士们作战勇敢外，还应归功于石达开的正确指挥。他冷静分析敌长我短，确立了避敌锋芒、诱敌深入、惊营疲敌、快速制胜的战术思想，不仅令太平军将领们赞不绝口，更使他的老对手曾国藩和与他交过手的英国侵略者自叹弗如，以致谈“石”色变。

【三河之战】

至1856年（清咸丰六年）夏天，西征太平军经过三年多的苦战，控制了湖北东部及江西九江、安徽安庆、湖北武昌等重要军事据点，攻破了围困天京三年多的江南、江北大营，形势一片大好。然而，就在革命蓬勃发展的时刻，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矛盾公开激化，发生了天京变乱。从杨秀清逼封“万岁”开始，经过韦昌辉的大屠杀和石达开的带兵出走，革命力量受到极大的摧残，造成太平天国“朝中无将、国内无人”的严重局面。

这次变乱不仅丧失了乘胜歼灭敌人的有利时机，反而使敌人得以重整旗鼓，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向太平天国反扑过来。革命形势由此急转直下，太平天国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这时，被洪秀全果断提拔为军事统帅的陈玉成和李秀成，受命于危难之间，立志扶大厦于将倾，担负起了支撑时局、开拓新局面的重任。

综观当时局势，要想摆脱军事上的被动不利局面，长江下游必须歼灭清军的江南、江北大营，解除天京之围，长江中游同时又必须击退湘军的进攻，确保军事重镇安庆不落入敌手。为实现这一战略，1858年（咸丰八年）7月，年仅二十一岁的陈玉成与李秀成在安徽枞阳联合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会上，陈玉成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战略构想，各将领也慷慨陈词，决心“各誓一心，订约会战”。这次会议确立了年轻的陈玉成作为太平军军事统帅之一的地位，同时也肯定了他提出的避实就虚、迂回包抄、声东击西、反客为主等机动灵活的战术思想。太平天国后期在军事上取得的一系列胜利，正是这些战术思想在实战中得到贯彻的结果。

枞阳会议后，陈玉成当即挥师连克庐州、店埠等地，与绕道而来的李秀成军夹击盘踞在江北大营的清军德兴阿部。对太平军的战略反攻未作任何准备的清军措手不及，大败而去。陈、李二部合而为一，又与驻守天京的太平军分进合击、围攻建于江北浦口的清军江北大营。这一仗打得痛快淋漓。由于太平军进展

神速，清廷钦差大臣德兴阿吓得“愁急交攻，彻夜呻吟”，根本拿不出什么主意。这时，他身边的人又建议说：“不如来个三十六计之上计吧！”德兴阿正求之不得，赶忙顺水推舟道：“既然大家说该这样做，就依你们吧！”

于是，江北大营的这些大小头目们纠集了一帮亲兵，狼狈逃窜，几乎是一夜之间就跑了一百多里地，武器弹药等军事物资扔得沿途比比皆是，连专门铸造用来对付太平军的十余门九千斤大炮也“送”给了太平军。自此，太平军彻底摧毁了清军的江北大营，并使之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这一胜利，使太平天国的南北交通线得到了恢复，长江南北的物资又可以源源不断地供应天京。这对于稳定天京城内的人心和扭转危局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为巩固这一成果，太平军在陈玉成、李秀成的分别率领下，继续兵分两路扫清天京外围的残留清军，进一步扩大战果。其中，李秀成部奋力消灭了龟缩扬州的清军残兵败将，占领了这个富庶的城市；而陈玉成则率军攻打被清军吹嘘为“铁铸”的六合。

六合，位于天京之北。若以浦口为咽喉，六合则是江北之心腹要地。太平军的将领们认为：“要解天京之围，就要先破六合！只有这样，清军水师才会被赶离天京附近江面，如此一来，太平军在江北一带就能纵横驰骋，战局必会由此改观。”

事实证明，选择六合作为整个战局的突破点是完全正确的。10 月 24 日，在陈玉成的锐意进攻下，这个被敌人吹嘘为“铁铸六合”的战略要地一举攻破。清军主帅温绍原当场毙命。这样，不仅使太平天国的江北防线得以巩固，还为后来攻破江南大营创造了有利条件，更使陈玉成部队实行江北作战的计划少了后顾之忧。

就在太平军以主力进攻江北大营捷报频传的时候，西线的湘军乘虚而入，加紧大举进攻太平军。将军都兴阿、副都统多隆阿、总兵鲍超及水师提督杨载福等率部直扑安庆。防卫安庆的太平军“一日五文前来告急”。湘军中最为凶悍的一支部队李续宾部接连攻陷太湖、潜山、桐城、舒城等地，进逼到了离庐州仅五十余里的三河镇，气焰极为嚣张。李续宾一时间也被清军吹捧为“威望冠诸军”的人物。西线形势万分紧急！

三河镇在庐州之南（今属肥西），扼庐州咽喉，为水陆交通要道，是太平天国当时在安徽的重要军事据点，筑有一座大城，内外堡垒九座，囤积了大量的粮食军械，以接济庐州、天京等地。因而，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对太平天国来说，三河镇的得失都关系到整个战局的成败。

正在长江下游作战的陈玉成接到三河守将吴定规的告急文书，马上指挥部队星夜奔赴安徽战场。同时，李秀成也挥师绕过清军的阻击前去接应。陈、李两军再一次并肩作战。

到了安徽前线，陈玉成立刻率部投入战斗。根据湘军长驱直下，孤军深入，犯了兵家大忌的弱点，他制定了围而歼之、速战速决的作战方针。同时，他又看到湘军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瞧不起太平军，果断派出小部队从各个方向不断骚扰敌人，一方面麻痹敌军，另一方面分散湘军兵力，迫使湘军多线作战，

难以集中。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陈玉成亲率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插三河东南的白石山和西南的金牛镇，包抄敌军后路。占领白石山和金牛镇的湘军还沉睡在梦乡里，忽听一阵枪声，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便当了太平军的俘虏。敌军的退路被切断了！可是陈玉成却丝毫没有松劲，他连夜派人传令庐州守将吴如孝带兵南下，阻击舒城方面湘军的救援。当庐州太平军已到达阻击地域的消息传来时，陈玉成严峻的脸色终于有了一丝笑容。至此，围攻三河镇的湘军完全陷入了太平军布下的天罗地网！

陷入重围的湘军情知不妙，慌乱发动进攻，妄图夺路而逃，外围的湘军也加紧接应的步伐，想救出自己的难兄难弟。太平军陈、李、吴三部密切配合，无论湘军如何挣扎，包围圈也未漏丝毫缝隙，反而逐渐缩小收拢，收网的时机成熟了！

11 月 14 日，陈玉成率部逼攻三河湘军大营。次日黎明大雾弥漫，数步之外就只闻人声不见人影，湘军突袭金牛镇。猛听一声炮响，一彪人马自敌后方浓雾中杀出，这支勇猛的部队正是由陈玉成亲自率领的，直杀得敌人哭爹叫娘，一败涂地。由于准备充分，又占天时地利，陈玉成部如摧枯拉朽般横扫三河镇外围的三路湘军，干净利落地打碎了敌人的全盘计划。威风一时的李续宾暗叫不好，赶忙纠集一伙人以攻为守，企图击退太平军突围而去。太平军严阵以待，连续击退了其十多次进攻。李续宾气得哇哇乱叫，连斩两名临阵脱逃的士兵，但仍挡不住退下来的湘军。无奈之下，他只好撤回大营，固守待援。

此时，李秀成部自白石山赶来助战，吴定规等守军也自三河镇内冲出，三路太平军会合成一只拳头，狠狠击向湘军的中军大营。先期抵达的太平军机智地把长江河堤挖断，滔滔江水汹涌而出，断绝了湘军的最后一条退路。逃至江边的李续宾望着翻滚的江水，自知在劫难逃，绝望中上吊自杀。这个七年间攻克四十余城、经历大小六百余战、双手沾满太平天国战士鲜血的刽子手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主将一死，湘军更是溃不成军。经过前后三天的激战，这支湘军精锐部队六千余人，上至李续宾、曾国藩的三弟曾国华，下至普通走卒，无一漏网，悉数被歼。

三河镇战斗结束后，陈玉成等挟胜利之余威，乘胜追击，夺回了舒城、桐城、潜山、太湖等地，迫使围攻安庆的清军弃营而去，安庆之围不战而解。从此，长江中游的战局发生了有利于太平军的变化，天京上游的局面得到了相对稳定。

这一仗，给了清朝反动统治者一个沉重打击。听到三河惨败、全军覆没的消息后，曾国藩忍不住痛哭流涕，一连数日食不下咽，他懊丧地承认："三河之败，歼我湘人殆近六千，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湘军另一头目胡林翼也跺着脚哀叹道："三河溃败之后，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日。……敢战之才、明达足智之士，亦凋丧殆尽。"

而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年轻的陈玉成已逐渐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军事统帅。连他的对手曾国藩都不得不承认，"自汉唐以来，未有如此'贼'之悍也!"在民间更有"军强冠诸镇，与国藩相持

数年，国藩深畏之”的说法。由于战功卓著，陈玉成被晋封为英王，时年仅二十二岁。

【大沽口之战】

1858年5月20日（清咸丰八年四月八日）上午8点，清朝直隶总督府外来了一队全副武装的外国人。他们交给直隶总督谭廷襄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清朝守军在两小时内交出天津守备重地大沽口炮台，让他们“护卫”特使进京，否则将以武力占领。这伙人便是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法联军的信使。他们的无理要求，当然遭到了中国方面的断然拒绝。

第一次鸦片战争过后没几年，贪婪的英、法等国不满足于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又相互勾结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发动了由英法直接出兵、美俄暗中支持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战争前期，他们在广东沿海大肆进攻。当他们发现这并不能使清朝政府屈服时，便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京津地区。5月初，英、法侵华军全权代表额尔金与葛罗率大小舰艇二十六艘、官兵约二千七百人，逼近天津。



清军炮击进犯大沽口的英法联军

由于清政府对英、法早有戒心，加强了津门重地大沽口一带的防务，配备轻重火炮五百余门，总兵力达一万三千多人。来势汹汹的英法联军自知如果开战占不了什么便宜，便派出了文章开头的那一队士兵，妄图恐吓守军交出炮台。结果却自取其辱，遭到中国方面的当头痛斥。

5月20日上午10点，英法联军悍然打响了第一炮，拉开了大沽口之战的序幕。清军当即予以还击。大沽口一带顿时炮声震天，硝烟弥漫。法舰“霰弹”号的螺旋桨在游弋中被中国军民事先布好的渔网缠住，无法动弹，成了炮台上清军的“活靶子”，一阵炮火袭来，法舰顿时变了形。还有些敌舰被白河上渔民施放的火筏阻挡，难以前进一步，连船上的帆都被引燃了。激战近两个小时，英法联军的三艘战舰当场沉没。

然而就在这时，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大海退潮引起白河河水猛退，联军舰艇顺势后撤，退出了守军火炮的有效射击范围。清军的炮弹呼啸着飞来，却在距敌舰不远处力竭落水爆炸，未伤敌分毫。而敌舰的火炮由于性能远胜于清军，既打得远又打得准，屡屡命中清军炮台。纵然守军英勇顽强，也逐渐丧失了还击的能力。此战双方各有伤亡，但清军因准备不足、装备落后，加之主帅谭廷襄以及直隶提督张殿元、署天津镇总兵达年等逃跑，致使北、南炮台先后失陷，天津完全暴露在了英法联军面前。在敌人的武力威胁下，清廷被迫屈服，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前往求和，在天津与侵略者再度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天津条约》，中国进一

步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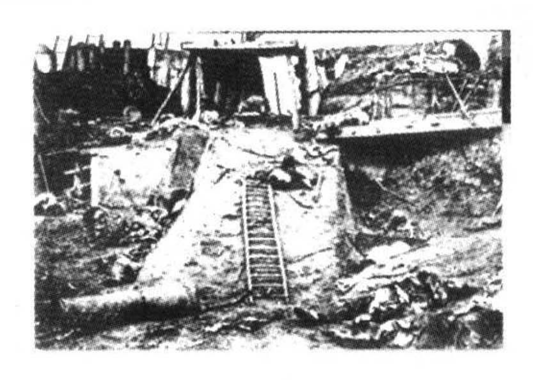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陆续撤出了津沽一线，京畿威胁暂告解除。胆战心惊的清政府为防备联军卷土重来，任命悍将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加强京津防务。

吸取了前战失利的教训，僧格林沁着力经营，经过细致的调查，提出了集中兵力、重点设防的总方针，进行积极防御。他亲自督办了以大沽沱口为重点的近海、沿海及侧翼的多重军事设施，还选调精兵强将充实力量。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大沽重地的防守力量有了质的提高，官兵们士气高涨，要给来犯之敌以沉重的打击。

果然不出人所料，1859年6月（咸丰九年五月），英法联军又借“进京换约”之名，由英海军上将何伯率领大小舰艇二十一艘（其中英国十七艘）、官兵约二千人再度来犯。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以深水舰只正面袭击大沽炮台，以浅水炮艇开道越过横江障碍进攻，从而摧毁炮台，然后组织陆战队登陆占领，扫清武装进攻的障碍。

6月25日上午，十余艘联军舰只驶至清军在前面铺设的铁戗旁，先后用缆绳拉倒了十余架铁戗，然后放下浮标标记开辟通道。僧格林沁闻报，心知来者不善，但为避免扩大事端，他一面派人与英法侵略者交涉，一面命令各部做好战斗准备，一旦敌人开战，坚决予以还击！

自兵临大沽海口以来，何伯就在极力收集大沽守军的情报。从各种途径得到的消息，正如他本人亲眼在望远镜中见到的一样，阵地上见不到几个士兵，根本不像是大战在即的样子。何伯放心



尸横遍地的大沽炮台阵地

了，当日下午1时30分，他下达了总攻击令后，便回舱喝咖啡去了。他满以为清军仍和去年一样经不起他的重炮轰击，要不了多久便可以从容登陆了。

殊不知何伯正中了僧格林沁的骄兵之计。局势紧张之初，僧格林沁便有所安排，他要求各守军注意伪装隐蔽，要做到炮台白天不见旗帜，夜间不闻更鼓，守军隐于安全处，任凭联军如何试探决不暴露。何伯的贸然进攻，正中僧格林沁下怀。当闻报联军已进入预定水域时，僧格林沁哈哈一笑，高喊一声：“打!”只见各部守军从藏身之所鱼贯而出，迅速撤除了掩盖在火炮上的草帘，按早已计算好的角度、距离向敌舰猛烈开火。

英法联军猝不及防，完全笼罩在炮台守军的炮火之中，当即便有几艘军舰中弹起火。有艘企图抢滩登陆夺头功的炮艇被突如其来的炮火击毁了锅炉，无法动弹，紧接着又被一顿狠揍，冒着浓烟沉入了河底。不久又有一艘炮舰“庇护”号步其后尘。刚才还在舱室里悠闲地喝咖啡的何伯，此时站在旗舰“鸻鸟”号的甲板上，目瞪口呆地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不知所措。突然，一颗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正好落在他的旁边。只听“轰隆”一声，站在何伯身后的“鸻鸟”号舰长当场毙命，何伯受了重伤，

“鸻鸟”号受损严重，无法指挥作战。

原来，清军采用了“擒贼先擒王”的战术，集中火力轰击联军指挥舰。无论何伯转移到哪艘船，只要升起旗舰标志旗，必定引来清军倾泻的炮弹。何伯无法，只得下令全线撤退。

不甘心失败的联军在零星炮火的掩护下再次组织陆战队强行登陆。早有准备的守军利用各种防御工事予以猛烈回击，一批批亡命之徒应声倒毙。激战至晚上，联军“术穷力尽”，无心恋战，抛下了上百具尸体狼狈逃回船上。没几天，英法联军的残兵败将便灰溜溜地南逃了。是役，清军以伤亡三十余人的代价，换取了击沉四舰、伤十余舰，毙伤英军四百六十四人、法军十四人，生擒二人的巨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英法联军在大沽惨败的消息传到欧洲，引起了英、法两国极大的震动。英、法上层统治阶级几乎都不相信这会是事实。为了报复，更为了在华攫取更多的特权和利益，英、法两国再度任命侵华老手额尔金和葛罗为公使，带领一百二十多艘军舰和近三万陆军来华，试图进一步以武力迫使清政府屈服。

对英、法的报复，清政府早就有所准备，加强了大沽一带的兵力部署。但是，初尝胜果的清军中开始出现盲目乐观的情绪，僧格林沁也没有了上回的谨慎，甚至夸口说：“如果他们敢再来，我迎剿兜击，必胜无疑！”主帅轻敌，部众麻痹，战争尚未开始便潜伏了危机。

在大沽口以北，有一片荒地叫北塘，是保卫天津的门户之一。这里原有炮台，海边还敷设了地雷。但由于清政府曾选定北塘接待英法特使由陆路赴津，因此炮台和其他工事都遭废弃，驻军也撤走了。北塘成了不设防区域。僧格林沁布防时，认为北塘至天津的那片荒地于联军而言没什么利益可图，便主观地以为联军不会在北塘登陆，因此这里仅留了少量部队驻守。

英法联军探听到这一消息以后，却公然声称将在北塘登陆，故意让僧格林沁知道。自负的僧格林沁大手一挥，说：“洋人狡猾，故意放出消息骗我调兵北上，我才不上当呢！”在错误的判断下，他作出了弃守北塘、诱敌深入的部署，结果正中了联军的避实就虚之计。

1860年（咸丰十年）8月1日，英法联军由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俄国人带路，绕开重兵防守的大沽口，驶至北塘河口。由于北塘近似无人把守，联军未费一枪一弹即顺利登陆，占领北塘一带的废旧炮台，并站稳了脚跟。两天后，联军向清军发动了进攻。陆上作战，联军的火力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由于重武器都被抽调到大沽前沿布防，此时此地的清军官兵手中多只是弓箭和刀枪等冷兵器，根本无力阻挡在猛烈炮火掩护下蜂拥而上的英法联军。

占到便宜的联军洋洋自得。12日，前往迎战的三千清骑兵全军覆没，新河、军粮城失陷；14日，唐儿沽（今塘沽）在激战两小时后被敌占领；18日，白河南岸的大小梁子亦告不守。至此大沽炮台陷于四面受敌的危险境地。

一天清晨，大沽北炮台下来了一行洋人，为首的正是侵略军头子巴夏礼。他用马鞭指看炮台大叫大嚷，要守军赶快投降。回答他的是几声清脆的枪声和驻守炮台的直隶提督乐善的严词拒绝：“你们要炮台的话，就拿你们的命来换

吧!"巴夏礼气急败坏，悻悻返回营中。

19、20两日，侵略军数百人由唐儿沽进至石缝炮台背后，填塞沟渠，作进攻准备，被清军击退。

21日清晨5时，联军兵分两路向大沽发起攻击。这是一场殊死的血战，清军将士奋不顾身地使用一切手中可以利用的东西进行抵抗。他们如猛虎一般扑向冲上炮台的联军，用长矛，用大刀，用石头，甚至用牙齿顽强阻击，整个阵地都为鲜血所染红。

激战多时，联军增援部队陆续到达，海上舰艇亦纷纷发炮助战，而清军因腹背同时受敌，两线作战，人员本就不足，再加上战斗减员严重，逐渐丧失了战斗力。北岸炮台陆续失守，只剩下石缝炮台有一门大炮还在轰鸣。联军一个军官在望远镜中发现，这门大炮是由一个满脸鲜血的清军士兵操纵，他装好炮弹后便果断开炮，根本不管敌人的炮火就在自己耳边掠过，直至一枚炮弹正好击中他，整个炮台才完全沉寂下来。

据守南炮台的僧格林沁见大势难支，下令全军撤退；直隶总督恒福在巴夏礼的威胁下，交出南炮台及全部军火物资。英法联军付出了死伤三千多人的代价，最终占领了天津门户北塘、大沽。

清朝统治者的抵抗决心至此完全丧失，8月24日，联军轻松进占天津；9月3日，兵临北京城下。9月22日，咸丰皇帝狼狈逃往热河（今河北承德），把北京城交给了以恭亲王奕䜣为首的一群留守大臣。10月10日，众大臣"开门揖盗"，18、19日英法强盗在圆明园抢掠了一切可以抢掠的东西之后，纵火焚毁了这座有一百五十多年历史的艺术宫殿，对人类文明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奕䜣在俄使伊格那提也夫居间"斡旋"下，于24、25日分别与英、法签订了又一纸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北京条约》。

"在将来交付历史审判的时候，人们不要忘记这两个强盗，一个叫英吉利，一个叫法兰西!"法国大文豪雨果这样评价这场战争。

【谢庄之战】

北京近郊，有一座美丽的小村庄，周围是茂密的森林，连绵的群山。村民们在这里过着与世无争的平静生活，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打猎、种田自得其乐。这个"桃花源"式的小山村便是后来名噪一时的谢庄。

村里有户姓冯的猎户，是早年间自山东迁移来的。户主冯三保，练得一身好功夫，为人豪爽仗义，被村里人称为"谢庄第一猎手"，隐约成了谢庄猎户的首领。冯三保有个宝贝女儿叫婉贞，长得眉清目秀，却不爱描花捏针，只好舞枪弄棒，也练得了一身漂亮的拳脚，时常与村里的青年男女相互切磋，俨然也成为青年中最出色、最有威信的一个。

1860年（清咸丰十年）9、10月间，一天，远方传来阵阵轰鸣，北京方向还冒起滚滚浓烟。村里人议论纷纷，不知道外边出了啥事，就派了几个人外出打探。没多久，便有消息传来：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城，赶跑了咸丰皇帝，还在大肆抢掠了圆明园后放火烧毁了这个有名的园林。

村里一下子炸开了。人们脸上满是惶恐，往日的宁静平和荡然无存。有的人甚至收拾东西准备搬家了。就在一片

慌乱中，冯三保与村里的几位长者冷静地商量过后，决定留下来，保卫自己的村庄。有人问："官兵都挡不住洋人，我们行吗?"冯三保黝黑的脸膛显露着坚毅："这里是我们的土地，决不能让洋人糟蹋了！拼死也要把他们挡住!"

斩钉截铁的话语打动了人们。村里人推举冯三保为首领，组织全村老少积极备战。他们在村前的谷口砌了一道坚固的石墙，又屯集了大量猎枪、火药和粮食。村里的青壮年们分成几拨，轮流守卫值更。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村里暂时平静了下来。不过，这只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寂静。

几天以后，谢庄前面的空地上出现了一队英法侵略军。这些刚刚掠夺完的侵略者似乎还未填满自己贪婪的欲壑，发现了谢庄这个小村庄，便狞笑着逼了过来。村中老少闻讯，纷纷拿起了猎枪、猎叉等武器，有些小孩也拿着木棒、石块，准备和石墙外的"饿狼"大战一场。

冯三保站在石墙上，冷冷地看着一步步靠近的侵略军，迟迟未发话。这时，侵略军中一个小头目模样的人"叽哩哇啦"喊了一大通，大意是让村民们打开大门，放弃抵抗。冯三保根本不予理会，暗中命令手持猎枪的猎手们在墙垛后面隐藏好，准备战斗。整个谢庄除了敌人狂妄的叫嚣外，竟是逼人的沉寂。

时值正午，阳光强烈地炙烤着大地。敌人耐不住了，哇哇地发动了进攻。几十名士兵端着枪若无其事地靠近石墙。他们根本没把这个小村庄里的老百姓放在眼里，脑中还在幻想着攻陷村庄后要饱餐一顿，美美地睡上一觉。敌人越来越近，有的猎户按捺不住了，不住地往冯三保这边看。手握自己心爱的猎枪，冯三保嘴里还叼着烟袋！看着有人等不及了，冯三保不紧不慢地取下烟袋放到脚边，悄声对周围的人说："放近了打，注意节省火药！听我号令!"

敌人更近了，连眉毛胡子都看得清了！只听冯三保一声暴喝："打!"石墙上"乒乒砰砰"地响起一片枪声，无数的铁砂应声飞向近在咫尺的侵略军。敌人猝不及防，遭此迎头痛击，当场倒下了好几个，其余的连滚带爬地往回跑，连同伴的尸体也顾不上了。看到敌人跑得远了，冯三保和几个艺高胆大的猎户飞身从墙上跃下，拾起敌尸旁的钢枪，解下子弹袋，满载而归。抚摸着锃亮的钢枪，冯三保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这下好啦！有了这枪就更不用怕洋鬼子啦!"周围的猎户们见初战告捷，也都个个笑逐颜开。

十几分钟后，气急败坏的敌人卷土重来。冯三保率众如前法炮制，再度击退敌人。如此再三。傍晚时分，敌人对谢庄仍是无可奈何，不得不灰溜溜地撤走了。

一举击退连官兵都挡不住的洋人，村里人高兴得赛似过年，有些人家甚至拿出鞭炮燃放以示庆贺。冯三保和众猎户聚在一起，大碗大碗地畅饮着家酿的美酒，大家脸上都溢满了胜利的喜悦。

在全村同贺胜利之时，冯婉贞却轻皱眉头，满腹心事地独自坐在家里，不时长长地叹息一声。深夜，尽兴回家的冯三保刚进屋，婉贞便迎了上去，焦急地说："爹！今天洋人是未做准备，才会被我们轻易打退。万一明天他们做好准备，把大炮带来，我们恐怕就抵挡不住了！您看……"

“女孩子家懂什么!”微醉的冯三保没等婉贞说完便打断了她的话，“明天鬼子敢再来，我保管叫他有……有去无回!”说完，他自己进屋倒头便睡，留下婉贞一个人满脸焦虑地呆站在原地。

冯婉贞咬着嘴唇来回走了几趟，忽然猛地一转身，进屋提了一包东西，拿着自己的佩刀转身出了门，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

没过多久，十几条黑影骑着马悄悄出了村，轻车熟路，直奔村外那片茂密的树林。原来，冯婉贞担心侵略军会带重型武器来犯，便带领村里平时常和自己切磋武艺的十几个青年男女连夜出村，到敌人进犯的必经之地——野树林埋伏，希望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借以挽救谢庄。

天色微明时分，远处传来车辚马啸声，间杂着“叽哩哇啦”的叫喊，敌人果然带着大炮来报复了!他们自以为凭着这几门大炮，定能攻下谢庄，因此肆无忌惮地沿着大路，大呼小叫地向谢庄开来。透过茂密的枝叶，冯婉贞禁不住捏了把汗，自己只有十几个人，十几把刀，能挡住气势汹汹的敌人吗?

略一迟疑，冯婉贞对围在她身旁的十几个青年人说：“我们分散埋伏，听我号令，看我进攻方向，一起冲杀，定能给鬼子当头一棒，也好减轻村里的压力!”说完，指定了一人回村报信，其余便各自连人带马埋伏在树林里。

英法侵略军自然想不到还离谢庄数里之遥便会有埋伏，仍然毫不顾忌地往前走。不一会儿，便到了树林深处。此时天色尚暗，林中古木参天，遮天蔽日，走在路上的敌人不得不打起火把。这正好成了青年们的目标。只听凌空一声脆喝：“杀啊!”大路两旁旋风般冲出十几条黑影，挥动手中雪亮的钢刀劈头盖脸地向英法侵略者砍去。

敌人大惊，慌忙四处躲闪，但终究慢了半拍，几个鬼子当即身首异处。林子里顿时乱成一锅粥。冯婉贞等乘乱大展拳脚，杀得敌人鬼哭狼嚎，鼠突豕奔。

然而，敌人毕竟都是经过正规训练的士兵，很快便回过神来，利用手中的武器开始反击。骑在马上作战的青年左右回旋极不方便，目标又显著，所以干脆弃马而下，手持利刃徒步与敌搏斗。由于是近身格斗，敌人的钢枪没了用武之地，肉搏又明显不是武艺高强的青年们的对手。没多久，侵略者又倒下了好多，受伤流血的比比皆是。

狡猾的敌人很快意识到肉搏绝非对手，便佯作败退，企图龟缩到一起，让穿梭于敌群的冯婉贞等暴露后，再用枪去对付他们。冯婉贞一眼便看穿了敌人的诡计，高喊一声：“冲进去!别让他们有机会开枪!”青年们心领神会，纵身投入敌阵，奋力搏杀。这下敌人无计可施了，只好硬着头皮应战。刺刀哪有钢刀好使，晨曦中不停传来敌人的惨叫声。青年们闻声，斗志倍增，而侵略者们则愈加胆寒，只能勉强抵挡，根本无还手之力。

这时，天逐渐亮了，树林里也透进清晨的曙光。奋战近两个小时的青年们已有些累了，进攻的节奏慢了下来。惊魂稍定的敌人这才发现进攻他们的原来只有十来个人，不禁恼羞成怒，恶狠狠地反扑过来。虽然敌人损失了不少，但相对青年们仍处于绝对优势，他们以三五个为一组，围攻几近精疲力竭的青年们。冯婉贞等左突右挡，却因寡不敌众

且又被分散包围，没多久都身披数创，鲜血染红了衣衫。

正在这紧要关头，四周传来震耳欲聋的呐喊声。林中冲出一群手持钢刀、长矛的人，为首的正是冯三保，只见他豹眼圆睁，手提大刀冲入敌群，两刀便把正在围攻冯婉贞的几名鬼子解决了。他扶着已多处受伤的女儿在一棵树下坐好，说："好女儿，你歇着，看爹替你杀敌！"说完转身又投入了战斗。

好一场恶战！当太阳高挂时，敌人终于不支，仓皇而逃，留下了近百具尸体和几门锃亮的大炮。

凯旋的队伍中，冯三保和冯婉贞走在最前面。谢庄百姓们敲锣打鼓迎接这对机智勇敢的父女和无畏的勇士们。

以弱胜强的谢庄之战，在很短时间里便传遍各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特别是京津附近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此，侵略者再也不敢在京津附近乡村为非作歹。没过多久，他们便撤出了北京城，其中不能说没有像谢庄这样的广大乡村人民的功劳。

【高楼寨之战】

清代中叶，在河南和安徽等淮北广大农村，出现了一种称为"捻党"的秘密组织。当时当地农村中迎神赛会要搓纸燃油，所谓"捻"便由此而得名，即一群、一组或一拨人的意思。参加捻党的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农民，他们聚集在一起，与残酷压迫和剥削他们的封建统治者展开了斗争。

虽然清朝当局早就严令禁止群众结捻，但因为刚开始捻党只是分散的、零星的活动，根本无法对统治者的统治构成威胁，所以清朝官吏们并没有把他们放在心上。到了 1853 年（咸丰三年），太平军抵达长江流域，特别是北上远征的太平军横越淮北地区时，捻党斗争便日益蓬勃发展起来。过了两年，黄河河南段再度决口，滔滔河水在山东、安徽和江苏许多地方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灾害，而官府和地主反而加紧搜刮民脂民膏。广大劳动人民更加无路可走，纷纷加入捻党。捻党的力量日益壮大，星星之火逐渐汇成燎原之势！

在残酷的斗争中，捻军与太平军患难与共，给予了清军以沉重的打击。天京陷落之后，太平军与捻军幸存的将士又逐渐集结在赖文光的周围，继续坚持抗清斗争，又掀起了另一幕轰轰烈烈的革命。

赖文光，广西人。1850 年（道光三十年）秋，赴金田参加太平天国团营，转战桂、湘、鄂等地。1852 年（咸丰二年）担任文职。杨韦事变发生后，奉命出师江西。次年回朝，保卫天京。曾参加二破江南大营之役，后随英王陈玉成西征。1861 年（咸丰十一年）被封为遵王。翌年，与陈得才等率军远征西北。天京失陷后，转战于豫、鄂、皖边界一带，连败僧格林沁所部。1864 年（同治三年）底，张宗禹、任化邦所率捻军和西北太平军合编后，推其为领袖。他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一名优秀军事统帅，毅然挑起了领导捻军反抗清朝统治者的重担。赖文光根据太平军的组织体制对捻军进行了整编，改变了捻军过去那种分散的、半农民半军队的状态。捻军从此以全新的面貌活跃在历史舞台上。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捻军面临的最强劲的对手，便是以僧格林沁为首的

蒙古骑兵。这些骑兵不仅凶狠异常，而且气焰极为嚣张，他们对捻军采取跟踪追击、穷追猛打的方针，妄图把捻军赶尽杀绝。

根据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为了保存自己，争取主动，赖文光放弃了过去太平军筑垒守城的阵地战战术，创造出骑兵奔袭的主动快速流动战术，在运动中疲惫敌人，迷惑敌人，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寻找适当的机会，出其不意地快速歼敌。

1865 年 5 月 18 日（同治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捻军在山东曹州（今荷泽）西北高楼寨地区，干净漂亮地全歼了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震撼了清政府朝野上下。

从 1 月开始，捻军在赖文光、张宗禹的率领下，主动进逼开封。清廷慌忙命令僧格林沁立刻前去解围。等僧军马不停蹄地赶到开封城下时，捻军早已从容离去，不知所踪。僧格林沁甚为自得，以为捻军仍和以前一样，只不过是一群残兵败将罢了，根本不是他的骑兵的对手。正当他在开封城里大宴宾客的时候，有探子报告，捻军又在黄河对岸出现！僧格林沁立即翻身上马，带领他的蒙古铁骑，风风火火地追向捻军出现的地方。

捻军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物资供给都不如僧军，硬拼肯定是不行的。但他们拥有一个僧军想也想不到的优势，从而使赖文光的流动战术得到充分贯彻。捻军中绝大多数将士都是生于淮北、长于淮北的庄稼汉，对淮北的民情、地形了如指掌，而长期劳动练就的铁脚板，不管是在平地还是在山间，都能健步如飞。捻军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引诱僧军左一下右一下地疲于奔命，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有一回，正在快速运动中的捻军与僧军不期而遇。赖文光发现这只是一支侧翼弱敌，计上心来，他果断下令全体捻军不退反进，朝着僧军猛冲过去。僧军措手不及，一下被猛虎般冲来的捻军冲了个七零八落。还未等他们回过神来，捻军的旗帜已消失在远方了。这样，捻军一下又从敌人的正面跳到了敌人的背后。

僧格林沁闻讯，大为光火，马上下令前军变作后队，转头追赶捻军。只见成千上万铁骑在淮北平原席卷而过，扬起漫天尘土。正当僧军全力以赴追赶捻军时，捻军却突然停止了急进的步伐，在一个偏僻的山沟里藏了起来。僧格林沁求战心切，哪里停得下来，一下子又远远地冲到了捻军的前面去了。

目送滚滚远去的僧军，赖文光满脸自信地对部下们说："我们到山东等他们！"于是，大军昼伏夜行又悄悄地北上山东去了。

如此三个月，僧格林沁的骑兵被捻军牵着鼻子来回奔驰在方圆几千里的大平原上，往返不下三四千里，连人带马都累得疲惫不堪，一个个又黑又瘦。急行军中，有时一天连一顿饭都吃不上，下层士兵中陆续有开小差的，有病死、累死的，连一些军官也开始抱怨起来。而僧格林沁本人寝食俱废，连续十几天不离鞍马，以致手都累得握不住缰绳，只能把缰绳缠在手腕上才能勉强驭马。就这样，他仍然瞪着两只血红的眼睛，不顾一切地命令军士日夜追赶。他已完全被激怒了，整日咆哮着要与捻军决一死战，任何人稍不顺意便劈头盖脸一顿皮鞭。到后来部下们都怕接近他，每天

只是远远地跟着他像没头的苍蝇一样一路狂奔。

5月18日，捻军在曹州府高楼寨布下天罗地网，然后以小股捻军引诱敌军“入瓮”。“追了三个月，终于追到了!”僧格林沁心中大喜，马上命令全军紧逼，以为可以一口吃掉令他恨之入骨的捻军。他自己更是一马当先，叫嚣着冲了过去，两只血红大眼犹如饿狼的眼睛。

只听一声炮响，前面“逃窜”的捻军一转身反冲过来。两侧埋伏的骑兵分两路闪电般从僧军侧背包抄，一骑夹一步为团阵，齐头并进，一下子把僧军层层包围起来。

僧格林沁见状暗叫不好，却又不甘心就此俯首就擒。他挥舞着手中的皮鞭，拼命要手下往外冲。然而疲惫异常的僧军哪里是以逸待劳的捻军的对手！况且心中早有不满的士兵又不肯卖力。战斗进行了没有多久，威风一时的蒙古骑兵或死或伤或投降，即宣告全军覆没了。

身陷重围的僧格林沁还想作困兽之斗，狂叫着冲向步步逼近的捻军将领。说时迟，那时快，从赖文光身后闪出一骑，手握长矛迎上前去。没几个回合，僧格林沁便招架不住，喘着粗气一拉缰绳，转身想跑。他坐下那匹马奔波了几千里，早已不堪重负了。此时又经血战，再也支持不住，只听“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僧格林沁随之摔在地上。捻军小战士张皮绠策马赶上，只见寒光一闪，僧格林沁连惨叫都没来得及，便丧命于麦田中。

高楼寨一役，僧格林沁与内阁学士全顺、总兵何建鳌等均被击毙，只有总兵陈国瑞重伤脱逃，僧格林沁所部马队一万一千人，几乎全部投降了捻军。

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是清廷镇压捻军的主要力量，也是清军中的“王牌军”。这支部队的全军覆没，不仅使当时尚处劣势的捻军获得了大量武器装备，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斗争的信心与热情百倍高涨，而且使清王朝丧失了一个镇压人民的可靠支柱，大大动摇了满清王朝的腐朽统治。

这次战斗，在我国军事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典型代表意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赖文光富有创造地提出流动作战，以快速运动疲惫和迷惑敌人，从而掌握了战争主动权，抓住适当的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出其不意地歼灭敌人。赖文光的战略战术，对后世军事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后来的许多大规模战争中，运动战都以主角身份登上战争舞台，成为弱小军队对付强敌的“杀手锏”。

【金积堡之战】

唐天宝十五载（756年）七月的一天，一列庞大的队伍慌慌张张来到当时叫作灵武（今宁夏灵武南）的一个小城。他们身后是叛将安禄山、史思明点燃的滚滚狼烟。队伍安顿下来后，一位身穿黄袍的年轻人在众人的簇拥下宣布继承皇位。这就是唐肃宗李亨。他即位的地方便是后来的金积堡。

金积堡因附近的金积山而得名。山中特产五色彩石和金色泥土，因此得名金积。到了清代，由于历史的变迁，小城已经荡然无存，仅余一处村镇，但在中原与西北各省之间，依旧不失为一个军事要地。这一带因有秦、汉两代兴修的明暗渠，故而灌溉方便，物产丰盈，

东及中原，西接西域各地和蒙古各部落，地理位置颇为险要，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19世纪50、60年代，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点燃了全国各族人民武装反清的烈火。1862年（清同治元年）春，久受当地统治者残酷压迫的陕甘回民揭竿而起。清廷正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无暇西顾。义军兵分四路，趁机占领了河州（今甘肃临夏）、灵州（今宁夏灵武）、肃州（今甘肃酒泉）、西宁（今青海西宁）等地，控制了西北广大地区，与太平军、捻军遥相呼应。

1864年（同治三年），太平天国运动被清朝统治阶级镇压下去，清军稍事喘息之后，便腾出手来对付仍然坚持战斗的陕甘回军。1867年（同治六年）初，清廷任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镇压太平天国有功的左宗棠戴着朝廷赏赐的双眼花翎走马上任了。是年6月，左宗棠军分三路入陕。他刚到西安，鞍马甫卸便召集驻西北各部清军将领开会，重新部署兵马，密谋把西北各路回军“剿灭”净尽。

左宗棠的到来，不仅带来了放手镇压回民起义的命令，还带来了屠杀太平天国革命军民的主力——湘军。这些湘军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个个异常凶残，手中使用的又是左宗棠想方设法购得的德国制造的优良武器。对回军而言，实在是个非常危险的敌人。

老奸巨猾的左宗棠并未直接进攻回军。他采取“由外及内，各个击破”的策略，先派刘松山率“老湘军”自山西渡黄河，由绥德西攻回军的盟友——董福祥领导的陕北饥民武装。在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湘军几次猛攻之后，民军惨败，董福祥被俘投降。刘松山从民军中挑选精壮编成“董字三营”，纳入湘军指挥，更加壮大了湘军的力量。

1869年（同治八年）4月，清军分三路进攻，相继占领了陇东萧金镇、董志原等回军外围重要据点，然后集中力量进攻甘肃的回军。

在甘肃四支回军中，以灵州马化龙实力最强，他以金积堡为根据地，控制了灵州及周围州县。为抵御清军，他令人在金积堡外围修起四五百所堡寨。金积堡更是修得异常坚固，墙高四丈，厚三丈多，周围九里有余。堡中更有堡，颇似郡县的城和关，到处壁垒纵横、渠水环复，而且屯集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粮食。

左宗棠在分析了甘肃各路回军的形势后认为，“西事关钮全在金积，此关一开，全局在握。”因此，他兵分三路进军灵州，于是年11月中旬，完成了对金积堡的包围。

金积堡周围有两处地险，一个是东面的永宁洞，这是山水河通往秦渠暗洞的咽喉，另一个是龙王庙的峡口，即黄河青铜峡峡口，是秦、汉两渠渠口汇合的地方，回民军便以此两处地险为依托，顽强抵抗。清军开战以来，几乎是连战连胜，骄气日盛，哪能想到会受挫，仍是一味在猛烈炮火掩护下猛冲。

回民军躲在事先修筑的堡洞里，待清军炮火一停便鱼贯而出，占据有利地形反击。清军一时竟拿回军毫无办法，丢下具具尸体狼狈而退。统率老湘军的悍将刘松山眼见清军损失惨重，气得咬牙切齿，眼里布满血丝。他亲自到了黄河青铜峡峡口前督战。长期跟随他征战的湘军见主将亲临，士气大振，更加亡

命地与回军冲杀。

回军毕竟不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青铜峡未多久便告失守，金积堡外围防线被撕开了一条口子。望着在回军阵地叫嚣的湘军，刘松山得意地哈哈大笑。笑声未绝，一阵惊天动地的炮声平地而起。刚才还在叫嚷的湘军顿时血肉横飞，抱头鼠窜。刘松山张大了嘴呆在原地，一颗炮弹恰恰落到他身边爆炸。等卫兵们把他从碎石堆中扒出来时，他早已咽了气。这个身经百战的左宗棠的大将到死也没明白怎么回事。原来，回军是以退为进，先让出阵地，待湘军松懈以后，再集中所有炮火给敌以猛烈的打击。老湘军未料会有此一劫，伤亡遍野，连统领刘松山也未能逃脱。

损兵折将，清军士气大挫。为应付危局，左宗棠起用刘松山之侄刘锦棠任统领。年轻的刘锦棠在军中征战多年，颇有指挥才能。他接替叔父刘松山之职后，第一件事便是召集湘军部将开会。他满脸悲伤地对众人说："我军即将取胜，却不幸兵败将亡。各位都是追随我叔父多年的老将了，难道忍心就此罢兵吗？我叔父的仇能不报吗？"一席话说得众将个个咬牙切齿，叫嚷着要报仇。看看火候差不多了，刘锦棠命人把刘松山的灵柩放到大营中，然后派人报告左宗棠，湘军既不坚守，也不退屯，而要继续力攻！就这样，湘军在刘锦棠的鼓动下又卷土重来。

为抵御刘锦棠的进攻，固守金积堡的回军首领马化龙依托秦、汉二渠，挖壕筑墙，修堡建垒，还相继掘开秦渠、板桥堰和山水河，使地处下游洼地的清军营地陷入一片泥泞之中。清军调兵遣将和物资运输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刘锦棠复仇心切，根本无视眼前的这些困难，每日往来于齐膝深的烂泥中，率领湘军逐堡逐寨地进攻。他的这招"逐次进攻，步步为营"颇为奏效。回民军因是各自为战，兵力分散，虽竭力阻击，仍然没能挡住湘军进攻的步伐，苦战数月，金积堡外围的堡寨相继落入湘军之手。回民军退守金积堡，依靠坚固的城墙和环复的沟渠防守。湘军与回民军面对面的较量开始了！

金积堡墙高壁厚，防守十分严密。湘军反复多次进攻，均是无功而返。亲临一线指挥的刘锦棠看着一批一批从城墙下败回的湘军，被复仇火焰冲昏的头脑反而清醒冷静了下来。他思虑再三，下令停止进攻后撤。前线的一些将领早就杀红了眼，一听停止进攻后撤，都急了，冲着刘锦棠咆哮："不能撤！你忘了你叔父是怎么死的吗？"刘锦棠冷酷地回答："我没忘！只是强攻不行，我要用锁金法困守！看他们能顽抗多久！"他下令清军环绕金积堡挖了前后两道宽三丈、深一丈的长壕，壕边筑起高约丈余的围墙，又在堡外高地上筑成几座炮台，居高临下，每日不断向堡内轰击。

刚开始，堡中的回民军凭借事先贮藏的粮食弹药，毫不畏惧地抵御清军。坚持了近一年，堡内的粮食弹药快耗尽了。首领马化龙先后派遣多人出堡向各地回民军告急求援，然而由于长壕完全切断了金积堡与外界的交通和联系，派出去的人不是惨遭杀害便是被俘，消息根本送不出去。

从回民军派出信使日益频繁的情况，刘锦棠判断堡内的物资供给已经出现困难，遂下令清军炮台加紧轰击。其实，围困金积堡快一年的清军自己的物资供

应也出现了困难，士气有所下降。刘锦棠不得不经常到士兵中去鼓舞士气。

在这种对峙中，被困在堡内的回民军，虽然同仇敌忾，英勇顽强，但在弹尽粮绝的危境下，许多人饿得连刀枪都拿不动了，哪儿还有力气战斗？经过深思熟虑，马化龙派出代表找到刘锦棠，提出以保全堡中全部回军的生命为条件投降，否则便拼个鱼死网破。

刘锦棠连想都未想便一口答应了。1871 年 1 月 6 日（同治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清晨，紧闭近一年的金积堡大门打开了，马化龙和老老少少近两千名回军从堡内蹒跚而出。清军一窝蜂冲了进去，占领了这个令他们头疼这么长时间的城堡。

刘锦棠一面假意安排接纳两千多回民军，做出践约的样子麻痹回军，一面派人火速请示左宗棠如何处置。没过多久，信使带来了左宗棠的命令：杀！

3 月 2 日夜，清军悄悄包围了回民军的营地。一声枪响，众清军一拥而入，对手无寸铁的回民军展开了残酷的屠杀。惨叫声划破了铁一般的宁静。屠杀一直持续到天明才停止，鲜血染红了金积堡的每一寸土地。

镇压了金积堡的回民军，左宗棠下令清军就地休整。一年以后，恢复元气的清军，又在刘锦棠的率领下，对西宁回民军发起强攻。两个月后，清军进驻西宁。1873 年（同治十二年）10 月底，刘锦棠进逼肃州。他故技重演，先围城数日，待守城回军弹尽粮绝后，利用义军降将喊话诱降。守城回军首领马文禄轻信上当开城投降。紧接着，又是一场惨烈的屠杀。至此，陕甘回民起义被完全镇压下去。

左宗棠和刘锦棠用回民军广大战士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不久，左宗棠又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西北军务，刘锦棠则被擢升为甘肃西宁道。西北回民武装抗清运动从此陷入了低潮。

【新疆之战】

1864 年（清同治三年），早有分裂野心的新疆封建主金相印与中亚浩罕汗国相勾结，在新疆南部分土割据。浩罕摄政王派遣帕夏（军事头目）阿古柏于次年侵入新疆。几年间，阿古柏完全掌握了南疆的统治权，建立了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自称“毕条勒特汗”，并将势力扩张到了天山以北的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在各城开征地税，还命令回、汉人民一律遵照中亚安集延（今吉尔吉斯境内）的风俗习惯，“光顶圆领”，剪去辫发，改变服饰装束，妄图把新疆从中国版图中完全分裂出去。在对内残酷奴役各族人民的同时，他还向英、俄大肆出卖新疆权益，以求取列强对他的“承认”和支持。

1871 年 7 月（同治十年五月），野心勃勃的沙皇俄国并不满足于间接侵略，悍然派兵入侵，强占了新疆西北的伊犁地区，为其鲸吞整个新疆夺取了一个重要的桥头堡。新疆形势危在旦夕！

此时，年近六旬、已准备告病还乡颐养天年的左宗棠，看到沙俄“窥我西陲，蓄谋既久，发机又速，不能不急为之多”，便毫不犹豫地表示，“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于是他挺身而出，要“引边荒艰巨为己任”，以花甲之年率兵西向，规复大好河山。

可是，在要不要出兵收复新疆这个问题上，腐朽的清朝政府却一直举棋不定。当时日本正侵犯台湾，东南海疆频频告急。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论者，公开提出停兵撤饷，暂罢西征，说什么“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对此，左宗棠据理力争。他从全局出发，主张海防与塞防并重，指出新疆是我国西北屏障，一旦放弃，必将导致“我退寸而寇进尺”，后患无穷。

当时的实际情况，左宗棠和湘军统领刘锦棠“熟商进兵机宜”后，制订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基本战略和“广储粮草，杜其窜路，然后相机大举，聚而歼之”的作战原则，在后来的军事行动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左宗棠以刘锦棠统率的二十五个营（约一万一千人）为前锋，分四批出星星峡，进攻乌鲁木齐，而以提督张曜部严守哈密至奇台一线作为后卫。6月，



左宗棠西征大军在漫长的战线上转运粮草（油画）

1875年5月（光绪元年三月），清廷终于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任命他“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授予他指挥关外一切军事的全权。

要使沦陷多年的新疆重归版图，困难之多、之大是显而易见的。左宗棠想方设法，历时一年多，先后解决了短缺达数百万两的军饷难题，出关作战的军粮来源和运输问题，又妥善安排了军火、器械等军需物资的供应，还裁减冗员，精练部队。各项准备工作完成之后，他将西征指挥部移到了肃州（今甘肃酒泉），以便就近指挥。

1876年4月27日（光绪二年四月四日），西征军在肃州祭旗出征。结合

西征军抵达济木萨城，探得守卫乌鲁木齐外围要地古牧地城（今新疆米泉）的是叛匪白彦虎五千余人。当时通往古牧地城有两条路：一条是走西树儿头子，为大道，易于大军通行，但要经过戈壁，汲饮困难；而另一条路是走黄田小路，水源充足，却被敌人筑卡设栏，严密防守。叛匪就是企图逼迫西征军放弃小路走大道，届时以逸待劳，在戈壁滩上困死、渴死清军。

左宗棠一面命人在西树儿头子大道沿途筑垒凿井，装出一副不得不走大道的样子，另一方面悄悄命令刘锦棠率精兵强将在夜色掩护下自小路出击。守卫黄田的白彦虎部以为清军会沿大道走，

根本没想到刘锦棠率领的大军从天而降，来不及做什么有效的抵抗，便举手投降了。道路一打通，大军迅速进逼古牧地城。经四昼夜激战，终于攻占了该地，取得了西征的首次大捷，打开了通往乌鲁木齐的门户。

在古牧地城，刘锦棠于一堆书信中意外地发现了一封乌鲁木齐来的机密文件，得知乌城几乎无兵可守。他一面派人汇报左宗棠，一面率领部下马不停蹄地驰往乌城。等到信使带着左宗棠“进攻乌城”的命令追上刘锦棠时，他已经站到了乌鲁木齐的城墙上察看战果了！

西征军7月20日（闰五月二十九日）攻占乌鲁木齐后，又于11月再克玛纳斯城，完全斩断了阿古柏伸向北疆的魔爪，掌握了通向南疆大门的锁钥，并且控制了乌鲁木齐以西的富饶地区，解决了就近采办粮草的问题。收复新疆的第一阶段便告结束。

经过五个月的精心筹划准备，左宗棠于1877年（光绪三年）4月又组织了第二阶段战役，进攻矛头直指战略重镇吐鲁番。

清军收复北疆之后，阿古柏将他的军队收缩起来，分别盘踞于达坂、吐鲁番、鲁克沁三处，妄图凭借天山关隘负隅顽抗。这三座城互成犄角之势，易守而难攻。

左宗棠看准了阿古柏和叛匪白彦虎貌合神离的弱点，采取了分而击之、各个击破的策略。他派刘锦棠部为主力攻打达坂，而以徐占彪部翻越天山佯攻吐鲁番。

17日凌晨，刘锦棠部迅速占领达坂城周围高地，将阿古柏精锐四千余人尽数困于城中。

天亮以后，刘锦棠不顾随从阻拦，亲临城下侦察敌情。城里的敌军认出了他，集中火力向他射击。刘锦棠应声连人带马摔在地上。众随从大惊，慌忙命令还击，拼命把倒在地上的刘锦棠拉回军中。谁知刘锦棠对大家笑了笑，便起身易马而前。原来他在枪林弹雨中竟然毫发无损，只是战马受伤倒地而已。

摸清了城防概况，刘锦棠立刻上报左宗棠。左宗棠命令环城挖沟筑垒，构筑炮台，准备强攻，还特别命令夜间在城墙周围遍燃火把。众将不解。他解释道：“我军远道而来，立足未稳。守军有任何举动都要尽收眼底，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19日晚，城东炮台筑成，西征军以德国造开花大炮对城中守军进行轰击。没多久，守军弹药库中弹爆炸。英国援助阿古柏军的弹药“轰隆隆”炸得大地发颤。此时大风骤起，烈火眨眼间燃遍全城。守敌惊溃，四散奔逃。刘锦棠一面指挥各营截击，一面发动喊话劝降。在强大攻势下，守敌纷纷投降，达坂收复。

对大批俘虏，左宗棠实行宽待政策。凡新疆平民，不论哪个民族，全部发与衣粮释放，愿留者留，愿走者走。在这一政策的感召下，达坂守军头目主动给阿古柏写了劝降信。在收复新疆的整个过程中，这种宽待俘虏的政策，对分化瓦解敌人起了重要作用。

攻占达坂后，西征军趁胜而进，一举攻克吐鲁番、鲁克沁，历时半个月，胜利结束了第二阶段战役。通往南疆的大门完全敞开，收复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左宗棠此时却并不急于续进。因为此时正值盛夏，不宜用兵。他正好利用

这段时间养精蓄锐，为第三阶段作战做准备，待到秋高气爽，再行长驱而入。

在此期间，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阿古柏由于精锐丧尽，已无力再与官军抗衡，而长期受他压迫的广大回、汉人民起义风起云涌。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阿古柏被迫服毒自杀于库尔勒。他的两个儿子为争夺汗位互相残杀，最后哥哥伯克胡里杀了弟弟，带着残部窜到新疆南部，阿古柏政权基本瓦解。

针对盘踞南疆之敌长于流窜的特点，左宗棠于当年秋令刘锦棠亲率精骑为前锋先行追击。在刘锦棠的带领下，先行部队以四昼夜长驱八百里，沿途且战且追，给伯克胡里和白彦虎以沉重的打击。原来被阿古柏胁迫的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纷纷反正起义，占领各城“以待官军”。伯克胡里和白彦虎如丧家之犬，分率残部由布鲁特窜入俄国境内。一月之内，西征军驰驱两千余里，胜利收复了南疆。收复新疆的三次战役画上了一个完满而精彩的句号。

新疆平定后，左宗棠建议新疆设省，并提出浚河渠、建城堡、清丈地亩、厘正赋税和分设义塾等项主张，以促进新疆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收复新疆的战争虽历时一年又九个月，但实战时间总计才半年。这是因为左宗棠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和部署。在战术上“缓进疾攻”，充分做好准备工作，每战必求以优势兵力速决，以防师疲粮匮；在战略上“先北后南”，先取乌鲁木齐以控制新疆总枢纽，“致力于北，而收功于南”。正因为如此，西征军始终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无往而不胜。英国人包罗杰在他所著的《阿古柏伯克传》中承认，左宗棠“在这场光明正大的战争中，用谋略战胜了、打倒了他（阿古柏）”。

【镇南关之战】

19 世纪下半叶，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法国把侵略的目光投向了中国的西南部。他们以越南为跳板，一步一步把魔爪伸向了富饶的两广大地。

年近七旬、已解甲归田的原广西提督冯子材眼见法国侵略军步步进逼，忧心如焚。他一面派人深入越南境内，探听法军虚实，一面向驻防广西边境的清军多次建议扩军备战。

1883 年（清光绪九年）12 月，法国远征军总司令孤拔率六千人自河内出发，攻打越南北部的山西，向应越南政府之邀而进驻的中国军队发动突然袭击，由此拉开了中法战争的序幕。

法军有备而战，而清军装备相对较差又措手不及，因此，战争一开始清军便节节败退。清朝政府手忙脚乱，用人之际方想起赋闲在家的冯子材，遂命其督办高、雷、钦、廉四府二十五州县团练，参加抗战。冯子材在一无饷源、二无实权的情况下，很快成立了九个州县团练，其中他亲自挑选训练的五百名钦州练勇后来成为抗敌主力“萃军”的骨干。

法军连连得手，气焰极为嚣张，变本加厉地向中国进犯。1885 年 2 月 23 日（光绪十一年一月九日），法军侵占广西门户镇南关（今友谊关），其前锋部队深入中国境内二三十里。由于广西人民奋起抵抗，加上战线过长、兵力不足、部队补给困难，法军不得不在大肆掠夺之后退回其大本营文渊。撤走前，

法军炸毁了镇南关的城墙和附近的军事设施，还狂妄地在爆炸后的废墟上树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广西的门户已经不再存在了！"

消息传到冯子材耳中，他义愤填膺，慨然上书要求领兵抗法。新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答应了他的请求，授予其广西关外军务帮办，带领十八个营的军队，开赴抗法前线。中法战争即将揭开新的一幕。

临行前，须发皆白的冯子材祭别祖先，嘱托家人：万一军有不利，百粤就非我所有。你们速带家眷，奉香火驰归江南祖籍，永为中国臣民，免受外人奴役。他还把两个儿子带在身边为国尽忠，同时也准备万一战死沙场，有人料理后事。他的拳拳爱国之心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人，人们更加敬佩这位在疆场征战了数十年的老将军。

当时前线的情况极为严峻，法军气势正盛，而清军却是一团糟。法军占领镇南关的当天，清军前敌总指挥潘鼎新便一口气逃到距镇南关百余里的海村，完全放弃了指挥。而其他清军将领又相互推诿，不服调度，散兵游勇四处劫掠，老幼难民蔽江而下，关内震动。冯子材以七旬高龄，德高望重，被前线将领推举为"前敌主帅"。原先一盘散沙的清军逐渐团结在他的周围，众志成城，要与法国侵略者血战到底。

法军尽管气焰嚣张，然而也面临着许多困难：远离后方补给基地；失去泊于江河的炮舰的强大火力支援；兵力不足，能战之兵仅四五千人。冯子材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处境，制订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他亲临前线勘查边境各处山隘，最后选定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关前隘为预设战场，还命人在东、西两岭间构筑了一道三里多长的土石长墙，墙外挖了深堑，在东、西岭上又修筑堡垒多座，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山地防御体系。在兵力配置上，冯子材把士气高、战斗力强的"萃军"和"勤军"放在主阵地上，在左、右翼派了较强兵力，以防法军迂回包围，最后以强大的预备队驻幕府、凭祥，随时准备投入反攻。一切布置妥当之后，冯子材才放心地说："不论法人如何进攻，我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



镇南关一役的祝捷图

法军见冯子材防备精当，不敢从正面进犯，便想从侧翼偷袭。冯子材接到了越南民众的密报，令苏元春率军阻击，同时派出一支"萃军"乘虚袭击法军据点扣波。3月13日，从侧翼偷偷来犯的法军遭到了苏元春部的迎头痛击，败逃至扣波时，又遭到守候多时的"萃军"的重击，溃不成军，狼狈逃回了文渊城。

偷袭未成，连吃败仗，法军指挥官尼格里深感脸上无光，为捞回面子，他不待援军到齐便仓促决定提前发起全面总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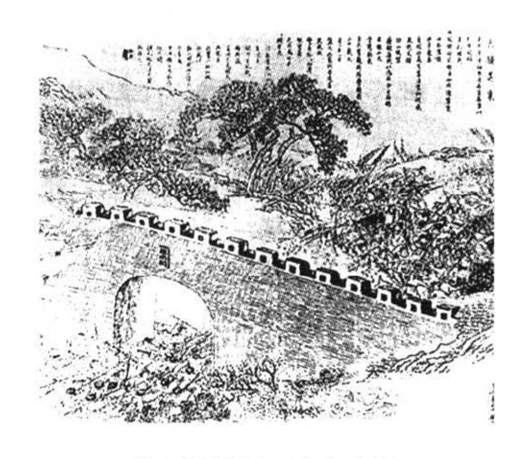
3月23日清晨，法军二千余人趁大雾偷偷进入镇南关，一路重点进攻东岭炮台，另一路顺关前隘谷地前进，企图在主力夺取大青山顶峰堡垒后，前后夹

击关前隘清军阵地。敌人以新式开花大炮为掩护，来势极猛。东岭上赶修起来的五座炮台，很快就被攻陷了三座。

法军占领东岭后，居高临下，以重炮轰击关前隘长墙，其主力则乘势向长墙猛扑过来。在这关键时刻，冯子材朗声高呼："如果再让法军入关，我们有何面目去见两广父老！"在主帅爱国热情的激励下，士兵们勇猛无畏，拼命杀敌。恶战一直持续到深夜，援军相继赶来，充实了前沿阵地的兵力。敌人疯狂的进攻终于被击退了。

当天晚上，身为前敌指挥的苏元春等产生了畏敌情绪，借口弹药不足要求后撤。对前来劝说的表兄黄元高，冯子材愤然拔出指挥刀，喝道："你知道这里是军法重地吗？"吓得黄元高连话都说不出来，慌忙退出。苏元春等又亲自请求，被冯子材严词拒绝。他慷慨激昂地说："我不会退！我誓与此墙共存亡！法国人说广西的门户不复存在了。我们要用他们的头来重建广西的门户！"一席话说得怯敌的将领羞愧难当，坚定了坚决抵抗的决心。

第二天清晨，大雾弥漫，数步之外



镇南关清军大败来犯法军

便不见人影。法军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兵力增至七八千人，大小火炮数以百计。霎时间，关前隘炮声震天，硝烟直冲云端，远在几十里外都能听见炮声。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法军主力再一次向清军阵地猛扑。狼群一般的法军转眼便拥到长墙下，有的甚至已经爬上了长墙，眼看长墙阵地就要被攻破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冯子材"以帕裹首，赤足草鞋"，振臂一呼："有进无退！"率先手持长矛跃出墙外。他的两个儿子相荣、相华紧随其后。

清军将士看到年近七旬的主帅亲自冲锋陷阵，顿时热血沸腾，打开长墙栅门，一齐从墙内冲出，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入敌群，与敌展开殊死肉搏。法军没料到清军会以肉搏方式反攻，本身又不善格斗，心中立时没了刚才的锐气，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

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清军终于把敌人压制到山谷里。此时，王孝祺、王德榜两军先后杀到，经过"七上七下"的激烈争夺，夺回了被法军占领的三座炮台，并赶走了占据西岭的敌人。中国军队完全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不久，各方面援军及几千名越南兵勇汇拢，法国侵略军欲进不得，欲退无路，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

3 月 25 日，冯子材发出总攻击令。清军各部从各山头、战壕里浪潮般涌出，向困在山谷的法军猛冲过去。法军惊恐万状，溃不成军，有数十名军官和一千多名士兵被当场击毙，少数漏网的残敌仓皇往越南谅山方向奔逃。中国军队取得了镇南关战役的完全胜利。

为继续扩大战果，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冯子材指挥清军乘胜追击，收复

文渊，直逼谅山城下。

法军指挥官尼格里为挽回败局，在谅山作了固守安排。他以主力扼守谅山门户驱驴，以屏蔽谅山；另以一部兵力分守谅山与外界联系的交通要道；留下老弱残兵驻守谅山的城垣堡垒。冯子材深知清军攻坚能力不强，待法军布置妥当，再想攻取谅山，就会困难重重。于是，他召集部下，商定了“正兵明攻驱驴，奇兵暗取谅山”之计。

27日，冯子材派杨瑞山率部在夜色掩护下从小路进至谅山城下潜伏。第二天，冯子材率各部兵分三路逼攻驱驴。激战中，尼格里胸部中弹，无法指挥。接替指挥的爱尔明下令法军退往淇河南岸。清军顺势冲进了驱驴。守卫谅山的法军一见满山遍野的清军，慌了神，慌乱中也不管对岸还有许多自己人便砍断了淇河浮桥。留在北岸的法军无路可退，一部分缴械投降，一些自恃会游水的拼命向谅山泅渡逃命，结果溺死河中的不计其数。城下的杨瑞山部乘乱杀出，一举冲入谅山城。

镇南关和谅山大捷是中法战争中规模空前的大胜利。它从根本上扭转了中法战争的局面，沉重地打击了法国侵略者，并直接导致了法国国内矛盾激化，茹费理内阁因战败而倒台；同时它又极大地鼓舞了清军将士。冯子材命令各军“跟踪追剿，不准延缓”，以席卷之势又收复了一批城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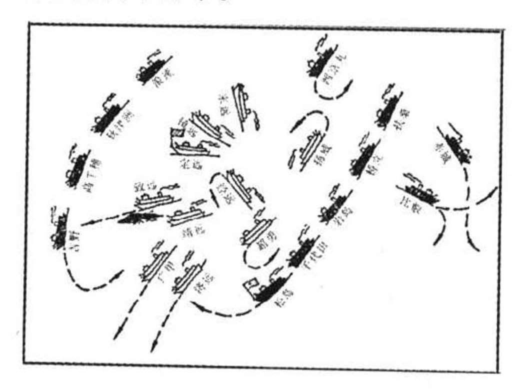
当时的战局对中国方面极为有利。可是，腐败的清朝统治者却认为，继续打下去“有碍中外和局”，高叫“乘胜即收”。6月9日，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正式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答应撤出中国军队，允诺法国在中国西南的种种特权。至此，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从此中国西南边省门户被打开，成为法国对华扩张的重要地域。

冯子材领导的抗法战争胜利，虽然被腐朽的封建统治者断送了，但他高超的指挥艺术，不顾年迈，勇敢抗击外敌侵略的爱国热情，却深为广大军民敬佩。当老英雄凯旋时，沿途居民以香灯、爆竹拜迎三十余里。诗人黄遵宪特作《冯将军歌》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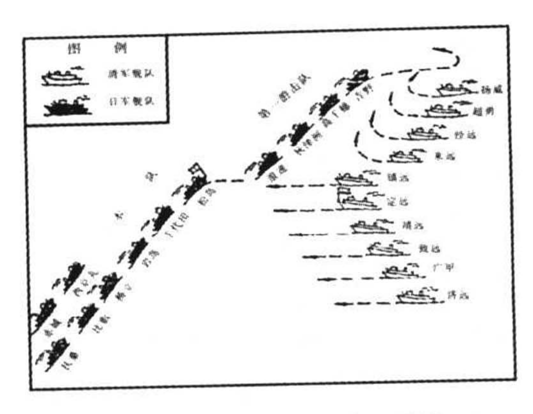
> 将军气涌高于山，看我长驱出玉关。
>
> 平生蓄养敢死士，不斩楼兰今不还。

【甲午之战】

“东沟海战天如墨，炮震烟迷船掀侧。”1894年9月17日（清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八日）下午，在黄海大东沟海面上，巨浪翻滚，炮声震天，一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海战正在进行。交战双方是被迫应战的中国北洋水师和早有虎狼之心的日本海军。



日舰包围清舰图



中日甲午海战开始时双方队形图

在这场战斗中，双方共投入了二十二艘战舰，五千六百多人。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战斗之激烈在当时为世所罕见。这便是著名的中日大东沟海战。在这场激战中，中国北洋水师的广大爱国将士面对强敌，英勇顽强，以生命和热血在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894年春天，朝鲜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朝鲜封建统治者无力镇压，请求清朝政府派兵“进剿”。6月，清军进驻朝鲜镇压东学党起义。早就对朝鲜及中国垂涎三尺的日本看到有机可乘，便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派出了大批军队在朝鲜仁川登陆，进入汉城，与驻朝清军形成对峙，并多次蛮横地拒绝“两国同时自朝撤军”的建议。朝鲜半岛的火药味越来越浓。

就在日本极力筹划侵略战争的同时，愚弱的清政府却把希望寄托在与日本狼狈为奸的帝国主义国家所谓的“调停”上。6月20日，李鸿章再次请求俄国驻华公使喀希尼出面调停朝鲜事，希望中日两国同时撤兵。但日本方面根本不予理睬，日军反而于7月23日闯入朝鲜王宫，劫持了国王，组织傀儡政府。25日，蓄谋已久的日本海军在丰岛海面悍然对运送援兵赴朝的中国海军“济远”、“广乙”等舰发动海盗式的突然袭击，击伤“广乙”、“济远”两舰，击沉“高陞”号运兵船，船上七百余名清军官兵遇难，还掳走了满载粮饷的“操江”号。几乎同时，日本陆军向驻守牙山成欢驿的清军发起进攻。中日甲午战争由此爆发了！

战争爆发后，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等爱国将士主张予敌以坚决回击。然而掌握着清廷外交大权的李鸿章却把北洋海军视为一己私产，采取“避战自保”的消极方针，严令丁汝昌只可守大同江至威海卫一线，后又缩小至成山角和鸭绿江一线，决不准“滥进袭击”。对于这个命令，广大将士愤慨不已，但也不得不只在规定区域内游弋。

9月17日上午，刚完成护航任务的北洋舰队，停泊在鸭绿江大东沟口外的海面上正准备返航。这天天气晴朗，水波不兴。10时30分，“镇远”舰的瞭望哨报告西南方海面有一簇烟雾，并且越来越大，烟雾下面一支舰队疾驰而来，估计是日本舰队。尖锐的警报声立时打破了海面的宁静，丁汝昌果断下令起锚迎敌。北洋舰队开足马力，破浪前进。在距敌舰五千米处，旗舰“定远”号发出了开炮的命令。北洋水师先敌开火，各舰大炮怒吼不止，颗颗炮弹呼啸着飞向敌舰，激战开始了。

北洋水师参战舰艇共十艘，而日本舰队不但舰数要多两艘，而且航速快，火力猛，占据了明显的优势。日本方面公然叫嚣，要“聚歼清国舰队于黄海”，气焰极为狂妄。这次由日本海军中将伊东祐亨率领的舰队有备而来，当然不会放过到手的机会。

日舰速率快、炮位多的优点，很快便显示出来。他们避开北洋舰队“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绕向北洋舰队的侧后，以左右舷炮轰击两翼小舰，而以首炮狂轰“定远”、“镇远”两舰背面，致使北洋舰队队形大乱，陷于被动局面。在敌人猛烈炮火的轰击下，“济远”、“广甲”两舰相继临阵脱逃，其余各舰仍奋勇还击。

面对强敌，丁汝昌指挥果敢冷静。激战中，他身负重伤，站立不稳，便坐到甲板上鼓舞士气，激励大家英勇杀敌。

日舰打乱北洋舰队的编组队形后，又以先锋舰“吉野”号为首的四艘快速巡洋舰直逼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定远”号是整个北洋水师的指挥中心，若有闪失，后果无法设想。为了保护旗舰，“致远”号管带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开足马力，驶到“定远”号之前迎战来敌。顿时，“致远”舰陷入了四艘敌舰的包围之中，但“致远”舰将士在邓世昌的指挥下，顽强作战，不断给敌舰以沉重打击。舰上配备的炮弹打完了，便用步枪射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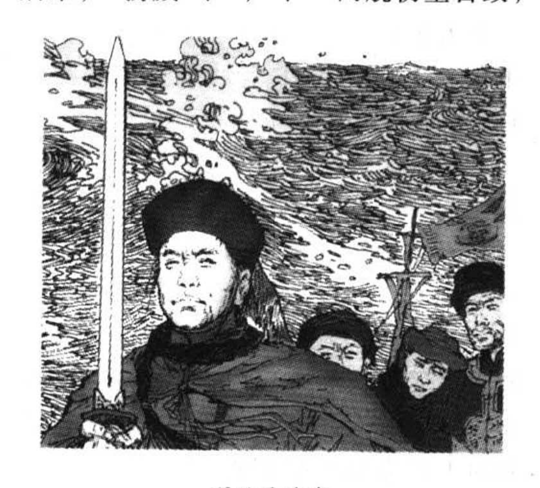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激战，“致远”舰中弹累累，船身倾斜，势将沉没。这时，敌舰“吉野”号野兽般冲近“致远”舰。这艘“吉野”号是日本参战舰中速度最快的主力舰，其马力几乎是“致远”的三倍。开战以后，它横冲直闯，对北洋舰队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邓世昌怒视“吉野”号，登上舰桥，慷慨激昂地向全舰官兵宣布：“我们为国作战，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我舰船伤弹尽无力再战，决定撞沉那横行霸道的‘吉野’号，与敌人同归于尽！”全舰官兵齐声高呼表示拥护。邓世昌跨进驾驶室，双手紧握舵轮，开足马力向“吉野”号猛冲过去。

日舰发现“致远”撞船的意图，立刻集中火力向“致远”猛轰。“致远”号燃起了熊熊大火，但并未停止，像一条火龙乘风破浪冲向“吉野”舰。“吉野”号上的日本兵见此情景，惊恐万分，纷纷跳水逃命。眼看“吉野”号就要完蛋了，不幸的是一枚罪恶的鱼雷击中了“致远”号，顿时全舰起火爆炸，不久便沉没了。

邓世昌落水后仍大呼杀敌，他拒绝别人的救助，抱着“阖船俱没，义不独生”的信念，与全舰二百五十多名将士一起牺牲于汹涌的波涛中。

“致远”舰的英勇行为大大激发了北洋水师将士的爱国热情。“定远”号在刘步蟾的指挥下，越战越勇，首先击伤敌舰“比睿”号，令其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不得不狼狈退出战斗。

紧接着，“定远”号又咬住了敌“赤城”号，一举击毙敌舰长坂元八太郎。然后又击伤敌“西京丸”号。不久，“经远”号也中敌鱼雷沉没。打到后来，“扬威”、“广甲”两舰伤重自毁，



邓世昌殉难



黄海大海战

“超勇”也被击沉。作为北洋舰队的两大主力舰“定远”号和“镇远”号，相互掩护、相互支持，在中方只有四舰与敌搏杀的情况下，一再给敌人猛烈的回击。敌军旗舰“松岛”号屡被击中，其储备的弹药被引爆，八十四人当场毙命，完全失去了战斗力和指挥力。

下午5时半，精疲力竭的日舰再也无力作战，首先退出了战场，大东沟之役结束。这次海战，北洋海军虽然有很大损失，但保住了舰队主力，还给敌人以有效的杀伤。

黄海大战后，北洋舰队退回旅顺军港全力休整。一个月不到，整个水师基本恢复了元气。10月18日，北洋舰队移师威海卫（今山东威海）驻防。

海上未占到什么便宜，日军便打起了陆上的主意，分两路从陆路大举入侵。腐朽不堪的清朝陆军数万人望风而逃，不战自溃，辽东半岛陷落。1895年1月，日军又在山东荣成湾登陆，直接威胁威海卫军港的后方。威海沿海一线防御工事完备，火力配备也较强，应付来自海上的进攻绰绰有余。然而负责其后方守备的山东巡抚李秉衡昏庸怯懦，听到日军逼近的消息便狼奔豕突逃到莱州（今山东掖县），将威海卫南、北两方的陆路炮台拱手让给了日军。停泊于军港内的北洋舰队，顿时面临日军的海陆夹攻。

北洋海军虽然在黄海海战中损失了五艘战舰，但主力尚存，完全有能力与来敌决一死战，可是李鸿章抱着投降论调，高唱什么“避战保船”，严令北洋舰队不准离开威海卫一步，连日常的海上巡逻也取消了。丁汝昌竭力反对坐以待毙。在旅顺告急时，他便面见李鸿章直抒胸臆，要求率队出击。日军荣城湾登陆后，他又慨然陈词：“与其安坐而待围攻，曷若僭师而起迎头痛击！”他的这些请战要求，换来的却是褫职留任。李鸿章当面呵斥道：“若违令出战，虽胜亦罪！”在这种情况下，丁汝昌只好全力以赴，准备这最后一战，寄希望于奇迹能够出现。

2月2日，日军完成了对威海卫的合围，军港与外界的联系全部断绝。丁汝昌抱着“吾身早已许国”的信念，率领将士苦撑危局，多次击退来犯的日军。战斗中，他身先士卒，“立于最危险之地”指挥作战。由于众寡不敌，清军损失越来越大，最终威海卫陷落。丁汝昌组织反攻，击沉敌舰两艘、鱼雷艇五艘。日军以两岸炮台配合军舰轰击港内北洋舰队，“来远”、“威远”、“靖远”诸舰相继沉没。十二艘鱼雷艇突围未果，全部被掳。“定远”舰严重受损。为防沉没，刘步蟾当机立断，下令断锚驶至刘公岛东南浅水处搁浅，以作水中炮台继续战斗。

7日，日军发动总攻，北洋水师仅存的两座炮台之一日岛炮台失守。在孤

立无援、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北洋舰队中的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四下活动，与一些贪生怕死的将领相勾结，胁迫丁汝昌投降。开战之初丁汝昌便断然拒绝了日本舰队司令伊东祐亨的劝降，此时当然更不会同意。面对绝境，为不使尚存的舰只落入敌手，丁汝昌毅然下令炸船毁台。但部分卑怯的清军将领为了投降讨好日本人，竟然拒绝执行。只有“定远”舰刘步蟾执行了命令，并自杀殉国，实践了他“苟丧舰，将自裁”的誓言。

12日，北洋水师最后一个据点刘公岛告急。这时密报传来：“援军无望!”一些民族败类在洋教习唆使下，持刀胁迫丁汝昌投降。丁汝昌宁死不降，含愤服毒自尽。在他尸骨未寒之时，洋员和败类们便向侵略者俯首乞降了，将尚存的十余艘大小船只及大批枪炮辎重拱手相让。清朝政府苦心经营十六年，耗费巨资的北洋海军，就此宣告全军覆没。

北洋海军的覆灭，从表面上看是清军海陆防线协调不当，出现后防漏洞所致，实际上却是李鸿章之流封建统治者的投降主义路线带来的恶果。在当时那种腐朽的统治下，是不可能真正完全战胜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北洋水师广大爱国官兵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将永远为人们称道和怀念!

【天津卫之战】

19世纪末，中国的广大乡村和城镇，几乎一夜之间便出现了一座座规模不小的尖顶教堂。在片片中国传统民居中，这些尖顶教堂显得格外刺眼。可恶的是，教堂里的那些外国教士肆无忌惮地迫使中国地方政府给予他们种种特权。他们骄横跋扈，拆毁庙宇，霸占田产，私立牢狱，包揽词讼，与地主恶霸相勾结欺压百姓，有的还以传教士身份作掩护，刺探情报，犯下累累罪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

义和团，源自义和拳、梅花拳和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结社，是山东、直隶（今河北）等地老百姓练拳习武的组织，最早兴起于山东、直隶交界地区。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宗教侵略，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侵略渗透到了乡村，直接触怒了广大劳动群众，因此，全国各地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大多以反抗教会暴行的形式表现出来。义和团率先举起“杀洋人、烧教堂”的大旗，终于引发了以普通劳动者为主体、具有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仅山东一省，在1897年、1898年（光绪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两年内就发生了上千起义和团反对外国侵略的正义行动。一时间，居留在中国的外国侵略者人人自危，寝食难安。

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极大恐惧。1900年4月6日（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七日），英、法、美、德四国公使照会清总理衙门，无礼要求清政府在两个月内剿除义和团，否则他们



清军用地雷阵伏击八国联军

将出兵“代为剿灭”。5月30日，他们见清政府似乎未理睬他们的照会，便进一步威胁，借口保护使馆，不管中国态度如何都要派兵入京。31日，英、美、法、俄、日、意水兵三百余人强行进入北京东交民巷各使馆。

义和团哪容他们在中国的大地上如此放肆，便烧毁了丰台车站，拆除了丰台、黄村、安定三个车站间的铁路和电线，阻止列强进军北京。技穷的各国使馆分别向本国政府告急请求增兵，悍然挑起了战争。

清政府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得寸进尺早已不耐烦，对轰轰烈烈的义和团也是深恶痛绝。但是他们意识到要想以武力进剿不仅徒劳，而且十分危险。当义和团打起“扶清灭洋”的旗帜后，他们觉得机会来了。于是，清政府采取了安抚义和团、“用拳灭洋”的方针，利用义和团对付帝国主义。6月上旬，义和团被清政府迎进北京和天津。

列强在中国人民的反抗面前，同恶相济，在军事上采取了联合行动，由英、德、俄、法、美、日、意、奥八国组成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为首的联军先遣军，企图以最快的速度进占北京，胁迫清政府妥协。6月10日，联军先遣军分三批乘火车五列从天津北上。临行前，西摩尔一脸傲气，妄称“用不了几小时就可抵达北京!”他的狂言不久便被英勇的义和团击得粉碎。

由于天津通往北京的铁路、桥梁早已被义和团拆毁。联军只有边修铁路边前进，沿途还不时遭到义和团的袭击。跌跌撞撞走了两天，才勉强抵达落垡，继续向廊坊进逼。

消息传开，北昌村义和团坛口首领李挺召集团民宣誓，决心与侵略者血战到底。他们拆毁铁路，使联军三列运兵火车被困。此时，周围村庄的五六千团民闻讯赶到，只见各色旗帜迎风猎猎，耳边号角阵阵，众团民群情激忿，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先遣军见状，不敢硬冲，只能龟缩在廊坊车站。由于他们根本没想到中途会被围困，所带粮食和弹药都不多，此刻个个饥渴难忍，有气无力。西摩尔情知不妙，与手下嘀咕了一阵后决定派一列火车强行南下，逃回天津筹集弹药和粮食。

火车没开出多远，就遭到义和团的堵截。但是义和团装备简陋，难以挡住有铁皮火车作掩护、手持先进武器的敌人。正在焦虑之际，葛渔城和东沽港的团民送来了他们连夜赶制的“大抬杆”土炮和土雷。李挺一下松开了紧锁的眉头，拍着抬炮，高兴得像个小孩子。在抬炮一顿猛轰之后，联军乖乖地缩回了廊坊车站。

西摩尔眼看寄托自己全部希望的火车又缩了回来，暴跳如雷却又无计可施，遂命令全部先遣军分批突围。面对急红了眼的侵略军，义和团与清军董福祥部密切配合，南北夹击，打死打伤一百多人。对逃窜至杨村的敌人，义和团与清军穷追不舍，深夜包围了杨村。惊魂未定的联军还未来得及喘口气，又丢下四五十具尸体，离开铁路沿北运河向天津徒步逃去。

土生土长的义和团民对敌人的逃跑路线了然在胸，于是定下“层层设伏”的计策，与清军在敌人的必经之路上设下几条埋伏线。敌先遣军利用黑夜且战且逃，潜行至天津郊外时，占领了清军的一座空武器库。夜里，一支小分队从

武器库中悄悄溜出来准备探路。他们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正暗自高兴时，耳边响起炒豆般的枪声，许多士兵连叫都没来得及便命归黄泉了。突围不成，剩下的联军故伎重演，又龟缩在武器库里固守待援。

19日，两千多各国援军赶至，接应西摩尔部向租界逃遁。早已恭候多时的义和团曹福田部又予以迎头痛击。联军士兵们眼见租界在前，可偏偏过不去，心中一急，便顾不上许多了，纷纷丢掉身上的辎重行李，有些人甚至连枪械都一古脑儿地丢了，然后乱哄哄地拼命往租界跑。义和团民没料到敌人会有此一“招”，正好乐得乘乱掩杀，又是大获全胜。侥幸逃脱的西摩尔望着身后那群丢盔弃甲的残兵败将，禁不住悲叹道：“如果义和团用的是西式枪炮，我带的这些军队，哪儿还能逃回租界，必定要全军覆没！”

廊坊惨败之后，联军气急败坏，大肆增兵扩大战争规模，妄图以紫竹林租界为大本营占领天津，进而再进攻北京。紫竹林原为天津城东南海河西岸的一个小村名。1860年（咸丰十年）天津开港后，法国强划租界于此，其旁为英、美租界，至90年代末，德、俄、日又在海河两岸划定租界，因此泛称为“紫竹林租界”。义和团运动兴起后，这里成为各国侵略军的基地。6月中旬廊坊之战打响后，沙俄军队在紫竹林对岸扫射义和团，造成大量伤亡；6月17日，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天津军民于当天下午即包围紫竹林，开始了保卫天津之战。

清军和义和团都清楚地知道，只有消灭驻扎在租界里的联军，才能达到保卫天津、抵御列强的目的，于是，战斗集中在紫竹林租界和与之相对的运兵重地老龙头火车站一线。

清军从水师营炮台和天津南门城墙上，发炮猛轰紫竹林各国武装据点，展开了长时间的炮战。而义和团此时则分作两部，一部以曹福田为首攻打老龙头火车站，一部由张德成率领攻打紫竹林租界。自此以后直到天津沦陷，曹、张两人始终顽强地战斗在各自岗位上，相互配合，锋芒直逼敌军要害。

老龙头火车站此前已被两千多名俄军抢先占领，不时骚扰附近的义和团和清军。一天午后，一部分清军主动到老龙头站前挑战，准备引出龟缩的敌人。俄军果然禁不起挑激，蠢蠢而动出了车站。众清军忽然往两边一闪，空出一条通道，隐蔽在后面的义和团曹福田部呐喊着杀了出来。吃够了义和团苦头的俄军见状，心里顿生怯意，转身就跑。曹福田立即指挥义和团和清军尾追痛杀，合力攻打。没几个回合，俄军便支撑不住了，从残壁断垣中伸出白旗拼命摇晃，想停战讲和。

战斗在第一线的曹福田看着敌人的白旗，脸上浮起一丝轻蔑的笑容。有人请示是否停火与敌议和，他把脸一沉，说：“继续打！不能给洋人喘气的机会，否则他们歇足了还要咬人！”激战一直进行至敌人援军赶到，义和团才脱离战斗大胜而回。是仗毙敌五百多人，敌军士气尽丧，再也没了以前那股嚣张气焰。

另一个战场上，张德成率领义和团中的“天下第一团”向租界发起进攻。经过多次激烈的拉锯战，张德成部进至离租界近在咫尺的马家口，犹如架在侵略者脖子上的一把钢刀，对租界里的侵略军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7月6日，侵略军阴谋袭击马家口，拔掉自己的眼中钉、肉中刺。张德成接到密报后，立即在马家口附近布下伏兵，结网而待。联军刚进入伏击圈，义和团民便从四面杀出。侵略军措手不及，乱成一团，根本组织不起什么有效的反攻，扔下数十具尸体散去。张德成率领义和团民乘胜追击，直抵紫竹林租界。

残存的敌人龟缩在租界里不敢露头，还在租界四周埋设了大量地雷，以阻挡义和团进攻的步伐。为这些地雷，张德成等义和团首领费了不少心思。终于有人提出大摆“火牛阵”的妙计，众首领顿时笑逐颜开，赞叹不已。义和团民们立刻依计四处寻来几十头牛，在牛尾巴上捆上油絮，点燃后将牛往租界猛赶。数十头尾巴着火的牛向租界狂奔，不仅把敌人埋下的地雷扫除得干干净净，还把侵略者藏身的一些洋楼引燃，烧得那些侵略军哇哇乱叫，根本无力抵抗。义和团民趁机呐喊着冲入租界，再次给侵略者以严厉的惩罚。

义和团英勇顽强、取得节节胜利的喜讯，极大地振奋了广大爱国人民。天津城内的居民纷纷在沿街大门贴上“义和神拳，大获全胜”的红纸标语，以示庆贺；许多人还给义和团送来得胜饼和绿豆汤，表示慰问。

就在义和团血战正酣、捷报频传的时候，清政府又一次被帝国主义的威逼所吓倒，改变了对义和团的态度。7月13日，清朝帮办北洋军务大臣宋庆“下令军中，痛杀拳匪”。在城外八国联军与城内清军的内外夹攻下，义和团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14日，义和团含恨撤出天津城。天津卫失守，天津人民陷入了血海。

在抗击八国联军的斗争中，义和团勇字当头，以血肉之躯去抵挡装备精良的帝国主义军队，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江孜之战】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英国在中国攫取了种种特权，其势力已弥漫到几乎整个长江流域。但是，这并未满足英国统治阶级贪婪的欲望，他们又把目光投向了美丽的“地球第三极”——西藏。1876年（光绪二年），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为自己染指西藏找到了冠冕堂皇的借口。同时，他们以印度为据点，先后把我国的西部邻邦尼泊尔、哲孟雄（今锡金）、不丹等并入了其势力范围，并在印度入藏的门户——哲孟雄大吉岭建立军事基地，搭好了入侵西藏的跳板。雪域高原宁静祥和的天空从此被乌云笼罩。

清朝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狼子野心早就有所察觉，在边境要地邻近大吉岭的隆吐山一带筑垒架炮，做好了抗击英军入侵的准备。

1887年（光绪十三年），英国又故技重演，派人向清政府递交了一份荒唐的外交照会，声称藏军守卫的隆吐山属哲孟雄领土，要求清廷立即撤去守军。对这种莫名其妙的照会，清政府断然拒绝，并严令西藏驻军做好战斗准备，以随时增援隆吐山守军。

1888年3月20日（光绪十四年二月八日）中午，高原的天空仍如往常一般湛蓝。忽然，隆吐山下响起了一阵不

祥的枪声。紧接着，山脚出现了一群蠕动着的英国人，正吃力地往山上爬。守卫隆吐山已经多日的藏军多尔济仁增部虽有些措手不及，但很快反应过来。藏军的装备极差，几乎没有什么有力的武器，但他们在多尔济仁增的指挥下，凭借熟悉的地形，居高临下，奋起还击。英军见藏军手中的武器不过是些弓箭和火铳，反击的火力极弱，心中顿时放松了。有些人干脆一改刚才的小心谨慎，直着腰往上爬。

可是，不一会儿英国侵略者便尝到了苦头。他们低估了藏军手中的弓箭。只见以多尔济仁增为首的藏军在山顶的岩石掩体后面一字排开，弯弓如满月，一支支箭像长了眼睛似的射向英军。一名英军军官被长箭贯胸，当场一命呜呼，受伤的、未受伤的英军士兵吓得连滚带爬地溜回老巢。

第二天清晨，喘息了一夜的英军增兵至六百多人，对隆吐山发起更加猛烈的攻击。藏军仍旧如法炮制，利用居高临下之势，以山为依托的有利地形予以还击。一仗下来，英军死伤一百多人。自卫作战取得了首战胜利。

然而，损兵折将的英军岂肯就此善罢甘休，他们调集重兵，调来多门重炮对隆吐山守军发起猛烈轰击。面对处于火力绝对优势的英军，藏军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工事一寸一寸地被摧毁，阵地一寸一寸地沦入敌手。最后，藏军不得不后撤，据守附近高山。

通道打开后，英军数千人蜂拥而入，进逼纳汤一线。西藏地方政府立即从各地调集大军。不久，万余藏军齐集亚东前线，反攻在即。这时，清政府内的投降派却在大肆活动，他们竟打着“不要扩大事端”的旗号，下令藏军撤兵讲和。9月，英军不战而下捻纳、亚东，终于以武力炸开了西藏的大门。

门户既开，英国侵略者胃口大增。他们大肆由印度向西藏增兵，至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英军在西藏驻军已达一万多人，配备了大量先进的步枪、机关枪和火炮，还制订了一个攻占江孜、拉萨的狂妄计划，妄图借此控制西藏，从而达到把这颗高原明珠从中国版图分裂出去的肮脏目的。

是年12月11日，大队英军在麦克唐纳少将的指挥下，兵分两路向江孜运动。由于西藏守军部署失误，致使通向江孜的要地春丕轻而易举地落入敌手，并进而丢掉了附近的火药库与武器库。这时，侵略者也遇到了难题。高原的严寒使士兵们痛苦不堪，冻死冻伤的几乎每天都有。麦克唐纳不敢贸然进攻，只得退回春丕休整，待机而动。

藏军抓住这一机会，在堆拉以北的曲眉仙角、古鲁一带构筑石墙组织防御，希望能把侵略者阻挡在江孜外围。英军见此情景，心知硬攻是讨不到好处的，便耍起诡计来。次年3月底，他们一边派人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一边由麦克唐纳率一千三百余人由堆拉悄悄地推进至曲眉仙角的藏军阵地附近。秉性耿直的藏族人哪知是计，只道英军想捞一把就走，遂停止还击，与侵略者谈判。这无异于与虎谋皮。谈判正在进行中，老奸巨猾的麦克唐纳暗令一个印度锡克族步兵营迂回至藏军阵地侧后，抢占了几个制高点。待藏军哨兵发现，为时已晚。英军居高临下，以机枪、大炮向守军进攻。这时，英军的步、骑、炮兵从三面将一千五百余名藏军包围。

藏军前线指挥官莱丁色拒绝投降，率部用刀、矛、叉等原始冷兵器与侵略军展开了白刃格斗。骁勇善战的藏军战士同仇敌忾，前仆后继，七百多名勇士的鲜血染红了石墙的每一块石头。余部且战且退撤到古鲁，凭借事先筑好的石墙、石垒顽强阻击。然而，弓箭、土枪毕竟无法与炸药、炮弹相抗衡，奋战数昼夜，古鲁也告失陷。是战藏军伤亡一千四百余人，几近前线藏军的半数，由此可见战斗之残酷。坚强不屈的广大藏族将士明知敌强我弱，却无一人言降，仍然义无反顾地投入战斗。他们的大无畏精神令英军也为之咋舌。

曲眉仙角之战得手后，英国侵略者得寸进尺，乘势北犯江孜。

江孜是相当于内地县一级的西藏地方宗政府所在地，西通日喀则，东达拉萨，是西藏的军事战略要地。由于江孜驻军大部已南调，又缺乏预备队，因此与气势咄咄逼人的英军相比，兵力更显薄弱。

江孜附近的藏族同胞为保卫家园，纷纷拿起武器，加入了反侵略斗争的行列。当英军进至康玛以南的雪那寺附近时，守卫该寺的二三百藏军与该寺的喇嘛僧众凭借高墙坚屋，给英军以重大杀伤。麦克唐纳听说连寺庙里的神职人员都拿起武器参加战斗，一下子竟惊呆了，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

由于实力悬殊，藏军不能力战，为保存实力，与全城百姓一起撤出了江孜。随后，英军进占已是一座空城的江孜。江孜失守后，西藏地方政府迅速组织民众武装近万人，分别集结于江孜东、西两侧，以防英军进逼日喀则和拉萨，同时，还在英军进攻拉萨的必经之路卡罗拉山口筑墙设卡，派重兵驻守。

侵略军担心前进受阻，想乘藏军部署立足未稳，一举突破藏军防线。5月3日，英军大队人马自江孜出发，向卡罗拉进犯。得意忘形的侵略者一心只顾进攻拉萨，以控制西藏的心脏，却忘了在他们后面还有大批蓄势待发的藏军。

英军离开江孜城向卡罗拉进发后不久，一个藏民气喘吁吁地跑进了日喀则附近的西藏民军驻地。他带来了江孜守敌不足二百人的重要情报。民军闻讯，当机立断决定奔袭江孜。5月4日，民军一千余人在留城藏民的配合下，克复江孜宗政府，迅速占领了宗山、白居寺等重要据点，并把英军巢穴洛林卡围了个水泄不通。

留在江孜大本营的近两百名英军遭此突袭，顿时乱作一团，龟缩在营地里负隅顽抗。出击卡罗拉之敌闻讯，赶忙回兵驰援，但在几路民军的顽强阻击下，英军被围的态势丝毫未得到改变。24日，又一部英国援军抵达江孜，与被包围的顽敌里应外合，向包围圈上的帕拉村民军发动反击。由于帕拉村墙高壁厚，英军先后出动了炮兵、工兵，仍未能动摇民军半步，自己反而伤亡了数十人。经过整整一天的逐屋较量，民军枪弹耗尽，不得已撤至地方宗政府所在地，而英军也因兵力不足、补给困难而无力进攻，双方呈僵持状态。

相持半个多月，英军近万人的庞大援军抵达江孜，依仗其强大的火力相继占领了江孜外围的村落。据守日喀则与江孜联系纽带翟金寺的千余民军，深知在远距离上敌长我短，但在近身格斗上我长敌弱，于是趁着月黑风高奇袭英军。英军想不到民军会主动出击，仓促应战，

一时死伤遍野。西藏民军虽长于格斗但终究寡不敌众，激战一天后，翟金寺失守。英军切断了日喀则与江孜的联系，江孜成为一座孤城！

7月5日，英军分两路向江孜城和宗政府所在地发起总攻。民军利用悬崖峭壁修筑了多道防御围墙，奋勇还击。激战数小时，装备落后的民军，弹药和弓箭全部耗尽，连“恶多”（为打鸟、打牲口时所备的一包小石头，一条绳，用时将石头置于绳上，用力甩出去）石子也打光了。英军见状，怪叫着一拥而上。民军中有人情急之下，抱起遍染鲜血的石头就往下砸。众人一见，纷纷效仿。正在爬墙攀岩的英军遭此迎头痛击，又被砸死、砸伤数十人。无奈之下，英军只有退到远处，用大炮拼命轰击守军阵地。一时间，江孜全城笼罩在一片炮火硝烟之中。幸存的民军再也无力坚持，被迫从小道撤往拉萨，江孜遂告沦陷！

7月14日（六月二日），英军乘胜进逼拉萨。西藏地方政府慌了神，见无力回天，竟下令各地藏军停止抵抗。于是侵略军长驱直入，于8月3日（六月二十二日）占领拉萨，阴云完全笼罩了西藏这片纯洁的土地。

总览西藏军民抗英全局，可以清楚地看到清朝政府忽视西藏边防的弱点，兵力严重不足，装备极为落后，虽处有利地形，藏族军民的浴血奋战，仍未能挽回败局。这一血的教训是不能不引起后人深思的！

【黄花岗起义】

广州先烈路上，有一座庄严的烈士陵园。二百七十米长的中轴线上，依地势由低而高排列着门楼、主墓、纪功坊。岗顶纪功坊上高擎火炬的自由神像与门楼上孙中山手题的“浩气长存”四个金色大字交相辉映，气势宏伟。烂漫的黄花将占地十六万平方米的墓园装点得庄严、肃穆。这便是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

为了推翻反动腐朽的满清封建统治，建立独立富强的民主共和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从1894年创建兴中会开始，不遗余力地全身心投入了反清运动。“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在孙中山指挥和领导的十余次武装起义中，影响最大、最为悲壮的当推1911年4月27日（农历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的广州起义了。

为组织这次起义，孙中山于1910年11月来到南洋槟榔屿（今马来西亚北部），召集同盟会领导人黄兴、赵声等以及国内外代表开会。由于革命党人的起义屡战屡败，一些人对革命前途感到灰心失望。会上孙中山一再劝勉，指出过去比今天要困难百倍，现今革命风潮



纪念同盟会起义中死难烈士之墓

日兴，华侨和民众的思想已经觉悟，正是起事的大好时机。他总结以往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指出："我们革命党并不缺少投身革命的人。以前屡次失败的原因是力量分散，所以变得薄弱了，每每有临渴掘井、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感。因此，这次我们要集中全力来经营！"

在孙中山的鼓励下，与会代表们热血沸腾，决定在广州举行一次更大规模的起义，一举占领广州城。并计划在夺取广州后，由黄兴带一支部队进攻湖南、湖北，由赵声率另一支部队出江西直取南京，待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后，再挥师北伐，推翻满清王朝。

预计起义费用约需十万元。会上大家便踊跃认捐，当场即筹集到了近万元。会后，孙中山亲赴美洲，黄兴等同盟会会员到南洋、香港等地募捐，得到了广大爱国华侨的热情赞助，共筹到款项十八万元之多，大大超过了原来的预算。革命党人信心倍增。

1911年1月，黄兴、赵声等起义骨干分子陆续到香港会合，成立了统筹部。众人推举黄、赵分任正、副部长，同时开展发动新军、防营、巡警、民军等各种军人，联络各地革命团体，购买、运输武器，侦察敌情等工作，还组织了一支由八百多人组成的"选锋"（敢死队），以便带头发难。

为了建立一批秘密机关，储藏武器，统筹部先后在广州城内海旁西街和育贤坊开设了两爿米店，这样就可以在米袋里暗藏军火运输入城。按照当时的规矩，租屋开店要有眷属，即所谓"非眷莫问"，于是便由女同盟会员冒充家属以掩人耳目。又假借办喜事、送嫁妆及新媳妇归宁之类，在披红挂彩的衣箱、礼物中运进了大批枪支弹药。更有甚者，黄兴的长子黄一欧与一位日本友人，利用清政府海关对洋人的畏惧，将几十支手枪和一万发子弹装在四只皮箱里，搭乘外国轮船大摇大摆地进入香港。随后，他又遵照父命打入广州巡警教练所，秘密活动，争取革命力量。

各项筹备工作就绪之后，统筹部确定4月13日分兵十路进攻广州城内的两广总督衙门等清朝统治机关。不料临期发生了几个意外，款项和武器未能及时送达起义者手中，起义消息泄露，革命志士温生才自发刺死署广州将军孚琦，致使敌人加强了戒备。原来的部署全盘打乱，起义被迫一再延期。

在这进退两难的时刻，有人劝黄兴赶快离开广州以避风头。黄兴断然拒绝说："现在已是箭在弦上，不容不发！惟有迅速发动起义才能自救！"他毅然决定27日准时发动起义，同时给香港秘密机关发了一封密电，称"母病稍愈，须购通草来"，催促香港同志速来会合。

1911年（清宣统三年）4月27日下午，在离两广总督衙门不足五百米的起义总指挥部里，一百三十多名来自海内外的"选锋"队员摩拳擦掌，只待一声令下，即向满清政府在广州的统治中枢——两广总督衙门发起进攻。

把起义总指挥部设在敌人重兵守卫的总督衙门旁，是革命党人勇敢而大胆的决定。一方面敌人不会想到起义军总指挥部近在咫尺，因而较为安全，另一方面也便于给敌人一个突然袭击。勇士们个个斗志昂扬，下定决心与敌决一死战。黄兴特赠友人相片一帧，说："谨呈小像一枚以为纪念，愿他日寻尸马革，尚能识我之真面目也！"其他志士也纷

纷写下绝命书以示决心。

就在大战即将来临的中午时分，一位须发如霜的老人快步冲进总指挥部。黄兴一看，原来是奉命往来于穗港间传递信息的老革命谭人凤。老人气喘吁吁地告诉黄兴，由于清军封锁海面，香港革命党人来不及抵达广州，要求推迟一天。正在分发子弹的黄兴未待老人讲完，便急得直跺脚，说："老先生，别说了，免得乱我军心！"

谭人凤见众人意志坚决，自知多说也无益，便整整衣服，要求领枪加入战斗。"先生老了，"黄兴劝他说，"这是决死队，您就别去了吧！"老先生一下子急了："我知道是决死队！你们不怕死，难道我一大把年纪的人还会怕死吗？"黄兴见他如此忠勇，只得给了他两支枪。不料老先生误碰扳机，"砰"的一声，自枪中飞出一颗子弹，险些伤了自家人。黄兴一把将枪夺下，连声说："好险，好险！老先生，还是算了吧！"固执的老人这才罢休。

下午5时半，历史性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晚霞映照下的木棉树，英雄花格外鲜艳。忽听一声呐喊，全城各秘密机关大门洞开，敢死队员们臂缠白布，足蹬黑面胶鞋，扑向各自的进攻目标。

黄兴带领一百三十多名"选锋"队员呐喊着冲向总督衙门。林时塽等四个人使劲吹起螺角，冲锋号伴随着喊杀声，声威大振。队伍冲到总督衙门，黄兴向把门的卫队大声喊道："我们是来打倒清政府的，如果你们赞成，请举手！"没有回应。"打！"起义者一齐开火，敌卫队管带金振邦当场毙命，其余人或伤或逃，没有来得及跑的慌忙缴械投降。

起义军乘势突入衙门，分头搜索方发现里面空无一人。原来两广总督张鸣岐事先得到消息，打穿后墙仓皇逃走了。起义军立即转出总督衙门，刚好与闻讯赶来的水师提督李准的亲兵大队迎头相遇。林时塽不知隐藏在李准部队中的革命党人早已暴露被捕，正准备上前联络自己人。不料他喊声未落，敌人的子弹便像雨点般扫射过来。林时塽头部中弹，当场牺牲，起义军相继倒下数人。黄兴右手食指、中指也被打断，他忍痛用无名指抠动扳机还击，指挥队伍分三路接应城外起义部队。

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因研制炸药炸残一只手臂的喻培伦，胸前挂了一只装满炸弹的篮子，挥动独臂投掷炸弹，杀伤了许多敌人。起义队伍中也不断有人伤亡、被俘。战斗进行到了深夜，由于道路不熟，且无月色，队伍渐渐散乱，部分人员退至郊外。而驻扎在城外的新军，因为敌人防范严密，预先又被收去枪械，所以无法响应。

黄兴与队伍失散后，趁乱化装出城，到了广州河南才找到秘密机关。第二天早上，赵声赶到，方知昨晚城内激战时，他带领的香港二百多名革命党人，因城门紧闭不能入城，只得分头返回。事已至此，黄兴和其他革命者只好乘船去了香港。到香港以后，黄兴指伤益重，被送入香港雅丽医院，准备切除将断未断的中指。医院规定，要有亲属签字才能动手术，女革命党人徐宗汉毅然假作妻子签字负责。两人因此巧结姻缘，日后终成眷属。

未能逃离广州城的革命党人，有的知道巡警教练所里有自己人，纷纷逃去暂避。受黄一欧影响同情革命的所长夏寿华马上搜集了许多制服，拿出来掷到

地上，高声说："外面这么乱，你们还不穿衣服出去巡查!"大家心照不宣，连忙换了衣服伪装出巡，不但自身脱险，还暗中救护了不少同志。

但是，仍然有三十一名革命党人因受伤不幸被俘或被搜查逮捕。其中有倾尽热血写成《与妻书》的林觉民，有独臂参战的喻培伦等。他们个个宁死不屈，正气凛然，从容就义。连同在战斗中牺牲的勇士，共有八十六人遇难。

三天后，死难烈士的遗骸陆续被运到了广州城大东门外咨议局前的空地暴尸示众。一位隐藏的同盟会会员潘达微，不顾清廷铁爪还在城内大肆捕人的恐怖气氛，挺身而出，以《平民报》记者的身份四处奔走，终于劝得广仁善堂将东郊红花岗上的一片义地献出，并一手负责烈士的营葬。当时一共殓得烈士遗体七十二具。第二天，他又冒险挥笔写就一篇报道《咨议局前新鬼录，黄花岗上党人碑》公开发表。他认为，黄菊雄浑高洁，经霜不凋，正是烈士高尚革命情操的象征，所以在报道中把红花岗改为黄花岗，一时脍炙人口，轰动全城，遂成定名。因此，这次广州起义又被人叫作黄花岗起义，遇难烈士也被称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孙中山语）烈士们的鲜血并没有白流，此役大大激发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沉重打击了清朝反动统治，吹响了武昌起义的战斗前奏曲。未及半年，武昌起义的枪声掀起了辛亥革命的怒涛，终于冲垮了统治中国两百六十多年的满清王朝，更结束了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武昌首义】

时间：1911年10月10日晚7点左右。

地点：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后队营房。

细雨濛濛，武汉的天空铅一般沉重。忽然，一声清脆的枪声自一间营房传出，划破了死一样沉寂的夜幕。随即，一位左臂缠着白布带的军人冲出房门，振臂大呼："同志们，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顷刻间，武昌城内枪声四起，弹如雨下。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了!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步步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沼，成为帝国主义列强肆意宰割的肥肉。腐朽的满清政府不但不发愤图强，反而更加严酷地压迫黎民百姓，炮制了"预备立宪"的大骗局，又出卖了原定为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修筑权，终于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无比愤慨。全国各地相继爆发了"保路运动"，吹响了起义的号角。

神州大地上涌动的革命春潮，尤以湖北最为引人注目。由于湖北社会、经济发展较快，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不断涌现，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得以迅速传播，各种反清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在这块土地上扎下根来。在孙中山民族民主革命纲领指导下，这些团体为武昌起义的爆发，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准备工作，以致当时湖北新军一万五千余人中，革命党人就占了五千多名。再加上大量同情革命的新军士兵和下级军官，革命者在新军中占据了明显的优势。

1911年8月，四川保路风潮进一步

扩大，湖北新军一部奉调入川镇压，湖北兵力空虚，这给了革命党以可乘之机。9月14日，革命党人组织秘密大会，制订了起义的大体日期与计划，革命已如在弦之箭。

正在这时，新军南湖炮队中的革命士兵因与军官发生冲突，准备自行暴动。这使得顽固派们大为震惊，于是赶忙下令把掌握在新军士兵手中的部分武器弹药收缴入库，余下部分由他们眼中所谓的“安定分子”掌握，并加强了对平时比较激进的士兵的控制。武昌城内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10月9日上午，革命党首领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机关做起义的最后准备。其中一人因吸烟不慎，火星飘入正待装填炸弹的火药中，引起爆燃，大股浓烟直透窗外。孙武头、手被严重烧伤。邻居以为发生了火灾，群呼火警，租界巡捕闻声而至。革命党人潘公复、邓玉麟本想将重要文件和革命者名册拿走，但一时慌乱，竟找不到钥匙，开不了锁，只得在院内泼洒煤油，打算纵火灭迹。此时巡捕已近，众人不得不匆匆逃离。

俄巡捕进屋后，很快发现了炸药等物，便用大斧劈开橱柜，将起义准备的旗帜、袖章、文告等搜洗一空。随即又把名册转给了湖广总督瑞澂。瑞澂又惊又喜，连夜命人按名册大肆搜捕革命党。革命党人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等相继被捕，惨遭杀害。武汉三镇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

连夜的大搜捕，完全打乱了革命党人的计划。几位起义首领仓促决定9日夜10日晨发动起义，但由于城内一片混乱，消息无法及时传送到各处革命者手中，以致号炮未响，各营未动，到后来连一些首领也不得不潜伏自保，起义机关陷于瘫痪，起义几乎就要流产了。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

在这群龙无首的关键时刻，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怀着“宁为玉碎，不图瓦全”的决心，自行联络，为起义做好了最后的准备。大家在悲愤中，激起百倍的勇气，终于一声枪响，诸营响应，1911年10月10日（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这个最黑暗的时刻，奏响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激越、最嘹亮的乐章。

10日傍晚，起义发动的时间将到，潜伏的革命党人金兆龙等荷枪实弹相时待动。一贯敌视革命的排长陶启胜带着哨兵查铺进屋，一见金兆龙和另一个革命党人程正瀛抱枪而卧，便高声斥问：“你们想干什么？”

金兆龙一语双关地回答：“准备不测！”

陶启胜狂叫道：“你们想造反呀！来人，把他俩捆了！”说罢猛扑过去。

金兆龙毫不畏惧，一边和扑上来的陶启胜撕打，一边高喊：“反就反！你能怎样！”

周围的起义士兵见状，一拥而上帮助金兆龙。陶启胜挨了几枪托，情知不

妙，赶忙夺门而逃。程正瀛举枪便射，“砰”的一枪打中陶启胜，也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

枪声便是命令，全营革命党人纷纷按计划在左臂缠上白布带，持枪出营响应。金兆龙振臂一呼，起义士兵立刻聚集在了他的周围。代理管带阮荣发、队官黄坤荣等反动军官听到枪声，立刻带着亲信赶来弹压。他们一边放枪一边吆喝：“你们都有家小父母。这种事做不得，要灭九族的！赶快各回本队！”

革命士兵以一次齐射作为回答，当场击毙黄坤荣，其他军官见状，抱头鼠窜而去。

此时，正在另一营巡视的新军革命党另一首领熊秉坤听到枪声。知道起义已经发动，马上赶回本部营地鸣笛集合，宣布起义。由于大部分武器都被收缴入库，集合起来的士兵只得撬开营内军械室，缴得二十四把军刀，然后挥动着这些雪亮的军刀，冲向楚望台军械局。

守卫军械库的管带李克果闻讯，召集守卫的士兵说：“我们共事多年，今有一言相告。守卫军械库，责任重大，若有人来抢，我们必须抵抗。大家听清了没有?”

潜伏在军械库的革命党人罗炳顺乘机说：“我们连一粒子弹都没有，怎么抵抗?”

“对!”其他革命士兵应声附和道。

李克果信以为真，赶忙命人打开军械库，搬出两箱子弹分发给众士兵。罗炳顺领到子弹后，立刻推弹上膛，朝天放了一枪，宣布说：“我们起义了！谁敢拦就打死谁!”

李克果顿时傻了眼，慌忙逾墙而逃。楚望台军械局落入革命党手中。

熊秉坤率众到达楚望台军械局后，迅速武装了自己。这时，城内其他部队的新军士兵也相继起义前来会合。熊秉坤集合好队伍，果断下令：今夜进攻总督衙门，完成武昌独立；本军以楚望台为大本营，以楚望台和蛇山为炮兵阵地；今晚的口令是“同心协力”。

参加起义的士兵越来越多，从未指挥过大部队的熊秉坤深感自己难以控制局面，正在为难之际，有人带着愿意参加起义的队官吴兆麟来了。此人军事指挥能力比较强，平日就被人称作“智多星”。他愿意参加起义，不禁使革命党人喜出望外，一致推举他为临时总指挥，全权组织起义。

起义队伍掌握了充足的武器弹药，控制了城内制高点，下一步便是要攻下新军第八镇司令部，占领总督衙门，摧毁象征清王朝在湖北的统治堡垒，使其指挥瘫痪，然后再消灭敌有生力量，控制整个武昌城。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午夜时分，起义军兵分三路冒着细雨向总督衙门和第八镇司令部展开了进攻。

由于敌情不明，起义军初战受挫，三路队伍都被迫退回楚望台大本营。此时，南湖炮队到达了预定阵地中和门和蛇山。吴兆麟立刻命令炮队发炮助战。可是，雨夜天黑，炮兵无法测定目标。有人建议用火指示目标。吴兆麟当即采纳，一边派人潜入敌心脏部位放火，一边命人切断出城的电话线，使敌人无法与外界联系求援。

领命潜入敌阵的士兵，在总督府附近找到一栋用作布店的木楼，正好可作指示点。士兵说明来意后，劝主人说：“快快避开，损失等革命成功后会赔给

你的。”谁知该楼主人却拎着一桶煤油递了过来，说：“不用赔！大事要紧！”由此可见当时民心之向背。

10月11日凌晨1时许，敌司令部与总督衙门烈焰冲天。起义炮兵趁机猛烈轰击。在炮兵掩护下，起义士兵一举攻占第八镇司令部，逼近总督衙门。

躲在衙门里的湖广总督瑞澂，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慌乱中，他一面令部下顽抗，一面让卫兵在围墙上挖了个大洞，携家小细软仓皇逃到江边，窜上了“楚豫”号兵舰。

残余的敌军见头头脑脑们都竞相逃命而去，一个个也无心顽抗了，对奋勇作战的起义士兵只作了些象征性的抵抗后，便陆续缴械投降。起义士兵终于攻占了总督衙门，控制了武昌。此时，东方发白，从乌云背后射出一缕阳光。

不久，汉口、汉阳新军起义占领两镇的消息传来，武汉三镇全部光复！随即，湖北军政府成立，由于起义士兵缺乏斗争经验，让立宪派和旧军阀混入了军政府，但这并不能阻挡汹涌的革命潮流。

没过多久，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都燃起了武装反抗清王朝反动统治的熊熊烈火，各省、各地区纷纷树起义旗。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并相继组成临时参议院，旋即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2月12日，宣统帝被迫宣告退位，清王朝这座腐朽的大厦轰然倒塌，在中国大地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也随之走到了尽头，中国从此进入了另一个新时代。

九、军事人物

【孙武】

孙武，字长卿，齐国人。春秋末期我国著名军事家。所著《孙子兵法》是我国现存的最古兵书，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专著，对中国、对世界的军事史，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曾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第一个注释和阐述《孙子兵法》的大军事家曹操，称赞《孙子兵法》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他要求部下将领们领会书中"审计重举，明画深图"的真谛。唐太宗评价古代兵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到了宋代，《孙子兵法》被列为"武经七书"之首。明代民族英雄戚继光更认为《孙子兵法》是"纲领精微"的"上乘之教"。孙中山先生认为，自从有了《孙子兵法》，"便成立了中国的军事哲学"。《孙子兵法》不但在国内影响巨大，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被国外人士认为是"最早、最优秀的著作"，其内容"闳阔深远"、"诡谲奥深"。约在公元七世纪，《孙子兵法》首先东传到日本、朝鲜，十八世纪以后，《孙子兵法》先后又被译成英、法、德、捷、俄等多种文字，一九七二年美国出版的约翰·柯林斯的《大战略》一书，赞誉"孙武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

孙武所处的时代，大致与孔丘（前五五一～前四七九年）同时，其生卒年月已不可考，主要活动在吴国阖闾（前五一四～前四九六年在位）时期和吴王夫差（前四九五～前四七三年在位）的前期。

孙氏家族的祖先，是陈国的公族。公元前七〇五年，陈厉公的夫人生了个儿子，取名叫完。陈完长大以后，为了回避宫廷斗争，便携家带口，来到了齐国，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并改姓田，这样他又被称为田完。一百多年以后，田氏家族越来越兴旺，地位也越来越显赫。田完的后代不少人身居要职，田氏成了齐国后起的一个大家族。

田完的四世孙田无宇，颇有勇力，



孙武塑像

深得齐庄公的信任。齐景公时，田无宇的一个儿子田书，做了大夫。他很有军事才干，因为领兵伐莒有功，齐景公在乐安（今山东惠民）封给他一块采邑，并赐姓孙氏。因此，田书又被称为孙书。孙书的儿子孙冯，做了齐卿。这个齐卿孙冯，就是孙武的父亲。

孙武生活在齐国的时候，正值齐国内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齐景公初年，左相庆封灭掉了右相崔杼。接着，田、鲍、乐、高等四大家族又联合起来，赶走了庆封。后来，内乱日甚一日，齐国公室同四大家族的矛盾，四大家族相互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当四大家族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愈演愈烈时，田室的支属孙氏，担心田氏宗族一旦失势，会殃及自身，便离开齐国，投奔吴国去了。

吴国占有今天江苏大部和安徽、浙江的一部分。它东靠大海，南同越国接壤，西与强楚为邻，北与齐、晋各国相望。在东周列国中，它立国很早，开化却很晚，直到公元前五八四年，晋国为了牵制楚国，在楚国后院点火，才派大夫巫臣出使吴国，教吴乘车，教吴战阵，教吴叛楚。这样，吴国才开始同中原各国有了交往。

春秋之际，封国林立，一些失意或是遇到祸难的士大夫，往往因故出走，离开自己的侯国，到他国去求官谋生。孙武来到吴国的前后，还有两个楚国人，一个叫伍子胥，一个叫伯嚭，因为祖父无辜被楚王杀害，都相继逃到吴国，想凭借吴国的力量，替先辈报仇雪恨。

伍子胥经过千难万险，来到吴国以后，很快便投在公子光的门下做了宾客。公子光是吴王僚的叔伯兄弟。他雄心勃勃，不愿久居人下，便笼络贤才，等待时机，取吴王僚而代之。伍子胥发现公子光另有志向，不愿卷入吴国内部的斗争，便寻个借口，到边邑务农去了。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伍子胥物色了一名叫专诸的勇士，推荐给公子光。

这时候，孙武也在边邑过着隐居的生活，他一面灌园种地，一面苦读兵书，写作兵法。孙武生活在一个战争频繁、兼并激烈的时代，身处有着源远流长的军事传统的齐国。他的祖父既是卿大夫，又是有名的将领，这些都是他能够写出兵法的有利条件。孙武是一个喜欢研究战史的人。早在少年时代，每当遇见老一辈的人，他总是要打听昔日的战争情形。如果遇到曾经实地参加过战争的人，一定请他讲一些实战的经验。久而久之，他渐渐认识到打胜仗有打胜仗的理由、打败仗也有打败仗的原因，并非像人们传说的那样，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个人无能为力。

孙武常常把研究的心得写在笔记簿上。此时离纸张的发明尚有六百多年。所谓笔记簿就是在竹片或木片上以小刀刻字或用漆书写，然后再连在一起。至于作战地图，他则绘在大张的帛布上，注明军队或车船的配置及移动情况，标出战争的原因、经过和结果，有时还要加上自己的评语。潜心研究的结果，渐渐形成了他独特的军事思想。

经过长时间的资料收集，脑子里有了初步概念之后，他又前往战场实地进行勘查和研究。这项工作在交通条件相当落后的当时，是极为辛苦而麻烦的。然而他却乐此不疲，前后竟持续了二十年之久。

孙武研究战争、战略和战术，并非

要借此去游说诸侯从而获取高官厚禄。他没有名利之欲，完全出于个人兴趣。他只希望自己能够平凡而恬静地度过一生。早先来到吴国的伍子胥对于孙武的才干和学说十分钦佩，他认定孙武是个人才，迟早有一天会脱颖而出，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来的。因此，他经常到孙武那里串门，共同探讨一些军事问题，如此一来二往，时间一长，两人竟成了莫逆之交。

周敬王四年（前五一六年），楚平王去世，年幼的楚昭王即位。第二年春天，吴王僚趁楚国君弱小又忙于治办丧事的机会，任命胞弟公子盖馀、公子烛庸为将，率领三军，兴兵伐楚。二公子求胜心切，领兵贸然深入，结果被楚军切断了后路。

公子光见大军被困在外，国内兵力空虚，便把专诸找来计议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举大事，君位难得！"于是，由公子光设计，让专诸在酒席上刺杀了吴王僚。公子光夺得了王位，称为吴王阖闾。阖闾是一位奋发图强、立志改革的君王，他决心要使落后的吴国赶上中原各国，摆脱长期以来遭受楚国欺凌的屈辱地位。为此，他"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不迷恋安逸，不贪图享受，不追求玩乐，一心要振兴吴国。因此，吴王迫切希望聚集人才，以佐自己成就富国强兵的伟业。

阖闾即位之初，既怕国人不服，又担心诸侯不相信自己。为了保住王位，他一面施行恩惠，收买人心，一面礼贤下士，网罗人才。阖闾首先选中了伍子胥，任命他做了行人。

行人本是掌管朝觐聘问的官，伍子胥这个行人却不同一般。吴王器重他的内政外交才干，经常同他商议军国大事。有一次，吴王问道："我国地处偏远，蜗居东南；地势低湿，江海危害；国无城防守御，民无衣食之藏。这种贫弱状况，如何改变？"

伍子胥沉思了一会，回答说："凡是想图霸称强的君主，必须修城郭，设守备，练士卒，广积蓄。"

吴王很赞同伍子胥的意见，并委托他去逐件施行。国都在姑苏（江苏苏州）建成以后，吴王还特意把西向的"阊阖门"称为"破楚门"，以示自己伐楚的决心。

吴、楚两国势不两立，是世代的冤家对头。吴王有心派伍子胥、伯嚭率军伐楚，又对他俩放心不下，怕他们到时只顾公报私仇、滥事砍杀，误了自己的大事。一天，吴王站在宫苑中的高台上，望着远方，慨然长叹。群臣都不解其意。惟有伍子胥心中明白，这是吴王在为选将而发愁。于是他趁机向吴王推荐孙武，并向吴王介绍了孙武的家世、人品和才干，称赞孙武是个文可安邦、武能定国的旷世奇才。可是，孙武自从来到吴国后，一直忙于勘查战史，隐居著书，吴王连孙武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甚至认为一个农夫不会有多大的本事。伍子胥奏道："此人精通韬略，有鬼神不测之机，天地包藏之妙。诚得此人为军师，虽天下莫敌！何况楚国？"尽管伍子胥费了好多的口舌，吴王仍然无动于衷，反而转变话题，同伍子胥谈论起军旅之事。伍子胥一边应对，一边找机会举荐孙武。整整一个上午，伍子胥借论兵之机，前后七次向吴王推举孙武。到后来，吴王听得厌烦了，便嗔怪说："我看你

是以举荐人才为名，实际上想呼朋引类，结党营私，以加强自己的势力和地位！”伍子胥见光凭口说打动不了吴王，便将孙武写的兵法拿来，呈给吴王看。

吴王将孙武的竹简兵书放在几案上，逐简翻阅。每看一简，吴王便情不自禁地叫好。他越看越爱看，越看越有兴致。从《始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军形篇》、《兵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就地篇》、《火攻篇》，一直看到《用间篇》，一字不漏，看到一些警句时，还击节赞叹。吴王看了兵法之后，感到非常满意，便急不可待地要见其本人。伍子胥奏道：“孙武此人不轻易进仕，非寻常可比，必须以礼聘请，方肯来见。”吴王答应，命取黄金十镒、白璧一双，使伍子胥驾车前往，接孙武来一见。

伍子胥乘车来到孙武住处，见面之后，恭恭敬敬地作了长揖，带着亲切的微笑问候他的起居生活，然后取出礼物送给孙武。见孙武高兴的样子，伍子胥又转达了吴王准备聘请他为将军的意思，激励他说：“先生饱学，满腹韬略，弃之乡野，岂不太可惜了吗？”

孙武淡然一笑：“我研究兵法只是一种爱好，并非想借此荣登官场，享受荣华富贵。而且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一个拙于辞令的人，怎能担当大王的重任呢？”他委婉地拒绝了伍子胥的好意。

不料伍子胥完全掌握了他的心态，并不想强求，以更温和的口气说：“先生的清廉我向来钦敬，你不愿出仕为官也在我意料之中。不过吴王思贤若渴，一心礼聘先生，如果我将先生的话转达吴王，他也未必相信，反而认为我办事不力。还是先生辛苦一趟，如果你要辞谢，请当大王之面禀告。希望先生体谅我的苦衷。”

孙武不好再说什么，遂和伍子胥一齐前往吴都。

一日清晨，孙武正在客馆等候召见，没料到吴王亲自登门拜访。

见面以后，吴王赞赏地说：“先生的兵法，寡人已经逐篇拜读，实是耳目一新，受益匪浅。”

孙武谦谢道：“草野之民，学疏才浅。承蒙大王错爱，实不敢当。”

吴王说：“先生不必过谦，你的兵法确是前所未见，博大精深，但不知实行起来如何，可否为孤王小规模地演练一番，让我见识见识？”

“可以。”孙武回答。

“先生打算用什么样的人去演练？”吴王问。

“随君王的意愿，用什么样的人都可以。不管是高贵的还是低贱的，也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都行。”孙武自信地回答。

吴王想给孙武出个难题，便问道：“用宫女可以吗？”

“可以。”孙武坚定地回答。

吴王大笑道：“先生是在和寡人开玩笑吧？天下岂有妇人女子，可使其操戈习战的？笑话，笑话！”

孙武激动起来，站起来斩钉截铁地说道：“大王如果信得过臣，请将后宫的宫女交给臣，如果不能训练成军队，臣愿受欺君之罪！”

吴王即将后宫美女一百八十人交与孙武，把王宫变成了训练场，自己和群臣饶有兴致地坐在望云台上观看。

孙武征得吴王同意后，将吴王的两

个宠姬左姬和右姬充作队长，然后要求说："军旅之事，必须号令严明，赏罚得当。虽然是训练，也是应该有的。请立一人为执法官，二人为军吏，负责传达命令；二人负责击鼓；力士数人，充作牙将，拿上各种兵器，列于坛上，以示军威！"吴王传令立即在王宫卫队中选用。孙武更换戎装，头戴兜鍪，将宫女分为两队，右姬统领右队，左姬统领左队，全部换上戎装，右手操剑，左手握盾，倒也十分整齐。

准备完毕，孙武宣布命令："一不许混乱队伍，二不许笑语喧哗，三不许故意违反军令。"然后亲自在场地画好绳墨，布成阵势。命令传令官授予二队长每人一面黄旗，执之为队伍前导，众宫女跟随队长之后，五人为一伍，十人为一总，步伐要整齐，距离要适当。听从军鼓来决定进退，左转右转，寸步不乱。孙武把命令讲完后，问众宫女："听明白没有？"众宫女嘻嘻哈哈，参差不齐地回答："明白了。"

紧跟着，孙武下令说："听到第一遍鼓时，两队要一起前进；听到第二遍鼓时，左队要右转，右队要左转；听到第三遍鼓时，所有将士都要挺剑持盾做出争战之势；听到锣声，左队和右队即回复原地。"宫女们觉得新鲜而又好玩，皆掩口嬉笑。

鼓吏禀报："鸣鼓一通。"宫女或起或坐，参差不齐。

孙武站起来严肃地说："约束不明，贯彻得不力，这是将领之过，是我的不对。"遂命令军吏再一次宣布军法、军令，强调说，如果再有不听从命令的，就要斩首示众。

鼓吏再次击鼓。

宫女们倒是都站起来了，但东倒西歪，嬉笑如故。

孙武亲自拿起鼓槌，再次重申军法和军令，并用力击鼓。

左姬、右姬和宫女们看见孙武那副认真的样子，觉得甚是好玩，倚仗吴王对自己的宠爱，更加大笑不止，甚而索性趴在地上不动。

孙武见此情景，心想，如果再不来真的，眼下的局面将难收拾，我也将贻笑天下。于是两目圆张，大怒道："执法官安在？"

执法官立刻上前来，跪下听候命令。

孙武厉声说道："约束不明，将之过也，既已再三约束，士兵不听从命令，那就是士兵的罪过了。军法上是怎样规定的？"

"当斩！"执法官回答说。

孙武说："士兵难以尽诛，可将两位队长斩首示众。"

执法官见孙武发怒之状，不敢违令，便将左、右两姬绑上，准备行刑。两位宠姬见孙武要杀她们，刹时间魂飞天外，号啕大哭，众美女全都大惊失色，惶恐不安。

哭声惊动了吴王阖闾，他见孙武真地要斩自己的两位宠妃，忙派人疾驰校场，命令孙武道："寡人已经知道将军用兵的能力了，但左、右两姬甚合寡人之意，如果二姬有所不测，寡人将食不甘味，请将军赦之！"

孙武坚定地回答说："军中无戏言。臣已授命为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果我徇私而释放有罪者，何以服众？"命令左右："速斩二姬！"斩后将二姬之首示众。

孙武另选两位宫女担任队长，继续

鸣鼓操练。宫女们打起精神，再不像刚才那样嘻嘻哈哈，嬉闹无常。全场肃穆异常，一鼓起立，二鼓转侧，三鼓合战，鸣金收兵。左右进退，回旋往来，皆合规矩，毫发不差，自始至终，井然有序，寂然无声。

孙武派遣一位军吏，向望云台上的吴王报告说："训练已经完毕，请大王亲临检阅，这群女兵可以听命于大王，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由于宠妃被杀，吴王的心中甚是不快，但又不便发作，只好强忍怨气，对军吏说："你去告诉孙武，他很辛苦，回去休息吧，我也不想去检阅了。"

坐在一旁的伍子胥连忙躬身说道："臣曾听说过，军中最重要的是军律，军律不严明，兵法无法执行。戏而起兵，没有不失败的。希望大王前去检阅，成大业的人不能偏执于儿女私情，请大王明察。"

吴王听了伍子胥一番诤谏后，顿然醒悟，于是率领群臣前去检阅。宫女们娇艳的面庞，此时却变得十分严肃，君王驾临，仍然目不斜视，全神贯注地听着孙武的号令，动作协调一致，丝毫不苟，真地变成了一群军纪严明、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的勇士了。

检阅完毕后，吴王带着孙武及伍子胥来到王宫，连声夸赞道："孙先生，今天看到您优异的表现，真是钦佩之至，不愧为难得的将才啊！"

孙武先是向吴王谢罪，接着便申述杀姬的理由。他说："令行禁止，赏罚分明，这是兵家最基本之法，为将治军之通则。用众以威，责吏以严，只有三军遵纪守法，听人号令，才能克敌制胜。"听了孙武的一番解释，吴王怨气消散，便丢掉杀姬之恨，拜孙武为将军。在孙武的严格教导下，吴军很快便成为一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部队。

在伍子胥、孙武的精心治理下，吴国的内政和军事都大有起色。吴王极为倚重两人，把他们视为自己的左右臂、股肱之臣，经常在一起谋划经国治军的大计，言论古来帝王治国平天下的经验教训，分析当时各国政事的利弊与得失。

吴王挺喜欢军事，对于如何治军，很有兴趣。他从《孙子兵法》上看到治军有道，便想做深入的探讨。

有一天，吴王同孙武讲论起治军之道，孙武说："远古的时候，黄帝坐镇中央，四方首领为恶肆虐。黄帝先是与民休息，广积粮谷，赦免罪犯，取得了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优势之后，才南伐赤帝，东伐青帝，北伐黑帝，西伐白帝，四战四胜，天下平定。后来，商汤王（商朝开国君王）伐灭夏桀（夏朝末代君王，荒淫残暴），据有九州；周武王铲除商纣，四海归一。这一帝二王，都是因为据有天时、地利，顺应民心，才无往而不胜的。"

又有一天，吴王同孙武议论起晋国的政事。吴王问道："晋国的大权掌握在范氏、中行氏、智氏和韩、赵、魏六家世卿手中，他们各自掌管晋国的一块地方，相互争权夺利。依将军看来，长此下去，六卿之中谁先灭亡，哪个家庭能够强大起来？"

孙武思考了一会儿，说道："依臣浅见，六卿之中，范氏、中行氏两家会最先败亡。"

"将军根据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吴王问。

"臣下是根据他们亩制的大小、收

取租赋的多少以及士兵的寡众、官吏的贪廉做出判断的。以范氏、中行氏来说，他们以一百六十平方步为一亩。六卿之中，这两家的田制最小，收取的租税最重，高达五分抽一。公家赋敛无度，人民累死沟壑，官吏众多而又骄奢，军队庞大而屡屡兴兵。长此下去，必然众叛亲离，土崩瓦解！”孙武回答。

吴王见孙武的分析切中两家的要害，很有道理，就接着问道：“范氏、中行氏败亡之后，又该轮到哪家呢？”

“根据同样的道理推论，范氏、中行氏灭亡之后，就轮到智氏了。智氏家庭中的亩制，只比范氏、中行氏的亩制稍大一点，以一百八十平方步为一亩，租税却同样苛重，也是五分抽一。智氏与范氏、中行氏的病根几乎完全一样：亩小，税重，公家富有，人民穷困，吏众兵多，主骄臣奢，又好大喜功，结果只能是重蹈范氏、中行氏的覆辙。”孙武回答。

吴王继续追问：“智氏家庭灭亡之后，又该轮到谁了呢？”

“那就该轮到韩、魏两家了。韩、魏两家以二百平方步为一亩，税率还是五分抽一。他们两家仍是亩小，税重，公家聚敛，人民贫苦，吏多兵众，急功好战。只是因为其亩制稍大，人民负担相对较轻，所以能多残喘几天，亡在三家之后。”孙武回答。

孙武不等吴王再问，接着说：“至于赵氏家族的情况，和上述五家不大一样。六卿之中，赵氏的亩制最大，以二百四十平方步为一亩。不仅如此，赵氏收取的租赋向来最轻。亩大，税轻，公家取民有度，吏兵寡少，在上者不至过分奢侈，在下者尚可温饱，苛政丧民，宽政得人。赵氏必然兴旺发达，晋国的政权最终要落到赵氏手中。”

孙武论述晋国六卿兴亡的一番话，就像是给吴王上了一堂治国安民的课。吴王听了之后，深受启发，高兴地说道：“将军论说得很好，寡人明白了。君王治国的正道，就是要爱惜民力，不失民心。”

又过不久，吴王认为伐楚的时机已经成熟，召集群臣商讨伐楚大计。伍子胥欣喜不已，盛赞吴军为精锐之师，士气如虹，定能扫荡荆楚，称雄中原。群臣亦都激奋不已，认为定能大获全胜，马到成功。吴王见孙武沉默不语，便征询他的意见。

孙武站起来说道：“伍卿和诸位所谈固然不错，吴国现在兵强马壮，斗志高昂。但战争必须知己知彼，方有胜利的把握。以我看，楚国诛杀了奸臣费无忌，深得民心，愤怨之情已经消失，附庸之国尚未离心离德，国势也未衰微到不堪一击的地步。再说，”他看了伍子胥以及最近由楚逃到吴国的伯嚭一眼，顿了一下，接着说道，“伍卿及伯卿皆为楚之亡命之客，楚、吴两国难免有人会认为这是出自两颗报宿怨之心，这样只会激起楚人仇恨，其斗志也会更加旺盛，吴兵也未必肯于卖命，这对我们是十分不利的。兵乃凶事，不可妄动干戈。我认为，必须在交战前就有胜利的把握。不打无准备的仗，不打无把握的仗。”

孙武侃侃而谈，对敌我双方实事求是的分析，入木三分，透彻明了，吴王和群臣听了无不信服，最后他说：“目前我们应该做的，一是加强我国的国势，训练好士卒；二是离间楚与附庸国之关系，使其归附于我，为我所用；三是想

办法使楚国上层发生内乱，特别是对骄横的令尹囊瓦，应尽力纵其气焰，令其内乱，待其后院起火，我们再趁势击之，可一举成功。”

吴王及群臣听了孙武一番入情入理的分析，无不为之折服。于是便按孙武的意见，对内励精图治、富国强兵，对外积极活动、离间楚国上层以及楚与其附庸国之间的关系，为下一步灭楚创造条件。

吴王是个有见识、有雄心的君王，又有伍子胥、孙武两员股肱之臣，真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不上几年功夫，吴国便由一个贫弱的小邦，一变成为府库充实、兵强马壮的国家。吴王凭借不断增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开始同强楚争霸东南。

阖闾即位时，领兵在外的公子盖馀和公子烛庸，分别逃到徐国（在今安徽泗县）和钟吾国（在今江苏宿迁东北）避难去了。公元前五一二年（吴王阖闾三年）夏，吴国派出使臣，责令徐国和钟吾国交出二公子。二国依仗有强大的楚国撑腰，拒不从命，私自放走了二公子，让他们去投奔楚国。楚国十分得意，立即派出大员隆重迎接二公子，楚昭王下令，请二公子在养地（今河南沈丘县）暂住。接着，又命令莠尹然、左司马沈尹戌重修养城，把养城东北边的城父、东南边的胡田两块地方封给二公子，企图利用二公子危害吴国。

徐国和钟吾国的胆大妄为，楚国的挑衅行动，大大激怒了吴国君臣，给吴国出兵提供了口实。这年冬天，吴王派孙武、伍子胥兴师伐讨。钟吾国国小民贫，不堪一击，很快灭亡。吴王即以得胜之师，回兵伐徐。徐国君臣一面固守城池，一面火速派人向楚国告急。楚国当即派沈尹戌率兵救徐。孙武主张兵贵神速，他见强攻一时难以取胜，怕旷日持久，楚兵来援，于己不利，便下令士卒日夜赶修堤防，堵截山水，灌淹徐国。楚国救兵还未到，徐国城池已被大水冲泡，徐国军队不战而溃，国君章禹领着夫人和近臣向吴军投降。

孙武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连灭二国。吴王得意忘形，想趁势移兵伐楚，扩大战果。孙武认为不妥，进谏说："楚军是天下的一支劲旅，非徐国和钟吾国可比。我军已连灭两国，人马疲劳，军资消耗巨大，不如暂且收兵，养精蓄锐，再等良机。”吴王听从了孙武的劝告，下令班师。

大军回国之后，吴王向伍子胥征求伐楚的方略，伍子胥献计说："楚国政出多门，意见分歧，莫衷一是，谁也不愿承担责任。假如把我军分成三支，轮番去骚扰它，彼出我归，彼归我出，楚军必然疲于奔命。待楚军疲惫之后，我们通过外交、间谍等途径影响他们的决策，造成他们的失误，然后再大举伐楚，就一定能成功。”吴王采纳了伍子胥"疲楚误楚”的计谋，并责成伍子胥、孙武去具体实行。

吴王阖闾四年（前五一一年）秋，吴军用一支人马围攻楚国六（今安徽六安县北）、潜（今安徽霍山县南）二城。楚国闻惊，马上派沈尹戌率大军救援。伍子胥、孙武估计楚国救兵快赶到了，便主动撤兵。楚军扑了空，白跑一趟，将潜城人迁到南岗（今安徽霍山县北）以后，只好回军。

楚军人未解甲，马未下鞍，吴军的第二支人马又包围了弦城（在今河南息

县南)。楚昭王大怒，命令左司马戌、右司马稽两员大将领兵出征。楚军昼夜兼程奔赴前线，才赶到豫章地区，离弦城还有一段路程，吴军就已主动撤离，楚军再一次扑空，士兵怨声载道。

吴军两次袭扰楚国，都曾请求越国助战，越国一向与楚国交好，根本不予理会。吴王打算伐越国，又担心一支人马兵力单薄无法取胜。正在吴王犹豫不决的时候，孙武对吴王说："兵在精而不在多。依臣愚见，一支人马就足够了。越军虽众，我们可以用计谋使之分散，他们兵力再多也无济于事。"在孙武的策划下，公元前五一〇年（吴王阖闾五年）夏，吴王又取得伐越的胜利。

公元前五〇八年（吴王阖闾七年）夏，桐国（在今安徽桐城县北）背叛了楚国。桐国的北面，原来有个小国叫舒鸠（在今安徽舒城县），很早以前就被楚国吞灭了，因此，舒鸠人对楚一直怀恨在心。于是，吴国派出间谍，唆使舒鸠人说："如果你们想办法诓骗楚军来攻打我国，我军便佯装惧怕楚军，假意代楚伐桐，使楚国对我不存戒心，这样就可以寻机消灭它。"

舒鸠人为了报复楚国，便听从了吴国的误楚之计。他们编造了一套假情报，在蒙骗楚国。楚国军臣利令智昏，竟然听信了舒鸠人的谎言，在这年秋天，派令尹（楚国的最高官职，掌握军政大权）囊瓦（字子常）率大军伐吴。囊瓦得报吴军战船摆满桐国以南的江面，便误以为吴军胆虚，想用伐桐来讨好自己，于是把大军屯驻在豫章地区，静观事态的变化。这时吴军却在巢城（在今安徽淮南市南）附近暗中集结，等待时机。楚军从秋天一直驻扎到冬天，时间一长，士气便日益低落，防备也松懈下来。孙武抓住时机，指挥吴军发起突然袭击，在豫章地区大败楚军。吴军在胜利返回的路上，又顺手牵羊出其不意地攻克了巢城，楚国守卫巢城的大夫公子芊胜也乖乖地做了俘虏。

班师回吴后，吴王阖闾说："这次虽然挫败楚军，但未拿下楚都，功劳微不足道。"

伍子胥说道："这次虽未大败楚军，但臣等做梦都想拿下楚都。只是楚乃天下劲旅，不可轻敌。令尹囊瓦虽不得民心，但其他大臣尚很贤良，尚未引起诸侯的痛恶。听说囊瓦贪得无厌，日久必招致众叛亲离，诸侯反目，届时再趁机西进，楚都可下。"遂使孙武在长江下游演练水军，同时派人终日打探楚军消息。

楚昭王即位以后，楚国江河日下。内部权奸当道，忠良被害。外则兵祸连年，东困于吴。楚的附庸时有叛离，各国诸侯也纷纷打楚的主意。

公元前五〇六年（吴王阖闾九年）夏，晋国支持蔡国灭掉楚的附庸沈国（在今河南汝南东南）。这年秋天，楚国发兵围攻蔡国，为沈国报仇。

蔡国同吴国交好，吴王打算借此机会大举伐楚，便去征询伍子胥、孙武的意见。

吴王问道："当年寡人主张伐楚，二位认为时机尚不成熟。经过这五六年的准备，现在出兵，两位认为怎样?"

伍子胥、孙武回答道："楚将囊瓦贪而无能，得罪了不少诸侯，唐、蔡二君对他恨之入骨，君王如果想大举攻楚，要得到唐、蔡两国的帮忙才行。"

吴王赞同他们的意见，便派伍子胥

去联合唐、蔡。唐成公、蔡昭侯慨然应允，一致表示要鼎力相助。原来唐、蔡二国都是楚的属国，岁岁朝贡，按时觐见。有一年，蔡昭侯带着一双晶莹的玉珮和两件华贵的皮袄去朝楚。蔡昭侯将一件皮袄和一块玉珮奉献给楚昭王；令尹子常见物眼开，向蔡昭侯索要剩下的皮袄和玉珮。蔡昭侯对子常的贪婪非常厌恶，不肯答应，结果被软禁起来。不久，唐成公骑了两匹名贵的宝马，也去朝楚。子常又厚着脸皮向唐成公索要名马，偏偏唐成公也是个倔性子，不吸取蔡昭侯的教训，硬是不给，结果也被囚禁起来。胳膊终究拗不过大腿。三年后，还是两君服软，交出了名马、宝物，才被释放。归国途中，蔡昭侯指着淮河发誓说："寡人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蔡侯归国之后，曾经联营晋、宋、齐、鲁、卫、陈等国，以晋国为首，共同伐楚。期间因大雨连绵，多日不停，晋国首先班师归国。晋国一走，其他国家亦无心恋战，也纷纷归国，伐楚计划中途流产。蔡侯失望之际，想到吴国，遂约会唐国，共同投靠吴国，希冀三国共同破楚，以雪昔日之耻。

这一年冬天，吴王阖闾亲自出马，拜孙武为将军，伍子胥、伯嚭为副将，胞弟夫概为先锋，倾全国兵力，并联合唐、蔡两国，总计数百辆战车，三万多兵马，数万随军民夫，浩浩荡荡出师伐楚。

孙武采取"攻其所必救"的战略方针，大军北上。溯淮河西进，有意给楚军造成吴军救蔡的假象。吴军越过了蔡国，孙武传令："军士登陆，徒步前进，将战船尽留于淮水弯道。"伍子胥问其故，孙武道："兵贵神速，战船逆水而行，速度太慢。这样会给楚军充分的时间，让其得到准备，如此则楚不可破矣!"伍子胥深以为然。于是吴军舍舟登陆，人衔枚，马摘铃，昼夜兼程，向楚国东北边境急速前进。

楚国得知吴国大军来犯，马上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议选将御敌。有的主张任命公子结为将，有的认为令尹子常合适，双方争议未决，没料到，这一绝密军情被吴国的间谍获知，吴军大营立即采取对策。伍子胥在楚多年，深知二人的情况，于是放出风声说："如果让公子结为将，我们就等着取他的人头；让令尹子常率兵，我们只好退避三舍。"楚国得知后，果然上当，拜贪婪无能的令尹子常为将，而不用有勇有谋的公子结。

子常统辖沈尹戍、部将史皇、武城黑等战将，指挥二十万大军星夜赶赴前线。楚军刚刚在汉水南岸立稳阵脚，哨探即来报告说，吴军已经出现在汉水以北。

孙武见楚军已经作了应战部署，不敢贸然渡水强攻，便略施小计，调动楚军。他故意卖个破绽，下令全军在豫章地区安营扎寨，休整待命。

楚将子常原来断定：吴军千里远征，军资接济十分困难，最利速战速决，最忌旷日持久，没料到，吴军却按兵不动，跟自己隔河相持。子常一时摸不清吴军的作战意图，不知吴军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只得命令部队暂时扎营，处处设防、严加戒备。

正在子常狐疑之际，左司马沈尹戍前来献策说："兵法上说，千里馈粮，士有饥色。吴军远征，利在速战。现在孙武按兵不动，正是犯了兵家大忌。孙

武这一失策，乃是上天保佑楚国。将军在此暂拖住吴军，使他们不敢冒险渡河。末将率领本部兵马，绕道吴军后方，征调方城以外民众，焚毁他们的战船，然后我即扼守大隧（今鄂豫交界之九里关）、直辕（今鄂豫交界之武胜关）、冥陌（今鄂豫交界之平靖关）三关。等吴军师老兵疲，将军再迎头攻杀，末将从后掩袭，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这样，吴军进退无路，插翅难飞，我军必大获全胜。"

二人计议妥当，左司马沈尹戌立刻分兵行动。孙武暴露自己的"失误"，本来就是为了引诱楚军中计，促使楚军分散兵力，造成军力对比上有利于己的变化，然后再伺机发动进攻。

左司马沈尹戌领兵走后，武城黑进见子常说："吴军战车纯用木料做成，极耐风雨。我军战车外包皮革，用胶固定，遇到阴雨天，胶化筋脱，容易损坏。长久相持，对我军不利，不如速战。"

武城黑刚走，部将史皇又悄悄来到帐中，私下对子常说："国人憎恶将军，爱戴左司马。假使左司马此去毁舟成功，那就等于是他独自战胜吴军。将军定要赶在左司马行动之前发动进攻，不然的话，难免出师无功。"

令尹子常听了两位部将的话，觉得也对，遂不顾与左司马沈尹戌之约定，倚仗自己兵多势众，下令立即强渡汉水，在大小别山一带，连营数十里，摆出一副大战的架式。哪知一着不慎，全盘皆输。

楚军的错误行动，正是孙武求之不得的。吴军早就秣马砺兵，准备厮杀。孙武趁楚军立足未稳，先声夺人，击鼓进兵。吴方前有大军堵截，后有抄袭之师，正是陷于"死地"，所以个个奋勇冲杀，无不以一当十。楚方背水作战，也想死里求生。双方在大小别山地区，大战三次。楚军虽众，然而素质却低，指挥无方；吴军虽少，但却训练有素，指挥得当。故而吴军大胜，楚军大败。主将子常见首战败北，心无斗志，无心再战，想要临阵脱逃，被部将史皇劝止。

楚军且战且退，向西退到柏举（在今湖北麻城以东）。子常在柏举重新集结兵力，企图孤注一掷，同吴军决战。两军相持数日，先锋夫概向吴王请战说："楚将子常不得人心，他的部下皆无斗志。如果我军先发制人，发起进攻，楚军必乱，而后我军再大举掩杀，必能取胜。"吴王阖闾认为，楚军虽败，实力尚存，不同意夫概的意见。

夫概回到自己的营帐，对部下说："君王既然让我担任先锋，我就有权调动本部军士。军事以利为上，我趋利而动，随机应变，见机行事，何待君命!"于是，夫概亲自率领自己的五千劲卒，趁楚军尚未开饭之机，发起突然袭击。楚军早已成了惊弓之鸟，见吴军突然杀来，措手不及，被杀得晕头转向。孙武见夫概突袭得手，当即指挥大军掩杀过去。吴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呐喊着冲进楚营。鼓声震天，人喊马嘶，车毂交错，刀光剑影，血肉横飞，两军在柏举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鏖战。吴军攻势凶猛，楚军抵敌不住，纷纷奔逃。子常见败局已定，也趁乱逃命。楚军失去主帅，军心大乱，结果一败涂地。部将史皇死于乱军之中。

吴军乘胜追击，在柏举西南的清发水（今湖北安陆西的涢水）追上了楚军。溃败的楚军，正在抢舟夺船，争相

渡河逃命。吴王正要下令发起攻击，夫概说："困兽犹斗，何况人呢。楚军见我急攻，知道难免一死，必然死里求生，与我拼死一战，我军未必能胜。如果给那些先渡河的楚军一条生路，没有渡河的楚军便丧失斗志，只顾逃命。我军乘其半渡发起攻击，定会大胜。"吴王听从了夫概的建议，乘楚军半渡之际发起冲锋，在清发水又大败楚军。楚军死伤很多，溺水者不计其数，河水为之变赤。

侥幸过河的楚军，饥不可耐，慌忙埋锅造饭。饭刚造好，吴军又已杀到。楚军只得丢下造好的饭食，忍饥逃命。吴军饱食一顿，继续跟踪追杀。

楚军残部一直向西南败退到雍澨（在今湖北京山县西南）。这时，前有波涛汹涌的汉水，后有吴国大军的追击，楚军饥肠辘辘，疲惫不堪，眼看就要全军覆没，成为吴军的俘虏。正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左司马沈尹戌领兵赶到，见楚军败得如此凄惨，便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打起精神，奋力击退了吴军的先头部队，救出了大批的人马和车辆。

原来，左司马沈尹戌领兵潜行到息城（在今河南息县西南）时，忽然得报子常战败。他不敢怠慢，立刻回师增援，一路上马不停蹄，昼夜兼程，正好赶到雍澨救急。他杀退吴军先头部队后，又赶忙收集子常残部，准备迎战吴军主力。等孙武大军赶到后，双方在雍澨又大战三次。楚军终因军心涣散，士无斗志，人困马乏，又被吴军大败。左司马成见大势已去，无心再生，乃自杀身亡。

至此，楚军全线彻底崩溃，兵败如山倒，溃兵如潮般涌向郢都（今湖北江陵北）。汉水天堑失守，郢都亦无险可守，完全暴露在吴军面前。

孙武指挥吴军不给楚军一点喘息的机会，迅速抢渡汉水，直捣郢都。郢都的左右各有一个属城，即麦城和纪南城，三城互为联络，成犄角之势。孙武率兵攻打纪南城。

孙武引兵过了虎牙山，转入当阳坂。这时孙武望见漳河之水滔滔而过，水势浩大。纪南城地势低下，距离纪南城不远的郢都地势亦低下。孙武看在眼里，心生一计，命令吴兵在高处驻扎，然后准备畚箕等工具，限一夜之间，掘开深壕一道，直逼纪南城。天明时深壕已经掘好了，孙武下令凿开漳江河堤，江水进入壕沟，浩浩荡荡，泻到纪南城中。守城将领还以为江水暴涨，遂命城中百姓向郢都逃命。不料江水浩大，连郢都城下都是一片汪洋。

孙武命人在山上砍竹造筏，吴军乘筏，声势浩大地杀到了郢都城下。

郢都人心惶惶，十分恐惧，各自逃生。楚昭王知郢都难守，只带爱妹乘舟从西门逃走，向西北方向仓皇逃去。孙武派人堵住漳江决口，又使人掘开水坝，放水归江，重兵把守郢都四郊。伍子胥这时已经攻下麦城前来报捷。吴将簇拥着阖闾进入郢都。

在这场吴楚大战中，孙武指挥吴国大军，在大小别山地区初战得势，在柏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清发水大败楚军残部，在雍澨消灭了左司马沈尹戌的回援部队，以三万精兵，击败楚军二十万大军，五战克郢。经此一战，吴国声威大振，楚国受到了立国以来最沉重的打击。后来秦国出兵，帮助楚国收复了郢都。楚国君臣惧怕吴军再来，便将国都迁到都城（在今湖北宜城县东南）。

阖闾大会群臣，论破楚之功，首推

孙武，并要加官晋爵，光耀门第。然而孙武却坚辞不就，并且提出了辞呈："臣本一介平庸之士，承蒙大王不弃，一定要臣出仕，在无法推辞的情况下，只好勉强从命。十几年来，臣竭尽绵薄为大王效力，如今大王的霸业已成，称雄于世。各国诸侯，无不慑服，这都是大王无与伦比的威德所致，臣亦与有荣焉。无奈臣体弱多病，年事已高，处理政事，每有心劳力拙之感，为此日夜惶恐，惴惴不安，恳求大王准臣辞官还乡，以终老天年。"

阖闾非常惊讶，马上派伍子胥亲往孙府，劝他打消辞意。孙武不改初衷，说："您不知道，当初出仕并非我的本意，完全是大王恩宠和您的友情所致。不知不觉间已经做了十多年官，有这么长的时间让我研究、实习兵法的机会，我已经很满足了。这是我的兴趣所在，不能算作什么功劳。如今，我的健康和能力已经一天不如一天，我恳托您，替我在大王面前说明原委，成全我的宿愿，我将感激不尽。"

孙武意志坚决，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伍子胥无奈，只得如实向阖闾汇报。阖闾也不好再勉强，同意了他的请求，为了酬谢他在奠定吴国基础和伐楚争霸大业中所建立的殊勋，把邻近越国的一个叫富春的地方赠送给他，作为他世居的领地。

孙武终于夙愿得偿，归隐田园。对于兵法的研究渐渐地淡下来了，大部分时间用来务农和处理家务。当年出仕的时候，他只有几根白发，为官十几年，虽然也只有五十多岁，却已满头银丝了。他对世俗的功名利禄之所以这么冷淡，是因为他对官场生涯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尔虞我诈、阿谀逢迎、忌妒和憎恨、阴谋和权变……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稍有不慎就可能家破人亡，实在是太险恶了。特别是阖闾登基为王和伐楚胜利后那种残酷、骄纵、淫奢的做法，使他不寒而栗。激流勇退是惟一的出路，否则前景不可预料。

孙武的妻子死去后，孙武听说越王允常去世，他儿子勾践即王位，阖闾趁越国丧的时机，准备发兵伐越。孙武皱起了眉头，喃喃地自言自语："乘人之危乃不仁之至，上天绝不会助佑的，子胥为什么不谏诤呢?"他真想去找伍子胥，让他说服阖闾息兵，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然而又想一想，自己已经退出政界，还是不要再去参与了。

吴国终于召集了数万大军，向南开拔，勾践亲自带兵迎敌，在醉李双方交锋，展开了一场大战。阖闾被越国大将灵姑浮砍断脚趾，不久气绝身亡。因太子波已死，阖闾死前把王位传给了夫差。夫差是个轻浮、傲慢而薄情的人，孙武为子胥的命运担心忧虑。

三年后，伍子胥郑重地专程到富春来拜会孙武。寒暄过后，子胥说出了来意。夫差俟大孝三年期满，准备大举伐越，以报醉李之仇。夫差和伍子胥等人考虑再三，拟请孙武再次出山，借他的智力和才华击败越国。

"孙先生，"子胥真诚地说："遥想当年，我们一同辅弼前王，把吴国建设到了今天这样的成就，如果毁于一旦，不但百姓涂炭，您就忍心吗? 大王夫差及其宠臣一心急于报仇雪恨，却又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作战计划，一旦失利，后果不堪设想啊!"

孙武感叹于子胥这样一个聪明人，

却又终日斤斤计较名利权势之争，反而把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搁在一旁，于是委婉地说："我是个过时的人物了，好比四季所穿的衣服，春有春装，夏有夏装，如果夏天却穿皮裘，不是太可笑了吗？我只希望把世事忘得一干二净，也希望世人把我忘得一干二净。聪明的人不但要合乎时宜，还要尽量把个人和世界接触的范围缩小。"孙武所说的是真心话，同时也在暗示子胥，要他隐退林泉，颐养天年。然而子胥一门心思要动员孙武出山，并不理会他的这些话，只是一个劲劝说他为国效力。

孙武已经看出子胥态度的坚决了，硬顶着似乎于公于私都不太好，于是建议说："再度出仕是绝不可能的了。不过，既然您专程来到富春，我就贡献一点伐越的战策吧，好吗？"

子胥无奈，只好同意。

孙武想了想，慢慢地说："夫差为了征越而锐意练兵，越王勾践肯定会知道的。勾践年少气盛，又在三年前击败了吴军，一定心骄气傲，不以为意，不过越国的大夫文种、将军范蠡却都是智慧超群的人物，他们又一定会阻止勾践轻举妄动而以固守为其策略。问题的要害是要千方百计地激怒勾践，使文种、范蠡的约束失败。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达到这一目的。"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我们可以派出一支轻骑兵，人数不要很多，五六千名即可，先从太湖渡船南下，在越的西北方登岸，不断地向越军挑衅，打打走走，灵活机动，意在惹恼勾践，即使文种、范蠡谏止，他也会出击的。只要勾践离开越都会稽，我军主力则由东直驱南面，轻取会稽。不管勾践是否回师往救越都，我军那支轻骑队伍都要不断地扰乱他们，当双方主力接触的时候，骑兵队可在敌人后方鼓噪呐喊，使他们心惊胆战，并不断地突击，这样，越军首尾受敌，加上吴军本来就比较强大，胜利是有把握的。注意不要堵住越兵的退路，不要逼他们孤注一掷，作困兽之斗，而是让他大败而逃，然后穷追不舍，务必全歼敌军，以绝后患。"

孙武喝了一口茶，最后强调说："这次战役有三个要点：其一为首先以骑兵队为诱饵，其二为不塞住敌军退路，其三为穷追不舍。我的这些意见，只是纸上谈兵，仅供吴王和您参考吧。"

后来的战争进程，果如孙武所料，吴军取得大胜，越王勾践夫妇被作为人质带到吴国为奴。只是由于伯嚭受越人贿赂，没有对越"穷追不舍"，并说服夫差保留越国，以致十年后越又灭吴并称霸于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夫差获得大胜，凯旋回国后，派伍子胥前往富春酬谢孙武，然而孙武已不知去向，空留一座缥缈的山庄，默默无言地矗立在青山绿水之间。

对于孙武的一生，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中曾经写过这样的话："吴王阖闾深知孙武能用兵，终于拜他为大将。在孙武的指挥下，吴军西向击败强楚，五战克郢，北向威震齐、晋两大中原强国，使吴国显名列国诸侯。这一切都是同孙武的功劳分不开的！""吴国任用孙武为将，申明军法，严格赏罚，军力强大，终于称霸诸侯。"

孙武之所以享有盛名，主要还不是因为他西破强楚、北威齐晋的军功，而是由于他留下了一部我国现存最早的兵书《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是一部内

容完备、结构严谨的古代军事名著。它的产生，为我国军事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孙武把与战争有关的军事问题，分作十三篇加以论述，全书有完整的体系和新颖独特的论述形式。各篇既能独立成章，相互之间又有密切的联系，上下承启，前后衔接，浑然一体，所以古人说："其义各主于题篇之名，未尝泛滥而为言也。"

《孙子兵法》虽然包容了军事学的各个方面，但是关于进行和指导战争的论述，则是全书的核心内容，其他各个方面，几乎都是围绕这一内容展开的。

孙武研究军事是从研究战争入手的。《孙子兵法》开宗明义第一篇就指出：战争是"国之大事"，它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人民的生死，因此必须慎重对待，不可轻率从事，"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这就明确表达了孙武的"慎战"思想。

孙武的"慎战"思想，反映在战争指导上则表现为"全胜"的理论，这是《孙子兵法》的精华所在。在"慎战"思想的支配下，孙武要求当权者不可轻易地进行战争，要进行战争就必须要有胜利的把握；只有一般的胜利把握还不行，必须要有"全胜"的把握才能进行战争。因此，他要求战争指导者尽最大的努力，创造最好的条件，争取以最小的代价、最快的速度，取得最完全的胜利。

《孙子兵法》不但对中国，而且对世界的军事史，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孙子兵法》不仅是我国现存的最古兵书，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论著。它比希腊布罗多德的《希腊波斯战争史》、色诺芬的《希腊远征波斯记》、罗马军事理论家弗龙廷的《谋略例说》，不仅成书的年代要早，学术性更强，而且在内容上更加详备、系统和深刻。所以《孙子兵法》不胫而走，流传到世界许多国家，早在唐朝就传入日本、朝鲜，一六六〇年就有了日译《孙子兵法》；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孙子兵法》西传至欧洲；一七七二年，法国神甫约瑟夫·阿米欧首次将它译成法文，在巴黎刊印出版；一九一〇年，英国汉学家贾尔斯，以《孙子兵法，世界最古的兵书》为名，在伦敦翻译出版。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孙子兵法》译成本国的文字。这些国家的军事理论家们，对《孙子兵法》都赞不绝口，认为它的内容"闳阔深远"、"诡谲奥深"，是"最早、最优秀的著作"；称道孙武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奠定了古代中国军事科学的基础"；亚洲的许多国家，甚至把孙子兵法规定为军官训练的必修课程。

【吴起】

吴起，战国初期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北）人，约生于周考王元年（前四四〇年），死于周安王二十一年（前三八一年）。曾先后在鲁国、魏国、楚国做官，屡立战功，并著有《吴子兵法》一书传世。他具有一心报效国家的品格、百折不挠的意志、身体力行的精神和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是战国初期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深受后人的称赞。在历史上，人们往往把吴起和孙武、孙膑相提并论，并称为"孙吴"。战国末期的《韩非子》一书说，天下谈论兵法的人，家中都藏"孙吴"的兵书。汉代

史学家司马迁作《史记》时，则把他们三人合在一起，专门写了一篇《孙子吴起列传》。宋朝的理学家朱熹，在《四书集注》里把孙膑、吴起并列为古代善于指挥作战的军事家。清朝末年变法维新的著名倡导人之一的梁启超，在《战国载记》一书中称赞吴起是“我国第一流名将”。由此可见，吴起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广泛而深远的。

吴起生活的时代，正是我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转化的时期。当时，秦、齐、楚、魏、赵、韩、燕等诸侯国，都酝酿着变法革新、富国强兵，进而争夺天下的霸权，实现全国的统一。每一个诸侯国都竭力扩张自己的势力，相互间无休止地攻城略地，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出现弱肉强食、七雄争立的局面。

吴起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里，由于时代的影响，他从小就喜欢舞刀击剑，立志要做一番大事业，报效国家。为了谋求政治上的发展，吴起曾经四处奔走，广散钱财，游仕立业。在交游中他极其认真，严格要求自己，做事一丝不苟。有一次他出门遇到一位朋友，约定晚上到他家吃饭，不料朋友因有事晚上没来，吴起竟连晚饭都没吃，直到第二天找来朋友，才一道进餐。还有一次他发现妻子织的丝带过宽，叫她改一改，妻子虽然点头答应了，但因开始时已固定好丝带的经线，无法再改，没有按吴起的要求办，吴起竟因此而遗弃了她。尽管吴起不惜舍财割爱，求名重义，立志要做一番事业，但他所在的卫国，是一个毫无作为、极其弱小的诸侯国，是魏、齐、赵三国争夺的对象，处于强国附庸的地位。它根本不理会吴起的志向和所作所为，使吴起白费了一番苦心，



吴起爱兵如子

结果一事无成，穷困潦倒，并受到乡邻们的奚落。吴起忍无可忍，一气之下杀掉三十多个耻笑自己的人，忍痛辞别年迈的母亲，到邻近的鲁国去游学。临行时他用牙齿咬伤自己的臂膀，向母亲发誓说：如果不成就事业，当上卿、相一类的高官，决不回卫国来。

鲁国是西周初年周公的封地。孔子的故乡，是著名的礼仪之邦。吴起到鲁国后，一开始投在曾申（孔子的学生曾子的孙子）的门下做学生，刻苦地研读儒家经典。有个叫田居的齐国大夫来到鲁国，发现吴起好学上进，才华出众，就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做了妻子。不久，吴起的母亲病故了，吴起想起当初的誓言，就忍痛没有回去奔丧。曾申见吴起如此不孝，大为不满，便和他断绝了师生关系。从此，吴起离开曾申，索性弃文习武，苦读兵书，很快就精通了兵法。三年之后，在鲁穆公的相国公仪休的推荐下，吴起当上了鲁国的大夫。

周威烈王十六年（前四一〇年），强大的齐国出兵攻打弱小的鲁国。在这危急时刻，鲁元公很想任用吴起做将军，相国公仪休也极力赞同。但是，由于吴起的妻子是齐国大夫田居的女儿，鲁穆公对此颇存戒心，怕吴起临战不坚因而

犹豫不决。吴起听说这一情况后，为了表示自己对国家的忠诚不二，亲手杀了自己的妻子。鲁穆公解除了怀疑，立即拜吴起为将军，命他率兵去抵抗齐国的进攻。虽然当时的形势是齐强鲁弱，鲁军不是齐军的对手，但吴起很会用兵，没有同来势凶猛的齐军死打硬拼。为了麻痹齐军，他首先摆出一副软弱怯战的样子，提议愿意同齐国谈判讲和，然后把老弱疲卒放在中军，把精锐部队隐藏在两翼，乘齐军松懈无备之时，突然从两翼发起猛攻。齐军仓猝应战，一触而溃；鲁军大获全胜，解除了齐国对鲁国的威胁。

吴起大破齐兵，显露出他杰出的军事才能。但是，他并未得到重用，反而招致齐国的离间和鲁国大臣们的毁谤。鲁国大臣们有的说，吴起杀妻求将，品质不好；有的说，我们鲁国是个小国，打败了大国，将来会有不测之祸；还有的说，鲁和卫是同姓的兄弟之国，吴起在卫国是杀人的逃犯，我们重用他对不起卫国，等等。因此，鲁穆公很快就解除了吴起的兵权。吴起认识到自己在鲁国不可能有所作为，又听说魏国的国君魏文侯礼贤下士，于是毅然决然地离开鲁国，去投奔魏国。

魏国，在战国初期是七雄中最强的一个。魏文侯任用李悝、西门豹等人，最先实行变法革新，政治、经济、军事力量迅速壮大起来，积极向四周扩张，大力谋求中原地区的霸权。吴起到魏国后，深得魏文侯的赏识，被拜为大将。第二年（前四〇九年），吴起奉魏文侯之命率兵攻打秦国，陆续夺取五座城池，经过两年战斗，占领了全部西河（今陕西东部黄河西岸）地区。周威烈王二十年（前四〇六年），魏军越过赵国，扫灭了中山国，吴起参加了这一战役。接着，吴起率领魏军，与韩、赵联军一起，东伐齐国，打到灵丘（今山东滕县东），取得一次很大的胜利。此后，吴起被魏文侯任命为西河守，即魏国西河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担负着同秦、韩两国作战的任务。魏文侯死后，魏武侯即位，武侯仍然重用吴起，继续任命他镇守西河，一直到公元三八三年，吴起离开魏国时为止。

吴起在魏国一共二十七年，这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时期。他先后领兵和各诸侯国打过大仗七十六次，其中有六十四次是大获全胜，其余的十二次也是胜负未分，从来没有损兵折将打败仗。这期间魏国“辟土四面，拓地千里”，吴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不仅战功赫赫，在镇守西河期间，还曾经把自己的作战经验写成一部兵书，即著名的《吴子兵法》，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军事理论遗产。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吴子兵法》共有四十八篇，可惜后来大部分失传了，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六篇。

吴起在魏国之所以战功卓著，和他严格治军的思想是密切相关的。根据《吴子兵法》、《史记》、《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的记载，吴起的治军思想十分精湛而独具卓识。他认为，兵不在多，“以治为胜”。所谓“治”，就是要通过严格选择和严格训练，建立一支战斗力很强的精锐部队。吴起曾经引经据典地向魏武侯阐述这个思想。他说，从前，齐桓公招募五万勇士，就称霸于诸侯；晋文公集中四万精锐士卒，就实现争霸中原的夙愿；秦穆公选出三万敢于

冲锋陷阵的猛士，就制服了四邻的强国。因此，他建议魏国也必须精选士兵和良将。这一建议得到魏武侯的赞同。于是，吴起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精心挑选士兵，根据其不同情况和特长，分别编队。他把有胆量、身体强、力气大的人单独编为一队，把忠实可靠、乐于为国捐躯效命的人单独编为一队，把善于登高跳远、能急行快跑的人单独编为一队，把犯过错误、丢掉官职而想立功受奖的人单独编为一队，把打过败仗而想报仇雪耻的人单独编为一队，然后分别施行严格的训练。吴起认为，人们在战场上的失败和牺牲，往往是武艺不精、战术不佳造成的，因而强调要先教后战，采取“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的办法，做到人人精通战术，武艺高强。在吴起的苦心经营下，魏国的军队被训练得非常出色：平日居止，一切行为举动都有规矩准则和礼节；战时发动起来，勇猛威严使敌人望而生畏；攻击时锐不可挡；退却时敌不敢追；前进、后撤、左移、右转，都有严明的节制，无不合乎指挥的要求；即使大阵被敌人割断，各部仍能组成小阵作战；即使小阵被敌人冲散，士兵们仍能组成行列进行战斗。因此，魏军的战斗力很强，打起仗来所向克捷，无坚不摧。有一次，吴起率领经过严格训练的五万精兵，打败了秦的五十万大军。所以有人称赞说：如果让吴起率领七万精兵，必将会无敌于天下。

吴起非常重视信赏明罚，要求士兵必须严格执行命令，做到令行禁止。他镇守西河的时候，秦国有一个烽火亭靠近魏国的国境，吴起很想拔掉它，但又不值得征调大军。于是，吴起把一个车辕放在城的北门外，下令说：“谁能把它搬到城的南门外去，就赏给他上等田宅。”开始，没人相信，后来有一个人试探着搬了，吴起果然按照命令赏了他。接着，吴起又把一担豆子放在东门外，下令说：“有谁把它搬到西门去，同样赏给他好田宅。”这回相信的人多了，人们都争着去挑，吴起又按令行赏了。不久，吴起下令说：“明天进攻秦国的烽火亭，谁首先登上烽火亭，不仅赏给他上等田宅，还让他做大夫的官职”。第二天，士兵们都争先恐后地向前冲去，一个早晨就攻克了秦国的烽火亭。还有一次，吴起带兵和秦国打仗，还没等下达命令，就有一个士兵非常迅速地冲过去，砍了两个秦军的脑袋回来。吴起当即下令斩了这个勇敢杀敌的士兵。他严肃地说：“没有我的命令，任意行动非杀不可。”据说，按照吴起制定的军法军纪实行了三年，魏国的士兵一听到秦军进犯的消息，就立即穿戴盔甲，做好准备，只待一声令下，就奋起抗敌，视死如归。

吴起为了带出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还非常重视对士兵的政治教育和做好内部团结。他反对单纯依靠命令和严刑厚赏来管理士兵，主张明耻教战，要求教之以礼，励之以义，做到“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他提出“四和”的重要原则，即“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把协调一致、同仇敌忾、团结对敌作为克敌制胜的先决条件。为了增强内部团结和做好政治工作，吴起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同最低

等级的士兵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睡觉不另设床铺，行军不乘坐车马，见到士兵背的粮食太重，他就分出一些自己背上。有一次，一个士兵身上长了毒疮，吴起用嘴把脓给他吸了出来。这个士兵的母亲听说以后，反倒痛哭流涕起来。许多人不理解这位母亲为什么哭，她解释说："从前，孩子的父亲长了毒疮，就是吴将军给他吸脓，治好不久，他就勇敢地牺牲在战场上了；现在吴将军又给这孩子吸脓，真不知哪一天这孩子又会像他父亲那样拼死在战场上。"吴起关心士兵，和士兵同甘共苦，大得军心，从而激发了将士们的战斗意志和牺牲精神，这正是他带兵打仗经常克敌制胜的重要原因。

在作战指挥上吴起非常重视知彼知己，因敌制胜、掌握战机，坚决果断，并总结了大量具体经验。他说，凡是敌人出现队形混乱、松懈麻痹、疲劳饥饿、人马疾疫、涉水半渡、险道狭路、精神恐惧等情况，都是虚弱和不利的表现，要大胆进攻，急击勿疑。对于不同的敌人，吴起主张灵活用兵，采取不同的谋略：可诈者则诈，可赂者则赂，可困者则困，可离间者则离间，可恐吓者则恐吓，可截击者则截击，可诱前者则诱前，可进攻者则进攻，可水淹者则水淹，可火烧者则火烧，可偷袭者则偷袭。吴起对战机的认识是很深刻的，要求指挥员要善于掌握"气机"，即恰当地掌握士气，在关键时刻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使部队具有压倒敌人的气概；要善于掌握"地机"，即正确地利用地形，使之有利于已，不利于敌；要善于掌握"事机"，即通过使用间谍、采取佯动和巧妙伪装等各种办法迷惑、破坏敌人，夺取主动，陷敌于被动；要善于掌握"刀机"，即充分发挥武器、技术、装备和战术的作用，把人和物结合起来，以便有效地战胜敌人。吴起还特别强调指挥作战要机智、果断，使敌方"如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并指出："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这就是吴起在作战指挥上的一些突出特点，它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对军事和政治的辩证关系以及政治对军事的决定性作用，吴起也有很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他初见魏文侯时，就援引古代的历史教训说："从前，承桑氏（远古时代的部落）的国君只讲文德，废弃武备，结果灭亡了；有扈氏的国君（处于夏禹时代）依仗兵多而好战，结果也灭亡了；英明的国君有鉴于此，就必须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治理好国家。"有一次魏武侯西巡，与吴起共同乘船顺黄河而下。武侯指着雄伟壮丽的河山对吴起说："你看，这高山大河多么险固，真是我们魏国的珍宝啊！"吴起立即回答说："国家的安危盛衰，在于政治的好坏，而不在于山河的险固。上古时南方部落三苗氏，左有洞庭湖，右有鄱阳湖，虽然地势险要，但因不修德政，失去民心，结果被夏禹所灭亡。夏朝的最后一个国君夏桀，左有黄河与济水，右有太华山，南有龙门山，北有羊肠坡，山川都很险固，但因政治腐败，结果被商汤所赶跑。商朝的最后一个国君纣王，左有孟门山，右有太行山，北有恒山，南有黄河，由于残暴无道，结果被周武王战败而自杀。由此可见，国家的安危在

德不在险。假如大王您不修德政，连这同一条船上的人都会成为您的仇敌！”武侯听了深受启发，对吴起大加赞赏。还有一次，魏武侯问他：“要想使军队作战时阵势稳固，防御时牢不可破，进攻时克敌制胜，应该怎么办？”吴起回答说：“如果能使德才好的人处于上位，德才差的人处于下位，军队的阵势就自然稳固了；如果能使人民安居乐业，并同各级政府的官员很亲善，军队的防守自然牢不可破了；如果能使老百姓都赞美自己的国君，讨厌邻国的国君，战争的胜利就是肯定无疑的了。”这就是吴起重视德政、重视民心向背的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是吴起能够取得辉煌业绩的思想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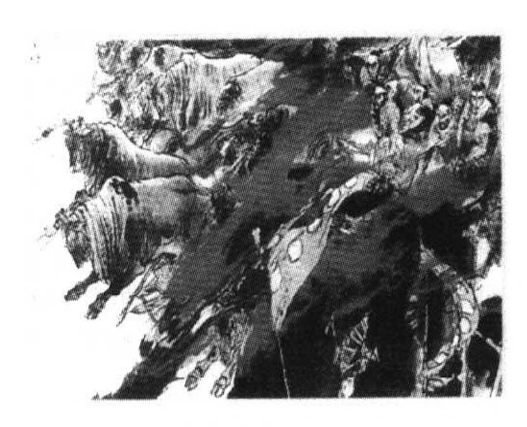
吴起镇守西河二十多年，由于他杰出的才能和显赫的战功，很受魏武侯的器重。后来，魏武侯的女婿公叔接替了相国的职务，他对吴起十分嫉妒，就经常在武侯面前说吴起的坏话，诬蔑吴起对魏国有二心。开始，魏武侯还不太相信，时间一长也就逐渐产生了疑心，于是撤了吴起西河守的职务。在这种情况下，吴起深恐进一步被害，便于周安王十九年（前三八三年）离开魏国，投奔了楚国。他告别西河的时候，眼含热泪，非常悲痛地说：“倘若国君听信谗言，不了解我一片报国的忠心，西河这片土地，不久就会被秦国夺去，魏国也会一点一点地削弱下去。”果真不出吴起所料，自从吴起走后，魏军常常吃败仗，不到二十年，全部西河地区就被秦国占领了。

吴起到楚国以后，受到楚悼王的器重，很快就当上了令尹（相当于相国的官职）。当时，楚国虽然是国土最广大的一个诸侯国，但尚未变法革新，政治腐败，经济贫困，军事上战斗力也较弱。这时吴起已年过花甲，仍然老当益壮，雄心勃勃。他不顾楚国旧贵族的强烈反对，极力推行变法革新、富国强兵的政治路线。在楚悼王的支持下，吴起采取“明法审令”、废除世袭分封、取消贵族特权、奖励耕战之士、严格整顿军队等一系列措施，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就使楚国强盛起来，南面平定百越（当时我国南方各族的总称），北面吞灭陈、蔡（位于今河南东南和安徽西北的两个小诸侯国），并击退魏、赵、韩三国的进犯，西北面打败了秦国的军队，连连获胜，威震天下。

但是，好景不长。周安王二十一年（前三八一年），吴起到楚国才两年多，楚悼王就病死了。悼王一死，楚国的旧贵族立即发动了叛乱，包围王宫，捉拿吴起。吴起在危急之际跑进楚悼王的灵堂，伏在悼王的尸体上，被乱箭射死。终年约六十三岁。杀害他的人也被以兵加王尸的罪过处死。

【田单】

战国时名将。系田齐宗室的疏远族属。生卒年不详。齐湣王时为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市掾。燕将乐毅破齐时，田单与族人避居安平（今山东临淄东北）。安平城破，他又命族人尽断车轴末端，用铁包裹轴头，使之坚而易行，得以免为燕军所虏，东保于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即墨大夫战死，田单被推为将军，守即墨拒燕。燕惠王继位，田单闻乐毅与燕新君有隙，乃纵反间于燕，使燕惠王遣骑劫代乐毅为将。他又



火牛阵

自称得神人相助，设计使燕军尽劓所俘齐卒，掘烧齐人冢墓，以激怒齐人。为麻痹燕军，田单还遣使约降于燕，令即墨富豪献金于燕将以求乞保护。

齐襄王五年（前279），田单大破燕军。他搜集城中千余条牛，饰以绘有五彩龙文的绛色缯衣，缚兵刃于牛角，灌油脂于芦苇而系于牛尾，于夜间点燃，牛因而怒直奔，突燕军。齐壮士五千随后冲杀，大破燕军，杀其将骑劫。田单乘胜挥军尽收失地七十余城，由莒（今山东莒县）迎齐襄王入都临淄。田单因功被任为相，封为安平君，后又益封夜邑（今山东掖县）万户。田单后又事赵，《史记》载他于赵孝成王元年（前265）将赵师攻燕，又攻韩。次年，田单为赵相。

【白起】

（？～前257）战国时秦国名将。又称公孙起。郿（今陕西眉县东）人。因与秦相魏冉相善，秦昭王十三年（前294），受冉举荐，被任为左庶长。次年，白起为左更，破韩、魏联军于伊阙（今河南洛阳东南龙门），斩首二十四万，故迁为国尉。再次年，升为大良造。二十八年，白起攻楚，拔鄢（今湖北宜城东南）等数城。次年，拔楚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秦因此设置南郡，楚被迫东徙都于陈（今河南淮阳），白起因功被封为武安君。三十四年，白起击破赵、魏联军于华阳（今河南郑州南），斩首十五万。四十七年长平之战，白起大破赵军，坑杀赵降卒四十余万。战后，白起主张乘胜进军，攻破赵国，但因秦相范雎妒其大功，终许韩、赵割地求和而罢兵。白起因此与范雎有隙。四十九年，秦发兵围邯郸失利，秦王亲命白起出任围邯郸的主将。白起认为前时未能乘长平之胜围赵，致失战机，此次围邯郸必无功而败，遂托病不行。后秦昭王与范雎罢免白起为士伍，并强令他迁出咸阳。白起行至杜邮（今陕西咸阳东北）受秦王之迫自杀身亡。

【王翦】

秦国名将。频阳东乡（今陕西富平东北）人，曾先后领兵平定赵、燕、蓟等地。王翦用兵多谋善断。秦王政二十



王翦

一年（前226），秦国在攻取楚国前夕，君臣间对用兵方案发生争论。李信认为只需用兵二十万，王翦却坚持非六十万不可。秦王以李信年少壮勇，命他与蒙恬率兵二十万人伐楚。王翦遂借口有病，告老归乡。次年，李信、蒙恬带领的秦军开始连打了几个胜仗，但楚军很快发动反击，大破李信军，杀七都尉。秦王政为扭转局势，亲自驰往频阳，请王翦挂帅出征并且满足他的要求，将全国兵力六十万人都归其指挥。

秦王政二十三年王翦领兵伐楚，楚国悉发国中兵力抗击，王翦坚壁不出，逐日休整部队，待楚军调动之际，举兵出击，结果大破楚军，杀项燕于蕲。岁余，王翦与蒙武虏荆王负刍，遂平定楚国，以其地置为楚郡。二十五年，王翦悉定荆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置会稽郡。王翦子王贲，孙王离也因战功著名于世。

【蒙恬】

（？～公元前210）秦代名将。先世为齐人。祖蒙骜入秦事昭王，庄襄王时先后伐韩、攻赵、败魏，屡立战功。父蒙武与王翦共灭楚。蒙恬早年学法律，曾为狱官，典掌文学。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因家世得为军将，大破齐国，拜为内史。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战国时期经常骚扰燕、赵、秦三国的北方少数族匈奴，仍为北方诸郡的严重威胁。秦始皇遂命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匈奴，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并且因河为塞，临河筑四十四县城，迁谪戍居住。又监修长城、直道。长城西起临洮，东迄辽东，逶迤万余里。直道自九原抵云



蒙恬

阳，全长一千八百里，因难修，未完工。这些措施对防止匈奴的侵扰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蒙恬驻兵上郡十余年，威震匈奴。弟蒙毅也位至上卿，常居宫中参与谋议。在将相大臣中，蒙氏兄弟与秦始皇关系最为亲近；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始皇长子扶苏因谏说坑儒一事，被贬至上郡，监蒙恬军。

秦始皇三十七年巡游会稽，北还至沙丘病死。当时蒙毅受命祈祷山川未返。中车府令赵高与丞相李斯、公子胡亥密谋篡改诏书，立胡亥为太子，遣使者赐公子扶苏、蒙恬死，结果扶苏自杀。蒙恬疑诏书有诈，不肯就范，被囚禁于阳周，蒙毅也被囚禁于代。胡亥本想释放蒙恬，但赵高与蒙毅有私怨，又担心蒙氏兄弟复贵对己不利，遂罗织罪名，加以陷害。秦二世胡亥即帝位后，听信赵高谗言，处死蒙毅，迫使蒙恬服毒自杀。

【项羽】

（公元前233～前202）秦末重要的反秦领袖之一，秦亡后自封西楚霸王。下相（今江苏宿迁西南）人。名籍，字

羽。祖父项燕为战国末年楚名将，为秦将王翦所杀；叔父项梁。秦统一后，项梁杀人，与项羽躲避吴中。当地每逢有大徭役和丧事，项梁经常主持其事，暗中以兵法组织和训练宾客子弟。

项羽力能扛鼎。少时学习书写和剑术，都无所成就，项梁很生气，他却说，“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项梁教他兵法，他略知大意，即不肯深学。但项羽才气过人，秦始皇东游会稽时，他在路旁观看，曾说：“彼可取而代也。”

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领导反秦起义（见陈胜、吴广起义），随即建立张楚政权。原六国贵族闻讯后也纷纷起兵。同年九月，项梁与项羽杀会稽守通，举吴中兵反秦。项梁自立为会稽守，项羽为裨将，部署精兵八千人。陈胜牺牲后，其部将召平矫令拜项梁为楚王上柱国，命其引兵西击秦。秦二世二年三月，项梁即率部渡江，东阳令史陈婴率义军两万来归，渡



项羽

淮后英布、蒲将军又以兵相属，兵力一时达到六七万人，成为当时反秦武装的主力。同年六月，项梁召集起义将领会薛计议，立楚怀王孙心，仍称楚怀王。项梁自号武信君。之后，项梁率义军大破秦军于东阿、定陶。项羽、刘邦（即汉高祖刘邦）也攻占城阳，略地至雍丘，斩秦三川守李由。不久，由于项梁骄傲轻敌，被秦将章邯乘隙袭破。项梁阵亡，项羽、刘邦退保彭城（今江苏徐州）和砀。章邯又渡河北上击赵，与秦将王离、涉间军进围巨鹿。楚怀王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率兵救赵。宋义行至安阳，留四十六日不进，坐观成败。于是项羽以宋义与齐密谋反楚为名，袭杀宋义。怀王即命项羽为上将军，统率全军救赵。项羽派当阳君、蒲将军将兵两万迅速渡过漳河，以解巨鹿之围；随即亲自率全军渡河，破釜沉舟，进击秦军。双方经九次激战，楚兵大破秦军，王离被俘，涉间自杀。当楚军救赵时，诸侯军皆作壁上观。战事结束后，诸侯将领谒见项羽，都膝行而前，莫敢仰视。从此，各路诸侯军都听从项羽指挥。接着，项羽在汙水上又大破秦军，并利用秦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招降章邯。他怕秦降卒不服，在新安城南将降卒二十万全部坑杀。

当项羽率军进入关中时，刘邦已先期进据咸阳。由于楚怀王有约在先，“先入关者王之”，刘邦理应王关中。项羽入关后，依恃手中四十万大军，企图消灭刘邦，独霸天下。因刘邦卑辞言和，双方暂时和解。项羽随即引兵西屠咸阳，诛秦降王子婴，焚烧秦宫室，掳掠货宝和美女东归，秦民大失所望。汉元年（前206），项羽以怀王为义帝，都郴，

又分封诸侯，自立为西楚霸王，据有梁、楚地九郡，都彭城，封刘邦为汉王。不久，田荣、陈余、彭越等相继举兵反楚。刘邦也还定三秦，进逼西楚，于是爆发了历时四年多的楚汉战争。

楚汉战争之初，刘邦乘项羽羁留齐地，于汉二年四月进占彭城。项羽随即回师救援，大败汉军，刘邦退据荥阳。此后，楚汉双方在荥阳、成皋一线长期相持。项羽虽取得一系列战役的胜利，但其政治、军事上的弱点却日益显露。他不都关中而都彭城，丧失了有利的战略地势，无法建立一个巩固的后方，一直处于两线作战的不利处境，进退失据，疲于奔命。项羽分封诸侯，举措失当，不公不平，促使那些在分封中没有得到满足的诸侯王倒向刘邦，使他在政治上日益孤立。此外，项羽虽然作战骁勇，却不善于用人，如韩信、陈平等都弃楚投汉，成为刘邦的重要将领和谋士，甚至对他的重要谋臣范增也不信任，以至在政治上屡屡失策。由于上述原因，使项羽丧失了在战役上取得的一系列战果，而刘邦却得以转败为胜。汉五年十二月，楚军被围困于垓下（今安徽灵璧东南），人少食尽。汉军四面唱起楚歌，项羽与虞姬对饮，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随即，与从者八百余骑突围，至阴陵迷失道路，复至东城，从者仅剩二十八骑。汉将灌婴率五千骑追及，项羽引兵东向，至乌江（今安徽和县境）自刎而死。项羽自刎前，仍称“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而不能认识自己终致失败的原因。汉王刘邦以鲁公礼葬项羽于谷城。

【韩信】

秦始皇嬴政年代，在江苏淮阴县韩家村，有位少年姓韩名信。幼年时家中虽不太富裕，但父亲是个勤劳明理之人，节衣缩食要供韩信读书识字。韩信自幼聪明，他不辜负期望，对所学知识都能一一牢记。他的勤奋好学深得老师的器重。一次，老师对其学生言道：“我一生所教的学生中，惟有韩信日后能成大器，有所作为。”可惜韩信十二岁时，其父因劳成疾，不幸早逝。韩母又百病缠身，家中渐渐一贫如洗。韩信十五岁时母亲病故，他不得已辍学。从此他无依无靠，孤苦伶仃，靠在河边钓鱼谋生。他生性喜爱武功，便向村里一位武师学了点拳脚剑法，师父看他聪明好学，便将自己的佩剑赠送于他，他非常感激，便常常佩戴在身上。

韩信十六岁时，秦皇暴政，民不聊生。又因淮阴天旱无雨，河水下降，水中鱼少。他常因钓不到鱼，换不来银两而饿饭。一日，他头顶烈日在河边钓鱼，由于腹中无食，再加天热，不觉倒在河边，昏了过去。在下游不远处，一位面目清秀的中年妇人带着她十四岁的女儿紫娟在河边为人洗衣，中年妇人是靠洗衣为生，人称漂母，见河边倒着一位少年，急忙和女儿跑到韩信身边。

漂母扶起韩信，看看脸色说道：“想必是饿昏了，不要紧，灌点米粥就会好的。快将他搀扶到我们家中。”漂母与紫娟将韩信搀扶到自己家中。韩信躺在床榻上，漂母一勺一勺地给韩信灌进米粥。韩信渐渐苏醒，睁开双眼。“你姓啥，家住何处，因何饿成这样？”



韩信

漂母问道。韩信惭愧地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和近况。漂母起了怜悯之心，又见韩信英俊年少，质朴淳厚，便说道："既然你无依无靠，如若不嫌弃我这破烂茅屋，粗茶淡饭，就住在我这吧。她叫紫娟，我还有个小女儿叫文娟，你们就当兄妹相称吧！"

韩信见这茅屋虽然简陋，但屋内收拾得非常整洁，又见漂母善良热情，便点了点头说："多谢伯母厚意，信若日后得志，必报母恩。"

从此，韩信就寄食在漂母家中，帮助漂母干些体力活。漂母待韩信如亲儿子一般。

转眼一年过去，在一个隆冬，韩信上山打柴，阴霾的天空飘起了一朵朵小雪花，他打完一担柴禾准备回家，忽然抬头见一老翁鹤发童颜，在一块不大的平地上练习武功，他不由自主放下柴担走到老翁跟前观看，老翁剑术已登峰造极，利剑上下飞舞，雪花竟然飘落不到老翁身上。韩信情不自禁地喝彩："好剑法！"老翁闻声立即收剑，抬头见是一少年后生，便转身要走。韩信慌忙上前跪拜在老翁脚下："请老伯收我为徒！"

老翁上下打量着韩信，见他眉清目秀，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心中已有几分喜欢，沉思片刻问道："你喜爱武功？"韩信见老翁发问，急忙答道："我自幼喜文爱武，但家中贫寒，因此习武造诣不深。今日有幸巧遇高人，请师父收我为徒，不然我就跪到天黑。"老翁微微一笑："啊！你真有诚意，那你习武为了什么？"韩信沉思片刻："为了将来报效国家，除暴政，辅佐明主创建太平！"老翁诧异地望望韩信，心中思量："他年龄不大，志向却不小，竟有如此雄心，日后必是国家栋梁之材。"便说："既然如此，我就收你为徒，教你武功，传韬略。"韩信高兴地急忙叩头谢恩："谢师父！"老翁又道："你先起来，今日先挑柴回家，等三日后来此等候。"言罢转身而去。韩信望着老翁的背影消失后，才起身挑起柴担下山。途中，见好友南亭慌慌张张跑来，韩信急忙问道："南亭兄，何事如此惊慌？"

南亭与漂母是邻居，和韩信结为好友，因他长韩信九岁，韩信称之为兄。他气喘吁吁跑到韩信跟前说："贤弟，快……快不好了，秦皇选美，紫娟、文娟姊妹俩都被抢走，伯母被官兵踢成重伤。"

"啊！"韩信大吃一惊，放下柴担与南亭飞奔下山……

官兵掠走姊妹俩后，南亭夫妇急忙跑进漂母家中将漂母扶在榻上，南亭飞奔上山去找韩信。韩信和南亭气喘吁吁跑回，推开家门。漂母躺在床上昏迷不醒，韩信上前声泪俱下："伯母，伯

母！”

南亭妻在一旁催促道：“信弟，伯母伤势不轻，得赶快请医生来治啊！”韩信用袖擦了擦泪水，转身出门请来一位山村郎中，郎中给漂母包扎好伤口，又给漂母诊脉，并不时摇头叹气。开好药方交给韩信，韩信送走郎中再伸手一摸，怀中竟无分文了，他毫不犹豫地从墙上摘下宝剑，挂在腰间，对南亭夫妇说道：“烦兄嫂在此照料，我去去就来。”

韩信匆匆来到淮阴街头，因无钱抓药，只好手捧宝剑在街头插草卖剑。日迫西山仍无人问及。韩信心急如焚便满街叫卖。他来到小河桥头，一班浪汉恶棍竟挡住他的去路，其中县令恶少快步上前趁韩信不备，抢走韩信怀里抱着的宝剑，又交于另一浪汉，并且双手叉腰喊道：“你这穷汉，在哪偷的宝剑在此叫卖？你若缺钱老子给你，不过，你得从我胯下钻过；如若不然，你这剑嘛，休想拿回，拉去见我爹，告你个偷盗之罪，你看怎样？”

这班浪汉望着韩信哈哈嗤笑，韩信大怒，紧握双拳欲想动手痛打恶少，忽然眼前浮现出漂母重伤在床等药治病的身影。他只好强忍怒火，沉思片刻说道：“好！拿钱来，这把剑就算卖给你。”

恶少从怀中取出一锭银子，在手中掂掂：“剑算我买了，不过得从我胯下钻过。”说着双腿一叉，嘻嘻地望着韩信，韩信稍作迟疑，便伏身在地，从恶少胯下钻过，然后站起来取过恶少手中银子，匆匆去街上药铺抓药。他抓好药飞奔到家，将药煎好倒在小碗里，吹凉端到漂母床前，南亭夫妇搀扶起漂母，韩信轻声喊道：“伯母，请喝药！”

漂母微睁双眸，摇摇头颤微微地说道：“我怕不行了，信儿……你与紫娟是天生一对，你……你一定设法救出她啊！并……并一定要找到文娟，我……我把她俩托付……你了！”漂母嘱完，双目已闭。

“啪”，韩信手中药碗落地，他扑在漂母身上失声痛哭：“伯母，您死得好惨，信一定替您老人家报仇雪恨，不忘您的嘱托。”南亭夫妇也泪水涟涟，并帮助韩信安葬了漂母。

第三日，韩信来到漂母坟前，摆好酒肉焚香祭拜。祭奠完毕，韩信来到南亭家中，向南亭夫妇告别，然后含着悲痛，进山跟着师父学习文韬武略。

几年以后，韩信已是满腹经纶的青年，他怀着远大志向，告别师父下山。就在韩信学艺几年里，秦王朝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公元前二〇九年，秦始皇在巡游途中沙邱驾崩，少子胡亥在奸人赵高相助之下，取得帝位，称为二世皇帝。胡亥是个昏庸无能之辈，朝中之事全部委托赵高处理，结果导致天下大乱，百姓苦不堪言。陈胜、吴广在二世苛法下被逼无奈，在大泽乡揭竿而起，点燃了反秦烈火。随后楚将后裔项梁、项羽叔侄在会稽起兵反秦，刘邦在沛县起兵反秦。两支队伍在反秦浪潮中很快崛起，秦王朝摇摇欲坠。

韩信下山后，闻听项梁大将军率军渡淮，怀着满腔热忱与南亭一起仗剑从戎。楚军有战将百员，项梁根本看不起韩信，只是给了个“薄秩”之职（薄秩是押粮运草帮助记账的士卒）。一次韩信随项梁攻打定陶时，他见楚军一路屡战屡胜，已有傲气；又洞察到秦军连日增兵，志在定陶决战，当晚便进帐斗胆

向项梁献计，让项梁提防秦军章邯夜晚偷袭。然而未得到项梁重视，结果遭秦军夜袭，项梁阵亡。项羽继承叔父项梁之职，但也没重视韩信，只是升了个持戟郎中（就是给项羽抬戟的卫士）。项羽统兵百万在巨鹿大败秦军主力，迫使大将章邯投降，彻底摧毁了秦军主力。刘邦不久也率军攻占咸阳，秦王朝覆没。然而刘邦人马只有十万，惧怕楚军，便封府库、闭宫室，与民约法三章，退守咸阳城郊灞上，以待楚军项羽到来。项羽率雄兵百万到了咸阳，屯兵鸿门，号令天下，自封为西楚霸王，然后又大封诸侯。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然而刘邦心中不服，因此楚汉相争开始。

关中平原的鸿门镇，连日来楚军大营大摆筵宴，三军将士开怀畅饮，庆贺胜利。韩信心烦无心饮酒，走出帐外，站立在夕阳下，凝视着远处咸阳城中滚滚浓烟火光，他心情显得沉重，按剑伫立，凝目苍穹。

阿房宫，金碧辉煌，雕梁画栋，奇山异石，百花争艳，自从楚军进入咸阳城后，连日来成千上万的楚兵烧杀抢掠。韩信与偏将南亭入宫内见到如此情景，心里不快，紧锁双眉退出阿房宫，来到宫外，见项庄又押着一批批宫女及一车车财物运回楚营。此时项羽在项伯、钟离昧等众将佐簇拥下来到广场之上，项羽身后跟着十几名高举火把的士卒，项羽望了望金碧辉煌的阿房宫，傲慢地把手一挥：“烧！”韩信见此情况，上前“扑通”一声跪在项羽面前：“大王这不能烧啊！”项羽一怔：“嗯！为何不能烧！”韩信眼含热泪：“它是百姓们的血和汗啊！”“大胆！一个小小持戟郎中也敢在大王面前多言！”项伯一旁厉声喝道。项羽见是韩信阻拦不由大怒，抬起一脚将韩信踢倒：“滚开，这阿房宫乃是犬地狼窝，将它焚尽方解吾恨！”韩信爬起又跪前几步：“大王，这万不能烧啊！纣王罪满天下，武王灭商也不会火烧纣宫；吴王恶遍越国，越王勾践也不曾尽焚吴台。罪恶在人，而不在物！”项羽轻蔑地望了一眼韩信，然后把手一挥：“给我烧！烧！”举着火把的楚兵立即涌进阿房宫、上林苑、万人厅。片刻烈焰冲天，火光四起。项羽望着这冲天大火，高兴地哈哈大笑，并高声说道：“秦始皇你万没想到吧，你强暴一世，兵踏六国，享尽了人间荣华富贵，你儿孙们却拜倒在孤王脚下，今日孤王烧了你这王八窝，还要掘你的陵，这样方能平六国百姓之怨，解孤王心头之恨。”韩信望着这冲天火光，心中掠过一丝悲哀。项羽率领众将离去，南亭走来劝慰道：“贤弟，你这是何苦来！”“唉！”韩信长叹一声，心中浮想联翩：自从从戎以来随楚逆施，将一座宏大的阿房宫付之一炬，真乃以暴易暴也，如此下去会失掉民心；而汉王刘邦，先入咸阳，却封府库、闭宫室，与民约法三章，比项王棋高一筹啊。

韩信正在沉思，楚将钟离昧走来。这钟离昧与韩信同乡，比信早入楚军，现已被项羽擢升为将军，他带着几分醉意踉踉跄跄来到韩信跟前，拍了拍韩信肩头：“贤弟为何不在帐中饮酒，而在此发愣？”韩信转身见是钟离昧，苦笑道：“喔！原来是钟离将军，信给你施礼了。”“别，别这样，贤弟见外了，你我同乡，又都在楚营多年，何必拘礼！贤弟，看你好像有心事？”“唉！你我虽同乡，可你已是大王驾前上将军，而我

从军多年，至今还是一名小小持戟郎中，言无人听，计无人用，可叹报国无门。”钟离昧微微一笑：“贤弟胸中抱负，昧怎能不知。贤弟虽职微卑小，可文韬武略何人能比。”韩信伤感地说：“唉！满腹经纶又有何用！”“贤弟日后凡事万不可太直。走，听说大王近日情绪高昂，常在黄昏时在府邸庭院中习武，你我今日不妨也去开开眼界。”“这万万使不得，大王庭院习武韩信岂敢前往。”“嗬！大王虽然遇事有些暴躁，但平日里常与士卒同乐，也不计较君臣礼节，因此百万将士都愿随他东荡西杀。近日大王心情舒畅，士卒们常去庭院探望，大王从未怪罪。贤弟不必多虑，随我前往就是。”韩信无奈，只好跟随钟离昧来到项羽府邸。二人走进府门跨进庭院，见项羽舞动大戟上下挥舞，戟在空中发出呼呼风声。庭院旁美貌温柔的虞姬，腰挂佩剑坐在几案旁观赏，几名侍女相陪，左右站立着范增、项伯。庭院四周围满将士个个看得如醉如痴。韩信被钟离昧带进人堆。见一把沉重的大戟在项羽手中挥洒自如，钟离昧情不自禁高喊一声：“好！”

项羽听见喊声一怔，顿时收敛，钟离昧知道自己失口，慌忙上前跪拜赔礼：“末将冒昧，请大王恕罪！”“哦，是钟离昧，你何罪之有，快快请起。”项羽放下大戟乐呵呵说道。“谢大王！”钟离昧起身吞吞吐吐说道：“大王，末将常听众将言论说您在会稽常单手举起千斤鼎，可惜末将从未见过，今日能否……？”“哦！”项羽哈哈大笑：“好，孤王今日就让尔等开开眼界。”言罢，项羽看见庭院石阶旁一对大石狮子，每个足有千斤。项羽走到右侧石狮旁，用右手抓住石狮一条腿，单手一交力，大喝一声：“给吾起。”石狮被项羽举过头顶，又在庭院中走了三圈然后轻轻放下，面不改色，心不跳，顿时众人目瞪口呆。片刻，才一阵掌声、一阵喝彩声：“大王神力，大王神力也！”

韩信与钟离昧心中也暗暗敬佩。项羽走到虞姬身旁，虞姬起身深情地献上一条绵帕，项羽接帕擦了擦脸；侍女献茶奉上，项羽接茶喝了一口，然后转身对钟离昧说道：“钟离昧，孤王今日高兴，你来与孤王切磋切磋武功如何？”“这万万不行，为臣哪敢与大王比武！”“钟离昧，看把你吓的，孤王刚才已说过，孤王今日高兴，咱们是切磋武功，让众将士们娱乐娱乐！”钟离昧无奈，只好拱手：“末将遵命。”两人便在庭院之中对打比武，十几个回合下来，钟离昧已累得气喘吁吁。正在此时，项羽一脚扫来，钟离昧躲闪不及，“扑通”一声被项羽踢倒在地，众人一阵掌声，项羽开怀大笑。项羽环顾四周，对众将士问道：“何人愿与孤王一比高下？”连问三声无一人答应。突然，钟离昧施礼：“大王，持戟郎中武功不错，让他与大王一比。”

项羽此时才注意到韩信，乐呵呵地说：“哦！原来是孤王的持戟郎中。好吧！请过来与孤王比试比试！”韩信连连摆手：“不行，不行，韩信职位卑贱，怎敢与大王交手，这岂不罪该万死吗？”“持戟郎，今日与孤王切磋武功，不论职位卑贱，孤赐你无罪。”钟离昧将韩信推到庭院之中，项羽开始与韩信比起武来。项羽拳脚如闪电般打来，还带有呼呼风声；韩信身体敏捷，翻转腾挪如狸猫一般。项羽虽武艺超群，但始终打

不着韩信，韩信也靠近不了项羽半步。二人，一个如猛虎下山，一个如出水蛟龙，两人越比越激烈，越比越勇猛，众人早已看得眼花缭乱。

丞相范增一旁暗暗吃惊："听人讲韩信很有才能，并有远见卓识，没想到武功还不差，凭武艺他略逊项羽，凭智慧项羽不及韩信，此人不能小视，待有时机，我一定举荐此人。"范增正在想着，两个比武之人已战几十回合，同时二人额角汗下，韩信已显出力量不及项羽。韩信决意败下，他倒退几步后跳出圈外，拱手施礼："小人韩信败输，大王不愧为天下无敌大将军。"项羽高兴地哈哈大笑："嗯，没想到孤王的持戟郎中都有两下，更不用说孤王的众位武将了。"项羽见天色已黑，便对众人说道："好了，今日就到此吧！"众人便纷纷散去。范增趁项羽高兴，便对项羽说道："听人说韩信很有谋略，今日又见他武功非凡，大王何不重用此人。"项羽听罢细细思虑，一旁项伯却插话说道："我常听人讲，这韩信少时寄食漂母，受辱胯下，却是个道地懦夫，他有何谋略。"项庄一旁也插话道："是啊，大王！像韩信这样懦夫，如得到重用，岂不让三军将士耻笑！"范增淡淡一笑，语重心长地说道："用人岂能看出身贵贱，用贤方才是立国之本！"项伯见范增有讥讽之意，心里很不痛快，他反唇相讥："一个懦夫就因与大王比两下武功就得以重用，那这百万之众都与大王切磋几下武功，那都得擢升吗？""这……"范增被项伯呛得无言可答。"好了，不必争持，孤王自有主张。"项羽阻止道。范增思虑片刻："既然大王不愿重用此人，那依我之见，不如将他杀掉，免得落入他人之手。"项羽点点头："好吧，等待机会杀掉就是！"

韩信自从与项羽切磋武功后，军中将士赞叹不已，可韩信心事重重，南亭见状，便拉韩信到鸿门镇饮酒消闷。

韩信与南亭饮罢酒回到大营，韩信心中有事便独自一人到了楚军临时大殿。韩信来到大殿帷幕处静听，众文武大臣已各抒己见争论多时，项羽最后说道："常言道，富贵不归乡，诚如穷浪荡，孤王还是以大多数众臣意见，返回故乡，定都彭城吧！""大王英明。"多数文臣武将齐声欢呼。韩信在帷幕后犹豫再三，还是冒险掀帘进殿，单腿一跪："大王，韩信不才愿敬一言。"项伯见是韩信，厉声喝道："大胆！一个小小持戟郎中竟敢谈论军国大事，来人！"两名武士应声而上。"拉下去砍了。"项伯命令道。"慢！"范增一摆手向项羽施礼："大王，韩信虽职位卑小，今日他敢闯入直言，必有见解，不妨让他讲出。"项羽微微点点头："讲！"韩信站起从容不迫道："大王，关中依山傍水，四塞险阻，土地肥沃，乃长治久安之地，若就此建都，便好成就霸业。""哼！"霸王心中十分不快，用鼻子哼了一声，韩信全然不理继续说道："秦地定都，进可以八方出兵，称雄天下；守可以四面挡敌，牵制诸侯。秦始皇久居此地，其中自有道理。""呸！"项羽勃然大怒，将几案一拍："什么始皇，建都咸阳二世已亡，难道汝辈想让孤和他一样吗？来人！"两名武士走上大殿，项羽厉声喝道："推下去重责二十军棍。"两名武士应声推韩信出殿。

韩信被责回到帐中，南亭知晓便找一农舍让韩信疗伤。由于南亭精心照料，

没过几日韩信伤已基本痊愈。

一日，韩信与南亭在街上闲逛，不期遇见张良，张良早听说韩信之才，寒暄数语，张良对韩信说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足下一腔大志，满腹经纶，为何要屈就于项羽手下?"韩信道："古人云'贤臣不事二主'，信既事项王，岂可他去?"张良微微一笑："足下所言差矣！臣若所事为暴君，岂不是助纣为虐吗?项羽最近行事残暴不次于二世，他虽骁勇号令天下，而终必灭；汉王刘邦忠厚豁达，礼贤下士，足下若投身汉王，定能受其重用，干一番大事。"韩信低头不语。张良接着道："吴起在鲁不为鲁用，弃鲁投魏而被魏封为大将，足下虽有雄才大略，而项羽弃之不用，这岂不埋没可惜吗?"韩信沉思片刻："这……我将如何去投奔汉王?"张良从袖中取出写好的信绢一条递与韩信："这里有信绢一条，将军可带上去汉中面见汉王，汉王见此信绢，一定委以重任。"韩能过信绢，珍藏于怀中，张良起身告辞。

夜深，月明，韩信骑着马风驰电掣般在关中平原上疾驰，后面人喊马嘶，楚军十几名将士穷追不舍，道上尘土飞扬。

晨光初照，薄雾缭绕，巍峨的秦岭，山峦重叠，含翠欲滴，韩信单骑越过山梁、峡谷、河沟，后面追兵已抛去很远，在岔道口韩信跳下马，将马拉到右道口狠抽几鞭，那马飞奔而去，韩信从左道而走，后面追兵来到叉路口迟疑不决，一将佐在右道口见有马蹄印，用手一指："向这边给我追!"追兵向右道追去。韩信逃离追踪，翻山越岭，终于来到汉中。

来到汉中以后，韩信受到刘邦手下大将夏侯婴的款待，经夏侯婴举荐，韩信在汉军中任连敖之职，管理军中粮草。

自从韩信在汉营任连敖之职后，顶风冒雨、日夜坚守护卫粮库。一日樊哙与郦食其带着几名挑筐的内侍，进了大门直奔粮库，韩信率领几名士卒正在持刀守卫。见樊哙统军走来，便客气地拱手施礼："樊将军，今日来此有何公干?""哦！是韩连敖，郦大人讲，后宫曹妃娘娘要排筵宴，需要些粮食酿酒，你给他发十五石粮食。"樊哙吩咐道。"郦大人、樊将军，这军粮乃是军旅之本，怎能拿去酿酒。"郦食其不耐烦地说："你吃粮不多，管事倒不少，你管他什么粮，后宫要用粮酿酒，你得快些取，少在这啰嗦。""不行，没有大王及丞相手谕，小人不敢擅自做主，乱发军粮。"樊哙不耐烦地说道："我是统军，由我担待。""樊将军，你让我们做下属的为难呀！大王有旨、萧丞相有令，没有他们手谕，任何人不得擅动军粮。"韩信耐心解释道。樊哙恼怒道："怎么，老子今日非取不可，看哪个敢拦，来人！把这库门给我打开。""不行!"韩信把刀一举："来人!"十几名守粮士卒应声而到，握着长戈在粮库门前站成一排。"大胆!"樊哙又气又恼："你……你们竟敢与我对抗!"言罢就要动武。韩信急忙从腰间取出一块银牌，举到樊哙面前厉声说道："丞相有令在此，敢私自动用军粮者，斩!"郦食其与樊哙瞥了那银牌一眼，气焰渐落，樊哙咽下一口气："好！咱们日后走着瞧!"郦食其把手一挥："咱们走!"转身带领众人狼狈不堪地离去。

韩信拒粮一事很快在军内传开，夏侯婴也禀报了萧何丞相，萧何十分赞赏，

便与夏侯婴徒步前来探望。他们推门一看，韩信屋内空空，可不远处却传来阵阵操练声。萧何、夏侯婴便向操练声走去，站一高处举目一望，只见草坪上，韩信带着他管辖的几十名士卒在操练。韩信在前做示范，士卒跟他动作练习，韩信还不时走入队列认真检查指导，直到士卒记熟时，才满意地点点头。萧何、夏侯婴互相望了望，满意地相互一笑，萧何说道："今日一见，韩信果有奇才！"夏侯婴赞同道："我汉军将士如由他来操练，必能攻无不克了。""看来，此人正是老夫要觅之人，真乃天助汉也，老夫定要在大王驾前保举此人。走，下去和他见上一面。"萧何与夏侯婴来到韩信等人身边。夏侯婴介绍一番，萧何将韩信双手紧紧握住。

萧何自从见到韩信操练士卒，心里十分高兴，他想等有机会一定在大王面前保举此人。突然夏侯婴慌慌张张跑进府来禀告，说韩信等一十二人被樊哙、郦食其所拿，言称韩信聚众谋反，大王已经批准在武门外断头台斩首。萧何顿时大吃一惊，问其原因，夏侯婴讲道："韩信与一帮士卒晚上在屋内谈论兵法，一名士卒因对樊哙不满，发了几句牢骚，被樊哙及郦大人听见，他们记恨上次拒粮之仇，便污蔑韩信等人是图谋不轨，聚众谋反，便将韩信等人拿下关入牢中，由于大王面前又有曹妃娘娘进谗言，大王便立即降旨斩韩信等人。"萧何听罢，急忙上马与夏侯婴飞奔武门外。

武门外，断头台汉军戒备森严，郦食其、樊哙高坐监斩台，韩信等人被五花大绑跪在断头台上，刽子手怀抱大刀侍立一旁，围观的群众议论纷纷。郦食其走下监斩台，来到韩信身旁，不冷不热道："韩连敖，临死之时还有话可说吗？""请问，我等身犯何罪？""聚众谋反！""证据何在？""何需什么证据？我与樊统军亲眼目睹，你们聚众藐视大王，污蔑樊将军，樊将军与大王是连襟，大王妹夫，你们污蔑樊将军，就是污蔑大王。"被绑的士卒道："这都是我一人所言，与连敖无关，你把他们都放了，要杀要剐由我一人承担。"郦食其冷冷一笑："说得轻巧，你们聚众谋反，一个也不能饶恕。""哈哈哈！"韩信藐视地大笑道："看来汉王的疆土，就是这汉中区区弹丸之地了！""狂妄，狂妄！"郦食其边走边喊，走回监斩台落坐。"时间已到，行刑！"樊哙一声令下。"唉！"韩信仰天长叹一声："我韩信不辞辛苦千里迢迢弃楚投汉，未能死在楚军，今日却死于汉军之手！子房，这就是你讲的弃暗投明，辅佐明主吗？"正在此时，几声马嘶，只见两匹马飞奔而来，萧何、夏侯婴飞马来到，并高声喊道："刀下留人！"两名刽子手刚举起大刀，抬头见是丞相萧何与统军太仆夏侯婴，忙放下大刀退于一旁。郦食其见萧何来到，气得把脚一跺："唉，他怎么来了。"樊哙见状迎上前道："丞相，末将是奉大王谕旨行刑，请勿干涉。"萧何冷冷一笑："夏侯婴你在此看着，不许任何人行刑，待我去面见大王，讨回赦令。"

萧何上马飞奔汉王宫，他见着汉王刘邦直言不讳："汉室刚立，不可乱杀无辜。天下人耳闻大王礼贤下士，求贤若渴，韩信才千里迢迢弃楚投汉。今日斩了韩信等人，岂不叫天下有志投汉之士寒心吗？大王日后靠谁来完成一统大业？鹂食其与樊哙私动军粮，被韩信所

拒，他们怀恨在心。昨晚韩信是聚士卒一起谈论兵法战策，并非聚众谋反，请大王明察！”刘邦疑惑地望望萧何：“果真如此吗？”萧何点点头：“臣以项上人头担保。”刘邦沉思片刻：“好吧，既然如此，传孤谕旨，赦免韩信等人死刑，韩信原复连敖之职。”萧何摇摇头：“大王，不可！”“萧卿！这是何意？”“大王，据臣所观察，韩信有胆有识，熟习兵法，连敖之职实在屈才。”刘邦沉思片刻：“既然丞相保举，他管理粮草有功，那就擢升治粟都尉吧。”“大王，这怕不妥吧？”“萧卿就不必多言了。”萧何只好答应：“臣遵旨！”接旨后转身离宫，上马直飞奔武门。

韩信等人虽得萧何力保得赦，又被萧何推荐升为治粟都尉，但这治粟都尉还是管粮草的小官，韩信才能根本发挥不出。时隔多月，汉军中却悄悄发生变故，汉营中皆是山东人氏居多，都思念家乡，不愿久居汉中，因此近月来将士三三两两地逃走无数。这一下可急坏了汉王刘邦，他想起兵东向，可自己势单力薄，军中又无有才能的大将统领，万一起兵东向被楚霸王项羽知晓，必发大兵拦截，那时岂不自取灭亡！因此近日显得消沉闷闷不乐，丞相萧何更是心急如焚，他思虑多日，认为韩信可任大将率军东向，因此与汉王刘邦发生了意见分歧。他认为汉军要想东征，必须启用韩信统军东征，否则必是徒劳无疑，因此决意二荐韩信。时逢八月十五夜，汉军将士望月皆歌，思念故乡，汉军已人心涣散，萧何再也不能沉默下去，便人宫求见刘邦，二荐韩信。汉王因近日心情不爽，曹妃娘娘特在八月十五夜备了歌舞让刘邦赏月观舞，以解心中烦闷。汉王在后宫亭院中正同曹妃和郦食其、周苛二文臣赏月，闻萧何求见，便令请进。萧何人得宫来，向汉王参拜后又与郦食其、周苛互相问安。刘邦摆手示意落坐。萧何扫视院中景色，又抬头望望皓月，若有所思地说：“啊！中秋之夜，月色真迷人！”“哦！”刘邦不解其意：“萧卿未与夫人在府邸赏月？”“臣哪有心赏月啊！”萧何淡淡一句。郦食其一旁慢条斯理问道：“立国数月，国泰民安，丞相有何忧虑之事？”萧何端起茶水淡淡一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哦！”刘邦一怔：“萧卿此言何意？”“大王可知将士聚集一起望月而歌，盼望东归吗？”“孤已知晓！”“大王何不趁众将士盼归心切，乘其锋芒，起兵东向，与楚争夺天下！”“唉！”刘邦长叹一声：“孤何尝不想起兵东向，与楚争夺天下。但楚强汉弱，项羽有雄兵百万，战将千员，项羽又有万夫不挡之勇，何人是他的对手？孤军中若有孙膑、吴起之人就好了。”萧何微微一笑：“孙膑、吴起之类的将才我军已有，就怕大王不肯重用。”刘邦大笑：“汉室之地哪有孙、吴之人！”郦食其阿谀逢迎道：“大王一向求贤若渴，知人善任，如有孙、吴之人，大王怕早已重用，让他统领三军了。”萧何微微一笑摇摇头：“非也！郦大夫，世上不缺金马良驹，缺者伯乐也！”刘邦惊奇地望着，萧何不慌不忙道：“此人淮阴人氏，有雄才大略，好似孙、吴，至今却仍屈居小小治粟都尉。”刘邦离座哈哈大笑，倒背双手，眼望皓月：“孤当萧卿所谈何人，原来却是指韩信。”萧何上前几步力争道：“据臣细察，又亲与交谈，韩信确系当今英杰，文足智多谋，武勇冠三军，有安邦定国

之才，万望大王早日重用，令韩信率军东征。”刘邦沉默不语，郦食其却插话道：“听说韩信少时寄食漂母，受辱胯下，这样一个懦弱之辈，能有何作为！”“哦！此话当真？”刘邦疑惑地追问道。“现在三军上下谁不知晓，韩从少时衣食不周，游手好闲寄食漂母，投奔楚营也只不过是扛戟的郎中，有何大才！”郦食其补充道。“萧卿，如此一个懦夫任我汉军大将，岂不荒唐！”刘邦很不高兴地说道。“大王，自古寒门出英豪，从来纨绔少伟男，说起来，大王与众臣也非豪门出身嘛！”萧何力争道。郦食其冷言冷语道：“大王！这与楚争雄并非儿戏哟！”刘邦听罢郦食其所言，心里主意已定：“萧卿，孤看在你面上，已饶恕韩信等人死刑，又加封为治粟都尉，一些将士至今仍有些不服，今日岂能再加封于他，更何况三军主帅！一个胯下懦夫有何大才。”萧何诚恳地说：“做为明君者，延揽贤才乃第一要事，大王万不可凭一时一事观人，误汉大业。”刘邦拂袖怒斥道：“荒唐！”周苛见状，上前来到刘邦身旁低语道：“大王，丞相所言有理，依臣愚见，不妨暂任韩信为帅，先试上一试，也不负丞相一片苦心。”“不！不！”刘邦连连摇头：“丰沛将士随孤王多年，身经百战，立下汗马功劳。一个受辱胯下的懦夫，岂能封他为帅？众功臣宿将岂肯服顺？三军将士岂不说孤赏罚不明吗？”萧何此时心情激动，激昂道：“三军将士，功臣宿将，虽有战功，但无一人能比韩信之才能，韩信乃人中之杰，臣知遇韩信才屡劝大王重用。大王如愿长居汉中称王，那就无须用韩信；如愿东向一统天下，非用韩信不可，切望大王三思！”刘邦沉默不语，踱步思索，又连连摇头道：“不！不行！不行！”萧何痛切地说：“大王，岂不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周苛劝解道：“大王，丞相乃是肺腑之言，不可不听。”刘邦仍然沉默不语。郦食其向萧何拱手道：“丞相！下官有一事不明，丞相为何屡荐韩信？下官听说韩信常入相府，众臣背后可议论纷纷呵！”萧何冷冷一笑：“郦大人，为人臣者，贵在光明磊落，背后诽议非君子所为吧！”郦食其尴尬地不知所措：“这……这，”又含笑道：“丞相何必多心，下官也是听他人所言嘛！”“哼哼！”萧何冷笑两声，转向刘邦说道：“大王既然听而不纳，为臣告辞了！”刘邦也生气地拂袖道：“回宫！”内侍高喊：“大王起驾回宫！”刘邦愤然而走，众人纷纷紧随。周苛上前向萧何关心地说：“萧何兄怎么如此直言，唉……”又紧追刘邦而去。萧何紧锁双眉，忧心忡忡，缓步走出后宫……

萧何与刘邦的争持在朝野上下掀起轩然大波，众文臣武将议论纷纷，樊哙闻知更是恼怒，为了这个韩信，使君臣不和，樊哙决心找韩信报复。一日黄昏，韩信正在一块空地上独自练拳，他刚练完一路拳脚收起架势，早已躲在树后的樊哙走了出来，他嘿嘿冷笑几声：“都尉拳法不错嘛！”韩信抬头见是樊哙忙答道：“在下露丑了，让樊将军笑话。”樊哙把双眼一瞪，挑衅道：“听说丞相在大王驾前保你做我三军主帅，不知你本事如何，今日想领教领教！”韩信谦让道：“在下不敢！”“那你还想升官？”樊哙冷冷一笑：“今日你若胜我，算你真有本领，你若让我打倒，就快给我滚开，当你的粮官去吧，别再让丞相为你

说情，让咱们汉室君臣不和。”“怎么丞相为我与大王发生了争持？”韩信惊讶地问道。“你别装蒜！”韩信心里一阵内疚，他深深感到对不起丞相萧何，他想走开去找萧何，不要为了他而使他们君臣不和，可樊哙以为韩信惧他，又进一步挑衅道：“怎么你害怕了，想走没那么容易！”他将外衣一脱，捋起内衣袖子，朝韩信当胸给了一拳。韩信倒退几步，并不还手，转身想走。樊哙却得寸进尺，把双腿一叉讥讽道：“想当年你不是钻过别人胯下吗？既不敢交手，那今天从我裤裆下爬过，今日本将爷便饶恕于你。”“樊哙！”韩信勃然大怒：“你也欺人太甚，我是不愿与你相斗，并非惧怕于你！”“嘀！”樊哙冷冷一笑：“竖子狂妄，胯下小儿你看招吧！”他举手就向韩信面部打来，韩信实在忍无可忍，接招还击。两人打了十来个照面，樊哙已招架不住，汗流浃背。韩信左手进一虚招，樊哙躲过，韩信右手又迅速打来，樊哙慌忙一闪，韩信下路一脚踢来，樊哙再无法躲过，“扑通”一声被韩信踢了个仰面朝天，韩信轻蔑地一笑，掸了掸脚上的尘土，大踏步走开。

夜幕降临，韩信回到住地，有几十名士卒悄悄来到他房间向他告别，说不愿久居此地，要弃甲归田，问他是否同行。韩信思虑片刻，对众人说道：“你们先走一步，我有一事办完，便离开汉营，弃甲归田永不从军。”众人也不好再说，又怕奸人告密，过会一个也走不掉还会丢了性命，因此趁着天黑便悄悄三三两两离去。韩信决心向丞相辞别，免得为了他而使丞相在中间做难，汉王已视自己为草芥，我何需留在汉宫，不如弃甲归田算也！他从怀中取出张良信绢，泪水夺眶而出，“嘿、嘿、嘿，”他一阵冷笑：“子房你骗我也！萧丞相多次举荐，汉王都不肯采纳，更何况你的一条信绢！看来我韩信命中注定不能实现胸中抱负！要它何用！”韩信想到这，将信绢在灯上点燃，信绢在火中慢慢化为灰烬。

他起身大踏步向萧何府邸走去。

萧何书斋，皎洁的月光从窗口射入，满屋晶莹。窗外竹影摇曳，秋花掩映，萧何正无限忧郁地坐在琴旁弹奏琴弦，琴声清韵，旋律起伏。侍女秋菊献茶进入书房奉上：“相爷，请用茶。”萧何停止弹琴，转身说道：“秋菊，天色已晚，告诉夫人让她早点安歇。”“相爷近日茶饭不思，夫人十分忧虑，已在厨下亲自给相爷做了点可口膳食。”“告诉夫人，让她不要忙碌，今晚我不想用膳。”“饭菜已做好，夫人尚等着相爷共进晚膳呢！”“唉！”萧何长叹一声：“天不定国事未安，多少黎民百姓颠沛流离，诸侯豪强暴虐无道，我身为汉室丞相不能辅佐大王一统天下为民谋福，心感惭愧呵！”“从相爷弹奏琴弦，小女已从琴音中听出相爷那忧国忧民之情！”“哦！你懂音律！”“相爷忘了我是从秦宫而来汉营。”“哦，我差点忘了，你能否弹奏一曲？”秋菊点点头坐到琴旁，抬腕轻拨，弦下滑出一脉清韵，娓娓如诉往事万千。萧何屏息倾听，秋菊边弹边吟唱：

> 以暴易暴楚吞秦，豪强割据乱纷纷。
>
> 何日挥戈兴大汉，扫除无道济苍生。

萧何听罢歌声，激动地问道：“你

……你是哪里人氏，如何……?”秋菊停奏回答道：“小女原名叫李文娟，家居淮阴城外。十年前秦宫挑选美女，将我姐妹抢入秦宫，那时我刚刚八岁，被送入后宫练歌舞习音乐，受尽了人间疾苦，汉军兵马攻入咸阳，我才与几个姐妹逃出秦宫，投奔汉王军营，又随军入汉中，被安排到相爷府中照料夫人。”萧何听完感慨万分：“不除暴政，天下一统，百姓焉能安居乐业，我一定全力辅佐大王完成一统大业，可叹大王听不进我肺腑之言，真叫老夫忧心。”萧何正在沉思，秋菊催促道：“相爷，不可忧虑过度，现夫人已将膳食准备好，请相爷到厅堂用膳。”萧何点点头走入厅堂。秋菊到琴旁落坐，抬腕刚欲弹奏，家童领着韩信来到书房。家童问道：“秋菊姐！相爷哪去了?”“相爷今日茶饭未进，适才刚去厅堂用膳，不知你找相爷何事?”“韩都尉求见!”秋菊起身抬头见韩信进来，她不觉又惊又喜：“哦！原来是救命恩人，上次竟忘记问你姓名，原来你就是韩都尉，请坐！我去给都尉沏茶。”韩信落坐，秋菊端茶献与韩信：“都尉请用茶。”韩信接茶时瞧见秋菊右手腕上的一只玉镯，不觉一怔：“请问，秋菊姑娘家住何处，家中还有些什么人?”“小女家居淮阴县，家中有一位老母和一个姐姐。”“你姐姐叫什么名字?”“李紫娟!”韩信又惊又喜：“你还有什么名字吗?”“我原名叫李文娟。八岁那年被抢入秦宫，起名秋菊。”韩信激动地说：“文妹，我可找到你了!”“你是……?”“我就是韩信，你韩大哥呀！你八岁时我还教你识文断字，你忘了?”秋菊泪水盈眶，一下子扑到韩信怀中，热泪顺颊而下哽咽道：“大哥，我娘，她还好吗?”“唉!”韩信心酸地长叹一声：“自你姐妹被抢走以后，不久她老人家就离开了人世!”文娟伤心地泪流满面：“大哥，秦王朝已灭，曾见到我紫娟姐?”韩信从怀中取出一只玉镯交给文娟，痛苦地说：“她……她为了我，死于楚将项庄的箭下。”言罢，韩信潸然泪下。秋菊双手颤抖接过玉镯，泣不成声：“娘！姐姐！你们死得好惨啊！韩大哥，你文武全才，可一定要为我娘和姐姐报仇啊!”韩信扶着文娟：“文妹不必太伤心，我正是为了替天下百姓伸冤，为你娘和姐报仇才投军从戎。推翻暴秦，又千里迢迢奔楚投汉，本想投汉有所作为，唉！谁料大王无意东归，我也被小人陷害，几乎丢掉性命，若不是丞相全力相救，恐怕我早已作了刀下之鬼。”秋菊擦擦脸上泪水，温柔地说道：“相爷多次提到韩都尉很有才华，据我所知，他多次在大王面前举荐于你。”韩信感慨地说：“人生在世，遇一知己足矣！相爷为了我生了不少闲气，真让我于心不忍。”“是啊!”秋菊叹气道：“相爷整日长吁短叹，茶饭不思，他为举荐大哥多次与大王发生争持。”韩信倒背双手，紧皱双眉陷入沉思：“现文娟妹已找到了，我心愿已了，她在萧丞相府中我也就放心了。”秋菊见韩信沉默不语，忙说：“韩大哥，你想什么呀，相爷刚去用膳，待我去禀报。”韩信急忙阻拦：“文妹不必了，既然相爷正在用膳就不打搅相爷了，我走了!”韩信转身离去，秋菊恋恋不舍地说：“大哥你常来呀!”韩信走到门外又对秋菊嘱托道：“丞相为国为民呕心沥血，你要好好照顾他。”“嗯!”秋菊眼含热泪点点头。

韩信离去多时，秋菊仍在门口呆呆地发愣，萧何与夫人用罢膳轻步走来，夫人见秋菊问道："菊儿如何站此发愣？"秋菊猛然清醒，转身忙施礼："相爷，夫人！"慌忙摆椅让坐，萧何爱抚地问道："菊儿怎么眼含泪水？"秋菊擦了擦两眼热泪慌忙答道："没……没什么，适才我韩信大哥来过，不知找相爷何事？""怎么韩信是你大哥？"萧何又惊又喜。"他少年时居住我家，我娘如亲人一样待他，他时常教我识字，待我如同亲妹。"萧何有所悟道："哦！我明白了，别人说他寄食漂母，就是在你家中喽？""当时我娘靠洗衣为生，人称漂母，韩大哥住我家帮我娘做了不少重活，怎能说他寄食我家！一些流言蜚语就是可恨！"萧何理解地频频点头又对屋外喊道："童儿，掌灯与我到韩都尉营中。"家童应声："是！"夫人急忙阻拦道："慢，相爷，天色已晚多时，有事明日再讲不迟。"萧何沉思片刻："也罢！明日我定与他好好交谈，韩信实乃难得的人才，汉室要一统天下，非用韩信不可。明日早朝我再尽力保举，大王若再固执己见，我就交出相印。""你呀，什么时候能改掉那牛脾气。"夫人微笑地说道。秋菊对萧何道："相爷、夫人，时候不早了，还是早点安歇吧！"夫人点点头，挽着萧何姗姗走入寝室。

夜深人静，约四更时分，萧何与夫人睡得正香，忽然窗外一阵急促喊声："相爷！相爷！"萧何被惊醒，掀被坐起问道："谁呀，何事这样惊慌？"家童在窗外说道："禀报相爷，适才守城军校来报，说昨晚韩都尉骑马出了北门，至今未归。""啊！"萧何吃惊地急忙更衣起床，又连声问道："为何此时才报？"家童说："军校来讲，昨晚一更时分韩都尉要出北门，军校问他，他说去城外粮仓巡哨，但至今不见回城，近来离营逃走的将士不少，怀疑韩都尉恐怕也是外逃，因此特来禀报相爷。"萧何慌忙起身走出寝室，向家童说道："童儿快去备马！"家童迟疑地说："相爷，如此深夜要上哪去？""去追韩信，追韩信！"萧何心急如焚地喊道。"相爷，我也随你一同前往！"萧何点头答应："嗯！快！"萧何出了相府大门，家童已从马厩牵出了两匹好马，萧何与家童翻身上马，打马扬鞭直奔北门。守城军校闻听丞相要出城，哪敢怠慢，立即开了城门，一名将佐随口问道："丞相要到何处去？"此时萧何心急如焚，来不及答理便狠抽马股，两匹快马飞奔出了城门。

秦岭山麓，留坝境地的寒溪河畔，一轮明月徐徐而起，月光给整个山麓披上一层银辉。韩信骑马奔走一昼一夜，感到人困马乏，当行到溪河边，见河水猛涨，水深浪急，已知上游暴雨发洪，很难淌水过去，便下马止步。他捧河水勉强喝了几口，坐在一块大石上吃干粮歇息。一位樵夫走过，他急忙上前打问前面道路，樵夫告诉他河水猛涨，只有等到水位下降淌水过河，才能北上翻越秦岭，他无奈只好叹气在此歇息。樵夫走远，韩信陷入沉思，偌大天地怎容不下我韩信一人，我堂堂七尺男儿，空读圣书，又习武艺，徒有雄心壮志，却报国无门。他想到这，起身向汉都南郑城方向单腿一跪，自言自语道："丞相，蒙你多方关照，信实难留于汉地，辜负了你一片苦心，韩信在此遥向拜辞，望恩相多多保重！"言罢，韩信起身牵马沿河而上。他刚走两步，忽闻几声马嘶，

马蹄哒哒声越来越近，只听马上之人高声喊道："前面之人请留步！"韩信吃惊地回头一望，只见两匹快马飞奔而来，来人渐渐清楚，竟是丞相萧何！萧何在马上看见韩信，顿时喜出望外，放声高喊："都尉留步！"韩信闻声止步，萧何污衣垢面来到韩信跟前，下马气喘吁吁拉住韩信双手："都尉……""丞相！"韩信泪水夺眶而出。家童也下得马来说道："我们相爷闻知都尉他去，急忙起身连夜追赶，还好总算在此地追上，一天一夜可把相爷累坏了。"韩信内疚地说："丞相！让你受累了！"萧何爱抚地说："你我一见如故，要走，也得告诉我一声嘛！"韩信"扑通"一声跪下痛哭道："丞相，请恕罪！""都尉请起，请起！"萧何扶起韩信："男儿有泪不轻弹嘛！横枪跃马洒热血，方才是英雄本色。"韩信抹去眼泪："我本想在汉军中干一番事业，辅佐汉王统一天下，可是大王偏信谗言、视我如草芥，虽丞相几次犯颜推荐，但大王充耳不进，我又恐再连累丞相，故决心离汉，弃甲归田永不从戎！"萧何微微一笑："都尉所言差矣！都尉满腹经纶，武艺超群，何不建功立业、做番大事流芳百世，怎能出此下策，私离军营，更何况还要弃甲归田！"韩信沉默不语，萧何又说道："都尉年轻，万不可蹉跎岁月，虚掷年华，荒废有用之身呵！当今天下，能成大器者，汉王刘邦也，凡事总有个前前后后，都尉若轻易弃而远走，将来会遗恨千古呵！"韩信迟疑不决道："这……汉王嫌我出身贫贱，留之何益！""大王十分器重人才，只是尚未知你，老夫可做担保。""唉！"韩信长叹一声："丞相多次为我，可结果大王他……？"萧何含笑道："伍子胥七荐孙武，孙武方被吴王所用，我也不过才二荐都尉啊！"见韩信犹豫不决，萧何又说道："都尉不必再犹豫，跟我速回军营，这次大王若再固执己见，一意孤行，不重用都尉，本相愿随你一道弃甲归田，不知都尉意下如何？"韩信心被说动，他激动地拔剑向天盟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丞相。我韩信如若不能全力辅佐汉室统一天下，誓不为人！""好！"萧何称赞道："你我同心协力，辅佐大王共建大业。"家童心里也十分高兴，将马牵到萧何、韩信身旁，他们翻身上马，打马扬鞭，高高兴兴返回汉营。

韩信随萧何回到汉营，萧何进宫三荐韩信，由于萧何再三陈述，刘邦终于点头亲试韩信才能。韩信讲了时局和楚汉相比的优劣，如若汉王起兵东向顺应民心，先夺关中，关中既下，汉便依秦为据地，然后再图天下，王业可成。刘邦得到韩信一番陈述，顿时茅塞顿开，但又一想通往关中的栈道已被烧毁，他愁容满面地又问如何能先夺三秦。韩信来到刘邦身旁只悄悄低语几句，刘邦开怀大笑："妙、妙、妙！"他赞不绝口："真是与张良所献计策火烧栈道珠联璧合！"他拉着韩信手惭愧地说道："都尉果是奇才，只恨以前自己糊涂。"刘邦立即封韩信为大将，萧何急忙阻止，言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汉室封大将军，应该筑坛拜将才是。刘邦采纳了萧何建议，便立即筑坛，于汉元年八月秋乙未，拜韩信为东征大将军之职，统管三军人马。

汉王刘邦自拜韩信为大将后，三军经韩信操练月余，兵马已基本操练精熟，士气高昂，刘邦甚是高兴，与韩信、萧

何商量后，决定择日东征。

大将韩信府内大厅，今日云聚着汉室各文臣武将。汉王刘邦上首落坐，左萧何、右韩信两旁相陪，韩信精神焕发，身穿金甲玄衣英气勃勃，下首各文武大臣伫立两旁。刘邦春风满面地高声说道："我汉室将于明日起兵东征，韩元帅早已拟就进兵方略，望众卿细听！"众人都鸦雀无声默默细听，韩信望了众人一眼，见有些武将还怀有轻蔑的眼光，他只是微微一笑，对众人说道："近月余已将人马操练一番，我又遣三千将士修筑栈道。众人定会疑问，这秦岭山中栈道已经烧毁，这三千将士修复得何年何月，明日如何起兵东征。这遣兵修筑栈道只不过是掩人耳目，麻痹章邯而已。我弃楚投汉时经老猎人指点出一捷径小道，此道虽然难行，但只要稍加修铺可以直捣陈仓。这叫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奇袭章邯。"众人听罢这才放下心来，人人显出敬佩之情，并齐声回答："谨遵帅命！"

雍王宫后殿，饮酒赏舞一夜的雍王章邯，太阳升起老高才慢腾腾晃悠悠地从寝宫内走入后殿，他刚坐下，一名侍女端来人参银耳汤奉上。章邯接汤刚喝一口，一内侍慌慌张张跑来禀报："启禀大王，大事不好！""哦！"章邯吃惊地问："何事如此惊慌？""探马来报，汉王刘邦已准备东征，数日前派千名士卒修复秦岭山中栈道。"章邯听罢不乐意地说道："区区小事也值得如此惊慌失措！山中栈道甚多，他何年何月才能修好，还不给我退下。""是！"内侍默默退下。章平又慌张进殿禀报道："大哥！据探马来报，刘邦已拜韩信为大将，号令十五万大军，要夺我秦地。"章邯冷冷一笑："刘邦真是痴心妄想。哦！韩信是何许人也？""禀大哥，韩信就是楚军霸王麾下的持戟郎中。"章邯听罢哈哈大笑："嗯，却原来是一个受辱胯下、毫无志气的懦夫。刘邦如此糊涂，怪不得他行为乖谬，前烧栈道已是失策，今又修复栈道，只派千名士卒，看他何时能修通，不必理睬。"章平劝慰道："大王，还是防备为好！"

章邯略一思索："好吧，贤弟就带上五万人马，据守陈仓道，孤王再令其他将佐率领人马在秦岭道口修筑堡垒，料他插翅难到我废丘都城！"章平很是称赞："大哥，不愧久经沙场，布防有理，妙！妙！"

秦岭山中褒斜道上，汉军将士汗流浃背地铺设栈道。有两匹快马奔来，一名将佐下马来到统军周勃、灌婴身旁高声喊道："韩元帅有令，周勃、灌婴修筑栈道监督不力，革去监工之职，带回汉都听候发落！"说罢，冲他们挤了挤眼。周勃心里明白，假意发着牢骚："真是的，干了这苦差事，难道还要伏罪不成！"另一名将佐拿出韩信令箭："将他二人拿下，带回营中，此处由我二人监工，继续加紧修复栈道。"

汉都南郑城夜晚，韩信带领一支大军悄悄离开南郑，向北挺进。后边大队人马在韩信留的标记下紧随。天刚拂晓，陈仓道上雍军章平的营寨隐约可见，韩信率领着三万人马翻山越岭、披荆斩棘，经过几天的行军，终于顺利走出秦岭。韩信见章平营寨，一声令下，汉军人马以排山倒海之势攻入敌营。一片喊杀声，章平这才从梦中惊醒，他慌忙从室内跑出中军大帐，见到处都是汉军人马，吓得魂不附体，他盔甲未穿，慌忙从后帐

中牵出战马，慌不择路，匆匆而逃。经过激战，雍军死伤无数，溃不成军，纷纷投降。汉军人马大获全胜，韩信从一士卒怀中取出三只白鸽，拴上信绢，放于空中，三只鸽子在蓝色的天空盘旋一圈，然后向汉中方向飞去。韩信命周勃、樊哙速带二万人马向废邱雍都进发，围困雍宫，歼灭章邯。汉都南郑城内，一只鸽子落入汉王府庭院内，一内侍见着鸽子捉住，从鸽子腿上解下小竹筒，急忙进宫献于汉王面前，汉王刘邦从竹筒内取出丝绢展开一看，心花怒放，立即对内侍下旨："快，速传孤王旨令，营内准备向秦地进发！"相府一只白鸽子落入文娟手中，文娟从鸽腿上解下信绢，急忙向丞相萧何献上。萧何一看满意地一笑："准备起程！"军中夏侯婴也从一只鸽子腿上取下信绢，哈哈大笑道："元帅果然奇才，来人，立即拔营起寨，三军向秦地进发。"翌日清晨，汉王刘邦率领着汉军人马及后宫、辎重、粮草缓缓向秦中行来。

废邱城，雍王宫主殿，龙灯凤烛香烟袅袅，章邯左右依坐着红裙舞女，翠袖歌姬，在悠扬的歌声中饮酒观舞。一将佐进殿禀报："启禀大王，汉军修复栈道又增加不少百姓，已修好一处。"章邯冷冷一笑："几百里栈道才修好一处，他何年尚能修好，看来韩信乃蠢夫也！不必理会，陈仓道已有章平把守，汉军插翅也难飞到我废邱城！"忽然殿外一阵凌乱的脚步声，章平垢面污衣与几名逃回的将佐跌跌撞撞冲进大殿，跪伏于地，失声痛哭。章邯大吃一惊，他一挥手，众舞女退下，乐声止。章平战战兢兢说道："大王，陈……陈仓……""陈仓怎么啦？"章邯追问道。"陈仓……失守！""啊！"章邯差点昏倒："啊！"他怒掷酒杯："你……你如何失守，又是何人夺去？"章平哭泣道："是韩信所率汉军人马！""啊！"章邯差点又昏倒："啊！难道汉军兵马是从天而降不成？栈道尚未修好，汉军从何处而来，难道他们真能插翅高飞吗？"一将佐道："大王，汉军未走栈道，是抄一条小径暗渡陈仓，现汉军已直奔废邱城而来。"章邯此时心急如焚，一军吏慌张进殿禀报："启禀大王，汉军兵分三路已杀到城下，将城池团团围困。"章邯急忙登城据守。

雍城外，韩信率领几万将士猛攻雍城，号角阵阵，杀声连天，雍兵抵抗不住，纷纷败退城内。

章邯在大殿内心急如焚，他令一名军校抬刀备马，决心与汉军决一死战。他刚出大殿，一将佐慌慌张张跑来禀报："大王，大事不好，不知城外何处涌来大水，已淹死我无数兵马，汉军已驾起船舟攻进城内。"章邯大惊失色，断定是韩信堵截了河水，又放水淹了城池。

汉军杀进城内，双方将士展开格斗，雍军又死伤无数。章邯、章平带领着百名士卒向城北仓皇逃命。他们刚出北门，一队人马拦住去路，为首一员大将金盔铁甲、手持长枪在阳光下更显得英气夺人。左有周勃、曹参，右有樊哙、灌婴。章邯一见，吓得魂飞天外。韩信在马上高喊道："章邯，本帅在此等候多时了，快快下马投降吧！""胯夫小儿，孤王久经沙场，没想到今日败在小儿你的手里，今日孤王与你拼了！""哼！"韩信冷冷一笑："章邯你恶贯满盈，今日便是你归天之日，休走，看枪！"说罢，横枪跃马直奔章邯而来。章邯见势不妙，与

韩信才交两个回合，便拔马向城内逃去。百名雍军士卒被汉军杀死杀伤，不少人跪地投降，章平被樊哙生擒。章邯逃回城内跑进宫中，韩信随后率领人马杀到；章邯又逃入大殿，韩信持剑追人大殿，后面曹参、周勃、樊哙、灌婴等将佐齐涌进殿内。韩信怒呵道："章邯匹夫，看你还想往哪里逃！"章邯见无路可走，前后左右均被汉军将士团团包围，遂拔出利剑向脖颈一抹，自刎而亡。此时夏侯婴也已赶到，他向韩信禀报道："启禀元帅，我汉军已分扎雍地各处，汉王及丞相和后队人马翌日即到。"韩信大喜："好！我军大获全胜，夏侯将军，速禀告大王，雍地全部平定。"随后，韩信又部署军马，兵分两路夺取塞地栎阳城和翟地高奴城，全部占领秦地。

一个月后，汉王刘邦率军进入废邱城。这时韩信已扫平塞地、翟地，司马欣、董翳二王相继投降，三秦全部平定，韩信班师回朝。

公元前二〇六年（汉一年）底韩信夺取三秦后，刘邦在秦地栎阳城建都，开放秦林苑，奖民耕作，减赋税，赦罪人，改秦社稷为汉社稷，关中大治，汉室崛起。同时谋臣汉军师张良在老母病故后，又从韩国返回汉室。项羽闻听三秦丢失，决心起大军讨伐，无奈三齐田荣举旗谋反，首先叛楚，项羽率大军尚在攻打齐都脱不开身，这时，张良又用一计，写书一封送与项羽，陈述时局利弊。信中写道："霸主项羽陛下，张良乃一介草夫，虽跟随刘邦，但能深明事理。汉王虽然失职，但只收复三秦，如前约即止，在三秦称王足矣，不再东进。惟有三齐叛楚，妄想灭楚称霸天下，故寄书阐明汉王之意，请霸王见谅！"范增知是张良施计，便请项羽暂且放下齐都不攻，先举兵攻打刘邦。无奈项羽认为不灭三齐，不杀死田荣气难咽下；刘邦虽夺三秦，并没举旗反楚，因此先平三齐后伐刘邦。谁知，这样一来，便使刘邦在关中站稳了脚跟，汉室有了喘息之机，刘邦采纳韩信之策，速在三秦大地招兵买马扩大实力。三秦大治，百姓安居乐业，只等夏收后起兵东征。刘邦此时思念家乡丰沛居住的父亲、妻子和儿女，便想派一支大军迎取。韩信已料范增必然派楚军监视汉王眷属，若汉遣兵接人，只怕人未接来，太公、吕雉和一双儿女命会休矣！刘邦心急如焚，韩信建议派两名熟悉丰沛地理的心腹，乔装成商人去丰乡暗中接太公及吕雉。张良也赞同此计。刘邦无奈，只好派薛欧、王吸二位偏将去丰乡迎取眷属。

关中平原今年夏粮遇上了大丰收，汉室粮仓均已堆满，三秦百姓丰衣足食，人人喜笑颜开。汉王宫主殿内这几日议事激烈，经过韩信、张良多方争议，刘邦才决心东征，但汉王刘邦决意亲统大军前往，关中大地交于长子刘盈据守。上次太公及吕雉因楚军监视很严未能迎回，只把长子刘盈偷偷接走。长子刘盈年幼，令曹妃娘娘相辅，丞相萧何辅佐据守栎阳城。

此时楚军项羽正讨伐三齐相持不下，汉军才乘隙而出，率军东征。从临晋渡黄河人河南，殷王司马卬率军阻拦，韩信略使小计破了殷军，活擒司马卬，汉军浩浩荡荡直抵洛阳。此进楚军项羽遣都尉陈平率军援助殷军，半途才知殷军大败，司马卬被活擒，陈平恐项羽治罪，便独自一人弃甲到洛阳城投汉。刘邦见陈平面如冠玉，相貌非凡，便委之重任。

陈平降汉后献上一计，让汉军乘项羽尚在千里之外攻打三齐，何不乘隙攻下楚都彭城，刘邦甚是高兴，便决意亲统大军前往，让韩信据守洛阳。韩信多次谏阻，刘邦不听，他恐韩信再夺彭城立功，功高震主，故让韩信据守洛阳。汉军一路所向披靡攻下楚都彭城，项羽此时也攻下齐都，杀了田荣，立田假为齐王。当项羽闻知刘邦偷袭了彭城，立即起大军杀回彭城。刘邦做梦也没想到项羽会率大军悄悄杀回，汉军大败，死伤几十万人马，汉王刘邦差点还丢了性命，多亏太仆夏侯婴拼死保驾才得以逃回。韩信闻知汉王刘邦大败，便亲统人马前往荥阳救驾。刘邦被救回，可汉军元气大伤，多亏韩信在荥阳多次击败楚军追兵，汉军才得已喘息，要不项羽会一鼓作气直追杀到三秦栎阳城中。在关中栎阳城中，丞相萧何闻知汉军大败，便征来新兵卒数万和筹来粮草数十万押送荥阳城中，汉军得到补充，军威才开始振作。

荥阳城。韩信巡城刚回到府邸，进书房卸下戎装。“启禀大将军，大王驾到。”“哦！”韩信一怔：“大王今日亲踏宅门，定有大事。传令！府门列队迎驾！”韩信急忙整衣出府门迎接。

此时刘邦在张良、郦食其、周苛等人簇拥下慢步而来。韩信率众武士列队相迎。刘邦在众臣簇拥下来到厅堂下首落坐。众臣分立两旁，二侍卫急忙献茶。刘邦喝了一口茶水，然后歉意地说：“彭城进兵，孤未听韩卿言，至今悔恨莫及。现各地诸侯趁势倒楚反汉，汉被孤立，又兵力不足，孤的宏业恐难实现。不知韩卿有何高见卓识？”韩信微笑说道：“大王可曾记得昔日在汉中起兵东征之时，你我君臣商议的大策？”刘邦淡淡一笑：“这，孤王怎能不记得。但是现在形势所变，我汉军已遭挫败，如何能与这强楚争雄？”“大王，楚虽强盛，但不是不可破。争夺天下不能凭一时强弱而定。汉军虽弱，只要分兵两路，采取东拒北征，方略必能夺取天下！”刘邦高兴地从座位上站起：“何为东拒北征？”韩信说道：“大王可差遣一部分人马，从荥阳起兵，向北挺进，先取魏，再入赵夺燕，然后从燕入齐平定北方，扫除楚的两翼。等北方已定统归汉属，然后北、东二路南下会师，合击楚军。”刘邦满意地点点头：“嗯！那东拒……？”“就是坐镇荥阳牵制楚军西进，防楚夺我关中，与楚周旋在荥阳，使楚无力顾及北方。等北方平定，两路夹击，何愁不破楚军？”“嗯，此策不错！”刘邦转念一想：“可是北征谈何容易？”郦食其也插话说道：“北征兵马太少，加之路途遥远，山径崎岖，给养供应困难重重，任重道远，何人能率军平定北方？”韩信思虑片刻：“大王！臣愿率一部分人马平定北方！”“这……”刘邦有些犹豫不决。张良急忙提醒：“大王！北征非大将军莫属！”刘邦猛然醒悟：“哦，对！对！北征非韩卿莫属，孤王封你北征大元帅之职。”韩信急忙起身施礼：“谢大王！为了汉室一统大业，臣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好！”刘邦高兴地说：“孤等候韩卿佳音。孤亲统一部分人马东拒楚军。”此策就此定下。刘邦率众臣回到行宫，韩信分了一部分人马待命出发。

荥阳城外。校军场上，旌旗招展，北征兵马个个精神抖擞，威武雄壮。一面帅字旗在队列前迎风飘扬。将佐曹参、灌婴骑马立于队前，韩信在两名侍卫相

伴下身穿金甲玄衣走来。曹参急忙下马来到韩信面前施礼："启禀元帅，北征兵马准备完毕，待命出发。"韩信点点头，然后拔剑在手向空一举，号令三军："北征将士，同盟一心，不负众望，扫平北方！"众将士齐声振臂高呼，呼声响彻云霄。刘邦在众臣簇拥下慢步而来，韩信迎上。刘邦拉着韩信的手来到队前，望了望汉军阵容，满意地笑道："韩卿不愧为大将之才，孤有韩卿，何坚而不摧也！"韩信向刘邦道："臣以为，北征虽说不易，东拒更不可小觑。荥阳城中三军人马全靠敖山粮仓，此仓万不可有失。请大王切记！"刘邦淡然一笑："韩卿放心，敖仓有周勃将军据守，不会有失。卿即起程，勿负孤望。"

于是，韩信率兵马踏上了北征的路程。

韩信率军北征，大军到临晋津，望见对岸统是魏兵，不便轻渡，乃择地安营，赶办船只，与魏兵隔河相距，暗中却派士卒探察上游形势，不多时探马来报，上游的夏阳地方魏兵把守甚少。韩信听后，便已想出一破敌之策，他令曹参带领人马入山，砍伐木料，不论大小运到军中。曹参领令走后，韩信又令灌婴带领将士分往市中，购买瓦罂，每瓦罂须容纳二石，购买千数，灌婴领命去办。没有几日，曹参、灌婴统统回来缴令，各将木料、瓦罂一律办齐。二将心中纳闷，便直言问韩信："元帅，用木料及瓦罂做甚？"韩信微微一笑，从怀中取出两条信绢："汝二人各取一条，看后自然明白！"二将接信绢在手，出了大帐，展开一看，原来元帅是让他二人制造木罂。这木罂造法，信绢画有图形，原是用木料夹住罂底四周缚成方格，把千罂分做数十排。让二将制好以后再行令。灌婴对曹参道："元帅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渡河船只已有，造这木罂有何用？"曹参微微一笑："想元帅定有妙计，我等只依法制做罢了！"二将星夜赶造，不到数日，已将木罂制齐，前来缴令。韩信满意地点点头："待至黄昏，灌婴你留兵数千，只准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守住船只，不得擅自渡河，违令者斩！""是！"灌婴领令出帐。韩信又对曹参道："曹参与本帅率军搬运木罂，连夜行到夏阳，即将木罂放入河中，每罂内装载兵卒两三人渡河，不得有误！"曹参领令出帐后，立即行动，率军将木罂运到夏阳。韩信与曹参一同率军乘坐木罂划到对岸。那魏将柏直只是注意把守临晋津，不使汉军渡河即可，哪想到韩信用木罂渡军。夏阳平日守军甚少，见河面没有船只，只是放心睡觉。天色已亮，汉军人马全部渡过。曹参拍马舞刀杀奔魏营，魏兵尚在梦中，毫无抵抗，纷纷投降，魏将柏直被杀。汉军直杀到魏都平阳，魏王豹闻听慌了手脚，亲自开城迎敌，他既无韬略，又无本领，未战几合，被韩信、曹参将帅二人活擒，魏兵见魏王豹活擒，纷纷弃甲投戈跪降。魏地扫平。韩信令人把魏王豹及家眷囚入槛车，运往荥阳听候汉王发落。

再说项羽自彭城大捷，汉军元气大伤，心里十分高兴，本可乘胜追击，直捣关中，无奈被韩信率军拦阻，只好班师回朝。这一日早朝，项庄启奏："启奏陛下，据探马来报，汉大将韩信率军北征，已夺取魏地，擒魏王豹。"项羽大惊，问众臣道："汉军上次彭城兵败，已死伤几十万人马，他怎有兵力北征？这韩信胯夫真不简单，当初悔不该没纳

丞相之言，使胯夫小儿弃楚投汉。”丞相范增急忙出班启奏：“陛下不可忧虑。汉军此次能北征说明兵援已补上，但汉军不会有多少兵力，韩信北征，荥阳城内必然兵力不足，何不将计就计，来个马踏荥阳城，乘势活擒刘邦，灭了汉军，看他韩信又能如何?”项羽点头称赞：“丞相所见正合吾意。”项羽立即下令，发倾国之兵马踏荥阳。

再说汉王刘邦闻知韩信大捷，魏地已平，又见魏王豹及眷属押到，心里十分高兴。他见豹妾薄姬颇有几分姿色，想纳为妃，又恐怕大臣们非议，他只好把近臣郦食其召入后宫商议。郦食其已摸清刘邦心意，便说道：“大王既然看中，何惧他人言语，纳入后宫便是。至于魏王豹等人愿降者纳入宫中为奴，不愿降者杀掉就是。”汉王刘邦满意地点点头。郦食其手捋胡须进谗道：“常言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韩信北征率精兵远去，难道大王就没多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哟!”刘邦微微一笑：“孤赐两名心腹侍女，卿不懂孤的用心?”“臣虽猜出一二，可是大王据守荥阳，万一项羽发大军围困荥阳……”刘邦淡淡一笑：“孤已考虑过兵来将挡，水来土围。孤坚守荥阳，项羽奈何不了!”“如若先取敖仓，断我军粮草，岂不……”郦食其又说道：“周勃几百人马能否抵挡楚军大兵压境?”“这个……”刘邦有些张中结舌。**“依卿之意?”“速调曹参、灌婴二将精兵协同周勃据守敖仓，如若不然荥阳将会……”郦食其不再向下说去，刘邦心里明白，立即传旨，速调曹参、灌婴两支精兵回兵据守敖仓。**

且说韩信据有平阳，筹备伐赵，此时汉王使命到，韩信立即接旨，原来是调曹参、灌婴两支精兵回荥阳，据守敖仓。韩信遵旨，只好让曹参、灌婴率军离去。曹参、灌婴二将本是韩信左右臂，这一离去兵力减去大半，使韩信显得沉闷压抑，他独自一人在书房内推开窗户，眼望那乌云翻滚的天空，不由长叹一声，陷入沉思。从他那布满血丝的双眸中，可以看出他那难以言状的痛苦和焦灼。此时两名偏将靳歙、陈豨走进轻声道：“元帅!”韩信慢慢转过身来：“二将请坐。”靳歙眼含泪水：“元帅，大王对咱们也太……”“别说了!”韩信苦笑道：“大王也有他的难处，虽调走曹参、灌婴两支精兵，但也是为了荥阳安危，万一敖仓失守，后果不敢设想，这关系到大王及众臣的安危!”“那我们北征还进军不进?”陈豨不满地说道。“才刚刚夺取魏地，就将人马抽走一半，这伐赵还伐与不伐?”“要伐，不但要伐，还要取胜才行!”韩信坚定地说道。“这人马粮草从何而来？如今咱们北征军只剩下一万多人，这……”陈豨又忿忿不平地说道。“不是本帅让你们赶紧四处募兵吗?”“刚招募的新兵，又如何能征战!”韩信坚定地微微一笑：“只要我等赶紧操练，指挥有方，新募兵丁仍可以驰骋疆场，杀敌取胜。”韩信接着又说：“此时此刻要以大局为重，咱们将帅要团结一心，才能北征胜利。走，咱们到募兵处看看!”陈豨与靳歙点点头跟随韩信来到募兵处。远远就见募兵处三五成群的青壮汉子踊跃报名参加汉军，一个个穿戴汉军服装喜笑颜开。又走到另一处，见四方百姓肩担、背扛着粮草纷纷交售给汉军，将士一一付清银两。韩信望着这一切，与靳歙、陈豨互相对视满意地

一笑。靳歙高兴地问道："元帅，何时起兵伐赵?"韩信果断地答道："再等几日，粮草筹齐，择日起兵直驱赵都。"

且说赵王歇闻知韩信伐赵，慌忙令赵相陈余率军扼险固守，阻住汉军。赵有一谋士广武军李左车，进言陈余道："韩信乘胜远来，锋不可当，但臣闻他新募兵卒，粮草又匮乏，他敢远道至此，必利速战。好在赵国门户，有井陉口为险阻，车不能行走，马不成列队，彼若从此处进兵，势难兼运粮草，所有辎重定在后面，请丞相给为臣三万人马，由间道潜出，截取汉粮，丞相深沟高垒，勿与交锋，韩信前行不得战，后退不得还，荒野无所掠食，汉军不出十日，必然自乱，那时微臣便将韩信所擒。"陈余本是书生出身，见识迂腐，又不尚诈谋，他怎能采纳李左车之计，立即喝退左车，使之离去。

再说韩信率领大军行至井陉口，天色微明。他吩咐靳歙、陈豨如此这般授以密计，令他们分头去办，二将领令而去。韩信令裨将分给干粮，叫全军暂时果腹，传谕将士道："今日便好破赵，待成功后，会食未迟。"将士都很惊疑，但又不敢细问，只好按令行事。韩信又挑选精兵万人，令其渡过泜水，背着河岸，列阵等待。赵军望见汉军背水列阵，不禁窃笑，就是汉军将佐也都惊疑，但都知元帅平日善于兵谋，往往令人不测，所以依令照行，不敢违抗。韩信率军渡河到了对岸，见赵兵据险立营不肯出战，便令将士扬旗示众，击鼓助威，并大模大样率军闯入井陉口。

此时早有赵军士卒报告陈余，陈余大开营门，麾兵出战。赵兵仗着人多势众，一拥上前来围韩信，韩信传令撤兵，并令将士抛下帅旗，掷下战鼓，一齐返奔，驰还泜河营寨。陈余部众得胜，奋力追击，还有居守营内的赵兵，也想乘势邀功，赵王歇也被拥了出来，掠取汉军旗鼓。韩信率军退到泜河边，陈余率赵兵追至。泜河岸边本有汉军列阵等待，见韩元帅回寨，立即出兵拒陈余兵马，韩信立即下令全军将士与赵军决一死战，退后者斩。元帅令下，个个奋勇，人人争先。一场鏖战，赵兵死伤无数。陈余见时已中午，将士人人都已腹饥，不能再战，便令撤兵。不料到了途中，望见赵营寨中旗帜已变颜色，仔细辨认，才看清是汉军旗帜，不由得魂驰魄丧，色沮心惊。正在慌张之时，突然斜刺里冲出一军，乃是汉左骑将靳歙、傅宽引兵杀来，陈余急忙率部对阵。突然又有一路汉军人马杀来，当头拦住，为首者陈豨、张苍，吓得陈余不知所措。三路人马合击，赵军大败，陈余被杀，赵军将士纷纷跪地投降，汉军大获全胜。韩信升坐大帐，靳歙押到一个俘虏，推入帐中禀报："启禀元帅，汉军大捷，末将已活擒赵王歇，前来交令。"韩信大喜，令人推出帐外枭首示众。赵王歇被斩，赵地扫平，汉军进入代郡城歇息休整。

韩信率军驻扎代郡城后，他又在帅府内伏案查阅燕、齐地形图，侍女翠珠献茶置案，靳歙、陈豨、傅宽等将佐抬着一坛酒，带领十几名偏将径直走进府门，来到屋内喜气洋洋跪拜朝贺："恭喜元帅，贺喜元帅，祝元帅身体安康!"韩信抬头一笑："众位！这是为何，快快请起!"众将起身，靳歙倒满一杯酒呈上："伐赵大捷，今日我等特备薄酒一坛，以表我三军将士敬佩之心，请元帅先干三杯!"韩信无奈，只好盛情地

接杯连干三杯。众将齐声称道："好！"陈豨高兴地上前几步施礼道："元帅，众将士至今不明，特来请教元帅！""哦！"韩信惊喜地问："众将何事不明？"陈豨很敬重地问道："元帅大战赵军二十余万，背水列阵，乃是兵家大忌，竟然得胜，这是何原因？"韩信望望众人，微微一笑："你等虽阅读兵书，却未得奥旨，所以生疑。兵法云：'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便是此意。请想，我军新旧夹杂，本帅又无分身之术，促使将士奋勇杀敌，惟置死地，使将士各自为战，然后才勇气百倍，无人可挡。这又如兵法所言，驱市人为战，不能不用此术也！"众将听罢无不佩服。此时一士卒进来禀告："启禀元帅，赵谋士李左车捉拿到，请元帅发落！""哦！"韩信又惊又喜："上次井陉口大战，让他走脱，此人非同一般，将他带进来！"李左车被缚，被两名士卒押了进来。他立而不跪，韩信一拍几案："李左车，你因何不跪？""哼！"李左车心里不服："可惜赵王、陈余昏庸君臣，不纳我言，要不怎能丢失赵地，成你阶下之囚。"韩信微微一笑："本帅知你很有智谋，可惜你错保了昏庸无能的赵王歇。常言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汝竟不懂此理，所以成为阶下之囚。""唉！"李左车长叹一声："李某空有满腹经纶，竟落了个国破家亡，做个刀下之鬼。今已被擒，要杀要剐，随你尊便，给个痛快就行。"韩信离案来到李左车身旁，上前亲解其绑："汝是条好汉，本帅赦你无罪，请坐！"李左车感动得热泪盈眶："谢元帅不斩之恩，在下早已敬仰元帅才能，如若元帅不嫌，在下甘愿在元帅帐下听令！"韩信大喜，立即令人备酒给李左车压惊，众人见元帅收服李左车，人人都敬佩离去。翠珠献茶置案。李左车落坐问道："不知元帅平赵后还征何处？"韩信一笑："本帅思虑北向攻燕，然后东向伐齐，不知李将军以为如何？"李左车思虑片刻："元帅名闻四海，威震天下，无人不敬佩。可是汉军经久争战，将劳卒疲，莫若元帅安兵歇息，镇抚赵地百姓，再选遣一舌辩之士去燕都晓示燕王利害，燕王惧元帅声威，不敢不降。待燕已降，元帅再起兵东向伐齐，齐成孤立，不亡何待？""此策善也！"韩信十分称赞。"不过遣谁去燕说降合适？"李左车自告奋勇道："元帅，在下不才，愿去燕都劝降！"韩信大喜，立即委派李左车前往燕都。李左车到了燕都，阐明利弊，果然燕王愿降。燕地全部属汉。

韩信率军一路所向披靡，涉西河，虏魏王，擒夏说，诛成安，毙赵王，名闻海内，威震四方，燕王投降，韩信便挥师东向伐齐，不出三个月便灭了三齐，收城池七十余座。齐地土地辽阔，韩信率军驻扎，安慰百姓，可韩信手下有一谋士蒯彻能言善辩，他蛊惑将士上表韩信，让韩信请命汉王加封韩信为假齐王，以便好镇守三齐大地。韩信在众将恳求下，违心地写了奏表送于汉王。在此同时，汉王刘邦被楚军困在荥阳城中，敖仓失守，粮草皆无，张良、陈平用离间计，迫使项羽怀疑丞相范增、钟离昧等忠臣良将，项羽果然中计，撤了钟离昧将军之职，范增见项羽不信任自己，便提出辞职，告老还乡，项羽恩准，范增离楚后一路忧郁成疾，终于未回到彭城途中患疾而亡。后来项羽醒悟知道中计，便恢复了钟离昧等人的将军之职，派人

去接丞相范增，未想到范增途中已死，项羽十分悲伤，便令人厚葬了范增，再次围困荥阳。汉军被困，荥阳粮绝，无计可施只好开城假降。汉偏将纪信假扮汉王刘邦乘坐龙凤辇，在汉御史大夫周苛陪同下，开了东门，趁着天黑假降，汉王刘邦与张良、陈平等臣假扮妇人混在妇女之中，开了北门，趁天黑而逃。项羽在东门见了龙凤辇甚是高兴，令将士将刘邦拖下车来，没想到竟然是纪信假扮，大怒之下烧死纪信与周苛，攻进荥阳城中，汉军大败，伤亡无数。汉王逃出荥阳来到成皋，与英布兵合一处，项羽闻知刘邦逃到成皋，挥师来攻成皋，汉王料知成皋难守，又带夏侯婴等众臣北向修武来找韩信。此时韩信率军刚平定赵地，说降燕王，准备伐齐，可巧刘邦驾到，急忙出帐迎接，汉王刘邦到了韩信大帐才长长喘了口气，他令韩信部将兵马截留一半与他，他率人马驻扎修武欲图收复荥阳，另一半令韩信率领东向伐齐。韩信伐齐大捷。汉王刘邦率军在彭城、英布两军协助下又攻下荥阳。项羽因惧彭越偷袭彭城，故与彭越、英布大战，荥阳城内兵将较少，被汉王巧取。项羽又杀回荥阳来困汉王。此时韩信差的吏使送奏表到，汉王本因爱臣郦食其贪功前往齐都去劝说齐王降汉，可韩信未接到不让攻齐旨令，便发大军攻齐，齐王大怒，立即将汉王派的使臣郦食其烹入油锅。郦食其死，刘邦十分悲痛，本已怨恨韩信不该贸然进兵攻齐，此时接到奏表，展阅后顿时拍案大怒："韩信小儿胆大妄为，竟然想做假齐王，还说为了镇守三齐，实在可恨！"一旁张良急忙低声劝阻："大王，而今汉方不利，怎能禁止韩信为王，如果韩信生变，汉大业完矣！"刘邦甚也聪明，立即停住骂声，令人刻好王印，使张良亲赴齐地加封韩信为真齐王。韩信封王后，正准备择日起兵伐楚。此时，项羽在谋臣献策下，也派遣楚使舌辩侯武涉前来离间韩信，给韩信王印，黄金万两，让韩信自立为王，楚、汉、韩信三足鼎立。若韩信助汉，汉胜；助楚，楚胜。若汉胜日后必危及元帅性命，楚胜不致元帅自危，请韩信三思。韩信驳斥了武涉所言，并说道："我韩信前事项王，只不过执戟郎中，言不听，计不用，所以才弃楚归汉。汉王授我大将军印，付我数十万将士，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我若负德，天理不容，我誓死从汉，决不自立。请汝复告项羽美梦休想。"武涉无奈只好收起王印、黄金叹气而去。武涉回到楚营，回禀了项羽，项羽无奈，只好按谋士所言，派遣两名刺客趁天黑来刺杀韩信。韩信在寝室内熟睡，房上两条黑影轻轻落下，他们身穿夜行黑衣、蒙着面，手执钢刀，轻步来到韩信寝室窗口。轻拨窗闩，掀窗翻身跳人。同时另有一个黑影人也从房顶落下到窗口跃身而入。两个蒙面人借着窗口微光，蹑手蹑脚来到榻前，一人掀开帷帐，另一人刚把刀举起，突然屋内有人高喊："有刺客！"这一声刺破夜空，犹如晴空一声霹雳，二刺客大吃一惊，随着声音，后面有一黑影人窜上一剑，将举刀人的刀架住，脚下一个扫堂腿，将举刀人踢倒，另一蒙面人举刀便向黑影人砍来，黑影人一架，二人厮杀在一起。

此时韩信惊醒，翻身跃起，从墙上拔出利剑来战被踢倒的蒙面人，二贼见事不妙，从窗口前后窜出，黑影人随后紧追。同时门口守卫士卒被惊醒，也大

声喊叫抓刺客，随着喊声，十几名侍卫举着火把，拿着兵刃纷纷向庭院赶来，两个蒙面人窜到庭院，脚还没站稳，后面黑影人紧跟着举剑便刺，三人厮杀起来，韩信也窜入庭院与二贼厮杀，一蒙面人虚晃一刀，翻身窜上房顶而逃，另一蒙面人刚想逃窜，被黑影人刺伤大腿，蒙面人大叫一声扑通栽倒在地，过来几名侍卫将刺客绳捆索绑，韩信向黑影人深施一礼："多谢壮士救命之恩！"

再说楚霸王项羽派刺客杀韩信未遂，便发倾国之兵三困荥阳，并将丰乡掠虏的刘邦父及妻女押到荥阳城下，架起油锅要挟刘邦开城投降。刘邦却反唇相讥："项羽汝辈，你我同事义帝，结盟约兄弟，我翁便是汝翁，汝欲烹汝翁，还请分我一杯羹！"项羽气得哇哇直叫，摘弓搭箭向刘邦射去，刘邦中箭受伤，楚汉在荥阳又僵持数月，刘邦无计可施，只好派使臣去楚营议和，从此化干戈为玉帛，愿划荥阳城外一条鸿沟为界，沟东属楚，沟西属汉，从此罢兵互不侵犯。项羽因帐中乏粮，再僵持下去楚军难免吃亏，便答应了刘邦请求。楚汉双方各遣使臣签订了合约，项羽便撤军返回彭城。此时刘邦在谋士张良劝说下，请刘邦下令速调韩信兵马半路拦截楚军，执行韩信北征时献的大计：北、东二路南下会师，合击楚军。刘邦醒悟，便立即传旨，又亲率大军追击。楚军以为议和后大事已了，将士们个个都兴高采烈、偃旗息鼓，慢悠悠向彭城撤退。刚行至灵璧垓下，突闻韩信率汉军拦住去路，又闻刘邦率军随后追击，项羽气得暴跳如雷，他立即传令在垓下扎下营盘，仗着楚军还有十几万人马，自己勇力过人，还惧怕韩信娃娃？便立即准备迎敌。

此时刘邦在军师张良劝说下，复用韩信为三军大元帅，调度诸军，有违令者斩！汉军各路人马都由韩信统一指挥后，声威大振。韩信素知项羽骁勇，无人能敌，便将各军分作十队，各遣将率领，分头埋伏，回环接应，再请汉王刘邦守住大营，韩信亲率三万人马出营挑战。项羽单靠勇力，不善兵谋，一闻韩信率军逼营挑战，立即拍马舞戟来战韩信。韩信率军且战且退，诱引项羽率军入网，项羽果然中计，猛追汉军。约莫追了几里，韩信见楚军已入埋伏之中，便鸣放号炮，唤起伏兵，先有两路杀出，与项羽交战，项羽全不退怯，鏖战多时，冲开血路又追韩信。韩信一举令旗，第二声炮响，又有两路伏兵杀出，截住项羽，再加厮杀。项羽杀得性起，仍然有进无退，接连又是几声炮响，伏兵迭起。项羽杀开一重又是一重，杀到七八重时，部将已经七零八落，楚军已死伤无数，项羽也自觉疲乏，渐渐想退却下来。哪知韩信又举令旗，十面埋伏一齐发出，都向项羽马前围裹拢来，所有楚兵，好似鸡犬一样纷纷四窜，只靠项羽一杆画戟，怎挡百般兵器！项羽此时悔恨无及，只得令钟离昧、项庄、季布等人断后，自己当先杀开一条血路，逃回垓下大营。

自从项羽起兵以来，从未经过这般挫辱。韩信用十面埋伏之计杀败项羽，把楚军十多万精兵击毙三四万，投降三四万，剩下三四万残兵败将逃回营中。汉军大获全胜，韩信黄昏升坐大帐，张良、陈平左右相陪，各武将下首伫立，韩信扫视众将一眼，严肃地说道："本帅用十面埋伏击败楚军，今晚定将楚军一举歼灭。曹参、周勃听令！""末将在！"二将出班。韩信从案中取出两枝

令箭："令你二人带上两万人马，埋伏在乌江口岸，项羽逃此，你二人按上写计策行事，不得有误！""遵令！"二将接令退下。韩信又抽出第二枝令箭："其他众将严阵以待，今晚二更点燃篝火全唱楚歌，再请些民间女子围坐篝火一同皆唱楚歌。楚歌由子房、陈平下去教唱你等，然后各将领教会士卒，不得有误！"樊哙犹豫再三还是出班，不满意地问道："元帅，这是哪一种兵法，末将从未听说唱歌能把敌军唱败！""嗯！"韩信把脸一沉："樊哙休得无礼，违令者，斩！"众将都默默无声，樊哙只好退下。

项羽败回大帐，爱妃虞姬秀丽聪慧，急忙迎上劝慰："胜败乃兵家常事，愿大王不必忧虑！"项羽摇摇头："你等妇人不知今日战事利害，我项羽从未遇此恶战！"虞姬急忙令人盛上酒肴给项羽解闷，项羽与虞姬落坐对饮，由于项羽疲惫，心情不好，未饮几杯便睡眼朦胧，虞姬将项羽搀扶到榻上，项羽合衣入睡。虞姬守候榻旁，甚觉不安。二更时分，忽然隐隐约约帐外传来阵阵歌声，男女声夹杂，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仿佛鹤啼鸿哀。虞姬忍不住潸然泪下，回顾项羽却是鼾声如雷，不由自主走出帐外，一阵阵凄婉、深沉的歌声传来……

战云千重兮田园荒，妻儿在野兮母在堂。

鸿雁传出兮飞不度，征人何日兮返故乡？

项羽突然也被阵阵歌声惊醒，翻身坐起大声喊道："虞姬！虞姬！"虞姬闻声急忙进帐，项羽惊疑地问道："为何四面都传来楚歌之声？"虞姬泪下："陛下，这歌像从汉营传来！""汉营中哪有这许多楚人，难道孤军中已经哗变？或者楚地已被汉军占领？"项羽正在惊疑，钟离昧慌慌张张跑进大帐："陛下，大事不好，军中将士皆已逃散，现只剩下八千江东子弟！"项羽下榻站起，一把抓住钟离昧衣领："你……你说什么？那项庄、项伯等众将何在？"钟离昧吞吞吐吐回答："都已逃散，听一士卒讲项庄在逃离时被汉军擒住被斩，现首级已挂在桅杆之上。项伯听说已投降汉营。""无耻之辈！"项羽恼怒地急忙走出大帐，环顾四周，只见楚军大营帐包东倒西歪，进入几顶营帐内查看，均空空荡荡，心中掠过一丝悲凉，再出帐远眺，见汉军大营篝火通明，身着楚军服的士卒三五成群皆歌，项羽又回到大帐，见虞姬已哭成泪人，自己也落下几滴悲伤之泪，便抓起酒壶咕咚咚一气喝下。此时钟离昧出帐，牵来项羽坐骑乌骓马，项羽瞧见挥泪唱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姬虞姬奈若何？"虞姬听罢项羽悲歌，心如刀绞，泪如泉涌，也随声吟唱："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卿生！"虞姬拔出佩剑向脖颈抹去，顿时血溅一地，项羽急忙拦阻已是不及，遂抱尸痛哭："虞姬，是孤害了你呀！"钟离昧与几名士卒牵来乌骓，扛着大戟挥泪走进大帐："陛下，乘着天色未明，还不快带领八千子弟冲出重围！"项羽强忍悲痛拔出佩剑，挖土与钟离昧等人掩埋好虞姬尸体，然后跨上乌骓，手持大戟，带领八千亲兵，经过血战终于杀出重围。

时过中午，项羽率领着残兵败将疲

惫不堪行到乌江口岸，突然一阵锣响，顿时杀出两路汉军人马，为首曹参、周勃各率人马拦住楚军去路，楚军吓得魂飞天外，乱作一团。汉军眨眼杀到，双方展开一场短兵鏖战，楚军又死伤无数。项羽拼命厮杀，冲出一条血路奔向乌江口岸。他回头一望，跟随他到江边的只剩钟离昧独自一人，他望着滔滔江水失声仰天长叹："苍天哪，苍天！难道真要亡楚吗？吾何时怒犯天颜？"此时江面一叶扁舟驶来，钟离昧瞧见大声喊道："船家快来救霸王。"小舟驰到岸边，船公自我介绍道："我乃乌江亭长，是陛下臣民，今闻陛下兵败垓下，特驾舟到江边巡视接应。"项羽闻听又悲又喜。船公催促道："此江只有我这一舟，快请陛下上舟，过了此江不远便是江东会稽！"项羽听到会稽二字，感到一阵天旋地转，差点跌倒，钟离昧手疾眼快急忙搀扶："陛下，你怎么啦？"项羽长吁一气："天已亡我，我何必过江！吾与江东子弟八千余人，渡江西行，今独我一人生还，吾还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兄弟？钟离昧你牵上我的乌骓上舟去吧！"此时汉军已杀声震天，蜂拥向江边追来，钟离昧泪如雨下："陛下，你不上舟，我怎能抛弃陛下独自一人乘舟！要死我愿随陛下一块死，要走咱们一起走！"项羽大怒，把脚一跺："钟离昧你还不快走！"他将钟离昧推到舟上，把乌骓拉上小舟，然后转身拔出佩剑，杀入敌群。汉军将士知项羽骁勇，人人吓得连连后退。此时船公长叹一声驾舟离岸，驶向江心。那乌骓望着项羽一声长鸣，"扑通"跳入江中而死。项羽瞧见，心如刀绞，他大吼一声挥剑连砍几十名汉军，汉军无人敢靠近他半步，项羽望着面前汉军一员将佐面熟，便哈哈一笑说道："汝不是孤的同乡吕马童吗？汝主刘邦悬赏万金，封万户侯要孤人头，孤就送汝辈一个人情，拿吾头去领赏去吧！"言罢，把利剑向脖颈一抹自刎而亡，终年三十二岁。楚国就此灭亡。

公元前二〇二年初，长达五年的楚汉相争，终于在垓下一战结束。同年二月，刘邦登基，尊为皇帝，史称汉高祖，暂都洛阳，国号汉，华夏九州又成一统。

洛阳南宫大殿，刘邦黄袍玉冠，气势威严地在四名宫女、四名内侍簇拥下，步履迟缓地进殿上首高坐。群臣叩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众卿平身！"刘邦扫视群臣微微一笑。群臣起身分立两旁。刘邦开始封赏群臣："韩信听封！"韩信急忙出班跪下："微臣在！"刘邦扫视韩信一眼微笑道："韩卿为汉室立下十大功劳，劳苦功高，朕赐你有特赦大权，见天、见地、见兵器三不死。"韩信感激得热泪盈眶："谢陛下隆恩！"群臣望着韩信人人羡慕。刘邦又说道："如今天下已定，四方太平，不再劳师征战，应该休兵息民，故请韩卿交还军符、帅印。""这……"韩信心中不快，但只好勉强应声道："微臣遵旨！""韩卿生长楚地，习楚风俗民情，因此改封为楚王，镇守淮北，荣归故里，衣锦还乡。定都下邳，择日起程上任。""臣遵旨！"韩信起身回班。刘邦又一一封了彭越、英布、张良、萧何、曹参等等文臣武将，并尊太公为太上皇，封吕雉为皇后、刘盈为太子，大赦天下，颁布诏旨，以告百姓。

翌日黄昏，韩信闷闷不乐来到洛阳城外小河旁散步，此时张良散步迎面走来，拱手施礼："恭贺贤弟封为楚王，

不日就要光宗耀祖，衣锦还乡了。”“子房兄真会取笑人。”韩信苦笑一声：“帅印、军符均已交还，你说我这做大将的心里……唉！子房兄，你为何只肯请封个留侯？”张良眼望夕阳余辉：“金钱、功名、地位，乃是虚有之物，不可贪也！辅汉成功，吾愿已遂，有块留邑之地，足已颐养天年了。”韩信心中一惊，若有所悟：“子房兄视功名如粪土，吾自愧不如！”张良一阵大笑：“知足者长乐也！”韩信也开怀大笑。二人择一草坪席地而坐，韩信说道：“记得当年吾在楚苦谏项羽，让定都关中，项羽不纳吾言，结果事败垂成。关中依山傍水，土地肥沃，左有崤函、右有陇蜀，三面据险，一面临河，河能运漕，真乃帝王之都。洛阳虽有险阻，但中区狭小，不过百里平原，楚汉相争数年，疮痍满目，土地荒芜，田地瘠薄。吾不日就要离京，请子房兄转告陛下请他移都关中。”“贤弟真是栋梁之才也！”张良敬慕地说道：“前日也有一位陇西戎卒名叫娄敬，千里赶来求见陛下，也是劝说陛下移都关中。”“那陛下之意？”“还没决定，可朝臣们都不乐意西移！”“那子房兄之意……？”“你我所见略同，不过常言道：水到渠成，凡事不可强求，若陛下问起移都之事，吾会直言不讳的！”韩信信任地点了点头。

数月后，韩信回到了楚地，定都下邳，他将楚地治理得井然有序，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一日他心里怀念故乡，便带领属下李左车、田瑞娘一班侍卫前往淮阴旧地重游。街上百姓听说楚王韩信返乡，都争先恐后观看，人人赞叹不已。韩信等人来到早年他受辱胯下的小桥街头。韩信触景生情，便对李左车、瑞娘讲诉了当年他为给漂母抓药卖剑、受辱胯下的经过。李左车抬头见小桥桥头柱上刻着“胯下桥”三字，大怒道：“来人，将那小桥柱上‘胯下桥’三字铲掉，改为将军桥。”韩信阻止道：“左车不必，让那‘胯下桥’留着醒世后人吧！”一侍卫来到李左车面前低语几句，李左车厉声喝道：“将那恶少带上来！”四名武士押着昔日县衙恶少来到韩信面前，恶少一见吓得瑟瑟发抖，跪地叩头连连求饶：“楚王爷饶命！小人有眼无珠，昔日冒犯楚王，求楚王爷饶命！”“你这样昔日县衙恶棍，不知欺压多少黎民百姓，今日我为百姓除了此害！”田瑞娘说罢，拔出佩剑就刺。韩信急忙阻拦：“瑞娘且慢！”瑞娘一怔收剑：“楚王你……！”韩信环顾四周，见围观的百姓像潮水一样涌来，沉思片刻：“得饶人处且饶人，他昔日虽仗势欺人，羞辱过吾，但如今只要他能悔过自新，知错也就算了！”“楚王你这是何意？”瑞娘生气地说道：“昔日胯下之耻，你背了多年，如今正是报仇之时，你却变得心慈手软。”韩信微笑着对众人说：“他虽有过错，但非有杀身之罪，将他放了！”两名武士给恶少松绑，恶少感激涕零，伏地连连磕头，声泪俱下：“小人该死，你就杀了我吧！”韩信转身背对恶少：“汝辈起来，今饶你不死，回去好好思过，重新做人。”“谢楚王！”恶少谢恩起身。韩信对属下一挥手：“咱们回府邸歇息吧！”众人随韩信离开了淮阴街。

不久，韩信与瑞娘便喜结良缘。

这日，楚王府门前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四名家丁守卫两旁，一位布衣素士，头戴斗笠，腰佩宝剑，短衣破衫来

到门前施礼："请问这是楚王韩信府吧?"家丁不屑一顾道："是啊，想要饭?楚王新婚三日，已赏出不少银两，现还剩几两，赏赐给你，拿去快走吧!"将碎银抛地。布衣素士并未拾银说道："承蒙仁兄向楚王通禀一声，就说同乡好友求见!"家丁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见他虽衣衫破旧却气度不凡，便应声道："好吧!"转身走进府内。

新婚燕尔才三日的韩信夫妇一身新装，正在厅堂饮茶，叙述家常，家丁走进禀报："启禀楚王、夫人，府门外有一布衣素士，自称是楚王旧友、同乡，求见!"瑞娘温柔贤淑、轻声细语道："楚王多次告诫你们，凡是楚王同乡、旧友求见，不必通禀，直接请他们进来就是!""是!"家丁转身离开厅堂，不大一会领着布衣素士进来，瑞娘起身姗姗走入里屋。布衣素士进厅堂施礼："楚王可好，仁兄有礼了!"韩信听着声音耳熟，凝视片刻不解地问："你是……?"布衣素士回顾左右，韩信明白，急忙喝退左右："你等都先下去吧!"众人退下。布衣素士摘下头上斗笠："钟离昧叩见楚王!"韩信急忙起身搀扶着钟离昧："真是钟离兄。"他又惊又喜，将钟离昧拉到案前落坐，但又皱起了双眉："你……如何到此地?如今万岁传下谕旨，四处画图缉拿于你，你来府中万一让陛下知晓，吾可吃罪不起!""看把贤弟吓成这样。"钟离昧冷冷一笑："堂堂一个楚王，竟然如此胆小?""唉!你哪知我的苦衷。"韩信苦笑道："陛下耳目众多，你还是投案自首或他处去吧!"钟离昧哈哈一笑："楚王，算我钟离昧有眼无珠，昏看人了，我何需投案自首，你一声令下将我推出府门砍了就是，我何需死在他人之手?""这……"韩信为难地不知所措。他沉思片刻苦笑道："好吧!知恩不报非君子，昔日受人滴水之恩，今日应当涌泉相报，你就留在府中住上数日，千万别四处乱跑，免得惹出祸端。"钟离昧深施一礼："谢谢楚王!"

阳春三月，风和日丽，杨花絮柳，百花盛开。高祖刘邦在张良、萧何劝说下已移都关中，萧何奉刘邦旨令，在秦遗留下的兴乐宫基础上重新筑建起规模宏大的汉都长安城。一日刘邦与吕后、审食其、曹妃陪同下在后宫御花园散步赏花。几只小鸟在一树枝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吕后听着鸟声有些心烦，皱皱双眉，审食其立刻心领神会，在地上拾起小石子向小鸟投去，群鸟受惊，四方飞散，乐得高祖刘邦哈哈大笑，吕后也淡然一笑道："这群小鸟，好似楚兵，垓下一战便四处溃散。"刘邦一怔，油然生情地说道："项羽手下均已分别擒获或投案自首，惟独朕最憎恨的钟离昧，因何至今尚未擒住?"吕后也气愤地说道："这个十恶不赦的钟离昧，他率军掳掠我与太上皇去楚营，使我们受尽凌辱，吾终身不忘，将他擒获碎尸万段才解吾恨!"吕后望着身边的审食其："辟阳侯，让你查访钟离昧下落有无消息?"这审食其是吕后家中的奴仆，只因吕后被楚掳入楚营，他也一同掳去，他对吕后殷勤照顾，吕后念其功劳，便说动高祖封他为辟阳侯，他为人奸诈毒辣，又素与吕后私通，只可惜高祖不知。他见吕后问他，急忙奴颜婢膝地回答道："回禀娘娘，臣已查到一二，不过，微臣不敢讲。"刘邦一怔："有何不敢讲，有朕做主，但讲无妨!"审食其诡秘一

笑，奴颜媚骨地上前一步："陛下忘记赐给韩信身旁的两名侍女吗？""怎么与她二人有关？"审食其淡淡一笑："据翠莲差人密报，钟离昧避居在韩信府中！"刘邦大吃一惊。"此事当真？""臣决无半点的谎言。"刘邦疑惑道："他难道真敢违抗朕令，私藏朝廷通缉要犯，视汉法而不顾？"审食其一翻老鼠眼，夸大其词道："陛下，据密探禀报，楚王威仪冠绝天下，下邳城下，淮阴街头，百姓蜂拥观望，众将鹄立两旁，军乐鼓吹，旌旗翻飞；楚王身着黄金甲，肩披黑斗篷，跨着大白马顾盼风生，'踏踏'而行，身后紧随楚府佐谋臣，铁骑千匹，'嘀，啊呀呀。'众人纷纷赞叹，胜似当年秦皇南巡的气势！""住嘴！"刘邦气得咬牙切齿咆哮道："来人！宣张良、陈平来后殿见朕。"然后拂袖回到后殿。内侍进殿禀报："启禀陛下，张良说身体患疾不能前来，陈平立即就到。"刘邦生气地一拍几案："自朕登基称帝以来，张良屡次推疾不来上朝议事，与朕离心离德，他不来算了，宣陈平！"陈平进殿后，刘邦说道："韩信身为楚王，竟敢抗谕旨不遵，私藏朝廷重犯钟离昧于府中，蓄谋反叛，朕想立即举兵讨伐，以解吾心头之根！"陈平心中明白，韩信决不会谋反，定是有人在陛下面前进谗言，他急忙阻止："陛下举兵讨伐万万不可，此事只能缓图，不可着急。""此事岂能从缓？"刘邦动怒道："韩信与钟离昧若率先起兵反叛，那后果不堪设想，钟离昧一日不擒，朕一日心里不宁。"陈平思虑片刻："若韩信未反，陛下举兵讨伐，岂不是更逼反韩信激成战事，况且朝中上下何将能敌韩信？所以臣以为此举不可！"刘邦听罢紧皱眉头气恼道："这……难道就无良策？你平日里能说会道，朕总认为你智谋过人，可用你之时却想不出半个良策，朕要你何用？"陈平十分尴尬，脸色通红，踌躇多时道："古时天子巡狩，必大会诸侯，臣闻南方有一云梦泽，陛下何不出游云梦，遍召诸王，云梦与楚相连，韩信闻知陛下出游云梦，定然前来谒拜，陛下趁信前来参拜之时，只需一声令下便可将信擒拿。"刘邦大喜，立即传令去南方巡游。

再说韩信闻听高祖率领群臣游云梦泽，心中忐忑不安，宣来谋士李左车在书房商议，李左车叹气道："唉！楚王你不该收留钟离昧这个祸根，陛下本来对你就有猜忌，钟离昧是朝廷重犯，你私藏府中，哪有不透风的墙。陛下名为游云梦，实为楚王而来。"韩信听罢更是惶惶不安："那如何是好？"李左车沉思片刻想出一策，让韩信立斩钟离昧去云梦泽献昧首级谢罪，陛下念你斩昧有功，定不会责罪，这样方保平安。韩信念昧与他有恩，不肯如此行事，李左车无奈，只好自己将昧带到厅堂晓明利害，言道："因你而牵连了楚王。"钟离昧知事已败露，汉高祖云游梦泽定是为他而来，便蛊惑韩信与他联手谋反，并说道："高祖所以不发兵攻楚，还恐昧与楚王联手同心抗拒，若斩昧献首级，今昧死，楚王明必亡。"韩信只摇头不肯反汉，并说："韩信决不做那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事。"钟离昧见事已至此，怕再连累韩信，便拔出利剑自刎厅堂，韩信大叫一声："昧兄，信对不起你呀！"扑倒在钟离昧尸体上失声痛哭。李左车割下钟离昧首级，与韩信驱车前往云梦泽谢罪。

刘邦在云梦泽行宫歇息数日，诸王都已前来谒拜过，惟有韩信尚未前来。正在思量，突闻韩信与谋士李左车捧钟离昧首级前来谢罪。刘邦令韩信一人进后宫参拜，韩信捧着首级刚入宫门，刘邦一声令下，韩信束手被擒。韩信长叹一声："果如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宫门外樊哙带领众武士将李左车一班人等全部缉拿处死。刘邦见诱执韩信成功，大喜，立即命将韩信打入囚车，押回京都。

京城牢狱中，一盏油灯在风中摇摆，昏暗的灯光下，韩信衣衫单薄，发髻凌乱，戴着枷铐，背对狱门，凝视窗外。牢门忽然"哐当"一声被打开，一位老狱吏领着一位姑娘，提着食盒走进。"楚王，有人看你来了！"老狱吏喊道。韩信慢慢转过身来，姑娘扑了上去："大哥！"泪水夺眶而出。韩信睁大双眸，激动地说："文娟小妹！"一股热泪像断了线的珍珠滚落下来，文娟把韩信搀扶着在床榻上坐下："大哥身犯何罪，他们把你……？""唉！"韩信叹气道："我自归汉以来，六年戎马倥偬，随陛下转战南北，而今天下已定，我已是个多余的人了。他们要杀我，竟诬我们反叛朝廷。"文娟惊诧地说："反叛朝廷？天塌地陷、江河倒流，小妹都能相信，可我绝不相信大哥会反叛朝廷，大哥定是遭奸人陷害，明日我定找丞相，为大哥辩驳，洗刷罪名。"韩信摇摇头："大哥不愿连累丞相，小妹，大哥这一去，请你常去看看你瑞娘嫂，让她别悲伤。"文娟点点头。韩信又说道："小妹，你能原谅大哥吗？"文娟抱住韩信失声痛哭："韩信哥你就别说了。"韩信抚摩着文娟秀发："大哥是为你好，所以才与你嫂子完婚，小妹，你看萧平如何？"文娟羞涩地脸一红低头轻声道："大哥用心，小妹知晓，请大哥放心。"韩信满意地一笑："只可惜大哥喝不上你们喜酒了。""不会的。小妹明日再去求留侯张良，让他设法搭救大哥。"韩信微微点了点头。

韩信被擒入狱后，朝中上下议论纷纷，早朝高祖刘邦环顾群臣："有本启奏，无本散朝。"陈平出班启奏："启奏陛下，北疆匈奴国现已崛起，十分凶悍，气焰嚣张，屡屡侵扰我边关。"高祖惊诧地问："哦！匈奴紧连代地，代相陈豨在边关据守，因何未见奏表告急？周勃速抓紧操练兵马，增援北疆边关。"周勃出班："臣遵旨！"刘邦扫视众臣问道："众卿还有何本奏？"张良出班："陛下，臣承蒙皇恩，封为留侯，微臣请陛下恩准辞去朝臣，前往封地留邑居住。"高祖脸色阴沉很不高兴："自朕称帝以来，你屡次推辞身体欠佳，不来早朝议事，今日上朝，却要告辞，朕也不强人所难，随你自便！""谢主隆恩！"张良跪拜谢恩，然后起身又启奏道："陛下，恕臣直言，韩信念起旧情，虽收钟离昧有错，但能知错必改，杀钟离昧献上首级，如信有反意，定会放走昧，让他逃之夭夭，只恐昧至今尚未擒获，韩信虽有招摇过市之错，但必没露反状，韩信为汉室立下十大功劳，臣恳请陛下饶恕他这次过失！"萧何、夏侯婴、周勃等一班忠臣也一起跪下为韩信求情，高祖沉思片刻，起了怜悯之心："好吧！既然众卿均已讲情，朕就赦免他这次，不过楚王爵位革去，降封淮阴侯，留在京城随朕伴驾。"众臣谢恩起身。

韩信出狱被降封淮阴侯后，家眷均已接到京城，他很少出府门，心情显得比过去压抑沉闷。一日早朝完毕，忽然匈奴使臣上殿奏表，要求高祖将长女鲁元公主下嫁匈奴王，匈汉和亲。高祖勃然大怒，将匈奴使臣轰出殿外。朝臣们对此事争议不绝，有的主张派兵攻打匈奴，有的赞成通婚和亲。韩信出班直言不讳说道："陛下，天下初定，士卒久劳，若两国兵戎相见，汉必兴师远征，实非易事，这匈奴国以游牧为主，习性刁野，非一时半载武力所能征服，不如和亲，使他子孙臣服。若公主嫁于匈奴王，将来得子，必立太子，匈奴王就是陛下女婿，死后子为王是陛下外孙，天下岂有做了外孙，敢与外爷抗礼，这让他子子孙孙畏服，不来侵犯我大汉边关，这岂不为好吗?"高祖听后顿时怒气暂消，点头同意和亲之策，各大臣也都赞同。没想到早朝散后，高祖回到后宫，吕后娘娘知道此事，大骂韩信出的馊策，哭闹几日，执意不肯把自己长女远嫁匈奴，她立即做主，将长女鲁元公主与张傲完婚。因答应了匈奴使臣和亲，这下犯难了高祖，在万般无奈下，只好在后宫找了一位嫔妃所生女子，诈称长女鲁元公主下嫁匈奴王，并传旨让代相陈豨速来京城迎嫁长女鲁元公主。陈豨此人远在边关已有野心，他到京城后，主要想探个虚实，想日后谋反起事。陈豨原是韩信属下，对韩信比较佩服，他想拉韩信入伙，与他一起谋反，便约韩信到渭水河边一叙，韩信不知陈豨用心，便按时赴约。二人相见寒暄几句后，韩信生气地说道："陈将军这就见外了，既然专程为护送公主远嫁匈奴，来京半月有余，如何不到我府中一叙，却约我来这河边?"陈豨奸诈地一笑："元帅请别生气，一乃我公务繁忙，二乃见陛下喜猜忌下臣，又见吕娘娘结党营私，擅权行事，万一我这边关守将登府造访，让陛下知晓猜忌，岂不连累元帅吗?元帅为汉室立下汗马功劳，却屡屡遭贬，还差点丢掉性命，日后我陈豨下场还不知怎样?"韩信一怔惊诧地说："将军为何如此悲观失望?"陈豨诡秘一笑："我非悲观，实为元帅鸣不平。""此话何意?"韩信疑惑不解道。"凭着元帅文武全才，因何要寄人篱下，为何不独竖一帜，称雄天下呢?我陈豨甘愿为元帅牵马坠镫。""陈将军不可胡言乱语。"韩信很不高兴道。"我陈豨并非胡言乱语，只要你我联手，我在边关起事，你在京城振臂一呼，咱们里应外合，岂不夺得天下。"韩信摇头道："我韩信若有异心，早在楚汉相争之时就独竖一帜了。""元帅因何如此死心塌地，甘愿受人摆布?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谁都可以据之!""陛下待我有恩，我岂能干这反叛朝廷之事!就是日后我遭小人诬陷，陛下治罪，丞相等众臣也会替我韩信辩白，论个曲直!"陈稀仰天大笑："元帅如此愚昧，据我多年观察，萧何此人处处办事圆滑，日后元帅若真遇不测，他会衡量自身利益，未必肯挺身站出替你辩白说情……""陈豨!"韩信大怒："不许你胡言乱语诬蔑丞相，今日吾看在你跟我征战多年的份上，要不就拿你上朝问罪，治你蓄谋反叛。""元帅恕我直言。"陈豨轻蔑一笑："你如今不是当年的三军主帅，随便可以拿人治罪，而今我陈豨已是守边大将，护送公主远嫁重臣，你以为陛下能听信你言吗?"韩信顿时感到天旋地转，差点跌倒，他用力地一指：

"你……你我从此情意两断，告辞！"言罢韩信愤然离去。陈豨尴尬地望着韩信背影冷笑一声："愚忠之辈，死到临头不知悔悟！我陈豨不做个轰轰烈烈的英雄豪杰，便当个朝廷叛臣，决不做个庸庸碌碌之辈。"韩信走上河岸，突然抬头见岸边树林中有个人影一闪，转眼不见了。韩信一怔，心中暗想："好像府中家丁栾说，他来此地何事？难道窥视于我？"又否定地摇头："不！定是我眼睛看花了。"韩信来到林中解开马缰，牵马出林，无精打采回到府中。

再说高祖刘邦，因在宫中闲得无事，便想到四处巡游，以显汉朝伟业。他带上最美貌年轻温柔的爱妃戚姬，在夏侯婴、周勃等武将护卫下来到赵地。驸马赵王张傲与王后鲁元公主出城迎接父皇，并备好丰盛酒宴为高祖接风洗尘，驸马张傲又特意请来赵地有名歌伎为高祖助兴。高祖在女婿赵王张傲陪同下在大殿饮酒赏舞，由于高祖高兴多贪了几杯已醉，被内侍宫女搀扶着入寝内安歇。赵相贯高对高祖一直心怀不满，今日见高祖到赵地，当夜又饮得大醉，便起心要刺杀高祖。三更时分贯高入高祖寝室行刺未遂，被夏侯婴、周勃等众武士擒拿。高祖刘邦惊醒大怒，立即传旨将赵王张傲、女儿鲁元公主一起缉拿带回京城，严加审讯。高祖回到京都十分气恼，没想到连自己的女儿、女婿也想谋害自己，日后这朝中何人可以信赖？他传旨让廷尉史严加拷问刺客是受何人指示，贯高大小酷刑均已用遍，体无完肤，却一口咬定与赵王张傲、公主无关，实属他一人所为。此案在吕后干预下，高祖无奈只好传旨处死贯高，驸马与公主无罪释放，降封驸马张傲为宣平侯，封戚姬所生如意儿为赵王。高祖又下一谕，凡全国各地，无刘氏者，今后不能封王。从此高祖更加疑忌下臣。

却说陈豨自从护送公主远嫁匈奴后，自恃有功，阴结爪牙，广养食客，联合韩王信、燕王卢绾准备二年起兵谋反。已夺汉城二十余座，高祖闻报，勃然大怒，立即传旨发大兵讨伐。韩信自降封淮阴侯后，心灰意冷，怏怏失望，经常称病告假，不来上朝议事。陈豨谋反，高祖本想令他前往征讨，见信不问朝事，便亲统大军前往平叛，将大权交于吕后。临行之时高祖在后宫中对吕后说道："娘娘，朕明日便要率军平叛，这朝中大事，就请娘娘费心，好好辅佐太子掌好朝政。"吕后妩媚一笑："谢陛下信任，太子虽然生性懦弱，不过做母后的怎能不辅佐他管好朝纲？"刘邦沉思片刻，捋了捋胡须："娘娘，朕离京后你要多加留心，京城中朝野上下朕最不放心的莫过于一人！""你是说淮阴侯韩信？"吕后猜着道。刘邦点点头："此人文武全才，朝中无人能比，三军上下多是他的属下，他若有变，这京城恐难保住，因此望娘娘多加提防，万不可掉以轻心。"吕后频频点头，又微微一笑："陛下请放宽心，妾早已收买了一名他府中舍人栾说，而且还有陛下设的隐线翠莲，他若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妾立即便知！"刘邦满意地一笑："上次钟离昧之事还多亏翠莲姑娘密奏，只可惜翠珠姑娘却死于暴病，不能为朕效力。"刘邦显得有几分惋惜。吕后愤然道："翠珠这是她不听我旨令的下场。"刘邦听罢沉默不语。吕后望望刘邦安慰道："陛下只管放心，谁若存有异心，妾只要抓到一点蛛丝马迹，定严惩不贷！"

刘邦心里一颤："未想到娘娘城府很深，朕自愧不如呵！"吕后嫣然一笑："谢陛下夸奖！"

自高祖率军平叛离京多月，朝中平安无事，却淮阴侯府发生一事。这一日黄昏时分，淮阴府内后花园，假山石背角处，家丁栾说与侍女翠莲坐在条石之上亲亲搂搂调情骂俏。翠莲闪动着一双勾人心魂的媚眼，撒娇地倚在栾说怀里，栾说搂着翠莲的腰身。一只手抚摩着翠莲那富有弹性的胸脯，淫邪地说道："娇美人，你让我日夜想得好苦，今日该还了我心愿吧？""去你的！"翠莲娇声娇气地说道："你答应送给我的珍贵礼物在哪？""乖乖你别急嘛！"栾说诡秘一笑，从怀中取出一串珍珠项链和一块发着蓝、绿色的翡翠。翠莲急忙接过，珍惜地端详，撒娇地问道："你这是哪来的？""美人你猜？"栾说逗道。"你当我不知！"翠莲抿嘴一笑："定是夫人那两件心爱之物，还是韩信与夫人完婚时，用重金给夫人买的聘礼，夫人视为珍宝，非常喜爱，怎么让你给拿来了，要是让夫人知晓，看不要了你这条小命。""她知道了又能怎样？"栾说嘴硬道："咱们有吕娘娘撑腰做主，她敢动我们半根毫毛？而且这府内家丁奴仆侍卫几百号人，她知何人拿去。"翠莲用食指一指栾说面额："你真是个贼胆包天。""我的娇娇，我还色胆包天呢！"栾说淫邪地边说边去解翠莲衣扣。"看把你急的，馋猫，就不怕别人看见！"翠莲欲火无法抑制，顺势躺下。"美人！天色快黑，这里哪会有人嘛。"栾说解开翠莲衣扣，抚摩着翠莲那白皙光滑肌肤与那两个丰满的乳房，又顺势压在翠莲身上开始交媾。

瑞娘近日心情不好，独自一人向假山处散步。当她走到假山处听到假山后有窸窸窣窣声音，不由暗吃一惊，瑞娘警觉起来，立即拔出佩剑，厉声喝道："是谁，快些出来！"二人听见瑞娘声音，吓得哆哆嗦嗦，衣裤不整地爬出。"啊！"瑞娘一见大吃一惊："原来是你们这两个狗男女，在此做那苟且之事，辱我侯府门风。"二人哆哆嗦嗦地站起来到瑞娘跟前，"扑通"一声跪下："夫人饶命！"然后二人又抬手打自己脸颊："我们不是人。"忽然珍珠与翡翠从翠莲怀中掉出。瑞娘一见顿时大怒："好！你这两个不知羞耻的狗男女，不但在此做那辱没门风的苟且之事，竟然还偷我的两件珍物，我岂能饶你，来人！"几名侍卫、家丁闻声跑来，二人吓得伏地磕头求饶，瑞娘怒声喝道："将这对狗男女推到院后乱刀砍了！"几名侍卫应声上前，将栾说、翠莲捆绑起来朝后院推去，两人浑身颤抖高喊求饶："夫人饶命！夫人饶命！""夫人这里出了何事？"此时韩信闻声走来。二人见着韩信，"扑通"跪在韩信面前磕头高呼："侯爷救命！侯爷救命！"韩信摆摆手，侍卫松手。韩信望了望瑞娘："夫人这是怎么回事？"瑞娘生气地说了原因。韩信望着这对狗男女气恼地说："栾说、翠莲你二人在我府中多年，竟然干出这些肮脏之事，按理应当问斩……！""侯爷饶命，小人再也不敢，请侯爷饶恕我们，我俩永世不忘侯爷你大恩大德。"二人连连磕头求饶。韩信见二人泪流满面，心中一软说道："念你二人年轻无知，就宽恕你二人这次，不过死罪饶恕，活罪不免，重责二十，轰出府门，永不留用。""侯爷！这不是太便宜这对狗男

女嘛，按汉律这二人犯的是死罪呀!”一侍卫不平道。“唉!”韩信长叹一声：“夫人你看……?”家丁拾起珍珠项链和翡翠交予瑞娘，瑞娘沉思片刻：“既然侯爷不忍心处死他二人，那又何必责打他们。算了！让他们走吧，永远不许再踏进府门半步。”侍卫上前解开二人绑绳，栾说、翠莲急忙伏地连连叩头：“谢侯爷！谢夫人!”然后从地上爬起，一溜烟狼狈不堪地跑出府门。

吕后这数月心里有些忐忑不安，自高祖率军平叛走后，一直无有胜负消息，今日早晨栾说、翠莲慌张进宫密报，说韩信与叛贼陈豨曾在渭水河边密谋过，还说日后陈豨起兵，韩信在京城做内应，吕后听完栾说编造的谎言后，信以为真。恐京城有变，立即传旨，召来亲信审食其、妹夫樊哙、兄长吕泽、妹妹吕媭在后宫密议。吕后脸色阴沉，心情紧张地说：“陛下率军胜负尚无一点消息，京城又很空虚，有人告发韩信与陈豨是同党，想里应外合夺取汉室基业。现趁韩信尚未动手，请各卿速想良策除掉韩信。”吕媭微微一笑，满不在乎地说道：“姐姐，除掉韩信叛贼这有何难？只要姐姐降道谕旨，令宫中御林军立即包围淮阴府，杀掉淮阴侯，明日再布告天下。”吕泽摇摇头：“不可！韩信非等闲之辈，那是军中大帅，三军将士均是他的属下。他要闻讯，振臂一呼，宫中御林军未到他府，你我就先做了他刀下之鬼。”樊哙不高兴道：“我就不信他韩信有那么大的威力，吾愿带御林军围剿淮阴府。”吕后摇摇头：“妹夫不可鲁莽行事，兄长所言不无道理，淮阴府侍卫家丁甚多，这宫中御林军怎是敌手，这岂不是以卵击石吗？还是想个万全之策才是。”吕泽在宫内踱步沉思片刻：“有了，要想除掉韩信不难，但只可智擒，不能力抵，臣倒想好一策。”“兄长快讲!”吕后急不可待地说。吕泽慢条斯理说道：“娘娘速遣十几名心腹侍卫，假扮陛下平叛军校，悄悄黑夜出城去北方绕上几圈，再风尘仆仆复入长安，只说出陛下遣来传递捷音，陛下已将陈豨叛贼诛灭，朝臣不知有诈，便来宫中祝贺，宫廷中埋下刀斧手，只要韩信入贺，踏进宫门一步，娘娘一声令下便立即将他拿下，推到宫外立即斩首。”“嗯！还是兄长智谋过人。不过万一韩信他不来朝贺，岂不功亏一篑吗?”吕后又赞成又担心地说道。吕泽微微一笑：“请问，韩信在朝中最信赖何人?”“当然是丞相萧何。”审食其抢先答道。“对嘛！萧何曾对韩信有知遇之恩，若让萧何登府去请，并一同入宫祝贺，岂不……”吕泽狡猾地一笑。“如若萧何不去请韩信前来，那如何是好?”吕后疑虑地说。“那就看娘娘您了!”吕泽望着吕后狡黠一笑。吕后沉思片刻：“嗯！有了，我亲登丞相府门，诱萧何去请韩信。”审食其拍手称赞：“嗯！娘娘不愧为当今女中英杰，这样让韩信一生，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几人在后宫内一阵奸笑。

萧何年已六旬有余，年迈体弱，陛下平叛离京，萧何处理政务，日夜操劳奔忙，已病多日。今日刚有好转在府上闻听陛下平叛告捷，心中十分高兴，忽又闻吕娘娘亲踏府门亲来拜望。萧何受宠若惊，慌忙更衣前往府门迎驾。吕后在十几名内侍宫女簇拥下乘坐龙凤辇缓缓而来。到了相府门前，见萧何及夫人一班人相迎，吕后下了龙凤辇在宫女搀

扶下来到相府厅堂落坐。厅内早已备好水果茶点，君臣互相问候以后萧何在下首落坐。吕后假惺惺关心地说道："丞相年事已高，身体要多多保重，不可过多操劳。陛下平叛告捷，明日宫中恭喜庆典，丞相就不要去了吧。""这哪成!"萧何感动地说："平叛告捷乃是朝中庆典大事，我这一朝之相，岂能不去庆贺。"吕后微笑着点点头："嗯！难得丞相一片忠心！明日庆贺这满朝大臣都去，这淮阴侯怕有数月没来上朝吧？我还真有些惦念于他。""淮阴侯是多月没去上朝，不过他有病告假乃是陛下恩准的。"萧何解释道。"是吗？不过病虽有点，主要怕是心情不畅吧！我看他对陛下误解太深，这样下去怕不太好吧？"吕后端起茶喝了一口望望萧何。萧何叹了口气："唉！都是钟离昧一案，他被牵连，不过他对汉室还是忠心耿耿的。"吕后心里很不痛快，心中暗骂萧何老糊涂虫，但表面装出微笑："明日宫中庆贺平叛告捷，他若能来那该多好，就是陛下回朝，闻知此事定能与韩信解除些隔阂，消除些误会。"萧何心里明白，这是娘娘让他邀韩信明日一同前往，萧何立即表明："请娘娘放心，明日庆贺大典，臣邀韩信随我一同前往就是!""那就好!"吕后高兴地说："将相同乐，我做娘娘的也感到高兴，待陛下回京，我一定让他们君臣消除隔阂，团结一心，共创太平盛世。"萧何高兴地也频频点头。吕后见目的达到，又闲谈一会便起身告辞回宫。

萧何送走娘娘，回到厅堂。夫人望着萧何说道："相爷，你不觉得吕娘娘今日亲临府门有点蹊跷?"萧何不以为然地说："这……这有何奇怪，她亲踏府门探望微臣，这是娘娘对微臣的关心。""妾看并非如此。"夫人淡淡一笑："娘娘一贯心胸狭窄，心黑手辣，做事专横，她让相爷请韩信入宫一同参加庆贺，这会不会另有文章?"萧何激动得热泪盈眶，深情地说："夫人大有长进啊！吾何曾不知娘娘此人，可是这圣命难违呀！陛下已将大权交于她在掌管，吾怎敢抗命不遵。""依我看，明日你就不要去请淮阴侯。"夫人担心地说道："妾怕娘娘想借相爷之手，图奸邪之谋。""唉!"萧何长叹一声："夫人，娘娘专权你不是不知，我若抗命不遵，萧府将有灭门之灾，做臣的只能宁可君负臣，不能臣负君。""那明日非请韩信一同前往去宫庆贺不可了?"夫人担心地问道。萧何点点头："如果娘娘并无歹意，是真为陛下平叛告捷，宴请群臣进宫庆贺，而韩信没去庆贺，一来老夫有负圣命，二来使娘娘与韩信之间又加深一层怨恨猜忌，日后陛下回京知道此事，势必对韩信不利，吾身为相国，怎能不为君臣和睦着想。"夫人忧虑地说："嗯！去请韩信不好，不请也不好，还真让人为难!"萧何倒背双手，在厅内踱步，沉思片刻："依老夫之见，臣不能负君，明日还得相邀韩信一同进宫，即便娘娘另有图谋治罪于他，可韩信为汉室立下十大功劳，而且自从钟离昧之事以后，韩信深居简出，并无差错过失。当年陛下曾亲口赏赐他三不死，有陛下金口玉言许诺，娘娘她又能奈何！况且满朝大臣在场，她敢违抗陛下诺言行事?"夫人听罢，满意地点点头。

翌日清晨，萧何穿着一新，亲去韩信府邸邀请。韩信多日没去上朝，也没多问朝中大事，昨日突收宫中一份请柬，

说陛下平叛告捷，明日宫中大殿宴请群臣共庆大捷，请大将韩信前来恭贺，韩信内心十分高兴，庆幸陛下平了叛贼，从此天下太平，他不想今日前往，可转念一想，自己多月不去上朝，陛下与娘娘与他都有隔阂，万一娘娘使诈，自己不慎再顶撞娘娘，岂不冒犯娘娘，犯下大罪，因此他又不想前往。正在踌躇之时，恰巧萧何满面春风地前来邀请，他碍于情面，不好推辞，便与妻子瑞娘告别前往宫中。瑞娘见韩信多年都闷闷不乐，今日高兴要随丞相去宫中，她也没好阻拦，因为有恩相陪伴，韩信决不会再闯祸端，因此，她给丈夫换了新衣，夫妇二人微笑告别。

未央宫前，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一班内侍伫立两旁，一班宫女在乐声中载歌载舞，朝臣们都陆续进入未央宫大殿。

在宫门前大道上，萧何与韩信并肩而行，两人谈笑风生。韩信手里拿着贺词，萧何满面春风地说道："贤弟可曾记得登坛拜将时的情景?"韩信感慨道："何止记得，历历在目，想起往事感到时光真快，汉已立国十年有余，你我都显老了。""贤弟正年富力强，怎么说老了？这汉室繁荣昌盛今后还靠你们，我已年迈体衰，该退居林下了。"萧何若有所思道。"这汉室江山，少我韩信可以，没有丞相可不行!"萧何被说得乐呵呵地："贤弟一席勉励之言，好似萧何年轻许多。"二人都乐得哈哈大笑，谈笑风生，携手走入大殿。

大殿内，刚满十五岁的少年太子刘盈与母后吕雉高坐在龙椅上，朝臣陆续进殿伫立两旁。萧何、韩信兴高采烈地跨入大殿。突然两扇宫门关闭，群臣惊愕，吕后一拍龙书案厉声喝道："来人！将叛贼韩信拿下!"埋伏在两旁的刀斧手蜂拥而上，韩信猝不及防，被这班人绳捆索绑，此时韩信才如梦方醒，怒声问道："娘娘，臣身犯何罪?"吕后冷笑一声："狂徒淮阴侯，自诩天下雄，竟敢与陈豨合谋反叛，今被人告，汝有何话可说？带证人!"栾说、翠莲这对狗男女猥猥琐琐从后殿走出。萧何疑惑不解地问："娘娘，不是韩将军与本相奉旨前来贺喜大捷的吗？怎么……?""萧丞相，你先站立一旁。"吕后严肃地说道，萧何只好退在一旁。栾说、翠莲跪下施礼："叩见娘娘和太子殿下。"吕后严厉说道："汝辈当着众臣之面，讲清楚韩信如何勾结陈豨密谋反叛朝廷。""是!"栾说翻着老鼠眼望了望韩信又扫视了众臣一眼，昧着良心说道："回禀娘娘，陈豨来京城时与韩信在渭水河边秘密谋画半日之久，是我亲眼所见，他们曾有密约，陈豨起兵反汉，韩信在京可做内应。当时我就想禀报娘娘，可又一想并没抓到他们真凭实据，因此未来禀报，这次陈豨果真起兵谋反，我才想起那日之事，我若不禀报娘娘，只怕韩信在京城起兵，那咱们汉室江山岂不完了吗！因此才来禀报娘娘。"吕后大喝一声："韩信，汝还有何说?""无耻!"韩信冷冷一笑，"这分明是栽赃陷害!"翠莲一旁假惺惺劝慰道："侯爷你就承认了吧，娘娘全已知晓!""呸!"韩信愤怒地说道："你两个狗男女，前几天做的好事被捉住，我怎么就不宰了你们!"吕后一拍龙书案："大胆！你这个反贼。陛下已将陈豨捉拿，陈豨已经供认不讳，汝还想抵赖?"吕后将假书信举起晃了晃："陛下书信在此，汝还有

何说。”韩信仰天哈哈大笑，这笑声在大殿震荡、回旋，显得阴森恐怖。韩信收住苦笑，怒吼道：“我才明白，什么平叛告捷，全是布下的阴谋，阴谋，……”吕后在恐慌中清醒：“来人！快，快给我推出宫门外砍了。”

四名武士来推韩信，韩信愤怒地说：“慢着！我韩信为汉室立下十大功劳，陛下赐我三不死：见天不死，见地不死，见兵器不死。汝有何权今日杀我?”“好!”吕后冷笑一声：“今日就不违背圣上许诺。来人！将韩信推入殿旁钟室，门窗遮掩，不让他见到天日；地上铺上地毯，不让他踏着地；不要拿兵器，用菜刀将他斩首。”萧何大吃一惊，伏地泪下：“娘娘……!”栾说从怀中取出一把早已准备好的锋利菜刀，四名武士来推韩信，韩信长叹一声：“唉！我不听人言，今果遭人暗算，中刁妇诈计。”韩信昂然地被推进钟室。栾说举起菜刀，猛力向韩信脖颈砍去，韩信血溅钟室，倒地身亡。栾说、翠莲割下韩信人头，用盘托出，走出钟室来到大殿：“回禀娘娘，韩信已被斩首。”太子吓得用袍袖掩面。萧何大叫一声，昏倒在地，众臣一见凄然泪下。吕后得意地一笑：“审食其，樊哙!”“微臣在!”二人出班。吕后严厉地说：“令你们率宫中御林军速去围剿淮阴府。灭韩信三族，府中一个活口不留!”“臣遵旨!”二人神气十足地接旨走出大殿。

审食其、樊哙率领御林军包围了淮阴府，并杀气腾腾破府门而入。此时瑞娘正在书房看书，听到院内杂乱脚步声，她跨出书房，猝不及防被御林军包围捆绑。审食其提剑在手，冷笑一声：“韩夫人，久违了。”一剑将瑞娘刺死。府内顿时大乱，哭声一片，审食其、樊哙率御林军在府内任意砍杀，尸体成堆，血流成河，淮阴府内一百多口无一人生还，府门被查封。一代名将就这样屈死在吕后的阴谋之下，又一出历史的悲剧。

【周亚夫】

（? ~前 143）汉文、景之世名将。周勃次子，因兄胜之杀人被处死，故得嗣爵，封为条侯。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匈奴大举侵扰上郡、云中，京城长安告警。周亚夫以河内太守被任为将军，驻屯细柳。因治军谨严有方，不久迁中尉，负责京城治安。汉景帝刘庄即位后，任亚夫为车骑将军。三年（前154）吴楚七国发动叛乱（见吴楚七国之乱），周亚夫以太尉率军平叛。他会兵荥阳，固守昌邑，待机以轻骑断绝吴军粮道。最后以精兵出击，不到三个月，就平定了叛乱。五年后，周亚夫迁为丞相，很受景帝器重。不久，因不同意废栗太子，又在王皇后兄王信和匈奴降王徐卢五人封侯等政事上与景帝旨意相左，加以梁孝王的挑拨和诬陷，受到景帝猜忌，中元三年（前 147）被免除丞相职务。景帝后元元年（前 143），周亚夫子私买工官尚方甲盾五百具，备作其父葬器，被人告发，事连周亚夫。廷尉召亚夫对质，并逼其供认谋反。周亚夫不服，绝食五日，呕血而死。

【卫青】

（? ~前 105）汉武帝时抗击匈奴的名将。字仲卿。其父郑季，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以县吏给事平

阳公主家，与婢女卫媪私通，生青。卫青因同母异父姊卫子夫得幸于武帝，故冒姓卫氏。长大后为侯家骑，跟随平阳公主。后因卫子夫的缘故得被武帝召见，先后任建章监、侍中、太中大夫。

武帝凭借文、景两代积蓄的财富与兵力，为根绝匈奴侵扰，一反西汉初年的和亲政策，发动了大规模的抗击匈奴战争。卫青自元光六年（前129）拜车骑将军始，曾先后七次率军出击匈奴。

元朔元年（前128）及二年，卫青连年率兵出击匈奴。元朔二年，率军出云中，迂回至于陇西，捕虏数千，获畜百余万头，驱逐匈奴白羊王、楼烦王，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此后，汉政府于此筑朔方城，置朔方郡（治今内蒙古杭锦旗北），并重新修缮秦时所筑边塞，解除了对都城长安的直接威胁。卫青以功封长平侯，食邑三千八百户。

汉得朔方后，匈奴连年入侵上谷、代郡、雁门、定襄、云中、上郡。元朔五年，卫青又率领苏建、李沮、公孙贺等军，出朔方，击溃匈奴右贤王，俘虏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一万五千余人，牲畜近百万头。武帝拜卫青为大将军，益封八千七百户。子伉、不疑和登虽在襁褓，也皆得以封侯。

元狩四年（前119），卫青、霍去病奉武帝之命，各领骑兵五万人，负从马四万骑和步兵辎重兵数十万人，分别出击匈奴。卫青出定襄塞外千余里，包围匈奴伊穉斜单于。单于突围溃走，精锐丧失殆尽。卫青率军乘胜追至窴颜山赵信城（约在今蒙古杭爱山以南）而还。汉军占领了朔方以西至张掖、居延间的大片土地，保障了河西走廊的安全。此后一二十年，汉匈之间一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武帝为酬偿卫青、霍去病的军功，乃置大司马位，拜卫青为大司马大将军。令骠骑将军霍去病秩禄与大将军等同。此后霍去病宠遇日隆，卫青相形见绌。

卫青率军与匈奴作战，前后捕斩首虏五万余级，益封凡一万六千三百户。他虽战功卓著，地位尊崇，但不以权势树党，不干预朝政。他勤恤士卒，颇得人心。然功利心较重，曾排斥压抑名将李广。卫青后娶平阳公主，死于元封六年（前105）。



卫青墓

【霍去病】

（？～公元前117）汉武帝时抗击匈奴的名将。大将军卫青的外甥，与卫青齐名。母少儿，为汉武帝皇后卫子夫姊。年十八即以皇后姊子为侍中。因喜骑射，元朔六年（前123）随从大将军卫青出征，率轻骑八百击匈奴，捕斩首虏二千余级，封冠军侯。元狩二年（前121）升任骠骑将军。前后凡六次出击匈奴，主要有两次。



霍去病

元狩二年，霍去病以骠骑将军率万骑出陇西，越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东南）千余里，斩首虏近九百级，缴获休屠王祭天金人。同年夏，再出陇西、北地两千余里，越过居延泽，进军祁连山，捕斩首虏三万余级。这次战役沉重地打击了匈奴右部，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部四万余人归汉。汉分徙其众于边塞之外，因其故俗置五属国，又先后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由此沟通了自内地与西域的直接交往，对西汉和匈奴势力的消长也发生了显著的影响。

元狩四年，汉武帝又命卫青、霍去病各领骑兵五万人，领私负从马十四万骑和步兵辎重兵几十万人，分道出击匈奴，霍去病出代、右北平两千余里，获匈奴屯头王、韩王等，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今蒙古乌兰巴托以东），登临翰海（或为今贝加尔湖），卤获七万余级。霍去病益封五千八百户，拜大司马骠骑将军，秩禄与大司马大将军卫青等同而恩宠有过之而无不及。

霍去病用兵注重实际，不死守兵法。武帝曾想教他学吴、孙兵法，他说：用兵要根据具体情况制订作战方略，不能单学兵法。武帝要为他修治第宅，他又说："匈奴不灭，无以家为。"在打仗时，他也总是身先士卒，经常率领部队担任大军的先锋。但因少时长于宫中，自恃显贵，不能抚恤士卒。在塞外时，汉武帝曾以太官膳食数十乘犒赏。及霍去病军归，所弃粮肉甚多，而士卒尚有饥者。霍去病死于元狩六年，终年还不到三十岁。

【马援】

（公元前 14 ~ 公元 49）东汉初名将。字文渊。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出身官宦世家。新莽时，任郡督邮。因私纵重囚，亡命北地。遇赦，留居当地经营牧畜，役属宾客数百家。后为新成大尹（新莽改汉中为新成，太守为大尹）。新莽败亡后，马援投奔割据凉州的军阀隗嚣，颇受敬重。任绥德将军。建武四年（公元 28），曾为嚣奉书洛阳，受到汉光武帝刘秀礼遇。后隗嚣遣长子恂入质东汉王朝，马援随同至洛阳，居久无职，请准将宾客屯田上林苑中。隗嚣公开反叛东汉王朝后，马援为光武帝谋划，并往来游说，离间隗嚣部属。建武八年，光武帝亲征，马援聚米为沙盘，分析形势，指画进军途径，使光武帝得以顺利击溃隗嚣。因王莽末年入据金城属县的西羌酿成边患，建武十一年，马援任陇西太守，率军先击破先零羌于临洮（今甘肃岷县）。随后，又击降武都参狼羌，于是陇右诸羌平定。建武十六年征为虎贲中郎将。次年，交阯郡征侧、征贰聚兵反抗东汉王朝，九真、日南、合浦蛮、夷起而响应。马援

又被拜为伏波将军，领兵南下，平定二征，并进击征侧余部都羊等，悉平岭南，因功封新息侯。马援行军所过，经常为郡县修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百姓，并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此后，匈奴、乌桓侵扰三辅，马援认为“男儿要



马援与沙盘

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又主动请兵出击。建武二十四年，六十二岁的马援又领兵远征武陵、五溪蛮夷。次年，汉军受阻于壶头，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死于军中，汉光武帝因帝婿黄门郎梁松之谮，追收马援新息侯印绶。永平初，汉明帝纳马援女，立为皇后。但因明帝禁外戚之家封侯与政，故马援未得入云台二十八将。至建初三年（公元78），汉章帝使五官中郎将持节追策，谥援为忠成侯。

【窦宪】

（？～公元92）东汉外戚权臣。字伯度。扶风平陵（治今陕西咸阳西北）人，窦融曾孙，章德皇后兄。章帝建初二年（公元77），以外戚拜为郎，迁侍中，不久又升为虎贲中郎将，日益受到宠任。和帝即位，太后临朝，窦宪在内掌握机密，对外宣布诏命；其弟笃、景、瓌并居要职。一门权势煊赫，俱骄纵不法。永元元年（公元89），窦宪遣客刺杀太后幸臣，得罪，被囚于宫内；因害怕被杀，自求击北匈奴以赎死。适逢南匈奴单于请兵北伐，乃拜窦宪为车骑将军，以执金吾耿秉为副，各领四千骑，合南匈奴、乌桓、羌胡兵三万余出征。窦宪遣精骑万余大破北匈奴于稽落山（今蒙古额布根山），北单于逃走。窦宪追击诸部，出塞三千里，登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刻石纪功，命中护军班固作铭。回师以后，拜宪为大将军，位次太傅，在三公上。二年，窦宪出屯凉州。三年，窦宪又遣左校尉耿夔等出居延塞，大败北匈奴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北单于奔逃，下落不明。北匈奴从此破散。窦宪既破匈奴，威权震朝廷，党羽布于全国，遂阴图篡弑。和帝探知他的阴谋，与中常侍郑众定计予以惩治。四年，窦宪还朝，帝勒兵逮捕其党羽，没收其大将军印绶，改封为冠军侯，命令他到封邑去，等他到达冠军以后，迫令自杀。

【李固】

（94～147）东汉大臣。字子坚。汉中南郑（今陕西汉中）人。自幼好学，常千里跋涉，步行寻师，以此通晓典籍。四方士人多慕其风采而来求学。后司隶、益州并命郡举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

东汉王朝自和、安二帝之后，外戚当权，宦官干政，朝政非常腐败。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日益频繁，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不断加剧。这种情况引起了一部分士大夫出身的官僚的担忧和不满，李固即其代表人物之一。顺帝阳嘉二年（133），公卿推举李固对策。李固纵论时弊及为政所宜，建议削夺外戚梁冀势

力，罢退宦官，并严令中常侍子弟不得为吏、察孝廉。李固因此为宦官所诬陷，久之，才得拜议郎，后出为广汉郡雒县令，至白水关，解印绶，还汉中，隐居不仕。永和中，李固任荆州刺史，复徙力泰山太守，累迁将作大匠、大司农。汉安元年（142），顺帝遣侍中杜乔、周举等八人案察州郡，因所劾奏多为梁冀及宦官亲党，顺帝下诏停止追究。李固与廷尉吴雄上疏谏争，顺帝只得下令罢免八使所检举的刺史和二千石。顺帝死后，冲帝即位，李固为太尉，与梁冀参录尚书事。冲帝在位不到半年即夭亡。李固主张立年长的清河王刘蒜为帝，梁冀为了继续把持朝政，坚持立年仅八岁的乐安王子刘缵为质帝。不久质帝又为梁冀毒杀，李固与司徒胡广、司空赵戒再次议立刘蒜为帝，而梁冀又与宦官密谋立蠡吾侯刘志为帝，公卿自胡广、赵戒以下都不敢违抗，唯李固坚持本议。梁冀奏请梁太后策免李固。刘志得立为桓帝后，刘文等谋立刘蒜为天子，梁冀因此诬陷李固与刘文等共为妖言，逮捕下狱。李固门生王调等上书为其申冤，得到太后赦免。及李固出狱，京师市里皆称万岁，梁冀畏惧李固声望，仍据奏前事，将其杀害。

【窦武】

（？～168）东汉末年外戚、大臣。字游平。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窦融玄孙。桓帝延熹八年（165）长女立为皇后，遂以郎中迁越骑校尉，封槐里侯。次年，拜城门校尉。窦武任职时，多方辟召名士，所得两宫赏赐，也都捐助给大学诸生。永康元年（167），他为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遭党锢一事上书，请求贬黜掌权的宦官，李膺、杜密等人以此得到赦免。同年冬，桓帝死，窦武以拥立灵帝故，拜大将军，更封闻喜侯。他与太傅陈蕃共秉朝政，引用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又起用李膺、杜密、刘猛等党人，并以太后诏诛戮专制宫省的中常侍管霸、苏康等，得到士大夫的拥护。建宁元年（168）八月，窦武与陈蕃定计翦除诸宦官。后事机泄露，宦官曹节、王甫等劫持灵帝、太后，诏令收捕窦武等。窦武召集北军五校兵士数千人驻屯都亭下，与王甫、张奂率领的虎贲、羽林和五营士对阵。结果兵败自杀，被枭首于洛阳都亭，宗亲、宾客、姻属悉被处死，家属徙日南。

【荀彧】

（163～212）东汉末年曹操的重要谋士。字文若。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世代官宦，叔父爽，位居三公。彧多智谋，举孝廉，拜县令。汉末天下大乱，弃官归乡里，率宗族先投袁绍，后归曹操，任司马，被喻为张良。曹操为兖州牧后，兴平元年（194），征徐州陶谦，荀彧以州司马留守。陈留太守张邈等反叛，各郡县响应者众。荀彧率军坚守，与程昱一起，为曹操保存了反攻基地。建安元年（196），曹操谋迎汉献帝都许，部众犹豫，彧极力促成。升侍中，守尚书令，深得曹操信任，军国大事皆与之筹划。能知人举贤，屡荐贤士郭嘉等人，又划策东擒吕布，西抚韩遂、马腾。建安五年，官渡之战，曹操军粮将尽，欲退兵还许。彧以为两雄

相争，“先退者势屈”，劝坚持待机，用奇兵制胜。操从其议，大败袁绍。八年，曹操据荀彧前后功绩，上表封万岁亭侯，称赞“天下之定，彧之功也”。后曹操欲自封魏公，加九锡，作为篡汉之阶，彧婉转劝阻，为操所忌，被迫饮药而卒。

【郭嘉】

（170～207）东汉末曹操的重要谋士。字奉孝。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县）人。经荀彧推荐任曹操司空军祭酒。早在官渡之战前三年（197年），郭嘉便建议曹操东平吕布，以防与袁绍决战时吕布援绍，双方夹击，造成被动。次年，曹操亲征吕布，败之。从此，郭嘉跟随曹操征战多年。及袁绍败，河北平定，又劝说曹操多辟青、冀、幽、并诸州名士以为掾属，借以笼络人心。曹操将北击乌桓，诸将惧荆州割据势力刘表袭击后方，嘉断言，刘表只能空谈，又与刘备有矛盾，不足为虑。不久，果如其言。建安十二年（207），又为曹操袭击乌桓划策，以为兵贵神速，宜留辎重，轻兵兼程，出其不意。曹操采纳郭嘉建议，大获全胜。郭嘉从征还，病卒。此前曾封为洧阳亭侯，至此增邑至千户。曹操称赞他在政治、军事方面的见识都超过别人，是自己的“奇佐”。赤壁战败，曹操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司马懿】

（179～251）三国时期魏国权臣。字仲达。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出身世族。初被辟为曹操丞相府文学掾，屡转至丞相主簿。孙权遣使敦劝曹操代汉自立。懿亦从而怂恿。曹操封魏王，曹丕为魏国太子，司马懿迁魏王太子中庶子，海参大议，常有奇策异谋，为曹丕所信重。曹丕代汉建魏后，累迁尚书右仆射、抚军大将军。文帝出征或巡游，往往留其镇许昌。明帝立，受遗诏与曹真、陈群一起辅政。督率诸军击败孙权的进攻，迁骠骑将军，加督荆、豫二州诸军事，率所部镇宛（今河南南阳）。新城太守原蜀降将孟达谋叛，太和元年（227），司马懿得讯率军倍道兼行新城（今湖北房县），速抵城下，破城斩孟达。蜀丞相诸葛亮北伐攻魏，五年，魏明帝调司马懿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西镇长安，指挥对蜀汉的战争。诸葛亮多次挑战，司马懿随机应变，坚壁拒守，以逸待劳，不与决战，诸葛亮于魏青龙二年（234）病死军中后，蜀军无功而退。司马懿功迁太尉。景初二年（238）率步骑四万大破叛魏的辽东公孙渊，进袭襄平（今辽宁辽阳），合围成功，猛攻斩渊，辽东四郡重归统一。景初三年，受明帝遗诏，司马懿与曹爽一起辅齐王芳，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后转为太傅。爽、懿争权夺



司马懿

利，矛盾日益尖锐。司马懿老谋深算，佯称病重，暗中周密布置，于嘉平元年（249），乘齐王芳、大将军曹爽出洛阳城谒魏明帝曹叡墓高平陵之机，关闭各城门发动政变，并假皇太后令，免曹爽兄弟全部官职，计诱他们放弃抵抗，束手归洛阳。随即诬以谋反，将曹爽兄弟及其党羽全部处死，独揽朝廷大权。三年，拥魏势力都督扬州诸军事王凌起兵反抗，被他迅速击败。司马氏代魏的基础从此基本奠定。拜相国，封安平郡公，卒。晋武帝司马炎即位，追谥宣帝。

【邓艾】

（约197～264）三国时期魏国将领。字士载。棘阳（今河南南阳南）人。本屯田农民。为小吏，司马懿见而奇之，辟为掾。迁尚书郎，建议屯田两淮，且佃且守；并开广漕渠，引河入汴，灌溉淮北农田，从而保证了征吴大军军粮。累迁城阳、汝南太守，所到之处荒地开辟，粮食增加，军民得到充足供应。后为安西将军，领护东羌校尉。以破蜀汉姜维功，迁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进封邓侯。景元四年（263），以征西将军，与钟会、诸葛绪分三路伐蜀。邓艾出奇兵，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取江油，进克涪县，于绵竹（今四川德阳北）击斩蜀将诸葛瞻，攻至成都，迫使蜀主刘禅出降。进位太尉。为人深自矜伐。以蜀地悬远，为不延误事机，他坚持自行任命官职，以安初附，由此违忤大将军司马昭。钟会借机诬他谋反，槛车征还，适遇兵变，被监军卫瓘杀死。艾功高蒙冤，经人疏理，晋武帝时平反。

【钟会】

（225～264）三国时期魏国谋士、将领。字士季。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出身名门，父钟繇位三公。钟会有才干，精通玄学。魏齐王芳正始年间（240～248），由秘书郎迁中书侍郎。正元二年（255），毌丘俭作乱，钟会从大将军司马师东征，迁黄门侍郎。甘露二年（257），都督扬州诸军事诸葛诞反于寿春，又从大将军司马昭讨之，被委以腹心之任。出谋划策居多，时人比为张良。迁司隶校尉，仍参与朝廷重大决策。名士嵇康被杀，便是他的主意。景元三年（262），司马昭欲大举伐蜀，朝臣多以为不可，会独赞成。被任为镇西将军，都督关中诸军事，四年，统十余万人，与邓艾、诸葛绪分三路进军。蜀将姜维等合兵守剑阁，钟会攻之不克，拟撤军还。赖邓艾取道阴平，先攻下成都，蜀亡，会乃得继续前进。蜀主将姜维归降。钟会进位司徒，忌邓艾功名，密告邓艾有反状。咸熙元年（264），艾被收捕。钟会独统大军，威震西土。钟会谋反，欲倚姜维割据蜀地，但部将不愿反者发动兵变。兵变中，钟会被乱兵所杀。

【诸葛亮】

（181～234）三国时期蜀国大臣，杰出的政治家。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南）人，家世二千石。东汉末，牧守混战，随叔父诸葛玄往依荆州刘表。隐居南阳隆中（今湖北襄樊西），躬耕陇亩，自比管仲、乐毅。建安十二



诸葛亮

年（207）刘备闻其名，三顾草庐。亮拟定东联孙吴，西据荆、益，南和夷、越，北抗曹氏，待机进图中原的隆中对策，为以后的蜀汉制定了总的战略。诸葛亮成为刘备主要辅佐。次年曹操南伐，他和江东周瑜、鲁肃共同努力，并亲至东吴游说，促成孙权、刘备的联合，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随后，辅助刘备取荆州四郡，出任军师中郎将。后从荆州率军溯江入蜀助刘备包围成都，推翻刘璋统治，夺得益州。迁军师将军。刘备出征，常镇守成都，稳定后方，保证供给。刘备称帝，任丞相、录尚书事。章武三年（223），刘备病笃，临终托孤于诸葛亮。当年刘禅继位，他以丞相辅政，又领益州牧，封武乡侯。刘禅暗弱，朝政无论巨细，都取决于亮。

诸葛亮当政期间，主要依靠从荆州带来的旧属，同时注意笼络原来刘璋部下和益州豪强大族。对出身贫寒而有才干的士人，也大力拔擢，被称赞为“能尽时人之器用”。他信奉申、韩法术，法令严明，赏罚必信。不论何人犯法，都严惩不贷。参军马谡极受器重，北伐中马谡为先锋，违反节度，为魏将所败，亮流涕处死，并以用人失察自请贬官。益州豪强大族自刘璋统治以来，长期专权自恣，蔑视君臣之道，诸葛亮对他们的不法行为，也毫不容情。这些措施保证了蜀国政治上一定程度的清明和统一。

诸葛亮对西南少数族采取了恩威并用的政策。建兴三年（225），南中（主要当今云南、贵州地区）发生大族叛乱，即亲率大军，深入不毛，进行讨伐，打击为首分子，同时尽量争取当地上层大姓，有的被起用为地方长官，从此这些地区的统治得以基本稳固，为蜀国提供了物质财富和兵力。

诸葛亮坚持与孙吴的联盟，并多次进行北伐，虽苦心筹谋，企图消灭曹魏，恢复汉室，但都因力量相差悬殊，屡遭挫败，未能成功。建兴十二年，最后一次北伐中，病卒于五丈原，谥忠武侯，被后代封建统治者推为“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忠君典型。著有《诸葛亮集》二十四篇，十万余言。

【关羽】

（？～219）东汉末著名将领。字云长。河东解（今山西临猗西南）人。早年与张飞一起追随刘备，参加兼并战争，为别部司马。三人情同手足。建安五年(200)，刘备为曹操所破，羽战败被俘，极受优待，拜偏将军。官渡之战中，曹操与袁绍交兵，绍大将颜良攻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关羽策马于万众之中刺斩颜良，解白马之围，作为对曹操的报答，然后奔归刘备。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刘备撤离樊城，并令关羽带领水军乘船经汉水到江陵汇合，后共至夏口，与孙吴联军大战曹军于赤壁。赤壁之战



关羽像

后，关羽拜襄阳太守，荡寇将军。刘备西取益州，又以关羽督荆州事，镇江陵。关羽勇冠三军而好学，读《左传》“略皆上口”。建安二十四年升前将军，率众围曹操大将曹仁于樊城（今属湖北襄樊），适值汉水暴涨，水淹曹操七军，降于禁，斩庞德，威震北方。曹操一度计议将都城由许徙于他处，以避其锋。谋士司马懿、蒋济建议，利用孙、刘矛盾，以割江南地为条件，劝孙权袭关羽后方，曹操采纳。当年，孙权派吕蒙趁关羽在襄樊作战之机，袭击荆州。关羽后方空虚，平日待下又骄矜少恩，江陵守将不战而降，家属均为吴军所得。关羽闻讯从襄阳赶回，将士皆无斗志，不得已西保麦城。十二月，至章乡（今湖北当阳东北），与子关平俱为吴将擒斩。

【张飞】

（？～221）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蜀国著名将领。字益德。涿郡（今河北涿州）人。早年与关羽一起追随刘备，参与兼并战争，为别部司马，三人情同手足。刘备从曹操破吕布，张飞因功拜中郎将。随刘备依袁绍，绍败又附刘表。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南攻荆州，追及刘备于当阳长阪（今湖北当阳东北）。刘备败走，张飞领骑二十余人殿后，曹将无人敢近，与关羽皆被誉为“万人之敌”。赤壁之战后，迁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刘备率军入蜀，与刘璋反目后，张飞随诸葛亮由荆州西上支援，俘刘璋将严颜，处理得当，所过克捷。益州既平，论功颁赐与诸葛亮、法正、关羽相等。建安二十年，领巴西太守。曹操派大将张郃进攻巴西，与张飞相持五十余日。后张飞率精卒万余人突袭张郃，大破之。巴西地区安定。刘备称帝后，张飞累迁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进封西乡侯。待下粗暴，时常鞭挞士兵，章武元年（221），从刘备东向攻吴，临发为部下刺杀。

【马超】

（176～222）三国时期蜀国将领。字孟起，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父马腾与韩遂等于汉灵帝时起兵割据凉州。后因内部矛盾，马腾复归汉，至京师任卫尉，马超因领其众，为偏将军，甚得羌、胡等族人心。建安十六年（211）曹操西征关陇，马超与韩遂等关中割据势力屯据潼关，联合抵抗，曹操施离间计，致使马、韩相互猜疑，遂一举击败。马超率羌、胡退出关中，转战陇上攻陷冀城，杀凉州刺史，并其众，自称征西将军，督凉州军事。不久原刺史故吏杨阜起兵讨伐，杀其妻子，马超投奔汉中，依其地割据势力张鲁，不得志。建安十九年，归刘备。时刘璋被刘备围于成都，马超率军抵城下，城中震

怖，加速了刘璋覆败。诸葛亮赞他文武全才，勇猛过人。建安二十二年，刘备率军进攻汉中，马超从征。二十四年，刘备为汉中王，拜马超为左将军，假节。章武元年（221），迁骠骑将军，领凉州牧。次年卒。

【姜维】

（202～264）三国时期蜀国后期主将。字伯约。天水冀县（今甘肃甘谷东）人。本仕魏国，宫中郎，参本郡军事。建兴六年（228），蜀丞相诸葛亮北伐，军向祁山，姜维受太守猜忌，不得已归蜀。诸葛亮辟为丞相府仓曹掾。称赞他深通兵法，才略过人。拜中监军，征西将军。诸葛亮、蒋琬、费祎先后卒，延熙十七年（254），加督中外军事，执掌蜀汉大权。他不顾部将张翼“国小民劳，不宜黩武”的劝告，多次伐魏。延熙十八年，北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经于洮西，曹军死者万计，但姜维随即遭挫，连年无功，人民负担沉重，怨声四起。其时宦官黄皓弄权，维自顾在朝廷根基薄弱，乃长期驻守沓中（今甘肃舟曲西北），不敢回成都。景耀六年（263），魏大举伐蜀，姜维坚守剑阁，阻魏将钟会大军不得进，致使钟会生退兵之议。后魏将邓艾取阴平道攻陷成都，姜维得后主刘禅敕令投降。次年，鼓动钟会反魏，欲伺机恢复蜀汉，事未成，发生魏将士兵变，与钟会一起为乱兵所杀。

【孟获】

三国时期南中少数族首领。系东汉末益州郡（今云南晋宁东）大姓。生卒年不详。蜀先主刘备死的前后，居住在蜀汉西南边境的少数族发动叛乱。越嶲（今四川西昌东）叟帅高定元杀郡将举兵称王。牂柯（今贵州凯里西北）太守朱褒据郡不受调遣。益州郡大姓雍闿杀太守正昂，蜀汉政府另派太守，又为雍闿执送东吴。孟获追随雍闿起兵反蜀汉，并诱煽夷人同叛。建兴三年（225），诸葛亮亲率大军分三路征南中（蜀汉以巴蜀为根据地，其地在巴蜀之南，故名），南中内部混乱，高定元部下杀雍闿，孟获代立为首领。诸葛亮以孟获在当地夷、汉人中威望甚高，乃采马谡“攻心为上”之策，定计将其生俘，纵归使更战。凡七纵七擒，孟获乃心服。当年秋，南中四郡（越嶲、益州、永昌、牂柯）悉平。诸葛亮大量起用当地少数族的上层分子，把夷人渠帅移置成都为官，孟获为御史中丞。并以南中的牛马特产充实蜀国军资。自此终诸葛亮之世，南方无大叛乱。

【孙坚】

（155～191）东汉末著名将领。吴大帝孙权之父。字文台。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少为吴郡司马，参与平定会稽地区以许昌为首的暴动。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孙坚率千余人，追随右中郎将朱儁至河南镇压，任佐军司马。汝、颍黄巾军退守宛城（今河南南阳），汉军合围，孙坚率众先登，城被攻破。后升议郎、长沙太守，又镇压当地区星等起义。积军功封乌程侯。董卓专权，孙坚兼并荆州刺史和南阳太守两支势力，与袁术合军。术推荐孙坚

行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屯于鲁阳（今河南鲁山）。坚率军讨伐董卓，善于用人，多次取胜，为卓所惧。董卓欲与孙坚和亲，并许任孙坚子弟为刺史、牧守等，孙坚拒绝。初平元年（190），董卓胁迫汉献帝仓猝徙都长安，并焚烧洛阳。次年，孙坚于洛阳城外战败董卓，攻克洛阳，击走吕布，得汉帝所遗传国玺。当年奉袁术命，率军征荆州刘表，为表部将黄祖兵士射死。

【孙策】

（175～200）东汉末军阀，三国时期吴国的奠基者。吴大帝孙权之兄。字伯符，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少居江淮间，结交士大夫，颇有声誉。父孙坚死，兴平元年（194），至寿春从袁术，不得志。二年，乃托辞率其父所遗千余兵南渡江，进攻扬州刺史刘繇、会稽太守王朗诸部。孙策善于用人，军纪严明，沿途无犯，得到周瑜及其他豪族支持，所向皆破。先后攻占吴（今江苏苏州）、会稽（今浙江绍兴）等郡。建安二年（197），袁术称帝，策与之决裂并接受汉朝参与讨伐袁术的诏令，以明汉将军领会稽太守。三年，拜讨逆将军，封吴侯。四年，袁术死。孙策率军攻庐江太守刘勋，得袁术、刘勋残部两万余人，领庐江郡（今安徽庐江西南），得豫章郡（今江西南昌），于是统一江南，为孙氏割据江东奠定了基础。此时北方袁绍势力正强，曹操通过子女联姻，辟除和察举策诸弟，对他极力拉拢。正当孙策欲渡江北进，继续扩大势力时，被仇家刺死，临终前嘱孙权继承其业。

【孙权】

（182～252）三国时期吴国开国君主、政治家。字仲谋。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黄龙元年（229）至神凤元年（252）在位，谥大皇帝。父孙坚。孙权少察孝廉，举茂才，行奉义校尉。跟随其兄孙策征讨江东。汉建安五年（200）孙策死，继统江东地区，得到张昭、周瑜、程普等人辅助，他广揽人才，鲁肃、诸葛瑾等为其宾客。建安十三年，曹操夺取荆州，沿江而下，孙权摈弃群臣归降之议，任周瑜、程普为左右都督，各领万人，联合刘备，组成孙刘联军，大破曹军于赤壁。孙权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后，依靠长江天险，多次击退北方曹魏进攻。曹丕代汉建魏，孙权表面臣服称藩，争取时间巩固政权基础。魏黄初二年（221），接受魏封号，称吴王于武昌（今湖北鄂州）。黄龙元年称帝，建都武昌，后迁建业（今江苏南京），先后统治江东五十多年。通过消灭各支割据势力，平定、降服少数民族山越，



孙权

所辖由江东扩展到相当于今福建、广东、广西、湖南的广大地区。汉末以来，这些地区处于分裂状态，自此重归统一，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

为维护吴国鼎立之业，孙权接受鲁肃建议，采取联合蜀汉，共御曹魏的基本方针。其后因夺取荆州，杀死关羽，双方失和，刘备率军复仇，爆发夷陵之战，大败刘备。但由于抗击曹魏的需要，吴蜀同盟重新恢复。在长时期内，他不为谣传所动，坚信蜀汉不致背盟。吴、蜀的长期和好，牵制了曹魏的进攻。

孙权信用渡江南来的豪族势力，同时对确有才干而出身贫贱的寒族也不拘一格，注意拔擢。后来，又根据南方特点，逐渐和江东，特别是吴郡的豪族地主紧密结合，委以高官要职，极力笼络。这些豪族地主处于太湖流域经济发达地区，势力强大，根深蒂固，看到孙权能保护自己利益，也对他委诚效忠，全力支持。

孙权通过保护私人封建大土地所有制来发展经济，征伐山越掠夺来的一部分“生口”赐给世家豪族大地主和功臣当作部曲、佃客。允许将世袭领兵，其佃客免除徭役、兵役。称为复客制度。在劳动力紧张的太湖流域，这是与豪族地主妥协，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措施。

孙权大权独揽，用法严峻。为防止影响政事，禁止地方长官擅去官奔丧，违者处死。晚年，吴国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太子和与鲁王霸相互攻讦，朝臣也分为两派，酝酿着统治的严重危机。他断然废太子和，杀鲁王霸，用严刑峻法处置一批朝臣，另立子亮为太子，矛盾得以缓和。

【周瑜】

(175～210) 东汉末孙策、孙权的重要将领。字公瑾。庐江舒县（今安徽庐江西南）人。家世官宦，与孙策同年，少相友善。建安三年 (198)，隶属袁术为居巢县长，后投孙策，时年二十四，人称周郎，为建威中郎将。孙策欲攻取荆州，任他为中护军，领江夏太守。从此，跟随孙策征讨，助其奠定割据江东基础，深得信任。与孙策分娶桥公二女，策娶大桥，瑜娶小桥。建安五年，孙策卒，与长史张昭共掌众事，辅佐孙权。不久，曹操挟新破袁绍之势，要孙权送子为质，群臣犹豫不决。唯周瑜分析江东有利条件，坚主勿遣，并建议占据江南，拥兵观变，则可争取主动，以免受制于人。建安十三年，刘琮以荆州降曹操，操率大军由江陵顺流东下，群臣震恐，多主归降。周瑜却列举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粮足，臣下用命，又分析曹军存在的种种矛盾和弱点，同鲁肃一起，力排众议，坚主抵抗，为孙权所采纳。与程普分任左、右督，率军三万，联合刘备，共同抗曹。此时，南来曹军已染疫病，初战即小败，曹军遂屯军江北乌林，隔江对阵。周瑜部将黄盖献火攻计，假降曹军，率满装柴草、膏油并饰以帷幕的蒙冲斗舰十艘，接近曹营顺风放火，曹军战舰与岸上营寨俱遭火焚。周瑜率主力擂鼓前进，曹操遂败而北归。周瑜被拜为偏将军，领南郡太守。后建议攻取益州刘璋，而后并汉中张鲁，再联合凉州势力，共同讨伐曹操，以统一北方。获采纳，未及行，病卒。周瑜精于音乐，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

顾。”

【张昭】

（156～236）三国时期吴国大臣。字子布。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少习《左传》，博览群书，有声名。察孝廉，举茂才，均不就。汉末大乱，为避难渡江南下。孙策起事于江东，任为长史、抚军中郎将，文武之事全委他处理，比为管仲。孙策临终时嘱其辅佐弟孙权。孙策死，人心浮动，张昭率群僚竭诚拥立并辅佐策弟权，绥抚百姓，大局方定。张昭仍任长史，权每出征，留昭镇守，领幕府事。因系旧臣，待遇尤重。赤壁战前，张昭畏惧曹操力量，主张迎降，遭鲁肃、周瑜反对。孙权因此对昭不满，称帝后，不以其为相，拜辅吴将军。昭敢于直言谏诤，如辽东割据势力公孙渊向吴称藩，孙权派使臣去辽东拜渊为燕王，张昭疑渊无诚意，力谏，孙权大怒，按刀斥昭。不久，公孙渊果杀孙吴使臣，孙权悔之无及。张昭以辅吴将军、娄侯终。

【吕蒙】

（178～219）东汉末孙权的重要将领。字子明。汝南富波（今安徽阜南东南）人。少为孙权别部司马，治军有方，士卒操练娴熟，得到宠任。建安十三年（208），从权征灭刘表将领黄祖，升横野中郎将。当年，又随周瑜、程普大破曹操于赤壁。十九年，与甘宁共破皖城（今安徽潜山），获曹操将朱光及男女数万口，拜庐江太守。次年，奉命西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计赚刘备零陵太守郝普。后升左护军、虎威将军。鲁肃卒，代督其军，屯陆口，与关羽为邻。建安二十四年，孙权采纳吕蒙献计，令其称病还建业，使威名未著的陆逊代守陆口，以此麻痹关羽不以吴军为患，调大军北至樊城进攻曹军。乘其后方空虚之际，吕蒙暗率精兵攻取南郡（今湖北江陵）。入城后军纪严明，抚恤老病，礼遇关羽将士家属，使随关羽回救的将士丧失斗志，从而斩关羽，定荆州，为巩固孙吴西部地区统治立下功勋。升南郡太守，封孱陵侯。寻卒，吕蒙贵显后经孙权告诫，始折节读书，见解独到，为老儒所不及，因而学识才略大进。鲁肃称赞他：“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

【陆逊】

（183～245）三国时期吴国将领、大臣。字伯言。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出身江东大族。孙策之婿。汉建安二十二年（217），建议进攻山越，以安定腹心，并取其精锐，扩大部伍。为孙权采纳，任帐下右都督率兵征伐，得精兵数万。建安二十四年，吕蒙积极谋划攻取江陵，陆逊曾以偏将军、右都督代吕蒙督军，并修书关羽以麻痹之，后孙吴大军乘机袭取南郡，领宜都太守。屡有战功，拜右护军、镇西将军，进封娄侯。吴黄武元年（222）为大都督，督五万人拒刘备大军于夷陵，固守七八个月不出击，等待敌军疲惫、士气低落之后，突用火攻，大败刘备（见夷陵之战）。拜辅国将军，领荆州牧，改封江陵侯。刘禅继位。诸葛亮秉政后，吴蜀复盟，孙权对其深为信任，与蜀文书往


陆逊

返，轻重可否，多与陆逊谋议。黄武七年，破魏扬州牧曹休，拜上大将军、右都护。黄龙元年（229），孙权称帝，徙都建业，留陆逊辅太子，掌荆州和豫章三郡事，镇武昌。上书反对严刑峻法，主张除大罪不可宽恕者外，对将吏均应“忘过记功”，用其才能。吴嘉禾六年（237），鄱阳（今江西波阳）郡民起事，豫章（今江西南昌）、庐陵（今江西泰和西北）两郡响应，陆逊进行镇压，并挑选降民中精壮者八千人，强迫为兵。吴赤乌七年（244），官至丞相。因亲附太子，牵涉宫廷斗争，数遭孙权责问，愤恚而卒。

【祖逖】

（266～321）东晋初有志于恢复中原而致力北伐的大将。字士稚。范阳道县（今河北涞水）人，士族出身。少轻财好侠，后折节读书，与刘琨友好。枕戈待旦，闻鸡起舞，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曾为齐王冏大司马掾，累官太子中舍人，东海王司马越任为典兵参军、济阴太守，母丧不赴。永嘉五年（311）匈奴族刘曜率汉军攻陷洛阳，晋怀帝被俘，中原大乱，祖逖率亲邻几百家避难南下，甘苦与共，被推为流徒的首领——行主。至泗口（今江苏清江北），镇东大将军司马睿任命他为徐州刺史，不久征为军咨祭酒，移居京口（今江苏镇江）。上书司马睿，力请北伐。建兴元年（313），司马睿以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只予一千人的粮食和三千匹布作为北伐物资，由其自募战士，自造兵器。他带着随他南下的部曲百余家北渡长江，中流击楫宣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至淮阴后，一面冶铸兵器，一面招募流散，得两千多人，进屯雍丘（今河南杞县）。当时，河南坞主（堡壁首领）各拥部曲自重，相互攻击，依违于石勒和晋朝之间，他派人招抚，共御石勒，进克谯城（今安徽亳州）。蓬陂坞主陈川势力较大，大掠豫州诸郡，被祖逖设伏击溃，将所掠子女财物各归原主，深得民心。陈川投石勒，祖逖率军伐陈，勒遣石虎领兵五万救援，祖逖数以奇兵击退进犯。石勒统治的镇戍多归附祖逖，北方晋室将领李矩、郭默、上官巳、赵固等也愿听从指挥，九年即收复黄河以南的大部土地。祖逖军纪严明，自奉俭约，不畜资产，劝督农桑，发展生产，深得百姓爱戴。历经丧乱的中原父老说：“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将何恨！”黄河北岸坞壁群众向祖逖密报石勒的活动，迫使不敢南犯。石勒遣书求互市，他虽不答，却任凭通商贸易，收利十倍。正当他营缮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秣马厉兵，积蓄力量，准备向北岸推进时，东晋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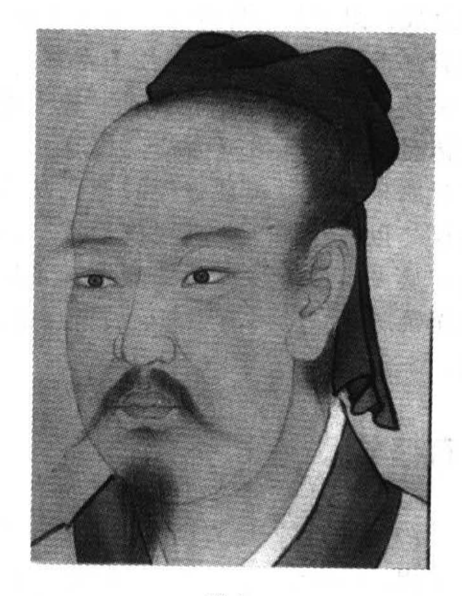

“闻鸡起舞”的祖逖

朝内部矛盾激化，王敦擅政。太兴四年（321），晋元帝司马睿派遣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衮、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以监督祖逖。祖逖忧虑王敦和东晋政权对立，内乱爆发，北伐难成，当年，忧愤死于雍丘。他收复的土地又被石勒攻占。

【谢安】

（320～385）东晋政治家。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其家族是流寓江东的北方世家大族。沉静有识鉴，少有名望。居会稽东山，屡次谢绝征召，与王羲之、支遁等遨游山水，以音乐诗文自遣。年逾四十才出仕，历任征西大将军桓温幕府司马、吴兴太守、吏部尚书、中护军。桓温专擅朝政，371 年废皇帝司马奕为东海王（后改封海西县公），立司马昱为帝（简文帝）。次年简文帝卒，恒温因简文既未禅位于己，又未受命摄政，率大兵入朝将发动政变，慑于谢安等人，未果。司马曜（孝武帝）继位，桓温又求加九锡以准备受禅让，谢安等故意拖延，至温病死，使东晋统治延长了四十七年。桓温死后，孝武帝年幼，谢安累官至侍中，独综朝政，政由安出。

谢安为相施政宽和，不以察察为事。为了拱卫京师，培植朝廷军事实力以抗衡长江上游，将北来侨民征募为北府兵，由侄谢玄统率，改变了荆、扬两重镇的均势。前秦攻下梁、益，占领襄阳，又南进徐、淮。太元八年（383），苻坚以号称百万之众伐晋，京师震恐，谢安任征讨大都督，坐镇建康，运筹帷幄，指挥谢玄等取得淝水大捷。翌年九月，谢安请求北伐，令谢玄为前锋，收复徐，兖、青、司、豫、梁六州（今山东、河南、陕西南部地区），但谢安父子叔侄遭会稽王司马道子（孝武帝同母弟）倾陷排斥，未竟其功。自淝水之战后，进位太保、太傅，声望极高。荆、江二州


谢安

刺史桓冲卒，朝议以谢玄继任。谢安为消除朝廷疑虑并调和荆、扬关系，任命桓石民为荆州刺史、桓石虔为豫州刺史、桓伊为江州刺史。但他仍不为司马道子所容，被迫于太元十年四月以抵御前秦为名北赴广陵，筑新城留住。七月病剧，还建康，八月卒。

【谢玄】

（343～388）东晋名将。字幼度。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谢安兄奕之子，少为谢安所器重，后桓温举为掾属。谢安执政，推荐为建武将军、兖州刺史、广陵相，组织与训练北府兵。太元四年（379）前秦军陷襄阳，又攻下彭城（今江苏徐州）、淮阴、盱眙，进围三阿（今江苏宝应），引起东晋朝廷震动。谢安遣玄自广陵救援，三阿围解，谢玄又与田洛合兵五万大败秦军，连克盱眙、淮阴，前秦军败退淮北。以功封东兴县侯。八年，前秦军进犯，爆发淝水之战，谢玄任前锋都督，率八千精兵强渡淝水，以少胜多，击溃前秦军。次年乘胜克彭城，北上收复徐、兖、青、豫诸州，进据黎阳（今河南浚县），以功封康乐县公。司马道子忌谢氏功高，朝议“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还”，使谢玄从坐镇的边境要地彭城回镇淮阴。他至镇所后，因病请解职，转授会稽内史，卒于官。

【苻坚】

（338～385）十六国时期前秦皇帝。字永固，一名文玉。氐族。在位二十九年。原籍略阳临渭（今甘肃天水东北），生于邺城。祖父洪，氐族酋长；伯父健，前秦创建者。苻坚博学多才艺，汉文化修养较深，擅长谋略，初封东海王，357年在氐、汉豪贵支持下，杀暴虐的苻生（苻健子），自立为大秦天王。即位前他就结纳人才，以图经国济民。即位后用人唯贤，励精图治。无才能的宗室外戚都遭摒弃，而王猛、吕婆楼、强汪、梁平老等文武之才，均授以高官，对王猛尤委以“军国内外万机之务”。

氐族豪强多是跟随苻健从枋头（今河南汲县东北）入关的建国元勋宗戚，骄横不法，不称吏职。他支持王猛抑制豪强，整饬军政，强化王权，命地方官荐举孝悌、廉直和长于文学、政事者，进行考核，“得人者赏，非其人者罪之”。由是“内外之官，率皆称职”。苻坚对于被征服的民族和地区的人采用怀柔政策，收用不少他族或投降的人为文官武将。如前燕将领慕容垂避害来投，拜冠军将军，封宾都侯；羌族姚苌归顺，任为龙骧将军。同时，他企图在思想意识上以汉化融合各族，提倡儒学，广兴学校，令公卿以下子孙入学，还亲临太学考试学生优劣。关中为前秦的根本所在，因多年混战，生产废弛，他“劝课农桑、赈恤穷困”，行区种法，兴修水利，遂使关陇地区经济发展，国力充实。

经过多年经营，前秦国势渐强盛，为统一北方准备了条件。当时前秦最大的对手是前燕。370年苻坚攻灭前燕，次年灭仇池氐族杨氏，373年取东晋梁、益两州，376年灭前凉和代，统一北方。382年派吕光进军西域。前秦成为十六国中最强大的政权，其疆域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包襄阳，北尽沙漠。新罗、

大宛、康居、天竺等六十二国遣使通好，唯东南一方的东晋未下。苻坚渐骄，急于统一全国，不顾群臣劝阻，倾前秦之力，调集步骑九十余万，分兵三路南下，以图一举消灭东晋。383 年大败于淝水。此后，前秦分裂，慕容垂和姚苌先后背叛，分别建立后燕和后秦，西燕主慕容冲攻入长安，苻坚出走为姚苌所俘，被缢杀。他在位期间致力于修明政治，统一中国北方，政绩显著，是十六国时期许多封建帝王中的杰出人物。

【王猛】

（325～375）十六国时期前秦国丞相。字景略。北海剧县（今山东昌乐西）人，家于魏郡。出身贫寒，隐居山中，贩畚箕为业。博学好读兵书，厌恶浮华风尚。善于谋略和用兵。354 年，东晋大将桓温进兵关中，王猛往谒，扪虱而谈天下形势，指出："公不远数千里，深入寇境，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见公心故也，所以不至。"一针见血地指出桓温北伐只想提高个人威望，并无收复关陇失地的雄心。他拒绝桓温之聘，与苻坚一见如故。论废兴大事，异常契合。苻坚即位，任中书侍郎，曾在一年中五次擢升，官至丞相、中书监、尚书令，封清河郡侯，成为苻坚主要的辅佐。

王猛任职十八年，综合儒法，选拔廉明，讲求实效，政绩斐然。在政治上抵制氐、羌权贵，整肃吏治，强化中央集权。任始平令，以明法峻刑禁勒豪强。为京兆尹，在京城一带坚持执法行事，数旬间诛不法贵戚豪强二十余人，百官震肃。在军事上，370 年统兵消灭前燕，留镇邺，都督关东六州军事，为统一北方作出重大贡献。选贤任能，法简政宽，使燕民各安其业。在经济上，劝课农桑，开放山泽，兴修水利，改进耕作，以致田畴开辟，仓库充实。在文化上，广兴学校，重视儒学，禁止图谶迷信，使公卿以下子孙就读，选拔学通一经，才成一艺的任官，促进氐、羌的汉化，有利于民族融合。他执政期间，"关陇清晏，百姓丰乐"，呈现小康景象。在民族问题上，与苻坚的"并包之度，绥怀之略"相左，认为鲜卑族的慕容垂难以控制，宜及早诛除。临终犹以前秦内部各族豪酋势力为忧，以东晋为正朔所在，劝苻坚勿进攻东晋，但未被采纳，因而有淝水之败。

【苏威】

（542～623）隋代宰相。字无畏。其家是京兆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大族，父苏绰，西魏名臣，曾助宇文泰改制。北周时，苏威袭爵美阳县公，大冢宰宇文护以女妻之。苏威见护专权，害怕在政争中牵连受祸，遂避居山寺。宇文护被杀后，他长期托病不出。杨坚辅政，因高颎推荐，欲重用他，他知杨坚有代周之志，便逃归乡里。隋朝建立，隋文帝杨坚任他为太子少保，兼纳言、民部尚书。他建议减轻赋役，被采纳。后又兼任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苏威很有才能，历任要职，与高颎参掌朝政，齐心协力辅佐隋文帝。政刑大小，均参与筹划。文帝修订隋朝典制，律令格式多为苏威所定。开皇九年（589）被任为尚书右仆射。十二年，有人告发他和主持选举的吏部官员结为朋党，任

用私人，遂被免除官爵。此后，屡次起用，屡被免官。大业元年（605），他继杨素为左仆射，三年，因事罢免，后又以太常卿、纳言参掌朝政，加开府仪同三司，颇受尊重，不久又被罢免。他对隋炀帝暴政不敢直言进谏，遇事多望风承旨。隋末，宇文化及杀炀帝，以苏威为光禄大夫。化及败，苏威降李密；李密败，苏威又归王世充。世充称帝，署苏威为太师。唐平王世充后，苏威求见秦王李世民和唐高祖李渊，均遭拒绝。武德六年（623）病死长安。

【韩擒虎】

（538～592）隋代名将。字子通。河南东垣（今河南新安）人，世代将门。父韩雄，北周时，官至大将军。擒虎受家庭的影响，少年时就以胆略见称；又喜读书，经史百家，皆略知大意。擒虎袭爵新义郡公，又以军功升至上仪同，先后任永州、和州刺史。屡败陈军。隋朝建立，隋文帝杨坚志在统一南北，知擒虎有文武才用，命他为庐州总管，镇庐江（今安徽合肥），作灭陈准备。开皇八年（588）十一月隋大举伐陈，擒虎为先锋，亲率精兵五百，自横江夜渡，袭取采石，半天之内，攻拔姑孰（今安徽当涂），接着向陈都建康进军。擒虎声威早闻于江南，沿途陈军纷纷溃降，陈大将任忠被贺若弼打败后，也弃军降于擒虎。擒虎以精骑五百快速前进，首先进入建康城内，俘陈后主陈叔宝，为南北统一作出了贡献。擒虎以平陈功，进位上柱国，出为凉州总管，不久召还。十二年病死。

【杨玄感】

（？～613）隋末最先起兵反隋炀帝杨广的贵族首领。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人。父杨素，曾协助炀帝夺取皇位与平定汉王谅的叛乱，假楚公，位至司徒。玄感以父功为柱国、礼部尚书，自以为家世显贵，朝臣中多其父故吏；又见朝政紊乱，炀帝猜忌大臣，他内心不安，遂和诸弟阴谋推翻炀帝的统治。

大业九年（613）春，炀帝二征高丽，玄感在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督粮。这时，隋末农民起义已经爆发，义军星罗棋布，遍及全国。玄感见有机可乘，于是滞留漕粮，召集亲故，于六月三日率兵据城，置官属，造兵甲，征丁夫；又伪称征辽东的水军总管来护儿谋反，传书傍郡，令发兵会黎阳。李密自长安应召至军，为玄感谋主。李密认为：北据幽州，断炀帝后路，为上策；西入长安，控制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为中策；就近攻洛阳，胜负难测，为下策。玄感以下策为上计，引兵从汲郡（今河南淇县东）渡河，围东都洛阳。玄感以“为天下解倒悬之急”为号召，从者如流。余杭民刘元进等也举兵响应。玄感起兵，是隋统治集团的大分裂，贵族官僚子弟如观王杨雄子恭道、韩擒虎子世谔等四十余人都来军中，光禄大夫赵元淑、兵部侍郎斛斯政等也与他通谋。玄感起兵给隋政权震动很大，炀帝闻讯后仓皇从辽东撤军南下。玄感屯兵洛阳城下，久战不克，隋援军到来，玄感腹背受敌，被迫西撤，为追兵所及，大败，奔上洛（今陕西商县），八月初，死于葭芦戍。玄感起兵为时虽短，但它削弱

了隋统治势力，促进了农民起义。

【宇文化及】

（？～619）隋末叛军首领。代郡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人，隋大将宇文述之子。年少时不守法度，长安人称他为“轻薄公子”。杨广为太子时，他领禁军，出入卧内，很受宠信。隋炀帝杨广即位，授他为太仆少卿，又以其弟士及娶南阳公主。化及受宠骄横，曾违禁与突厥交市，因公主的缘故，才免一死。宇文述临终前乞求炀帝看顾其子，炀帝于是授化及为右屯卫将军。大业年间，义军、叛军蜂起，炀帝在江都（今江苏扬州）不敢回京城，而称为“骁果”的随从禁卫多关中人，不愿从炀帝久驻扬州，打算自行回本土。统领骁果的武贲郎将司马德戡等得知此状，便集兵数万，于大业十四年（618）发动叛乱，推化及为主，缢杀炀帝，立秦王杨浩为帝。化及自称大丞相，引兵十余万西归。不久发生内讧，德戡等被杀。时东都群臣奉越王侗继帝位于洛阳，招瓦岗军领袖李密为太尉，使讨伐化及。双方战于黎阳（今河南浚县北），化及屡败，北走魏县（今河北大名西南》，将士屡叛归李密。化及自知必败，叹曰：“人生固当死，岂不一日为帝乎!”于是毒杀杨浩，即帝位于魏县，国号许，改元天寿。武德二年（619），唐遣李神通攻化及，化及东走聊城（今山东聊城东北）。时窦建德已立夏国，遂以讨逆为名，往攻聊城，神通退兵。同年闰二月，建德攻陷聊城，擒化及，槛送襄国（今河北邢台），与其两子同时处斩，许亡。

宇文化及被杀地点，《隋书》本传作河间：《北史》本传、两《唐书·窦建德传》作大陆；《资治通鉴》作襄国，今从《资治通鉴》。

【王世充】

（？～621）隋末割据者之一。字行满，本姓支，出自西域。其祖支颓耨，徙居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早亡。其父收，因母改嫁仪同霸城人王粲，故冒姓王。王收曾官至怀、汴二州长史。世充卷发，利口善辩，涉书传，好兵法，且明习法律。隋开皇中，为左翊卫，以军功拜仪同，转兵部员外郎。大业中，累迁江都（今江苏扬州）丞，兼领江都宫监。他窥测隋炀帝杨广颜色，阿谀顺旨，获得炀帝宠信，背地里阴结豪强，收买人心。杨玄感反隋时，朱燮、管崇于江南起兵响应，世充募江都万余人破之。齐郡农民义军孟让率十万众至盱眙（今江苏盱眙东北），世充又设计袭破之。大业十二年（616）迁江都通守，镇压河北格谦余部及南阳卢明月。次年瓦岗军（见隋末农民起义）占领兴洛仓，进逼东都。炀帝命世充为将军，统率诸军十余万屯洛口拒战。十四年，世充领兵数万渡洛，被起义军击败，只剩千余人，走保河阳（今山西沁阳南）。隋越王杨侗召令他还洛，屯含嘉城。炀帝死后，世充与元文都、卢楚等奉杨侗为帝（史称皇泰主），杨侗以世充为吏部尚书，封郑国公。同年七月，世充杀文都、卢楚，专制朝政。时李密虽破宇文化及，还屯金墉（今河南洛阳市北），但兵力损失很大。世充乘机进击，大败之，李密势蹙降唐。世充收集其余众，自为太尉、尚书令。唐武德二年（619）

四月，世充废皇泰主，称帝即位，建元开明，国号郑。三年，唐高祖李渊遣秦王李世民攻郑，进逼东都，世充乞援于夏主窦建德。四年五月，李世民败夏军于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建德被俘，世充以洛阳降，郑亡。七月，唐徙世充及其家属于蜀，临行，为仇人独孤修德所杀。

【窦建德】

（573～621）隋末河北起义军前期领袖。贝州漳南（今河北故城东）人。建德父、祖世代务农，稍有资产。建德仗义疏财，甚为乡里敬重。初为里长，因犯法亡命，后遇赦得归。

大业七年（611），隋炀帝杨广征兵攻高丽，建德以“募人”从军，为二百人长。当时，山东大水，同县孙安祖，家为大水漂没，妻子饿死。县官见安祖骁勇，也将他选入从征行人中。安祖诉称贫困，不应人选，被县令笞责。安祖愤激，杀死县令，投奔建德。建德帮助安祖聚集贫困农民和拒绝东征的士兵几百人，入漳南县东境方圆数百里的高鸡泊，举兵抗隋。这时，清河鄃县（今山东夏津）人张金称、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人高士达在清河一带起义，往来漳南，地方官怀疑建德与诸义军交通，便收杀建德全家老小。建德本已随军北上至河间（今属河北），听说全家被杀，就率领部下二百人投奔高士达。士达自称东海公，以建德为司兵，听从建德建议，入高鸡泊。安祖被张金称火并后，其部都来归附建德。这支起义军拥有上万人。

大业十二年，高士达以窦建德为军司马，建德用计袭杀隋涿郡通守郭绚，声势大振。同年末，炀帝遣太仆卿杨义臣击破清河义军主力张金称部。金称遇难后，余众投建德。义臣乘胜入高鸡泊，士达阵亡，建德为士达发丧，招集散亡，重又组织起队伍。十三年正月，建德称长乐王于河间乐寿县（今河北献县）郊，年号丁丑，设置官属，分治郡县。七月，建德大败隋将薛世雄，攻克河间。唐武德元年（618）十一月，建德定都于乐寿，国号大夏，改元五凤。隋将宇文化及先已杀炀帝，这时引军西归关中。二年闰二月，建德攻宇文化及于聊城（今山东聊城东北），生擒化及。

聊城大捷，建德俘获大批隋朝的皇室、宫人、官僚和称为“骁果”的禁军。建德下令宫人立即放散，骁果也听其自去；皇室和高级官僚，除宇文化及一伙诛杀外，愿去长安（李渊处），洛阳（王世充处）和突厥（义成公主处）者，派兵护送出境；愿留者随才录用。被录用者多为著名的文学之士和工艺家。其中裴矩任右仆射（宰相），掌管选举，又为建德定朝仪、制律令，对夏政权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八月，建德攻克洺州（今河北永年东南），即迁都于此。他劝课农桑，对恢复河北的生产有积极作用。

武德二年闰二月之后八个月中，起义军发展迅速，除原有冀、定、瀛、恒、博、易六州外，还先后攻克邢、贝、沧、洺、相、赵、黎、卫八州，拥有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区。隔河与据有洛阳的王世充对峙。但主要敌手却是据有关中、向东发展的李渊。

建德在与李渊争夺河北的战争中，对唐军降将仍沿袭处理隋朝降官的政策，

但有些降将却一再伺机反叛。三年正月，唐降将徐世勣勾结黎阳土豪李商胡暴乱，虽为夏将曹旦平定，但义军将佐被害者达数百人。十二月，又发生唐降将河北慰抚使张道源暗送情报，勾引唐并州总管刘世让偷袭夏都洺州事件。

四年三月，唐兵进攻洛阳王世充，建德亲自统兵十余万援助世充，和唐军相持于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镇）一带。谋士凌敬建议全军渡河，攻占河阳，越过太行山，进军汾水流域，威胁关中，迫唐军从洛阳撤退。建德不听。五月初，李世民袭击得手，夏军溃散，建德被俘。其妻曹夫人偕左仆射齐善行等数百骑逃归洺州。

建德被俘后，洺州诸将举棋不定，山东大族李公淹、唐降官魏徵等，力劝齐善行等降唐。于是，善行散府库绢帛数十万段给予士兵，将其遣散还乡，士卒散尽。五月中，齐善行、裴矩等以洺州降唐。夏亡。七月中，窦建德于长安被杀。（见隋末农民起义）

【刘黑闼】

（？～623）隋末河北起义军后期领袖。贝州漳南（今河北故城东）人，与窦建德同乡里。黑闼家贫，建德时常给以资助。隋末，农民起义军纷起，黑闼先从郝孝德，后归李密。李密败，黑闼为王世充所俘，世充以他为骑将，守新乡（今属河南）。但他对世充不满，乘机逃归窦建德，建德署为将军，封汉东郡公，命他率兵东西袭击，往往克捷，军中号为神勇。

武德四年（621）五月，建德被唐军所败，夏政权被消灭，黑闼归乡里，杜门不出，种蔬菜自给。那时唐派往河北的官吏残虐义众，又强征建德旧将赴长安。七月，建德遇害于长安。其旧将范愿、董康买、曹湛、高雅贤等既愤建德被杀，也鉴于王世充降后，部将不能保全。他们说：“若不起兵报仇，实亦耻见天下人物。”范愿等推黑闼为主，聚众攻克漳南，再举义旗。九月，黑闼大败唐淮安王李神通、幽州总管罗艺联军，击走唐将徐世勣（即李勣），擒唐将薛万钧兄弟，兵势大盛。原属建德的将士争杀唐朝官吏，响应起义，半年之间，义军占领河北大部，尽复建德旧境。

五年正月，黑闼称汉东王，定都洺州（今河北永年东南），改元天造。夏政权文武官僚悉复本位，立法行政，都效法建德。三月末，黑闼与李世民决战于洺水（在今河北曲周西），自午至昏，战斗十分激烈，唐军遣人决洺水堰，义众兵溃，黑闼与范愿等奔突厥。

洺水之役后，唐军肆意杀戮，得脱的义军首领都被以死罪悬名缉捕，虽有赦令，获者必戮。他们的妻子被虏，人心危惧。六月中，黑闼再起，袭定州（今河北定县），曹湛、董康买等聚兵响应。十月，黑闼斩唐河北道行军大总管淮阳王李道玄于下博（今河北深县东南），迫唐洺州总管庐江王李瑗弃城西走，相州（今河南安阳）以北州县相继归附，旬日间，尽复故地，再次还都洺州。唐朝又命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率师镇压。十二月，黑闼围魏州（今河北大名县北），与建成、元吉军相峙于昌乐（今河南南乐）。建成采纳魏徵建议，释放俘虏以招诱。这时义军粮尽，部分将士被诱，动摇叛变。黑闼兵败势竭，又恐魏州城中出兵攻击，表里受敌，

遂夜走馆陶（今属河北）。黑闼被唐骑兵紧逼，不得休息。六年正月初到达饶州（今河北饶阳），他委任的刺史诸葛德威诱执黑闼，举城降唐。黑闼及弟十善等被送往洺州，为建成杀死。起义终告失败。

【翟让】

（？～617）隋末农民起义中瓦岗军前期领袖。东郡韦城县（今河南滑县东南）人。曾任东郡法曹，犯法当斩，狱吏黄君汉知道他骁勇，认为他“可救生民之命”，便不顾个人安危，私自释放他。大业七年（611），翟让与同郡人徐世勣（即李勣）、单雄信起兵于瓦岗（今河南滑县南），参加起义的有故县吏邴元真、善于占卜的贾雄和翟让兄翟弘等。翟让以贾雄为军师，邴元真为书记，徐世勣、单雄信为领兵将校，所部多齐、济间渔猎手。瓦岗军初期活动于东郡一带，后从徐世勣建议，分兵西上，进入大运河所经的郑、宋（今河南东部郑州、商丘一带）界，阻截往来的公私船舶，资给丰足，归附者日众，起义军很快发展到万余人。大业十二年，李密参加瓦岗军。他设计袭斩了曾累败起义军的张须陀，次年，夺取兴洛仓，对瓦岗军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十三年二月，翟让推李密为瓦岗军首领，号魏公。不久，瓦岗军围攻洛阳，大批隋军投降，增强了李密在瓦岗军中的地位，因而李密与瓦岗军部分早期将领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翟让的司马王儒信劝翟让自为大冢宰，总领众务。翟让不从。十一月，翟让被李密用计杀死。

【李密】

（582～619）隋末农民起义中瓦岗军后期领袖。字法主。京兆长安人，祖籍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南）。李密曾祖李弼，西魏八柱国之一，北周统治核心关陇集团的著名家族。祖父曜，北周开府，邢国公；父宽，隋柱国，蒲山郡公。

隋开皇中，李密袭爵。大业初，为左亲卫府大都督，东宫千牛备身。李密不满宿卫侍从官职，称病自免，闭门读书。大业九年（613），杨玄感于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起兵反隋，召李密为谋主。玄感败，李密逃亡。十二年，入瓦岗军，翟让派他游说河南地区小股反隋武装归附，很有成效。同年十月，李密劝翟让迎击隋悍将荥阳通守张须陀所统精卒，大败隋军。这次战役李密立了大功，翟让命他分统一部分军队。李密军令严肃，赏赐优厚，士卒乐意为他所用。瓦岗军声势渐盛，他劝翟让要有平定天下的远大目标，建议袭取兴洛（后改洛口）仓，开仓赈济，扩充队伍，然后进取东都。大业十三年，瓦岗军攻取洛口仓，招就食饥民几十万，起义队伍迅速壮大。

李密长于谋略，归瓦岗军时孑然一身，经过半年的活动，不仅取得了翟让的信任，而且逐步在瓦岗军内部形成以李密、房彦藻、常何、时德叡，李玄英、祖君彦等为核心的势力。十三年初，李密获准建立“蒲山公营”。

蒲山公营建立后，李密加紧活动，瓦岗军旧部开始分裂。二月，在王伯当、贾雄和徐世勣（即李勣）的支持下，翟

让推李密称魏公于洛口，改元永平。设置魏公府和行军元帅府，又置“百营”以招徕各路反隋武装。魏公府下置三司、六卫，以翟让为司徒，徐世勣、单雄信为左右武侯大将军，各领本营，这是瓦岗旧部；元帅府置左右长史、司马、记室、护军，又置“内军四骠骑”，统率亲兵八千以供宿卫，这是蒲山公营的扩大，是李密的嫡系武装。

这时，瓦岗军屡败隋军，据有洛口、黎阳、回洛三个大粮仓，河南诸郡县相继降附，今河南以至山东境内诸起义军也都接受魏公号令，李密在各路起义军中确立了盟主地位。就在这时，瓦岗军领导集团内部李密派和翟让派之间在处理隋降官、分配军资等问题上，矛盾愈演愈烈，同年十一月，终于发生火并。在元帅府长史房彦藻、司马郑颋的周密策划下，李密置酒召司徒翟让及其兄翟弘、司徒长史翟摩侯（翟弘子）、司马王儒信、左右武侯大将军徐世勣和单雄信等赴宴，于席间杀翟让、翟弘、翟摩侯、王儒信及从者数百人；徐世勣受伤，单雄信叩头请命，得免于死。李密于是分翟让本营，由王伯当、徐世勣、单雄信分领，后来李密又命徐世勣出守黎阳，把单雄信降为外马军统领。

十四年（618）三月，江都发生兵变，推宇文化及为主，杀隋炀帝杨广，率众十余万西归。化及西归，洛阳惊恐，隋内史令元文都等策划招抚李密，使他拒敌化及，自己坐收渔人之利。皇泰主（见隋末农民起义）遣使任李密为太尉、尚书令、行军元帅、魏国公，命他讨伐化及。李密与洛阳长期相峙，这时化及兵逼黎阳，李密深恐腹背受敌，因此接受隋的官爵，七月出兵东讨化及。两军在黎阳附近的童山激战，化及兵败北走。但此时东都内部也发生变故，王世充利用手中掌握的兵权发动政变，杀死召李密入朝的元文都，专制朝政。童山之战，李密虽然取得胜利，自己的兵力也遭到重大损伤，世充组织了两万多军队，乘机进击。两军战于偃师（今河南偃师东），李密军大败，本营覆没，亲将秦叔宝、程知节（初名程咬金）、牛进达等被俘，单雄信投降。王世充入偃师，又俘季密将佐裴仁基、郑颐、祖君彦等。李密部将王伯当闻偃师兵败，弃金墉（今河南洛阳北），北走河阳（今河南孟县东南）。李密想退入洛口，守将邴元真已降世充；欲奔黎阳，又疑徐世勣不可信，走投无路，乃于九月渡河至河阳，引王伯当、常何、贾润甫等两万人降唐。李密自以为凭自己的地位威望，足以招抚山东郡县，一定会受到唐的优待，不料到了长安，待遇菲薄，只任他为光禄卿，封邢国公，他十分不快。

十一月，唐高祖李渊遣李密偕王伯当、常何、贾润甫等到山东去招收旧部。十二月，李密至稠桑（今河南灵宝北），接到敕书，要他单身还朝。他感到已被猜疑，遂与润甫等谋叛唐，润甫等劝阻不止，常何西归，润甫奔熊州（今河南宜阳西）。十二月三十日（619年1月20



瓦岗军开仓散粮（油画）

日），李密与王伯当率领骁勇数十人，袭据桃林县（今河南三门峡西南），遂南入熊耳山。唐将盛彦师邀击，斩李密及伯当于邢公岘。

【杜伏威】

（596～624）隋末农民起义中江淮义军领袖。齐州章丘（今山东章丘西北）人，家世贫困。大业七年（611）伏威十六岁时，与至交辅公祏同聚众起义。他勇敢善战，被推为主。九年，起义遍及各地，他率众投奔长白山左君行部，因不被礼遇，随即离去，转向淮南。他设计击败江都派来镇压的隋军，先后合并了下邳、海陵的反隋武装，兵威渐盛。十二年隋炀帝杨广遣陈稜统宿卫精兵八千人进攻。次年，伏威奋勇突阵，大败隋军。起义军乘胜破高邮（今江苏高邮北），占领历阳（今安徽和县）。伏威自称总管，以辅公祏为长史，收取属县。江淮间小股反隋武装争来归附。伏威选敢死之士五千人为上募，待遇优厚，战时作为前锋；又以壮士三十余人为假子，分领部众，与共衣食；军令严整，有功必赏，临阵后退者必杀；所得资财，都作为军资。

十四年，宇文化及杀炀帝，任伏威为历阳太守，伏威不受，上表洛阳，接受皇泰主（见隋末农民起义）所封的东道大总管、楚王的官爵。武德二年（619），降唐，任和州总管、淮南安抚大使；三年，进使持节、总管江淮以南诸军事、扬州刺史、东南道行台尚书令，封吴王。这时另一支起义军李子通部据有江都（今江苏扬州）、丹阳（今江苏南京）长江两岸地区。伏威遣辅公祏渡江击败子通，占领淮南及丹阳以至毗陵（今江苏常州）的江南地区，徙居丹阳。他进用士人，修治器械，减轻赋税，严惩奸盗和贪官污吏。子通兵败东走后，重又组织武装，消灭了占有吴郡（今江苏苏州）和今浙江地区的吴兴豪族沈法兴，徙都余杭（今浙江杭州），兵势复振。四年，杜伏威最后破灭了李子通，又进军攻占江东和皖南。

早在武德四年初，唐军攻围洛阳时，伏威曾遣兵助战。五年秦王李世民镇压了河北刘黑闼起义军，进攻据有今山东东部的徐圆朗，取十余城，淮北震动。伏威自请入朝，以辅公祏留守。唐以伏威为太子太保，仍兼行台尚书令，留长安。六年八月，辅公祏在丹阳举兵反唐。七年二月，杜伏威在长安被杀。

【李世民】

隋大业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拥众据地，各霸一方。隋炀帝困居江都（今江苏扬州），隋王朝已经名存实亡了。

“乱世出英雄”，有一位胸怀济世之略的年轻人，眼见隋朝行将就木，便劝说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另创基业。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打出造反旗帜，统军三万西进，直逼隋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这位年轻人，凭借其超群的军事才华，很快就成为这个反隋集团的中坚人物，从此，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又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叫李世民，也就是后来的著名皇帝唐太宗。

李世民是李渊的次子，善于骑射，长于谋略，为人聪睿勇决，见识深远，颇受李渊器重。李渊起兵造反后，即对

李世民委以重任，把手中的一半人马交与他统领。此时，李世民才刚满十八岁。

这样一来，年轻的李世民就有了施展才华与抱负的大好机遇。

大业十三年七月，李渊大军从太原出发，十四日抵达距霍邑（今山西霍县）只有五十多里的贾胡堡。这时，留守长安的隋朝宗室得到李渊起兵西征的消息，命虎牙郎将宋老生屯兵据守霍邑，阻止李渊继续西进。

适值连日阴雨不止，部队的粮草也将耗尽，李渊不由得萌生退意，便和近臣裴寂商议，想暂时还师太原。李世民听说后，连忙制止道："创兴大义，拯救苍生，理应先入长安，号令天下，遇到点小挫折就犹豫，恐怕从义众人要顷刻瓦解了。再说还守太原，割据一城，充其量不过是山贼水寇的勾当，会有什么远大前程！"李渊不为所动，仍执意退兵。李世民悲愤满腔，情不自抑，竟在营门外号啕大哭起来。李渊闻声召他入问何故，李世民回答说："如果退兵众人就会散掉，敌人随后聚兵掩袭过来，我父子必将束手待毙了，所以悲哭。"李渊这才悔悟，打消了退兵的念头。

两天后，天空放晴，李渊挥师径取霍邑。李世民先率数十骑至城下，扬鞭指麾，作出要围城的样子，激宋老生出战。宋老生果然开门出兵，背城列阵。李渊与长子建成在城东，李世民于城南成犄角呼应。隋军先在城东发起攻击，逼退李渊军。李世民则乘机引兵从南面高地直插隋军侧背。隋军阵脚顿时大乱，士兵丢下兵器，纷纷涌入城内，混乱中竟把主将撇在了城外。形势危急，宋老生只好攀吊索登城，不想追兵赶到，被腰斩为两段。主将一死，守城隋军或降或逃，霍邑很快就落入李渊手中。

霍邑一战，是李渊成败的关键之战。李世民在此战中初步显露出了深远的战略眼光和用兵方略。若干年后，唐太宗李世民在与唐初名将卫国公李靖谈论军事问题时，对这一仗作了精辟独到的分析探讨。

唐太宗说："我击破宋老生的那次战斗，刚一交锋，我军稍稍后退，我亲率精骑自南飞驰而下，横冲老生阵脚，将其后路截断，因此擒住了敌人。这是用的正兵，还是用的奇兵呢？"

李靖回答说："臣据兵法看，自黄帝以来，凡战都是先用正兵而后用奇兵，先用仁义而后用权诈。霍邑之战，陛下兴师是正义举动，这是用了正兵；右翼军稍稍后退，则是用了奇兵。"

唐太宗问："那时右翼军后退，差点坏了大事，怎么说是用了奇兵呢？"

李靖说："大凡用兵作战，向前推进便是正兵，向后退却就为奇兵。若右翼军不退却，那么宋老生怎么会竭尽全力出击呢？《孙子兵法》说：'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宋老生不会用兵，只知恃勇急进，没想到后路被陛下截断，所以失败。这就是所谓以奇为正呀！"

唐太宗说："霍去病用兵常与孙（孙武）、吴（吴起）的兵法暗合，有没有这回事？霍邑之战，当右翼军退却时，高祖大惊失色；待我从敌侧后奋力反击时，局势反而变得对我们有利了，这也与孙、吴用兵之法暗合。你说的确实很对。"

攻克霍邑后，李渊以李世民为先锋，西渡黄河，开赴渭北。李世民率军迅速进抵泾阳（今陕西泾阳），后与李渊会师，于十一月攻入长安。入城后，李渊



李世民

立隋炀帝的孙子代王杨侑为帝，自任大丞相，执掌国政，封李世民为京兆尹、秦国公。

正在这时，西北豪强薛举自称秦帝，乘李渊立足未稳，聚兵号称三十万，进逼渭水之滨。李世民率部迎战，大破薛举之子薛仁果于扶风（今陕西凤翔），斩首万余级，又夺占了不少地盘。第二年春天，李世民兄弟分别被任命为左、右元帅，总兵十余万，回过头来东进洛阳。他在洛阳附近设伏，击败了隋将金紫光禄大夫段达。

五月，隋炀帝在江都被部下缢杀的消息传到长安后，久存自立野心的李渊便废掉了杨侑，改元武德，定国号为“唐”。李渊建唐后，授李世民为尚书令，进封秦王。

这一年七月，薛举闻知李渊称帝，再次进犯泾州（今甘肃泾川北），新加封的秦王李世民率军反击。八月，薛举病死，他的儿子薛仁果继为秦帝，派副元帅宗罗睺领兵出战。李世民针对薛军急于速决的心理，决定采取深沟高垒、坚壁不战的方针，相持待机六十余天。直到薛军粮草将尽、军心骚动之时，李世民才对诸将说：“对方士气已衰，我们可以出战了。”

他先拨一部兵力，由行军总管梁实统领，在浅水原（今陕西长武东北）列阵诱敌。早已心急如焚的宗罗睺见唐军终于出战，急令部众倾巢而出。但唐军守险不出，薛军攻之甚急，渐至疲惫。

就在这时，李世民亲率骁骑绕道敌后，向薛军腹背杀来。李世民一马当先，冲入敌阵，形成了内外夹击的态势。薛军顿时大乱，被唐军斩首数千，自相践踏、坠入涧谷者更是不可胜计。宗罗睺见情势不妙，带着残兵夺路而逃。李世民率数千骑兵在后穷追不舍，一直追到薛仁果所居的折墌城（今甘肃泾川东北）。

薛仁果慌了手脚，急忙闭城自守。天色将晚，唐军大队人马陆续跟了上来，李世民随即布兵把折墌城包围起来。第二天早上，薛仁果自知无力抵抗，便出城请降，这股割据势力终于被唐军吃掉了。

浅水原之战是李世民指挥的又一个杰出战役，先疲后打、攻敌侧背是其特点，同时也是李世民一贯的作战风格。在作战中，他常能以轻骑深入迂回，出敌阵后，攻其侧背，出奇制胜。

李世民也是一位善于根据不同情况而灵活运用战略战术的军事家，他的这种不拘定势的军事才能在平定山东（崤山以东的广大地区）一战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唐武德三年（620年）七月，李世民在扫平宋金刚、刘武周等割据势力后，兵锋东向，包围了洛阳。这时在洛阳称郑国皇帝的是军阀王世充。王世充被围后，派人向河北义军领袖、夏王窦建德

求救。窦建德担心唐灭郑后，下一个打击目标会轮到自己，就于第二年三月率十万大军驰援洛阳，屯兵于虎牢（今河南荥阳境内）之东。

战报传到唐营，李世民迅速召集谋臣宿将商议对策。有人认为夏军声势浩大，如果继续围城，将会两面受敌，不如暂时撤围，退守新安，依险待机；有人主张分兵作战，不能让夏、郑两军会合。李世民审时度势，毅然采纳了后一种意见，说："窦建德新破孟海公，将骄卒惰，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应该进据虎牢，这等于扼住了敌人的咽喉。他若冒险来争，我们以逸待劳，取之甚易；他若狐疑不战，那不出旬月，王世充必溃。到时我们再集中力量消灭窦建德，这岂不是一举两克？"

于是，李世民留一部兵力，继续围困洛阳，自率精锐奔赴虎牢阻击夏军。双方相持月余后，窦建德率军来决战，李世民只用小部兵力接战，主力仍按兵不动。时至中午，夏军士卒饥疲，阵形开始紊乱。李世民见此情况，便对众将下令道："敌势已懈，急速出击！"将士们闻令跳上马背，势如狂风般地向敌营席卷过去。顿时，尘土飞扬，刀光闪耀，杀得夏军相顾错愕，立刻全线崩溃。李世民挺身向前，众将士紧随其后，追击三十里，斩首数千余级，窦建德也受伤被擒，十万大军士崩瓦解，作鸟兽散。

李世民把窦建德押至洛阳城下，王世充知道再没有指望了，只好开城投降，山东遂平。平定山东之战中，李世民抓住了虎牢这个关系全局的重要环节，扼住了夏军的咽喉，又根据战局发展情况，采取中央突击夏军心脏的战法，全取夏、郑两军，反映出他高超的指挥艺术和灵活的指挥风格。

这一战以后，黄河南北广大地区尽为唐境，统一事业的基石基本上奠定了。

但是不久，窦建德的部将刘黑闼等人再度起兵反唐，几个月就占领了河北、山东大部分州县。这年十二月，李世民再次受命东征。第二年三月大败刘黑闼军，刘黑闼败逃突厥，山东、河北之地又复平定。

武德七年（624 年），唐王朝在镇压了南方杜伏威和辅公祏等势力后，终于重新统一了中国。在削平群雄、完成统一的过程中，李世民功不可没，他的军事才华，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在统一战争结束后，李世民对部下说："我从少年征战至今，颇知用兵的要领。每观敌阵，就知道它的强弱所在。我以弱抵强，以强抵弱，然后前后夹击，敌人没有不溃败的。"

李世民所说的强弱运用，也就是奇正的作战策略。他看重奇兵，经常大胆地以弱为正，以强为奇。正面列阵只不过是为了吸引敌人，辅助行动，而侧背出奇才是部署的重心、决胜的关键。

李世民不仅是位熟练运用奇正作战策略的军事实践家，而且也是位造诣颇深的军事理论家。在称帝多年后，他与深晓兵法的卫国公李靖就用兵中的奇正变化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唐太宗说："先退后进是以奇为正，能说'凡兵却，皆可谓之奇'么？"

李靖说："军队退却时，若旗帜参差，鼓声混乱，士兵喧嚣，这是真正败退，并非敌人的奇兵；若旗帜整齐，鼓声相应，号令划一，虽退而并非真败，这里面必有奇。所以，兵法上说，佯退的军队不要追赶；又说，能而示之不能。

这都是奇兵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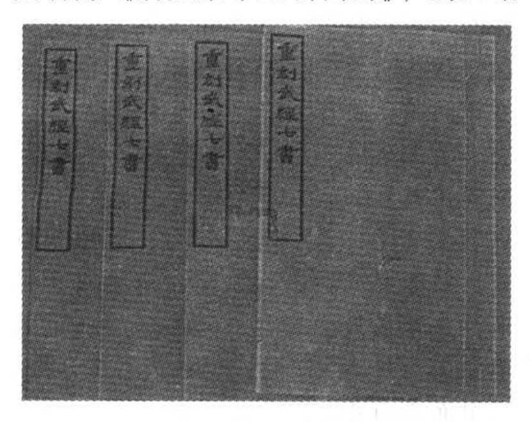
唐太宗深入一步问：“奇正是平时就有分别呢，还是作战时临时决定的呢?”

李靖回答：“孙子说，‘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作战时，奇可变为正，正也可变为奇，也可以正生奇，以奇生正。这是作战时战略战术绝妙的变化，平素是没有区分的。”

唐太宗说：“说到这里，我对奇正的变化，是这样理解的：我的正，要让敌人看成是奇；我的奇，要让敌人误认为是正。只让敌人看到表面现象，无法推测揣度，而不知我真正的奇正变化。”

李靖十分敬佩地说：“皇帝陛下了不起，您已经大大超过古人，我是无法相比的。”

唐太宗与李靖结合各自的作战实践，不但对奇正的作战策略有所论述、发挥，而且还对其他军事谋略内容作了深刻具体的讨论研究。诸如用兵中的虚实、攻守、阵法等问题，在唐、李二人的探讨中都有所涉及。后来，宋朝人阮逸把他们两人谈论军事问题的记录整理成书，定名为《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列入诏



《武经七书》

定的《武经七书》之中，成为传世的古代重要军事著作。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发展了《孙子兵法》、《司马法》等古代兵法的要义，军事思想非常丰富。它反映了李世民在军事理论方面的建树，是李世民作为一位曾推动过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的军事家的有力印证。

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是位武功赫赫的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位在政治上大有作为的封建帝王。他以隋亡为戒，推行清明政治，任用贤臣，勇于纳谏，在他的身后，辟有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为大唐帝国的繁荣盛世拉开了序幕。

人们在提起唐太宗李世民时，总要把他与秦皇、汉武相提并论。的确，唐太宗作为一位曾给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以重大推动作用的封建帝王，其显赫的文治武功足以与秦皇、汉武相媲美，然而唐太宗在军事理论方面的成就，却是秦始皇、汉武帝难望其项背的。

【李靖】

唐初，人才济济，文武齐备。但出朝为将，入朝为相，既通兵法，又善征战，就要首推李靖了。

遇主逢时

李靖生于北周武帝天和六年（五七一年），卒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六四九年），本名药师，雍州三原县（今陕西三原）人，出身于官僚家庭。

青少年时期的李靖，姿貌魁伟，并受到良好的教育，有文武才略和远大的抱负，曾对亲近的人说：“大丈夫要遇主逢时，必当立功立事，以取富贵，何必去做咬文吐字的书生!”李靖的话并

不是青少年狂话，他的舅父、隋朝名将韩擒虎经常和他谈论兵法，每每赞不绝口，曾说："可以与谈论孙、吴兵法的，除了李靖还有谁呢！"那时李靖才二十岁左右。大约在隋文帝后期，李靖进入仕途，最初做长安县（今陕西西安西北）功曹，是一个地位很低的小官。后来在三十岁左右，到兵部做驾部员外郎，地位也不算高，但在朝廷中，他却以超群的文武才略，深得吏部尚书牛弘、宰相杨素的赏识。牛弘曾经赞叹说："李靖，王佐之才也！"意思是说李靖具有辅佐皇帝的才干。杨素有一次拍着自己的座位，对李靖说："卿终当坐此。"言外之意，李靖将来一定能做宰相。

隋炀帝大业（六〇五～六一八年）末年，李靖出任马邑（今山西朔县）郡丞，丞在郡中地位较高，仅次于太守、通守。当时，由于隋炀帝的昏庸残暴，奢侈腐化，好大喜功，滥用民力，又连年发动对外战争，社会经济濒临崩溃，人民生活极端痛苦。广大农民纷纷揭竿而起，起义的烽火遍布各地，一些贵族和地方官吏也乘机起兵。占领州郡，称王称帝。李靖在马邑，觉察到太原留守李渊正在密谋策划起兵，于是他前往江都（今江苏扬州），准备向在那里巡幸的隋炀帝告发。不料走到长安，道路阻塞不通，只好滞留长安。大业十三年（六一七年），李渊终于在太原起兵反隋。他乘瓦岗军与镇守洛阳的隋将王世充正在争夺河南，关中兵力空虚之机，迅速抢渡黄河，攻占了长安。李渊在长安俘虏了李靖，决定把他处死。临刑之际，李靖呼喊说："你李渊起兵，本为天下除暴乱，以成大业，为何以私怨而斩壮士？"李渊一听，知道李靖不是寻常人物，再加上李世民又站出来为他说情，这才免他一死。李靖从此归附了李渊和李世民父子，实现了他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遇主逢时"的愿望，在李渊统一全国，李世民征讨东突厥的战争中，立下丰功伟绩。

平抚岭南

大业十四年（六一八年）三月，在农民大起义的沉重打击下，隋朝的统治已经陷于瓦解，隋炀帝在江都被大将军宇文化及等人杀死。五月，李渊在长安建立唐朝，他就是唐高祖。武德二年（六一九年），唐高祖稳定了在关中地区的统治，并且占有了巴蜀地区（今川渝）后，即以关中为根据地开始着手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他一方面命秦王李世民经略北方，一方面则以赵郡王李孝等人经略荆州地区（今湖北荆州地区）。当时的荆州为梁王萧铣所盘踞。萧铣是南朝梁皇室后裔，在隋末农民大起义中起兵，占据了长江中游地区，势力范围东起巴陵（今湖南岳阳），西抵三峡，北自汉水中游，南极交趾（今越南北部），建都江陵（今湖北江陵），拥有精兵四十万，是当时南方一股极为强大的割据势力。

为了讨伐萧铣，唐高祖命令李靖率兵南下，前往夔州（今四川奉节），进行出征前的准备工作。李靖率领唐军抵达峡州（今湖北宜昌）后，受到萧铣军队的阻挡，旷日持久，迟迟无法开赴夔州。唐高祖对李靖本来就有宿怨，听到他滞留峡州不进的消息，恼怒异常，命令峡州都督许绍把他处死，幸好许绍很爱惜李靖的才干，上奏请求赦免，唐高祖这才作罢。后来，许绍击败了萧铣的军队，李靖到达夔州。第二年，开州

（今四川开县）少数民族冉肇则进攻夔州，驻守夔州的赵郡王李孝恭迎战失利。李靖闻讯，急率八百士卒偷袭冉肇则大营，并在一个险要地点设下伏兵，阵杀了冉肇则，俘敌五千余人。这个以少胜多的消息传到京城，唐高祖特别高兴，对大臣们说："我听说使功不如使过，李靖果然立了大功。"他亲手写了一个赦令给李靖，说："既往不咎，以前的事，我早就忘了。"从此，唐高祖对李靖倍加重用。

武德四年（六二一年）初，李靖经过深思熟虑，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向李孝恭提出了攻取萧铣的十条方略。李孝恭把李靖的方略上报给唐高祖，唐高祖极为赞赏，决定加以采纳。于是，便行命李孝恭为夔州总管，同时又考虑到李孝恭没有指挥过大规模战争的经验，又任命李靖为行军总管，兼任李孝恭的长史，让他担负战争的具体指挥工作。李靖接到任命，即按十条方略，积极进行出征的准备工作。讨伐萧铣，水师是非常重要的，但唐军缺乏战船，而军中的北方士卒不习水战，所以李靖就加紧建造战舰，训练水师。同时，巴蜀地区属于望风而降地区，唐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还很不巩固，李靖劝说李孝恭召集巴蜀大地主和少数民族酋长的子弟，量才选用，安置在自己的身边，表面上是提拔重用，实际上是做为人质。这样做，不仅稳定了巴蜀局势，同时因水师多是巴蜀人，对稳定军心也起了重要作用，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九月，唐高祖下达讨伐萧铣的诏令，唐军兵分四路向荆州地区进发。赵郡王李孝恭受命为荆湘道行军总管，李靖摄行军长史，统领十二总管，为唐军的主力，自夔州顺流东下。时值江水泛涨，三峡路险，急流汹涌，萧铣认为李孝恭、李靖根本不会沿水路出师，毫不加防备。李孝恭的部将也认为江水猛涨，不宜出师，建议等到江水退落以后再进军。李靖认为："兵贵神速，现大军刚刚集结，萧铣还不知道，如果乘江水正涨出师，突然出现在江陵城下，攻其不备，乃是兵家上策。即使萧铣得知我将出师的消息，仓促调集军队，也无法应战。擒获萧铣在此一举，机不可失也！"李孝恭采纳了李靖的正确意见。于是，大军分乘二千余艘战舰，由夔州出发，浩浩荡荡，乘急流，过险滩，顺利渡过三峡，顺流而下，在十月间抵达夷陵（今湖北宜昌）。萧铣大将文士弘率精兵数万屯驻于清江（今湖北清江，自宜都注入长江），李孝恭准备乘胜掩击。李靖认为，文士弘是萧铣手下的名将，士卒精锐骁勇，不可力战，主张把战舰停泊在长江南岸，暂时不与敌军交锋，待其士气衰落，再出兵决战，但是，李孝恭没有采纳李靖的合理建议，命令李靖驻守大营，亲自率军向文士弘发动进攻。不出所料，李孝恭果然失利，被迫回奔江南的大营。李靖密切观察敌情，他发现文士弘的军队在小胜之后，都离船上岸抢掠财物，阵势混乱不堪，立即指挥将士乘机出击，一举击败了文士弘，缴获战舰四百余艘，歼敌万余人。文士弘带领败兵逃窜，李孝恭挥师进击，直至百里洲（唐时，长江在今湖北枝江南北分流，二流之间有一小岛即百里洲，今已不存）。文士弘整军复战，又遭惨败，退人北江（长江出百里洲而东流的水道）。

打败文士弘后，李孝恭命令李靖率领精兵五千为先锋，直逼江陵城下。萧

铣做梦也没料到李孝恭、李靖的大军会来得如此神速。在此之前，他因部将骄横，为削夺他们的兵权，下令罢兵归农，只留下侍卫士卒几千人，而将大部分士卒分散到各地去屯种。这时，只好又仓促下令，把士卒重新集中起来，但因道路遥远，士卒一时无法集结，江陵的防御极为空虚。李靖带兵来到江陵，首先乘虚攻占外郭，然后又攻下江陵水寨，先后击败萧铣大将杨君茂、郑文秀，俘虏士卒四千余人，进而围困江陵城。在攻下江陵水寨时，缴获了萧铣大批战船，李靖下令把这些战船全部散于长江水中，顺流漂荡。部将对他的做法，很不理解，说："缴获敌人的船只，应该加以利用，为什么把它们丢弃了，难道是为了资助敌人吗?"李靖回答说："不然。萧铣所盘踞的地区，南至岭外（今广东、广西等地)，东到洞庭湖，范围很大。假若我军一时攻城不下，萧铣援军赶到，我们就内外受敌，进退无路，虽有船只，又有什么用处呢？如果把缴获的这些战船散在江中，萧铣沿江将领忽然见到船只顺流漂散而下，必然认为萧铣已被打败，江陵失守，就不敢再进兵了；等到他们弄清事情的真相，至少也得十天半个月，我们用这个办法延缓敌人救兵的到来，必定可以顺利地攻克江陵。"果然，赴援萧铣的救兵抵达巴陵，见到长江之中漂荡的船只，疑惑不进。萧铣见无援军到来，李靖攻城甚紧，无计可施，只好下令打开城门出降。李靖首先率军入城，号令严肃，军不私掠。李孝恭率领大队人马随后入城，诸将建议没收萧铣将士以及同唐军交战而死的人的家产，分赏给将士们。李靖却坚决反对，他指出："王者之师，应该宣扬忠义。为萧铣战死的人，死为其主，乃是忠臣，不能与叛逆者同等看待。至于投降的人，更不应该加以惩罚，因为萧铣所控制的地区，还有许多尚未归附，如果我们惩罚萧铣的降将，没收他们的家产，那里的将士就会坚守不降。所以，我们应该宽大为怀，以慰人心。"李孝恭接受李靖的意见，不仅不没收萧铣将士的家产，并下令严禁掳掠。全军将士，秋毫不犯，江陵城中，人心安定。江汉之间萧铣所属的州县得到这些消息，纷纷望风归降。几天后，援救萧铣的各路大军十余万人，得知萧铣已经投降，也都解甲而降。

平定萧铣后，唐高祖论功行赏，授予李靖上柱国，封永安县公。接着，唐高祖命令李靖安抚岭南地区，并授予"承制封拜"的特权，代表朝廷按国家制度任命地方官吏。李靖到达岭南后，派遣使者分道招抚诸州。武德五年（六二二年）七月，岭南少数民族的重要首领冯盎投降，岭南之地全部为唐朝所占有，计得九十六州，六十余万户。于是，唐高祖又任命李靖为岭南安抚大使、检校桂州（今广西桂林）总官，让他镇守岭南。

统一江淮

武德六年（六二三年）七月，接受唐朝招抚的江淮农民起义军，由辅公佑导，在江南重新起兵反唐。唐高祖任命李孝恭为元帅，李靖为副元帅，率兵前往镇压。

辅公佑原是江淮起义军主要领袖之一。江淮起义军是隋末农民大起义的一支重要力量，主要活动于淮南江北地区，与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窦建德领导的河北军齐名。这支农民军以历阳（今安徽和县）为根据地，沉重地打击

了隋炀帝的统治，并迫使外出巡幸的隋炀帝滞留江都（今江苏扬州），无法北上东都洛阳，为推翻隋朝的腐朽统治建立了丰功伟绩。武德二年（六一九年），江淮军主要领袖杜伏威派遣使者到长安，向唐朝投降，被唐高祖封为吴王。后来，杜伏威击败了江南一些地主武装势力和农民起义军，完全控制了淮南江东之地，并将根据地迁到丹阳（今江苏南京）。武德五年（六二二年），秦王李世民率兵镇压了窦建德部将刘黑闼的势力后，占领淮北地区，而长江中游地区及岭南地区也在前一年为唐朝所占领，杜伏威感到势单力孤，难以存在下去，为表示投降的诚意，便主动前往长安入朝。辅公佑对杜伏威降唐深为不满，就率领部众在六二三年秋重新起兵反唐，自称皇帝，建立了“宋”政权。起兵之后，他立即部署兵力，向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海州镇）、寿阳（今安徽寿县）发动进攻。

李靖接到唐高祖镇压辅公佑的命令，立即与李孝恭一起，带领李世勣等七总管的军队，由西、南、北三个方面包围江淮起义军。到武德七年（六二四年）初，唐军先后攻占了广陵（今江苏扬州）、芜湖（今安徽芜湖）等地，把江淮起义军压缩在江东地区，辅公佑为了确保丹阳的安全，派遣大将冯慧亮等率水师三万屯驻于江东的博望山（在今安徽当涂西南三十里），大将陈正通等率步骑三万屯驻于青林山（今当涂东南），并在梁山（地岸）、博望二山之间拉起铁链，封锁江路，以防李孝恭、李靖顺江而下，或沿江由陆路东进。李孝恭与李靖率水陆大军抵达舒州（治所在今安徽潜山，此处指舒州地区，即今安徽安庆一带），冯慧亮等死守不战，双方处于对峙状态。李孝恭召集众将研究对策，大多数将领认为：冯慧亮等拥强兵扼守，又据水陆之险，如果强攻，一时难以取胜，建议出兵绕道直取丹阳，掩袭辅公佑的根据地，丹阳一败，冯慧亮等人就会不攻自降。李孝恭准备采纳诸将的建议，但李靖却提出不同意见，他说：“冯慧亮等人所率领水陆二军虽然是辅公佑的精兵，但辅公佑亲自率领的部队数量也不少。现在我们连博望山等几个营寨尚且不能攻拔，攻取丹阳又谈何容易！如果攻取丹阳，旬月不下，冯慧亮等尾随我军之后，救援丹阳，我将腹背受敌，那就非常危险了。冯慧亮等都是辅公佑手下身经百战的将领，他们不是不想出战，而是辅公佑授意他们慎重从事，据险固守，借以拖延时间，使我帅老兵疲，如果我军前往挑战，把冯慧亮等的军队引出城来打，就可一举破敌。”李孝恭认为他的分析很有道理，便派一些老弱士卒前去进攻冯慧亮的营寨，而把大部分精兵放在后面，列阵以待。战斗打响后，前去进攻的老弱士卒不胜而退，冯慧亮不知是计，率兵出城追击，追奔了几里路，正遇上朝廷军的大队人马，被打个措手不及，遭到惨败。李孝恭、李靖乘胜率领水陆大军俱进，转战百余里，博望山、青林山的戍卒纷纷溃败，冯慧亮、陈正通二将弃阵逃遁，死伤万余人。李靖率军攻到丹阳，辅公佑得知冯慧亮、陈正通的败讯，十分恐惧，尽管手下还拥有数万精兵，仍然弃城东走，向会稽（今浙江绍兴）撤退。唐军紧追不舍，辅公佑的士卒沿路溃散，最后终于在武康（今浙江德清西武康镇）被俘。至此，江淮农民军便被彻底镇压

下去，唐朝基本上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战争结束后，唐朝在丹阳设东南道行台，以李靖为行台兵部尚书。不久，废除行台制度，设扬州大都督府，又以李靖为大都督府长史，协助李孝恭统治江南地区。经过长期的战乱，江南社会经济凋敝，人心浮动，李靖派官吏到各地进行安抚，使民心逐步安定下来，生产也日渐恢复和发展起来。

北击突厥

李靖做了一年多的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武德八年（六二五年）又奉命来到北部边疆，投入了反击东突厥的斗争。

雄踞漠北的东突厥，在隋末乘中原战乱之机再度崛起，不少农民起义领袖和地主武装割据势力纷纷向其称臣纳贡，甚至向其借兵，李渊也曾对其称臣纳贡，并借兵南下，来帮助自己发展势力。后来，李渊称帝建立唐朝，觉得向东突厥称臣纳贡是个耻辱，而东突厥也不愿意看到中原地区出现一个统一且强大的唐王朝，于是双方的关系日趋恶化。从武德五年（六二二年）起，东突厥的颉利可汗多次率兵南下，进攻唐朝，并且一度逼近到唐都长安。唐高祖在镇压了辅公佑、基本实现全国的统一之后，决心集中力量进行反击，武德八年（六二五年），他命令李靖率领江淮兵一万出潞州（治所在潞州，今山西长治）北上，并令任瓌驻屯太行，抵御东突厥的进攻。八月，颉利可汗带领十万骑兵南下，大肆掳掠朔州（今山西朔县），唐将张瑾率兵迎击，在太谷（今山西太谷）全军覆没，任瓌脱身逃奔李靖。第二年四月，颉利可汗又进攻灵州（今宁夏灵武），李靖率兵前往抵御，在硖石（今宁夏青铜峡南）展开一场激战。他指挥将士顽强拼杀，经过一天战斗，迫使颉利可汗引兵北退。不久，唐高祖便以李靖为灵州大都督，让他担负北方的御敌重任。武德九年（六二六年），唐朝太子李建成（唐高祖长子）、齐王李元吉（唐高祖第四子）与秦王李世民（唐高祖次子）争夺权力的斗争日趋激化。李世民的妻弟长孙无忌竭力劝说李世民发动政变，诛杀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李世民犹豫不决，征求李靖的意见，他婉然辞谢，没有答话，从而得到李世民的敬重。六月，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杀李建成和李元吉，两个月后，唐高祖传位给他，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皇帝唐太宗。唐太宗即位后，即以李靖为刑部尚书，后来又任命他代理中书令（宰相），再后又改任为兵部尚书兼代理中书令。

唐太宗即位后，东突厥颉利可汗乘唐朝发生政变之机，大军直逼渭水便桥（今陕西西安通往咸阳的渭河桥处），威胁长安。唐太宗感到唐朝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与之决战，只好亲自前往渭水便桥，与颉利可汗结盟，送给他大批金、帛，颉利可汗这才回师北撤。

但是，在这一事件之后，东突厥内部贵族之间互相争权夺利的矛盾急剧激化，特别是颉利可汗与突利小可汗之间的矛盾更是尖锐，不时发生内战。同时，遭受突厥统治的铁勒诸部中的薛延陀、回纥等，也乘颉利可汗南下进攻唐朝的时机，逐步发展自己的势力，摆脱了突厥的控制。再加上蒙古草原气候恶劣，频年大雪，牛马牲畜大批死亡，人民生活发生困难，东突厥的势力日渐削弱了。而唐朝经过唐太宗几年的治理，人心安定，社会经济逐步复苏起来，开始显露

出升平局面的曙光。于是，唐太宗决定进行大规模的反击。贞观三年（六二九年）九月，他任命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代州（治所在代州，今山西代县）都督张公瑾为副总管，讨伐东突厥。十一月，李靖与李世勣等分兵四路，合兵十余万，北上出击。第二年初，李靖率骁骑三千从马邑（今山西朔县）进屯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南的恶阳岭，然后夜袭颉利可汗的牙帐所在地定襄。颉利可汗没有预料到李靖会突然率兵深入突厥境内，他误以为唐朝大军必定是倾国而来，否则不敢孤军深入，慌忙率众越过青山（今内蒙古大青山），逃向碛口（大沙漠之口，在今内蒙古二连浩特西南）。李靖不战而下定襄后，派间谍潜入敌人内部，行离间计，使颉利可汗的亲信康苏密带领一部分东突厥部落降唐。这是唐朝建国以来对东突厥战争中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唐太宗得到捷报，特别地高兴，晋封李靖为代国公，并赞扬李靖说："汉朝李陵以步卒五千抵御匈奴，然而终归降于匈奴，他尚且留名青史。李靖以骑兵三千进入突厥地区，攻占定襄，威震北方，此前所未有，足以雪往年渭水便桥结盟之耻也！"

颉利可汗逃到阴山（今内蒙古阴山）之北的铁山之后，尚有余众数万，但已是困难重重，所以派遣使者到长安谢罪，请求内附于唐朝，并且表示颉利可汗本人将亲自入朝的意愿。唐太宗派遣唐俭前去抚慰颉利可汗并命令李靖率兵迎接颉利可汗。但是，颉利可汗并非真心实意要入朝，而是想借此阻止唐朝的进军，准备待到草青马肥之时，再逃往大沙漠以北（今蒙古地区）。李靖引兵与李世勣相会于定襄北的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两人分析当时的形势，商议说："颉利可汗虽失败，但突厥部众依然很盛。一旦让颉利可汗逃入漠北，道路远阻，我军就不易追击。现在朝廷的使者已经到达颉利可汗那里，颉利可汗必定认为朝廷不会再出兵进攻，而不加防备。如果现在选拔一万精兵，携带二十天的口粮，前往偷袭，就可轻而易举地把他活捉。"他们把自己的意见告诉行军副总管张公瑾，张公瑾犹豫不决，说："皇上的诏书已经同意接受颉利可汗投降，朝廷的使者也已经去他那里，我们怎好再发兵进击呢?"李靖说："这就是韩信所以破齐的计策也!"夜里，李靖便领兵出发，李世勣继后，进至阴山，俘获突厥数千人。果不出李靖、李世勣所料，颉利可汗见到朝廷使者唐俭心中大喜，以为唐军不会继续北进，毫无戒备。李靖派遣苏定方率二百轻骑为前锋，乘雾而行，悄悄地逼近颉利可汗的牙帐。当唐军到达距离牙帐七里的地方，颉利可汗这才觉察，匆忙骑马奔逃。李靖率军掩击，突厥部众溃散，唐俭乘混乱之机脱身返回，唐歼敌万余人，俘虏男女十万余口，牲畜数十万头。颉利可汗带领万余人准备越过大沙漠，向北逃遁。李世勣率兵抢先赶到碛口，挡住颉利可汗的逃路，突厥部众纷纷投降。颉利可汗眼看翻越大沙漠的通道被堵死，被迫向西逃，准备穿过河西走廊（今甘肃西部），进入吐谷浑地区。由于众叛亲离，不久即被唐军俘获。至此，号称控弦百万的强大的东突厥汗国灭亡了。

东突厥灭亡的消息传到长安，唐太宗异常高兴，因为这不仅是消灭了唐朝

北部的一个劲敌，而且洗掉了唐高祖在太原起兵时向东突厥称臣的耻辱。唐太宗和太上皇李渊特地在皇宫的凌烟阁上举行庆祝酒宴。酒酣之后，太上皇李渊亲自弹奏琵琶，唐太宗随乐起舞，表现了父子二人的兴奋心情。

位高而谦的晚年

在灭东突厥的战争中，李靖功居第一。但是凯旋归来，御史大夫萧瑀却上奏唐太宗，弹劾他“破颉利牙帐，御军无法，突厥珍物，掳掠俱尽”。唐太宗虽然下了一道赦书免予弹劾，但是等到李靖入宫晋见，还是当面对他大加斥责。李靖忍让为怀，不予置辩。后来，唐太宗悟出这是上了谗言的当，赏给李靖许多绢匹，并对他说：“以前有人说你的坏话，现在我已经明白自己上当了，你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里。”八月，正式任命李靖为尚书右仆射（宰相）。李靖担任宰相后，身居富贵，功名显赫，但他在盛名之下，颇知自足，为人沉厚，从不盛气凌人，被唐太宗誉之为“一代楷模”。贞观八年（六三四年），李靖因病请求辞去宰相职务，唐太宗便给他特殊礼遇，让他在病情好转时，每两三日到政事堂参加宰相会议。

就在辞掉宰相职务的这一年底，六十四岁的李靖又率军出征了。当时，唐朝与吐谷浑屡有摩擦，唐太宗决定大举讨伐吐谷浑。唐太宗本想以李靖为帅，但又觉得他已年迈，不好开口，李靖知道后，请求挂帅出征，说：“臣虽年老，尚可一征。”唐太宗喜出望外，任命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率兵部尚书侯君集、刑部尚书李道宗等五总管，出征吐谷浑。贞观九年（六三五年）闰四月，李道宗于库山（今甘肃州西）大败吐谷浑，吐谷浑王伏允放火焚烧野草，然后向西逃跑。李靖部将认为，野草被烧，马就缺食，不可深入追敌，但是李靖采取了侯君集的建议，分兵两路追击吐谷浑王伏允。李靖率领薛万均、李大亮沿湟水（今青海湟水，黄河支流）西进，为北道；侯君集与李道宗沿黄河西进，为南道。李靖在牛心堆（今青海西宁南）大败吐谷浑，接着南下，又在赤水源再度击败吐谷浑。侯君集等往西追击伏允到达乌海（今青海冬给措纳湖）。各路唐军不顾路途艰险、缺水缺粮的困难，越过积石山（今青海阿尼玛卿山），穷追不舍，终于击溃伏允的军队。伏允逃入大沙漠中（今柴达木盆地），其子慕容顺举国投降。不久，伏允为部下所杀，李靖立慕容顺为吐谷浑王，然后率军凯旋而归。

在出征吐谷浑的过程中，李靖因为行军总管高甑生延误军期，曾按军法处分。凯旋之后，高甑生为报私仇，诬告李靖谋反。后来唐太宗虽然以诬告罪将高甑生流放边疆，但这件事却在李靖的心中投下了一层阴影，使他觉得自己功高位重，成为众矢之的，难以自处。为了避免招惹麻烦，从此他便阖门杜绝宾客，即使亲戚也不让随便进入家门。后来改封爵为卫国公。贞观二十三年（六四九年），病死于家中，享年七十九岁。唐太宗下令将他陪葬于昭陵，把他的坟墓修成铁山、积石山的形状，以旌表他北灭东突厥、西征吐谷浑之功勋。

李靖不仅是能征善战的一代军事统帅，而且也是一位对兵法很有研究的一代大军事家。据说，唐太宗曾让李靖教大将侯君集兵法，侯君集对唐太宗说：“李靖想要谋反。”唐太宗问他证据何

在，他说："李靖只教给我兵法的粗略部分，而不教精华部分，他留了一手，显然是想要谋反。"唐太宗就去问李靖，李靖回答说："这是侯君集想要谋反。现在全国形势已经安定，我教给侯君集的那些兵法，就足够制服四方之用，他却坚持要把我的全部兵法学到手，这不是要谋反又是为了什么呢?"侯君集后来果真与废太子李承乾一道谋反，这里姑且不说李靖此时是否真地看出他有造反之心，但侯君集在唐初已是一员战功累累的名将，先后出任兵部尚书、宰相，唐太宗却让他向李靖学习兵法（六四六年）。唐太宗在亲征高丽败绩后，自己弄不明白失败的原因所在，就求教于李靖，问他："我以天下之众，败于小国，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李靖回答说："这个问题江夏王李道宗可以解释明白。"唐太宗又去问李道宗，李道宗说："陛下亲征高丽时，臣曾提出乘虚攻取平壤的策略，可惜陛下未予采纳。"唐太宗听后怅然地说："当时行军匆忙，我已不记得这件事了。"此时李靖已是七十六岁高龄，又未参与高丽战事，但对唐太宗出征的过程及作战指挥的利弊得失了如指掌，一句话解开了唐太宗百思不得其解的疙瘩，真不愧是一位大军事家。

李靖著有《李卫公兵法》一书，惜已失传，只有唐代后期杜佑写的《通典》及宋朝人写的《太平御览》尚保留此书的部分内容。

【李勣】

（594～669）唐初名将。本姓徐，名世勣，字懋公。入唐，赐姓李；后避唐太宗李世民讳，单名勣。曹州离狐（今山东鄄城西南）人，徙居东郡卫南（今河南浚县东南）。父盖，家豪富。

世勣十七岁时，从翟让起义于瓦岗寨。大业十二年（616）李密加入瓦岗军后，世勣与王伯当劝说翟让推李密为主。十三年二月李密称魏公，以世勣为右武卫大将军，封东海郡公。在瓦岗军破隋将张须陀、王世充诸战役中，世勣皆有功。同年，李密采纳了他的建议攻取黎阳仓（在今河南浚县），开仓赈济饥民，人心归附，壮大了起义队伍。武德元年（618）世勣随李密降唐，封曹国公。此后数年间，他从秦王李世民平定盘踞洛阳的王世充，先后镇压窦建德、刘黑闼的河北起义军，又主持和参加镇压兖州（今属山东）徐圆朗、江淮辅公祏起义军诸战役。

李世民即位后，任命他为并州总管。贞观三年（629），李勣与李靖分道击溃东突厥颉利可汗之众；次年，平定东突厥，从而安定了北方。兵还，任并州都督府长史。十一年，改封英国公。他在并州共十六年，号为称职。十五年，迁兵部尚书。十七年，以特进、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

二十三年，太宗病危，贬他为叠州都督，又嘱咐太子李治（后为唐高宗）继位后委李勣以重任，以便获得他对嗣君的忠诚。高宗即位，立即将他召还，任命他同中书门下参掌机务。后累进尚书左仆射、司空。总章二年（669）卒。

李勋善于用兵，史称他"临敌应变，动合时机"。他与人一起筹划时，凡有可取者，立即采纳；告捷之时，归功于下。因此部下都乐于效力，所向克捷。后世论唐代名将，必称"英、卫（李靖封卫国公)"。他饱经世故，善于

趋避，左迁叠州都督时，奉诏即行，竟不还家。高宗欲立武昭仪（见武则天）为皇后，大臣多反对，高宗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回答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因此，李勣礼遇隆重，一生没有遭到挫折。

李勣孙徐敬业，嗣圣元年（684）起兵反武则天，兵败被杀。

【侯君集】

（？～643）唐初大将。豳州三水（今陕西旬邑北）人。君集少年时以武勇称，隋末战乱中，被秦王李世民引入幕府，从征讨有功，累迁左虞候、车骑将军。武德九年（626）的玄武门之变，君集之策居多。太宗即位，君集任左卫将军，封潞国公，迁右卫大将军。贞观四年（630），任兵部尚书，检校吏部尚书，参议朝政（即宰相）。九年，为积石道行军总管，随李靖平吐谷浑，策划军事，分兵深入，君集有大功。十一年，改封陈国公。十二年，迁吏部尚书，仍参朝政。君集出自行伍，素无学术，及被任用，方始读书。他出为将领，入参朝政，获得当时称誉。十二年，吐蕃围松州（今四川松潘），唐授君集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以击之。十三年冬，因高昌王麴文泰遏绝西域商贾与唐交往，唐又以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率兵击之。十四年八月，进围高昌，这时文泰已卒，子智盛降，得二十二城，八千零四十六户，一万七千七百口，君集刻石记功而还。太宗以其地置西州。

君集入高昌时，私取宝物；将士也竞相盗窃，君集自身不正，不敢禁制。还朝后，被人揭发，下狱，虽得免罪，却没有奖赏，他心怀不满。十七年，洛州都督张亮密告他煽动自己谋反。太宗认为两人对话，别无旁证，没有追究。这时，太子承乾屡有过失，魏王泰争立，两人各自树立徒党，君集与承乾结纳。同年，有人告发承乾策划政变，结果承乾被废黜，君集也被杀。

【褚遂良】

（596～658）唐初大臣，书法家。祖籍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县），晋末南迁为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西）人。父亮，秦王李世民文学馆十八学士之一。官至通直散骑常侍。遂良博通文史，贞观十年（636），由秘书郎迁起居郎。精于书法，以善书由魏徵推荐给太宗，受到赏识。十五年，他劝谏太宗暂停封禅。同年由起居郎迁谏议大夫。贞观中，太宗宠爱第四子魏王泰，遂良提出太子、诸王的待遇应有一定规格。十七年太子承乾以谋害魏王泰罪被废，遂良与长孙无忌说服太宗立第九子晋王李治为太子（即唐高宗李治）。次年遂良被任为黄门侍郎，参预朝政。太宗策划东征高丽时，他持不同意见，尤其反对太宗亲征。二十二年为中书令，二十三年，太宗临终时他与无忌同被召为顾命大臣。高宗永徽元年（650），遂良以抑价强买中书译语人的土地被劾，出为同州刺史。三年，召还，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复为宰相。四年，为尚书右仆射。六年，高宗欲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他认为王皇后出自名家，并无过错，竭力反对废立，由此被贬为潭州都督，转桂州（今广西桂林）都督，又贬爱州（今越南清化）刺史。显庆三年（658）死

于任所。

褚遂良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为初唐四大书法家。他传世的书法作品，碑刻有《大唐三藏圣教序》、《伊阙佛龛记》、《孟法师碑》、《房玄龄碑》、《雁塔圣教序》等，墨迹相传有《倪宽赞》。

【徐敬业】

（？～684）唐代反抗武则天专政的军事首领。唐初名将李勣孙。祖籍曹州离狐（今山东鄄城西南）。李勣本姓徐，赐姓李。总章二年（669），李勣死，敬业袭爵英国公，历官太仆少卿、眉州刺史。

弘道元年（683），唐高宗卒，中宗即位。次年，改元嗣圣，武后以太后临朝称制，不久即废中宗，立豫王旦（即睿宗），武太后掌握全部权力。这一年，敬业因事被贬为柳州司马，赴任时途经扬州，便和同被贬官南方的唐之奇、骆宾王、杜求仁、敬业弟敬猷以及前盩厔（今陕西周至）尉魏思温、奉使到扬州的监察御史薛璋等，一起策划起兵反对武则天。当时扬州没有都督，由长史管理州务。这年九月，他们使人诬告长史陈敬之谋反，薛璋以御史奉使的身份将他捕杀，徐敬业自称扬州司马，组织囚犯、工匠、役丁数百人，占有扬州。随即招集民众，以扶助中宗复位为号召，发布了由骆宾王撰作的《讨武曌檄》。敬业起兵后，武则天剥夺了他的赐姓，命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统兵镇压。当时敬业的谋士有北上进攻洛阳和南下先取常州（今属江苏）、润州（今江苏镇江）两种主张，敬业采纳了南进的策略，渡江攻取了润州。那时，李孝逸大军已逼近扬州。敬业重又还兵，在高邮（今江苏高邮北）迎战。十一月，大败，逃奔润州，想渡海投高丽，为唐兵追及，敬业弟兄被部下所杀，同党大都被捕杀。

【安禄山】

（703～757）唐安史之乱的祸首。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杂胡。本名轧（一作阿）荦山，据说姓康。母突厥人。禄山少孤，因母改嫁安延偃，遂冒姓安氏，改名禄山（安、康可能出自中亚昭武九姓胡）。安禄山通晓边境若干少数族语言，初为互市牙郎。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以其骁勇多机智，令为捉生将，并收为养子。开元二十八年（740）禄山为平卢兵马使，以贿赂交结唐廷派往河北的使臣，博得唐玄宗李隆基的称许。二十九年，擢为营州都督；天宝元年（742）为平卢节度使；天宝三载，兼范阳节度使、河北采访使；十载，又兼河东节度使，掌握了今河北、辽宁西部、山西一带的军事、民政及财政大权。安禄山权势的取得，除了手段狡诈，善于谄媚逢迎，骗得唐玄宗、杨贵妃等人的宠信和支持外，还因为河北一带民族杂居，情况复杂，而他熟悉当地情况；另外，当时奚族和契丹族势力较强，不时进扰河北，他以征战或欺诈手法镇压两族立功，被玄宗倚为安边长城。

玄宗统治晚年，朝政腐败，禁军虚弱。安禄山洞悉内情，有轻朝廷之心。他又与权臣杨国忠不和，遂阴谋叛唐。他豢养同罗、奚、契丹降人八千为假子，称“曳落河”（胡语，意为壮士），皆骁勇善战；又畜战马数万匹，多聚兵仗，分遣胡商至各处经商致财。天宝十四载，

又请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汉将，组成一个以少数族武人为骨干、有汉族失意文人和地方军人参加的财富力强的武装集团。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自范阳起兵，以讨杨国忠为名，发动叛乱，攻陷洛阳。次年正月在洛阳称大燕皇帝，建元圣武。同年六月，遣军陷长安。从此，唐朝的半壁江山陷于长期战乱之中。至德二载(757)正月，为其子安庆绪（见安史之乱）所杀。

【史思明】

(703～761)唐安史之乱的祸首之一。营州宁夷州突厥族中的杂胡。本名窣干。与安禄山同乡相善，亦通晓若干种少数民族语言，为互市牙郎。以骁勇有智计，为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所知，任为捉生将。天宝初，累立战功，官至将军、知平卢（今辽宁朝阳）军事。曾到长安奏事，唐玄宗很赏识他，赐名思明。迁大将军、北平太守。天宝十一载(752)，安禄山荐他为平卢兵马使。

安禄山叛变后，令他经略河北。天宝十五载，思明攻陷常山（今河北正定），执太守颜杲卿。后李光弼、郭子仪军至河北，屡败思明。此时，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被安军攻下，不久肃宗在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即位，郭、李引军赴灵武，河北十三郡复尽陷于思明。安禄山任思明为范阳（今北京）节度使。至德二载(757)，思明率兵十万围李光弼于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安禄山被其子庆绪所杀后，思明归守范阳。同年冬，安庆绪败退邺郡（今河南安阳），因契丹、同罗等族组成的精兵大部归思明，遂遣使赴范阳征召精兵，并谋除思明。思明遂以所领十三郡及兵八万降唐，受封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半年后，复叛，并与安庆绪遥相呼应。乾元二年(759)三月，思明率军增援安庆绪于相州，大败唐九节度使之军，随即杀安庆绪，还范阳，四月，自称大燕皇帝，改元顺天。同年九月南犯，攻陷汴州（今河南开封）、洛阳。上元二年(761)二月，败李光弼军于洛阳西北的邙山，唐廷震恐，于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屯兵备御。思明素爱少子史朝清，欲立之为太子，这时遂命长子朝义攻陕州，不克。思明便一再声称要斩朝义，三月，为史朝义与部将谋杀。

【李光弼】

(708～764)唐中叶名将。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人。父楷洛，本契丹酋长，于武则天时附唐。光弼少善骑射，历任朔方（今宁夏灵武西北）、河西（今甘肃武威）将校。



李光弼

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反，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次年，光弼被子仪荐为河东（今山西太原西南）节度使，又加河北采访使，领朔方兵五千出井陉（今河北井陉西北），收常山（今河北正定），会合郭子仪军大破禄山将史思明，河北十余郡复归唐。光弼欲攻安史巢穴范阳（今北京），值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失守，长安陷落，乃返军据守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肃宗至德二载（757），史思明、蔡希德以十余万众围攻太原。太原只有河东兵约万人，光弼鼓励士卒，多方备御，思明不能得逞。后安庆绪（安禄山子）杀父自立，思明归范阳，留蔡希德继续攻城。光弼乘其懈怠，出兵反击，大败叛军。乾元元年（758），子仪、光弼等九节度使联兵围安庆绪于相州（今河南安阳）。二年，史思明自范阳来援庆绪，唐诸军战败并溃，唯光弼军不散。代宗命光弼代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副元帅，入洛阳。时史思明已杀安庆绪，称大燕皇帝，遣军攻河南诸州。光弼以洛阳城大难守，遂撤出官吏百姓，弃空城，率全军扼守河阳三城（今河南孟县东南）。思明入洛阳，于河南掘沟筑月城，与光弼相持。次年，光弼大败思明于河阳，乘胜收复怀州（今河南沁阳）。上元二年（761），宦官鱼朝恩、大将仆固怀恩奏称叛军不难扫除，肃宗乃促光弼速攻洛阳，光弼被迫进军，战于北邙（今河南洛阳北），唐军大败，河阳、怀州均陷。光弼退守闻喜（今山西闻喜东北）。入朝，肃宗不加罪责，命其以太尉充河南副元帅，都统河南等五道行营节度使，镇临淮（今江苏盱眙北）。此时，史思明已被其子史朝义所杀，朝义遣军南侵申（今河南信阳）、光（今河南潢川）等十三州，自领精骑围宋州（今河南商丘南）。光弼移镇徐州（今属江苏），击败叛军，宝应元年（762），进封临淮郡王。当时浙东袁晁起义，光弼遣军镇压。

唐代宗李豫即位后，信任宦官程元振、鱼朝恩，两人皆与光弼不协，力图中伤。光弼自镇临淮，二三年间不敢入朝。他历来治军严肃，发布命令时，诸将不敢仰视。至是，朝廷屡次征召，他皆迁延不至，诸将因此不听指挥，光弼羞愧成疾，广德二年（764）卒于徐州。

【王仙芝】

（？～878）唐末农民战争领袖。濮州（今山东鄄城北）人，原以贩卖私盐为业。僖宗乾符二年（875）初，因连年饥凶，仙芝与尚让、尚让兄尚君长等在长垣（今河南长垣东北）聚众起义，自号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传檄诸道，指斥唐朝“（官）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标明平均旗号的农民起义。五月，攻克曹州（今山东定陶西）、濮州。曹州冤句（今山东曹县西北）人黄巢也在这时起义，率所部义众前来会合。义军东逼沂州（今山东临沂），西攻洛阳周围地区。三年十月，王、黄联军南走唐（今河南泌阳）、邓（今河南邓县）等州，继续活动于今河南、湖北、安徽等地。年底，蕲州（今湖北蕲春东北）刺史裴偓诱降，仙芝动摇，准备降唐，接受左神策军押牙之职，却因黄巢及起义群众的坚决反对而未遂。于是王、黄分兵作战，黄巢北去，仙芝仍转战南方。四年二月，仙芝一度攻破鄂州（今湖北

武汉武昌)。王、黄又再度合兵攻宋州(今河南商丘南)等地。不久又分兵,仙芝转攻郢州(今湖北京山)、复州(今湖北沔阳西南)。同年冬,唐朝招讨副都监杨复光再次诱降,仙芝遣尚君长、蔡温球及楚彦威等赴敌营洽降,中途为唐招讨使宋威所劫持。宋威贪功,乃妄奏君长等系他战败所俘,尚君长等人被杀。仙芝降敌之谋再次未遂。五年初,起义军攻破荆南(今湖北江陵)罗城,由于敌方援军到达,作战不利,被迫北撤。二月在黄梅(今湖北黄梅西北)为敌将曾元裕所破,仙芝战死。

【黄巢】

(? ~884)唐末农民战争领袖。曹州冤句(今山东曹县西北)人。稍通书记,屡举进士不第,以贩私盐为业。家富于财,善击剑骑射。唐懿宗咸通(860~873年)末至僖宗乾符(874~879年)初,连岁凶荒,黄河以南尤其严重。农民起义纷纷爆发。乾符二年(875)初,王仙芝、尚让等在长垣(今河南长垣东北)发动起义,唐末农民战争爆发。五月,黄巢与同族兄弟、子侄黄揆和黄恩邺等八人募众数千响应。接着王、黄两军会合,协同作战,东攻沂州(今山东临沂)不克,就西向进攻洛阳周围地区。唐统治者急调大军夹击。王、黄乃于乾符三年十月间南趋唐州(今河南泌阳)、邓州(今河南邓县),以后又活动于今河南、湖北、安徽等地,反复冲击敌人。同年底,蕲州(今湖北蕲春东北)刺史裴偓对王仙芝进行诱降,仙芝动摇,欲受唐官职。黄巢指斥他说:起初我们共立大誓,横行天下,



黄巢

现在你独自取官降敌,广大群众何所归宿!因怒击伤仙芝首。仙芝畏众怒,不敢受唐命,遂与黄巢分兵作战。黄巢率军北上,攻克郓州(今山东东平北)、沂州等地。以后王、黄虽曾一度合攻宋州(今河南商丘南),不久又分兵。

乾符五年,王仙芝在黄梅(今湖北黄梅西北)战死,尚让率余部奔亳州(今安徽亳州)与黄巢所部会合,推黄巢为黄王,号冲天大将军,建元王霸,署置官属。从此,黄巢成为起义军的最高领导人。两支义军会合后,势力又见壮大。黄巢再度北上,克沂、濮等州,然后沿黄河南岸西进,"欲窥东都(洛阳)",唐朝急调军队增援东都。黄巢知攻东都无望,于是引兵南下,渡过长江,东趋下游。在越州(今浙江绍兴),遭到镇海(今江苏镇江)节度使高骈部将张璘、梁缵的阻击,义军乃转由浙江南进,开山路七百里,进入福建,攻克福州(今属福建)。黄巢在福州大力打击官僚、地主,杀了顽固不化的"处士"周朴。后率大军沿海岸南进,于六年九月攻占岭南重镇广州。经过大约两个月的休整,黄巢在这年冬又率领大军北伐,自号"义军都统",并发表文告,宣布即将打入关中,指斥唐朝以宦官掌握朝政,纲纪紊乱,朝臣与宦官勾结,贿赂公行;还宣布义军禁令,禁止刺史广殖

财产，县令犯赃者全族处斩。他所指责的都是当时极弊，深得群众拥护。义军拥众数十万，从桂州（今广西桂林）出发，乘大筏沿湘江顺流北上，攻克潭州（今湖南长沙），又下江陵（今属湖北）。本欲乘胜进兵中原，直趋关中，但至荆门（今属湖北）为唐将领刘巨容所败，乃转而东进。于广明元年（880）五月在信州（今江西上饶）击毙淮南（今江苏扬州北）节度使高骈的骁将张璘。七月，自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长江东岸）飞渡长江。高骈与唐廷有矛盾，又慑于义军声威，虽拥兵十余万，但保境而已，不敢出战。黄巢渡江后以破竹之势跨越淮河，于十一月占领东都洛阳。进军途中，义军“整众而行，不剽财货”，沿途群众纷纷参加义军，众达百万。入洛阳城后，义军劳问居民，闾里晏然。黄巢北攻时，还特意转牒唐朝各镇兵将：你们各宜守垒，勿犯我兵锋。我将入东都，到京师向皇帝问罪，与你们无涉。这些话分化了敌人营垒，所以兵行无阻。黄巢在东都并未久留，随即转旗西指，于年底突破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天险，最后攻下了京师长安。唐僖宗和大宦官田令孜南逃成都。义军入城之日，向贫民散发财物，并由大将军尚让向群众宣布：“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

十二月十三日（881年1月16日）黄巢即位于含元殿，国号大齐，改元金统。原唐朝官员，四品以下酌情留用，三品以上全部罢官。其中枢主要官员有：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赵璋为侍中；原唐官崔璆和杨希古并同平章事（即宰相）；孟楷、盖洪为尚书左、右仆射，兼军容使（掌管近卫军队）；翰林学士中还有著名诗人皮日休。黄巢在长安执行严惩皇族、公卿的政策，唐宗室留长安者几无遗类，义军查获降官张直方夹壁中隐藏的高官显贵百余人后，全部处死。大齐政权还没收富豪的财产，号称“淘物”，富室皆赤脚而行。次年，唐军曾一度攻入长安，义军暂时撤出，当夜反攻，将唐军驱逐出城。

但黄巢即未派大军追击唐僖宗，也没有首先全力歼灭分镇关中的唐朝禁军，大齐政权也缺乏必要的经济政策，生产、财政均无着落。这样，敌我力量对比就逐渐发生了不利于义军的变化。关中地主坚壁清野，使大齐政权陷入严重的缺粮困境；中和二年（882）大齐的同州（今陕西大荔）防御使朱温叛变降敌；沙陀族李克用应唐朝的乞援，率劲旅一万七千人南下；敌方军力大大增强。这时，黄巢发现困守关中已很不利，乃于三年四月东撤，攻逼蔡州（今河南汝南），唐节度使秦宗权战败，投降黄巢。六月间，义军开始围攻陈州（今河南淮阳）。守将赵犨顽抗，义军久攻不克，朱温和李克用又先后前来增援赵犨，黄巢遂于四年四月解围，逾汴而北，又遇到唐徐州节度使时溥的阻击，作战不利，最后退至狼虎谷（今山东莱芜西南），于六月十七日兵败自杀（一作为甥林言所杀）。历时九年余的农民战争至此结束。不久后，唐王朝即告灭亡，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

【尚让】

唐末农民战争领导人之一，后叛降唐。生卒年不详。唐僖宗乾符二年

(875)在长垣(今河南长垣东北)爆发的唐末农民战争，是王仙芝和尚让、让兄尚君长一起发动的。

三年九、十月间，仙芝遣尚让分兵进入嵖岈山(今河南遂平西)作战。黄巢与王仙芝分军作战后，他随仙芝转战南方。五年二月，仙芝战死于黄梅(今湖北黄梅西北)，他率余众至亳州(今安徽亳州)附近与黄巢会师，推巢为黄王，号冲天大将军。后随巢南下广州。广明元年(880)十二月，黄巢入长安时，尚让向聚观的群众宣称："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黄巢建立大齐农民政权，以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

中和元年(881)三月，黄巢遣尚让与林言等率众五万攻凤翔，在龙尾陂(今陕西岐山东)为郑畋、唐弘夫等所败，损失两万余众。三年二月，尚让等以十五万之众与李克用战于梁田陂(今陕西渭南东)，败绩，损失数万人。起义军撤出关中后，围攻陈州(今河南淮阳)，黄巢遣尚让屯太康(今属河南)。四年三月，太康为唐军所陷。五月，黄巢败于王满渡(今河南中牟北)，尚让以所部约万人降于唐朝感化军(即徐州)节度使时溥，时溥遣尚让随唐将领李师悦追击黄巢。巢失败后，尚让亦为时溥所杀。

【刘知远】

(895~948)后汉王朝的开国皇帝。沙陀部人。居住太原。后唐时，石敬瑭为北京(即太原)留守，以知远为押衙。敬瑭密谋称帝，以称儿、称臣、割地、岁输金帛为条件，求契丹主出兵助己灭后唐。知远进谏，认为称臣已可，以父事之太过，只用金帛贿赂也可以使契丹发兵，不必割地，否则，恐异日为中原之大患。敬瑭不从。天福元年(936)敬瑭即位，先后以知远为陕州、许州、宋州、河东节度使，邺都、北京(太原)留守，加侍中。七年，敬瑭死，侄重贵嗣位，是为出帝，封知远为北平王。时吐谷浑部归附河东，后来又有反复，知远杀其首领白承福等，收其精骑，得其财畜，河北富强冠于诸镇。开运年间，契丹军南下中原，知远不出一兵支援朝廷。开运三年(946)冬契丹陷开封，灭后晋，出帝北迁。知远派王峻至开封上表奉贺，契丹主耶律德光赐诏，称"知远儿"。次年正月，耶律德光称帝，国号辽。二月，知远见辽帝贪残不能统治中原，于是在太原即位，仍称天福十二年，意在争取后晋旧臣归附。三月，辽帝在中原人民的反抗下，被迫北返。辽所署的汴州节度使萧翰矫称辽帝命，拥立后唐明宗子李从益知南朝军国事。知远乘虚入洛阳，从益被逼死于开封。知远入开封，改国号为汉，史称后汉。次年正月改元乾祐。更名暠，当月卒。

【郭子仪】

郭子仪(公元697~781年)，唐朝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父亲郭敬之，曾任刺史。郭子仪长得魁梧，面貌英俊，身高膀宽，目光炯炯有神，为人刚强勇敢，公正无私。他在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做官，可谓唐朝的"四朝元老"。在那时，提起"郭子仪"三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郭子仪从小就喜欢读兵书、练武功，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在读书或习武时，精神集中，常常废寝忘食，而且一丝不苟。他非常欣赏孟子的一句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郭子仪二十岁时，在河东（今山西太原）当兵，曾犯有过失，按军律应该斩首。当他被捆着双手押赴刑场时，竟然昂首阔步，大步向前，一点也不惊慌。正巧，在途中遇上当时著名的诗人李白。李白本来和他并不相识，见他年轻英俊，相貌非凡，临刑不惧，又听说他才干出众，意志坚强，便赞叹地说："这样的人，将来一定能为国家做出一番大事业，杀了多可惜啊!"李白很怜悯郭子仪，便立即到当地官员那里说情，最后以自己的官职做担保，把郭子仪救了出来。这样，李白就成了郭子仪第一位知己朋友。后来，李白参加永王李璘幕府，因受牵连下狱，郭子仪曾经请求替他赎罪，报答他当年的救命恩情。

郭子仪的青年时代是生活在国富民殷、繁荣昌盛的社会里，即所谓"开元之治"。这时期以唐玄宗李隆基为首的唐朝政府，励精图治，扫除积弊，任用贤能，改善政治，使得社会经济稳步发展，国力也十分强大。

郭子仪就生长在这样的年代里，他年轻时就立志要做一个保家卫国、统兵作战的将帅。

郭子仪最初做左卫长史（皇帝禁军幕府中的幕僚长），因屡立战功，多次被提升。七四九年（天宝八年）官至天德军使（驻地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西），兼九原（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北）太守。这时，唐朝廷对外还没有大的战事，几十年间相对太平。在这样的环境里，由于缺乏外界压力，没有危机，久而久之，人们开始安于逸乐，贪图物质享受，整日只知吃喝玩乐，唐朝政府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唐玄宗李隆基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把大权交于奸臣李林甫、杨国忠之手，自己则与宠妃杨玉环夜夜笙歌，醉生梦死，全不见了昔日励精图治、重整山河的雄心。只有郭子仪等少数人尚能居安思危，经常想到会发生战事。他一面操练兵马，一面守卫祖国的疆土。

当时边疆各地居住着我国各族人民。他们辛勤劳动，为祖国的统一和发展做了巨大的贡献。

在我国北部色楞河一带，居住着维吾尔族的祖先回纥人。七四四年，回纥首领骨力裴罗统一了回纥各部，就派使臣来唐朝，请求唐朝在回纥所占领的土地上设置都督府。唐朝答应了，便把回纥分为六府七州，并封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接受唐中央的领导。从此，唐朝同回纥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交往更加频繁。唐朝以金银器皿、锦绸布匹换来回纥的马匹、白氎等物。后来肃宗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回纥可汗，表示唐政府对回纥的友好。

在青藏高原一带，居住着藏族的祖先吐蕃人。他们有的过着游牧生活，饲养犛牛、马、猪等；有的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种植青稞、小麦、荞麦等。公元六四一年，唐太宗派人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同吐蕃的赞普（王的称呼）松赞干布结婚。文成公主入藏时，把蔬菜的种子、手工业品、医药、书籍等带到吐蕃。汉、藏两族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唐朝同边疆各族虽然也发生过战争，

但友好相处和经济文化交流却是主要的。

自高宗以来，唐朝在边疆上一直有重兵驻守。玄宗时，为了加强防御，在重要地区设立了十个军镇，每个军镇都设置一个节度使。节度使起初只管几个州或一个道的军事，后来兼管行政和财政，权力很大，成了独行一方的土皇帝。当时唐中央的禁军不过二十万人，而边疆的十个节度使共拥兵四十九万，形成外重内轻的局面。

那时唐朝重用安禄山，任命他做平卢（今辽宁朝阳）、范阳（今北京）、河东（今太原市西南）三镇节度使。安禄山的父亲是西域人，母亲是突厥旗人。安禄山做了节度使，总揽三镇军政大权，又招募北方很多牧民当兵，势力便逐渐壮大起来了。

安禄山常到长安去，对唐朝内部情况非常熟悉。他见唐政府日益腐败，便萌生了取而代之的念头。他招兵买马，积累钱财，收集朝廷情报，观察朝廷动向，等待时机，准备反唐。可是昏庸无知的玄宗皇帝却闷在葫芦里，对安禄山的所做所为一点不提防，反而听信他的花言巧语，竟然让他认杨贵妃为干妈，对之信任有加。

唐玄宗统治后期，政治日趋腐败，自杨贵妃入宫后，玄宗便过着“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淫逸生活，终日沉湎于歌舞声色之中。宰相李林甫同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先后把持朝政，飞扬跋扈，任用亲信，干了不少坏事，各种社会矛盾愈来愈尖锐。

唐朝内地多年来未发生过战争，军事力量薄弱，士无斗志，军备空虚。但统治集团却认为国泰民安，再也用不着军队了。官府里的刀枪盔甲，因长期闲置都生了锈，很多名城要塞，都不加设防。唐政府还不准老百姓私藏武器，凡私藏者，皆判以刑罚。在这种情况下，野心勃勃的安禄山认为篡夺大唐江山的机会到了。七五五年（天宝十四年）十一月九日，他以“清君侧”、“讨杨国忠”为名，从范阳发动十五万大军，号称二十万，长驱南下。由于唐政府毫无准备，致使叛军一路上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地方官吏听说叛军来了，有的弃城逃跑，有的开门出降。就这样，安禄山的叛军一路上几乎没有遭到什么抵抗，很快就渡过了黄河。不到三个月，就占领了东都洛阳。安禄山自称大燕皇帝。又过了几个月，叛军击溃了唐朝的潼关守军二十万人，继续西进。这消息传到长安，玄宗吓得魂飞天外，满朝文武官员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唐朝政府临时招募了八万人，由大将哥舒翰率领去抗击叛军。这些人多是城里的无业游民，既没有严明的军事纪律，又缺乏基本的作战技术训练，军事素质很差，在与叛军的大战中，自然不堪一击，就连大将哥舒翰，也战败被俘。

唐政府为了阻击叛军的继续西犯，又从西北边防上抽调大批兵力，但是边防的将领整天喝酒、赌博、克扣军饷，士兵连饭都吃不饱，哪里还有战斗力呢？七五六年夏天，叛军距离长安只几十里了，长安顿时紧张起来，玄宗带领皇族亲贵和左右臣僚（自然也少不得贵妃玉环）仓皇出逃，长安遂陷入叛军手中。玄宗一行逃到马嵬驿，将士鼓噪不前，愤怒地杀死了祸国殃民的杨国忠，并要求惩办杨贵妃。群情激愤，玄宗无可奈何，只好忍痛割爱，派人缢死了杨贵妃。

这时马嵬驿的人民请求皇帝留下来同他们一起抗击叛军，唐玄宗哪肯答应，只把他的儿子李亨留下，他自己则往四川逃命去了。

安禄山从起兵到占领长安，前后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安禄山每到一处，烧杀抢掠，凌辱妇女，拉夫抽丁，强迫壮年男子服劳役，使得广大劳动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田园荒芜，生产破坏，很多地方都成了“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的荒原。叛军进入长安后，屠杀人民，抢夺财物，烧毁房屋，把一座古老的文化名城糟蹋得不像样子。叛军的残暴罪行，激起人民无比愤恨，各地人民奋起反抗。河北一带的人民自动组织起来，坚决打击叛军。有些地方的官员和人民一起，共同抵抗，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如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最先在河北起兵，一连收复十七个县城，牵制了叛军很大兵力。

安禄山听说颜杲卿反对他，十分恼怒，立即派部将史思明夺取常山。颜杲卿被围困六七天，终因粮饷断绝、援军未到而失败了。史思明抓住颜杲卿，把他押送到洛阳去见安禄山。颜杲卿一见安禄山，就破口大骂：“你这个叛贼，我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残暴的安禄山喝令把他捆到柱子上，割掉他的舌头，凌迟处死。颜杲卿嘴里喷着鲜血，还是骂不绝口，就这样壮烈地牺牲了。

玄宗逃往四川以后，肃宗（李亨）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即位。肃宗为了收复长安，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决定任郭子仪为朔方（今宁夏一带）节度使，并把朔方军作为反攻的基本队伍。为了加强朔方军的实力，肃宗又指定李光弼协同郭子仪作战。

郭子仪和李光弼原来都在安思顺手下做部将，两人的才能不相上下，职位也相同。当郭子仪受命代替安思顺做朔方节度使时，李光弼不服，决定马上离去。忽然接到皇帝的手谕，要他同郭子仪同心协力平定叛军，李光弼只好遵奉王命，留了下来。郭子仪把朔方的兵马分给李光弼一半。郭、李二人共同表示：一定要同心协力，奋勇杀敌，报效国家。

史思明占领常山后，原来被颜杲卿所收复的州县，又全部陷入叛军手中，河北一带的叛军又强大起来了。为了挫伤叛军的锐气，郭子仪一面派李光弼迅速向常山进军，一面亲率大军从背后袭击叛军。

李光弼一连收复了七个县城，又把常山城包围得水泄不通。史思明陷入重围，他带领两万精锐的轻骑，企图突围逃命。李光弼分兵四路，从四门杀进常山城去。只听战鼓雷鸣，人喊马嘶，打得叛军东逃西窜，互相践踏。史思明惊慌失措，带领败军退守恒阳（今河北灵寿）。李光弼乘胜追击，两军在恒阳相持四十昼夜。后来叛军退出恒阳，李光弼的军队进入恒阳城内，叛军就回军把李光弼的兵马困在城中。李光弼被围困后，请郭子仪火速援助。郭子仪便率领轻骑一万多人星夜赶来。郭、李大军内外夹击，史思明被打得落花流水，损兵折将，元气大伤，只好收拾残兵败将逃往范阳。

安禄山听说史思明吃了败仗，恼羞成怒，扬言不消灭唐军，决不罢休。当即选拔最精锐的骑兵两万人来迎战，又命令部将牛廷玠出兵助威。叛军仗着人多势众，来势汹汹，不可一世。为了打击叛军的气焰，郭子仪召集大小将领商

量对策，他指出：叛军作战专靠增加兵力，叛军跋山涉水远道而来疲于奔命，叛军轻敌、斗志松懈，两军交战，胜利一定属于唐军。根据以上分析，郭子仪决定采取固守阵地战术，等到叛军疲惫时，再以优势兵力，一举歼灭它。

两军开始接触，打了十几个回合，不分胜负。唐军杀掉一名怯阵后退的将领，士气大振，个个奋勇，人人争先，打得叛军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叛军边战边退。郭子仪、李光弼乘胜猛追，一直追到博陵（今河北定县），博陵不但有高大的寨墙和深广的壕沟，而且地形险要，易于防守，叛军在这里扎营下寨，郭、李屡攻不下，便领兵退驻恒阳。史思明又从范阳赶来。郭子仪一面深沟高垒，据险坚守，积极作好准备，一面采取“敌来则守，敌去则追；昼则耀兵，夜袭其营”的作战方针，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几天以后，叛军果然士气沮丧，疲劳不堪，但唐军却得到了充分休息，兵强马壮，斗志高昂。郭子仪认为消灭叛军的时机到了，马上分左右两翼向叛军冲杀。这两翼大军像两把锋利的尖刀，刺向敌人的两肋，叛军弃甲抛戈，四散溃逃。唐军大获全胜，计杀死叛军四万人，活捉五千人，缴获战马五千匹。在混战中，史思明左冲右突，仓皇逃命。突然，一枝飞箭射中了他，从马上跌了下来，鲜血迸流。他散发跣足，狼狈地又逃回博陵，再也不敢出来挑战了。这时，河北几十个州县纷纷杀死叛军守将，迎接唐军。从此，郭子仪的名字也就传遍了四方。

唐朝称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首都设在长安。长安是唐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是一个非常繁华的都市，工商业发达，交通方便。天宝初年，居民有三十多万人。长安分东西两市，有很多达官贵人的住宅区，以及万商云集的商业区。洛阳是陪都，在政治和军事上也很重要。安禄山的叛军占领长安和洛阳后，使整个局势急转直下，唐王朝危在旦夕，人民受尽蹂躏和剥削，生活非常困难，洛阳附近竟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人民渴望唐军早日打回来，从当时情况看，收复两京对挽救危局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肃宗派郭子仪、李光弼收复河北失地的同时，又命房琯去收复长安。房琯不切实际，好高谈阔论，是个“纸上谈兵”的将军。出战前，他向肃宗夸下海口：“我这次出兵，定能水到渠成，马到成功。不获全胜，决不来见陛下!”房琯本想在这次战斗中立一大功，但他不分析具体情况，机械地搬用古人的“车战法”。他用两千辆牛车排成长蛇阵，牛车的一边是骑兵，另一边是步兵，列队蜂拥前进。战斗一开始，叛军就顺风擂鼓，摇旗呐喊，又燃起大火。火借风势，风助火威，顿时，只见烟光冲天，红光遍野，牛马惊骇，四处乱窜，片刻之间，军粮、马匹、营寨、树栅全被烧毁。房琯的兵马首尾不能相顾，四处逃散，你推我挤，人马杂踏，踩死的、杀死的、烧死的共四万多人，房琯本人也几乎送了命。

叛军获胜，气焰又复嚣张起来。

肃宗深知要消灭叛军，收复两京，非郭子仪不可。七五七年九月，便传令召见郭子仪。郭子仪来到灵武拜见肃宗，表示为国尽忠的决心，在国家大难临头的时刻，愉快地接受了收复两京的艰巨使命。郭子仪从房琯的失败教训中得到

启发，认为要收复两京，必须先夺取潼关，攻人陕州（今河南陕县），击溃潼、陕之间的叛军，截断叛军的后路，然后才能直取长安。由于郭子仪的分析正确，肃宗十分赞赏，命令唐军按照郭子仪的军事部署进行。郭子仪出战不久，果然夺回潼关，给了叛军当头一棒。唐军士气大振。为了鼓励士兵奋勇作战，早日收复两京，皇帝下令犒赏三军，还恳切地对郭子仪说："京城能不能收复，全靠你这一仗，愿你全力以赴。"郭子仪斩钉截铁地说："这次作战，要破釜沉舟，就是剩下一兵一卒，也要打到底，不消灭叛军，就以死来谢罪！"

肃宗命令郭子仪率领中军、李嗣业率领前军、王思礼率领后军，并指定郭子仪为统兵元帅，共领兵十五万人。又向回纥借来骑兵五千。军分三路昼夜兼程急进，军容整肃，号令严明，浩浩荡荡开到长安西香积寺附近，连营为阵，横亘三十多里。叛军十万人在北面，同唐军南北对垒。叛军守将李归仁、安守思据险设防，他们自恃兵多将广，出城挑战。一次，唐军奋勇迎敌，快逼近敌营时，叛军擂动战鼓，一齐冲杀上来，唐军措手不及，败走。叛军乘胜追击，李嗣业扬鞭策马，飞奔阵前，拼命刺杀，他挥动战刀高喊："叛军已将我们包围，若不奋勇厮杀，只有死路一条！"说罢，他光着膀子，举起闪闪发光的大刀，指挥战斗。刀光过处，叛军人头落地。唐军军心稍定，在这危急万分的时刻，郭子仪率领大军及时赶来，同李嗣业合力猛击叛军。擂鼓声，响彻云霄；喊杀声，震天动地。顷刻间，叛军阵营大乱。唐军把叛军紧紧包围着，使其无法突围。激烈的白刃战开始了，两军从中午一直厮杀到傍晚，叛军被杀六万多人，余众弃甲曳兵，逃回长安城中。

这一年，叛军内部发生了叛乱，安禄山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杀死。郭子仪探得这消息后，便调集大军向长安进攻。唐军与叛军一交锋，叛军就像惊弓之鸟，丢盔曳甲，抱头鼠窜。唐军奏起胜利凯歌进入长安城。老百姓听说唐军回来，都喜出望外，夹道欢呼，有的杀鸡宰羊，有的抬出酒来欢迎唐军。

长安收复以后，不久，肃宗便由灵武迁回长安。唐军乘胜向洛阳进军。当时，安庆绪屯兵洛阳，听说郭子仪来打洛阳，便派严庄、张通儒带领十五万大军迎战，叛军声势浩大，杀气腾腾，在新店（今陕西陕县西）与唐军相遇。叛军依山扎营，准备战斗。新店地势险峻，山高壁陡，峰回路转，叛军居高临下，这对唐军十分不利。郭子仪为了化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趁叛军还未来得及休息，便选拔英勇善战的骑兵两千人，向敌营冲杀，又派一千多名弓箭手埋伏山下，再命回纥军从叛军背后登山偷袭，他自己就率领主力军与敌人展开正面战斗，一切部署妥当，立即擂鼓出战。叛军像饿狼一般从山上猛冲下来，郭子仪假装败退，边战边走。叛军大喜，倾巢出动，奋力追击。战斗到黄昏，暮色苍茫，叛军已被歼灭数万人，余者也筋疲力竭，寸步难行。这时，突然杀声如雷，山鸣谷应，唐军埋伏的弓箭手像神兵一般从地下钻了出来，只见万箭齐发，像雨点似地射向敌兵。唐军的骑兵更是勇猛，往来驰骋，左右冲杀。叛军前后被围，左右遭打，进既不能，退又不得。正在这时，又听到四处高呼："回纥兵来了，赶快放下武器投降吧！"

叛军听了，简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唐军与回纥兵的合力攻击下，叛军被打得溃不成军，狼狈逃散。严庄拼死命才逃回洛阳，连忙向安庆绪建议："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安庆绪走投无路，只好收拾残部，放弃洛阳，渡过黄河，退守相州（今河北成安、广平、魏县一带）。郭子仪便收复了洛阳。

洛阳收复后，郭子仪返朝，肃宗十分高兴，亲自带领仪仗队到灞上（今陕西西安市东）迎接。皇帝见了郭子仪，激动地说："我有了你，就像鱼儿有了水，大唐的天下，所以能保住，全靠你的英勇奋战啊！"郭子仪表示不敢承当。

两京收复后，肃宗把玄宗从成都迎回，尊他为太上皇。

在收复两京的战斗中，郭子仪多次立大功，这对安定唐室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战绩很快传遍各地，他的声誉也越来越高了。

两京虽已收复，但李氏王朝仍然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肃宗回到长安，先后重用宦官（后来宦官称太监）李辅国和鱼朝恩，把派遣军队的权力交给李辅国掌管。李辅国的权势很大，他可处理国家大事，别人不敢有异议。肃宗让鱼朝恩监督神策军（一支军队的名称）驻守陕州，防御潼关。肃宗听信李、鱼的谗言，远离忠君爱国的贤臣。而叛军的势力还相当强大。安庆绪在邺郡（今河南安阳）还霸占七个县，史思明在范阳盘踞十七个县，他的党羽高秀岩在河东的兵马也有数万，这对唐朝是很大的威胁，不久，安庆绪、史思明又开始向南进犯，东西两京又面临危机。

七五八年九月，唐政府命令九个节度使：朔方郭子仪、河东李光弼、关内王思礼、北庭李嗣业、襄邓鲁炅、荆南季广琛、河南崔光远、滑濮许叔冀及平卢董泰等，一起出兵讨伐安庆绪。九个节度使的地位相同，职权相等，互不统属。肃宗怕将帅的权力太大，因此，不设元帅，特派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监督出征将帅的最高官职）监视诸将。鱼朝恩名义上虽不是主帅，实际却操纵九个节度使的兵权。他根本不懂兵法，更不知如何用兵，让这样的人监督作战，怎能不吃败仗呢？

当安庆绪从洛阳逃往相州时，士兵死伤惨重，只剩下步兵一千多人，骑兵三百多人。正巧，路上又碰到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的大军。李光弼有一万多人，安庆绪明知众寡悬殊，已被唐军困于死地，但还要作最后的挣扎，他对部下说："我们的处境万分危急。打，也难于逃生；不打，只能束手待毙。不如杀出重围，或许还能保全生命。"说罢，他把兵分成八路，让他们从四面八方向李光弼的军队，一面呼叫，"我们胜利啦！唐军失败了！"李光弼的军队一听，就乱了手脚，安庆绪就用此计打退了李光弼。几天后，安庆绪又聚集了数万人，死守相州，并把相州改为安成府。

九个节度使的兵马共六十万，一齐出动，围攻相州城，安庆绪好似兽困樊笼、鱼儿落网，既不能战，又不能退，处在绝境之中。

郭子仪为了把叛军一网打尽，便下令：高筑堡垒，坚守阵地，引水灌入相州城，全城成了一片汪洋。叛军有的爬上房顶，有的吊在树上，数十日以后，柴尽粮绝，先吃战马，吃完战马，再用马皮充饥。最后，什么都吃光了，为了

活命，只好吃老鼠。当时，一只老鼠竟价值四千文。城里的叛军想投降，又因城高水深，不能出来。相州城眼看就要被攻破，正在危急的时刻，史思明率领五万精兵前来援救安庆绪了。

九个节度使的兵力雄厚，本来可以一举消灭叛军，可惜群龙无首，诸将各自为战，谁也不听谁的指挥，可是史思明的军队，养精蓄锐已很久，士气旺盛。史思明是个极其狡猾的家伙，他知道唐军数量超过他十几倍，必须抓住唐军士气低落的弱点，用精兵突击，方能取胜。他来到相州城外，先按兵不动。过了十多天，突然同唐军展开激战。两军正交战时，遇到一阵狂风，顷刻之间，天昏地暗，尘土飞扬，对面不见人。唐军望见城下来往流窜的人马，误认为叛军追来，纷纷逃散。郭子仪见大势不好，只得收集残余部队，领着人马向洛阳退走。

这次战斗，唐军损失严重，战马万匹只剩三千，刀枪十万几乎全部扔掉，九个节度使中的八个各回原来驻地，郭子仪留守洛阳。

这次战斗失利，应问罪鱼朝恩，但不明是非的肃宗，不但不斥责鱼朝恩，反而给他封官加爵，更加器重他。鱼朝恩得到皇帝的宠爱，越发盛气凌人。他一向嫉妒郭子仪，怕他功高望重，对自己不利，因此常在肃宗面前诽谤郭子仪。为了陷害郭子仪，鱼朝恩便把相州一仗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到郭子仪一人身上。糊涂的昏君，信以为真，竟然夺了郭子仪的兵权交给李光弼，让他回长安。

郭子仪接到皇帝的命令，连夜起程回京。将士们听说郭子仪要离开他们，都跑来挽留。有的哭哭啼啼，依依不舍；有的要跟他一同去长安。郭子仪也不忍和他们分离，但又不敢违抗皇帝命令，他安慰将士们说："我是去送京城派遣来的使臣，哪里是离开你们，你们要服从命令！"说罢，挥泪跃马离去。

平时，郭子仪对待士兵宽厚、爱护、关心他们的生活，不打骂，不训斥，如同对待亲人一般，因此受到官兵的拥护与爱戴。

郭子仪走后，李光弼来到朔方军队，他怕朔方的将士反对他，因此待到夜里才进入洛阳城。郭子仪的部将张用济屯兵河阳（今河南孟县），果然反对李光弼，他希望郭将军再回来。有人对张用济说："你这样做，不是给朝廷找借口来迫害郭将军吗?"张用济认为很对，只好硬着头皮迎接李光弼。

史思明在相州替安庆绪解了围，打退了唐军，自认为立了大功，要和安庆绪平分兵权，安庆绪不答应，史思明把他杀了，吞并了他的军队，回到范阳，自称大燕皇帝。

史思明听说郭子仪被免除官职，夺去兵权，心中大喜，认为有机可乘。七五九年五月，史思明便带领大军向洛阳进犯。唐政府十分恐惧，不知采取怎样的对策才好。有人向朝廷建议："郭子仪为唐朝立过多次战功，又善于用兵，为什么放着良将不用，让叛军逞凶呢?"肃宗认为很对，决定起用郭子仪为兵马都管使（警备守卫京城的长官），诏令刚传下，就被鱼朝恩拦住了。鱼朝恩把郭子仪看成眼中钉，常想阴谋陷害他。一次，郭子仪立功回朝，鱼朝恩邀请他游章敬寺，有人暗地告诉他说："鱼朝恩想谋害你，千万别上他的当。"郭子仪不听，将士们请求随身护卫，他拒绝了，并且说："我是国家的大臣，没有

皇帝的命令，鱼朝恩不敢杀我。”说着，只带着家童数人去见鱼朝恩。鱼朝恩一见，非常惊奇。郭子仪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鱼朝恩听了，十分惭愧。

史思明打到洛阳，驻守洛阳的李光弼，接连吃了败仗，李光弼放弃洛阳，带兵退守河阳。当时，鱼朝恩也带领一支人马，还没看到叛军的影子，就吓得退到了陕州，再也不敢出来了。

史思明占领洛阳不久，就被他的儿子史朝义杀死了。

肃宗虽猜疑郭子仪，但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又不能不重用他。七六二年二月，河东（治所在太原）一带的驻军，听说洛阳失守，都骚动起来了。朝廷怕他们和叛军连成一气，想出兵镇压，但苦于没有德高望重的统兵将领，想来想去，只得任命颇负盛誉的郭子仪为河北诸州的副元帅，派他出镇绛州（治所在今山西新绛）。郭子仪忠勇爱国，不计较个人得失，他接到作战的诏令，马上就出发。这时，忽然传来肃宗病危的消息。郭子仪去拜见肃宗。肃宗语重心长地说：“我死后，河东一切军政大权，完全由你掌握。”郭子仪出兵不几天，肃宗就咽气了。肃宗死后，由代宗即位做皇帝。

代宗时，国库官府的盐、铁、茶、酒等税，名目竟有二百多种，这些苛捐杂税，自然都要落到人民身上。代宗重用宦官程元振，让他参与机密，掌管国家政权。宦官在肃宗时就开始专权，如宦官李辅国曾对肃宗说：“大家（宫中对皇帝的称呼）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指李自己）处分。”专权的宦官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中，朝廷的赏罚，宰相的任免，甚至皇帝的废立，都由他们决定。程元振飞扬跋扈，擅作威福，把皇帝束缚得像个木偶，事无大小，只要程元振出口，代宗便百依百顺。程元振痛恨功臣名将，特别憎恨郭子仪。程元振在皇帝面前诋毁他，总想免除他的副元帅职务，让他做肃宗山陵使（皇陵的督工），但未能得逞。郭子仪明知皇帝受程元振控制，误了国家大事，便向皇帝上书道：“我为唐朝的富强，披星戴月，南征北战，请陛下相信我对唐朝的忠心。陛下要亲近贤人，远离奸臣。不然，唐朝的危亡就在眼前！”郭子仪的劝告，并不能打动皇帝的心。朝内宦官专权，朝外藩镇割据，唐朝仍然陷于混乱之中。

安庆绪、史思明虽死，但史朝义还盘踞在洛阳。朝廷任命雍王李适（即后来的德宗）为统兵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让他们出兵讨伐史朝义。鱼朝恩、程元振坚决反对郭子仪为副元帅，但这一次朝廷并没有接受他俩的意见。雍王和郭子仪认为单靠唐军的力量，无法消灭叛军，便向回纥借来十万大军，唐军和回纥兵一起打进洛阳。史朝义带领败军逃往莫州（今河北任丘北）。七六三年正月，史朝义的部下田承嗣、李怀仙等，见大势已去，纷纷向唐朝投降。史朝义看到众叛亲离，走投无路，便自杀了。这场战乱，这时才算完全平定，前后延续了七年零三个月，历史上叫作“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以后，社会内部矛盾重重，国力虚弱，原驻在西边的军队，大部分被调到北方去讨伐叛军。这时，吐蕃统治集团乘机深入唐朝内地，把凤翔西、邠州（今陕西彬县）北等十几州的土地都占领了。七六三年十月，又占了奉天（今陕西乾县），朝廷大为震惊，

急令郭子仪带兵抵挡。郭子仪带领一万多人，可是吐蕃兵却有十万多人。郭子仪多次请程元振拨兵增援，可他根本不理。吐蕃兵很快打到了长安城下，吓得代宗逃往陕州。郭子仪从咸阳赶来，进了长安，不见皇帝，又没有兵马，十分焦急。这时守城的将领王献忠怂恿郭子仪说："皇上早已逃跑，现在国家无主，你身为大元帅，只要下道命令，就可以把皇帝废除，国家大权不就落到你手里了吗?"郭子仪把他痛斥了一番。不几天，吐蕃兵占领了长安。

当代宗逃往陕州时，唐军多往商州（今陕西商县）逃散，郭子仪派部将王延昌赶到商州去招集他们。逃兵听说郭子仪来了，都欢呼不止，愿听吩咐。不过数日，便招集到四千多人。

郭子仪分析了形势，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他先派段秀实去劝说阎宁（今陕西彬县和甘肃环江一带）节度使白孝德，请他出兵助战；再派左羽林（皇帝的亲军，侍卫皇宫）大将军长孙全绪带二百轻骑，到蓝田（今陕西蓝田县）城北面，白天擂鼓呐喊，夜晚燃起火把，牵制吐蕃兵力。军事部署完毕，郭子仪佯言向蓝田城东进军，但却率领主力军奔向蓝田城西。吐蕃兵果然中了郭子仪的计，直向蓝田城东冲杀，扑了个空。郭子仪急速集中兵力，奋勇攻击，打得吐蕃兵措手不及。吐蕃兵发觉已中了计，十分惶恐，忽听四处高呼："郭令公（指郭子仪）率领大军来啦!"喊声震天，吐蕃兵不战败走，唐军顺利地进入长安。

长安收复后，代宗本应早日返回京城，可是程元振见郭子仪多次立了大功，威信越来越高，深怕代宗重用他，所以劝代宗在洛阳建都。为了国家的利益和朝廷的安稳，郭子仪上书给皇帝："长安地势险要，前有终南山作屏障，后有泾、渭二水，右连陇蜀（今甘肃、四川），左接崤函（崤山、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东北），可以雄视四方，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大有一夫当前，万夫莫开之势。长安经过几朝的建设，宫殿华丽，市场繁荣，工商业发达，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经济满足。长安是创立帝业的基地。秦汉两朝占领长安而称帝，隋炀帝弃长安而灭亡。再看洛阳，地贫民饥，人烟稀少，野草丛生，一片荒凉，宫殿多被烧毁，残垣断壁，不易防守，请陛下慎重考虑。"代宗看完奏章，很受启发，便对左右官员说："郭子仪所考虑的，都是从国家的安危和利益出发呀!"七六四年十一月，代宗便从陕州回到长安。

唐朝和回纥的关系，一直是友好的。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战斗中，陇右（今甘肃东南）节度使仆固怀恩认为自己立了大功，应受重赏，可是代宗并没给他封官加爵，仆固怀恩很不满意，妄图背叛唐朝。他母亲知道后，非常气愤，严厉责骂道："唐朝哪点亏待你，为什么要叛变呢?"骂着，举起刀向他砍去，幸亏他跑得快，才没被砍着。

不久，仆固怀恩便带领轻骑二百多人逃往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他发誓与唐朝势不两立。为了推翻唐朝政权，仆固怀恩便制造谎言，向吐蕃、回纥借来十万大军，从灵州向长安进攻。仆固怀恩的大军来到奉天，长安告急，朝内文武百官，一筹莫展，又是一场混乱。皇帝惶恐不安，忙向大臣们问计。郭子仪说："仆固怀恩曾作过我的部将，我

了解他。他虽是一员猛将，但他寡恩少义，虐待士兵。士兵所以跟着他，都想乘机重返家园。”皇帝立即任命郭子仪为关内河东副元帅，让他率领十万大军去讨伐仆固怀恩。

郭子仪率兵来到奉天城外的阵地上，立即下达军令：固守阵地，不准猛冲猛打。有些将领急于要求出战，郭子仪耐心地说服他们，指出：仆固怀恩的军队，远道而来，士气旺盛，利用速战速决。我们要尽量地躲开叛军的锋锐，不要打硬仗，要严加防御。我们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集中力量打他个措手不及，求得全胜，如果匆忙出战，万一失利，全军就有覆没的危险。谁再敢提“出战”，立刻推出斩首！

仆固怀恩率领十万大军（包括吐蕃、回纥兵），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这正好中了郭子仪诱敌深入之计。他们刚要摆开阵势，只听战鼓咚咚，杀声四起，奉天城外，唐军摆成一字阵势，非常严整，当中竖着一面帅旗，随风飘扬，旗上写一个“郭”字。仆固怀恩的将士一听说郭令公的大名，都吓得丢盔卸甲，四散逃跑。仆固怀恩只得带领残兵败将，又回到灵州，唐军不战而获得了胜利。

仆固怀恩不甘心失败，七六五年，他又勾结吐蕃、回纥、吐谷浑（鲜卑族的一支，唐时居今甘肃、青海间）共十万多人，再次犯进长安。他们来势汹汹，杀气腾腾。为了拦阻叛军各路的进犯，郭子仪传令各地驻军，必须扼守要冲，抵制敌兵，不让敌兵前进一步。当时，淮西（治所在今河南汝南）节度使李忠臣部下的官兵喜欢玩球戏，当接到出战的命令，都埋怨地说：“我们玩球戏正玩得兴高采烈，作战也要挑个好日子!”李忠臣责问他们：“如果你们的父母得了急病，也要找个吉利的日子治病吗?”大家都默不作声，只好待命出发。

仆固怀恩率领大军直奔盩厔（今改名周至），在行军途中，他得了暴病，突然死去。仆固怀恩的部将张韶率领吐蕃、回纥大军，继续进军，包围了长安北面的泾阳（今陕西泾阳县）。镇守泾阳的郭子仪，仅有两万多人，但早有戒备。他命令部将坚守阵地，不准同叛军交锋。就在这时，吐蕃、回纥听到唆使他们入侵的仆固怀恩已暴死，于是，便开始分营扎寨，争权夺势，闹不团结。郭子仪闻知，暗暗自喜。他详细地分析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唐军守孤城，抗雄兵，将寡兵少，力量薄弱；吐蕃、回纥兵比唐军多五倍，又骁勇善战，回纥王甚至不可一世地自称：“威风凛洌气昂昂，塞外称雄无人言；鼓角声高催战马，诸藩部将我为强。”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郭子仪深知战必失败，退则被歼，只能“智取”，不能“力敌”。他一面积极备战，一面争取谈判。

郭子仪召集大小将领共同商讨退敌策略。任命部将白孝德为副元帅，让他死守泾阳，等待援军；派牙将李光瓒去见回纥王，表示愿和回纥王共同打击吐蕃。回纥王听说郭子仪还活着，十分惊奇，半信半疑。他对李光瓒说：“郭令公真在人间，你不是欺骗我吧？如果他还活着，能让我看看他吗?”

李光瓒把这番话告诉郭子仪。郭子仪是个足智多谋的将领，为了劝退回纥兵，他决定一个人去见回纥王。他对将士们说：“回纥兵多，我们兵少，实力相差悬殊，很难用武力战胜。过去唐朝

和回纥的关系密切，曾订过互不侵扰盟约。为今之计，我不如亲自去说服他们，不用动刀枪，退走回纥兵。”郭子仪要冒着生命危险，单枪匹马去回纥军营中谈判，将士们担心他的安全，准备选拔五百名精锐的骑兵随身保护他。郭子仪坚决拒绝，他说：“这样做，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把事情弄糟。”

郭子仪就要动身，他的儿子郭晞跑来拦住马，劝阻说：“回纥兵像虎狼那样凶暴，父亲是国家的元帅，怎能轻易冒着生命危险，去回纥军营谈判呢?”郭子仪果断地说：“如果唐军和回纥兵打起来，不但咱们父子生命难保，就连国家的命运也很危险。如果国家保不住，个人还有存身的地方吗？与其坐着等死，不如去同回纥王谈判，用道理说服他。万一不成功，我就捐躯报国，来实现我平生的大志。”说着扬起鞭子，打了他儿子的手，喝令他：“走开!”便和几个骑兵闯出了军营。

郭子仪出了军营，叫人连声高喊：“郭令公来了，郭令公来了!”回纥兵听了，个个吓得目瞪口呆，情不自禁地都放下了武器。回纥兵的统帅药葛罗（回纥王的弟弟）立即拿起弓箭，站在阵前，准备战斗。郭子仪来到回纥军营门前，不慌不忙地翻身下马，摘掉头盔，脱去铁甲，放下刀枪，勇敢沉着地向回纥营中走去。回纥兵都很吃惊，你瞧瞧我，我看看你，不约而同地说：“果真是郭令公呀!”药葛罗也放下弓箭，忙走来迎接。郭子仪握着药葛罗的手，义正辞严地责问：“你们回纥替唐朝立过大功，唐朝报答你们的也不薄，为什么违背盟约，向唐朝进攻？你们丢掉过去的功劳，帮助叛臣仆固怀恩作乱，同唐朝结怨仇，多么不明智啊！仆固怀恩叛唐弃母，被人唾骂，像他这样寡廉鲜耻的人，能替你们做出什么好事呢？今天我独自一人来到这里，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如果你们真有诚意同唐和好，应该马上撤兵。不然，我将传令三军，一气杀来，管叫你们片甲不留。如果你们敢把我杀死，唐军一定不会答应。”药葛罗早已吓得手足无措，连连说：“我们受了仆固怀恩的欺骗，他说帝已死，说你早已在阵前丧命，朝内乱成一团，没有主人，因此我们才敢跟仆固怀恩来进犯。现在皇帝仍然坐镇京城，又亲眼看到你，我们哪里敢同唐军作战呢!”

郭子仪见事已成，喜在心头，乐在眉梢。为了粉碎回纥与吐蕃的联盟，他抓紧机会，又劝药葛罗说：“吐蕃王不讲道义，反复无常，趁着唐朝有乱事，便抢占土地，烧毁城市，破坏乡村，还掠去大批财物，假如你们肯帮助唐军打退吐蕃，继续保持同唐朝的友好关系，唐朝就把吐蕃抢去的东西，全部送给你们，千万不要错过良机啊!”药葛罗又感激、又惭愧地说：“令公的话，开导了我，我愿帮助唐军打退吐蕃兵，以便立功赎罪。不过请你不要把仆固怀恩的儿子杀掉，因为他是我们王后的兄弟(仆固怀恩的女儿嫁给回纥王)。”郭子仪答应了他的要求。

这时，在旁边围观的回纥兵，稍稍转向前来，郭子仪的随从人员也紧紧跟上几步，显示加强戒备。郭子仪一点也不惊慌，挥手叫他们退回。药葛罗一面让士兵退出，一面叫人摆出酒席，同郭子仪同饮共欢。药葛罗要试一下郭子仪是否有诚意，请他举起酒杯发誓，郭子仪对着回纥首领和士兵说：“大唐天子

万岁！回纥可汗万岁！谁若违背誓言，就叫他死在阵前！”药葛罗也照样发了誓。立了盟约后，郭子仪便领着几个轻骑，凯旋归来了。

吐蕃王听到这个消息，连夜带着队伍逃走了。郭子仪于是派精兵同回纥兵一道追击，在灵台（今甘肃灵台）西大败吐蕃。这样，郭子仪不用一兵一卒，不费一刀一枪，就瓦解了回纥与吐蕃的联盟，并迫使回纥兵也撤退了。京师之危遂解。

闰十月，郭子仪入朝，然后回镇河中。河中地处两京之间，自广德二年仆固怀恩叛乱，郭子仪再任朔方节度使，河中就成为朔方军的根据地。为了解决军粮问题，郭子仪组织士卒种地以自给。他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要打胜仗，必须把兵练好，要练好兵，就要有充足的军粮。”当时，由于连年发生战争，农村经济破产，人民生活困难，筹措军粮确实不易。为了减轻人民对军费开支的负担，郭子仪不顾年迈力衰，亲自耕种了一百亩地。将帅也各自耕种一定数量的土地。在将帅的带领下，士卒耕种的积极性大为高涨，河中地区的荒地全都得到开发，生产的粮食不仅足供军饷开支之用，还有剩余。

此后两年，每到秋季，吐蕃就率兵进入关中抢掠，但均被郭子仪率军击退。大历三年，宰相元载认为，郭子仪率朔方兵镇守河中，深居腹内无事之地，而吐蕃连年入寇，由于防守兵力太少，无法阻止其进犯关中，建议将郭子仪的朔方兵移镇璎州（今陕西彬县）。代宗皇帝接受了他的建议。次年，郭子仪便奉命率朔方军前往屯驻璎州。此后，吐蕃虽年年秋季入犯，但再也不敢进入关中的纵深地区骚扰了。

大历八年，郭子仪已是七十七岁高龄。吐蕃十万骑兵入掠璎州等地，郭子仪部将浑瑊抵御失败。郭子仪对诸将说：“败军之罪在我，不在诸将。”然后与诸将商讨对敌之策，重新调整部署，终于击败了吐蕃。

郭子仪镇守璎州长达十余年之久，此时的朔方兵人数已不及天宝时的十分之一，全军的将士也不及吐蕃的四分之一，战马不及吐蕃的百分之二，但是，吐蕃每年秋季入寇关中，均被郭子仪击败。关中大多数地区因此免遭蹂躏，京师也得以安然无恙。

虽然如此，但唐朝廷内忧外患仍很严重。由于统治集团的腐败、宦官的专权、藩镇的割据、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日益加深，使李唐王朝逐渐走向衰亡。

唐代宗死后，由他的儿子德宗即位。德宗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减少人民与统治者的矛盾，便下令废除租庸调（唐代与均田制相联系的赋役法。租指田赋，调指依乡土所产而缴纳绢、绵或布、麻，庸指以绢或布代替力役），实行两税制（按土地和财产的多少，每年分夏、秋两季两次收税）。两税制虽比租庸调法适合于当时的情况，但人民仍然啼饥号寒，在死亡线上挣扎，郭子仪虽极力挽救李唐王朝的颓势，但他已无能为力了。

郭子仪到了晚年，被封为汾阳郡王，并进位太尉（全国军事首脑）。他官高爵显，在朝廷中的威望极高。

郭子仪治军宽厚，深得人心，朔方军将士都以父母事之，愿拼死为之效力，这是郭子仪在历次战争中所以能打赢许多硬仗、屡次转危为安的一个重要原因。

郭子仪功勋盖世，威振四方，敌人都很害怕他，吐蕃、回纥称他为神人，一听说他率领大军出战，皆望风而逃。节度使田承嗣对朝廷图谋不轨，专横跋扈，但是见到郭子仪派去的使者，即西向而拜，并指着自己的膝盖说："我这膝盖不向人下跪已经多年了，现在要为郭公下跪。"李灵曜盘踞在汴州（今河南开封），不管公私财物，只要经过汴州，一律扣留，只有郭子仪的粮饷、武器，不但不敢抢掠，还派人护送过境。郭子仪还为朝廷培养了一大批人才，随他征战的先后有六十余名部将，后来都位至将相。

郭子仪功高望重，但他从不居功自傲。安史之乱后，许多节度使手握兵权，为非作歹，与朝廷貌合神离，拒不听命。郭子仪虽权重势大，深得人心，但他却从不以此为资本，要挟朝廷，谋取私利。相反，他始终忠于朝廷，别无二心，有诏即赴命，绝无半点犹豫。

当时宦官专权，嫉妒功臣。为了避免招来麻烦，郭子仪有时还拒绝接受朝廷的高官厚禄。唐代宗时，曾下令以郭子仪为尚书令，但他认为唐初太宗为秦王时做尚书令，唐太宗即位后，这个职位经常空缺，如果接受这项任命，一会破坏国家的法度、二会招致他人的闲言；再者安史之乱以来，以官赏功臣，已使国家法度遭到破坏，现今安史之乱已被平定，就应按照国家的制度来任免官员。因此，他坚辞不受。

有时，为了顾全大局，减少矛盾，他甚至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不计个人荣辱。大历二年，他父亲陵墓被盗，人们怀疑是鱼朝恩指使手下人干的，但官府没有捕获盗贼，口说无凭。祖坟被盗，在封建社会是没有比这更为严重的事情了，因此事情发生后不久，郭子仪自奉天入朝，朝廷内外气氛十分紧张，担心他不会善罢甘休，甚至可能发动政变。但当唐代宗对他提起此事，他却流着泪说："我长期带兵，对士卒约束不严，有时就发生部众盗掘坟墓的事。如今我父亲的墓被盗，这是老天的报应，与谁都无关。"盗墓之事才不了了之，朝廷内外惶恐不安的气氛也消除了。因此，尽管鱼朝恩、程元振对郭子仪屡进谗言，横加诽谤，但由于他为人坦荡，居功不傲，忠于朝廷，没有什么把柄可抓，每次都化险为夷，得以常保功名，长寿而终。

史称郭子仪"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嫉"。

郭子仪做了国家的功臣，有权有势，可是他不徇私情，不讲情面。代宗皇帝死了，将要下葬，按照惯例，严禁杀生。郭子仪的本家仗着郭子仪的权势，偷偷地杀了一只羊。左金吾（唐左右金吾掌管宫中及京城警卫）将军裴谞把这件事报告给德宗皇帝。有人提醒裴谞说："郭令公已七十多岁，他是国家的大功臣，怎么不看他的情面呢?"裴谞说："我这样做，正是维护郭令公的声誉，让人们都知道他可敬而又可畏。"郭子仪知道了，当即严办了他的本家，并向裴谞表示感谢。

又一次，郭子仪妻子的奶妈的儿子犯了军法，被郭子仪手下的一个军官按军法杀了。郭子仪的几个儿子都到父亲面前哭诉，说这军官连他们母亲的面子都不给，根本不把郭家的人放在眼里。父亲打了一辈子仗，为朝廷立了汗马功劳，应该与众不同。郭子仪听了，把儿

子们大骂一顿，教训他们说："你们只知道袒护自己家里的人，却不尊重将士，不维护军队的纪律。如果像你们说的那样，凡有功于国家之人，就可以与众不同，搞特殊化，凌驾于国法之上，那天下岂不大乱?"儿子们听了，觉得父亲言之有理，都不再吭声了。

郭子仪有八子七婿，他们都在朝内做官，家族兴旺，子孙数十人，有时孙子向他请安，他都分辨不出来。郭子仪对家人要求很严格。郭子仪七十大寿时，全家上下都来祝贺，只有郭暧的妻子升平公主没有来。郭暧很生气，便动手打了升平公主，气愤地说："你父亲是皇帝，你依仗皇帝的权势，不来祝贺。我父亲还不愿做皇帝呢!"升平公主挨了打，她不依不饶，哭哭啼啼。事情被郭子仪知道了，他不容儿子郭暧分辩，让人用绳子捆住郭暧，带着儿子向代宗皇帝请罪。代宗对郭子仪说："不痴不聋，不作姑翁，儿女闺房琐事，何必计较。"郭子仪谢过皇帝，回家后，把儿子痛打一顿，才算了结。

郭子仪的一生，基本上是在戎马征战之中度过的。自天宝十四年安禄山于范阳起兵，郭子仪即以朔方节度使的身份参与平叛战争，屡立战功。唐肃宗时，收复两京，主要是依靠郭子仪所率朔方军的力量。安史之乱被平定后，郭子仪以朔方节度使先后出镇河中、瓖州，防御回纥、吐蕃，捍卫京师，虽兵弱将寡，仍屡败敌兵，使京师得保无虞，关中百姓免遭涂炭。所以，史书上说"天下以其身为安危殆三十年"，是一点也不夸大的。

郭子仪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军事家，他通晓兵书，但不机械地搬用古代兵法。郭子仪多谋善战，根据不同情况，有时声东击西，有时迂回堵截，有时先发制人，猛冲猛打，还有时不用一兵一卒，竟能计退敌兵。兵多将广，固然能打胜仗；即使兵少将寡，在不利的情况下，也能取得胜利。胜利了，不骄傲；失败了，不气馁。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成为一代名将。

大历十四年，唐代宗病死，遗诏命令郭子仪在三天的治丧期间代理朝政，郭子仪奉命入朝。唐德宗即位后，尊郭子仪为尚父，加太尉，兼中书令，余官皆罢。从此，他告别了戎马生涯，在朝廷担任宰相。过了两年，即建中二年（七八一年），郭子仪病死，享年八十五岁。死后被追封为太师，陪葬建陵（唐肃宗陵）。按唐代制度，郭子仪坟高当为一丈八尺，葬时破格增加一丈，为二丈八尺，以表彰他的功劳。

【石守信】

（928～984）北宋将领。浚仪（今河南开封）人。五代后周时累官至殿前都指挥使、义成军节度使，与赵匡胤结为义社兄弟。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回师开封时，他开右掖门接应，帮助夺取后周政权。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他被任命为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改归德军节度使。不久，率军平定后周节度使李筠、李重进的叛乱，以功加同平章事，升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成为典领中央禁军的主要将领。建隆二年（961）七月，宋太祖采纳赵普的建议，为避免重演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事件，解除石守信和高怀德、王审琦等人的兵权。石守信改授天平军节度使出镇郓州

（今山东东平），所受赏赐甚厚。开宝五年（972），其子石保吉娶宋太祖第二女延庆公主。太平兴国二年（977）拜中书令，行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东）尹，充西京留守。四年，随宋太宗赵炅北征辽朝，督前军失律，责授崇信节度使，旋又进封卫国公，七年徙镇陈州。石守信历任节镇，以贪婪无厌、专务聚敛著称，所到之处都给人民造成灾难。太平兴国九年死。

【潘美】

（925～991）北宋将领。字仲询。大名（今属河北）人。初仕后周，官至客省使。潘美与宋太祖赵匡胤素厚，北宋代周后，颇受重用，参加平定李重进叛乱，镇守扬州、潭州（今湖南长沙），皆有功，累迁防御使。开宝三年（970），潘美为行营兵马都部署，率军平南汉。后任广州知州兼市舶使，升山南东道节度使。开宝七年，任昇州（今江苏南京）西南面行营马步军战棹都监，助都部署曹彬伐南唐。南唐平，加检校太傅、宣徽北院使。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潘美任北路都招讨制置使，随宋太宗赵炅伐北汉。北汉主降，他又被任命为知幽州（今北京）行府事，随宋太宗北伐辽朝，兵败而回。潘美南征北战，在北宋消灭十国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太平国四年八月，潘美任河东三交口都部署，驻守西北边防，以捍辽朝。以雁门之捷封代国公，后改忠武军节度使。雍熙三年（986），宋兵三路北伐辽朝，潘美为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朔（今山西朔县）等州行营都部署，杨业副之，率西路军出雁门，所向克捷。不久，因曹彬所领东路军大败于岐沟关，潘美等也受诏撤军，并掩护云、应四州之民内徙，在撤军过程中，潘美与王侁等逼迫杨业冒险迎敌，置之必败之地，而又见死不救，致使杨业全军覆没，被俘身亡。为此，潘美被削三任，降为检校太保。次年，又复旧官。淳化二年（991），加同平章事，数月后死。

【杨业】

杨家将的故事在我国民间流传久远，深入人心。杨业就是杨家将故事中最主要的真实人物。

杨业原名杨崇贵，他的生年没有记载。《宋史·杨业传》上说，杨业入北汉时为弱冠之年。《礼记》上解释，男人满二十岁，举行冠礼，表示已经成年。弱冠是不足二十岁。杨业入北汉是乾佑四年（九五一年），向上推二十年，为五代的后唐长兴三年（九三二年），这一年大约就是杨业的生年。他的卒年是北宋雍熙三年（九八六年）。所以，杨业一生大约活了五十五岁。山西代县的杨业后裔说他享年五十九岁。若按此说，杨业则生于后唐天成三年（九二八年）。

杨业是哪儿人，史传记载各不相同，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地方：麟州新秦（今陕西神木县北）、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和保德火山（今山西河曲南）。一个人的籍贯怎么有三个地方，究竟哪儿是杨业的故乡呢？清朝乾隆年间的《保德州志》上记载："杨业，旧志（指以前修的《保德州志》）谓即本州人。"旧的《保德州志》虽然不是杨业时修撰的，但保德人记载本州的名人，总不能

把不是本州的人硬当作保德州人来写。而且，民间传说杨业的父亲杨信是“火山王”、“火山刺史”、“火山节度使”。火山是个地名，属于唐朝岚州宜芳县，紧靠黄河东岸，宋朝时曾设火山军、火山县。五代时候，契丹进扰到保德州，杨信就在家乡聚众结堡，当了一支武装力量的首领。“火山王”大约就是杨信的自号或是乡人对他的称呼。明朝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里，也讲到杨信起兵火山地区。还说他亲自去过这个地方，看到杨信屯兵的一座城堡遗址，当地居民称之为“杨家城”。至今，河曲旧城东数十里仍有“杨家城”、“杨家寨”等村寨多处。又据清朝初年山西不康基田讲，在河曲附近的岢岚州（今山西岢岚县），出土了杨氏墓碑，上面写着杨业夫人折太君的事。还有，晚清人李慈铭的《荀爽斋日志》说：“今山西保德州折窝村，有大中祥符三年折太君碑，即杨业妻也。”大中祥符三年（一〇一〇年）是宋真宗统治的年代。所以，说杨业是保德人，不仅有文字记载，而且有出土文物可以为证。

说杨家是麟州新秦人，见于欧阳修的《杨琪墓志》。墓志中说：“杨君琪，字宝臣，麟州新秦人也。”杨琪是杨信的重孙，杨业的侄孙。所以，后人根据这个墓志，就说杨家是麟州新秦人。还有，北宋曾巩著的《隆平集·杨业传》以及《资治通鉴》上也都说杨业是麟州人，那是因为杨信在后汉时担任过麟州刺史，当时全家迁居麟州。杨信后来死于麟州，由于长子杨业不在身边，麟州刺史一职就由次子杨崇训继承。杨琪是杨崇训的孙子，欧阳修称杨琪为麟州新秦人，也有一定道理，因为杨琪的曾祖父就已移居麟州了。当然如果论原籍，杨琪还应当说是保德人。

《宋史》上说杨业是并州太原人。杨业于后周初年，应北汉皇帝刘崇之召，赴太原任职。他在北汉供职二十九年，长期居住太原，所以《宋史》上说他是并州太原人。实际上，杨业无论祖籍还是他自己的出生地，都是保德，说他是并州太原人就不太合理了。

杨业出生的时代，中国正处在五代十国的动乱岁月。黄河流域先后由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五个朝代统治着。南方各地和北方的山西，先后建立了前蜀、吴、闽、北汉等十个割据政权。五代十国时期，藩镇林立，混战不已。北方生活在辽河地区的少数民族契丹，逐步强大起来。契丹贵族耶律阿保机于神册元年（九一六年）建立契丹国。契丹贵族乘中原地区动乱，时常向今天山西、河北北部一带出兵，掳掠人口和牲畜。杨业的家乡保德州火山，正是契丹经常骚扰的地方了。他率领当地百姓结成堡寨，组织“士兵”，抵抗契丹。到阿保机的儿子耶律德光统治的时



杨业

候，后唐的藩镇石敬瑭想做皇帝，就以割地称臣为条件，乞求契丹出兵。后唐清泰三年（九三六年），辽太守乘势率大军入山西，第二年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出兵帮助石敬瑭灭亡了后唐。石敬瑭把幽云十六州（今北京和河北、山西北部一带）割给契丹，还向辽太宗自称儿皇帝。杨信对石敬瑭的卖国行为十分愤恨，就自树旗帜，起兵抗辽，转战于山西西北部，从石敬瑭手中攻取了保德、离石等地。他还同黄河西岸的府州（今府谷）折从阮、折德扆父子结为同盟，共同抵御契丹。那时杨业大约只有五岁。

石敬瑭死了以后，他的侄子石重贵即位，对契丹不再那么恭顺。耶律德光以此为借口，于契丹会同九年（九四六年）大举出兵南下灭掉后晋。第二年耶律德光进入开封，改国号为辽。他纵兵大肆掳掠，中原人民纷纷武装反抗，耶律德光被迫退出开封北归，途中病死。杨信带领儿子杨业，在耶律德光攻入开封之时，联合府州的折氏父子，共渡黄河北上，攻克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北），自为州主。这时杨业已有十八九岁。

山西自古出良将，民间谚语说：“山东出相，山西出将。”杨业出生在这样的地方，父辈又是地方武装力量的领袖，加之生长在烽火连天的时代，所以他自幼就善骑射，好打猎。每次出猎，他的猎获物总是比别人多，他还常对伙伴说：“我当了大将带兵，会像老鹰、猎犬追逐兔子一样。”十五六岁的时候，杨业已跟随父亲出入沙场了。

杨业同折德扆的女儿折太君结婚，折太君就是民间传说的“杨门女将”的主帅佘太君。折作为姓氏读 shé，与佘同音，以折为姓的极少见，所以民间就把折作佘，折太君也就变成了佘太君。

折氏世居今天陕西府谷一带，是当地的豪族。折太君的高祖，是唐朝后期的地方武将，祖先折从阮在后梁时为府州刺史。后晋时，契丹入掠，他同杨信联合共同举兵抵抗。后来，他俩共同辅佐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做了后汉皇帝。折德扆是折从阮的长子，行伍出身，一直跟从父亲参加抗辽斗争，后汉时为府州团练使。折太君生长在军人家庭，经常耳闻战马嘶鸣，婚后的公公、丈夫，也是久经沙场的战将，所以，她也“善骑射”，“尝佐业立战功”，连她的侍女、仆从也个个武艺过人。她和杨业的婚姻可说是门当户对的美满姻缘。至今，山西临县、离石的人民还流传着杨业在当地的七里庙迎娶折太君的故事。

后周广顺元年（九五一年），后周灭后汉。后汉的河东留守刘崇据河东称帝，史称北汉。在麟州任刺史的杨信，应刘崇之召，派长子杨业到太原见刘崇，留在刘崇的军中任保卫指挥使。刘崇为表示对他的爱重，赐杨业姓刘，改名为继业。那时，他大约还不到二十岁。

就在杨业赴太原上任不久，折德扆一家就归附了后周。折德扆归附后周是因为父亲折从阮在后汉时移镇邓州（今河南邓县），郭威建后周，加折从阮同平章事（宰相地位）。周世宗即位，又把折从阮召到朝中。后周如此厚待折从阮，当时任府州团练使的折德扆，自然要归附后周了。杨信初时因儿子杨业在刘崇身边，也就依附北汉，当折氏父子归附后周以后，他就处在孤立的地位，不得不归附了后周。从此，杨家父子分属两国。杨信归附后周的第二年，即后

周广顺二年（九五二年），病死麟州。长子杨业在北汉，次子杨崇训承袭了麟州刺史的职位。兄弟两人仍然分属两国。杨业的父亲、弟弟归后周以后，刘崇不但没有杀掉杨业，反而赐以刘姓，想通过杨业来争取杨信、杨崇训重新归附北汉。刘崇的做法的确没有落空，杨崇训因哥哥在北汉而几次背周归汉。但由于北汉的国力日衰，杨崇训处在麟州，悬隔黄河，得不到北汉的援助，在周世宗柴荣的招抚下，最后只得又归附了后周。

北汉的皇帝刘崇，原是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的弟弟，后周夺了他家的皇位，他自然十分仇恨。刘崇一反过去抗辽的态度，转而投靠契丹，攻打后周。杨业是在抗辽斗争中长大的，对北汉向契丹纳贡称臣，当然很不满意，不过他作为臣下也无可奈何。由于北汉同契丹之间仍然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契丹统治者不但逼北汉纳贡，而且还不时过境劫掠。北汉最高统治者虽然委曲求全，但在契丹进扰时，也不得不派人还击。到刘钧统治的时候，北汉同契丹的关系十分紧张，双方长期绝交，处于战争状态。杨业在北汉屡建战功，不断升迁，这时已任代州（今山西代县）的建雄军节度使。代州是北汉与契丹相接的北部边境。杨业常驻代州，在那儿修筑许多堡寨防御契丹。在双方交战的时候，杨业就是前线的总指挥。后周和北汉之间，后来的北宋和北汉之间，先后爆发了几十次战争，从史书的记载看，杨业在宋太祖开宝年间（九六八～九七五年），才在战场上出现。大约在这之前，他主要承担防御契丹的重任。《宋史》上说杨业在北汉“屡立战功，所向克捷，国人号为‘无敌’”。这里所说的“屡立战功”、“所向克捷”，主要应是指对契丹的战斗。“国人号为‘无敌’”，也主要指北汉人民表彰他防御契丹的骁勇和功绩。

赵匡胤于建隆元年（九六〇年）夺了后周的皇位，建立宋朝。在北宋消灭各个割据政权统一南北的过程中，遇到的强劲对手，除契丹外，就要算北汉了。天会十二年（九六八年），北汉皇帝刘钧死，最高统治集团爆发了争夺皇位的斗争。赵匡胤决定乘机发兵，灭掉北汉。杨业参加了这次抵抗宋军的战争，他被任命为侍卫亲军都虞侯，就是兼统北汉的中央部队。杨业和将领冯进珂领兵扼守太原城南的团柏谷。宋军的先锋何继筠夺下汾河桥，直逼太原城下。杨业打败宋军，迫使宋军退走。第二年初，宋太祖亲征北汉。杨业和将领冯进珂仍驻屯团柏谷。由于北汉牙将陈廷山投降宋军，杨、冯二将苦战失利，损伤千余人，退入太原城。北汉主刘继元解除了杨业的兵权。三月，赵匡胤亲至太原城东南，在太原城外布下四个军寨。杨业率骑兵几百人从城内冲出，直攻宋军东寨。东寨主帅挺身抵挡，北汉兵出援，杨业最后拽着城墙上垂下来的绳子，才进入城中。五月，宋军在围攻太原的同时，引汾水灌城，太原危急。北汉主命令杨业与司空郭无为等，领兵千余人乘夜出袭宋军。这天夜里正好下雨，汉军迷路，杨业马足受伤，只好中途返回城里。宋军久攻太原不下，其时值暑天多雨，将士腹泻的很多，恰好辽的援军到来，赵匡胤只好下令班师。杨业和诸将乘势追击，获粮三十余万斛，茶绢以万计。这些东西对衰败的北汉政权，是一个不小的收获。宋军退去以后，辽军还在太原城下。一贯抗辽的杨业，劝北汉主刘继

元说："契丹贪利不讲信用，将来必然会攻破北汉。这次来的援兵盛气凌人，但对我没有防备，我愿去袭击他们，不仅可以缴获几万匹马，还可以把辽占领的河东之地要回来，使百姓免遭契丹的骚扰，您也可以从此长享富贵。"但北汉主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反而在辽军北还时，送给一份厚礼。广运三年（九七六年）初，北汉主令杨业攻晋州（今山西临汾），杨业被宋军将领武守琦打败。这一年，赵匡胤已基本上统一南方，又决定进攻北汉。他派出五路大军围攻太原，又派兵分攻北汉其余各州。宋军在这次战争中，各路都取得战果，北汉的太原也即将攻下。辽又派兵出援北汉，恰好这时赵匡胤突然死去，宋军只得撤兵。

杨业在抗宋的战争中，从史书记载上看，大都打了败仗。宋军并不骁勇，只是数量上远远超过北汉的军队。杨业同契丹作战，多是"所向克捷"，惟独与宋军对仗处于失败地位。这是由于史书作者的正统观念很强，写进史书的大都是有利于宋朝的事，但同时也说明杨业抗宋的斗志远不如抗辽那么足。

宋太祖死后，他的弟弟赵匡义即位，就是宋太宗。赵匡义即位后，到太平兴国四年（九七九年），南方诸国都已削平，攻打北汉就成为完成统一的首要任务。这年二月，赵匡义集中兵力亲自伐汉。为了防止辽出兵救援北汉，赵匡义以一部分兵力先攻占太原以北的忻州（今山西忻县）石关岭一带。当契丹的几万援兵到了忻州，就被宋军击败。三月底宋军包围了太原。至五月初，太原附属的小城羊马，被宋军占领。北汉的统兵将领都指挥使郭万超逾城投降，北汉军心瓦解。杨业对这次战争的形势是看得很清楚的。宋朝集中军事主力来对付北汉，而当时的北汉只剩下十来个州的土地和三万五千多户居民，同宋朝的实力相差太大。所以，在宋军围攻太原时，杨业从北汉主的出路和河东百姓的利益出发，劝刘继元降宋。刘继元拒不接受投降。后来，北汉都指挥使投降宋军，刘继元的亲信大臣也都纷纷逃散，城中危急，刘继元走投无路，只好派人奉表出降，北汉至此灭亡。赵匡义早已听说杨业骁勇无敌，曾派人收买他，杨业不从。北汉主投降以后，赵匡义召见杨业，杨业在北汉二十九年，很受北汉王的重用，他为感激知遇之恩，向北叩拜，大哭一场，算是告别北汉，然后解甲来见赵匡义。赵匡义大喜，赏给他许多东西，让他恢复原来的姓氏，单名一个业字，在自己的身边担任散职，做右领军卫大将军。杨业降宋，立即受到封赏，这不仅是由于宋太宗赏识他，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曾劝说北汉主降宋，宋太宗授予杨业官职时的诏令，即表彰他"定策乞降"，为宋朝立下了大功。一些史书记载，杨业在降宋之前，仍然据城苦战。那是因为，杨业虽然向北汉主提出了降宋的建议，但在这个主张实现以前，他认为必须继续忠于职守，这同他的建议并不矛盾。杨业从抗宋到降宋，表明他不仅骁勇善战，而且也是一个很有见识的将领。

北宋灭北汉时，击败了辽大将耶律沙的几万援军，斩杀了五员敌将和上万士卒，这就使宋太宗增长了伐辽的勇气。不过，宋军将士出征日久，加之在北汉掳掠许多财物，所以，人人思归，不想伐辽。太平兴国四年（九七九年）六

月，宋太宗不顾将士的反对，率主力从太原向辽的南京（今北京）进发。契丹易州（今河北易县）刺史刘禹举州投降，涿州（今河北涿县）刺史刘厚德和范阳守军万余人也都投降，宋军连下数郡。辽军负责南京防务的北院大王耶律奚达和统军使萧讨古，合兵与宋军战于南京附近的沙河，为宋军所败，南京遭到宋军的包围。南京是辽的南面门户和军事重地，南京留守韩德让和大将耶律斜轸，见宋军已经兵临城下，就由耶律斜轸带万余骑兵出屯德胜口（今北京德胜门外）。宋军乘辽军立足未稳，就带兵攻打，耶律斜轸损失千余骑，退至清沙河（今清河镇一带）。南京附近的辽将和地方官相继降宋。辽景宗听到宋军入境、辽军战败的消息，准备放弃幽州，但他的妃子萧绰，就是后来著名的萧太后，接受大将耶律休哥的建议，动员强大的兵力，由耶律休哥统帅去救援南京。七月，宋太宗指挥将士攻城。耶律沙率辽的援军赶到城外，引诱宋军交战于高梁河，战败退走。宋太宗亲率军队追击，追至清沙河时已是黄昏，耶律休哥和耶律斜轸从左右两边冲入宋军，宋军大乱，指挥失灵，败散而逃，死亡万余人。宋太宗身中数箭，从清沙河连夜逃归南京城南的宝光寺大营。第二天，宋太宗又化装乘驴车南逃，辽军一直追到范阳（今北京城西南）才回去。这是杨业归宋以后北宋的第一次伐辽战争。

杨业参与了这次战争没有，史书几乎没有记载，只有《烬余录》上说太平兴国五年（九八〇年），宋太宗在莫州（今河北任丘北）为契丹所困，“杨业及诸子奋勇救驾，始得脱归大名”。这书上所说的是太平兴国五年宋朝伐契丹的事。实际上，这一年，宋太宗只是准备亲自带兵伐契丹，来到了河北大名。由于大臣的劝谏，宋太宗根本没有到达莫州，而且，当时杨业已经去代州（今山西代县）上任了。但《烬余录》上所说的情况，有点像太平兴国四年（九七九年）宋太宗在清沙河大败的情景。那时杨业是宋太宗的侍卫官和军事顾问，在宋太宗身边的可能性极大。当宋太宗被辽兵追击时，杨业自然会奋勇救驾。由于史书上没有记载，这只能是一种推测，不能说确有其事。不过在这次战事结束，宋太宗还师之后，授杨业郑州防御使，防御使兼刺史之职，比一般刺史高，可见，杨业在宋太宗伐辽的战争中是立下功劳的，否则不会在战后得到这个职位。

太平兴国四年（九七九年）九月，宋太宗班师南归之后的两个月，辽朝统治者为报南京围城之仇，出骑兵十万南伐；同时还派一支人马进犯雁门山南。这两路军都先后被宋军击败。但宋朝统治者由此更加认识到北部边防形势的紧张，所以，就在这年冬天，战争还没结束，宋太宗以杨业老于边事，熟悉敌情，任命他为代州刺史，兼领“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派他和潘美一起戍守并州地区。宋太宗还给他很重的赏赐。三交是个地名，这里指太原以北的三交寨，即牧马河、汾河和滹沱河三条河谷通道的交叉口，地势重要。当时旧太原城已被宋太宗毁掉，新的太原城尚未建成，作为并州行营的最高军政长官潘美和杨业，只好先驻三交寨，所以他俩的官职也都冠以“三交”二字，潘美是领“三交行营都部署”，杨业作为他的副手，称“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宋朝的禁军出京屯戍，称为“驻泊”。统兵官中

地位高的就称“驻泊兵马都部署”，杨业以“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兼代州知州，具体地说，就是统辖并州路的禁军和代州的地方军，同时兼管代州民政。代州的重要性在于雁门关。代州北边四十里就是重峦迭嶂的雁门山。雁门山的断崖峭壁间，有条崎岖曲折的路，号称天险，它就是著名的雁门关。自古以来这儿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出了雁门关就是辽国。代州称得上是宋朝的边防重地。宋太宗委任杨业担任这个职务，可以说是对他的很大信任。志在疆场的老将杨业，也很乐于担当起防守宋王朝北界的任务。杨业从宋朝中央领导的禁军，加上代州一州的厢军，不过几千人，而契丹从代州南下的军队，常有上万人，甚至十万人。杨业不畏艰难，在当地人民支持下，以杰出的军事才能和丰富的作战经验，经常打败入犯的辽军。他虽然不知书，但作战勇敢，又有智谋，平时注意将士的攻战训练，能与士卒同甘苦。代北冬天寒冷，当地人大多穿着皮衣，杨业只穿絮有棉絮的衣服。他的衙门也不生火，侍从都冻僵得倒了，他却丝毫不感到寒冷。他从政简易，关心属下，所以士卒都愿为他出力。

杨业赴任不到三个月，在太平兴国五年（九八〇年）三月，辽景宗就亲率十万大军进犯雁门关。杨业命部将董思愿守住雁门关峡谷南口，自己亲率数百骑从西陉（雁门关峡谷西支），绕道至雁门关峡谷北口，猛攻辽军，杀了辽朝的驸马侍中萧咄李，活捉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海，缴获无数马匹盔甲武器。杨业因功升为云州观察使，仍为代州刺史，并兼郑州防御使。从此，辽军望见杨业的旌旗，就自动退去。

太平兴国七年（九八二年）四月，契丹分三路伐宋，中路三万人攻雁门。杨业在雁门关大败辽军，斩辽军将士三千，乘胜追逐到朔州（今山西朔县）、寰州（今山西朔县东北马邑镇）和应州（今山西应县）等地，攻破辽军营垒三十六座，俘获辽军一万多人，得到牛马羊五万多头。

在杨业驻守代州的七八年里，辽军从未攻人过雁门关，河东百姓过上了安宁的生活。为此，河东人民世代传诵他英勇战斗的事迹。

杨业的战功，也遭到同僚的妒忌。和他一起戍边的主将还上书宋太宗，诽谤杨业。宋太宗看后就把这些奏疏封起来送给杨业，表示对杨业的信任，以此换取杨业对他的忠诚。但另一方面，宋太宗明知这些奏疏纯属诬陷之词，对上书者却不加追究，实际上是鼓励他们继续陷害忠良。因为，他需要一些人向他提供边将的情况，以便加以控制。

从宋太宗亲自率兵讨伐幽州（宋称辽的南京仍为幽州）以后，宋辽之间没有大的战争。太平兴国七年（九八二年），辽景宗死，长子隆绪即位，就是辽圣宗。圣宗即位时只有十二岁，国事主要由母亲萧太后主持。宋朝的边臣纷纷上书宋太宗，乘辽朝主幼、太后专权、国人不服的机会，收取燕云十六州。宋太宗自太平兴国征辽惨败之后，也一直耿耿于怀，想要灭亡辽国，挽回面子，因此，他同意臣下的意见，积极做北伐的准备。不过，当时的辽朝对边防并没放松，辽圣宗即位的当年，萧太后就命耶律休哥为燕京留守，总领南面事务。在宋朝“筑城河北，聚粮边境”的同时，耶律休哥也在“劝农桑，修武备”，

加强边境的防备。

经过几年的准备，雍熙三年（九八六年）三月，宋太宗出动三十万大军，向辽朝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这次宋太宗虽然没到前线，但一切军事行动都由他亲自指挥。宋军分三路出兵，东路由曹彬、米信率领宋军主力，从雄州（今河北雄县）出击；中路由田重进率领，出飞孤（今河北涞源北）；西路由潘美任主帅，杨业为副帅，出雁门。按照宋太宗的部署，计划以东路曹彬的军队攻打涿州（今河北涿县）吸引辽军主力，然后中路、西路绕道辽的南京北边，三路合围，攻取南京。

战争的初期，三路大军都捷报频传。曹彬的东路军取得固安、新城两县，然后攻克涿州，击败辽军。中路的田重进连克飞孤灵丘和蔚州（今河北蔚县）。西路军的战果尤为辉煌。杨业率军从西陉北出，先在雁门谷北口击败辽军，然后追击至寰州，寰州的辽朝守将赵彦章举城投降。杨业的儿子杨延昭进围朔州。朔州的辽兵守将赵希赞抵抗失败，也开门纳降。杨业父子转攻应州，辽的守将艾正等投降。云州（今山西大同），也被杨业父子收复。他们又进兵浑源，同田重进在恒山之下会师。代北居民听说宋军到来，纷纷前来欢迎，见了杨业的队伍，热泪盈眶。他们热情支持宋军，有的充当向导，有的供应军需，有的乘夜斩辽军首级来献，还有的参加宋军打仗。杨业下令征募壮士，成百上千的人前来应征。

面对宋朝的全面进攻，辽朝忙调集各路军队，令耶律休哥抵御宋军主力曹彬的军队，派耶律斜轸抵御潘美、杨业。萧太后和辽圣宗亲至南京督战。宋军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因兵力分散，相互不能很好地配合，加之粮草供应不及时，给辽军的反击提供了条件。四月，曹彬在涿州遇到耶律休哥的军队，粮食不继，萧太后和辽圣宗的援军已到了涿州东。辽军两边夹击，曹彬从涿州败退。五月，曹彬和辽军在涿州西南四十里的岐沟关大战。宋军败退，夜渡拒马河，耶律休哥引精兵追击，宋军掉到河里淹死的不计其数。曹彬退到易州，在州东沙河驻营，听说耶律休哥领兵来了，宋军争渡沙河，死亡过半，史书上记载“沙河为之不流”，曹彬的主力军全部溃败。宋太宗得悉东路军溃败，伐辽的勇气一下全没了，急忙下令让中路、西路兵马撤退：令田重进屯定卅，潘美、杨业退守代州，徙云、应、朔、寰四州吏民入雁门关，分别安置在河东和京西。

那时候，辽大将耶律斜轸率十万大军直奔宋朝西路军而来，先攻陷蔚州，潘美率师去救，同辽军战于飞孤，宋军败。原来已为宋占领的浑源、应州守将都弃城而逃。六月底七月初，耶律斜轸乘胜进入寰州。杨业按照宋太宗的命令率兵护卫云、应、寰、朔四州的官吏百姓向内地迁徙。那时曹彬、田重进的两路宋军都已撤回，辽军集中近二十万人的兵力，攻击代北的宋军。在辽军的优势兵力面前，杨业向潘美建议，不要正面同辽军作战，可以领兵出大石路，向北奔应州，虚张声势，将辽军的主力引向应州的西边。同时派人密告云州、朔州等地的守将，等宋军离代州北上时，令云州官吏、百姓先出来，这就不怕辽军前来追击了。而位于寰州的辽军怕被宋军切断后路，就会转向应州，这样在寰州西侧的朔州军民也可乘势南出石碣

谷（今朔县城南之上、下石峡谷），避开辽军的袭击危险。再在谷口安排三千弓弩手，派骑兵在中路支援，这样三州的官吏、百姓可以万全，陷入敌后的宋军也能安全撤退。杨业的这个“示形于东，而务于西”的计策，在兵少而又要完成护卫几州百姓撤退任务的情况下，是切实可行的。但是，监军王侁竭力反对杨业的建议，提出了一个不顾客观条件而蛮干的建议。他说：“我们领数万精兵，怎能如此怯懦?”他主张沿着雁门大路，大张旗鼓地行军到马邑（当时是寰州城的所在地）。另一将领刘文裕赞成王侁的办法。杨业忙说：“不可，这样势必大败。”王侁嘲笑杨业说：“君素号‘无敌’，今遇敌军不战，是不是另有什么打算（暗指杨业是否要去投靠辽朝)?”杨业听了这话十分气愤，他对潘美、王侁等人说：“现在的形势对我军不利，按你们的主张去做，不是白白让士卒送命吗？你们说我怕死，我可以为你们打头阵。”当时作为西路军主帅的潘美，也要杨业执行王侁的方案。临行，杨业哭着对潘美说：“这次去必然会失败，我原是北汉的降将，早就应当死的。太宗没有杀我，而且委为将帅，授予兵权。我并非纵敌不打，只是想等候时机，杀敌立功，报答国家的恩典。今天各位责备我避敌，我当先去战死。”他说着用手指着陈家谷口（今朔县西南陈家沟）的方向说：“诸位在谷口两侧，埋伏好步兵和弓弩手。等我转战到这里，就以步兵夹击相救，不然就会全军覆没。”杨业说完就率领儿子杨延玉和老将王贵等，自石碣谷奔向寰州前线。

辽军统帅耶律斜轸听说杨业领兵前来，命先锋萧达揽在路上埋下伏兵。第二天早上，杨业与耶律斜轸在朔州东边相遇，双方交战，耶律斜轸假装战败，且战且退。待杨业进入萧达揽的埋伏圈，伏兵四起，耶律斜轸回师再战，把杨业包围起来。杨业率众突围，苦战到下午，箭尽力竭，拼力杀出重围，到达陈家谷口时天色已近黄昏。杨业见两边静悄悄的，连个人影也没有。原来潘美、王侁等在这儿等到上午，不见杨业到来。王侁以为辽兵败了，怕杨业独占功劳，就领兵离开了陈家谷口。潘美也沿交河西南走了二十里。一会儿，潘美听说杨业兵败，但没去接应，反而带兵逃走。杨业气得拍着胸口大哭，只好率领士卒力战。那时跟随他的将士只剩下百余人。杨业对他们说：“你们都各有父母妻子，同我一起死在那里没什么好处，你们跑回去还可以报告天子。”将士都感动得泪流满面，谁也不肯离去。老将王贵杀死几十个辽兵，弓箭用完了，自己也被杀死。其余士卒全部战死，没有一个生还。杨业的儿子杨延玉也战死沙场。剩下杨业一人，他身受几十处伤，还用刀砍杀了几百个辽兵，杨业的马也受了重伤，不能再行进。他躲到树林里，辽兵耶律奚达望见他的袍影，射了一箭，杨业从马上摔下来，被捉住了。

杨业被俘后，送到辽军统帅耶律斜轸处，耶律斜轸责备杨业说：“你同我国决胜三十多年，今天何面目同我相见！”不过，耶律斜轸对杨业的骁勇也很敬佩，想招降他，但是遭到了杨业的坚决拒绝。萧太后和辽圣宗事先下有密令，要耶律斜轸切勿用暗箭伤害杨业，务必活抓。辽将耶律奚达虽然捉住了杨业，但因他是用暗箭射伤再捉住的，而且又没能劝降杨业，萧太后非但没有嘉

奖他，反而处分了他。由此可见辽朝统治者对杨业是何等钦佩和重视。杨业一生抗辽，自然不肯降辽。他被俘后叹息说："宋太宗待我甚厚，我总盼望打败辽军，捍卫边疆以报国家。没想到却被奸臣嫉妒，逼着我去送死，落得全军覆没，还有什么脸活在世上呢?"他在辽营绝食三天就牺牲了。杨业死时是雍熙三年（九八六年）七月。

造成杨业之死的原因，历来说法不一。多数认为潘美应负主要责任，因为他是西路军的统兵主帅。他不采纳杨业的正确建议，而听从王侁的错误主张，以致造成杨业兵败至陈家谷口；而潘、王又没有按事先的约定在那儿接应，却违约撤兵，这自然就导致杨业被俘。少数人认为，王侁和刘文裕应负主要责任。当时监军权力很大，潘美不敢不听他的，不过，持这种见解的人，也不否认潘美对杨业的死负有责任，即他没有坚决反对王侁的主张，又在关键时刻违约撤兵。总之，杨业的死是王侁、潘美等人造成的。

杨业一生抗辽，从北汉时起，就在雁门地区抵御辽兵南下，一直到归宋以后，前后三十多年。辽兵南下掳掠，对当时北汉和后来的宋朝百姓来说，都是个很大的威胁，所以杨业抗辽就受到宋朝和宋以后历代人民的称颂。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说，杨业、杨延昭"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乡里儿童村夫），皆能道之（都能讲出他们智勇无敌的事迹）。"杨家将故事的流传也就从此开始。北宋的杂剧中，就有杨家将的故事。南宋时，说书人也纷纷讲述杨家将的故事。据记载，那时说书人的话本里有《杨令公》、《五郎为僧》等。元曲中的杨家将故事就更加多了。元曲大作家关汉卿，就写过杨家将的剧本，题为《孟良盗骨》。到了明代，已有了杨家将内容的长篇小说，题为《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有关杨家将的戏曲、小说一直流传到今天。宋朝人还为杨业修了几座祠庙，在山西代县有杨业的家庙，在苏州也有杨业家庙，在北京密云古北口有杨无敌庙，古北口的庙至今犹存。

【戚继光】

在北京保卫战中，明军的"神机营"曾令瓦剌骑兵闻风丧胆。"神机营"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装备枪炮的兵种。这以后，明朝开始大量仿制和改制外来先进的佛朗机和火绳枪（当时称为"鸟铳"），进一步扩大了军队装备由冷兵器时代向火器时代过渡。

在这个过渡时代里，应运而生了两部充满朴素唯物论和军事辩证法的重要军事著作，一部叫《纪效新书》，一部叫《练兵实纪》。这两部著作被后人合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兵书之一，它们的作者就是明代杰出的军事家、抗倭名将戚继光。

戚继光，字元敬，山东登州（今山东蓬莱）人。他的六世祖戚详曾在明朝开国时建立军功，因而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戚继光出身于将门之家，他的父亲戚景通，精通武艺，熟读兵书，为人正直，对戚继光从小就严加训导，经常教育儿子长大以后要为国家效力，这对戚继光日后成为一位抗倭民族英雄，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

戚继光十七岁那年，父亲病故，年



戚继光

轻的戚继光便承袭登州卫指挥佥事的职务，从此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

戚继光生活的年代，正是倭寇肆虐中国沿海的时候。倭寇之害起自元末明初，当时日本正处在南北分裂混战的后期，一些战败的武士勾结不法商人和破产农民，窜扰中国沿海，掳掠财物，杀戮百姓，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明代人称他们为"倭寇"。明朝中后期，倭寇之害愈演愈烈，到了嘉靖年间，已是相当严重。

戚继光从小目睹倭寇对沿海人民的残酷蹂躏，对倭寇的野蛮行径恨之入骨，便立下了雄心壮志，要荡平倭寇，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他在一本兵书的空白处写下这样的诗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决心在抗倭斗争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当时的倭患以江浙一带最为严重。由于当地卫所残破，兵力单薄，明廷便把戚继光由山东调到浙江，并升为参将，负责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今浙江临海）三郡。这儿正是倭寇活动的中心地带，戚继光的责任比以前更加重大了。

在实际战斗中，戚继光发现明军的战斗力极差。当地卫所的军卒以老弱居多，各地调来的客兵也缺乏训练，而且纪律松弛，自相斗杀，甚至杀良冒功，骚扰百姓。当地民间广泛流传着这样的谚语："宁遇倭贼，毋遇客兵；遇倭犹可逃，遇兵不得生！"依靠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取得抗倭斗争的胜利呢？

于是，戚继光决心招募一支由当地人民组成的新军。因为他在斗争中深刻体会到，遭受倭害最严重的是人民，最痛恨倭寇的也是人民，抗击倭寇最坚决、最英勇的同样是人民。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取得抗倭斗争的胜利。

嘉靖三十七年（1558 年），当地的义乌县发生了矿夫和乡团的大规模械斗。戚继光从这场械斗中发现义乌人勇锐而且有血气。他想，如果把这些因民事纠纷而兵戎相见的力量引导到抗倭战场上去，不但可以避免自相火并的惨剧，而且将会产生巨大的战斗力。于是，他向上司提出了到义乌招募壮丁、组建新军的建议。他的建议得到总督胡宗宪的支持，同意他罢去所部旧兵，到义乌县重新招募。

戚继光到义乌后，对械斗的双方晓以大义，动员他们共同御敌，不可自家阋墙。他的爱国热忱感动了械斗双方，许多矿夫、乡民踊跃应募。很快，戚继光就募集了四千多人，建立起一支新军。

戚继光开始对这支新军进行严格的训练。

戚继光首先教育新战士，建立这支队伍是为了保卫家乡和人民。他对新战士说："兵是用来杀敌的，贼是要杀老百姓的，百姓们当然希望你们英勇杀贼。

如果你们既能杀贼又守军法，不扰害百姓，百姓怎能不欢迎你们呢?”

戚继光对这支队伍的武艺训练抓得也非常紧。他告诉士兵：“武艺不是用来应付官府的，是用来杀贼的。”并要求他们苦练实战的真武艺，不学“花枪”。戚继光还时常对士兵的训练实绩加以考核，进步者受奖，屡次考核不进的受罚。这样一来，使得人人专心练武，个个有实战的真本领。

戚继光又根据江南一带多水泽、道路曲折、难于以大阵势作战的地理特点，针对倭寇善设伏、能冲锋、擅长短兵相接的作战惯伎，创制了一种新阵法——“鸳鸯阵”。并把这种阵法作为阵势组成的基本单位，教授士兵严加操练。

“鸳鸯阵”以十二人为一队，最前一人是队长，次二人持牌平列，次二人持狼筅，次四人持长枪，次二人持短兵器，最后一人是专事炊事的火头军。接战时，狼筅、长枪、短兵均可杀伤敌人，同时狼筅各跟一牌，保护拿牌人的后身，长枪每二人分管一牌一筅，后边有短兵防护。这一战斗组织以集体互助的战术为核心，长短兵器互相配合，彼此相倚，打起仗来机动、灵活、严密，能够发挥士兵近距离搏战的勇敢精神，同时可以减少自己的伤亡。

“鸳鸯阵”后来又配上鸟铳手、弓弩手、火箭手，组成步兵大营，发展成为营阵法，在以后的抗倭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经过几个月的训练，戚继光麾下的这支新军不但纪律好，素质高，组织严密，而且熟悉作战阵法，成为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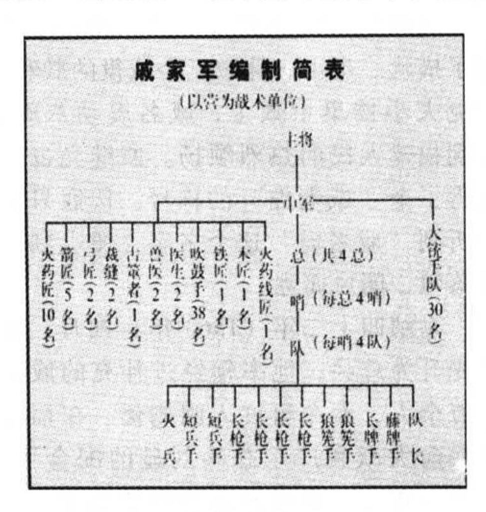
嘉靖四十年（1561 年），倭寇大举进犯台州。戚继光带领这支新训练的军队御敌。他以寡敌众，在一个多月时间里消灭倭寇五千多人，救出被掳百姓六千多人，使侵犯台州的倭寇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台州大捷后，戚继光以军功晋升为都指挥使。根据海防的需要，他又在义乌招募了两千人，把队伍扩大到六千人左右。两年间，戚继光带领这支军队驰骋在浙东御倭前线，百战百胜，人们称他的军队为“戚家军”。

就在此前后，即嘉靖三十九年至四十年间，戚继光总结统军以来，尤其是和倭寇斗争以来的经验，又结合研究古代兵法的心得，完成了《纪效新书》的写作。

在这部兵书中，戚继光主张重视古法，通晓古法；而同时又极力反对迷信古法，墨守古法。他吸取了《孙子兵法》中有益的精华，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兵器的变化，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创新发展。

戚继光把自己多年来练兵的一套方法及“鸳鸯阵”等阵列写进书中，并作



戚家军编制简表



戚继光所著《纪效新书》

了详细论述。同时，他也吸收了同时代其他人的许多可贵的经验，使得这部书内容丰富，见解独到，颇具创造性。

戚继光认为研究兵法应讲求实际，用来指导实战，所以《纪效新书》写成后，即被作为教育、训练戚家军的军事教材。戚继光要求将士们人人熟悉兵法、阵法，并用层层推理、反复设喻的生动通俗语言对战士们进行引导、解疑，使他们在读兵书时都能有所收获。

经过军事理论的武装，戚家军作战比以往更加灵活、勇猛。在浙江倭患平息后，戚继光又带领这支队伍转战到福建剿倭。

戚家军入闽不到两个月，就先后取得了横屿、牛田、林墩三个战役的胜利，攻克大小倭巢十数个，威名震动八闽，受到福建人民的热烈颂扬。戚继光也因此得了个“戚老虎”的称号。倭寇只要一听到“戚老虎”这个名字，便立刻丧魂落魄，闻风而逃。

嘉靖四十二年（1563 年）四月，戚继光升为总兵，他率领经过补充的戚家军万余人，奉命再度入闽剿倭。在福建总兵俞大猷和广东总兵刘显的配合下，到第二年春，全歼福建境内的倭寇。接着，戚继光又与俞大猷挥师南下广东，肃清了广东境内的残倭。至此，猖獗二十年的沿海倭患终于得以平息，戚继光“但愿海波平”的夙愿也终于得以实现。

但这时明朝北方的边患又严重起来。隆庆元年（1567 年），蒙古鞑靼部在首领俺答汗的统领下进攻山西，同时入寇蓟州（今河北蓟县），直接威胁到明廷的统治。加强北方防御力量，抵御鞑靼的问题又摆在了明朝统治集团的面前。

根据一些朝臣的建议，明廷决定调抗倭有功的戚继光以都督同知镇守长城一线，以消弭边患。十二月，戚继光动身北上，在他的戎马生涯中揭开了新的一页。

对于蓟州一带，戚继光是再熟悉不过了。他年轻时曾在这里戍守达五年之久。时隔二十年，戚继光再次来到故地，回首往事，不禁感慨万千。他又想起年轻时立下的壮志：兴十万之师，出塞千里，打一场大仗！如今夙愿眼看即能得酬，戚继光决心大干一场。

然而，事情并不像他想的那么顺利。戚继光到任后，两次向朝廷提出募兵、练兵计划，却都遭到一些守旧派大臣的反对，结果未获批准实施。戚继光只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一些加强边防的措施。

不久，戚继光的练兵主张得到了关心边事的执政大臣张居正的支持，张居正力排众议，授权戚继光总理练兵事务，戚继光的练兵计划终于有机会变成现实了。

隆庆二年（1568 年）冬天，戚继光把蓟州的全部防区划分为十二路，每路设一将领。又建置了车营七座，并配以马、步兵，进行混合训练。他还派自己的老部下、余杭参将胡守仁到浙江调募

鸟铳手三千，来蓟北听用，并加紧整顿哨所，进行练兵。

自戚继光镇守蓟州以后，由于防御设施稳固，兵又精练，鞑靼未敢轻易来犯，边塞形势一直比较平静。

这期间，戚继光一边整顿防务，训练士兵，一边着手进行他的第二部军事著作——《练兵实纪》的写作。经过四年的不懈努力，隆庆五年（1571 年）《练兵实纪》终于脱稿了。戚继光称，写这部书的目的是为了实用，所以书名就叫作“实纪”。

与十年前的那位抗倭英雄相比，这时的戚继光不但在职位、权力上有了不同，而且在治军经验上也更加丰富、系统。因此《练兵实纪》中的许多见解比《纪效新书》更加独特而深刻。

《练兵实纪》以练兵为中心，包括了军制、军令、战法、兵器等各方面的内容，并附有多幅插图。戚继光在书中着重总结说明了训练的次序：首先是练兵法，第二步是练胆气，第三步是练耳目，使士兵熟悉各种旗鼓号令，第四步是练手足，使士兵能熟悉武艺，最后是练营阵。《练兵实纪》的各卷就是按照这个顺序排列的。

结合北方戍边的特点，《练兵实纪》还对多兵种的编组、协同和训练方面做了阐述和发挥。书中详细介绍了马营、步营、辎重营等组织，具体叙述了选兵和操练各兵种的原则及方式方法。这对于明、清两代的军事家们，是很有实际用处的。

在书中，戚继光还把“练兵”发展为“练将”和“将将”，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一个优秀将领，必须德、才、识、艺四者兼备，其中以德最为重要．只有兼以文义、雅有德量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优秀的将领。这一经验总结，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世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练兵实纪》一问世，就得到了时人很高的评价。有人赞誉它“练兵硕画，凿凿皆老成壮略，章程条贯，极为明备”，是“兵家上乘”之作，并把戚继光与春秋时期的军事家司马穰苴相提并论，说即使司马穰苴复生，见到这部兵书，也会自叹弗如。戚继光对这些赞誉之词当然不放在心上，报之以一笑，但这也足以说明这部兵书在当时的巨大影响。

我国古代，有许多著名将领多无兵书传世，编著兵书者又多非名将。自秦汉至明代二千年间，既是著名将领而又有著名兵书的，惟戚继光一人。他一生戎马倥偬，躬历百战，以赫赫战功显名于世。同时他又勤于总结军事经验，撰著兵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戚继光其人，不愧为民族之精英；其书，亦堪称传世之佳作。他的爱国精神和军事思想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为纪念戚继光而建的福州万家亭

【宗泽】

（1059～1128）北宋末、南宋初抗金名臣。字汝霖。婺州义乌人（今属浙江）。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同进士出身。从元祐八年起，他先后任大名府馆陶县尉、衢州龙游县（今浙江衢州东）令、晋州赵城县（今山西洪洞县北）令、知莱州掖县、登州（今山东蓬莱）通判、巴州（今四川巴中）通判等地方官。

靖康元年（1126）金兵第一次围攻开封撤退后，宗泽入京任台谏之职。八月，金兵再次南侵，他出知磁州（今河北磁县），并任河北义兵都总管。他不仅在磁州击退金兵，还主动出击，获得一些战果，使磁州军势声震河朔。其时，宋钦宗赵桓依然想用屈膝求和的办法求得金兵再次后撤，派康王赵构出使金营。当赵构一行到达磁州时，宗泽劝阻赵构使金，使他得以免被金兵俘虏。金兵再围开封后，宋钦宗任命宗泽为河北兵马副元帅，协同兵马大元帅赵构等人救援京城。他力主向开封进军，并不顾元帅府中赵构、汪伯彦等人的阻挠，率兵奋战，多次挫败金兵，虽然由于势孤力单，未能解京师之围，但却打击了金兵的气焰。

南宋政权建立，宗泽因坚持抗金，反对投降活动，遭到排斥。由于李纲的推荐，于建炎元年（1127）六月任知开封府，后又升任东京留守兼开封府尹。

宗泽在开封修建防御设施，加强治安，整顿秩序，同时联络北方抗金义军。各地农民起义军，还有若干支溃兵游勇，在金军南侵的情况下，也都先后归附宗泽，共同抗金。因此，宗泽在很短时间内，就把开封这个经过金兵洗劫，残破不堪的城市，整顿成抗金前线的坚强堡垒，击退金完颜宗翰等发动的猛烈进攻。为了收复河东、河北失地，宗泽在巩固开封防务的同时，还积极作渡河准备。他先后给宋高宗赵构上了二十四份奏疏，恳求他“回銮”开封，向宋朝军民表示坚决抗金的决心，并以开封为中心，号令全国军民进行抗金斗争。

宗泽对宋朝的一片忠心，丝毫未能改变宋高宗等人屈膝投降的立场。宋高宗等不仅不支持宗泽的抗金部署，还一再加以破坏。建炎二年，宗泽终于忧愤成疾，疽发于背。诸将入问疾，他勉励诸将：“汝等能歼敌，则我死无恨。”诸将出，宗泽悲愤地吟诵杜诗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连呼三声“过河”，遂于七月与世长辞。谥忠简，有《宗忠简公集》传世。

【李纲】

（1083～1140）北宋末、南宋初抗金名臣。字伯纪。福建邵武人。政和二年（1112）进士及第。五年，任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不久即因议论朝政过失，被罢去谏官职事。宣和元年（1119），上疏要求朝廷注意内忧外患问题，被宋徽宗赵佶认为议论不合时宜，谪监南剑州沙县税务。

宣和七年七月，李纲被召回朝，任太常少卿。其年冬，金兵两路攻宋，完颜宗望（斡离不）所率东路军直逼宋都开封。在宋廷一派慌乱情况下，李纲向宋徽宗提出了传位给太子赵桓，以号召军民抗金的建议。赵桓（宋钦宗）即位

后，升李纲为尚书右丞，就任亲征行营使，负责开封的防御。他率领开封军民及时完成防御部署，亲自登城督战，击退金兵。金帅完颜宗望见开封难以强攻，转而施行诱降之计，宋廷弥漫了屈辱投降的气氛。李纲因坚决反对向金割地求和，被宋钦宗罢官。由于开封军民愤怒示威，迫使宋钦宗收回成命，李纲才又被起用。完颜宗望因无力攻破开封，在宋廷答应割让河北三镇之后，遂于靖康元年（1126）二月撤兵。开封守卫战在李纲组织下获得胜利。

金兵撤离之后，李纲即遭到宋廷投降派的排斥和诬陷。靖康元年五月，宋廷强令李纲出任河东、河北宣抚使，驱赶他出朝。李纲就任后，宋廷又事事加以限制，使宣抚使徒具空名，无节制军队之权。李纲被迫于九月辞职，旋又被加上“专主战议，丧师费财”的罪名，先责建昌军（今江西南城）安置，再谪夔州（今四川奉节）。

李纲被贬不久，金兵再次两路南下围攻开封。宋钦宗在被俘前夕又想起用李纲，任命他为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事，但已无济于事。当李纲在长沙得知此命时，北宋已经灭亡。

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另建朝廷。为利用李纲的声望，起用他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右相）。其时，李纲正在赴开封途中，接到任命，便赶到南京，竭尽思虑，为高宗筹划重整朝纲，组织抗金，并同高宗周围的汪伯彦、黄潜善等投降派展开尖锐斗争。他反对投降，主张“一切罢和议”，严惩张邦昌及其他为金兵效劳的宋朝官员，以励士节。为加强抗金斗争的力量，他推荐坚决抗战的老臣宗泽出任东京留守，去开封整修防御设施；又力主设置河北招抚司和河东经制司，支持两河军民的抗金斗争，并推荐张所和傅亮分别任河北招抚使、河东经制副使。他还针对北宋以来军政腐败，赏罚不明等情况，颁布了新军制二十一条，着手整顿军政，并建议在沿江、沿淮、沿河建置帅府，实行纵深防御。

李纲整顿军政的设施，有助于宋朝廷支撑局面，尚能为宋高宗所接受。然而，他主张坚决抗金及反对投降活动，却为宋高宗及汪伯彦、黄潜善所不容。因此，他们又设法驱逐李纲。首先，调李纲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左相），另委黄潜善接任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牵制李纲。接着，又罢免张所、傅亮，撤销河北招抚司及河东经制司，蓄意破坏李纲的抗金部署，迫使李纲辞职。李纲任宰相仅七十五天，就被驱逐出朝，不久贬鄂州（今湖北武汉市武昌），继又流放到海南岛的万安军（今广东儋县东南）。直到建炎三年（1129）底才获自由。

建炎四年，李纲回到邵武居住。此后，于绍兴二年（1132）二月至绍兴三年，任荆湖广南路宣抚使，兼知潭州（后改湖南安抚使），又于绍兴五年十月至七年十一月任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他虽然被排斥在外，但一直关心国事，一再上疏陈述政见，继续反对屈辱投降，支持岳飞抗金斗争。绍兴十年正月卒。

李纲一生著述甚多，其遗文由其诸子编成《梁谿全集》一百八十卷，刊行于世。其中《靖康传信录》、《建炎进退志》、《建炎时政记》等，系李纲在北宋末、南宋初置身朝廷时的亲身经历和亲

见亲闻的记录，是研究这段历史的宝贵资料。

【岳飞】

岳飞（1103～1142年），字鹏举。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人。幼年贫穷，曾为人庄户。联金灭辽时应募从军，曾在张所部任统制，并与王彦一起抗金。其后随宗泽留守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任都统。宗泽死后，南下投张浚部，逐渐成为南宋抗金主将。建炎四年（1130年）收复建康（今江苏南京）。绍兴三年（1133年），因平定江西农民起义，被高宗赵构赐予“精忠岳飞”锦旗。绍兴四年，大破伪齐刘豫兵，收复襄阳等六郡，封靖远军节度使。绍兴五年平钟相、杨幺起义。后驻军鄂州（今湖北武昌），晋封武昌开国侯，联络两河义军，部署北伐。绍兴八年底，上表朝廷，提出“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反对高宗和秦桧的议和政策，为其所忌。绍兴十年郾城一战，大破金兀术精锐，收复颍昌、郑州和洛阳等重镇。由于高宗和秦桧执意求和，于同年秋被强令撤军，回临安后即被解除兵权，并被诬入狱。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4日）与子岳云及部将张宪被秦桧以“莫须有”之罪杀害，时年三十九岁。孝宗时追谥“武穆”，宁宗时又追封为鄂王。



岳飞

岳飞不仅智勇善战，在军事上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同时又颇富文才，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儒将，戎马倥偬之余，常挥毫遣兴，赋诗作文。其文章语言质朴，议论正大，诚挚感人。其诗词慷慨激越，夺人心魂。著作有《岳忠武王文集》十卷。其中《满江红》流传千古，众口皆碑。书法也颇有造就，传世作品有前后《出师表》等。

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的某一天，从西边天空飞来一只天鹅模样的大鸟，降落在永和乡岳家庄一富户的屋顶上。它扇动着有力的翅膀，伸着美丽的脖颈，发出阵阵悦耳的鸣叫。这叫声引起了该室主人的注意。他已四十有余，正在庭院中烦躁地搓着双手，来回走动。听到鸟的鸣叫，他停住了脚步，抬头看了看，不禁露出一丝惊讶的表情。他还从未见过这种鸟，莫不是传说中的神鸟大鹏？恰在此时，屋里传出一声嘹亮的婴儿啼叫，接着房门打开，里面奔出一位丫鬟，笑嘻嘻地叫道：“岳员外！岳员外！夫人生了，是男孩！男孩！”这位被称作岳员外的中年人闻讯大喜，猛地甩开双手，大踏步跨进屋里。岳员外忙捧起正吮手蹬腿的儿子，左瞧瞧，右看看，乐得直说：“岳家可有了烧香火的人了！”旁边的妇女向岳员外不住夸赞道：“你看这孩子长得多富贵相啊！

大眼大耳，宽额方口的，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姚氏说：“您别只是傻乐了，快给儿子想个名字吧！”这时，屋顶上的大鸟又发出一阵鸣叫，岳员外心里动了一下，脱口说：“名就叫岳飞，字叫鹏举吧，愿他日后能像鲲鹏一样展翅高飞，建功立业，光宗耀祖！”

岳员外是岳家庄的大户，颇有田产家财，但他生活得却很简朴，为人也很善良，常常节衣缩食，来赈济庄里的贫民。对借钱粮不还的人，他从不逼讨，就是有人公然侵吞他的田地，他也不与之论争，因此很得乡亲们的敬重。对他来说，惟一也是最大的焦虑是年近半百，尚无子嗣。为此，他曾四处访医寻药，甚至烧香拜神。如今，他已是如愿以偿，自然高兴万分，向家堂神庙点烛燃香，忙个不停。他还打算在岳飞满月时大摆筵席，款待全庄乡亲。

但这个日子并没有来到，来到的却是一场灭顶的灾祸。一天，一阵怪风呼啦而起，随即从山后升起一团黑云，飞快地翻滚过来，霎时间弥漫整个天空，盆泼似的雨水从空中倾泻而下。岳家庄的人从未见过这么暴烈的雷雨，惴惴不安地呆在屋里。忽然，从远处传来一阵阵恐惧的叫喊：“黄河决口了！黄河决口了！”顿时，岳家庄就像炸了锅，人们顾不上头顶上的雷雨了，扶老携幼，哭着叫着跑出屋子，涌向村外，向地势高处奔去，但这怎能跑得过猛兽般扑过来的洪水呢？

岳员外听到呼喊声，慌忙抱起不满月的岳飞，携着姚氏，踉跄着跑在院子中。这时他已听到洪水的呼啸声和成片的房倒屋塌声，他知这跑是来不及了。情急中，他一眼瞥见了放在墙角的一只大木缸，来不及犹豫，就拉着姚氏跑了过去。他先让姚氏坐了进去，再将岳飞递过，让抱在怀中，颤抖着说道：“夫人，我将儿子托付给你，靠你保全一点岳氏血脉，我就是喂了鱼鳖，也能瞑目了！”话音刚落，一股洪流涌来，岳员外手一松，木缸就随水漂走了。

岳飞母子坐在木缸内，随势漂荡，任意东西，虽屡经惊吓，终于安然无恙，最后在河北大名府黄县境内，随一股水流漂向岸边，被人救起，得以侥幸逃生。

岳飞一家虽然侥幸生还，家道却因此败落。岳母平日靠为人做针线活来维持家计，抚养岳飞。岳飞六七岁时，迫于生计，就砍柴放猪，打水送饭。年龄稍长时还曾到大户人家做庄客，打短工。岳母原是大户人家出身，受过一定教育，于是就做起了岳飞的启蒙老师，教他认字读书。没有钱，买不起笔砚纸墨，就在木盘中盛满沙子，教岳飞在上面写字，写满，可抚平再写。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岳飞竟识了不少字，并且练就一手龙飞凤舞的好书法。

在宋朝，下层学子主要是靠科举考试来挤入上层社会，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像汉、唐人那样通过从军远戍来建功立业几乎是不可能的。从赵匡胤陈桥兵变以来，朝廷就一直奉行重文轻武的政策，军人受到轻视，士卒被称作“赤佬”，为防止他们逃跑，他们的脸上要被刺上字，就像是受了黥刑的囚犯一样。人们视从军为畏途，逃之唯恐不及，但岳飞从小时候起就一直渴望做一名将士来保家卫国，他不是不想金榜题名，而是实在忍受不了异族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那时，北宋边备松弛，委曲忍让，辽金屡屡起衅，并几次侵扰

中原，饮马黄河，大肆劫掠。官军每每闻风而逃，百姓备受兵灾之苦。这一切给年少的岳飞很大的刺激。他认为，在国家民族处于危难的时候，仍去汲汲于追求自己的科场功名，这是最不光彩的行为，非大丈夫之所为。他毅然决然地决定，长大后一定要从军，为看不起“赤佬”的朝廷效命，抵御外侮，保卫自己的家园。

为了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岳飞小时曾四处拜访名师，练习武艺。他先师从汤阴县名手陈广学习枪法。由于他生得健壮有力，悟性又好，肯下苦功，所以很快得其真传，并加以发扬光大，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让敌人胆寒的枪法，在传说中称作“岳家枪”，渲染得神乎其技。在全县的比武中，岳飞大显威风，一杆枪使得蛟龙翻海一般，将对手一个个赶下擂台，夺得第一。其后，他又向一个叫周同的人学习骑马射箭。岳飞在他精心指导下，武艺大进，可以拉开三百斤的硬弓，在奔驰跳跃的马背上左右开射，应声中的。周同还教岳飞研读《孙子兵法》以及《左传》等古代历史书籍中所记载的战例。他常常告诫岳飞道：“用兵打仗不只是靠勇敢，拼死力，那是匹夫之勇，不值得称道。用兵打仗更重要的是靠智谋策略。如果运用得当，就能以少胜众，以弱胜强！”岳飞连连点头称是，对师父极为佩服。周同死后，岳飞非常悲痛，每月初一、十五都要到下葬处祭奠，风雨无阻，人们对岳飞不忘故恩旧谊的行为极为赞赏，认为他一旦能为时用，一定会为国效命的。

宋徽宗宣和四年（一一二二年），真定（今河北正定）宣抚使刘韐募兵，十九岁的岳飞应征，当上一名敢死战士，并任小队长。不久，岳飞就参加了一次剿匪的战斗，他主动向刘韐请战，愿领百余名精骑消灭这股劫掠乡里、令官兵十分头痛的土匪。获准后，他让一部分士卒扮作商人，往土匪的营寨去“经商”。匪徒正四处抓丁，扩充队伍，以应付官军的围剿，见了这帮精壮的“商人”，自然不会放过，一个个抓将起来，强令入伙。

岳飞又命百名官兵预先潜伏在山下险要处，自己则亲领几十名骑兵至土匪营寨前叫骂挑战。匪众见岳飞人少，大开寨门，鼓噪涌出，希望一举擒获。岳飞稍稍招架了几个回合，佯装不支，呼哨一声，掉转马头就跑。匪众哪知底细，拍马就追。到了山下伏击圈内，只听得一声号令，伏兵四起，紧紧围上，岳飞也返身杀回，一阵猛杀，匪众死伤大半，余下的扔掉器械，跪在地上直喊饶命。潜入匪徒营寨的官兵乘着空虚，四处纵火，捣烂了匪窝。匪首陶俊和贾进和慌慌张张，想骑马逃走，被绊马索绊倒，就地擒获。岳飞大获全胜，押着俘虏，载着战利品，凯旋奏捷。刘韐大喜，对岳飞的智勇大加赞赏。

不久，岳飞参加了宋金联合攻打被辽兵所占领的燕城（今北京）的战斗。其时，辽国在新兴金国的不断打击下，已奄奄一息，燕城守备空虚。宋军有十几万兵马，加上辽常胜将军郭药师率涿、易二州八千兵马降附，在兵力上占有压倒的优势，攻取燕京本是唾手可得的事。但北宋王朝将帅鲜勇寡谋，士卒军纪松懈，也无斗志，与辽军稍一接触，就溃不成军。郭药师向宋大将刘延庆提议，应在辽援军没有赶来前袭取燕城。畏敌如虎的刘延庆几经犹豫后，同意了这个

计划。于是，郭药师率六千精兵乘夜渡过芦沟，向燕城突然发起猛攻。岳飞率领自己的敢死队冲在最前面。城上守兵拼命往下放箭，掷石块和掀滚木，岳飞毫不畏惧，硬是靠云梯攀上城墙，将守兵杀死，开了城门，宋军遂攻占了燕京外城，但刘延庆却遥相观望，拒不按计划增派后续部队，致使辽援军赶到，与城内守军夹击宋军入城部队，使之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岳飞等少数官兵拼命杀开一条血路，缒城逃回。

金人通过这次战斗，看出了宋军的虚弱不足惧，于是在宣和七年（一一二五年）灭辽之后，挟战胜之威，兵分两路，向北宋发动了大规模的入侵。西路由宗弼率领，自云中（今山西大同）出发进攻太原，遭到太原军民顽强抵抗，被牵制在那里不能南下与东路军会合。东路军由斡离不率领，在宋降将郭药师的向导下，长驱南下，直扑北宋首都开封。赵宋王朝慌成一团，史称“朝廷震惧，不复议战守，惟日谋避狄之计”，意思是说根本不考虑如何迎敌，一心只想逃跑，以避开金人的猛攻。该年年底，金人更近汴京，平日贪于声色之娱的宋徽宗竟晕了过去，被大臣们用药灌醒。在性命与皇位难得兼顾的情况下，最后狠心舍弃后者，索来笔墨，抖抖索索地写下退位诏书，让位给太子赵恒，即宋钦宗，自己则带着一帮宠臣连夜逃往镇江避难去了。新即位的宋钦宗也几次想溜，均被坚决主张抗金的大臣李纲及汴京军民所阻拦。

此时岳飞在家已居丧四年。靖康元年（一一二六年），康王赵构奉朝廷之命，在相州设大元帅府，并派枢密副史刘浩在民间招募义勇兵，岳飞再次入伍。他以前剿匪及攻打燕京时的勇敢善战受到赵构的重视，遂命他去招讨流寇吉倩。吉倩早知岳飞的威名，哪敢抗拒为敌，遂率部众归降。赵构大喜，封岳飞为武训郎。

汴京告警时，赵构命岳飞随刘浩前往勤王，途中遇到金兵狙击，双方相持于滑台城（今河南滑县东）南。一日，岳飞率百余名骑兵在河上操练，只见前方烟尘起处，突然出现了大队来犯的金军，气势汹汹地逼了过来。敌众我寡，力量悬殊太大，宋兵不免大惊失色，策马就想逃跑，被处变不乱的岳飞拦住。他鼓舞士卒道：“金寇虽然众多，却不明白我们的情况，不敢贸然进攻。我们要是一逃跑，必然会被他们瞧出破绽，乘势掩杀，我们是很难生还的；不如乘他们立足未稳之际冲杀过去，乱中取胜。”言罢，跃马挥枪，大吼一声，率先突入敌群，众士卒紧随其后。有一个面貌凶猛的金将哇哇叫着扑向岳飞，挥刀便砍，岳飞用枪荡开，顺势向前扎去，正中金将心窝。金兵见状，吓得魂飞魄散。岳飞指挥宋兵，左冲右突，手中那杆丈八长矛蛟龙般飞舞，蹭着伤，挨着亡，杀得金兵人仰马翻，拼命逃奔。岳飞也乘胜收兵，归禀刘浩。刘浩大喜，表奏康王赵构，为岳飞请功，康王立即传下委任状，升岳飞为秉义郎。

靖康二年（一一二七年），金兵在占领汴京开封四个月后，俘获了徽、钦二帝后离去，北宋正式灭亡。宋朝旧臣拥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为帝，即高宗，建立南宋王朝。岳飞认为新主即位，当有一番作为，以树立自己的威信，就上了一封千言书，忠心耿耿地向高宗献计献策道：“陛下您现在做了皇帝，这是

国家社稷的大幸，是百姓子民的洪福。您胸有克敌制胜的谋略，又有各地赶来的勤王之师可供调遣，而金军正处在胜利的陶醉之中，骄惰懈怠，没有防备，这是天赐良机，陛下应当亲率六军，北渡黄河，收复失地。黄潜善、汪伯彦竭力倡议南逃避敌，终于酿成靖康之祸，是当今的卖国贼，陛下不可不提防！”这原出于一片忧国忧民的热忱，却不知正触犯了朝廷大忌，立即被斥责为越职言事，夺职遣回。在封建社会，不在其位而言其事，不管其动机动如何纯正无私，都算是狂妄犯上，绝不容许的。至尊无上的皇帝和一个中下级军官之间是不会有通信和对话自由的。岳飞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是他太忠诚耿直了，容不得他安分守己、世故圆滑。为此他屡遭打击，甚至最后献出了生命。

岳飞罢归不久，结识了河北招抚使司的干事赵九龄，很得赏识，遂被引荐给河北招抚使张所。张所是北宋著名的抗战派将领，当时受宰相李纲的委派，在河北一带招募民兵，积极组织抗金力量。他见岳飞身材魁梧，气宇轩昂，很是喜欢，抵掌而谈，非常投机。他问岳飞：“你武艺如何？能搏击多少敌人?”岳飞徐徐答道：“我很自信自己的武艺，但并不认为这匹夫之勇是多么了不得的事。用兵之道贵在施谋使计，而不在于逞凶斗狠。栾枝用曳柴诈欺之计大胜强楚，莫敖靠采樵诱敌之法击溃绞人之围，这些全靠的是智谋，而不是个人的武艺。”张所一听肃然起敬，赞叹道：“原来你并非一个武夫啊！不知你对当今形势有何看法？如何才能守住黄河呢?”岳飞侃侃谈道：“汴京的安危全看河北诸郡的巩固与否。我们当在所有险隘处建立要塞，互成依仗之势，如果任何一城受到威胁，其他城塞就会赶来相助，并且伺机骚扰敌人的后方，这样的话，敌人就不敢窥视黄河，京师也就安然无恙了。”

一席话说得张所心悦诚服，连连点头称是。岳飞见遇到了知己，不禁慨然请求道：“张招抚如果能提兵巡境的话，岳飞愿做前驱，供你调遣！”张所大喜，立即授岳飞武轻郎职，命他随已归顺的八字军领袖王彦北渡黄河，挺进新乡(今河南新乡)。

新乡有金人重兵驻守，见宋军渡河，就猛扑过来，想一举围歼之。王彦见状，心里害怕，传令停止前进，高筑壁垒，准备死守。岳飞几次请行，都被拒绝，不由气愤道：“我们本来就是找金寇打仗的，如今却畏敌不前！如果图安全的话，何不待在后方呢！”王彦也恼了，说：“你要送死的话，我可以让你去！”岳飞遂率领千余名士卒，迎着穷凶极恶的金军杀了过去。金军急忙分兵围截，竟被岳飞冲溃；金军又聚拢起来追堵，再次被岳飞突破，如此反复了好几次。岳飞一马当先，所向披靡。宋军士气大振，人人逞勇，个个发狠，竟一鼓作气攻下了新乡。

宋军攻占新乡，这等于孙猴钻进了牛魔王的肚子，金军自然不会善罢甘休。调集人马，蜂蚁般涌了过来，想把立足未稳的岳飞置于死地。两军在侯兆川(今河南辉县西北）相遇，展开激战。岳飞身上十余处受伤，仍在马上厮杀，士卒也拼命死战，终于击退数倍于自己的敌人。

当天晚上，宋军官兵未解铠甲，就枕着兵器睡着了，他们实在太累了，自

从与王彦分兵以来，他们一直与围追堵截的金军进行着战斗，已经好几天没有休息了，所以，战斗一结束，他们没吃饭，甚至连伤口也来不及包扎，倒头而睡。他们以为金军新败，一时半会儿不可能再来了。不料，在一个梦还未做完的时候，忽然传来警报，说大批金军来劫营，宋军士卒惊得睡意全消，跃身而起，陷入一片恐慌之中。他们全拥至岳飞帐前，想听他如何处置。岳飞没有出来，帐篷内传来有节奏的鼾声，宋兵们着急，责问帐前军吏："军情如此紧急，你们怎么不通知首领？"军吏哈哈一笑，道："首领有令，让大家回去安心睡觉，不必害怕，金寇不会来的！"宋兵疑惑地散开了，但谁也没敢再次睡去，抱着枪，守在备好鞍的战马旁。

其实，岳飞自己并未安然而卧，接到警报时，岳飞心里也很担心。宋军连续作战，已疲惫至极，对有备而来的金军，极难有获胜的希望。逃跑已经来不及，很快会被追杀，一番权衡后，岳飞决定冒险效法诸葛亮的空城计。金军连日来已被岳飞杀怕，见宋营一片寂静，怀疑其中有诈，怕中埋伏，就转身退走了。岳飞长吁了一口气，急忙传令拔营。

连日征战，岳飞粮草很快告罄，就到王彦营中求借。王彦对岳飞的频频告捷不仅不感到高兴，反倒觉得如芒刺在背。当初放岳飞出去，原来是让他去送死的，至少让他碰碰壁，受受金人的教训，然后回来老老实实受他的节制和管辖，不再与他的闭垒自守、畏敌如虎的政策作对，但岳飞却坚持了下来，胜仗一个接一个，这岂不等于向世人昭告他王彦的胆怯无能，他能不嫉恨吗？向他借粮草，能答应吗？于是，他冷冷地对岳飞说："粮草我有一些，但自己要用。你有本事独立行动，就没有本事搞到粮草吗？"岳飞忍住不快，说："王将军，我们都是为朝廷效命，当互相支持帮助，分什么你我？"王彦冷笑一声：说："这么说，你的功劳可以记在我的名下了？"竟拂袖而去。岳飞无奈，只好率领所部到了太行山一带，依靠当地民间抗金组织，与金军展开周旋，打了不少胜仗。在一次战斗中，岳飞擒获了强悍凶狠的金军大将拓跋耶乌，在另一次遭遇中，又刺杀了敌将黑风大王。但由于孤军作战，粮草不济，难以长久坚持下去，最后只得杀出重围。岳飞知道王彦必不容己，就投奔抗金名将宗泽而去。

岳飞与王彦分道扬镳，独立采取军事行动，按宋朝军律，是要处以死刑的。所以他到宗泽大营不久，就被五花大绑起来。在即将行刑之际，遇见宗泽视察刑场，岳飞朗声叫道："宗元帅难道不想恢复中原吗？"宗泽将脸一沉，喝道："胡说！本帅与金寇誓不共生，天下谁人不知？"岳飞道："宗元帅既要驱逐胡虏，为什么要杀堪做前驱的壮士？"宗泽对岳飞早有所知，今见他相貌英伟，出语俊爽，知道不是一般平庸之辈，就令刀下放人，邀到元帅府叙谈。用兵之道、恢复方略，凡所问及，岳飞总是侃侃而谈，持议精当，很合宗泽的心意。他认为岳飞算得上栋梁之才，堪当恢复大任。他已垂垂暮年，恢复振兴之事尚茫然无绪，朝廷中持和者济济，主战者寥寥，昏庸无能者居多，贤明干练者甚少，这些有时使他陷入绝望，见到岳飞，使他不免对前途又增强了信心。有这样的人在，大宋江山是不会轻易易主的。他拉住岳飞的手，连连赞道："你有勇

有谋，在抗金的事业中会大有作为的!"

当时正值金兵来犯，宗泽命岳飞率领五百名骑兵迎敌，借以亲自考察一下他的实际作战能力，看他是否属于纸上谈兵的马谡之流。岳飞果然不负所望，先战昨城（今河南汲县东南），再战黑龙潭，均获胜利。随后开赴汜水关（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镇）迎敌。该关地形险要，为东西交通咽喉，也是西路金军南侵的必经关口，战略意义非常重要，因此必须夺下并守住它！岳飞昼夜兼程，赶到关口，察看各处地形后，立即开始筹画分置。宋军兵少，粮草不足，面对数倍于己的金军，显然宜于速战速决，不宜于长久相持下去。于是，岳飞想出一条迷惑敌人、乱中取胜的计策。他选出二百名精悍的骑兵，命每人捆扎两束柴草，潜伏在前山脚下。他亲自率领所余士卒，开赴关口敌军营寨前。金军见宋军人少，不以为意，醉醺醺地进入梦乡，夜半时，岳飞一声号令，埋伏在山下的一起点燃柴两端，每人两束，两手各一，上下左右挥动起来，同时还擂鼓鸣号，吆喝呐喊。一时间，整个天空被火光照得通亮，遍山漫野回荡着喊杀声。金兵从梦中惊醒，以为宋军大部队赶到，一手提着裤子，一手倒拿兵器，慌慌张张就要逃跑，被岳飞迎面拦住，大声令道："放箭!"只听见一阵嗖嗖声，箭矢像雨点一样密密地倾泻过去，金兵顿时倒下一大片。岳飞翻身上马，平举着丈八长矛，大吼道："杀!"率先踏入金兵中，士卒随之拥上，展开肉搏。金兵不敢恋战，掉头就跑，正撞上举着火把赶来的伏兵，被猛杀一气，倒毙无数。

火光中，见一金将哇哇叫着，来回冲突，想要稳住金兵，进行反扑，宋兵被他的鬼头大刀砍翻了好多。岳飞看得真切，恼得性起，将枪挂在得胜钩上，从背上取下弓来，搭上利箭，舒展猿臂，"嘿"的一声扯个满月，略一瞄准，右手一松，只听"嗖"的一响，正中金将咽喉，顿时栽下马来。金兵更惊得失了魂一般，拼命冲开一个口子，逃向山下。岳飞也得胜回营，向宗泽禀报，宗泽大喜，认为岳飞果有大将之才，就破格提拔为统领，不久又升迁为统制。岳飞这下算是遇到了伯乐，政治抱负和军事才能有了全面施展的条件和机会。在此以前，他虽然屡建战功，因身轻位卑，始终得不到重视。

建炎二年（一一二八年）七月初一，抗金老将宗泽死于开封留守任上。他晚年将全部精力用于抗金复宋的事业上，却受到朝廷的百般阻挠，心力交瘁，憾恨而亡。

接替宗泽任开封留守的杜充，却是一位刚愎任性、嗜杀残忍的无能之辈，根本无力管束部下。集结在开封周围，原归宗泽节制的各路勤王之师，以及收编的忠义民兵很快陷于内争中，互相攻击。原统制王善、曹成、孔彦周等合兵五十万，攻打南薰门，想赶走杜充，占领开封。守门的仅有八百名士卒，见叛军来势汹汹，不免心惊肉跳，想弃城逃跑，岳飞挺身拦住，说："叛军是乌合之众，虽然人马多，没有什么害怕的。不信的话，我杀一阵给你们看看!"随即挺枪挟弓，跃马冲入敌阵，叛军知道岳飞的厉害，哪敢上前阻挡，竟被岳飞冲得四散。守兵见状，大为振奋，一起杀上，叛军不支，慌忙退去。岳飞乘胜追击，擒获叛将杜叔五、孙海、孙胜等。岳飞因平乱有功，被授为英州刺史。

杜充见部将分崩离析，城中粮食即将用尽，金兀术又虎视眈眈，时刻有侵吞之心，便决定放弃开封南逃。岳飞听说，急忙劝阻说：“开封为中原军事要地，关系重大，万万不可随意放弃。开封若失，中原必然陷于胡虏手中；中原不保，南宋可就危险了。他日若要收复，就远不如放弃容易了！愿杜统帅三思而后行啊！”杜充辩解说：“经此叛乱，开封守军元气大伤，兵少将寡，粮草又接济不上。朝廷逃难不暇，根本顾不上开封的守备，这样怎能长期坚持下去呢？提前撤走总比城破时突围要好吧！”岳飞见杜充执意要走，只好请求道：“您一定要走，就让我留下来吧！我向您保证，坚决守住城池，否则的话，提头去见你！”杜充哪会答应，脸色一黑，说：“我主意已定，你不要多言了！”言罢，拂袖离去，岳飞只好从命。这样，李纲和宗泽流血保卫过的开封城就被杜充随便抛弃了。

杜充丢失开封，朝廷非但没有治罪，反任命为枢密副使，并兼建康行营留守。建炎三年（一一二九年）秋，金军渡过淮河，取道滁州、和州，准备渡江后直趋浙江。杜充畏敌如虎，闭城不出。岳飞认为应当凭借长江天险，进行坚决阻击，决不能让金兵踏上岸来。如果让金军渡过长江，就很难阻挡其凶猛的进攻了。他几次进见杜充，陈述利害，请求赶快出兵，沿江布防，但杜充拒不答应。最后，岳飞竟急得流下泪来，哭谏道：“杜留守，赶快发兵吧，再拖延就有危险了！”杜充终不为所动，将岳飞斥退出去。不久即传来警报，说金军已在马家渡（今安徽马鞍山市北）轻松渡江，正势如破竹，向建康杀来。杜充这才慌了，草草派岳飞等人迎敌。这犹如用几筐土石去堵决堤的洪水，如何能起作用？王瓔尚未接战即闻风窜逃，都统制陈淬还没摆开阵势，就被势焰正炽的金军冲得东倒西歪，混战中，陈淬竟阵亡。只有岳飞挺枪跃马，奋力冲突，杀得金兵不敢上前，只能任他驰骋。无奈孤军奋战，寡不敌众，只得杀出重围，在险要处安营扎寨。

在岳飞浴血战斗时，胆小如鼠的杜充竟开城投降，南宋的长江防线彻底崩溃，金军乘胜南下，南趋临安。高宗丧魂落魄，逃到明州附近的海上。面对将帅叛逃、士卒溃散、金军席卷而来和百姓惶惶呼救的局面，岳飞心如刀绞。他将士卒集合起来，歃血盟誓道：“朝廷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血性男儿在国难当头，当以死报效国家，图个名垂青史，流芳百世。如果向胡虏投降，或者结伙为盗，纵然一时偷生，终会遗臭万年，大丈夫能这样行事吗？”听得将士们热血沸腾，表示愿意随岳飞血战到底。

不久，岳飞奉命驻军广德（今安徽广德），以牵制南下金军。在战斗的间隙，他抓紧时机进行休整。不断的行军和作战，将士极度疲劳，需要恢复体力。受损的建制需要恢复重建。随时入伍、仓猝上阵的士卒需要训练，尤其是减员的部队需要补充，岳飞真希望能有一年半载的时间，来对部队好好整编一番，以便能更好地体现他的军事意图。但这在烽烟四起的南宋时代是根本不可能的，岳飞只能见缝插针地进行他的整训计划。

主要是招募兵丁。岳飞的兵太少了，朝廷出于对武将拥兵专横的忌讳，不让岳飞拥有太多的军队，且常常釜底抽薪，借故抽调，就是后来成为南宋一员独当

一面的大将时，岳飞的总兵力也没能超过几万，这使他难以施展他全部的军事才能。他只能在不触犯禁忌的前提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招募一些兵丁。这是很难的，老百姓讨厌军人如同讨厌土匪。何况在战火连绵的年代，丁壮大多已被迫当了兵或土匪，剩漏的不是东躲便是西藏。岳飞，也包括当时大多数将领主要靠做“误入歧途”的人的工作来补充兵员了，即所谓的招降纳叛。但由此带来的问题也是很严重的，使军队原有的匪气更加变本加厉，这会很快腐蚀掉一支军队的战斗力，岳飞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不只招募，而且还进行严格的教育和管理，他绝不容许军纪涣散和侵扰百姓，稍有触犯，严惩不贷。有一句话在他的军队中非常流行：“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打掳！”这不是一句自我标榜、流于形式的口号，而是一条被严格执行着的诫律，岳飞自己也不例外。岳飞有个舅舅姚某，平时仗恃岳飞的声势，胡作非为、侵扰百姓。岳飞知道后，不便亲自责罚，就告诉母亲，让她出面致意。姚某大为恼火，认为岳飞狂妄，冒犯尊亲，就想伺机报复。一次与岳飞同行，至无人处，突然催马向前赶了几步，取下弓来，转身就射岳飞，慌张之下，射在马鞍上。岳飞大怒，飞马上前，将正要放第二箭的舅舅掀下马来，用佩刀一刀砍死。岳飞的这个举动在当时引起巨大回响，认为岳飞罚不避亲，为民除害，从而对岳飞更加敬畏起来。当然也有人认为岳飞过于绝情，就是深明大义、亲手在岳飞身上刺下“精忠报国”四字的岳母也一时想不通，对岳飞大行家法，让他跪在祖像前，怒声喝斥。但不久，她就慢慢想通了，原谅了儿子。不如此何以服众人呢？不服众人又怎能报国呢？

有过必罚外，岳飞还有功必赏，善待士卒。一个严冬的日子，岳飞的一个幕僚在军营巡视，发现一个士卒衣着单薄，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便上前问道：“你的上司是不是克扣了你的军饷？这样寒冷，难道没有怨言？”士卒却答道：“其他将领才经常克扣军饷，自从跟随岳宣抚以来，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他从未克扣我们一文钱，我之所以穿得单薄，是由于家累太重，所得军饷大半都接济了家人的缘故，我感激都来不及呢，哪能忘恩负义，抱怨岳宣抚呢？”

杨再兴原是一名流寇悍将，一次在两军对垒时杀死岳飞弟弟岳翻，后来杨再兴战败，自缚请罪。岳飞并不计较前嫌，亲自为他松绑，收为部将，任用不疑。杨再兴大为感动，发誓效忠，后来竟战死在小商桥。岳飞这种不计恩怨、待人以诚的作风，吸引了不少文人武士，纷纷慕名而来。其中有一个叫黄纵，替岳飞掌管机要文件。一次，岳飞分发沉香，待到黄纵时，只剩下一小块。岳飞见分得不均，打开一袋再分，到黄纵时又剩下一小块，岳飞一时不知所措。黄纵看在眼里，深为感动，表示大小无所谓。

在岳飞的大力整治下，他的军队变得纪律严明起来，很快赢得了老百姓的衷心拥护，他们亲切地称岳飞的军队为“岳家军”，以示与其它作风恶劣的军队的区别，他们甚至设立祠堂，绘上岳飞画像，经常进行供奉祭祀，祈祷岳家军尽早赶走金寇，恢复老百姓正常的生活。从此，他们不再一味地拒绝参军了，送子送夫者络绎不绝；也不再坚壁清野了，

箪食壶浆者随处可见；更不冷眼观战了，带路送情报者主动踊跃。

在紧张的整军、练兵中，岳飞不忘挤时间学习。他深知，若没有诸葛孔明之智谋以及淮阴侯韩信之武才，仅凭匹夫之勇是很难扭转当今危局，救民于水火的。这就需要向古代的圣贤学习，汲取他们的智慧。他喜欢读的仍然是《孙子兵法》，常置于身侧，有空即摩挲研习。与少年时的诵读不同的是，他现在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对书中那精奥的道理有更深的启悟。他经常将这些体会自觉地运用在具体的战斗中。当然，他并不盲目迷信、机械照搬。宗泽曾对此不以为然，批评他作战不依阵法，岳飞却自有他自己的见解，认为古人的阵法并不是万用不爽的灵丹妙药，不可固执迷信，应当根据具体的情况加以灵活运用。用兵的关键在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不可能每次都按部就班布好了阵，再与敌人厮杀，那样非吃败仗不可。用兵之道，全在于灵心一点，随机应变！宗泽被他说得心悦诚服，击掌称妙。宋代军队作战，都很按照皇帝事先“御制”的阵图进行。然而战场情况，千变万化，这在千里之外的皇帝怎能全部预知呢？所以宋军几乎是每战必败。岳飞作战，全靠灵活机动，所以每战必胜，攻必克，守必固，一生经历大小一百二十六次战斗，无一败绩，是历史上少有的常胜将军。史书称赞他有韩信、彭越、周勃等将之采，并兼有诸葛孔明之风，形成了一套有鲜明特色的战略战术思想。后代的小说家竟据此臆造一部《武穆遗书》，称之为岳飞的兵法著作，像“岳家枪谱”一样，使许多武林高手心驰神往，为这并不存在的、所谓可以称王称霸的法宝拼杀得你死我活。

经过短期的修整后，岳家军的战斗力得到更进一步的提高，于是，他们便四处寻找战机，打击金兵。不久传来情报说，有一大批金军将途经广德南下。岳飞闻讯后，紧急部署，在金军必经的险要处布下口袋，严阵以待。一段难熬的时间过去后，金军终于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前面的危险，他们一路就是这么满不在乎地走过来的，很少遇到宋军的全力抵抗，稍一接触，宋军就如鸟兽散了。但这次他们却遇到了一个可怕的对手——岳家军！看到他们已进入伏击圈，岳飞手中的号令旗一挥，只见伏兵骤起，滚木、山石从两侧山坡上冰雹般倾泻而下，金兵顿时倒下一大片。金军被这突然袭击搞得晕头转向，尚未定下神来又被一阵箭雨击毙无数。剩下的慌忙后撤，被一彪人马迎面拦住，骑马持枪冲在最前面的正是岳飞。他大吼一声，当先突入敌群，挥动丈八长矛，或扫或刺，金兵纷纷倒下。这时，两则的伏兵已逼了过来，将金兵铁桶一样围在山谷间，轮番冲突，金兵死伤无数，剩下的大多缴械投降，只有少数拼命杀出重围，落荒而逃。

这次伏击战沉重地打击了金军的嚣张气焰，使岳家军声威大振，只要一提及“岳爷爷”（金兵对岳飞敬畏的称呼）或岳家军，金人马上就心惊肉跳，他们再也不敢随意行动了，扎下营来，想等后面的大部队上来后一起围剿岳飞。岳飞探得敌将王权的部下多是签军（被金人强行征集的汉兵，军心涣散，战斗力比较弱）就决定先吃掉他们。一次，有一百名签军出来打劫，遭宋兵追杀，擒获四十余名，押赴岳飞营帐。这些俘虏

估计难逃活命，个个心惊肉跳。岳飞沉着脸道："你们也是汉人，却为虎作伥，帮金虏屠杀同胞，本该斩首……"说到这，岳飞有意停顿了一下。签兵吓得魂飞魄散，跪下磕头说："岳爷爷饶命！岳爷爷饶命！"岳飞说："饶命不难，就看你愿不愿意改邪归正，戴罪立功？"签军们连忙道："愿意为岳爷爷效劳，请岳爷爷吩咐吧！"岳飞说："要你们做的并不难。请你们回去做内应，帮我们攻取王权营寨，怎么样？"签军们连忙答应。岳飞遂与他们约好具体行动的时间和方式，然后就放他们回去了。当天晚上半夜时，这些签军突然放起火，并大声喊："岳爷爷来了！"敌营寨就像炸了锅一样，陷于极端慌乱中，敌人衣服也没有穿好，就倒拿武器跑出营帐。王权竭力想稳住慌乱的士卒，但无济于事。早已埋伏在外的岳家军一拥而上，冲入营寨内，一边乱砍，一边喊降。签军本是被胁迫而来，心里对金人有怨，哪肯为他们卖命，所以几乎未加抵抗就放下了武器。王权见状，就想乘乱逃走，被岳飞赶上，一把掀下马来，被拥上的士卒擒获。

岳飞广德大捷后，本想南下勤王，只因粮草短缺，不便远行，只好移军牛头山，等待金兀术撤退。金兀术因遭南宋军民的英勇抵抗，不得已放弃追袭赵构的计划，声称"搜山检海"已毕，开始率部北撤，遭南宋名将韩世忠截击，金山寺一役，几乎被擒，慌张中逃入死港黄天荡。后掘开老鹳河故道，方得逃出，往牛头山急急奔来，他庆幸自己不该绝，已摆脱死亡的威胁。正当他得意时，突然鼓角齐鸣，从树丛中和乱石后跃出大队人马，杀奔过来。冲在最前面的那位大将，挺着一杆丈八金枪，盘旋飞舞，如同神出鬼没，无人可挡。金兀术已被韩世忠挫了锐气，又遭这当头一棒，立即晕头转向，无心恋战，忙策马返奔，一口气跑了二三十里，看并无追兵，这才停了下来，问部将道："刚才那位大员是谁？如此厉害！"有一随卒脱口答道："是岳爷爷！"金兀术叹道："原来是岳飞，果然名不虚传！"此时已是傍晚，暮色渐浓，金兀术传令扎营。他怕岳飞夜来袭击，就留下一部分士卒留心巡逻防守，自己也不敢安然入寝，至夜静更阑时，方朦胧睡去。忽然梦中被一阵震耳欲聋的鼓角声惊醒，紧接着一名小校来报："岳家军来了！"金兀术慌忙操剑冲出帐篷外，只见大营中四处起火，杀声不断。兀术声嘶力竭，挥舞着剑喊道："不要乱，不要乱！给我杀退岳飞！"但被死神惊醒的金兵怎能镇定下来，有效地组织防卫呢？他们已经被接踵而至的灾难搞得神经质了，以为到处都是想置自己于死地的敌人，尤其面对难辨的夜间，他们向自己认定的"敌人"冲杀着，捍卫着自己的性命；对方同样认真严肃地还击着。天色渐渐亮了，金军渐渐地感到了荒唐；怎么对手和自己一样的打扮、一样的身容、一样的语音？他们突然醒悟了，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己人和自己人玩了一晚上的命！岳爷爷确实厉害，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金兵自相残杀累了，刚养足了精神、等得不耐烦的岳家军又杀了上来。金兀术情知不敌，策马就跑，金兵也跟着奔溃，怎奈岳家军尾追不舍，慢一步的，都做了刀下鬼、马下魂，只有那些脚生得长、腿跑的快的人侥幸脱网，跟着兀

术逃到龙湾（今南京城区西北），准备进驻建康。行军到静女镇（今江苏江宁西北静安附近）时，远远看见旌旗招展，中间大写着“岳”字，兀术大惊，连忙退兵。兵还没退位，已听见连珠炮响，岳飞领着大队人马杀了过来，冲进敌群，一阵猛杀，金兵死伤众多，十五里长的路上积满了尸体，余下的马不停蹄地逃往淮西。岳飞乘胜收复了建康，消息传到朝廷，刚从海中爬出的高宗兴奋了起来，当即下旨，任岳飞为通泰镇抚使。

自从金军南侵，骚扰中原，兵民困苦流离，啸聚为盗，劫掠乡里，有些甚至投降金人，为虎作伥。因此岳飞在抗金的同时，也参加了一次次剿抚内乱的军事行动。

绍兴元年（一一三一年），高宗授张浚为江淮招讨使，岳飞为副，前往讨伐李成。李成原为江东捉杀使，强盗未曾捉拿住几个，自己却于建炎二年落草为寇，叛据宿州，后为刘光世所破，窜迹于江、淮、湖、湘间，横行十数郡，势力滚雪球般膨胀起来。张浚接到任命后，本想与岳飞一起进军，见情势危急，于是提前出发，驰入洪州。李成部将马进领着几倍的兵马，将洪州团团围住。张浚命令高挂免战牌，任马进百般辱骂，就是不出城迎战。这样相持了十几天后，岳飞领兵赶到，杀开重围，到了城内，见到了张浚，张浚大喜，问岳飞如何破敌。岳飞答道：“我认为现在可以出战了！”张浚说：“我们二军合在一处，也没有马进人多，如何获胜？”岳飞说：“马进虽然人多，一心只顾尽早拿下洪州，却没有考虑身后危险。如果我们派一支人马潜入敌营，沿江而上，抢占生米渡（今江西新建县西南），截住退路，再用重兵攻其背后，这样一定能破马进。”张浚连连点头称善。岳飞请求做先锋，张浚大喜，命岳飞率领所部掩击敌人营寨，又派杨沂中领精兵，趁暮色缒出城外，直趋生米渡。

岳飞披甲上马，奔赴西山，逼近敌人营寨。马进自兵围洪州以来，连日骂阵挑战，张浚总是不应，还以为是胆怯，反倒定下心来，纵酒作乐，想让城中粮草断绝，不战自乱。这天，他正在帐中搂着抢来的美人，饮酒听歌，已经醉醺醺的了，忽然听兵卒士来报，说官兵从背后来劫营，不由得大吃一惊，酒也全醒了，推开美人，操起大刀就往外走，一面命令属将召集喽啰，前往抵挡。还未站稳脚跟，岳家军已到了眼前，迎风猎猎的“岳”字旗帜下，正是岳飞。他用枪指着马进，喝道：“反贼，还不赶快下马投降！”马进仰天哈哈一笑，道：“都说岳飞厉害，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三只眼的马王爷！”说到这，他猛挥一下大刀，嚎道：“弟兄们，给我上！”直奔岳飞。岳飞命令飞箭，只听一片嗖嗖声，蝗虫一样的箭头泻向敌群，贼众立时倒下无数。岳飞又令：“出击！”言未毕，他自己已跃马趋出几丈，挺枪刺向马进，马进忙用刀招架。几个回合过去，马进已气喘吁吁，手忙脚乱，情知刚才的玩笑开大了，吹出的牛皮挡不住岳飞的掌中枪，于是虚晃一招，拖刀就逃。岳飞麾众掩杀，只见得人仰马翻，血飞尸积，不到一时，就将整个营盘扫荡得干干净净。马进逃到筠州（今江西高安），岳飞一路紧追而来，在城东扎下营寨。他知道马进已吓破了魂儿，不敢开城迎战，就想出一个法儿，让人赶做

了一面红色绫罗旗帜，上面绣着一个“岳”字，让精心挑选出来的二百余名骑兵举着巡逻，自己则率主力埋伏在城角。马进正在城墙上视察，看见这队人马，数目不多，并没有岳飞本人，却打着“岳”字旗号招摇，莫非欺负我马进不成？岳飞本人固然英雄，手下的难道也个个无敌？念及至此，羞辱感涌上心头，叫一声：“待我捉住这帮杂种！”就令放下吊桥，引着兵卒，鼓噪而出。骑兵见马进出城，略战几个回合，佯装不支，倒拖着旗帜就跑。马进不知好歹，策马便追。转过城角，突然身后一声炮响，伏兵骤起。马进回头一看，只见岳飞正围了上来，被追的宋兵也返身杀回。马进大惊失色，几乎从马上栽下来。他已领略过岳飞的手段，哪敢再战？又因退路被阻，只得弃城东逃。岳飞尾追不放，并让士卒大呼：“不愿随贼的，请赶快坐下，我不杀你们！”匪众听见，大半多扔掉兵器，抱着头原地坐下。按着名册清点，共有八万多人。岳飞好言劝诫一番后，各随其志愿，或发给路费盘缠，遣返家乡，或整编入伍，效命朝廷。

马进残余逃往南康（今江西星子），岳飞继续追赶，到朱家山，赶上马进的后卫部队，展开拼杀，挑死贼目赵万成。李成听到马进兵败的消息后，亲自率领十余万兵马赶来相救，与岳飞相遇楼子庄。岳飞丝毫没有畏惧，舞动着长枪，迎头乱刺，霎时间戳倒了数十名匪兵。匪兵从未遇到过这么凶猛的将领，魂飞魄散，向后退去，却与继续蜂拥而来的匪兵冲撞一起，互相践踏，乱作一团。岳飞乘势杀上，匪众倒毙无数。李成见状，挥刀杀上，正撞着岳飞。几个回合过去，李成已出了一身臭汗，手软眼花，眼看着要败退下来，突然旁边闪出一骑，挥刀而上，与李成双战岳飞。岳飞沉着应战，一枝长枪在手，左挑右拨，上撩下劈，三马盘旋片时，就将来骑刺于马下。这人便是马进。李成心惊，虚晃一枪，返身就逃，又遭赶上的张浚和杨沂中的截杀，十万多兵马，或伤或亡或逃，最后只剩下三五千人，逃奔蕲州，投奔刘豫伪齐政权。

李成已破，又有张用自襄、汉东下，被岳飞探悉。张用与岳飞同乡，绰号“张莽荡”，其妻绰号“一丈青”，均武艺高强。岳飞致信张用，晓谕道：“我与你有同乡之谊，故在动兵前告知你。你若想战，就速请出兵；如果不愿迎战，就赶快受降！”张用阅信，知岳飞不可敌，表示愿意接受招安。岳飞亲往抚慰，张用等甚感其义。自此，江淮一带归于平安。张浚表奏岳飞战功应属第一，高宗下旨升岳飞为右军都统制，令屯洪州，弹压余盗。

绍兴二年（一一三二年），流寇曹成拥众十万，自江西向湘、湖侵扰而来，占据了道州和贺州（两州在今湖南、广西两省交界处），朝廷命岳飞剿抚。曹成听说岳飞将至，大惊道：“岳家军来了！”连忙分道而逃，岳飞到达茶陵，派使赴曹营招降，被拒绝。岳飞上表朝廷道：“对付盗寇，朝廷连年多用招安办法，所以强盗势力强盛时就肆虐不从，势力弱小就受降，时降时反。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盗贼蜂起，一时就难以剪除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加强打击的力度。朝廷同意了岳飞的请求。

岳飞遂起大军，开进贺州境内。一次，士卒捕获一名曹成的奸细，捆在岳

飞帐外，听候审讯，岳飞一面算计着军中的粮草，一面踱出帐外，一位军吏走过来请示道："岳都统，军中粮草即将用完，怎么办呢?"岳飞正要回答，一眼瞥见奸细，灵机一动，顺口答道："只好退回茶陵再说了。"言毕，好像突然才发现奸细似的，露出失言后的慌张表情，跺了一下脚，返身进入帐内。随即暗中嘱咐士卒，装作大意，放跑了奸细。奸细跑回曹营，将轻易获得的军事机密情报告诉曹成。曹成喜出望外，认为这是天赐良机，让他报岳飞一箭之仇。当年南薰门之乱时，他曾让岳飞杀得大败，几乎丧了命，至今让他想起来恨恨不平。他传令属下养精蓄锐，准备在岳飞退兵时从后掩杀。

岳飞放跑奸细后，半夜传令，让官兵在被窝草草吃饭，打点轻装，悄悄向逘岭进发。拂晓时已到达太平场（今广西贺县东），曹成尚在浓浓的睡梦中，一点也没有料到即将临头的大祸。突然，他被叫醒，说岳飞杀来了。曹成以为还在梦中，他不能相信！白天还在贺州准备撤兵，晚上怎么可能到了自己跟前！难道他是天兵下降！但他很快明白，岳飞确实来了。整个营寨火光四起，杀声震天。他比较聪明，知道抵抗是死路一条，三十六计，早早溜走是上策。于是带着残兵败将。逃往北藏岭和上梧关（均为贺县北山区中的要隘），想依险顽抗。岳飞没有让曹成喘息，组成敢死队，乘胜发起攻击。士卒人人争先，个个逞狠，一鼓作气，连克两寨。但狡猾的曹成再度逃脱，纠合所有部众约十万，死守蓬头岭。岳飞当时只有八千人马，但他最善于以少击多，加上连连获胜，将士士气正高。曹成在岳飞痛击下，军气沮丧，了无斗志，人数虽十倍于岳飞，却如同一盘散沙，一击即溃。所以在岳飞的猛攻下，蓬头岭很快被占。曹成如丧家之犬，逃往连州（今广东连县）后向宋军投降。

此次征剿曹成，正值盛夏酷暑，又在岭南瘴疠之地，由于岳飞行措有方，士卒竟无一人死于疾病，算得上军事史上的奇迹。高宗听说，很是叹赏，遂授岳飞武安军承宣使的荣誉军衔。

绍兴三年（一一三三年）春，高宗召岳飞回临安，以加强京师的保卫工作。江西宣谕刘大中急忙上书说："岳飞的队伍军纪严明，深受人们爱戴，奉为他们的保护者。如果一旦被调离此地，盗寇恐怕又会蔓延开来。"高宗便取消了这个决定。不久，江西、广东一带爆发了陈颙、彭友等领导的农民起义，高宗遂命岳飞往讨。岳飞接到命令后，立即调遣兵将，赶到虔州（今江西赣州市）。彭友率众迎敌，战不几合，被岳飞于马上生擒，其残部逃至固石洞。该洞形势险峻，四周环水，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至。岳飞一面在山下陈列重兵，严阵以待，一面遣敢死战士疾速上山歼敌。彭友残部因失去首领，军心立即涣散。见岳飞部队来进攻，不战自溃，蜂拥下山，被岳飞迎面截住，一阵猛杀。残敌连呼饶命，全部向岳飞投降。不久，岳飞又平定了其他几支农民起义军，因战功卓著，岳飞受到高宗的召见。高宗亲手写了"精忠岳飞"四字，制作了一面锦旗送给岳飞，并授镇南军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等职。从此，岳飞成了统御一区的南宋大将了。

襄阳六郡包括唐州（州治在今河南唐河）、邓州（州治在今河南邓县）、随

州（今湖北随县）、郢州（州治在今湖北钟祥）、信阳军（军治在今河南信阳）及襄阳府（今湖北襄樊），均地处长江中游地区，军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受到岳飞的高度重视，他多次向高宗上书，陈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襄阳上流，与吴、蜀襟带相连，如果我们得到了它，进可以紧逼金寇，退可保卫东南。"他强调："襄阳六郡，地势非常险要，要想恢复中原，必要以此为基地。作为朝廷武臣，岳飞早已厉兵秣马，准备着有朝一日挥师北上，报效陛下。恳望陛下圣明早断，下令实施我的计划。这样的话，上游地区不仅可以得到平定，整个大宋王朝也可望逐步得到振兴，这实在是关乎国家兴衰危亡的大事！"岳飞的这些愿望和战略计划，是建立在深思熟虑和精忠报国的基础上的，是切实可行的。襄阳地处长江中游，越过汉水即可深入宛、洛地区袭扰金军后方，如果宋军的守淮部队能从东西加以策应，金军即可陷入首尾不得兼顾的境地，但岳飞的建议始终未被采纳。

绍兴四年（一一三四年），被金人扶持的伪齐政权遣李成袭取襄阳六郡，直接威胁到长江上游，并且将随时祸及两浙地区。岳飞见情势危急，再次上书朝廷，说："襄阳六郡为恢复中原基本，万不可失；为今之计，应当尽早攻取六郡，以除朝廷心腹之害！"高宗这才心动，与丞相赵鼎商量。赵鼎推许岳飞说："岳飞是当今少有的智勇双全的大将，屡建奇功。他对长江中上游的地理形势，以及敌我双方的情况了解得非常详细，收复襄阳六郡，没有比岳飞更合适的了。"高宗于是命岳飞为荆南（今湖南长沙）、鄂州（今湖北武昌）及岳州（今湖南岳阳）制置使，率军克复襄阳。

岳飞接到诏命后，立即发兵渡江。只见万帆竞发，浩浩荡荡，气势非常雄壮。岳飞迎风站在船首，心潮如脚下的长江水，翻腾激荡，久久不能平定，他终于向收复大业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这是他从军以来就一直萦绕在心头的愿望，就是在金军步步紧逼，宋军闻风窜逃，朝野上下笼罩在亡国灭家的绝望中时，他也没有放弃这种信念，他坚信，只要皇帝能卧薪尝胆，文臣只要能不爱钱，武将只要能不惜死，上下一心，坚持抗战，就一定能赶走胡虏、光复大宋河山的！现在，他总算说动了东躲西藏、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向金人求和上的皇帝，使自己得以兴师出征，夺取襄阳六郡，以营建北伐基地！他也明白，这仅仅是一场短短的序曲，全面反攻的大幕能否最后被捉摸不透、疲弱无力的皇帝拉开，现在还是很难说的。但激昂的民族义愤使岳飞不可能也不愿意因悲观而懈怠自己的行动，只要自己努力争取，一切都会改观的！想到这，岳飞心潮澎湃，猛地拔出剑来，向船舷击去，向身旁的幕僚慨然说道："岳飞此次渡江，如果不擒杀金人刘豫，誓不返渡！"众僚属被岳飞的情绪所感染，纷纷表示愿随岳飞浴血奋战。

渡过长江，岳飞率军赶到郢州城下。郢州已为刘豫占有，派部将京超守卫。京超凶猛有力，被人称作"万人敌"。他见岳飞兵临城下，并不以为意，大咧咧地登上城墙。一位部属提醒他应加紧防备才是，京超哈哈一笑，骄横地说："人人都说岳飞厉害，今天京超我倒要看看他是否三头六臂！"说到这，又冲

着城下狂喊道："岳飞小儿，有种的上城来，你京爷爷等着你玩几招！"岳飞闻言大怒，立即命敢死队攻城，说："谁先登上城墙，有重赏，畏缩后退者定斩不饶！"抱了必死决心的勇士一声呐喊，抬着云梯，挥着大刀，争先恐后地涌上前去。京超指挥兵士拼命抵抗，放箭、扔滚木、掀梯子，使宋兵的第一次攻击受挫。岳飞稍事调整，增强了兵力，很快又发起了更为猛烈的第二次进攻。他命令弓箭手用密集的箭压制城墙上的敌军，自己亲自带领敢死战士登城。京超由于轻敌，未做充分的防守准备，箭头、滚木和石块很快用光，而宋兵的攻势一次比一次更凶猛，渐渐地，京超支持不住了，宋兵已由好几处攻上城墙，与伪兵展开激烈的肉搏战。不久，城墙即被占领，城门被打开，宋军如潮水般涌来。京超连砍几名逃兵，也没能阻止住溃败的士卒。他觉得大势已去，心里不由恐慌起来，也顾及不到刚才说出的大话了，策马就跑。岳飞派牛皋等将在后面紧追不舍。京超觉得生逃无望，又不愿投降受辱，便纵马跳下悬崖。郢州遂被收复。

由于饱受频繁的战祸，郢州人起初对岳飞的到来心有疑惧，于是，他严厉地重申军纪，绝不容许有扰民侵民的行为发生。他还四处张贴安民告示，消除人们的疑惧心理，激发人们的抗金热情，并大开粮仓，赈济饥民。这一切措施很快赢得了人们的好感。这一切做好之后，岳飞留下一部分士卒镇守郢州，其余的兵分两路，一路由张宪、徐庆带领，直趋随州；另一路由岳飞自己亲自带领，扑向襄阳。襄阳由李成亲自镇守，闻说岳飞到来，早早摆好阵势等候，希望能报前日之辱。自从投靠金人以来，他觉得腰杆硬朗了许多，他现在不再是一个东游西荡的流寇了，而摇身变成了准金人了。岳飞能战胜金人的追随者吗？所以，当他看见岳飞，不禁自负狂傲地说："岳飞，你识得我的阵法吗？"岳飞看了一眼，哈哈大笑，说："李成叛贼，上次败逃后，我以为你能多少长进一点，不料更加混蛋！从古至今，你见谁曾将骑兵安排在险峻的地方，相反却将步兵安排在平旷之地？难道你投降金人后，马变得善于在水中行走，你竟将它们排列在襄江岸边？你的步兵也变得行走如飞，敢在平旷之地和我的战马赛跑？这样最简单的军事常识都不懂，还与我谈什么阵法？"李成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地说："岳飞小儿，休要口出狂言，有能耐就破我的阵吧！"岳飞道："你这小孩玩的把戏，就是再增加十万人马，也用不着我亲自出马！"言罢，他在马上用鞭指着骁将王贵道："你带长枪队去破敌人的骑兵！"又指着另一程咬金式的大将道："你带骑兵去冲击敌人的步兵！"二将接到指令后，立即分头行动。牛皋率先突入李成的步兵队中，马踏刀砍，锐不可挡，风卷残云般，霎时使金兵倒下一大片，剩下的四处奔散，互相践踏，又毙伤无数，平旷地上的步兵阵很快就被击溃。王贵同时也向敌骑兵阵发起进攻，他们专用长枪刺敌人的马，马一中枪立即倒地，背上的骑兵纷纷跌落，不是栽得头破血流，便是被杀或被擒。敌骑几次想组织反扑，因岸边崎岖不平，草树丛生，马无法奔跑，且经常自己绊倒，将背上的骑兵甩出好远，哭爹喊娘，王贵的长枪队大显神威，跳跃腾挪，越战越勇，步步紧逼，敌骑连连

败退，慌忙中不少连人带马跌入襄江，被汹涌的水流卷走。李成没有想到自己苦心经营的战阵这么快就被击垮，不由大恸。他彻底服输了，乘着夜色，带着几百名贴身亲随，狼狈逃走了。岳飞追赶不及，就整肃军容，浩浩荡荡地开进了襄阳城。不久，张宪、徐庆也传来消息，报告说随州已被攻占。

刘豫的部将成益驻守新野，收集各路残兵败将，准备负隅顽抗。岳飞在襄阳略事休整后，即派王贵攻打唐州和郢州，张宪攻信阳军，自己率部将王万，分左右两翼，包抄新野。伪齐兵已知道岳家军的厉害，远远望见"岳"字旗号，就吓得魂飞魄散，稍一接战，即溃不成军，岳飞大获全胜。王贵、张宪等将也传来捷报，说唐州、邓州、信阳等也次第收复。至此，襄阳六郡全部平定。

岳飞按预定计划收复失地，为南宋建立以来，第一次超出朝廷君臣的意料。他们一向听惯了败兵失地的消息，因沮丧而麻木的心不免激活了一下。他们称赞岳飞"机权果达，谋成而动则有功；威信着明，师行而耕者不变。久宣劳于边圉，实捍难于邦家"。升岳飞为靖远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节度使。岳飞上书朝廷道："金人所爱惟子女金帛，志已骄惰；刘豫潜伪，人心终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万，直捣中原，恢复故疆，诚易为也。襄阳、随、郢地皆膏腴，苟行营田，其利为厚。臣候粮足，即过江北剿戮敌兵。"就是说要加紧襄阳等地抗金基地的建设，随时准备北伐。

收复襄阳不久，朝廷就紧急调遣岳飞入洞庭湖剿抚杨幺。

杨幺原名杨太，曾与钟相一起领导了洞庭湖农民大起义。起义发生在建炎四年（一一三〇年），建立了大楚政权，改元天载，以"等贵贱，均贫富"相号召。起义军攻打城池，屡败官兵，很快蔓延十九个县。一次，钟相遭到官兵袭击，被俘后不久遇害，杨幺逃过了这次灾难，收集起旧部，占据了龙阳，势力又壮大起来。朝廷派王𤫩去征讨，被打得大败而逃。朝廷只好派岳飞代王𤫩招捕杨幺，封他为武昌郡开国侯，兼清远军节度使。岳飞部下多为北方人，不习水战，听说往洞庭征招杨幺，众将士多有疑惧之色，岳飞鼓励说："杨幺盘踞洞庭湖，出没水中，人们都觉得他厉害，不敢去征讨。其实，用兵打仗主要看将帅如何谋略与指挥，哪分什么水陆！如果运兵得法，陆战可以胜利，水战同样可以胜利。破杨么我自有良策，大家不用担忧，只需听我命令，齐心协心，看他杨幺能钻到水底去！"众将士随岳飞征战多年，知道岳飞不是说大话吹牛皮，便都放下心来，打起了精神。

岳飞虽然给部下打气鼓励，其实他自己心里非常清楚，如果用自己的步兵去与杨幺的水兵硬拼，结果不会与王𤫩两样。以己所短击敌所长，这是兵家最忌讳的事，他还不会狂妄到一切不顾的地步。军情紧急，展开水上军训或临时招募水师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它可以使那些平庸将领望而却步，但这却难不倒岳飞。敌人并不是铁板一块，熙熙攘攘为名利而聚集的人不会是没有的，只要喻之以利害，肯定会有人弃而投我，甘为前驱的，这样不就克服了我们的弱点吗？于是，岳飞将部队调配停当以后，立即派遣使者分头去招降杨幺属党。不久，即传来消息，说杨幺的心腹僚属黄佐愿意接受招安。

岳飞大喜，说：“黄佐深受杨幺器重，要是他能来降，破杨幺还有什么可说的！”他打算亲自前往招抚，牛皋、张宪等连忙劝阻说：“黄佐为杨幺心腹，为什么会降顺？恐怕其中有诈，不得不防！”岳飞笑着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是能收得黄佐，破杨幺就成功了一半了，否则的话，我只能用我的陆军来攻击水寇了，那不是自投湖水吗？”他不由分说，由送信的带路，自己一人，骑着马出了营，去见黄佐。到了黄佐营寨前，让送信的去报知黄佐，说岳飞前来。黄佐问送信的：“岳飞带来多少兵马？”送信的说：“就岳飞本人。”黄佐召集部将商讨道：“岳飞号令如山，威震中外，要是与他为敌，是万万不能生还的。再说杨幺专断残暴，在他手下从事随时都有可能被火并，因此，我反复考虑，认为接受招安最是上策，现在岳飞一人而来，可见他是值得依赖的诚实君子，不是欺诈阴险的小人，要是向他归顺，必会受到他的善待。我看我们还是打开寨门迎他进来吧！”部下大多表示同意，少数几位有异议的也不敢公开反对，于是黄佐率众到寨门，恭迎岳飞。岳飞赶快下马上前用手抚着黄佐的背，宽慰他说：“你能深明大义，迷途知返，这是非常明智的抉择，值得嘉赏。今后要是能立功，封爵荫子也是很容易的事！”黄佐深表感谢，并将部众一一介绍给岳飞。岳飞温言劝勉，众人心悦诚服，表示愿意听岳飞调遣。岳飞见已打动黄佐等人，进而说道：“你们本是大宋臣民，外敌当前，本当共同御侮才是，怎能随杨幺反兴内乱呢？这不是帮金人灭我中国吗？我此番前来，是要宣明大义，使你们能革面洗心，同卫王室，剿除异族。”黄佐等人连忙说：“我们知罪，愿意戴罪立功！”岳飞点点头，说：“我打算派你们到湖中各水寨，向众人传达我的意思，劝说他们归降，谁如果有才能，一定向朝廷保荐，绝不计前嫌。对那些顽固不化、不听劝降的，可设法擒杀。”黄佐等纷纷表示愿意从命，岳飞遂与黄佐握手为约，当即返回军营，加紧水上训练，等候黄佐的消息。

这时，张浚赶到潭州视察军情。听到岳飞的情况后，他的幕府参谋席益误以为岳飞有意纵寇为患，怂恿张浚向朝廷反映。张浚深知岳飞，不以为然地说：“岳飞忠孝兼全，天下闻名，哪能做非法之事？如此用兵，自有他的打算，旁人哪能知道呢？”席益自觉惭愧，退了出去。隔了数天，传来消息，说黄佐已攻破杨幺部将周伦水寨，斩杀了周伦本人，并生擒手下头目多人。岳飞立即向朝廷申报黄佐战功，保奏为武功大夫，朝廷准奏，下诏褒奖。岳飞同时去见张浚，通报军情，并请求道：“前统制任士安不服王𤩽命令，导致失败，应该申明军律，予以惩罚。”张浚点首示意，说：“就照你说的办吧！”岳飞又与张浚密语数句，张浚大喜。岳飞起身告别，回到军营，传来任士安，列举其罪状，令鞭打三十，并喝道：“限你三天破贼，要是到期无功的话，定斩不饶！”任士安谢过不杀之恩，退出帐外，自率部下开入洞庭湖，扬言岳家军二十万随时可至。杨幺自恃险要，并不将官兵放在眼里，曾狂妄地说：“官兵从陆地上来，我就入湖；从湖上来，我就登岸。要想破我，除非岳飞亲自来。”他见任士安来，并不在意，调拨了几艘战船，出去迎敌。任士安本来畏敌如虎，但想起岳

飞森严的军令，知道半步也退不得，只得硬着头皮，拼命向前杀去。正在酣斗间，突然左右两面响起一片喊杀声，岳家军真地杀到，杨幺兵卒大乱。任士安喜出望外，趁势杀出，与援兵会合一起，痛剿一阵，击沉敌舟好几艘，敌兵溺毙者无数。

原来，岳飞并不是狠心将任士安赶往虎口，借刀杀人，而是有意断绝其后路，置之于“死地”之中，让他得以死命缠住敌人，以便大部队分兵包抄敌人。

时值金军可能入侵的秋季，朝廷召张浚回京准备防守事宜。岳飞闻讯，急忙拿着破杨幺草图去见张浚。张浚知道他的来意，没等他开口就道：“来年再议破贼的事吧！”岳飞说：“您此时千万不可离开，否则的话就会前功尽弃，来年又要花费许多精力！”张浚道：“这我知道，可金人入侵也不能不防啊！”岳飞说：“并不妨碍您的大事，只需要您稍留片刻，不出八天时间，我便可破贼！”张浚不信，说：“哪会这样容易？”岳飞扬一扬草图说：“这是黄佐献来的洞庭形势及杨幺守御地图，非常详细，按图行动，不出十天，一定会荡平贼窝。”张浚又以为官兵不习水战，如何能迅速取胜？岳飞胸有成竹地答道：“王𤫉用官兵攻水寇，自然难以取胜，但要是用水寇攻水寇，就转难为易了。水战为我军所短，而为敌方所长，以所短攻所长，怎能不难呢？如果我们能分化瓦解水寇，为我所用，使它们自相离异攻击，然后我军趁机发兵，一鼓作气，一定会全歼敌人。八天之内，您会听到捷报的！”张浚沉吟半晌，说：“既然如此，我就答应你，暂留八日，八日后恕不相陪了。”

岳飞于是发兵到了鼎州（今湖南常德市）正逢黄佐求见，禀报岳飞道：“杨幺弟杨钦愿归降，特来求见。”岳飞大喜，说：“杨钦为杨幺一员悍将，现在来降，大事成了，快去宣他进来。”黄佐遂引杨钦进帐。杨钦跪禀道：“杨钦久慕元帅大名，希望能为您效劳，只是害怕族兄杨幺知道，祸及全家，所以不敢举动，现在武功大夫黄佐，屡次向我盛赞您宽怀大度，不咎既往，所以我冒昧登门谢罪，万望元帅宽恕！”岳飞连忙上前，扶起杨钦，安慰说：“你能弃暗投明，理应赦免前嫌，我还要特别向朝廷保举你为武义大夫。你可再回湖中，招降同伙，到时还要按功加赏。”杨钦受宠若惊，欢天喜地地走了。

过了两天，杨钦兴匆匆地领着余瑞、刘诜等人来降，以为会受到岳飞的嘉赏。不料岳飞面带怒容，将惊堂木猛地一拍，厉声喝道：“我叫你招降所有同伙，为何只领这两三人回来？”杨钦愣住了，刚想表白，岳飞又将惊堂木一拍：“少说废话！拖下去打五十军棍！”顿时被几位军吏七手八脚牵了出去，掀翻在地打了五十军棍。杨钦连声呼冤，帐内又传出号令，令将杨钦赶往湖中，令他再往招抚。杨钦没想到岳飞竟这么混帐，赏罚不明，悔不该听从黄佐的诱惑，前来投降，好处还没有捞到一星半点，却劈头盖脑地受了一顿羞辱，罢了，还是过自己的水寇生涯得了，杨幺一人之下，数万喽啰之上，何等威风！于是，他气恨恨地返回，想伺机袭扰岳飞，以解心头之恨。时值傍晚，湖面上烟波浩淼，暝色苍茫，又是仲夏天气，湖水为暑热所蒸，更是烟雾迷蒙，难辨东西。岳飞在杨钦走后，立即命牛皋、王贵等，率

兵数千随着杨钦后面前进。杨钦只顾行船，没有注意到身后的跟踪，就这样曲曲折折带入了深巢。这是一个很大的水寨，驻扎有数千人，关卡林立，巡逻士卒不断出没。杨钦打了一声口哨，便飞出一只巡船前来迎接。正待随入，忽然身后鼓角齐鸣，近百只战船箭一般驶了过来。杨钦吃了一惊，方知为岳飞所诈，只好把方才胸中的所有盘算，一齐抛到湖中去，招呼牛皋、王贵等人一同入寨。王贵、牛皋已受了岳飞的吩咐，不敢造次，问杨钦道："寨内水寇，不知愿不愿意投诚？如果不的话，我们就要杀人了！"杨钦说试试，就大声喊道："全寨兄弟们听着！岳元帅现有数万大军在此，愿意投降的，请快快出来迎接！否则的话，岳元帅就要攻寨了！"黄佐、杨钦已游说过寨内大小头目，不少人心有所动，但还在犹豫，未曾马上随黄、杨归降，今见岳家军压境，仓促中迎战，万难取胜，只得顺水推舟，答应投降缴械。王贵、牛皋遂占领了水寨，并派人向岳飞通报。

岳飞接到报告，遂率大军赶到，全力合击杨幺。杨幺组织残余拼命抵抗。他们乘坐的船是特制而成，以水轮驱动，行驶如飞。两旁装有撞竿，所遇辄碎，不及交手就船破沉底，上面的人纷纷落水，不是淹死，便是被擒。岳飞见状，长叹道："怪不得从前围剿的官兵常常败北呢！"遂命军士砍伐山上大木，穿凿成巨筏，放在港汊，又命用朽木乱草，从上游浮下。然后命善驾阵的兵士驾着小船，前行诱敌，杨幺部众不胜忿，争着追赶，却被乱草缠住船轮，就像胶粘住一样，任其鼓轮撑篙，一步也挪不动。正在这时，岳飞指挥着宋兵战船，一齐杀到。杨幺等惊慌失色，前进不得，退路又被阻，不得已逃进港汊中。刚入港口，连连叫苦，只见里边全是巨筏，筏上载着宋兵，迎面驶了过来，跳上贼船，乱砍乱戮。港外的官兵也杀了过来，将杨幺团团围住，轮番攻打，杨幺残众见抵敌不住，纷纷投降。杨幺见大势已去，纵身跃入水中，想凭借良好的水性潜水逃跑。牛皋看见，随后跳入，揪住杨幺的衣领，提到岳飞船中，被绑缚起来，后被枭首，杨幺领导的起义终于被岳飞平定了。

消息传到张浚处，掐指一算，正合八日期限，不禁叹服道："岳元帅真是神算，无人能及！"

岳飞自平定洞庭湖以后，又还军襄阳。不久，朝廷下诏，改授岳飞为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兼宣抚副史。从此，便每日枕戈待旦，准备恢复中原。

绍兴五年（一一三五年），岳飞遣梁兴等潜伏敌占区，结纳两河民间抗金组织首领，招募乡勇，加固堡垒，以待宋军北伐。李通、胡兴、李兴等举众投奔，将金军的活动情况，以及山川关隘全都详细地告诉了岳飞。在这种人心思战的有利形势下，绍兴六年，岳飞从鄂移军襄阳，遂即挥师北上，里应外合，很快地收复了伊阳、洛阳、商州、虢州，继而转攻陈、蔡地区。两岸人民，欢呼雀跃，打着"岳"字旗帜，"挽牛牵车，载糗粮以馈义军，顶盆焚香迎候者，充满道路"。以至于自燕京以南的地区，金人号令不行，完全失去了控制。兀术强行征召"签军"以对付岳飞，却没有一人相从。一贯骄横的兀术不禁叹息道："我从起军以来，从未遇到现在这样挫折！"金大将乌陵思谋素称凶悍狡猾，

对部下的恐慌浮动无能为力，毫无办法，只能告诫他们道："你们不要轻举妄动，等岳飞来时立刻就投降。"金军统制、统领崔庆，将军李觊、崔虎、华旺等率领部众，密制"岳"字旗帜，从北方来降。金将军韩常也打算率五万众归降。岳飞大喜，与部将道："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但是，虽然当时的形势对岳飞极为有利，这次北伐终因"钱粮不继而抽回干事车马，未能成功"。岳家军驻扎在襄阳，距南宋首都临安有数千里之遥，粮饷转运迟滞，平日即有"粮食不周"之忧。这次北伐，岳家军深人河南，朝廷措置粮草不力，以致前线士卒常受饥饿困扰，甚至饿死，这就严重影响了军人的战斗力。对此困境，岳飞只得忍痛撤军。已经克复的州县再度陷于伪齐的统治下；欢迎和支持岳家军的人民受到了严酷的报复。岳飞愤慨万分，热血沸腾。他感到壮志难酬，虽然他因战功卓著屡获官爵，但这不是他的本领。收复失地，报仇雪耻才是他矢志以求的志愿。

绍兴九年（一一三九年），金兀术再度南侵。金军分四路南下：以聂黎贝堇出山东，直奔江淮；李成犯河南；左临军撒离喝自河中（今山西永济）趋陕西；兀术自己自黎阳（今河南浚县）直插汴京。金军来势凶猛，宋廷一片震动，命岳飞等迎敌。危急之中，高宗也知道放权，对岳飞道："设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遥度。"岳飞遂誓师襄阳，再次北进，一举攻占蔡州并次第收复淮宁府、西京、赵州等地，举凡岳家军所至，无不获胜。河南民间抗金首领李兴，率众响应岳飞，收复伊阳等八县。东部和中部的宋军也连连奏捷。韩世忠收复海州，张浚部将王德收复宿州、亳州，金人大震。消息传到临安，一心求和的高宗和秦桧与金人一样深以为忧，急忙下令各路宋军撤退。岳飞正在逐节进攻，哪会乐意半途而废呢？当下拒绝了收兵的命令，留大军驻守颍昌，自率一队精锐人马直趋偃城。兀术大为震惧，召集部将商讨对策。众将早已被岳家军吓破了胆，兵临城下的时候，哪里还会想出胜敌的法儿呢！纷纷说岳飞智勇冠天下，难以为敌，还是早早退兵为上策。金兀术却不愿就此善罢甘休。他做梦都想马踏临安，灭掉南宋，建立大金帝国。实际上，他几次快要成功了，都碰上了岳飞，让他大栽跟头，前功尽弃。他很恼火这位丧门星。他领教过多次，知道岳爷爷确实厉害，但他咽不下这口气。他是金国的一根撑天柱子，握有百万大军，曾经灭辽国破开封、虏宋主，使宋人谈虎色变，难道就甘心败在一位处处受朝廷牵制、拥兵不足几万的南宋将领手中么？这不让世人和后人耻笑么？不能，绝对不能，一定要和这个岳蛮子决一雌雄，看到底谁是"爷爷"！于是，金兀术调集各路兵马，决心与岳飞决一死战。

岳飞接到急报后，不禁大喜，说："金寇来得越多越好，我正好乘机一举歼灭他们，免得以后再骚扰中原!"正说着，朝廷钦差赶到宣读旨谕，敦促岳飞迅速撤退，以免被金人吃掉。岳飞告诉来使说："金人已经黔驴技穷了，我完全有把握破敌，请您回禀皇上，让他放心，静候佳音!"钦差见说不动岳飞，只得回朝交差。岳飞遂挑选出嘴皮薄、善羞祖骂娘的士卒，让他们逐日骂阵挑战，兀术不胜其怒，遂向岳飞下来战书，

愿决死战，并令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及将军韩常等，云集偃城，列好阵势。岳飞将岳云转入帐内，命他首先出战迎敌，并下军令状说：“如果不胜金寇，就杀你的头！”岳云为岳飞长子，十二岁就随军出征，所使两柄铁锤，重八十斤，使起来如车轮飞转，所向披靡，累立战功，被称为赢官人，现在他刚二十出头，任防御史，领有几千人马。他受了命令后，即带着自己的队伍，大开城门，旋风一样冲入敌阵，来回冲荡，地上很快堆满了金人尸体。龙虎大王若不是跑得快，脑袋瓜早就被铁锤砸得粉碎。兀术见岳云这般厉害，便放出“铁甲浮屠”和“拐子马”来。这是兀术恃以为傲的王牌军队。所有的将士全穿着铁甲，三人为一伍，用皮绳串连起来。每进一步，便以马随上，可进不可退，以示必死的决心。这支军队，一向横行中原，屡败官兵，这次又使出故伎，用来对付岳云。岳云并不畏惧，抖擞精神，竭力厮杀，身上连受几处伤，仍然勉力坚持。岳飞见状，立即放出藤牌军，冲到阵前，左手持藤牌蔽体，右手执麻扎刀，蹲着身子，专砍马腿。拐子马互相串连，一马倒地，其他二马便被绊住，不能前进，霎时间，一万五千骑拐子马人仰马翻，七颠八倒。岳云乘势麾众向外杀出，岳飞也纵军奋击，提枪跃马，带头冲锋，一个部下拉住他的马笼头，阻止说：“你是国家的重臣，关系到社稷的安危，怎么这么不顾惜自己的生命呢？”岳飞喝斥了几次竟没松手，一气之下，挥起皮鞭，抽着那位部下的手，叫道：“你知道什么？给我滚开！”一提马缰，冲了上去。将士们见了大受鼓舞，勇气倍增。战斗持续到天黑，金军败，向北逃去。

兀术头也不回地逃了一程，见岳飞收兵，才停下来扎营休息。点检人马，损失大半，不由悲从中来，出声恸哭道：“我从起兵伐宋以来，全靠这拐子马战胜敌兵，现在被岳飞消灭，今后还有什么指望呢？”韩常等将在旁劝解道：“胜败乃兵家常事，不必为此伤心！”兀术转悲为恨，咬牙切齿地说：“我要再增加兵马，与岳南蛮拼个你死我活！”于是收集残兵，并从汴京调来生力军，云集颍昌。岳飞只领四千兵马，与金军展开激战，竟大获全胜，兀术简直要发疯了，又会集十二万兵马，向岳家军猛扑过来。兀术女婿夏金吾想替自己的岳父洗刷耻辱、恢复名誉，挥刀冲在最前面，连连砍翻十余名宋兵，气焰十分嚣张。岳云见状，不觉大怒，拍马迎上，挥锤相迎，没有几回合，一锤正中夏金吾的天灵宝盖，金兵见状魂飞魄散，撒腿就跑，狂奔十五里才止住。

当时，太行山及两河地区的抗金义勇军，纷纷响应岳家军，攻城夺池，一时金军的道路被阻绝，成为绝援之敌，岳飞于是大起兵马，进逼朱仙镇，在距汴京四十里的地方，与金人对垒相拒。岳飞首先派遣背嵬军（北方人呼酒瓶为嵬，大将酒瓶必令亲随兵背之，所以岳飞、韩世忠称自己的亲随兵为背嵬兵）先驱杀入，将兀术的阵脚冲乱，岳飞随之挺抢跃马，驰入阵内，众将领也个个奋勇向前，如猛虎下山，犬羊立靡，神龙搅海，虾蟹当灾，金兵十伤六七，兀术几乎送命，幸亏转身跑得快，一口气跑回汴京。

经过岳家军一系列沉重的打击，金军元气大伤，士气低落，兀术想号召众

将再议迎敌，却见个个垂头丧气，没有一人吭声。兀术又传檄河北，调集诸路兵马，竟没有一兵一卒赶来。当时中原一带，人们纷纷响应岳家军，悬挂"岳"字旗帜，并箪食壶浆，饷送义军。就是金军骁将马陵葛思谋及统制王镇、统领崔庆和偏将李凯、崔虎、叶旺等，全都以为金人气数已尽，有意提前降顺。更有龙虎大王以下的将官噶克察、千户高勇等，竟秘密地接受了岳飞派人送来的飞旗榜，准备岳飞大兵到时悬挂迎降，连兀术极为倚重的韩常也打算率部依附。兀术自知众叛亲离，大势将去，便仰天长叹道："我从领兵以来，还从未到过这种境地！事已至此，还有什么说的！"就想领着亲信，弃城逃跑。仓皇出走间，忽然闪出一位文弱书生，拦住马首说："大王慢走，岳飞马上就要退兵了！"兀术以为书生痴人说梦话，不耐烦地答道："你一个迂腐儒生，懂得什么！岳蛮子只用几千人马，就攻破我的十几万大军。中原百姓，日夜盼望他到来，我难道坐待俘虏，不管生死么？"书生笑道："大王说错了。自古以来，哪有奸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在外呢？你虽不是岳飞的对手，但岳飞何尝又是朝内奸臣的对手呢？大王请稍留，不出几日，岳飞就会撤兵的。"

兀术虽常年领兵在外，却风闻金朝与秦桧来往议和的事，经书生一说，马上醒悟过来，便掉转马头，仍留在汴京。

在岳飞积极联络所有抗金力量、积极筹措北进的时候，朝廷使者飞一般地赶到，敦促岳飞班师。岳飞惊问道："这是何故？"使者答道："秦丞相与金人议和，已有头绪，所以请岳少保撤兵，以免使议和夭折！"岳飞愤然道："中原之地已恢复大半，燕云之地也将唾手可得，在这时为什么向言而无信的金人求和，请我撤兵？"朝使无言以对，默然而去。岳飞当即向朝廷上疏，请朝廷抓住战机，"速赐指挥，令诸路之兵火速并进！"高宗和秦桧看了奏折，非常恼火，不仅没有命令其他将领起兵，侧应岳飞，反而釜底抽薪，调回了张浚、杨沂中的部队，使岳飞陷于孤立作战的境地。岳飞仍不屈服，高宗、秦桧无奈，采取强硬措施，一天连下十二道金牌，催岳速归。金牌是牌上写有金字，是朝廷在情况紧急时使用，一见到金牌，任何将领都得绝对服从命令，否则就视为叛国，在这种情况下"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不起作用的。岳飞一日竟接到金牌十二道，不觉悲愤交加。他知道这一去，是很难再回来了，即将成真的宏愿将永远胎死在梦想中了。秦桧卖国求和岳飞还可以想得通，他本来就姓秦嘛！但高宗赵构为何对自己的社稷江山那么不爱惜，对自己的骨肉那么绝情呢？岳飞百思不得其解。"完了，昔日的凌云壮志！完了，沦陷区痛苦呻吟的老百姓！完了，大宋的江山社稷！"岳飞仰面悲叹道。马鸣萧萧，黄河呜呜，似在应和着岳飞。

整个军队笼罩在悲愤之中。岳云、牛皋、张宪等随岳飞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将领来见岳飞，试图劝岳飞抗旨，岳飞忍痛斥退了他们。他痛下了班师令，将士们缓缓地挪着脚步。老百姓们闻讯赶来，黑压压一大片，跪在岳飞马前，哭诉道："岳大爷，千万不能走啊！您一走，我们就没活路了！"岳飞流着眼泪，取出金牌，说："朝廷有令，我不敢擅留啊！"众人道："难道朝廷不要我

们了吗？我们一直盼星星盼月亮盼着你们呢！”岳飞知道他们留在这里免不了受金人蹂躏，下令道：“你们不用悲伤了，愿随我南去的赶快回家准备，我等你们五天时间。”老百姓齐声应命，五天后，在岳飞的护送下，扶老携幼，牵羊赶牛，慢慢向南行去。金人惧于岳家军，没有追击。

岳飞的过分忠诚耿直，使他不能像成为一名智勇兼全的军事家那样成为一名圆滑精明的政治家，他甚至连那位飘然而现、倏忽而隐的白衣书生都不如，竟然对高宗忌言收复的行为大惑不解！高宗怎么会乐意收复失地，甚至捣了黄龙府呢！那样的话，就得迎回徽宗和钦宗二位先帝，自已将如何处置他们呢？天无二日，何况三个！当然，如果金人也不谅解他这个苦衷，想用对待徽、钦二帝的办法来对他，那他也会起而抗争的。他只想做偏安皇帝，为此他可以不惜一切地与金人议和。反正，普天之下的所有，都是他自已的。岳飞却不善揣测并迎合主子幽暗隐晦的心意，只是一味地输忠献诚。绍兴九年，宋金议和，岳飞就慨然上书赵构，表示反对，道：“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议。”自然不会被接受，由此却大大得罪了相国秦桧。绍兴和议成后，他又上了一道名为祝贺、实是抗议的《谢讲和赦表》，道：“夷虏不情，而犬羊无信，莫守金石之约，难称尊壑之术。”并且他不适时宜地请战：“臣愿定谋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当令稽颡以称藩。”这怎能使赵构不恼火！愚忠往往比奸诈更令皇帝讨厌，因为这类人常常固执一理，而不顾及皇帝的隐衷，使其难堪又不敢光明正大地发作，久而久之，终于酿成大祸。赵构对岳飞的忠诚渐渐怀怨在心，只要稍有时机，就借题发作，摧折一番，在这种情况下，刚直的岳飞又不善于克己顺从，悲愤之下，屡屡提出辞职。而在金兵压境、和议不成的情况下，赵构又离不开岳飞，只好屈皇帝之尊求其还职，好言抚慰，这更加深了对岳飞的忌恨。要是让他恢复了中原，夺得燕云，捣了黄龙府，岳飞岂不功高危主，成为他的心腹大患？秦桧要加害岳飞，他能不暗自庆幸，假手于他吗？世人只晓得秦桧为杀害岳飞之罪魁祸首，这当然不会错，却不知赵构为幕后怂恿者，罪更重一等，这也正是赵构所老谋深算的。

秦桧为主和派的首要人物，本来，和与战一样，本身并无非议之处，在迫不得已的情势下，求和乃至投降不失为一条出路，秦桧却不是这样，他完全为金人吓破了胆，卑躬屈膝，唯和是求，达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而岳飞则是坚决的抗战派，公开反对议和，谴责朝廷的投降政策，多次触怒秦桧。岳飞每打一次胜仗，每向北推进一步，他都会心惊肉跳一次，觉得这样离求和就远了一步。他认为，只要岳飞在世一天，他就会无所作为一天，金人明白他这种难堪的心情，乘机要挟他除掉岳飞，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在战场上根本无望做到的事。他们写信给秦桧，说：“你每时每刻都想与我们达成和议，而岳飞却积极地谋取河北之地，并连伤我们大将。这仇不能不报！你必须杀掉岳飞，和议才能达成！”秦桧于是更执意要杀岳飞了。

但岳飞的名声太大了，不是想杀便

杀得了的，必须是一步一步进行。秦桧决定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先将岳飞孤立起来。当时，南宋手握重兵，能独当一面的大将有三位，即岳飞、韩世忠和张浚。张浚怯于公战，勇于私斗，素与岳飞有隙，对岳飞屡立显功，少年得志，心怀猜忌，常借故中伤岳飞。秦桧便将他收买，让他参加暗害岳飞的阴谋。韩世忠与岳飞一样，是抗金派的骨干，秦桧决定先将他除掉。绍兴十一年（一一四三年），朝廷命岳飞与张浚前往韩世忠军队“视师”，以便寻隙遣散韩家军。在视察时，岳飞见韩家军旌旗鲜明，军马整齐，威武雄壮，心里倍增钦佩之情。当张浚提出与岳飞私下瓜分韩世忠军时，岳飞坚持正义，表示坚决反对，指出南宋真正能领兵打仗的，仅仅有二三人，如果遣散韩家军，将何图恢复大业？但最终张浚还是秉朝廷之意，强行遣散了韩家军，并欲以谋反罪陷韩世忠于死地。岳飞得知消息后，立即向韩世忠报讯，使其得以采取防范措施，免遭迫害。张浚与秦桧大怒，罗织罪名，罢免了岳飞枢密副使的虚衔。岳飞于是脱去战袍，退隐庐山。

岳飞虽被削夺兵权，罢归庐山，秦桧仍不善罢甘休，非置岳飞于死地而后快。他们威逼利诱岳飞旧时部下，让他们揭发岳飞的罪状。一部将王俊，绰号叫雕儿，品性奸诈贪婪，常受到张宪的抑制，因而心怀不满。受到张浚的唆使后，竟将张浚自己拟好的状词投诉给枢密院，诬告：“副都制张宪，谋据襄阳，还飞兵柄。”张浚不顾枢密院无审讯权的规定，传讯张宪，严刑拷打，逼其承认他自己绞尽脑汁想出来的罪状，张宪连呼冤枉，宁死不肯虚招，张浚等得不耐烦，又自己虚拟了一份“张宪口供”，送给秦桧。秦桧遂派人将正竭力作“赤松游”的岳飞逮捕，送入大理寺询问。岳飞想不到秦桧这样心狠手辣，激愤之下，撕开上衣，露出脊背，让中丞何铸、大理卿周三畏看：“皇天后土，可表我心！”二人望去，只见“精忠报国”四个大字，深入肤里。周三畏不觉肃然起敬，就是与秦桧同党的何铸，也良心发现，命将岳飞送回狱中，自己去向秦桧申辩岳飞无辜。周三畏干脆挂冠而去。

秦桧于是让一直对岳飞怀恨在心的万俟卨接办此案，岳飞任凭酷刑加身，始终不肯承认。万俟卨便效法张浚，自拟岳飞供词，诬陷岳飞曾令于鹏、孙革致书张宪、王贵，让他们向朝廷虚报军情；岳云曾致书张宪，让他设法使岳飞再掌军权等。“供词”送赵构审批，赵构不暇细阅，生怕跑了岳飞似的，急急批道：“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临斩！”于是，岳飞便被赵构恩赐的御制毒酒鸩杀在临安大理寺所在的风波亭。终年三十九岁。临刑时，一腔怨愤的岳少保提笔在“供状”上写上“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写毕，掷笔于地，仰天长啸，端起鸩酒一饮而尽。霎时，玉山摇摇，轰然倒塌，一代军事英才就这样含冤而亡。

岳飞被收系大理寺时，朝臣大多明哲保身，缄口不语，少数几位挺身营救者多遭流放或被处死。韩世忠曾当面质问秦桧，岳飞究竟犯的什么罪？秦桧竟答道：“岳云给张宪的信，虽未查得实据，恐怕是莫须有的事！”韩世忠愤然道：“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统治者

向来独断专行，哪管天下服与不服？韩将军后来也许明白了这一点，在未到岳飞父子这一地步前即辞去官职，骑着小毛驴，带二三个童仆，每日悠悠地欣赏西湖风光了。

【韩世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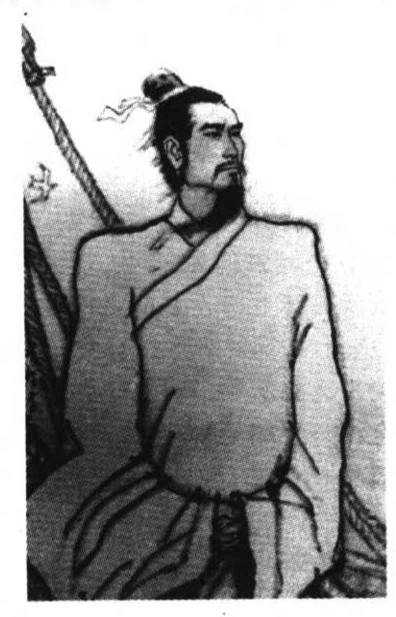
（1089～1151）南宋著名抗金将领。字良臣。绥德（今属陕西）人。幼年家贫，年十八，应募入伍，性格粗犷、豪爽，嗜酒使气，人呼为韩泼五。能挽强弓，勇冠三军，在对西夏作战中屡立战功。宣和三年（1121），以偏将身份随王渊镇压方腊起义。宋金战争爆发后，韩世忠率部转战睿州（今河南浚县东南）、庆源府（今河北赵县）、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等地，以少击众，是北宋末年官军中少见的一支劲旅。建炎元年（1127），宋高宗赵构即位，韩世忠任御营左军统制。建炎三年，以镇压临安苗傅、刘正彦政变有功，驻守镇江。金完颜宗弼率军渡江南侵，韩世忠退保长江口一带，在金兵北归时，以水军八千人，重返镇江江面，进兵邀击，将金军逼进黄天荡（今江苏南京东北），又尾追至建康（今南京），前后战斗四十日，给金军以巨大的打击。岳飞收复襄阳等地后，金与伪齐联合向两淮地区反扑。绍兴四年（1134），韩世忠伏兵大仪镇（今江苏扬州西北），击败敌军。此后，韩世忠移屯楚州（今江苏淮安），积极发展生产，联合山东义军，以不足三万人的兵力，使淮东成为保卫东南的重要屏障。在宋廷对金乞和的岁月里，韩世忠多次上书，揭露金之阴谋，坚决请战，与秦桧进行多次斗争。绍兴十年，在岳飞北伐的同时，韩世忠连克海州等地，十一年，奉命救援淮西，后被宋廷调回，任枢密使，解除兵权。秦桧迫害岳飞，举朝无敢言者，独韩世忠面诘秦桧误国，为岳飞伸张。绍兴和议后，他闭口不言兵，杜门谢客，以家乡清凉山为名，自号清凉居士，表示思念沦于金朝统治的故土。绍兴二十一年病逝，宋孝宗时追封蕲王，谥忠武。

【张俊】

（1086～1154）南宋武将。字伯英。成纪（今甘肃天水）人。十六岁时充当弓箭手。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在与西夏作战及镇压山东、河北农民起义的战斗中，升为下级军官。北宋末，曾随种师中援太原。康王赵构任兵马大元帅，他即率部往从。宋高宗赵构即位后，建立御营司，任张俊为前军统制。南渡初，宋高宗被苗傅、刘正彦所废，他和韩世忠等受张浚节制，平定事变，因而升为御前右军都统制，拜节度使。绍兴初年（1131），出任江淮招讨使，镇压农民起义和叛将李成等部，并阻击伪齐刘豫南侵。后与岳飞、韩世忠合称三大将，所部称张家军。绍兴十年金军南侵，宋诸军迎击，都得胜利。张俊也派部将王德收复宿州（今安徽宿州）、亳州（今安徽亳州）。旋即撤兵，不支援岳飞。次年，他迎合朝廷对金议和的意向，自请解除兵权，授枢密使。又追随秦桧制造伪证，促成岳飞冤狱。后罢枢密使，进封清河郡王。张俊贪婪好财，大肆兼并土地，年收租米达六十万斛。宋高宗曾亲临其家，礼遇优厚，诸将都不能比。死后，追封循王。

【文天祥】

(1236～1283) 南宋末大臣、民族英雄。小名云孙，字天祥，后以字为名，改字履善，后又改字宋瑞，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幼时从父文仪读书，并在白鹭洲书院学习。宝祐四年（1256）中进士第一名，与陆秀夫等同科。开庆元年（1259），授签书宁海军（临安，今浙江杭州）节度判官厅公事。当时蒙古军大举攻宋，进围鄂州（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宋廷大震，宦官董宋臣主张迁都。文天祥尚未就职，毅然上疏请斩董宋臣，未被采纳。他从此不愿为官，几经推辞，到景定二年（1261），才接受了秘书省正字之职。在任官中，经常受到排挤，还得罪了权臣贾似道。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出任湖南提点刑狱；次年，调任知赣州。此时，元朝发动了灭宋战争。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元旦，文天祥在赣州得到元军渡江的谍报，不久接到谢太后要求各地起兵勤王的诏书。他立即组织两万人的队伍，开到临安。这时，元军已近逼临安，谢太后决心投降。德祐二年正月，谢太后向元军投递降表，文天祥反对无效，且被任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进元营谈判。他在元营与元丞相伯颜争辩不屈，又怒斥降将，遂被扣留，押解北上。行至镇江，与随从人员设法逃出，历尽艰险，到达通州（今江苏南通），再从海路南下到福州。宋端宗赵昰任他为枢密使、同都督诸路军马。他在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建立督府，组织军队，继续抗元。景炎二年（1277年，元至元十四年），文天祥从福建路转移到广南东路，越过大庾岭，进入江南西路，收复兴国等县，包围赣州，气势颇盛。不久，元大将李恒到江西，打败宋军。空坑（今兴国境）之役，文天祥主力溃散，欧阳夫人等家属都被元军俘获。但他仍不灰心，收拾散兵，退屯南岭（后改称忠臣岭，在今广东永安东南），转进海丰，在广东的潮、惠州继续进行抗元活动。帝昺祥兴元年（1278年、元至元十五年），驻在厓山（今广东新会南海中）的宋政府封文天祥为少保、信国公。十二月，元张弘范从海陆大举进攻，文天祥撤出潮阳，转移海丰，准备入山结营固守。行至海丰以北的五坡岭，被元军追及，文天祥被俘，部下殉难者不计其数。次年正月，被移上海船，从潮阳驶往厓山，经珠江口零丁洋时，赋著名的《过零丁洋》诗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明不屈之志，为千古绝



文天祥

唱。张弘范命人劝文天祥写信招降张世杰，他录此诗作为答复。南宋灭亡，文天祥被押北上，于至元十六年（1279）十月初一至大都（今北京）。前宋丞相留梦炎、受封为瀛国公的宋恭帝，先后奉命劝降，都被拒绝。元朝权臣阿合马亲到住地问话，丞相孛罗等在枢密院堂上审问，文天祥慷慨陈辞，义薄云天。此后，他被关禁在兵马司狱中，阴暗潮湿，冬令严寒，夏季酷热，均甘之如饴。欧阳夫人和两个女儿也在大都过俘囚生活。文天祥明知只要一屈膝，便可与家人团聚，仍不改变初衷，仅嘱家人“归之天命”而已。他身在狱中，而诗句墨迹传遍京城，被视同珍宝，狱中的元朝军官士兵也常请他讲古人事迹。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八日（1283年1月8日），元世祖忽必烈召见文天祥，进行最后一次劝降。文天祥答以“天祥为大宋状元宰相，宋亡，只能死，不能活”。次日，在柴市（今北京东四北大街府学胡同，明朝时在此地建文丞相祠；一说在宣武门外菜市口）慷慨就义。

文天祥遗著有《文山先生全集》。他前期的诗文多酬应之作，比较好的诗也只表现了隐逸的志趣，或带有感伤哀愁的情绪。赣州起兵以后，风格为之一变，诗词散文都悲壮刚劲，感人至深。他把国家、人民和自己的遭遇，用诗词逐事记录，把从镇江逃出元营后的记事诗，编成《指南录》；又将被俘以后所作，编为《指南后录》；在狱中又集杜甫诗句，成《集杜诗》二百首，历述“颠沛以来”的“世变人事”，抒发自己的亡国之痛。其他作品如《正气歌》，历数史书所传各代不畏强暴、不惜牺牲的人物，表示自己准备随时献出生命的决心，尤为数百年来传诵不绝之作。

【成吉思汗】

（1162～1227）蒙古开国君主，著名军事统帅。名铁木真，姓孛儿只斤，乞颜（Qǐyán）氏，蒙古人。元朝追上庙号太祖。

成吉思汗生于蒙古贵族世家。五世、四世叔祖曾为辽属部官令稳、详稳，曾祖葛不律汗及其弟咸补海汗、伯祖父忽都剌汗都做过蒙古部主。父也速该，有拔阿秃儿（ba－hatur，勇士）称号，是一个有实力的贵族。当时，蒙古高原部落林立，塔塔儿人、蒙古人、克烈人、乃蛮人、蔑里乞人、斡亦剌人互相攻打，争战不休。这些部落都曾对辽金两朝有臣属、纳贡的关系，但又时服时叛。金王朝利用归顺的部落征伐叛离者，使蒙古高原部落战争局势复杂化。战争愈益频繁，规模愈益扩大，部落结构常被打破，形成跨部落的军事联盟，从而出现走向大规模联合的客观趋势。1162年，受金朝支持的塔塔儿人与蒙古人发生激战，也速该俘获塔塔儿首领铁木真，正值成吉思汗出生，便用俘虏的名字为婴儿命名，以纪念胜利。

约在1170年，也速该被塔塔儿人毒死，所领部众纷纷离去，也速该的遗孀月伦领着铁木真和他的几个弟弟度过数年艰难生活。铁木真曾被咸补海汗后裔泰赤乌贵族掳去囚禁，逃回后投靠和臣属于蒙古高原最强大的克烈部部主脱里汗。不久，铁木真的妻子孛儿台又被蔑里乞人掳去，他求脱里汗约其附庸札答阑部主札木合共同出兵，打败了蔑里乞人，夺回妻子。少年时期的艰险经历，



成吉思汗

培养了铁木真坚毅勇敢的素质。

忽都剌汗死后，蒙古部众大都在札木合控制下，铁木真投靠札木合，随他游牧。在这过程中，铁木真笼络人心，招徕人马，最后脱离札木合，建立自己的斡耳朵。约在12世纪80年代，铁木真称汗。札木合率领札答阑、泰赤乌等十三部来攻，铁木真兵分十三翼迎战，因实力不敌而败退，史称十三翼之战。

1196年，金兵征塔塔儿部，铁木真和克烈部脱里汗出兵帮助金朝，于斡里札河（今蒙古东方省乌勒吉河）打败塔塔儿人。金右丞相完颜襄授铁木真以察兀忽鲁（部长）官职，封脱里汗为王（脱里从此称王汗，语讹为汪罕）。不久，克烈部发生内乱，王汗弟引乃蛮人攻打王汗。王汗逃奔西辽，又经畏兀儿、西夏返回蒙古高原。由于铁木真的援助，王汗很快恢复了统治。

铁木真与王汗联兵攻打古出古·乃蛮部，回师途中又与乃蛮本部相遇。王汗见敌势盛，不告而退，把铁木真留在乃蛮兵锋之下。铁木真发觉后，迅速撤兵，回到自己牧地撒里川（在今蒙古克鲁伦河上游之西），反而把王汗暴露在敌前。王汗大败。因为有许多蒙古部众在王汗处，铁木真怕他们被乃蛮吞并，对自己不利，便派称为四杰的博尔术、木华黎、博尔忽、赤老温领兵援救王汗，击退乃蛮。铁木真在部落争战中善于利用矛盾，纵横捭阖，逐渐摆脱了对王汗的臣属地位。

针对铁木真和王汗，蒙古高原形成了塔塔儿、乃蛮、斡亦剌、泰赤乌、札答阑、合答斤、散只兀等大小十余部的联盟，在犍河（今内蒙古额尔古纳河支流根河）共推札木合为局儿汗（全体之君）。1201～1202年，铁木真和王汗联兵，与札木合联盟先后大战于海剌儿河（今内蒙古海拉尔河）流域和金界壕沿边的阙奕坛等地，获胜，札木合投降王汗。1202年，铁木真消灭了四部塔塔儿，占领了呼伦贝尔高原，实力猛增。

王汗见铁木真不断壮大，危及自己在蒙古高原的霸主地位，便在1203年对铁木真发起突然袭击，铁木真败退到哈勒哈河以北。不久，铁木真乘王汗不备，奇袭王汗牙帐，克烈部亡。同年，为金朝看守界壕的汪古部也归附铁木真。1204年，铁木真与乃蛮人决战，消灭了乃蛮太阳汗的斡耳朵，成为蒙古高原最大的统治者。

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今蒙古鄂嫩河）源召开忽里台大会，树九游白旗，即蒙古国大汗位，号成吉思汗。蒙古国初期，成吉思汗把蒙古牧民划分和固定在九十五个千户中。千户下设百户、十户。千户那颜都是成吉思汗的封臣，各千户内的牧民不能任意离开千户组织，对那颜有人身隶属关系。成吉思汗把一部分千户作为领民分给诸弟诸子，形成左右手诸王。又以木华黎、博尔术为左

右万户那颜，即两个最大的军事长官。把原来只有一百五十人的怯薛扩充到一万人，征调千户那颜、百户长、十户长的子弟充当怯薛，以此控制全国。设札鲁忽赤掌管户籍、词讼等行政、司法事务。成吉思汗的汗廷是由传统的草原贵族斡耳朵发展起来的游牧军事封建国家机器。蒙古国建立后，大批原来的部落人口被分编在不同千户中，许多部落的界限从而泯灭，开始形成共同的蒙古民族，成吉思汗对此起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邻近的吉利吉思、畏兀儿、哈剌鲁等部分别在 1207 年、1209 年、1211 年归附成吉思汗。

勃兴的蒙古贵族渴望占有大量财富。西夏成了成吉思汗首先侵略的目标。1205 年和 1207 年，成吉思汗侵入西夏，掠走大批骆驼和财物。1209 年又大举入侵，引黄河水淹灌西夏都城中兴府（今宁夏银川）。西夏不得已，纳女请和。

成吉思汗即大汗位后，仍向金朝纳贡，曾亲至净州（在今内蒙古四子王旗城卜子村）贡岁币。卫绍王即金帝位，成吉思汗说："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为之耶！"最后断绝了对金朝的臣属关系。1211 年，率领大军南下攻金。当时金朝社会危机重重，政治腐朽，经济凋敝，财政拮据，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无力抵御蒙古。据守野狐岭的金军号称四十万，但一触即溃。在浍河堡决战中，成吉思汗实行中央突破，全歼金军主力。1213 年，缙山一战，金军精锐消耗殆尽。成吉思汗南出紫荆关，蒙古军分三路横扫华北平原，到处掠获财物，俘虏工匠。金朝无力抵抗，1214 年向成吉思汗献岐国公主，并给蒙古大批金银珠宝。成吉思汗退出居庸关北上。金宣宗随后从中都（今北京）逃迁南京（今河南开封）。1215 年，蒙古军占领中都，在辽西消灭金朝守军，攻占金北京大定府（在今内蒙古宁城西）。华北、东北的地主武装纷纷投降蒙古，倒戈攻金。1217 年，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专事攻金，自己准备西征。1218 年，派大将哲别灭亡了被乃蛮太阳汗之子屈出律篡夺王位的西辽。于是，花剌子模算端统治下的中亚地区便与极力向外扩张的蒙古直接接壤。

1219 年，成吉思汗率二十万大军西征，向花剌子模发动了侵略战争。摩诃末算端统治的花剌子模是暂时的军事行政联合，有不同民族、部落，矛盾重重，政局不稳。算端同生母贴儿干哈敦，同伊斯兰教教主哈里发，都有尖锐矛盾。各地方军事首领各自行事，尾大不掉。战争开始，摩诃末算端失去抵抗信心，望风远逃，幻想蒙古军队饱掠一场之后自行退去。花剌子模失去统一指挥，兵力分散，只有各个孤城的防御，没有大兵团的野战反击，使蒙古军从一开始就居于优势。成吉思汗几路进兵，分割包围了各战略重镇，各个击破，采用大规模屠杀、夷平城市、签发被俘人众打头阵等残酷手段震慑敌人，解除自己后顾之忧。战场上的主动权全在蒙古一方。1219 年，蒙古军围攻讹答剌城，次年攻



成吉思汗陵

克。1220年，成吉思汗攻下不花剌、花剌子模新都城撒麻耳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等城，术赤、窝阔台、察合台率兵攻克花剌子模都城玉龙杰赤（今土库曼斯坦乌尔根奇），拖雷一军进入呼罗珊地区。哲别、速不台奉成吉思汗之命穷追摩诃末算端，后者逃至里海孤岛病死。哲别、速不台率军继续西侵，远抵克里木半岛。1221年，拖雷占领呼罗珊全境。成吉思汗追击新算端札阑丁至印度河，不获而还。1222年，在占领区置达鲁花赤监治。1223年，还撒麻耳干驻冬，次年起程还国。

成吉思汗西征，进行历史上罕见的大屠杀、大破坏，给中亚各族带来极大灾难。

1226年，成吉思汗出征西夏。次年西夏亡。1227年夏历七月十二日，成吉思汗病逝，临终提出联宋灭金的战略。大皇后孛儿台生子四人：长子术赤，为钦察汗国诸汗之祖；次子察合台，为察合台汗国诸汗之祖；第三子窝阔台，蒙古第二代大汗（元太宗）；第四子拖雷，后人为元朝和伊利汗国皇室。忽兰皇后生一子阔列坚，后裔入元封河间王。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攻金灭夏，曲折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各族交往日益密切的客观趋势，为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成吉思汗军事才能卓越，战略上重视联远攻近，力避树敌过多。用兵注重详探敌情、分割包围、远程奇袭、佯退诱敌、运动中歼敌等战法，史称“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另一方面，作战具有从游牧部落战争带来的野蛮残酷的特点，大规模屠杀居民，毁灭城镇田舍，破坏性很大。13世纪主要封建国家社会危机深重，为成吉思汗实行大规模军事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

【窝阔台】

（1186～1241）大蒙古国第二代大汗，成吉思汗正妻孛儿台所生第三子。又译兀窟解、月古歹、月可台、月阔歹、斡歌歹等。从青年时代起，窝阔台便跟随成吉思汗征服漠北诸部，在与克烈部王汗的战争中，力战负伤。1211年，从成吉思汗伐金，领兵分掠云内、东胜、武、朔诸州。1213年蒙古军分三道南下，与术赤、察合台率右军，尽破太行山东西两侧诸州郡。成吉思汗分封诸子，窝阔台所得的封地在叶密立、霍博之地（今新疆额敏、和布克赛尔二县境）。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前，窝阔台被确定为大汗继承人。西征中，成吉思汗命窝阔台与术赤、察合台围困讹答剌城。城破后，他领军赴撒麻耳干，与成吉思汗会合。在进攻玉龙杰赤城的战役中，成吉思汗派他调协其兄术赤与察合台两军，统一指挥，终于取胜。然后他至塔里寒与成吉思汗合军，进击札阑丁至于申河（印度河）。1227年，随成吉思汗征西夏。1229年，成吉思汗死后第三年，经蒙古诸王贵族的忽里台选举，窝阔台即大汗位。即位后，强化了国家机器，提高了大汗权威。始创朝仪，制定了皇族诸宗王见大汗时的跪拜礼节。再次颁行大札撒（法令），确定牧民赋额。始置仓廪，确立驿站制（见驿传）。任契丹人耶律楚材掌领汉人赋税，牙老瓦赤掌领西域赋税。1230年，在汉地设置十路征收课税使，推行丁税、地税法。赋税制度的推行征收得大批金帛，使窝阔台

开始信任耶律楚材等儒士大夫，采用汉地传统制度，以改进统治。1231年，窝阔台与弟拖雷分道伐金，由西京（今山西大同）下河中府（今山西永济），从白坡渡河，与顺汉水下绕至钧州（今河南禹县）的拖雷军会合。留兵围困汴京（今河南开封），然后北返。1233年，任宣差勘事官阿同葛等清查、登记中原户口。同年，又在燕京创立国子学，选派蒙古子弟学习汉文。1234年灭金后，窝阔台召集诸王贵族大会，进一步申明条令，对参加大会、宫禁出入、行军纪律及有关窃盗等方面都增加新的规定。命失吉忽秃忽担任中州断事官，负责清查、登记中原汉地人户。1235年再次召集大会，分遣诸王拔都及皇子贵由、蒙哥大举西征；皇子阔端与阔出分道攻南宋；唐古征高丽。窝阔台则留居蒙古本土，纵情享乐，创建和林城，建造万安宫。1236年，完成中原汉地的户口清查、登记工作，窝阔台把其中的大部分人户分赐诸王、贵戚、斡鲁朵为封户。用耶律楚材建议，行"五户丝制"（见科差），规定受封的诸王投下在所分封的州郡设达鲁花赤，但收租则由政府设官吏负责，再颁赐封主，非奉诏不得擅征兵赋。1238年，考试中原诸儒生，中试者编入儒户籍，其中部分人被任为本贯州县议事官。同年，又在漠北筑图苏湖城，作迎驾殿。1240年，废除了失盗的官物责令当地人民代偿的规定。当时地方官府和人民因应付上司的征敛急需，多向回回富商告贷，每年利息便相当于本金，名为"羊羔息"。窝阔台接受汉人官僚的建议，以官物代偿陈债；并规定利息累增，至相等于本金为止，不许超过。又检查、登记诸王大臣所俘男女。在窝阔台统治的十三年中，除了在军事上继续进行扩张之外，在政权建设、增颁法令、确定赋税、建立驿站等方面都有新的发展。他开始在漠北建设城市，在缺水处凿井，都对草原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他任命牙老瓦赤治理中亚地区，依靠耶律楚材等治理汉地，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因此，《元史》说在他的统治下，"量时度力，举无过事，华夏富庶，羊马成群，旅不赍粮，时称治平"。但在他的晚年，任命一些回回人统治汉地，奥都剌合蛮为提领诸路课税所官，牙老瓦赤主管汉民公事，耶律楚材等渐遭排挤，统治又趋混乱。窝阔台性喜奢豪，挥霍无度，嗜酒。1241年十一月，暴死。后追上庙号为太宗。因窝阔台在蒙古历史上首称合罕（qahan，大汗），故元代诏令、公文中"合罕"（又译哈罕、恒罕）一词习惯上便是他的专门称号。他有后妃多人，子七人。第二皇后脱列哥那，蔑里乞氏，在窝阔台死后称制，摄理国政（1242～1246）。

【术赤】

成吉思汗正妻孛儿台所生长子。又译拙赤、约直等。成吉思汗微时，蔑里乞部人以报仇袭击其家，将孛儿台掳走，配与其部人为妻。后因得王汗的帮助，孛儿台得救。她在回家的路上生术赤，因此，当时人对术赤的血统有所怀疑。成吉思汗建国后，以蒙古百姓分封子弟，术赤得分民九千户。1211年，随成吉思汗伐金，与察合台、窝阔台攻掠云内、东胜、武、朔等州。1213年，再次大举分道伐金，与察合台、窝阔台率右军残破太行山东西两侧诸州郡。1217年，吉

利吉思部反抗蒙古征兵，术赤奉命出征，征服了吉利吉思及谦河（今叶尼塞河上游）西至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的森林中百姓诸部。成吉思汗便以西北诸部赐归他领有。1219 年，从父西征，受命与察合台、窝阔台留军围讹答剌。城破后，术赤进至撒麻耳干与成吉思汗会合。成吉思汗又命他与察合台、窝阔台进攻花剌子模，围玉龙杰赤城。因与察合台素不和，各行其是，城久攻不下。成吉思汗乃命窝阔台总领军事，协调行动，终于取胜。玉龙杰赤城陷后，察合台与窝阔台前赴呼罗珊，与成吉思汗合军，术赤则径返其在也儿的石河旁辎重所在的驻地。成吉思汗分封诸子，术赤作为长子，封地最西，所有海押立以西征服地区均属于他（见钦察汗国）。1223 年，成吉思汗东还时，术赤称病，未入觐。有人告发他正在围猎，成吉思汗怀疑他背叛，准备发兵亲征。此时，传来术赤死讯。术赤死的确切日期不清。稍后的穆斯林作家说他先成吉思汗六个月去世。有子甚多，知名者十四人。次子拔都承袭汗位。

【察合台】

成吉思汗正妻孛儿台所生第二子。又译察合带、察哈歹、茶合斛、茶合带。成吉思汗建国后，以蒙古军民分授子弟，察合台得四千户。1211 年，随成吉思汗伐金，与术赤、窝阔台攻掠云内、东胜、武、朔诸州。1213 年，再次大举分道伐金，与术赤、窝阔台率领大军，破太行山东西两侧诸州郡，大掠而还。1219 年，随成吉思汗西征，与术赤、窝阔台同攻讹答剌，城破后，进取别纳客忒等地，与成吉思汗大军会合于撒麻耳干。随后与术赤、窝阔台奉命进攻花剌子模，陷其首都玉龙杰赤城。1222 年夏，与成吉思汗合军，追击花剌子模算端札阑丁至申河。成吉思汗把畏兀儿以西直至阿姆河之间的草原地区分封给他。他驻帐于阿力麻里附近之虎牙思。1226 年，成吉思汗出征西夏，察合台受命留守蒙古大斡耳朵。他与长兄术赤不和，与弟窝阔台相处较融洽。

成吉思汗逝世后，察合台遵照遗命拥戴窝阔台即大汗位，亲执臣属之礼；平时亦守臣下礼节，维护大汗尊严。他曾径自下令将作为汗国公产的河中地区一地给予另一人，窝阔台任命的河中行政长官牙老瓦赤向窝阔台告发，窝阔台责令察合台答复，他立即引咎自责。窝阔台大喜，便把此地赐给察合台，从此对其不再猜忌防范。察合台熟悉札撒（法令），执法严峻。窝阔台对察合台极尊重，汗国大事，必先遣使咨商，征得他的同意而后行。1241 年 5 月，察合台先窝阔台七个月病逝。因窝阔台称他为阿哈（兄），以后历代大汗亦皆称其继承人为察合台阿哈。他有子八人。第二子抹土干原被定为继承人，因在西征中战死，便定抹土干第四子合剌旭烈为继承人。贵由即大汗位后，因与察合台第五子也速蒙哥友善，于是改命也速蒙哥嗣为察合台汗国可汗。

【拖雷】

（？～1233）成吉思汗正妻孛儿台之第四子。常从成吉思汗征伐，成吉思汗视他为“那可儿”（伴当），人们又称他为也可那颜。1213 年，成吉思汗分兵

伐金，拖雷从成吉思汗率中路军，残破河北、山东诸郡县。1219年，从成吉思汗西征，攻陷不花剌、撒麻耳干。1221年，分领一军进入呼罗珊境，陷马鲁、你沙不儿，降也里。按照蒙古习俗，幼子继承父业，而年长的诸子则分析外出，自营生计。故成吉思汗生前分封诸子，拖雷留在父母身边，继承了父亲所有在斡难和怯绿连的斡鲁朵、牧地及军队。成吉思汗去世后，拖雷监国。1229年，在选举大汗的忽里台上，推窝阔台即大汗位。1231年，与窝阔台分道伐金，拖雷师出凤翔、宝鸡，入大散关。11月，蒙古军假道南宋境，沿汉水而下，经兴元（今陕西汉中）、洋州（今陕西洋县），在均州（今湖北均县西北）、光化（今属湖北光化北）一带，用皮囊渡过汉水，北上进入金境。1232年初，与金军在钧州（今河南禹县）遭遇，拖雷乘雪大败金将完颜合达、移剌蒲阿于三峰山，尽歼金军精锐，随后同从白坡渡河南下的窝阔台军会合（见钧州三峰山之战）。同年北返，病逝途中，年四十余岁。后追谥为景襄皇帝，庙号睿宗。拖雷正妻唆鲁禾帖尼，克烈氏，生蒙哥、元世祖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四子。唆鲁禾帖尼以聪明能干著称，拖雷去世后，她抚育诸子成长，统领并团结部众，周旋于诸王矛盾斗争之间，为其子蒙哥取得大汗位准备了条件。

【蒙哥】

（1209～1259）大蒙古国第四代大汗，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长子。母克烈氏唆鲁禾帖尼。“蒙哥”，蒙古语意为“长生”。1235年，奉窝阔台命，与拔都、贵由等西征不里阿耳、钦察、斡罗思诸地。1237年春，攻破钦察部，追擒其部长八赤蛮于也的里河（今伏尔加河）中之一岛上。进伐斡罗思，克乌拉基米尔城；破薛儿客速人与阿速人。1240年与贵由奉旨东还。

贵由去世后，斡兀立海迷失皇后称制，诸宗王在汗位继承上发生争议。术赤子拔都以宗长身份在阿剌豁马黑（即《元史·宪宗纪》之阿剌脱忽剌兀）召集部分诸王开忽里台，首推蒙哥为大汗继承人。窝阔台系诸宗王没有参加这次大会，并以会议不是在蒙古本土举行为理由拒绝承认。于是拔都派弟别儿哥率军卫蒙哥东还，并定于来年在斡难河（蒙古鄂嫩河）、怯绿连河（蒙古克鲁伦河）召开大会。窝阔台系诸宗王一再拖延，拒不赴会。拔都不顾他们的抵制，于1251年夏，在阔帖兀阿阑（成吉思汗大斡耳朵所在地，今蒙古温都尔汗西南克鲁伦河与臣赫尔河会流处西）举行大会，拥蒙哥即大汗位。窝阔台之孙失烈门、脑忽等企图乘大会欢宴时进行武装偷袭，中途被鹰者克薛杰发觉告变，蒙哥命令将他们拘捕。从叛的按只䚟、畅吉、爪难、合答曲怜、刚疙疸等以诱惑诸王为乱的罪名处死。为防止宗王也速蒙哥（察合台子）等为乱，派卜邻吉䚟率十万军队，在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护堡子）与哈剌和林（和林）间的兀鲁黑塔黑（今科布多境内一大山）、杭海（蒙古杭爱山）及横相乙儿（今新疆青河东南）等地驻防，遣也客那颜（拉施都丁《史集》作末哥那颜）率两万人马到吉利吉思和谦谦州。次年夏，贵由妻斡兀立海迷失及失烈门之母哈答合赤，都以咒诅罪赐死，参加叛乱的诸

宗王被流放。

蒙哥登大汗位，委其弟忽必烈领漠南汉地军政事宜，以牙老瓦赤、布智儿、赛典赤等任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讷怀、麻速忽等任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阿儿浑任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事。以察罕、也柳干统两淮等处蒙古军、汉军；和里解统土蕃等处蒙古军、汉军；僧海云掌佛教事；道士李志常掌道教事。又颁发政令，拘收前此朝廷及诸王所滥发之牌印、诏旨、宣命，限制诸王乘驿所征用的马匹数量，禁诸王擅招民户和以朝觐为名滥征人民财货，放免修筑和林城的工匠。1252 年，命忽必烈征大理，诸王也古征高丽。又任诸臣分掌汗廷事务，忙哥撒儿任大断事官，帖哥紬、阔阔术等掌帑藏，孛兰合剌孙掌斡脱，阿忽察掌祭祀巫卜，只儿斡带掌驿传所需，孛鲁欢任必阇赤长，掌宣发诏令，朝觐贡献及内外官员上奏等事。1253 年，遣弟旭烈兀西征，塔塔儿带撒里等征欣都思（印度）、怯失迷儿（克什米尔）等国。1256 年诸王会议决定大举伐南宋。蒙哥以幼弟阿里不哥留守和林，诸王塔察儿（斡赤斤孙）率师出东路，攻荆襄，自率主力入四川。1257 年冬，蒙哥渡漠南，次年十月渡嘉陵江至白水江，命汪德臣造浮桥以渡。十一月，拔长宁（今四川广元西南），顺流东下，至大获山（今四川苍溪东），宋将杨大渊率众降。因塔察儿所统东路军无功后撤，改命忽必烈统诸路蒙古军、汉军攻宋。1259 年二月，蒙哥率全军渡鸡爪滩，至石子山，猛攻钓鱼山（今四川合川东），因宋将王坚恃险坚守，屡攻不克。天气暑湿，军中疫疠流行，兵士多病死，蒙哥亦染疾，七月卒于钓鱼山，在位九年。后追谥桓肃皇帝，庙号宪宗。

有子五人：班秃、阿速歹、玉龙答失、昔里吉、辨都。

【拔都】

（1208～1255）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次子，钦察汗国的创建者。1227 年术赤去世，拔都受诸兄弟推戴，继承父位，统领术赤兀鲁思。分所部军民为二，以一半属兄斡儿答，使领有兀鲁思东境，号为左翼；自领另一半，为右翼。1229 年，率术赤系诸王赴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大斡耳朵参加忽里台，推举窝阔台为大汗。

术赤曾奉命攻取钦察等北方诸国，但他在世时，势力只达到钦察草原东部的押亦河（今俄罗斯乌拉尔河）。1235 年，窝阔台召集忽里台大会，决定由各系宗王居长者统兵远征钦察、斡罗思、孛烈儿（波兰）、马札儿（匈牙利）以及这一方面所有未服之国。出征诸王有：以拔都为首的术赤诸子，窝阔台长子贵由及其弟合丹，拖雷长子蒙哥及其弟拨绰，察合台长孙不里、子拜答儿，成吉思汗庶子阔列坚等。以拔都为诸王之长，统率全军，以大将速不台为先锋，并命万户以下各级那颜皆遣长子从征。1236 年秋，拔都与诸王、诸将之军会于不里阿耳边境，征服押亦河以北的巴只吉惕部落，并遣速不台率军进取不里阿耳等国。不里阿耳先降，后又整军备守，拔都怒，命速不台再攻，屠其都城（今俄罗斯卡玛河与伏尔加河汇流点南）。拔都命蒙哥率左翼军攻钦察、阿速，1237 年春初，擒杀也的里河（今俄罗斯伏尔加河）下游的钦察部首领八赤蛮。随

后，拔都率诸王军征服莫尔多瓦国。秋，拔都召集诸王大会，定议进兵斡罗思。冬，攻陷也烈赞（今俄罗斯梁赞附近）。1238年初，攻陷莫斯科，屠其城。遂进围弗拉基米尔，猛攻五日，城破。同时分兵攻取旁近诸城。弗拉基米尔大公尤里·符谢沃洛多维奇退守昔赤河，孤立无援被歼。拔都军继续抄掠诸伏哥罗德、斯摩棱斯克、契尔尼果夫诸国，然后回驻也的里河下游。秋，蒙古诸王分兵攻取太和岭（今高加索山）、黑海以北钦察、阿速各部以及斡罗思诸国。1239年冬，贵由、蒙哥之军攻陷阿速国都蔑怯思城，分遣一军取铁门关（今俄罗斯杰尔宾特西）。1240年，拔都与贵由、不里发生争执，恰遇窝阔台患病，召贵由、蒙哥等回蒙古，留拔都继续征进。秋，拔都自统大军攻克乞瓦（今乌克兰基辅），又取伽里赤。至此，斡罗思诸国大部分被征服。

1241年，拔都分军为两路继续西侵。一路由诸王拜答儿、大将孛栾台率领，攻入孛烈儿，于里格尼茨击溃孛烈儿、捏迷思（德意志）联军，即转兵南下与拔都会合；另一路由拔都兄弟和速不台统率，攻入马札儿，于濒宁河（今匈牙利东部索约河）畔击溃其王“怯怜”（匈牙利语“国王”）之军，遂进渡秃纳河（多瑙河），攻掠马茶（今匈牙利布达佩斯）等城。1242年冬，窝阔台死讯传到军中，拔都率师东返，次年春，抵也的里河大营。

这时，大蒙古国汗位空缺，由皇后乃马真氏摄政，召诸王来会，议立新汗。拔都与贵由不和，闻将立贵由，便托辞风疾，中道返回大营，只遣兄弟赴会。拔都是长支宗王的首领，由于他缺席，选汗大会推迟了三年。贵由即位后，谋发兵攻拔都。1248年初，伪称往叶密立养病，率护卫军西行。拖雷妻唆鲁禾帖尼得知贵由意图，密遣急使驰告拔都，拔都即整军东来迎敌。三月，贵由暴死于横相乙儿之地（今新疆青河东南），其妻斡兀立海迷失摄政。拔都遂以长兄身分召集诸王至其驻地阿剌脱忽剌兀（在术赤兀鲁思东境），商议选立新汗。蒙哥兄弟应召赴会，察合台、窝阔台两系诸王以大会应在蒙古本土举行为理由拒不与会，只派代表参加。术赤、拖雷两系诸王单方面举行大会，由拔都倡议，推举蒙哥为大怯，并决定来年在怯绿连河大斡耳朵重新召集大会，拥戴蒙哥正式登基。拔都遣其弟别儿哥等率领大军扈从蒙哥东还。1251年，蒙哥即位，从此大蒙古国汗位由窝阔台系转入拖雷系，拔都也因拥立有功，取得更大权力。

根据成吉思汗生前的分封范围，钦察草原、不里阿耳及阿速被征服后，即并入术赤兀鲁思，于是拔都在也的里河下游建立萨莱城（今俄罗斯阿斯特拉罕附近），作为国都。斡罗思诸城邑名义上应为黄金家族的共有财产，由大汗管辖。因此，在贵由、蒙哥时代，大汗政府均曾派官检括斡罗思户口。1257年，蒙哥还任命驸马剌真之子乞䚟为达鲁花赤，镇守斡罗思。但因为距离遥远，斡罗思地实际上受拔都统治。他以归附蒙古的斡罗思贵族担任各公国长官，并从中选任一人为全斡罗思大公，仍各置达鲁花赤监督。拥立蒙哥以后，拔都凭势将塔剌思及河中地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蒙哥又将谷儿只（今格鲁吉亚）授与拔都弟别儿哥为分地。术赤兀鲁思成为大蒙古国中领土最大的宗藩之国，其

境域东起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西包斡罗思诸公国。斡罗思人称拔都大营为“金帐”，穆斯林史家因拔都家族立国于钦察草原，称之为钦察兀鲁思，“金帐汗国”、“钦察汗国”之名即出于此。拔都对部下将卒颇宽厚，不吝赏赐，蒙古人称他为“赛因汗"（Sayin qan，意为好汗）。

【元世祖忽必烈】

（1215～1294）元朝的创建者。庙号世祖，蒙语尊称薛禅皇帝（Secĕn qahan）。拖雷正妻唆鲁禾帖尼的第二子。

金，据有中原地区以来，习惯于游牧的蒙古贵族，把他们原有的落后制度强加于汉地，造成了政治混乱、生产破坏的恶果。这种情况，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蒙古的统治，因而需要有所改革。忽必烈为藩王时，便思“大有为于天下”，热心于学习汉文化。先后召僧海云、僧子聪（刘秉忠）、王鹗、元好问、张德辉、张文谦、窦默等，问以儒学治道。1251年，长兄蒙哥即大汗



忽必烈

位，忽必烈以皇弟之亲，受任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南驻爪忽都之地。先后任汉人儒士整饬邢州吏治，立经略司于汴梁，整顿河南军政，屯田唐、邓，都收到积极效果。1253年，受京兆（今陕西西安）封地，忽必烈又在这里任诸儒臣兴立屯田，兴复吏治，恢复农业，建立学校，使关陇地区的吏治有了明显的进步。这些成效更加深了忽必烈采行汉法的认识，并进一步取得北方汉族地主阶级对他的拥护。他们中的代表人物，通过交相引荐，聚集在他的幕府里，为元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社会基础。同年，忽必烈受命与大将兀良合台远征云南，灭大理国。年底，班师北还，留兀良合台继续经略云南诸地。1256年，命僧子聪卜地桓州东、滦水北的龙岗，建开平城，修筑宫室。忽必烈采行汉法的活动招致了蒙哥的不满。1257年，蒙哥遣使勾考关中、河南财赋，藩府诸臣都受罗织致罪。忽必烈采用姚枢建议，送家口前往和林，以为人质，并亲身入觐，始取得蒙哥谅解。蒙哥停止了勾考，但仍尽罢其所设置的行部、安抚、经略、宣抚、都漕诸司。1258年蒙哥兴师伐南宋，忽必烈初以足疾家居休养，后因负责东路的诸王塔察儿进攻襄、郢地区无功受谴，蒙哥授命忽必烈代总东路军。1259年九月，忽必烈率师抵淮河，蒙哥在合州前线病逝的消息传来，忽必烈仍挥军自阳逻堡渡长江，围鄂州（今湖北武昌），并以军接应从云南北上的兀良合台军。这时，得悉留守漠北的幼弟阿里不哥擅自征兵，图谋汗位的消息，忽必烈立即采纳汉人儒士郝经的献计，与宋约和，轻骑北返燕京。

1260年三月，忽必烈在部分诸王的

推戴下，即汗位于开平，建元中统。在诏书中明确提出了“祖述变通”，“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提倡“文治”的政治纲领。它的基本精神是要更改蒙古旧制，采行汉法，建立与中原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中央集权制封建政权。忽必烈在中央设中书省，以王文统任平章政事，在各地分设十路宣抚司，任汉人儒士为使。同年五月，阿里不哥也在部分留居漠北的诸王拥戴下，称大汗于和林。忽必烈以汉地丰富的人力、物力为依托，出兵击败阿里不哥。在与阿里不哥鏖战的同时，中统三年（1262）春，益都行省李璮乘机叛乱，被忽必烈迅速镇压。这两件事都对当时的政治带来了重大的影响。阿里不哥的失败意味着草原诸王保守势力受到挫折，使忽必烈能较少牵制地推行仪文制度改从汉法的基本政治纲领，而李璮的叛乱又强烈地引起了忽必烈对汉人的猜忌，于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废除汉人诸侯的世袭制度，削弱这些家族的军权，在地方上实行军民分治等等，一方面以加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则可严密对汉人的防范。此外，又在各级政权中引用色目人分掌事权，使与汉人官僚相互牵制。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与政治意图下兴建的新王朝，其创制立法，始终着眼于在保持蒙古贵族统治特权的前提下，对旧制作必要的更改，使政权机构能大体上符合汉地的统治需要，又足以确保蒙古贵族的既得利益。

中统五年八月，忽必烈又改元为至元。经过从中统元年到至元初年的增改损益，新王朝的各种制度大体上确立下来。至元八年（1271），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为大元。次年，确定以大都为首都，标志着新王朝的政权建设已全部完成。元朝政权在总体上是取法于中原前代王朝的体制，与中原的封建经济基础基本上是相适应的。但也保留了不少蒙古的落后旧制。因此，这个政权本身是充满矛盾的，作用也比较复杂。中央集权政治的重新确立，恢复了正常的统治秩序，对人民的赋役剥削限制在一定的数额之内，较之前此的黑暗混乱是一大进步。忽必烈很重视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措施，立司农司，垦荒屯田，兴修水利，限制抑良为奴，等等。在他统治期间，社会经济逐步恢复，有些地区有所发展，边疆地区得到开发，出现了“户口增，田野辟”的景象。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这个政权也保留了大量的蒙古落后旧制。如：分封采邑制度（投下二五户丝制）；遍及于各生产领域的驱奴制；手工业中的官工匠制度；商业中的斡脱制；贵族世袭的选举制度以及民族压迫政策等等。这些制度在元朝一代始终保留下来，严重地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使元朝的社会矛盾愈益激化。

在建成新王朝、稳定对北方统治的同时，忽必烈又积极着手统一南宋的战争，至元十一年，命伯颜大举伐宋。十三年，下临安，十六年最后消灭了流亡在崖山的南宋残余势力，完成了全国的大统一。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统治全国的王朝，它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发展了国内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南北方的统一也为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前景，其影响都十分深远。

全国统一以后，忽必烈的保守、嗜

利和黩武等消极因素都有了发展。采行汉法、改革落后旧制的工作陷于停顿。这时，早年追随忽必烈，并在元王朝的创制中起过重要作用，对忽必烈具有影响的汉人官僚或逐渐被疏远，或相继谢世。忽必烈所依任的是回回人阿合马。阿合马从中统初便主管中央财政，多方搜刮，权势日重。至元十二年右丞相安童出镇西域后，阿合马独擅朝政。汉人官僚不满于阿合马所为，斗争一直很激烈。忽必烈始终左袒阿合马而逐渐疏远汉宫，朝政进一步向黩武嗜利的方向发展。十九年，大都发生了王著、高和尚刺杀阿合马事件，反映了社会矛盾的加剧。此后，忽必烈又先后任卢世荣、桑哥专理财政，都以失败告终。同期，忽必烈接连派遣军队远征日本、安南、占城、缅甸与爪哇，都遭到失败。外侵战争不仅给邻国造成破坏，带来痛苦，而且对本国人民也是极大的灾难，因而受到人民的反对和抵制。但抗击海都、笃哇等西北诸王的侵扰和平服东北诸王乃颜叛乱，却保护了东北和西北广大边疆的安全，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按照蒙古的习俗，忽必烈置四斡耳朵，分属四皇后。大斡耳朵属长妻弘吉剌氏察必皇后。十八年，察必去世，继娶其妹南必为皇后。忽必烈素有足疾，晚年体弱多病，相臣常不得入见，往往通过南必奏事，因此南必皇后颇干预国政。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忽必烈病逝，年八十，在位三十五年。子十一人。第二子真金早立为皇太子，先忽必烈去世。至元三十年，始以皇太子宝授真金第三子铁穆耳（元成宗），确定为皇位继承者。

【木华黎】

（1170～1223）蒙古国开国功臣。札剌亦儿部人。世代为蒙古孛儿只斤氏贵族的臣仆。其父孔温窟哇将他送给成吉思汗作奴仆。从此，木华黎追随成吉思汗，参与统一蒙古高原各部的战争，累立战功。蒙古建国，木华黎被封为左手万户长。他同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并号“掇里班·曲律”（dörben－külühüd，蒙古语，意为四杰），其子弟分任四怯薛之长。1211年后，随成吉思汗连年伐金，参与指挥野狐岭和浍河堡战役，大败金兵。1213年，蒙古军进逼中都（今北京），又分兵三道南下。木华黎随成吉思汗中军下山东，攻占滨、棣、益都等城。回师至霸州，招降史秉直、史天倪、史天泽父子和肖勃迭及其部众。1214年初，从成吉思汗围攻金中都，迫金主请和。同年冬，奉令率军征辽东，降高州。1215年春，攻陷北京（今内蒙古宁城县西），下利州、兴州、松州、义州、锦州等二十六城、五十四寨，又取广宁府及辽东之金、夏、海、盖等城。1217年，成吉思汗准备西征，封木华黎为国王，命他统率札剌亦儿、弘吉剌、亦乞列思、忙兀、兀鲁兀、汪古等部及契丹、女真、汉军专门征金，连年向河北、山东、山西发起进攻。在这时期的军事行动中，木华黎改变了以往蒙古军春去秋来、一味屠杀抄掠的办法，决意长期占领，以汉族地主武装史天倪、史天泽驻真定，张柔驻满城，招降严实所据东平等五十四州县。1221年，与西夏联军攻陕西。1222年秋，又南下攻占山西未下诸州，渡河围攻长安、

凤翔，因金兵固守，未克。1223 年 3 月，回师山西，卒于闻喜县。其子孛鲁袭爵，领军继续征金。木华黎后人世袭札剌亦儿部首领，称国王；另一支封东平王。四怯薛之一，恒由木华黎后人为长。他们之中任将相等高官者甚多。

【耶律楚材】

（1190～1244）13 世纪蒙古国大臣。字晋卿。契丹人。辽太祖耶律亿九世孙。父耶律履，仕金，官至尚书右丞。楚材世居金中都（今北京），自幼就学，博览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金章宗时曾任开州同知，宣宗时任左右司员外郎。

1215 年，蒙古军攻占中都。1218 年，成吉思汗召耶律楚材至漠北，次年同行西征。耶律楚材追随成吉思汗多年，被当作书记官和占卜星相家使用，虽为亲近，但未能施展其才。成吉思汗去世，拖雷监国期间和窝阔台即位后，他日益受到重用。1231 年，任掌汉文字的必阇赤长（汉人称为中书令或中书侍郎），于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原封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政策与措施。

在经济方面，楚材通过在中原设立十路课税所，每年为蒙古政权征收到大量财赋。他阻止蒙古贵族改农田为牧场的企图；建议把汉族武装地主私占的奴隶、农奴和蒙古诸王大臣将校的驱口收为国家编户；劝阻大规模屠城，保护了大量社会劳动力；反对蒙古贵族的苛征暴敛，反对西域商人对人民的高利贷剥削和汉、回商人的扑买课税剥削制度。他的主张有一部分得到实施，使多年来遭到战争破坏的中原汉地社会经济初步得到恢复。

在政治方面，楚材既反对蒙古诸王功臣“裂土分民”，又限制割据各地的汉族武装地主所掌握的军、政、司法、经济权力，制定和实行了一些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如定君臣礼、五户丝制（见科差）、军民分治制等。

在文化方面，楚材推行了保护、优待、任用儒士的政策。1230 年，由他奏请后任用的十路课税正副使共二十员，都是儒士。1238 年，奏请在中原诸路举行儒士考试，选取儒士四千零三十人，这些中选儒士有不少人后来成为元世祖时名臣。

在窝阔台晚年及去世之后，皇后乃马真氏宠信奥都剌合蛮等，耶律楚材渐被排挤。不久，抑郁而死。

耶律楚材的著作有诗文集《湛然居士集》、《西游录》及《庚午元历》等。

【伯颜】

（1236～1295）元朝著名军事家、政治家。蒙古八邻部人。曾祖术律哥图、祖阿剌从成吉思汗征伐有功。父晓古台从宗王旭烈兀西征，因罪死。至元元年（1264），旭烈兀遣伯颜出使大汗廷，深得元世祖忽必烈的赏识，留为侍臣。二年，拜中书左丞相。七年，任同知枢密院事。十一年，复拜左丞相，总襄阳兵大举攻南宋。十二月，下鄂州。命阿里海牙率军镇戍鄂州，分兵攻取湖南、广西等地，自与阿术率大军沿长江水陆东下，大败贾似道军于丁家洲，与取道淮西南下的合答、董文炳会合。十二年三月，下建康（今江苏南京）。伯颜以行

中书省驻建康，阿塔海、董文炳以行枢密院驻镇江。五月，伯颜奉诏还朝商讨大计，然后还军。十一月，元军兵分三路，进军临安（今浙江杭州）。行省参政阿剌罕为右军，从建康出四安取独松关；董文炳、张弘范为左军，取海道经澉浦、华亭进击；伯颜和行省右丞阿塔海为中军节制诸道，从建康向常州进发。十三年正月，三路军会师于临安；三月，南宋幼主赵㬎出降。同年，宗王昔里吉、玉木忽儿等自阿力麻里举兵叛乱，东犯和林，弘吉剌部只儿瓦合等起而响应，漠南北震动。十四年，忽必烈命伯颜率军北上，平定只儿瓦台叛乱，击败昔里吉于斡耳寒河（今蒙古鄂尔浑河）。十八年，从皇太子真金戍守漠北。二十二年，代诸王阿只吉总军西北。二十四年，东北的乃颜和诸王哈丹等发动叛乱，忽必烈命伯颜自别失八里移军驻守哈剌和林，阻止海都和乃颜军队会合。又派他亲至胜剌哈处，侦察敌情。二十六年，伯颜任知枢密院事，分院和林。二十九年，进讨依附海都的明里帖木儿（阿里不哥子），又获胜。因有人谗言伯颜驻军北方，保守无功，忽必烈遣玉昔帖木儿代总其军，召居大同。

三十年，忽必烈病危，召伯颜入侍，与玉昔帖木儿，不忽木同受顾命。三十一年正月，忽必烈去世。同年，在诸王大臣参加的忽里台上，伯颜、玉昔帖木儿推举铁穆耳即皇位（见元成宗铁穆耳）。是年十二月，伯颜病逝。

【伯颜】

（？~1340）元朝大臣。蔑里乞氏。武宗时历任吏部尚书、御史中丞、尚书平章政事。延祐三年（1316），为周王（武宗子和世㻋）府常侍。其后历任行台御史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等职。致和元年（1328）秋，泰定帝卒于上都，伯颜与知枢密院事燕铁木儿协力拥立元文宗图贴睦尔。伯颜以拥立功大，历任御史大夫、中书左丞相。知枢密院事等要职，进封浚宁王。元统元年（1333）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即位，伯颜又以拥戴之功，历任中书右丞相，总领蒙古、钦察、斡罗思诸卫亲军都指挥使，进封太师、秦王。三年，中书左丞相唐其势与其弟塔剌海等阴谋废立，被伯颜一网打尽。其后伯颜任大丞相，专权自恣，无所忌惮，将诸卫精兵收为己用，任意出纳府库钱帛。为了打击异己，他罗织罪名，置郯王彻彻都、高昌王帖木儿不花于死地。他的官衔多达二百四十六字。伯颜还力主加强对汉人的压迫，曾提出要尽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至元六年（1340）二月，顺帝与伯颜之养子、御史大夫脱脱等合谋，黜伯颜为河南行省左丞相。三月，诏徙伯颜于南恩州阳春县（今属广东）安置，途中病死于龙兴路（今江西南昌）驿舍。

【脱脱】

（1314~1355）元顺帝妥欢贴睦尔朝大臣。字大用，蒙古蔑里乞氏。幼养于伯父伯颜家，从浦江吴直方学。年十五，为泰定帝皇太子怯怜口、怯薛官。元统二年（1334），任同知宣政院事，迁中政使，再迁同知枢密院事。至元四年（1338），进御史大夫。时伯颜为中书右丞相，专权恣横，为顺帝所忌，脱

脱恐受累，与顺帝近臣密谋除伯颜。六年二月，乘伯颜猎于柳林之机，受命将他逐出京师。至正元年（1341），任中书右丞相。改伯颜旧政，复科举取士法，开马禁，减盐额，免旧欠赋税，号称“更化”。三年，主修《辽史》、《金史》、《宋史》，任都总裁官。四年，以疾辞相位。八年，为太傅，综理东宫事。九年，复为中书右丞相。十一年，为解决国库不足，采纳吏部尚书偰哲笃建议，变更钞法，铸至正通宝钱，印造交钞，令民间通用，造成钞法混乱。同年，因黄河决白茅堤、金堤，冲坏盐场，用贾鲁治河，发河南北兵民十七万沿河筑堤，使复故道；时紧工迫，官吏舞弊，促使农民起义爆发。八月，治河工程完毕，以功赐世袭答剌罕号。十二年九月，率兵剿徐州芝麻李红巾军，屠城，以镇压起义之功封太师，仍为右丞相。十三年三月，领大司农事，屯田京畿，兴水利，立法佃种。十四年，总制诸王诸省军讨伐高邮（今属江苏）张士诚起义军。高邮未下，顺帝忌脱脱权力过重，用右丞哈麻等言，以“老师费财”为名，就军中削其官爵，元军大乱，被士诚击败。次年春，流徙云南，十二月，被毒死。二十二年，昭雪复官爵。

【韩林儿】

（？～1366）元末大宋红巾军领袖。栾城（今河北栾城西）人。祖辈因从事白莲教活动被徙永年（今河北永年东南），父韩山童仍以白莲教组织群众。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韩山童与刘福通、杜遵道等在颍上（今属安徽）发动起义，韩山童被捕牺牲，韩林儿随母逃往武安，刘福通等攻克颍州（今安徽阜阳）。十五年春，刘福通等迎韩林儿至亳州（今安徽亳州），立为帝，称小明王。国号大宋，年号龙凤，以亳州为都城。仿元制，设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和六部，地方设行省。以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罗文素、刘福通为平章，刘福通弟刘六为知枢密院事。不久，刘福通杀杜遵道，自为丞相，称太保。同年底，元将答失八都鲁败刘福通于太康（今属河南），亳州失守，韩林儿退驻安丰（今安徽寿县）。次年，兵力复振，收复亳州。十八年五月，攻克汴梁（今河南开封），即为都城。十九年八月，汴梁为元将察罕帖木儿攻破，复回安丰。当时韩林儿虽有帝名，但实权为刘福通掌握，外出将领大多不受约束，政权建设很差。二十三年二月，安丰受张士诚部将吕珍围攻，韩林儿被名义上尚属大宋政权的朱元璋（即明太祖朱元璋）救出，安置滁州（今安徽滁州），从此受朱元璋挟制。二十六年，朱元璋遣廖永忠接韩林儿至应天（今江苏南京），途经瓜步（今江苏六合县南瓜埠），沉之江中，宋亡。

【刘福通】

（？～1366）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大宋红巾军领导人。颍州（今安徽阜阳）人。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与栾城（今河北栾城西）人韩山童等以白莲教组织群众，利用元朝征民夫开黄河故道的机会，在颍州颍上发动起义，事败，韩山童被元兵捕杀，刘福通率余众攻占颍州。数月之间，陆续攻克亳州（今安徽亳州）、项城（今河南沈丘）、

朱皋（今河南固始西北）、罗山、真阳（今河南正阳）、确山、汝宁（今河南汝南）、息州（今河南息县）、光州（今河南潢川）等地。部众以红巾为号，烧香奉弥勒佛，故称红巾军、红军或香军。各地贫苦人民群起响应，形成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农民战争。

十五年正月，迎立韩山童子韩林儿为皇帝，称小明王，定都亳州，以恢复汉族王朝的统治为号召，国号大宋，建元龙凤。刘福通先任平章，旋杀丞相杜遵道，自为丞相，称太保。十二月，为元将答失都鲁击败，亳州失陷，迁都安丰（今安徽寿县）。次年夏，兵力复苏，收复亳州，遣李武、崔德破潼关入陕。十七年春，部将毛贵入山东，克胶州、莱州（今山东莱州）、益都、滨州（今山东滨县西北）。六月，刘福通攻汴梁（今河南开封）。其后部下关先生、破头潘等率兵入晋、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趋关中，加上毛贵在山东的发展，形成三路北伐之势。但三路之间配合很差，兵力分散，北伐没有成功。这年冬，白不信等在凤翔被元将察罕帖木儿所败，余部入四川。次年三月，毛贵由山东挥师北进，直逼大都，因孤军无援，败于柳林（今北京通县南），引兵退回。五月，刘福通攻克汴梁，以为都城。六月，关先生等攻保定路不克，转攻大同，于十二月克上都，往辽阳。十九年五月，察罕帖木儿发秦、晋元兵围攻汴梁。刘福通坚守百日，粮尽援绝，弃城走安丰。从此据守一隅，没有进展。

二十三年春，张士诚遣部将围安丰，刘福通一面坚守，一面向当时在名义上尚属大宋政权的朱元璋求援。朱元璋来援，败吕珍兵，刘福通与韩林儿一起被接至滁州（今安徽滁县）。二十六年，被朱元璋遣部将廖永忠沉于瓜步（今江苏六合县南瓜埠）江中。

【徐寿辉】

（？～1360）元末天完红巾军领导人。一名真一（或真逸）。罗田（今属湖北）人。布贩出身。至正十一年（1351）八月，与麻城铁工邹普胜等在蕲州（今湖北蕲春南）利用白莲教组织起义。部众以红巾为号，故称红巾军。十月，攻克蕲水（今湖北浠水），被拥立为帝。国号天完，年号治平，建都蕲水，以邹普胜为太师。十二年，遣将丁普郎、杨普雄、项普略、况普天、欧普祥、陈普文、赵普胜等分兵四出，先后攻克今湖北、江西、安徽、福建、浙江、江苏、湖南的许多城市和地区。所到之处以“摧富益贫”、“弥勒佛下生”等口号发动群众，得到贫苦人民的广泛响应，沉重打击了各地官府和地主富豪。但因兵力分散，流寇主义严重，得地大多不能坚守，逐渐被元军和地方武装击败。十三年底，元军反攻获胜，蕲水失陷，徐寿辉等避入黄梅山及沔阳湖中。

十四年，元军慑于刘福通、张士诚等农民起义军势力壮大，抽调长江中游兵力前往镇压。天完兵势复振，于次年再次攻取湖广、江西的许多地区。十六年正月，天完迁都汉阳，但徐寿辉本人受丞相倪文俊操纵，虚有帝名。次年九月，倪文俊企图杀徐寿辉降元，事败，被部下陈友谅杀死，天完实权转归陈友谅掌握。十八年夏，陈友谅攻克龙兴（今江西南昌），徐寿辉欲往，陈友谅不从，遂止。次年十二月，徐寿辉仍欲往

龙兴，至江州（今江西九江），陈友谅伏兵城外，尽杀其左右部属。陈友谅即以江州为都城，挟持徐寿辉，自称汉王，一揽大权。二十年闰五月，徐寿辉被陈友谅杀于采石，天完亡。

【陈友谅】

（1320～1363）元末大汉政权的建立者。湖北沔阳人，家世业渔。年轻时曾为县吏。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后，参加徐寿辉、邹普胜、倪文俊等人领导的天完红巾军，初为簿书掾，后以功升元帅。元至正十七年（1357）九月，倪文俊谋害徐寿辉未成，逃奔黄州，陈友谅乘机袭杀倪文俊，并其部众，自称宣慰使，随后改称平章，掌握天完实权。此后两年继续进行反元战争，攻取安庆、池州、龙兴（今江西南昌）、瑞州（今江西高安）、邵武、吉安、抚州、赣州、信州（今江西上饶）、襄阳等地。

陈友谅在反元战争中竭力争取汉族地主阶级合作，收罗了不少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知名的有元兵部尚书黄昭和进士解观等人。同时，他在天完内部制造分裂，篡权夺位。至正十九年九月，陈友谅杀害了在反元战争中功劳卓著的天完将领赵普胜。同年十二月，杀徐寿辉左右侍臣，挟持徐寿辉，自称汉王。次年闰五月，杀徐寿辉于采石，自立为帝。建国号大汉，改元大义，以恢复汉族王朝的统治为号召。仍以邹普胜为太师，张必先为丞相，张定边为太尉。

大汉政权建立后，一面继续进行反元战争，一面把军事重心放在对邻境朱元璋部的战争上。陈朱之间的战争是封建统一战争，前后进行了三年多，历龙湾（至正二十年闰五月）、江州（二十一年八月）、鄱阳湖（二十三年夏）几次重大战役。大汉将士多数是天完旧属，对陈友谅的篡权夺位深为不满，在战争中相继倒戈降朱，使陈友谅接连败北。二十三年八月，陈友谅在鄱阳湖中流矢身亡。陈友谅穷奢极欲，不恤民力，又不善于抓住战机，也是他失败的原因。张定边等护陈友谅次子陈理返武昌，立理为帝，改元德寿。二十四年二月，朱元璋兵临武昌城下，陈理出降，汉亡。

【张士诚】

（1321～1367）元末割据江浙一带的武装首领。小名九四。泰州白驹场（今江苏大丰西南白驹）人，出身盐户，以操舟运盐为业，平时多受富户欺凌。至正十三年（1353），在红巾军起义影响下，与其弟士义、士德、士信及李伯升等十八人，杀富户，招集盐丁，起兵反元，攻克泰州，连克兴化、高邮，拥众万人。十四年正月，据高邮，称诚王，建国大周，改元天祐。九月，元中书右丞相脱脱统大军出征高邮。十一月，高邮城破在即，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听信中书右丞哈麻等言，削脱脱兵权和官爵。由于临阵易将，元军大乱，张士诚乘机出击，大获全胜。百万元军，一时四散，无所从者，多投红巾军。高邮战役是元末农民战争的重要转折。十五年，淮东大饥，张士诚决定渡江南下，遣士德率军取通州（今江苏南通）。十六年正月，渡江克常熟。二月，取平江（今江苏苏州）、松江、常州诸路。张士诚改平江为隆平府，据以为都。七月，克杭州。当时，朱元璋已克集庆（今江苏南京），

张、朱两军开战，张士诚连败于龙湾、常州。十七年，张士德被朱元璋部俘于常熟。张士诚势穷力迫，投降元朝，封为太尉。此后继续与朱元璋争夺地盘，互有胜负。

张士诚骄侈淫逸，怠于政事，大权操纵在搜罗来的地主文人和旧官吏手中。文武官员，竞相积聚财富，生活极端腐朽。至正二十年至二十三年，每年运粮十余万石到大都以支持元朝统治。又乘北方红巾军失败、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之机，扩展地盘，势力南抵绍兴，北逾徐州，达于济宁，西达汝、颍、濠（在今安徽凤阳东北）、泗（在今江苏盱眙北），东至海，拥兵数十万。二十三年三月，遣吕珍袭击红巾军宋政权都城安丰（今安徽寿县），刘福通和小明王韩林儿被朱元璋救出。九月，张士诚自称吴王，以张士信为江浙行省左丞相，不再输粮至大都。

二十五年十月，朱元璋灭陈友谅汉政权后，开始全面进攻张士诚，其方针是先取长江以北通、泰诸郡县，剪其羽翼，然后转取浙西。二十六年十二月，平江被围。次年九月，城破，张士诚被俘至应天（今江苏南京），自缢死。

【李自成】

(1606～1645) 原名鸿基，陕西米脂人，家世业农，父守忠因里役破产。自成以家贫，为人牧羊，略识文字，及长为银川驿卒。明天启、崇祯年间，陕北连年旱荒，农民纷起暴动。崇祯三年(1630)，自成以裁驿卒失业，又以借贷被辱，遂投活动于西川的不沾泥张存孟部。后因张存孟败降，自为一军。

起义的发展和胜利 不久，自成投闯王高迎祥，为八队闯将，转战陕、晋、畿南、豫楚等地。七年，高迎祥农民军被围困于汉中附近峡谷中，自成重贿明总督陈奇瑜，伪称解甲归农，得脱围困。既出栈道，连破麟游、永寿等七县，势力愈强。九年七月，迎祥在陕西盩厔（今周至）战败，被俘牺牲，自成承袭闯王名号，转战于陕南及四川东北部地区。十一年，起义军败于梓潼，被迫出川北上。自剑州（今四川剑阁）入甘肃，又走避宁羌（今陕西宁强）。六月至汉中。是时农民军首领大多败降，唯李自成农民军仍坚持战斗。是年冬，明三边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孙传庭设伏于潼关原，起义军损失过重，潜伏陕南山区。十二年，避走巴东。十三年二月，自成军又在奉节鱼腹山失利，为避实就虚，乃走大宁（今四川巫溪）、竹山，返陕南，再次潜伏商雒山（今陕西商州东南）中。

同年，河南省发生严重灾荒，农民纷起暴动。十一月中旬，起义军经陕南商州突出武关，转战河南，农民争附，连下豫西南各州县。不久，文士牛金星、宋献策、李岩等先后投奔起义军。十四年初下洛阳，杀明福王朱常洵，开仓济贫，声势迅速扩大。此后，三次围攻开封，连获项城、襄城、朱仙镇、郏县、汝宁五次战役的胜利，执杀明兵部尚书陕西总督傅宗龙、汪乔年及陕督杨文岳等，大败陕督孙传庭。明军主力被消灭，起义军控制河南全省，部众近百万，其他农民军首领如罗汝才、袁时中等多归附自成，李自成起义军成为明末农民起义军的主力。

自占领洛阳始，李自成渐将过去的

流动作战改为每得一城，分兵据守的军事战略，十六年正月克承天（今湖北钟祥），打出“剿兵安民”旗号，散发“三年不征”传单。寻移檄黄州，揭露朱明暴政，宣传自己兴仁义之师，拯民于水火的作战宗旨。两年多席卷河南五府数十州县，及湖广荆、襄诸府。十六年二月，改襄阳（今湖北襄樊）为襄京，成立新顺政府，自成自号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罗汝才为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辖区西起潼关，东至归德（今河南商丘）、汝宁（今河南汝南），北滨黄河，南至松滋、枝江、澧州（今湖南澧县），派遣地方官吏者凡七十多州县。



李自成

起义军雄据荆襄，遂图谋取京师。李自成采纳谋士顾君恩之策，先取陕西，作为根据地。十六年九月，起义军与明孙传庭兵战于河南郏县，深沟高垒以疲明军，并利用连日阴雨，明军粮运不继之际，遣轻骑出汝州（今河南临汝）断截明军粮道，大败孙传庭，杀伤明军四万多人，获器仗辎重数十万计，传庭奔潼关。此后起义军分两路进兵陕西，一路经淅川下商州（今陕西商州）入陕南；自成则亲率大军趋潼关。十月，陷潼关，明军溃败，传庭战死。十七年正月，起义军攻克西安，乘胜取宁夏、兰州、西宁、永昌、庄浪等地。

起义军占领西安后，即正式定国号为大顺，改元永昌，以崇祯十七年为永昌元年。并改西安为长安。李自成改名自晟，称王。同年二月，起义军分两路进攻北京，一路由先已进入山西的大将刘芳亮等率领，从平阳（今山西临汾）经阳城，越太行山出豫北，先下卫辉（今河南汲县）、彰德（今河南安阳）等地，然后经真定（今河北正定）北上，以牵制明朝南路援军；一路由自成亲自率领，渡黄河，下太原，传檄各州县，揭露朱明种种罪状。山西农民群起响应，各府州县望风而下，自成遂率军北上，经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南下，三月十八日围困京师。次日攻入北京。明思宗朱由检自缢于煤山（今景山）。明朝灭亡。

政权建设　起义军在襄阳建立新顺政权之时即曾设官置司，中央置上相、左辅、右弼、六政府（相当于六部）侍

郎、郎中等官，地方设防御使、府尹、州牧、县令。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后，又增置六政府尚书，设弘文馆、文谕院、谏议等官，并封爵五等，大封功臣。

占领北京后，大顺中央政治机构在襄阳，西安两次建置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委派官吏，改内阁为天祐殿，牛金星继任首辅。六政府尚书分别为：吏政府尚书宋企郊，户政府尚书杨玉休，礼政府尚书巩焴，兵政府尚书喻上猷（一作侯恂），刑政府尚书安兴民（一作耿然明），工政府尚书侯恂（一作黎志陞）。尚书下设侍郎、郎中、从事、员外等职，充实和完备了各部朝官。又改翰林院为弘文馆，六科给事中为六政府谏议，十三道御史为直指史，太仆寺为验马寺，尚书宝寺为尚玺寺，通政使为知政使。其余光禄、大理、太常、鸿胪、国子监等仍沿袭前明旧名。所委官员少数由举监生员充任，其余绝大部分为前明降官。地方文武官吏，改巡抚为节度使，布政司为通会，兵备为防御使，知府为府尹，知州为州牧，知县为县令。并开科取士，选拔新人出任各级官吏。

武职亦改前明武官之称，改五军都督府为五军部，仍设左右都督。又改总兵为正总权，副将为副总权，守备为守旅，把总为守旗。但职名并未统一，有的仍沿用总兵、副将等称。其专事征伐的有，权将军，一品；副权将军，二品；制将军，三品；果毅将军，四品；威武将军，五品；都尉，六品；掌旗，七品；部总，八品；哨总，九品。权将军有田见秀、刘宗敏；制将军有李过、李岩、贺锦、刘芳亮、袁宗第、刘希尧等，其余授果毅将军、威武将军等衔者凡五十余人。

自成在北京建制的同时，继续分兵略地，委派地方官吏，建立基层政权。北直、山东、河南、苏北、皖北各地州牧县令纷纷上任。降将马科则率军进攻四川，川北州县也多降附置官。

是时大顺版图，东自山东，西至甘宁，北沿长城，南达江淮，掩有北直、山东、山西、陕西、河南五省，西北甘肃、青海、宁夏的一部分，川北保宁地区若干州县，及今江苏、安徽淮河流域地区，长江流域则有湖广的荆州、襄阳、承天、德安四府等地。

政治经济纲领政策 起义军起义过程中，针对明朝地权集中与赋税繁重的情况，提出“均田免粮”口号。攻占西安后，又以“贵贱均田”及“五年不征”相号召。在河南等地到处传播“不当差、不纳粮”的歌谣。后因“均田免粮”纲领属于平均主义的空想，并未真正实行，只是个别地方官曾经实行过改变封建地权的措施。如山东诸城县令到任之后，即以劫富济贫之说，令产不论远近，许业主认耕；在某些地区大顺地方官府还默许农民进行自发的夺地斗争。起义军亦实行籍没富室政策，以解决军饷，兼济贫穷。李自成初下洛阳，没收福王藩府及宦家巨室存积的粮食和大量金钱，以其中一部分赈济贫民。以后每攻占一个城镇，常采取类似措施。占领西安后，继续以“劫富济贫”相号召。但在这一口号下，劫掠平民、殃及无辜之事亦时有发生。起义军还针对地方为考中的举人进士树建牌坊，下“毁坊之令”。

起义军还实行平买平卖，保护工商的政策。这种政策自崇祯十四年占领河南起，始终执行。起义军进北京后，令

市民照常营业，不少地区工商业照常进行。山东畿辅运河航行的商船不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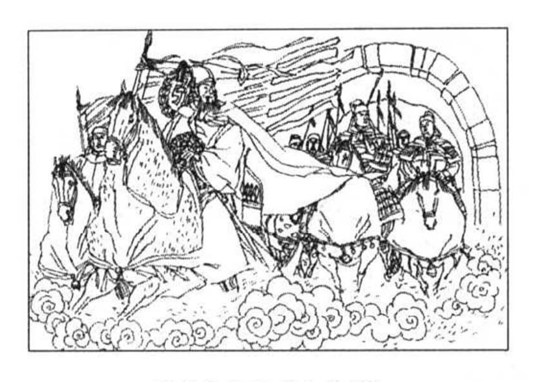
起义的失败 起义军占领北京后，北方的劲敌只余驻防山海关外的明总兵吴三桂。自成虽认识到三桂拥有重兵，事关边防，但失于轻敌，仅派降将、权将军唐通和降官、兵政府侍郎左懋第携金银锦缎前往招抚。三桂先接受招抚，后闻自成在北京向明官追饷，并闻家属被拘，遂归山海关起兵反叛，并向清军求援。自成大怒，率刘宗敏、李过东征，四月二十一日至山海关。为防三桂东退，自成出奇兵二万绕至三桂军后，自己则率大军从西面合围夹击。在吴三桂军动摇之际，清多尔衮发兵夹击。因众寡悬殊，两面受敌，农民军势渐不支，败退北京。

农民军的战败引起北京人心惶恐。明降官纷纷南逃，各地官绅地主也纷起反噬。尤其严重的是，起义军的很多将官经不起都市豪华生活的诱惑，鹜声色，贪财货，分据前明大官住宅，日趋骄奢淫逸，士卒也各身怀重货，无有斗志。斗争严峻，军心涣散，纪律松弛，形势十分不利。永昌元年（1644）四月二十九日，自成仓猝即帝位，次日即离北京南下，经晋入陕，试图仍以陕西为基地再起。入陕后，李自成令李过、高一功拒守陕北，自己拒守西安。在清军进逼下，李过、高一功退至陕南，又沿秦楚边界，经川东至荆门、当阳南下。自成也于次年正月退出西安，自蓝田、商州经武关退守河南，又经襄阳、承天、德安（今湖北安陆）退至武昌。五月转战至今湖北东南各州县。九月至九宫山（今湖北通山），为地主乡团所围困。李自成牺牲，余部由刘宗敏、李过率领南下，联明御清。

【张献忠】

张献忠（1606～1646）字秉吾，号敬轩，延安卫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人。家贫，曾在延安府（今属陕西）充捕快手，继投边营。崇祯三年（1630），陕北连年旱荒，农民纷起暴动。是年十月，农民军首领王嘉胤据府谷，破河曲。献忠率米脂十八寨农民应之，自号八大王，人称“黄虎”。翌年，献忠已成为农民军三十六营中的一营之首，转战陕豫。八年，东征皖北，众逾万人。九年闯王高迎祥被俘死，献忠一军称最强。同年秋，献忠义军自均州（今湖北均县）与老回回马守应等攻襄阳（今湖北襄樊），又联合罗汝才、刘国能等人东下，与久据皖中英山、霍山的贺一龙、贺锦合营，转战至淮阳。十年春，转战太湖、蕲州（今湖北蕲春西南）、黄州（今湖北黄州）、安庆等地，破和州（今安徽和县）、含山、定远，众至二十万。同年秋，明军集中兵力，加强部署，进行反扑。起义军连遭失利，先走麻城，后西退至谷城。为保存实力，献忠于十一年五月伪降于明总理六省军务兼兵部尚书熊文灿。

献忠伪降后，名义上归明朝节制，实际惟向熊文灿催索饷银。他屯兵数万于谷城，打造武器，训练士卒，为再举义旗进行准备。十二年五月，再起，夺取库藏，释放狱囚，诛杀地方官吏，谷城、房县所驻明军多投降起义军。七月于房县西之罗猴山败明军左良玉部，斩获甚巨。熊文灿因此弃市，左良玉降秩三级。献忠军威名大震。十月，明兵部



张献忠大破“十面网”

尚书杨嗣昌督师至襄阳，部领各路兵凡十万，以“四正六隅”之策进剿起义军。十三年春，玛瑙山等役义军连败，退于兴归山区，收集散亡。后转战于湖广、四川、陕西三省交界地带，数月后连破新宁（今四川开江）、大竹、大昌（今四川巫山北）、开县，寻连克川东各州县。又针对杨嗣昌围剿战略，采取“以走致敌”之计，自十三年七月至十四年一月，北起广元，南至泸州、南溪，西起成都，东至巫山、夔门（今四川奉节），义军足迹几遍全蜀。明军疲于奔命，只得尾随其后，问其所向。十四年二月，献忠突然率军出川入楚，攻占襄阳，杀明襄王朱翊铭，发库藏银赈济饥民。杨嗣昌被迫自缢，其围剿战略彻底失败。张献忠起义军开始进入极盛时期，转战河南、湖北及皖中北部各州县。十六年，又在蕲黄一带号召农民参军，队伍迅速扩大，五月取武昌，执明楚王朱华奎以王府所存银钱散济贫民。改武昌为天授府，以为京都，称大西王。建制置官，开科取士，蕲、黄一带二十一州县悉附。八月，弃武昌西进，复南下蒲圻、嘉鱼，克长沙。又攻占常德、宝庆（今湖南邵阳）等府。分兵进攻江西。十月，连破永新、吉安、萍乡、袁州（今江西宜春）、安福、万载等城。十一月克建昌（今江西南城），继下抚州（今江西临川）、南丰。起义军在楚赣之间进兵神速，所至辄破，每使敌军猝不及防。当时，湖南大部、湖北中南部、江西中部、广东北部以及广西全州已皆在农民军控制之下。

农民军占领长沙后，于所克州县设置官吏，传檄远近，令所属州县民众照常营业，宣布钱粮三年免征。同时严肃军纪，严禁杀掠。农民军还在常德刑杀宗室贵族及横暴官绅，并将杨嗣昌家霸占的土地还给农民。故湖南、江西农民群起响应。

十六年岁末，张献忠决计入川建立基业，遂率军打进四川。十七年正月下夔州、万县、涪州（今四川涪陵）。继由江津顺流东下，六月克重庆，执杀明四川巡抚陈士奇。八月克成都后，分兵略地，先后下四川州县五六十。十月，以成都为西京，建立政权，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崇祯十七年为大顺元年，并设置内阁和六部，对前明投顺官吏加以任用。以汪兆龄为内阁大学士兼右丞相，严锡命为大学士兼有丞相，胡默为吏部尚书，王国宁为户部尚书，吴继善（一云江鼎镇）为礼部尚书，龚定敬为兵部尚书，李时英为刑部尚书，王应龙为工部尚书。还建置各院监寺科道，委派官吏。地方政权分府、州、县，分设知府、知州、知县等官。同时统一军制，共编一百二十营，营设总兵。最高武官为将军，有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次有都督多人。为收罗人才，还开科取士，所取进士举人分别选授中央及地方官吏。为吸取外国先进科学技术，聘请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为“天学国师”，询问西

方各国政事、天文、数学等方面的知识。二人曾为献忠制作天球仪、地球仪和日晷等。

张献忠在四川严厉镇压横暴地方的官绅和地主，但措施过激，波及面过宽。起义军内部则严格约束士卒，不许淫掠。对违纪者有由“捆打”至“枭示”的处罚，但往往禁而不止。还释放狱囚，散府库金银赈济贫穷。在起义军占领时期，过去曾受官绅地主压迫的奴仆或纷起暴动响应献忠，或向起义军地方官府告发故主罪状，使其受到制裁。起义军尤注意团结少数民族，派人到各地招抚各少数民族，免其三年租赋。除个别部族外，四川少数民族多行归附。为保持过去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茶马贸易，献忠还任命雅州（今四川雅安）知州王国臣为茶马御史，以司其事。

献忠占据四川时期，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已在清军进攻下逐渐败亡（见李自成起义）。清军占领黄河流域各省后，分兵南下。清顺治二年，派人入川向献忠招降，献忠严加拒绝，并召集诸将计议征伐。三年八月，清兵逾剑阁（即剑门关）入阆中。献忠率军迎击，至西充的凤凰山，清兵猝至，因疏于防备，未及战斗，献忠已被清兵射死，起义军大败。余部由孙可望、李定国等率领，南下云贵，联合南明永明王共同抗清，康熙元年（1662）最后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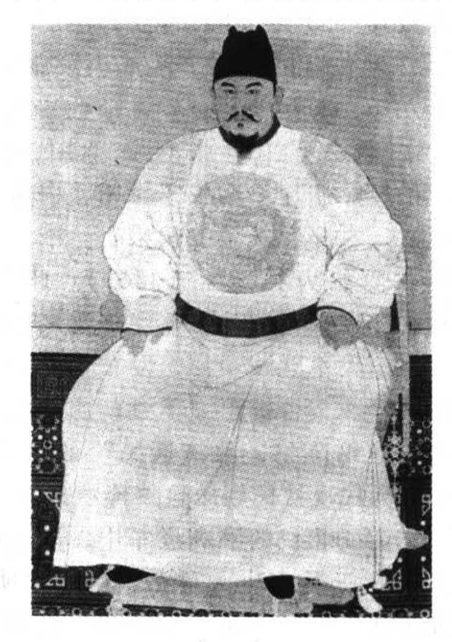
【朱元璋】

（1328～1398）明朝开国皇帝。祖籍为江苏沛县，其祖、父为生活所迫，一再迁徙，最后定居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太平乡孤庄村。朱元璋幼名重八，参加农民起义军后改名元璋，字国瑞。

反元建明　朱元璋幼时曾为地主放牛。十七岁时，因父、母、兄皆死于瘟疫而孤，不得已入皇觉寺为僧。不久以行童游食于淮西一带。深受后来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彭莹玉所进行的秘密反元宣传的影响。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震撼全国的红巾军农民起义爆发。次年朱元璋投奔起义军郭子兴部。他以智勇过人，得为子兴心腹，并娶其养女马氏为妻。后继郭子兴而成为义军首领，在家乡一带逐步扩充队伍，随后克滁州、援六合、下和州，势力渐增。他以儒士冯国用、冯国胜、李善长等人为谋士，并采纳了他们的以金陵（今江苏南京）为根据地以定天下和建立帝业的建议。

至正十五年，农民起义军领袖刘福通拥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在亳州称帝，号小明王，国号宋。韩林儿任命朱元璋



朱元璋

为左副元帅。不久，朱元璋率军断缆渡江，取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下太平（今安徽当涂），并于次年攻占集庆（今江苏南京），改名应天。小明王升其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此后，朱元璋以应天为根据地，借东邻张士诚、西邻徐寿辉、北邻小明王等反元势力，唯南面有元军的有利形势，相继攻取常州、江阴、常熟、徽州（今安徽歙县）、扬州等地；并接受徽州老儒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在应天屯田，兴修水利，恢复农业生产，增强经济实力，保证了军事供给和需要，安定了后方。至正十九年，小明王升其为仪同三司、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

朱元璋消灭东南的孤立元军后，即开始与元末各割据势力展开较量。至正二十年，朱元璋在江东桥计败劲敌陈友谅，西入江西。二十三年他亲解小明王安丰之围，迎其往居滁州，得拜为中书右丞相。同年，与陈友谅决战于鄱阳湖，友谅败死。二十四年，自立为吴王，建置百官，大量招纳儒士组成决策集团。二十六年，朱元璋发布声讨张士诚的檄文，次年破平江，俘张士诚。二十六年底，他又遣使迎小明王于滁州，中路沉之于江，农民起义军政权宋亡。于是朱元璋改明年为吴元年（1367）。此后，他在南征浙东方国珍、福建陈友定的同时，派出大军北伐中原，发布告北方官民的文告。文告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纲领，对北方人民反抗民族压迫颇具号召力。

在南征北伐的顺利进军中，朱元璋于吴二年正月在应天称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七月，徐达率领的北伐军逼近大都，元顺帝妥欢贴木儿携后妃、太子仓惶出逃上都，宣告了统治中国九十八年的元朝的终结。此后，统一战役仍在继续，同年，汤和率领的南征军灭方国珍、陈友定，福建、两广尽入版图。洪武四年（1371），四川平定。十四年平云南。至二十年，山西、陕西以及东北平定，全国统一。

统治措施 朱元璋削平群雄，统一南北的同时，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着手稳固新建王朝的统治，制定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和发展。

朱元璋在中央废中书省和丞相，政归六部，六部尚书直接听命于皇帝，结束了自秦汉以来存在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加强了皇权。又改监察机构御史台为都察院，与大理寺、刑部合称"三法司"，其职权是"纠劾百司，辨明冤枉"。在地方废行中书省，设立承宣布政使司，又设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合称都、布、按三司，分掌地方民政财政、刑法、军事，各自直属中央，改变了原行中书省长官独揽地方大权的局面。

朱元璋又创立了卫所制（见都司卫所），于全国军事重地设卫，次要地方设所，统于各地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司隶属于中央的大都督府。为了削弱将领的军权，他在废丞相制的同时，又于洪武十三年废大都督府，设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分别管理京师及各地卫所和都指挥使司。五军都督府和兵部各自掌管军籍和军政，遇有战事，皇帝亲自选官派军，战后官归将印，军回卫所，以防止大将拥兵自重，危及皇权。卫所还实行屯田，耕战结合，对明初生产力的恢复起了积极作用。

经元末战乱，明初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社会生产亟待恢复。朱元璋实行安养生息的经济政策，采取奖励垦荒，实行民屯、军屯，商屯等屯田制度，兴修水利，在全国推广桑、麻、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等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成功地使明初社会经济较快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他还下令清丈土地，编制赋役黄册、鱼鳞图册、建立里甲及粮长制，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使封建国家的赋税和徭役制度得到保障。他的限制和打击旧豪族地主、规定工匠轮班制、放松对手工业者的人身控制等政策，对恢复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也起了促进作用。

为充实官僚机构，朱元璋采取荐举、学校、科举三途并用的办法选取官吏。他重视人才的录用，曾多次命中央及各地官吏推举人才。他鉴于元代官吏贪污腐败以至亡国的教训，决意整顿吏治。甚至以剥皮囊草来惩办贪官污吏，办法之严酷为历史上所罕见。他的厉行整顿虽有一定效果，但因其性格猜忌多疑，也任意滥杀了不少无辜。

为使朱家王朝长治久安，强化皇权，解决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朱元璋借胡惟庸案、蓝玉案大肆诛戮功臣；为保证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他制订了《明律》和《大诰》，还特别设立锦衣卫特务机构，充分显示出以强化封建专制帝王的权威。

明初，朱元璋还实行分封制，将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分封到全国各地，以巩固统治。由于北元回归大漠后保有相当强的军事力量，对明朝北部形成极大威胁，故朱元璋分布在北方边防线上的塞王兵力尤为雄厚，洪武后期，这些塞王已掌握边防军事指挥权，防止了军权旁落。但他的第四子朱棣（即明成祖朱棣）后来却因此夺得他的继承者建文帝的皇位（见靖难之役），这是朱元璋所始料不及的。

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1368～1398），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影响深远，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并奠定了明朝二百多年的统治基础。但他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发展到空前程度，以及由此对社会经济产生的阻碍作用，也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转入后期的历史特色。

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明太祖朱元璋卒，年七十一岁，葬于南京孝陵。永乐元年（1403）谥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嘉靖十七年（1538）增谥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徐达】

徐达（1332～1385年）明朝初年名将。字天德，濠州（今安徽凤阳）人。世代农家出身。元朝末年参加朱元璋军，与常遇春同称才勇。朱元璋攻灭张士诚，北上灭元，都用他为大将军。明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年）率军攻克大都（今北京），分兵定北方各地。以后又连年出击扩廓帖木儿。他有谋略，行军持重有纪律。封魏国公，死后追封中山王。

元朝顺帝至正十三年（一三五三年）夏天。淮河流域的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县太平乡。

这是五月的一天，太阳底下有杆红旗插在一座草屋前面。一群年轻的庄稼汉子，正围着几个头裹红巾的士兵高声谈笑，亲热异常。



徐达

为首的士兵头儿，是位大个黑脸青年，高额头长下巴，模样古怪中带着威严。他一边亲热地和大家拉手拍肩，一边眉飞色舞地讲道："乡亲们，我这次回来，是奉郭元帅的将令来招兵买马、扩充队伍的。如今兵荒马乱，大家伙守在这穷乡僻地，既要忍饥挨饿，还得担惊受怕，不如干干脆脆出去闯荡一场，或许日后还能闯出个什么名堂来。蒙古人的气数已经快到尽头了，大家都知道濠州城被围困了七个月，五万多官兵硬是打不下来，最后，连他们的主将贾鲁也莫名其妙地得病死了。贾鲁这一死，官军便成了一群无头苍蝇，只好退兵回徐州去了。"

"嘿！重八大哥，我们心里想的跟你说的一样。"大个子徐达一拍大腿喊道："大家早就有心想投奔红巾军，杀几个蒙古官军出出几辈子的怨恨，只是没人牵线。现在你回来了，这下好了，大家就跟你走。你还记得咱们小时候放牛肚子饿得难受，杀了田主家的小牛烤肉吃的事吗？只要将来能有个不愁吃穿的好日子，弟兄们愿意跟着你打到天边去。"

听了徐达这么一说，周德兴、郭兴、郭英、费聚、邵荣等人也都异口同声地表示同意。

这位名叫"重八"的士兵头目，就是后来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不过这时，他还未成什么大气候。一年前，他是个穷途无路的游方和尚，出家所居的皇觉寺被元兵一把火烧成了残垣断壁，只好走"逼上梁山"的造反之路。

朱元璋这次带着几个士兵回到家乡，是来招募士兵的。虽说身份才只是个小头目，但毕竟今非昔比了。左邻右舍的乡里乡亲，儿童时代一块长大的伙伴朋友，闻讯后都聚拢来了。其中徐达小时候和朱元璋一块放过牛，感情十分友好。这次见面后，两人又谈得非常投机。

在朱元璋和徐达等人的奔走联络、游说鼓动下，不到十天工夫，便招募到七百多人。这些人都是世世代代的乡里亲朋，远近多少都有些宗族关系，沾点婚姻亲戚，一旦有人出头号召，自然就会群起响应。他们后来便成为朱元璋军中的骨干将领，史书上称为"淮西老将"。

当朱元璋带着新招募的队伍回到濠州城里，元帅郭子兴十分高兴。过了不长时间，他便任命朱元璋担任镇抚职务。从此，朱元璋便一跃而成为带兵官员了。

朱元璋从招募的这七百人中，挑选出二十四名淮西老乡，担任军中的大小头目，其中第一个就是他的儿时好友徐达。

徐达应募投军的这一年，已是二十三岁的小伙子。他比朱元璋小三岁，人长得身材高大，强壮有力，高高的颧骨，性情刚毅，临危武勇敢为。他的家庭，是世世代代务农为生的庄稼户。在徐达从小到大的这二十多年间，淮河流域的

老百姓备受天灾人祸的煎熬，可真是受尽了艰难，吃够了苦头。

在蒙元王朝统治的末期，不只是淮河一带灾祸频繁，民生凋残。在中原地区，由于官府不修水利，黄河连年决口，百姓流离失所，田地荒芜，到处是人烟寥落、凄凉黯淡的景象。

一三五一年（元顺帝至正十一年）五月，反抗蒙元残暴统治的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终于在官府督修河道的工地上爆发了。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短衣草鞋，头裹红巾，手持竹竿锄头，长矛大刀，捕杀官僚，攻占县城州府，开仓散粮，破牢放囚。起义军传唱着“杀尽不平方太平”的歌谣，敲响了蒙元王朝的丧钟。

红巾军大起义如同燎原烈火，迅速燃遍了中原地区和江淮流域。首举义旗的是颍州（今安徽阜阳）刘福通，随后有徐州芝麻李和赵均用、蕲水（今湖北浠水）徐寿辉、湖北襄县孟海马、濠州郭子兴等人继起响应。此外，还有非红巾军系统的浙江台州方国珍、江苏泰州张士诚等起义军，皆各据一方，自立名号，创建政权，把个蒙元王朝像剖瓜似地拦腰截成了许多碎块。

话说在濠州举事起义的郭子兴，祖上原是山东曹县人，打他父亲这代起来到安徽定远县居住谋生。郭子兴兄弟三人因善于经营盘算，逐渐发迹成为当地有名的大家富户。红巾军大起义爆发后，定远、钟离一带的农民揭竿而起，动辄就会合起数千人马。常言道：“乱世英雄起四方，有兵有粮草头王。”一三五二年二月间，早已加入民间秘密宗教弥勒教的郭子兴，招集了几千人，趁黑夜偷袭濠州，冲入州府官衙，杀了元朝州官。然后，郭子兴和起事的头目孙德崖等五人都号称“濠州节制元帅”。

濠州城头红旗一举，远近的穷苦百姓纷纷前来投奔，义军的声势越发壮大。朱元璋在濠州起事后两月投军的。他先当兵卒，不久，就因机敏能干被郭子兴调到帅府担任亲兵九夫长。又过了几个月，朱元璋在军中以勇敢有见识、重义气得人缘而名声四传，郭子兴便把他当作心腹体己看待，还将干女儿马姑娘许配给他为妻。就连“元璋”这个名字，也是郭子兴给他取的。

前面说到濠州被元兵围困，那是一三五二年冬天到次年春天的事情。元兵因主将病死退走后，城里的红巾义军才长长松了口气，由于围城期间折损了不少兵马，朱元璋征得郭子兴同意后，回到家乡招募队伍补充兵员。

再说濠州城里的五个义军元帅，并不是心有宏图远志的人物，相互之间常为了一些小事勾心斗角，消耗实力。就连带头起事的郭子兴，也是心胸狭窄，贪图财货，遇事缺乏决断。而朱元璋却是个胸有大志、心有盘算的英雄豪杰。他看出总待在濠州城里，早晚会出事。所以，他便想打破僵局，开拓新地盘，发展势力。

朱元璋向岳父郭子兴说明心意后，便带着徐达、费聚等二十四人，南下定远县，准备掠地招兵。定远是郭子兴的家乡，他的旗号在这里很有号召力。朱元璋利用这个地利人和之便，连续收编了几支地主武装，再加上陆续前来投奔的人数，几个月的工夫，竟发展到两万多人。对这支生力军，朱元璋重新编制，加强训练。他特别重视军纪，严令不许扰民。

军势壮大之后，朱元璋在谋士冯国用、李善长的参谋下，决定南下攻打滁州（今安徽滁县）。滁州的元军力量弱小，被朱元璋军队一个猛冲便攻占了。不久，郭子兴也从濠州来到滁州驻扎。

一三五五年正月，由于滁州缺粮，郭子兴派朱元璋去攻打和州（今安徽和县），攻取和州后，郭子兴提升朱元璋为总兵官，负责镇守。

从南下定远到攻取和州，徐达一直是朱元璋的得力助手。他不仅作战勇敢，而且善于出谋画策，逐渐显示出了统兵作战的军事才能。朱元璋看到徐达的才干谋略出于众人之上，便在郭子兴面前为他请功，并建议提拔重用。郭子兴采纳了朱元璋的建议，任命徐达为镇抚。

三月间，和州城里的红巾军又闹了一场窝里斗。因濠州缺粮而来到和州就食的孙德崖，与郭子兴难以相处，决定率领自己的队伍离去。朱元璋为了不伤和气，亲自送孙德崖的队伍出城。谁知没走多远，后面传来消息，说是郭子兴将殿后的孙德崖抓了起来。德崖的将士不由分说，也将朱元璋扣押不放，然后，派人通报郭子兴换人。但是两边谁也不肯先放人，都怕对方不守信用。

双方就这样僵持了两天，朱元璋在孙军中险遭人害。在这个情势危急关口，新任镇抚官徐达挺身而出，向郭子兴请求：他愿到孙军中做人质，换回朱元璋，与孙德崖交换。

郭子兴正在不知如何才好，见徐达这样挺身赴险，急忙同意。最后，当孙德崖被放出回到军中后，徐达才得以释放，平安无事。这件事，使朱元璋对徐达心怀感激，更加信任和重用了。

捉放孙德崖这件事，使郭子兴窝了一肚子闷火，气恼之下便得了重病，不久就去世了，郭子兴一死，他的次子郭天叙继任了元帅职位，郭子兴的妻弟张天祐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朱元璋的地位虽说只是第三把手，但因他身边有徐达、汤和、冯国用、李善长等勇将谋士，再加上他招募收编组织起来的军队占多数，所以，实际上朱元璋才是举足轻重的角色。

一三五五年六月一日，朱元璋与徐达、汤和、李善长、冯国用等人率领三万大军，乘船渡江，杀向南岸。与和州隔江相望的太平路（今安徽当涂），是富庶的产粮区，朱元璋决定先占领太平路，而后相机进取集庆（今南京）。

长江南岸的要塞采石矶，是太平城的咽喉之地。元将蛮子海牙早已率弓箭手和长矛手严阵以待。朱元璋的红巾军两次冲击都被元军打退，开战不利。勇将常遇春和胡大海身先士卒，发起第三次冲击，终于杀散元军，登上南岸。朱元璋和徐达等人指挥大军乘胜进攻，一鼓作气拿下了太平城。

元军不甘心失败，弃城而走的蛮子海牙从水路以战船封锁采石；陆路由陈野先率地主武装“义军”数万人直扑太平城。

朱元璋早已做好准备。他派徐达、邓愈两人各率一支精锐骑兵埋伏于城南山中。陈野先仗着人马众多，亲自督促“义军”拼命攻城。就在城上城下攻守双方激烈鏖战之际，南山中的两支伏兵奔袭而来，徐达、邓愈二马当先，从背后杀人“义军”阵中。陈野先前后受敌，惊惧失措，慌忙领军夺路而逃，结果被邓愈活捉。水路元军得知陆路“义军”失利，只好顺流而下奔集庆去了。

太平城转危为安。接着，徐达又受命带数千人马，出太平向东攻占了溧阳、溧水，从南面对集庆形成包抄之势。一五三六年（元至正十六年）三月，朱元璋会合水陆诸军，攻取了集庆城。元朝守将福寿战败身死，军民共计五十余万人归降于朱元璋。

朱元璋取得集庆后，改名为应天府。这时，他的地盘刚得到扩展，周围是元军或其他起义军，处于四面邻敌的状况。于是，他从长计议，决定以应天为中心，先给自己营建一块根据地，而后再作远图。

应天东面的镇江，由元将定定把守。如果镇江落到割据东吴的张士诚手中，就会对应天构成威胁。因此，朱元璋在应天稍作休整，即命徐达统兵进攻镇江。在出兵时，为了严明军纪，朱元璋与徐达商量演了一场“苦肉计”：他故意找徐达的过错，而后大发脾气要从重处治，经李善长等人再三求情，才准予戴罪出征，立功免罪。

徐达被任命为大将军。大军出发时，朱元璋再三告诫道：“我自起兵以来，从不妄杀无辜。你要明白我的心意，严格约束部下，攻取镇江后，不许焚烧杀掠。若有违犯者，定依军法处置。”

徐达顿首领命，率军浮江东下，攻取了军事重地镇江。军中号令严明，百姓宴然。然后又分兵掠取金坛、丹阳等县。朱元璋任命他为统军元帅，驻守镇江。此时，张士诚已占据常州，派水军来攻镇江。徐达于龙潭击退来犯之敌，急派信使请求朱元璋派兵进围常州，以为牵制。朱元璋派三万大军增援，徐诚也派遣兵将驰援常州。

徐达考虑到敌方援军来势锐盛，不易强取，便在常州城外十八里设下两支伏兵，又派大将王均用为奇兵，然后亲自督军迎敌。张士诚的援军遭徐达迎头拦击，又受王均用侧翼横冲，败阵而退。这时，两支伏兵齐发，敌军大溃奔逃而去。徐达擒获敌方两员大将，乘胜挥兵包围常州。

常州被围既久，城内粮草缺乏，军心动摇。徐达与汤和督军加紧攻击，终于在次年三月攻克了常州。朱元璋将常州改路为府，设立长春枢密院，任命徐达佥枢密院事，汤和为枢密院同佥，共同领兵镇守。

四月，徐达又与常遇春等将在朱元璋亲自指挥下，攻取宁国。七月，徐达派前锋将赵德胜攻常熟，擒获张士诚的弟弟张士德。张士德善战而有谋略，为张士诚攻取了浙西大片地盘。他被俘后绝食而死，使张士诚极为沮丧。

一三五八年十月，徐达与邵荣等人联兵夺取了宜兴。这样一来，朱元璋相继取得了应天周围的战略要地，在东面挡住了张士诚西犯的门路；在西面对徐寿辉采取以守为攻的战略。

一三六〇年五月，徐寿辉被部下陈友谅杀害。陈友谅自称皇帝，国号汉。他占有江西、湖广大片地盘，是割据群雄中力量最强、野心也最大的人。他派使者与张士诚相约，东西夹攻朱元璋。然后统率大军沿江东下，来攻应天。

朱元璋命诸将分头埋伏于应天城内外各险要地点，而后派陈友谅的熟人康茂才诈降，诱使陈友谅进入埋伏圈中。伏兵四起之后，陈友谅情知中计，但已无退路。此时，徐达伏兵于南门外，看见朱元璋黄旗挥动，即刻带兵杀出。这一战击溃陈友谅的主力，生俘七千余人，

缴获几百艘战船。

陈友谅乘船逃脱，奔还江州（今江西九江）。

徐达乘胜统兵收复太平，又与诸军会合，攻克安庆。

正当朱、陈两军在江南连续作战的同时，江北的红巾军接连失利，形势危急。一三六三年，投降元朝的张士诚围攻安丰（今安徽寿县），刘福通派人向朱元璋求援，如果安丰失陷，应天就将失去一道屏障。朱元璋带领徐达等将渡江北上救援刘福通。

就在这时，陈友谅乘机发兵六十万，大举进攻，首先包围洪都（今江西南昌）。朱元璋的侄儿朱文正督军死守城池，等待援兵。

七月，朱元璋亲率大军至鄱阳湖，与陈友谅决战。开战第一天，徐达冲锋在前，率部下击退敌军前锋部队，杀敌一千五百余人，缴获一艘大船。俞通海等将发起火攻，烧掉敌船二十余艘。徐达战船着火，敌军乘势反攻。徐达奋不顾身，带头扑灭大火，拼死搏战，与朱元璋派来的援兵一起杀退敌军。

两军于湖上相持不下。朱元璋担心张士诚乘虚进犯，便命徐达连夜回应天负责守备。徐达在应天修城备粮，整顿士卒，警惕防守，使朱元璋得以无后顾之忧。

鄱阳湖一战长达三十六天之久。朱元璋依靠火攻终于大胜敌军。陈友谅在激战之中被飞箭射死，全军失去主帅，溃退回武昌。

一三六四年（元至正二十四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自立为吴王，设置百官，建中书省，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

朱元璋从起兵以来，部下将帅中最著名者有三人，第一位就是徐达，其余两人是常遇春、邵荣。

朱元璋消灭了兵强地广、雄踞长江上游的陈友谅，解决了四面的强敌，自己的军力地盘也更加壮大。他的下一个进攻目标，便是割据东吴的张士诚。

张士诚是淮南泰州（今江苏泰县）人。泰州靠海，居民都晒盐维生。张士诚兄弟几人从小到大，是靠撑船贩卖私盐混光景。他为人仗义疏财，是当地私盐贩子的头目。地方上的大户和官府常常欺侮勒索盐船，人们早就怨恨在心。一三五三年，张士诚趁着天下义军蜂起的形势，带着兄弟朋友共十八位壮士，举事造反。贫苦农民、盐民、无业游民群起风从，很快攻下泰州、高邮，占据了三十六个盐场。张士诚自称诚王，国号大周。

经过六七年的扩张经营，张士诚占地两千余里，盛产粮食，又有鱼盐桑麻之利，人口众多，最为富庶。但他生性持重，待人宽和，遇事缺乏主见，只想守住自己的地盘，无甚大的野心。他手下的武将文臣，大多是当年穷愁潦倒的江湖朋友。如今有了地盘，成了气候，这些人个个贪图享乐，争着修房子建园子，平日里更是伎优声色，歌舞宴乐，已经很快地腐化败落了。

从元至正十六年（一三五六年）起，朱元璋便与张士诚接境，双方互相攻伐，大小冲突不断，僵持了近十年时间。由于朱元璋以全力对付陈友谅，所以对张士诚基本上取守御之态。

张士诚的地盘以长江为界，分为两部分。江南的浙西地区防守比较坚固，

而江北的淮东地区防守则相对薄弱。朱元璋东征张士诚，采用先北后南的策略。元至正二十五年（一三六五年）秋天，徐达受命为总兵管，统率常遇春、胡美、冯胜等将，带领步、骑、水军，渡江北上，进攻淮东地区。

徐达率军很快攻克泰州，活捉守将严再兴等人。然后，分兵命部将刘杰攻取兴化，他自己进兵包围高邮。朱元璋担心徐达深入敌境，无人策应，便命其退回泰州，先攻取淮安、濠州和泗州（今江苏盱眙）。

张士诚为了分散牵制江北的朱元璋军队，出兵攻击江南的宜兴。朱元璋命徐达渡江还击，打退了张士诚的军队，生俘敌士卒三千余人。然后，徐达又还兵江北，攻打高邮。

徐达从江南回师后，经朱元璋同意，以孙兴祖守海安，常遇春统水军为继援，自己与冯国胜一起，很快攻克高邮城，杀死守将俞同佥等人。

高邮既克，朱元璋派使者告喻徐达，乘胜取淮安。

徐达挥兵围城。淮安守将梅思祖等人看到形势严峻，遂开城投降，并献出所辖的泗州。随后，徐达又进兵攻取兴化。这样，淮东地区便基本平定了。

在朱元璋召集文武大臣的议事会上，徐达主张道："张士诚等人骄傲而且反复无常，暴敛民众，荒淫奢侈，这是上天要使他们灭亡。他所任用的骁将李伯升、吕珍之徒，都是卑劣小人，依靠手中兵将追求富贵享乐。执掌政务的黄敬天、叶德新、蔡彦文三人，都是迂阔书生，胸无大计。我愿奉主上威德，率精锐之师出师，声讨兵伐，三吴之地可计日平定。"

朱元璋听后大喜道："你的想法与我完全相合。这样的话，大事一定能够成功。"

七月，左相国徐达受命为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统领二十万大军，出太湖直取湖州（今浙江吴兴）。根据朱元璋"先分其势"的策略，同时由李文忠、华云龙带兵攻杭州和嘉兴。

话说徐达等人率军进至湖州三里桥时，敌方守将张天骐兵分三路迎战。徐达亦分三路进攻，自己居中路。交战不久，常遇春擒获敌将黄宝，其余两路敌军急忙退回城中。

张士诚遣李伯升援救湖州，随后又增派朱暹、吕珍等人带兵六万来援，屯驻于城东的旧馆，筑起五个营寨。另外，还有张士诚的女婿潘元绍驻兵乌镇，为吕珍等人声援。

此时，朱元璋派汤和自常州增援徐达，诸将于东阡镇南的姑嫂桥一带筑起十座营寨，阻绝旧馆方面敌军入援湖州的通道。徐达又遣精兵夜袭潘元绍。元绍遁逃，徐达下令填塞沟渠水港，绝敌运粮之道。

张士诚看到湖州危急，援兵又被阻隔，便亲自带兵来援，但被徐达在皂林（今浙江桐乡北）击败。九月，张士诚又派部将徐志坚以轻舟出东阡镇，欲攻姑嫂桥，不料遇上风雨大作，结果三千余人一起被打败活捉。攻取湖、杭后，朱元璋的第二步便是围攻平江，消灭张士诚。早在围城之前，宁海（今山东牟平）人叶兑曾向朱元璋建议用"销城法"围攻平江。就是在距平江城一箭之地外筑起长围，四面立营，屯田固守，将张士诚困死于城中。

徐达统率大军进逼平江，采用了叶

兑的方法。他屯兵于葑门外，其余常遇春、郭兴、华云龙诸将分段屯驻，修筑长围。又架设起三层的大木塔，居高临下监视城中动静，名为“敌楼”，其上设置有弓弩火铳，又用“襄阳炮”，日夜轰击城中。

平江城外无援兵，内乏粮草，张士诚几次试图突围都被堵死。朱元璋几次派人前去劝降，都被张士诚坚决拒绝。他的部将莫天祐驻守无锡，为平江声援。莫天祐派手下善泅水的杨茂潜入平江，传递消息。杨茂在阊门水寨被徐达部卒抓获。徐达释放了杨茂，向他申明形势大义，收为内应。平江虽被围困，但坚城一时难拔，因而徐达让杨茂继续为平江和无锡之间传送情报，这样，他就可以全部了解敌方的虚实动静。

一三六七年二月，徐达因平江久围不克，遣使向朱元璋请示。朱元璋亲笔写信道：“大将军自随我起兵以来，天性忠义，沉毅有谋，勘乱定难，可比古代豪杰。……今后军中缓急事宜，一切由将军自行定夺。”

徐达得朱元璋手书，遂传令所辖四十八卫将士加紧攻城。有一天，张士诚之弟张士信正在城楼上吃饭，被城下的“襄阳炮”击中，粉身碎骨而死。

城中张士诚听取部将熊天瑞的建议，也制作飞炮，轰击城下。城中的木石用尽，又毁祠庙民房作为材料。徐达传令军中架起木屋，上承竹笆，士卒伏于其下，以挡城上箭石炮火。

九月，平江城中粮尽，军民以枯草老鼠为食。张士诚身陷绝境但仍不投降。徐达下令全军强攻破城！城下战鼓擂动，火炮齐鸣，二十万大军杀声震天，将士人人奋勇争先。徐达督军首先攻破葑门；常遇春攻破阊门水寨，直逼城下。张士诚令枢密唐杰上城督战拒敌。唐杰抵挡不住，交械投降。参政谢节、潘元绍是在城门扎营，此时看到大势已去，也相继投降。

将及黄昏时分，张士诚军全线崩溃。徐达指挥全军从四面八方架起云梯，蚁附登城，冲入城内，与敌军展开激烈的巷战。

张士诚与其副枢密刘毅收拢残兵，尚有二三万人。他亲自督战，在万寿寺东街与徐达军拼杀，但很快就因力量悬殊，又复失利，刘毅也投降了。张士诚仓皇退入他的王宫，身边只剩下几名亲兵。这时，后宫齐云楼大火冲天，张士诚的妻子刘氏点燃了楼下的柴草，自焚身亡。见此凄惨断肠情状，张士诚长叹几声，转身关起房门……

暮色苍茫。平江城中的喊杀声已经微弱。降将李伯升奉徐达之命，前去劝谕张士诚。他匆匆进入宫来，张士诚已悬梁自缢。李伯升让随从赶忙将其解救下来，幸亏气息未绝，许久才缓过气来，但却闭目不语。徐达闻报，命将张士诚押送应天，听候朱元璋处理。最后，张士诚还是在看守之地自缢而亡。

平江既破，城中二十万军民向徐达投诚。徐达与常遇春按事先约定，分平江为两半，各自驻守，安抚民众，并下令全军将士各悬一块小木牌，上书军令：“掠民财者死，拆民居者死，离营二十里者死。”

徐达率诸将从平江凯旋归至应天，朱元璋亲到戟门迎接，颁下敕书表彰诸将，然后按功行赏。徐达进封为信国公，常遇春为鄂国公。

攻灭张士诚后，朱元璋派朱亮祖、

汤和等人率军征讨浙东的方国珍，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便削平了这个称雄浙东二十年的割据者。与此同时，朱元璋决定了北伐灭元大计。

一三六七年十月，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二十五万大军，北取中原。行前，朱元璋又当面告谕众将："大军出征是奉上天之命，讨平祸乱。因而命将出征，重在选人得当。治军严明，战胜强敌而攻取城池，具有统率才能的，莫如大将军徐达。勇敢无畏，敢当百万之众，冲锋陷阵，所向披靡，莫如副将军常遇春。我不担心常遇春打不了硬仗，只担心他会轻敌。身为大将而好与小将争胜，这可不是我所希望于诸位的。这次出师北伐，如果大敌当前，以遇春为先锋，与冯胜分为左右两翼，各率精锐冲击向前。薛显、傅友德都是勇冠三军，可各领一支人马，独当一面。大将军徐达专门主持中军，责任是运筹决胜，策励诸将，切不可轻举妄动。"

徐达统率北伐大军从淮安出发，先进入山东。配合北伐主力的偏师，由征戍将军邓愈率领，从襄阳北略南阳，以分散元朝兵力。北伐军所过之处，张布"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讨元檄文，告谕官吏和民众。讨元檄文起了巨大的宣传号召作用，许多州县纷纷投降，北伐军进展顺利。

十一月，徐达指挥大军攻克沂州（今山东临沂），然后遵照朱元璋的指示，命部将韩政扼守黄河天险，张兴祖攻东平、济宁，自己亲率大军攻克益都。十二月，大军兵临济南，元将达多尔济（朵儿只）开城投降。徐达命指挥陈胜镇守济南，自己复还益都，分兵攻取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山东掖县）。北伐军从誓师出征起，前后三个月的时间，山东基本被平定。徐达将山东各地的土地甲兵账册图籍等一并上奏朱元璋。

在北伐军连连攻取山东州县的捷报声中，一三六八年正月四日，朱元璋在应天登基称帝，建立起朱明皇朝，年号洪武。新朝建立，自然要封赏功臣，任命百官。朱元璋任命的左、右丞相，一个是李善长，一个是徐达。朱元璋立长子朱标为皇太子，李善长秉任太子少师，徐达秉任太子少傅。

二月，明北伐军沿黄河西进直入河南境内，连克永城、归德、许州（今许昌），直逼陈桥。元汴梁（今开封）守将左君弼献城投降。徐达留都督佥事陈德守汴梁，统率大军向河南（今洛阳）进发。

四月，明北伐大军自虎牢关进至塔儿湾（今河南偃师境内），元将脱音特木尔统五万大军列阵于洛水北岸。副将军常遇春单骑先闯敌阵，射杀敌前锋一人，纵马大呼恃勇冲锋，徐达指挥大军继后，以不可阻挡之势全线冲击，元军大溃。脱音特木尔逃往陕州，明军乘胜追击五十余里。外围之战取胜，明大军扎营于洛阳北门外。元守将李克彝弃城而逃，梁王阿抡只好出城投降。

明军继续西进，攻克陕州（今河南陕县），直逼天险潼关。元守将李思齐、张思道闻明大军将至，慌忙丢弃辎重奔向凤翔。明军先锋都督通知冯宗异引兵进入潼关，向西直至华州（今陕西华县）。

至此，明北伐大军平定山东、河南，又据潼关堵住关中元军东下出路，对元

大都形成了月牙形的包围态势。

五月，朱元璋驾幸汴梁，大会诸将，厚加慰劳，同时研究下一步的进军方案。

朱元璋询问新的战略部署，徐达道："自我大军平定山东、河南，元军统帅扩廓帖木儿在太原观望不进，如今潼关也被我军控制，张思道、李思齐失势西窜，元大都的声势已绝。我军乘胜直捣其城，可不战而得之。"

朱元璋看看地图道："你讲得很好。不过，北方土地平旷，利于骑兵作战。你应当挑选部将领兵作为先锋，然后督水陆大军继其后，用山东粮食为军饷。大都没有了外援，城内人心自然惊溃不安，必定会被我大军攻克。"

徐达又向朱元璋请示道："如果大都攻克而元朝君主北走出关，我军是否穷追不舍？"朱元璋回答："元朝气运衰微，定会自行灭亡，不必烦劳我军穷追。一旦元朝君主逃出塞外，我军宜固守边关疆土，严守其侵犯便是。"

七月，朱元璋返回应天，他临行一再告谕徐达等人："中原人民，苦于动乱已经很久了。朕命你们北伐，就是为了解救人民。诸位将军攻克城镇，切勿抢掠，切勿焚烧，一定要让市场照样买卖营业，让百姓各安其生。"

徐达、常遇春率诸将会于河阴（今河南荥阳），然后分遣兵马进入河北。闰七月，徐达于临清招集诸将，部署具体进军方略，命傅友德开辟陆路以通步、骑兵，都督副使顾时负责疏浚河道以通水军。

明北伐军沿运河推进。常遇春首先攻陷德州，接着又克长芦（今河北沧州）、直沽（今天津）。据守天津的元丞相也速从海口望风而逃，大都震动，人心惶惶。

明军进至河西务（今河北武清东北），大败元军，生俘二百余人，乘胜推进到通州（今北京通县），又利用大雾天气，伏击元守军，守将布颜特穆力战身死。

通州失守的消息传到大都皇宫之中后，元顺帝大为恐慌，集合后妃、太子说道："今日岂能重蹈北宋徽宗和钦宗亡国被俘的覆辙！"他不顾臣下的劝谏，以保命为先，于闰七月二十七日深夜，带着后妃、太子从建德门仓皇而出，经居庸关北走至上都开平（今内蒙多伦西北）。

八月二日，徐达率军进至大都齐化门，士兵填平城下的壕沟，进入城中。徐达登上齐化门城楼，兵士将元顺帝留下守城的淮王、左右丞相等人押到。这些人不肯投降，被徐达下令处死。其余的元朝大臣将士都以性命为重，愿意归顺明朝，他们都受到宽大处理，无一人被滥杀。徐达下令查封城中的府库图籍宝物，派指挥张胜带一千兵士守卫皇宫，同时严令所有将士，不得骚扰百姓。由于朱元璋早有告诫，以及徐达严厉约束，北伐军纪严明。大都城中官吏人民生活安定，一如平时，街市上的店铺买卖营业也未曾停顿。

攻取大都，标志着蒙元朝统治中国的结束。徐达即刻遣使向应天献捷，又命傅友德、华云龙负责整修城垣。朱元璋接到捷报后，宣布大赦天下；下令改大都为北平府，由孙兴祖、华云龙驻守；诏命徐达、常遇春、汤和、冯宗异等人率大军攻取山西、陕西等地，扫清元朝的残余势力。

大都攻克，元朝灭亡。但元顺帝逃

至上都，仍然保持着完整的政府机构，元军的力量仍然不可轻视。西北地区尚在元残余势力的控制之下。

明朝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年）九月，徐达指挥的西征大军，以常遇春为先锋，从河北翻越太行山进入山西南部，进取泽州（令出西晋城），元守将贺宗哲弃城逃遁，明军又进克潞州（今山西长治）。

据守太原的扩廓帖木儿（原名王保保）派兵南下来争夺泽州。明将杨璋奉命援救，与元兵中途遭遇，失利败归。扩廓帖木儿又企图乘北平空虚，兵出雁门关去偷袭。徐达闻此情报后，对诸将道："王保保主力远离，则太原必定守备空虚。北平我军有六卫三万兵马，孙兴祖将军统率，足以抗击来犯之敌。现在我军乘其不备，直捣太原，使其进不能战，退无所依。这在兵法上称为'批亢捣虚'之策。如果王保保回军来救太原，必定为我擒获。"

徐达挥兵直指太原，扩廓帖木儿在远袭北平的途中闻报后，急速回军来救。十二月，元军前锋骑兵突然出现于太原城外。傅友德、薛显率领数十名敢死的精锐骑兵，击退来敌。常遇春向徐达建议道："我军骑兵虽已集结，但步兵未至。骤然与敌交战，必定会多有损失。如果夜晚偷袭敌营，定能奏效。"徐达听后连声称好。

恰逢扩廓帖木儿的部将豁鼻马暗中派人前来请降，并愿为内应。徐达便挑选了数十名精骑乘夜埋伏于城外，约定举火为号，内外相应。半夜时分，明军举火鸣炮，内外兵马一齐冲人敌营。已入睡梦的元军被鼓噪呐喊之声惊醒，不知真相，自相惊扰，乱作一团，不战而溃。扩廓帖木儿正在营帐中读兵书，仓皇之间也不知出了什么事，光着一只脚，骑了一匹抓到手的瘦马，带着十八名骑兵逃向大同。元军四万余人马在豁鼻马带领下向徐达投降。

常遇春率轻骑兵追击扩廓帖木儿直至忻州。扩廓不敢在山西逗留，又逃奔甘肃。明军胜利北进，又收取大同，攻占了其余州县，山西全部被平定。

洪武二年（一三六九年）三月，常遇春、冯胜领军先行渡过黄河，进攻陕西，徐达督军继后。元将李思齐据守凤翔，遣将分守关中要地。明大军人关中，先锋将郭兴领轻骑直捣奉元（今西安），元守将弃城不战而逃。泾渭父老千余人于道旁迎候徐达。徐达先派部将入城宣谕安民，然后整军入城。明军占领奉元路后，改名为西安府。

时值关中饥荒，徐达上奏灾情，朱元璋下令开仓赈济。守将耿炳文负责整修水渠，以利百姓农耕。

徐达统兵攻取凤翔后，召集诸将，商议进兵方向。此时李思齐已逃往临洮，张思道逃往庆阳。众将认为张思道易取，可经由郴州先取庆阳，然后越过陇州取临洮。徐达却说："庆阳城坚兵精，不易攻取。而临洮北界黄河与湟水，西通羌戎之地，先攻取这块地方，可以有人员补充兵力，有物产以供军用。我军大兵压境、李思齐如果不再向西逃跑，就会束手被擒。一旦临洮攻下，其他州县就可不战而得。"

明军移师西向，连克陇州（今陕西陇县）、秦州（今甘肃天水）、巩昌（今甘肃陇西），副将军冯胜率军进攻临洮，李思齐穷途无路，举城投降。

另一路由顾时所率明军攻克兰州。

五月，徐达攻取平凉。张思道闻听明军已克临洮，慌惧奔走宁夏，结果被扩廓帖木儿扣押。张思道之弟张良臣听说其兄弟被执，心中害怕，遂向徐达乞降。但不久，张良臣又复叛变，偷袭明军营寨，明将张焕被俘，薛显受伤走脱。

得知张良臣复叛，冯胜、傅友德、汤和等人急速领兵前来会合。徐达分遣诸将截断张良臣与其外围党羽的联系，自己率军将庆阳四面包围起来。张良臣恃勇出城挑战，都被徐达挥军击败。围困三个月后，庆阳城内粮草缺乏，军心动摇。张良臣的部将开门出降，徐达领兵自北门入城。张良臣父子投井欲自杀，被明军捞起处死。攻取庆阳，使明军掌握了控制陕甘地区形势的主动权。

明军平定陕西，朱元璋诏命徐达班师，赏赐给他大量的白银和绢帛。正当朱元璋要对北伐将领论功封赏时，西北地区战事又有急变。扩廓帖木儿闻知明军班师，便率兵围攻兰州，形势一度危急。

洪武三年（一三七〇年）正月，为了肃清西北地区的元兵残余力量，解除边患，徐达再次受命为征北大将军，李文忠代替已经病故的常遇春为副将军。出征前朱元璋召集诸将分析双方形势：扩廓帖木儿所以屡屡侵犯边疆，是因为其君主还在。如果派兵直取元君主，扩廓帖木儿失势，可不战而胜之。但眼前扩廓帖木儿正在围攻兰州，舍其而远征大漠，是舍近趋远，有失缓急之所宜。于是，朱元璋派定兵分两路，徐达出潼关直捣定西，打击扩廓帖木儿。李文忠出居庸关，深入塞北打击元顺帝。这样，可以使他们彼此自顾不及，无暇相互救援。元顺帝远在塞外，不会想到我军来袭击，可以打他个措手不及，如此部署，可一举两得。

四月，徐达西路军经潼关直指定西。扩廓帖木儿自兰州撤围，两军相持于沈儿峪，隔着一道深沟扎营对垒，一天接战几次。扩廓帖木儿派出千余名骑兵，抄小路袭击明军的东南营寨。明将胡德济仓卒失措，士卒溃散。徐达急忙率军援救。击退元军，稳住阵脚。徐达下令处斩了几名严重失职的将校，并将胡德济押往京城，交由朱元璋处置。

第二天，两军会合决战。明军冲过河沟杀入敌营，大破元军，俘虏了元朝的宗室亲王、国公、平章等官员一千八百余人，士卒八万人，战马一万五千匹。这场双方投入数十万兵力的空前大战，使扩廓帖木儿的主力军损失殆尽，带着妻子等几个人狼狈逃命，抓着水上的漂浮木渡过黄河，逃向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明将郭英追赶扩廓帖木儿直至宁夏。徐达取得定西大胜后，还师返回西安。

东路大军由李文忠指挥，进至应昌（今内蒙达里诺尔西南），其时元顺帝已死，即位的皇太子爱猷识里达腊，逃往和林，明军穷追不舍，俘获了元帝的孙子、后妃、诸王将相等数百余人，经明军东、西两路打击，元朝残余的力量，已无法再组织大规模的进犯了。

十一月，徐达、李文忠凯旋回到京城，朱元璋亲自到龙江迎接。随后大封功臣，徐达改封为魏国公。朱元璋体恤徐达等功臣连年征战、冲锋搏杀、风餐露宿、身体疲劳，特下诏优待可以三日或五日上朝一次。

洪武四年春天，朱元璋派徐达镇守北平。徐达到任后训练士卒，修缮城池，

迁移军民充实边防力量，并督促垦田生产。

洪武五年，朱元璋想解除北方边患，又发大军出征。徐达仍为征虏大将军，出雁门关攻击和林为中路；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出应昌为东路；冯胜为征西将军进兵甘肃为西路。三路各五万大军，分道并进。

徐达率军入山西，派都督蓝玉为先锋，出雁门关，先于野马川击败元军前哨骑兵，随后又于土剌河打败扩廓帖木儿。五月，徐达指挥明军进军岭北。这时，从土剌河败逃的扩廓帖木儿，与贺宗哲合兵一起，拼死抗拒明军。结果，明军大败，死伤惨重。徐达收拢将士扎营固守，才得以摆脱困境。朱元璋以徐达功勋卓著，对这次兵败未加责问治罪。其余东、西两路明军，只有冯胜进兵至西凉，一路告捷。

朱元璋的重要谋臣刘基曾提醒说："不可轻视扩廓帖木儿，这个人是真正的将才。"早在大都被攻破之前，朱元璋曾多次写信派人劝扩廓帖木儿投降。元顺帝逃往塞外后，朱元璋又使人送信劝扩廓帖木儿投降，甚至册封扩廓帖木儿的妹妹为第二子秦王的妃子。最后派降将李思齐去作说客。见面时扩廓帖木儿以礼款待，辞回时还派骑兵送到双方交界地。李思齐正想告别，骑士说道："奉总兵之命，请留下一件东西作纪念。"李思齐说："我因公差远道而来，无什么东西回赠。"骑士便直接说道："我要你一只手臂。"李思齐心知不可避免，只好砍下一只手臂，回来后不久便死了。由此之后，朱元璋心中敬佩扩廓帖木儿忠于其主。有一次大会诸将，朱元璋问道："天下的奇男子数谁?"诸将都说："常遇春率领万人，就可以横行无敌，是真正的奇男子。"朱元璋笑着说道："常遇春确实是人中豪杰，但他早就是我的臣下了。我不能收伏王保保为臣，是一件大憾事，他就是真正的奇男子呀!"

洪武六年，扩廓帖木儿率兵南下，攻击雁门关。朱元璋命令守边将领严加防御，不可轻易出击。这一年，徐达留守北平，尽心整顿边备。十一月，元军进犯大同，徐达调兵遣将将其击退。洪武八年，扩廓帖木儿死后，元朝残余势力对明的进犯虽有所减弱，但边患问题并没有完全解除。洪武十四年，徐达率军出塞，一直进至黄河最北端，大破元兵，擒获平章、太史等官员，得胜而还。

徐达从洪武四年受命镇守北平，此后十多年间，数次率兵出塞，使元朝的残余势力不敢轻易南下，将其扼制在长城以北。十多年中，徐达每年春天奉命赴北平，冬暮又奉命回京，不辞辛劳，对安定北方的军事形势起着重大作用。朱元璋由衷称誉徐达是"万里长城"。

洪武二年春正月，朱元璋下诏建立功臣庙，并亲自确定功臣的位次，以徐达为第一，其后是常遇春、李文忠、邓愈、汤和、沐英、胡大海、冯国用等人。功臣庙建在应天（今南京）城西七里的鸡鸣山下，凡是被列入名次的功臣，都有塑像立于庙中。

大封功臣是朱元璋巩固朱明王朝的重要措施之一，被封公封侯的功臣，绝大多数都是百战沙场的将军。徐达是这些农民将领中的杰出人物。但徐达能够成为朱明王朝的第一开国功臣，并不仅仅因为他是朱元璋的老乡、少年时代的好伙伴。

世代农家出身的徐达，小时候与朱元璋一起给地主放过牛，自然没有条件和机会进学堂接受知识教育。史书上称徐达少年时代便怀有大志，成人后性格刚毅，勇敢无畏。自从跟随朱元璋投军后，徐达很快就成为一名带兵的将领，并深得朱元璋信任。他在连年征战的环境中，虚心学习，向人求教，逐渐阅读熟悉了兵书，掌握了一个高级将领必须具备的军事知识。每当临敌作战时，徐达总是与部将一起分析形势，制订作战方案，他的分析预料往往高人一筹，令部将信服。当明王朝建立，生活相对安定后，徐达仍然不耻下问，经常请延讲儒士给他讲解古书。虚怀若谷，汇纳百川，徐达以这种谦谦进取的态度，在几十年的戎马征战中，养成了长于谋略、料敌如神、指挥若定、所向必胜的军事才能，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成为能统率百万大军、功勋卓著的杰出将领。

徐达自带兵以来，始终号令明肃，所到之处，百姓宴然。每当攻取一个新的城镇，徐达都要重申军令，严厉禁止烧杀抢掠的行为，凡是违反军令的，立即以军法处治，斩首示众。在消灭陈友谅的历次战役中，有一次，徐达与常遇春一同伏击敌军，斩首万人，生俘三千。常遇春要杀掉俘虏，他说："这是我们的死对头，不杀就会留下后患。"徐达一面制止常遇春的野蛮做法，一面急速派人报告朱元璋。但常遇春还是乘夜活埋了一半俘虏。朱元璋知道后大为生气，下令将剩余俘虏全部释放。从此之后，大军出征，朱元璋总是任命徐达担任统帅，约束众将。

徐达率北伐大军攻克元大都后，立即派兵守卫皇宫大门，并让宦官负责看护宫女、妃嫔、公主，严禁将领士卒随便入宫侵犯骚扰。朱元璋曾对文武大臣说过："治军持重，纪律严明，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深得为将之体者，莫如徐达。"

徐达不仅严于治军，而且严于律己。在元朝的官军将领和一些农民起义军的头目中，不少人都是一旦身居高位，就私欲膨胀，胡作非为，打了胜仗就拼命地抢占金银财宝、美女奴仆，隐匿战利品而不上缴。徐达总是始终如一地严格约束自己，不贪不暴。徐达为人处事，言语稳重，深思熟虑。带兵出征时，令出不二，部将皆小心谨慎，奉命行事。徐达善于团结部将，体恤士卒，与他们同甘共苦。将士们对徐达既尊敬又感激，都愿意听从他的指挥，打仗人人奋勇争先，不畏牺牲，因而所向披靡，一路克捷。徐达驰骋沙场几十年，先后攻克都城两座、省会三座，州县城镇数以百计，所经之处，百姓安然而不受兵害。

战功卓著而谦虚谨慎，是徐达的又一优良美德。历朝历代，因居功自傲而被贬官流放甚至杀头灭门的文武大臣，屡见不鲜。在朱明王朝的创立过程中，徐达开辟江汉流域，扫清淮楚之地，攻取浙西，席卷中原，声势威名直达塞外，先后降伏王公、俘获将领不可胜数。但他功成不骄，在皇帝面前尤其恭敬谨慎。朱元璋经常召见徐达，设宴欢饮，每每以"布衣兄弟"相称，而徐达总是诚惶诚恐，谦恭相对，不越君臣之尊卑秩序。

自从洪武四年徐达奉命镇守北平，常常是春天离京赴任，冬季回朝立即奉还将印。按照朝廷的礼仪制度，徐达封爵国公，官至丞相，外出时备有前呼后拥的威赫仪卫，但他时常乘着普通的车

马出门，回到家中也是过着俭朴的生活，从不呼朋唤友、歌舞宴欢以夸耀自己的显达高贵。朱元璋曾对徐达说："大将军征战几十年，功劳最大，从未安宁地休息过。我把过去住过的旧宅院赐给你，你可以安享几年清福。"朱元璋所说的旧宅院，就是他称吴王时的王府。徐达坚决推辞，不肯接受。有一天，朱元璋带徐达来到旧吴王府，与他饮酒并将他灌醉，然后把他抬到床上，蒙上被子，想用这种办法强迫他接受赏赐。徐达酒醒之后，吃惊不小，急忙下床伏地向朱元璋连称"死罪，死罪"。朱元璋见徐达如此谦恭，心中非常高兴，也不再强迫他接受旧王府。随后，朱元璋下令为徐达另建了一座上等宅院，并在门前立牌，刻了"大功坊"三个字。

徐达一生深得朱元璋的信任和重用，除了上述的优秀品德和才能之外，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忠诚正直，鄙视奸佞，不结党营私。封建时代道德的两大基准是忠、孝。而封建君臣之间的关系，对臣下来说，第一重要的就是忠诚。朱元璋曾在朝堂上称赞徐达："受命率军出征，取得胜利凯旋归来，一贯不骄不傲，女色无所爱，财宝无所取，公正无私，像日月行天一样光明磊落的，只有大将军一人而已。"

徐达在朝中功高位显，深得皇帝信任，自然便有人想与他结交，希图利用他的声望影响谋取私利。丞相胡惟庸曾想与徐达拉拢关系，结为友好，但徐达鄙视胡惟庸的品行作为，不予理睬。

当胡惟庸希望与徐达结交通好而遭冷遇后，他便企图收买徐达的看门人福寿，想让福寿捏造罪名陷害徐达。但福寿忠于其主，不为所动，向徐达报告了胡惟庸的卑劣行径。此后，徐达多次向朱元璋进言说胡惟庸为人奸恶，品行不端，不适合再担任丞相。由于胡惟庸贪权骄纵，阴结私党，使朱元璋不仅感到皇权旁落，还感到有谋反的威胁。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和谋反罪名杀掉了胡惟庸。这时，朱元璋想到了徐达的那些忠告，对徐达的忠耿之心更加器重。

洪武十八年二月，徐达病逝于南京，享年五十四岁。朱元璋为徐达辍朝以表哀悼，并亲临灵堂祭奠，悲伤不已。朱元璋下诏追封徐达为中山王，谥号"武宁"，赠其三代皆封王爵，赐葬于中山之北，亲自为徐达写了碑文，称赞其为"开国功臣第一"。

关于徐达之死，有的史书上说是被朱元璋害死的。朱元璋从起兵到称帝以后，一直是以威猛严厉治军治国的。登上皇帝座位后，朱元璋想的最重要事情就是江山永固，他的子孙后代永远做皇帝。所以，他对当年鞍前马后、出生入死为他打江山的功臣特别猜疑，担心他们哪一天会谋反夺权。另外，太子朱标性情仁善宽和，朱元璋怕他将来驾驭不了功劳卓著的元老重臣，于是铁硬起心肠，大杀功臣，滥加株连。前面说到杀胡惟庸和后来杀大将军蓝玉一案，就牵连而杀掉了几万人。史书上称，朱元璋当皇帝后"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为了他的独裁统治和江山不易，他杀功臣杀红了眼，因而后人翻阅明初史书，可闻一派血腥气味。

有关徐达被害身死的经过是这样的：徐达在北平身患背疽，这是一种恶疮，不易治疗。朱元璋派徐达的长子徐辉祖带着书信前往北平看望，不久又召徐达

回南京疗养。有一天，宫中内侍给徐达送来皇帝赏赐的食盒。徐达从病床上挣扎起来磕头谢恩，然后打开食盒，只见里面放着蒸鹅。据说背疽最忌吃蒸鹅，徐达呆愣了半晌，最后流着泪当着内侍的面吃下了蒸鹅，不几日便死去了。但也有的史书上作了考证，认为“赐食蒸鹅”是野史中歪曲事实真相的牵强附会之说。

徐达有四子三女。长子徐辉祖有才气，徐达死后，继承爵位。三个女儿，长女嫁给朱元璋的儿子燕王朱棣为妃，后来燕王夺权称帝，徐妃被册立为皇后。其余两个女儿，也都嫁给了朱元璋的儿子，一个是代王朱桂的妃子，一个是安王朱楹的妃子。

【李善长】

（1314～1390）明初大臣。字百室。定远（今属安徽）人。少时有智计，习法家著作，推断时事，多有所中。元至正十四年（1354），投朱元璋幕下，掌书记。劝朱元璋效法汉高祖刘邦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的做法，以成帝业，于是，被任为参谋，参预机画，主持馈饷，备受信用。他善于调护诸将，因材用人，使之各得其所。朱元璋任太平兴国翼大元帅，以李善长为元帅府都事，从克集庆（今江苏南京）。朱元璋任江南行中书省平章，以其为参议，军机进退，赏罚章程，多由他裁决。后枢密院改为大都督府，善长兼领大都督府司马，升任行省参知政事。二十七年，朱元璋自立为吴王，以李善长为右相国。他娴于辞令，明习故事，处理政务，裁决如流，将吏帖服，居民安堵；调兵转饷无乏，恢复制钱，榷淮盐，立茶法，开铁冶，定鱼税，国用益饶，而民不困。吴元年（1367），论功被封为宣国公。吴改官制，尚左，故李善长由右相国改称左相国，居百官之首。曾与刘基等裁定律令。

明朝建立，兼太子少师，授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定官制、礼仪，监修《元史》，编《祖训录》、《大明集礼》，事无巨细，都由善长与儒臣谋议而行。洪武三年（1370），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予铁卷，免二死，子免一死。时封公者共六人，而善长位居第一。授封制词中将他比之萧何，褒称甚至。但李善长富贵极便意稍骄，引起明太祖朱元璋的不满。四年，以疾致仕。病愈后主持修建临濠（今安徽凤阳）宫殿。时朱元璋徙江南富民十四万于临濠，又以善长管理其事。九年，与曹国公李文忠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督修圜丘。其子琪尚临安公主，拜驸马都尉。

胡惟庸以李善长推荐，被擢为太常寺少卿，后为丞相，两人往来甚密。十三年，胡惟庸案发。二十三年，李善长以胡党获罪，谓其元勋国戚，知逆谋不举，狐疑观望，心怀两端，大逆不道，连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一律处死。朱元璋手诏条列其罪，传著狱辞，为《昭示奸党三录》布告天下。次年，虞部郎中王国用上书诉其冤，朱元璋得书，竟不加罪。关于李善长是否参与谋反，明代史家郑晓、王世贞等人均持否定态度。

【刘基】

(1311～1375)明初大臣、文学家。字伯温，浙江青田人。元至顺间举进士，任高安丞，有廉直声。又任江浙儒学副提举。博通经史，尤精象纬之学，时人比之诸葛亮。

元至正年间，方国珍起兵海上，被辟为江浙元帅府都事以招安，又任为行枢密院经历。因忤执政意弃官还乡。至正十九年(1359)，朱元璋下处州，闻刘基及宋濂等名，次年礼聘而至。他上书陈述时务十八策，倍受宠信优礼。参与谋划平定张士诚、陈友谅与北伐中原等军事大计。吴元年(1367)为太史令，进《戊申大统历》。奏请立法定制，以止滥杀。不久，拜御史中丞兼太史令。朱元璋即皇帝位后，他奏请设立军卫法，又请肃正纪纲，人惮其严。尝谏止建都于凤阳。洪武三年(1370)授弘文馆学士。十一月大封功臣，授为资善大夫、上护军，封为诚意伯，岁禄二百四十石。刘基佐明太祖朱元璋平天下，太祖比之为张良，呼为"老先生"。基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遇急难，勇气奋发，计划立定，人莫能测。屡劝朱元璋修德省刑。为政颇有知人之明。四年，赐归。

刘基居乡隐形韬迹，唯饮酒弈棋，口不言功。寻以旧憾为左丞相胡惟庸所讦而夺禄。入京谢罪，留京不敢归，以忧愤疾作，胡惟庸曾派医生探视。八年，遣使护归，居一月而卒。后涂节谓其死实为胡惟庸投药所致。正德八年(1513)，加赠太师。

刘精通天文、兵法、数理等，尤以诗文见长。其文与宋濂齐名，诗与高启并称。诗文古朴雄放，不乏抨击统治者腐朽、同情民间疾苦之作。著有《郁离子》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写情集》四卷，《犁眉公集》五卷等，后均收入《诚意伯文集》。

【汤和】

(1326～1395)明开国功臣、著名将领。字鼎臣。濠州(今安徽凤阳)人。幼孤。习骑射，颇饶智略。元至正间投身郭子兴军中，升千户。后委身事朱元璋，从之渡江，下采石(今安徽当涂西北)、太平(今安徽当涂)，取溧水、句容(今均属江苏)。又以取镇江功升统兵元帅。其后，下金坛、常州、无锡、平江(今江苏苏州)，以功晋升御史大夫兼太子谕德。寻拜征南将军，讨方国珍。国珍降，浙东悉定，接着进军闽中，拔延平，执陈友定。朱元璋称帝后，又取怀庆(今河南沁阳)、泽(今山西晋城)、潞(今山西长治)诸地，拔河中(在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山镇)，平关陇，定宁夏(今宁夏银川)，以及徇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皆以功居诸将先，晋封为中山侯。洪武四年(1371)拜征西将军，入重庆，平明玉珍。次年从徐达北伐，其后屡战获胜，进兵延安，迫使伯颜帖机乞降。十一年晋封为信国公。他虽功高而益恭畏，十八年急流勇退，即请乞骸骨还乡里，深合明太祖朱元璋意，为赐第凤阳。既而倭寇上海，帝令巡视山东滨海，度浙东西地，建卫所城池五十九，选浙东民五万八千余人戍守。次年，闽中并海城工竣，乃还报命，请还居新第，赐赉极厚，许每年一朝京师。二十三年以疾失音。

二十八年八月卒。追封东瓯王，谥襄武。

【常遇春】

（1330～1369）明开国功臣，著名将领。字伯仁。安徽怀远人。世业农，善射，勇力绝人。元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驻兵和州（今安徽和县），遇春投元璋军中。六月，以攻取采石矶（今安徽当涂县西北）、太平（今安徽当涂）功，授管军先锋。十月，升管军总管。次年败元中丞蛮子海牙兵于采石，寻守溧阳（今属江苏），三月，从大将军徐达克镇江，十一月进统军大元帅，接着以克常州、宁国（今安徽宣城）、池州（今安徽贵池）功，于十八年春擢江南行中书省都督马步水军大元帅，进枢密院佥事。其后，在鄱阳湖之战中，他奋勇当先，救出被陈友谅军围困的朱元璋，会同诸将全歼号称六十万的陈友谅军，继平张士诚军，遂得荆湖、三吴广大地区，因功进中书平章军国重事，封鄂国公。复拜副将军，与徐达率师北进中原。下山东诸郡，取汴梁（今河南开封），破元兵于洛水北，河南诸郡皆下。又下河北诸郡，取德州、通州（今北京通县），遂克大都。此后，又下河间、真定，取太原、大同、奉元路（今陕西西安）、凤翔。会元将攻通州，诏遇春还备。于是率步骑九万发北平（今北京市），败元将于锦州、全宁（今内蒙古翁牛特旗），遂克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元帝北走。遇春乘势追击，俘获元宗王将士及辎重，马牛数万，全师而还。师次柳河川，得暴疾卒。追封开平王，谥忠武。遇春性沉鸷果敢，每战必先，善抚士卒。虽年长于大将军徐达，然听约束唯谨，一时名将，徐、常并称。

【熊廷弼】

（1569～1625）明末军事统帅。字飞百，亦作非白，号芝冈。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汉）人。少时家境贫寒。放牛读书，刻苦强记。万历二十五年（1597）举乡试第一，次年中进士，授保定推官，尽释被税监王虎冤系狱者多人，并上撤矿疏，以能擢为监察御史。三十六年巡按辽东。面对辽东地广人稀，边防多事，特别是后金势力兴起，实行军屯，缮垣建堡，按劾将吏，军纪大振。上疏备陈修边筑堡、以守为战的存辽大计，与巡抚杨镐之议不和。不久督学于南直隶，以严明声闻。四十七年，在与后金军的萨尔浒之战中，经略杨镐指挥的号称四十七万大军惨败，从此明朝力量大衰，在辽东失去优势，不得不由进攻转为防御。战后，经廷议，擢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杨镐为辽东经略。其时开原、铁岭相继失陷，沈阳军民纷纷逃奔。廷弼到任后，立斩逃将，督造军器，修缮城堡，调兵遣将扼守各重要地点，互为应援，守备大固。他还亲巡沈阳、抚顺，相度形势，召置流移，安定民心。策略以守为主，反对浪战，并联合朝鲜牵制后金，卓有成效，使后金军不敢轻进。熹宗初立，以不进兵为言官所劾，上书自明，求罢，朝廷以袁应泰代。天启元年（1621）后金破沈阳，袁应泰死；不久辽阳又陷，震动京师。廷弼被召入朝，首建三方布置策：在广宁（今辽宁广宁）厚集步骑以牵制后金主力；在天津与登、莱（今山东莱

州）各设巡抚，置舟师，乘机入辽南；在山海关设经略，节制三方。遂进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驻山海关，复经略辽东军务。朝廷同时擢王化贞为巡抚。二人一主战，一主守，意见不和。王化贞拥重兵守广宁，而廷弼则徒拥经略虚名，仅有数千军士。化贞握重兵，不听节制，以降敌明将作为内应，发动进攻，弄巧成拙，兵败后弃广宁退走。廷弼的方略难以实现，见大势已去，随之撤至关内，被下狱论死。魏忠贤指使阉党袒护王化贞，委罪于廷弼，廷弼被杀，传首九边。熊廷弼有胆略，知兵事，且善射，为明末突出的军事统帅。崇祯时获昭雪，谥襄愍。有《熊襄愍公集》。

【杨涟】

（1572～1625）明末大臣，东林党的重要人物。字文孺，号大洪。湖广应山（今属湖北）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任常熟知县。后擢户科给事中，转兵科右给事中。天启初，因移宫（见三案）而遭劾辞职。天启二年（1622）起为礼科都给事中，旋擢太常少卿，次年拜左佥都御史。四年进为左副都御史。

杨涟在光宗、熹宗时的内廷“红丸”、“移宫”事件中，劾崔文昇用药无状；首促诸大臣拥太子入慈庆宫即位，又力促李选侍移居仁寿宫。天启时，宦官魏忠贤用事，与朝廷中群小结成阉党，迫害正直大臣。杨涟与吏部尚书赵南星、左佥都御史左光斗、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等激扬讽议，务植善类，抑奸邪。魏忠贤及其党对杨涟等恨之入骨，遂兴汪文言狱，诬大中、光斗等交通文言，肆为奸利，事虽获解，但东林党人处境日危。四年六月，杨涟上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致魏忠贤恨甚，十月，矫旨责涟无人臣礼，与光斗等并罢官，次年再兴汪文言狱，以“党同伐异，招权纳贿”等罪名，捕杨涟等入狱。七月，杨涟与光斗遭酷法拷讯，惨死狱中。崇祯初，为杨涟等平反昭雪，追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著作收入《杨忠烈公文集》五卷、《杨大洪先生集》（二卷）中。

【袁崇焕】

（1584～1630）明末著名军事统帅。字元素。广西藤县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授福建邵武知县。时明军在辽东与后金对峙，日趋被动。崇焕虽身为知县，却以天下为己任，以边才自许。天启二年（1622），入京朝觐，因御史侯恂之请，被破格擢为兵部职方司主事。不久，清太祖努尔哈赤夺占广宁，大臣廷议守山海关，以防御京师。危急之际，崇焕单骑巡阅山海关内外，还朝备陈关上形势和方略，请兵御守山海关，廷臣称其才，升为佥事，监督关外军。他力主坐镇宁远（今辽宁兴城），守关外以捍关内，深为大学士、蓟辽督师孙承宗之倚重。修筑关外重镇宁远城，进兵备副使，再进右参政。后高第继孙承宗任蓟辽督师，崇焕拒绝执行高第撤守关内的命令，刺血为书，激励将士，誓死守卫宁远孤城。大败后金十万围攻大军，炮伤努尔哈赤，赢得明朝对后金作战的第一次胜利（史称“宁远大捷”），一扫明军望敌而溃的暮气，收复辽西大片土地。朝廷擢其为右佥都御史、辽东巡抚。时魏忠贤遣其党羽刘应坤、

纪用等出镇辽东，他抗疏进谏，不纳。七年，后金兵渡大凌河南下，他采取积极战略，遣将修缮锦州、中左、大凌三城，破后金主力，取得宁锦大捷。战后终因不附魏忠贤，被其党所劾去职。熹宗崩，崇祯即位，魏忠贤被诛。朝臣纷请召袁崇焕还朝。崇祯元年（1628）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入都，帝召见平台。他慷慨陈词，计划以五年时间恢复辽东，并疏陈方略，依靠辽东人民保卫辽东土地，筑城屯田，坚壁清野，待机而进攻，对当时辽东军事形势作了全面的估计和筹划。到任后，即加强防守，收复失地，安抚流亡。杀皮岛（今朝鲜椴岛）守将毛文龙，整顿军制，以严明纪律。翌年，清太宗皇太极避开其防守地区，率军十万取道喜峰口入关。崇焕闻讯自辽东千里驰援，十一月抵达蓟州（今天津蓟县），在后金攻占遵化、直抵北京城下的紧急关头，率军入卫京师，与后金兵鏖战于广渠门外，取得京师之捷。皇太极屡受重挫之后，乃设反间计，朝士诬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崇祯性情多疑，听信谤言，崇焕竟被下狱。三年八月被冤杀。有《袁督师遗集》。

【郑成功】

郑成功是我国明末清初一位杰出的爱国名将、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清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十五年（一六六一年），他以惊人的胆略与气魄，挥师东征，驱逐了盘踞台湾三十八年的荷兰殖民者，收复了我们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为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的历史谱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勤学苦练　立志报国

郑成功，生于天启四年（一六二四年），卒于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年），本名森，字明俨，号大木，福建南安县石井镇人。天启四年（一六二四年），他出生在日本长崎平户岛千里滨。传说，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其父翌皇为泉州人）游海滨时在一块海石上生下了他，这块海石被日本人称为郑公石（亦作诞儿石），至今尚存，成为平户的名胜古迹之一。郑成功出生后，他的母亲望子成材，给他取了个乳名叫福松。他懂事后，母亲就教他认识汉字，还给他讲中国大陆的山川风物，使他从小就向往着美丽可爱的祖国。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小名一官，字飞黄。他早年跟随一个商人做生意，来到日本贩卖货物。当时，日本是德川幕府主政，政治腐败。郑芝龙与另一名中国商人颜思齐等密谋起事，反抗德川幕府的暴政，事机泄漏，遭幕吏搜捕，郑芝龙、颜思齐等各驾船而逃，漂流到台湾，登陆筑寨定居。他们推举颜思齐为首领，联合当地高山族人，分部耕种渔猎。郑芝龙的弟弟芝虎、芝彪、芝豹和郑氏族人都从泉州入台，漳、泉一带的贫苦人民也纷纷而至，一时聚众达数万人。他们与高山族一起，披荆斩棘，历尽艰辛，把台湾西部平原开发成丰饶富庶的家园。天启五年（一六二五年），颜思齐病死于台湾，众推郑芝龙继任首领。郑芝龙积极发展海上贸易，并控制通往日本和南洋群岛的航道，向往来的商船征收税银。明王朝当时实行锁国政策，把他们看成“海盗”。他们屡次与明朝官军发生冲突。崇祯元年（一六二

八年)，郑芝龙接受明朝政府招抚，他不但控制了北港为中心的一带地区，而且控制着整个台湾海峡，成为“威权震七闽”的一个显赫人物。郑芝龙为维持沿海治安、攻打“海盗”和荷兰殖民者的走私商船，屡次建功，受到明政府的重用和提拔，做到总兵官。这时，他怀念留在日本的妻儿。就在郑成功七岁那年，郑芝龙派弟弟郑芝燕把妻儿从日本接回了故乡。

郑成功“风仪整秀，俶傥有大志”。他眉高眼长，声音洪亮，长得神采飘逸，聪慧健美，富有凝重威严的气质。郑芝龙一见到自己这个阔别七年的头生子，心情格外喜悦和欣慰。他把儿子视为“国之栋梁”，给他改名为森。因感于自己起于行伍，未读诗书，便让儿子郑成功住在安平镇（今晋江安海），以重金聘请一位很有名望的私塾先生教他读书。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老师常给他讲述古代英雄豪杰的故事，以及屈原、岳飞、文天祥的诗词，使他少年的心头，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教育。郑成功读书颖敏，才思过人。他不但勤奋攻读诗书，还刻苦练习驰射武艺。在老师的启迪之下，由于他勤学苦练，学业大有长进，十一岁时就写得一手好诗文。有一回，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命题是《洒扫应对》，郑成功立即挥笔写下了“汤武之征诛，一洒扫也；尧舜之揖让，一进退应对也”的警句。大意是说，王师征诛邪恶，犹如荡涤扫除；尧舜贤明谦让，犹如进退应对，从而道出了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老师阅后，“惊其用意新奇”，不禁拍案叫好，称赞郑成功是少年奇才。

郑成功性喜《春秋》，尤爱孙、吴兵法。他关心天下兴亡与民生疾苦，立志成为一个具有文韬武略的爱国志士。传说有一次，郑成功在《孙子兵法》书上走笔题写了“挥尘谈兵效古之英豪，究心天下封侯非所愿”，他的叔父郑鸿逵看到后大喜，连声称赞他：“有志气，有出息！”说他将来必定是一匹驰骋天下的千里驹。

十五岁时，郑成功中了秀才，考取南安县学生员。二十一岁进入南京太学，成为国子监生员。当时著名学者钱谦益把郑成功纳为弟子，对他颇为器重，特地给他取了个“大木”的别号。先辈王观光一见郑成功，就对郑芝龙说：“你的儿子是个英武之才，绝非你所能比的。”南京有识之士见了郑成功，也都惊叹说：“这是位奇男子，骨相非凡也！”他们一致赞扬郑成功是济世雄才，非止科场中人。

就在郑成功二十一岁这一年，明王朝最终在农民革命的沉重打击下彻底崩溃了。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年）五月，清兵入关，占领北京。九月，迎清世祖顺治帝福临进京。从此，满族统治者便在窃取明末农民革命胜利果实的基础上，建立起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

当明王朝被李自成为首的农民革命军推翻后，明朝的一些文臣武将和地主绅士即麇集江南，为恢复他们昔日的地位而继续顽抗。他们先后拥戴朱家皇室的藩王，建立起南京福王政权、浙江鲁王政权、福建唐王政权和湖广、西南地区的桂王政权，史称这几个政权为南明政权。

清顺治二年，南明隆武元年（一六四五年)，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位，改

元隆武，史称隆武皇帝。郑芝龙因为手下有十几万军队，并积极拥立朱聿键，被封为“平国公”。郑成功随父亲一起上朝，隆武帝见他少年英俊，气宇非凡，非常高兴，特赐他以国姓朱，改名成功，号明俨，封忠孝伯，为御营中军都督，赐尚方剑，以驸马一样的礼仪待他。从此，民间都尊称他为“国姓爷”。

郑成功对隆武帝的恩宠与器重感恩不尽，忠心不二。当隆武帝颁谕宣布要统率大师，御驾亲征时，郑成功向他发誓道：“臣受国恩，义无反顾，臣当以死报陛下。”后来，他父亲郑芝龙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财产，与汉奸洪承畴相勾结，想投降清朝，郑成功发现这一情况，又立即向隆武帝奏告：“陛下当自为计。”隆武帝看到郑芝龙已不可靠，便对郑成功寄以希望，委以重任，封命郑成功佩招讨大将军印，镇守仙霞关；建昌告急时，又命郑成功速发精兵二千进驻铅山，以为声援；三月，为防清兵进入南昌，催郑成功等速出分水关，以复江西省；四月，铅山告急，又命郑成功、傅冠速约各镇鼓锐前进，以巩固崇关。此外，隆武帝还依靠郑成功筹措兵饷器甲，并于这一年的六月，授予他全权，回漳、泉招募兵将。

清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一六四六年）二月，清廷命贝勒博洛为征南大将军，率师往征福建、浙江。七月，清兵大举进攻福建，郑芝龙拥兵数十万，“舳舻塞海，粮饷充足”，却不进行抵抗。八月，唐王逃往汀州被俘杀，九月，清兵攻入福州。郑芝龙已退据安海（即安平镇），尚有楼船五百多艘，但他已决意归降清朝。郑成功哭谏力阻，他就是不听，独自北上降于清。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在清兵突至安平时不幸被辱，登上城楼，投河自尽。清将贝勒博洛迫郑芝龙致书郑成功，劝其归降。郑成功正在南安丰州潘山看士兵操练，接到父亲诱降的来信，愤慨不已，立即回信说：“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只有缟素而已。”

郑成功愤父降清，痛母惨死，又值隆武覆亡，他俯仰身世，悲愤交集，决心弃文就武，矢志抗清，以图力挽狂澜，恢复明朝。他携所着儒巾蓝衫，跑到南安孔庙，哭焚儒衣，以敬谢先师，并跪地四拜仰天道：“（成功）昔为儒子，今为孤臣，向背去留，各有作用，惟先师昭鉴之。”从此，他自认是明朝臣子，自称“罪臣朱成功”，怀孤臣孽子之痛，起兵南澳，进据金、厦，用招讨大将军印，以桂王永历为年号，遥奉明王朝，在乐南沿海展开抗清斗争。

转战东南　坚持抗清

清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一六四六年）十二月，郑成功为了表示抗清决心，大会文武群臣于烈屿（小金门），设高皇帝神位，定盟恢复，树起“背父救国”的旗帜，起兵抗清。第二年，他移师于广东南澳，招募旧部将士，远近前来投奔的达数千人，一时军声颇震。

顺治四年（一六四七年）至顺治六年（一六四九年），郑成功率领海上义师，连破福建的同安、海澄、漳浦，并攻克泉州和闽南一带地方，进据金门、厦门。然后以金门、厦门为抗清基地，积极发展自己的军事、政治力量。

在军事方面，郑成功建立水陆军师一百多镇营，分为亲军、陆师、水师三部。亲军有五卫，即左武卫镇、右武卫

镇、左虎卫镇、右虎卫镇和銮仪卫，其中銮仪卫是郑成功的侍卫军，包括前后左右中五营。亲军以外，有前后左右中五军，是作战的主力部队，郑成功自为中军元帅。军以下为镇，镇以下为协，每镇设前后左右中五协。这种五五编制法，组织十分严密，它保证了军队的集中指挥和战斗力的发挥。军队要打胜仗，没有船舰武器是不行的。郑成功起兵后，就积极督造船械，到厦门后，又命冯澄世设局大造各式武器。郑成功还特别注重部队的训练，先后建厦门演武场、澳仔演武亭，亲自检阅各兵操练，并制定操练章法，印发全军遵行。此外，还进行必要的考核，凡武艺超群、成绩优异者，立予奖励和提拔。郑成功号令严明，他的军队进退均凭号令行事。对于临阵退缩官兵，严惩不贷，对于违令者虽取胜仍予处罚，奉令者虽犯有错误仍加奖励。一次，郑成功因驰马进马信兵营，班长陈勇因事先未奉通行命令，立予阻止，而且刀伤郑成功以致流血，马信闻知后，把陈勇押送到郑成功面前认罪，郑成功却当面释缚，给予表扬和奖赏。即使对至亲骨肉，郑成功也执法无私。在清将马得功袭击厦门时，他的叔父郑芝莞闻报后，席卷珍宝，弃城下船，不战而遁。郑成功率舟师回到厦门，立即将郑芝莞按失机论罪，依法处斩，所以郑成功全军上下无不恪遵军令。

在政治方面，郑成功上疏奏请南明永历朝廷下诏，“许其军前所设六部主事秩比行在侍郎，都事秩比郎中，都吏秩比员外”。六部即礼、户、吏、兵、刑、工，所设六官遂成为郑成功辖下分理庶政的主管。厦门是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郑成功占领厦门后，为了把厦门建设成为巩固的抗清根据地，除了在军事上采取一系列措施外，还着手建立政权机构，把厦门（明朝称中左所）改为思明州，任命郑擎柱为知州。

此外，郑成功还注意发展贸易，筹措粮饷。当时，每年从厦门一带前往日本、南洋各地的商船有七八十艘，贸易额达二百五十万两左右，其中大部分由郑氏“官商”经营，并在国内京师、苏杭、山东各地经营财贸，以济其用。派出征饷官督征泉、漳、福、兴沿海地方的钱粮，以充军饷。

郑成功采取这些措施，建立了以金、厦为中心的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后，便率师南征北战，转战于东南各地，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战绩。

清顺治八年，南明永历五年（一六五一年），张献忠的余部大西军与南明的桂王政权联合抗清，第二年，大西军出师北伐，掀起了抗清高潮。郑成功趁机出击闽南各地，与之遥相呼应。五月，郑成功进军海澄磁灶地方，漳浦清军总镇王邦俊率马步兵数千来援，郑成功用设伏诱敌的计策，打败清军，缴获大量马匹辎重。九月，郑军乘胜进攻漳浦，王邦俊等又调集马兵数千、步兵数千与之对垒。

郑成功兵分三路，一路埋伏待敌，一路抄袭敌后，一路正面迎敌，杀得清军狼狈逃窜，缴获清军大批马匹衣甲。王邦俊两次败绩后，驰报求援，清廷派遣杨名皋带马步兵数千人援，郑成功率师由九都登岸，亲自率领戎旗镇驻扎漳浦小盈岭上，将其余各镇分为四股择地埋伏岭下。待清军进入伏击圈，戎旗镇督同援剿右镇迎击清军中股，援剿右镇等击其左，左先锋等击其右，使清军难

以招架，溃败而退，几乎全军覆没。闽南漳属各县清军残余势力，或潜逃投郑，或献城归降，仅在十二月份，郑军就先后克取了漳浦、云霄、诏安、海澄、平和等县，巩固和扩大了以金、厦为中心的抗清基地。

第二年正月初，郑成功乘胜率师扬帆人海澄港，下令各镇官兵攻打长泰县。三月初，清浙闽总督陈锦督马步数万前来救援，妄图一举消灭郑军。郑成功遣将屯扎诏安、南靖、平和、海澄等县，分路拒敌，然后自统大师屯扎漳州九龙江东岸口江东桥附近待敌。十三日中午，陈锦尽率马步兵由东南山埠而来，郑成功下令迎击，各营兵士蜂拥而出，仅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即将清军击溃，并攻入牛蹄山清军老营。陈锦逃到同安港口，被侍卫人员刺死，割下首级，献给郑成功。江东桥之战，歼灭了驻闽清军的主力，进一步巩固了以厦门为中心的抗清根据地。

四月，郑成功率师进攻漳州府城，清守将王邦俊樱城固守，上下请援。五月，清援兵到达漳州，会同王邦俊督兵由东门出战，被郑军杀退，退守城中，不敢复出。清军援兵被杀退后，转而调集舟师数百只进攻厦门，以图解漳州之围。郑成功令陈辉为总督，率水师百余艘战船迎敌，将清军舟师击败于崇武海面，夺得清军大船十余只而回。

郑成功倾其全力围困漳州，达五个多月之久，仍累攻不下，以致师劳粮匮。九月，清调总兵金砺统领浙、直满汉马骑万匹星夜人闽赴援，郑军迎战累败，只好解漳州围，退驻江东桥，最后又退守海澄。

清顺治十年，南明永历七年（一六五三年）五月，金砺调集清军水陆精锐数万进攻海澄。海澄是厦门的门户，关系郑氏成败，是郑军必守之地。郑成功下令出击，清军用大小铳炮数百日夜连击，无瞬息停，郑成功收军固守。清军又连续炮击两日，郑军营垒整而又坏，将士损伤很多。郑成功指挥自若，虽城坏百余丈，立雉堞防御，他仍然登敌台观望，张盖而坐，与诸将饮于敌楼。诸将见敌人炮火密集，劝他躲避，他说："死生有命在天，敌人的火炮又能把我怎么样?"清兵见是郑成功，立即炮火齐发，甘辉赶紧将郑成功挤下台，原座随之即被炮击碎。郑成功激动地说："天佑孤臣，诸将平安无事矣!"全军将士无不振奋，斗志昂扬。这时，清军营中火药钱粮已供应不上，郑成功估计敌人必然拼死决战，命令将士挖掘地窝藏身，并命令戎旗镇、神器镇在晚上把火药全部埋在河沟旁边，准备对付清军的进攻。初六夜晚，清兵果然发炮猛轰，一夜不绝。五鼓之时，以炮兵为头锋，绿旗兵继后，并营逼进，填壕攀栅而上。郑军拼死拒敌，用大斧砍杀，三退三进，杀伤相当。天色渐明，清军已大半过河，郑成功下令点燃埋伏河沟边的地炮，把刚过河的清军全部炸死。郑军乘势冲出，未过河的清军狼狈奔逃，被郑军擒杀无遗，金砺侥幸脱逃。

清顺治十一年，南明永历八年（一六五四年）十一月，漳州协守清将刘国轩献城降郑，郑成功授刘国轩都督佥事。十二月，郑成功令诸镇将分兵进取同安、南安、惠安等县，其余各县俱闻风归降。至此，漳州及漳泉属邑均被郑军克复，郑军遂移师到兴化地方。

第二年，清廷命贝勒世子罗托（即

郑亲王世子济度）统领清军赴闽，以图一举消灭郑军。郑成功采用冯澄世所献良策，将泉漳诸邑城全部拆毁，派郝文兴统其所部坚守海澄，而将全军撤回厦门，坚守各岛，养精蓄锐，以待清军。清顺治十三年，南明永历十年（一六五六年）四月，罗托命韩尚亮为先锋，进攻厦门，与郑军对峙于围头。正遇一场暴风雨，清军士兵大多晕船，无法作战，又不能靠岸，转而进攻金门，遭到郑军水师的阻击，双方会战于泉州湾。清军惨遭大败，死伤无数，韩尚亮首先毙命，其余清兵大多被俘。郑军取得了泉州湾战役的胜利，但在六月发生了海澄守将黄梧据城背叛降清的事件。海澄失守后，郑成功只好改变进攻方向，别图进取。

七月，郑成功乘贝勒世子罗托与总督正提师驻扎漳州、福州省城空虚之际，派水师直抵闽安。闽安告捷后，郑成功又亲率水师前往闽安，命大队舟师驻扎南台，进围福州。为防南北清军援兵，又分兵把守乌龙江及连江北岭，然后将东南隅一带房屋拆毁，竖栅安置炮台，日夜轰击福州城。经过激战，郑军曾一度攻入城内，占据了乌楼，后来因中清军伏兵，又在八月中旬撤出福州。罗托得知郑成功攻克闽安包围福州的消息后，急忙派阿格商统领骁骑驰赴救援，并命马得功带兵出云霄八尺门，渡江袭取铜山，以图仿效“击魏救韩”之法。九月初，马得功领兵到八尺门，进攻铜山，但遭到郑军的反击，伤亡很多，被迫撤回。十二月，郑成功又督师进取罗源、宁德等邑。清军援兵阿格商等率马步数千尾追。郑成功令甘辉、周全斌等断其后，然后节节示弱诱敌。阿格商见郑军退走，放心追赶，至护国岭遭到郑军的伏击，死伤惨重，阿格商当场毙命。

郑成功分兵进取转战福建各地的同时，为了接应大西军李定国进军广西，曾于清顺治十年，南明永历七年（一六五三年）派水师南下至潮州，并与鲁王旧臣张名振合师北上，攻入长江。顺治十五年（一六五八年），清军大举进攻西南地区的大西军，郑成功为解救西南的急局，又派兵进攻浙江沿海，不幸遇到飓风，被迫撤退。此后，郑成功便一直在福建沿海作战，屡败清军，期待着和李定国一起北伐。张名振死后，余部由张煌言率领，郑成功也和他密切合作。他们转战于闽、粤、浙等山区海岛，互为应援，遥相呼应。

郑成功在东南沿海转战十余年，深感徒费时日，不如与清军一决雌雄，经过长期准备，他决定再度北伐。清顺治十四年，南明永历十一年（一六五七年）九月，永历帝（即桂王）下诏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这一年，他开始检查军备，储备粮食，操练铁军，布置兵力，进行北伐准备。在做了充分准备之后，清顺治十六年，南明永历十三年（一六五九年）五月，郑成功自任招讨大元帅，以原隆武宰相张煌言监军，率十七万水陆大军，二千三百只战船，大举北伐江南。北伐大军五月在崇明岛登陆，六月直捣瓜州，水师进泊镇江南岸七里港，二十日登岸扎营，与清军咫尺对峙。郑成功见银山逼近镇江府，离清军营地不到三里，便于二十二日下令各路大军迅速迂回到银山脚下，与清军展开激战。郑军奋勇死战，无不以一当百，所向披靡，杀得清兵溃不成军，横尸遍野，其余清兵惊惶四散，鼠窜而逃。郑成功一面传令进兵围城，一面派人进城招降。

镇江府守将高谦与知府戴可进等献城，赴银山军前投降。二十五日，郑成功巡视镇江城，严令官兵，不许擅入民家骚扰百姓，违者从重究处。在郑成功抚慰政策感召下，附近的仪真、浦口、滁县、六合等处归附者接踵而至。

七月，郑成功率师进围南京城。荆州、扬州、芜湖、丹阳、宁国、池州、安庆等府州县，纷纷投诚归郑。不到半个月时间，北伐军即占据四府三州二十四县，使清廷大为震惊，顺治帝甚至准备亲自带兵镇压。但是，郑成功未能接受张煌言等人建立据点、断清粮运、集中兵力攻打南京的建议，加上兵力分散而又轻敌，最后遭到清将梁化凤的偷袭，惨败于南京城下。郑成功不得不率兵撤出长江，返回金、厦。清军尾随而下，企图一鼓作气，彻底消灭郑军。

清廷任命达素为安南大将军，率领四五万八旗军入闽，同时又命明安达理率军自南京出发，由海道会攻厦门。郑成功经过半年的修整和补充，集中全部兵力于厦门海面，决心同清军作殊死战。清顺治十七年，南明永历十四年（一六六〇年）五月初十日凌晨，两军会战于漳州海门港。清军利用有利的风向，向郑军发起猛攻，击毁郑军很多战船，但郑成功一直站在他的船头，神色自若地指挥作战，将士深受鼓舞，奋勇击杀。中午，风向改变，波涛顿起，郑成功即刻命令全军发炮反攻，清军乱作一团，郑军将士踏浪如飞，乘势猛击，俘获大批清军船只和官兵，达素狼狈逃窜，羞愤自杀于福州。

进围厦门惨遭失败后，清廷为了对付这支抗清力量，清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十五年（一六六一年）发布“迁界令”，强令从山东到广东沿海的居民内迁三十里，严禁船只出海，企图把郑成功围困在东南一隅之地，防止他再次率师北伐。面对这一形势，郑成功决定跨海东征，收复被荷兰殖民者占领的台湾，作为积蓄力量，继续抗清的根据地。

挥师东征　驱荷复台

台湾与福建隔海相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十七世纪初，荷兰殖民主义向东方扩张，在其亚洲殖民基地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建立了东印度公司，就开始对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进行侵略。明万历二十九年（一六〇一年），荷兰殖民者的一武装商船来到广州，对我国人民进行武装挑衅。第二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两艘民舰进攻澳门，与葡萄牙争夺澳门未逞，转而于明万历三十一年（一六〇三年）七月侵占澎湖，后在泉州都司沈有容义正词严的警告下，被迫撤退。但荷兰殖民者贼心不死，明天启二年（一六二二年）四月派遣两艘军舰攻打澳门，被葡萄牙打败后，又转而于七月再一次侵占澎湖。第二年，明朝政府派福建总兵俞咨皋领兵规复澎湖，大败荷兰人侵者。荷兰人侵者被逐出澎湖后，又于明天启四年（一六二四年）转而在台南附近的台江登陆，侵占了台南地区，先后在一鲲鯓筑台湾城（荷兰人叫热兰遮城），在今台南地方筑赤嵌城（荷兰人叫普鲁文查城）和赤嵌楼。在荷兰殖民者侵占台南地区以后，明天启六年（一六二六年），西班牙殖民者窜人台湾北部，侵占了基隆和淡水。明崇祯十五年（一六四二年），荷兰殖民者在台湾北部击败西班牙殖民军，独霸了台湾。

荷兰侵略者侵占台湾后，不但破坏

了我国领土的完整，而且由于它的掠夺和骚扰活动，已经严重影响到郑成功的海上贸易和粮饷之源，因而对郑成功的抗清复明斗争也构成了严重威胁，所以郑成功早在誓师抗清复明不久，就有意要收复台湾，并对荷兰殖民者展开斗争。清顺治十二年，南明永历九年（一六五二年），有一位耶稣会的教士，从中国到巴达维亚，就曾秘密地向荷兰东印度公司提供了郑成功打算攻台的情报，东印度公司马上致书台湾荷兰殖民军头目，让其“谨慎提防”，实际上，郑成功据东南沿海进行抗清复明斗争时，已把台湾视为自己的后方，在驱荷复台前就曾把犯人幽置台湾，而且还委托何廷斌在台湾预收船只入厦的进口税，作为郑军的财源之一。

清顺治十六年，南明永历十三年（一六五九年），郑成功率师北伐南京失败退守金、厦一带后，每以厦门地狭为忧，自觉“地蹙军孤”，“乃稍稍议迁”，“方谋所向”。为了继续他的抗清复明事业，他决心要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以为抗清根据地。这一年四月，正当郑成功计划收复台湾的时候，何廷斌因不堪荷兰殖民者的欺辱，从台湾来到厦门求见郑成功。何廷斌是福建南安人，原系郑成功郑芝龙的部下，后来在台湾给荷兰人当翻译，对台湾的情况十分熟悉。他向郑成功献策说台湾“田园万顷，沃野千里，饷税数十万，造船利器，吾民鳞集，所优为者，近为红夷占据，城中夷伙不上千人，攻之可唾手得者”，并献上台湾地图。十二月，郑成功接受何廷斌的建议，召集诸将议決：“遣前提督黄廷、户官郑泰督率援剿前镇（按为戴捷）、仁武镇（即康邦彦）往平台湾，安顿将领官兵家眷。”第二年正月，郑成功即派黄廷、郭泰、康邦彦出征台湾。康邦彦已到达澎湖，后来因清军进攻厦门，只得暂时停止出征台湾的行动。此后，郑成功又多次研究收复台湾和留兵防守金门、厦门事宜。

清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十五年（一六六一年）正月，李定国战败，桂王永历帝朱由榔逃往缅甸，大陆各省基本被清军占领，收复台湾已不容踌躇。郑成功召集诸将再次讨论进军台湾问题。他对诸将说：“去年虽胜达虏一阵，伪朝未必遂肯悔我，则我之南北征驰，眷属未免劳顿，前年何廷斌所进台湾一图，田园万顷……攻之可唾手得者。我欲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领家眷，然后东征西讨，无内顾之忧。”接着，便在厦门积极筹集粮饷、物资，操练军伍，并传令大修船只，听候出师，准备进军台湾。

郑成功基本完成战前准备工作后，从厦门移师驻扎金门。他命令其子郑经及部分将领留守金、厦，以防清军乘虚袭取，自己亲率大军进取台湾，征台大军分为两个梯队：郑成功自率二万官兵，数百艘大小战船为第一梯队，先期出发；由黄安等指挥六千官兵，二十余艘战船为第二梯队，以为后援。郑成功根据台湾的地形和敌情，作出了“先取澎湖，然后乘涨潮时机，航渡鹿耳门，登陆禾寮港，切断台湾城、赤嵌楼两地荷军联系，分别各个击破，最后收复台湾全岛”的战略决策。

三月初一日，郑成功在金门举行隆重的誓师仪式。初十日，传令移师驻金门料罗湾听令开船。二十三日中午，郑成功征台大军自料罗湾出发。但见帆樯

蔽日，旌旗如云，数百船舰，首尾鱼贯，浩浩荡荡向东南挺进。第二天，各船齐集澎湖后，郑成功驻峙内屿，其他分驻各屿，“候风开驾”。二十七日，进军柑桔屿，遇风折回，仍停泊澎湖各岛屿。由于风阻乏粮，只得就地征集。岛上的老百姓听说是郑成功的军队，便带着鱼虾猪羊前来慰问，并自愿作先锋船的向导。在这风阻乏粮的严峻时刻，为赶上四月初二日鹿耳门涨潮之机，航渡鹿耳门，登陆禾寮港，郑成功当机立断，毅然于三月三十日晚传令开船进军。他说：“冰坚可渡，天意有在。天意若付我平定台湾，今晚开驾后，自然风恬浪静矣。不然，官兵岂堪坐困断岛受饿也。”直到当天晚上一更过后，依然波浪未息，惊险殊甚。而三更一过，却已云收雨散，天气晴朗。出征船舰顺风驶离澎湖，在四月初二日黎明赶至鹿耳门港外，候潮应风而进。

台湾海岸线很长，可以登陆的地点很多，郑成功选择鹿耳门登陆台湾，是一个正确的战略决策。鹿耳门接近台南，位于赤嵌城、台湾城附近，是用武必争的要害之地。一人鹿耳门，就可以控制赤嵌城及其港口，断敌出海之路。但鹿耳门形势非常险峻，从鹿耳门附近登陆，只有南、北两个航道。南航道在北线尾岛和鲲鯓之间，通过南航道将在赤嵌附近登陆。然而，在一鲲鯓沙洲上，荷兰人的热兰遮城堡以重炮控制了航道，在赤嵌的普鲁文查城堡也是荷兰的主要火力点，要想突破这条航道，必须付出很大代价。北航道在北线尾岛的北部，通过北航道，将在北线尾岛北部和赤嵌西北的禾寮港登陆。这条航道迂回曲折，水浅沙平，是荷兰殖民者疏于防范的一条航道。在北线尾岛北端，原有一座热堡炮台，后因暴风雨袭击而坠毁，荷兰人只在鹿耳门口沉塞夹板船，以为这样大船无从出人，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在北线尾岛仅派一名班长和六名士兵驻守。郑成功详细审察了何廷斌所献地图，了解到水路并不从敌人炮台前经过，而且何廷斌派小通事郭平实地勘察已探明一条在沙泥中的港路，这条港路从赤嵌直下鹿耳门，涨潮时水深可达四尺有余，最大的船也可以顺利通过，因此，他决定把主攻方向选在北航道。四月初二日中午，鹿耳门海潮大涨，郑成功亲自带领船队，由坐在船头的何廷斌充当向导，按图迂回，顺着污泥中的港路，徐徐驶人海湾，将舰船分布在台江之中。荷兰侵略者大惊，以为郑军自天而降，顿时束手无策。当晚，郑军突破海面荷兰夹板船和赤嵌楼炮台火力的拦阻，只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就顺利通过了这条险阻的航道，在嵌西北约十里地的禾寮港登陆。台湾各族人民闻讯接踵而至，“男女壶浆，迎者塞道”，争先恐后用货车和其他工具帮助郑军登陆，表现了台湾各族人民殷切盼望和热烈欢迎郑军收复台湾的热情。

郑成功大军在台湾登陆后，立即扎下营寨，准备从侧后进攻赤嵌楼，荷兰殖民者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赤嵌城和台湾城之间的海道也已被郑军封锁，使两地的殖民者无法互相援助。当时，荷兰侵略军头目揆一据守在台湾城（即热兰遮城堡），城中只有荷兰侵略军一千一百多人。据守赤嵌城（即普鲁文查城堡）的是荷兰侵略军司令官描难实叮，城中荷兰官兵也只有三四百人。此外，在台湾城附近停泊的荷兰船仅仅只有两

艘战舰、两艘小艇和一些帆船。荷兰侵略者妄图凭藉这些船炮和城堡，乘郑军立足未稳之际，打退郑军。四月初三，荷兰侵略军从海陆两路出击。在海上，荷兰殖民者以其主力舰赫克托号企图阻挡郑军战船。郑成功以众敌寡，集中六十艘最强的战船将它团团包围，用猛烈的炮火，把赫克托号击沉。接着，其他三艘荷兰船也被击溃，其中一只缩回台湾城下，一只逃往巴达维亚。在陆上，当郑成功大军从北航道登陆禾寮港时，荷兰殖民者派汤马斯·贝德尔上尉带领二百四十名士兵企图阻止，这个贝德尔上尉，就是绰号"拔鬼仔"的，他竟狂妄地说什么，只消一阵排枪，就可把中国军队打散。郑成功命令部将率领七百多名战士，从侧翼绕过小山，向敌人后面抄袭，大军主要以弓箭从正面迎敌。在郑成功四千大军围攻下，荷兰侵略军腹背受敌，当场被击毙一百一十八人，贝德尔本人也随之一命呜呼。与此同时，荷兰殖民者又派阿尔多普上尉率领二百名士兵，乘舢板到赤嵌附近，企图阻挡郑军的登陆，结果遭到郑军优势兵力的攻击，大败而归。赤嵌城守将描难实叮，见郑军登陆，一面发炮，一面向台湾城呼救。揆一便命令阿尔多普乘船转往赤嵌城增援，但在郑军战船的阻击下，只有六十名士兵侥幸登陆，阿尔多普和其余士兵慌忙掉转船头逃回台湾城。

郑成功大败荷兰侵略军后，便以一万两千人的兵力围困赤嵌城。赤嵌城，即普鲁文查堡，周围四十五丈，高三丈六尺，城墙上有四座炮楼。守城的荷兰殖民者为争取喘息时间，派人同郑成功"谈判"，表示愿向郑成功"年输□税若干万，并土产□□货随意听从，年年照例纳贡。……送劳师银十万两"。郑成功断然拒绝，他严正指出，台湾"一向是属于中国的。……现在中国人需要这块土地……自应当把它归还原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正当郑成功以重兵重炮围攻赤嵌城时，当地人民向郑成功献计说，赤嵌城中无井泉，城外高山有水自上而下，绕于城壕，贯城而过，这是城中的惟一水源，若将其堵塞，城中的荷兰军要不了三天就会自动投降。郑成功采纳这一计策，终于迫使荷兰守将描难实叮于四月初六在城头树起了白旗。

郑成功收复赤嵌城后的第二天，又指挥大军分水陆两路围攻台湾城。台湾城，即热兰遮城堡，周方二百七十七丈六尺，高三丈多，分三层，下层深入地下一丈多，城垣坚固，四隅向外突出，置炮二十尊，南北还各置千斤巨炮十尊。守城荷军以密集火炮远射，封锁了周围每条道路。郑成功以正面进攻和侧翼迂回、水陆协同作战的战术，对台湾城进行围困。先派三四千人占据台湾城外市区，在市区平野上架设了二十八门大炮；然后派杨祥等率兵前往七鲲鯓，从左翼侧逼近台湾城。荷军一部行至七鲲鯓，还没来得及列阵对垒，即被杨祥率领的盾牌军冲垮，死伤过半，其余荷兰军狼狈退回台湾城。在郑军进逼下，台湾城内的荷兰侵略者一片混乱。这时困守在城内的侵略军只有八百七十人，退据堡垒继续顽抗。郑成功一面准备攻城，一面督促龟缩在热兰遮城堡的荷兰殖民者出降，揆一执迷不悟，继续负隅顽抗。四月二十九日，郑成功下令向台湾城发动猛攻，炮击达四小时之久，摧毁了台湾城的大部胸墙，击伤许多荷军。揆一拼命在城上列炮还击，迫使郑军向后撤

退，荷军乘势从城中冲出，妄图夺取郑军大炮，被郑军将领马信、刘国轩所率弓箭手击退。为尽量避免过多的杀伤，郑成功决定改速决战为持久战。他一方面派提督马信率领精锐部队驻扎台湾城外市区进行围困，另一方面又派六千兵力逼近台湾城南，与马信互为呼应，配合行动。五月初二，郑军第二梯队黄安等六镇，乘船二十艘，兵六千人，抵达台湾，并从台湾城南面逼近该城城堡。郑军兵力得到加强，供给得到补充后，从五月初五日开始，在所有通向城堡的街道都筑起防栅，并且挖了一条很宽的壕沟，加强对荷军的围困。

在郑军的围困之下，台湾城内的荷兰殖民者由于疲惫和饥饿，兵士患血痢、坏血症、水肿，每天都有死亡。九个月内，饿死加上战死的达一千六百余人，最后城堡里仅剩四百名健壮的士兵。

巴达维亚城的荷兰总督闻讯后，派了十艘兵船和七百名士兵，由司令官卡尤率领前往台湾支援。七月初五，荷兰的这支援军到达台湾海面后，不敢贸然驶进。直等一个月后，即闰七月二十三日，才开入港内，企图进行偷袭。但还未及措手，就遭到了郑军水师的迎头痛击。卡尤惨遭失败，率残部狼狈逃回巴达维亚。

经过八个多月的围困，郑成功下令在台湾城外增设炮台，建造战壕，准备总攻。十二月初六清晨，郑军以重炮轰击并进占乌特利支堡，迫使荷兰殖民者头目揆一不得不向郑成功投降。十二月十三日，揆一在投降书上签了字，然后全部滚出了台湾。从此，台湾回到了祖国怀抱，郑成功挥师东征，驱荷复台的伟大斗争，在台湾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终于赢得了胜利。

披荆斩棘　开发台湾

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密切民族关系的措施，推动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台湾地区的开发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

郑成功到达台湾一个多月，即改赤嵌地方为东都明京，设一府二县，这是台湾府县设置之始。从郑成功收复台湾后的府县调置看，完全是沿袭明制的，他“号台湾为东都，示将迎桂王狩焉”；改台湾城为安平镇，以寄托他对故乡的怀念；置赤嵌城为承天府，是为东都明京，并设天兴、万年二县。郑成功总号台湾为东都，且标明“明京”，可见他仍把自己看成是明之海外孤臣。郑成功之子郑经嗣位后，也不堕先志，属守臣节。后郑经因闻永历帝朱由榔已卒，若东都总号不改，便有忘僭之嫌，所以将东都改为东宁，置天兴、万年二州。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十分注意团结台湾同胞，尤其是对台湾少数民族（当地统称为番族），采取民族和睦政策。登陆不久，郑成功即带领他的部将亲临新港、麻豆、萧垅、目加溜湾四社慰问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对前来迎附的村社头目设宴款待，并赐给正副士官袍帽靴带，以示抚慰。各族同胞深为感动，南北各社闻风前来归附者接踵而至。郑成功又赠送他们许多烟草、布帛。为了帮助生产，郑成功还根据杨英的建议，发给各社耕牛和铁农具，并派有经验的汉族农民向他们传授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

为了保护台湾各族人民的利益，郑

成功收复台湾后即注意整饬法纪。他严令禁止士兵滋扰各族人民的村社，不准混侵士民及百姓的现耕物业，如有违越，法在必究，从重惩处。郑成功一向用法严峻，违法者即使亲信也不能赦免。他的部将吴豪因抢掠百姓、监匿米粟而被处以极刑。右虎卫陈蟒同罪，被“捆责革职”。承天府府尹杨朝栋因“以小斗散粮”，被全家抄斩。马信曾劝说郑成功“宜用宽典”，郑成功回答说：“法贵于严，庶不至流弊，俾后之守者自易治耳。”

郑成功为稳定军心民心，解决严重的军粮和给养问题，以巩固和发展驱荷复台胜利成果，他亲下谕令并颁布垦殖条款，大力推行屯垦，实行“寓兵于农”政策。垦殖条款颁订后，在当时台湾城的荷兰殖民者尚负隅顽抗的情况下，他即果断地作出将各镇营分派各地屯垦的决定。除留马信所部执行围困台湾城的军务外，其余官兵均按镇分地，按地开荒，插竹为社，斩茅为屋，围生牛教以犁，使野无旷土，而军有余粮。农隙则训以武事，有警则荷戈以战，无警则负耒以耕。这不但解决了军粮问题，而且对台湾的开发做出了重大贡献。

郑成功还把从荷兰殖民者手里没收来的王田改为官田，由官府供给生产资料，租给农民耕种，收取实物地租。镇守将兵，分兵屯垦所新垦殖的土地叫营盘田，实行自耕自给，每年只需向官府交收获量的三分之一。此外，鼓励文武官员及绅士圈地募民开垦，所垦土地称为私田，可以传为世业，从而出现了文武各官竞相占地招佃开垦的局面。

为了开发台湾，郑成功抵台时，曾严令金、厦所部搬眷赴台，并派人招徕漳州、泉州、惠川、潮州等沿海地区，清政府实行海禁而流离失所之民入台开垦。当时官兵迁家眷来台的虽不多，但沿海居民不愿内徙而东渡台湾的人却为数不少。在郑氏时代，台湾人口有了较大幅度增大，至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清朝政府统一台湾前夕，从大陆移入台湾的人口已不下二十万。台湾人口的迅速增长，促进了台湾开发事业的迅速发展。大陆汉族人民同台湾各族同胞一起，披荆斩棘，为共同开发祖国宝岛做出了贡献，郑氏时期在台湾开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郑成功（包括其子郑经时期）对台湾的经营开发，使台湾的社会经济获得了飞跃发展。尤其是台湾西南部平原地区出现了空前繁荣景象。许多新的城镇，如琅琊、云林、彰化、新竹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的。即使较远的淡水、基隆等地，也因驻军屯垦而为日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台湾土地日辟，生产日盛，“向之惮行者，今喜为乐土焉”。

郑成功一面发展生产，一面提倡教育。在少数民族居住的村社设立乡塾，为鼓励村社儿童入学，规定送子女入学者，可以减免徭役和赋税，从而大大提高了各民族的文化水平。

清康熙元年，南明永历十六年（一六六二年）五月八日，郑成功病逝于台湾，年仅三十九岁，他一生矢志抗清复明虽没有成功，而驱荷复台却是成功了的。他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开发台湾所建树的不朽功勋，将永载史册。他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多铎】

（1614～1649）清初著名将领。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五子，多尔衮同母弟，镶白旗主，时人通称十王。清太宗皇太极时，屡有战功。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1636）四月，封为和硕豫亲王。先后掌管过礼部和兵部。顺治元年（1644），随清军入关。十月，南下河南、西进陕西镇压李自成农民军。二年正月，攻入潼关、取西安。二月，移师攻南明，四月陷扬州，五月入南京，俘福王朱由崧，六月占浙江，十月还京师。进封和硕德豫亲王。三年五月，征伐北投喀尔喀蒙古苏尼特部的腾机思、腾机特等，败之。四年七月，册封为辅政叔德豫亲王。六年三月十八日病痘死。九年三月，因多尔衮案株连，降为多罗郡王。乾隆四十三年（1778）正月，高宗为多尔衮平反的同时追复多铎豫亲王及封号。

【多尔衮】

（1612～1650）清朝入关时的摄政王。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天聪二年（1628）以初次从征察哈尔多罗特部有功，赐号墨尔根代青（满语，聪明之意）。此后数次入明境内山西、北直隶、山东等地掠略，又征察哈尔、朝鲜，攻大凌河、锦州、松山等地，为清太宗皇太极所器重，逐渐跃居于后金军主要统帅之列。天聪五年执掌吏部，崇德元年（1636）封为和硕睿亲王。

崇德八年，皇太极因病突然死去，因储嗣未定，清朝皇族面临王位之争。多尔衮以镶白、正白两旗势力拥立皇太极年仅六岁的第九子福临为帝（即清世祖福临），由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共同辅政。不久，多尔衮集大权于一身，其地位越过济尔哈朗，各衙门关白政事、记录档册皆以多尔衮为先。

顺治元年（1644）三月，李自成攻下北京，推翻了明王朝（见李自成起义）。清朝统治者抓住机会，立即向关内进军。四月，以多尔衮为大将军的满蒙汉八旗兵与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互相勾结，共同镇压农民军。山海关之战，李自成军失利，退回北京后，率部西走。五月，多尔衮入京。十月，迎福临至，即位北京，正式宣布清朝对全国实行统治。多尔衮位崇功高，权势日增。是年加封为叔父摄政王，五年又尊为皇父摄政王，以皇帝之尊亲代行皇帝职权，成为清入关初年的实际统治者。

多尔衮摄政时期，以入关前已经建立的政治制度为基础，进一步仿照明制，加强封建专制政权。多尔衮在维护“权归满人”的同时，对汉族地主阶级、故明官员采取了“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的政策。令原明朝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顺治五年又设六部汉尚书、都察院汉左都御史各一员。为发挥汉族官员在政权中之作用，六年，下令禁止满洲诸王干预各衙门政事及指摘内外汉官。为广泛招徕汉族地主阶级，又礼葬明崇祯帝后，开科取士，网罗人才。

清代中央集权的加强，经历了皇帝与旗主、诸王之间的不断斗争而逐步实现。多尔衮采取措施限制由满族贵族、大臣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集权力于摄政王之手。又罢诸王兼



多尔衮

理六部事务，以各部事务由尚书掌管。诸王有干预各衙门政事者即行治罪，从而又推进了皇太极以来的中央集权。

清军入关之后，李自成军退回陕西，张献忠驻军四川（见张献忠起义）。明臣史可法、马士英等拥立福王朱由崧于南京。多尔衮先以重兵追击李自成于陕西、湖北，复命豪格入四川攻张献忠。顺治二年，多尔衮派兵下江南，渡长江，破南京，福王政权亡。三年，清军入浙江，六月破绍兴，南明鲁王遁走入海；八月清军入福建，破延平、汀州，唐王被执。清军相继入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多尔衮摄政七年，除西南之云贵等地尚有南明桂王政权及农民军之余部，海上有郑成功之抗清活动外，清军已占有全国之大半地区，为清朝建立全国政权打下初步基础。

为维护满族贵族利益，多尔衮摄政期间的一部分政策，激化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尤以剃发令、圈地令、逃人法、易服、投充等项，在一定地区内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

顺治七年冬，多尔衮出猎边外，十二月初九死于喀喇城（今河北滦平东），年仅三十九岁，被追尊为“诚敬义皇帝”。顺治亲政后，被首告“阴谋篡逆”，诏削爵，平毁墓葬，家产籍没。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帝为多尔衮昭雪，恢复了多尔衮的封号，成为清代八家铁帽子王之一。

【吴三桂】

吴三桂，江苏高邮人，籍辽东山海卫。其父吴襄为崇祯时锦州总兵，三桂以武举随征，因战功及父荫，官都指挥。后吴襄坐失战机下狱，擢三桂为总兵，守宁远。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初李自成军破大同、真定，京师戒严。明崇祯帝封吴三桂为平西伯，飞檄率所部入卫京师，并起用吴襄提叔京营。三桂令步骑先入关，亲率精锐殿后。十六日抵山海关，二十日到丰润，闻京师已陷，入卫兵皆溃，三桂引兵还屯山海关。李自成派部将唐通携银四万两犒三桂军，并胁吴襄作书招降。三桂率兵西至滦州，闻其爱妾陈圆圆为李自成军部将刘宗敏掠去，即回师山海关，秘密遣使上书睿亲王多尔衮，请清军入关讨李自成。多尔衮得书即日急进，至山海关外十里，吴三桂出关迎降，即在军中剃发盟誓，其兵以白布系肩，前驱入关。四月二十二日，吴三桂与清英王阿济格、豫王多铎大败李自成军于山海关（见山海关之战）。是日清封吴三桂为平西王，令其为前驱追击李自成。吴三桂随阿济格败李自成于庆都。后又自长城外进绥德、延安，攻西安。李自成出武关南走，三桂督兵追击，自襄阳下武冒，进至九江，清廷召还，命往锦州镇守。顺治五年移

镇汉中。八年，清廷命吴三桂督李国翰征四川。九年，吴三桂分兵攻下成都、嘉定、叙州、重庆，又击败大西军首领孙可望于保宁。十四年，清廷命吴三桂为平西大将军进征贵州。十五年，击败李定国，下遵义。十六年，清军会攻云南省城，南明永历帝奔永昌，并谕吏、兵二部，凡云南文武官举黜及兵民一切事，命吴三桂暂行总管，俟数年后，仍照旧例。十八年，清军入缅，缅甸王执永历帝献清军。康熙元年，吴三桂杀南明永历帝朱由榔于昆明。清廷晋封吴三桂为亲王，并命贵州省亦属管辖。吴三桂遂久镇云贵。

三藩势成割据 三藩各拥重兵，久据数省。平南、靖南二藩各有兵力十五佐领，绿营兵各六七千，丁口各两万；平西王所属兵力五十三佐领，绿营兵一万二千，丁口数万。吴三桂功高兵强，四方精兵猛将多归其部下。清廷又擢升其部将王辅臣为陕西提督，李本深为贵州提督，吴之茂为四川总兵，马宝、王屏藩、王绪等十人为云南总兵。三藩势力几及全国之半。

吴三桂初镇云贵，清廷曾准予便宜行事，云、贵督抚全受他节制，所除授文武官员，号称“西选”，“西选”之官几遍各地。顺治十七年，云南省俸饷九百余万，加以粤闽二藩运饷，年需两千余万。邻近诸省輓输不足，则补给于江南，致使清朝财赋半耗费于三藩。吴三桂自恃势重，益骄纵，踞明桂王五华山旧宫为藩府，增崇侈丽，尽据明黔国公沐氏旧庄七百顷为藩庄，圈占民田，迫令“照业主例纳租”理头工作“勒平民为余丁”，“不从则诬指为逃人”。又借疏河修城，广征关市，榷盐井，开矿鼓铸，垄断其利，所铸钱，时称“西钱”。吴三桂专制云南十余年，日练兵马，利器械，暗存硝磺等禁物。通使达赖喇嘛，互市茶马，蒙古之马由西藏入云南每年数千匹。他遍布私人于水陆要冲，各省提镇多有心腹。其子吴应熊为额附，朝政巨细，可以旦夕密报。于是，吴三桂自以为根蒂日固不可拔，朝廷终究不会从他手中夺去云贵。

耿精忠袭封王爵后，纵令属下夺农商之业，“以税敛暴于闽”，纵使其部下“苛派夫役，勒索银米”。又广集宵小之徒，因谶纬有“天子分身火耳”之谣，妄称“火耳者，耿也。天下有故，据八闽以图进取，可以得志”。

尚可喜在广东令其部属私充盐商，又私市私税。广州为对外通商口岸，“每岁所获银两不下数百万”。尚可喜对清廷比较效忠，但年老多病，将兵事交其子之信。尚之信素性桀骜，横暴日甚，招纳奸宄，布为爪牙，罔利恣行，官民怨恨。又酗酒嗜杀，常在其父面前持刃相拟，所为所行，日益不法。至此，三藩各据一方，互通声气，广布党羽，实际上已成为割据势力。

康熙帝决定撤藩 三藩势成割据，严重威胁着清朝的统治和国家的统一。早在清世祖死时，吴三桂拥兵北上入祭，兵马塞途，居民走避，清廷恐吴三桂生恋，命其在城外张棚设奠，礼成即去。康熙帝亲政数年，深知朝廷中外之利害和前代藩镇之得失，曾说：“朕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康熙六年，吴三桂以目疾请解除总管云贵两省事务，以相试探。康熙帝命吴三桂将所管各项事务交出，责令云贵两省督抚

管理。云贵总督卞三元、提督张国柱、李本深合词请命平西王仍总管滇黔事务。康熙帝以照顾吴三桂身体为理由，予以拒绝。

康熙十二年三月，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留其子尚之信继续镇守广东。经户、兵两部和议政王贝勒大臣集议，认为如果尚之信拥兵留镇广东，跋扈难制，康熙帝遂诏令尽撤全藩。吴三桂和耿精忠得知不能自安，在同年七月先后疏请撤兵，以试探朝廷意旨。经户、兵二部确议，吴三桂及所部五十三佐领官兵家口应俱迁移。疏下议政王大臣会议，大学士索额图、图海等多以为三藩不可迁移。惟有刑部尚书莫洛、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等力请徒藩。康熙帝再命议政王贝勒大臣及九卿科道会同确议，画一具奏。诸王以下所见不一，仍持两议。康熙帝考虑到藩镇久握重兵，势成尾大，非国家之利；又以为吴三桂之子，耿精忠诚弟都宿卫京师，凉吴、耿二人不能发动变乱。遂下令三藩俱撤还山海关外。

三藩之乱及其覆灭 吴三桂、耿精忠疏请移藩，实迫于形势，并非本意。吴希冀朝廷慰留，如明代沐英世守云南之先例。及撤藩命下，愕然失望，遂与其心腹聚谋，暗中部署兵马，禁遏邮传，只许入而不许出，并勾结他省旧部，又与耿精忠联络应和，准备叛乱。康熙十二年八月清廷命礼部侍郎哲元肯等赴云南，户部尚书梁清标等赴广东，吏部侍郎陈一炳等赴福建，各持敕谕，会同该藩及督抚商榷移藩事谊。九月，清廷命陕西总督鄂善总督云南军务，宁夏总兵官桑额提督云南军务。此时吴三桂与其党正日夜加紧密谋。侍郎哲尔肯、学士傅达礼等既至云南，催促起行。吴三桂表面拜诏，而屡迁行期，反谋益急，而难于举兵之名。欲立明朝后裔以号召天下，但缅甸之役及杀害永历帝无可自解；欲行至中原据腹心之地举兵，又恐日久谋泄。是年十一月，吴三桂反，杀云南巡抚朱国治，拘捕了按察使以下不顺从的官员，发布檄文，自称“原镇守山海关总兵官，今奉旨总统天下水陆大元帅，兴明讨虏大将军”。佯称拥立“先皇三太子”，兴明讨清，蓄发，易发冠，传檄远近，致书平南、靖南二藩及各地故旧将吏，并移会台湾郑经，邀约响应。云南提督张国柱、贵州巡抚曹申吉、提督李本深等随吴三桂反。云贵总督甘文焜在贵州闻变，驰书告川湖总督蔡毓荣，急走至镇远，被副将江义以兵包围，甘文焜自杀，三藩之乱由此开始。

自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吴三桂起兵反清，至康熙二十年十月二十九吴世璠自杀，清军进入昆明，三藩之乱历时八年。其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吴三桂坐像

第一阶段自康熙十二年十一月至十五年四月。战乱不断扩大，吴三桂兵出云贵，进据湖南澧州、常德、岳州、长沙；清军云集荆州、武昌、宜昌，但不敢渡江撄其锋。孙延龄叛于广西，罗森、郑蛟麟、吴之茂叛于四川，耿精忠叛于福建，台湾郑经渡海进兵福建漳州、泉州和广东潮州，提督王辅臣又叛于宁羌，击杀清陕西经略莫洛。四方震动，人心动摇。康熙帝欲亲征，经议政内大臣密议谏止。清军东征西讨，顾此失彼。随后尚之信又叛于广东，总督、巡抚俱附之，清廷增兵两江。

第二阶段自康熙十五年五月至十七年七月。以王辅臣败将平凉为转机，形势向有利于清军发展。随后，因郑经部争据福建漳、泉、兴、汀等地，耿精忠腹背受敌，危促撤兵请降。尚之信也相继投降。孙延龄又被吴世璠杀于桂林。于是，清军集中兵力进逼长沙、岳州，吴三桂聚众固守。两军在江西吉、袁二州，广东韶关、永兴和广西梧、浔二州及桂林等湖南外围要地反复争夺。清军将帅每多观望，旷日糜饷，在军事上仍处于相持阶段。

第三阶级自康熙十七年八月至二十年十月。康熙十七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国号大周，但未能改变叛军的困境。同年秋，吴三桂病死，形势陡变。叛军无首，众心瓦解。其孙吴世璠继承帝位。清军趁机发动进攻，从此叛军一蹶不振，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等地逐步为清军恢复。但马宝、胡国柱等叛军仍困兽犹斗，节节顽抗；满洲将帅仍多迁延，以致时逾两年，清军才进逼云南，康熙二十年十月，攻下省城昆明。吴世璠势穷自杀，余众出降，三藩之乱终告平定。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中国历史百科全书　第３卷　军事卷　（图文互动版）
作者＝徐寒主编
页数＝５９４
ＳＳ号＝１１４８４９９５
出版日期＝２００４年１２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一、兵役制度
【部族兵制】
【全面征兵制】
【部分征兵制】
【职业兵制】
【世兵制】
【募兵制】
【古代军训】
二、兵器装备
【十八般兵器】
【棍】
【戈】
【矛】
【戟】
【枪】
【镋钯】
【斧】
【剑】
【刀】
【弓箭】
【弩箭】
【投枪】
【炮】
【弹弓】
【火枪】
【火炮】
【枪炮】
【火箭】
【头部防护具】
【身体防护具】
【手持防护装备】
【兵车】
【攻城器械】
【守城器械】
【障碍器材】
三、军事编制
【四大兵种】
【车兵】
【步兵】
【骑兵】
【水军】
【什伍之制】
四、统兵制度

【文武分途】
【军官制度】
【庙算】
【以文驭武】
五、兵礼军法
【交战规则】
【军营礼仪】
【军功制】
【军法】
六、战术战略
【步兵阵法】
【骑兵战术】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七、兵书通览
【《孙子兵法》】
【《吴子》】
【《司马法》】
【《孙膑兵法》】
【《尉缭子》】
【《六韬》】
【《阴符经》】
【《黄石公三略》】
【《将苑》】
【《李卫公问对》】
【《素书》】
【《百战奇法》】
【《阵纪》】
【《兵法百战经》】
【《三十六计》】
【《兵经百篇》】
【《曾胡治兵语录》】
【《乾坤大略》】
【《兵谋与兵法》】
【《练兵实纪》】
【《兵机要诀》】
【《防守集成》】
【《火龙经》】
【《海防图论》】
【《海国图志》】
【《百将传》】
【《太白阴经》】
【《武经总要》】
【《武备志》】
【《兵学新书》】
【《治平胜算全书》】
【《知古录》】
【《武经七书》】

八、著名战役

【涿鹿之战】
【鸣条之战】
【牧野之战】
【长勺之战】
【韩原之战】
【泓水之战】
【城濮之战】
【鄗之战】
【邲之战】
【鞍之战】
【鄢陵大战】
【马陵之战】
【桂陵之战】
【即墨之战】
【华阳之战】
【长平之战】
【巨鹿之战】
【井陉口之战】
【陈仓之战】
【垓下之战】
【马邑之战】
【昆阳之战】
【官渡之战】
【赤壁之战】
【街亭之战】
【彝陵之战】
【南中之战】
【苦县之役】
【关洛大战】
【前秦灭凉、代之战】
【柴壁大战】
【清口之战】
【淝水之战】
【常山之战】
【邙山之战】
【高梁河之战】
【澶渊之战】
【富平之战】
【和尚原之战】
【仙人关之战】
【黄天荡之战】
【郾城之战】
【顺昌之战】
【柘皋之战】
【定川之战】
【三川口之战】

【好水川之战】……………（２８５　）【麟府之战】
【夏辽之战】
【永乐城之战】
【采石之战】
【十三翼之战】
【三峰山之战】
【钓鱼城之战】
【襄樊之战】
【北京保卫战】
【宁远之战】
【赤嵌城之战】
【雅克萨之战】
【乌兰布通之战】
【大小金川之战】
【虎门之战】
【三元里之战】
【浙东之战】
【吴淞之战】
【湖口之战】
【三河之战】
【大沽口之战】
【谢庄之战】
【高楼寨之战】
【金积堡之战】
【新疆之战】
【镇南关之战】
【甲午之战】
【天津卫之战】
【江孜之战】
【黄花岗起义】
【武昌首义】
九、军事人物
【孙武】
【吴起】
【田单】
【白起】
【王翦】
【蒙恬】
【项羽】
【韩信】
【周亚夫】
【卫青】
【霍去病】
【马援】
【窦宪】
【李固】
【窦武】

【荀彧】
【郭嘉】
【司马懿】
【邓艾】
【钟会】
【诸葛亮】
【关羽】
【张飞】
【马超】
【姜维】
【孟获】
【孙坚】
【孙策】
【孙权】
【周瑜】
【张昭】
【吕蒙】
【陆逊】
【祖逖】
【谢安】
【谢玄】
【苻坚】
【王猛】
【苏威】
【韩擒虎】
【杨玄感】
【宇文化及】
【王世充】
【窦建德】
【刘黑闼】
【翟让】
【李密】
【杜伏威】
【李世民】
【李靖】
【李绩】
【侯君集】
【褚遂良】
【徐敬业】
【安禄山】
【史思明】
【李光弼】
【王仙芝】
【黄巢】
【尚让】
【刘知远】
【郭子仪】

【石守信】
【潘美】
【杨业】
【戚继光】
【宗泽】
【李纲】
【岳飞】
【韩世忠】
【张俊】
【文天祥】
【成吉思汗】
【窝阔台】
【术赤】
【察合台】
【拖雷】
【蒙哥】
【拔都】
【元世祖忽必烈】
【木华黎】
【耶律楚材】
【伯颜】
【伯颜】
【脱脱】
【韩林儿】
【刘福通】
【徐寿辉】
【陈友谅】
【张士诚】
【李自成】
【张献忠】
【朱元璋】
【徐达】
【李善长】
【刘基】
【汤和】
【常遇春】
【熊廷弼】
【杨涟】
【袁崇焕】
【郑成功】
【多铎】
【多尔衮】
【吴三桂】